

20 世纪中国学术大典

军事科学

主 编 马天保
执行副主编 鲁保坤
副 主 编 金 钰 陈效良 金 鹏
王 泉 赵国强 傅荣斌



B1272649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 2002

2011.11.2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军事科学/主编:马天保,执行副主编:鲁保坤.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9
(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
ISBN 7-5334-3531-1

I. 军… I. ①马…②鲁… III. 军事科学-科学研究-概况-中国-现代 N. E-12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8413 号

责任编辑 林鼎华

装帧设计 谢从荣 林小平 张旭良

20 世纪中国学术大典

军事科学

主 编 马天保 执行副主编 鲁保坤
副 主 编 金 钰 陈效良 金 鹏
王 泉 赵国强 傅荣斌

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350001)

电话:0591-3725592 7811283

传真:3726980 网址:www.fep.com.cn)

利丰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印刷

(深圳南山区南光路 1 号 邮编:518051)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44.75 字数 1060 千 插页 8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 000

ISBN 7-5334-3531-1/Z·98 定价:145.00 元

ISBN 7-5334-3531-1



9 787533 435318 >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向本社出版科(电话:0591-3726019)调换。



毛泽东在延安撰写《论持久战》
(解放军画报社供稿)



毛泽东与朱德研究对日作战计划
(吴印咸 摄)



毛泽东与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委叶剑英
在一起



毛泽东与为中国火箭、导弹、航天事业做
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钱学森在一起
(孟昭瑞 摄)



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在研究渡江作战问题

(解放军画报社供稿)



邓小平与军事科学院院长宋时轮在一起



1985年5月，邓小平宣布
中国政府决定裁减军队员额
100万

(吴森辉 摄)



1981年9月，邓小平
乘车检阅参加华北某地军
事演习的部队

(段继文 摄)

江泽民等中央军委领导参观全军
训练模拟器材展览
(解放军画报社供稿)



1998年3月19日,江泽民视察军事
科学院时接见军事科研人员。
(江志顺 摄)



江泽民视察国防大学
(郑春龙 摄)

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央军
委领导观看航天归来的“神
舟”号飞船
(杨子恒 摄)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全军科学研究工作会



1959年1月，中央军委领导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全军科学研究工作会代表合影

(军事科学院院史办供稿)

全军毛泽东军事思想学术讨论会会场

(军事科学院院史办供稿)



全军战术讨论会会场



邓小平新时期国防建设军队建设理论研讨会会场

(军事科学院院史办供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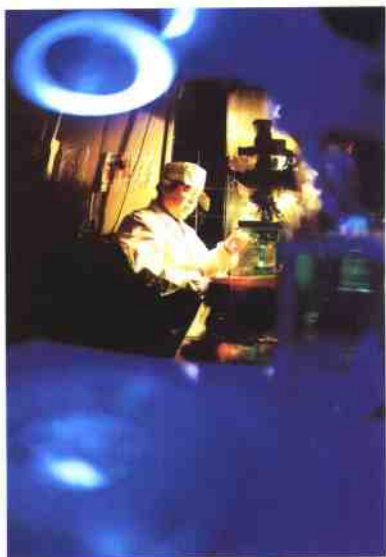
1999年7月，江泽民出席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杨子恒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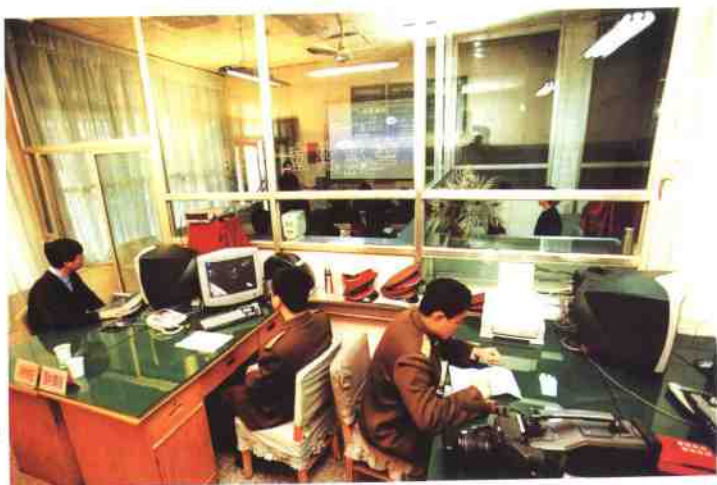
高技术条件下军事力量发展与军事斗争研讨会会场
(军事科学院院史办供稿)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军医大学附属医院专家在进行医学研究
(解放军画报社供稿)



1991年1月,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在北京成立
(军事科学院院史办供稿)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使用新研制的装备管理网络系统监控和管理车船装备
(解放军画报社供稿)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某部在图上
进行战法研究

(解放军画报社供稿)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某部研究作
战指挥问题

(转载自《当代中国空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某部科
研人员探讨指挥作战问题

(第二炮兵司令部编研室供稿)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
国际战略问题

(解放军画报社供稿)

1999年6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国
防大学召开“新形势下司令部建设与发展
学术研讨会”

(郑春龙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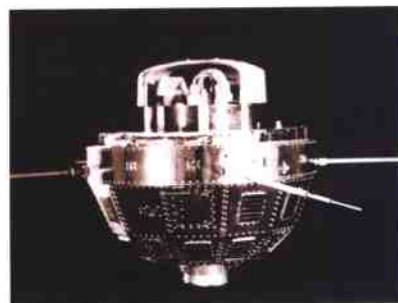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孟昭瑞 摄)



1967年6月17日，中国成功进行了首次全当量氢弹空爆试验
(孟昭瑞 摄)



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
(解放军画报社供稿)



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已检测调试完毕，准备发射
(解放军画报社供稿)



1999年11月20日，中国成功发射并收回第一艘无人试验飞船
(解放军画报社供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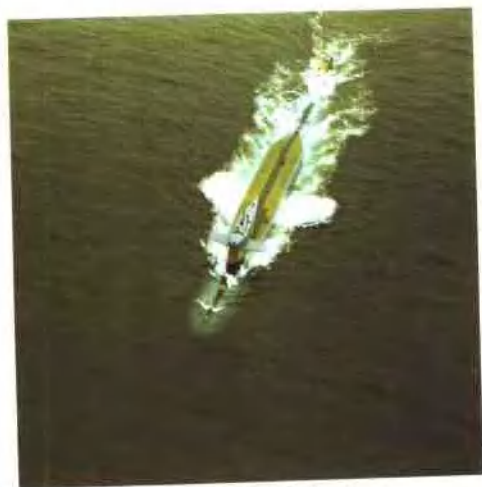
中国航天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解放军画报社供稿)



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三代战机
(解放军画报社供稿)



中国自行研制的可携带红箭8反坦克导弹的直9武装直升机
(解放军画报社供稿)



中国自行研制的攻击型核潜艇
(吴寿庄 摄)



中国自行研制的火箭布雷车进行布雷
(解放军画报社供稿)



中国自行研制的96式坦克
(岱天荣 摄)

《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顾问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 于光远 著名经济学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王元化 著名文学理论家 著名文化学专家
王淦昌 中国科学院院士
王绶琯 中国科学院院士
王朝闻 著名美学家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叶笃正 中国科学院院士
卢嘉锡 中国科学院院士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程裕淇 中国科学院院士
师昌绪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
汝 信 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
朱丽兰 国家科学技术部原部长
任继愈 国家图书馆馆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孙俊人 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正全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研究部部长
宋木文 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
吴阶平 中国科学院院士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张光斗 中国科学院院士
张岱年 著名学者 北京大学教授
陈荒煤 文化部原副部长 著名文艺理论家
林兰英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副主席
季羡林 著名学者 北京大学教授
周光召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主席
罗沛霖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
郑哲敏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
钱正英 中国工程院院士 全国政协副主席 水利部原部长
涂光炽 中国科学院院士
雷洁琼 著名社会学家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潘家铮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

《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编纂委员会

总主编：

吴阶平 中国科学院院士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季羨林 著名学者 北京大学教授

主任委员：

王绶琯 中国科学院院士

师昌绪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

汝 信 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

朱丽兰 国家科学技术部原部长

路甬祥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院长

委员人选由各学科主编等担任

各卷学科主编（按学科排列顺序）：

数 学 林 群 中国科学院院士

力 学 郑哲敏 中国科学院院士 力学所所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

物理学 冼鼎昌 中国科学院院士

化 学 胡亚东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

天文学 王绶琯 中国科学院院士

测绘学 喻 沧 国家测绘局原局长

地质学 李廷栋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地质科学院院长

大气科学 陶诗言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所原所长

固体地球物理学 陈运泰 中国科学院院士 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所所长

应用地球物理学 刘光鼎 中国科学院院士

海洋科学 刘光鼎 中国科学院院士

空间科学 刘振兴 中国科学院院士

地理学 吴传钧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所长

生物学 钱迎倩 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研究所原所长

王亚辉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细胞学研究所所长

农业科学 石元春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农业大学校长

水 利 朱尔明 国家水利部总工程师

医 学 王 镛 中华医学会副会长 中华医学杂志社总编辑

电子学 罗沛霖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
自动控制与系统科学 许国志 中国工程院院士
材料科学与工程 何继善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南工业大学原校长
矿业工程 何继善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南工业大学原校长
冶金工程 何继善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南工业大学原校长
信息科学与通信工程 钟义信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副校长
计算机科学技术 王行刚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
哲学 汝 信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常务副院长 研究员
陈筠泉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原所长 研究员
宗教学 任继愈 著名学者 国家图书馆馆长
卓新平(执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 研究员
考古学 李学勤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
历史学 李学勤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
博物馆学 李学勤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
文学 徐中玉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钱谷融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艺术学 郑雪来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电影评论家
教育学 顾明远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院长
心理学 张厚粲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社会学 陆学艺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所长
民族学 郝时远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
语言学 林 焘 北京大学教授
经济学 宋 涛 著名经济学家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法学 江 平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新闻学 丁淦林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出版学 方厚枢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军事科学 马天保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研究部副部长
关俊杰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研究部副部长

《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编辑出版工作委员会顾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 兰书臣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研究部副部长
朱永康 原福建省教育委员会主任
宋木文 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
汪远平 《光明日报》副总编辑
杨牧之 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
陈太一 中国工程院院士
林爱枝 福建省新闻出版局原局长
金常政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原副总编、编审
姚以恩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侯逸民 中国科学院院刊编审 北京现代管理学院教授
郭荣辉 原福建省教育委员会主任

《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编辑出版工作委员会

主 任：阙国虬

副 主 任：方建云 黄旭（常务） 王亿钦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亿钦 方建云 孙汉生 陈鹰平 林启仁

林 健 黄 旭 谢从荣 阙国虬

《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军事科学》
学术指导委员会

主任委员 徐根初
委员 李正全 王福成 兰书臣 关俊杰
黄伟民 王平 薛文浩 汤少云

主编、副主编

主 编 马天保
执行副主编 鲁保坤
副 主 编 金 钰 陈效良 金 鹏
王 泉 赵国强 傅荣斌

门类主编、副主编、编审人员

军事思想门类

主 编 鲁保坤
副 主 编 徐永军
编审人员 陈 焕

军事学术门类

主 编 金 鹏
副 主 编 董 明 杨 鲁
编审人员 刘玉中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门类

主 编 王 泉

副 主 编 黄伟民

编审人员 邢福有 张让来

军事后勤门类

主 编 赵国强

副 主 编 张广仁

编审人员 王恩斗

军事技术门类

主 编 王 平

副 主 编 贾 强

编审人员 李项鸿 孙晓文 曹凤军

军事历史门类

主 编 汤少云

副 主 编 蒋凤波 傅雁南

编审人员 金立昕 吴晓燕 陈振中 葛业文

军事地理测绘气象门类

主 编 傅荣斌

副 主 编 郑朝军

编审人员 于海涛

编辑出版工作人员

索引编辑 董 明 杨 鲁 张广仁

出版说明

《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是一部以条目形式总结百年来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社会科学、人文学科领域中国学人学术成果的大型工具书。

《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按学科分类分卷出版。各卷以学科体系为框架，分学科研究、专题研究、学术事件、学术人物、学术名著名篇、学术机构团体、学术刊物等7类条目。其中学科研究和专题研究为主体内容，占各卷的主要篇幅。

1994年7月，我社初步提出《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的出版构想，后曾多次向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术机构和高等学府的有关专家咨询，并召开多次座谈会，对选题的意义和价值进行论证和评估，得到学界权威人士的充分肯定。1996年开始制订编纂计划，完成总体框架设计，并开始向权威专家组稿。同年，新闻出版署将本书列入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的编纂出版，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工作。它有别于百科全书、学术史和学术年鉴。本《大典》以百科辞书的体例，构成一部独特的学术“世纪鉴”，实为一种崭新的探索。这一探索本身虽然不是学术研究，而是学术总结，但必须保持高尚的学术品位；必须尊重历史，推进科学发展，传播真知，批判伪科学和谬误。为了避免门户之见，本《大典》对涉及各学科、流派之间的争论，只要有学术创新，均兼收并蓄。

经过八年的不懈努力，《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这一跨世纪的大型丛书终于问世。以一家地方专业出版社之力，不畏风险，克服困难，完成如此巨大的出版工程，端赖社会各界特别是学术界的鼎力相助，特别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原副总编辑金常政先生，对这一大型丛书的总体框架设计提出过许多指导性的建议。在本书出版之际，我们谨向有关国家机关、学术机构和众多作者深表谢忱，并愿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意见，以利修订再版。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1年12月

序 一

季羨林

世界文明古国，决不止中华一家，而文明兴旺发达垂五千年而未尝中断者，我中华实系只此一家。这恐怕是天下之公言，决非我一个人夜郎自大之私言。

其原因何在呢？

统而言之，原因不出两端：一内因，一外因。常言道，内因是变化的基础或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密切联系，互为主次。

什么是中国文明的内因呢？我认为，内因表现得最突出之所在就在中国文明的特点上。多少年来，我自己虽不是哲学家，而且还最不敢喜欢哲学，但好胡思乱想，再加上一些个人的观察与体会，我发现：中国或东方文明的根基是综合的思维模式，再说得具体一点就是“整体概念，普遍联系”。而西方文明的根基是分析的思维模式，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从总体上来看，二者是对立的，运用得当，则还能起互补作用。天下没有绝对纯的事物，所谓综合与分析，并不是说综合中没有分析，分析中没有综合；但从宏观上来看，东方综合而西方分析，是无法否认的。这个看法，有人赞成，有人反对。但是尽管有人反对，我仍深信不疑。

这只是讲中国文化或文明的根基，具体表现亦有可得而言者。我个人觉得，中国文化的特点可以归纳如下：唯求实用，不尚玄虚，貌似浅显，实亦邃密，整体思考，枝叶兼及，允执厥中，不务偏激。最大的特点还在有极大的包容性。大海能纳百川，所以才成其为大。古人说：“有容乃大”，说的也是这个道理。还有一点，也是颇为值得一提的。中华民族，特别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对宗教信仰的需要极为淡薄，正式信教者不多，即使信了某一个宗教，也没有宗教偏执狂，有时甚至儒、释、道三教都信，而实际上是什么都信之不深，不陷入其中，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真正的宗教战争，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好处极大，它决不阻碍外来文化的输入，因为，历史事实证明，外未文化往往随外来宗教而入，宗教与文化是孪生兄弟。中国历史上两次最重要最有影响的外来文化输入，都是伴随宗教而来的，铁证如山，无可否认。

写到这里，我必须谈一谈外来文化输入的重大意义了。用不着是真正的科学

家，就是普通老百姓，也都知道一个平凡的真理：近亲繁殖，不利于后代的成长。造化小儿好像是有意制订了一条规律，天地间，包括人类在内的动植生物，大多忌讳近亲繁殖。必须不断有新的基因，新的血液输入，后代才能健康地发展。否则就会退化，就会萎缩。人类兄妹不能结婚，看似伦理，实为生理。这些都属于常识一类，用不着多加阐释。在过去，有些地方，有些人，连同姓结婚都忌讳。“五百年前是一家”的说法在起着作用。

人类文化，虽然不是生物，但却与生物有些类似之处，文化也有一个诞生、成长、衰退、消逝的过程。因此，它也受到了上述生物规律的制约。当代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他的巨著《历史研究》中就明确无误地阐明了这个观点。尽管书中有一些细节，我们不一定能完全同意，但是，总体来看，他的理论是能够成立的，原因是符合历史发展的事实。在他列举的人类从有史以来已有的二十凡种文明——他有时候称之为“社会”，有时候称之为“文化”——中，有的已经消逝得无影无踪，有的仍然存在。其原因汤因比有自己的看法和解释，我无法一一列举。总体来看，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一条生物发展的规律在起了或者起着作用。这一点他说得并不明确。明确归纳像我上面说的那样，我是始作俑者。对了，不敢掠美；错了，不能辞其咎。

画龙点睛，现在我要回答在本文开头时提出来的那一个问题了：中华文化之所以能连绵五千年而来尝中断的原因是，内因是有“有容乃大”的特点，外因是有外来文化，外来的新鲜血液的输入。外来文化的输入，如涓涓细流，随时流入，而规模巨大、延长的时间特别长的输入，在中国共有两次，一次是佛教伴随着印度文化的输入，一次是天主教和耶稣教伴随着西方文化的输入。这两次外来文化的输入相距一千多年，其影响一直到今天还没有终结。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辉煌数千年而不少衰，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对于这两次文化的输入，怎样评价也不会是过高的。人们能够想像，如果没有这两次新鲜血液的输入今天中国文化会是什么样子吗？

尼泊尔和印度佛教输入中国，其影响之既深且远，皎如明月，无人不知。其影响方面之广，实为空前。举凡哲学、宗教、文学、语言、音乐、绘画、建筑、雕塑、风俗、习惯，甚至天文、地理、科学、技术，以及鸟、兽、虫、鱼、水果、蔬菜，等等，等等，简直是无孔不入，中国都受到了印度的影响。（当然，中国也有相应的回报，只因印度是一个缺乏历史的国家，中国对印度的影响，至今还多隐而不彰，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去探讨、挖掘。）一直到今天，中国各名山胜地之琳宫梵宇，古刹宝塔，还能依稀反映出昔日辉煌。中国人民的信仰中至今还杂有印度佛教成分，这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因为本文的重点是想谈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的文化大输血，谈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情况，佛教影响就不再谈下去了。

我在上面曾提到过，中国历史上两次巨大的外来文化的输入，相距一千多年，我指的是明末清初西方文化随天主教而传入中国的事实。实际上，中国与欧洲之交通早已开始。蒙昧远古，姑且不谈。公元前二世纪汉武帝时已经有历史记载。（参阅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中国与欧洲之交通”）从那以后直至公元17世纪一千多年的时间内接触时断时续，时强时弱；但一直没有完全断绝。在这个期间，欧洲文化传入中国，中国文化输入欧洲，双方互助互利，等于双方彼此相互输入新鲜血液，双方文化得以昌明，这是世界历史上的大事，应该大书特书的。

谈欧洲文化输入中国，虽然是本文的重点，但是重点中还有重点，就是20世纪欧洲文化的输入。本《大典》的目的是叙述和总结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的，为什么离开本题去谈欧洲或西方（后来又加上了美国，美国文化实为欧洲文化的分支或发展）文化的输入呢？其中道理并不深奥，而是有目共睹的。离开了西方文化的影响而侈谈20世纪的中国学术发展，其中既包含人文社会科学，也包含自然科学和技术，是不会搔到痒处的。在这里也有一个内因与外因的关系问题。内因是中国本土几千年学术的发展，外因就是西方文化的输入。谈论20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二者必须兼顾，缺一不可。

今世之谈文化交流者多有这样的看法：一种陌生文化进入本土时，往往要经过四个阶段：进入，碰撞，适应，融合。证之以佛教传入中国之情况，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佛教无父无君，又不能传宗接代，这大大有悖于中国的伦理道德，大碰撞是必然的。佛教方面先做了自我调整或者伪装。儒家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佛经的翻译者在最初译经时改篡原文，突出强调一个“孝”字。中国方面一些虔诚的佛教徒，也想方设法为之涂饰。这种适应终于得到了报偿，佛教于是逐渐在中国立定了脚跟。这种从适应到融合的过程往往长达几百年。到了唐代，韩愈还在信佛的皇帝面前，大揭佛教的老底，其斗争之激烈可以想见。天主教带着西方的科技知识入华，也有一个同佛教相似的过程。但是，西方的天文、历算等的水平远远超过中国，清初康熙皇帝为之心折。中国钦天监的官员不服气，但是，事实胜雄辩，他对日食计算得不准确，而西方人准确，在事实面前，他不得不低了头。因此，我们可以说，在碰撞方面，西方自然科学传入中国，中国抵抗力极其微弱，从而碰撞也极其微弱，简直是微不足道了。

对于19世纪西方文化传入中国的情况应当多说上几句，特别是中、西、日三方面错综复杂的关系，更应说清楚，否则下面的文章就不容易作。此时，西方的工业革命仍在进行，殖民扩张，仍是不遗余力。而中国的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比如魏源、林则徐等等，也痛感有认识世界之必要。于是，西学东渐，两厢情愿。东渐的道路，大体上有以下四途：一、西方传教士；二、西方军事和科技人才，医

生；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四、中国派驻西方的使节。

西方传教士，使用传统的办法，倚仗一技之长，藉以传教。他们编写了一些英华字典，最早的有马礼通（R. Morison）的 *A Dictionary of Chinese Language*（1822），以后还有几本。我猜想，其目的是供西方人学习华语之用。这些字典在日本都有和刻本，有的甚至再版数次，对日本学习西方文化有一定的影响。

晚清时代，重视军队的建设，努力向西方学习，许多省份的武备学堂或者讲武堂间有聘请西方军官来华任教者。至于科技人才和医生，亦间有见诸记载者，大概人数极少。废科举建学堂以后聘有一些西方的教员。这恐怕已经是20世纪初的事情了。

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19世纪中叶可以魏源、林则徐为代表，晚清则有王韬等等。他们渴望了解西方。派留学生则是19世纪后期的事，容闳等是大家都熟悉的。

至于中国派遣驻西方使节，也多是19世纪下半叶的事。其中最著名的有曾纪泽、郭嵩焘、薛福成等等。今天读他们的使外日记或旅行记，对我们仍有很大的启发。他们对驻在国的经济、政治情况，十分重视。他们更重视西方的工业和科技，有很多参观工厂的纪录，都十分细致、精确。这种情况，我们今天的外交官还应该认真学习的。

虽有以上四个方面，但是我认为，效果并不显著。根本原因是，当时的政府已腐败透顶，什么良药都失去了作用。但也不是一点影响都没有。原来是从天子以至于庶人，几乎都患了夜郎自大狂，不承认西方有什么好东西。后来挨了几顿痛打，头脑清醒了一点，却仍然不彻底服输。于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等一系列的说法应运而生。到了更晚的时期，就产生了“西方物质文明，东方精神文明”的说法，聊以自慰，不思上进，迹近阿Q精神了。

现在我就专门来讲20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与西方文化传入中国的问题。到了此时，西方的坚船利炮，已经把中国皇帝和官员吓掉了魂，西方殖民主义气焰万丈。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中国毫无还手之力。在学术上和文化上，中国也是毫无还手之力。再用“碰撞”这个词儿，我认为已经十分勉强。一方咄咄逼人，一方节节退让，束手无策，哪里还有什么“碰撞”呢？常识告诉我们，只有在双方势均力敌的条件下，才能谈到“碰撞”。据我的估计，在20世纪前几十年大清帝国还在苟延残喘的时候，中西学术对比的情况就是这样。中国方面只有接受而没有什么“碰撞”了。

那么，西方学术是否就快马加鞭长驱直入了呢？也不是的。在这里，我想进行一点细致的分析。

我想从中西文化关系——我不用“碰撞”这个词儿——这个角度上把20世纪

的中国学术的发展分为下列五个阶段：

- 一 世纪初到五四运动前夕，约为1900年~1917年
 - 二 “五四”运动十几年，约1917年~1930年
 - 三 1930年~1949年
 - 四 1949~1978年改革开放
 - 五 改革开放至世纪末，约有20年
- 下面我分别来谈一下。

第一阶段

在这一阶段中，西方文化传入中国，路线有两条：一直接，一间接，前者微弱，而后者则极强大；前者弱不成军，后者则是一支强大的集团军。二者力量悬殊，根本谈不上势均力敌。前者的源头主要是英国，后者的媒介则是日本。

直接路线的代表人物或者主帅是严复。严复赴英国留学，本来学的是海军。但是，回国以后，清朝廷腐败已极，严复空怀报国之心，却是英雄无用武之地，遂退而从事译述工作，将英国的古典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逻辑，以及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等，都比较忠实谨严地介绍到中国来。其中《天演论》一书产生的影响特别巨大，至深且远，大家都承认，鲁迅本人就受其影响。严复还有一个“同志”，就是林纾。林本人不通西方语言，靠与别人合作，别人口译，林执笔为文，就用这种方式，他翻译了大量西方文学，不限于英国，美国、法国等都在内。他的译文对中国文艺界产生了不亚于进化论的巨大影响，成为中国文坛上的一个奇迹。此外还有极少数介绍西方文学艺术哲学思想的学者，其影响相对地说不可同日而语了。

上面说到间接路线是通过日本。在约有两千年的中日交往中，双方互相学习，受益良多。在中华文化鼎盛时期的唐代，日本大量地接受了中国文化。然而世事变化的规律是“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到了清代后叶，中国文化走向衰落，而日本则逐渐走向繁荣。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开始，大力向西方学习，结果是政治统一，经济繁荣，文化发展，教育兴盛。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已经大步地走在中国前面，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中国在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方面反而要向日本学习了。

在政治方面，日本一方面侵略中国，一方而又庇护反清排满的中国革命。孙中山，虽然主要活动在南方港澳以及美英等国，但也多次到日本，兴中会和同盟会都同日本有联系。黄兴的根据地就在日本。此外还有很多反清的英雄，都在日本住过。日本对中国辛亥革命的成功起过很大的作用。没有日本的协助——这一协助当然也是有目的的，辛亥革命怎样成功，实在还真是一个问题。

我的重点是讲学术文化，在这方面要讲得详细一点。20世纪初中国学术界的大师，有的是土生土长的不大接受西方的影响，因而成就有限。最著名的几位大师，比如章炳麟、梁启超、王国维、罗振玉等等，都是中西兼通的，而西方的学术文化，他们多是在日本通过日文的译述学习到的。王静庵先生也通英文，但是，根据他所处的环境来看，他必仍以日文为主。太炎先生虽居东瀛，从事革命活动，但仍不忘书生本色，在东京讲授《说文》，弟子中颇有后来有极大影响的学者和文学家，比如鲁迅、黄侃、钱玄同等等。这些人产生影响大多是在第二阶段中，也就是五四运动时期。我想在这里说一句：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时代划分上不得不尔；然而，学者们发生影响，则决不受这个划分的限制。上述诸大师，其影响至今犹在，有些人在中国学术史上，将会是永在的。话再回到本题：这些大师之所以有成就，因为他们肯于和善于吸收西方文化，而吸收的途径则是通过日本的媒介。

我再附带说上几句：我在上列大师中没有写上康有为的名字。原因是，我从来不认为康有为是一个真正的学者。说好了，可以称他为思想家；说不好，只能称他为“政客”。他的那一套学术，等于泡沫，到了今天还有什么人会提到他对20世纪中国学术的贡献呢？这也许是稍有偏见，但是既然这样想，我就只能这样说了。

我在上面谈了在第一阶段中中国吸收西方文化学术，主要是从几位大师谈起的。这个事实是无法否认的。但是日本的影响决不止于这一些。从平常我们不大注意的一些地方，背后也隐藏着日本的影响，比如中国现在通用的学科的名称，哲学、物理学、化学等等，连“科学”这个词儿本身也是日本的产物。好多学问，中国古代是有的，但并没有形成体系，中国人不认为它们可以单独成为学科的。这些学科在西方从希腊罗马以来逐渐形成成为独立的学术体系，有了专门的名词。日本先学了过去，使用中国的汉字命名，遂成为独立的学科。到了清末，由中国学人从日本传了进来。人们只要对比一下北京大学的前身或者北京大学初期课程表中的许多学科的名称和今天通用的名称有同有异，探讨其间的差别和变化，便可以恍然于心了。此外，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使用的术语中，也有大量的转抄自日本。

我还想说几句看似题外实为题内的话，这就是日本的西化问题同中国的西化问题的比较。中国的西化，时间并不短，中国学人认识世界或者企图认识世界，也早于日本。清代魏源的巨著《海国图志》出版于鸦片战争前后。这一部书参与者之一就是林则徐。在当时中国的环境下，能写出这样一部书，不能不谓之奇迹。然而它在中国起的作用并不大，而在日本则极大。有人甚至说，这一部书与明治维新也有关联。结果是，日本大规模的西化早于中国，而且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我

有一些日本朋友，我也曾数次访问日本，我的印象是：日本人把西方文化同本国的传统文化，包括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等融合得十分成功。新的学到，旧的没丢，达到了水平相当高的和谐。虽然眼前出了一些“离经叛道”的青年，日本人，特别是老年人，在惊诧之余，把他们称之为“新人类”，但似乎并无伤大雅。

最后我还要加上一点“多余的话”。清朝末年，中国学人大量涌入日本，学习各种各样的技术学问，大多数是日本向西方学习的产物。这些技术学问中不可避免地会搀杂上日本本土的东西。因此，据我个人的揣测，中国人间接学习到的西方文化，不可能是地地道道的西方文化。这个问题过去没见过有什么人研究过，似乎应当补上这一课。

第二阶段

我的标题为“五四运动十几年”，这只是一个极其笼统的说法。“五四”运动影响深远，什么时候结束，谁也说不清楚。

从西方文化传入中国这个角度来看，这一阶段的情况相当错综复杂，叙述起来有一定的难度。我想先从这个运动的两个主要发动人胡适和陈独秀谈起。胡适是留美学生，美国哲学家杜威的高足，带回中国来的是杜威的实验主义，与日本是不沾边的。他首先举起了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大旗，提倡文学革命。陈独秀，就其学习背景来看，是属于日本派的。众所周知，他的功绩首先在输入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看，都是一件大事，在五四运动中当然也是意义巨大影响深远的大事。从产生的根源来看，马克思主义纯属西方文化的范畴，专就胡陈二人来谈，胡适始终不赞成马克思主义，因为它与胡所服膺的美国哲学和政治思想不能相容。而陈独秀则终生信仰马克思主义。至于什么“托陈派”的说法，是受了苏联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可以说是无稽之谈。

“五四”运动所标榜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则都是不折不扣的西方玩意儿。

我现在专门谈一谈我个人对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一点看法。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方面，他是强调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重要影响；但是，我认为，其中也蕴含着马克思主义不是直接从德国传到中国来的，而是经过了苏联的媒介。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远早于十月革命。从19世纪末到“五四”运动前，中国已经有不少人介绍了马克思主义。许多介绍马恩的思想和事迹的文章见诸报刊。这些介绍者大都是国民党早期的创始人，比如朱执信、廖仲恺、马君武、胡汉民、戴季陶、李石曾、吴稚晖等等。如果我们分析一下上述诸人的生平事迹和思想来源，就不难发现，其中有

日本的影响。在这些人中，马君武与德国有联系、李石曾后来与法国有联系，其余的人大都是在日本影响下学习和成长的。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恐怕也多通过日本的媒介。

第一部《共产党宣言》的汉译本，是陈望道从日本转译的，虽然也参考了英译本。我不知道，最初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读的是什么文字的《共产党宣言》等书，有很大可能就是日文。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是日本留学生，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最初肯定是通过日文的。稍晚一点，共产党的领导人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大概是能阅读俄文译文的。到了20年代末30年代初，鲁迅等介绍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当时称之为“普罗文学”——仍然是间接通过日文译的俄文著作。据说，日本译者俄文水平不够高，对俄文原著了解得马马虎虎，因而日译文佶屈聱牙，鲁迅的译文当然也不会通畅的，结果产生了一场“直译”、“意译”、“硬译”的大辩论，文坛一时闹得纷纷扬扬。我再补上一句后话：到了解放后，中共中央翻译局的一位领导同志还对我说，他们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译文是根据俄文转译的，不是根据德文和英文原文。他义形于色地说：“俄文译文比原文更可靠！”我真是大吃一惊，真是闻所未闻。可见当时“一边倒”究竟“倒”到了什么程度。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还是未谈我们的“五四”时期。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首先是留学生情况或者留学途径。西方文化传入中国，途径颇多，其中留学生占的比重颇高，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稍有涉及。他们是“拿来主义”的主要执行者。他们去学习的国家主要是文化先进科技发达的国家，比如欧洲的英、德、法等国，太平洋对岸的美国，还有东方的日本。出国途径，除了个别的官僚和富商子女外，主要是两条：一是清华留美预备学堂，一是留法勤工俭学。前者先在国内招收十几岁的中小学生，入清华学习几年中学课程，主要是英语，毕业后派赴美国，学习科目文理工农工商医都有，在美国大学中获得学位后回国。这个制度延续了二十来年，时间长，人数多，很出了些有名的人物，例如胡适等，对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有极深远的影响。到法国去勤工俭学，规模不是太大，也不像清华那样正规，当然也出了不少人才。最突出的一点是出了一些共产党领导人，像周恩来、邓小平等等都是。这两条途径，对中国引进西方文化，都起了重要作用。

其次，我想谈一谈“五四”时期的文学团体。规模和影响都最大的是文学研究会，主要人物有茅盾、郑振铎、叶圣陶（绍钧）、夏丏尊、朱自清、俞平伯、许地山等人，鲁迅也应该归入这一派，巴金亦然。他们的宗旨是“为人生而文学”，倾向于现实主义。《小说月报》是他们的同仁刊物。可以说是他们的对立面的是创造社，创办人包括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等，用一个现成的名词来概括，他们接近浪漫主义，特点是主要成员几乎都是留日的学生。以上两个文学团体，奠

定了中国新文学的基础。在西方，19世纪德国的歌德首先提出了“世界文学”这个概念。据我个人的理解，在文学创作方面，全世界各国人民不可能有统一的思想感情，也就是说，文学作品内容可以因民族的不同而异。真讲到世界统一，只能表现在形式方面。事实上也正是这样。这最明显地表现在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戏剧方面。散文形式多样，无从表现，诗歌亦然。仅以中国、印度、日本等东方国家而论，新的小说和戏剧，在形式上都被西方的小说和戏剧所统一。从鲁迅起，一直到茅盾和巴金，他们的小说在形式上同欧洲毫无区别。在中国流传了几百年的章回体不见了。中国旧小说叙事一般都是原原本本，而西方则不这样，往往从中间插上一杠子，然后再追述或补述。在戏剧方面也完全采用了西方的形式。“五四”时期，易卜生的戏剧不但在思想方面有深远影响，在形式上也统一了中国的戏剧创作，一直到今天，始终未变。试问曹禺的剧本在形式上同易卜生有什么不同？同元剧又有什么相同？西方文学在形式上统一了世界，成了“世界文学”。东方国家进入“世界文学”这个领域，时间有先后的不同。印度和日本都早于中国。

我在这里还必须补述一下《学衡》杂志的情况。这个杂志是清华留美学生吴宓创办的。他在美国师从白璧德，学习比较文学。白在美国以宣扬人文主义著称，是属于保守派的。吴回国后就邀集志同道合者，创办了《学衡》，是一个综合性的刊物，不限于文学。它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反对白话文，可谓逆当时的潮流而动的，因而遭到了鲁迅等人的严厉的批判。影响是有的，但不是太大。这个杂志与日本无关，可以说是一个打着白璧德美国招牌，企图在中国复古的一个尝试。按时间顺序，这个杂志主要应归入第三阶段。

再次，我想谈一谈“五四”运动大本营的北京大学的情况。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过程，我上面已经谈过了，这里不再重复。北大校长蔡元培是一位人品道德学问都极高的人物，办学极有远见，他的一些想法和做法，至今依然光辉闪耀。特别是他那种“兼容并包”的精神，更令人钦佩不置。世界各国古今学术史都证明了一个事实，只有真正的而不是口头上的“百家争鸣”，才能使学术兴隆发达。蔡元培真正是言行一致的。他聘请教员，不讲资历和学术见解，只要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他一律延聘。极端激进的和极端保守的，一视同仁。共产主义者和复古主义者，都能在北大讲坛上有一席之地。辜鸿铭这个人物以怪著称，他受的完全是英国式的教育，著作不多，著作中洋味更少，在当时以及后来，他的影响都不大，最近几年又多人提起。梁漱溟当时年纪不太，他那一本《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则影响不小。真正参加发起五四运动的骨干是一批年轻人，比如傅斯年、罗家伦等。顾颉刚又以《古史辨》一书名震遐迩。钱玄同自称“疑古玄同”，也属于疑古一派。中文系的三马、三沈、二周，都是当时有名的人物，其中周树人（鲁

迅)更为突出。新派人物出版的杂志《新潮》、《语丝》等,影响极大。冯友兰是北大学生,留学美国,后来长期执教于清华大学。在“五四”期间,有几个著名的外国学者被邀请来华讲学,比如英国的罗素,美国的杜威,印度的泰戈尔,后者是诗人文学家,对中国新诗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冰心早期就受到泰戈尔的影响。

最后,我想谈一谈清华国学研究院。有人称之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这是不大确切的。研究院建立时,还没有清华大学。研究院存在的时间极短,只有几年。教师的人数极少,只有有名的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再加上一个讲师李济,不过五人而已。学生的人数也不多。办学的方式介乎西方的学堂与中国传统的书院之间。入学考试不注重学历而注重学生的学术素质。入学后教师能做到因材施教。结果毕业的学生中很有一些极著名的学者,一般几乎都是大学教授。到了抗战时期就形成了“吾师派”,可见其影响之深远。我总感到,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办学经验实在很值得总结的。四大导师,梁、王两位,前面已经谈过。陈寅恪留学日、美、欧等地,而以在德国为最久。但是他的学风都无西方影响,毋宁说是更接近乾嘉学派。

从“五四”到卅年代,这第二阶段,十几年中在中国思想学术界发生了几次重要的论战:如“问题与主义论战”、“科学与玄学论战”、“东西方文化论战”、“社会主义论战”、“哲学论战”、“中国社会性质与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等等。在这些论战中,除了“东西方文化论战”直接涉及中西文化以外,其他论战也多有涉及中西文化矛盾的地方。这些论战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学者面临“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时代主题所做出的不同理论思考与选择。我以为,今天我们不能仅以政治立场为标的做出判断与批评,而应细心审视他们论战的内容,汲取双方理论思维的教训,才真正有益于今日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避免再重犯历史性错误。

第三阶段

现在来谈第三阶段。我在上面说过,二、三阶段之间的划分,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只不过是一个大概的轮廓。有不少学者在第二阶段已经崭露头角,到了第三阶段,甚至第四阶段才真正大展鸿图。

这一阶段,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个多事之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接着来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最后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原扫荡,国无宁日,大学内迁,衣冠南渡。这些情况,本来是应该对学术的繁荣不利的;事实上,这些情况也确实制造了一系列的困难。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在这段将近二十年的动荡中,中国学术不但没有萎缩,反而有繁荣兴盛的迹象。从中国历史上来看,第一个文化学术最兴隆的时代是春秋战国,当时正是群雄割据,战乱频仍的时代。然而真正的“百家争鸣”也出现于此时,成为中国空前绝后学术空气最

自由，学术思想最活跃的时代。到了汉武帝时，天下真正统一了，武功真正显示了，但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没有使学术繁荣。这个经验是值得记取的。

在这个第三阶段中，学术上真有百家争鸣的气象。国民党政府想控制而没有力量。许多学术大师，比如鲁迅、胡适、郭沫若、冯友兰、汤用彤、陈寅恪、陈垣、王力、朱光潜等等，都不断有新著出版。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学者，如郭沫若、翦伯赞等等，高举唯物主义的大旗，向他们所认为是唯心主义者的学者们，发动攻击，仿佛真是真理在手，义形于色。在文学界也表现出来了差不多类似的现象，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人都不断有新作问世，充分显示了活力和新意，是他们创作如日中天的高峰期。他们大多数人活到了建国以后，有的还有作品问世，有的则噤若寒蝉。问世的作品也多少含有遵命文学的味道，不复有当年的光彩，这一点是十分值得反思的。

在这第三阶段中，中西文化的碰撞没有什么明显的表现。

第四阶段

指的是1949年~1978年，自建国至改革开放时期的开始。

中国人民的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给全中国人民，包括海外的华侨和华裔，带来了空前的希望；给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爱国思想深入骨髓的老知识分子，带来了无比的欢欣和鼓舞；给中华文化学术的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赤县神州的天是明朗的天，这里的人民好喜欢，是真真正正的一派大好形势，我们真觉得是站起来了。引得许多海外著名的知识分子，包括科学家和文学家，纷纷回国；华侨子弟违背父母之命争先恐后地赶回祖国。文化名人如钱学森、华罗庚、老舍、罗常培、周培源等等都回国来了。他们满以为解放了的中国是人间天堂，有如佛国净土，着着实实地狂欢了一阵子。

然而，好景不长，一转眼间，中国知识分子就运交华盖，灾难临头了。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基本上都是指向知识分子。你能逃过一个，但不能逃掉下一个，磕磕碰碰，无人能免。首先是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跟着是一系列的批判，批电影《武训传》，批俞平伯，批胡适，批陈寅恪。接着又来了肃反，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到了1957年，就来了有名的反右斗争，什么“阴谋”、“阳谋”，“引蛇出洞”，总共划了55万右派分子，都是知识分子。有些人被划为右派的原因，今天说起来，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可有的人就因此弄得家破人亡，中间还间夹着大跃进、人民公社等三面红旗，“左”风肆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1962年庐山会议，本来是准备反“左”的。彭德怀一封万言书，又扭转了乾坤，大扇反右之风。紧接是四清运动，四清还没有结束，就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涉及面之广，行动之荒谬与残酷，为害之大，简直是空前绝后（这是我的希望），人世罕见，成

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个奇耻大辱。“文革”一直搞了十年，没有人能控制局面，文化遗产遭破坏之严重，无法想像。结果是经济濒临破产，中华民族处于风雨飘摇中。

在上述的情况下，哪里还能谈到真正的文化事业，真正的学术研究？虽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实则是一花不放，或一家独鸣。这一家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具有普遍的真理，学一学是有好处的。但是，从来源上来看，马克思主义属于西方文化的范畴。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是用另外一种形式接受西方文化。可是我们号称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国实际”中就包含着中国文化，可见这种学习是融会贯通中西文化的。至于结合的结果如何，有目共睹，我就不再饶舌了。

不过，我在这里还想再重复一下我在上面已经提到过的一个观点：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直接从马恩原著中学习的，而是通过苏联，这种马克思主义难免打上了苏联的印记。我只举一个极小的例子，恩格斯曾说过，生产包括两个方面：物质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但苏联只讲前者，我们也东施效颦，把后者忘记了。

在人文社会科学界，一般的情况是，把极端复杂的研究对象，在马列主义旗帜下极端地简单化了。研究哲学的，只讲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首先把每一个中国古代哲学家都贴上了一个标签：唯物或唯心。往往有同一个古代哲学家，被今天的同一个哲学史家，今天贴上了唯心的标签，明天又贴上唯物的标签，任意而行，形同儿戏，好在已死去几千年的哲学家决不会从坟墓中站出来抗议，今天的研究者心安理得，自我感觉极为良好了。在历史学界，讨论的重要问题是历史分期。中国封建社会究竟是从何时开始？学者间争论不休，甚至动了意气；可是争论了几十年，依然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争论起源时间，相差千年，到今天只好不了了之。另一个问题是农民战争。据说农民战争是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动力。可历史事实是，农民战争只起破坏作用，胜者王侯败者贼，胜利者依然是骑在人民头上的剥削者、压迫者、屠杀者。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让学术进步，岂非缘木求鱼，南辕而北辙吗？

第五阶段

我指的是1978年的改革开放一直到世纪末的今天。

改革开放，天日重明，挽救了我们国家的经济，也挽救了我们的学术文化。继承和发展学术文化的知识分子头上的紧箍松了一点，那种天天过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日子，终于成为过去了；那种被打倒在地，身上踏上一千只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的恐惧，也终于消逝了。知识分子们焉得不额手称庆由衷地感到喜悦

呢？

然而，这种喜悦并不是立刻就感觉到的，中间有一个长期的缓慢的过程，主导这个过程的是—种特殊的反思。1978年全国政协恢复活动时，我们社会科学组的成员到友谊宾馆去报到时，我遇到了在文革期间被尊为文艺界黑线的头领的一位长久领导文艺工作的高级干部，我们也算是老朋友了，已经十几年没见面了。他一看到我，就赶过来同我热烈握手，仿佛都是死里逃生—般。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古代说：‘士可杀，不可辱’，现在看来却是‘士可杀，亦可辱’。”说罢哈哈大笑。我—时真分辨不清，他是哈哈大笑呢，还是嚎啕大哭？

但是，他的话却引起了—我灵魂深处的共鸣。我在《牛棚杂忆》中提到，我在“文革”中曾—度想自杀。只是在间不容发的奇迹中，我没有能如愿，厚颜无耻地活了下来。在过去二十年中，我经常反思这个问题。这种事对我来说是幸呢，还是不幸？结论到现在也还下不了。但我仍然倾向于不幸，我觉得，没有自杀是我生平做的一件大错事。那位文艺界的“黑线人物”的想法，以及我自己的反思，我认为，都说明了一件事：根据我的观察和读书，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有两事有别于西方知识分子：—是根深蒂固的爱国情怀，—是硬骨头精神。前者先不谈，专谈硬骨头，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便是。然而，到了十年浩劫，硬骨头—变而为软骨头。自己造神，自己膜拜，受到了千古未有的耻辱，仍能觊颜活下来。中国知识分子，包括我自己在内，何以能下作到这个程度，我至今不解。

反思归反思，工作归工作。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又重新振作起来，不顾待遇的菲薄，国家照爱，工作照干，兀兀穷年，刻苦钻研，—时文坛和学坛又充满了活力，沉寂了三十年，又重新活跃起来。文网已疏，思想自由，新思想、新观点，也敢于提出。我在上面再三强调，这是繁荣学术必不可少的条件。有一点我必须特别强调：现在敢于同外国同行切磋琢磨了。在文革中谈洋色变，自造囹圄，自我禁锢，现在大大地改变了。在当今地球已成为地球村的时代，如果再自我封闭，中国的学术研究后果真不堪设想。

这一阶段，学术研究的成果大体上可以归纳为如下几项：

—、在古籍整理出版方面有比较显著的成就，出版了几套大书，比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丛书》、《全宋诗》、《全宋文》等等。还有几套丛书，比如海外的中国古籍等。标点本《二十四史》在上一阶段已经出版。

二、将中国古籍输入电脑。我手头没有详细的统计，估计其量极大。全国许多大学和研究机关，都在兴致勃勃地做这一件工作，包括台湾在内。许多大型的中国古籍，比如《全唐诗》、《全唐文》、《四库全书》等等，都已输入电脑，看来这一件工作方兴来艾。对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些大作家，这件工作实在具

有革命的意义。过去，写书写文章，第一步重要的工作就是搜集资料。这件工作是异常艰苦的。中国古代的著作往往不知索引为何物，一直到今天，此风未息。这对阅读者非常不方便。现在有了电脑，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基本解决了。今后学者的工作重点不再放在搜集资料上，而在使用和阐释资料上了。我认为，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当然，很难想像能把所有的典籍都输入电脑，因此，总还会有一些冷僻的典籍需要人工检索。

顺便提一句，现在制作光盘的工作已在进行中。这对利用古籍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三、上面我曾提到，在那“闭关锁国”时代，我们不能也不敢去了解外国科学进展的情况，这当然会大大不利科学研究工作。现在有机会同外国的学术界交往了，联系了，从而我们对外国学术进展的情况有了基本的了解。外国那些生生灭灭的学说，也介绍到中国来了，我们不再坐井观天了。但是，这里面也有危机，据我个人的看法，至少有两个危机，一个是翻译外国学术著作不忠实于原作，一个是只注重输入新名词、新术语，真正涵义则往往忽略。这一点，我们今后必须努力纠正。

四、许多原未空白的学科现在补上了，或者至少是加强了，比如比较文学、敦煌吐鲁番学等等。在过去，我们基础非常薄弱，甚至引起了外国学者的讥笑。现在已经建立起来了，老、中、青三代的研究队伍，也逐渐形成了。这情况在敦煌吐鲁番学的研究上，表现得更为清楚，过去曾轻视过我们的外国学者，现在不能不刮目相看了。

但是，也并不是一好百好，一了百了。现在有许多中国学者慨叹，国际论坛上没有中国的声音。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除了个别学科外，我们真正能处在世界学术前列的确实没有。倘若再从中西文化碰撞这个角度来看，西方文化，包括精华和糟粕，有的甚至于算不上文化，都如汹涌的怒涛一般，冲入中国，一往无前，势不可挡。中国仿佛成了一片空虚，哪里还谈到什么碰撞！中国一部分人又犯了一窝蜂的老毛病，凡外皆佳，是华必劣，对西方文化顶礼膜拜，其虔诚胜于朝山进香。鲁迅是主张“拿来主义”的，如果他能活到今天，看到这种“拿来”的情况，一定会是痛心疾首，而又无可奈何。反观西方，一般人仍以“天之骄子”自命，对中国文化一无所知。多少年来，我张皇“送去主义”，我自认是有道理的。

第五阶段写完，时间已经到了世纪末。下一个世纪怎样呢？我不是王铁嘴，不是张半仙，但是，我仍想说一点预言。西方文化发展到了今天，为世界人类造就了巨大的福利，但是却显露出来了严重的弊端。克服这些弊端，西方文化本身是做不到的，必须济之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方文化，人类才能顺利生存下去。中

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将重现辉煌，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

我在上面用了一万多字，从中西文化碰撞的这个角度上来总结了中国一百年来学术的发展。我不是研究中国学术史的专家。真正的专家们从其他角度上大概也能总结出他们认为是正确的发展规律。如果有的话，我也不敢赞一辞。我现在不过是根据我自己的认识水平，写出了我的看法，期望得到真正专家们的教正，若能够得上一得之愚，则我就感到欢欣鼓舞了。是为序。

1999年1月31日写毕

序 二

路甬祥

20世纪是科学技术成就辉煌的世纪，也是人类理性日益成熟的世纪。人类对自然的观察的视野在微观和宏观两方面都扩大了10万倍以上：对物质结构的认识已经从大于 10^{-10} 米的分子、原子集团深入到小于 10^{-18} 米的基本粒子内部，而对宇宙的观察眼界则已经从直径10万光年扩展到150亿光年的大宇宙范围。一方面，由于各门科学的深入发展，我们周围的自然界从分子、原子、基本粒子，到细胞、细胞核、染色体、DNA分子、基因片段，到宇宙、天体、地球表面和地壳内部，所有各个层次都得到了较为深入研究；另一方面，由于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的大量兴起，各门学科之间的空隙逐渐得到填补，其中特别是分子生物学的出现，使物理科学和生命科学之间的鸿沟开始消失。由此，自然界各方面各个层次及其之间的过渡环节也开始逐一为人们所认识，整个自然科学正在形成不断发展的、多层次的、综合的统一整体。伴随着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使人类对科学技术活动认识的哲学眼光、历史视野和战略高度不断扩展和提升。科学哲学、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的发展，以及对于生态环境危机的警觉和可持续发展观念的形成，对于科技对人类社会自身发展可能带来的危机的担忧，标志着人类对科学技术反省和思考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加大。

20世纪上半叶发生的一系列科学革命，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人类对世界自然图景的认识，而且带动了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相对论、量子论和信息论的创立，DNA双螺旋结构分子模型、夸克模型的发现，系统论与控制论的建立，以及地球板块模型、宇宙爆炸假说的提出，标志着人类对于物质、能量、时空、信息、生命、地球和宇宙认识的新的革命。量子化学、固体能带论、质能转换原理、生物遗传中心法则、受激辐射理论、反馈控制等为技术发展提供了划时代的关键科学原理，开创了信息技术、新材料与制造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海洋技术和空间技术等等一系列高新技术领域。原子核物理学研究的核技术的发展，导致了原子弹、氢弹、核电站以及可控核聚变实验的实现；源于半导体物理学、电子物理学研究的微电子技术的发展，导致了电子计算机的硬件系统从电子管到晶体

管再到集成电路和大规模集成电路、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迅猛发展，其软件系统的发展则是以数学和逻辑学为基础的；源于量子理论的光发射和吸收理论与固体物理学结合导致了激光器的诞生，不仅发展出半导体激光器和气体激光器等多种激光器，还衍生出基于其他物理原理的自由电子激光器和原子激光器等，导致了激光和光通讯技术的出现；而基因控制技术，包括引起震撼的动物克隆技术，则都是以DNA的双螺旋结构和遗传中心法则为基础的。快速推进的科学和不断发展的社会需求成为技术进步的基础和推动力。基于科学基础上的技术创新、技术发明不断涌现，不断引发出影响深远的新的产业革命。技术进步也为科学发现和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实验与观察手段。

上述这些20世纪中最重要的科学技术成就已经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仍然在不断迸发出对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力。不仅如此，这些划时代的科学技术成就既是与科学技术相互作用的结果，又对其自身发展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使科学技术在最近100年里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绚丽多彩的图景。在这一百年的时间里，人类已经创造出了前几千年都不可比拟的物质文明。今天，人类开始进入工业化社会的高级发展阶段——信息化时代，并已形成以知识为基础与推动力的知识经济构架。科学技术更加彰显出了推动社会发展的无与伦比的力量，成为国家综合国力与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

中国现代科学技术事业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走过了它的奠基时期和开拓时期，并在21世纪已经进入了一个创新发展的新时期。

中国科学一世纪末的孕育、成长、变革与复兴，自然带有中国民族文化与国情的深刻烙印。一百年前，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肇始在社会主要表现为西方传教士的科学输入以及洋务官员实施的技术引进。进入20世纪以后，大批海外归来的学子们办学校、建学会、出学报、带学生，成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奠基人。当时，一大批觉悟了的知识分子构成了中国科学化运动的主体。高扬“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的“五四”运动，不仅是影响最为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而且是一场科学启蒙运动。当时社会上的智士仁人、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中国要“救亡图存”、“富国强兵”，不仅要推翻封建统治、打破闭关锁国和文化禁锢的传统，实现民主革命和思想文化解放，而且必须使科学成为新的认知体系的主体。可以这样说，20世纪初中国大地上高高扬起的“科学”旗帜，从一开始就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人们把科学当做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有力工具，另一方面，人们对科学精神的文化价值也给予了充分肯定。科学在中国近代社会上取得的这种地位的过程，虽有曲折，但仍不失为20世纪整个世纪的主流。

1915年中国科学社的成立，不仅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已自觉地肩负起中国科学的社会责任，而且标志着中国科学的体制化过程的开始。该科学社提出的宗旨

为“联络同志，研究学术，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它提倡的科学活动内容包括：“发行杂志，传播科学，提倡研究”，以及“设立各科学研究所，施行实验，以求学术、工业和公益事业的进步”。它的影响所及，曾一度遍布全国。这些科学活动，不仅在中国创建了许多近代新学科，而且造就了一大批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他们以科学社团的形式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科学的历史发展进程。在这些专家当中，绝大部分是归国留学生，侯德榜、竺可桢、茅以升、李四光等则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后来于1927年按照孙中山先生提议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于1949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均承袭了科学社的传统。虽说，当时中国科学的体制化进程从民间模式转变为政府模式之后，其发展不能不受到政治和社会文化思潮的冲击与影响，但我们亦应看到正是这种把科学组织纳入国家建制化的模式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有利于全国性科学技术规划的制订，有利于国家科学发展目标的实施；而且还有利于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到国家重大发展目标上来。到30年代，理、工、农、医各科的学系、学会和研究所都已初步建立起来了。

在20世纪的前50年，中国科学家不仅在地质学、生物学和古人类学等“本土”科学方面做出了较大的成绩，而且在国外研修的中国科学家还在科学的诸前沿领域也做出了一些重要贡献。前者如中国地质图的绘制、中国植物图谱的编撰、水杉植物的发现、北京猿人的发现、地质力学的创立，以及传统科学遗产的整理等科学成果不仅对于中国有重要价值，也具有世界意义，关于中国资源分布和文化遗产的研究对于了解全球演化和人类历史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后者如数论和示性类的研究、正负电子对湮灭的早期实验、恒星光谱型与温度关系的认证、铀核三裂变的发现、 μ 粒子的发现、植物呼吸酶的发现、验证中微子存在的实验方案、上临界马赫数概念、行星波不稳定性概念、水的三相点的测量、联合制碱法等均是一批有世界影响的工作。30年代成为人们常常回顾的中国现代科学开创奠基的时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科学技术事业获得全新的发展环境，特别是由于1956年制定了12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诸如分子生物学、核物理学、高能物理学、高分子化学、半导体物理学、计算机和自动化科学技术、生态学与环境科学、空间科学技术等方面的研究也都发展了起来。中国科学家在几乎完全被封锁的极端困难条件下取得了一批重要科学技术成果，例如对我国自然资源和环所进行的大规模科学考察、勘探和综合研究，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成因、过程、规律及其对东亚地区自然环境的影响，全国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及生态农业研究示范，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了有生物活性的牛胰胰岛素，在陆相生油的理论指导下发现并开发了大庆油田，提出数学优选法并在工农业生产领域大规模地推广，特

别是成功地实现了核弹爆炸实验、导弹发射和人造地球卫星上天。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科学家们也曾经受了改造的困惑、反右扩大化的伤害、三年自然灾害的苦难、帝国主义封锁和苏联终止援助造成的困难以及“十年动乱”的破坏，但仍以其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强烈民族责任感实现了国家和人民的期望，为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国际地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艰难曲折的六七十年代成为开拓者们值得回忆的英勇的时代。

改革开放的社会条件和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确立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为加快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步伐，以追赶迅速发展世界科技潮流，从1984年开始进行了科技体制改革的诸多探索，科学技术为国民经济服务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例如：高产优质杂交水稻的育成与推广，数学机械化证明，农业病虫害的防治，小麦、棉花、油菜、烟草等新品种的培育，人造卫星及卫星应用技术的发展，数千亿次超级计算机的研制，非线性光学晶体生长，稀土永磁材料、工程塑料，6000米无缆自治深海水下机器人的研制，高温超导体的研究，用基因工程技术获得乙肝疫苗、人生长素、干扰素及青霉素酰化酶的研制能力，以及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等一大批科学工程装置的建成等。但到目前为止仍缺乏自主创新领域和国际领先的独创性研究工作。当代世界正处在历史性的转折时期，对于开始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的中国，科学技术也必须先行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因此我们正面临一个充满着机遇和挑战的时期，它为一切有信心和创新能力的中国科技工作者提供了崭新的机会。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平、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综合国力的发展为中国科学技术的大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只要我们认真总结百余年来经验教训，在实现国家第三步战略目标的过程中，完全可以把中国科学技术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开创一个中国科学技术的创新时代，为中国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国防安全提供强有力的支援，为人类科学文明做出新的重大贡献。历史表明，必要的投入，遵循科技创新的客观规律，实施有效的政策和组织管理，加上由爱国奉献、求真唯实、协作创新等鲜明科学文化价值导向所形成的物质与精神力量，使新中国科学家在极其艰难条件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科学奇迹。“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大庆油田的自主勘探与开发等，正是其中最为辉煌的例证。吴文俊院士独创地继承光大了中国古代数学的精髓，将其数学机械化的思想与现代计算机科学相结合，做出了自动推理领域的先驱性工作，开现代中国数学家开创世界数学研究新领域的先河；而袁隆平院士则在着力解决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的粮食问题的崇高责任感和使命感所形成的坚定信念的驱使下，冲破了当时经典理论认为的水稻等“自花授粉作物没有杂种优势的”遗传学流行观念的束缚，开创了两系法杂交水稻育种技术，并在超级杂交稻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他们成为新世纪伊始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获得

者，代表了中国科学技术面向新世纪发展的方向。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当我们为迎接全球化知识经济的挑战，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时候，在学习和吸收国际科技发展和先进科技管理的有益经验的同时，我们仍然不可忽视中国科学发展的自身特征与优势。

科学是不断发展的系统化、理论化的知识体系。科学知识是借助于正确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认识客体，并积累、整理、分析、归纳其结果而系统表述的知识体系和理论。科学发展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其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的历史继承与创新。科学不是哪一个时代的产物，而是历史性的积累和发展的结果。由于自然现象的复杂性，人们对其规律的认识往往有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伪存真的过程，逐步发展成系统的科学知识。它不但来自生产实践和社会活动，更来源于科学实验。它是严谨的科学观察的记载、严格科学实验的结果，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重复，能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与规律，从而有真理性。但科学没有终极真理，它随时接受新的事实检验，并伴随着客观事物和人们认识能力的发展而发展，科学有无止境的前沿。

因此，科学的意义在于发展和创新。有新的发现，对已有的知识按新的观点进行分析和归纳，创造新的理论和新的方法，或者用科学知识开发新的应用。进行科学创新必须首先解放思想，不为传统观念和已有知识所束缚，善于提出新的问题，勇于开拓新的方向，创造新的知识，创造新的方法，开拓新的知识应用。科学的发展不但有数量的积累，也有质的飞跃。在某一科学领域中，当知识积累和发展到一定程度，可能产生重大突破。这种突破可能使某一科学领域的知识结构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或使一门或几门学科得到迅猛发展。

科学是认识人类社会和自然的研究活动。科学不仅仅是指已被认识的真理和知识，也是指认识真理和获取知识的探索过程。原始的科学活动寓于生产活动，后来被逐渐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活动。活动方式也从个别科学家，转变到18世纪以后学院式研究，到20世纪已发展成为完全社会化、国家化和全球规模的社会活动。科学活动是一种创造性的脑力劳动，其主体是科技工作者——知识分子。科学活动需要物质条件，同时更需要信息环境、文化氛围、科技人员的主观条件——知识基础、创新思想和正确的科学方法。19世纪以后，由于出现了科学——技术——生产的转化方式，显示出科学对生产力的革命性推动作用。社会对科学技术表现出强烈的关注与需求。科学活动的规模和空前发展的速度，则表现出对社会越来越大的依赖。科学社会化和社会科学化的进程正在迅速发展。现代科学已成为社会和国家的事业。专门从事科技活动的社会成员也空前增加，科学立法、科研管理部门、科学基金会、国立研究机构、大学、企业研究开发部门、科学学会、国际性科学组织……等形式不断发展，已成为一种完整的社

会建制。它树立了自己的科学目标、科学精神、科学价值观、科学道德规范、科学活动的方式和方法。它已构成了当代社会建制的的一个重要部分，并与政治建制、经济建制、文化和教育建制等相互影响，紧密联系，共同作用，决定着国家、民族和人类的文明进程。

科学的价值在于求真，在于它的真理性。而认识客观世界的社会价值更在于改造世界，在于为人类带来福利，满足人类的需求。科学之所以发展成如此宏大的事业，之所以受到社会的如此关注和重视，正是由于它不仅为人们提供了自然规律的系统知识，还在于它为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注入不竭的动力。科学的价值是通过科学活动的内部结构实现的。当代科学认识活动已经形成了特定的内部结构——基础研究、战略研究和应用发展。其发展趋势是相互联系更加紧密，转移更为迅速。基础研究的目的在于增加新科学知识和新科学领域，而往往并不直接考虑特定的应用目的；战略研究是近年来出现的概念，系指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研究与开发工作，包括重大定向基础研究、重大战略高技术研究与发展的重要公益性研究。基础和战略研究主要依靠国家支持和组织。应用与发展旨在通过研究所获得的知识指导生产新的材料、产品，建立新的工艺、系统或服务，并从本质上去改善和更新已经在应用的那些材料、产品、设计和工艺。应用与开发的主体是企业，主要动力是市场与需求。从而科学作为整体体现了其双重的社会价值——真理价值和应用价值，表现了不同的行为主体和运行机制。

进入创新时期的中国科技事业面临三项艰巨的任务：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提高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和探索适合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今天，科学发展的速度不仅取决于投入，而是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有效的科学体制。自19世纪以来科学的进步就已表现为“知识”和“体制”两个方面，后进者缩小差距的主要方法往往是采取了18世纪来以来有效的近代教育制度和研究建制。中国在19世纪中叶接受现代科学时，知识水平的差距近300年，而在引入先进的教育和研究体制后，即能在100多年的时间内把知识水平的差距缩小为二三十年。对于开始进入创新时期的中国科学事业，我以为，所要解决的诸多问题中的首要问题仍然是科技体制问题，急需建设一个能适应新世纪科技革命和市场与社会需求挑战的国家创新体系。因为创新体系本质上反映着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协调的程度，所以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主要任务在于探索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律，发挥二者相互促进的作用。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在处理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有许多经验和教训有待总结，而技术与经济、科学与技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以及中国与世界这些关系，正是人们普遍关心而又必须恰当解决的问题。

任何国家和科学的发展都必须以其自身的研究和发展能力为基础，只有具备

了研究和发展的基础结构，外援才能发挥其应有的催化作用。尽管现代科学在中国已经有百余年的历史，但至今也还不能说已经具有了较高水平的科技研发和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通常可以四个指标评价一个国家的科技能力，一是以投入研发的人力和财力衡量从事科技活动的规模和能力，二是以出版物的质量和数量衡量科学或知识创新成果，三是以拥有的专利件数和产业转化程度衡量技术创新成果及其产业化，四是有比较完善的国家创新体系和有一批具有研究开发能力的大企业和高科技企业。它们大体上能反映一个国家的科技研发与产业化的竞争能力。如用这些指标在世界范围进行比较，就会发现我们中国同发达国家还有不小的差距。在科学已成为高技术的先导和技术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的今天，任何国家要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都必须有一支强大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队伍，构建形成适应时代和国家发展要求的国家创新体系。我们不仅要充分尊重科学的学术自由权和自主权，激发起科学技术发展的内部动力，还要在社会上普遍提倡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建设和健全社会主义公平、公正、有序的市场经济体制，培育企业自主科技创新的能力，强化国家目标和社会需求的引导和推动作用，培育科学技术发展的外部氛围和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和创新体制和机制。倡导“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高度重视基础科学本身的发展，为科学技术和国家创新能力的持续提高奠定坚实基础。

自 50 年代后期以来，经受了百年屈辱的中华民族就开始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早在 1957 年毛泽东主席就曾发出整理科学遗产、发展自己的科学学派的号召。已经提前达到第二步战略发展目标的中国，面临的任务是向第三步战略目标奋进，在 21 世纪中叶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为了在新世纪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振兴中华，在确保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加速经济增长，我们必须极大地提高全民族的科学和教育水平，实施我们已经确立了的“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由于人口众多而使得自然资源相对不足是我们的基本国情，关键在于如何通过普及教育和发展科学技术从而开发巨大的人力资源。我们不仅必须在世界上率先实施节约资源并保护环境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且还必须创造性地发展支持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全新的科学技术体系。

开创创新时代的艰巨任务要求科学家充分发挥科学创造性。

科学是理性的事业，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更要求理性的创造思维，哲学的启迪对于科学创新思维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历史上启蒙哲学之于法国科学，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之于德国科学，提供了科学受惠于哲学的典范；当代科学哲学把物质、能量和信息概括为世界三要素的观点，不仅为建立信息社会概念提供了启迪，而且加深了科学技术对自然过程和人工过程及其统一性的理解。哲学求索导致科学家们探索诸如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和认知的本质之类永恒的科

学难题，哲学的概括与综合的观念激励科学家们追求局部与整体、特殊与一般、遗传与变异、精神与物质的统一，从而把局部认知转换成科学理论。唯物辩证法也是反对迷信和伪科学的锐利武器。

科学也不仅仅是纯粹理性的过程，任何科学创造都不能从单纯的推理和思辨中产生，而更需要现象和实验的观察与分析，也需要科学的洞察力和判断力。那些作出伟大贡献的科学家，无不具备这样的思维和实践能力。

科学家还要有唯物辩证的历史观和认识论。尽管科学的进展有无止境的前沿，科学史是可以认识科学发展的轨迹及其规律的。对于科学未来的预测更多地要靠对科学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诸如下个世纪将会在哪些领域发生新的科学革命，哪些学科将成为未来科学新结构的重心，各个学科前沿领域会有可能发生哪些突破，哪些新的技术革命可能将因科学的新发现而引发？以唯物科学历史观思考过去，审视未来，未来的科学也必定同解决人类与环境的和谐、对物质、生命、信息与认知规律认识的深化，与科学本身的综合和统一等问题相联系。诚然，科学的未来是不能完全准确预测的，但一切科学的预见实际上都是开拓与创造未来的动力。让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实事求是，开拓前进去迎接中国科学创新的时代。

20世纪中国科学的发展，经历了艰难曲折，同时也保持了一种与中国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传统和特征，它将对中国新世纪的发展提供有益的经验。这部学术大典所展示的正是这样一幅多维画卷。这么多中国一流科学家，他们的智慧结晶，他们的研究体验，他们的深邃视角，他们的篇篇华章，聚合为一部学术巨著。我们坚信，它将会成为我们中华民族迈向科学辉煌的阶石。

我们应该永远记住阿基米德那句话：

“给我一个支点，就能撬起地球。”

我以为这个支点就是：科学！

凡 例

一、编 排

1. 本书按学科(学术门类)分类分卷出版。一学科(学术门类)辑成一卷,字数不足一卷的,同其他相关学科(学术门类)合为一卷。

2. 本书条目按学科研究与专题研究、学术专题、重要人物或名著名篇、学术机构和学术团体类别分类编排,形成系统的分类目录。

3. 学科研究与专题研究条目按本学科内容体系框架分类编排。

4. 学术专题、重要人物、名著名篇、学术机构和学术团体,均按时间(发生、诞生、出版、成立、创办)次序编排。

5. 各学科卷在条目分类目录之前都有一篇介绍本学科中国学人百年来重大研究成果的综述性文章,如“20世纪中国军事科学研究”。

6. 学科与学科之间相互交叉的学术主题在有关学科卷中均设有条目,但释文内容分别按各自学科的要求有所侧重。

二、条 目

7. 学科(包括子学科)研究从研究综述的角度立目,如:“军事学术研究”;专题研究从研究综述角度立目,例如:“美国军事思想”;重要人物以人物的常见名字立目,例如:“毛泽东军事思想”;名著名篇以书名、文题立目,并标注书名号,例如:《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学术机构团体以全称立目,例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8. 条目标题附有英文,例如:“马克思军事理论研究(Study of Marx's military theory)”;重要人物英文即该人名汉语拼音(音译),例如:“邓小平(Deng Xiaoping)”。

三、释 文

9. 条目释文力求使用规范化的现代汉语,释文开头一般不重复条目标题。

10. 较长的条目释文,设置层次标题。

11. 一个条目的内容涉及其他条目,并需要由其他条目的释文补充的,采用“参见”的方式。所参见的条目标题在本条释文中出现的,用楷体字排印。

四、参考文献

12. 在学科研究和部分重要的专题研究条目释文后附有“参考文献”,供读者参考。此文献是指在20世纪学术史上发生过重要影响的著作或文章。

五、索引

13. 本书各学科(学术门类)卷均附有全部条目的汉语拼音索引、汉字笔画索引和外文关键词索引。

六、其他

14. 本书所用学科专业技术名词以各学科有关部门审定的为准,未经审定和尚未统一的,从习惯。地名以中国地名委员会审定的为准,常见的别译名必要时加括号注出。

15. 本书字体除必须用繁体字者外,一律用1956年国务院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中的简化字。

16. 本书所用量和单位以1994年7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量和单位》为准,个别的从习惯。

17. 本书所用数字,以1996年6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出版物上数字用法》为准。

20 世纪中国军事科学研究

(study of China military science in the 20th century)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研究部

军事科学，是研究战争和国防的本质与规律，并用于指导战争和国防的准备与实施的科学。军事科学研究，是对战争和国防的本质、规律及指导规律的探索活动，是创造战争指导和国防准备与实施的理论、完善军事科学体系的科学劳动。军事科学与军事科学研究，是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军事科学是军事知识体系，是最高形式的知识产品；军事科学研究是获得军事科学知识的思维活动，是军事科学劳动的创作过程，是创造和整理军事科学知识的工作。军事科学研究的任务，是通过战争和国防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对战争和国防规律及其指导规律的不断探索，预测战争的发生、发展及其特点，提出克敌制胜的原则、手段和方法；分析战略环境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提出国家防卫的原则、目标和措施，为正确地指导战争和国防的准备与实施，提出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决策依据。在新世纪的新形势下，中国军事科学研究将围绕确保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本色和作风两大历史性课题深入展开，创新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科学，更好地为新的军事实践服务。

二十世纪中国军事科学研究的历史背景

20 世纪的中国军事科学研究，是与 20 世纪的人类社会特别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

20 世纪，是人类社会高速发展的历史时期。社会制度经历了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过渡，经历了社会主义由理论向实践的转变，经历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并存与激烈竞争的演变。科学技术作为人类社会前进的巨大动力，经历了由机械技术向信息技术的演进，从而推动了社会经济由大工业经济开始向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的转化。20 世纪，也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长河中战争连绵不断的世纪。从 1900 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拉开 20 世纪的帷幕，到 1999 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发动侵略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科索沃战争落下 20 世纪的帷幕，全世界共发生了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在内的大小战争 300 余场。战争规模经历了

由世界大战向局部战争的演变，战争形态经历了由机械化战争向高技术化战争进而向信息化战争的演变。20 世纪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反对封建专制而进行的资产阶级革命战争，为反对北洋军阀统治而由国共合作进行的北伐战争，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而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等，构成了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旋律。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所进行的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战争，结束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受奴役、民族遭压迫、国家被分裂的苦难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经过半个世纪的艰苦奋斗，把昔日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建设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国防力量得到全面发展，在保卫祖国、进行自卫还击作战，捍卫国家统一和主权完整，反对霸权、维护世界和平等方面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0 世纪的中国军事实践，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战争和中国国防建设的实践，为 20 世纪的中国军事科学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客观依据，并不断推动着 20 世纪中国军事科学研究的创新和发展。

清末和中华民国时期的军事科学研究

中国军事科学研究历史悠久，成就辉煌。从先秦到清代前期，共有数千种兵书留存于世，其中尤以《孙子》对中国乃至世界军事科学的研究与发展影响最大。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抵抗外敌人侵，寻求富国强兵之路，封建地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推动清王朝实行了一些军事变革。林则徐、魏源等总结汲取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军战败的教训，强调整军经武、反抗侵略，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主张“练兵”、“制器”，提倡“军事自强”。姚锡光撰写的《筹海军刍议》，建议清政府在重建近代海军时应组建外海巡洋舰队和长江巡洋舰队，以彻底改变中国近代海军逡巡近海的被动局面。清王朝为了维护自身统治、对付帝国主义列强坚船利炮的需要，开始着手学习和研究西方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开办军工厂（局），建立初具规模的近代海军和海防系统，编练新军和创办军事学校，聘请外国军事教官，派遣军事留学生，逐步建立起新的军事教育系统，废除了延续千年的武举制度等，开始了由传统兵学向近代军事科学研究转变的历史进程。这一时期翻译和编著的《防海新论》、《兵学新书》、《战法学教科书》、《战术学》等军事书籍，介绍和研究了西方的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但由于清政府政治上腐朽没落，外交上软弱无能，抗击外敌的军事人侵屡遭败绩，同时其顽固势力极力阻挠近代军事科学理论在国内的传播，使得中国近代军事科学

的研究与发展较为缓慢。

1911年,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通过城市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结束了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帝制,推动了中国近代军事科学研究的发展。在斗争实践中,孙中山逐步认识并研究提出了有关武装起义、军队建设及国防建设等方面的理论。关于武装起义:在革命道路问题上,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主张以武装起义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在起义力量问题上,主张利用会党、新军中不满清政府统治的各种力量,作为武装起义的基本队伍;在起义方向问题上,主张依托外援,首先在南方边陲地区发动起义,然后再向其他地区发展。关于军队建设:主张革命党必须建立自己的革命军队,作为进行革命斗争的中坚力量;革命军队必须“以俄为师”,应是“党军”,执行党赋予的任务,建立党的组织和党代表、政治部、党部三重领导体制,开展革命政治工作;要创办革命军官学校,以创造革命军队的基础;工农民众是革命军队的主体,要重视以革命精神教育军人;提出要建设一支与陆军、海军并列的独立空军等。关于国防建设:提出了精神与物质并重、政治与军事相辅、国防与民生兼顾、外交与武力配合、以实业为基础加强国防建设等。这些,不仅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军事方面的认识和要求,也为中国近代军事科学研究与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中华民国中、后期,在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下,军事科学研究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蒋介石在统率国民党军队时,虽然提出过一些适应地主资产阶级政治目的所需要的建军理论和作战方法,但由于用于指导反革命、反人民的内战,最终归于失败。在这期间,国民党军队内外的有识之士开展了一些军事学术研究,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据《民国时期总书目·军事》对北京、上海、重庆图书馆馆藏军事书目的统计,在中华民国中、后期出版的军事图书就达几千种(线装书除外)。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蒋百里的《国防论》、杨杰的《国防新论》等。内容涉及当代军事科学的主要知识门类,如军事哲学,国防理论,作战理论,军制理论,军队训练理论、管理理论,后勤理论,武器装备原理和使用,外国军事现状与历史,军事地理、气象、测绘等。这一时期军事科学研究的理论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在国防方面,一些研究者把国防与战争、阶级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认为只要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阶级与阶级之间还进行着政治的压迫和经济的榨取,侵略战争就不会消弭,国家必须进行国防建设;强调综合培植所有国防要素和国力,运用一切力量,熔铸成综合军备,建设强大的国防;主张中国必须从政治制度改革入手,实行民主宪政和义务兵役制,建立健全政府组织和社会组织,使人民有权参加政治之权力,人民才能履行保卫国家之义务;主张实行总体国防,实现国家工业化,立足于“独立作战、自力更生”;强调要适应大

陆性战争，以发展陆军、空军为主，建立进步的军事制度，实行积极防卫的战争指导和全国人民进行国防教育等。在军队建设方面。一些有识之士主张建立一支具有与国防任务、与陆军和空军相称规模的海军，认为国家的强弱，领海是否完整，全看海军的力量，海战一输，陆战便补救不及，因此不能厚陆薄海、优空制海，必须同样重视海军建设；要根据国防的需要，加强海军舰（潜）艇和海军航空兵部队的建设；要把分散的海军统一起来，加以整顿，以备国防之需等。在作战指导方面，注重进攻战役作战，即使被迫进行防御战役，战役计划的主导精神也应着眼于最后的反攻；强调实行多路、多方向、多梯队的分进合击，长驱直入，与对方主力决战，速战速决；强调打击重心，对对方的主力兵团、交通枢纽、指挥机构等，实施重点打击；主张建立快速战役机动集团，沿交通线实施主要攻击，采取翼侧迂回的进攻方法；注重建立战役预备队，以便保持进攻作战中的连续突击能力；强调在防御作战规模急剧扩大的情况下，要把以往在战术层次上的多梯队布势上升到战役层次上，实行多方向、多梯队的纵深布势；在城市防御作战中，要求建立以外围阵地、核心阵地和兵力、火力、障碍物相结合的防御体系；在沿江河防御作战中，要充分利用江河天然屏障，建立宽正面、有重点的与火力相结合的江河防御体系等。

中国革命战争时期的军事科学研究

中国革命战争时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军事理论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研究创立中国无产阶级军事科学最重要的历史时期。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成立。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第一个党纲中，原则地提出了用革命手段推翻旧政权的历史任务。此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对中国革命要不要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中国革命应该走什么道路、中国共产党要不要建立独立领导的革命军队、这支军队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战略战术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和探索。蔡和森、周恩来等于1922年相继在党的刊物上提出，完全解除旧支配阶级的武装和“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的主张。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充分阐述了中国广大劳苦农民在革命中所具有的巨大作用，明确提出了建立农民政权和组织农民武装的观点。但彻底认识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极端重要性，则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1927年7月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针对陈独秀在党内推行的右倾投降主义，提出必须“保存武力”和“上山”的主张，指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遇到事变我们即无办

法”，“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创建革命军队、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八一”南昌起义之后，中共中央于8月7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正式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毛泽东在发言中强调，全党“要非常注重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9月11日，毛泽东亲自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并创建了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此后，党在全国范围内相继领导发动了近百次武装起义，创建了数十块革命根据地，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各革命根据地的多次“进剿”、“会剿”和“围剿”。在艰苦的革命战争中，毛泽东等党和红军领导人特别重视从实践中总结经验。1928年12月提出要编纂红军战史，1931年4月决定成立红一方面军军史编辑委员会，1937年5月决定成立红军历史征编委员会，同年6月决定成立军事研究委员会，开始对红军建设和作战的经验进行研究总结。同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为了指导革命战争的需要，不断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总结战争、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建设的经验，探讨中国革命的道路、人民军队建设的原则、方法以及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其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指导革命战争和人民军队建设的具体方针和原则上，也以文章、文件、教材、条例条令等形式单独发表或者登载在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一些报刊上。其中毛泽东所进行的大量富于创造性的理论探索，集中体现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军事著述之中。另外，还有周恩来的《关于湘鄂西苏区发展的几个问题》、《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朱德的《怎样创造铁的红军》、《谈几个战术的基本原则》等。在这些文章中，他们深刻总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教训，形成了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深刻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具体特点，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阐述了人民群众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指导路线；深刻总结了建军初期的经验教训，确立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新型人民军队的一系列建军方针和原则；深刻总结了红军反“围剿”作战的经验教训，创立了积极防御战略理论和作战原则。上述思想、理论、原则等的提出和确立，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军事科学的理论基石——毛泽东军事思想初步形成。

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共中央洛川会议提出全面抗战的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确定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实行由以运动战为主的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毛泽东在全面研究中日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情况和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的形势，总结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撰写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等军事论著和具有重要军事内容的《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著作，以及周恩来撰写的《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和朱德撰写的《论抗日游击战争》、《论解放区战场》等，对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进行了系统研究、理论总结和哲学概括，科学预见抗日战争发展的全过程及其规律，指明了战争的胜利前途，全面阐述了持久战的思想，完整地提出了关于敌后游击战争的理论。通过对抗日战争性质、规律的研究，深刻阐明了一般战争的本质和研究战争的科学方法，揭示了军事活动的一系列普遍规律和共同原则，全面回答了中国革命战争如何才能以弱胜强、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战略、策略等问题；系统阐述了人民战争、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这些，不仅标志着毛泽东军事思想已经成熟，也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军事科学研究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解放战争时期 解放战争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最波澜壮阔的篇章。在历经四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经历了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包括战略反攻、战略决战和战略追击）阶段，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在指导解放战争的过程中，毛泽东军事思想得到极大的丰富和发展，尤其是包括上百万兵力参加的大规模战役的指导艺术，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在此期间，毛泽东撰写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三个月的总结》、《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将革命进行到底》等军事著述，周恩来撰写的《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在部队中试验组织士兵委员会》和朱德等撰写的《目前形势和军队建设问题》等，对战争指导和作战指挥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成果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人民战争理论的战略防御理论，而且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战略反攻、战略决战、战略追击的战略进攻理论；不仅发展了运动战和游击战理论，而且创造了包括大中城市攻坚战在内的大规模阵地战理论。在建军方面，总结了新式整军运动的经验，开始探索军兵种建设和军队正规化建设的理论；提出了健全以党委制为核心的军队党的领导制度；建立健全了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制度等。解放战争的伟大实践，不仅使毛泽东军事思想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也使中国无产阶级军事科学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军事科学研究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全国性胜利，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随着这一历史性变化，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成为中

国共产党军事工作的基本任务。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国家的主要武装力量，一面不断地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一面进行着巩固国防、抵御侵略、维护国家独立、安全、统一和稳定的军事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列主义军事理论、毛泽东军事思想成为中国军事科学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军事实践的内容更加丰富，军事科学研究的领域更加拓展，军事科学研究的条件获得极大的改善，中国军事科学研究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对策研究及军事技术研究全面发展、日益繁荣的局面。

发展概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军事科学研究事业是在没有专门的科研队伍，缺乏资料，许多学科有待开发的困难条件下起步的。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的带领下，全军边展开研究，边组建队伍，边总结经验，边探索规律，围绕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总结人民解放军革命战争经验和借鉴外军建设经验，掀起了群众性的军事科研活动。全军各大军区、海军、空军和各兵种司令部先后组成了战史研究编写机构，各军以上单位分别成立了研究编写战史和条令条例的组织。各军事院校陆续开设了军事理论研究的有关课程，翻译了一批苏军的军事著作、条令条例和有关资料，根据部队建设和发展的需要，组织编写了人民解放军部分基础性的规章制度和教范，全面开展了抗美援朝战争经验的研究和总结等。上述工作，为军事科学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进行了必要的和有益的探索。

以1958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成立和1959年1月中央军委军事科学指导委员会的成立为标志，全军军事科学研究工作开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为了适应军事科学研究的新形势，军队各大单位分别建立了相应的研究机构。1959年1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军军事科学研究工作会议，总结了建国10年来军事科学研究工作的经验，确定了军事科学研究工作的方针、任务和范围，制定了1959~1960年全军军事科学研究工作规划纲要，解决了关于调整与加强军事科学研究机构等重要问题。这个时期，为巩固国防、维护国家安全，进行了国防建设理论研究；为指导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与实施，进行了现代作战理论研究；为适应部队正规化建设的新形势，开展了编写条令条例为主要内容的军队建设问题研究，并相继展开了军事思想、军事历史和外国军事等基础理论研究。一支以专业人员为主体的军事科研队伍初具规模。1961年2月又召开第二次全军军事科学研究工作会议，规划和部署了新的军事科研任务。军事科学研究事业有了新的发展。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军事科学研究事业遭到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严重干扰和破坏。尽管如此，广大军事科研人员仍然坚持开展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研究，围绕做好应付大规模战争准备，开展了战争初期与反突袭研究、城市防卫作战问题研究等军事科学研究活动。

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军事科学研究工作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科研体制和科研工作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1986年3月，中央军委明确提出了新时期全军军事科研工作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要求。1991年初，经中央军委批准，召开了第三次全军军事科学研究工作会议，总结了“七五”期间全军军事科研工作情况，部署了“八五”期间全军军事科研工作，并讨论通过了全军军事科学研究工作五年计划。1996年7月，召开了第四次全军军事科学研究工作会议，总结交流了“八五”科研计划的完成情况和主要经验，研究了如何贯彻实施“九五”科研计划的有关问题。2001年4月，召开了第五次全军军事科学研究工作会议，在总结交流“九五”科研计划完成情况和主要经验的基础上，研究部署了“九五”科研计划的有关问题。这一时期，军事科学研究工作呈现许多新的特点：一是军事科研队伍日益壮大。建立了以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下的以军事科学院为主体，与总部机关、大单位和军事院校科研机构相衔接，并与部队和各类群众性学术组织相结合的军事科研体制；培养了一支以专业科研人员为骨干，以全军广大干部为基础，素质较高的科研队伍。成立了中国军事科学学会以及国际战略学会、孙子兵法研究会等群众性学术团体，并多次召开全军性和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二是军事科学体系日益完善。军事思想、军事历史、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军制学等骨干学科的研究全面展开，并逐步拓宽了研究领域，相继创立了一批新兴学科，形成了较完整的体系。三是军事科研手段日益先进。广泛采取作战模拟、数学模型、交互式分布系统、信息处理及互联网络系统等现代化的研究手段。实现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结合，提高了研究效率和质量。四是学术交流渠道日益拓宽。军内交流形成了合力攻关、上下一体、专业性研究与群众性研究相结合的大格局；军地间形成了知识共享、人才交流、优势互补的良性循环机制；国际军事交流日趋活跃，对外交流的领域不断扩大，促进了人民解放军与外军之间的相互了解，走出了一条开放式科研的路子。五是军事科研与军事决策及作战训练结合日益紧密。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相结合，突出重大现实问题研究，注重了军事理论研究的超前性、实用性和综合性，研究成果的质量有了显著提高。

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对中国军事科学研究的杰出贡献 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核心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军事思想和军事论述，是中国军事科学研究事业的根本指导思想。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在战争和国防的伟大实践中，不仅以创造性的思想理论奠定了中国军事科学研究事业的理论基础，丰富和完善了中国军事科学理论体系，而且对军事科学研究给予了极大的关怀，作出了许多重要的指示，领导和推动了全军军事科学研究事业的蓬勃发展。这是推动中国军事科学研究事业开拓前进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国军

军事科学研究取得辉煌成就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是中国军事科学研究事业的领导者和奠基人，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中国军事科学研究的理论基石。中国的军事科学是建立在毛泽东军事思想基础之上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军事科学。毛泽东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举世公认的集军事统帅和军事理论家于一身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他坚持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相结合，创立了人民军队、人民战争、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理论和军事辩证法，形成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不仅是指导取得中国革命战争胜利的伟大旗帜，而且也是指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国防和战争实践及开展军事科学研究的理论指南。

在建国后的相对和平时期，面对帝国主义的全面封锁与包围，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和维护国家安全，毛泽东提出了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一定要建设强大的国防，不仅要建设一个强大的陆军，还要建设一个强大的空军和强大的海军的思想；大力发展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尖端技术，建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的思想；实行积极防御，开展人民战争，立足复杂困难的情况，坚决反对外敌人侵的思想；要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的生命线的思想；军队要严格要求、严格训练，准备打仗的思想；要团结第三世界，争取第二世界，建立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思想等。毛泽东关于中国国防的重要思想，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给军事科学研究赋予了强大的生命力。

毛泽东以巨大的热情亲自领导和推动了全军军事科学研究事业的开展。他指出，“我们现在进入钻研现代化的新时期，我们面临的新问题是新的国防。”全军一定要“钻研现代化国防”。他强调指出，全军要研究和总结历次革命战争经验，要发展战争年代形成的作战原则和军事理论；要集中力量，搞出自己的作战条令来。他倡导军事科学研究要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指出军事科学研究要以我为主，学习外军经验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他批准成立了军事科学院和全军各级军事科学研究机构。在毛泽东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军事科学研究事业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

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是深入开展中国军事科学研究的理论指南。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是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坚持彻底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立场，突破“左”的思想束缚，拨乱反正，不仅迎来了全党的思想大解放，而且使军事科学研究重新回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军事科学研究工作得以全面恢复，并有了新的发展。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回答了现代战争

和战略指导，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从而形成了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他科学地分析了世界基本矛盾运动新的表现形态，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和平与发展是两大全球性战略问题的思想；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转移相适应，提出国防和军队建设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思想；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转移到相对和平时期根本建设和长远发展的轨道上来的思想；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军队要始终不渝地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忠于人民的思想；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的思想；坚持积极防御，实行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思想；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的思想等。这一系列重要思想，是中国军事科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为新时期的军事实践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指导，也是新时期开展军事科学研究的理论依据。

邓小平重视发挥军事科学研究在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在纪念军事科学院建院 20 周年的题词中，他号召全军“继承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发展我国军事科学”。他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崇尚科学。要求科研工作者下定决心，奋起直追，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知彼知己，力戒空谈；强调加强科研队伍建设，要创造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强调贯彻而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针；强调科学研究工作走群众路线，发扬民主，百家争鸣；强调要善于借鉴和吸收建立在现代工业基础上的人类文明的一切先进成果，扩大对外开放，广泛开展学术交流等。在邓小平一系列重要指示指引下，军事科学研究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江泽民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和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伟大旗帜，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论述指引着中国军事科学研究事业不断向前发展。江泽民作为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和军队的统帅，站在时代的前沿，洞察国际战略格局的新变化和世界军事领域的革命性变革，进行了一系列新的理论思考，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军事理论观点，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指引着中国军事科学研究事业向新的世纪迈进。

而对新的军事实践对军事理论的需求，江泽民高屋建瓴地提出了确保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确保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军队永不变色两大战略性问题。他审时度势适时领导制定了人民解放军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提出了军队跨世纪发展的战略构想；系统地回答了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他强调指出，要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到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来；明确军队建设的总要求是“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强调国防建设要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时代特色的国防发展道路；提出把政治建设摆在

军队各项建设的首位，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本质和作风；提出实行科技强军，加强质量建设，推动军队建设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坚持“思想理论武装”和“高科技知识武装”的辩证统一，造就一大批跨世纪的军事人才；积极探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特点和规律以及新形势下治军的特点和规律等。江泽民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和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科学运用，是对中国军事科学的新发展和新贡献。

江泽民对世纪之交中国军事科学研究事业十分重视。他指出：“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先进的军事理论，历来是军队建设得以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是战争的重要制胜因素。”“要从我军的实际出发，面向世界，着眼未来，努力发展我们的军事理论。”他在给军事科学院题词中强调：“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发展无产阶级军事科学，为国防建设和未来反侵略战争服务。”他强调，军事科学研究必须坚定不移地以马列主义军事理论、毛泽东军事思想和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为指导，紧密结合世界军事发展和军队建设的实践，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寻求解决新形势下的矛盾和问题的思路、办法，为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服务；军事科学研究要注重超前性、实用性和综合性；要研究立足人民解放军现有装备的战略战术，研究军队建设和改革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军事科学研究要与现代作战紧密结合，要与军队建设的现实紧密结合，要把科研的主要力量投入到研究现实问题的“主战场”。江泽民的这些重要指示，对于深化新形势下的中国军事科学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

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军事思想和军事论述，既是中国军事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也是贯穿于中国军事科学研究事业发展的一条主线。他们创建和身体力行的，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战争观和方法论基础之上的军事科学理论，是中国无产阶级军事科学的特色所在，也是人民解放军的优势所在。

中国军事科学研究的辉煌成就 建国以来，军事科学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研究成果有的进入领导决策，有的用于部队建设与作战，有的获得国家级和军队级奖励，在军事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马列主义军事理论、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和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论述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军事建设和军事斗争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全军军事理论工作者，始终把马列主义军事理论、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和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论述的学习与运用，作为军事科学研究的重中之重，并为此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取得了蔚为可观的研究成果。经过几代军事科研人员的努力，先后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列宁军事文集》、《斯大林军事文集》、《毛泽东军事文集》、《邓小平军事文集》、

《邓小平论国防和军队建设》等一批经典著作，促进了全军的学习和研究工作。相继推出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原理》、《邓小平新时期军事理论研究》、《邓小平新时期国防建设军队建设理论研究》、《江泽民军事论述研究》、《“三个代表”思想与新世纪军队建设》、《论无产阶级军事科学》等一批系统研究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思想的著作。同时，全军还对30多位老一辈无产阶级军事家的军事著述、军事思想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整理，相继出版了《周恩来军事文选》、《朱德军事文选》等文献，并出版了许多研究他们军事思想的著作。

适应时代的发展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加强战略问题的研究，国家安全战略、国防发展战略和军事战略研究成果显著，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大决策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咨询。全军军事理论工作者紧紧把握为军事建设和军事斗争现实服务的方向，围绕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现代战争的特点规律以及军委、总部关注的重大问题，先后完成了当代国际形势变化对世界战略格局和中国安全环境的影响与我之战略对策的研究、军事战略方针问题的研究、国防发展战略的研究、2000年中国国防系统研究、军队建设重大问题系统调查论证、军队建设计划规划研究论证等一大批有份量的研究报告。对国家综合安全、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国防经济发展与经济安全等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编写了《战略学》、《战争与战略问题研究》、《当代世界军事与中国国防》等一批战略理论著作。战略研究的深入开展，为军委、总部战略决策发挥了理论助手的作用。

着眼现代战争的发展，深化作战问题的研究，不断创新、丰富和发展作战样式、作战指导和作战方法，为赢得保卫国家安全和捍卫领土主权斗争的胜利提供理论依据。根据现代战争的发展和作战环境与作战任务的变化，先后多次编写与修订合成军队战斗概则、合成军队师团战斗条令和各军兵种合同战斗条令，并编写了联合战役纲要和各军兵种战役纲要。在各个时期，根据军事斗争准备的不同重点，先后开展了抗敌大规模登陆作战研究、不同地形条件下边境自卫还击作战研究、抗敌全面入侵作战问题研究、高技术局部战争作战问题研究等。相继取得了对来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几个问题的探讨、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战役战法研究等一大批开创性的研究成果。编写了《战役学》、《战术学》、《军队指挥学》等理论著作，进一步完善了现代条件下的作战理论。

适应国家根本利益的需要和军队发展的大趋势，加强军队建设理论的研究，不断推出有关军事建设、政治建设、后勤建设、装备建设的新成果，为全面加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提供了理论保证。为规范军队建设提供依据，先后研究编修了内务条令、纪律条令、队列条令、司令部条例、政治工作条例、后勤工作条例、装备工作条例以及军官、文职干部和士兵服役条例等。这些条令条

例的研究和制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提供了法规依据。同时还陆续出版了《国家军制学》、《军队管理学》、《军队政治工作学》、《军事后勤学》、《军事装备学》等一批成果。为了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军队建设的指导，特别加强了质量建军问题的研究，开展了“党的三代领导集体与军队质量建设”研讨活动，举办了“学习邓小平理论，探索新形势下治军的特点和规律研讨会”以及新形势下军队政治工作改革、三军联勤、科技装备发展等专题研讨会，推出了一批高质量研究成果。这些成果被广泛地运用于各时期部队建设的实践，促进了军队的全面建设。

适应新的军事实践和发展中国军事科学的要求，深入开展基础理论和作战模拟的研究，推出了一大批鸿篇巨制和理论新作。军事历史研究方面有《中国军事通史》、《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战史、解放战争各野战军战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等。在军事地理、测绘、气象方面有《军事地理学》、《军事测绘学》、《军事气象学》等。在军事工具书方面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用主题词表》、《世界军事年鉴》、《中国军事年鉴》、《当代中国》丛书国防军事卷等。其中，《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是全军军事科学研究取得的重大成果。外军研究方面，翻译出版了《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国际军事与防务百科全书》等。在军事运筹和作战模拟研究方面，推出了《军事运筹学》、《作战模拟基础》等专著，先后完成了一批战术、战役法、战略及国防与军队建设方面的各种模型和专家系统，在军队建设与作战理论研究和院校教学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国军事科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当代世界，军事科学研究将更加广泛深入地受到科学技术的影响，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将成为军事科学研究的重点，战争与和平的转化、危机与冲突的处理、军备控制、威慑等理论将进一步发展，以高技术质量建设为主要标志的国防与军队现代化建设理论将得到拓展和深化。21世纪的中国军事科学研究，在指导思想上将仍以维护国家安全和统一，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作为根本出发点，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总体战略，为巩固国防，抵御侵略，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实现祖国统一，维护国家安定，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坚持以马列主义军事理论、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论述为指导，按照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在实践中发展马列主义军事理论。

在研究基点上,要面向世界、着眼未来,加强军事科学理论的超前性和实用性研究,为现实军事斗争服务。新的军事实践,呼唤着新的军事科学理论的指导。新的军事革命,为新的军事科学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在新世纪新形势下,必须面向世界和准确预测世界未来军事的发展趋势,加强超前性和实用性研究。要突出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努力探索人民军队立足现有装备克敌制的战略战术;加强新军事革命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特点和规律,特别是军队建设和改革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和对策问题研究,寻求解决新形势下的矛盾和问题的思路、办法,为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服务,为军事决策服务。

在研究内容上,军事科学体系的新学科将逐步增多并高度综合。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并在军事上的广泛运用,以及为适应高技术战争与现代国防实践活动的要求,新的军事科学理论将不断创立,新的学科将不断涌现。如国防发展战略学、航天战略学、联合战役学、军事社会学、军事心理学、军事教育学、军事管理学、军事领导学、军事未来学、军事预测学等,都将成为军事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军事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相互渗透和相互交叉,导致出现越来越多的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横断学科和综合学科。这种学科增多的专业化趋向,将促使军事科学研究越来越注重高度综合和整体研究,以有利于把与军事有关的政治、经济、科技、教育、地理等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研究方法上,军事科学研究将广泛采用现代科学方法与手段,注重军事演习和局部战争经验。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以及突变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等已广泛应用于军事科学研究的许多方面,这都将对改进军事科学研究的方法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军事科学研究还将运用数学方法和模拟方法,对复杂的军事活动过程进行定量研究,对军事活动进行数学模拟,以提高军事科学研究的质量和效率。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军事科学研究将更趋数学化、模型化和精密化。在研究手段上,将广泛使用计算机技术,使信息检索和分析等工作更加方便。尤其是资料库、数据库、网络和参数分析论证系统的建立,将使军事科学研究朝着研究工作自动化、信息传递高效化、数据分析精密化、军事实验模拟化、预测未来科学化的方向发展。

在军事科学研究与军事技术的结合上,将更加紧密。高新技术的发展,强化着人们的科技意识,促使军事科学研究与军事技术的结合更加紧密。技术决定战术。新的技术装备的进一步研制开发与应用,将改变战争的物质条件和战场面貌,引起作战手段和作战样式的变化,从而也引起建军和作战指导原则与方法的变化,为军事科学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和更高的要求。军事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将不可避免地改变人们的观念,并导致一些军事理论

的生命周期明显缩短，同时也为扩大军事科学研究领域，加快军事科学研究的发展速度，不断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因此，军事科学研究将在军事技术发展速度加快的情况下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张震：《军事科学》，载《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第1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

张万年主编：《当代世界军事与中国国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9。郑文翰主编：《军事科学概论》，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

刘继贤著：《军事科学研究与管理》，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

军事科学院：《中国军事科学研究五十年》，北京：《解放军报》，1999年9月28日。

目 录

出版说明.....	(1)
序一	季美林 (1)
序二.....	路甬祥 (17)
凡例.....	(1)
20 世纪中国军事科学研究	(1)
条目分类目录.....	(1)
正文.....	(1)
条目汉语拼音索引.....	(617)
条目汉字笔画索引.....	(621)
条目标题主题词索引.....	(625)
Keyword Index of Entry (条目外文关键词索引)	(650)

条目分类目录

20 世纪中国军事科学研究 (见条目分类目录前专文)

〔军事思想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军事理论毛泽东军事思想〕

【学术专题】

马克思军事理论研究	1
恩格斯军事理论研究	6
列宁军事理论研究	11
斯大林军事理论研究	14

【重要人物】

毛泽东军事思想	19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	28
周恩来的军事思想	38
朱德的军事思想	40
彭德怀的军事思想	42
刘伯承的军事思想	43
贺龙的军事思想	45
陈毅的军事思想	46
罗荣桓的军事思想	48
徐向前的军事思想	49
聂荣臻的军事思想	50
叶剑英的军事思想	52
叶挺的军事思想	53
杨尚昆的军事思想	55
李先念的军事思想	56
粟裕的军事思想	57
徐海东的军事思想	59
黄克诚的军事思想	60

陈赓的军事思想	62
谭政的军事思想	63
萧劲光的军事思想	65
张云逸的军事思想	66
罗瑞卿的军事思想	68
王树声的军事思想	69
许光达的军事思想	70

军事哲学研究 71

【学术专题】

军事认识论研究	77
军事思维研究	80
军事哲学思想史研究	86

〔中国历代军事思想研究〕

【学术专题】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研究	89
《孙子》研究	100
晚清军事思想研究	106
中华民国军事思想研究	118

【重要人物】

袁世凯的军事思想	125
孙中山的军事思想	126
黄兴的军事思想	127
蒋百里的军事思想	127
蒋介石的军事思想	128
杨杰的军事思想	129

〔外国军事思想研究〕

【学术专题】

德国军事思想研究	132
英国军事思想研究	135
苏联军事思想研究	139
日本军事思想研究	142

印度军事思想研究·····	145
美国军事思想研究·····	147
军事学术研究 ·····	150
战略学研究 ·····	157
【学术专题】	
战争研究·····	161
高技术战争研究·····	166
核战争研究·····	168
局部战争研究·····	172
战略研究·····	176
海军战略研究·····	178
空军战略研究·····	186
核战略研究·····	191
国防战略研究·····	194
军队建设研究·····	198
战略研究著作·····	202
战役学研究 ·····	203
【学术专题】	
战役研究·····	206
特种作战研究·····	207
联合战役研究·····	210
进攻战役研究·····	212
防御战役研究·····	214
陆军战役研究·····	217
海军战役研究·····	219
空军战役学研究·····	221
空军战役法研究·····	222
战略导弹部队战役学研究·····	224
战略导弹部队战役研究·····	225
战役研究著作·····	226
战术学研究 ·····	227
【学术专题】	
战术研究·····	230
合同战术研究·····	233
进攻战术研究·····	234
防御战术研究·····	236

陆军战术研究·····	237
海军战术研究·····	239
空军战术研究·····	241
战略导弹部队战术研究·····	242
兵种战术研究·····	243
战术研究著作·····	244
军队指挥学研究 ·····	245
【学术专题】	
作战指挥理论研究·····	247
联合作战指挥理论研究·····	249
海军作战指挥理论研究·····	251
空军作战指挥理论研究·····	252
战略导弹部队作战指挥理论研究·····	254
司令部工作研究·····	255
军队指挥理论著作·····	257
军事情报学研究 ·····	259
【学术专题】	
军事侦察研究·····	260
军事情报整编学研究·····	262
军事运筹学研究 ·····	263
【学术专题】	
军事问题影响因素量化研究·····	267
军事问题决策优化研究·····	268
武器射击运筹理论研究·····	269
军事模型与模拟研究·····	269
对策论研究·····	270
网络分析研究·····	271
决策分析研究·····	272
统筹法研究·····	274
军制学研究 ·····	275
【学术专题】	
军制基础理论研究·····	279
国防体制研究·····	283
陆军军制研究·····	285
海军军制研究·····	288
空军军制研究·····	290

军事制度史研究.....	292
外国军制研究.....	294
军队管理研究.....	295
战争动员研究	300
军事训练学研究	304
【学术专题】	
军队院校教育研究.....	307
部队训练研究.....	309
战役训练研究.....	311
海军战役训练研究.....	313
空军战役训练研究.....	315
战略导弹部队战役训练研究.....	317
战术训练研究.....	319
陆军战术训练研究.....	321
海军战术训练研究.....	324
空军战术训练研究.....	326
战略导弹部队战术训练研究.....	327
国防经济学研究	329
军事法学研究	335
【学术专题】	
军事法制理论研究.....	339
军事立法研究.....	341
军事行政执法研究.....	343
军事司法研究.....	345
中国军事法制史研究.....	347
战争法研究.....	351
海战法研究.....	353
外国军事法研究.....	355
〔其他〕	
军事学术刊物.....	357
军事学术研究机构.....	358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研究
..... 359

【学术专题】	
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	366
军队组织工作研究.....	368

军队干部工作研究.....	372
军队政法工作研究.....	374
军队文化工作研究.....	376
战时政治工作研究.....	378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研究	380
军事心理学研究.....	383
军事人才学研究.....	384

军事后勤研究..... 386
〔军事后勤基础理论研究〕

【学术专题】	
战略后勤研究.....	389
战役后勤研究.....	390
战术后勤研究.....	392
海军后勤研究.....	393
空军后勤研究.....	395
战略导弹部队后勤研究.....	396
军队后勤体制研究.....	397
军事后勤管理研究.....	398
军事后勤法研究.....	400
军事后勤史研究.....	401
外军后勤研究.....	403
高技术战争后勤研究.....	405
军事后勤指挥研究	407
军队财务研究	408
【学术专题】	
国防费研究.....	410
军需勤务研究	412
军队卫生勤务研究	414
【学术专题】	
军事医学研究.....	416
军队物资勤务研究.....	418
军队油料勤务研究.....	420
军械勤务研究.....	422
军队营房勤务研究.....	424
军事交通研究	426

军事装备维修研究..... 428

〔其他〕

军事后勤研究机构..... 429

军事后勤学术刊物..... 430

国防科学技术研究..... 430

〔基础理论研究〕

【学术专题】

射击学研究..... 443

弹道学研究..... 445

军用标准化研究..... 448

军事计量研究..... 450

核武器研究..... 452

导弹技术研究..... 454

海军技术研究..... 461

空军技术研究..... 467

火药研究..... 474

炸药研究..... 475

弹药研究..... 478

轻武器研究..... 481

装甲兵技术研究..... 484

防核、化学、生物武器技术研究..... 488

军事化学防护研究..... 491

军用电子技术研究..... 492

【学术专题】

军用电子计算机研究..... 494

军事通信技术研究..... 497

电子对抗技术研究..... 500

军用雷达技术研究..... 502

军用光学和光电子技术研究..... 504

军事航天技术研究..... 506

军用能源研究..... 509

军事系统工程研究..... 510

〔军事历史研究〕

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 511

中国近代战争史研究..... 515

【学术专题】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史研究..... 519

北伐战争史研究..... 522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史研究..... 525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研究..... 530

【学术专题】

八路军军史研究..... 534

新四军军史研究..... 535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争史研究〕

土地革命战争史研究..... 536

中国工农红军反“围剿”作战史
研究..... 539

南方八省红军三年游击战争史
研究..... 542

抗日战争敌后战场作战史研究..... 545

各战略区反“扫荡”作战研究..... 546

解放战争史研究..... 547

中国人民志愿军军史研究..... 550

抗美援朝战争史研究..... 553

世界战争史研究..... 557

【学术专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研究..... 561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 564

战后局部战争史研究..... 567

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研究..... 570

海湾战争研究..... 574

〔军事地理测绘气象研究〕

军事地理研究..... 577

【学术专题】

战略地理研究..... 579

战役地理研究..... 581

战术地理研究..... 582

海军地理研究..... 583

空军地理研究..... 585

战区军事地理研究..... 586

世界军事地理研究.....	587
中国边疆军事地理研究.....	588
中国周边国家军事地理研究.....	589
军事地形研究.....	591
军事测绘研究.....	592
【学术专题】	
军事大地测量研究.....	595
军事地图制图研究.....	596
军事气象研究.....	597
【学术专题】	
军用大气探测研究.....	599
天气预报理论与技术研究.....	600
卫星气象研究.....	601
雷达气象研究.....	602
军用人工影响天气研究.....	603

军事气象信息工程研究.....	604
军事航空气象研究.....	605

〔其他〕

【名著名篇】

《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	606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	607
《当代中国》丛书国防军事卷.....	609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	610

【学术机构】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611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	614

【学术团体】

中国军事科学学会.....	615
---------------	-----

马克思军事理论研究 (study of Marx's military theory)

探讨马克思军事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战争观、军队理论、暴力革命理论和作战指导理论等问题的活动。

研究简况

对马克思军事理论的研究,在中国开展得较早。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阐述科学共产主义基本原理和暴力革命理论的名篇《共产党宣言》,就在1920年由陈望道译成了中文。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结合中国实际认真研究了马克思关于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的科学主张之后,才坚定了走以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马恩列斯军事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更加受到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军委的重视。1938年,中央军委决定把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作为高级军事干部的必修课目。与此相适应,一批阐释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译著相继出版。马克思的一些重要军事理论观点,在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论战争与军队》和重庆读书出版社出版的《马恩列斯论游击战争》等书中,均有翔实的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为适应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中央军委提出军队高级干部应把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军事著作提到重要的位置。为此,军事科学院于60年代初翻译出版了三卷本《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选》。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军事科学院又于80年代初编辑出版了内容更为全面的五卷本《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这就为广大干部群众全面系统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军事理论创造了更便利的条件。此

后,军内外研究马克思军事理论的人数在逐渐增多,具有重要学术见解的研究专著和论文相继出版和发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较过去大有进步。1986年,军事科学院专门成立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研究所。全军的一些主要指挥院校也相继设立了负责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教学的研究小组。1988年,“马恩列斯军事理论”,作为一个研究方向,被列入军事科学院硕士研究生培养规划,随后的教学实践又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军事理论的研究。进入90年代,“马恩列斯军事理论”和“毛泽东军事思想”,作为一个学科列入了《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的编纂框架。这就为全面系统地研究马克思军事理论提出了新要求,从而使研究工作和研究范围有了新的拓展。

中央军委领导都很重视对马克思军事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刘伯承元帅在南京军事学院创建之初,就提出要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科学。叶剑英元帅要求军事科研人员,要学习和研究马列和毛泽东的军事著作,把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作为其他军事问题研究的基础和理论准备。军队的许多高级领导都曾对马克思的军事理论作过研究。1962年,许光达大将在一次报告中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军事理论观点及其学术价值,明确提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马列主义军事科学的奠基人。1984年8月,军事科学院宋时轮院长则从探讨马克思军事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的角度,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认为马克思关于武装起义、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军队、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战争等重要理论原则,在中国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均得到了充分运用,而且结合中国实际有所发展。

从70年代末开始,军内的一些军事理论工作者开始了对马克思军事理论的系统研

究。1983年3月,为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鲍世修发表了题为《马克思和无产阶级战争观》的论文,对马克思在无产阶级战争观形成中所作的理论贡献从四个方面作了探讨。

①马克思论证了战争的历史起源和终结前景。战争既不是自人类社会有史以来就有的产物,也不是流传万代永不消逝的东西,只是一种历史上的暂时现象。人类社会的发展促成了这一怪物的出现,同样,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将永远把它埋葬。②揭示了战争的社会原因及其本质。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战争从属于政治。③马克思提出了区分战争性质的标准,并辩证地论述了战争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凡是促进社会进步,即促使反动制度灭亡(或削弱)和促进新的、更加进步的制度建立的,就是进步的、革命的战争;凡是阻碍进步,即导致反动制度巩固和扼杀新的、更加进步的制度诞生的,则是反动的、掠夺性的战争。④马克思阐明了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作用以及战争的性质和作战方法相互制约的原理。先进的思想本身只能使社会超出旧制度的思想范围,而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这是对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作用的充分肯定。

1987年,《军事历史研究》杂志发表署名文章,对马克思把唯物史观用到军事科学领域、建立无产阶级军事理论体系的做法,从法学角度,给予了详细分析和评议。该文指出,从军事科学发展的整个历史看,用唯物史观来解释和论证各种与战争、军队和军事学术有关的问题,把人们对复杂的军事现象的认识置于真正的科学基础之上,这本身就是一个创举。而这个创举恰恰是在马克思的倡议下,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后期完成的。这也正是马克思对创建无产阶级军事科学所作的巨大贡献。

1985年和1988年,先后出版了尚金锁、邓锋的研究专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军事思想简论》、《马列主义军事理论研究》,对马克思军事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条件、基本内容和主要观点以及科学价值等都作了较详细的介绍和论述。

90年代上半期,围绕《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思想》中有关《马克思军事理论》条目的撰写和评审,马克思军事理论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该组条目既有总体理论概括又有著作内容阐释,集中反映了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军事理论界研究马克思军事理论的新成果和相应水平。在《马克思军事理论》条目中,对马克思军事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基本内容等都作了系统介绍。

20世纪末,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鲍世修撰著的《马克思恩格斯军事理论研究》一书。该书深入详尽地探讨了马克思恩格斯军事理论各个有机组成部分、理论形成的历史条件、理论特点、研究方法、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以及理论价值、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等问题,是20世纪末中国军事理论工作者在马克思恩格斯军事理论研究方面取得的又一丰硕成果。

研究内容

中国军事理论界对马克思军事理论的研究,主要是围绕以下一些内容展开的:

关于马克思军事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研究认为,马克思军事理论,是马克思在与恩格斯共同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1845~1846年,他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历史任务,并且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3页),而这一矛盾“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

(同前)。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用暴力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想。1848~1849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先后撰写了《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著作,提出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实行工人阶级专政等思想。1850年3月,他和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又明确提出武装工人建立无产阶级军队的主张。从19世纪50年代起,马克思虽然把军事问题的研究分工给恩格斯,但在繁忙的经济学研究工作之余,仍以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关注军事问题。1857年8、9月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提出关于战争和军队的发展的历史最能说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的思想。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考察了原始社会的战争同生产发展的关系。此外,他在1854~1856年发表的关于西班牙第四次资产阶级革命的文章中,探讨了西班牙军队起义失败的原因和人民游击战争的特点;在1856~1859年撰写的关于英国、俄国、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亚和远东各国,以及英国镇压印度民族大起义的一系列文章中,除谴责欧洲列强对亚洲各国的残酷掠夺和野蛮统治外,还对有关各方的作战行动作了评析。美国内战(1861~1865)爆发后,马克思对这次战争的阶级性质和社会原因进行了分析,研究了联邦军在这次战争前期屡战不捷的症结,探讨了合理的作战方案,预测了战争的发展前景,强调战争性质对战争前途的决定作用。在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他通过分析普法两国统治集团之间、两国统治集团与交战国人民之间及与本国人民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揭示了战争在不同阶段对不同国家所具有的不同性质,提出工人阶级政党和无产阶

级在不同情况下对这次战争应持的态度,并阐述了区分战争的政治内容和军事行动性质的原则,以及根绝战争的可能途径。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发生,马克思给予高度关注,为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撰写了《法兰西内战》等著作,从理论上进一步阐明了无产阶级军队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中的极端重要性,论证了用人民武装取代资产阶级常备军的必要性,并分析了巴黎公社失败在军事上的原因。

关于马克思军事理论的基本内容 研究认为,马克思军事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关于战争观 研究认为,马克思关于战争问题的主要观点有:

战争起源于原始社会后期出现的经济利益的冲突 在原始社会的最初阶段,由于各氏族集团的生产力低下,人口也不多,氏族内部实行公有制,共同劳动,共同消费,彼此紧密协作,居住区提供的生活资料足以维持自身的生存和繁衍。氏族集团之间不存在发生战争的条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居住区提供的生活资料逐渐难以满足公社成员消费的需要,这就导致向外扩张,于是便出现了战争。他还认为,战争并不是永恒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产生它的条件不复存在时,将自动退出历史舞台。

战争服务于政治,政治支配战争 马克思指出,在阶级社会中,战争是一种直接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是受政治支配的,政治不仅能够导致战争的爆发,而且贯串于战争的始终,影响战争的各个方面。

战争的性质一般说来取决于它对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马克思认为,要确定某一战争的性质,首先必须从历史作用上看这一战争是促进社会进步,还是阻碍社会进步。根据战争的历史作用,他把战争区分为两大类,

即进步的、革命的、解放的、防御性的战争和反动的、掠夺性的、侵略性的、进攻性的战争（这里的“防御性”和“进攻性”都是从政治意义上说的。——编者注）。对进步战争要支持，要歌颂；对反动战争要反对，要谴责。他还指出战争的性质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是同一次战争，在不同阶段会因政治目的的变化其性质也随之改变。

战争在一定条件下引起革命或社会变革 马克思认为，不同性质的战争对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是多种多样的。进步战争将会促进社会的发展。反动战争一般对社会进步起阻滞作用，但从其后果看，有时在一定条件下也有可能对社会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因为剥削阶级统治集团为了一己私利而挑起的战争所具有的非正义性和巨大的破坏性，往往能够促使社会的阶级斗争激化，迫使人民为摧毁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而奋起抗争。

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地位 马克思在与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中指出，先进的思想本身只能使社会超出旧制度的思想范围，而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主义原理，也适合于用来说明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作用。从马克思留下的一些军事著作看，他在分析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的各次战争的进程和结局时，首先考虑的总是人民群众在其中的作用。当然，马克思对统帅在战争中的作用也并没有否定。相反，他认为，统帅虽然不能决定战争的命运，却能影响战争的进程。他对那些在战争中做出过贡献的军事家总是给予充分肯定评价。

关于军队理论 研究认为，马克思关于军队理论的主要观点有：

军队是随着阶级和国家的出现而逐步产生的 马克思认为，尽管原始社会曾发生过规模巨大的战争，但不存在脱离生产的专门

军队组织。即使在阶级社会的早期，情况也是这样。战争在当时是社会成员的共同任务和共同工作，除儿童外，每个男子都承担有参战的义务，由各个家庭组成的社会集团本身就是按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军事组织或军队组织。专门的军队是随着阶级和国家的出现，逐步产生的。

资产阶级常备军是维持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强力手段 马克思认为，反动军队是剥削阶级掌权国家为维护政权而拥有的主要强力手段。从反动军队的对内职能来说，马克思认为，它是最主要的镇压工具，同时，反动军队还能帮助政治野心家发动政变来攫取国家的权力。至于反动军队的对外职能，那也是多方面的：广泛用于进行殖民战争；频繁用于镇压附属国和殖民地人民的反抗；经常用于进行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掠夺和争霸战争。他强调，对反动军队从事的各种反革命行径，无产阶级政党和革命人民必须及时予以揭露和抨击。马克思自己在一些报刊评论中，就曾对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动用军队掠夺和侵略中国、印度等国的罪行，进行了无情的斥责和鞭挞。在《法兰西内战》一文中，马克思还提出了废除资产阶级常备军，代之以武装人民的重要思想。

无产阶级的武装组织是一种全新的革命军队 马克思指出，工人应该组织和武装起来，使整个无产阶级用步枪、马枪、大炮和弹药武装起来，组成由他们自己选出的指挥官和总参谋部来指挥的独立的无产阶级近卫军，并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只受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赢得自身解放的权利。马克思还认为，无产阶级的武装组织是同时具有爱国主义精神和国际主义精神的军队。

军队在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 马克思认为，军队是社会的一种特殊的组织，由于

对敌斗争的需要,迫使它不得不率先在经济关系方面不断进行变革,从而成为整个社会关系变革的先行者。他说过“战争比和平发达得早”(《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1卷第341页)。像发放薪金、承认个人拥有动产的权利、建立行会制度、大规模运用机器、以金属作为货币以及在部门内部进行分工等经济现象,最初都是在军队里发展起来的。

关于暴力革命理论 马克思多次表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只要可能,无产阶级决不放弃和平手段,并设想少数国家可以不经武装搏斗而实现社会主义。但鉴于统治阶级通常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因而实现社会主义变革的根本办法是暴力革命。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

关于战争指导理论 研究认为,马克思关于战争指导问题的主要观点有:

不应把战争的政治内容同它的军事行动性质相混淆,防御性战争不排斥进攻作战行动 马克思认为,民族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从政治上说,总是带有防御性质的。在敌人打响第一枪后,被迫应战的一方,就完全有理由和有权利采取攻势行动打击对方,直到将其彻底击败。判断战争性质时,不能“把防御性的战争和防御性的军事行动混为一谈。”(《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5卷第581页)那种认为在街上遭人袭击的人只能招架不能还手的思维逻辑,“是缺少辩证法的。”(同前)

集中兵力是克敌制胜的重要因素 马克思认为,在进攻作战中,要善于集中兵力,打敌要害,实行彻底的歼灭战。1857年9月,他在评论英国军队在印度的作战行动时,曾指出战略的奥妙就在于集中兵力。美国内战期间,马克思在分析当时驻在田纳西的北军肯塔基军团下一步的可能行动方案时,又强调了集中兵力、打敌要害的重要性。为了争取全局的胜利,应当不惜牺牲一切小的军事行动,

从所有其他军团中抽调力量来加强这个军团。并建议北军集中兵力打击南部同盟控制地区的锁钥乔治亚州,割裂其整个防御部署,以便各个击破。

科学价值

研究认为,马克思军事理论作为一种观念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历史观原理同战争实践与军队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科学地反映了军事领域里许多带规律性的东西,对今天的现实生活仍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认真、系统地开展对这一理论体系的研究,对认清今天的世界政治军事形势,贯彻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实现科技强军推进人民解放军的质量建设,继承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和邓小平军事理论,识别和抵制错误军事思想,掌握先进的军事科学研究方法,都具有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马克思军事理论作为无产阶级军事科学的理论基石,不仅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防建设、军队建设、军事理论的繁荣发展、军事人才的培养和造就,有着长期的指导作用,而且为马克思军事理论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为适应维护国家安全和加强军事理论建设的需要,马克思军事理论研究,必将获得新的巨大的发展。

参考文献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1~5卷,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1982。

鲍世修撰:《马克思恩格斯军事理论研究》,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9。

鲍世修撰:《马恩列斯军事理论研究现状综述》,载《世界军事年鉴—1987》,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

(鲍世修)

恩格斯军事理论研究 (study of Engels' military theory)

探讨恩格斯军事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战争观、军队理论、暴力革命理论、作战指导理论和科学技术对军事的影响等问题的活动。

研究简况 对恩格斯军事理论的研究,在中国开展得较早。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决定走以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从20年代后期起,便开始了对恩格斯军事理论的研究和探索,用以指导当时的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早期一些能直接阅读外文原著的领导人,如瞿秋白,就曾认真钻研过恩格斯的军事理论,他曾引用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阐释过的关于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炮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的基本原理,批驳了考茨基反对暴力革命的言论。1930年,全面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以专门章节论述无产阶级暴力观的重要著作——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由吴黎平译成中文。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马恩列斯军事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更加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军委的重视。从1938年开始,军委便组织专人有计划地翻译恩格斯的军事著作,并通过《八路军军政杂志》或作为抗日战争参考丛书相继发表,以推动广大干部的学习和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人民出版社在50年代出版了曹汀翻译的《恩格斯军事论文选集》。与此同时,研究恩格斯军事理论的论文也开始在报刊出现。1958年3月军事科学院成立后,曾于60年代初翻译出版了三卷集的《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选》,后又于80年代初期编辑出版了内容更为充实全面的五卷本《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这就为广大干部群众全面系统地学习和研究恩格斯军事理论创造了更便利的条件。此后,军内外研究恩格斯军事理论的人数在逐渐增多,具有重

要学术见解的研究专著和论文相继出版发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较过去大有进步。1986年,军事科学院专门成立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研究所。全军的一些主要指挥院校也相继设立了负责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教学的研究小组。1988年,“马恩列斯军事理论”,作为一个研究方向,被列入军事科学院硕士研究生培养规划,随后的教学实践又进一步推动了恩格斯军事理论的研究。进入90年代,“马恩列斯军事理论”和“毛泽东军事思想”,作为一个学科列入了《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的编纂框架。这就为全面系统地研究恩格斯军事思想提出了新要求,从而使研究工作和研究范围有了新的拓展。

对恩格斯军事理论的研究,中央军委领导及其他高级领导都十分重视。叶剑英元帅早在30年代战争时期,就研读了不少恩格斯的军事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在长期主管全军的训练和科研工作中,潜心研究恩格斯关于战争和军队的一些基本观点,特别是对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分析战场内外相关因素对战况进行准确预测的科学方法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从中获得了方法学上许多有益的启示。1962年,许光达大将在一次报告中明确提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科学的奠基人,特别是恩格斯是个伟大的军事家。他把恩格斯的军事理论概括为五点:①揭示了战争的起源。②阐明了各类战争的性质。③论述了战争与政治、经济的相互关系,生产方式、作战方法与军队组织编制的相互关系。④阐明了作战方法、战术的发展与政治、人、技术的关系。⑤提出了适时举行无产阶级武装起义的必要性和指导艺术问题。这是中国军事理论界明确提出恩格斯军事理论大体内涵的较早文献。1984年,军事科学院宋时轮院

长则从探讨恩格斯军事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的角度,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认为,恩格斯关于武装起义、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军队、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战争、积极防御是最有效的防御、赢得战争胜利的是人而不是枪以及军队的组织、作战方式和胜负取决于物质的条件等理论原则,在中国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均得到了充分运用,而且结合中国实际有所发展。

从70年代末开始,军内外一部分军事理论工作者开始了对恩格斯军事理论的系统研究。1980年11月,为纪念恩格斯诞辰160周年,鲍世修发表了题为《恩格斯对无产阶级军事理论的伟大贡献》的长篇论文。文章在四个方面详尽论述了恩格斯对创建无产阶级军事科学所作出的重大贡献。①在一般基本军事理论领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原理和论断,解决了许多前人未能解决的问题,推动了整个军事科学的发展。该文指出,关于论述军事科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即论述战争和军队的起源发展、本质和社会原因的一般基本军事理论,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是缺乏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基础的。恩格斯的功绩在于,他和马克思一起,最先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创造性地运用到军事科学基本理论的研究方面,通过揭示战争和军队以及作战方法对经济条件的依赖性,科学地说明了武装力量和军事科学发展的物质基础。②在革命人民武装斗争的军事理论领域,从暴力革命的基本原理出发,为工人阶级制定了完整的军事纲领和一整套的战略、策略,从而揭开了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军事科学发展的新的一页。③在军事学术即一般的战略战术原理和原则领域,运用军事辩证法提出了许多卓越的见解,深刻地揭示了军队作战行动的客观规律,大大丰富了整个军事科学的内容。④在

军事历史研究领域,他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科学地规定了人民群众和统帅在战争史上各自应有的地位和作用,深刻地阐明了在一切军事活动中,人和武器的正确关系,创立了崭新的马克思主义军事历史学理论。

80年代,谈论恩格斯在军事方面的研究方法的文章有所增多。1980年,《哲学研究》杂志第12期发表了敬恩撰写的题为《学习恩格斯分析战争现象的科学方法》的文章。该文介绍了1870~1871年普法战争期间恩格斯分析战争进程的科学方法,从而阐明了恩格斯每次对战场事态发展作出准确预测的奥秘所在。认为,恩格斯之所以能够做到在普法战争中判断准确,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他通晓以下深刻的战争哲理:①战争不是孤立的现象,它是与周围的各种事物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②战争不是静止不动的现象,它是随着交战双方军事行动的展开而不断发展变化的。③战争不是不可知的现象,它的奥秘是能够揭示出来的,军队作战行动的规律是可以预见得到的。

试图对恩格斯的军事理论进行系统概括的还有周鸾书。1983年,他在《江西师院学报》发表两篇文章,分别就恩格斯的军事理论和作战理论谈了自己的看法。其中,前一篇文章阐述了恩格斯关于近代军事体系的特点、暴力与经济的关系、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决定军队素质的诸因素等问题;后一篇文章则论述了恩格斯关于战略决策的重要性、“先机之利”、扬长避短、集中兵力、进攻战、防御中的河川和要塞、民族战争和人民战争中的游击战、将帅之才和预见性等和九个问题。

1985年和1988年,先后出版了尚金锁、邓锋的研究专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军事思想简论》、《马列主义军事理论研究》,对恩格斯军事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条

件、基本内容和主要观点以及科学价值等都作了较详细的介绍和论述。

90年代是恩格斯军事理论研究获得更加深入发展的新时期。从1990年4月至1991年8月,《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系列从更新角度探讨恩格斯军事理论的文章。一些在过去研究中没有涉及到的问题,如在恩格斯的军事理论遗产中有无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思想?按照恩格斯的观点,军队的战斗力应当由哪些因素构成?恩格斯是怎样看待科学技术对军事的影响的?恩格斯研究军事问题,从方法论角度看都有哪些特点?从巴黎公社的失败中,恩格斯在军事方面都提出过哪些经验教训?等等,在这一时期都被提了出来,并在理论上得到了科学的解释和说明。

90年代上半期,围绕《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思想》中有关《恩格斯军事理论》条目的撰写和评审,恩格斯军事理论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该组条目既有总体理论概括又有著作内容阐释,集中反映了最近半个世纪来中国军事理论界研究恩格斯军事理论的新成果和相应水平。

20世纪末,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鲍世修撰著的《马克思恩格斯军事理论研究》一书。该书深入详尽地探讨了马克思恩格斯军事理论各个有机组成部分、理论形成的历史条件、理论特点、研究方法、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思想的理论价值、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等问题,是20世纪末中国理论工作者在马克思恩格斯军事理论研究方面取得的又一丰硕成果。

研究内容 中国军事理论界对恩格斯军事理论的研究,主要是围绕以下内容展开的:

关于恩格斯军事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研究认为,恩格斯军事理论,是恩格斯在与马克思共同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形

成和发展起来的。1845年2月,恩格斯在爱北斐特发表的两篇演说中,探讨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常备军对经济建设的影响,阐明了军队在共产主义社会将不复存在的原因。1845~1846年,在与马克思共同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历史任务,并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3页),而这一矛盾“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同前)。1848年2月,在《共产党宣言》中与马克思一起提出了用暴力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想。1848~1849年欧洲革命期间,恩格斯撰写了一些战争评论,如《皮蒙特军队的失败》、《匈牙利的战争》等,在这些战争评论中,初步阐述了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的基本思想。1849年8月~1852年,恩格斯以主要精力总结了1848~1849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恩格斯通过认真系统地学习军事理论和在起义部队中的实际锻炼,对军事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在《德国维护帝国宪法运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等著作中,深刻分析了革命运动失败的原因,提出了工人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组织的思想,阐述了武装起义必须遵循的规则,探寻了革命党在武装起义和国内战争中所可能采取的策略,并对无产阶级军事学术的发展,发表了许多重要的见解,从而为其军事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初步基础。

自1853年克里木战争爆发到1871年巴黎公社建立,是恩格斯从事军事问题研究和著述的最重要时期。这一期间,他撰写了大量军事文章和战争评论。在《欧洲军队》中详细地评述了欧洲各国军队的组织、编制、训练制度、官兵的战斗素质等特点。在为纽约

出版的《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的《军队》、《攻击》、《会战》、《步兵》、《炮兵》、《骑兵》、《筑城》、《海军》等60多个条目中,概括地阐释了自古以来的战争史、军队发展史、分析了各个时期武装力量的组织、装备、训练状况,以及作战方式方法的演变等。在《步枪史》、《论线膛炮》、《法国轻步兵》等文章中,考察了各种武器的改进过程,不同国家的战术发展过程,以及战术发展对武器改进所起的促进作用。还专门评述了英国志愿兵部队的组织、训练、军官培养、部队管理等问题。在为克里木战争、印度民族大起义、意大利独立战争、美国内战、普奥战争、普法战争等重大军事冲突撰写的约200篇战争评论和军事论文中,通过对具体战争的分析,深刻揭示了战争与政治、军事与外交、战略与战术、兵器发展与作战方式演变之间的关系,阐释了战争中许多带规律性的现象和原理。在总结各国人民起义和反对殖民帝国侵略的武装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深化了对人民战争的本质和特点的认识。后来,在1876~1878年撰写的《反杜林论》一书中,恩格斯探讨了暴力在历史中的正反作用,论证了军队对经济条件的依赖关系以及对经济的反作用,分析了武装力量和作战方法发展演变的基础等,标志着恩格斯军事理论的成熟。

19世纪80~90年代,随着各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过渡,欧洲局势出现了剧烈动荡。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急剧增加,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随时有被卷入一场世界战火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先后撰写了《波克罕〈纪念1806年至1807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一书引言》、《欧洲能否裁军?》等重要文章,分析了未来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规模、特征、结局,揭示了战争危险的根源,探讨了制止战争爆发的有利因素,说明了社会主义者对即将爆发的战争的态度和

同军国主义扩军备战行径作斗争的策略与方针。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战争的起源和原始社会的军事组织等问题又作了详尽考证和阐释,使恩格斯军事理论有了新的发展。

关于战争观 研究认为,恩格斯关于战争问题的主要观点有:暴力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战争的起源和消亡、战争的本质、战争的性质、战争同社会发展的关系、人民群众和统帅在战争中的作用、战争的胜负同人和武器的关系、人民战争的特点、战争与和平的辩证关系等。恩格斯关于战争问题的许多精辟思想在这部分均有所反映。如,在谈到暴力的物质基础时,他指出,没有什么东西比陆军和海军更依赖于经济前提;军队的装备、编成、战术和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在论及人和武器在战争中的关系时,他强调,战争的胜负是人和武器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人的作用、特别是人在战争中的主观能动性和勇敢精神更为重要,并明确指出,赢得战争胜利的是人而不是枪。关于人民战争思想,恩格斯最有代表性的清晰表述是:群众起义,革命战争,到处组织游击队,进行游击战争,是小民族制胜大民族,不够强大的军队抵抗比较强大和组织良好的军队的唯一手段。

关于军队理论 研究认为,恩格斯关于军队理论的主要内容有:军队的产生、社会本质和职能,军队的发展与社会生产及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合理的兵役制度,构成军队战斗力的各种因素,军队在无产阶级夺取和巩固政权中的作用,共产党对无产阶级军队的领导和无产阶级军队的新特点等问题是其主要内容。恩格斯对军队问题的研究是非常透彻的。他认为,军队是有组织的暴力,是国家特殊的公共权力;不同性质的军队具有不同的职能。反动军队是统治阶级对付人民的主

要压迫工具,革命军队则是被压迫人民反对压迫者的工具。他主张,废除资产阶级常备军,建立和保持无产阶级常备军;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无产阶级掌权的国家,采取常备军和民兵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恩格斯强调,实现军队进步的关键在改革,而军队改革的目的是从根本上提高战斗力。较完善的武器装备、科学合理的编组、良好的军事素养、优秀的思想政治素质、统一果敢的指挥和周密可靠的后勤保障、先进的军事思想,是构成军队强大战斗力的必备条件。

关于武装起义理论 研究认为,恩格斯关于武装起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有:武装起义在达成革命目标的道路选择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发生武装起义的社会经济原因和成熟条件,无产阶级在与资产阶级联合举行的起义活动中应坚持的独立性和拥有自身武装组织的必要性及同农民联合的必要性,武装起义作为一种艺术应遵循的客观规则,武装起义作战方式的变化发展等。武装起义理论的核心是革命道路的选择。恩格斯认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就无产阶级一方的愿望来说,最好能避免采用流血手段,但是,剥削阶级通常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因而,实行社会变革,根本的办法是暴力革命。他强调,在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条件下,举行武装起义,无产阶级必须保持联合斗争中的独立性,建立自己的武装组织和取得农民的支持,方能获得胜利。此外,武装起义是一种艺术,它本身固有的一些规则,起义者必须严格遵守。

关于作战指导理论 研究认为,恩格斯关于作战指导理论的主要内容有:作战指导的认识路线和战略战术原则。恩格斯指出,战争活动是有规律的,正确认识战争规律,按照战争规律指导作战,是作战指导的关键。他强调,作战方法必须随战争实践的变化而转变,切忌不问客观条件机械套用。恩格斯认为,成

功的作战指导,必须遵循以下的战略战术原则:在进攻作战中,不是平分,而是集中兵力在决定性地段实施主攻;在防御作战中,应重点设防,防中有攻,攻防结合,最有效的防御是以攻势来进行的积极防御;要尽可能长久地掌握主动权,以左右敌人的行动;行动的迅速可以弥补军队的不足,时间就是军队,就是胜利;攻敌于不备,歼敌于追击之中;慎重选择决战的时机和地点;预备队是借以解决战斗的主要手段;力避侧敌行军,用好侧方阵地;组织大部队行军时,要考虑各纵队间的相互支援,要把结合点选在敌军活动范围之外,等等。

关于科学技术与军事的关系 研究认为,恩格斯关于科学技术与军事关系的论述,不仅包含有恩格斯关于科学技术对军事发展施加全面性影响的内容,而且还有他关于战争实践不断推动军事进步的理论阐释。恩格斯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带动新作战工具的出现,必然推动军队内部组织结构和体制编制的改变,以及作战方式方法的变化,而作战方法和武器装备各自的变化,在不同阶段上又有不同的特点:在战争时期,从总体上看,作战方法的发展基本上与武器的改进是一致的;在和平时期,两者之间的发展便发生了差距。对此,恩格斯形象地指出:在长久的和平时期兵器由于工业的发展改进了多少,作战方法就落后了多少。关于战争实践推动科技进步的科学道理,恩格斯通过对西欧国家武器装备发展历史的剖析作了说明,指出,正是进行散兵作战的需要,推动了后装线膛枪的问世。

科学价值 研究认为,恩格斯军事理论作为一种观念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历史观原理同战争实践和军队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科学地反映了军事领域里许多带规律性的东西,对今天的现实生活仍

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认真、系统地开展对这一理论体系的研究,对认清今天的世界政治军事形势,贯彻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实现科技强军推进我军质量建设,继承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和邓小平军事理论,识别和抵制错误军事思想,掌握先进的军事科学研究方法,都具有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

恩格斯军事理论作为无产阶级军事科学的理论基石,不仅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防建设、军队建设、军事理论的繁荣发展、军事人才的培养和造就,有着长期的指导作用,而且为马克思军事理论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广阔空间。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为适应维护国家安全和加强军事理论建设的需要,恩格斯军事理论研究,必将获得新的巨大的发展。

参考文献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1~5卷,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1982。

鲍世修撰:《马克思恩格斯军事理论研究》,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9。

鲍世修撰:《马恩列斯军事理论研究现状综述》,载《世界军事年鉴—1987》,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

(鲍世修)

列宁军事理论研究 (study of Lenin's military theory)

探讨列宁军事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基本内容和科学价值等问题的活动。

研究简况 20世纪20年代开始,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学者和军事专家即开始了对列宁军事理论的研究和探索。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国内已有《列宁战争论》、《列宁论中国的战争》等译著问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军事理论界根据中国

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开始了对列宁军事理论著作全面系统的编译研究工作。由军事科学院译编的《列宁军事文选》(两卷本)、《列宁论战争与和平》、《列宁军事文集》等译著相继出版,从而推动了对列宁军事理论的研究。进入80年代,有关研究列宁军事理论的论著陆续出版,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专著有:《列宁军事思想初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军事思想简论》、《列宁斯大林军事思想》和《马列主义军事理论研究》等。这些研究专著,从不同侧面对列宁军事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条件、基本内容和主要观点以及科学价值等作了较详细的介绍和论述。到了90年代,围绕着《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思想》有关《列宁军事理论》条目的撰写和评审,列宁军事理论研究有了新的进展。该组条目既有总体理论概括,又有其著作的内容阐释,集中反映了中国军事理论界研究列宁军事理论的新成果和相应水平。综合而言,上述专著和条目,对于列宁军事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基本内容和地位作用等,都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阐释和评介。

研究内容 中国军事理论界对列宁军事理论的研究,主要是围绕以下内容展开的:

关于列宁军事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研究认为,列宁军事理论,是列宁在长期领导俄国革命、苏维埃共和国武装力量建设、反击国内白卫军和外国武装干涉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高潮时期,列宁指导了布尔什维克党反对日俄战争的斗争,组织和领导了1905年的十二月武装起义。他在此期间撰写的《旅顺口的陷落》、《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莫斯科起义的教训》等著作,论述了帝国主义战争的特点,批判了专制制度的军事体制,提出了战争现在是由人民来进行的观点,揭示了阶级社会战争的根源,论证了组织武装起义和创建革命

军队的必要性,并阐明了革命军队的宗旨、任务和阶级成分,以及组建革命军队的原则与方法。同时还强调了为实际准备武装起义而研究军事科学与学习军事知识的必要性。至此,列宁军事理论已基本形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爆发前后,列宁积极参与和领导了反对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就现代战争涉及的许多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观点。他在此期间撰写的《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社会主义与战争》、《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战争与革命》等著作,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战争观一些重要原则,并结合实际全面论证了战争与阶级、战争与政治、战争与经济、战争与革命等大量理论问题。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苏俄内战和外国武装干涉时期,列宁全力参与军事领导工作,同时撰写了《大难临头,出路何在?》、《马克思主义和起义》等著作,起草了《俄共(布)中央关于东线局势的提纲》、《大家都去和邓尼金作斗争!》等文告,发表了一系列的讲话、指示和报告,就组织武装起义、工农红军建设、武装保卫祖国和加强国防建设等问题提出许多新的理论观点。此外,为了直接指导战争,还领导解决了一系列重大军事问题,如制定正确的战略决策、选定主要作战方向和集中使用兵力等。战争结束后,列宁仍然高度重视军事工作,强调要改进军事领导体制,并在俄共(布)第十次和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为改善和提高国家的防御能力制定了明确的方针政策。这些都标志着列宁军事理论有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关于战争观 研究认为,列宁关于战争问题的主要观点有:战争这一社会历史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才出现的,其根源隐藏在社会经济关系的对抗性矛盾之中,是经济利益冲突的产物。在人类社会的各个阶段,战争无论何时何地总是由剥削

者、统治者和压迫者阶级挑起的;帝国主义战争,更是私有制基础的直接的和必然的发展。因此,在阶级社会里,在帝国主义时代,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只有在社会经济关系中的对抗性矛盾消除以后,只有在阶级消灭和国家消除以后,战争才能消失。列宁在揭示战争的本质和性质时指出,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而政治的基础是经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阶级之间的关系,因而阶级社会中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始终是战争的经济基础,是私有制引起了战争。由于进行战争的阶级和他们所追求的目的不同,战争的社会性质有着正义的(解放的)与非正义的(掠夺性的)明显区别,因而战争性质的确定,取决于它的政治内容,即看它是什么政治的继续,是由哪一个阶级进行的,是为了什么目的进行的;在交战过程中,随着双方情况和条件的变化,战争的性质也是可以转化的;只有首先弄清楚战争的性质,才能决定对待它的态度。列宁在阐述帝国主义时代战争的根源和类型时指出,世界性的经济掠夺孕育着帝国主义战争,即引起重新分割世界的战争;随着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战争的发展,势将引起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和掠夺的民族解放战争,或者导致国内战争和革命战争,以及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保卫社会主义的战争。所以,整个帝国主义时代将是充满各种战争的时代。

关于暴力革命和武装起义理论 研究认为,列宁关于暴力革命和武装起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有:历史上没有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不是用暴力来解决的,在阶级斗争最尖锐的情况下,革命就是战争。列宁充分论证了无产阶级进行暴力革命的必然性,要求积极组织无产阶级举行起义,提出要使起义采取遍及全国的长期的国内战争这种高级形式。列宁强调,党必须在工人、农民和军队中培养一支

无产阶级大军,在革命形势到来的时刻,要立即发起起义,并且采取坚决的进攻,促使起义成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战争。

关于军队建设理论 研究认为,列宁关于军队建设理论的主要内容有:只有强力组织即军事组织才能解决伟大的历史问题,因此建立革命军队十分必要,常备军是国家政权的主要强力工具。列宁为新型革命军队提出的原则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必须由共产党进行政治领导;要具有公开的阶级性;它要为劳动者的利益而斗争,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其根本任务是要打退一切敌人的进攻,保卫民主的新制度。为了保证新型军队完成任务,列宁明确提出,要培养新型的军事干部;从人民中间选拔指挥员;合理使用旧的军事专家;要按照现代战争的需要进行军事训练,学习现代军事知识和科学技术;采取一长制,实行集中统一的领导;保持高度自觉的纪律;进行党务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随时戒备和保持必要的防御能力。

关于国防建设和战争指导理论 研究认为,列宁关于国防建设和战争指导理论的主要内容有:无产阶级获得胜利的国家不能排除战争,为了保证工农政权,要像爱护眼珠一样爱护军队和国家的防御能力,整个国家和人民都必须严肃地对待国防,发展国家的经济,不断增强国防力量。战争是对每个民族全部经济力量和组织力量的考验,谁在经济、政治、科学、技术、精神和军事方面占有优势,谁就能在战争中获得胜利。在战争指导方面,列宁强调,要实行政治领导和军事领导的统一;建立巩固的有组织的后方基地,集中管理国家的一切力量和资源;全面考察并利用战争客观规律和双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条件;果断而及时地作出战略决策;掌握军队战略行动的计划性和目的性,并对命令的执行情况

进行严格的监督和检查。他还指出,军队的技术准备和士气对于赢得现代战争是具有重大作用的。

关于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理论 研究认为,列宁关于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理论的主要内容有:社会主义国家武装斗争的方式,主要是进行人民战争;现代战争是由人民来进行的;在任何战争中,胜利归根到底是由那些在战场上流血的群众的精神状态决定的。在现代条件下,正确的战略决策和有效的作战指挥是赢得战争胜利的关键。为此,在战争中要善于利用敌人的矛盾,争取同盟者,各个击破敌人;要正确判明主要危险和确定主要突击方向;力求掌握敌人现有的或者可能有的斗争方法和手段,并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作战方式和方法。关于战略战术的灵活运用,列宁认为,指挥人员的主观条件起着重要作用。他在阐述具体作战原则时指出,在决定时机和决定地点拥有压倒优势是取得军事胜利的规律,要善于在此时此地集中兵力和兵器;在战争中,要始终争取并保持作战的主动权,并善于避免同绝对优势的敌人公开作战,而尽量在敌人最难料到的地点和时间攻其不备;在作战过程中,要及时地向主要战线调派战略预备队,并不允许改变其使用方向;要坚决地采取进攻行动和勇敢地实施突然袭击,并要在学会进攻的同时学会正确地退却,要及时地巩固并不断扩大业已取得的胜利。

关于列宁军事理论的科学价值 中国军事理论界在对列宁军事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及其内容进行研究探讨的同时,对其理论的科学价值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认为,列宁军事理论是适合于列宁所处时代的历史条件和斗争需要的,不仅对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武装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以及苏联红军建设和国防建设等,曾经起过重大指导作用,而且

对 20 世纪上半叶的无产阶级革命及其战争实践,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而且为苏联军事科学的形成和发展也奠定了基石。深入研究列宁的军事理论,领会其精神实质,掌握其科学方法,对于指导现代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列宁军事文集》,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

俞世福、韩晓林、李元奎主编:《列宁斯大林军事思想》,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

程金明著:《列宁军事思想初探》,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

(程金明)

斯大林军事理论研究 (study of Stalin's military theory)

探讨斯大林军事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基本内容和科学价值等问题的活动。

研究简况 斯大林军事理论的研究,在中国开展得较早。为指导中国革命战争,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即开始了对斯大林军事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面临着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任务,而当时苏联在军队建设和现代反侵略战争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是唯一可供中国学习借鉴的国家。为此,中国军事学术界即开始了对能集中体现苏联军队建设和作战经验的斯大林军事著作(如斯大林的《论伟大卫国战争》等)和一些能反映斯大林军事理论的苏军条令(如刘伯承翻译的苏军 1943 年《野战条令》)等译编工作,各军事院校开设了学习斯大林军事理论的课程,编写了有关教材。1960 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根据当时的国内外形势,

决定加强全军干部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学习。军事科学院为适应学习和研究的需要,于 60~70 年代,除编辑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军事著作外,还编辑出版了《列宁斯大林军事文选》。到 80 年代又编辑出版了《斯大林军事文集》。上述译著的出版,推动了包括斯大林军事理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研究。相继出版的研究专著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军事思想简论》、《列宁斯大林军事思想》和《马列主义军事理论研究》等。这些专著从不同侧面对斯大林军事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条件、基本内容和主要观点,以及科学价值等作了较详细的介绍和论述。到了 90 年代,围绕《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思想》中有关《斯大林军事理论》条目的撰写和评审,斯大林军事理论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该组条目既有总体理论概括又有著作内容阐释,集中反映了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军事理论界研究斯大林军事理论的新成果和相应水平。此外,有的军事院校开设了斯大林军事理论课程,有的军事科研单位召开了有关专题研讨会,军内外又出版了一些专著,发表了一批学术论文。斯大林军事理论研究获得进一步发展。

研究内容 中国军事理论界对斯大林军事理论的研究,主要是围绕以下一些内容展开的:

关于斯大林军事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军事理论界对斯大林军事理论的形成与发展问题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认为,斯大林军事理论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基础上,在参加俄国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中,在领导苏联军队建设、国防建设和卫国战争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斯大林自 1898 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党后,即结合时代特点和俄国国情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开始接受无产阶级

暴力革命思想。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高潮时期,斯大林撰写了《武装起义和我们的策略》、《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起义》等著作,论述了以武装起义推翻沙皇政府和建立革命政权的思想。1917年协助列宁组织和领导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其间撰写的《论战争》、《论俄国革命胜利的条件》、《两条道路》等著作,阐述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本质、目的及制止方法,俄国革命胜利的条件等问题。在1918~1920年苏俄内战和外国武装干涉时期,斯大林在列宁思想的指引下,撰写了《彼尔姆陷落原因给列宁同志的报告》、《关于建立共和国的战斗预备队》等著作,提出了建立无产阶级常备军、建设巩固的后方和发展军事工业等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国防建设的重要观点。这些,标志着斯大林军事理论已初步形成。

20世纪20~30年代,斯大林在领导苏联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撰写了《论俄国共产党人的战略和策略问题》、《论列宁主义基础》、《论红军的三个特点》、《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等著作。斯大林在上述著作中,从本国实际出发,并针对帝国主义包围和大战危险增长的现实,提出了加速发展国民经济、全面加强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建立广泛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进行反侵略战争准备的积极防御战略思想,这表明斯大林军事理论已形成体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大林在领导苏联军民进行伟大卫国战争中撰写的《广播演说》、《国防人民委员命令(第五十五号)》、《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七周年》等著作,论述了打败德、日法西斯夺取卫国战争胜利的纲领,发展了包括军事、政治、经济、外交在内的国家战略理论和战争指导艺术。战后,斯

大林又撰写了《在莫斯科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给拉辛同志的复信》、《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著作,总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并根据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大战不是不可避免的新论断,以及要经常保持警惕,继续加强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日益提高军事艺术水平等要求。这表明斯大林军事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结束后又获得了很大发展。

关于战争观 研究认为,斯大林关于战争问题的主要观点有:

战争产生于资本主义制度和帝国主义对世界霸权的争夺 战争是世界各种经济和政治势力在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基础上发展的必然产物。在帝国主义时代,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更加突出,通常经过一段时期,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均势就要被破坏,争夺销售市场、资本输出市场、原料产地、石油资源以及控制陆、海交通要道的斗争就空前尖锐起来,而所有这些争夺又都归结为争夺世界霸权这一基本问题。一些帝国主义国家为了争夺世界霸权、摆脱危机,必然同另外一些同样渴望世界霸权的新兴帝国主义国家发生激烈冲突,用战争解决世界霸权问题。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市场的斗争比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的矛盾更加激烈,美、苏必战之说缺乏根据;世界大战不是不可避免的,但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就依然存在。

战争是政治的表现,战争的性质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 不能把战争问题同政治问题分开,因为战争是政治的表现。战争有侵略的、非正义的战争和解放的、正义的战争之分,因而不能笼统反对一切战争,面应反对帝国主义的、反革命的战争,拥护解放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由于德、奥、意同盟国和英、法、俄协约国这两个

帝国主义集团要重新瓜分世界而爆发的,是非正义的、帝国主义的战争,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是由于德、日、意法西斯国家要夺取世界霸权、在全世界推行法西斯制度,并侵略一切爱好自由的国家而爆发的。因此,反轴心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开始就带有反法西斯战争、解放战争的性质。

以武装起义夺取政权,以全民战争打败侵略者。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武装起义、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是革命运动的必然规律。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成为起义的领袖,加紧注意武装工作和组织红色队伍,按照统一计划,积极组织武装起义,在起义中采取进攻政策。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的苏联,必须从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各条战线上进行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以全民战争战胜侵略者。苏联同法西斯德国的战争不仅是两国军队之间的战争,同时也是全体苏联人民反对德国法西斯军队的伟大战争,因此,要使全民动员起来,把自己的全部工作转到战时轨道上来,服从战争利益。

战争具有两重性。战争同生活中的一切事物一样,具有两重性。它既有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和牺牲的消极方面,也有唤醒人民、锻炼人民、促使人民起来革命的积极方面。

现时代的战争是机器时代的战争。以往的战争是工场手工业时代的战争;现时代的战争则由于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的发展而成了机器时代的战争。

战争命运决定于经常起作用的因素。战争的命运不会由突然性这种偶然因素来决定,而由那些经常起作用的因素来决定,如后方的巩固性、军队的士气、师的数量和质量、军队的装备、军队指挥人员的组织能力等。原子弹不能决定战争的命运。

关于军队建设理论。研究认为,斯大林关于军队建设理论的主要内容有:

建立一支无产阶级的武装力量。无产阶级武装力量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石之一。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国家必须依靠工人和农民,努力建立一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各民族团结和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无产阶级武装力量。

实行常备军体制,建设一支强大的正规军。在武装力量建设上,依靠民兵体制是建立不起任何国防的。应当实行常备军体制,建设一支专门的、训练有素和装备齐全的常备军。如果不建设一支充满纪律精神、有组织得很好的政治部,并且一接到命令就能够奋起杀敌的正规军,那就不能够保卫共和国。

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指挥员和司令部,它领导无产阶级在一切斗争部门中进行一切形式的斗争,并把各种不同斗争形式联成为一个整体。红军的性质表现为3个特点,即红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军队,是巩固各民族团结的军队,是充满国际主义精神的军队,党的任务就是使红军永远保持和巩固这些特点,使军队成为革命思想的模范体现者。军队是工人和农民的集合点和学校,必须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建立和健全军队的政治工作机关。必须实行严格的组织纪律,同时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严禁用惩办代替教育。要发扬革命英雄主义。慷慨地嘉奖作战有功人员和部队是培养和保持军队战斗精神的重要因素。

提高军队现代化武器装备水平,协调发展各军种兵种。武器装备是决定战争命运的重要因素之一。军队要彻底打败敌人,除了无比的勇敢精神之外,还必须有完全现代化的、数量充足的武器装备,以及组织得很好的、数量充足的供应。为此,必须加强军种、兵种建设,使它们日臻完善并协调地发展。

加强干部培养和部队训练。“干部决定

一切”。平时通过军事院校培养军队干部，战时则除军事院校培养外，主要通过实践锻炼。战争是严峻考验，它能造就勇敢、坚强、能干的人。许多优秀将领就是在战争头几个月打出名的，他们经过战争锻炼取得了经验，成了真正的统帅。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干部，是取得卫国战争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现代战争要求部队具有高度的战斗素质和精神素质，熟练掌握武器装备，密切协同动作，具有良好体魄。部队要努力通过严格训练达到这些要求。“战争需要什么，部队就训练什么”，这是部队训练的指针。

加强军事科学研究，发展现代军事科学 在军事上，特别在这种现代化战争中，不能停步不前。在军事上停步不前，就等于落伍。落伍的人是会挨打的。因此，必须深入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在战争经验的基础上，在军事科学和军事技术发展的基础上，日益提高自己的军事艺术水平。要重视并严肃对待军队各种作战条令的编写工作，并按照严格程序审批，因为条令不同于短期有效的命令，它是多年有效的红军法典。必须从事业的利益和现代军事科学的观点出发，对著名权威人士的过时的原理和观点进行批判地分析，不这样就不能推进军事科学的进步。

关于国防建设理论 研究认为，斯大林关于国防建设理论的主要观点：

维护和平，推迟战争 苏联的建设事业多半取决于是否能推迟同资本主义世界的战争，把它推迟到国内外环境对苏联比较有利的时候。为此，要利用帝国主义阵营中的矛盾，向资本家“赎买”并采取一切办法保持和平关系。为了赢得经济建设和增强国防力量的时间，在对外关系上要保持谨慎态度，不让战争挑拨者把苏联卷入冲突中去。苏联在争取和平国际环境中所依靠的是：自己日益增长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实力；苏维埃社会在道

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各族人民的友谊；自己的红军；自己的和平政策；迫切需要维护和平的各国劳动者在道义上的支持；由于某种原因而不愿破坏和平的那些国家的明智态度。

迅速发展国民经济，建立雄厚的国防经济基础 经济力量是进行反侵略战争的基础；面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必须迅速发展国民经济，创造一切技术上和经济上的必要前提来最大限度地提高国防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尽快建立国防的经济基础，是国家积极防御准备的一项最重要措施；必须打破闭关自守，寻求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各种形式的经济合作，引进先进技术和装备，加强国防建设；必须建立充足的战略物资储备。

加强后方建设 后方的巩固性是决定战争命运的经常起作用的因素之一。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没有稳固的后方，就不能获得胜利，因为后方不仅以各种给养支援前线，还以人力（战士）、以情绪和思想支援前线。没有巩固的后方，就不可能有国防。要建设巩固的后方，就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增强各族人民的友谊，教育人民和军队提高警惕性并坚定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意志，运用无产阶级专政惩办敌对分子，同时还要加速开发苏联东部地区，建设战略后方基地。

加强常备军建设和全民国防教育 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像爱护眼珠一样爱护武装力量和国防力量，加强常备军建设；要使全党认识到巩固国防的事业是全体劳动人民的事业；要使全体人民在帝国主义武装进攻的危险面前做好动员准备；要坚决克服在常备军建设上的取消主义情绪，坚定不移地满足军事部门的要求，改进军队供给，改进武器装备，加强军队训练，提高军队战斗力，以保卫社会主义成果免受外来侵犯。

关于积极防御战略理论 研究认为，斯

大林关于积极防御战略理论的主要观点有：

做好国内工作 使全国预先地、长期地作好经济上、政治上、精神上、军事上的积极防御准备，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加强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爱国主义精神，建立雄厚的国防物质技术基础，不断加强军事实力。

做好外交工作 要奉行维护和平和反对侵略的对外政策。要加强同所有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支援各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既不威胁任何人，也不怕任何人的威胁，坚持后发制人。

实施正确战略指导 在战略作战指导上，既准备在边境上消灭入侵之敌，也准备当强敌人侵时，通过积极的战略防御不断疲惫和消耗敌人，必要时实行战略退却，退入腹地，以便赢得时间积聚力量，伺机转入战略反攻和进攻，彻底消灭入侵之敌。

建立反侵略同盟 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战争，是无产阶级国家可以利用的“间接后备军”，战略指导的任务就是要正确运用这一切“后备军”。反法西斯的国家之间存在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别的共同利益，有共同的敌人。应同非侵略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结成反侵略同盟，以孤立和打击主要敌人——德、日、意法西斯国家。应根据盟国一致的利益，正确解决盟国之间的矛盾和分歧。

进行全民的卫国战争 战胜侵略者，不能只依靠正规军，同时还要依靠有利于消灭侵略者的人民游击运动。要遍地燃起游击战争的烽火，造成使敌无法安身的条件。广泛开展的人民游击运动，是战胜敌人的决定性条件之一。

关于统率艺术和作战艺术 研究认为，斯大林关于统率艺术和作战艺术的主要观点包括：

正确选择主要突击方向 选择时，不仅

要考虑军事需要，还要估计居民条件，使红军主力既能突击敌人主力集团，又能通过同情己方的地区前进；要尽全力找出敌强大集团的薄弱点（如翼侧、接合部、战斗力较差的部队等）；要兼顾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要求，具有必要的战役容量，使大兵团能机动自如。

在选定的主要突击方向上集中优势兵力只有在战线的一个地段上建立对敌的巨大兵力优势时，进攻才会取得应有的效果，为此要求每一个担任突破任务的集团军和方面军都建立突击集团。集团军的突击集团由3~4个师组成，而方面军的突击集团则由数个集团军组成。用这种建立突击集团的战法来代替一线平推的战法。同时，要求把航空兵和炮兵集中使用在突击集团行动地带内，把原来的航空兵和炮兵的火力准备，改为航空兵和炮兵进攻，即航空兵和炮兵应自始至终支援和伴随步兵进攻，直到突破敌防御全纵深。

用合围方式歼灭敌重兵集团 红军不只是从敌人手中解放苏联国土，而且要通过实施堪称“军事艺术典范”的大合围战役全歼敌军。这种大规模合围战役的胜利，是“指挥员成熟的标志”。

经常保持和正确使用战略预备队 不应该打没有预备队的仗，必须实行常备预备队制度。没有常备预备队就不能保持现有的阵地，也不能扩张战果。现代战争是预备队战争，谁的战略预备队多，谁善于正确使用和及时恢复战略预备队，谁就能胜利。在建立和使用战略预备队时，强调，预备队只有训练好才能投入使用；要隐蔽集中、适时展开，达成突然性；要使用于主要方向和重大战役；要准确选择使用时机。

实行灵活、机动、大胆的战术 红军统帅部的正确战略和各级指挥员的灵活战术，是取得重大战役胜利的保证。各级指挥员必须彻底抛弃“愚蠢的有害的线式战术”，应机断

行事,不墨守成规,采用灵活、大胆的机动战术;不能只会向上级请求增援,而应更好地指挥自己的部队。“打仗不应靠数量,而应靠本领”。指挥员应不断探索和改进各军种和兵种,特别是炮兵、坦克兵和航空兵的作战使用方法,把各级司令部和后勤机关的工作提高到现代战争所要求的水准。

科学价值 研究认为,斯大林军事理论总体上适合于他所处的历史条件 and 实践提出的要求,反映了苏联进行国防建设和卫国战争的一些基本规律。苏联在列宁和斯大林军事理论指导下,建成了世界上第一支无产阶级的常备军,在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础上奠定了雄厚的国防经济基础,制定和实行了积极防御的战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当时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建立了反法西斯同盟,成了打败德日法西斯国家的主力军,取得了卫国战争和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伟大胜利。斯大林以其丰富的军事理论和实践,继列宁之后进一步为苏联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石,为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斯大林军事理论对中国和世界其他一些国家的军事思想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斯大林的军事理论和战争实践也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这是不能苛求于他的。

(徐晓村)

毛泽东军事思想 (Mao Zedong Military Thought)

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人民军队和国防建设以及军事领域一般规律问题的科学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及其军队长期军事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同时也多方

面汲取了古今中外军事思想的精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军队建设、国防建设和反侵略战争的指导思想。

形成与发展 中国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为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从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到辛亥革命,连续不断地进行革命武装斗争。然而,这些斗争都归于失败。历史事实证明,农民、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都不能正确地解决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只有在中国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并且独立地领导革命武装斗争之后,才逐渐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军事理论体系,从而指导中国革命通过武装斗争走向胜利。

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经过1919年“五四”运动,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成立,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第一个纲领中,原则地申明了用革命手段推翻旧政权的历史任务。蔡和森、周恩来于1922年相继在党的刊物上提出,完全解除旧支配阶级的武装和“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周恩来年谱》第57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北京,1990)等正确主张。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进行的大革命期间(1924~1927),一大批共产党员被派往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联军中工作,叶挺独立团等部成为受中共党组织直接掌握的武装。党的一些领导人对革命军队政治工作问题作出了许多论述,提出了无产阶级应当领导建立农民革命武装、推翻农村封建统治的主张。尤其是毛泽东所著《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鲜明地阐发了关于中国广大劳苦农民在革命中具有巨大作用的观点。然而,彻底地认识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极端重要性,还是在蒋介石、汪精卫

于1927年春、夏相继发动反革命政变,使大革命遭到失败以后。在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毛泽东于同年7月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针对陈独秀在党内推行的右倾投降主义,提出必须“保存武力”和“上山”的主张,指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毛泽东年谱》上卷第205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3)同月,中共中央制定了在湘、鄂、赣、粤四省区发动武装起义的计划。8月1日,由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发动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创建革命军队的开始,中国革命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8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正式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毛泽东在发言中强调,全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2页)至1928年6月,党在全国范围内相继领导举行了近百次武装起义。毛泽东军事思想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为适应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需要,而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发动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起义部队按原定计划进攻长沙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他毅然率部改向反动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进军,在井冈山地区创建了第一个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组成的部队到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从秋收起义至1929年底,毛泽东先后领导进行了工农革命军的三湾改编;为红军规定了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制定了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并草拟了大会决议案。通过这些实践探索,成功地解决了如何在中国社会条件下,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武装,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一系列建军原则问题。自井冈山会师至1931年秋,毛泽东和朱德总结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红军游击战原则十六字诀,指挥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多次“进剿”和“会剿”;继而毛泽东又提出积极防御,诱敌深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一系列作战方针和原则,组织指挥中央苏区军民连续打破了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一、第二、第三次大规模“围剿”。在此期间,他先后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毛泽东的上述实践与著作,为中国革命及其武装斗争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正确道路,规定了人民军队基本的建军路线和作战原则,从而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究竟应当走什么道路和如何建军、如何作战三个根本问题。这些,标志着毛泽东军事思想已初步形成。

自1931年在中共中央取得支配地位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给蓬勃发展的中国革命战争造成巨大危害,导致全国各革命根据地反“围剿”,特别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被迫于1934年10月开始举行战略转移。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在危难关头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

革命。

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指挥下，各支主力红军克服长征中的艰难险阻，相继胜利转移到达陕北，胜利完成了长征。这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夜，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1936年12月，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起，与张学良、杨虎城等国民党爱国将领和进步人士共同努力，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进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1937年7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爆发。同年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全国抗日战争必须实行全面抗战的路线和持久胜敌的总方针；确定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实行由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军事战略转变，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创造根据地，牵制和相机歼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1936年底至1938年秋，毛泽东先后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军事论著，以及具有重要军事内容的哲学名篇《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些著作，对历时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经验做了系统的理论总结和哲学概括，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和各项基本指导原则，科学地预见抗日战争的发展进程，系统地回答了中国革命战争如何才能以弱胜强、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有关问题；同时，也深刻阐明了战争的本质和研究战争问题的科学方法，揭示了军事领域的一系列普遍规律和共通法则。这表明毛泽东军事思想作为一个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军事理论科学体系已经建立起来。尔后，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又对建设抗日根据地、发展敌

后抗日游击战争、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下进行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的斗争，以及加强军队政治建设、加强军政军民团结、军队实行生产自给等诸多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指导原则。从而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全面可靠的理论指导。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所作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不仅总结了抗日战争以来全党、全军创造的新鲜经验，而且对中国共产党长期领导军事斗争和军队建设等方面的基本经验作了进一步理论概括，明确提出了“人民战争”、“人民的军队”、“人民战争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战略战术”等概念，并作了精辟阐述。朱德在所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中，就这些科学概念的具体内容进行了系统的阐发，并在所作关于军事问题的结论中，提出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这一概念。此次大会前后，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其他一些领导人，也分别对毛泽东军事思想作出了若干阐述。从此，毛泽东军事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军事战线上的指导理论。同年8月，历时八年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宣告胜利结束。

1946年6月，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美国帝国主义援助下，依恃优势的军事力量，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原解放区悍然发动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奋起自卫，历时近四年的解放战争由此开始。这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规模空前浩大的战争，是中国两种历史命运的总决战。在这场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战争中，毛泽东军事思想得到全面的丰富和发展。毛泽东的战争指导艺术，特别是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和渡江战役等双方投入兵力总数达100万人以上的大规模战役指挥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至此，毛泽东军事思想在作战方面，不仅丰富了人民战争理论和战略防御理论，而且创造出独具特色的包括战略决战和战略追击在内的战略进攻理论；不仅发展了运动战和游击战理论，而且创造了包括大中城市攻坚战在内的大规模阵地战理论。在建军方面，在军队内部实行了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总结推广了新式整军和群众性练兵以及大规模争取、瓦解敌军的经验，开始取得进行军种、兵种建设和军队正规化建设的经验；探索和总结了为保障大规模正规战争所需的后勤工作的经验和理论。其间，毛泽东撰写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三个月总结》、《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将革命进行到底》等著作，总结提出的著名“十大军事原则”以及起草的大量作战指挥文电，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和指挥下，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比预期的时间大为缩短，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

在1950年10月~1953年7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指挥下，同朝鲜军民并肩奋战，战胜了骄横一时的美帝国主义侵略军及其仆从军，为保卫祖国安全、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通过这场反侵略战争，摸索创造了在现代战争和异国特定地理条件下，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大量新鲜经验。其中，包括在现代条件下进行运动战、近战、夜战，打“零敲牛皮糖”式的小歼灭战的经验；进行以坑道为骨干，与野战工事相结合的坚固阵地防御作战的经验；开展抗击敌“空中绞杀”斗争、确保战区后勤运输线畅通的经验；诸军种、兵

种协同作战和准备抗敌大规模登陆作战等方面的经验。这些经验，为毛泽东军事思想增添了关于现代化战争指导的内容。

从50年代初起，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领导、指挥了必须建设强大的现代化国防，以保卫国家安全和国内经济建设的历史任务；制定了反对外来侵略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确定了为自卫而发展包括导弹核武器在内的高新技术装备，建立中国自己的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体系的指导思想和总体部署；提出了加强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民兵建设和战略后方建设，以及发展中国的军事科学等一系列指导方针。从而形成了毛泽东国防建设思想，构成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一个新的组成部分。

基本内容 毛泽东军事思想作为一个科学体系，有着极其丰富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战争观和军事问题方法论 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研究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创造性地提出了“军事辩证法”这一概念，系统、深刻地阐明了战争和军队的一系列根本观点，揭示了军事领域矛盾运动的各种基本规律，总结提出了关于如何研究和指导战争的许多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原则。军事辩证法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论精髓所在，它为正确地看待战争，恰当地解决军事领域的各种矛盾，提供了基本的观点和方法。^①战争是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斗争形式。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战争是流血的政治，用以扫除政治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无产阶级要根据每场战争

的政治性质，决定对它的态度，拥护一切推动社会进步的正义战争，反对一切阻碍社会进步的非正义战争。人类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人类的旗帜。人类社会的发展终究是要消灭战争的，当进步到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国家，什么战争也没有了。支持和参加正义战争是为了最终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②从本质和长远上看，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应从这点上建立无产阶级的战略思想，在战略上即总体上要藐视一切敌人和困难；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老虎、铁老虎、真老虎，应从这点上建立无产阶级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在战术上即每一个具体问题上要重视一切敌人和困难。③作为两军厮杀的战争，其军事本质和根本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是一切战争行动的根据，从技术行动起到战略行动止，都要贯彻这一本质。它普及于战争的全体，贯彻于战争的始终。一般来说，消灭敌人是主要的，只有大量地消灭了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④战争双方诸因素的相互对立、依存和在一定条件下的转化，构成战争矛盾运动的内容和过程，推动战局的发展，决定战争的结局。这种对立、依存和转化，在战争过程中表现为双方客观物质基础和自觉能动性的综合竞赛，表现为力量对比的消长变化。战争的胜负虽然取决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自然、国际援助等诸方面的条件，但这些条件只是提供了胜负的可能性，最终决出胜负还要靠人们的主观努力，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发挥人在战争中的能动性，就是要正确地认识和应用战争的规律，在战争指导上具体表现为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军事家不能超越既定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去企图战争的胜利；但可以而且必须凭借既定的客观条件，正确而充分地发挥主观的努力，实施正确的战争指导，多打胜仗，从而逐渐

实现战争力量对比的强弱转化，能动地夺取胜利。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起决定作用的归根到底是人而不是物。既要反对过分夸大精神作用的唯意志论，又要反对过分夸大武器作用的机械论。⑤战争现象虽然较之其他社会现象更带有所谓“盖然性”，但战争不是神物，而是一种物质的运动现象，同样是有规律的，是可以认识和驾驭的。要注重从战争学习战争。⑥战争的规律有一般与特殊之分。正确地研究和指导战争，必须着眼其特点和发展。既要熟识和运用一般的战争规律，又要熟识所从事的具体战争的特殊规律，防止不分战争性质和时间、地域差别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战争规律是战争的客观实际对于人们头脑的反映。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从中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是研究和指导战争的根本方法。⑦要正确处理战争全局与局部的关系。战争指导者要有战略头脑和全局观念，善于关照全局，掌握关节，抓住战略枢纽部署战役，抓住战役枢纽部署战斗，以局部服从全局，全局则着力保证关键性的局部。⑧战争中，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要在必要而周密的侦察基础上，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思考，做出正确的判断，据以定下正确的作战决心，制定合理的军事计划。制定军事计划要考虑多种可能性，立足最坏情况，争取最好结果。军事计划付诸实施后，要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及时修正决心，调整部署，求得主观指导不断合于客观实际。⑨要运用对立统一的观点，正确认识和处理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进攻与防御、优势与劣势、主动与被动、内线与外线、流动性与固定性、进与退、走与打、集中与分散、持久与速决、歼灭与消耗、前线与后方、正规军与群众武装、野战军与地方军、军事工作

与政治工作等军事领域中一系列特有的矛盾关系,使矛盾的两个方面达到相反相成或相辅相成。⑩战争的形态是在不断否定旧的作战方式中发展的,要适时实行以转换主要作战形式为主要内容的军事战略转变,使战争形式符合战争特点和作战任务的变化。

人民军队思想 毛泽东高度重视人民军队在夺取政权和保卫政权中的作用,强调“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789页)他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系统地创立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成功地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群众保持紧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①这支军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为着广大人民利益而建立、而战斗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军队,是真正的人民军队。紧紧地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是这支军队的唯一宗旨。②这支军队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永远是一支战斗队,同时也执行工作队、生产队等革命政治所要求的其他任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除了担负作战这项主要任务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设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工作,并利用作战间隙进行生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任务是巩固国防,抵抗侵略,捍卫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制度,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③这支军队作为忠实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和政治路线的工具,必须完全地无条件地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坚持党指挥枪,决不允许枪指挥党,兵权只属于党,决不属于任何个人。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和最高指挥权属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一切行动听从中共中央、中

央军委的指挥。军队中要建立党的各级组织,作为各级部队(分队)的领导核心。党委(支部)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是党实施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④这支军队实行坚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为了对军队实施领导而在军队中进行的思想和组织工作,是人民军队的生命线。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包括:加强军队中党组织建设,发挥党委的核心领导作用,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对官兵实行进步的政治教育,灌注革命精神和先进思想,培养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实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军事民主,实行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和瓦解敌军的原则。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选拔任用干部。中国共产党在军队的团和相当于团以上的单位设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并配备相应的政治工作人员,领导和管理部队的政治工作。政治工作的任务是: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人民军队的性质;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保证全体指战员充分发挥为人民而战斗、而工作和训练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保证各项任务的完成。⑤这支军队实行集中领导下的民主,建立自觉的严格的纪律,保持和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政府,爱护人民;时刻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做到团结、紧张、严肃、活泼。⑥这支军队要加强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加强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不断用现代化的武器和新的技术装备部队,提高战斗力。⑦这支军队要加强教育训练,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大力开展群众性练兵活动,提高官兵科学文化知识水平,掌握

新的技术和随之而来的最新战术,全面提高指战员的军政素质。要办好各类院校,培养合格的军事人才。⑧这支军队要加强军事科学研究,注重把自己的战争经验上升为理论,同时批判地借鉴中国古代和外国军事思想的有益成分,发展中国现代的军事科学。

人民战争思想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关于人民群众的历史能动作用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人民战争思想。

①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和依靠群众,才能进行革命战争。战争力量的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兵民是胜利之本,真正有力量的是人民而不是反动派。革命战争是群众的事业,动员了广大军民,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对广大军民的政治动员是一件绝大的事,是夺取战争胜利最基本的条件。②在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中国社会条件下,要首先在反动统治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并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逐步加以扩大,作为进行人民战争的依托。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才能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革命阵地,使之成为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发展生产、准备干部的战略基地,成为为人民军队提供人力物力支援的巩固后方和作战的良好战场,借以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的战争目的。建立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必须把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结合起来,建立革命政权,广泛组织和武装群众。同时,也不可忽视城市工作和非根据地的农村工作。实行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国家必须建设巩固而强大的战略后方。③革命战争是为人民利益而战的战争,要实行代表绝

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奋斗纲领和基本政策。战争中要兼顾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重视发展生产,尽可能地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尽力改善群众生活,以调动和保持人民群众支持长期革命战争的热情和积极性。④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矛盾,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使革命战争获得最广泛的国内社会基础和 international 同情援助,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最主要的敌人。⑤要把武装斗争这种主要斗争形式同其他各种非武装斗争形式,包括工人的、农民的、青年和妇女的斗争,经济战线、外交战线和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合法的和非法的斗争,公开的和秘密的斗争等,在总体上配合起来,从一切方面的努力中不断增加革命的战争力量,减杀反革命的战争力量,使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方向逐步变化,最后达到获得力量优势、战胜敌人的目的。⑥以人民军队作为进行人民战争的骨干力量,实行主力兵团(野战军)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和游击队、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主力兵团可以随时执行超越地方的作战任务;地方兵团执行保卫地方和进攻当地敌人的任务;游击队和民兵则是正规军的助手和后备力量,主要执行在固定地区内直接配合正规军作战和保卫地方的任务。三种武装力量分工不同,紧密配合作战,是实行人民战争的正确组织形式。⑦实行与人民战争相适应的战略战术,灵活机动地使用兵力和作战形式。

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 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实践中,创立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成为人民军队在战争力量敌强我弱、武器装备敌优我劣的条件下克敌制胜的法宝。其基本精神是:一切从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你

打你的,我打我的,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灵活机动,不拘一格,扬长避短,力争主动,利用矛盾,各个击破;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退却时反对逃跑主义,有效地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争目的。①承认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在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战略防御阶段必须实行战略上的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和战役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通过战役战斗上的歼灭战达到战略上不断消耗敌人,借以逐渐改变战争力量的总体对比,最终把战略防御推向战略进攻。②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作为作战的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城市和地方的夺取或保守是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③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必须贯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力求打歼灭战,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采取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力避打得不偿失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④实现歼灭战,必须审慎地选择打击方向和攻歼目标,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强大之敌。每战集中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⑤采取恰当的作战形式,实行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相结合。就中国革命战争的全过程而言,运动战是大量歼灭敌人、决定战争命运的主要作战形式。阵地战是消耗和歼灭敌人的重要作战形式,在战略防御阶段主要执行阻击和钳制敌人的任务,在战略进攻阶段主要执行攻歼据守之敌、夺取城市的任务。游击战则应提高到战略地位,它不仅是配合正规战争必不可缺的辅助作战形式,而且在长时期内,游击战和游击性的运动战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作战形式。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重点,应根据战争的实际情况有主有次,灵活运用,并适时实行以转换主要作战形式为主要内容

的军事战略转变。⑥力求主动,力避被动,执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尤其应慎重初战。每战须预有准备,立足于能够应付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力求有胜利把握,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⑦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连续作战、勇于近战夜战的优良战斗作风;善于利用作战间隙休整部队,以利再战。⑧立足现有装备战胜敌人,同时注重从作战缴获中不断充实和改善自己的装备。⑨把对敌军的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结合起来,重视利用敌人营垒内部的各种矛盾,在军事打击的强大压力下开展有力的政治攻势,利用多种方式解决敌人。⑩大力组织支援前线,搞好后勤保障,切实做好人员和各种物资的动员补充工作及医疗救护工作。

国防建设思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的中心,随之转到巩固国防、建设现代化国防上来。为此,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相应的指导思想、方针和原则。①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对外永远不称霸,决不侵犯别人,也决不允许别人侵犯中国。②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以保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和平,为国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安全保障。③正确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把国家经济建设放在首位。国家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要重视加强国防建设,在不断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的基础上,努力实现国防现代化。④中国的国防现代化要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要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动员和依靠广大军民共建国防。国防斗争要综合运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多种方式,实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⑤必须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军队建设应保持适当规模,注重提高质量,不断从低

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建设诸军种、兵种合成的国防军。⑥建立完整的国防科学研究和国防工业体系,实行平战结合、军民结合的方针,根据本国本军的特点发展武器装备,尤其要重视发展当代尖端武器和技术装备。⑦普遍实行民兵制度,完善国防动员体制,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⑧加强战略后方建设,为未来反侵略战争提供巩固的战略依托。⑨对付外敌入侵,仍要坚持人民战争的路线,坚持和发扬立足现有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优良传统。

特点与价值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军事领域的典范。它贯串着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充满求实精神,以回答和解决现实问题为起点和归宿,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它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创造精神,最易于为广大兵民所掌握、所运用。它坚持大无畏的革命胆略和严谨的科学态度相统一,强调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是革命人民及其军队以弱小力量战胜强大敌人的制胜科学。它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与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相结合,同时充满了创新精神,反对军事上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反对一切脱离实际的东西,强调理论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它具有很强的民族气派,同时又汲取了古今中外军事思想的精华。

毛泽东军事思想创造性地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如何进行革命武装斗争和在夺取政权以后如何进行军队及国防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建设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实行灵活机动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以及国防现代化建设等方面,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树立了无产阶级军事理

论发展的新的里程碑;创造了在正义战争中以弱胜强的高超战争指导艺术,为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在争取解放的正义战争中实现以小敌大、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提供了成功的实践范例和理论武器;所揭示的军事规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是一座博大精深的军事理论大厦,在世界军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它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为人们科学地认识军事领域的各种矛盾运动规律,正确地指导军事斗争和军事建设的实践,提供了最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尤其具有普遍的真理意义。

今后,毛泽东军事思想仍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民族人民进行军队建设、国防建设和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指导思想。当然,任何一种科学理论都带有时代的印记。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必须从整体上去理解它的精神实质,去掌握它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机械地搬用它针对当时的某一实际所作出的具体结论。毛泽东军事思想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一条进一步认识真理的广阔道路。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从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出发,对当代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了新的科学论断,调整和明确了军事战略方针,提出了和平时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确立了以现代化为中心,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军队建设总任务、总方针,提出了关于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一系列重要观点,领导人民解放军积极而稳妥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并就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军队的装备建设、教育训练、政治工作、后勤建设、干部队伍建设等多方面的问题,作出了大量论述,形成了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1989年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集体,认真地贯彻毛泽东

军事思想和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领导着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了新的进展,总结提出了一系列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原则,从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和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坚持和继续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

参考文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6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郑文翰)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 (Deng Xiaoping's thought of army building in the new period)

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军事家邓小平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为指导中国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而提出的系统理论。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形成过程 邓小平(1904. 8. 22~1997. 2. 19),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既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设计师,同时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军队和国防建设的总设计师。他的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就是从新时期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出发,为适应军队和国防建设的需要,而逐步发展形成的。早在1975年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时,邓小平即针对“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造成的严重破坏,着手对军队各方面工作和国防工业战线进行整顿,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观点和方针原则。后由于他被错误地撤销党内外

一切职务,初见成效的整顿工作被迫中断。1977年邓小平恢复党政军领导职务后,整顿军队的方针才得以全面贯彻。至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先后发表了《军队要整顿》、《军队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等一系列重要讲话,明确提出: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反对“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重新恢复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则,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当前国际形势对中国有利,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要坚持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要坚持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现在的人民战争与过去的表现形式不同;要整顿军队首先要整顿各级领导班子,改变机构臃肿、领导软弱无力和纪律涣散的状况,解决“文化大革命”以来军队中存在的“肿、散、骄、奢、惰”和部分领导班子“软、懒、散”现象;要抓编制、抓装备、抓战略;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必须把军队搞精干,军队建设讲求真正的战斗力;要坚持依法治军,从严治军;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要逐步实现军队指挥系统现代化;要重视现代条件下的民兵工作;等等。这些观点和方针,指导人民解放军各方面的工作胜利地实现了拨乱反正,重新走上了正确轨道,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全面推进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铺平了道路。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1981年6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

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自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起,邓小平先后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他从新的历史条件出发,就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大政方针进行了总体设计,相继发表了《精简军队,提高战斗力》、《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在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等一系列重要讲话,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如果工作做得好,世界大战就可以延缓;霸权主义是当代战争根源,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要在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下行动;要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建设巩固的国防;中国今后的反侵略战争要坚持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实行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大力加强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实现武器装备现代化;人民解放军要建设成为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要减少数量,提高质量;要按照现代化战争的要求和精兵合成、提高效率的原则,改革军队体制编制,建立和健全各种规章制度;实行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军人,开展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活动;要继承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发展中国军事科学;等等。上述观点和原则的确立,使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形成了一个科学理论体系。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出“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概念,并要求按照这一思想指导新时期的军队和国防建设。邓小平关于新时期军队和国防建设的重要论著,

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2、第3卷。

基本内容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基本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对当代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新的判断,军队和国防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邓小平对国际环境进行了长期冷静的观察和科学分析,就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了新的判断。这一判断包含两个基本含义:一方面,维护和平力量的不断发展,大仗一时打不起来,可以争取到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另一方面,霸权主义是当代战争的根源,战争的危險依然存在,小的战争不可避免。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一是和平问题,一是发展问题。中国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有个观点,即大战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经过长期观察,现在总的判断是战争危险还是存在的,但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战争应该避免,也可以避免,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是可能的。世界很大,也很复杂,但一分析,真正支持战争的人没有多少,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另外,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看待。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战争是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问题在于世界和平的力量要发展起来,团结起来。发展需要和平,和平离不开发展,发展自己同维护和平是一回事。如果工作做得好,世界和平的力量发展起来,第三世界国家发展起来,就可以延缓世界大战。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存在,始终是解决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主要障碍。为此,要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国与国的关系,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中国搞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中国应当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永远不称霸,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坚力量。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

对战争与和平作出准确的判断很重要。中国过去的好多决策,包括第一、第二、第三线的布局 and “山、散、洞”的方针等,都是从战争迫在眉睫的观点出发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是在国际形势的判断上不再认为战争迫在眉睫,二是相应调整对外政策,这是两个极其重要的转变。这两个变化是正确的,要坚持下去。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军队和国防建设的指导思想实行了战略性转变。1985年中央军委决定人民解放军裁减员额一百万,就是实行这一转变的根本标志,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坚决维护世界和平的实际行动。实行军队和国防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以来,邓小平始终强调对战争危险要保持警惕。他指出,国际事态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绝不能有任何和平麻痹思想。现在总的来说,制约战争的力量在发展,超级大国任意主宰世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对战争危险绝不能放松警惕。世界上希望中国好起来的人很多,想整中国的人也有的是,中国自己放松不得,军队还是要随时准备打仗。

中国要建设巩固的国防,军队要担当起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历史责任。中国的国家利益,一是根治贫穷,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一是维护和平,捍卫国家的独立、统一和安全。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讲人格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中国曾经饱受丧权辱国之痛,作为中国人要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确保国家的主权和安全不受侵犯,是中国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中国现在国力较弱,容易受到

威胁,一旦丧失主权和安全,就会成为大国的附庸,就意味着要倒退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去。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中国的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世界上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针对整个第三世界的和针对社会主义的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国内外敌对势力总是遥相呼应,一遇适当气候,就要互相勾结起来,挑起事端,制造动乱。对此,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丧失掉。中国不能乱,这个道理要反复讲,放开讲。稳定离不开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各种分裂和颠覆活动,制止动乱,需要运用专政手段。中国在历史上曾是一个遭受列强侵略和瓜分的半殖民地国家,与此相关的某些历史遗留问题,比如祖国统一问题,至今尚未完全解决。中国希望用“一国两制”的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但不能排除使用武力,这是一种战略考虑。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人民解放军要担当起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历史责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扎扎实实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为保卫世界和平,为保卫祖国领土的安全,为争取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做出新的贡献。

要确保国家的主权和安全不受侵犯。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其中就有一个国防现代化。如果不搞国防现代化,那岂不是只有三个现代化了?现在国际局势并不太平,必须建设巩固的国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防建设仍然要沿着毛泽东开创的道路前进,仍然要坚持全民办国防的指导思想。中国的特点是国大人多,经济力弱,全民办国防的优势和威势要一直传到后代,保持下去,这是本钱。军民一致,这个原则不能变。要恢复和发扬军

政、军民之间紧密团结的优良传统；要广泛持久地开展拥政爱民、拥军优属活动；要根据新的情况，开拓新的视野，创造新的形式，坚持从各个方面正确解决军民关系问题。在武装力量建设上，要实行精干的常备军同强大的后备力量相结合。组建预备役部队是个好办法，可以寓兵于民，平时少养兵，战时多出兵。坚持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民兵仍然是一支重要的战略力量，要提高到战略地位。解决建立有效的国防动员体制问题，关键是要坚持平战结合、军民兼容的原则。

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化国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最重要的战斗力，现代战争不发展现代武器装备是要吃亏的。解决武器装备问题，要从战略着眼，正确规划科研和生产的目标及任务。要根据未来反侵略战争的实际需要，根据武器装备的设计、生产和形成战斗力的周期，把科研、生产和装备部队统筹起来。否则，紧要关头就要误大事。要站在世界军事技术革命前沿，把眼光放长远一点，不能老是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要根据国家可以提供的经济和技术条件，区分轻重缓急，把要害的东西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上。解决和发展先进的武器装备，应当量力而行，贯彻少而精的方针，数量不一定要多，质量要一代代地提高，搞真正顶用的。提出装备战略要求的目标要考虑国家经济状况，宁可少搞一点，也要坚持质量第一。质量问题非常重要，特别是尖端的东西，不讲质量，一个小零件就有可能毁掉全局。讲质量，要讲配套，讲整体质量水平。解决装备问题，要把学习、引进先进技术同自己的创造结合起来。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依靠自己的努力和创造，搞出中国式的更好更新的东西。但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也要适当引进外国的新技术。学习和引进只是一

个起点，目的还是要提高中国自己的科研和制造水平。既要有自知之明，善于学习，也要有雄心壮志，注重创造。既要重点发展先进技术装备，也要重视改进、更新常规武器。在战略武器问题上，中国的方针是你有我也有，要有威慑力。

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要在增强国力的基础上加速国防现代化。中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这个阶段的实际出发，解决中国现在面临的所有问题，包括军队和国防的现代化问题，关键是把经济发展起来。经济建设及发展状况，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大局问题，离开这个大局，中华民族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中国各族人民就有沦为世界“难民”的危险。在整个国家建设这盘棋上，军队和国防建设虽然也很重要，不可忽视，但“四化”建设总得有先有后，经济建设必须优先发展起来，经济建设要始终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心位置上。现在就是要紧紧扭住这个“中心”不放，硬着头皮把国家经济搞上去。在世界性的或大的战争延缓甚至有可能避免的形势下，尽可能地减少军费开支来加强国家建设，保证经济建设优先获得发展，对于整个国家和民族无疑具有深远意义。这个问题，军队有自己的责任，要紧密配合这个大局，而且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再说，国防建设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不行，经济不发达，国力太弱，国防现代化就不可能。大局好起来了，国力大大增强了，再搞一点原子弹、导弹，更新一些装备，空中的也好，海上的也好，陆上的也好，到那个时候就容易了。因此，在国家一时还拿不出更多的钱来用于国防建设的情况下，军队要忍耐几年、十几年，给大局让路，保证国家首先集中力量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同时，还要为国家建设大局服务，尽一切可能把潜在的生产力挖掘出来，贡献出去。军队各个方面都和国家建设有

关系,都要考虑如何支援和积极参加国家建设。无论空军也好,海军也好,国防科工委也好,都要考虑腾出力量来支援国民经济的发展。如空军,可腾出一些机场,一是搞军民合用,一是搞民用,支援国家发展民航事业。海军的港口,有的可以合用,有的可以腾出来搞民用,以增大国家港口的吞吐能力。国防工业设备好,技术力量雄厚,要把这个力量充分利用起来,加入到整个国家建设中去,大力发展民用生产。这样做,有百利而无一害。

军队和国防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涉及国家大局问题。世界现在并不太平,霸权主义到处惹事,中国如果不搞国防现代化,连自卫力量都没有,日子就不好过,要受人家欺负。像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离开军队和国防的现代化,就不足以成为对国际事务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之一,就不足以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不足以振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解决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问题,在实际步骤上固然有先有后,但在总体布局中不能可有可无。必须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合理确定国防投入比例,相应改善武器装备,加速国防现代化。

实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坚持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战略方针仍然是积极防御。中国搞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是坚决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坚持的是自卫立场,永远不称霸,决不会去侵略别人。中国的主要目标是要让自己尽快发展起来;现在国家还很穷,还很落后,尤其需要一个和平环境,集中力量解决自己的发展问题。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中国都不可能威胁和侵略别的国家,中国的战略始终是防御性的,就是将来现代化了,也还是防御性的。

中国需要和平,真心希望避免战争,但中国也非常珍惜得来不易的独立自主权利,决不允许别人损害中国的利益,别人也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自己利益的苦果。对战争问题,中国一向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所以,中国的战略是积极防御。中国有自己的长处和优势,要树立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同中国的特殊国情相适应,也应该是积极防御的战略。今后一旦敌人打进来,中国的方针就是“积极防御”四个字。积极防御,不是单纯防御,防御中也有进攻。积极防御就是后发制人。积极防御本身包括持久作战,一旦出现敌人大规模入侵的情况,战争就一定是持久的。中国虽然还比较穷,比较落后,打起仗来还有许多不利的方面,但好处是块头大、地方广、人口多,有不信邪的特点,有打持久战的传统。现在的中国也不是过去的中国,谁要敢于侵略中国,至少要有打二十年仗的准备。如果谁要动武,中国人不怕,一直打到底。中国军民有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传统,过去就是用很劣势的装备战胜现代化装备敌人的。这是人民军队有信心的根据。两只脚当然跑不过摩托化装备,但现代化装备不是没有缺点的。坦克、飞机也要“粮食”,一旦卡断了,就不行了。现在世界上有人说什么都是技术决定的,不要完全迷信这个。当然,也要讲究技术,否则是要吃亏的。今后打起仗来,中国还只能立足于现有装备,立足于比现有武器装备好一点的的基础上,好得太多一下子办不到。总之,要立足以弱胜强,以劣势装备战胜现代化装备之敌,以持久战消耗和战胜敌人。

中国的军事战略是毛泽东制定的,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就是人民战争。今后反侵略作战,还是要立足于自己的力量,坚持人民战争。必须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

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发展中国军事科学。只要坚持人民战争,敌人就是现在来,中国军民以现有武器也可以打,最后也可以打胜。中国实行的是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敌人要打进来,就叫它处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搞人民战争不是不要军队现代化,现在的人民战争与过去不同,对象不同,装备不同,手段不同,条件不同,所以实现形式也不同。中国民兵现在的武器就比解放战争时期正规军的武器好得多,手中有打坦克的导弹。装备的改进,使人民战争更有力量。当然,今后打起仗来,中国军队还有许多不利因素,如好多干部没有实战指挥的经验,装备又比较落后等。但军队勇敢还是有的。有勇敢这一条,就能学会打仗。开始可能吃些亏,经过一段时间,情况就会变化。老的游击战在现代条件下还是有用的,用现代武器打游击战争。打现代战争,没有指挥系统的现代化不行,没有制空权也不行。陆军、海军都需要空军掩护支援,没有制空权,敌人飞机就会横行无阻,今后作战要努力取得制空权。海军是近海作战,面临霸权主义强大的海军,没有适当的和真正顶用的海上力量不行。战略武器,威慑力量,本身就有压力作用,有一点,哪怕是小的,就是一种制约力量,谁要毁灭中国,谁就要受到报复。但是,将来不一定会打核战争,常规战争是有可能的。对付这种战争,中国要有制胜力量。在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肩负着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四化”建设的光荣使命,必须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这就为新时期的军队建设,确定了总的奋斗目标和任务。新时期军队建设的这一总目标、总任务,

包括革命化、现代化和正规化三个方面的深刻含义,归结到一点,就是要把人民解放军搞强大。“三化”建设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关系军队建设的全局,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形成一个整体,构成新时期军队建设的鲜明特色。为实现这一总目标、总任务,邓小平对军队建设的各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根本要求和指导方针。

始终不渝地坚持人民军队的性质 人民解放军要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性质。这个性质是,党的军队、国家的军队、人民的军队,国家的军队还包括它是社会主义国家军队的内容。军队要永远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军队始终是党领导的,党要管军队。军队要听党的话,任何时候都不能打自己的旗帜,不能搞小圈子。要坚持党领导军队的各项制度,尤其是通过中央委员会来实现党的绝对领导,更要加以坚持。坚持这些制度,要讲政治纪律。个人必须服从组织,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全党必须服从中央。全军要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在以他为主席的中央军委领导下,把军队建设得更好,为捍卫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捍卫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捍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完成和平统一祖国大业,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中心是解决现代化的问题 邓小平强调在军队建设全局的谋划上,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解决现代化的问题。他指出,高度的政治觉悟,优良的战斗作风,严格的组织纪律,一直都是人民解放军的传统优势。但是,同面临的更强大的对手比,人民解放军的整体建设水平仍然相对落后,主要问题是在现代化上还差很大一截,包括官兵科学文化素质较差,部队武器装备水平较低,干部指挥现代化战争能力不够。早在建国初期,毛泽东

就曾郑重提出军队和国防现代化的问题。现在，在这个问题上要专心致志，始终如一地干下去，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过去军队是小米加步枪，懂得射击、刺杀、扔手榴弹就可以上阵了。现在沿用过去的经验是不行的，海军就得有海军的专业知识，空军就得有空军的专业知识，参谋业务也同那个时候不同，知识面要宽得多。所以，第一位的重要工作，就是要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合格的现代化的军事人才。现代条件下对“专”的要求更高了，培养现代化的军事人才要特别重视专业知识，真正做到红与专的统一。必须在全军上下造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空气，必须解放思想，破除陈规陋习，在人才培养和使用上开出一条路来，促使拔尖人才脱颖而出。要特别注意使各级干部掌握必要的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现代战争知识，努力提高指挥现代化战争的能力。军队现代化事业和未来反侵略战争要求必须这样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抓军队，不仅要抓编制，抓战略，而且要抓装备。武器装备是军队质量建设的物质基础，要改进武器装备，下决心搞出自己的新的顶用的东西。

搞好军队体制编制改革 在军队现代化建设问题上，要重视抓编成、抓体制。改革体制编制，首先要解决“肿”的问题，即解决由于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所造成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问题。这是从国际大局和国内大局考虑的。军队人员过多，也妨碍军队装备的现代化。减少军队人员，把省下来的钱用于更新装备，这是确定的方针。一个从节约开支看，一个从军队本身提高素质看，都必须“消肿”，不“消肿”就不能应付战争。现在主要不是“肿”在作战部队，主要是“肿”在各级领导机构。机关太大，指挥机构的人员特别是干部过多，这是军队的一种病态。人越多越不好办事，打仗是不行

的。精简，主要是减少不必要的非战斗人员，减少统率机构、指挥机构特别是高层机构的人员。因此，“消肿”的重点是精简机关，提高效率。坚持这个原则，军队就可以搞精干。通过精简，实际上不但没有削弱军队的战斗力，反而增强了军队战斗力，并且还为提拔新生力量创造了一个条件。改革体制编制同“消肿”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军队要搞得很精干，不改革体制不行。现代战争是诸军兵种联合作战，部队平时编成要把战时扩编考虑进来，要同战时使用结合起来，要根据战区特点和部队肩负的不同任务，把编制员额搞得严格和精确起来。精简整编要搞革命的办法，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体制改革第一步是机构改革，机构不能搞得很繁琐，要简化。要通过改革体制，解决机构臃肿、公文旅行、人浮于事的问题，提高办事效率。要根据各战区特点，根据军队装备不断改进的情况，搞些合成军、合成师，合成军实际上就是集团军。这样便于平时合成训练，便于指挥员熟悉特种兵的指挥，能把平时训练和战时使用结合起来。海军和空军的体制要以有利于它们的建设为原则。各大军区、省军区的情况不同，编制上不能强求一律，要有所区别。军队的数量平时不需要那么多，把战时动员体制和动员方案搞好了，就可以减少平时军队兵员数量。体制改革除了反对官僚主义、克服工作效率低等弊病外，重要的是要有利于培养和选拔人才，使年轻的优秀干部早点上来。军队的体制改革要充分酝酿，成熟一件做一件，不成熟宁肯慢一点。搞编制要严格，要切实遵守编制，编制就是法律。要定编定额，该用几个人就是几个人。制度化以后，编制就不会臃肿。要建立和实行军官服役制度和退休制度，军队没有退休制度就不能保持生气。军队的改革要有军队自己的特点，不能照搬地方的改革

经验,更不能照搬外国军队的治军原则。坚持军队自己的特点,一方面要把改革同维护军队稳定和保持军队高度集中统一结合起来,凡是涉及全军性的问题,要由中央军委作出决策和部署,不能各行其是。另一方面,要把是否有利于提高战斗力作为根本标准,贯彻到改革的每一个环节和所要解决的每一个问题之中,同军队的建设与发展相协调。

加强军队正规化建设 新形势下加强军队正规化建设,关键是要有一个很高的标准,要严格制度,严格纪律,严格训练,严格管理,把“严格要求”贯彻到部队工作与生活的方方面面。要特别强调的,一个是制度问题,再一个是纪律问题。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军队建设的许多问题,要从制度上加以考虑和解决。在新的形势下,要理顺一些大的关系,就要十分注意解决制度建设问题,要讲法制,坚持依法治军。一定要建立和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所有的领域,所有的方面,都要订出章程。建立规章制度要严,要细,标准要高,一点差错也不能有,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职责。有了章程就要执行,老老实实地执行。解决贯彻和落实问题,既靠教育,也靠训练。对全军指战员都要进行必要的纪律教育和法制教育,战士从入伍起就要学习和服从各自所必须遵守的纪律。军队非讲纪律不可,纪律松弛是不行的。遵守纪律的最高标准,是真正维护和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国家的政策,不允许对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任意散布不信任、不满和反对意见,要靠纪律维护大局。从严执法,从严执纪,首先要做到在纪律、法规面前人人平等。对一切无纪律、无政策、无法规的现象,不管是什么人,都必须坚决反对和纠正,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义,打击邪气。不允许任何人特殊,不能对任何人姑息迁就。说治军要严,首先对领导班子要严,对高级干部要严。管理也是有

科学的,管理好不好大不一样。所谓管理得好,主要是做好人的工作。不仅要把管理当作行政工作,而且还要当作思想工作。在管理制度上,特别要注意加强责任制,借口集体领导而无人负责是最危险的祸害。建立和加强责任制就是根除这种祸害的有效形式。明确职责,并以制度形式把职责规范下来,可以做到赏罚严明,形成你追我赶、争当先进、奋发向上的环境和风气,可以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因素,利于发动群众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约束自己。管理是个大学问,要把部队管理好,就要提高管理能力。学习现代管理,包括吸收和借鉴一切管理科学上的积极成果,要同学习现代科技知识和学习现代战争知识结合起来,也要同继承和发扬自己的传统优势与特色结合起来。要从实践中学习,从书本上学习,从自己和人家的经验教训中学习。

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 邓小平指出,进行现代化战争,需要掌握多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天上、地下、陆上、水下,包括通信联络,都要懂得。在战争年代,人民解放军主要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那是最过硬的学习;在和平时期,就要从教育训练着手来提高干部战士的素质,提高军队战斗力。在没有战争的条件下,要把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作为和平时期军队的经常性中心工作,这个原则要从制度上加以贯彻。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这一方针具体化,需要从两个方面去做。一方面是部队本身要提倡苦学苦练。部队要能打仗,靠提高政治觉悟,靠勤学苦练,从战士到干部都要苦练,从勤学苦练当中学本领。要根据现代战争的需要,学习现代化战争知识,学习诸军兵种联合作战。要通过学习、拉练、演习,增长各级干部的指挥能力和管理能力,战士则要学会怎样对付坦克、飞机等。军队的好

传统、好作风，也要从苦练当中恢复和培养起来。同时，还要努力学习其他一些必要的政治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知识。另一方面是通过办学校来解决干部教育训练问题。为了提高干部的指挥水平、管理水平，增加他们的知识，要办好学校，包括各总部、各军兵种、各级的学校，都要办好。办学校，一是训练、选拔和推荐干部，起到集体政治部、集体干部部的作用。二是认真学习现代战争知识，不但高级干部要学，连排干部也要学，要使军队各级干部都懂得现代战争。三是恢复人民军队优良的传统作风。要在学校里培养这种作风，并把它带到部队，发扬光大。办好学校，首要的是选好办校的干部和教师。这些干部比部队现职干部还重要，要选最优秀的。其次是搞好教材。教材要统一，教材的内容要使学员懂得敌人，懂得自己；要重视体现中国自己的战争经验；要有现代战争的知识，包括坦克、飞机，天空、地面、海上，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等。再一条是要选好学员，要调好的干部来学。从排长起，各级军官都必须经过军官学校的培训，军官每个阶段的晋升也必须经过学校学习，这应当成为一种制度。

加强和改进军队政治工作，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在新的条件下，必须把思想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上。思想工作和思想政治队伍都必须大大加强，不能放松，不能削弱。多年来一些同志埋头于具体业务，对政治动态不关心，对思想教育不重视，再这样下去，就会误党误国。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改革，现代化科学技术，加上讲政治，威力就大多了。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不能离开一定的历史条件，对人民解放军来说，由长期的战争环境转人和平环境，这是个最大的不同。军队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和基本内容没有变，优良传统也还是那一些。但是时间不同

了，条件不同了，对象不同了，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也要有所不同。如果不去研究和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存在的问题，就不能在没有打仗的条件下提高部队战斗力，就不能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始终不渝地坚持人民军队的革命性质。为此，要坚持毛泽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理论，保持和发扬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并在新的条件下发展提高，把政治工作切实认真做好，做得有针对性，细致深入，群众乐于接受。思想政治工作一定要注意克服过去那种“左”的做法，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以说服教育为主，坚持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坚持把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在思想政治方面，既要反对封建主义，也要反对资本主义，就是要讲理想，用坚定的政治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没有信念就没有一切。对军队来讲，确立坚定的信念现在仍然是一个建军的原则，仍然不能丢掉，这是中国自己的特点。为此，要多做工作，多进行教育。教育要结合实际，引导和激励官兵发扬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学习什么？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讲作风首先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和德才兼备的标准，全面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培养和选拔接班人，关系军队发展和未来反侵略战争的大局，是一个战略问题，非解决不可。要选用那些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斗争中经得起考验的人；那些党性强，能团结人，不信邪的人；那

些艰苦朴素,实事求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作风正派的人;那些努力工作,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有魄力,有实际经验,能够办事的人。总之,必须是真正的共产党员。选拔干部,要坚持公道正派,要注意群众公论,要搞“五湖四海”,反对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在选人的问题上不能感情用事,要用政治家的风度来处理问题。要逐步制定完善的干部制度,把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同干部工作走群众路线紧密结合起来,用制度解决选人、用人、管人问题。要把严格考核干部作为一项制度坚持下去。要逐步建立和健全党内监督制度,把党内监督同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军队要继承和发扬老红军的优良传统与作风。毛主席倡导的优良传统与作风,最根本的就是两条,一是实事求是,再一个是群众路线。没有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是不可能贯彻到底的。军队贯彻群众路线,有两个问题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对军队内部而言,就是官兵关系,要坚持官兵一致的原则;对军队外部而言,就是军民关系,要坚持军民团结的原则。对各级领导干部来讲,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搞特殊。继承和发扬老红军的优良传统与作风,尤其需要强调艰苦奋斗,坚决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及其生活方式的侵蚀和影响。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没有艰苦奋斗的精神,就无法抗住腐败现象,也就无法成就伟大事业。就是要永远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人民解放军要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上走在前头,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一代新人。

适应新情况,把整个后勤管好 打仗有多种手段,包括后勤,搞好后勤也是为了打仗。现代战争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打钢仗、打装备、打后勤。后勤工作是一门学问,不钻进去

是做不好的。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部队武器装备的逐步改善,军队后勤工作出现了很多新的情况。过去是小米加步枪,对后勤依赖还不算很大。现在无论是军需给养、武器弹药、装备器材,都得靠强大的后方供应;战争物资的储备,也在不断变化。另外,过去军队家当比较小,现在家当大了,怎么把整个后勤工作管好,也是个新问题,需要有适应新情况的一系列制度和办法。在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条件下,军队要考虑的,不是增加军费预算在国家财政开支中的比重,而是怎么把钱用得更好,用得更合理,真正用在加强战斗力上。这也是一个要考虑的战略问题。要十分重视培养后勤管理人才,改进管理方式,健全管理制度。做后勤工作的同志要学会管家,学会少花钱多办事。这里面也有很大学问。要甘当无名英雄,廉洁奉公,当好“红管家”,做踏踏实实的工作,勤勤恳恳地、热心地为大家服务。国家现在还有困难,有些实际问题一下子还解决不了,要在困难条件下尽力把工作做好。

把军队搞精干,全面提高战斗力 军队是要打仗的,不讲战斗力不行,军队就是要提高战斗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要研究和解决和平时期全面提高军队战斗力的问题。抓部队建设,只看表面不行,要看实战能力。战争的条件不同,样式不同,对手不同,衡量实战能力的标准也不相同。要适应现代战争需要,要瞄准更强大的对手,讲真正的战斗力,顶用的战斗力。军队战斗力的可靠性始终是一个关系未来反侵略战争胜负和国家安危的根本问题,忽视不得。讲真正的战斗力,要讲全面提高部队素质。质量问题是影响战争胜败的问题,只讲数量,不讲质量,会耽误大事。中国还穷,养兵不能太多;中国又是一个大国,周边环境比较复杂,养兵太少也会影响国家安全。

因此,军队的数量与规模要控制在国家安全和国力所能允许的范围之内。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没有适当的力量不行,但这个力量要顶用,要精,要把技术搞上去,把质量搞上去,真正是现代化的东西。精兵,就是要把军队搞精干。一个是要压缩员额,再一个是要精简机关,还有一个就是全面提高官兵的素质。

科学价值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今中国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这一思想正确地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军队和国防建设的基本规律,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做好反侵略战争准备,指明了方向。

参考文献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邓小平文选》第2~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3~1994。

(蒋顺学)

周恩来的军事思想 (Zhou Enlai's military thought)

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军事家周恩来关于中国革命战争、人民军队和国防建设等问题的理性认识。

周恩来(1898.3.5~1976.1.8),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中国共产党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领导人之一。1921年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秋回国后,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军事部长。1927年3月领导上海工人武装第三次起义。1927年5月,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大革命失败后,受中共中央委派,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领导举行了南昌起义。1928年7月,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

员,后兼任中央军委书记等职。1931年底进入中央苏区后,曾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等职。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后,参加三人军事小组,对长征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抗日战争爆发后,担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45年6月,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并继续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战争开始后,继续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担任政务院总理,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多方面组织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参与抗美援朝及作战的重大决策,参与领导有关军种、兵种及军事院校的组建,为实现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诸军种、兵种合成军队的转变做出了重大贡献。1954年任国务院总理后,继续关心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参与领导国防事业和边防、海防、空防斗争。周恩来的军事思想主要内容有:

实行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 ①开展真正的革命,使国家政权落到劳动阶级手里。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必须以武装斗争为中心,打倒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②暴动是革命斗争发展到了最高峰的群众武装推翻反动阶级、夺取政权的直接行动。要通过工农兵群众的暴动,从反动阶级手中夺得武装,夺得政权,创立武装割据局面。③党必须加强对暴动和起义的领导。必须考虑到主客观条件是否具备和成熟,反对不进行周密准备,不顾一切蛮干的盲动主义。④中国革命必须坚持武装斗争,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是中国革命的特征。

以革命政治为本,建设人民军队 ①军

队不是阶级，是一种工具，革命军队是人民的工具。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其宗旨是要为被压迫人民的利益冲锋陷阵。

②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外，还有三项主要任务：发动群众斗争，实现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武装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③革命军要接受革命党的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根本的决定因素就是有共产党对军队的正确领导。在人民军队中，党的作用高于一切。要健全军队中各级党组织，切实实现党对军队的领导。④以革命主义为基础的革命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的“生命线”和“灵魂”，是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夺取军事斗争胜利的重要保证。政治工作的基本目的是提高战斗力，保证战争的胜利，使军队本身团结起来，军队和人民结合起来。

革命战争要以人民为靠山，争取广大人民的最大支持 ①革命战争是民众自己解放自己的事业，人民是革命战争的靠山，人民大众自身的解放要求是革命战争得以开展的社会基础和必备条件，中国革命战争不能靠外援，只能依靠中国人民。只有实行彻底的革命路线，革命战争才能取得千千万万民众的支持与配合，革命战争就能最终在全国取得胜利。②开展人民战争，根据地至关重要。离开了根据地作为依托，就难以充分获得广大农村人民群众的支援，革命战争就难以生存和发展。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农村根据地是可以长期存在并逐步发展的，革命战争也就可以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直到最后解放全中国。③人民军队与工农群众武装是相成而不相消的，他们共同担负革命战争的任务。应当采取正规军、地方游击队和赤卫队相结合的组织形式，使军队周围有广大游击队、赤卫队、人

民自卫队等群众武装，在此基础上为正规军建立广泛的补充军，以实现游击战与运动战、阵地战的配合，野战军和地方军相呼应，正规军与民兵相配合。

战争指导要从实际情况出发，灵活运用战略战术 ①指导战争的一切方针、计划，都不能脱离敌情、地形和任务等方面的实际情况。必须因地制宜，或内线作战，或外线作战，或分散活动，或集中行动，或举行作战，或进行休整，一切均以争取打胜仗并减少自己的损失为目的。②中国革命战争是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进行的，集中主要兵力于决战的时机和决战的方向，造成战争力量对比总体劣势中的一个局部优势，是不断歼灭敌人壮大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③同国内外强敌进行战争，须取积极防御、持久胜敌的方针。要坚持持久战，最主要的是发动和组织广大民众对敌人的反抗，使广大敌后地区变为敌人的前方。实行积极防御，必须坚持死敌为主，略地次之的原则，反对在条件不具备的阶段硬攻或死守大中城市。④军事指挥要讲究“权变”，战略战术的运用应因敌、因地、因时、因任务、因己方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使战法不断有新的研究和发展，达到灵活机动，出没无常。⑤必须注重游击战争。中国革命战争，应利用广大农村发展游击战争，以不断增长力量，消耗敌人。坚持和发展游击战争，一要有坚强的领导，二要有坚强的干部，三要把所到之处的民众组织起来，四要不断与敌接触，在斗争中生长新的力量。游击战本身还不足以达到赢得战争胜利的目的，还须与正规战相配合。

实行积极防御战略，加速国防现代化建设 ①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力量。必须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加强国防建设，随时警惕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要建立综合国防体系，除了有强大的陆军，还必须建立强大

的空军和海军,以保卫领土、领空和领海都不受侵犯,战胜任何侵略者。②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奉行的是永远不称霸的既定政策,这决定了新中国决不会侵略他人,但也决不容许别人侵略自己。中国在国防方面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③为打破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核威胁和核讹诈,必须发展中国自己的军事尖端技术,发展核武器、导弹和人造卫星,把人民解放军装备起来。④中国的国防现代化与工业、农业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是一个整体,国防现代化离不开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在工农业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上,去建设现代化的国防。而国防现代化对发展国民经济又具有明显的带动作用。⑤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应以自力更生为基点,充分依靠人民和各个方面的力量,实行全民国防的路线。坚持包括中央与地方相结合、军队建设与民兵建设相结合在内的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突出重点,抓住关键,以早日实现国防现代化的目标。

周恩来的军事思想研究,在当代中国军事思想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周恩来军事文选》(4卷)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周恩来传》等,是研究周恩来的军事思想的重要依据。主要研究成果有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伟大的军事家周恩来》。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思想》中,收有《周恩来的军事思想》及其重要军事著作的条目。

(杜魏华 张家裕)

朱德的军事思想 (Zhu De's military thought)

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

军事家朱德关于中国革命战争、人民军队和国防建设等问题的理性认识。

朱德(1886. 12. 1~1976. 7. 6),四川仪陇人。1909年入云南讲武堂学习军事。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1913年入滇军,任营长、团长、旅长等职,先后参加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1922年赴德国留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转赴苏联学习。1926年回国后,参加发动泸(州)顺(庆)起义,配合北伐战争。1927年参加领导南昌起义,任第9军副军长、军长。起义军南下受挫后,率余部转战闽、粤、赣、湘。1928年1月,与陈毅等发动湘南起义,4月下旬率部到达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会师,组成工农革命军第4军,任军长。1930年8月后,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先后参与指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反“进剿”、反“会剿”和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1934年10月参加长征。抗日战争期间,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八路军总指挥(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与彭德怀在华北领导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期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全国解放后,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朱德的军事思想主要内容有:

建设人民的军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中国革命的主力,要想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就要建立和壮大人民军队。毛泽东的建军路线是人民军队的路线。人民军队的总原则,是从人民出发,为人民服务。它具有民族的、人民的、民主的三大特点。人民军队必须置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才能完成它担负的使劳动人民从政治上、经济上获得完

全解放的历史任务。实行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须在部队中设立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连队党支部应成为全连领导与团结的核心。共产党员应在战斗、生产和群众工作中起模范作用。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的灵魂和生命线。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第一是启发和提高官兵的政治自觉性,第二是团结本军和友军,第三是团结人民,第四是瓦解敌军,第五是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保证命令的贯彻执行。人民军队要把士兵培养成自觉的战士,要组织战士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使他们全面成长。人民军队要从爱护人民、爱护士兵出发制定养兵方针。要在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精兵简政,军民兼顾的原则下保养军队。

实行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的用兵新法指导军事斗争,必须掌握好政治、经济、人民、武器和交通(包括地形)五个要素,依据这五个要素的具体条件和敌我力量对比制定战略战术,用以战胜敌人。人民战争的基本内容就是群众战,实行军队与民众相结合的群众战战略。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就是人民战争的路线。一方面以军队的作战去援助人民的斗争,另一方面又是用人民的各种斗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交通的、军事的)去配合军队作战。人民军队的各种作战原则,必须围绕着军队与民众相结合的特点,才能发挥作用。人民战争的用兵原则,应当是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部队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务求趋利避害,争取主动,机动歼敌。战略上以各个击破为原则。在进攻中,第一动作都要选定主要突击方向,集中最大兵力在这一方向决战,其他方向只留出可以牵制敌人的兵力,以求先打掉敌人一部。在抗御强敌进攻中,只以小部兵力和游击队作有弹性的周旋,主力隐蔽转向敌侧后,集

中兵力歼敌一部。当敌人明显强大于革命势力时,应该把游击战作为逐步发展革命力量,不断削弱并战胜敌人的战略武器。游击战应坚持积极、主动、进攻三个原则,战术的基本形式是突然袭击,行动的基本要求是迅速、秘密和坚决。游击战须随形势发展和革命力量壮大,逐步向运动战过渡,增加运动战的分量,扩大运动战的规模。在作战指挥和战役、战斗中应实行军事民主。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指挥机关应发动大家讨论完成任务的战术和方法,发动群众献计献策。高级指挥员和军事机关则要深入部队,及时发现并总结和推广群众中的新鲜经验,据以创造新的战法。

建设政治上坚强的强大的正规化、现代化国防军 人民军队决不允许以功臣自居,向党闹独立性,脱离人民群众,必须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全党全军的团结。要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军指战员,树立高度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必须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一支大量使用现代化技术装备的合成军队,努力建设强大的海军、空军、装甲兵等新的军兵种。全军要实行统一的指挥、编制、制度和纪律,建立正规的严格的工作秩序和生活秩序,具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计划性和准确性,克服游击习气、山头意识和散漫作风。全军上下一定要大力学习新的军事科学、新的军事技术以及各种科学文化知识,掌握现代作战本领。只要有了大批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基础,忠心耿耿为社会主义服务,并且掌握了现代军事技术和军事学术,精通业务、富有革命事业心的干部,建设一支强大现代化革命军队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现代战争要有现代化的物质基础,离开强大的后勤供应是根本不行的。国家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基础,国防建设是经济建设的安全保障。民用工业和国防工

业应该结合起来,平时主要为经济建设服务,战时能迅速转到为战争服务。

朱德的军事思想研究,在当代中国军事思想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朱德年谱》,金冲及撰写、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当代中国人物传记·朱德传》,袁伟、吴殿尧编、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朱德军事活动纪事》,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朱德军事文选》,是研究朱德的军事思想的重要依据。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思想》中,收有《朱德的军事思想》及其重要著作的条目。

(龚希光)

彭德怀的军事思想 (Peng Dehuai's military thought)

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军事家彭德怀关于中国革命战争、人民军队和国防建设等问题的理性认识。

彭德怀(1898. 10. 24~1974. 11. 29),湖南湘潭人。1916年入湘军。1922年考入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毕业后,任湘军连长、营长。1926年随部队参加北伐战争。192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与滕代远、黄公略等率部举行平江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和湘鄂赣苏区。后率领该军主力到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4军会师,任副军长兼第30团团长。1930年6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3军团总指挥,同年8月任红一方面军副总司令员兼红3军团总指挥。1931年11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在井冈山根据地和中央苏区期间,出色地指挥了许多重要的战役战斗。长征到达陕北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红军前敌总指挥等职。抗日战争爆发

后任八路军(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副总指挥,在华北敌后指挥部队开展游击战争。1945年6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解放战争期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西北野战军(后为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西北战场指挥部队取得一系列重大战役的胜利。全国解放以后,任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1950年10月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1952年回国后,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54年9月起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彭德怀的军事思想主要内容有:

革命战争必须依靠人民 人民战争思想的核心,就是依靠人民群众。战争的胜负系于人民的向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只有依靠广大民众,打人民战争,才能打败国内外强大敌人。实行人民战争,必须有根据地。没有武装斗争,根据地就建不起来、巩固不了;离开根据地,武装斗争就无法持久,打不了胜仗。军队一定要把建立、巩固和发展农村根据地作为重要的战略任务。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进行人民战争,必须依靠党的各项正确政策和军队的模范行为,给群众带来利益,包括实际的物质利益。坚持反对一切脱离群众的东西,杜绝一切侵害群众利益的事情。只有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人民战争才能实行起来。

建设一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人民解放军必须服从共产党的领导。要在军队中健全党的组织和制度,提高共产党员在群众中的模范作用,使党组织成为部队中的核心和堡垒。保持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是人民军队区别于剥削阶级军队的一个重要标志。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人民

解放军必须坚持和发扬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传统,不容许有轻视和削弱政治工作的倾向。政治工作干部应深入到各种军事活动中去,学习新知识,了解新情况,使政治工作充满活力地向前发展。治军务必从严。严,主要是对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求要严。在工作作风上,要重实际,重效率,严戒弄虚作假、摆花架子,要把端正作风作为军队建设的大事来抓。

作战指导应立足于战略上以弱胜强,战术上以强击弱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在力量对比上长期处于劣势地位,要取得胜利,就要按照自己的特点打仗,充分发挥人民军队善于集中、善于机动的优势,灵活变换作战形式,求得战役战术上处于优势地位,积战术胜利为战役胜利。进而改变战略态势。实行游击战,以避实击虚,专击小敌为上策。在战术上务须按照地形、敌情而采取适当的集中与分散对敌,不呆板拘泥于任何形式。实行运动战,必须树立敢于诱敌深入和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指导思想,必须重视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的结合运用。

中国未来反侵略战争,要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必须依据军事服从政治的原则,从中国的根本性质和根本政策考虑战略方针。为此,中国的未来反侵略战争,只能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平时期要做好工作制止或推迟战争的爆发。当帝国主义不顾一切后果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初期要顶住敌人的几个连续进攻,将敌人的进攻限制在预定地域,把战局稳定下来,迫使敌人同我们进行持久作战,逐渐剥夺敌人在战略上的主动权,而使我们逐渐掌握战略上的主动权,然后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依据中国实际加强国防建设 中国的国防建设发展步骤,必须从中国国力实际出发,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全局。和平时期,武装力量

应限定在适当数额之内,实行“裁减数量、加强质量”的原则,以节减军费,发展国家建设。发展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应以自力更生为主,使国防建设牢固建立在自己国家工业和科学发展的基础之上。实行常备军与后备力量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解决好平时养兵少、战时用兵多的矛盾。

全面加强人民军队现代化建设 军队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带有本质性的转变,必然引起一系列深刻的变革。在现代化建设中,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保持政治上、思想上的统一,还要达到统一的指挥和协同动作。统一和正规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条件。现代战争需要具有复杂的现代战争知识、组织能力和技术操作能力。全军官兵必须实施严格训练,掌握现代军事科学知识、军事业务和军事技术。要大力加强各级司令部建设,提高参谋和指挥的质量,以适应组织指挥诸军兵种合成军队作战的需要。必须高度重视和大力加强后勤的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使之提高到现代化水平,使之具有组织供应、保障战争胜利的能力。要大力加强军事科学研究,逐步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军事学术。

彭德怀的军事思想研究,在当代中国军事思想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彭德怀军事文选》,《彭德怀传》编写组撰写、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当代中国人物传记·彭德怀传》,是研究彭德怀的军事思想的重要依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思想》中,收有《彭德怀的军事思想》及其重要著作的条目。

(王承光)

刘伯承的军事思想 (Liu Bocheng's military thought)

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军事

家刘伯承关于中国革命战争、人民军队和国防建设等问题的理性认识。

刘伯承(1892.12.4~1986.10.7),四川开县人。1912年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参加过癸丑讨袁之役、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曾任川军旅参谋长、团长等职。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与发动和领导泸(州)顺(庆)起义。1927年参加领导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南昌起义失败后赴苏联留学。1930年回国后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1932年1月进入中央苏区后,担任过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军委参谋长等职。参与指挥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后因反对教条主义的指挥而被降职。长征途中复任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后任先遣队司令员。抗日战争期间,任八路军第129师师长,率部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创建了晋冀豫和冀南根据地。解放战争期间历任晋冀豫军区、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1947年8月率部挺进大别山,为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拉开序幕。翌年底任中共淮海前线总前委委员,参与指挥了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1949年冬率部进军大西南,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刘伯承的军事思想主要内容有:

坚持人民军队的原则,适时实行向现代化、正规化的转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老百姓的子弟兵、勤务员,与人民群众有血缘般的关系。共产党军队打胜仗的秘诀,就在于进行的是为人民、得民心的战争。军队建设首要的是贯彻党的领导,团结于党和党的路线之下。兵权只能归于党,决不能归个人。政治质量是军队战斗力的先决条件。政治工作

首先要各级部队中发挥党组织的实际领导作用,使部队具有“胶力与活力”。政治工作要沿着群众路线发展,保证部队完成作战任务。夺取全国政权后,人民军队要实行向现代化、正规化的转变,这个转变要比以前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转变大得多。

实行综合群力的“全面战”、“全力战”毛泽东军事学的本质是人民军事学,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是从人民的本质上发挥一切力量的战略。革命战争要以小敌大、以弱胜强,必须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军事斗争为轴心,以武装力量为骨干,实行包括政治战、经济战和文化战在内的“全面战”和党、政、军、民协力一体的“全力战”。要把武装组织与非武装组织、战斗力与劳动力、军事斗争与民众斗争、积蓄革命力量与消耗敌人力量结合起来,形成整体作战威力。

注重实际和机动,讲求趋利避害和辩证指挥。指挥员和司令机关要随时随地地周密研究任务、敌情、我情、地形和时间这五个对作战最有影响的要素(即“五行”),据以定下正确的作战决心。现实是辩证的,指挥也应是辩证的,必须从实际出发,求得辩证的学术。处理作战指挥中的各种矛盾关系必须避免绝对化。“不管黄猫黑猫,咬得到老鼠的才算好猫”,一切战术运用都须以能消灭敌人才算数。在战争的不同阶段,应估量敌我各方面的客观条件,适时调整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三种作战形式的分量,这种调整即是军事战略转变。作战不但要军事,而且特别要政治,政治主张要公开明确,军事行动要秘密诡诈。在以弱敌强、以落后装备对优势装备的中国革命战争中,作战尤需机动,要发扬人民军队吃苦耐劳能行军的长处,提倡英勇的机动,采用“狼的战术”,避免“牛抵角”的笨拙战法。

办好军事院校,培养治军人才 中国革

命战争要赢得胜利,人民军队要实现现代化、正规化,必须办好军事院校,造就大批军事人才。军事院校应以培养出具有忠勇卫国之德、精通现代军事学术和军事技术之才的指挥军官和政治军官为目标。院校一切工作应以训练为中心,一切业务应保障教学任务的完成。军事院校必须建立合理的正规制度,以保证教育训练工作的顺利完成。军事院校教学要理论联系实际地学习新的军事学术和军事技术,应以战术为经,技术为纬,经纬交织,循序渐进。在和平环境无法直接从战场汲取实战经验时,必须通过实兵演习来学习和掌握实战本领。军事学术研究要博而约,博学古今中外军事,约之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军事思想。教材和教员是院校最重要的两项基本建设,要格外重视。教材要成龙配套,形成体系;教员要从部队优秀干部和品学兼优的毕业学员中选拔,大力加强他们的自身学习和修养,以造就一支又红又专的高水平教员队伍。

刘伯承的军事思想研究,在当代中国军事思想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刘伯承传》编写组撰写、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当代中国人物传记·刘伯承传》,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刘伯承军事文选》是研究刘伯承的军事思想的重要依据。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思想》中,收有《刘伯承的军事思想》及其重要著作的条目。

(薛洪兴 郭善仪)

贺龙的军事思想 (He Long's military thought)

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军事家贺龙关于中国革命战争、人民军队和国防建设等问题的理性认识。

贺龙(1896. 3. 22~1969. 6. 9),湖

南桑植人。1914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1916年组织起一支讨袁护国军,任总指挥,不久失败。1917年以菜刀夺取枪支,重新组织农民武装。1929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师长、军长。1927年参与领导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指挥。在起义军南下途中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初,回到湘西发动领导武装起义,3月领导举行桑植起义,7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军长,创建湘鄂西苏区。1930年7月率部到洪湖苏区与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会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2军团,任总指挥。1932年秋率部辗转数省,回到湘鄂边开展游击战争。后进入川黔边,创建黔东苏区。1934年统一指挥红2军团和红6军团在湘西开展攻势,策应中央红军主力北上,并创建了湘鄂川黔苏区,任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主席和军区司令员。1935年11月率部长征。1936年7月在四川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随即任红二方面军总指挥。抗日战争期间,历任八路军第120师师长、晋西北军区(后改为晋绥军区)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等职,创建和巩固了晋北、冀中、晋绥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期间,任晋绥军区司令员、西北军区司令员等职,参与指挥绥远、晋北等战役,领导陕甘宁和晋绥解放区的后方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率部进军四川,旋任西南军区司令员等职。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贺龙的军事思想主要内容有:

穷人要翻身解放,必须抓枪杆子,建设一支由共产党绝对领导的人民军队。掌握枪杆子在中国革命中极端重要,必须建立一支置于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新型革命武装。人民军队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

策,决不允许“军权高于一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任何时候都不脱离群众,是军队战胜敌人的基本条件。建立官兵一致、官兵平等的新型同志关系,是军队战斗力的源泉。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是军队完成各项任务的根本保障。

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是人民军队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人民军队一定要有自己的根据地。有了根据地,军队才能有充足的人力、物力来源,才能有好的作战战场,才能有效地得到人民群众的配合支援,才能使武装斗争和其他形式的斗争有力地配合起来。根据地的开辟、巩固和发展都离不开枪杆子,离不开武装斗争,也离不开根据地的党组织和政权建设。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还必须高度重视发展根据地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要加强根据地的地方武装和民兵建设,以巩固根据地政权,开展人民战争,为部队提供雄厚兵源。

从严治军,培养良好的军政素质。高度的政治觉悟、严格的组织纪律、过硬的杀敌本领、顽强的战斗作风,是部队战斗力的重要标志,而它们必须靠从严治军去培养。部队只有靠平时刻苦训练,练出过硬杀敌本领,战时才能减少流血牺牲。部队要实行精兵政策,实行一元化制度,加强领导,严格管理,建立各种纪律和制度,养成严肃的军容风纪,使部队做到令行禁止。

讲究作战方法,采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战略要服从政略。高级指挥员要有政治头脑和战略眼光,能综观大局,深谋远虑,正确处理局部与全局、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作战中要讲求实际,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对象和不同地形,采用不同战术。视敌我力量,斟酌进退,随机应变,力争保持主动。

建设正规军、民兵和国防工业三位一体的现代化国防。中国的国防建设应贯彻毛泽

东的人民战争路线,执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国防建设的内容主要是军队建设、民兵建设和国防尖端技术和国防工业建设,这是三位一体的任务,军队建设是最重要的任务。军队建设包括革命化、现代化和正规化。在未来的人民战争中,离开民兵是绝对不行的。做好了民兵工作,就能做到平时养兵少,战时出兵多。必须努力发展中国的尖端科学技术,建设自己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为人民解放军提供现代化装备。

贺龙的军事思想研究,在当代中国军事思想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贺龙军事文选》,总参谋部《贺龙传》编写组撰写、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当代中国人物传记·贺龙传》,是研究贺龙的军事思想的重要依据。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思想》中,收有《贺龙的军事思想》及其重要著作的条目。

(顾永忠)

陈毅的军事思想 (Chen Yi's military thought)

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军事家陈毅关于中国革命战争、人民军队和国防建设等问题的理性认识。

陈毅(1901.8.26~1972.1.6),生于四川乐至。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奉党派遣入川,开展兵运和组织泸(州)顺(庆)起义,策应北伐战争。1927年赶赴江西,在抚州(今临川)赶上南昌起义部队,被任命为团政治指导员。1928年1月参与领导湘南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1师党代表。4月同朱德率部上井冈山与毛泽东所部会师,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后称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先后任师长、中共红4军军委书记、前委

书记等职。1930年起历任红6军(后改为红3军)政治委员、红22军军长、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等职,参与领导中央苏区建设和反“围剿”作战。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任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等职,在赣粤边坚持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期间,参与领导组建新四军,先后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指挥等职。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代军长,在华中领导敌后抗战。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新四军军长、山东军区司令员、山东野战军司令员。1947年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华东军区司令员。1949年1月起,任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继续担任华东军区司令员等职。1966年任中央军委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陈毅的军事思想主要内容有:

必须建设一支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新式革命军队。新式革命军队的特质,在于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保持并不断加强这种特质,是这支军队生存和发展壮大的政治基础。建军的目的,是为人民群众服务。建军的要求,是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建设优越的军事组织,提高军事技术,执行严格的纪律,建立严密的制度,充满革命气派和创造精神。人民军队建设不是单纯的技术建军,必然包括强大的政治建设工作。政治建设的根本任务,是确保和不断巩固党的领导,使部队成为党的政策的宣传者、执行者和贯彻实行的组织者。但加强政治建设决不是轻视其他方面的建设,而是保证一切部门一切工作的健全和发展。

中国革命战争要依靠农村根据地,实行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必须先有农村根据地,并“波浪式”地发展到全国,才能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要在根据地内实行正确的土地政策,调动农村最广大群众拥护和参加

革命战争的积极性。要全面加强根据地军事建设、组织建设和经济建设,把根据地的千百万人民锻炼成一支政治、军事大军,去战胜敌人。正确的军事战略产生于正确的政治战略,应把它作为社会现象总体的一部分来加以考察。要综合研究敌友的情况,对政治、经济、文化与军事作全盘的考察,对军队、人民、政府和党的关系作出正确处理。在对敌斗争中,不仅要善于使用军事力量,而且要善于使用政治力量;不仅要善于指挥军队作战,还要善于指挥人民作战;不仅要善于动员使用我方的军民,而且要善于瓦解敌军;不仅要善于作武装斗争,而且要善于把武装斗争与各种非武装斗争、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秘密斗争与公开斗争结合起来,综合战胜敌人。群众武装、地方部队和主力兵团,是革命武装力量的三个阶梯,要相互依存配合,共同打击敌人。中国革命武装斗争实际上是一种“城乡”斗争,敌之优势集中在城市,我则必须发展农村游击战争。当革命战争由以游击战为主发展到以大规模正规战为主之后,总的指导方针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战略防御阶段,应以运动战为主,让出地方,诱敌深入,实现内线歼敌;战略进攻阶段,要逐渐加大阵地战比重,并与运动战相互配合。应大力提倡“以战养战”的方针,为规模日益扩大的革命战争提供强有力的后勤保障。

毛泽东军事学派的出现,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光辉成就。毛泽东军事学派是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的产物。其特点是用实事求是的方法研究中国革命战争实际;其本质是研究和回答革命人民及其军队如何在实力相差悬殊条件下战胜强大反动派和侵略者的问题;其内容是把军事作为社会现象总体的一部分,提出了中国革命的完整军事政策。毛泽东军事学派代表了中华民族军事史的光辉成就。

陈毅的军事思想研究,在中国现代军事思想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陈毅传》编写组撰写、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当代中国人物传记·陈毅传》,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陈毅军事文选》,是研究陈毅的军事思想的重要依据。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思想》中,收有《陈毅的军事思想》及其重要著作的条目。

(吴克斌 胡石言 傅立群)

罗荣桓的军事思想 (Luo Ronghuan's military thought)

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军事家罗荣桓关于中国革命战争、人民军队和作战指导等问题的理性认识。

罗荣桓(1902.11.26~1963.12.16),湖南衡山人。1924年考入山东青岛大学。1927年4月到武昌中山大学理学院就读,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入中国共产党。7月奉党派遣赴鄂南通城从事农民运动,8月参与组织通城秋收暴动。9月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三湾改编时,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特务连党代表。后相继担任营、支队党代表。1930年任红4军政治委员。1932年后历任红1军团政治部主任、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红8军团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长征,遵义会议后任红3军团政治部代理主任。1935年9月后曾任红1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军委后方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15师政治部主任。1943年3月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115师代师长。抗战胜利后率部进军东北。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东北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兼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暨华中军区(后为中南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等职。参与指挥辽沈战

役、平津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兼任总干部管理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等职,长期领导全军的政治工作。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罗荣桓的军事思想主要内容有:

关于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 人民军队只有在党的领导之下,才能战无不胜。党支部建在连上,党小组设在班排,与群众直接联系,这对于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起了决定的作用。军队政治工作的基础在基层,要做好政治工作,就要把连队工作做好,做好连队工作的关键,是切实加强和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和任务,一定要坚持从实际出发,特别是要坚持从连队中来,到连队中去。军事工作是用命令的形式,保证战斗行动的一致,而政治工作则是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用群众路线的方法,用说服教育、提高觉悟、提高自觉性的方法,来达到同一目的。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干部配备都要由党委讨论决定,配备干部要公道正派,搞五湖四海,反对任人唯亲、拉山头、搞宗派。要善于团结和使用各方面的干部,对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一视同仁,都应根据德才标准,严格要求,大胆使用。知识分子干部和工农干部应相互取长补短,团结协作。

关于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 革命战争不能只靠正规的主力军打天下,而应该实行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广大民兵相结合,必要时抽调部分主力部队加强地方武装。战争时期,地方武装和广大民兵不仅是开展地方性游击战争的骨干和基础,而且可以通过地方武装升级,为主力部队输送强大的兵员。国家和平建设时期,民兵建设应由地方党委统一领导,围绕生产,结合中心任务进行。民兵发展起来,常备军就可以减少,大量节省军费。

抗日游击战争不仅是军事的、军队的,而且也是政治的、人民的,应实行“分散性、地方性、群众性的游击战”方针,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坚持敌后抗战。针对日伪军的大规模“拉网式扫荡”,应实行敌人打过来、我就打出去的“翻边战术”,即主力部队趁敌合围圈尚未收紧,择其薄弱部位,跳到敌人后方予以有力打击,迫其主力回援,从而挫败敌之“扫荡”、“蚕食”。适时实行分散的群众性游击战争与主要方向上的集中主力作战相结合的方针,使敌后游击战争逐步向运动战转变。发动群众扩大武装,要靠深入的宣传鼓动工作,要靠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调动广大劳动群众参军参战的革命热情。

关于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方法 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是实事求是,学习毛泽东的著作也应提倡实事求是。要着重学习和领会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掌握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学习中应当联系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了解毛泽东撰写的每一篇著作的历史背景,弄清毛泽东某一论断是何时在何种条件下对什么问题而发的。反对对毛泽东思想采取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态度,以及“走捷径”、“背警句”、“立竿见影”等简单化、庸俗化的学习方法。理论学习必须联系实际。理论来自实践,再为实践所证实、所补充。理论离开实践,就会成为死的东西。历史是向前发展的,毛泽东思想也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罗荣桓的军事思想研究,在当代中国军事思想研究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罗荣桓传》编写组撰写、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当代中国人物传记·罗荣桓传》,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罗荣桓军事文选》,是研究罗荣桓的军事思想的重要依据。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思想》中,收有《罗荣桓的军事思想》

及其重要著作的条目。

(刘 汉 李维民)

徐向前的军事思想 (Xu Xiangqian's military thought)

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军事家徐向前关于中国革命、人民军队和国防建设等问题的理性认识。

徐向前(1901.11.8~1990.9.21),山西五台人。1924年4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任工人赤卫队第6联队队长。1929年被中共中央军委派往鄂东北,先后任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兼第4军军长等职。1932年10月由于敌人的强大和张国焘的错误指挥,红四方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被迫向西转移,开辟了川陕根据地。1935年春率部长征。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被任命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积极拥护中共中央北上方针,支持朱德、刘伯承反对张国焘分裂活动的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29师副师长。1939年6月奉调山东,任八路军第1纵队司令员。1942年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后任抗日军政大学校长等职。解放战争期间,先后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1兵团(后改为第18兵团)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徐向前的军事思想主要内容有: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用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灌注军队 在中国的条件下,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革命的胜利。将部队置于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为实现党的纲

领、路线、任务而斗争,是这支军队区别于一切旧式武装的根本标志,也是它不可战胜的力量源泉。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军宗旨,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永远保持人民子弟兵的阶级本色。要用政治工作保障军事的胜利。军事和政治二者不能分开,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任务,也是一个总任务的两面,二者同样重要,不可偏废。

实行群众战争的战略战术 人民的力量是敌人无法战胜的最伟大的力量,要实行群众战争的战略战术。假如人民军队孤军作战,就不会取得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人民战争是我们的最大优势和克敌制胜的主要法宝,人民战争的传统必须永远坚持和发扬。要重视民兵在保卫祖国、和平建设和未来反侵略战争中的重要战略地位。民兵建设要以抓好基层建设为主,不要搞大摊子、空架子,要劳武结合,以劳为主,民兵活动要服从生产。要坚持地方党委和军事系统对民兵建设的双轨领导制度,坚持民兵的经常性训练教育制度,充分发挥民兵在国家经济建设、保卫海防边防、维护社会治安中的作用。

实施“打活仗”的作战指导 “活”即高度的灵活机动,是驾驭运动战等作战形式的中心点。游击战原则须以依靠群众、避实就虚、避强击弱为要义。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提出,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等原则。要坚持积极防御,诱敌深入,内线歼敌是粉碎敌“围剿”的基本方针。但在一定条件下,实行战略外线的先发制人积极进攻,不仅是可以的也是应该的。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游击战应实行小打面不能大打,活打而不能死打,快打而不能慢打,稳打而不能蛮打等原则。运动战须以灵活机动为核心和命脉。在解放战争时期又提出,运动战要实行集中优势兵力逐个歼敌、出敌

不意、预有计划地创造战场、运动神速、灵活变换攻防战术等原则。

从严治军、刻苦训练与爱护士兵相统一 革命军队作为高度集中统一的打击敌人、保护人民的武装工具,一定要有严格的要求,严格的训练,严格的纪律。军令如山倒,令行禁止,决不能松松垮垮。在构成军队战斗力诸多因素中,训练占有重要的地位。只有坚持经常、严格、刻苦的训练,掌握战术技术要领,部队打起仗来才能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作风就是战斗力,一支革命军队具有好的战斗作风,才能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狠、硬、快、猛、活”的战斗作风,是革命军队在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艰险环境中,敢于压倒一切敌人和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从严治军和爱护士兵是统一的,二者不能对立起来,这是人民军队同一切旧武装的一个重要区别。

徐向前的军事思想研究,在当代中国军事思想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徐向前撰写、解放军出版社1984~1987年出版的《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的《徐向前军事文选》,《徐向前传》编写组撰写、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当代中国人物传记·徐向前传》,是研究徐向前的军事思想的重要依据。在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思想》中,收有《徐向前的军事思想》及其重要著作的条目。

(朱 玉)

聂荣臻的军事思想 (Nie Rongzhen's military thought)

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军事家聂荣臻关于中国革命战争、人民军队和国防建设、国防科技等问题的理性认识。

聂荣臻(1899.12.29~1992.5.14),四川

江津人。1919年底赴法国勤工俭学。其间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3年春转入中国共产党。次年赴苏联学习。1925年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政治秘书兼教官。参加北伐战争，参与领导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1931年底进入中央苏区，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军第1军团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中央苏区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抗日战争开始后，任八路军第115师副师长、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等职。率部深入敌后，在晋察冀边界创建了敌后第一块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组织指挥了正太、清风店、石家庄等战役，参与指挥平津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聂荣臻的军事思想主要内容有：

关于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 军队各项工作中，党的领导和建设是“头”，其他工作是“躯干”。军队政治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启发干部战士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精神因素对于革命军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必须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军队基层政治工作，依靠和发挥党支部的核心堡垒作用和党团员的模范带头作用。

关于建立并依托农村革命根据地 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关键在于发动和组织群众，有了群众，不仅山地，平原也可以开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要有良好的政策，特别是经济政策和锄奸政策千万不能发生偏差，保证改善广大农民的生活条件与民主权利。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的中心问题是壮大革命武装，必须不断壮大和发展主力部队、地方游击队、群众武装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中国共产党是领导

根据地的坚强核心，民主政权是动员和组织人民共同战斗的坚强杠杆。根据地要在发展中求巩固，在巩固中求发展。要以山区为依托，以平原为粮仓。根据地的对敌斗争是以军事斗争为中心的全面斗争。

关于游击战、运动战和阵地战的战略战术 游击战要正确处理“点、线、面”的辩证关系，着重缩小敌人的“面”，切断敌人的“线”，孤立敌人的“点”。在敌优势兵力“扫荡”时，应采取“走就是防御”的方针，针对敌之“囚笼”政策，采取“向敌后之敌挺进”的方针。运动战要坚持完全自主的方针，以“动”造成变化，寻机消灭敌人。要适时掌握时机，把运动战和阵地战结合起来，夺取敌占的坚固城市。

关于发展中国国防科学技术 中国必须加强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建设，要减少兵员数目，建设海空军和特种兵，要逐步掌握火箭、原子能、无线电电子等最新技术。国防现代化的发展必能带动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工业部门的发展。国防科技发展必须贯彻以自力更生为主，利用国外已有的科学成果为辅的方针。要处理好需要与可能的关系。装备研制的基本目标是：研制少量的导弹、核武器，建立必要的自卫手段，以打破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同时不断加强常规武器配套。军工产品必须坚持“质量第一”的方针，要严格把握好研究、设计、材料、工艺、试验、试制和生产七道关口。研制尖端武器要集中力量，缩短战线，任务排队，确保重点。科研与生产，以科研为主；尖端与常规，以尖端为主。尖端方面，先抓导弹，再抓核武器。导弹方面，以自行设计的中远程地地导弹为主。在确保“两弹”的前提下，再按作战飞机舰艇、陆军大型装备的顺序安排科研任务。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组织全国大协作，猛攻技术难关。组织国防科研机构、中国科学院、

工业部门、高等院校、地方科研机构五个“方面军”，相对集中各专业的研究力量，形成“拳头”。要充分发挥科学家的作用，从各方面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努力地做好科研服务工作。

聂荣臻的军事思想研究，在当代中国军事思想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聂荣臻军事文选》是研究聂荣臻的军事思想的重要依据。有关研究成果的代表作有：《聂荣臻传》、《聂荣臻年谱》（上下）、《中国元帅聂荣臻》、《聂荣臻同志永远和我们在一起：悼念聂荣臻元帅文集》等。1999年12月，为纪念聂荣臻诞辰100周年，出现了以张万年、迟浩田的纪念文章《功绩显赫铭天地，德高望重昭日月》为代表的一批学术研究成果。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思想》中，收有《聂荣臻的军事思想》及其重要军事著作的条目。

（周均伦）

叶剑英的军事思想 (Ye Jianying's military thought)

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军事家叶剑英关于中国革命战争、人民军队和国防建设等问题的理性认识。

叶剑英(1897.4.28~1986.10.22)，广东梅县人。1917年夏，入云南讲武堂学习，毕业后，追随孙中山从事民主革命。参与筹办黄埔军校，参加两次东征和北伐战争。192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策应南昌起义。参与领导广州起义，任工农红军副指挥。1928年赴苏联学习。1931年初到中央苏区，历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参谋长等职。参加长征途中，任军委第1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央纵队副司令员等职。抗

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参谋长和中央军委参谋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兼人民解放军参谋长等职，主持中央和军委后方机关工作。1949年8月任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陈赓等指挥发起广东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华南军区司令员、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国防部长、中共中央副主席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叶剑英的军事思想主要内容有：

建设新型的人民军队 要革命就要抓军队，要依靠枪杆子建党、建政，巩固政权。建立军队不能光靠整编和策动旧军队倒戈的办法，必须通过武装起义来创立自己的军队。军队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绝不允许向党闹独立性。政治工作永远是人民军队的生命线，要不断加强军队的政治建设。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国防军，要注重质量，协调发展，提高合同作战能力。要全面加强司令部建设，充分发挥司令部的职能和作用。要建立精干、合理、高效的后方勤务保障体制。

运用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在游击战争中要建立有群众、有武力的“红色据点”，巩固后方。要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经常袭扰敌后，把敌人的后方变为前线。游击战要与运动战相结合。战略战术要相辅相成，战略上持久，战术上应速战速决；战略上内线，战术上应外线；战略上防御，战术上应进攻；战略上以静制动，战术上以动制静。当敌动时，以镇静的态势打击它；当敌静时，则积极地动作起来，争取主动的运动战。

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 要正确处理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关系。国防力和经济力都是国力的组成部分。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基

础,国防建设是经济建设的保障。建设现代化国防,要注意开发与战争有关的各种潜力。增强国防实力,其基本途径就是走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道路。要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对国防发展的促进作用。国防武装力量包括常备力量和后备力量。常备力量是国家的值班部队,在和平时期要不断提高质量,扩大技术力量和专业人才。要千方百计把科学研究和军工生产搞上去。科学研究要突出重点,做到基本建设重于制造,尖端重于一般,生产导弹先于原子弹。巩固国防,要在重视边防的同时要注意空防和海防,把边防、海防、空防和纵深防御结合起来。要解决人民防空问题,准备打街垒战(巷战)、地道战式的城市保卫战等。

打好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 中国未来反侵略战争第一是人民战争,第二是现代战争,现代战争主要有三个特性,即突然性、迅速性和复杂性。未来战争的基本点应放在自力更生上面,放在以常规武器战胜使用尖端武器的敌人上面,放在持久胜敌上面。要研究现代条件下的运动战、阵地战和游击战。

按实战需要进行军事训练 在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中心工作是军事训练,训练也是打仗,要从难从严训练部队。训练的目标和要求是“四个结合”,即红、专、健相结合,技术与战术相结合,训练与科研相结合,院校与部队相结合。

军队院校要成为培养军事人才的基地要继承和发扬红军大学和抗日军政大学的优良传统,加强德智体全面训练。办好院校的关键是教员。院校教育实行“速成训练”和“完成训练”“两股绳”的训练方式。要从中国国情出发,选编好教材,发扬教学民主,实行直观形象教学。

广泛深入开展军事科学研究 军事科学研究的指导方针和根本任务,应是完整准确

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以我为主,总结经验,研究敌人,汲取外军有益经验,探索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指导规律,为军队和国防建设及未来反侵略战争服务。要建立中国的现代军事科学体系,加强军事科研队伍建设,正确处理科研、教学、“生产”的关系,把实践作为这三者统一的基础。军事科学研究要有科学方法,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做到“不孤立不空洞”。军事科研要区分主次,统一规划,全军动手。

叶剑英的军事思想研究,在当代中国军事思想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叶剑英军事文选》,《叶剑英传》编写组撰写、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当代中国人物传记·叶剑英传》是研究叶剑英的军事思想的重要依据。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叶剑英传略》是较早问世的研究叶剑英生平及其思想的专著。主要研究成果还有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叶剑英光辉的一生》,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叶剑英在广东》等。1992年,在叶剑英诞辰95周年的前后,有一批研究叶剑英的军事思想的成果问世,主要反映在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论叶剑英的革命理论与实践》一书中。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思想》中,收有《叶剑英的军事思想》及其重要军事著作的条目。

(范 硕)

叶挺的军事思想 (Ye Ting's military thought)

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新四军领导人、军事家叶挺关于中国革命战争和人民军队建设等问题的理性认识。

叶挺(1896.9.10~1946.4.8),广东归善(今惠阳)人。1918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

1924年赴苏联学习,同年10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2月转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9月回国后,参加第二次东征战役。不久参与组建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团并任团长,开始致力创建新型革命军队。1926年5月,率独立团任北伐先遣队,所向连战皆捷,开创了迥别于旧军队的新式战斗作风和勇猛战术,被誉为“北伐名将”。1927年参与领导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抗日战争爆发后,出任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军长。率部挺进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1941年1月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政府扣押。1946年3月经中共中央营救获释,4月在由重庆赴延安时因飞机失事遇难。叶挺的军事思想主要内容有:

必须建设一支新型的革命军队 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建立一支为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战斗的新型革命军队。这支军队来自人民,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奋斗。官兵在政治上一律平等,经济上公开开支。革命军队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担当起推翻旧政权的历史任务。军队中建立党组织,团建立支部,营建立小组。党员要起骨干作用。革命的政治工作是军事工作的根子,要在军队中建立有力的政治工作,全面提高军队的政治素质。要按实战要求苦练部队,苦练出精兵。要全面掌握战术和技术,做到一专多能,一兵多用,打起仗来以一当十。部队要有勇敢、顽强、果断、迅速的战斗作风,敢当尖兵,争打头阵,敢用刺刀杀出威风。精于近战、夜战,能强攻能死守,能独立作战,能连续作战。

革命军队要有自己的战略战术 军事斗争要和民众运动相结合,与群众打成一片,要帮助编练工人赤卫队、农民自卫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要避免反动力量集中的大中城市和中心地区,到偏僻的农村去与农民运动

相结合。革命军队的指挥员应根据敌情、我情、民情、地形、天候等条件和战局发展的趋势决定作战方法,把仗打活。对坚固设防之敌,应正面佯攻,侧后包抄,选敌薄弱部位一举突破,向纵深穿插,实行“虎腹掏心”;对远距离既定攻击目标,应采取长途奔袭战法,使敌疑为“兵从天降”,慌乱无措,以利攻歼;对立足未稳或动摇之敌,应采取猛打、猛冲、猛追的打法,集中兵力从侧翼突破,向纵深穿插迂回;对突然遭遇之敌,应集中优势兵力猛扑上去,打它个措手不及,吃掉其先头部队,再分割围歼溃敌;对主动来犯的优势之敌,应采取积极防御的手段,选择险要地势,节节抗击疲惫敌人,选择有利时机,集中兵力实施反攻。在遭到敌重兵包围时,应声东击西,佯作多方向突围,以精锐部队从敌薄弱部位打开缺口,不惜任何代价,突出重围。把仗打活的关键是指挥员要有见机进取的精神。

应重视研究现代战争特点 现代战争的特点,一是武器的高度机械化。战争已发展到机械化武器的时代,各国都受到影响,中国的抗日战争应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加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争取国际支援。二是参加战争的社会阶层的广泛性。资本主义发达的时代,整个社会经济组织严密,仗打起来就把全体人民都抛进战争的旋涡。战争空间的广阔性使现代战争中已没有前方后方、天上地下的区别。这就要求不仅军事上要有严密的组织与配合,整个社会也要有高度的组织性,仅靠主帅一人发号施令的拿破仑式指挥方法,已不适应现代战争。为此,要建立健全的指挥部,运用科学的指挥方法,要有科学的组织和分工。

叶挺的军事思想研究,在当代中国军事思想研究中占有一定地位。有关叶挺的军事思想及生平研究的代表作有:《叶挺传》、《叶挺将军》、《叶挺将军传》等。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7年出版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思想》中,收有《叶挺的军事思想》及其重要军事著作的条目。

(李杞华)

杨尚昆的军事思想 (Yang Shangkun's military thought)

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人、军事家杨尚昆关于中国革命战争、人民军队和国防建设等问题的理性认识。

杨尚昆(1907.7.5~1998.9.14),四川潼南(今属重庆)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春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底赴苏联学习。1931年回国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1933年初到中央苏区,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红军第3军团政治委员等职。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等职,参加直罗镇、东征和山城堡战役。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副书记、书记,领导北方局与八路军总部紧密协作,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巩固和发展了华北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副书记兼秘书长等职,协助中央领导处理日常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等职。1981年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协助军委主席邓小平整顿军队,坚决贯彻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为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解放军建设面临的一系列新问题,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杨尚昆的军事思想主要内容有:

正确分析国内外形势,不失时机地实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 杨尚昆依据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主持确定了军队建设实行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由以

往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应急状态,转入相对和平时期稳定发展的轨道。他指出,这一转变不是消极的措施,而是为抓住当前这一历史机遇,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人民解放军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各项建设,增强现代条件下的自卫能力。

改革军队体制编制,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 现代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的发展,使作战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民解放军的组织结构必须与此相适应。要按照“精兵、合成、平战结合和提高效能”原则,理顺关系,优化结合,逐步完善适应现代战争的体制编制,做到“机构精干,精兵合成,平战结合,提高效能,指挥灵便,提高战斗力”。军队改革的步子既要积极,又要稳妥。要加强后备力量建设,把精干的常备军与强大的后备力量结合起来。要在改善武器装备的同时,大力提高人的素质,增强指挥员驾驭现代战争的能力。要加强诸军兵种建设,突出重点,形成比较过硬的“拳头”部队。

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下,建设强大的国防 要全面贯彻军队和国防建设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下行动的原则。军队要服从国家建设大局,但国防建设必须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地位相适应。在和平时期,仍然可以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军队和国防建设要贯彻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形成能够应付多种形式的外来武装侵略的能力。要重视经略海洋,维护海洋权益,加强对海岛、海岸线的实际控制。要重视军事科学研究,充分发挥其先导作用,进一步繁荣军事理论研究,加强对国防建设发展战略的探讨,加强对未来战争的预测。

以现代化为中心,全面加强军队建设 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是人民解放军新时期建设的总目标。军队建

设必须以现代化为中心。人民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应当坚持“中国式”，即要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先进的军事思想和较高科学文化素养的指战员；要有精良的武器装备；要通过科学编成和严格的训练，把人和武器装备很好地结合起来。松懈是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最大危害，必须坚持从严治军，加强正规化建设，建立健全各方面的规章制度。

军队的改革和建设要以提高战斗力为标准。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支战斗队，这一思想在任何时期都不能动摇。必须把提高战斗力作为军队改革和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和平时期，军队战斗力的提高主要靠训练，训练的重点是干部。为此，必须加强军队院校建设。军队教育训练改革的核心是内容的改革，着眼点应放在如何适应现代战争和新时期军队建设需要上。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加强军队政治建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人民军队建设，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深入进行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教育，保证枪杆子永远掌握在忠于党的事业的人手里。政治工作依然是人民解放军的生命线，“生命线”的真正含义是在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和完成各项任务中，充分发挥“保证”和“服务”的作用。必须结合新情况、新问题，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充实新的内容。在全军大力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养军地两用人才，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断加强军政、军民团结。

杨尚昆的军事思想研究，在当代中国军事思想研究中占有一定地位。杨尚昆有关军事问题的著作、讲话、报告等，是研究其军事思想的重要依据。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思想》中，收有《杨尚昆的军事思想》及其重要军事著作的

条目。

(谢景新 李振惠 葛楚氏)

李先念的军事思想 (Li Xiannian's military thought)

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人、军事家李先念关于中国革命战争和人民军队建设等问题的理性认识。

李先念(1909. 6. 23~1992. 6. 21)，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26年参加农民运动，1927年11月率领家乡农民参加黄麻起义，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31年起，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团、师、军政治委员。参加创建鄂豫皖苏区和川陕苏区的历次反“围剿”作战。1935年率部随方面军主力参加长征。1936年奉命率领红30军西渡黄河，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指挥所部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河西走廊。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豫鄂边省委军事委员会副主任、新四军豫鄂边独立游击大队司令员、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鄂豫皖湘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等职，领导所部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原军区司令员。1946年6月，在国民党军围攻中原解放区时，组织指挥中原突围战役。1947年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等职。李先念的军事思想主要内容有：

坚持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加强革命队伍的团结，全面提高部队军政素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战斗力的源泉。革命军队有共产党的领导才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取得胜利。要重视加强部队的政治建设，使指战员树立革命理想和阶级观念、政策

观念、群众观念以及组织观念。要把连队党支部作为一切政治工作的基础。以革命军人的特点和任务为依据,加强部队军政素质建设。军事训练和后勤保障是增强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决不容忽视。

人民军队必须依托农村,创建生存发展的战略基地。广大农村是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大胆深入敌后农村,就一定能站稳脚跟,直至最后战胜敌人。争取和团结、依靠群众,是创造与发展根据地的基本问题。摧毁旧政权,建立新政权,是创建根据地的重要一环。在革命军队控制的地区,一律摧毁旧政权组织,建立革命政权;在双方经常“拉锯”的地区,则通过对伪乡长、保长的争取教育,形成政权。必须大力培植地方武装和民兵,使其成为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和巩固根据地的雄厚力量。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尽一切可能孤立敌人,是军队生根立脚的重要环节。要与一切愿意合作的国民党军政人士、开明绅士建立友好关系。对大刀会、红枪会等自发武装,应多加联络,切勿到处乱打,到处树敌。在新开辟地区,应多方设法解决给养问题,要取之于敌,注意不使群众增加负担。要大胆提拔和使用群众中有魄力、有威信、斗争意志坚强的分子,培养地方工作的本地干部。根据地要边建设边巩固,巩固与发展交替进行。根据地的发展,一般应采取“波浪式”,在特殊的环境中,也可采取“跳跃式”、“豆腐块式”的发展形式。坚持党的统一领导,是根据地建立和发展的关键。

根据不同作战对象,采取不同的作战形式和战术。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敌后开展武装斗争,游击战是最有利的作战形式。对大股敌人的“扫荡”,应化整为零,分散游击;对小股敌人的“扫荡”,应化零为整,集中兵力予以消灭。利用敌顽之间的矛盾,机动回旋。当敌伪大规模“扫荡”时,则转移到接近顽军的

地区活动,“背顽以对敌”;当顽军大规模进攻时,则转移到接近日伪军的地区活动,“背敌以对顽”;遇敌顽夹击时,则转移至另一地区,伺机反攻。游击战要向运动战发展。运动战要把进攻性、流动性和突然性结合起来,或围点打援,攻敌必救,或出敌不意,奔袭奇袭。运动战要趋利避害,当敌大规模围攻来临之际,应抢在敌发起总攻之前分路突围,突破敌人重兵的围追堵截,长距离流动转战。当敌大规模围攻来临之后,应利用地形,节节抗击,运动防御,收紧阵地,诱敌深入,伺机反攻。作战中要扬长避短,培养部队近战夜战能力,掌握山地战、河川战、森林战、村落战等不同地形作战的本领。

正规军、地方武装与民兵相结合,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主力部队是夺取胜利的“拳头”,但仅有正规军是不够的,还必须巩固和扩大地方武装,必须有遍布于广大地区的群众性的民兵组织,才能使主力部队如虎添翼。

李先念的军事思想研究,在当代中国军事思想研究中占有一定地位。《李先念文选》中的军事著作及其他有关军事问题的讲话、报告等,是研究李先念的军事思想的重要依据。有关研究成果的代表作主要有:《李先念传》(建国前部分)、《李先念》、《李先念将军》等。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思想》中,收有《李先念的军事思想》及其重要军事著作的条目。

(朱 玉)

粟裕的军事思想 (Su Yu's military thought)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军事家粟裕关于中国革命战争、人民军队和国防建设等问题的理性认识。

粟裕（1907. 8. 10~1984. 2. 5），湖南会同人，192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6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湘南起义后到井冈山，参加了创建中央苏区的斗争和历次反“围剿”作战，历任中国工农红军连长、营长、团长、师长、红4军参谋长、红7军团参谋长各职。1934年7月任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参谋长，转战闽、浙、赣、皖。1935年1月任红军挺进师师长、闽浙军区司令员，在敌人统治的腹心地区开创浙南游击根据地，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初期任新四军第2支队副司令员、先遣支队司令员，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副指挥兼参谋长等职，参与创建苏南和苏北根据地。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1师师长、苏中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开辟并巩固了苏中、苏南、浙东、浙西等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等职，直接指挥或参与组织指挥了苏中战役、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沙土集战役、豫东战役、济南战役，以及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京沪杭战役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第一政委，中共中央军委常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粟裕的军事思想主要内容有：

关于敌后游击作战 1938年粟裕撰写的《游击战术讲授提纲》全面总结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经验；在晚年的战争回忆录中，他又对本人所指挥的敌后游击作战的主要战役战斗进行了系统总结，形成了一整套敌后游击作战的指导理论。内容包括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转变、游击战的战略意义、游击战的战略

战术及其斗争策略、创建根据地等各个方面。他强调要通过打一两个好仗的方法实现向游击战的转变，要从思想上、组织上和工作上实现向游击战的转变，要在战略战术上实现向游击战的转变。他根据浙南游击区和苏中抗日斗争的实际情况，先后提出“敌进我进”和“基本区的要点争夺战”的游击战指导方针，并总结出“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胜利”、“不在消灭敌人，而在消磨敌人”、“积极进攻，绝少防御”、“越是敌人后方，越是容易成功”等六条原则、五个要领。他后来总结说，游击战很难谈得上防御，也不能大量地歼灭敌人，只能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

关于大兵团作战 粟裕既有指挥大兵团作战的丰富实践，也有系统的关于指导大兵团作战的理论。主要包括：正确处理全局和局部的关系，着眼全局深刻领会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从战略全局的高度指挥战役战斗和把握打第一仗与第二仗、第三仗的关系，从战略全局的观点出发选择作战地区、作战时机和作战对象；正确处理战役各个发展阶段与全过程的关系，把各个相对独立的战役战斗看作是前后相继的一个过程，既要掌握整体链条，又要抓住链条的重要环节，既要慎重初战，又要适时结束战役，从而将战区作战从一个阶段顺利导向另一个阶段；战争的全过程存在着战略、战区、战役三个不同层次的转折，战区指挥员在实施作战时必须注意把握好战区、战役的转折，战役的转折点就是在对战役是决定影响的环节上掌握主动、打赢敌人，从而使部队确有把握取得战役的全胜；实行完全主动的作战，能动地创造和捕捉有利的战机，灵活用兵，以奇制胜，一切调度都要着眼于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哪里好消灭敌人就在哪里打仗，什么时候好消灭敌人就在什么时候打仗，什么敌人好消灭就消灭什么敌

人；围绕作战重心适时转用和连续使用兵力，把集中使用主力作为转换战场形势的最重要手段，把一定条件下战区主力的分散行动作为破坏敌人集中的重要方式，把适时组织实施部队转移和休整作为连续作战的重要保证；将战役合围与战术分割、围歼与阻援有机结合起来，战役合围是“战役之关键”，在实施战役合围、构成对外正面的同时，要向敌纵深猛烈突击，迅速将敌分割包围、各个歼灭，使敌无法组织协同和互相支援作战，阻援是合围作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兵力常可多于围歼兵力。

关于国防建设和未来反侵略战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粟裕有许多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特别是1979年1月他在军事学院所作《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几个问题的探讨》的报告，对和平时期的国防和军队建设、现代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等进行了深入探索和研究。主要包括：必须首先确定国家的战略方针，并以此制定国防建设计划，使整个建军计划与整个国家建设计划密切配合起来，走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建设国防的路子；军队现代化建设应突出加强海、空军，而尤以加强空军为主，以求能在主要战场和关键时刻夺取局部制空权，陆军以发展炮兵、坦克和机械化部队为重点；要重视军队和院校的教育训练，把学习和掌握军事技术当作重大的战略任务来完成；做好对付敌人大打和中打的准备，国防现代化建设中要突出重点和基础建设，要把战场建设提到战略高度来认识；科学技术的发展并广泛运用于军事必然促进作战方法的改变，要在新的条件下研究新的办法，完全不顾具体情况，不研究具体办法，抽象地空谈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是唯心主义的；阵地战、运动战、游击战的打法都要有新发展，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形式的特点，将是依

托阵地的作战和不远离阵地作战，配合广泛的敌后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重点设防、重点守备地区要打坚固阵地防御战；战争初期在现代战争全局中的地位大大提高，战争初期首要的问题是抗住敌人的战略突袭，挡住敌人的“三板斧”，保存有生力量，从被动中夺取主动。

粟裕的军事思想研究，在当代中国军事思想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粟裕军事文集》、1988年出版的《粟裕战争回忆录》，国防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论粟裕的军事理论与实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粟裕论苏中抗战》，中原农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粟裕兵法》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粟裕军事指挥艺术与现代战争理论研究》等，是研究粟裕军事思想的重要依据。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思想》中，收有《粟裕的军事思想》及其重要军事著作的条目。

(陈舟)

徐海东的军事思想 (Xu Haidong's military thought)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军事家徐海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和人民军队建设等问题的理性认识。

徐海东(1900.6.17~1970.3.25)，湖北黄陂人。192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11月在湖北家乡率领农民自卫队参加黄麻起义。在创建鄂豫皖苏区斗争中历任中国工农红军营长、团长、师长等职。1932年秋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苏区后，参与重建红25军、红28军，任副军长、军长，在鄂东北、皖西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9月率部到达陕北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军团长。抗日战争初期，任八路军第115

师第 344 旅旅长,率部参加平型关战斗和晋东南反“九路围攻”作战。1939 年 9 月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 4 支队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 年被授予大将军衔。徐海东的军事思想主要内容有:

人民的军队应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共产党员在军队中不能争个人的兵权。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革命斗争的工具,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军队应当是最能经受失败与胜利双重考验的铁军。红军所以能打败比自己强大的敌人,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某一个指挥员个人如何有本领,而是由于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有阶级觉悟的部队。要不断加强军队中党的建设,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共产党员在军队中不能争个人的兵权,不允许有“官瘾”,要做到能上能下。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指挥员,在战争中应胸怀全局,为全局利益要勇于牺牲个人和本部队局部利益。

实行飘忽的游击战术,积小胜为大胜。弱小的红军要发展壮大,作战中应避开强敌,实行飘忽的游击战术。贪打大仗,只想攻城夺镇,死打硬拼,是军事上的自取灭亡。游击战可采用声东击西,“老鹰抓小鸡”的战法,突然袭击,抓到后就迅速转移,不恋战,不多贪战果,积小胜为大胜。对多路围攻的强敌一般应采取“先疲后打”的对策,敌动我先不动,待敌两路或三路接近时,向敌空虚的地方突击,把敌甩在后头,拖着敌人转圈子,拖到一定程度,哪一路孤立突出,就打哪一路。对固守分散之敌,一般宜采取围点打援的方法。

人民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必须处处时时爱护人民,与人民群众心连心。人民军队与群众的关系,是鱼和水的关系,是相依为命的。军队吃饭、穿衣、住宿、行军、打仗,处处离

不开群众的帮助和支援。人民军队必须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处处爱护群众利益,不侵犯群众一丝一毫,才能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越是在困难的环境下,军队越要注意群众关系。军队宁愿自己挨饿,也不与群众争粮;宁愿自己挨冻,也不进民宅。部队要经常进行“我是人民的儿子”的教育,使每个指战员都懂得,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是同呼吸共命运的一家人。

人民军队应有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能吃苦耐劳的军队才有战斗力;能在最艰苦困难中生存的军队才能最后战胜敌人。党领导的部队必须发扬“肩膀上扛粮食,屁股后头挂镰刀”的精神,自力更生,解决给养来源的困难,以战养战,夺取敌军的武器与物资补充自己。这种艰苦奋斗、以战养战的精神正是人民军队本质的体现。

徐海东的军事思想研究,在当代中国军事思想研究中占有一定地位。徐海东有关军事问题的著作、讲话、报告以及海燕出版社 1987 年出版的《十大将传记丛书·徐海东大将》,是研究徐海东的军事思想的重要依据。主要研究成果有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0 年出版的《徐海东纪念文集》等。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7 年出版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思想》中,收有《徐海东的军事思想》及其重要军事著作的条目。

(张 麟)

黄克诚的军事思想 (Huang Kecheng's military thought)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军事家黄克诚关于建立革命根据地、人民军队和作战等问题的理性认识。

黄克诚(1902.10.1~1986.12.28),湖南永兴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 年参加北伐战争。1928 年在湘南起义中参与领导

永兴起义。1930年后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3军团第5军的团、师政治委员、军政治部主任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第115师第344旅政治委员,八路军第2纵队、第4纵队政治委员,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四军第3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苏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2兵团政治委员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黄克诚的军事思想主要内容有:

革命武装斗争须有巩固的农村根据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离不开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没有巩固的根据地,军队就无法生存;单凭攻打几座城市图发展不可能持久。创建根据地依靠正确的方针政策。要巩固中心区,开拓边区。既要分散兵力,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又需要集中兵力,打破敌人的进攻,来掩护创造根据地,二者必须兼顾。应在发展壮大主力兵团、粉碎敌伪“扫荡”的同时,推动根据地建设的全面发展。

从实际情况出发,采用适合人民军队特点的战略战术 毛泽东的游击战、运动战思想是红军作战的正确指导原则。在红军弱小时期要坚决反对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主义军事方针。在战役战斗指挥上,既要缜密运筹,沉稳部署,又要灵活机断,相机处理。在平原地区对日军作战,要灵活运用转移、集中、分散、反击的方式。在敌人“扫荡”初期,应实行转移主力、隐蔽精干和与敌人打“圈子”的方针;在敌人实行分区“扫荡”时,则采取“扫荡”圈内打小仗,圈外部队积极作战的方针。战略反攻阶段,要从游击战向运

动战转变,集中主力兵团在地方武装配合下,扫清根据地内敌伪据点,打通相邻根据地间的联系。进入战略决战阶段后,可分别按主力决战地区、游击坚持地区和开展政治攻势地区等各类不同的地区,相应地部署军事力量,让出大城市,向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发展,待己方具备了进行决战的有利条件时,再回过头来逐个歼灭之。

全面建设人民军队 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军队素质的重要保证,也是人民军队独具的优势所在。政治工作的核心,是巩固和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培养相当数量的合乎标准的干部,是提高军队质量的基本条件。培养、选拔和爱护干部,是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应加强政治机关的作风建设,建立健全政治工作制度。后勤工作是军队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照顾国家的全局,搞好军队的工作;照顾军队的全局,搞好后勤工作;照顾后勤的全局,搞好各个部门的工作。后勤工作者要发扬优良传统,保持革命作风,提倡任劳任怨、埋头苦干、不畏艰险、克服困难、善于创造的作风。军队要爱惜民力,努力减轻人民负担,关心群众疾苦,保持子弟兵本色,努力为国家节省开支,做到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对有限的军费要合理安排,首先保证和加强重点建设,不应平均使用。军队各级领导干部要纠正铺张浪费和追求个人享受的倾向,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以及实际需要和可能,作为考虑军队建设和军队干部待遇的前提。

黄克诚的军事思想研究,在当代中国军事思想研究中占有一定地位。黄克诚有关军事问题的著作、讲话、报告以及海燕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十大将传记丛书·黄克诚大将》等,是研究黄克诚的军事思想的重要依据。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中国军

事百科全书·军事思想》中,收有《黄克诚的军事思想》及其重要著作的条目。

(李振墀)

陈赓的军事思想 (Chen Geng's military thought)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军事家陈赓关于中国革命战争、人民军队和国防建设等问题的理性认识。

陈赓(1903.2.27~1961.3.16),湖南湘乡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1926年赴苏联学习,翌年回国参加南昌起义。1931年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12师师长。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第129师第386旅旅长、太岳军区司令员等职。解放战争中任人民解放军纵队司令员、兵团司令员等职,参加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参与指挥广东战役,指挥滇南战役等。1950年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云南军区司令员,应邀赴越南民主共和国协助指挥抗法战争。1951年率部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第3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1952年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副总参谋长、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国防部副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陈赓的军事思想主要内容有:

人民军队的政治建设 加强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建设始终如一的基本方针,只有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人民军队才能保持正确方向和革命性质。加强党的绝对领导,必须健全部队中党的各级组织、加强基层党支部工作,提高共产党员的政治标准、责任心与模范作用,成为领导、团结与巩固部队的核心。政治教育要结合实际,解决实际问题,不能搞形式主义和空洞说教。人民军队指战员要牢固树立爱人民的观念,捍卫人民利

益,为人民服务,遵守政府法令。干部要爱护士兵,发扬军事民主,处理好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和军政关系。这是人民军队区别于旧式军队的显著标志。人民军队建设的关键是干部队伍建设。干部队伍不仅要有一定的数量,更重要的是不断提高质量。工农干部要知识化,知识分子干部要实际化。

带兵、练兵的基本原则和用兵艺术 带兵和练兵是用兵的前提。人民军队须有严格的纪律,以保证命令的坚决执行。应建立健全管理部队的各种规章,制定各种条令条例,作为治军依据,严格执行。巩固革命军纪,必须有说服教育,但又要赏罚严明。部队的良好作风必须从点滴抓起,从细微处养成。干部要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深入检查,注重实效。带兵首先要做好思想工作,思想工作应经常化,贯穿于每一任务的始终。环境越残酷,任务越艰巨,思想工作越重要。一个好的指挥员不仅要善于指挥部队,而且要善于训练部队。中国军队与现代化程度颇高的敌军对抗,除了应有高度的政治素质以外,还须有精巧的战术技术,充分发挥现有兵力兵器的威力。欲达此目的,关键在于军队的训练。各级干部都要重视军事教育训练工作。练兵必须讲求实际,从严要求。训练中一定要坚持学与用、练与战、理论与实际相一致,反对徒事虚表,因袭旧套。每次大小战斗后都要组织部队总结经验教训,探讨优缺点,进行实战教育。在战争实力总对比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人民军队的各级指挥员只有强化主观努力,在用兵之道上高敌一筹,才能使己方的兵力兵器发挥出最大效力,多打胜仗,最后战胜强敌。侦察是做到知彼、定下作战决心和作出兵力部署的依据,兵力对比上的敌强我弱尤其需要用周到的侦察来弥补。侦察应多层次而不间断地进行,要贯穿于战前与作战全过程。要打有把握有准备之仗,切忌浪打,鲁莽用兵。要先打弱敌

与好打之敌，打掉了弱敌，则强敌变弱。应贯彻打歼灭战的方针，集中优势兵力、火力于主要作战方向。要高度发扬下级指挥员的作战积极性和机动性，不宜过分地干预下级的行动。

敌后游击战要领 敌后游击战争要有广泛的群众性。正规兵团固然是骨干，但若忽视地方武装与群众武装的建设，是不能完成总任务的。群众性游击战争可实行十种小组战法：连环“麻雀网”，即在一定区域内，以若干游击小组互相配合作战，此伏彼起，让敌接应不暇；散乱的“麻雀群众”，即游击小组不规则地活动，各自为战；延长的“麻雀线”，即各游击小组沿交通线部署，层层阻滞打击敌人的运输队；“跳蚤战”，即不规则地袭击敌之翼侧、后尾或先头等各个部位；“扭击”，即对好打之小股敌人扭住不放，力求歼灭；“蜜蜂战”，即对较大股之敌猝然扑击，“叮”一下就跑；“拉锯战”，即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冷枪战”，即游击队员隐蔽射击，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飞行神枪手”，即以射击技术好的游击队员，迅速推进到有效射程内，杀伤敌人，打后就跑；“地雷战”，即在预设地区广布各色地雷，予敌杀伤。敌后游击战要求战斗动作迅速突然，求得多打小歼灭战，积小胜成大胜，正确处理使用力量与积蓄力量的关系。

现代战争条件下的作战原则和国防建设现代新式武器杀伤力大，敌人装备优势，机动性强，易占主动。中国军民要顶住敌人的突然攻击，防御上是有困难的，但敌人技术装备上的优势不是决定因素，最后解决战斗的还是要靠地面部队的争夺。要战胜强敌的外来侵略，战略上必须力求使战争持久化，要在战略纵深和战役纵深构筑多道防线，加强翼侧防护，增大防御的稳定性，依托坚固工事保存己之有生力量，并对敌之弱点或突出

部适时实行战术反击，多打小歼灭战，以耗其实力，毁其士气。在国防现代化建设中，应大力发展国防科技事业，使军队的装备技术水平逐步得到提高。为此，应下大力量加强科学技术研究，培养中国自己的国防科技队伍，把大批懂得现代军事技术的人才输送到人民解放军各军种、兵种部队中去。

陈赓的军事思想研究，在当代中国军事思想研究中占有一定地位。陈赓有关军事问题的著作、讲话、报告、日记以及海燕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十大将传记丛书·陈赓大将》、新华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陈赓大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陈赓大将军》等，是研究陈赓的军事思想的重要依据。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思想》中，收有《陈赓的军事思想》及其重要军事著作的条目。

（阮家新）

谭政的军事思想 (Tan Zheng's military thought)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军事家谭政关于中国革命战争和人民军队建设等问题的理性认识。

谭政(1906.6.14~1988.11.6)，湖南湘乡人。1927年9月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军委秘书长、第12军政治部主任、第1军团第1师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中南军区暨第四野战军副政治委员、第三政治委员，总政治部第一

副主任、主任，国防部副部长等职。1955 年被授予大将军衔。谭政的军事思想主要内容有：

政治工作的核心是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革命的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所特有的，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重要因素。人民军队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的生命线。政治工作是以党的革命纲领和人民革命的精神教育军队，使军队的内部一致，军队与人民、政府一致，使军队服从党的政治领导，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并进行瓦解敌军和协助友军的工作，达到团结自己，战胜敌人，解放民族和人民的目的。党的工作是政治工作的基础，政治工作应该通过党的组织进行，使政治工作指导系统和军事工作指导系统融为一块，进而实现党的领导。

军队政治工作必须服从、服务于党和军队的中心任务。军队政治工作必须适应新形势，根据军队执行的新任务补充新的内容。军队政治工作产生于党领导的军事实践，离开军事实践的政治工作是一定要脱离实际的。整个军队的方向就是政治工作的方向，因此，政治工作的任务，只能根据军队的基本任务与当前具体任务去规定，不能在军队基本任务与当前具体任务以外再有所谓政治工作的独立任务。政治工作就是以革命精神教育部队，从思想上、政治上与组织上去保证这些任务的完成。在军队执行的任务中，作战是被放在第一位的，其他一切都是服从于战争的。政治工作要着眼于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保证部队打胜仗。

军队政治工作必须贯彻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总方针，把思想教育放在优先位置。在军队与党的关系上，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完成服从党的领导；在军队与地方政府、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上，要尊重地方政府，尊重人民群众，实行拥政爱民，努力减轻人民负担；在军队内部的关系上，要通过民主

的方式，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密切官兵关系，增进官兵团结。思想进步才能达到行动的进步。必须注重部队的政治教育，借以提高部队官兵的政治情绪、政治认识与政治质量，培养高度的对敌仇恨与英勇杀敌的士气，纠正各种错误的思想倾向。干部思想进步是部队工作进步的枢纽。

军队政治工作要克服形式主义，发扬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政治工作存在的形式主义、平均主义、教条主义和空喊口号的作风，是与人民军队的性质不相一致的，它会减弱政治工作的革命性，如果这些作风不改变，即使走的路线是正确的，政治工作的方向是正确的，仍然无法发挥政治工作的作用。政治工作必须根据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相结合的原则，发扬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才能做好。军队政治工作必须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在干部问题上，不得论亲疏、分派系，不得以个人所好者好之、所恶者恶之。对党员干部与非党员干部应当一视同仁。

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中的政治工作。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应正确认识政治和军事技术的关系。在现代战争中，技术条件的重要性大大提高了。没有现代技术装备，没有高度技术水平的诸兵种合同作战，单靠人的勇敢是不能在战争中取胜的。强调技术的重要性，并不是主张可以降低人的作用、政治因素的作用。相反的，人的因素始终是战争中的决定因素、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在技术条件日趋复杂、兵种逐渐增多、战争更加残酷的条件下，更需要发挥人的作用。要注意纠正部队工作转变中存在的忽视官兵一致、上下一致的传统，忽视民主的作用，在领导方法上强调行政命令，忽视思想工作，不走群众路线等偏向。

谭政的军事思想研究,在当代中国的军事思想研究中占有一定地位。谭政有关军事问题的著作、讲话、报告以及海燕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十大将传记丛书·谭政大将》等,是研究谭政的军事思想的重要依据。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思想》中,收有《谭政的军事思想》及其重要军事著作的条目。

(乔希章)

萧劲光的军事思想 (Xiao Jingguang's military thought)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军事家萧劲光关于中国革命战争、人民军队和国防建设等问题的理性认识。

萧劲光(1903.1.4~1989.3.29),湖南长沙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先后任闽粤赣特区军委参谋长、闽粤赣军区参谋长兼政治部主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政治委员,第11军、第7军政治委员,红3军团参谋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留守兵团司令、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后改兼南满军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1兵团司令员、第四野战军第12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海军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萧劲光的军事思想主要内容有:

进行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全面提高人民军队军政素质 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的性质决定的,军队政治素质的提高要靠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因此,必须坚决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精神,建立健全党的各级组织,有针对性地进行党的方针、政策的教育,适时纠

正错误思想,明确政治方向。要倡导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文化知识,把军队变成一个战斗的学校。要十分注意激发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军队作战能力的提高要靠正规化的教育训练。对于指战员来说,战略战术思想是指挥成败的关键,必须加强军事理论学习;对于战斗员来说,则以提高战术技术水平为主。司令员对于军队战斗力的提高至关重要,必须明确司令部的工作职责,加强司令部的工作计划,特别要重视参谋业务的培训工作。应根据战争进程和作战环境的变化,进行新的军事理论和战术技术的教育训练。

实行灵活机动的作战指导,讲究军事斗争策略 在红军弱小、根据地不稳的情况下,更多需要的是游击战、运动战,而不是攻坚战、阵地战。游击战不仅是战术问题,应当提高到战略战役层次。游击战争的指导者要使自己处于主动的地位,必须采取积极防御方略,有计划地灵活运用兵力。对于主要采取游击战、运动战形式的人民军队来说,近战战术最能发挥其特长。人民军队必须担负建立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的任务。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进行革命根据地建设,必须准备以“战争改变形势”,军队是不可或缺的基本力量。它既担负着打击来犯之敌、保卫根据地的任务,又是培养、储存干部的场所,生产经营的主力军,同时还担负着发动群众,开辟敌后根据地的重任。在军事斗争中应注意战略和策略的运用,要区分顽固势力和中间势力,努力争取后者,集中力量打击前者。对于顽固派的斗争必须讲究策略,有军事上的斗争,还有思想上、政治上的斗争,究竟采用哪种斗争方式,要依具体情况而定。军队不仅要会“兵战”,还要会“心战”,分化瓦解敌人。

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人民海军 根据毛泽东人民军队建设的思想,人民海军建

军之初的建设方针是,以工农为骨干,以解放军为基础,吸收大量的革命青年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人员,争取、团结和改造旧军队海军人员。为此,要保证党的绝对领导和坚持政治委员制度,使政治工作成为海军建设的基本保证。人民海军建设必须打好政治、组织和技术“三个桩子”。一方面,要探索区别于一般政治工作的理论和方法,提倡面向舰队、面向海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另一方面,海军建设要迅速走上正规化。“治军先治校”,学校以教学为中心,部队以培训为中心,努力解决“人与技术”这一主要矛盾。现代海战是综合性的立体战争。人民海军建设从一起步就必须从长远着想,树立建设一支具有海空、水面、水下、岸防和陆战队五个兵种齐全的,能够协同作战的强大的现代化的海上战斗力量的思想。海军建设必须从实际出发,将“必需”和“可能”结合起来,有步骤地进行。针对世界海军向导弹化、核能化发展的趋势,提出中国海军建设应以潜艇为重点,实行尖端技术与常规装备相结合,舰艇装备由中小型向大型方向发展。海军建设要在加强近海防御能力的同时,增进纵深防御的能力。建设强大的海军既要考虑从战略上考虑,也要考虑战役战术问题,装备要导弹化、电子化,要有几样使敌人害怕的武器装备。

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发挥海上人民战争的优势 人民海军在战略上是防御的,在战术上是进攻的。应依托海岸岛屿,以岸炮和水雷为防御骨干,以鱼雷快艇、驱逐舰、水鱼雷飞机协同陆军进行反登陆作战,潜艇和飞机开展对敌人海上运输线的积极进攻,并在航线上布雷,充分发挥海上人民战争的优势,将众多的岛屿变成“不沉的航空母舰”,以扬长避短,进行有效的防御作战。实行分散的海上游击战与有利条件下集中打击的歼灭战相结合,也就是海上的破袭战与沿海

抗登陆相结合的作战方法,以其广泛性、突然性、进攻性、灵活性的作战特点,制胜敌人。随着导弹和核武器的出现,海军战斗纵深大大扩展了,人民海军实行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具体形式和活动范围应与此相适应,在海上开辟独立战场。

萧劲光的军事思想研究,在当代中国军事思想研究中占有一定地位。萧劲光有关军事问题的著作、讲话、报告以及海燕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十大将丛书·萧劲光大将》,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萧劲光回忆录》、1989年出版的《萧劲光回忆录》(续集)等,是研究萧劲光的军事思想的重要依据。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思想》中,收有《萧劲光的军事思想》及其重要军事著作的条目。

(张 炜)

张云逸的军事思想 (Zhang Yunyi's military thought)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军事家张云逸关于中国革命战争和人民军队建设问题的理性认识。

张云逸(1892.8.10~1974.11.19),广东文昌(今属海南)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期间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25师参谋长。1929年7月,奉中共中央指示到广西原桂系军队李明瑞部任职。当年12月与邓小平等领导举行了百色起义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军长。1931年7月率部到江西瑞金,先后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参谋长、粤赣军区司令员、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参谋长、副军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山东军区司令员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

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张云逸的军事思想主要内容有：

人民军队的各级指挥员必须提高军事指挥艺术的思想。中国革命武装的各级指挥员，必须在实际用兵中学习军事，提高自己的指挥水平。指挥员的指挥艺术如何，直接关系到甚至决定着战役战斗的成败。各级指挥员不仅要懂得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取得的游击战争经验，活用于抗日游击战争，而且还要进一步学会游击战、运动战和阵地战三种作战形式的灵活运用；不仅要懂得步兵战术，还要懂得骑兵、炮兵和机械化特种兵的使用，以及现代战争复杂战术的综合运用；不仅要研究中国军队的战术，特别是自己用血汗换来的作战经验，而且还要研究外国军队的战术原则和经验；不仅要懂得正规部队的战法，还要懂得如何依靠广大群众力量，特别是民众武装的配合作战。

根据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规律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的思想。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规律与全国整个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第一阶段应为战略进攻。这是因为，日军在战争开始阶段是集中兵力在正面战场上实施全面进攻，其占领区势必兵力空虚，这就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向敌后区域进攻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和条件。因此，该阶段的敌后游击战争虽是在全国战略防御的总形势下进行的，但带有战略进攻的性质。第二阶段是积极的战略防御。该阶段，由于日军占领地广而兵力有限，在正面战场的全面进攻不得不停止，转而采取巩固、保守其占领地的方针，调转主要兵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进攻。在这种局势下，敌后抗日战争的任务将主要是粉碎敌人的“扫荡”和“清乡”，保存与巩固根据地及其抗日军队，聚集力量准备反攻。因此，应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第

三阶段是战略反攻，与全国抗日战争的第三阶段相同。

加强人民军队中党的组织工作建设的思想。人民军队中党的组织工作建设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军队其他各项建设的好坏和战斗力的强弱。只有不断加强组织建设，才能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行，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组织工作中最中心的环节是加强各级党委、总支和支部的建设。其中，应特别重视干部的选配，治军先治干，有什么样的干部就能带出什么样的部队。要加强干部的党性锻炼，使干部做到每做一件事都首先想到对党是否有利。要敢于开展党内思想斗争，纠正各种错误思想，以保证军队各级党组织和干部队伍在思想意志上的统一。

重视人民军队的参谋工作建设的思想。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要向科学的现代的军队前进，就应重视参谋工作的建设。人民军队中的参谋机关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所必需的重要机构，是部队的指挥中枢，主要任务是保证部队打胜仗。参谋人员应从对首长、对革命高度负责的态度出发，养成负责的、自动的、创造的、科学的、精密的、办事迅速的作风。部队每次作战前，参谋长和参谋人员应把各方面的情况搞清楚，并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作战方案，协助首长定下决心。作战过程中要坚决贯彻首长决心，切实掌握战场情况，适时给部队下达补充指示，协调各部队的行动。战后要深入部队检查战斗情况，总结战斗经验，写出战斗经验。

张云逸的军事思想研究，在当代中国军事思想研究中占有一定地位。张云逸有关军事问题的著作、讲话、报告以及海燕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十大将传记丛书·张云逸大将》等，是研究张云逸的军事思想的重要依据。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思想》中，收有《张云逸的

军事思想》及其重要军事著作的条目。

(崔建环)

罗瑞卿的军事思想 (Luo Ruiqing's military thought)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军事家罗瑞卿关于中国革命战争、人民军队和国防建设等问题的理性认识。

罗瑞卿(1906.5.31~1978.8.3),四川南充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军团参谋长,纵队、师、军政治委员。参加长征,任红军先遣支队参谋长,陕北支队第2纵队政治部主任等职。1936年起,先后担任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后改为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副校长。1940年,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晋察冀野战军政治委员和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第2兵团(后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兵团)政治委员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曾任公安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罗瑞卿的军事思想主要内容有:

军队政治思想工作 ①政治工作既要保持独立性又要发挥创造性。保持政治工作独立性的根据,是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其内容是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政治工作是军队的生命线和战斗力的源泉,坚持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的三大任务,坚持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光荣传统。②党的干部政策是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亲。干部工作的出发点是正确地认识干部的本质。不要从个人好恶的观点出发去对待干部,而要从大公无私的立场对待干部;不仅要看到干部的弱点,还要看到干部的长

处;不应从固定的观点出发,而应从发展的观点来认识干部的去、现在和将来。③加强部队的政治教育。干部、战士教育应从实际出发,反对教育工作领导上的主观主义与学习上的教条主义。④做好瓦解敌军的工作。⑤增强政治工作的顽强性。人民军队战斗力顽强性的具体标准,就是要能够与敌人进行白刃拼搏。政治工作,就是要能保证部队此种战斗力之顽强性的养成。要把鼓舞士气,加强团结作为政治工作的总方针。⑥政治工作要保证军事任务的完成。政治工作要落实到业务上,红要落实专上。要反对某些脱离政治的单纯军事观点,但是加强军事训练,不仅不应当反对,而且应当大加提倡。认为一强调军事训练就是单纯军事观点,这是最大的误解,也是最有害的误解。革命化不出成果,也是没有用处的。政治也不能乱冲一气。

教育训练思想 ①要贯彻毛主席为抗大制定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教育方针,坚持少而精、理论联系实际、理论与实际并重、军事政治教育适当配合等原则。②要贯彻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分子知识化和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员思想的教育原则。抗大的新老干部应当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勉励、互相关心、互相信任、互相尊重,搞好团结。③和平时期部队要靠训练学会打仗。搞好军事训练就是最重要、最具体的战备。干部训练要以学战术为主,学技术为辅;战士要以学技术为主,学战术为辅。训练要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要开展群众性练兵运动,用比武和推广先进练兵经验的方法来推动军事训练。在比武中要防止并反对形式主义和锦标主义。

国防科学技术和国防工业建设思想 ①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建设,要贯彻自力更生的方针。要发奋图强,一切原材料、设备、配

套产品等都要立足于国内。②正确处理国防工业建设与国民经济建设的关系。军队、国防建设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要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相互促进,协调发展。③处理好发展国防科学技术与国防建设的关系。国防科技与国防工业必须执行抓住重点又兼顾一般的原则。发展国防尖端技术,建立特种技术部队是重点的重点。要“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突破尖端、加强常规”。在武器装备上要处理好长远规划和近期安排的关系。在生产和科研关系上,科研要密切结合生产,要为生产服务又指导生产。各科研和生产部门都要加强整体观念,统一计划、统一调度、合理分工、加大协同。在质量和数量关系上,要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求数量。在军品和民品的关系上,军工企业在军品第一的条件下,要做到军民结合。

罗瑞卿的军事思想研究,在当代中国军事思想研究中占有一定地位。罗瑞卿有关军事问题的著作、讲话、报告以及海燕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十大将传记丛书·罗瑞卿大将》等,是研究罗瑞卿的军事思想的重要依据。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思想》中,收有《罗瑞卿的军事思想》及其重要军事著作的条目。

(黄 瑛)

王树声的军事思想 (Wang Shusheng's military thought)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军事家王树声关于人民军队、人民战争和战略战术等问题的理性认识。

王树声(1905.5.26~1974.1.7),湖北麻城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后,担任工农革命军鄂东军第2路分队长,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团长、师长,第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兼第31军军长等职。抗日

战争时期,历任晋冀豫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太行军区副司令员,河南军区司令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第1纵队司令员、鄂西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鄂豫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先后任湖北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总军械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第二政治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王树声的军事思想主要内容有:

人民军队建设思想 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实行官爱兵、军爱民。共产党员要时刻以党的利益为重,把军队永远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人民军队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带兵必须爱兵,爱兵是阶级感情,爱兵才能打胜仗。越是战斗频繁、任务艰巨,越要关心爱护人民和士兵,做到军政、军民一致,官兵团结一心,克服困难,夺取胜利。各级都要提倡顾全大局,只要整体利益需要,就不怕牺牲个人和整体利益。

山地运动防御作战思想 山地运动防御应掌握的原则是:①明确作战目的,坚定胜利信心。除应掌握一般运动防御的原则外,还必须适应各种山地特点。山地运动防御在于利用山地有利地形,用各种积极手段从被动中争取主动,消耗敌人有生力量,为反攻和进攻创造有利条件。②周密组织,重点部署。切忌分兵把口,要控制强有力的预备队,以便及时实施反击和进攻。要充分利用山地特点构筑阵地,有重点地组成坚强的防御阵地。③顽强坚守,以奇制胜,主动转移。在与敌对峙时,应利用和创造条件,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或以精干部队对敌进行奇袭;或组织阵前出击;或以伏击歼灭敌人小部队。在不利条件下,应主动向新的阵地转移,以便创造新的战机。④掌握时机,转入反攻。在大

量消耗并诱敌至我预定地区时,应坚决果断地转入反攻。反攻方向应选择在能够撼动敌整个阵地之处,以保证初战必胜。反攻手段应是多种多样的,如可以精干部队乘夜暗大胆迂回,插入敌之纵深实施奇袭,配合正面部队反攻等。

围点打援的战术思想 ①围点是手段,打援是目的,但在情况有利时,应适当转移兵力歼灭被围之敌。②正确判断情况,集中主力打援。要从全局出发,确实查明敌之各种情况,以便决定歼灭援敌全部或一部。③围点之妙在于“似攻而非攻”。“似攻”在于使被围之敌感到恐慌,援敌才能援得迅速;因主要目的是打援,所以是“非攻”。④阻止援敌,应走得像、守得稳。阻援部队为诱敌进入预设伏区,应似守而走,示之以弱;当敌到达我预定阻击阵地时,应坚决防守。⑤迅速勇猛地出击,歼援敌于运动中。⑥适时地转移兵力,乘胜歼灭守敌。

突围战斗的作战思想 ①从被动中争取主动,做好准备。在定下决心和战斗实施中,要从最困难处着眼,向有利方向争取。②抓紧有利时机,正确选择方向。突围时机应力争选择在敌未完全形成合围,或已形成合围而未做好攻击准备,或已开始攻击而为我所阻止时,利用黄昏或夜暗突然实施。突围方向,应选择在敌人接合部或兵力薄弱部位。可分路或集中突围。③突围首要关键在于打开通路。④坚定沉着照顾全局,友爱团结互相支援。在突围中,各级指挥员应坚定沉着,独立作战,同时要有高度的整体观念,互相协作。

王树声的军事思想研究,在当代中国军事思想研究中占有一定地位。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王树声军事文集》、海燕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十大将传记丛书·王树声大将》等,是研究王树声的生平及军事

思想的重要依据。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思想》中,收有《王树声的军事思想》及其重要军事著作的条目。

(张光本)

许光达的军事思想 (Xu Guangda's military thought)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军事家许光达关于中国革命战争、人民军队和国防建设等问题的理性认识。

许光达(1908. 11. 19~1969. 6. 3),湖南长沙人。192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9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参谋长,红2军第17师政治委员和师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曾任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教育长、第3分校校长,中央军委参谋部部长兼延安交通司令、防空司令、卫戍司令,八路军第120师独立第2旅旅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曾任晋绥野战军第3纵队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3军军长、第2兵团司令员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受命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并担任司令员。1959年9月任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许光达的军事思想主要内容有:

人民军队的组织原则思想 在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贯彻党的政策和任务是其宗旨。各级指挥员都必须领会党的方针、政策和毛泽东军事思想,这是人民军队组织路线最重要的问题。人民军队是为人民利益而战斗的,一切向人民负责,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依靠群众,调动群众的自觉性、主动性,以完成各项任务,是建军思想的重要内容。

革命战争的战术思想 战术是由班到师

的战斗的方法。人、技术、地形、气候、时间等因素的“配合”，决定着具体的战术内容。人与技术是决定战术的基本因素。军队的本质、政治情绪、疲劳程度、群众条件等政治因素，与战术运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要根据当时军事斗争的性质和条件，运用新式战术战胜敌人。实行歼灭战，反对单纯的防御战。最有效的方法是调动敌人于运动中歼灭之；或以少数兵力佯攻，同时集中主力突击敌之侧后。

装甲兵的建设 and 作战运用思想 ①机械化是陆军发展的必然趋势。装甲兵部队是机械化的合成军队，在体制编制上应包括独立坦克部队和队属坦克部队。②装甲兵是陆军的重要突击力量。随着陆军机械化比重的增长，坦克兵和机械化步兵将成为陆军基本突击力量。③技术是装甲兵战斗力的基础。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兵部队。要建立一整套装甲兵技术保障机构和管理制度。④重视教育训练的实效和质量。部队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提高战斗力。部队应以训练为中心，训练要遵循先技术后战术、先基础后应用的规律，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⑤装甲兵部队是能充分发挥运动战特性的最理想的部队。在战役、战斗中，既能单独遂行任务，又能在合成军编成内遂行任务。应集中使用在主要方向上，并主要用于进攻战斗中。

掌握军事辩证法提高指挥艺术思想 掌握军事辩证法对于提高指挥艺术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人民战争中的防御和进攻是交替运用的，进攻中有防御，防御中有进攻，互相渗透、转化。进攻是主要的，防御是进攻的准备或开始，是达到进攻的手段。指挥防御作战时不可产生消极防御的思想。战争力量的强与弱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强中有弱、弱中有强，强弱是可以转化的。作战中，敌方弱的部分被打掉，其强者因其失去

依托而较前变弱，这是“先打弱后打强”的内在原因。指挥员必须从敌我双方和一方力量各部分的比较中，找出其中的强与弱。数量与质量具有辩证关系，指挥员应把注意力放在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的问题上。兵力对比的最佳优势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要在效能、经济和部队持续作战时间等方面构成“内容上的绝对优势”。

许光达的军事思想研究，在当代中国军事思想研究中占有一定地位。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许光达论装甲兵建设》，海燕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十大将传记丛书·许光达大将》等，是研究许光达的生平及军事思想的重要依据。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思想》中，收有《许光达的军事思想》及其重要军事著作的条目。

(许廷滨 丁 骥)

军事哲学研究

(study of military philosophy)

探讨军事领域矛盾运动的本质和规律的活动。军事哲学在军事科学体系中处于最基本的理论基础地位，对军队建设、国防建设和作战活动起着理论指导作用。军事哲学的基本概念、范畴，逻辑起点，学科性质、体系、产生、发展，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是军事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研究概况 军事哲学思想早在人类逐渐进入文明时代起就开始孕育萌发，并随着社会的进步不断地演变、发展而日臻成熟，但军事哲学作为一门学科逐渐建立起来，还是直到现代才出现的事情。20世纪，人类社会无论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领域还是在整个军事领域，都得到了巨大的革命性的发展，尤其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两次军事革命的展开，有力地推动着现代军事哲学的研究与发

展。这方面,不仅苏俄、中国、美国等有突出的表现,其他如西欧、日本、印度等亦迈出了一定的步伐。

在促使军事哲学研究的系统深化与建立学科体系方面,现代中国做出了更为突出的贡献。长期的封建统治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因素的制约,使得中国在 15 世纪中叶以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未能把古代辉煌的军事哲学思想传统继续发扬光大。1840 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此种情形愈加明显。然而从 19 世纪末开始,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与抗击八国联军入侵中的失败,逐渐唤醒了—批先进的有识之士,掀起了一股学习西方,实行“新政”,开办工业与创练新军的热潮,大大促进了中西军事哲学思想的交流与融合。特别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于 1911 年发动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年来的封建统治,提出了许多新的军事思想与纲领,把中国近代军事哲学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峰。孙中山揭示了民族与战争、民权与战争、民生与战争的关系,明确提出了三民主义战争观与武装革命的纲领,主张贯彻以民富国强为主旨的国防建设思想。中华民国时期,无论是军阀混战、全民族抗日战争,还是三次国内革命战争,都为现代军事哲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深广的基础。国民党领导的军队及其从事的军事活动,产生了诸如蒋介石、蒋百里、杨杰等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军事哲学思想,出版了许多有关的著作,如蒋百里的《孙子新释》、《军事常识》、《国防论》,杨杰的《国防新论》、《军事与国防》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及其从事的军事活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产生了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军事哲学思想,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与战略》、《论解放区战场》等

著名的军事著作与论文,以及《矛盾论》、《实践论》等包含深刻军事哲学思想的哲学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普遍地、持久地、深入地开展了学习与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热潮,包括新中国十大元帅在内的许多著名军事家,亦从不同的角度与方面丰富着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战争观、实事求是的军事认识论、发展的战争指导论、丰富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与科学的军事方法论等,从而使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进一步得到了发展,并形成了一定的科学体系。

80 年代以来,中国对军事哲学的系统化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邓小平等根据时代的变革、国际战略格局的演化和中国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的总任务,对军事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要求不断进行新的探索、新的实践和新的总结,不仅创造性地制定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军、作战的方针和原则,还提出了许多包含深刻哲理的军事理论观点,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邓小平军事哲学思想,如实事求是的军事认识论、新的战争与和平观、现代大国防观以及辩证的军队建设思想等。随后,江泽民对新的历史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等问题又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与论述,尤其是关于当代战争与和平、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军与科技强军、积极防御战略与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等,得出了一系列唯物辩证的结论。邓小平军事理论与江泽民军事论述中贯穿的深刻哲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体系。同时,中国学术界在改革、开放和当代高技术战争新形势的推动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军事哲学研究高潮,不仅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了数以百计的论文,而且先后出版了一大批军事哲学方面的专著,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著述有:郭化若著《军事辩证法》、郑

文翰著《把军事辩证法研究提高到新水平》、高体乾著《军事唯物辩证法》(1985)、毕文波等主编《军事思维学论纲》(1988)、梁必骏著《军事方法学》(1990)、王成业等主编《军事哲学原理》(1990)、林英家等著《邓小平新时期军事哲学思想》(1991)、张俊波主编《中西军事哲学比较研究》(1993)、陈鸿猷等主编《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史》(1993)、张家驹等主编《军事认识论》(1994)、梁必骏主编《军事哲学》(1995)、李际均著《军事战略思维》(1996)、傅立群主编《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认识论方法论》(1997)、梁必骏主编《军事哲学思想史》(1998)等等。另外,军事科学院在1988年招收军事辩证法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基础上,从1992年起开始招收军事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后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又于1995年起开始招收军事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同时,许多军队指挥院校、政治院校亦招收了军事哲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并为其他专业的研究生开设了军事哲学课程。所有这一切,不仅奠定了军事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广泛基础,而且表明这门新学科已基本形成。这中间,《军事哲学》一书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规划的重点项目之一,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陆军指挥学院、空军指挥学院、第二炮兵指挥学院、海军政治学院、空军政治学院、军事经济学院等单位的有关专家、教授共同完成的。该书明确了军事哲学的研究对象和学科性质,系统阐发了军事哲学一系列的概念、范畴、规律、原理,完整建构了军事哲学的理论体系,深入探讨了军事哲学今后发展的趋势。

研究内容 当代中国军事哲学研究的发展,是一个不断争鸣、不断深化、不断创新的过程。由于中国学术界对军事哲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基本内容和体系构成、功能特征等始终存在着不同看法,因此,深化并完

善军事哲学理论及体系,成了军事哲学不能完全确立并使其成为学术界共识的关键所在。在这个过程中,争论的焦点主要围绕着以下几个问题:

关于军事哲学的学科称谓 长时间以来,中国一直习惯于用“军事辩证法”的称谓来涵盖军事哲学方面的内容与理论体系。但随着军事哲学研究的深化,并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新学科之后,究竟是沿用“军事辩证法”还是改用“军事哲学”作为学科称谓的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坚持叫“军事辩证法”的意见认为:军事辩证法的概念,早在1936年就由毛泽东提出来了,几十年来一直沿用这个名称,已为大家所习惯和接受;“军事辩证法”突出了军事领域的矛盾运动特点,在揭示军事矛盾运动的普遍规律时,理应包括军事唯物论、军事认识论的内容;“军事辩证法”明确标示了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的唯物辩证性质,而不像“军事哲学”是个中性词,还可以是唯心的、形而上学的。建议改称为“军事哲学”的意见则提出:“军事辩证法”的涵义过于狭窄,顾名思义是指军事领域的辩证法问题,如把军事本体论、军事认识论等全包括进去,显得比较牵强,不如叫“军事哲学”更名符其实;军事哲学不仅仅指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思想,理应包括古今中外的军事哲学思想,叫“军事哲学”有利于扩大研究的范围与视野;学科的称谓不能老是用“约定俗成”的办法固定化,习惯叫法如果不能适应学科的新发展,就应改称新称谓。《军事哲学》一书原则上赞同后一种见解,并从学科分类、学科内容与学科发展三方面,论证了用“军事哲学”作为本学科称谓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同时认为“军事辩证法”作为一个重要概念,可继续存在于军事哲学的理论体系之中。

关于军事哲学的学科性质 主要包括以

下三种见解：强调军事哲学的哲学性质，认为它属于哲学在军事领域的具体应用，是哲学的一门应用性分支学科；强调军事哲学的军事性质，认为它属于军事科学的范围，甚至可以作为军事科学的概论；强调军事哲学的中介性质，认为军事哲学实际上是哲学通向军事科学的中介和“桥梁”。参加撰写《军事哲学》一书的专家、教授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讨，一致认为军事哲学的学科性质，受制于它的研究对象和基本内容。基于军事的各个具体方面、层次和部分，均有各门具体的军事学科去研究，惟独关于军事整体的本质、规律和指导问题，需要一门概括性、综合性学科进行研究，这个任务便历史地落在了军事哲学的肩上。因此，军事哲学要研究和解决的基本问题为：军事是什么，军事领域存在哪些普遍规律，如何正确认识与指导军事活动，等等。这种见解得到了有关专家的认可。认为，军事哲学作为一门扎根于军事活动土壤之中的特殊学科，离不开哲学的影响与导向，哲学作为一般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构成了军事哲学的指导思想，其理论基础是军事实践与认识活动。它又是对各个具体的军事学科知识、方法的最高概括，又对各门具体军事学科与各种军事活动，在战争观、军事观及其方法论方面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关于军事哲学的逻辑起点 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出版的一系列军事哲学专著和发表的论文来看，学术界对军事哲学理论体系究竟以什么作为其逻辑起点的问题，各有各的见解和理由。归纳起来大概有这样几种：①认为“战争目的与战争手段”是战争运动的基本矛盾，既是军事哲学中最普遍、最本质的问题，又是战争历史的起点，可作为军事哲学的逻辑起点。②认为“消灭敌人与保存自己”是贯穿整个战争、战役、战斗始终的基本矛盾，一切军事行动都必须围绕它来展开，因而

这才是军事哲学的逻辑起点。③认为“战斗”是组成战争的细胞，是战争中最简单、最常见、最基本的活动，其他不过是它的继续和扩展，以此作为军事哲学的逻辑起点比较合适。④认为“战争”、“战争性质”或“战争运动”是军事哲学的逻辑起点，因为军事哲学就是关于战争活动的哲学，上述概念可作为整个理论体系最基本、最抽象的概念来运用。⑤认为把“军事”、“军事本质”或“军事运动”作为逻辑起点更合适，因为这几个概念比上述关于战争等概念显得更抽象，可在内容上创造出比战争哲学更丰富的理论体系。⑥《军事哲学》认为，敌我之间的对抗才是贯穿整个军事领域始终和各个方面、并区别于其他社会领域的基本矛盾，而“敌我对抗”概念正是对这一客观存在的真实反映，它揭示了军事活动特殊的历史起点和最普遍的本质属性，属于最基本、最简单、最抽象的基本概念，由此可以推演出军事哲学的各种范畴、规律和原理，因而以此作为军事哲学的逻辑起点是最为恰当的。

关于军事哲学范畴的形成 在这个问题上，学术界同样存在不同的认识。有的从军事哲学是哲学在军事领域的具体应用这一观念出发，认为军事哲学没有必要形成单独的范畴，只需用哲学的范畴、规律、原理来说明军事问题就可以了。也有的主张通过哲学范畴军事化来获得军事哲学范畴，诸如物质与意识、运动与静止、主观与客观、实践与认识、必然与偶然、本质与现象等，分别在其前面加上“军事的”这一定语即可。还有的认为军事哲学既然是一个独立学科，就不能搬用哲学范畴，而应将所用的军事概念不断加以概括和抽象来获得军事哲学的全部范畴。《军事哲学》一书吸收了以往关于军事哲学范畴形成的研究成果，认为军事哲学的范畴及其体系应包括三个方面：①凡哲学与其他一般性学

科的范畴,只要普遍适用的,就可以直接借用或经过改造成为军事哲学范畴。②凡军事科学及其各个具体学科的范畴,只要能达到反映军事整体的本质联系高度的,也可加以借用或改造而成军事哲学范畴。③在军事哲学研究中,可通过对各个具体军事学科的范畴加以概括、抽象,以形成军事哲学自身的专用范畴。这些由移植、改造和抽象而来的一系列范畴,共同构成军事哲学的范畴体系。

关于军事哲学的体系建构 由于人们所确定的军事哲学逻辑起点不同,以及构成理论体系时所遵循的原则、方法不同,因此,在建构军事哲学理论体系时就出现了多种方案纷呈的现象。如:有的围绕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的矛盾,先从宏观上、总体上对战争进行考察,再就战争力量的要素、建设与使用加以具体分析,然后又回到从战争的认识与指导上如何解决这一矛盾,从而形成整个体系。有的以战争规律为中心来建构体系,认为按此建构的体系应包括战争的社会历史规律、战争诸因素相互关系的规律、战争认识规律、战争力量的建设与运用规律、军事科学的发展规律等部分。有的把战争目的与手段的关系问题视为中心,首论战争的目的,次论实现战争目的的手段,最后论述解决战争目的与手段之间矛盾的基本方法,从而建构成整个体系。有的把立足点放在对军事实践活动的本质及其一般规律的探索上,其体系主要包括战争是军事实践的基础,作战行动是军事实践的生动体现,国防建设是和平时期的军事实践的主要内容,军事科研是军事实践的理论升华等。《军事哲学》一书认为,应遵照实事求是、高度概括、符合逻辑、系统优化的原则,运用理论与实际、历史与逻辑、抽象与具体、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思考军事哲学体系的建构问题。据此,该书以“敌我对抗”作为逻辑起点,运用一

系列的重要范畴,确立了由军事本质论、军事运动论、军事认识论、军事指导论与军事哲学方法论等“五论”为基本部分建构成军事哲学的理论体系。

关于军事哲学的若干立论 有关军事哲学的一些基本观点与原理等方面的立论,中国学术界在其基本方面的认识是一致的,但在有些方面也存在不同的看法,例如:①战争的起源。有的坚持“阶级起源论”,有的坚持“利益冲突论”,还有的坚持“多因素作用论”。《军事哲学》一书则从战争起源的历史事实出发,认为战争起源于“敌对双方在经济、政治利益上的对抗”,原始社会的战争与阶级社会的战争“有着历史的必然联系”,而“作为两种不同社会性质的战争又是有区别的”的结论。②战争与军事的本质。有的坚持“战争始终是政治的继续”,有的认为“核战争不再是政治的继续”,有的认为战争与军事的本质是“指阶级性与暴力性两个方面”,还有的提出战争有“经济本质”、“政治本质”、“军事本质”的多重性。《军事哲学》一书认为:“战争乃是敌对双方为了一定利益而进行的暴力对抗活动”,就战争的性质而言“永远是政治的继续”,这一原理“对于核战争是同样适用的。”但军事“系指以准备、实施战争为中心的直接相关的社会活动”,它既“以战争为核心”,又“不等同于战争”,军事的本质“是由贯穿于军事领域的基本矛盾决定的”,表现为“暴力性与非暴力性的统一”。③军事认识中的理性与非理性因素。长时间以来,人们并不重视非理性因素在军事认识中的作用,有的甚至认为“这是唯心主义的东西”。《军事哲学》一书就这个问题专门进行了考察,认为军事心理因素与非逻辑形式等非理性因素,在军事认识中是一种“客观存在”,“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同时又不能将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截然分开,“理性因

素制约非理性因素，并在军事认识活动中起主导的决定作用”。④军事客观规律与军事指导规律。就其关系而言，一种意见认为两者没什么区别，另一种意见认为两者有着完全不同的依据和表现。《军事哲学》一书则认为：“不仅存在客观的军事规律，还存在着军事指导规律”，而且军事指导规律是对军事客观规律的“自觉遵循”、“灵活运用”、“近似反映”。⑤军事哲学方法与其他科学军事方法。在诸多的军事哲学著作中，往往都认为一般的科学军事方法皆属于方法论的范围，因此，理应包括在军事哲学体系之中。《军事哲学》一书，对军事哲学方法与其他科学军事方法的联系与区别作了分析，认为军事哲学理论体系只应包括军事哲学方法论的内容，但军事哲学方法必须同其他科学军事方法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发挥其方法论的作用。

关于军事哲学的基本功能 关于军事哲学究竟是怎样起作用 and 实现自身价值的问题，概括起来学术界主要有两种争论意见：一种是“直接作用论”，认为军事哲学既然是关于军事实践与认识活动总的知识体系，就应对军事活动的各个方面起到直接的指导作用，因而主张对军事哲学的研究、学习，必须同具体的军事活动联系起来，着力提高其应用性和可操作性。另一种是“间接作用论”，认为军事哲学是关于军事世界的性质与规律的总认识，不需要去回答军事实践与认识活动中出现的各种具体问题，而只要帮助人们提高理论思维能力就可以了，因此，主张充分发挥其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理论先导功能。《军事哲学》一书认为，不能简单地强调军事哲学“直接”或“间接”起作用，而要充分认识军事哲学的功能、作用的广泛性、多面性与综合性，它“不仅可以帮助人们确立科学的战争观、军事观，借以提高军人的科学思维能力，而且还可以自觉运用根本的军

事方法论，来能动地指导各项军事活动，并对哲学与其他科学的发展起积极的促进作用”。

军事哲学研究的发展方向 在各种军事哲学研讨会和院校军事教学中，军事哲学研究的发展方向，是一个经常探讨的问题。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应加强军事哲学基本理论的研究，针对所存在的各种问题展开深入讨论，进一步充实、完善内容和整个理论体系，更好地为军队建设、国防建设和未来作战服务。军事哲学思想始终随着人类社会与军事领域的发展而发展着，无论是内容与体系都将不断丰富、完善以至革新。军事哲学下一步发展的趋向，将突出对军事本质论、军事认识论、军事指导论、军事价值论和军事哲学思想史等分支学科的研究。军事哲学将面临军事革命的新形势，跟上时代、开拓前进、更新内容，更卓有成效地为军事活动服务，乃是今后势在必行之事。军事哲学将更富有时代感并积极发挥指导作用。针对客观需要和学科现状的矛盾，军事哲学将向新的广度和深度开拓前进。通过吸收哲学和各类科学的最新成果，军事哲学的内容和形式会更加丰富多彩。随着理论与实际之间联系的加强，军事哲学将愈来愈为更多的人所掌握和运用。广泛地运用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军事哲学研究必将进一步趋于科学化。

发展趋势 在可预见的 21 世纪里，军事哲学研究的前沿，将是人们面对的军队建设、高技术战争以及新军事革命等一系列新问题，如何从军事哲学的角度去认识和思考，并得出能正确指导未来军事实践活动的普遍性结论。

参考文献

毕文波等主编：《军事思维学论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张俊波主编:《中西军事哲学比较研究》,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

王成业等主编:《军事哲学原理》,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

梁必骏主编:《军事哲学思想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

(梁必骏)

军事认识论研究 (study of military cognitive theory)

探讨军事认识本质及其一般规律的活动。其任务为科学观察和认识军事事物提供理论基础和方法论。

研究概况 早在20世纪20年代,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活动中,就开始了军事认识论的研究。30年代中期,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批判以王明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军事路线和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基础上,于1936年秋所作的《军事辩证法》著名讲演和此后相继发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著作中,对军事认识的哲学基础、基本理论和辩证规律等作了深刻的论述,为军事认识论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加强全军干部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学习。从50年代中期起,一些军事院校相继开设了《军事辩证法》课程,有的高级将领和许多军事理论工作者,把军事认识理论作为军事辩证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深入研究,涌现了一批理论成果。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哲学界开展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以及此后开展的“主体和客体”“认识的主体性”等问题的讨论,拓展和深化了军事认识论研究的范围和内容。80年代中期,随着军事认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有一

些学者提出了建立军事认识论分支学科的问题。此后,国防大学等一些军事院校率先开设了《军事认识论》课程,并开始招收该专业方向的硕士研究生。90年代,军内出版了《军事认识论》专著和发表了一批专题研究的论文,探讨了军事认识论的任务和方法。经过多年的教学和科研实践,军事认识论开始进入军事哲学分支学科的行列。

研究内容 中国军事学术界对军事认识论的研究,主要是围绕以下问题展开的:

关于军事认识论的研究对象、学科定义及性质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军事学术界的意见比较一致,认为,军事认识论以军事认识活动为研究对象,是研究军事认识的本质及其一般规律的科学。军事认识论在理论上具有双重性质,相对于哲学认识论来说,它是哲学认识论的一个分支,是一门哲学应用学科;相对于军事科学来说,它是军事科学的理论基础和认识方法论,又是一门军事理论学科。军事认识论在哲学认识论和军事科学之间起着中介的作用,是哲学认识论和军事科学相结合的交叉学科。

关于军事认识论与军事辩证法的关系问题 军事认识论与军事辩证法是一种什么关系?有了军事辩证法,还有没有建立军事认识论的必要?这在中国军事学术界是存在争议的问题。大致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辩证法就是认识论,军事辩证法包含了军事认识论;军事辩证法这一概念自1936年毛泽东提出以来,国内一直沿用它作为军事哲学的同义语,已广为人们所习惯和接受,没有必要把军事认识论从军事辩证法中分离出来,重建新学科。另一种意见认为,军事认识论和军事辩证法在研究内容上虽有相互包含渗透的一面,但两者研究的对象、角度和重点是有所区别的。军事辩证法的研究对象是军事领域矛盾运动及其一般规律,重点是揭示

以战争为核心的军事运动的辩证性。现有的军事辩证法教材、专著中,军事认识问题主要是从战争实践和战争认识的辩证关系角度来论述的,对于军事认识活动本身的特殊性、特殊机理、特殊规律等则很少论及或展开。而军事认识论是从军事认识共性的角度来研究军事领域的认识及其规律,它不仅研究军事认识的辩证运动,还要全面地研究军事认识的主体和客体、认识和实践等基本范畴及其相互关系,研究军事认识的结构、形式、环节、过程以及认识方法等问题,揭示军事认识的一般规律。这是其他学科所不能替代的。因此,建立军事认识论新学科是必要的。

关于军事认识论研究的基本内容 中国军事学术界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军事认识论研究,主要包括军事认识基础理论研究、军事认识运动理论研究、军事认识应用理论研究和军事认识方法理论研究等方面的内容:

军事认识基础理论 主要研究军事实践、军事认识、军事认识的主体和客体等基本范畴及其相互关系等内容。中国军事理论工作者研究军事认识论以军事实践为逻辑起点。军事实践是人们为认识和改造军事领域内的事物而进行的一切客观物质活动。作为军事实践核心的战争实践具有间断性、暴烈性、残酷性以及活动的风险性和较少的重复性等显著特点。军事认识是在军事实践的基础上,人们对军事领域的事物及其规律的能动反映。军事认识活动的主要特点有:①敌对认识主体具有双向对抗性。每一方认识主体都力图掌握对方的真实情况,同时又掩盖己方情况不为对方所认识,并且运用各种谋略手段和技术手段,干扰和破坏对方的认识活动。②敌对认识客体具有高度隐蔽性和人为虚假性。在战争运动中,对抗双方的武装

力量、兵器装备、作战企图、行动计划等互相严格保密,并且有意地制造种种假象迷惑和欺骗对方。③认识内容具有更大的相对确定性。这主要是由认识对象的复杂性以及战争情况的绝对流动性和相对固定性、不确定性和确实性、偶然性和必然性等等所引起的。④认识方式上的超常性。面对情况错综复杂、形势变化迅速、战机稍纵即逝的战场环境,军事认识主体往往需要突破常规思维方式,随机应变,瞬时决断,出人意料,出奇制胜。⑤接受实践检验具有严酷性。军事认识是否达到主观与客观相一致,最终需要接受战争实践血与火的检验。由于认识上的“一着不慎”,往往会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军事认识和军事实践在军事活动中是辩证统一的。军事实践是军事认识的来源、动力、目的和检验标准,军事认识又对军事实践起指导作用。一个正确的军事认识往往需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多次反复才能达到。

军事认识运动理论 主要研究军事认识运动的基本矛盾、军事认识的一般过程和军事认识的一般规律等内容。军事认识的核心问题是战争认识问题。关于什么是战争认识的基本矛盾,中国军事学术界有多种提法,主要有:战争存在与战争意识的矛盾;战争中的主观与客观的矛盾;战争规律与战争指导规律的矛盾;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的矛盾;军事理论与军事实践的矛盾。经过多年的研讨,许多学者比较倾向于战争认识的基本矛盾应该是,在战争实践基础上产生的战争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的矛盾。其主要理由有三:一是从一般认识论意义上说,它是主观与客观这一认识过程的基本矛盾在战争认识中的具体体现;二是从认识和实施战争来看,它的正确解决是从事战争指导的大问题,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负;三是从在战争认识中的地位 and 作用来看,它是贯穿于整个战争认识全

过程,并制约战争认识其他诸矛盾的最根本的矛盾。战争认识基本矛盾双方是辩证的关系:一方面,战争的客观实际决定主观指导,一切指导战争的理论、原则和计划要得以实现,必须在战争实践中始终与客观实际保持一致,主观指导作用的发挥程度,也要受到客观实际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战争的主观指导对客观实际又具有巨大的反作用。在同样的客观条件下,军事家的指导有正确与错误之分、高明与低劣之别,即使客观条件处于劣势的一方,往往制定出高于敌手的深谋奇略,夺取战争的胜利。

军事认识应用理论 主要研究军事认识的作用机制、军事认识的检验和发展、军事认识的价值评价以及军事认识主体素质的提高等内容。中国军事学术界认为,研究军事认识论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何把军事认识的研究成果应用到军事实践中去,并在军事实践中进一步检验和发展军事认识,这是一个具有复杂机制的过程。其中包括如何通过一系列中间环节,将表现为思想、理论形态的军事认识规律性的东西,转化为指导军事实践的实践理念模型;如何选择和运用适当的手段和方法,掌握正确的操作方式,在军事实践活动中把实践理念模型转化为实在的东西等等。这种转化的实现,既是军事认识理论真理性的证明,也是军事认识理论在对主体有意义上的价值实现。

军事认识方法理论 主要研究军事认识方法的基本原理和军事认识领域的一般方法论,包括军事认识方法的本质、形成机制,军事认识方法的层次、体系,军事认识方法的应用和发展等内容。中国军事学术界认为,军事认识作为主体对客体的观念反映,是通过一系列认识方法实现的。军事认识方法是军事认识运行的方式、途径、程序和手段的总和。军事认识方法的不同,直接影响到军事认识

活动的成果。

军事认识方法的本质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一方面,军事认识方法形成、发展的原形和客观依据是军事事物之间的联系发展和军事实践活动,军事事物及其规律和军事实践的规模和水平,决定军事认识方法的内容和发展的程度;另一方面,军事事物及其规律和军事实践活动只有内化于人的头脑之中,转化为思维活动的规律,通过主体的逻辑形式同人的自觉精神活动相联系,变成人们思考军事问题的规则、程序、步骤和手段等,才能形成科学的军事认识方法。

军事认识方法按其作用范围,大体上可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军事认识总体性方法,即军事哲学方法或军事思维方法,概括军事各个领域认识方法的共性规律,适用于军事认识一切领域,其理论基础是哲学和军事哲学原理。诸如矛盾分析方法、从抽象到具体方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方法等都是军事认识领域中最具普适性的基本认识方法。第二层次是军事认识方面性方法,反映军事世界某一方面或几个方面的共性规律,适用于某一军事门类或几个相关门类的共同的横断的认识方法,其客观基础是一些军事门类对象之间存在着某些共同的属性和规律。诸如军事思维中的逻辑思维方法、形象思维方法、以及直觉(灵感)思维方法,现代科学中具有综合性质的系统论方法、控制论方法、信息论方法、协同论方法以及军事经验思维方法中的观察、实验方法等,都是军事认识领域中广泛使用的方法。第三层次是军事认识专门性方法,反映军事某一专门领域的特殊对象和特殊规律,只适用于该领域并在特定范围起作用的认识方法。诸如军事技术研究方法、军队政治工作研究方法、军事学术研究方法、以及军事预测方法、军事决策方法和更具军事特殊性的认识方法如侦察、图上(沙盘)作

业、靶场试验等等。

军事认识方法的应用与发展 中国学术界认为,军事认识的总体性方法、方面性方法和专门性方法是一般、特殊、个别的关系,它们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在实际的军事认识活动中,需要综合运用多种军事认识方法。由于不同层次、范围、内容的军事活动的综合繁简程度不同,军事认识方法的综合运用形式也是灵活多样的。军事认识方法在应用中是不断发展的。随着军事实践活动、军事科学技术、军事学术理论以及一般方法科学的发展,军事认识方法在实际运用中不断优化完善、丰富创新。由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形成的现代科学“方法群”,把多种认识方法统一起来,为军事认识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有力地推动着军事认识方法的应用与发展。

发展趋势 军事认识论是一门阶级性很强的学科,是为一定阶级的战争利益和一定国家的国防利益服务的。当代国际政治性格局的剧烈变动,现代高科技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迅速地改变着战争以及军事活动的形态,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为指导战争和研究军事提供认识论、方法论指导显得更为重要和突出。在中国,军事认识论作为一门新学科,虽然尚处在形成的初创阶段,在研究的广度、深度以及系统性、普遍性方面均显不足。但是,随着现代军事领域的深刻变革和新的战争实践的迅速发展,关于军事问题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必将受到更加普遍的重视。在新世纪之初,中国军事学术界将更加自觉地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研究面临的军事认识问题,将更加注重把思维科学、逻辑学、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成果引入军事认识论研究,多角度地研究和回答军事认识领域的基本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确保军事认识论

研究的科学性和时效性。可以预见,军事认识理论研究在不断深化宏观研究的同时,将进一步深入到微观机制的研究;对军事认识的理论研究将更加紧密结合军事认识在实践中的应用研究;在加强军事认识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的同时,将更加重视对军事认识现实问题的研究;研究军事认识的历史经验将与指导现实、预测未来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通过对不同军事认识的比较研究,将进一步深化军事问题的认识,促进军事思想的发展。此外,随着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运用现代技术、手段研究军事认识问题的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军事认识研究的方法将更加科学化和多样化。

参考文献

张家驹、楼焕甲主编:《军事认识论》,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

梁必斐主编:《军事哲学》,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

李际均:《军事理论与军事实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

(张家驹)

军事思维研究 (study of military thinking)

探讨军事理性认识的活动。是军事认识论研究的延伸,包括战争、战争准备、武装力量建设及其与相关事物的关系等。军事思维作为军事理性认识,是在军事实践的基础上,按照一定的思维方式,对于军事领域各种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能动反映。军事思维的结果包括军事观念、军事理论、军事谋略以及军事行动的计划 and 方案,等等。军事思维是军事思维学、军事心理学、军事哲学等诸多学科的研究对象或研究对象之一。这里主要是指军事思维学意义上的军事思维研究。

研究概况 中国的军事思维研究有着悠久而发达的历史。春秋末期孙武所著《孙子》一书,是世界公认的最杰出的古代军事理论著作,其中军事思维特别是军事谋略艺术的研究成果是它的主要内容之一,因此也可以说,它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军事谋略学名著。对《孙子》中军事思维的内容,成为中国学术界军事思维研究的重要课题,并得出以下共识,它上承《易经》、老子以柔克刚、以弱胜强的思想,在军事思维的基础上比较系统地揭示了军事谋略的原则和方法。其中贡献最突出、影响最深远的有以下几点:指出军事谋略的重要性,主张“上兵伐谋”;认为用兵要旨在于“以正合,以奇胜”,并在一定意义上把谋略的本质归结为“诡道”;追求“全胜”之策,把“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军事谋略的最佳目标;将“知彼知己”作为形成军事认识、制定军事谋略的基本前提。孙武以后,中国历代军事家在军事思维的基础上所形成的谋略思想相当活跃,形成了群星灿烂、奇谋不竭的历史画卷。可以说,高度重视并已形成较为系统完备的权谋,是中国军事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

20世纪20年代末以来产生、形成和得以发展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相结合的产物,是继承与发扬中国军事文化传统精华的结晶,是人类军事思想史上最伟大的科学成果之一。毛泽东军事思想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军事思维内容,特别是毛泽东军事哲学(军事辩证法)中,包含着进行创造军事理论和制定战略战术的完整、系统的科学方法。主要包括:①从社会历史发展中,从军事与经济、政治、文化的内在联系中研究战争和军事问题。②揭示战争规律必须着眼其特点,着眼其发展,以此为基础确立战争指导规律。③立足于人民战争的性质、力量

和作用制定战略战术。④战争指导和作战决策必须着眼于人和武器的结合,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的结合,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必须在知彼知己的前提下,坚持计划与灵活性的统一,做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力争主动和行动自由;必须辩证处理攻与防、打与走、进与退、直与迂、集中与分散、内线与外线、持久与速决、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以利于赢得最终胜利等等。毛泽东军事哲学和军事思想方法是克敌制胜特别是推动矛盾转化,达到以弱胜强、以劣胜优之目的的最大思想武器。

80年代,中国军事科学研究日渐活跃和繁荣,这不仅为军事思维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新资料来源,而且也构成了军事思维研究的总的学术背景。此间,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大力倡导现代思维科学研究,得到热烈的响应,一批重要的成果陆续问世。与此同时,前苏联和美国当代关于军事决策、军事系统分析以及“大战略”等问题的论著和文献也引起中国军事学者的关注。这些论著和文献有的直接探讨了军事思维的理论问题,有的可视为军事思维科学的应用性成果。其间,中国军事科学界形成了一个共识:如果说历来战争都不仅是物质力量的较量,同时也是思维和智力的较量,那么由于现代科学技术在军事领域日益广泛和深入的渗透,加大了驾驭战争的难度,思维和智力较量的比重也必然日益增大;为了适应这种形势的发展,军事思维科学研究应当迅速地提到议事日程。

80~90年代的军事思维研究大体经历了如下的过程:从依托典型战例,对某些军事谋略进行哲学思维分析,进展到对军事思维和军事谋略思维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以形成军事思维学和军事谋略学的理论框架,其后,又进展到有关军事思维某一层、某一方面或环节的比较系统、深入的探讨。1991年

的海湾战争以来,有关的研究内容中,对于高技术条件下战争的军事思维以及新军事革命对军事思维的影响等问题给予了一定的重视。80年代末到90年代,有的军队院校和研究机构还为硕士、博士学位研究生开设了军事思维研究课程。在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论述的指导下,军事思维研究取得了一批成果。主要著作有(以出版和发表时间为序): 毕文波、郭世贞主编的《军事思维学论纲》;李炳彦、孙兢编著的《军事谋略学》(上、下册);张守刚所著的《军事思维研究》;周志明主编的《军事思维效率引论》;李际均所著的《军事战略思维》;傅立群撰写的《美国战略思维中的几个基本观念》。

研究内容 80~90年代,军事思维研究的主要内容是:

关于军事思维学的性质及研究内容 有些学者主张建立军事思维学这样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认为军事思维学是研究军人及其他有关人员在战争和其他军事实践中思维活动的内在机制和规律的科学,它是军事哲学认识论的下位学科,是军事学和思维学相互渗透的产物。其内容大致包括:军事思维和军事思维的实践基础和科学基础;军事思维的特点和基本规律;军事思维方式;军事思维与军人情感和意志的相互作用;军事思维与军语及军人言语(话语)的关系;人工智能对军事思维的影响;军人思维的训练,等等。军事思维的一种重要产品是军事谋略,即军事对抗的计谋和方略。军事思维大量地表现为谋略思维,对于中高级指挥员来说,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可以归结为谋略思维。有的学者主张建立现代科学形态的军事谋略学,认为谋略学堪称活力对抗思维学,而军事谋略学则是军事对抗思维学。军事谋略学包括“谋理”、“谋法”和“谋德”三个部分。“谋理”是关于谋

略思维的基础理论,其中“活力对抗论”是关键的内容;“谋法”是关于谋略思维的应用理论,主要研究审时、造势、料敌、示形、用奇、攻心、柔胜、权衡、标本、伐交、用间、励士和将道等问题;“谋德”主要是研究指挥员思维品格的陶冶和优良将性的培养。

关于军事思维的特点和规律 有的著作指出,军事思维对象具有更大的流动性,包含着更多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表现为对抗的暴烈性。军事思维的特点即在于由其对象的上述特点所制约的基于科学性的预见性、超常性、灵活性、时效性和敏锐性。有的论著认为,军事谋略思维的任务在于精心筹划灵巧用兵、以智胜敌的最佳计谋和方略,“诡道”则是它的主要特征,但不是唯一特征。有的著作把“诡道”逻辑理解为“不守常”逻辑,认为军事谋略学研究的就是诡道逻辑。军事战略思维是最高层次的军事决策和谋略思维。有的著作把军事战略思维的特点概括为政治性、目标性、传统性、整体性、系统性、超前性、对应性(对策性)、创造性和确定性。论及军事思维的规律,先后发表过两种表述。一种将其概括为三条:一是以风险性为背景的军事思维与军事存在同一律,即在军事风险性和军事可知性的矛盾中,达成思维的准确性;二是军事思维的最大效益;三是军事思维的相对保证律,即从包含风险因素的军事客观实际出发,通过强化思维主体的主观条件的作用,相对保证军事思维的准确性和完善性。另一种则概括为五条:一是军事思维对抗律,即敌对双方的思维都要以对方的战斗力量为对象,企图予以破坏和摧毁;都针对对方的思路和对策来确定自己的方案和行动,企图破坏和战胜对方的对策;一方的思考导致另一方的反思考又是一个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吸引的交错发展的过程。二是军事思维超常律,即军事思维中的超常不是违反思维规律,而是根据

实际情况妙用思维规律;超常与寻常两者相互联系,往返转化。三是军事思维狡黠律,即在知彼知己的基础上,设法采取用间与反间、示形与用佯等手段达成隐己骗敌的效果。四是军事思维高效律,即由于战局变化多端,战机稍纵即逝,军事思维必须要有高速度、高效率,这是利用和创造战机以及在等待战机中乘隙寻机的关键所在。五是军事思维权变律,即由于古今中外没有完全一样的战争,同一场战争没有完全不变的态势,军事思维必须因机制变、因敌制变、以变应变。

关于军事思维方式 据有的学者研究,思维方法和思维形式的统一构成了思维方式。思维方法是思维运行的途径,而思维形式则是思维的结构要素和结构单位。思维方式的类型包括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含规则思维和辩证逻辑思维)以及由二者派生的经验思维和直觉(灵感)思维。创造性思维则是在辩证逻辑思维指导下(通常以直觉思维为先导),综合运用多种思维方式,产生某种突破性、开拓性和构建性结果的理性认识活动。军事思维方式没有超出这些基本类型,但具有自己的显著特点。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同一思维方式军事运用机制的特殊性。例如应用已有理论、原则或规则这一典型的思维类型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在其他领域中学习某些原则或规则无疑是为了应用,军事领域也是如此;但在不少情况下,由于交战双方都熟知同样的原则或规则,因此,要想胜敌一筹,最好的谋略倒可能是不用这些原则或规则。兵家过去学习它,仿佛就是为了将来不用它;这是军事领域创造性思维扬弃规则思维的一种特有的或者选择频率更高的途径。第二,同一思维方式军事运用的特殊重要性。例如,指挥员常常要解决好决策过程中全面把握情况和过于紧迫的矛盾。这是军事思维的一大难点,而克服这一困难的关键

往往在于辩证逻辑思维的运用,因为这种思维方式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相互联系中分析具体的矛盾。假如面对的情况为A,它由a、b、c、d诸因素构成,那么其中任何一个因素,例如a,都不是孤立地存在的,而是与b、c、d对a的影响必然在a中得到一定的反映。因此,只要对a进行辩证分析,就不仅可以直接了解a,而且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间接了解b、c、d。这就是说,在时间仓促,不允许直接了解b、c、d的情况下,指挥员如果善于抓住a进行辩证分析,就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全面地把握A,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决策的正确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否认对a以外其他方面一一进行侦察研究的重要性,也不意味着只需对a进行辩证分析,而不借助于其他知识和经验就可以保证全局决策的绝对无误。但至少可以说,在万不得已即时间确实不允许的情况下,对a的上述辩证分析,是降低冒险性的负作用,保证军事决策某种正确性的根本条件。如果a是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则决策的可靠性较大,反之则决策的可靠性较小。

有的学者把相对定型化的思维方法称之为思维方式,也有的学者把基本的思想观念称之为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存在着层次的区分,并且在运用上还存在着正确与否或恰当与否的区分,有的学者则据此进一步确定某些思维方式的名称。为了适应现代军事技术特别是军事高新技术在军事领域引起的深刻变化及其发展趋势,有的著作强调必须倡导现代的科学的军事思维方式,改变陈旧的军事思维方式,即倡导多维立体的军事思维方式、系统运筹的军事思维方式、发散与收敛结合的创造性军事思维方式和前导式军事思维方式,改变单维直线型的军事思维方式、经验滞后型的军事思维方式和主体意向型的军事思维方式。在适应新的军事发展形势的军事思

思维方式或方法的研究中,作为辩证逻辑思维一种现代具体形态的系统思维的军事应用以及军事观念更新问题尤其受到普遍高度的重视。有的学者指出,现代高技术战争是军事系统与军事系统的对抗,即战场体系的系统对抗、武器装备的系统对抗、作战力量的系统对抗、作战样式的系统对抗以及指挥系统的系统对抗,等等,因此,坚持军事领域中的系统思维显得至关重要。有的学者强调指出,军事改革涉及到军事系统与社会全面变革的关系,涉及到军事系统内部各个方面、层次和环节的关系,因此,必须运用系统思维方法进行科学的论证、筹划、决策和实施,才能使各项军事改革得以配套有序地展开,产生应有的整体效益。有些论著通过总结两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形成和突破陈旧落后的军事思维定势的客观历史条件和主观条件,探讨了当今军事观念更新的内容和方法,特别是强调了军事观念更新的极端重要性,认为军事创新的灵魂即在于军事理论的创新和军事观念的更新。

关于军事思维效率 有的著作指出,提高军队的快速反应能力,既要着眼于外延式增长,即力求命令传达、指挥实施的通畅快捷,提高人员集散、军力部署的速度以及作战保障的简便程度,更要着眼于内涵式增长,即提高军事思维效率。军事思维效率是指军事思维过程中的投入与产出之比,不仅包括速度,也包括效应和效果。提高军事思维效率需要具备诸多的条件,关键在于掌握有效的军事思维方式和原则,提高军事思维的广度、活度和跨度。人工智能的军事应用是军事思维效率的倍增器,这主要表现为加强军事思维的简约效应、预测效应、优化效应以及指挥自动化系统中的人—机协调的综合效应。

关于军人精神世界 有的学者论及,军人精神世界是军人头脑对外部世界的能动反

映和主观体验。它包括四个相互联结、逐级递进的系统:一是认知系统,由世界观和科学文化知识构成;二是动力系统,由需要、理想和信念以及情感、意志、兴趣爱好等构成;三是反思控制系统,由价值观念、审美观念和道德伦理观念构成;四是操作系统,由一定的思想观念支配的行为规范、行为方式和行为能力构成。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未来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努力塑造履行当代中国革命军人神圣天职所必需的军人精神,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任务。

关于冷战思维 随着苏联的解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持续 45 年之久的冷战即告结束。但有的国家仍然坚持冷战思维。这是一种政治、外交和军事合为一体的战略思维。有的学者指出,冷战思维主要有如下六个特点:一是主张由超级大国主宰世界,实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二是国家之间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异同来分亲疏,并把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强加于他国,粗暴干涉别国内政;三是图谋介入别国的内部事务,制造民族分裂;四是蓄意树立主要冷战对象,进行威慑、遏制和打击;五是策划扩军备战,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在国际争端中,以武力相威胁,甚至进行军事干涉和地区局部战争;六是借重联盟战略,组成国家集团,建立海外军事基地,与另一些国家对抗。冷战结束以来,个别国家的冷战思维不但未曾消失,反而迅速膨胀。它在这一时期的战略思维的基本出发点,在于企图通过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各种手段,以单极格局代替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对抗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国际政治局势,阻挠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有的学者认为这一时期的冷战思维可称之为“新冷战思维”,其核心是“新霸权主义”或“唯一霸权主义”。联系美国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政治、军事战略的调整,联系北约东扩的推行和新《日美防

卫合作指针》的制定,联系美国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和领头建立“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的目标,联系美国和英国对伊拉克实施侵略性质的军事打击,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实施侵略性的军事打击,以及侵犯中国主权、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这几宗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严重的践踏和平的政治、军事事件来看,冷战思维仍然阻碍着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时代潮流。

关于军人的思维训练 有些学者指出,军人的科学思维训练的内容包括直接性训练和相关性训练两部分:前者是指以军事现象为对象,单独和综合运用各种类型思维方式的训练;后者是指通过调整军人的情绪、情感和意志状态,应用军语,以及借助人工智能,保障和促进思维活动,提高军人思维质量和效率的训练。军事思维训练的途径和方法主要包括:一是要求军人在作战、对抗性演习和军事训练等军事实践活动中,激发思维活力,锻炼思维能力;二是要求军人具备一定的哲学、逻辑学和数学素养,具备军事及相关领域的科学文化知识、丰富的军事经验以及日常生活经验;三是引导军人学习军事史和战争史,从正反两方面总结和借鉴思维经验;四是引导军人以科学的态度和良好的品质对待和进行思维活动;五是把军事思维的共同基础训练与各级指挥员、参谋人员及其他普通军官和士兵等不同对象的分类特殊训练结合起来;六是实行军人思维训练的优化设计和科学管理。

军事思维研究的意义 军事思维研究,在人民解放军的教育训练特别是谋略训练中已经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首先,它有助于改善军人的思维素质,提高军队的作战能力。现代军事技术特别是军事高技术迅速地推动着战争形态的改变。与此相联系,在军事思想、军

事学术、军事技术科学、平时军事工作的训练、作战决策指挥以及士兵战斗行动的反应等各个层次和方面,军人的思维面临着新的严峻挑战。适应现代战争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战争的要求,改善军人的思维素质,已经成为提高军队作战能力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更高层次的标志。正在兴起的军事思维学(含军事谋略学)与军事心理学、军事哲学等学科研究成果相互促进和补充,并逐步转化为教育训练的内容,是提高军人思维水平特别是指挥人员和指挥机关谋略水平的一个必要条件。其次,它有助于推动一般思维学研究,军事思维是以武装暴力为手段,在现实的或潜在的生死对抗中进行的,它的内在机制在人类思维领域中具有高度的典型性。因此,军事思维学研究是一般思维学研究的重要基石。

发展趋势 有些学者预言,进入 21 世纪以后,思维科学将可能成为整个科学领头的前沿学科之一。中国 80 年代以来开展的现代科学意义的军事思维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未来军事思维研究的发展将可能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在总结传统军事思维经验的基础上,将进一步加强与世界范围内军事变革的实践相结合的研究;二是在高技术手段直接进入军事思维领域的情况下,将进一步加强对军事思维活动的影响与要求的研究;三是冷战思维研究将更加深入具体,并由此推动与冷战思维相对立的旨在维护世界和平的军事思维课题的探讨;四是在典型的军事事件的军事思维考察的基础上,进行系统的军事思维发展史的研究。五是在新的军事思维问题的专题研究和军事思维发展研究的基础上推进军事思维学理论体系的研究。

参考文献

毕文波、郭世贞主编:《军事思维学论纲》,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张守刚著:《军事思维研究》,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

周志明主编:《军事思维效率引论》,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

李际均著:《军事战略思维》,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

(毕文波)

军事哲学思想史研究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military philosophical thought)

探讨军事哲学思想的产生、演变历程及其发展规律的活动。就其属性与地位来看,它是军事思想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哲学思想史研究的分支。军事思想是人们关于军事问题的一系列基本理论、观点与方法,军事哲学思想是其最基本的内容。军事思想又是军事科学体系的一个知识门类,作为逻辑概括和反映历代军事哲学思想的军事哲学学科,则属于这个知识门类中的一门基础理论性学科。因此,军事哲学学科离不开对历代军事哲学思想的研究,它是对各种军事哲学思想加以总结、概括而成的理论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军事哲学思想史研究是军事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军事哲学思想史研究的基本状况 尽管军事哲学思想史是一门军事科学不可或缺、同军事哲学有着十分密切联系的学科,但真正作为一门独立的新学科确立起来,在中国还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事情。当然,在此之前亦有不少的科研成果,为军事哲学思想史学科的建立作了学术准备和奠定了一定基础。这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中国陆续出版了许多有关战争史、军事史、军事思想史、哲学思想史的专著,例如军事科学院《中国近代战争史》编写组编著的《中国近代战争史》(1984)、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

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1987)、高锐主编的《中国军事史略》(1992)、廖国良等著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1991)、邓锋等著的《西方军事思想发展史》(1993)、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1954)和《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辩证法分册》等等。这些著作在分析、介绍和总结各种军事活动史实时,不同程度地对军事哲学思想进行了研究,从中可以窥见历代军事哲学思想发展变化的某些脉络;二是出现了近似军事哲学思想史的著作,例如林伯野主编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史》(1989),对古代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近代资产阶级的军事辩证法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辩证法思想等,分别作了详细的介绍和评析,比较系统地回顾了军事辩证法思想发展的历史。由于当时并未把军事哲学思想与军事辩证法思想严格区分开来,而且军事辩证法思想事实上也是军事哲学思想的重要部分,因此,它从一个非常重要的侧面为军事哲学思想史研究开了个好头。三是研究和出版了一些关于军事哲学思想史方面的专著。如:陈鸿猷等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史》(1993)、张俊波主编的《中西军事哲学比较研究》(1993)等等。《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史》一书,力求比较系统地描述马克思军事哲学的发展过程,勾画出它发展的基本思想线索,它以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的创立、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在俄国(苏联)的发展——列宁主义军事哲学、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在中国的发展——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邓小平对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坚持和发展等四编构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中西军事哲学比较研究》则有所不同,它研究的是“中西古往今来的军事哲学”,力求通过对中西军事哲学思想横向与纵向、共时与历时的比较,揭示各个时代军事领域共同的普遍规律和各自的特殊表现,来获得有

价值的思考结论。另外,军事科学院的军事哲学专业研究生,从1992年起开设了“军事哲学思想史”的课程,所用教材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与阐述了古今中外军事哲学思想发展变化的历史。1995年由梁必骏主编的《军事哲学》(1995)一书,还用相当的篇幅专门介绍了军事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状况。所有这些成果,对于促进军事哲学思想史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军事哲学研究领域,有许多研究成果。1998年由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军事哲学思想史》是一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性军事哲学思想史。其内容分为七大部分:①阐明军事哲学思想史的学科性质、体系构成、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它的意义。②研究与阐述军事哲学思想孕育萌发的背景、条件、状况及其基本特点。③研究和阐述军事哲学思想萌发之后迅速生长以至达到初步成熟的情形。④研究和阐述军事哲学思想在迅速生长后的1000多年时间里,缓慢演进的状况。⑤研究和阐述军事哲学思想自资产阶级革命开始到20世纪初发生的革新过程。⑥研究与阐述军事哲学思想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今愈来愈广泛、愈来愈深刻的系统化发展。⑦总结了军事哲学思想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主要是在对整个军事哲学思想产生、演变的历史过程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军事哲学思想发展变化的规律。

在考察视角上,坚持把军事哲学思想的历史演变过程,置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在分析、研究各个历史时期的军事哲学思想时,首先考察这个历史时期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与军事活动基础;分析研究各个国家、民族、人物的军事哲学思想时,充分考虑这个国家、民族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每个人物所处的社会环境状况。

在研究对象上,既强调研究军事哲学思想产生、演变的历史过程,又注重揭示军事哲学思想发展变化的阶段特性与基本规律,并始终把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军事哲学思想产生、演变的整个历史过程是军事哲学思想史的基本研究对象,因此,不仅要注意总结每个军事哲学思想历史发展时期的特点,而且还要全面总结军事哲学思想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如:军事哲学思想是人类社会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特殊产物;军事哲学思想变革的直接动力源于军事实践与认识活动;军事哲学思想的历史构成受制于主体的反思与交往状况;军事哲学思想的演变过程呈非平衡的螺旋上升运动状态;军事哲学思想的不断发展对社会历史进程起一定反作用;等等。

在研究内容上,主要是考察历代军事活动家及军事理论家的军事哲学思想,同时也注意反映历代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史学家等其他人物的军事哲学思想,并关注到世界各国主要宗教教义中蕴涵的战争观念。在探讨古代中国的军事哲学思想发展状况时,详细研究了中国古代兵法与军事家的军事哲学思想,对孔子、老子等思想家和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纵横家等多种学派的军事哲学思想,也进行了挖掘和阐发。在研究古代欧洲的军事哲学思想时,不仅注重从少量兵法中去挖掘军事哲学思想,而且还从诸如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和希罗多德、修昔底德、阿庇安等史学家的著作中,发掘其蕴涵的军事哲学思想。对于历代宗教,如印度教、犹太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教义中所蕴涵军事哲学思想作了研究,从而更加丰富了历代军事哲学思想研究的内容。

在体系构成上,研究中坚持从军事哲学思想自身产生与演变过程的客观实际情况出发来分析、考察历史分期问题,并将其历史发

展过程分成孕育萌发、迅速生长、缓慢演进、变革创新、系统深化五个时期,并以这五个时期的顺序为经,以各个不同时期各个影响较大的国家、民族、地区为纬,对这些国家、民族、地区的各种代表性人物与著述的军事哲学思想分别进行了具体研究,在揭示军事哲学思想各个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特点的基础上,总结了其整个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

军事哲学思想史研究的特点 军事哲学思想史除了具有一般军事思想史或哲学思想史的共同性质外,还表现出整体性、反思性与交叉性的三位一体特征:所谓整体性,是指军事哲学思想史是从整体上认识军事的历史。这一特性,主要反映军事哲学思想史不仅属于人们对军事领域的认识史,而且是人们认识军事整体的那部分历史。认识各个层次、方面、部分的军事事物及其运动,是各门具体的军事学科的任务,如把不同历史时期的这些理性认识有机地联结起来,就构成了这个学科或那个学科的思想史。军事哲学思想史则不同,其认识对象乃是军事整体,虽然它离不开各个具体学科的思想史,但从根本内容上说只能是认识军事整体的思想史。所谓反思性,是指军事哲学思想史是对军事活动反思的历史。这一特性,主要反映军事哲学思想史不是对历代军事活动经验的具体总结史,而是人们对军事实践与认识活动进行不断反思的历史,旨在回答“军事是什么、为什么这样”和“怎样认识与指导军事活动”这类带普遍性的问题。军事哲学思想史正是将历代人们对军事活动的一系列反思结论“编串”起来,并加以综合地分析与研究而构成的。所谓交叉性,是指军事哲学思想史是军事与哲学思想结合的历史。这一特性,主要反映军事哲学思想史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一方面要以历代军事活动作为自身的实践基础,另一方面又要以历代哲学思想作为自身的理论

基础,历代军事活动与历代哲学思想的相互作用与结合,才产生了历代的军事哲学思想。因此,军事哲学思想史既包括历代哲学思想不断渗透和影响军事活动的内容,又包括历代人们经常把军事活动上升到哲学层面加以透视的内容。当然,整体性、反思性与交叉性是从不同侧面反映军事哲学思想史性质的,在实际的历史过程中,它们并非分开的,而是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共同体现着军事哲学思想史的特征。

军事哲学思想史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军事哲学思想史的学科特性,决定了这个学科在军事科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研究军事哲学思想史的直接目的,是揭示军事哲学思想历史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它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首先,军事哲学思想史是现代军事哲学学科赖以分析与总结的历史基础,深入研究军事哲学思想的历史演变情况,有助于进一步弄清军事哲学范畴的来龙去脉,把握军事哲学规律,提高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军事哲学理论的自觉性。其次,研究军事哲学思想史可以对提高军人的科学思维能力与水平,产生积极的影响,既有助于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军事观念,从理论上、知识上、方法上丰富创造性的思维活动,又可以为革新军人的思维方式提供历史的经验。再次,坚持古为今用地研究军事哲学思想史,可以获得许多有价值的一般性结论,从而更自觉地指导各项军事活动,不仅能为当前的军事活动提供理性思考的指导,直接为现实军事斗争服务,而且通过揭示军事发展变化的规律,还可有助于科学地预见未来的军事世界。最后,军事哲学思想史作为军事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与哲学、哲学思想史、历史学等又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其成果有利于充实和丰富各门相关学科,促进了这些学科的发展。

军事哲学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趋势 军事哲学思想史这门既古老而又新颖的学科,从当前的情况来看,未来可能的研究发展趋势是:①对各个国家、民族、地区的军事哲学思想史与某一历史时期的世界军事哲学思想史,诸如中国军事哲学思想史、欧洲军事哲学思想史、阿拉伯民族军事哲学思想史、古代军事哲学思想史、近代军事哲学思想史、现代军事哲学思想史等,进行更深入、更细致的研究。②关于军事哲学思想历史发展的特点与规律的研究,将对各具体国家、民族或地区的军事哲学思想史发展的特点与规律进行具体总结,以及对整个世界军事哲学思想史发展的规律进行再研究。在此过程中,还将从各种不同角度或根据不同需要,对各个国家、民族、地区军事哲学思想史发展的特点进行比较研究,以得出各种可供当今人们借鉴、参考的结论。无论是从哪个方向深化军事哲学思想史研究,继续强调与实现研究的目的始终要为现实与未来军事实践活动服务,将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参考文献

林伯野主编:《军事辩证法思想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

陈鸿猷主编:《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

张俊波主编:《中西军事哲学比较研究》,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

梁必骏主编:《军事哲学》,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

(梁必骏)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研究 (study of China's ancient military thought)

探讨先秦至清前期军事思想的活动。它以中国历代兵学理论、兵家流派、兵书、兵论

及战争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军事思想观念为研究对象,是中国古代优秀军事文化遗产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斗争智慧和现实借鉴价值。

研究概况 20世纪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研究大体可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20世纪初至70年代末的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研究 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此前数十年间,除了对《孙子》的研究比较重视,并投入了较多的精力以外,对其他兵书、人物兵论及战略战术思想多限于个别的探讨,系统、全面的研究工作尚未展开。20世纪初至70年代末,学术界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研究成绩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①对古代兵书和兵论资料的编辑整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既集中体现在卷帙浩繁的兵书之中,也体现在历史人物的有关言论以及人们在战争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作战指导和治兵思想之中。有关材料的搜集整理是进行研究的必备前提。从20世纪初开始,系统地整理出版古兵书一直是学术界的一项重要任务,陈毅夫编《中国古代军事学》(南京:军用图书社,1935)收录了《握奇经》、《六韬》、《三略》、《孙子》等11部久享盛名的兵书,鲁元选辑《中国十大家兵书》(1938)收录了从《孙子》到《戚少保治兵语录》等十部兵书名著。一些从未刊刻、鲜为人知的兵学著作,如无名氏的《三十六计》秘本兵法(成都:瑞琴楼刊,1941)、魏禧的《兵迹》(南昌:豫章丛书编刻局刊,1915)等也被人发现并刊印出来。有的人还做了大量的资料爬梳工作,将历代名将名贤论兵语录汇集成册。宣永光编《治兵箴言》(北平:武学书局,1929)、刘千俊编《历代名贤经武粹语》(金华:正中书局,1941)即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作品。在校勘整理古兵书的同时,人们很注意对它们的白话翻译,出版了一大批可读性

较强的普及类作品。陆达节编《中国兵学现存书目》(广州珠海大学,1949)则首次对中国古代兵书状况进行了初步调查,著录历代兵书书目近500种(包括现存的和存目的)。中国共产党人即使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岁月里,仍十分重视承继和研究这份“珍贵的遗产”。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八路军军政杂志社于1942~1947年先后出版了《吴子》、《司马法》、《六韬》、《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白话译解)孙子兵法》等兵书。②对一些著名将帅的军事思想、兵书及战例战法的初步研究。这期间发表的一些学术论文对白起、诸葛亮等著名将帅,《吴子》、《尉缭子》等著名兵书和一些战例进行了较深入的剖析。如刘国钧《曹操与其时代之思想》(《斯文》第1卷第3期,1940年11月)、史久光《关于诸葛亮〈心书〉之研究》(《新中国》1945年第3、4、5期)、任济民《刘裕之用兵与其勋业》(《怒潮》第16期)。中国共产党的著名军事史研究专家郭化若也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相继发表了《赤壁之役及其对民族抗战的启示》、《齐燕即墨之战的初步研究》、《淝水之战初探》、《孔明兵法的初步研究》等一批既研究古代兵法,又对抗日战争的现实斗争有借鉴意义的文章。③对农民战争战略思想的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把对农民战争的研究作为史学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学术界也在这方面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发表了一些研究论著。如漆侠等著《秦汉农民战争史》(1962)在叙述这场战争的过程中,对农民军的战略方针进行了归纳总结。军人出身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白天四易其稿,写出了1万余言的《唐末农民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其他一些学者也对历代农民战争的战略意图、战略方向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撰写出一批颇有见地的学术文章。④对军事哲学的研究。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史

久光《军事哲学札记》(世界兵学社,1946)。该书对中国传统武德和从孔子、孟子到曾国藩、胡林翼等历代儒家名臣的思想分别予以介绍,尽管有些内容并不涉及战争领域里的一些根本问题,有些内容只是一般的用兵治军理论,无法上升到军事哲学的高度来认识,但作为勾画中国军事哲学发展线索的一次尝试,其意义还是不可否认的。

80年代至世纪末的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研究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研究出现了令人兴奋的好形势。其特点是:①研究气氛空前活跃。不仅国家有关部门和各研究机构十分重视古代兵学典籍的整理和研究,而且随着“谋略热”和“兵法热”的出现,社会各界和出版行业都对这一优秀的传统文化遗产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经国务院批准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中,兵书的整理占有重要地位。解放军出版社和辽沈书社联合出版的《中国兵书集成》多达50巨册,历代最重要的兵书、最珍贵的版本基本囊括其中,给广大兵书研究者提供了难得的资料条件。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兵法通俗读物》丛书、《中国古代兵法译丛》丛书,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军事著述选读》丛书等不仅进一步推动了对兵书的深入研究,还较好地适应了广大兵法爱好者阅读的需要。已经出版的权威性辞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对70余部兵书设立条目,进行介绍,则是对学术界近年来有关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与此同时,一些研究机构也将多年精心编撰的学术巨著陆续推出。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军事科学院编写的3册《中国古代战争战例选编》(1982)、《中国古代兵法精粹类编》(1988)、20册《中国军事通史》(1998)以及由原南京军事学院史料处发其端,由郭汝瑰等人最后

编成的多卷本《中国军事史》(80年代陆续出版)等。这些著作除了用相当的篇幅介绍历代兵书之外,还系统阐述了著名人物、学派的军事思想及战略战术思想,给读者提供了十分丰富的知识内容。②研究领域不断拓展。近年来学术界改变了以往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研究自我局限的状况,由只重视《武经七书》等少数著名兵书的研究,发展为对从先秦至清前期历代重要军事著述的研究;从只重视少数著名将帅和兵学家的研究,发展为对广大有独特见解的文臣武将,甚至包括从未亲临沙场的文人思想家的研究;由原先对兵书的个案研究,发展为对整个古典兵学文化的深入研究;由仅限于中国古代兵学的研究,发展为对中西方军事思想进行比较研究;由对古代军事思想的断代研究,发展为按专题对军事思想某方面的纵向研究;等等。《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中国历代军事思想分册》,许保林、王显臣著《中国古代兵书杂谈》(1983),张俊波主编的《中西军事哲学比较研究》(1993)、王联斌著《中国武德通史》(1998)以及由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推出的《中国军事文化纵横》丛书即是在转换研究视角后学者们奉献出的新成果,同时报刊上还发表了一大批有关中国历史上的军事管理思想、军事后勤思想、军事经济学说及地缘战略等专题研究方面的论文。③研究内容更加深入。学者们结合当时的社会思潮与作战样式对有关兵书和人物的军事思想进行深层次的剖析,对兵学思想的承传、传统文化与兵学的相互影响、兵家内部的学派分野、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线索以及兵学范畴的演变等许多重要学术问题都发表了独到的见解,从而有助于从更宏观的角度理解和把握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重要学术观点与学术争论 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研究过程中,学术界对一些值得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虽然意

见多有分歧,但对问题的深入研讨和学术视野的拓展却是很有益处的。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发展基本线索研究由于以往较注重对著名兵书和人物的个案研究,对《孙子》自身兵学体系的归纳,很少将众多兵书、人物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特别是缺少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发展线索的梳理。进入90年代以后,学术界加大了对这一问题的研讨力度。《中国军事通史·总序》将古代军事思想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即先秦军事思想、秦汉至隋唐五代军事思想、北宋至清前期军事思想。刘庆在《中国古代兵学发展的三个阶段与三次高潮》(载《军事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一文则将古代兵学分为三个大的阶段,一是先秦至西汉,古代兵学体系基本形成,并在战国中后期出现发展高潮;二是东汉至宋元,古代兵学内容更加充实丰富,在宋代形成高潮;三是明初至19世纪60年代,发展高潮在明中后期。宫玉振、赵海军著《书剑飘逸》(1999)也分别以《孙子》、《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和《曾胡治兵语录》三部兵书为标志,提出“兵学三结”之说,认为《孙子》是总结,《问对》是小结,《曾胡》是终结。虽然人们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发展线索的研讨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如何打破王朝体系和断代史研究的框子,真正从其自身的发展逻辑出发来明晰古代兵学的演变脉络,无疑是今后值得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关于中国古代兵书研究 对《孙子》以外其他兵书的研究,近年来也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各种兵书研究专著相继出版,以往鲜为人知的兵书内容被介绍给读者,一些学者开始着手归纳和揭示不同历史时期兵书发展的趋势和特点,预示着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重要载体——兵书研究正在向着系统化的方向发展。

关于《吴子》的作者和成书年代问题

《吴子》在历史上曾与《孙子》齐名,对其作者和成书年代的争论由来已久。目前主要有四种说法,一是战国吴起著;二是吴起门人或幕僚辑录吴起言论而成书;三是战国时人缀拾成篇;四是后人伪托甚至杂抄而成之“伪书”。李硕之、王式金《吴子浅说》(1986)考证认为,该书作者就是吴起,但也不排除后人文字窜入的可能性。对该书的内容,孙开泰《吴起的军事思想》(载《历史教学》1985年第9期)概括为进步的战争观、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的战略战术思想。钱庆平《吴子和〈吴子兵法〉》(载《国防大学学报》1988年增刊)认为,该书主要包括政略和战略相结合的战争观、教战和励士结合的治军论,一般打法和特殊打法结合的用兵论三部分。

关于《司马法》的真伪和思想内容问题《司马法》也是先秦流传下来的一部兵学典籍。历史上曾有人认定它是后人托名的“伪书”。蓝永蔚《〈司马法〉书考》(载《春秋时期的步兵》,1983)从今本《司马法》的书名、内容、历代引文和哲学思想源流等方面考察它与汉代本《司马法》的关系,得出今本就是汉代残篇的结论。田旭东《关于〈司马法〉的几个问题》(载《西北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又从今本《司马法》与《周礼》在军制、军赋等方面的一致性,在论据上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对该书的思想内容,王中兴《司马法及其轻重说》(载《漫话中国古代军事》)概括为“以战去战”的战争观,“以仁为本”的治军思想和“变嫌摧疑”的战备思想,并认为其哲学的核心是“轻重说”。徐勇、黄朴民《略论〈司马法〉的军事思想和历史地位》(载《学术研究》1998年第5期)将该书置于古代兵学发展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并与《左传》、《国语》等文献相印证,认为书中最珍贵的是原古者“司马兵法”所保留的部分春秋中期以前的军事制度和思想。该内

容为研究先秦齐国军事思想的逻辑发展提供了材料。至于《司马法》的军事思想,该文归纳为8个方面,即以仁为本、以义治之的战争观,既致力于避免战争,又肯定正义战争,慎战备战并重的国防思想;把握军队自身规律,严格区分治军与治国差异的治军思想;相为轻重的用兵方略;智、勇、巧相结合的作战思想;以六德为核心的军事教育思想;注意改良武器装备的思想;丰富的古军礼内容等。

关于《孙臆兵法》的编成和思想内容问题《孙臆兵法》失传甚久。1972年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孙臆兵法》,在学术界引起轰动,也使此书一度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对一些相关问题展开热烈讨论。关于竹简中哪些部分属于《孙臆兵法》这一问题,最早是张震泽在《孙臆兵法校理·例言》中提出的。他认为竹简整理小组公布的1975年版《孙臆兵法》中,下编15篇因无“孙子曰”、“威王问”字样,似非孙臆之书。竹简整理小组的专家们最终同意了这一观点,故在《孙臆兵法》1985年版出版时将下编15篇移出,不再视为孙臆之书,并在上编中增加《五教法》一篇。但对这种处理办法,仍有一些学者表示异议,有人说下编似孙臆后学对《孙臆兵法》阐释之作,乃属该书的组成部分。对《孙臆兵法》的军事思想,霍印章在《孙臆兵法浅说》(1986)中作了概括,认为它包括“战胜而强立”的战争观、“必攻不守”的积极战略、巧妙造势的灵活战术、以人为本的治军原则和以“道”制胜的军事哲学思想。至于书中所提出的“必攻不守”思想,学者们分歧较大,《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孙臆兵法》(1985)解释为强调进攻的思想;霍印章认为是攻敌所不守的战略指导思想;许保林《孙臆和〈孙臆兵法〉》(载《军事历史》1986年第2期)认为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战术思想。

关于《尉缭子》的真伪和作者问题《尉

繆子》在《汉书·艺文志》中就著录有兵家和杂家两种，南宋时陈振孙怀疑传本《尉繚子》为伪书，后世学者多袭其说。自1972年银雀山汉墓出土《尉繚子》残简后，伪书之说遂废，但对今本《尉繚子》作者为谁仍意见很不统一。何法周的《〈尉繚子〉初探》（载《文物》1977年第2期）认为，该书作者是秦始皇时期的尉繚，而杂家《尉繚》与兵家《尉繚》本是一著作，被班固误认为两本书了。龚留柱的《〈尉繚子〉考辨》（载《河南师大学报》1983年第4期）认为，该书作者为战国中期梁惠王时之尉繚，今本《尉繚子》前12篇基本属于杂家《尉繚》的内容，后12篇应为原兵家《尉繚》的内容。徐勇的《〈尉繚子〉成书、著录及其相关问题》（载《中国哲学史研究》1989年第2期）则认为，梁惠王时的尉繚和由大梁来秦国的尉繚本是一个人。对于《尉繚子》的理论贡献，刘先廷的《〈尉繚子〉对古代军事哲学的贡献》（载《漫话中国古代军事》）一文认为，它的一个贡献是突出了对兵阴阳家迷信占验的批判，维护了军事唯物主义传统；另一个贡献是先于荀子对百家争鸣进行了初步综合。

关于《六韬》的作者、成书年代和思想内容问题 《六韬》的作者和成书年代也是个争论不休的老问题。过去，人们大都以为它是后世伪作。银雀山汉墓竹简出土《六韬》残简后，证明它在汉初即已流传，但究竟成书于何时，作者又是谁，学者们的看法并不一致。张烈《〈六韬〉的成书及其内容》（载《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认为，作者是秦始皇时期某位在野人士所作；刘宏章《〈六韬〉初探》（载《中国哲学史研究》1985年第2期）提出，是战国时期通姜氏之学者述旧闻而著于竹帛，时间大约稍早于公元前4世纪；陈青荣《〈六韬〉书名含义及时代信息》（载《姜太公与齐国军事文化》，1997）则认为它成书于春秋时代。

张林川《〈六韬〉的作者及其流传考》（载《文献》1998年第3期）认为，它最初只是《周书》的篇名，经后人逐渐增补，最后成书当在西汉初年。但目前学术界多数人都将它归于战国末期无名氏的作品，刘庆《先秦齐国兵学的产生与发展》（载《管子学刊》1994年第3期）进一步推测，它可能是当时齐国一个推崇姜尚的兵学流派的思想纪录。关于其思想内容，孔德骥《六韬浅说》（1987）指出它在战争观上主张“禁暴乱，止奢侈”，重视战争的物质和精神准备；在军队建设上，对司令部组织机构、训练和选将等方面，有许多创见；在战略战术上，强调估量战略形势，选择战略时机，坚持全胜原则，主张灵活用兵、速战速决以及各兵种配合作战等。吴如嵩《论〈六韬〉的军事思想》（载《兵家史苑》第1辑）则将其分为民本主义和主张义战的战争观，“全胜”战略和以进攻为主的军事战略论，以运动战为主要特色的战斗论，包括战斗保障勤务和指挥保障勤务的战场勤务论，强调“勇智仁信忠”将帅条件的治军论等几个方面，分别予以详细论说。张文儒《论〈六韬〉之道》（载《中国军事科学》1998年第3期）则指出，《六韬》军事思想的核心是“道”，是从兵学角度对老子思想的进一步阐发。

关于《黄石公三略》的成书时间和思想内容问题 对《黄石公三略》的成书时间，一向有先秦、秦代、楚汉、两晋南北朝诸说。许保林《黄石公三略浅说》（1986）从思想体系、语言特点、史籍记载、考古发掘等方面进行了考证，提出了成书于西汉末年的新说法。他还将该书内容划分为以收揽人心为核心内容的政治战略，以控制战略要地为主要特色的军事战略，恩威兼施、赏罚必信、将士并重、任人唯贤、因才而用的治军思想，以及在论述士与民、将与众、德与威、仁与法、柔与刚、强与弱等关系上表现出的辩证法思想等。

关于《李卫公问对》的作者问题 《李卫公问对》是宋朝官定《武经七书》之一,但在宋代已有人对它的作者提出疑问。目前大致有3种看法,一是蓝永蔚《〈李靖问对〉伪辨》(载《春秋时期的步兵》)一文看法,认为它是一部与李靖及《卫公兵法》都没有瓜葛的军事著作,系宋人阮逸所撰;二是孙公达《〈李卫公问对〉的由来》(载《军事卷通讯》)的看法,认为它是唐中后期的作品,黄朴民从书中安西都护府等机构设置时间考证,也认为当是唐后期某不知名者所撰;三是吴如嵩、王显臣《李卫公问对校注》(1983)中的意见,即认为它是唐太宗与李靖讨论军事问题的认识论辑录,经后人整理成书。

关于其他著名兵书的有关问题 除了上述著名兵书外,学术界还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一些过去不太受人重视的兵书,订正了一些沿袭已久的错误。如张文才《百战奇法浅说》(1987)考证,以往托名明代刘基所撰《百战奇略》实为北宋末年的作品,书名为《百战奇法》,作者已不可考。面胡大海《百战奇略辨伪》(载《浙江学刊》1985年第5期)则认为是清初避洗道人的托名伪书。再如明代的《筹海图编》,署名为胡宗宪撰,但经近年来学术界的研究,普遍认为其真正作者是郑若曾;对该书的海防思想价值,范中义《筹海图编浅说》(1988)做了较深入的发掘,将其概括为御海洋、固海岸、严城守三方面密切结合的积极防御思想。对托名于年羹尧的所谓《年大将军兵法》,邱心田指出系由明代兵书《登坛必究》改头换面而成,是清初查禁明代兵书情形下的特殊产物。对古代兵书做了深入细致研究的还有兰书臣《华岳〈翠微北征录〉考索》(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该文充分肯定了它的战略战术主张和军事条文的价值,指出该书紧紧围绕南宋抗金斗争实际来立论,对当时的

军队建设和抗金作战有积极的指导意义。此外,毛元佑的《〈虎铃经〉简论》(载《兵家史苑》第2辑)、廖德清《中国古兵书〈登坛必究〉述评》(《兵家史苑》第3辑)等,也把研究的目光投向以往人们较少注意到的兵书身上。对古代兵书的较全面研究,当推《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中国历代军事思想分册》,书中收入70余部兵书的条目,对每部兵书的作者、成书年代、版本沿革及思想内容都有较全面、权威的介绍。对古代兵书目录的研究,则以刘申宁《中国兵书总目》、许保林《中国兵书知见录》用力最勤,前者著录兵书数目达4221种之多。但两书皆存在将同书异名者和同一书的不同版本一一著录的情况,对翻译的西方兵书也不加区别予以收入,给人们了解中国兵书的实际状况带来一定的困难,所以需要学术界在对这些兵书仔细考订的基础上,进行一番认真梳理。

关于非兵书典籍的军事思想问题 言兵者不止兵书。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文人论兵”的传统,浩如烟海的古代著作、文集中保留了大量武将文臣的论兵篇章。近年来,学术界开始注意加强对这些典籍中军事思想的研究。一方面,对非兵书典籍中论兵言论的整理工作已次第展开,牛鸿恩、邱少华编《先秦诸子军事论译注》(1985)、《先秦经史军事论译注》(1987),吴如嵩主编《中国古代兵法精粹类编》(1988),王雅轩主编《中国历代百家论后勤》(1986),总政办公厅编研室编《中国历代军队政治工作资料类编》(1990)等,是人们搜集整理有关资料的初步成果。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对非兵书典籍的研究也颇见成效,尤其是对《管子》、《墨子》和《蒙古秘史》等几部著作进行了较深入的讨论。《管子》一书历史上一直托名于春秋时代名相管仲,近人认为它实为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派著作的汇集。袁德金《稷下兵家及其哲学思想初探》

(载《中国哲学史研究》1988年第2期)、《〈管子〉军事思想初探》(《军事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中,对其军事思想进行了分析,认为该书既把战争看成是“辅王成霸”、“尊主安国之径”,又看到了战争“贫民伤财”、“危国忧主”之“四患”,因此主张既不废兵,又不要轻起战端。在军队建设上强调武器精良,“因便而教”,并规定了军事训练的具体内容。在作战指导上,提出了“计必先定”、“遍知天下”、“释坚而攻虚”等作战原则。于汝波、刘庆《〈管子〉的国防思想》(载《管子与齐文化》,1990)中,从更广泛的国防思想的角度,将有关内容归纳为“以人为本”的国防观、“富国强兵”的国防建设思想、“教盖天下”的国防教育思想、严“制”明“计”的国防管理思想、“全胜”“必胜”的国防斗争策略。对《墨子》城守诸篇的成书时间,有秦代说、战国后期的秦国说、汉人作品说等不同看法。近年来学术界更重视对其思想内容的探索。比如岑仲勉《墨子城守诸篇简注》(1987)认为,该书讲究抗敌方法,注重军事技术,但谈用兵方略的话不是很多。而杨一民等《〈墨子〉城守诸篇的防御思想》(载《军事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则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它不但对城守战术有许多系统的论述,而且对整个防御战略也有不少精辟的见解,包括官民和睦是胜利的保障,要善于物色优秀的守城人才,赏罚分明,不能消极被动防守,要积极主动等。对中国蒙古民族13世纪中叶流传下来的珍贵典籍《蒙古秘史》军事思想的探讨也在近年陆续展开。赵智奎《〈蒙古秘史〉军事思想初探》(载《内蒙古师大学报》1985年第1期)等文章指出,这是一部“对成吉思汗、斡歌歹(又译窝阔台)汗统治阶级用战争手段变革整个社会的忠实纪录”,书中包含着各个击破、远交近攻、先取四周、再取中部的战

略思想,迂回、奇袭、合围、诱伏、穷追猛打、布疑等战术思想以及独特的军制、军法、军纪,其中闪烁着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的光辉。苏文聪《〈周易·师卦〉与西周军旅之学》(载《军事历史研究》1991年第3期)、林国良《〈鬼谷子〉与权变思想》(载《文汇报》1992年8月26日)也都就其中的军事思想精华做了有益的梳理和总结。

中国历代人物的军事思想研究 学术界对中国历代人物军事思想的研究,首先关注的是那些有军事经历和言论的名人,如曹操、诸葛亮、唐太宗等人。历年来出版的军事人物传记多以他们为传主,传记中不乏反映其军事思想的内容。《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也收录了数十位古代著名将帅军事思想的条目。但对他们在军事思想上的贡献,学术界见仁见智,意见不一,有的人物还引起了学术界的争论。

曹操的军事思想研究 曹操作为三国分立时期的重要人物,过去学术界普遍肯定他的武功和注《孙子》的工作。如任昭坤《曹操》(1990)一书将其《孙子》注中的思想概括为以道御战的战争观、任势制胜的诡诈论、厉行法治和破格拔擢人才的治军思想,并称他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吴荣政《关于曹操军事才能的评价问题》(载《湘潭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却提出了新看法。他说曹操指挥的对统一全局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战争,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汉中之战,只有官渡之战获得胜利,其余二战都以失败告终。曹操注释《孙子》虽有贡献,的确充实了我国古代军事理论宝库,却不能以理论指导实践。

诸葛亮的军事思想研究 对三国分立时期的另一重要人物诸葛亮,学术界也有截然相反的不同评价。张景荣等《诸葛亮〈隆中对〉的战略思想及其他》(载《军事历史》1987年第5期)肯定《隆中对》是一个既符合当时实际,又富有远见的战略方针;赵昆生《试析

诸葛亮研究中的几个疑题》(载《重庆师院学报》1988年第2期)也解释说,诸葛亮不能阻止刘备伐吴,乃是因为刘备入蜀后入路路线发生了变化,一意孤行的结果。郑广南《诸葛亮在军事上的贡献》(载《南充师院学报》1985年第4期)也与上述意见相同。该文还肯定了诸葛亮八阵图及重视发明兵器和其他军事装备的价值,说它们对后世都有深远的影响。与之持完全相反观点的张国光则认为,诸葛亮是一个被神格化了的平庸的人,一个好秘书长,而非好参谋长。他提出“三分天下”是非常保守的战略;赤壁之战主要的功劳应记在周瑜身上;夷陵之战,他没有劝阻刘备连营几百里;兴师北伐则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不可避免地要失败(《湖北学术界提出应重新评价诸葛亮》,《军事历史》1988年第6期)。

岳飞的军事思想研究 对抗金名将岳飞,邓广铭《岳飞传》(增订本,1983)等多从作战指挥和治兵思想方面予以肯定。毛元佑《岳飞“反攻中原”战略述评》(载《军事历史研究》1992年第1期)则说他善谋,主要体现在战争最高层次的战略谋划上。为了收复中原,他编组了一支骑兵、步兵和水军诸军兵种齐全的精锐力量,在襄阳六郡建立战略基地,正确判断战略形势,采取从南向北逐次推进,扫荡开封外围敌军,进克开封,渡河收复河北失地,然后直捣黄龙的战略步骤。在郾城、颍昌战略决战后,又及时进行战略追击,扩张战果。虽然由于南宋朝廷的腐败,他的战略谋划未能最终实现,但并不因此影响他作为一个战略家的历史地位。

戚继光的军事思想研究 对戚继光在军事思想上的贡献,朱清泽、童来喜的《论戚继光的军事思想》(载《军事历史》1988年第1期)中,概括为治军之道——训练节制之师,育将之道——德、才、艺、识四者兼备,战争之

道——因敌而制胜。刘重日也表示要《全面评价戚继光的文韬武略》(载《军事史林》1988年第2期),认为其在治军和用兵上的创新有:“兵戎以鼓舞为先”,不单靠赏罚;禁止妄杀;严明军纪与体恤士卒相结合,重视将帅的表率作用。范中义《戚继光建军思想初探》(载《军事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中,对戚继光的建军思想作了专门的研讨,说他强调实行严密的、与战术相适应的组织编制;从实战出发进行号令、纪律、技术、战术和思想训练;重视武器装备的先进性和科学运用;阐述了人与武器、练将与练兵、将德与将才、练胆与练艺的辩证关系,从而形成了关于军队建设系统完整的思想体系。

郑成功和康熙的军事思想研究 对郑成功和康熙这两个生活在不同时代的著名军事家,因他们都曾收复台湾,因此,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学术界对其战略思想屡有述评。邓孔昭《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战略运筹》,任力、吴如嵩《清朝政府统一台湾的战略与策略》(均载《中国军事科学》1996年第2期)两文认为,郑成功攻台前麻痹敌人,储备粮草,修整船只,选择荷军无法得到增援的时机,集中十倍于敌的兵力,并在外交上孤立对手,最终才会使荷兰殖民者退出台湾岛。康熙收复台湾的主要策略有四:一是寻求政治解决的和谈策略,二是分化瓦解台湾郑氏集团的招降策略,三是禁海迁界的经济封锁策略,四是“因剿寓抚”,统一台湾的军事策略。

伊尹的军事思想研究 对古代著名的政治家伊尹,陈其钧、颜剑挥《浅论伊尹的军事思想》(载《军事历史研究》1992年第2期)认为他也是中国军事史上确有记载的第一位军事家。其军事思想包括择明主而事的政治准则;“视民知治否”的重民思想;重视战略侦察,不求神问卜的朴素唯物论思想;慎于决战的谋略战法等等。

姜尚的军事思想研究 姜尚,即民间百姓十分熟悉的姜太公。他曾辅佐周武王灭商,立下赫赫战功。司马迁将他尊奉为权谋思想的鼻祖。但因年代久远,史料鲜少,以往归于其名下的《六韬》一书,学术界又多以为是后世伪托,所以研究其军事思想的文章较少见。近年来齐国故里淄博市多次组织学术活动,会后出版的《姜太公新论》(1993)和《姜太公与齐国军事文化》(1997)两部文集中,收录了多篇有关姜太公军事思想的文章。惟文中多不加论证即把《六韬》看成是姜太公的作品,不免降低了论文的学术价值。其中使用学术界公认的史料研究姜尚的军事思想特点的文章,如徐勇的《兵家始祖 谋略化身》等,还是值得一读的。

伍子胥的军事思想研究 80年代出土的竹简《盖庐》,据介绍是与孙子处于同一时代的伍子胥与吴王问对形式的兵书,惜至今仍未整理发表出来,这就给研究带来很大的不便。尽管如此,徐勇、黄朴民《伍子胥军事思想述略》(载《孙子学刊》1992年第1期)仍依靠现有史料对伍子胥的军事思想做了概括,说他帮助吴王制定“西破强楚”的战略方针并非完全为了报私仇,而是吴国争霸中原的一个重要战略步骤。伍子胥“安君治民”的战略措施,“疲楚误楚”的策略方针,“投间误敌”的用间艺术,声东击西、避实击虚的作战指导,尽敌为上、连续进攻的进攻原则以及“器械为宝”、计划周详、注重实际的用兵技巧等,都有一定的思想价值。

范蠡的军事思想研究 范蠡是与孙武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人,其军事活动也都集中在吴越地区,薛国安《范蠡与孙武战略思想的比较》(载《中国军事科学》1994年第2期)认为这些原因决定二者思想上必然有相同的一面,也有相异的一面,而且往往异大于同。如孙武强调进攻速决,以刚克柔,威

慑制敌,不战而屈人之兵,总之是倾向于进攻;范蠡偏重于持久防御,强调以柔克刚,主张避敌锋芒,后发制人,总之是倾向于积极防御。他们分别揭示出战略进攻和积极防御的一般规律和基本原则,共同完善了先秦时期的战略思想。

成吉思汗的军事思想研究 有关蒙古族军事统帅成吉思汗的直接语言材料虽然不多,但研究者还是对这位立下过赫赫战功的军事家给予特别的关注。内蒙古地区学术界曾多次举办研讨会,集中讨论了成吉思汗的军事思想,达林太《蒙古兵学研究——兼论成吉思汗用兵之迹》(1990)一书中也以主要篇幅论述了成吉思汗在军事学上的杰出贡献,认为他具有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主要表现是:在处理军事与经济的关系上,根据自身民族特点,组建了强大的骑兵;在处理军事与政治的关系上善于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交替使用和平与非和平斗争手段;在武装力量建设上,既灌输“忠汗”思想,又能妥善处理内部矛盾,既抓将士教养,又求武器精良;在作战指导上,“以聚攻散”是其战略战术核心,打歼灭战、闪击战和运动战,宽正面进攻,无后方作战是其特色。

孔子的军事思想研究 对于古代大思想家孔子,郝云虹《孔子是我国最早的军事教育家》(载《军事教育》1987年第9期)认为,孔子堪称中国最早的军事教育家,他用以教人的“六艺”至少有一半属于军事教育的内容,他还有明确的重武备、慎用兵和禁暴除害的军事思想,并首创了智、仁、勇的军事教育方针。郝玉庆《孔子的军事活动及其国防思想》(载《军事历史》1987年第3期)认为,孔子有自己的国防思想,其表现是:提出了发展经济、充实国力、加强国家防卫能力的国防基本政策和原则;主张实行文武兼修,政略战略合一的国防规划;强调“兵民相洽、兵坚民固”的

国防观念。其国防思想的理论基础是爱民教战,倚民养兵。黄朴民《孔子军事思想简议》(载《军事历史》1996年第1期)将孔子的军事思想概括为:取信于民的思想;“执干戈以卫社稷”的义战立场;文武并举的国防建设思想;以礼为准的治军主张;临事而惧的作战原则等。该文还指出,作为儒家学说重要组成部分的孔子军事思想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产生过很大影响,也在古代经国治军实践中发挥过重大作用,有合理的思想内核,也不可避免带有封建性糟粕。

晁错的军事思想研究 杨一民在《略论晁错的军事思想》(载《军事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中称晁错为儒法兼通的兵家,有独特的军事思想。他所提出的徙民塞下的战略防御思想,所实行的在边塞建居民点,兵农合一,修筑“高城深堑”等防御设施,讲究城守战术,以夷制夷,以长克短等,都是很有见地的思想。

杜牧的军事思想研究 在军事思想研究者眼里,以诗人扬名的杜牧,其言论中也不乏军事思想的内容。程刚《略论杜牧的军事思想》(载《军事历史研究》1988年第1期)在研究了杜氏的材料之后指出,杜牧提倡“智为始、仁次之、勇次之”的将帅标准,强调治军的严肃性,主张对割据藩镇“裁其欲而塞其争”,都是基于当时的客观环境和对安史之乱的教训而得出来的,充分显示出其军事思想“经邦济世”的宗旨。

范仲淹的军事思想研究 张富祥在《范仲淹军事思想初探》(载《兵家史苑》第3辑)中,重点就范仲淹的治边战略思想进行了分析。他说,范仲淹不仅是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和出色的文学家,同时也具有丰富的军事思想。他在防御边疆少数民族侵扰时,主张任用土兵,羁縻诸羌,战和相济,持久、稳妥、积极、灵活地进行战略防御,尧则取其近,守则图其

久,而不是贸然进攻,这些思想符合宋朝的军事情况。

王安石的军事思想研究 张富祥《王安石的军事思想》(载《军事历史研究》1991年第3期)中认为,王安石除了进行军事改革外,为改变宋朝长期不能最终制服西夏和辽的被动局面,提出从易处着手,断契丹、党项之右臂,逐渐将其制服的长远设想,以及静重待敌、寻机而动,反对轻举进攻,整编军队、改善武器,逐步改变募兵制、向兵农合一的征兵制过渡的主张,都是有积极意义的。从对古代军事改革思想总结的角度,王瑞明在《王安石的军事改革思想》(载《军事历史》1988年第6期)中指出,王安石的军事改革是紧紧围绕着富国强兵这一中心,紧密联系政治、经济诸环节展开的;王安石所提出的大力更新朝廷内部守内虚外、重内轻外的传统观念,把整军与理财结合起来,以富促强,选贤任能,以保障改革的顺利进行等主张,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徐光启的军事思想研究 在明朝末年,积极接受西方思想,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徐光启在军事上也颇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朱佩明《论徐光启的军事思想》(载《兵家史苑》第1辑)认为,徐光启以富国强兵为宗旨的军事思想体系包括下面几部分:在建军思想方面主张进行军事改革,提出了设险阻、整车马、备器械、选将帅、练戎卒、严节制、信赏罚(后来又把习火器放在第一位)等措施;在战略上,根据明军在辽东作战的实际情况提出先求我可以守,次求我可以战,再求我可以大战的战略方针。强调战略防御要重点防守影响全局的地区。在战术上,强调火器的使用,重视改进和发展先进城台设施和火器。

断代兵学思想研究 对断代兵学的研究,多集中于《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的有关条目和《中国军事通史》的有关章节里。同时,傅

平安、丁地树《试论商和西周时期的战略战术思想》(载《史学月刊》1981年第5期)、谢国良《魏晋南北朝隋唐军事思想述略》(载《烟台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刘庆《辽金军事思想探微》(载《辽金史论集》第5辑)等文章也相继发表,其中一些研究成果为从宏观上把握中国军事思想走向提供了帮助。

兵学流派研究 关于兵家内部的学派分野问题,历史上就有“三门四种”之说,近年来学术界对兵形势、兵阴阳都有文字涉及,如李零主编《中国兵书名著今译》(1992)将《地典》、《黄帝阴符经》和《太白阴经》都归到这一类下,田旭东《兵阴阳家初探》(载《孙子兵法及其现代价值》,1999)对历史上兵阴阳家著述钩沉索隐,初步显露出其概况。吴如嵩为徐勇《尉缭子浅说》撰写的序言,对《尉缭子》的兵形势特色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对先秦地域性兵学流派的研究也有所进展。在齐文化研究的热潮中,人们对齐国兵学也倾注了很大的学术热情,有的学者论述了《孙子》、《六韬》和《管子》等名著与齐国兵学的关系,并对齐国兵学的演变历史、齐国兵学的基本特征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一先秦兵学中最重要地域性流派有着兼收并蓄的学术态度、历史悠久的兵学传统、求实和创新精神、成熟完备的理论体系,这是它能够在中国兵学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重要原因。还有文章对楚、吴、越等国在春秋战国时期所形成的地域性兵学流派,深受道家 and 阴阳家思想影响的南方兵学进行了分析。惜这类研究的涵盖面大,可供研究的参考文章数量有限,不能不影响到这一领域的整体研究水平。

兵学范畴研究 对兵学范畴的研究,源于对古代兵法注释的需要。但近年来研究发现,兵学范畴在构建古代兵学体系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从传统兵学范畴而不是

从近代西方军事理论框架和军语出发,能够更好地阐释古代军事思想。因此,一些研究文章试图从解说兵学范畴入手,进而说明古兵书中的军事观点。吴如嵩《“虚实”探析》(载《军事史林》1988年第3期)、薛国安《范蠡与孙武战略思想的比较研究》等都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孙子兵法辞典》、《诸子百家大辞典·兵家》分别对十多个或几十个兵学范畴做了解释。对兵学范畴的演变进行纵向研究的则有刘庆《〈孙子〉兵学范畴的历史考察》(载《孙子探胜》,1992)一文。

军事文化研究 中国古代军事文化,既表现为传统文化对军事的影响,也表现为军事自身的文化积淀和文化传统的延续。对前者的研究,近年来有黄朴民的《儒家军事思想与中国古代军事文化传统》,刘庆的《道家文化对古代兵学的影响》(载《中国军事科学》1997年第4期)等文章发表,《中国军事通史》的有关章节、张文儒《中国兵学文化》(1997)第7章以及宫玉振、赵海军的《书剑飘逸》(1999)等书对此类问题也都有论及。惟其中整体概观性的研究多,深入细致的个案研究较少,不能不影响到整体研究的质量。对军事文化自身的研究和分析,目前已由概观性研究进入到个案研究的层次。这主要表现在由解放军出版社推出的《中国军事文化纵横》丛书中多有阐述,举凡古代军旅诗词中军人的精神世界、军服文化、中国古代皇权与将帅的关系、中国古兵器的历史与传统等令人感兴趣的话题都有论及。

研究展望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研究在近些年确实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急需投入更多研究精力的薄弱环节。就其大者来说,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应改变以往重微观研究,轻宏观概括的倾向,强化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发展线索的探讨,强化从其

自身的发展逻辑出发的兵学分期研究和特点研究,强化对不同兵学流派、兵学家群体的研究,强化对兵学范畴和兵学观点演变历程的研究,更多地从兵学概念的内在联系中来把握其思想内涵。二是应加强对兵书和非兵书资料的整理和研究。以往对军事思想的研究更多地依赖于兵书,今后应进一步扩大阅读范围,将众多史籍、文集中的相关资料运用到军事思想的研究中来。对古代兵书也要加强考订辨析,尽早查清中国古代兵书的数量,对这份宝贵的军事文化遗产要心里有数。三是进一步开展军事观念、传统文化对古代兵学影响方面的研究,提高古代兵学研究的层次和水平。相信在新的世纪里,随着研究方法的改进和学术水平的提高,学术界将会有一大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问世,为宏扬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发掘前人丰富的斗争智慧做出新的、有益的贡献。

(刘庆魏鸿)

《孙子》研究 (study of *Sunzi*)

探讨中国古代兵书《孙子》思想原理及其应用价值的活动。这是中国古代兵学文化研究中最重要、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研究概况 20 世纪的《孙子》研究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 世纪初至 40 年代末) 中国进入 20 世纪后,在武器装备、军队编制和作战样式等方面都发生巨大的变化,而诞生于几千年前冷兵器时代的兵书是否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对此,中国军事理论研究者大都持肯定态度。同时为了更好地发掘其千古未易的理论内涵,提出了“使孙子现代化”的口号,更重视探讨其中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思想内容。这一时期先后出版《孙子》研究著作近 80 种,论文数十篇。其著述样式和研究特

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①改变过去只注重字词校勘和章句释义的倾向,突出对其军事思想的阐述,并大量引用近、现代中外战例和西方近代军事理论加以说明。顾福棠撰《孙子集解十三卷》(清光绪二十六年刊本),蒋百里、刘邦骥撰《孙子浅说》(1915 年铅印线装本),徐庆誉《孙子兵法与现代战争》(湖南西南日报社铅印本)等皆为此类著述的代表作。②着力于揭示《孙子》的思想体系,提炼适合时代需要的战争原理、原则。萧天石著《孙子战争理论之体系》(大江出版社,成都,1942)、公羊寿撰述《孙子兵法哲理研究》(国光印书局,上海,1933)等,即是在这方面的有益尝试。③采用“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白话文和新式标点,为普及《孙子》原理创造了条件。其中以叶玉麟《白话译解孙子兵法》(广益书局,上海,1936)较为通俗,为广大士兵和普通民众所喜爱,亦开白话译解《孙子》之先河。④注重在现实军事斗争中的实际运用。在抗日战争期间出版的许多《孙子》研究著作,或者是为了激励国人誓死抗敌的士气,或者是用来具体说明日军必败的战争原理。如李则芬《以孙子兵法证明日本必败》(1936 年铅印本),运用《孙子》的原则方法分析中日双方的战场形势,认为日寇侵华从《孙子》中找不出胜利的条件,所以必败无疑。李浴日撰写的《从孙子兵法分析敌人进犯粤北的溃败》(载李浴日编《东西兵学代表作之研究》,世界兵学编译社,1943)一文,指出导致其失败的原因在于将军骄横,不知彼己,计划错误,地形困难等。⑤出现了将《孙子》的研究和应用向军事以外领域扩展的趋势。一些学者认为,该书不仅可以作为古代兵书来读,还可以作为政治哲理、治国经义、外交原则乃至为人处世之道来学习。张廷灏撰写的《从孙子兵法研究做事方法》(中周出版社,重庆,1945)就属于这类读物。⑥展

开了《孙子》与西方军事思想（尤其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比较研究。这方面研究以蒋百里的《孙子新释》（载《庸言》1914年第5号）、李浴日的《东西兵学代表作之研究》（世界兵学编译社，1943）学术价值较高。当然，这一时期《孙子》研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唯物辩证法揭示其思想原理。毛泽东早在青年时代就开始接触《孙子》，红军长征到延安以后，曾两次指示有关人员搜集该书，并进行了认真研究，其文章中多处引用孙子的话，对孙子的理论观点有深刻的理解。他还指示郭化若具体研究注释兵书，后者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写出了《孙子兵法之初步研究》（载《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卷11、12期，第2卷1期，1939年11月~1940年1月）一文，这是中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对《孙子》军事思想进行系统阐发的著作。人民解放军的其他高级将领朱德、刘伯承、叶剑英等人也都对《孙子》有深入研究。古代军事文化底蕴深厚的刘伯承元帅不仅精通《孙子》原理，且能熟练背诵其文句，还在抗日战争中运用其原则屡建奇功，创造了山西七亘村“重复设伏”的成功战例，在军事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第二阶段（40年代末至70年代末）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的《孙子》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出版了杨丙安的《孙子集校》、郭化若的《今译新编孙子兵法》和《十一家注孙子附今译》、军事科学院《孙子》注释小组的《孙子兵法新注》等著作，发表了任继愈的《孙子兵法中的辩证法因素》、郭化若的《论孙子的军事思想与哲学思想》等重要论文，数量虽然不多，但在研究方法和文献整理方面仍取得了可观的成绩：①普遍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孙子》的思想内容、时代特色和理论价值进行深入

分析和系统阐释。如刘伯承元帅在担任军事学院院长期间，亲自讲授《孙子》，将该书概括成谋略、兵势等六个方面，深入浅出地解释了它所揭示的战争规律和哲理。郭化若则在文章中分析了《孙子》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客观条件，将其军事思想和哲学概括成战争观、战略理论、军队建设原则、哲学原理和方法论等四个方面，并指出其缺陷与局限性。其他一些有关著述也对书中包含的战争理论、战争指导思想、军事地理思想、治军思想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等进行了分析和探讨。②在文献整理方面，更注重对历代有关文献及考古新材料的利用。在继承宋、清诸代孙子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中华书局出版的《孙子十一家注》以上海图书馆藏南宋版本为底本，又据北京图书馆藏本补缀文字，给读者提供了一个精良的重要版本。杨丙安著《孙子集注》则在广泛搜集历代孙子版本，引用大量参考文献的基础上，对《孙子》十三篇的文字进行了总结校理，索隐发微，订正讹误，多有创见。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出土后，专家学者们抓紧对这一现存最早的《孙子》版本的研究和整理，为尔后的孙子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新材料。但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报刊上也发表过一些论文，出版了几部小册子，却大都以“评法批儒”为主旨，在学术上没有多少值得称道的地方。

第三阶段（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孙子》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与20世纪前80年相比，这一时期的研究状况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①研究领域更加广泛。与以往《孙子》研究大都集中的其人其书等有限领域不同，这一时期学术界进一步开拓了孙武故里与身世、《孙子》的成书年代与作者、孙子兵学形成的社会背景、《孙子》的著录流传与版本源流、

《孙子》中蕴含的各学科思想、《孙子》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借鉴与应用等新的研究领域,同时对《孙子》的哲学和军事思想等固有课题也加大了研究力度。如将《孙子》的哲学思想分为辩证法思想、伦理学思想、美学思想、心理学思想等。对《孙子》军事思想的探讨则细化为军事思想体系、国家安全思想、军事战略思想、军事预测思想、军事管理思想、战争动员思想等专门课题,有利于对孙子思想的进一步发掘和借鉴。②研究成果相当丰富。据不完全统计,自70年代末以来,共出版有关著作近百部,发表文章500余篇,远远超过以往各个历史时期。研究成果的发表形式也呈多样化趋势。从载体性质上分,不仅有各种各样的印刷出版物,还有各种电子媒体出版物,如刘庆主编的《孙子兵法——中国智慧之海》(1995)光盘、杨少俊主编的《孙子兵法的电脑研究》软件等。从研究内容上看,有以考辨、训诂和校勘见长的著作,如杨丙安的《孙子会笺》(1986)、吴九龙主编的《孙子校释》(1990)、李零的《〈孙子〉古本研究》(1995)、纽国平等的《孙子释义》(1991)等;以理论阐释见长的著作,如郭化若的《孙子译注》(1984)、吴如嵩的《孙子兵法浅说》(1983)和《孙子兵法新论》(1989)、陶汉章的《孙子兵法概论》(1985)、陈学凯的《制胜韬略——孙子的战争知行观》(1992)、黄朴民的《孙子评传》(1992)等;专门研究孙子生平事迹的著作,如杨善群的《孙子评传》(1992)等;专门汇集孙子研究资料的著作,如吴如嵩、刘庆等编的《孙子兵法辞典》(1993)、于汝波主编的《孙子学文献提要》(1994)等;关于《孙子》对现代社会生活启示与应用的著作,如李世俊等人的《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1984)、杨先举的《兵法经营十谋》(1988)等。还有一些介绍孙子思想的通俗读本和连

环画、漫画图书,也为广大读者了解《孙子》提供了有益的帮助。③研究更趋于组织化。继1989年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成立后,山东成立了中国孙子与齐文化研究会和孙子研究中心,黑龙江、辽宁和苏州也相继成立了地方性的孙子研究团体。各研究团体汇聚了国内的有关专家和爱好者,召开一系列学术会议,合作完成一些大型学术课题,进一步推动了国内外的孙子研究。其中,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先后四次举办国际研讨会,会后结集出版了《孙子新探》、《孙子新论集粹》、《孙子探胜》和《孙子兵法及其现代价值》等论文集,组织编纂《孙子兵法辞典》、《孙子大全》,山东省孙子兵法研究中心编纂《孙子集成》等著作,都受到学术界的好评。

研究内容 对一部仅有5000余字的古代兵书而言,学术界对《孙子》的研究是相当细致、深入和广泛的。其中也有一些学者们普遍关心的重大学术问题,大家对此见仁见智,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学术看法。

关于《孙子》的成书年代 《孙子》是否为春秋末年孙武所著,是早在宋代就聚讼不休的一个老问题。目前学术界对此仍有4种不同看法:一是齐思和《孙子兵法著作时代考》(载《燕京学报》1939年第12期)中所说的,孙武未必实有其人,其书所言之制度为战国制度,所言之名词为战国之名词,已足证其为战国时之著作。近年李零发表的《关于银雀山简本〈孙子〉研究的商榷》(载《文史》第7辑),从书中所反映的战争规模、持续时间、以运动战为主的作战样式和书籍体裁上分析,认为《孙子》不是孙武亲著,而是“孙子学派”军事思想的纪录,成书过程大约从春秋末期的吴国开始,到战国中期成书于齐国。二是根据《史记》的记载,书中“仁”的思想倾向、以车战为主的作战方式、兵种构成等内容,认为《孙子》作成于春秋末年的孙武,但不排除后人窜

人文字和思想观点的可能性。吴如嵩《孙子兵法浅说》(1983)和蓝永蔚《孙子兵法的时代特征考辨》(载《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等均持此说。三是郭化若在《孙子译注·再版的话》中的看法,即《孙子》系孙武门徒根据孙武的著述整理而成,成书年代大概在春秋末年至战国初年。四是杨丙安等人在《孙子兵法源流述略》(载《文史》第27辑)一文中提出的观点,认为《孙子》奠基于春秋,基本完成于战国,定型于秦汉,即以孙武的认识论为基础,后经战国兵家整理,至西汉时校理成书。

关于《孙子》的校勘及版本 历代见诸著录及现存的《孙子》版本达数百种之多,那么究竟哪些本子可以作为今天学术界校勘的底本及重要参考资料呢?自宋、清以来,社会上最流行的主要有《武经七书》本和《十一家注孙子》本。近年有学者更重视的则是汉简本和《魏武帝注孙子本》。吴九龙在《简本与传本孙子兵法比较研究》(载《孙子新论——中外学者论孙子》)一文中指出,从墓葬年代和简书字体推定,简本抄写年代比历史上早期著录《孙子》的《史记》要早数十至上百年,比今之传世本更接近孙武的手定原本。李零在《银雀山简本〈孙子〉校读举例》(载《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4辑)中认为,影宋本《魏帝注孙子》所据底本是《孙子》最古老的注本,也是后世各种传写本、刊刻本的祖本。在对各版本进行比较研究的同时,许多学者也更重视广辑古书引文,校以竹简文本,从军事理论的合理性和古代地方方言的角度索隐发微,订正《孙子》中的误文、异文,以便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较好的读本。由吴九龙主编的《孙子校释》(1990)即是在这方面的有益尝试。

关于《孙子》的思想渊源和社会背景 对于2000多年前就已产生的这部博大精深的兵学著作,学术界很注意探索其思想上和文

化上的渊源。金典戎的《孙子评论》(载《陆大参谋月刊》1941年第4期)认为,除了孙子伟大的天赋及其对古代兵法深入研究的主观条件外,还有受家学渊源的熏陶和姜太公的影响等客观条件。郑良树的《孙子军事思想的继承和创新》(载《孙子探胜》,1992)则通过对先秦古籍中有关资料的爬梳排比,说明孙子对前人军事思想的承继关系。黄朴民的《孙子兵学与春秋哲学政治思潮》(载《管子学刊》1993年第3期)从当时社会思潮对《孙子》影响的角度,提示了该书形成的深层思想文化背景。杨丙安的《孙老兵学异同论》(载《孙子探胜》)中,对孙子与老子相通与相异之处,对孙子与老子活动时间大体一致的古代哲人思想上的相通相斥关系作出了分析并得出结论。刘庆《孙子兵法与齐国兵学》(载《军事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探讨了齐国兵学——这个先秦时代最有影响的地域性兵学流派与其代表性著作之间的渊源关系及决定性影响。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讨,对于从宏观上把握《孙子》诞生的契机,解释为什么中国自古以来即是兵学盛国这一奇特历史现象是有意义的。

关于《孙子》的军事思想体系 对《孙子》所蕴含的军事思想体系,许多学者都从各自角度进行了归纳。陈启天的《孙子兵法校释》(成都国魂书店,1941)将其概括为战争论、战本论、战争指导论、统御论、将才论、战争方略论、战斗原则论七个部分;萧天石的《孙子战争理论之体系》(成都大江出版社,1942)把《孙子》的战争指导理论分为国家指导原则、政治战指导原则、经济战指导原则、外交战指导原则、精神战指导原则、间谍战指导原则以及先知、目的、计划、安全、速战速决、歼灭战、包围战、闪击战、主动、攻击、集中、奇正、虚实等30个方面;李浴日的《孙子兵法新研究》(世界兵学社,

1946)归纳为先知、计划、自然、求己、全存、主动、利动、迅速、秘密和变化十大原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郭化若在《论孙子的军事思想与哲学思想》一文中,将《孙子》军事思想概括为战争基本问题、战略问题和军队问题三大部分。这一体系划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为学术界接受并沿用下来。80年代以后,对《孙子》军事思想体系的讨论更加热烈。陶汉章在《孙子兵法概论》(1985)中,追述了刘伯承元帅曾将《孙子》的军事思想体系概括为谋略、兵势、正兵与奇兵、虚与实、用兵的主动性和灵活性、用间等六个方面。谢国良在《孙子思想研讨》(载《军事史林》1986年1~4期)一文中说,《孙子》的军事思想应包括重战、慎战、备战和善战的作战思想,注重计谋、全胜和进攻速胜的战略思想,主动、惑敌、因情用兵的思想,重视将道和法治的治军思想以及军事哲学思想。吴如嵩在《孙子兵法新论》(1989)中,将《孙子》的军事思想体系总结为16论,即安国全军的慎战论、谋深虑远的先胜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论、威加于敌的伐交论、纵深奔袭的突袭论、攻虚击弱的易胜论、示形动敌的致人论、因利制权的任势论、兵以诈立的诡道论、奇正相生的阵法论、用兵八戒与十围五攻的常法论、令文齐武的治军论、五德兼备的将帅论、因粮于敌的后勤论、九地六形的军事地理论、刚柔皆得的战道论。刘庆的《〈孙子〉兵学体系初探》(载《孙子新探——中外学者论孙子》,1990)则从军事思想体系、思维形式体系和思维方式体系三个层面分析该书,指出其军事思想体系由战争准备理论和战争实施理论两部分构成,思维形式体系由战争问题、作战指导和军队建设三个基本范畴群构成,思维方式体系由逻辑思维方法、定量分析方法、朴素系统方法和原始辩证思维方法构成。上述对孙子军事思想体系的分析,不管分歧有多大,都为进一步研讨

中国古典兵学体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关于《孙子》的国家安全观 对《孙子》中蕴藏着的国家安全思想的探讨,是1998年第四届孙子兵法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才全面展开的,相关论文也多集中在这次会议的论文集《孙子兵法及其现代价值——第四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1999)之中。对这一内容进行正面阐述的是韩嘉禾、祁云防《孙子的胜负观与国家安全观》一文。该文认为,孙子对军事斗争与国家安全内在统一性的揭示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理想境界的“全胜”,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最佳选择;二是以综合国力为中心的“称胜”,是维护国家安全的物质基础;三是以“先为不可胜”为基点的“先胜”,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先决条件;四是以“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为要旨的“知胜”,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指导原则。蒋磊在《〈孙子〉“伐谋伐交”思想对当代非对称战略的启示》中,针对当前世界上许多国家用“非对称战略”来遏制和对付可能出现的安全威胁指出,《孙子》中虽然没有直接出现过“非对称战略”的说法,但它的“伐谋伐交”思想却是非对称战略的核心,当前维护国家利益与安全,应以它为最优先、最重要的选择。刘春志《〈孙子〉国防观对世纪之交的国家安全的启示》充分肯定了《孙子》不懈地追求和平的价值取向,认为它处理战争与国家利益的基本原则有三:一是非利不动,不打不符合国家利益的战争;二是非得不用,不打没有必胜把握的战争;三是非危不战,不打不到万不得已的战争。而必须依靠强大的综合国力,诱之以利,胁之以害,以整体威慑达到“安国全军”的目的。

关于《孙子》的重要思想观点 本着“古为今用”的宗旨,20世纪的研究者花费了很大精力探究该书的治军思想、战略战术诸问题,对以往人们很少提到的用间、军事地理、

军事伦理都有涉及，并在一些重大学术问题上另辟新说，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比如“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在过去相当一段时间内曾被视为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受到贬斥。近年来它所包含的思想精髓和现实意义则愈来愈受到人们的广泛重视，对它的评价也与过去有了很大的不同。吴如嵩在《析“不战而屈人之兵”》（载《中国军事科学》1988年第3期）中甚至说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核心的“伐谋”“伐交”的“全胜”战略是决定着军事战略的制定和实施的更高层次的战略——大战略，是《孙子》军事思想的核心，是孙武在战略学上的独特成就。高锐在《〈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全胜”论新探》（载《孙子新探——中外学者论孙子》）中，进一步将《孙子》中的“全胜”思想分为全国、全军、全旅、全卒、全伍五个层次，说即使达不到全部的不战而屈之，也可以求得局部的不战而屈之，因此全胜思想可称得上是一项缩短战争进程的速胜战略。在当今国际国内环境中，正确宣传和发展《孙子》这一思想，对于解决国际矛盾，抑制那些穷兵黩武的战争狂人，不无积极意义。还有人从军事文化的角度切入，指出虽然“全胜”战略在春秋末年已不再有具体的实施价值，但它反映了中华民族追求和平的思想倾向，反映了中国古代兵家用兵打仗的理想境界，在历史上留下深刻的痕迹，在今天仍有不可忽视的思想价值。再如以往学术界大都认为《孙子》的战略方针是“反对持久战，力主速决战”。郭泽波在《孙子防御作战思想初探》（载《军事历史》1987年第3期）中则指出，《孙子》中已形成了比较系统的防御作战理论，其基本原则是治力为先，重点守备，重视地利，灵活用兵，又如对该书的治军思想，厉平《〈孙子〉的军事管理思想》（载《军事历史》1987年第1期）从管理学的角度切入，

将其概括为以“分数论”为主要内容的系统管理思想、以“相得论”为主要内容的情感管理思想、以“有能论”为主要内容的智能管理思想，颇能给人以启发。

关于《孙子》的军事哲学思想 具有浓郁思辨色彩的《孙子》也是兵家哲学的经典之作。早在抗战时期，郭化若就在《孙子兵法之初步研究》（载《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卷第11、12期~第2卷第1期）中指出，《孙子》的战争观是唯物辩证的。它强调战争依赖于经济，判断情况反对迷信，认识到战争有一定的规律，主张全面地联系地看问题，把战争中的一切事物看成是变动的，而不是静止的，强调从现象深处发掘事物的本质等，都体现了朴素的唯物辩证法因素。这一看法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近年来，还有人从形与势的关系上分析孙子的朴素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结合点，从重点论的角度探讨孙子的战争哲学特色，都很有新意。同时也有学者指出，《孙子》在军事哲学思想上仍存在着一些消极成分，像过于强调“速”而没有认识到“速”与“久”的辩证关系；把奇正相生看成如“环之无端”，表现出形而上学的倾向；认为孙子过分夸大将帅的个人作用，表现出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不过，也有学者发表文章，对上述看法予以驳斥。方法论研究也是《孙子》军事哲学思想研究的热点。一些文章分析了《孙子》所体现出来的逻辑思维、系统论思想、运筹思想、博弈思想、斗争哲学等，着重探讨了具有东方思维特色的认识范畴和实践范畴，从而更深刻地体味到为什么《孙子》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其思想言论历久而弥新的奥秘所在。

关于《孙子》与西方兵学的比较 中西兵学的比较是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中的重要课题。1943年世界兵学社出版了李浴日《东西兵学代表作之研究》，近年来学术界相继发表

了刘庆《孙子与古希腊、罗马军事著作的比较》(载《孙子新论集粹》,1992)、陈西进《〈孙子兵法〉与〈战争论〉》(载《兵家史苑》第2辑,1990)、夏征难《孙武与克劳塞维茨军事辩证法思想略论》(载《中国军事科学》1990年第4期)等文章。其基本观点是:以《孙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兵学注重谋略,强调宏观、整体的指导意义,主张因情用兵、灵活机动,“舍事而言理”,推崇哲学思辨,直觉顿悟;西方军事思想更偏重于逻辑推理,求实索真,强调局部、微观的分析原则,注重实力建设和具体战法,突出军事技术的地位与作用,强调计划的周密性和指挥的坚定性。而这些兵学文化上的差别,是深深地根植于各自的社会土壤之中,不宜简单地对它们评说优劣,而应注重于沟通,进行互补。

研究展望 20世纪里《孙子》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在国际国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不要忘记《孙子》研究的不足之处。例如:对《孙子》思想的解说中,没有把该书放到当时的时代条件和文化背景之中去考虑,存在着肆意拔高、把古人思想现代化的现象;对《孙子》与现代战争的关系,采取简单类比的态度;对一些学术问题的争论,往往意气用事;在将《孙子》原理用于现实社会生活中时,常常出现牵强附会的庸俗化倾向。这就要求严肃的研究者们要老老实实做学问,努力弥补上述的不足,真正为繁荣21世纪的《孙子》研究做出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刘庆:《〈孙子兵法〉研究述评》,《兵家史苑》第3辑,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

吴如嵩、刘庆等:《孙子兵法辞典》,沈阳:白山出版社,1993。

朴民:《本世纪孙子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动

态》,1998年第8期。

(刘庆)

晚清军事思想研究 (study of military thought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探讨中国从鸦片战争到清朝灭亡期间军事思想演变情况的活动。晚清短短70余年间,中国军事思想的发展已脱离了传统兵学的正常发展轨道,在“千古未遇”的严峻挑战面前,发生了巨大的、根本性的变化。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错综复杂,战争样式的变化,反侵略战争的需要,西方近代军事理论的影响,都对军事思想的现代化起到了或多或少的拉动牵引作用。晚清军事思想的发展充满着艰难和曲折。军事观念和战略战术的每一点微小变革,都伴随着革新与守旧思想之间激烈交锋,有的新思想、新观念的确立甚至要付出流血牺牲、割地赔款等异常沉痛的代价。在中国军事走向现代化的20世纪,上述许多耐人寻味的现象都引起亟须寻求历史借鉴的研究者的注意。他们力图从历史真相的探究中更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以服务于现实斗争的需要。晚清军事思想研究就是在这一背景下逐渐发展起来的。

研究概况 在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学术界不可能对晚清军事思想展开全面、细致的研究,大多是出于现实军事、政治斗争的需要,对曾国藩、左宗棠等个别晚清人物和太平军、捻军、湘军等武装集团的思想做过一些阐释。其中蔡锷编成于武昌起义之前的《曾胡治兵语录》,在民国时期影响颇大,蒋介石还为之增补《治心》一章,作为教材印发给军校学员,在现代军事教育中发挥了作用。蒋百里《中国五十年来军事变迁史》(载《申报五十年》,1923)对1872年以来中国军事思想的变化有所涉及,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对北洋军建军作

战指导思想亦有所分析。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商务印书馆,1945)对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战争准备和用兵方略的介绍,罗尔纲《湘军新志》(商务印书馆,1939)对湘军建军和作战思想的归纳,罗尔纲《捻军的运动战》(商务印书馆,1939)对捻军特殊战法的总结,简又文《太平军广西首义史》(商务印书馆,1944)对这支农民军早期战略的说明等,从对人物和武装集团军事思想个案分析的角度充实了晚清军事思想研究的内容。这一时期人们往往把精力更多地投入到资料的搜集、分类和考订上,如蔡锷编《曾胡治兵语录》,程演生、萧一山、王重民等人分别从巴黎法国国立语言学校图书馆、伦敦不列颠博物馆和剑桥大学图书馆搜集的《太平军目》、《太平条规》、《资政新篇》等太平天国军事印书,还有一些学者编辑各种有关图录文集等,都为晚清军事思想研究做了必不可少的资料准备工作。但总的说来,整个研究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学术准备不足,研究力量投入也很不够,无论是成果的数量还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不能令人满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学术界首先在晚清军事史料的编辑出版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从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史学会组织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其中《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捻军》、《洋务运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及《第二次鸦片战争》等大型专题资料丛书,特别是有关太平军的专题资料丛书,如《太平天国印书》(1961)、《太平天国文书汇编》(1979)、《太平天国资料汇编》(1980)、汇集了学术界多年来资料整理的成果,为晚清军事思想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牟安世《中法战争》(1955)、江地《捻军史初探》(1956年)、戎笙等《太平天国革命战争》(1962)等,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较早问世的一批晚清军事史方面的研究著作。

但限于作者知识结构、研究兴趣等多方面原因,许多晚清军事史著作更侧重于政治史和对外关系史角度的叙述,关于军事及军事思想本身的内容仍乏善可陈。这一时期具有较多军事色彩的研究是一些关于林则徐、陈玉成、李秀成、张洛行等人物军事思想的文章,一些学者在太平天国早期战略、捻军战术和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作战队形等问题上展开了学术争鸣。可惜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学术研究全面停顿,即使有相关文章发表,也大都要服从于所谓“评法批儒”和影射史学的需要,鲜少学术价值。真正意义上的晚清军事思想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主要进展情况是:

搜集整理、编辑出版了一批研究资料。这一时期有关资料的搜集整理、编辑出版工作取得了巨大进展,除了《中法战争》、《甲午战争》等资料丛刊相继编辑出版“续编”,收入大量罕见的重要军事资料外,一些重要军事人物的文集也陆续编撰完成,如《孙中山全集》(1981)、《左宗棠全集》(1986)、《曾国藩全集》(1987)、《刘铭传集》(1997)、《张之洞全集》(1998)等;出版了《北洋军阀》(1989)、《晚清海军史料》(1982)、《中国近代战策辑要》(1993)等专题性资料集;出版了许多晚清重要军政人物的书信、日记。作为晚清军事思想最重要的载体,以往人们不太注意的上千部晚清兵书、军事译著以及各种清末军事报刊也被从尘封的书库中发掘出来。在广泛查阅相关资料的基础上,毛振发、刘庆撰写出《中国近代兵书概论》(载《历史研究》1987年第2期),毛振发撰写了《清末军事刊物述论》(载《军事史林》1987年第1期),提醒学术界充分注意它们珍贵的军事思想史料价值。上述良好的资料准备工作无疑是学术界全面探讨晚清军事观念、人物思想和战争战略,更好地把握整个晚清军

军事思想的发展脉络的必备前提。

军地合一,携手形成了一支研究队伍这一时期,军队和地方史学工作者携手合作,形成了一支具有一定水平的研究队伍,并真正开始了从军事思想的角度切入研究课题。军事思想研究在知识准备上较为复杂,既要掌握一般的军事理论知识,又要对史学有较深刻的了解,这就对研究者的知识结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年来军队和地方史学工作者在这方面加强合作和交流,成立了中国近代军事史学会,先后举行三次中国近代军事史研讨会并编辑出版了会议论文集;在军队和地方院校、科研机构开设有关课程,培养中国近代军事史方向的研究生,对晚清军事思想研究有不小的推动作用。近年来出版的一些地方和军队学者的有关著述,都非常注重从军事理论的不同层次、不同学科对研究对象做进一步发掘。如戚其章《甲午战争史》(1990)对战术动作的描述已到“营”一级;张一文《太平天国军事史》(1994)在叙述战争的同时,注重对这支农民军队战略战术的专门研究;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1991)对晚清海军建设思想、海防思想和海上战术变化过程做了细致的分析;皮明勇《关注与超越——中国近代军事变革论》(1999)对近代军事变革的理论模式、思想观念的变化过程分专题加以剖析。这些著述清晰地表明晚清军事思想研究已经摆脱了先前作为政治思想研究附属的地位,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研究领域。

选题广泛,相继发表了一批研究成果学术研究领域里任何新方法的采用,新视野的开拓,新课题的提出,最终都要体现为新的研究成果的完成。相对于20世纪的前80年,80年代以后的晚清军事思想研究可谓成果累累。这期间不仅许多近代军事史论著以相当篇幅论述这方面的内容,还出现了专门的

晚清军事思想史著。其中有的论著侧重于分析晚清历次战争的战略战术成败,如《中国近代战争史》(1985);有的论著侧重于对晚清人物军事思想的分析,如张一文、施渡桥主编《中国近代军事人物》(1990),刘子明《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史》(1997),多人合著的《孙中山军事思想与军事实践》(1989),《中国军事通史(清代后期)》(1999)等,对晚清军事思想的阐述也主要是依托人物来进行的;刘庆、皮明勇编写的《中华文通志·军事学志》(1998)则试图从战争观、国防思想、军队建设思想、战略和战术思想这几大部分分别说明其思想内容和演变历程。近年来发表的上百篇学术论文除继续加强对军事人物思想和历次战争指导思想的研究外,对晚清兵书、国防观念、战略思想、军事改革思想、军事管理思想、陆上战术和海口防御战术等更具有军事色彩课题展开研究,代表了国内在这一领域的最新学术水准。

研究内容 中国学术界对晚清军事思想研究的主要内容是:

关于军事思想总论的研究 学术界对晚清军事思想最有代表性的总体概括,体现在《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中国近代军事思想》条目中。该条目认为,晚清军事思想经历了三个时期——19世纪40~60年代初为萌芽时期,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一些有识之士承认中国在军事技术方面的落后,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标志着变革传统军事思想的开端;60年代初至1894年为局部变革时期,一部分洋务派官僚出于镇压农民起义和抵御外侮的双重目的,开展了一场“洋务运动”,本着“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以制器为先”的方针,兴办军事工业、仿造西式枪炮战舰,为新的军事思想的产生提供了物质条件,在建军治军思想上虽然仍贯穿着封建纲常和宗法思想,但在作战指导上则向近代化迈出

了一大步；1894年至1911年为全面变革时期，中国在此期间大规模编练新军，广设军事学堂，派人出国留学，翻译外国军事著作，在传播西方军事思想，促进中西军事思想融合方面作了初步尝试。对晚清70余年军事思想变化做总体分析的，还有沈渭滨、奚纪荣《中国近代军事思想概论》（载《史林》1988年第3期）一文，认为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前夕是萌芽阶段，从60年代初到90年代中叶是形成阶段，从90年代中期到清末是初步发展阶段。而整个晚清军事思想的发展呈现出发展迅速、道路独特，其思想主要体现为统治阶级思想，缺乏系统的理论著作等特点。因此，中国近代军事思想无法最终育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显得面目模糊、脉络不清。也有相当多的学者看到晚清西方军事理论大量涌入，传统兵学因不适应近代战争的要求而迅速解体，一些新思想、新观点被飞速前进的时代大潮很快抛在后面的情况，认为晚清军事思想应以各种思潮的兴替演进为主线。刘申宁《从兵书刊刻看中国近代军事思潮》（载《军事历史研究》1988年第4期）一文，从兵书出版的角度研讨了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发展的特点，即重防御、讲西学、求实用等；刘庆《晚清兵学家群体与中国近代军事思想》（载《中国军事科学》1997年第1期）一文中，则注意到具有不同思想倾向和知识结构的晚清兵学家群体与军事思想之间的密切关系，在探讨晚清军事思想的演变方面迈出了最初的步子。

关于国防战略思想研究 晚清国防思想是近些年来受到人们重视的课题。学术界在对晚清十数次抵抗外国入侵战争进行系统研究后，发觉其中确有一些共同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梁巨祥《关于中国近代战争的经验教训》（载《军事史林》1987年第3期）等就是高屋建瓴地观察和总结晚清历次战争成败得

失的概观性文章。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学者发现晚清国防观念、国防战略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一次次惨痛失败后有所变化和发展。毛振发《晚清时期的国防思想》（载《中国军事科学》1992年第1期）从对国家主要威胁的争论，国家军事体制的改革和对富国与强兵关系的认识三方面进行分析，说明其中不乏与传统国防思想迥然不同的新观念和新理论。刘庆、皮明勇《军事学志》认为，晚清全面、强烈的国防危机意识，国防价值观念的更新以及以力御力的国防原理论的出现，使近代国防观念的更新表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色。该书还从“师夷长技以制夷”，近代国防建设科技主题的提出；兵战与商战并举，近代国防建设经济主题的凸现；全体性国防论，近代国防综合性主题的确立这三个阶段阐述了国防建设思想的变迁。刘庆《中法战争与晚清国防政策的转变》（载《学术论坛》1991年第3期）认为，中法战争之后，清朝国防出现了三方面大的转变，即在国防战略上从海防塞防之争走向全面防卫；在国防建设上，开始仿效西人致富之本，大力发展工商业；在国防外交上，由维护宗藩的体制转向维护国家的战略边疆。

关于海防战略思想研究 对海防战略思想的研究，首先是从海防、塞防之争开始的。对这场19世纪70年代清朝内部发生的争论，以往学术界多肯定左宗棠提出的海防塞防的观点，否定李鸿章专注海防之说。认为，正是因为清廷采用了左宗棠的主张，才能有收复新疆之举，才能维护祖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但近年来也有许多人认为海防派思想也有其正确的一面，说主张海防或塞防并不是划分爱国还是卖国的标准，从军事思想发展的角度看，海防派具有把边防的重点由西北内陆边地扩大到东南万里海疆的眼光，是封建国防观念向近代国防观念一个引人注目的

转变。魏天柱《试论晚清国防战略的几个问题》(载《中国近代军事史论文集》,1987)则从国防发展战略的高度评价这场争论,说无论是主张海防优先的“海防论”、主张塞防优先的“塞防论”,还是主张海防塞防并重的“并重论”,都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没有分清国防的重点和主次方向。关键是清王朝不明敌情,对所要防御的敌人没有清醒的认识。也有的学者对晚清海防思想本身做出评判。姜鸣《晚清海防思想研究》(载《史林》1988年第3期)从中国人的海洋观念出发,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濒临海洋的大陆民族,对海洋的认识是保守的、有限的。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体的中国社会,本质上并不需要将利用海洋和保卫国家利益综合一体的海上力量,严重缺乏走向海洋的战略意识。晚清的海疆防御战略思想实际上是主张海口要塞防御,主动放弃对制海权的角逐。晚清海军建设受制于这种海防战略思想,走过了一条分区舰队防御的道路,结果是畛域攸分,由“三洋海军”变为北洋一支舰队,路子越走越窄,不利于海军从近海向外海发展,终以失败而告结束。与此文意见不同的是徐勇《试论李鸿章的海军战略思想》(载《东北师大学报》1985年第5期)一文。认为,李鸿章在朴素海权理论上有所建树,但他缺乏决战思想,背弃了进攻原则和集中兵力等作战原则,造成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夏冬《论李鸿章的守势战略》(载《军事历史研究》1988年第1期)一文,则试图说明李鸿章等人的海防战略思想并不完全是消极的。李鸿章等人制定的海防战略层次分明,态势也是好的。重点地区重点防御,重点海口重点防御;二线配备机动劲旅,以便对进犯之敌作出快速反应;海军从海上夹击敌人,“以战为守”,这些都没有错。晚清海防战略的失败是由于指挥失当、武器装备、人员素养和后勤保障等

方面原因造成的。

关于持久战思想研究 持久战思想也是晚清重要的战略新思想之一。较早注意到这思想的是刘树泉、张玉福《甲午战争末期中国出现持久战思想》(载《沈阳师院学报》1987年第3期)一文。只是他们没有把整个晚清时期中国战略思想的变化联系起来综合考察,将这一思想出现的时间大大延后了。对此,刘庆《试论晚清的持久战思想与实践》(载《军事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详细考察了该战略思想在晚清时期萌生发展的全过程,并指出这些不系统的认识大都是针对某一具体战争发展的议论,而“真正系统、全面地阐述持久战观点,独特的理论构架”,“则是迟至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事”。

关于鸦片战争中清政府战略战术得失研究 对此问题,王建华《鸦片战争时期抵抗派的军事思想和实践》(载《史林》1988年第3期)、林庆元《论清政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战略战术》(载《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3期)文章中,分别注意到当时不同政治派别在战略上的不同态度。后者提出,林则徐“以守为战”,不与敌人海上交锋,证明是一种消极防御,并不能防止敌人登陆和占领据点。后来林则徐、魏源等一大批爱国志士所提出的,在更广阔的空间里依靠人民群众支持,持久作战的思想却可以发挥中国的战略优势。张一文《试论清军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基本原因》(载《历史档案》1983年第1期)则说明了清军各级将弁不懂战术,据守一地,只知株守炮垒,不布远势,炮火与步兵不能有机配合,互相协同等战术上的弱点。

关于太平军战略战术研究 对太平军的战略战术问题,罗尔纲在《太平天国兵法》(载《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1期)中进行了总体概括。认为,太平军在战略上具有争取战争主动权、掌握战争灵活性的特点,即遇到失

利,就改向有暇可乘之地转进,进攻坚城,采取远势包围、待敌自困而后取。具体作战时,视敌情或设伏、或劫营、或以走制敌、或筑城寨坚守、或挖地道攻城。这些都体现了革命战争中广大群众的智慧,达到了中国农民战争军事思想的高峰。至于决定太平军命运的一些重大战略问题,如对定都南京、北伐和西征的评价,自60年代起就成为“热点”,近年来讲座更加热烈,先后发表数十篇文章。一些学者亦由对具体战略问题和战役指导方针的得失探讨,转向对一支农民军战略战术思想的总体评价。如张一文《太平天国前期战争的战略问题》(载《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太平天国后期战争的战略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等文章中,对选择战略目标、夺取战略主动权、掌握战略重点等问题都有述及。王国平《论太平军的水战战略》(载《云南学术探索》1991年第2期)一文中提出,太平军建都之初,水营在确保长江控制权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太平军水营没有发展成为一支独立部队,又长期担负繁杂的任务,没有继续获得发展,最终失去了对长江的控制权,这也是太平军军事上失败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张一文在《从怀庆之战看太平军的战法》(载《太平天国学刊》第3辑)一文中,从剖析典型战例入手,对太平军的警戒和指挥方法,地雷轰城法、筑城御敌法、正面当敌和两翼包抄阵法都分别予以介绍;江地《关于捻军起义的作战方法问题》(载《太平天国学刊》第1辑)中说明了捻军装旗战、欲南佯北战、步骑联合战、埋伏包抄战、犄角战等不同战法的特点,分析了捻军战术的弱点及其对手清军河墙战法对捻军的限制,是农民军战术方面值得一读的文章。

关于中法战争研究 发生于19世纪80年代的中法战争,近年来随着对法方档案资

料搜集整理工作的展开,各地多次举行学术讨论会并汇编印行论文集,许多军队和地方学者也投入了相当多的研究精力,取得了较多的成果。其中《中国近代战争史》几乎论及中法战争中所有的重要战役,对中法双方的战略计划和作战指挥做出了较详尽的评价。黄振南《中法战争诸役考》(1998)对中、法、越南史料综合比较,在战争史实论述上推陈出新,很值得一读。一些学术论文则重点就镇南关大捷后乘胜求和、中法战争期间陆海战场的关系等与战略决策相关的问题展开讨论。关于前者,过去都被认为是清政府腐败和奉行“投降卖国”方针的表现。庚裕良《败后宣战与乘胜即收——试论清政府在马尾、镇南关战役后的策略》(载《中法战争史论文集》)中,则不同意上述看法。认为,若将镇南关大捷后的“乘胜即收”放在当时边疆危机的形势下衡量,也不是一无是处。关威《中法战争后清政府“乘胜即收”原因析》(载《山西师大学报》1988年第1期)等文章,也以当时军事形势、国际形势和法国对华政策方面的原因,否定了“投降卖国”的说法。对当时陆海战场孰主孰次问题的争论,实际上也与对“乘胜即收”的评价有关。杨志本、王苏波在《镇南关大捷不是中法战争的转折点》(载《中法战争论文集》第2集)中提出,观音桥事件之后,中法战争的主要战场实际上已经转移到中国东南沿海,法军的战略方针是转攻东南沿海,夺取担保品。清军虽然取得了镇南关大捷,同时澎湖被占,因此只扭转了陆战场的局势,不能说扭转了整个中法战场的局势。对此持完全相反意见的是王承仁,他在《关于镇南关大捷在中法战争中的战略地位问题》(载《中法战争史专集》)中强调,越南北圻及中越边境,始终是中法战争的主战场,不是镇南关一谅山大捷后没有改变清政府在谈判中的地位,而是清政府利用这个

有利的形势去作了“乘胜即收”的屈辱投降的资本。对清军在战争中的战术及作战指挥水平,刘子明在《论冯子材镇南关战役的组织指挥》(载《中法战争史论文集》第2集)中从军事指挥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认为,冯子材集中优势兵力,掌握强大的预备队,采取主动出击、阵前设伏、近战夜袭、包围迂回、边疆追击等机动灵活的战术手段,是他取胜的主要原因。刘庆《中法战争时期的清军战术》(载《中法战争史论文集》第3集)从战术发展史的角度对此时正处于战术变革阶段的清军战术进行考察,说它既有传统的阴影,也有新战术的色彩。

关于中日甲午战争研究 相比较而言,在晚清历次战争中,关于甲午战争的研究是最为充分的,学术成果也最多。《中国近代战争史》、《甲午中日海战史》、《甲午中日陆战史》、《甲午战争史》、《中国军事通史(清后期)》等,都以相当篇幅探讨了中日双方的战略和战术思想。有关论文对战略战术的讨论则集中于以下三个问题上:①对清军战略的评价。庄维民《论甲午战争中的清军战略》(《东岳论丛》1984年第4期)指出,清廷采取以京畿为轴心,京、津、奉(天)并重的防御体系,消极地把旅顺、威海视为海军避风港,忽视其对渤海的钳形屏障作用,因而在兵力部署上本末倒置,不是加强两翼,拱卫京津,策应东线战场,而是消极地集中兵力于京畿,候敌来簇,是自取其败。吴如嵩、王兆春《试谈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的使用问题》(载《中日关系史论丛》第1辑)不赞成某些论者关于清军在战争初期应通过海上主力决战,争夺黄海制海权的主张,认为正确的方针应当是:北洋海军以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为依托,经旅大、威海的海岸炮台和水雷等既设障碍为掩护,控制渤海海峡,寻求有利战机对敌实施奇袭和突击,打破日军速战速决的计划,待

力量优劣易势,然后转入反攻,寻求海上决战,控制黄海制海权。刘庆《论甲午战争中清廷海陆作战方略的失误》(载《甲午海战与中国海防》,1995)指出,清廷由于对日本意图判断错误,仓促出兵援朝,正好钻进日军设好的圈套之中,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被迫应付这场战争,一开始就陷入战略上的被动。尤其是清廷关于海陆两线进攻的战略计划,是不顾敌我形势的盲目乐观举动;为配合陆上行动调北洋舰队护航,导致中日两国海军主力过早进行决战,实际上这正是日军统帅部所希望的。黄海海战后,日军海、陆两路大举进攻,清廷也应迅速调整战略计划,在海上,动员南洋等各支海军摆出一副进袭日本本土或琉球的样子,北洋海军则不时从隐蔽的港口出发,打击敌人分遣舰队或运输船队,破坏其登陆企图和后勤补给;在陆上,坚持将旅顺和威海作为防御重点,集结重兵,并在国内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可惜清廷没有采取任何可行的补救措施,最终丧师弃地,与侵略者签下了屈辱的《马关条约》。②黄海海战中清军战术的优劣。由于战争情况错综复杂,史料记载又很不一致,清军舰队的到底以何种队形接敌始终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目前基本上有五种说法,横列阵形或“一字形阵势”,二列横队的一种交错配置,后翼梯形阵,人字形阵势,由五叠雁行阵改列为一字雁行阵。但该问题争论的关键则在于究竟采用什么队形才能充分发挥己方全队的攻击力。对此,戚其章认为北洋海军舰首重炮占优势和航速低,肯定了丁汝昌“始终以舰首向敌”的战法(载《中日甲午战争论丛》,1983)。杨志本、许华《论丁汝昌海上战役指挥失误问题》(载《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从机动与火力有机结合的角度,认为当时最好的战术,是以单纵阵对敌舰实施舷侧方向上的攻击,这样做不但依然可以发挥北

洋诸舰舰首重炮的火力,而且还可以发挥舰尾炮和一侧舰舷炮的火力。③威海海战失败的责任问题。对北洋海军惨遭覆灭的威海海战失败的原因,多数论者归于清军所实行的“避战保船”方针。但有的学者认为,株守威海是李鸿章的责任;又有的学者认为,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未能捕捉有利战机、突击日军登陆运输队,同时株守军港、坐以待毙,应负不可推卸之责;还有的学者提出,应把山东海陆战场结合起来看,威海战败的原因不是“避战保船”所致,它与威海至成山角一带海岸和陆地防御薄弱,没有援兵有很大关系。刘庆《甲午海战与晚清海防战略战术》(载《甲午海战与中国近代海军》,1990年)从海防战术的角度提出,对日军远势登陆缺乏思想准备,附台而守,不做纵深兵力部署;不善于掌握抗敌登陆的时机和手段,缺乏海口要塞防御的良策,不进行积极防御,都是威海之役惨败的战术原因。

抗击八国联军入侵战争研究 对晚清时期抗击八国联军人侵战争的研究,由于清政府在战争期间持不抵抗态度,战争中的一些战役战斗也发展的不够充分,对义和团抗敌方面的研究又大都包括在义和团运动研究之中,因此专门分析战争中清军、义和团战略战术的文章极为少见。关于辛亥革命战争,值得一读的有夏林根《论资产阶级革命派反清武装起义的战略方针》(载《复旦学报》1981年第5期)、魏宏远《辛亥革命前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根据地思想》(载《历史教学》1981年第10期)等文章。

清军战术思想研究 关于晚清时期清军战术的总体情况,刘庆、皮明勇《中华文化通志·军事学志》一书第六章第二节分晚清陆战战术、晚清海口防御战术、晚清海战战术进行了较详细的说明。此外值得一读的还有牛俊法《论近代清军的装备与战术》(载《史学月

刊》1985年第6期),杨志本、许华《近代海军作战的阵法与战法述论》(载《历史档案》1988年第2期)以及由解放军工程兵学院的几位专家撰写的《中国筑城史》的近代部分。后者从筑城技术对城守战法的影响来分析晚清战术的变化过程,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有机结合在一起,是多学科研究的一个可喜成果。

人物军事思想研究 晚清具有军事思想研究价值的人物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既有时间长短不等的军事实践,又留下许多军事论著者,如林则徐、魏源及后来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袁世凯等人,这类人最受史学研究者的青睐,有关他们的研究成果也最多。二是有丰富的战争实践,却很少留下直接的思想语言材料,这类人中最典型的要数太平天国前期军事领袖杨秀清。学术界以往对他们研究较少,近年来开始注意对其战争实践给予提炼总结,从中归纳出思想要点来。三是在晚清政治和军事活动中并不占重要地位的人物。他们有的没有任何军事实践经验,如晚清思想家王韬、郑观应,科学家徐建寅等;有的仅是幕僚或地方绅士,如鸦片战争时期的臧纡青。但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思想观点,对晚清军事思想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因此近来也受到研究者的注意,有关研究成果正日渐增多。

林则徐、魏源军事思想研究 被誉为近代思想先驱的林则徐、魏源,在晚清军事思想的发展上也起着无可争议的先导作用,许多研究者都把目光首先投到二人身上。孟彭兴《林则徐军事思想的特点初探》(载《军事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从不怕战争,积极备战;适应形势,师夷长技以制夷;随着他对敌情研究的深入,积极主张建设一支近代化的水师等三个方面论述了林则徐在军事思想方面的贡献。编有《海国图志》、《圣武记》的魏

源,也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研究兴趣。从其爱国反侵略的目的出发,董蔡时《论魏源的反侵略思想》(载《江苏师院学报》1980年第4期)认为,魏源在战略上以兵、食二者为首要,以守为攻,以纵为擒,归根到底是在自卫战争中以积极防御来制胜敌国。李汉武《魏源军事思想初探》(载《求索》1986年第6期)进一步分析了魏源的军事思想主要内容:在总体战略上,主张以守为战,以战守为议和的基础,并力争“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在军政关系上,主张从全国战局着眼,处理好战略指挥、驭将、控兵等问题;在人与武器的关系上,主张应重视武器的重要作用,建立海军和近代军事工业。李国华《以经济观审视海防建设——魏源海防思想述评》(载《军事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从经济的角度审视海防建设,发觉魏源的海防战略核心是守,同时主张运用国外的先进技术完善本国的经济与国防,并提出了淘汰冗滥、练好精兵,在发展武器装备上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改善兵饷,建立近代军事工业,尊重人才等一系列政策方面的意见。戚其章《魏源的海防论与朴素的海权思想》(载《求索》1996年第2期)认为,魏源强调以守为战和走精兵之路相结合,乃是一种积极的防御战略;在内守坚固的基础上还要采取攻战的方针,是内守与外防相统一的海防观;建设一支强大的近代海军,师海权国家之长,是朴素的海权观。施渡桥《试论林则徐、魏源的军事思想》(载《军事历史》1987年第6期)一文看到了林、魏二人在军事思想上的许多共同之处,将这些共同方面概括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思想,以守为战、以纵为擒的积极防御思想,从一定意义上是对当时爱国志士们抗敌思想倾向的概括。

农民起义领袖的军事思想研究 对晚清时期农民起义领袖的军事思想研究,是颇为

红火的农民战争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其中太平天国留下的资料较为丰富,研究其将帅军事思想的文章也就比较多,比如对洪秀全、石达开、洪仁玕、陈玉成和李秀成的军事思想,就先后发表了余明侠《洪仁玕著述中的军事思想初探》(载《江淮论坛》1981年第5期)、魏道明《从洪杨战略分歧看太平军的北伐西征》(载《青海师大学报》1987年第2期)、苏双碧《石达开出走及其战略得失》(载《太平天国学刊》第5辑)等数十篇文章。对留下来的直接语言材料很少,但在太平天国前期战争中地位至关重要的杨秀清,也注意到从定都天京、西征、北伐等战略决策的实践中加以提炼归纳,在评价上述战略决策的同时指出杨秀清战略思想的得失。还有的研究者发现一些小规模农民起义领袖的军事思想也具有不可忽略的思想价值,因此狠下了一番钩玄索隐的资料搜集功夫,并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像郭必勋《略论张秀眉的军事思想》(载《贵州民族研究》1983年第2期)、张山等《太平天国时期贵州号军起义的几个问题》(载《太平天国历史与地理》,1989)等文章的发表无疑更丰富了晚清军事思想的研究内容。

曾国藩的军事思想研究 王少普在《论曾国藩的军事思想》(载《军事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曾国藩的军事思想适应了封建地主阶级与帝国主义联合镇压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的需要,反映了这类战争的特殊规律。这一看法恐怕说明了学术界对曾国藩军事思想感兴趣的一个重要原因。对曾国藩颇具特色的治军思想,李育民在《略论曾国藩治军思想》(载《求索》1985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运用儒术是其基本特点,具体内容是以礼治军,诚字为本;刚柔互用,宽严相济;勤恕廉明,修己治人。该文认为,曾国藩治军思想中含有合乎规律的

内容,如强调部队的政治、军事素质,主张治军从严,争取民心,重视内部的协调统一等,都是克敌制胜的必备条件。孔令铜《浅谈曾国藩的训练思想》(载《军事历史》1987年第2期)指出,曾国藩把训练分为“训”和“练”两个不同范畴,说“训”侧重于政治思想训导,“练”侧重于军事技艺教练,具有历史的开创性。其训练思想虽有明显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但许多见解和做法代表了当时训练的发展方向,对中国近代军事教育产生了很大影响。对曾国藩的战略思想,施渡桥《论曾国藩的战争指导思想》(载《中国军事科学》1988年第2期)认为,总的看来其战争论是唯心主义的,但也含有某些唯物主义成分,如:“稳慎徐图”,“谋定后进”;着眼全局,审机度势,巩固后方,保障粮运等。徐子宏、李国兴《曾国藩战略思想简论》(载《求索》1988年第6期)认为,曾国藩在与太平军作战的历史中,形成了稳、忍、呆、拙的作战风格和战术作风,这与其全局的战略部署相配合,构成了他战略思想的基本内容。

胡林翼的军事思想研究 研究胡林翼的军事思想的文章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董丛林《胡林翼战略战术指导与湘军战局》(载《河北师院学报》1987年第1期)。该文认为,胡林翼着力贯彻“全军为上,得土地次之”的方针,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提出了“一处合围,数路配战”与“以整击散”、“临阵分枝”的方针,强调“扼要立营,加高加深,固己以困敌。并且认为与曾国藩过求稳慎而大为拘囿迂缓的方针相比,胡林翼则力图恢宏面稍显放恣操切,但全面的看比曾国藩更胜一筹。

左宗棠的军事思想研究 对左宗棠的军事思想,研究者不仅分析了他在镇压太平军时的作战思想,更注意到他在收复新疆时的杰出表现。如董蔡时《左宗棠评传》认为,左宗棠在讨伐阿古柏时制定的先北后南的战略

方针和缓进速战的战术方针,充分注意粮饷的筹措和战前的练兵准备等方面,表现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王征《从收复新疆的战略看左宗棠》(载《湖南师大学报》1985年第5期)指出,这是左宗棠战略思想的飞跃和新的转折点;邹廷霞《左宗棠“慎战”思想浅析》则肯定了他不轻兵冒进,重视后方建设和后勤保障等“慎战”思想;黄玉兰在《左宗棠治军有术》(载《湖南师大学报》1985年第4期)中说,左宗棠所强调的“兵之精在将”,“兵之强在练”,“兵之锐在器”,“兵之壮在饷”的治军思想,至今仍不乏参考价值;施渡桥在《试论左宗棠的军事思想》(载《军事历史研究》1991年第2期)中,将左宗棠与他同时代的曾国藩、胡林翼和李鸿章进行了比较分析后认为,左宗棠的作战指导思想内容更丰富、思虑更周密。该文还指出,左宗棠作战指导思想的核心是“慎战”,其对前攻与后防,战略决策与战役战斗指挥、奖赏与惩处、筹兵与筹粮饷、整军与作战、人与武器等相互关系的辩证认识和正确处理,是其慎战思想生动、具体的反映。

李鸿章的军事思想研究 对李鸿章的军事思想研究,是近年来对洋务运动的评价发生变化以后才开始的。苑书义《李鸿章传》(1991)、《中国军事通史(清后期)》都以相当篇幅对其军事思想内容加以评说。徐勇《试论李鸿章的海军战略思想》、夏冬《论李鸿章的守势战略》则是较早对李鸿章军事思想某一侧面进行探讨的文章。皮明勇《关注与超越——中国近代军事变革论》专辟一章论述李鸿章的军事变革思想,肯定了他改善武器装备,培养新型军事人才,改革清军训练和发展近代海军等一系列改革主张及其在军事变革中的积极指导作用。同时也指出了他军事变革思想的局限性,说他未能向前再迈一步,思想没有达到更高的层次。中国军事改革长

时间停留在一个低水平上,延误了近代化的良好时机,与此不无关系。目前对李鸿章的军事思想较全面的概括,是《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中《李鸿章的军事思想》这一条目。该条从国防建设主张、军队建设观点、海防观点和战略战术原则四个方面,对其在镇压农民起义和19世纪70~90年代国防建设过程中的思想言论进行归纳,肯定了他的思想在继承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基础上又有较大发展,肯定了其思想在促进清军武器装备、编制训练上向近代化演变的作用,也说明其根本宗旨是为了维护清朝封建统治,其军事变革思想仅仅是局部的甚至掺杂了许多陈旧腐朽的东西。

丁日昌的军事思想研究 丁日昌的军事思想研究是近几年因其海防和国防近代化思想才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奚起荣《略论丁日昌提出的“三洋”方针》(载《军事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一文认为,丁日昌在19世纪60~70年代就提出建立三支近代化水师,以求“三洋”联为一气,首尾相应的方针,成为海防大讨论的中心议题。其“三洋”水师编制和制海权思想,对中国海军建设所起的作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陈锋《丁日昌与晚清海防论》(载《军事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一文,具体阐述了丁日昌海防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内容和影响。吴福环《论丁日昌的国防近代化思想》(载《军事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丁焕章《评丁日昌筹办海疆防务的思想主张》(载《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还对过去很少有人提及的丁日昌“海防以民心为本”的思想做了探讨,说他把军事与政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思想堪称是对林则徐“民心可用”主张的继承和发展。评述丁日昌发展军事工业、改革军制、培养新式军事人才等思想的有皮明勇《丁日昌与晚清军事近代化》(载《广东社会

科学》1981年第1期)一文。季云飞《丁日昌台湾防务思想与实践之探析》(载《台湾研究》1996年第1期)认为,丁日昌的海防思想是对鸦片战争以来爱国之士设防台湾主张的继承与深化,并且为后来刘铭传的台湾防务思想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袁世凯的军事思想研究 清朝末年执掌兵权、参与军事改革的袁世凯,是研究晚清军事思想不可忽视的人物。毛振发《试论袁世凯军事思想》(载《军事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是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李援等《袁世凯对近代军队进行的改革及其评价》(载《军事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也涉及到袁世凯的军事改革思想。他们认为,袁世凯“参用西法”的练兵思想萌生于甲午战争时期,是对清军战败认真反省的产物,是袁世凯编练新军思想的进一步系统化。内容包括“道”、“法”两方面,即精神教育,强调要忠爱、武勇,“道必师古”;知识、技能养成,主张努力学习西人,改革军制,增加粮饷,重视兵源,讲求纪律,加强操练,实质上仍是“中体西用”思想的延续。王晓华《略论袁世凯的教育主张》(载《史学月刊》1988年第2期)中,专门分析了袁氏的军事教育思想。指出,袁世凯认为练兵首要任务在于储将,储将的主要途径是兴学,因此主张通过创办军事学堂和派遣出国留学,培养新军骨干,对清末的军事教育思想有较大影响。

张之洞的军事思想研究 对清末编练新军和兴办军事教育起到重要作用的还有张之洞。沈继成《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军事教育的兴起》(载《湖北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一文提出,张之洞坚持培养人才比选拔人才更重要,尖锐地批评了中国传统的重选拔轻培养的用人之道,这些看法当是其军事教育思想的精华所在。其主张开放式办学,练将与练兵并重,提倡军国民教育,重视教学实践的观

点,也都颇有价值。对其军事思想做全面评价的则是皮明勇《张之洞军事思想》(载《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2期)一文。该文将其在军事理论上的贡献分成三部分:一是提倡积极、理智的军事价值观,振奋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二是以“中体西用”作为军事变革的基本原则,并将西方军事制度也列入“用”的范围,深化了改革;三是提出采用新的体制编制,推行新的军官制度发展近代军事教育,变革训练制度等新主张。苏小东在《张之洞在甲午战争中的海军作战方略》(载《贵州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中注意到张之洞所提出的不同于李鸿章“保船制敌”思想的“以战为守”的积极防御思想,认为这一思想的提出,反映了当时国人对近代海军兵力的认识水平。

孙中山的军事思想研究 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导人孙中山,近年来研究颇为热烈。《孙中山军事思想与实践》一书有相当部分论及其清末的军事主张。谢健、毛振发《孙中山军事思想的几个问题初探》(载《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3)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其军事思想。一是主张用革命的武力推翻中国的封建统治,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指明了唯一正确的道路。二是提出军队必须与国民相结合,使之真正成为国民之武力的建军宗旨。三是主张建立革命根据地,有别于历史上的流寇主义农民战争。有的学者对孙中山在海权方面的远见卓识给予充分肯定。

蔡锷的军事思想研究 在晚清军事思想家之中,蔡锷是研究者比较感兴趣的一个。李双壁《论蔡锷的军事思想》(载《贵州文史丛刊》1987年第4期)、丁凤麟等《蔡锷的军事救国思想初探》(载《求索》1987年第5期)等文章,经过系统研究后认为,蔡锷的军事思想是在甲午战争后严重的民族危机和激烈

的国内矛盾激发下,在中西军事思想影响下形成的。它具有爱国主义思想主线,民主主义的原则,博采中西、融合古今而又不失自己的独特风格这样三个特点。董亚文《浅谈蔡锷的治军思想》(载《军事历史》1987年第3期)专门将其治军方面的见解归纳为慎重选将、养战一致、严明法纪、爱兵爱民等几个大的方面。奚纪荣《蔡锷军事思想研究》(载《军事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一文,从发展过程的角度对蔡锷的军事思想进行了研究。认为,蔡锷的军事思想是以“救国救民”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是在融合了古今、中西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防建设思想和战略战术思想的,对后来中国军事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兵书研究 中国学术界对兵书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对近代以来兵书书目的整理、整体评价以及对个别兵书的考辨上。许保林《中国兵书知见录》、刘申宁《中国兵书总目》对晚清兵书和中译外国军事著作的出版、刊刻状况予以披露,展示了这部分宝贵资料的基本情况。毛振发、刘庆《中国近代兵书概论》侧重对这部分资料的面貌及其价值做出评价,指出它有结构科学、内容实用、语言通俗等鲜明特点,说它的撰述出版史,就是近代军事思潮的兴替演进史。它反映了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由传统型转向“中体西用”,进而广泛吸收资产阶级军事理论,无产阶级军事理论的历史进程。深入研究近代兵书,不仅有裨于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研究,对今天的国防现代化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外,荣孟源《〈筹海初集〉跋》(载《人文杂志》1985年第4期)、罗尔纲《〈武略〉跋》(载《太平天国学刊》第3辑)等分别对具体兵书的源流和版本进行考证;祁龙威《〈湘军志〉钩沉》(载《军事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运用各类史料说明《湘军志》的写作过程和特点。这类文

章虽然不多，却是兵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

研究展望 从以上介绍的情况看，在 20 世纪 100 年间，晚清军事思想的研究在资料的搜集整理，对一些重要思想观点和人物思想的分析上，应该说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晚清军事思想学科建设和现实国防斗争历史借鉴的迫切要求相比，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特别是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力争打破政治史、断代史的分野，真正从军事思想自身发展的逻辑出发，对晚清军事思想的发展线索进行认真归纳，改变晚清军事思想总体面目模糊，宏观研究欠缺的现状；根据晚清社会变化剧烈、思想更新速度快的特点，要着重加强对军事思潮和兵学家群体兴衰的分析研究。②一些具有强烈现实借鉴意义的课题亟需展开研究。比如，晚清在经营西藏、新疆等边疆、海疆过程中的各种措施就应当认真总结剖析，对如何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和军事各种复杂矛盾丛集的情况下，解决好边疆稳定问题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同时它们也应该是晚清军事思想史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③晚清军事思想在微观研究上仍有许多空白之处需要填补。如过去对人物思想的研究侧重于一流人物，一些政治地位比较低，但在军事思想上颇有贡献的二、三流人物（如军事幕僚、洋务思想家等）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对战争的研究多侧重于从政治、经济、武器装备和人员素质等大的方面找原因，而没有深入到战术战法的层次；对清末大量的军事刊物报纸资料也没有来得及整理和研究；对兵书的考订工作才刚刚起步，等等，都需要学术界逐项地进行艰苦认真的研究。显然，只有在上述诸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之后，才有可能以此为基础，编撰出一部内容全面系统、具有真正学术价值的《晚清军事思想史》。

参考文献

张一文、刘庆、皮明勇：《中国近代军事史研究概览》，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

（刘庆）

中华民国军事思想研究 (study of military though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探讨 1912~1949 年中华民国时期军事思想的活动。

研究概况 中华民国军事思想研究，是 1979 年以来才被开拓出来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并且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关于这一时期军事思想的总体性研究比较少，涉及到相关内容的主要有刘庆、皮明勇编写的《中华文化通志·军事学志》（1998）、《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中国历代军事思想分册》等。前者分别对民国时期的战争观、国防思想、军队建设思想、战略战术思想做了归纳和概括；后者除了在《中国近代军事思想》条目中对民国时期军事思想的演变做了概略的描述外，还选收了一些在当时比较有影响的军事人物和军事著作。此外，梅宪华《民国时期军事书籍述论》（载《军事历史研究》1992 年第 3 期）、史全生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1996）、刘庆《20 世纪中国战略思想演变述略》（载《中国军事科学》2000 年第 2 期）等著述中，还就民国时期的军事著作、军事教育思想、战略思想等进行了大致梳理。但总的说来，学术界对民国时期军事思想的研究尚不平衡，成果也不甚丰富。

研究内容 1979 年以来，中国学术界对中华民国时期军事思想研究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中华民国时期重要人物的军事思想研究 在中西军事理论交流频繁，新旧思想观念碰撞激烈，大小战事接连不断的民国时期，战争的胜负决定了诸多政治派别生死存

亡的关键,也因此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在此期间对战争与军事问题发表过较多见解的人,既有指挥过作战的军队将领,如吴佩孚、冯玉祥、蒋介石等人;也有专门从事研究与教学工作的军事理论家,如蒋百里、杨杰等人。学术界对他们思想观点的研究也较为热烈。

吴佩孚的军事思想研究 在民国重要的军事人物中,曾在民初军阀混战中崭露头角的吴佩孚的军事思想颇受学术界注意。20世纪80年代以来问世的一些传记、论文对此有所论列。其中郭剑林《吴佩孚军事思想简析》(《中国近代军事史论文集》,1987)认为,吴佩孚以封建道统来维系和完善部队的政治思想和组织纪律,其治军的根本思想是“五常八德”,即“仁义礼智信”和“孝弟忠信礼义廉耻”;治军要略首重选将,次重纪律,打仗时不仅靠作战去赢得胜利,还注意舆论和从精神上瓦解敌军,战术上注重不同兵种的性能及攻守运用。《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思想》中《吴佩孚的军事思想》条目,将其主要思想观点概括为:认为兵略与政略密不可分;维护“五常八德”等封建礼教,以效忠于他的护卫亲军为骨干,以经过武术训练的幼年兵为后备,优遇青年学生,以组建其封建军阀军队;强调任人以能,把将才分为天将、地将、神将、威将、猛将、勇将、儒将、大将八类;强调教兵贵愚不贵智,用兵贵智不贵愚,处兵贵宽不贵严,使兵贵严不贵宽;推崇夜战奇袭等。蒋自强《从第一次直奉战争看吴佩孚的军事谋略》(载《军事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中,从剖析战例人手说明了吴佩孚出色的作战谋略,认为他战前积极扩军练兵;交战时善于抓住时机,骗取民心;作战中攻其一路,出奇制胜;自己还能临阵督战,灵活调度,这都对取得第一次直奉战争胜利是起了作用的。学者们还提出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全面地、历史地考察吴佩孚的军事思想,以发现其某些具

有一定借鉴意义的军事遗产。

冯玉祥的军事思想研究 对曾经统帅过数十万西北军将士的冯玉祥,学术界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他的治军思想上。刘其奎《试论冯玉祥治军思想演变》(载《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和军队建设》,1990)勾画了冯玉祥治军思想变化的轨迹,认为其带兵之初,曾借助基督教救国思想治军,以“博爱利他”的教义向士兵施行爱国主义教育。从1924年北京政变至1926年北伐战争,他转为以三民主义为治军的思想武器,主张废除旧的愚兵政策,建立革命的政治工作制度;宣传三民主义,实施政治训练;大力提倡爱国、为民教育;注重道德精神训练和纪律精神教育;摒弃形式主义,注重实战训练;为激励士兵“振其精神,乐其心智”,实施“以乐治军”。1927年北伐战争失败后,冯玉祥投入新军阀混战,其治军思想随之发生逆转,显露出封建军阀思想的落后性;直到“九一八”事变后,他才幡然悔悟,重新与共产党合作,治军思想才得以进步和发展。

蒋介石的军事思想研究 蒋介石在中华民国时期曾担任北伐军总司令、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务,就军事问题发表过许多看法,对国民党军队的建设和活动有重要影响。据此,学术界对蒋介石的军事思想做了初步概括。《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思想》中《蒋介石的军事思想》条目认为:蒋介石的军事思想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与外国军事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在国防问题上,蒋介石主张近代国防决非单纯军事国防,尚有经济(工业)国防、精神(思想)国防;政略高于战略,战略服从于政略;提倡尚武精神,寓将于学,寓兵于农。其中有些观点符合国防建设的一般规律,但由于他残酷镇压人民革命,实行独裁统治,对日寇的人侵妥协退让,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所提出的“全国皆兵”政策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实

施。在军队建设问题上，蒋介石奉行军权至上的原则，坚持建国必须以建军为中心，始终牢牢抓住军权不放；重视军官培养，认为用兵的关键在于用将，打仗就是打将，提出“士兵教育干部化，干部教育超级化”的口号；注重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以治心为治军之本，极力向官兵灌输“礼义廉耻”四维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以绝对信仰统帅为首要纪律，鼓吹一个统帅、一个命令，要求全体军人绝对信仰和服从自己。在战略战术原则方面，蒋介石在各个历史时期，根据当时的条件，针对各种作战对象，采取了不同的战略战术。如北伐战争时期，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以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相结合，打败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数十万军队。在十年内战时期，吸取前四次“围剿”红军失败的教训，第五次“围剿”强调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在军事上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在抗日战争时期，战略防御阶段主张持久消耗战略，以空间换取时间，逐次消耗日军，变劣势为优势；战略相持阶段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在前方发动有限攻势，积小胜为大胜，变劣势为优势；战略反攻阶段实行军事战、政治战与外交战互相配合，在局部地区对敌人发动较大规模攻势。在三年反人民内战时期，初期倚恃其军队数量和装备上的优势，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着眼于占领城市和控制交通线，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受挫后改为重点进攻；在丧失大量有生力量之后，被迫转入全面防御、分区防御和重点防御，最终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主力被歼，结束了其在大陆的反动统治。刘子明在《蒋介石军事思想初探》（载《军事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说，蒋介石的军事思想是多种复杂思想融合在一起的近代地

主资产阶级的军事思想。他对战争的基本看法，如立国必须尚武，战争生于人性等观点，是其指导战争和军队建设的理论依据。蒋介石要仿日本武士道，创中国军人魂，提倡忠义气节，不成功便成仁以及独裁专断和奉行持久消耗战略的军事理论，都与其唯心主义战争观、封建专制和法西斯独裁思想及对战争规律的错误认识有关。

蒋百里的军事思想研究 蒋百里是中华民国时期最著名的军事理论家，著有《军事常识》、《国防论》等许多在当时曾产生重要影响的论著，对中国近代国防建设有较大的贡献，也因此成为中华民国军事思想研究的热点人物。金盛萍《一代军事学家蒋百里》（载《军事历史研究》1987年第2期）归纳了他从1911～1926年间的主要军事著作和演讲后，说明其主要内容是主张加强国防，实施义务兵役制和义务民兵制使军事生活和民事生活融为一体；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采取自卫的方针，用持久的方法对付日本的速决。对蒋百里在国防经济方面一系列有价值的思想观点，余子道《蔡锷（军事计划）和蒋百里（军事常识）两书军事思想》（载《复旦学报》1990年第6期）、《蒋百里国防经济思想述论》（载《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3期）评价说，他倡导在增强综合国力的基础上，强化武力与兵力，建立总体性国防体制，以战胜外敌保家卫国的国防思想；他主张在国家政治经济体制变革的基础上变革军事，革新军制建设崭新的资产阶级军队和军事体制。这些真知灼见，都是中国近代建军思想发展中的不可多得的思想成果。蒋百里的国防思想已经涉及到国防与军事的发展对于国家经济发展的依赖关系，提出了生活与战斗相一致的原则以及适合中国国情的、以国防经济为基础的国防体制。关于蒋百里的御日国防思想，吴仰湘《蒋百里的御日国防思想初探》（载《军事历史》1993年第3期）认

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实事求是地分析国际形势，确定国防战略的目标，将日本列为中国的第一假想敌。二是将中国御日国防的第一线确定在东北，并提出山东半岛是防日的第二要害处。三是提出军事训练要有针对性，以防日为练兵目的。四是提出持久作战思想，针对侵略者利于速战的特点，明确指出中国有地大、人众两个优越条件，不打则已，打起来就得运用“拖”的办法，拖到东西战争合流，中国转弱为强，把敌人拖垮而已。五是全面制定抗击日本侵略的国防方略，提出工业布局要着眼于山岳地带，要使钢铁油煤路矿布局配套，要有战略物资储备，要积极发展空军，培养飞行人才，以利防空和抗日战争。

杨杰的军事思想研究 董亚文《浅谈杨杰国防思想》(载《军事历史研究》1991年第2期)认为，杨杰能联系中国实际，始终以经济理论作为研究国防问题的理论基础，比较正确地阐明了国防建设中物质与精神、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强调要积极、独立自主地建设适应总体作战的现代国防。他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实践，指出世界军事发展的总趋向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机械化力量的增强，新式武器装备的大量涌现，战争必然向着总体方向发展。总体国防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结晶体。军事是结晶体的顶点，是国防建设的核心，政治是国防建设的重要因素，又是加强国家战斗力的手段。而要实现总体国防，首先要实行农业国家的工业化。刘子明著《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史》(1997)专辟一节介绍了杨杰及其名著《国防新论》的有关观点。指出，杨杰反对鲁登道夫的政治服从军事的观点，也不同意克劳塞维茨的军事服从政治的观点，认为政策、经济、军事、文化等都是国防的，是相互渗透、相互隶属的；国防建设包括三个最基本最重要的因素，即人、物和混合因素，混合因素包括经

济、技术、组织因素；国防力量运用四面体包括经济、技术、军事、外交，发挥它们的综合作用，使其适当配合、有机运用，就有由贫弱变富强的可能，就能增强国防力量；现代的国防是人民的国防，应当是为全体人民利益建设，由全体人民去从事建设，建筑在全体人民身上的国防；国防战略原则应当包括实行总体国防、国家工业化、自力更生、实行适应大陆性战争的建军思想和积极防卫等。这些思想在很多地方受到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影响，与他同时期、同阶级的其他军事家的军事思想相比要高出一筹。

关于中华民国时期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研究 学术界对中华民国时期的重要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北伐战争的战略问题 谈方《加伦与北伐战争的胜利》(载《民国档案》1987年第3期)认为，加伦修改了由蒋介石、李济深等制定的平均分配兵力，与吴佩孚、孙传芳同时作战的计划，坚持集中兵力，先鄂后赣，各个击破的主张，促使蒋介石采纳了加伦的“先吴尔后孙张”的正确主张。赵国章《一九二六年南口战役论略》(载《天津师大学报》1987年第1期)还认为，1926年冯玉祥国民军与北洋军进行的南口战役牵制了吴佩孚的军事力量，也促成了北伐军先打吴佩孚方针的制定。对北伐各战场战略战术的特点，也有一些文章论及。其中王星禄《北伐军两湖战场作战特点》(载《军事史林》1986年第1期)将其归纳为速战速决，运动歼敌；逐点夺取，长驱直进；迂回包抄，前后夹击；连续作战，穷追猛打。并认为其缺点是指挥协调不够，战术上有死打硬拼倾向等。

关于国民党军“围剿”中国工农红军的战略问题 从国民党军“围剿”红军战略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文章不多，值得一提的是周宁《第

五次反“围剿”的新战略及其“功效”》(载《党史研究资料》1988年第2期)一文。该文认为,1932年夏国民党军对红军各苏区发动的第四次“围剿”,虽然在中央苏区遭到失败,但这次“围剿”却攻陷了鄂豫皖苏区,达到了从战略上独立中央苏区的目的,并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其后国民党军将重心南移,在第五次“围剿”中实行一套新的反共措施,如推行保甲制,厉行封锁和新生活运动,改革部队编制,开办庐山训练班等,实行以碉堡政策为核心的稳扎稳打、以守为攻、旷日持久、蚕食紧缩的战略战术原则,对中央苏区起到很大的危害作用。

关于长城抗战问题 金以林《论长城抗战》(载《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1期)一文认为,蒋介石虽然进行了一定的抵抗,但指导方针仍然是“消极抵抗,积极谋和”,在华北吃紧的情形下,仍动员南方八省军队,集中50万兵力“围剿”中央苏区,多方破坏冯玉祥在察哈尔组织的民众抗日同盟军,以达到全力“剿共”的首要目的。这种政策的结果是《塘沽协定》的签订,华北门户的洞开。

关于“一·二八”淞沪抗战问题 金再林《南京国民政府对“一·二八”事变的方针》(载《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一文,否认了当时流行的十九路军抵抗是抗命之举的说法。该文认为,战争爆发后,南京政府认为日本的目标是占领上海、南京,控制长江流域,而这是蒋介石所不能容忍的。他在战争期间的方针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但十九路军是想抵抗到底,蒋介石只是以战求和,在这方面二者存在着原则的分歧。

关于“八一三”淞沪会战问题 余子道《论抗战初期正面战场作战重心之转移》(载《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3期)针对台湾军事史和民国史学界的观点指出,南京政府发动和举行淞沪会战的战略意图为:一是保卫

上海地区政治经济利益。二是保卫首都南京和守卫长江。三是为争取国际干预,孤立日本,借以造成和平解决的契机。四是军事战略上分散敌军的兵力,迟滞敌军的进攻,以利于逐步实施“持久消耗”战略。该文不同意台湾学者提出的淞沪会战和华东战场的开辟,诱使日军作战方向从“由北向南”变为“由东向西”,把作战重心由华北移向华东的看法,指出至今仍没有一件足以说明南京政府引诱日军改变战略意图的文件面世,现有史料说明南京政府官员扩大沪战只是为牵制日军在华北的攻势。淞沪会战规模扩大的最后的一步,是蒋介石所始料不及的,而且它并没有最终改变日军的主要作战方向。

关于正面战场的地位问题 截至2000年史学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武汉失守前,国民党的抗战还是积极的,国民党战场是全民抗战的主战场。产生歧义较多的是对相持阶段国民党军战场地位的评价。如丁卫、武正《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载《党史研究》1985年第4期)认为,国民党在武汉失守后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何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正面战场初探》(载《南开学报》1985年第4期)认为,国民党在武汉失守后,抗战仍是努力的,至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正面战场有过几次较大的战役,使日军受到一些消耗,但也确有一部分国民党人制造反共磨擦。也有学者把国民党从片面抗战转向消极反共的时间划到1940年、1943年乃至1944年春。关于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关系问题,中国现代史第四次学术讨论会上进行了热烈讨论。与会学者普遍认为,二者是相互独立又始终存在着互相配合和支持的关系,只是配合的主次有变化。抗战初期主要是正面战场支援敌后战场的开辟和发展,相持阶段主要是敌后战场对正面战场的支持。两个战场既有战略配合也有战役配合,在抗战

初期以战役战斗配合为主,在相持阶段以战略配合为多。

关于持久消耗战略问题 陈兵《中国正面战场对日战略研究》(载《军事历史研究》1987年第2期)认为该战略提出于1935年夏,王树荫《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的持久战略初探》(载《史学月刊》1987年第4期)认为提出于1937年8月。对其内涵,余子道《中国正面战场对日军事战略的演变》(《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做了较充分的说明。认为,“持久消耗”属于一般战略方针,包括持久战略、消耗战略、单纯防御战略、阵地战为主运动战和游击战为辅的战略等构成。持久战略说的是战略时间,即“以空间换取时间”,消耗战略说的是战争的内容,即积小胜为大胜。至于这一战略的局限,王树荫上文指出,它不是立足于对中日战争规律的深刻认识,所采用的片面抗战手段与依赖列强的心理反映了持久抗战的消极性,战术上的阵地消耗与战略上持久有矛盾等。陈兵上文还指出,国民党把持久战略绝对化了,其持久战略是两段论,与中共的三阶段论持久战是不相同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的说法,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为保存实力诱敌深入是必要的,但持久战略的要旨不应是消极地拿国土去换持久的时间,而应是有失有复。也有学者把国民党的抗战战略与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战略进行比较,以更深入地说明二者的不同。如费正、李作民《论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的战略指导方针及其相互关系》(载《国民档案》1991年第2期)指出,尽管抗战伊始,国民党与共产党在持久战略问题上基本取得了一致,但在坚决抵抗、全面抗战、积极防御这三个持久战略的关键问题上,南京政府决策错误,致使其正面战场的作战一开始就蕴含了失败的危机。武汉失守后,正面战场在蒋介石“两期抗战”思想指导下转守为攻,这与持久战方针相悖,因

此在实践中碰壁,1939年冬至1940年1月的冬季攻势失败,主要原因就在于此。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正面战场更见消沉,原因有二:一是以盟国军援和盟军参战为继续抗战条件;二是保持实力以备战后继续控制中国并影响远东。所以蒋介石在正面战场上对敌采取“招架战法”。这种消极避战的指导方针不仅使国民党军战不能胜,守不能固,且伪化现象严重,致使支撑抗战的历史重任不得不由共产党独立承担,所以只有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战略才是正确的。

关于中华民国时期海军、空军建设及战略战术思想研究 近年来,学术界对中华民国时期的海军、空军建设及其战略战术思想的研究逐步深入,并取得了相当的研究成果。主要是:

关于海军建设及其战略战术思想问题 对此,一些著述发表了重要见解。如《中华文化通志·军事学志》认为,民国初期中国在引进西方海战理论的基础上开始自创海军战略体系。1914年,国人将英国海军军官编写的《海军战略及战术》一书编译印行,随后又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海战经验,弥补了原有体系的不足,在编写海军战略教材时将海军战略原则归结为一条,即争夺制海权,强调海军要集中优势兵力,在国防第一线(即敌国海域)作战,以攻为守;要加强海防根据地、海岸要塞的建设;对舰队作战强调要快速集中、各个击破、声东击西、潜艇奇袭、陆军背攻、间接封锁等战法。与此同时,国人还在20世纪30~40年代对马汉的海权理论作了进一步的介绍,并大胆批评其理论失误之处,肯定潜艇、航空母舰对海战的巨大影响,提出中国海军不仅要有巡洋舰和驱逐舰,还要有航空母舰、战列舰、潜艇和航空兵。可惜上述宏伟的海军建设计划得不到国民党政府的支持,故海军理论无论发展到什么地步,也没有它的

用武之地。高晓星《评蒋介石的海防言论和行动》(载《军事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着重分析了蒋介石对民国海军建设的影响,指出他表面上重申了孙中山建设一等海军国家的理想,表示支持建设60万吨舰艇的发展目标,但实际上只是空头许诺,而并未付诸实施。蒋介石轻视海军建设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他头脑深处的“海不能防”、“海不必防”的思想所致。至于抗日战争时期力量弱小的中国海军战略战术上的得失,王云《论中国海上作战力量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载《中国军事科学》1995年第3期)、苏小东《中国海军抗战述评》(载《军事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等文章都指出,中国海军阻止日军沿江西犯的作战,对粉碎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使其被迫由战略进攻转向战略防守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中国近代以来海洋观念淡薄以及执行消极的单纯防御思想,必然导致中国海上力量在抗日战争初期就损失殆尽,这一沉痛教训是值得认真吸取的。

关于空军建设及其战略战术思想问题 中华民国时期对空军建设的重视程度要远胜于海军建设。有些激进的“空军制胜论”者甚至宣称,由于中国海军不发达,“杜黑主义”仍是中国国防的希望和法宝。但由于国民党政府建设空军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围剿”红军和打内战,所以它的力量并不足以与日军抗衡,在反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中没有发挥出空军应当发挥的作用。常惠民、黄裕冲《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空中作战力量建设与使用的主要启示》(载《中国军事科学》1995年第3期)一文,在讨论抗战时期为什么中国空军没有在制止日军向中国腹地推进的作战中发挥显著作用时指出,中国空中作战力量从旗开得胜到丧失制空权、几近全军覆没的事实说明,弱小的空中力量在与强敌对抗的斗争中

必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更难以有效地配合地面和海上作战,因而必须把空军建设摆上国防建设的重要位置;没有自己强大的航空工业,战时就要受制于人,加强空军建设必须高起点地发展自己的航空工业;充分进行战争准备对于以劣胜优具有决定性意义。对抗战时期中国空军的教育训练思想、空战及防空战术思想,有一些学者进行了分析。如季云飞《抗战时期蒋介石空军教育训练思想之探讨》(载《军事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认为,蒋介石在空军中提倡精诚团结、为国捐躯、有敌无我、勇敢迅速、独立自主等五种精神,提出军校教育理论联系实际、教育与社会联系、管教合一的原则;重视作战部队教育训练的规范化建设和从实战出发的各种训练;强调部队官兵的军事学术研究;等等。尽管许多主张带有经验色彩,系统性也不强,对抗战初期的空军建设和提高空军战斗力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中华文化通志·军事学志》认为,抗战以前,中国空军作战主要是参与内战,所以着眼于提高攻击地面目标的技术,缺乏空中格斗训练。抗战时期,在苏联和美国飞行员的帮助下,空中作战能力有很大提高,所采用的游击战术也颇有成效。中国当时因地制宜采用浮游炸弹防空,飞机躲避敌人袭击的敌来我走、敌去我返等战法,对降低空军损失也有一定效果。

研究趋势 从上面的综述可以看出,中华民国军事思想的研究范围还不够广泛,许多学术空白有待填补,以叙述为主、介绍为主的论著还比较多,真正高质量的有独特学术见解的论著较少,一些论著带有明显的“急就章”性质,这与该领域研究刚刚起步的状况是一致的。但学术界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不小的成绩,也显示出该研究领域今后进一步发展的广阔前景,纠正上述不足也是今后的研究方向,想必经过学术界同行的艰苦努力,

中华民国军事思想研究能在不久的将来,取得更多更丰硕的成果。

(刘 庆)

袁世凯的军事思想 (Yuan Shikai's military thought)

清朝末年的军政重臣以及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关于军队建设和军事教育等问题的理性认识。

袁世凯(1859~1916),字慰庭(又作慰亭或慰廷),号容庵,河南项城人。1881年5月入淮军,后升任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903年任练兵处会办大臣,主持清末新军编练。辛亥革命后以武力压迫和政治讹诈手段取得第二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1915年5月接受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随后复辟帝制,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1916年3月袁世凯不得不取消帝制,6月病卒。袁世凯所处的清朝末年,恰值外侮日甚之时,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天朝大国为日军所败,使其深感清军“非患兵少而患在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无术”(《新建陆军兵略存录·袁世凯禀》),原因就在于“军制冗杂,事权纷歧,纪律废弛”(同前),因而主张“权时度势,扫除更张,参用西法,认真训练”(同前)。在清政府“新政”背景下,采用西方军事制度,对清军实施军事改革。袁世凯的存世之作《新建陆军兵略存录》、《训练操法详晰图说》等,是其军事思想的主要载体。主要内容有:

军制改革思想 袁世凯以“更革旧制”为依据,引进西方军事制度,其“专仿德国章程”,建立了由步、骑、炮、工、辎五个兵种,又参照日本陆军师团编制,制定了新的陆军编制法规,在清朝末年基本实现了新军编制的统一。在兵役制度上吸收欧洲征兵制做法,改进招募程序,强调“兵必合格,人必土著”,优选粗通文义的青年人入伍,改变官佐的结构,

提高募兵的质量,为提高新军的战斗力奠定了基础。

军事训练思想 先后采用德、日两国陆军操典,聘用德、日两国军官教习训练军队。将练兵内容分为练规矩、练号令、练身体、练步伐、练器械、练阵式,突出“攻守战阵之法”的训练,强调练兵就是为了用兵,并通过创办随营炮兵学堂、步兵学堂、骑兵学堂等,开展军事讨论,建立军事考核制度和野外对抗演习,提高部队作战能力。其组织编写和修订的《续定夜战暂行章程》、《马队操练应改各法》及《训练要言》、《训哨弁要言》、《训兵要言》等条令规章,对新军战术和训练产生了重要影响。

军事教育思想 以“兴学”为强军之首,认为强国之途在练兵,练兵之要在储将,储将之法在兴学。指出士农工商,均有专学,而兵学尤重。主张兴办军事学堂,并选派优秀人才出洋留学,提出“各国兵学甚精,中国将领习者极少,亟宜创设学堂造就,分班出洋游历”(《新建陆军兵略存录》卷一)。为普及军事教育,曾奏清朝廷通飭各省广设武备学堂,在全国设立小学堂、中学堂和大学堂以为兴学强军之法。

袁世凯对清朝军队实施的各种军事改革,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军事的近代化进程,但其政治上的反动性使抵御外侮的军队变为复辟帝制的工具,并为后来的军阀混战埋下了祸根。学术界对袁世凯以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军事思想及其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的作用等,做过多方面研究,代表性著述有《中国军事通史·清代后期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北京,1998)、《关注与超越——中国近代军事变革论》(皮明勇,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鲍威尔,中华书局,北京,1978)、毛振发《试论袁世凯军事思想》(《军事历史研究》

1987年第4期)、李媛等《袁世凯对近代军队进行的改革及其评价》(《军事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等。

(徐永军)

孙中山的军事思想 (Sun Yat-sen's military thought)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行者,辛亥革命武装起义决策者,中华民国创始人孙中山关于武装革命、军队和国防建设等问题的理性认识。

孙中山(1866~1925),名文,字逸仙,广东香山(今中山)人。1892年在香港西医学院毕业。早年即有志反清,先后成立兴中会、同盟会,从事民主革命,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创立三民主义学说,多次联络华侨、会党和新军发动武装起义。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辛亥革命失败后,领导了反对北洋政府的讨袁战争、护国战争,均遭失败。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决心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新三民主义。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遗著编为《中山全书》、《总理全集》、《孙中山选集》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军事历史学界对于孙中山的军事思想研究日趋活跃,涉及内容主要有:

关于战争观 孙中山在由旧三民主义到新三民主义的政治思想转变过程中,把民族、民权、民生的思想浸透在他所领导的武装斗争中,形成了三民主义战争观,并从三民主义入手,阐述了有关战争的起源和起因、战争与政治、战争与经济、战争与民族、战争与民众等问题。关于孙中山战争观的评价,学术界本着一分为二的原则,认为与同时代的

资产阶级革命家相比,孙中山对战争的认识是深刻的,但由于其所处的阶级和历史时代的局限,对战争的基本认识尚处于感性阶段,对帝国主义是战争根源、阶级对立是战争的重要内在因素、人在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等的认识都显不足。

关于武装斗争 孙中山十分重视武装斗争,主张以暴力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1894年他上书李鸿章失败后,摒弃改良幻想,果敢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自兴中会成立时,孙中山就主张用武力推翻清朝封建统治,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重申了这一方针。1906年,孙中山与黄兴等人共同制订《革命方略》,为进行武装起义拟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和原则,强调要建立一支有战斗力的国民军。此后,孙中山亲自领导了多次武装起义和军事斗争。

关于军队建设 孙中山重视建立新式的革命军队,主张武装民众。在屡经失败的情况下,孙中山学习苏联建军的经验,提出了一整套建设党军的思想,创建黄埔军校,仿效苏联红军制度训练革命军队。曾著《人民心力为革命成功的基础》一文,以人民心力为基础,阐明了武力与民心相结合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孙中山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军队建设思想。其主要观点是:新三民主义是革命军队的灵魂;党的领导是革命军队的中枢;工农民众是革命军队的主体;依靠军校培养新型军事人才等等。

中国史学界对孙中山及其军事思想做过多方面的研究,代表性著作包括《孙中山军事思想与实践》(军事科学出版社,北京,1989),谢健、毛振发著《孙中山军事思想的几个问题初探》(1993),李凡著《孙中山全传》(1991)等,内容涉及革命根据地建设,军事教育,建立海权、空权、陆权等立体国防,一地起义多地响应、分进合击、速战速决的战略战术,“筹

款”、“因械于敌”、以根据地支撑前线的后勤保障思想等。

(季云飞)

黄兴的军事思想 (Huang Xing's military thought)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辛亥革命时期武装起义的主要组织、指挥者黄兴关于武装起义诸问题的理性认识。

黄兴(1874~1916),原名軫,字廛午,号克强,湖南善化(今长沙)人。1902年东渡日本留学。1903年11月在长沙创立华兴会。1905年8月,在东京与孙中山共同创立中国同盟会。1906年12月,在湖南发动萍浏醴起义,首次打出“中华民国”旗号。1907年,与孙中山发动广西钦州廉防起义、镇南关起义。1908年3月,发动钦廉上思起义。1911年4月,发动广州起义(又称黄花岗起义)。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任陆军部总长兼参谋部总长,后参加“讨袁战争”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失败后逃往日、美,继续宣传讨袁,支持护国战争。1916年病逝于上海。后人编有《黄克强先生全集》、《黄兴集》。

黄兴的军事思想主要观点有:以“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的军事战略方针,实现武装推翻清王朝的战略目标;“联络会党,运动新军反政”的武装革命思想;“整顿会党”,以军律统帅军事领导机关以及“努力”、“服从”、“协同”为主要内容的治军思想。

中国文学界对黄兴及其军事思想的研究较为深入,主要著作有,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1981)、(美)薛君度著《黄兴与中国革命》(1980)、李妙根著《黄兴的军事活动和军事思想》(载《军事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季云飞著《黄兴军事思想述论》(载《江海学刊》1992年第3期)等。

(季云飞)

蒋百里的军事思想 (Jiang Baili's military thought)

中国中华民国时期军事理论家蒋百里关于国防问题的理性认识。

蒋百里(1882~1938),名方震,字百里,号澹宁,浙江海宁人。清末先后赴日、德留学军事。辛亥革命后历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吴佩孚军总参谋长、代理陆军大学校校长等职。死后追赠陆军上将军衔。他一生精心研究军事理论,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吸收外国军事理论精华,试图在融会中西军事思想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思想观点。其主要著述有《孙子新释》、《军事常识》、《国防论》等,其中以《国防论》为代表作。该书是作者在不同时期关于国防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论文和讲演稿的辑录,1937年上海大公报社刊行,全书共七篇,约10万字。

国防观 他认识到战争是交战双方政略冲突的结果,政略是由国家根本利益、基本国策决定的,“故政略定而战略生焉,战略定而军队生焉”(《军事常识》第一章)。国防的基本力量由兵力、武力、国力三个层次构成的。从根本上说兵力之源在武力,武力之源在国力。武力是加以军事的组织、锻炼的国力,包括国民的体力、智力和道德力,以及农业、工业、矿业、牧畜和经济等各要素。国力则是人力、地理、物质生产力、机械运动力和政治力五者的综合体。在国力综合体之中,政体和制度堪称“原动力”,而要增强中国的国防力量,就应改革政治,实行民主宪政和义务兵役制,使人民有参与政治之权利,也有保卫国家之义务。

国防建设思想 他主张在国防建设中贯彻“生活条件和战斗条件一致”的原则,建立“既能吃饭,又能打仗”的国防制度。具体说来就是使国防经费的投入向有利于国民产业的方向发展,把军用和民用结合起来,国营与民

营并举,以长期持久的努力来建设、发展国防。他不反对举借外债以加快重工业建设,但必须立足于本国,主要依靠自己的人力、物力、财力。同时还强调要掌握先进的军事技术,重视新式武器的研制,争取站在世界的先进行列。但从中国经济落后的状况出发,强调平时应把武器的研究与大量生产区别开来,“研究唯恐落后,制造唯恐争先”(《蒋百里文集》第256页)。在农业方面也必须求得自足,军事工业和国防交通的布局要合理。这样,才能保证战时有效地抗击敌人入侵。

国防教育思想 他认为除了对军人进行军纪教育和军事知识教育外,还要特别提倡爱国主义教育,树立全军一贯的爱国心。同时还要通过“文武合一”的办法提高国民与军队的素质。建议规定每个高中学生每年要接受两个月的军事训练,只有专门学校以上学校的毕业生才有担任军官的资格,从而达到兵民相通、寓兵于民的目的。

国防战略思想 他认为中国的国防应以自卫为根本原则,绝对排斥侵略主义。但是自卫的战争并不意味着战场上以防御为唯一方针,仍要发扬战役、战斗上的攻击精神。面对日本等帝国主义强国的侵略,应发挥自身地大人众的优越条件,坚持战略上的持久与战术上的速决,恰好是国家实行持久作战的必要条件。

蒋百里的军事思想内容丰富,集中反映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军事理论界的基本观点和态度,在民国时期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也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份有价值的历史遗产。

(刘庆)

蒋介石的军事思想 (Jiang Jieshi's military thought)

中国中华民国时期国民党军统帅,军事家蒋介石关于国防、军队和作战指导问题的

理性认识。

蒋介石(1887~1975),学名志清,名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人。1907年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次年春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不久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回国,1924年被孙中山派赴苏联考察军事。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校长,旋兼任国民革命军军长、总司令等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集国家元首、政党领袖、军队统帅于一身,在新军阀混战中获胜,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对革命根据地发动军事“围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被迫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先后掀起三次反共高潮。抗战胜利后不久即发动大规模内战,1949年率残部退至台湾。1975年在台北病死。蒋介石的军事思想主要内容有:

在战争认识上,主张唯武主义 认为武力是国家生命力的基本要素,战争为人类生存必需的本领,生活就是战争。强调战争胜败决定于精神要素,主张仿日本武士道,创中国军人魂。认为,物质力是战争遂行的一部分因素,但如过分强调物质的作用,必将忽视战争遂行的决定因素 **精神力**。

在治军上,强调治心即为治军之本 主张加强军事学校的建设,要求受训者必须效忠“党”、“国”,对主义和上官,尤其统帅,要格外信仰。同时,他在军队内部建立了严密的政治作战组织和特务系统,实行严厉的思想统治和政治控制。

在战争指导上,主张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战略战术 如:十年内战后期,曾提出“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战法;抗日战争时期,针对日本的速战速决战略,提出了以空间换取时间,持久消耗战略;在三年反人民的内战中,提出了速战速决的战略。在具体作战中,强调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方针,并曾亲

手制订“战争十大原则”：目标原则与重点、主动原则与弹性、攻势原则与准备、组织原则与职责、统一原则与合作、集中原则与节约、机动原则与速度、奇袭原则与欺敌、安全原则与情报、士气原则与纪律。

对蒋介石的军事思想的研究在台湾开展的较早，但大多是对其著作的诠释和有意的美化，如《领袖军事思想》（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台北，1980）等。大陆学者对蒋介石的军事思想研究虽起步较晚，但比较客观公正，涉及的范围也比较宽泛。主要论著有《蒋介石军事思想初探》（刘子明《军事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治军思想探讨》（季云飞，《南京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等。

（季云飞）

杨杰的军事思想 (Yang Jie's military thought)

中华民国时期军事理论家杨杰关于军事特别是国防问题的理性认识。

杨杰（1896～1949），字耿光，云南大理人。曾入北洋陆军速成学堂、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日本陆军大学学习，担任过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陆军大学校长、教育长，参谋本部次长，中华民国驻苏联大使等职。参加过辛亥革命、护国战争、北伐战争。参与指挥第二期北伐战争、蒋唐战争、蒋冯阎战争中蒋军作战。两次率团出访欧美及苏联等国，考察军事和争取军援。军事著述逾百万字，主要有《战争抉要》（1933）、《抗战建议书》（1938）、《国防新论》（1943）、《孙武子》（1943）、《军事与国防》（1944）等。1949年应中共邀请参加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途经香港为国民党特务暗杀。

杨杰军事著述内容广泛，所涉及的军事思想主要内容有：

战争观 杨杰很早就关注战争问题的探讨，30年代的《战争抉要》集中反映了他对于战争问题的认识。

关于战争的根源 他认为，“战争者，人类或团体或国家间，各以强力贯彻其目的或主张之行为也。”战争从人类出现时就存在，只要人类存在，战争就不可能被消灭。这是因为，万物都有生存竞争，“凡有‘生’者，皆趋侵略征服之途，竭其全力于一战，以图强者、优者、胜利者之地位。”另外，人们意志的不同，人口增加，社会发展，武器发展迅速，都会导致激烈的冲突，引起战争。由此他得出结论，“欲根本绝灭战争，舍夺去人类特有性质，及进化之要素；或低下其程度，使侷于下愚；或高尚其程度，使侷于上圣外，别无他法。”“若谓绝对和平，则宁谓为世界所不能有之事。”

关于战争发生的原因 杨杰认为这涉及许多方面，主要有生物学的的原因、情欲的原因、神秘观念的原因、社会发达的原因四类。具体来说有：①生物原因。即生物的本能是好战，生存竞争是生物进化的动力，它导致战争，消灭战争会使人类退化。②经济原因。人类进化，物质财富增加，经济要求也会增加，而物质财富的来源是有限的，对于物质财富的争夺就会导致战争。③民族、文化、宗教原因。一个民族、文化、宗教，常常会排斥其他民族、文化、宗教，或者会扩张自己的民族、文化、宗教，而其他民族会反对这种扩张，就会引起战争。④权势欲望。他认为帝国主义是权势欲望与经济欲望结合的产物，是权势导致战争的一个例子。⑤政治观念的原因。如德国人认为他们是优等民族，有权利消灭其他劣等民族。⑥阶级压迫和殖民地争取自由。他认为，“马克思氏承认社会及经济发达之结果，必发生革命。其论允为至当”。抗日战争时期，杨杰出任驻苏联大使，

较多地接触到无产阶级军事思想，对于战争的认识有了一些变化，对于阶级矛盾和帝国主义在战争中的作用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并认识到战争能够被消灭，不再认为消灭战争会使人类退化。

关于现代战争的性质和特点 他指出，现代战争的特殊性质有三点，即战争的时效性、流动性、并用战。时效性是指战争爆发的突然性，作战行动迅速，战局瞬息万变；流动性是指摩托化和飞机的发展，使后方随时成为战场，交战国无论何时何地都有遭受敌人袭击的可能；并用战是指战争不再是单纯的军事斗争，而是经济、政治、外交、思想方面的综合战争。因此，中国人必须改变观念，深刻认识现代战争的特点，全面加强国防建设。

全体战的国防思想 杨杰认为，“国防，是人类所同具的安全感觉的产物，也可以说是竞争生存的经验集结而成的武库。在并世共存的各民族的国家界线尚未消除，侵略武器未能毁灭以前，它总是跟着科学的进步和人类的欲望继续演进而无有底止。”他从对现代战争特质的认识出发，提出了国防四面体的理论。即国防不应单纯依赖军事力量和军事手段，而应是经济、技术、军事、外交力量及其手段的综合体，当其中一个顶点向上时，另外三点就会一同支持这个顶点。建设强大的国防，不仅要建设强大的军事力量，更要有先进的技术、强大的经济和外交，使军事力量获得巨大的支持，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使国防总体力量获得坚实雄厚的基础。中国当时的经济和技术处在国际水平以下，纵使能够获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战后能不能富强，还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中国要建设强大的国防，迫切需要的是经济、技术的独立和进步，不如此便不能使中国国防从根本上得到加强。杨杰在国防四面体理论中，特别强调了技术在国防和战争中的作用。他认为，技术因素非常关

键，“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本是苏联在实行国家建设过程中所提出的口号，现在搬到中国来，大家也并不否认他的适用。新中国的国防建设，同样地由技术干部来决定”。（《国防与技术》，转引自《杨杰将军传》）杨杰认为，国防四面体理论并不是将国防只限于军事、经济、技术、外交四个方面，而政治也是国防四面体的一个顶点。他指出：“在战争爆发之前，政治组织决定军事组织，可以说军事附属于政治，等到战争爆发以后，军事就成了国防四面体的顶点。政治组织必须适应军事的需要……好比演戏一样，有时节军事当主角，有时节政治当主角，经济、文化也有当主角的机会。它们是相依为命，需要彼此协调，动作一致。”（《国防新论》第 288 页）“一个国家，如果经济地使军事服从政治，这个国家的战争潜力便会逐渐增加，由弱国变为强国。”（同前，第 289 页）

杨杰认为，研究和建设国防，首先要把握住时代、特殊性和重心。把握住时代性，就要使国防必须随着时代、科学的进步而进步，随着战争的发展而发展。在机械时代，必须使国防立足于机械工业的基础之上，国家拥有了强盛的机械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国防才有可能强大。把握住特殊性，就要从本国的实际出发，分析本国政治、经济、文化、国民的素质、性情、心智等方面的特点，建设适应本国特殊性的国防，决不能照搬他国的模式，即使那个国家的国防是最好的。把握国防的重心，就要在国防建设的千头万绪之中，不能平均分配力量，齐头并进，而要找出最重要的、最关键的环节，在这样的地方倾注力量，才能在较短的时间，用较少的气力，收到更大的效果。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搞好国防建设，杨杰主张：

建立一个满足民众利益的政府是建设强大国防的先决条件 只有政府拥有一个能够

得到民众拥护的“主义”，不使一部分民众朱门酒肉，而另一部分民众忍饥受冻，从而得到民众的信任，使民众们自愿踊跃地参加战争，国防才能够建设好。如果政府离开民众，违反民众的利益，它便会被民众抛弃，这样的政府是不能建设国防的。

组织民众，全民皆兵，全民参战 应真正实行征兵制，在全国民众中实施有组织有计划的军事教育，积极进行青年训练、妇女训练，使全国变成一个军营，全体民众都成为战斗员。特别是要把学校教育和军事教育打成一片，使中学生成为优秀士兵，使大学生成为优秀预备军官，文武合一，寓将于学。除此之外，还应以各种俱乐部、协会的形式，普及军事教育，提高国民军事素质。

建立国家动员体制 现代战争是整个国家民族所有一切力量的总决赛，通过国家总动员，运用组织的方式，使各种力量在国防上发挥高度的效能。总动员的范围包括军事动员、产业动员、交通动员、经济动员、政治动员，以及其他社会和精神方面的动员，要制订动员计划，完善动员法规与组织机构，组织演习和检阅，以便一遇战争，就迅速转入战争状态，使整个国防力量尽快发挥效力。

建立适应战争需要的现代军队 世界军事在飞速进步，“各兵种不相关的时代过去了，以一兵种为主体而配合其他兵种作战的核心组织也并不怎样的时髦；最新的军事组织，将是各兵种互相配合的混合组织”。“各兵种有机的混合，已成为军事组织的最高法则。”（《国防新论》第229、230页）中国军队的建设也要符合军队发展的这个趋势。

作战思想 主要内容有：

灵活运用作战方法 不能照搬和套用以往的作战方法，古往今来的作战，从来没有完全相同的情况，也没有同样的方法可以获得作战的胜利，“盖成败之数，在各人运用之妙，

是学贵活用。”（《杨杰将军传》第157页）他认为，一支军队应有统一的战术，来自各路军阀的国民党军要统一战术思想，贯彻一个统一的战术，才能在作战中统一思想，不谋而合，无攻不克，无敌不摧。

努力争取战场作战主动权 杨杰指出，作战的关键是力争作战的主动权，要“能够立于主动的地位，主宰战场支配战局”。“凡事须立于主动地位，以获得自由为主，一旦陷于被动地位，则始终追随敌之动作，结果终归于失败也。”（《统帅纲要草案》二七）而要立于主动地位，就要先于对方集中兵力，出其不意地包围对方，掌握和适时投入足够的预备队等。

恰当运用包围迂回战术 杨杰认为，包围迂回为战术上最良好的方式，在现在火力和进攻方式已大大进步的条件下，“正面攻击远不如迂回或包围之有效”。（《杨杰将军传》第184页）为了达成包围，要“出敌意外，或以雷霆万钧之势使敌纵然察知亦不及应付，如此方能尽包围之事。”但是，实施包围时，要特别严密布置，不使对方知晓，最好同时展开正面攻击以迷惑对方。因实施包围时，正面薄弱，易为对方中央突破，或者在实施迂回包围时被对方各个击破。

攻击战成功的关键在于选择攻击点 攻击战通常要选弱点或者强点，弱点一般是对方的突出部或结合部，易于以较小的损失突破对方。如果找不到弱点，或者兵力有很大优势，可以选择强点，虽然强点攻击困难，损伤很大，但是一经攻陷则全阵地瓦解，故任何损失也应在所不惜。

作战行动要迅速、坚决、坚韧 为了达成作战目的，必须运用迅速机敏的手段，以快速敏捷的集中，果敢的歼灭战，猛烈的追击，打垮对方。若不幸陷于持久战，则以不屈不挠的精神，想尽一切办法，达成作战目的。杨杰的

军事思想在国民党军和国民党统治区曾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其中关于国防建设方面的某些认识和主张,至今也有一定的理论借鉴的意义。

对于杨杰军事思想的研究是80年代开始的。云南大学历史系杨德惠的《杨杰思想研究》(1989),对杨杰的军事思想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她的《杨杰将军传》系统详尽地研究了杨杰的生平事迹,公开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使对于杨杰的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

(金钰)

德国军事思想研究 (study of German military thought)

探讨德国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战争观、军事战略思想、作战指导思想和建军思想等问题的活动。

研究简况 中国军事理论界对德国军事思想的研究,最初是从对德国个别军事思想家、军事统帅以及德国某个历史时期军事思想的介绍和评述开始,逐步过渡到全面、系统和综合研究的。1911年,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潘毅、林逢春等人首次编译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取名《大战学理》,由陆军教育研究社出版发行。至1946年,又先后出版了由瞿寿是、黄焕文、马儒健、陶希圣、杜衡等人编译的多种版本,为研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理论提供了条件。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组织“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介绍、学习和研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196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组织翻译出版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成为世界唯一标准的中文版本。自1938年后的60多年里,以军事杂志、书刊为主的各种载体发表了研究克劳塞维茨战争理论的学术文章,涉及《战争论》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对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观和哲学思想体系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1989年

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介绍了德国参加的著名战争、军事人物及其军事著作。1988年,解放军出版社首次翻译出版鲁登道夫的代表作《总体战》。译者同时对《总体战》及“总体战”理论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认为,《总体战》虽说是伴随侵略战争而出现的,但对“总体战”理论不应全盘否定,它对于研究德国历史和德国军事思想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20世纪70~90年代,以军事科学院为主的学术研究单位对战后德国军事战略思想、作战指导思想和建军思想中的某些问题进行了介绍和跟踪研究。由刘善继主编的《当代外国军事思想》一书,对联邦德国50~80年代的军事战略思想做了较全面深入的分析研究。此间,一批与德国军事思想研究有关的译著和著作相继问世,如《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克劳塞维茨传》、《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大事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海军战略》、《德国国防军大本营》、《隆美尔》、《古德里安》、《曼施泰因》、《党卫队》、《基辅会战》等。1986年,中央军委批准编纂的中国第一部大型专业百科全书——《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将《德国军事思想》和一批德国军事将帅或军事理论家的军事思想等一组条目被收入其中。自此,对德国军事思想研究进入了全面、系统的阶段。1995年,军事科学院又将《德意志军事思想研究》一书作为重点研究课题,组织军内有关专家对德国军事思想进行了系统研究,并于1998年完成。该书是20世纪中国军事理论界在这一研究领域的最系统、最全面和最新的研究成果,也是世界首部对德国军事思想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理论专著。该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以德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为背景,结合当时的政治、经济、哲学等因素,对德国自公元前1世纪~公元20世纪的军事思想形成与发展、

主要内容、主要代表人物及其军事著作等,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和客观的分析与评价。2000年,《诉诸总体战的神灵——鲁登道夫〈总体战〉浅说》一书出版。该书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科学的研究方法,首次对《总体战》及“总体战”理论进行了系统、公正的评介。认为,“总体战”理论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集前人军事思想之大成,对当今军事思想的发展和未来战争仍具有一定意义。

研究内容 20世纪,中国军事理论界对德国军事思想研究,主要是围绕以下问题展开的:

关于德国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研究认为,德国军事思想渊源于公元前1世纪的日耳曼部落,到18世纪末初步形成理论体系。此间,以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为代表的军事思想,为德国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19世纪,在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影响下,一批代表先进思想的德国军事理论家和改革家,对落后的普鲁士—德意志军事进行了大胆抨击,提出许多改革措施。普鲁士军事理论家C. H. von 贝伦霍斯特和A. H. D. von 比洛等主张废除常备军,建立民众武装,反对棍棒教育,强调精神的重要作用。普鲁士的改革家G. J. D. von 沙恩霍斯特、A. W. A. 格奈泽瑙、H. von 博因等,主张废除体罚,取消贵族特权,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使德国军事思想有了突破性的发展。C. von 克劳塞维茨撰写的《战争论》,利用辩证方法探讨了战争与政治、目的与手段、进攻与防御、精神因素与物质因素等的关系,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进步思想和革新精神。19世纪70年代,普鲁士总参谋长H. K. B. von 毛奇在创建新型总参谋部、将先进技术应用与战争和作战指挥方面均有许多创新,对德国军事

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19世纪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从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逐步演变为具有现代科学技术和高度组织性的法西斯帝国主义国家,其军事思想表现出鲜明的侵略性。A. von 施利芬制定的“施利芬计划”、E. 鲁登道夫提出的“总体战”理论、H. 古德里安提出的“闪击战”理论,以及由K. 邓尼茨进一步发展的无限制潜艇战理论,成为德国指导两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理论依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一分为二并分别加入华约和北约,在战争理论、战略方针、军队建设、作战原则等方面与本集团其他成员国采取协调一致的政策。联邦德国以北约为盟友,以华约和苏联为主要敌人,奉行“前沿防御”战略,同时推行“均势战略”,寻求东西方缓和。1990年10月,两个德国实现统一后,将“前沿防御”战略改为坚持北约危机反应战略,由对华约和前苏联的单方向被动防御,改为积极的多方位防御,谋求实现世界政治大国的最终战略目标。

关于战争观 研究认为,二战前德国的战争观旨在混淆视听,为其侵略扩张服务。毛奇的“上帝惩罚论”、F. 尼采的“超人”思想、K. 豪斯霍弗尔的“生存空间”论,以及H. 张伯伦的“种族优劣”论,都是鼓吹侵略战争的理论。

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 德国法西斯认为,和平只是梦幻,战争是拯救人类免遭危机的灵丹妙药,“闪击战”是“最人道的”战争。统一后的德国认为,爆发世界大战的危险已经消失或减弱,但冷战时期被两极体制掩盖的各种矛盾有可能引发新的冲突和战争。

关于战争与政治的关系 克劳塞维茨曾中肯地指出,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的继续,深刻揭示了战争的本质。毛奇也承认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但认为政治只能对战争的开始和结束负责,在战争进程中政治应服从

战争。鲁登道夫则认为克劳塞维茨的论断已过时,政治应为战争服务。

关于战争与经济的关系 弗里德里希二世、鲁登道夫、希特勒等,都非常重视经济在战争中的作用。鲁登道夫在《总体战》中指出,国民经济状况直接关系到军队持续作战能力和战争结局,因此必须动员全国的经济力量投入战争。战后,联邦德国认为,国家的经济实力和技术水平比军事实力可以发挥更大的国际影响。

关于精神因素在战争中的作用 德国历代统治阶级都极为重视精神因素在战争中的作用。认为物质的原因和结果不过是“刀柄”,精神的原因和结果是“刀刃”;军队的精神状态往往决定战争的胜负。战后,联邦德国强调“人是军队的主体”,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军队每个成员的精神力量。

关于战争形态 鲁登道夫在继承国内外军事思想和总结第一次世界大战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系统的“总体战争”理论。他认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不再只是军队的事,它涉及人民生活各个方面。战争胜负不仅取决于军队的强弱,而且取决于民众的精神状态和国家的经济力量。总体战争应不宣而战,为了达到战争目的可以利用各种作战手段。“总体战争”理论成了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战后,联邦德国提出“总体防御”思想,认为未来德国的国家防御是由军事防御和民事防御两部分组成。

关于军事战略思想 研究认为,从19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始终将扩大版图,建立“大德意志民族国家”作为其战略目标。由于德国地处欧洲中心,在实现其战略目标过程中,德国始终将选择首先打击的战略目标作为重要课题。“施利芬计划”是德国第一份正式的两线作战计划,为希特勒发

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提供了现成的模式。纳粹德国为避免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采用了“闪击战”战略。战后,联邦德国奉行北约的“前沿防御”战略,在东部地区组织绵亘的防线,企图依靠本国和北约的军事实力以及美国的核保护伞,阻止华约的进攻。两德统一后,德国的军事战略目标由原来防止华约入侵,扩大为对付来自各个方向的多种威胁,坚持北约危机反应战略,参与解决国际冲突,保卫本国及盟国利益,在继续依靠北约的同时壮大自身实力,以提高本国的国际地位。

关于建军指导思想 研究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军队受《凡尔赛和约》的限制,奉行以H. von 泽克特为代表的小型化、高质量的建军方针。泽克特认为,庞大军队的时代已经过去,未来是小型职业军队的时代。军队越小,越容易通过武器装备现代化提高质量。纳粹德国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疯狂扩军备战,迅速建成一支为其侵略扩张服务的庞大军队。在“闪击战”理论指导下,军队建设的重点是陆军的机械化。古德里安关于组建独立装甲兵团作为陆军主要突击力量的主张,得到希特勒的赞赏。古德里安认为,空军是实施“闪击战”的重要手段,对战争进程具有重大影响,但单靠空军也不能夺取战争的胜利。德国对海军建设重要性的认识远远落后于对陆、空军建设的重视程度。只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A. von 蒂尔皮茨和K. 邓尼茨曾提出过大力发展海军的思想,并在战争中以无限制潜艇战给敌国补给造成重大困难。德国历来强调军权高度集中,重视统帅机构建设。19世纪60年代,毛奇根据武器装备和作战需要调整总参谋部体制,增设铁道处和军事科学处等部门,扩大总参谋部的职权范围,使其成为最高统帅的军事决策机构,为当时各国军队所效仿。战后,联邦德国注意随国际形势和技术装备

的变化不断调整部队编制。自联邦国防军组建至两德统一,陆军进行过三次重大调整,实行过四代编制。两德统一后,德国对军队建设思想进行了重大调整,突出了“轻装、机动、快速反应”的原则,组建危机反应部队,提高快速反应能力,力争建设一支人员精干、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和反应快速的现代化军队。在军队的武器装备上,德军始终强调将最新技术应用于作战,形成装备上的优势。毛奇在普军总参谋部专设“技术室”,对新技术进行跟踪研究,并率先将铁路、电报、滑膛枪(炮)等新技术新兵器应用于作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大力发展和生产坦克、飞机等重型装备,研制V-1、V-2型火箭,以适应“闪击战”战略的需要。战后,联邦德国军队重视提高火力、机动力、指挥控制和后勤保障能力。认为研制和装备高性能武器可增强士兵斗志和提高部队战斗力,但要周密计划,掌握适度,以免因技术装备密度过大,给后勤工作造成重大负担。德国军队向来注重官兵的文化思想和纪律养成教育,强调技术、体能训练。毛奇认为,军纪是军队的灵魂和支柱。鲁登道夫强调以日耳曼的民族精神和宗教意识教育训练部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开展以“爱国”和“效忠”为主要内容的精神教育。战后,联邦德国把教育训练视为军队平时的首要任务,高度重视军队的精神教育,认为训练和知识水平的高低是衡量军队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关于作战指导思想 研究认为,德国一直将进攻视为取得作战胜利的唯一手段。克劳塞维茨所指出,防御与进攻相比,防御是一种较强的作战类型,有以逸待劳、占有天时地利和民众支持等有利因素。弗里德里希二世指出,“防御是最错误的原则”。毛奇认为,进攻是主动行为,防御是被动行为,在同等条件下,进攻优于防御,只要做好准备就应先发制

人发动进攻。施利芬认为,进攻是夺取胜利的唯一手段,防御不应是固守防御。鲁登道夫认为,进攻能在精神上震慑敌人,应不宣而战以达成突然性。希特勒则主张突然袭击,一味进攻。强调迂回包围,重视机动作战,主张歼灭战是德国军队一贯的指导思想。战后,联邦德国将防御作战放在首位,认为防御可削弱敌人,使兵力对比有利于己,为最后决战创造条件。同时,将迟滞作战列为与进攻、防御并列的第三种作战类型。认为迟滞作战不再是战术上处于劣势的标志,而是避免遭敌核武器杀伤、对付敌突然袭击和将敌引入预设目标或地域的有效手段。两德统一后,德国则强调攻防结合。

研究趋势 德国统一后,随着其主权的完全获得,综合国力的增强,地缘条件的改善,国际地位的上升以及影响力的扩大,要求摆脱“政治侏儒”而成为世界政治大国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其军事思想将呈现出谋求政治、经济、军事大国的色彩。21世纪中国军事理论界对德国军事思想的研究,除要关注上述问题外,其在高技术条件下军队建设和作战思想,将成为研究的重点。

参考文献

戴耀先主编:《德意志军事思想研究》,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9。

戴耀先著:《诉诸总体战的神灵——鲁登道夫〈总体战〉浅说》,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

(戴耀先)

英国军事思想研究 (study of British military thought)

探讨英国军事思想的形成、发展、战争观、军事战略、国防和建军以及作战等问题的活动。

研究简况 研究认为,对英国军事思想

的研究是从 20 世纪后期才开始的,并历经了一个从译介原著到研究论述的过程。作为 20 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主要参与者之一的英国,先后造就了两个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即 J. F. C. 富勒和利德尔·哈特。随着他们军事著作的问世,中国翻译出版其中的主要作品成为研究英国军事思想的最初的也是重要的方式。中国军事科学院翻译了利德尔·哈特的代表作《战略:间接路线》(1954)一书(是根据 1957 年俄译本《非直接行动战略》转译的),取名《战略论》,1981 年由战士出版社出版。富勒的代表作《战争指导》(1961)一书的中译本于 1985 年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中国台北出版的“战略思想丛书”中也有该书的中译本。富勒的另一重要著作《装甲战》的中译本由解放军出版社于 1987 年出版。此外,有关英国军事思想的翻译和研究著作有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论资产阶级军事科学》(1957)、《战略思想新趋向》(1981)和《各国防务政策之比较研究》(1985)等。1982 年英阿马岛战争引发了中国军界对英国军事研究的重视。除当年发表了相当数量的军事论文外,军事科学院军事学术杂志社还于 1984 年编辑出版了论文集《马岛战争研究》一书,对英军的作战思想和有关的学术问题作了较系统的探讨。1985 年中国台北出版的“现代战略思潮丛书”之六《现代战略思潮》一书中,专门论述了英国战略思想的要点及其对现代西方战略学的重大影响。同年,英国学者 J. 利德所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军事思想》一书问世,为中国学者研究英国军事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1986 年,中央军委批准编纂的中国第一部大型专业百科全书——《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将《英国军事思想》和一批英国军事将帅或军事理论家的军事思想等一组条目被收入其中。自此,对英国军事思想研究

进入了全面、系统的阶段。1988 年解放军出版社在其出版的“军事理论读物丛书”中首次推出《当代外国军事思想》一书,其中较系统地论述了英国军事思想的内容。

研究内容 20 世纪,中国军事理论界对英国军事思想的研究,主要是围绕以下问题展开的:

关于英国军事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研究认为,英国军事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17 世纪中叶英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摧毁了封建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随后 O. 克伦威尔组建了第一支新型资产阶级军队——新模范军。英国早期军事理论家 H. 劳埃德通过对七年战争等战争历史的探索,开创了研究英国军事思想的先河。19 世纪初,英国海军统帅 H. 纳尔逊率部在特拉法尔加角击败法国和西班牙舰队的海战中,不拘泥于传统的战列线战术,大胆采取穿插分割的机动战术,对后世海军作战思想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19 世纪中叶,英国完成工业革命而成为工业强国,发动了包括对中国的鸦片战争在内的一系列侵略战争,其军事思想充分反映了对外侵略扩张的殖民政策。在战争中,夺取和巩固制海权以及保卫海上交通线,成为英国重要的战略目标,海军始终起到决定性作用。因此,海权论首先在英国受到推崇。海军中将 P. H. 科洛姆的制海权理论应运而生。与海权思想相对应的是 H. J. 麦德金的以陆权为核心的地缘政治学说,一定程度上为英国日后重视欧洲大陆和结成大西洋联盟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的军事技术取得长足发展。H. M. 特伦查德在运用航空兵和发展空战理论方面独树一帜,创建了世界上第一支独立的空军军种——英国皇家空军,被誉为战略空军的先行者。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J. F. C. 富勒和利德尔·哈特提出的机械化战争论和

间接路线战略标志着英国军事思想发展到新的阶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联盟战略占主导地位, 英国除与美国保持特殊关系外, 还加强与苏联合作, 为建立反法西斯同盟创造了条件。大战初期, 敦刻尔克撤退和新加坡失陷使英国再次重视海洋战略, 确保制海权成为其战争指导的基本原则之一。不列颠之战显示了军事技术和战略防空的重要性, 一度处于劣势的皇家空军不断改进空战战术, 给德国空军以沉重打击。1943年卡萨布兰卡会议后, 战略轰炸成为英国空军的重要任务。战争期间, 英国依据机械化战争论, 把其原先规模不大、装备较差的陆军发展成远征北非、反攻欧洲的机械化军队。这说明英国的建军思想发生重大变化, 不仅强调发展海军, 同时重视陆军、空军的协调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综合国力已下降的英国加入了北大西洋条约组织, 执行该组织的作战、建军方针, 其军事思想受到美国军事思想的重大影响。

关于战争观 研究认为, 英国的战争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战争的性质与起因 当代的英国学者认为, 从广义上讲, “战争性质”是指战争的社会和政治性质, 即战争是政策的一种手段。但核战争的发展会改变通常的战争特性。狭义的解释是战争的军事特性, 即根据某一类战争的作战样式来确定战争的性质, 如核战争等。战争是人类连续不断活动的一个社会现象。任何战争都有其发生的直接原因和条件, 认为在“冷战”期间苏联的军事扩张可能是爆发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 而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民族的生活方式则往往是战争的一种目的。

战争的分类 英国学者们把现代战争分为: 使用大规模杀伤武器的全面战争, 没有达到全面战争程度的有限战争, 在第三世界国

家间的局部战争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国内战争等。

战争的可能性 “冷战”期间, 英国十分重视爆发大战特别是在欧洲爆发有限战争的可能性问题的探讨。英国国内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主要的观点是, 实施核威慑和联盟战略可以遏制这类战争的爆发。“冷战”结束后, 英国认为民族主义的重新抬头增大了爆发局部战争的可能性。

关于战略思想 研究认为, 英国战略思想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战略分类 大战略是战略的最高层次, 是国家运用全部国力达到国家目的之艺术。战略则是调动和部署军队和战舰, 迫使敌人在不利的地点、时间等条件下作战的艺术。战略有多种分类方法, 按层次区分, 可分为国家战略、联盟战略、军事战略、军种战略、战区战略。前两者实际上属大战略范畴。按平时和战时区分, 可分为威慑战略和战争战略。根据行动性质区分, 可分为直接战略和间接路线战略, 后者强调通过瓦解敌军、威胁敌人交通线等间接行动取胜。

战略研究 英国视战略研究为发展军事思想的关键。战略研究是制定防务政策和提高军事艺术的重要途径。在其基础上形成的战略学是国家军事思想的核心, 对军事行动具有指导意义。

威慑理论 1955年丘吉尔提出以“恐怖平衡”为基础的核威慑理论, 主张英国发展独立的核力量。英国曾提出“大威慑”概念, 称“第一次打击”为“主动威慑”, “第二次打击”为“被动威慑”。英国的“分级威慑”观点实际上类似美国的“逐步升级”理论。英国在其威慑理论的基础上贯彻有限核威慑方针, 从20世纪60年代起至世纪末, 皇家海军一直在逐步实施由美国提供导弹的“北极星”——“三叉戟”潜艇计划。

关于防务政策 研究认为,英国的防务政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防务政策的出发点 以维护本国的主要利益和本民族的生活方式为根本原则,防务政策的制定受本国经济等因素的制约,并随着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

防务政策的基本点 “冷战”期间,英国的防务政策或军事政策有两个基本点:依靠北约组织,积极贯彻北约的战略方针;依靠核威慑,除了依赖美国的核保护伞以外,坚持发展独立核力量。“冷战”结束以后,情况有所变化,依靠北约这一点基本没有变,但依靠核威慑则转为着重发挥常规高技术武器装备的作战能力。

防务政策的变化 英国在积极贯彻1999年4月北约《新战略概念》的同时,也在与法国等欧盟国家酝酿建立欧洲快速反应部队。其联盟战略中除继续保持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外,开始出现与西欧国家建立联合防务的倾向。

关于建军思想 研究认为,英国的建军思想包括以下几点:

奉行质量建军方针 保持一支小型的高度专业化的职业军队,通过训练提高官兵素质和部队战斗力。

重视改进军事技术 及时淘汰陈旧的装备,研制与采购高技术的新式装备。在武器采购中强调“费效比”,贯彻选择、替代、效率和竞争原则,并明确规定更新武器装备的重点和顺序。

实施大规模军事改革 要点是精简机构,裁减兵员,增强快速反应能力。

强调后备役部队建设 在节省防务开支压缩现役部队规模的和平时期,重视后备人员的训练和教育,以便战时能及时迅速地扩充兵力。

关于作战思想 研究认为,英国作战思

想可从其近20年来有关的局部战争和作战行动中获知:①从1982年英阿马岛战争看,英军在定下决心、兵力部署、远洋奔袭、夺取制海权的两栖登陆作战等方面体现了其传统的军事原则,即目标、决心、集中、机动、节约兵力和突然性。英军在远渡重洋、夺取制海权和制空权之后,对马岛实施突然性的两栖登陆到占领全岛仅用25天时间,速战速决,以较小的代价,取得了战争的胜利。②从1991年的海湾战争看,英军第1装甲师在主攻方向上,担任美第7军的先头突破和保护翼侧的任务,充分发挥了装甲兵的突击力和机动力,体现了英国传统的“装甲战”思想。同时再一次表明,英军能在战场上与盟军特别是美军协同作战。③从1999年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空袭行动中看,英国空军在空袭中,虽然没有担任主角,但却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次代号为“盟军行动”的大规模轰炸之所以得逞,除了北约的兵器先进等原因外,主要是因为从4月中旬起扩大了轰炸的范围,打击非军事目标,如公路、桥梁、发电厂等基础设施,严重影响了南联盟的国民经济和民心士气。这是“间接路线”的作战思想在空战中的实际运用。

发展趋势 21世纪初,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英国军事思想将不断发展。可以预期,英国将继续贯彻依靠北约、保持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和参与西欧联合防务的联盟战略;积极执行北约和欧盟的“维持和平”使命;在保持一支最低限度的核威慑力量的同时,进一步完善“小型化的职业军队”;利用高科技成果提高军队的快速反应能力与特种作战能力,加强空中打击力量,以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这也将成为21世纪中国军事理论界对英国军事思想研究的重点。

(潘嘉珍)

苏联军事思想研究 (study of Soviet military thought)

探讨苏联军事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战争观、军事战略、国防与军队建设、作战等问题的活动。

研究简况 中国军事理论界对苏联军事思想的研究始于20世纪20~30年代。当时为了满足革命战争的需要,翻译介绍了苏军的一些作战条令和军事理论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出于建设正规化军队的需要,人民解放军把对苏联军事思想的研究与借鉴作为军队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50年代,中央军委成立了训练总监部,该部集中了一批优秀的军事翻译和理论研究人员,编辑出版了期刊《军事学习》(后改为《军事译丛》),译介了大量苏军的条令、条例、教程、文章和官方军事文献。60~70年代,加强了对苏联军事思想的研究,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多供内部使用,公开发表的较少。从80年代起,对苏联军事思想的研究进一步深入。这一时期的重大成果是,翻译出版了《列宁军事文集》、《斯大林军事文集》和八卷本的《苏联军事百科全书》,这些成果为中国军事理论界开展对苏联军事思想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此外,这一时期还陆续翻译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苏联军事理论著作,如《军事战略》、《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回忆与思考》、《军事技术进步与苏联武装力量》、《战争史和军事学术史》、《局部战争今昔》等。1986年,中央军委批准编纂的中国第一部大型专业百科全书——《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将《苏联军事思想》和一批苏联军事将帅或军事理论家的军事思想等一组条目收入其中,使得苏联军事思想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进入90年代以来,一批有理论深度、有影响的研究成果陆续问世,其中有军事科学院外军部编著的《苏联军事基本情况》、姚文彬编著的《苏联军

事战略》以及王海等编著的《苏联军事战略概论》等。

研究内容 20世纪,中国军事理论界对苏联军事思想的研究主要是围绕以下问题展开的:

关于苏联军事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过程研究认为,从1917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诞生,到1991年苏联解体,在长达74年的历史中苏联军事思想先后经历了四个时期的发展变化。

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1918~1920) 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苏维埃国家面临着巩固政权、反击国内外反革命势力进攻的任务。在此期间,苏联军事思想逐步形成。主要内容是如何解决建设新型军队、保卫苏维埃国家等理论和实践问题。在战略上主张采取目的明确、行动坚决的进攻行动,把陆军作为战斗威力的基础,强调苏共对武装力量的领导。

和平建设时期(1921~1940) 在这一时期,红军进行了精简整编,实施了军事改革。苏联军事思想在总结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经验的基础上向前发展。在军事战略上,明确树立了积极进攻的思想,提出了大纵深战役理论。30年代后半期和40年代初期,随着苏德战争的临近,苏军加强了对未来战争性质、特点、作战样式和作战方法以及军队建设方向的研究,并得出了一些正确的结论。但也曾经出现了忽视和否定战略防御的倾向。

卫国战争时期(1941~1945) 苏联军事思想在战争中经受了严格的检验,在理论和实践上得到多方面的充实和发展。着重解决了如何判断敌人的主要突击方向,如何恢复被敌突破的战略防线,如何使用战略预备队,以及如何创造转入反攻的条件等重大课题。创造了新型战略进攻样式——方面军群进攻

战役。

战后时期(1945~1991)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军事思想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为40年代中期至50年代初期。苏联军事思想在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主要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重视研制核武器,力图打破美国的核垄断;执行以陆军为主、完善和协调发展各军兵种、全面加强武装力量建设的方针。第二阶段为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期。苏军开始装备火箭核武器,建立战略火箭军和新的兵种,具备了核作战能力。提出核战争的一系列理论原则,强调核武器首先决定军队发展和建设的方向。第三阶段为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期。苏联在战略核力量方面取得了与美国的均势。这一时期,提出了“积极进攻战略”,强调核军备与常规军备并重,谋求全面的优势;既准备打核战争,也准备打常规战争。第四阶段为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1985年,苏联新领导人提出了“新思维”,对苏联的内外政策重新进行反思,其军事思想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认为战争不再是政治的继续,防止战争是苏联军事战略的首要任务;提出了“合理够用”的质量建军原则。

关于战争观 研究认为,苏联在对战争的认识上,虽然提出过不同的观点,但其主流观点是以马列主义军事理论为基础的。

关于战争的起因 苏联提出,战争是阶级社会固有的现象。在当代,帝国主义是一切战争的总根源。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存在着发生战争的危险。只有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消灭阶级,才能够从社会生活中根除战争。

关于战争与政治的关系 苏联遵循列宁关于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的论断,肯定战争对政治的从属关系,同

时,承认战争对政治的反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核武器的出现和发展,某些苏联领导人认为,在核时代,战争已经不再是政治的继续。

关于战争与经济的关系 认为,经济是战争的物质基础,是决定战争进程和结局的基本因素。同时也肯定战争对经济的反作用,强调经济的发展计划一定要考虑未来战争的需要。

关于战争与科学技术的关系 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将引起军事上的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家的军事实力和战争潜力,决定武装力量的发展水平。

关于战争的分类 认为,就政治性质而言,战争分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就军事特征而言,根据规模大小,战争可分世界大战和局部战争;根据作战兵器,分为核战争和常规战争;根据持续时间,分为速决战和持久战;根据作战样式,分为运动战和阵地战。

关于现代战争的特点 认为,未来世界大战的基本特点是:政治目的坚决,规模空前巨大,斗争空前激烈;战略行动的方式多样,且多变;大战爆发后的一定时间内,可能使用常规武器,但随着军事行动的扩大,有可能爆发为全面核战争。

关于军事战略思想 研究认为,尽管各个时期苏联军事战略思想不尽相同,但总体上其军事战略思想是建立在保持超级大国地位,争夺世界霸权的基础上,具有明显的进攻性。其主要内容是:

把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作为军事战略的基本目标 认为,“未来的世界大战将是两个对立的阵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体系之间的决定性冲突”。

准备打各种样式、各种规模的战争 苏联认为,战争样式既可能是核战争,也可能是常规战争;既可能是世界大战,也可能是局部

战争。

突出核武器的作用,谋求对美国的全面优势 关于核武器的作用,尽管各个时期的提法不尽相同,但总体上,苏联一直把发展核武器置于突出的位置,强调核武器将首先决定军队发展和建设的方向,极力与美国争夺核优势,同时也不放弃常规力量的作用,强调“协调地、平衡地发展所有军兵种”。

强调战略进攻,主张先发制人,突然袭击,速战速决 认为,苏军战略行动的基本样式是进攻,先发制人,突然袭击是进行未来战争最有效的方式,是取得胜利的先决条件,可以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

关于建军原则 研究认为,苏联的建军基本原则包括政治原则和军事原则两个方面,共有九个方面的内容:

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苏联在80年代末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之前,一直把共产党对武装力量的领导作为军队建设的基本政治原则。

实行基干军制 苏联认为,保卫国家的职责只能由正规常备军来履行。

建立可靠的动员体制 苏军认为,在保持现役部队的同时,必须建立相应的武装力量动员制度。

实行集中领导和一长制 苏联认为,军事组织的特点和军队的任务性质要求它实行集中领导和一长制。

协调发展各军兵种 苏联认为,军队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协调发展各军兵种,建设全面发展的武装力量。

调整武装力量的组织编制 苏联认为,军队必须及时调整部队和指挥机关的组织编制,以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

改进武器装备 苏联认为,武器和技术装备水平是军队战斗力的主要标志,改进武器和技术装备是军队建设的中心课题。

全面进行教育训练 苏联认为,教育训练是军队建设的重要方面,目的是提高军人的战斗素质、政治素质和心理素质,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保持高度的战备状态 苏联认为,军队的战斗准备是战时夺取胜利的关键。保持部队战备状态的主要途径是完成战役战斗训练和政治教育的各项任务。

关于作战思想 研究认为,苏联在战争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探索、总结和丰富其作战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军事行动的类型 苏军历来把进攻视为基本的、决定性的军事行动类型。在肯定进攻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同时,也承认防御在战争中的作用。

关于作战原则 主要有:军事行动的高度积极性和主动性;夺取并保持战略主动权;正确判断和选择主要作战方向,在决定性时刻和最重要的方向上坚决集中兵力兵器;灵活机动地选择作战方法;军事行动的突然性和出奇不意;军事行动的快速性和连续性;大胆实施机动,迅速突破敌人防线,向深远纵深发展进攻;各军兵种协调行动;及时准备和合理使用战略预备队;储备武器装备和物质器材;全面保障武装力量的战略行动;对武装力量实施集中的、不间断的、坚定的指挥;正规军的行动与游击运动相结合;充分利用精神和心理因素。

关于战略性战役 苏军认为,战争由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大规模战略性战役组成。战略性战役,按行动类型区分为战略性进攻战役和战略性防御战役;按行动规模区分为方面军群战略性战役和战区战略性战役。其中,大陆战区战略性战役特别是战略性进攻战役受到苏军高度重视。此外,苏联还制定了战略火箭军、陆军、空军、防空军、海军的作战使用原则。

参考文献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主编:《苏联军事基本情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

(韩生氏)

日本军事思想研究 (study of Japanese military thought)

探讨日本军事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战争观、军事战略、建军和作战等问题的活动。

研究简况 中国军事理论界重视并积极开展对日本军事思想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前,研究日本近代军国主义形成和发展及当代日本军事战略、建军和作战特点的专论经常见于报刊。80年代末,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的学术刊物《日本问题》刊登《日本军事思想史的考察》一文,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日本军事思想演化的过程,认为日本古代至当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古代,日本军事思想受中国军事思想的影响深刻,是“东方军事思想”体系的分支;在近代,由于受西方军事思想的影响,呈现出“西方军事思想”体系的特色;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事思想表现出为其国家对外侵略扩张政策服务的基本特征;战后,作为战败国,在美国控制下,其军事思想深受美国军事思想的影响,明显烙有美国军事思想的印记。1986年,中央军委批准编纂的中国第一部大型专业百科全书——《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将《日本军事思想》收入其中,自此对日本军事思想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全面、系统的阶段。90年代以来,中国军事理论界对日本军事思想的研究展现了新的面貌。1990年,《日本军事思想研究》一书的编写,被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的重点研究课题。1992年10月,该课题完成,标志着中国军事理论界有了以日本军事思想为研究对象的专著。此后,以日本军事战略思想为研究对象的

《日本军事战略研究》,以日本作战思想为研究对象的《日本作战理论研究》等专著也相继问世。随着中国军事理论界对日本军事思想研究的日益广泛、深入及其有关论著不断涌现,使得对日本军事思想的有关问题基本达成了共识。

研究内容 20世纪,中国军事理论界对日本军事思想研究,主要是围绕以下问题展开的:

关于日本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研究认为,日本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时期:

古代日本军事思想 公元1世纪末2世纪初,日本进入奴隶制社会。3~6世纪“大和时代”,奴隶主阶级已建有正式军队。645年经“大化改新”建立封建制度后,日本不断派使者到正处于盛唐时期的中国,中国军事思想随之传入日本。日本兵学家学习、研究《孙子》、《吴子》等中国古代兵书,写出《斗战经》等兵学著作;日本武将则运用中国古代兵法于军事实践,为日本古代军事思想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德川幕府时代,日本兵学家总结前人经验,提出各种主张,形成多种兵学流派,留下大批兵学著作。随着西方殖民势力东侵,一些思想家著书立说,主张严修武备,加强国防;同时鼓吹对外扩张。

近代日本军事思想 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为日本近代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的形成开辟了道路。明治政府成立后,实行“富国强兵”政策,掀起学习西方的热潮。在军事领域,海军以英国为样板,陆军先后以法国和德国为样板。西方的军事思想、军事制度、战略战术、条令教范等大量传入日本,尤其是C. von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A. T. 马汉的《海权论》对日本军事思想产生深刻影响。西方军事思想的传播,加速了日本的军事改革。明治政府建立由中央统一指挥的常备军,

在全国实行国民兵役制,完善军队指挥体制,设立参谋机构;成立军事院校,加强教育训练;发展军事工业,改良武器装备。至19世纪末,日本军队成为亚洲最强大的军队。在引进西方军事思想的同时,日本继承和发展其封建“武士道”精神。1878年颁布《军人训戒》,要求军人效忠天皇。1882年发布《军人敕谕》,要求军人遵守“武士道”的忠节、武勇和礼仪。“武士道”成为日本军人的伦理规范,日本军队成为具有军事封建性质的资产阶级军队。1890年,首相山县有朋把日本本国疆域称作“主权线”,把朝鲜和中国称作“利益线”。以此为理论依据的大陆政策成为当时日本国家战略的核心。作为推行这个政策的重要步骤,1894年和1904年日本先后发动两场对外侵略扩张的战争,即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战争中,日本军事思想得到发展,陆军获得了大兵团作战经验,海军积累了大规模海战经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出兵中国山东,攫取德国在中国和南太平洋诸岛的权益,并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1927年,首相田中义一召开“东方会议”,确定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方针,提出“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的总战略。从此,日本走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策源地的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日本军事思想
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开始历时14年的侵华战争。1937年制造“七七”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华战争。1941年推行“南进”战略,对美、英、荷兰等国开战,发动太平洋战争。此时,日本军事思想更加明显地呈现出为其国家侵略扩张政策服务的基本特征:在对战争的认识上,提出战争是国家使用武力实行国策的行为,日本进行的战争是实现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圣战”,为此提出动员一切力量并使用一切手段进行

总体战争;在军事与政治的关系上,实行统帅权独立和军政分离原则,将国家政权置于军队控制之下;在军事与经济的关系上,实行战时经济体制,牺牲国民利益;在战争与精神因素的关系上,夸大精神因素在战争中的作用,实行精神“总动员”;在战略指导上,采取突然袭击、先发制人、夺取主动、速战速决的进攻战略,陆军重视大兵团机动作战,海军强调舰队决战;在军队建设上,提出国民皆兵,以“武士道”精神和奴役性军纪将士兵训练成战争“肉弹”;在作战方法上,强调主动性、坚决性、连续性、快速性和近战。由于日本进行的是侵略战争,失道寡助;其人力财力有限,资源匮乏,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树敌过多,战线太长,战略指导的错误等原因,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打击之下,最终无法摆脱失败的命运。

当代日本军事思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军事思想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当代日本军事思想。中国军事理论界对当代日本军事思想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战后日本有关战争观、军事战略思想、军队建设思想和作战思想等方面的探讨和考察。

关于战争观 《日本军事思想研究》一书认为,日本军国主义长期进行侵略战争,被侵略国家人民深受其害,日本人民也饱尝战争之苦,战后初期,在日本一度兴起否定一切战争的“和平主义国家”、“非武装中立”思想。日本宪法第九条规定:“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然而,同时也出现“自卫战争有理”和“自主防御”等主张,认为不能一概否定战争,日本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有权自卫,不应依赖别国而要靠本国的力量保卫自己。7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发表《防卫计划大纲》认为:核恐

怖遏制了核战争和大规模常规战争；在大国核僵持局面下，世界大战得以避免，但国与国之间意识形态对立、民族宗教矛盾和领土资源纠纷导致局部常规战争不断，世界并不安宁；由于亚太地区大国互相制约，日本不致遭到外国大规模武装入侵，但有限的小规模的战争威胁随时存在，因此日本必须加强本国的“基础防御力量”。进入90年代后，伴随国内外形势的巨大变化，否认侵略亚洲邻国的历史甚至美化军国主义的势力在日本滋长，主张修改宪法，走军事大国道路，复活军国主义的思潮成为一种危险的倾向。

关于军事战略思想 研究认为，日本军事战略是从属于美国军事战略的，是美国联盟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军事战略研究》一书指出，战后初期，为适应美国军事战略的需要，日本政府提出安全必须依赖“集体防御”的主张。据此，1951年与美国缔结《日美安全条约》。条约规定，美国对日本的安全承担义务，日本为美军提供基地和设施。从此，日美共同防御成为日本军事战略的“支柱”。其基本构想是：对付核威胁，依靠美国的核遏制力量；对付有限的小规模侵略，原则上依靠本国的力量；依靠本国力量难以抵御时，等待美军支援。但日本也有人反对过分依赖美国，认为《日美安全条约》有损于日本的独立地位，主张“自主防御”。70年代初，日本政府提出“专守防御”的战略方针，即只有遭到外敌入侵时才行使武力，而且必须限制在自卫所需的最小限度以内。日本政府曾向国际社会做出一系列原则性承诺，包括不充当给其他国家造成威胁的军事大国；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只有突然遭到外敌入侵且运用其他手段无法排除时，才行使“国家自卫权”，但必须限制在最小限度；不拥有“集体自卫权”，禁止向国外派遣军队，友好国家遭到武装进攻时不以

武力提供支援；不发展进攻性战略武器，等等。80年代初，日本政府提出“综合安全保障战略”，认为国家安全的威胁不仅有军事威胁，还包括自然灾害、粮食危机、资源危机等。威胁的多样化要求对付威胁的手段多样化。军事手段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但不是唯一手段。只有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外交、文化等方面做出全面努力，国家安全才能得到保障。进入90年代后，日本认为，美苏冷战虽然结束，国际形势总体趋向缓和，但地区性冲突不断，大规模杀伤武器和核扩散的危险增大，周边地区也存在不稳定因素。因此，日本继续采取措施加强日美间军事合作，并提高本国在这一体制中的地位。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日本进一步强调作为西方的一员积极分担西方防务责任。1991年海湾战争后向中东派出扫雷艇，1992年国会通过《联合国维和行动合作法案》，1993年以后向柬埔寨等国家和地区派遣维和部队，从而突破了以往的“专守防御”和“禁止向国外派遣军队”的政策。1996年，日美两国签署《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为新形势下日美军事合作重新定位。1997年，签署新《日美防卫合作指导方针》，将两国的军事合作范围从日本本土扩大到“日本周边地区”。1999年，日本国会进一步通过该方针的三项相关法案，其中的《周边事态法案》不明确将我国台湾排除在外，埋下了日本与美国共同干预我国解决台湾问题的隐患，也为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增加了不利因素。

关于建军思想 《日本军事战略研究》一书指出，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开始重新武装日本。1954年，日本全面实现重建军队的目标，建成包括陆海空三军的“自卫队”。日本军队重建初期，日本政府提出军备要适应国家经济力量的发展水平和国民的心理基础，因而于1957年制定了“根据国情在

自卫限度内逐步发展”的建军方针。随着经济不断发展,日军的实力逐渐增强。7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提出和平时军队建设思想,以美苏之间爆发大战和日本遭到大规模武装入侵的可能性不大为由,主张坚持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以对付有限的小规模侵略为目标,建设一支规模小、质量高、机能齐全以及国际形势一旦有变就能迅速扩充的“基础防御力量”。在宪法和内外舆论制约下,日本军队建设始终以控制数量、提高质量为重点。1958~1976年完成的四次防御力量发展计划和1977~1990年基本完成的《防卫计划大纲》,都贯彻质量建军方针。1995年制定的《新防卫计划大纲》和1996~2000年防御力量发展计划,强调建立“合理、高效、精干”的现代化军队。其要点是:保持军费持续增长,更新武器装备特别是海军、空军的武器装备,改善部队体制编制,加强军队快速反应能力,增强后勤保障能力。

关于作战思想 《日军作战理论研究》一书指出,日美共同防御是日本作战思想的基础。1978年日美两国制定《日美防卫合作指导方针》,随后又制定联合作战计划。按照该方针,日军主要在本国领土及周围海、空域实施防御作战,美军负责提供支援并实施进攻作战。1997年两国签署“新指针”后,日军的任务扩大。在日本“周边地区”发生紧急事态时,日本将承担对美军的后方支援任务。日本认为,日本周边海域和东南、西南两条长1000海里的海上交通线是日本的“生命线”,确保其安全至关重要。据此,日海军采取海上巡逻、护航、防空、港湾与海峡警备等措施,确保周边海域的安全和海上交通线的畅通。为防止敌飞机和导弹的突然袭击,日本高度重视防空作战。其作战原则是:力求将来犯之敌排除在领空之外,以保证领土和国民不受侵害,作战能力免遭破坏。

为此,日本正计划建立严密的防空体系,并决定与美国共同研究“战区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抗登陆、反空降是日本国土防卫作战的主要作战样式。日军强调,海陆空三军密切协同,力求歼敌于海上或水际滩头。1999年3月日本防卫厅长官称:“宪法允许日本对可能向日本发动导弹攻击的外国基地实施先发制人的攻击。”这表明积极防御思想已成为日军重要作战思想。

发展趋势 中国军事理论界认为,进入21世纪日本军事思想的有关内容将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军事理论界对日本军事思想的研究,将主要关注和侧重于日本军事战略思想、建军思想、作战思想等方面的深入探讨和研究。

参考文献

潘俊峰主编:《日本军事思想研究》,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

王颜昱主编:《日本军事战略研究》,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

黄金鹏著:《日军作战理论研究》,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

(潘俊峰)

印度军事思想研究 (study of Indian military thought)

探讨印度军事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战争观、军事战略、国防、建军以及作战等问题的活动。

研究简况 中国军事理论界对印度军事思想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但当时主要侧重于对印军作战指导方面的研究,且研究成果也仅限于内部掌握使用。60年代,特别是进入70年代以后,对印度军事思想的研究,虽然受到了军事理论界的广泛关注,但研究成果也很少见于报刊。进入80年代以

后,军事理论界才真正开始全面系统并有计划地对印度军事思想进行研究。1986年《印度军事思想》被列入经中央军委批准编纂的中国第一部大型专业百科全书——《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条目框架,围绕其撰写和评审,使研究工作又有了新的进展。80年代末,《印度军事思想研究》一书的编写,被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的重点课题。1992年8月,该书完成编写并出版,标志着中国军事理论界有了首部以印度军事思想为研究对象的专著。该书紧紧围绕印度国家战略这一中心问题,对印度军事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与过程、军事战略、国防发展、军队建设和作战思想等进行了全面系统地介绍和阐述。继该书之后,1993年9月又出版了《印度军事战略研究》一书。该书从分析印度的内部与外部的安全环境入手,较详细地论述了印度军事战略同地缘条件、历史传统等国情之间的关系,探讨了印度军事战略的形成、演变及发展趋势。此外,军内外一些报刊杂志也刊载过一些研究印度军事思想的论文。上述研究成果从不同的侧面和层次上,对印度军事思想的形成发展、战争观、军事战略、国防、建军和作战等问题进行了概述。

研究内容 20世纪,中国军事理论界对印度军事思想的研究,主要是围绕以下问题展开的:

关于印度军事思想的形成过程 研究认为,印度军事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大体经历了以下三个时期:

初创时期 研究认为,印度独立之初至50年代末,是印度军事思想的初创时期。这一时期,印度的战略思想主要是以文武两手统一全国,抢占边境争议地区,实现英国统治时期的喜马拉雅山“理想边界”;作战思想沿用了英印殖民军传统的攻防战术;建军思想强调文官治军,成立了国防部,实行陆海空三

军分立;国防发展思想强调优先发展经济,适当发展国防。

转折时期 研究认为,从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是印度军事思想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期。50年代末,印度在南亚推行“西攻北进”战略。1962年印度在中印边境作战失败后,其战略思想由“西攻北进”转为“西攻北防”;其作战思想由单一陆军作战,改为侧重陆空协同的诸军、兵种联合作战;其军队建设思想由偏重发展陆军,改为以陆军为主相应发展海、空军。

调整发展时期 研究认为,从70年代初至90年代末,是印度军事思想进一步调整和发展时期。进入70年代,印度为适应把战略视野转向印度洋的需要,其国防发展战略由国防压倒一切,调整为国防与经济并重同步发展;军队建设强调以提高质量为中心,巩固陆军,提高空军,重点发展海军。80年代,印度军事思想又有所调整变化。其军事战略改为面向印度洋;国防发展战略强调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发展国防;军队建设强调优先发展海军,继续提高空军,大力改编陆军;作战思想强调陆海空三军协同,机械化兵团快速进攻和攻势防御作战。进入90年代,世界两极格局结束,印度军事思想随之发生新的变化。军事战略转为收缩陆地战线,深入印度洋,加强核威慑,国防发展战略转为以发展国民经济为主,国防为辅;建军思想强调压缩军队规模,优化结构,提高质量;作战思想强调积极准备高技术和核条件下作战,快速适应地区冲突等。

关于战争观 研究认为,印度的战争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战争与政治的关系 印度认为,在核时代,核威慑已取代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矛盾、领土纠纷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等,都可能成为战争的起因。

战争与经济、科技的关系 印度认为,国防有赖于经济的发展,并取决于国家工业的发展水平,强调高新技术在战争胜负中所起的作用。

战争中人与武器的关系 印度认为,武器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首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人和武器的高度结合是取得战争胜负的必由之路。

关于战略思想 研究认为,印度战略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以实现国家战略总目标为目的 即依托南亚,走出印度洋,争做一流大国。表现在军事上,即为依托次大陆面向印度洋。印度认为,印度是南亚的主体,南亚的安全就是印度的安全,主张要从印度洋走向世界,做世界海上强国。

以遏制中国为战略思想的核心 自60年代以来,印度一直把中国视为战略上的主要潜在威胁,并把能否长期有效地遏制中国的威胁(常规战争或核战争)做为其战略思想的出发点和终极目的。

以地区威慑为防务政策的目标 要在各个战略方向上以实力优势进行有效威慑,通过建立快速反应部队和发展战略核武器等手段,谋求能在必要时对周边小国实施“惩罚”和对战略对手拥有相应的核威慑能力。^④根据形势需要灵活选择战略伙伴。印度认为,印度属于不结盟国家,且国力、军力有限,不足以独立支持一场现代化战争。因此,要根据形势需要灵活地选择战略伙伴。

关于国防发展思想 研究认为,印度为发展国防主要提出了以下几条原则:①以经济建设为基础,实行国防计划经济,根据形势需要采取兼顾国防,或与国防并重,或优先发展国防的方针。②改革国防工业体系,加强国防工业潜力,实行军民并举的方针。③以自力更生为基点,实行直接进口、特许仿制和自行

研制三结合的方针。

关于建军思想 研究认为,印度在建军方面的主要原则有以下几个方面:①文官治军。总统是武装力量总司令,并委托内阁总理行使领导权,国防事务由文官组成的国防部负责。②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保持对周边国家的军事优势。为此,要建立一支攻防兼备、数质量兼顾、规模适中、具有威慑力的现代化武装力量。③以武器装备现代化为核心,推进军队全面建设。

关于作战思想 研究认为,印军的作战思想受英印殖民军和苏、美军的影响较大,但随着武器装备的更新,逐渐提出了自己的作战原则:①先发制人,快速突击,速战速决。②集中优势兵力于主要方向,实施机械化兵团大纵深迂回和立体攻防。③夺取空中优势,掌握战区制空权。④加强诸军、兵种的协同。⑤提高电子战地位,充分发挥软杀伤武器的作用。⑥加强指挥员的指挥艺术。

发展趋势 中国军事理论界认为,印度随着核力量的发展和军队武器装备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及综合国力的逐渐增强,其军事思想特别是战略思想和作战思想方面将有新的发展。为此,中国军事理论界将密切关注上述变化并加以研究。

参考文献

陈平生主编:《印度军事思想研究》,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

(陈平生)

美国军事思想研究 (study of United States military thought)

探讨美国军事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战争观、军事战略、建军和作战等问题的活动。

研究简况 中国军事理论界对美国军事思想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主要

侧重于对美国备战和作战思想的研究。到了60年代,即开始了对美国军事战略和建军思想的研究,1965年出版了《美国军事战略思想初步研究》一书。该书较系统地论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军事战略和建军思想的演变。80~90年代,对美国军事思想的研究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1986年,《美国军事思想》被列入经中央军委批准编纂的中国第一部大型专业百科全书——《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纂框架,围绕其撰写和编审,使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1987年出版的《核战略纵横》一书,较系统地论述了美国的核战略思想。1988年出版的《当代外国军事思想》和《美国军事战略概论》,较全面地分析、阐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军事战略思想、作战思想和建军思想的发展变化过程。1990年,《美国军事思想研究》一书的编写,被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的重点研究课题。1992年10月该课题完成,标志着中国军事理论界有了首部专门以美国军事思想为研究对象的专著。该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200多年美国军事思想的发展变化及其各个历史时期的核心内容。此后,以美国军事战略思想为研究对象的《美国军事战略研究》和以美国威慑思想为研究对象的《战后美国威慑理论与政策》,以及以美国建军和作战思想为核心的《美国军事基本情况》等著作相继问世。从上述成果来看,中国军事理论界对美国军事思想的研究成果,基本反映了美国军事思想的实际情况,形成了较一致的认识。

研究内容 20世纪,中国军事理论界对美国军事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问题:

关于美国军事思想的形成与发展问题 研究认为,美国军事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

美国独立战争至美国内战时期 美国建

国初期,著名军事统帅G.华盛顿,A.汉密尔顿等人根据独立战争经验,提出了一套适合当时美国国情的作战与建军思想,为美国军事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初步基础。19世纪早期从事军事理论研究的一些学者,如D.H.马汉和H.W.哈勒克等人,开始介绍欧洲的军事思想,特别是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的经验,为美国军事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养料,从而使美国军事思想基本上沿袭了西欧国家的军事理论。

美国内战结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20世纪初期,A.T.马汉的海权论,W.米切尔的空中战争论是这一时期美国军事思想发展的主要标志。这两种理论对美国对外扩张提供了理论依据,对美国军事思想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80年代末 这一时期,美国军事理论界对未来战争,特别是核战争及其战略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先后提出核武器制胜、威慑、有限战争、逐步升级、低强度冲突、宇宙大战、空地一体战、高技术作战以及遏制战略、大规模报复战略、灵活反应战略、现实威慑战略等军事理论和战略思想。至此,美国军事思想形成了理论体系。

美苏冷战结束至90年代末 美苏冷战结束后,美国强调贯彻“预防性防务”思想,主张积极参与“世界军务”,保持对冷战后出现的各种地区危机和冲突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要求军队从事广泛的非战争军事行动;军种和盟军要联合作战,运用高技术常规力量对付地区性战争,把实施信息战作为打赢未来战争的要素,并注重全面加强美军质量建设,突出发展数字化部队。

关于战争观 研究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军事思想在继承资产阶级传统战争观的基础上,根据国际形势和军事技术的高度发展,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

关于战争起因 美国一些学者把战争归结为人类社会的永恒的现象,认为和平是人为的,战争是必然的,现代战争的起因在于人的自私、冲动和愚昧,以及国家内在需要和国际无政府状态。

关于战争与政治的关系 在核武器出现后,美国军事理论界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出现分歧。一些学者认为,在核时代战争已不再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另一些学者认为,在核时代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更加密切,仍然是政治的继续。实际上,美国官方在国际活动中始终把战争作为推行强权政治的一种重要手段。

关于战争与经济、科技的关系 美国军事理论界认为,经济因素是取得现代战争胜利的基本因素。现代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武装力量的强弱,而且取决于支撑战争的经济实力。认为随着导弹核武器、电子技术、空间技术,定向能技术等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军事上的应用,科学技术对战争的影响越来越大。科学技术能改变战场面貌、战争进程、战争方式,甚至决定战争结局。

关于战争分类 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把战争区分为核大战和局部战争。60年代,把战争区分为冷战、特种战争、有限战争和世界大战四类。70年代,以使用的武器为标准,把战争区分为核战争和常规战争两类。80年代,又按战争强度区分为高强度、中强度和低强度战争三类。90年代,又有人将战争区分为武装的和平、低强度冲突、有限战争、全面常规战争、战区核战争、全球核大战六个层次。

关于军事战略思想 研究认为,美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形成其独特的军事战略思想体系的。战后50多年中,美国军事战略思想虽经历了多次大的变化和调整,但其一些基本特征并没有变化。这些基本特

征是:

以称霸世界为基本战略目标 美国军事战略是依据其全球战略目标确定的,直接服从于其全球战略的需要。美国依仗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奉行一系列的向外扩张的军事政策,力图实现其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目标。这是美国军事战略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灵活运用“威慑”与“实战” 美国强调,平时要依靠各种威慑手段对对手实施“威慑”,使之不敢向美国及其盟国发动进攻;一旦“威慑”失灵,战争发生,则通过“实战”击败对手。在“威慑”和“实战”的运用上,强调按“战前威慑”、海外前沿地区直接交战,战争逐步升级的阶梯作出灵活反应,迫使对手就范。

侧重在海外地区作战,以西欧、东南亚、东北亚为战备重点地区 西欧、东南亚和东北亚战略地位重要,因此被美国视为其国家利益息息相关的地区,并作为其海外军事部署的重点地区。

实行海外驻军与本土战略预备队增援相结合的军事部署方针 其基本思想是:以本土为依托,把战略核力量和常规力量的主力配置在本土,以应付全球机动的需要;同时,还在海外配置少部分兵力,实行前沿部署,起“绊索”作用,一旦战争爆发,本土战略预备队将增援前沿部署部队在海外地区作战。

坚持联盟战略,依靠盟国联合作战 第二次大战结束后,美国历届政府都推行联盟战略。其核心思想是:通过与盟国的战略合作抗衡敌对强国;通过盟约对盟国进行约束和控制;在战争中利用盟国的力量,减轻美国的负担和弥补其自身力量的不足。

关于建军思想 研究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建军思想不断变化,有时侧重核力量建设,有时侧重常规力量建设,但基本指导思想比较稳定。主要体现在:坚持文

官治军原则,贯彻军政与军令分开的双轨领导体制;实行现役正规部队,预备役部队与文职人员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强调保持军事技术优势,注重诸军种均衡发展,重视正规化建设和依法治军。美苏冷战结束后,美国强调把美军建设成一支精干的高质量军队。其军队建设的核心思想是:贯彻“合理够用”原则,把军队数量保持在可实现国家安全目标的低水平上;在缩小军队规模的同时增强军队效能,建设“多能部队”;常规部队质量建设侧重发展高技术常规武器,提高部队战备水平以及建设数字化部队、数字化战场和发展数字化装备;在缩小核武库规模的同时,保持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潜地弹道导弹和战略轰炸机“三位一体”核力量的均衡发展,研制小型和微型核武器,并发展反导防御系统。

关于作战思想 研究认为,美军作战思想随着武器装备的发展和军事战略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但其基本作战理论可概括为以下几点:每战均须有明确而可以达到的目标;利用和创造战机,最大限度地发挥主动性;进攻是保持主动,取得决定性战果的最有效手段;在决定性的地点和时间坚决集中兵力;出敌不意,攻敌不备,善于达成突然性;掌握时机,善于实施机动;统一指挥,密切协调;确保安全与后勤支援。美苏冷战结束后,针对高新军事技术的发展和对付地区性战争的需要,美军作战思想有了新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的作战理论,其中包括兵力投送条件下的应急作战理论、联合作战与联军作战理论、全维作战理论、信息战理论和非对称作战理论等。

发展趋势 中国军事理论界认为,随着美苏冷战结束后国际战略形势、经济与科技的发展以及新军事革命的到来,美国军事思想将不断发生变化。中国军事理论界将进一

步加强对美国军事战略思想、建军思想和作战思想新变化、新特点的关注和研究。

参考文献

钱俊德编著:《美国军事思想研究》,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

蔡祖铭主编:《美国军事战略研究》,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

翟晓敏著:《冷战后的美国军事战略》,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9。

(钱俊德)

军事学术研究

(study of military art)

探讨作战指导和军事建设的本质、规律及其指导规律的活动。军事学术是军事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对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军队指挥学、军事情报学、军事运筹学、军制学、军队管理学、战争动员学、军事训练学、国防经济学、军事法学等学科的研究。其中,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是军事学术研究的主导部分。

军事学术的研究对象,是作战指导和军事建设。作战指导,是对战争、战役、战斗给予原则性的指示和引导。包括对作战形势的判断,对作战行动的决策,对各种作战手段的协调运用,对作战各阶段、各方面问题的运筹与照应等。军事建设,是阶级、国家或政治集团为增强军事力量而进行的建设。包括战备、军事训练、行政管理、武器装备建设、战场建设、战争动员准备与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等,其核心是武装力量建设。军事学术研究的基本任务,是揭示作战指导和军事建设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指导军事斗争实践,为赢得战争胜利和国防现代化建设服务。

清末和中华民国时期军事学术研究 中国清末,在西方影响下,军事学术研究的内

容、范围和方法均发生了重大变化。自19世纪60年代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器利兵精”的思想指导下,开始兴办近代军事工业,以新式枪炮装备军队,并按西方模式编练新式海军和新式陆军;伴随武器装备的更新,作战样式和作战方法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为中国近代军事学术的产生提供了物质条件。从19世纪60年代后期至19世纪末,在作战指导方面,开始把军事战略分为攻势战略和守势战略,主张内外并重,强边固海,由陆防为主发展到陆海并重;提出战、守、和三策,强调必能战而后能守,必能战能守而后可以言和。在战役战术上,冷兵器时代海战的接舷战,发展为以运用火器为主的近代海上交战。《北洋海军章程》的制定,标志着近代海军事制已占主导地位。1894年,中日甲午战事日记中首先使用“战役”一词。20世纪初,蔡锷又提出“战役”是一个作战等级,与战争、战斗概念进行了区分。步骑、步炮协同作战开始普遍采用,陆海协同的抗登陆作战也已出现。战斗队形开始由密集向疏散发展,出现攻守结合的野战工事,并提出因险设伏、枪矛配合、接敌近战等多种军队扬长避短的作战方法。在军队指挥上,电报、铁路和航运开始用于作战保障,标志着作战指导已向近代化迈出了一大步。在军事建设方面,提出中国应整顿军队,仿外国军制选练精兵,陆军从旧营制迈向“以步队为主,骑、炮、工程队为辅”的合成军队。在军事训练和战争动员上,在全国广设学堂,建立了较完整的军事教育体系,教习韬略,以储将领之才;广修大路、铁路,以备战时之需等。至中华民国初期,逐步实现了向近代军事体制编制的转变。在军队实行全面变革的过程中,还翻译、编撰了一批外国军事学术著作以及各类操典、教科书等,西方资产阶级战争理论、战略战术、军制学等开始在中国传播。为探寻御敌建军之道,徐建寅编撰的

《兵学新书》、袁世凯组织编纂的《训练操法详晰图说》、姚锡光著的《筹海军刍议》、蔡锷辑录的《曾胡治兵语录》、湖北两湖译书堂编辑的《中西武备新书》、天津水师学堂编绘的《船阵图说》、陆军预备大学堂的教科书《战略学》以及《战法学教科书》、《战术学》等一批著作纷纷问世,在传播外国军事学术、促进中西军事学术融合方面,作了初步的尝试。

辛亥革命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认识到必须重新建立一支革命军队。1921年重建的中华民国政府提出的《十年国防计划》,包括了作战指导和军事建设的主要内容。在讨袁、护国、护法战争以及军阀战争中,作战指导与作战样式均发生明显变化:战略上,北伐战争中的国民革命军,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战术上,预备队的掌握与运用已引起重视,飞机开始用于遂行侦察任务,作战样式偏于阵地战,更加重视防御工事的构筑与改进;同时把战法学分为高级和初级两种,高级战法学含战略学和军制学;初级战法学亦称战术学,含军纪、教育、训练等。指挥上,各级司令部的建设被提到重要位置,普遍注意利用近代交通、通信工具来实施部队机动和提高指挥效能。在军事建设方面,既保留了中国传统军制的特色,又深受西方军事制度的影响,随着武器装备的更新,不断向现代军制发展。北洋政府制定《暂行陆军征募条例》(草案)开始实行募兵制。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集团本着统一军权、改革军制的指导思想,着手军队的整顿和建设,开始改革军制,建立军事统率机构,组建装甲兵等特种兵,发展空军,加强海军,形成陆海空三军的联合军队体制;举办各种军事学校和军官训练团,培养军官和各类专业人才,颁布《训练大纲》、《操典》、《教范》、《阵中要务令》等,对

陆海空三军的军官、军士、兵卒教育训练的内容、方法、要求，作了明确规定。1928年上海真美出版社出版的《军事学术大全》，把军事知识、军事术语和军事基本理论等，均列入军事学术的研究范围。国民党政府1933年颁布的《兵役法》，规定实行义务兵役制，同时，重视用法规调整军内外各种关系，使军制法制化，制定了《陆海空军刑法》等一批军事法规，加强了中国军队近代化正规化建设。在这一时期，翻译出版了欧美的《高等兵学》、《统帅纲领》和日本的《战术学》等大量军事著作。一些将领与军事理论家也著书立说，在结合战争实际运用军事学术方面作了新的探索，如蒋百里的《国防论》，杨杰的《国防新论》，郑介民的《军事情报学》等。从清末到民国初期军事学术研究，标志着传统军事学术向近代军事学术的过渡，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军事学术研究 20 世纪 20 年代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革命实际，不断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丰富实践经验，吸收中国历代和外国优秀的军事学术遗产，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代表的、正确反映中国革命战争客观规律的作战指导与军事建设的理论。其要点是建设人民军队，开展人民战争，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在反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武装起义和革命战争中，毛泽东等人始终把建设一支人民军队作为武装斗争的首要问题。通过“三湾改编”和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理论和原则。在建立革命根据地、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和胜利完成长征的战争中，总结提出

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红军游击战作战原则，以及积极防御，诱敌深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一系列作战方针和原则。军事学术研究的主要成果有：毛泽东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周恩来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关于粉碎第四次“围剿”的电报》，朱德的《怎样创造铁的红军》、《谈几个战术的基本原则》等。这些著作规定了人民军队基本的建军路线和作战原则，成功地解决了如何建军和作战等根本问题，标志着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军事学术理论已初步形成。

抗日战争时期，面对装备优势的敌人，毛泽东等人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确定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实行由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军事战略转变，提出战略上实行内线持久的防御战和战役战术上实行外线速决的进攻战的具体方针，强调在敌后战场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和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方针，创造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军事学术研究的主要成果有：毛泽东的《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军事论著；周恩来的《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等；朱德的《论抗日游击战争》、《论解放区战场》等。这些著作系统地回答了抗日战争中如何以弱胜强、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以及建设抗日根据地、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加强军队建设等诸多重大问题，从而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全面的理论指导，表明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具有鲜明中

国特色的军事学术理论体系已经建立起来。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军事思想中的战争指导艺术,特别是在辽沈、淮海、平津、渡江诸战役中体现出其高超的大规模战役指挥艺术,得到全面的丰富和发展。不仅丰富了战略防御理论,而且创造出独具特色的包括战略决战和战略追击在内的战略进攻理论;不仅发展了运动战和游击战理论,而且创造了包括大中城市攻坚战在内的大规模阵地战理论。在建军方面,及时总结推广了新式整军和群众性练兵的经验,开始探索并取得了进行军种、兵种建设和军队正规化建设的经验;建立和实行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等。军事学术研究的主要成果有:毛泽东撰写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以及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总结提出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等;周恩来的《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等;朱德的《目前形势和军队建设问题》等。这些著作,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军事学术理论的极大丰富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军事学术研究建国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保卫祖国领土完整和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为了加强军队的质量建设,全面提高战斗力,针对作战和军队建设实际,确立与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学术,为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指挥下,战胜了装备高度现代化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摸索创造了现代战争条件下,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丰富经验。其中包括:在战略进攻阶段,执行以运动战为主,以部分阵地战、敌后游击战相结合的战略方针;在战略防

御阶段,贯彻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实施以阵地战为主,以坑道为依托的坚固阵地防御和反击作战,采取“零敲牛皮糖”式的小歼灭战的方法,并取得了诸军种、兵种协同作战和准备抗敌大规模登陆作战等方面的经验。这些经验为毛泽东军事思想增添了现代化战争指导的内容。军事学术研究的主要成果有:毛泽东的《祝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重大胜利》、《抗美援朝的胜利和意义》,周恩来的《抗美援朝,保卫和平》,以及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指导战争的大量文电和战后出版的《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总结》等。

从50年代初起,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领导、指挥了和平解放西藏,解放沿海岛屿和边境地区自卫反击作战及保卫领海、领空的作战。毛泽东根据国家由战争环境转入相对和平建设环境,但又面临战争威胁的实际情况,为准备抵御外来侵略,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制定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提出了加强国防建设和战略后方建设,正确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建设强大的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加强教育训练,搞好战备工作;建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实行平战结合、军民结合的方针;加强民兵建设,完善国防动员体制,以及发展中国的军事科学等一系列指导方针,从而形成了毛泽东国防建设思想,为现代中国军事学术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中国军事学术界对军事学术的理论体系进行了深入探讨。195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颁发的《军语画一》认为,军事学术“是研究指导战争、战役、战斗的方法,它包括战略、战役法、战术三个组成部分”。1959~1960年,军事科学院院长叶剑英对军事科学体系讨论进行总结,指出军事学术主要包括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军制学、战争动员学、军队训练学,以及军事历史学、军事地理学等等。这一时期,军事学术研究机

构逐步完善,形成了专门的研究队伍,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军事学术研究的主要成果有:毛泽东的《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训词》、《给军事工程学院的训词》、《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等;周恩来的《进一步提高军队的政治素养》等;朱德的《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建设海军,保卫国防》等;彭德怀的《四年来的军事工作总结和今后军事建设上的几个基本问题》、《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而斗争》等;以及刘伯承的《在中共军事学院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发言》、叶剑英的《现代战争与军队训练问题》等。

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邓小平针对“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军队建设造成的严重破坏,着手对军队各方面进行整顿,逐步发展形成了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邓小平提出了“继承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发展我国军事科学”的新要求;对世界形势作出了新的战略判断,指出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只要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确定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使之从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到和平时期的建设轨道;提出国防和军队建设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重申“为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而奋斗”的总目标,强调要注重质量建设,精简军队,提高战斗力;明确提出坚持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强调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把科学技术与国防建设和提高军队战斗力紧密联系起来;提出继续坚持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坚持平战结合,军民兼容,依靠人民建设和巩固国防;提出军队要整顿,制度要建立,强调编制就是法律,要

贯彻条令,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等。这些理论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军事建设、作战指导的理论,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现代军事学术研究的发展。军事学术研究的主要成果有:邓小平的《军队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精简军队,提高战斗力》、《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85)等;叶剑英的《发展我国无产阶级的先进军事科学》,杨尚昆的《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粟裕的《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几个问题的探讨》等。

90年代,江泽民依据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在对国际战略形势的新变化进行科学判断的基础上,重申和提出了加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的一系列方针、原则。他强调在和平时期,军队要坚决贯彻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维护国家的领土领空领海主权和海洋权益,保障国家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有一个安全稳定的内外环境;指出要切实提高教育训练质量,努力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具有高度政治觉悟、高昂士气和掌握现代军事技术、懂得现代战争指挥艺术的优秀人才;强调逐步完善军队的体制编制,实行精兵政策,加强质量建设;提出要按照“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全面建设部队。在江泽民主持下,中央军委根据国际战略格局的演变和战争形态的变化,提出在军事斗争准备上,由准备应付一般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向准备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转变;在军队建设上,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努力提高部队应急作战能力。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了《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确定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

军队指挥学、军制学为军事学学科专业的一级学科,标志着军事学术理论体系进一步完善。这一时期,军事学术研究的主要成果有:江泽民在中央军委历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全面加强部队的管理工作》、《在纪念抗大建校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以改革创新的精神迎接世界军事发展的挑战》、《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在视察军事科学院时的讲话》、《关于二十年来军队建设的历史经验》、《贯彻科技战略,推动军队质量建设》、《在首都各界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坚持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等。

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论述,是中国现代军事学术研究的指南。

当代中国军事学术研究的特点 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全球经济竞争加剧,地区性矛盾上升,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此起彼伏,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在军事斗争中地位明显上升,成为影响军事学术研究的突出因素。军事学术研究呈现出了许多新的特点:

着眼适应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需要,修正和更新作战指导理论 中国军事学术界根据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特点和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的要求,进一步加强了关于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特别是传统战法的发展与创新问题的研究,在作战指导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陆续出版了《战略学》、《战略学教程》、《高技术战争》、《战役学》、《战役学教程》、《高技术局部战争与战役战法》、《合同战术学》、《合成军队指挥学》、《陆海空军高技术条件下作战指

挥》、《军事运筹学》等理论专著,编写修订了新一代作战条令、司令部工作条例和各种军事学术教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指导提供了理论基础。在战略研究方面,把巩固国防,抵御外敌侵略,捍卫国家领土、领空、领海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作为军事战略研究的基本目标;针对冷战结束后现实威胁的变化,将立足点从重点准备全面战争,转向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积极配合政治、外交和经济斗争,强调维护世界和平,努力改善国家安全环境。在战役、战术研究方面,形成了联合战役学、军种战役学和合同战术学、军种战术学、兵种战术学若干层次,增设了战役战术理论研究机构,研究队伍逐步壮大,特别是90年代对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的系列研究,促进了作战理论的深入研究和发 展。在军队指挥方面,着眼高技术局部战争的特点开展学术研究,在组织指挥部队战备行动、训练演习、抢险救灾和执行应急任务等方面,丰富了现代条件下组织指挥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经验。随着军事情报工作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高,军事情报学作为一门学科从军队指挥学中分离出来,其学科体系也日臻完善。198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运筹学会成立,军事运筹学成为军事学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军事运筹分析理论研究,将围绕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作战形式、作战方法和组织指挥等方面的内容深入开展。

着重研究相对和平时期武装力量建设特点,探讨新形势下的军事建设理论 围绕多出高质量的成果和人才,为军队和国防现代化服务的目标,在军事建设方面编著出版了《国家军制学》、《军队管理学》、《战争动员学》、《国防经济学》、《军事教育学》、《军事法学》等专著,编修了内务条令、纪律条令、队列

条令和警备条令,制定了国防法、兵役法等一系列军事法律、法规,为新时期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提供了法规性依据。在军制方面,对军队体制编制、管理制度、兵役制度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强调军队体制编制的调整与改革,要适应国家面临的安全形势的需要,贯彻“精兵、合成、高效”的原则;实行精干的常备军与强大的后备力量相结合,把注重质量建设作为根本方针,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使军队具备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所必须具有的整体效能和水平。战争动员的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入,着重研究现代战争条件下寓兵于民、组建预备役部队、实施快速动员等课题。90年代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了东南沿海联合渡海登陆作战等多次实兵演习,召开了城市作战、战法成果论证、夜间训练和科技练兵现场会,把应付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作为训练重点,强调科技大练兵,着重研究和演练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战法;同时,进一步理顺和完善了指挥院校、专业技术院校的培训体制,使院校教育更加适应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建设的需要,逐步形成了部队训练、院校教育和预备役训练的完整训练体系。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国防经济学的研究要努力适应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和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进一步贯彻“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方针,强调国防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加大军民兼容程度,增强平战转换能力,以提高现代国防的整体建设水平。

军事学术研究的理论、方法、手段不断增多,与科学技术的关系更加紧密。军事学术研究的发展,越来越受到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制约。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已成为军事学术理论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当代军事学术研究中,“天战”、“信息战”、“电子战”、“环境战”

等新的概念和理论,无不以空间技术、信息技术、光电技术、遥感技术等高技术为基础。军事力量中技术因素尤其是高技术武器装备等物质因素的比重将不断上升,军事技术对军事学术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充分吸收最新科技成果,最大限度地利用先进军事技术,研究如何发挥高技术武器装备威力的新的作战理论,已成为军事学术的主要研究方向。随着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新的研究方法被大量应用于军事学术研究领域。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在军事学术研究中发挥着巨大作用,现代社会学、统计学、国际关系学等也得到了广泛应用,并开始了对混沌学、军事生态学等新理论的探讨。先进的电子技术、仿真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等,为军事学术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利用电子计算机进行模拟、仿真、分析,利用网络技术获取信息和进行学术交流,综合运用相关学科理论,以系统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军事学术问题,加强量化分析及论证,使军事学术研究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

发展趋势 随着高新技术的飞速发展,军队武器装备不断更新,促使军事学术不断适应军事技术的发展,军事学术理论更新速度将大大加快。当代局部战争的实践也加速了对军事学术理论的检验和修正,不断发展变化的军事技术和作战环境,将使军事学术理论适应战争和军队建设实践的时间跨度大为缩短。军事学术理论的创新发展之迅速,修正更新之频繁,将远远超出过去任何时代,中国军事学术研究,将进入一个新的、更加繁荣昌盛的发展阶段。

参考文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辑,《毛泽东军事文集》,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江泽民:《坚持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载《论党的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委员会:《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学术 I、II,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

(金 鹏)

战略学研究

(study of science of strategy)

探讨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的活动。是军事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最高研究领域,起着主导作用的骨干学科。战略学研究与战役学、战术学研究,三者从不同范围、不同层次反映战争指导规律,彼此联系密切,相互影响,相辅相成,融成有机的整体。战略学研究同军队指挥学、军事教育训练学、军制学、战争动员学、军队政治工作学、军事后勤学和军事地理学等有关学科的研究有密切的联系,并为这些学科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指导,而这些学科的研究成就,又为战略学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提供有益的养分。

战略学的研究以全局性战争行动为研究对象。其任务是揭示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研究和提出战略指导理论、运用原则和方法,为军队建设及其战略运用,准备与实施战争,提供理论指导。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战略学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战争准备与战争实施理论,战略指挥、战略协同与战略保障理论,军队建设与运用理论等。

战略学研究是随着战争实践而形成的,并随着战争实践的不断发展和丰富。战略理论早在古代就相当成熟,但作为战略学学科理论体系的形成和成熟当在近现代。从世界范围考察,现代战略学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之后。到了80年代,无论从其研究内容和学科理论体系,都有新的丰富和发展。

清末和中华民国时期近代战略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以《孙子》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战略理论著作,博大精深,擅长抽象概括,富有深刻的哲理性,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从而奠定了中国古代战略理论的坚定基础。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期,正当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发展之际,中国在闭关自守的清王朝统治下,停滞不前,被西方列强任意侵略、掠夺和宰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其“船坚炮利”的技术和先进的“养兵用兵”之法,闯进闭关自守的中国大门,激发了统治集团中一些开明人士起而效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治国治军的实际行动,明确地提出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养兵用兵”之法,“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思想。但是,所有这些活动和主张,均没有引起清朝统治集团的重视。

与此同时,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在太平天国革命和以义和团为代表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推动了近代战略理论的发展。特别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兴起,把武装斗争放在革命斗争的首要地位,把夺取政权视为头等重要的任务。孙中山等人在组建军事学校、培养军事领导骨干、组织革命军,以及在制定武装斗争革命方略、革命组织体制和作战方法等方面,都有不少建树和贡献,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战略理论的研究和发展。

中国近代战略理论发展,既继承了传统的军事理论遗产,又根据近代战争和军事活动的实践,接受了西方一些先进的军事思想。现在保存的军事理论著作包括军事译著多达1000余种,大致可分为著述、注疏、汇辑、译著四类。较有代表性的著述是:陆军预备大学堂的教科书《战略学》(1908)和蒋百里的《军

事常识》(1917)。还有陈凤翔编著的《军制学》等。在这些军事理论著作和编著中,多有涉猎战略理论领域的研究成就,反映中国近代战略理论的发展水平。陆军预备大学堂印发的《战略学》从战略定义,战略与政治的关系,近代战争的特点,战略原则,战略防御与战略退却,战略进攻与战略追击,以及战略保障等重要战略理论与实践等方面,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和阐述。蒋百里的《军事常识》,是首部全面吸收近代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综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军事理论成就,进而系统地研究、阐述中国的军事理论、国防建设、兵役制度、军事教育与管理等问题的军事思想和战略理论的著作。上述所提到的其他兵书,也是中国近代结合战争实际,兼收中外军事思想和战略理论之精华的颇有影响的军事理论著作。《军制学》的成就在于把有关军事制度方面的问题,上升到战略理论高度加以研究和总结。

随着清朝洋务运动的兴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军事理论著作,也逐渐被介绍进来。如两江督练公所刊印的《日本陆军大学战术讲义》,潘毅等人翻译的《大战学理》(1911)等。《大战学理》即 C. von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是中国最早译本,影响深远。正如译著作者在序言中所说的那样:“是书分篇之众,理想之深,著述之宏富,说案之详明,非普通肤浅之军事学所可同日而语,诚我军界同胞当手置一编而不可缺焉者也。”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明,西方列强的人侵,也同时撞开了中国传统军事思想的大门,开始接受和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战略理论,加之中国近代战争实践的发展,从而对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和战略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推动了军事上的一系列改革和变革,取得了许多新的成就。

国民党政府时期,战略理论的发展反映

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战略理论与中国传统战略思想的结合,出现了国民党陆军学校编印的《战略原理》(1933)、王屏障的《陆军战略》(1937)、蒋百里的《国防论》(1937)、杨杰的《国防新论》(1942)和国民党中央陆军将校训练团印行的《战略学讲话》(1942)等著作。其中当以蒋百里的《国防论》和杨杰的《国防新论》为代表。他们在这些战略理论著作中,对国防观、国防战略方针、独立自主建设国防以及实行防御性国防战略的战略战术原则等,作了比较全面、深入的论证研究,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中国革命战争时期战略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从20年代开始,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理论逐渐形成并迅速得到发展。1924年,在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国民党同共产党实行合作,大批共产党人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参加了先后举行的两次东征和北伐战争。这是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7月1日成立以后,直接参与组织军队和从事武装斗争的一次重要尝试。但到了1927年,正当北伐战争取得节节胜利的关键时刻,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阶级叛变革命,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广大革命群众。大革命归于失败。中国何去何从,命运如何?在这严峻的历史关头,毛泽东根据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创造性地提出了实行中国革命斗争重点由城市转向乡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战略理论,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

毛泽东在领导土地革命战争中,总结提出了进行游击战争“十六字诀”的作战指导原则和以“古田会议决议”为代表的人民军队建军原则。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两个重要历史时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与方

法论,从战略理论和战略实践的结合上,系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和策略问题,提出了一整套适合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的战争指导和战略战术的理论与原则,先后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战争和战略》和“十大军事原则”等重要军事论著,连同他组织指挥许多重大战略战役行动的文电,构成了一个完全适应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理论体系。在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新中国以后,毛泽东又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并根据新的历史时期的新情况、新特点,提出加强国防,建设一支现代化、正规化和革命化军队的理论与原则,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毛泽东战略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

关于战争观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一步阐述了战争的阶级根源和阶级属性,深刻地揭示了战争的本质,提出要支持正义的战争,反对非正义的战争;提出了正确区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政治标准,明确宣称共产党人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用正义战争去反对非正义战争。毛泽东指出,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必须经过战争才能消灭战争。这些重要论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和暴力革命的学说。

关于武装革命和建立农村根据地理论 毛泽东对马列主义军事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提出了关于暴力革命的形式和武装革命道路问题的著名论断。他针对中国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经济十分脆弱,工人阶级队伍还很弱小,另一方面则是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国民经济中占居举足轻重的地位,几亿农民可以汇成一支强大的力量的特点,指出这个特

点造成了中国中心城市由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长期盘踞,形成一股强大的反革命力量,而广大乡村、尤其是两省或数省、数地区交界的地区,则是它们统治比较薄弱的地区,出现了农村制约城市、而不是城市制约农村,广大农村可以不依赖城市而独立生存的特殊局面。毛泽东根据中国社会存在的这一实际情况和特点,并在认真地总结和吸取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和历史上农民起义战争存在的流寇主义等经验教训,提出了中国革命不能走城市工人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道路,而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这一道路的重要战略理论。他亲自参加、组织领导武装斗争实践,领导中国革命实行从城市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比较薄弱的广大农村转移,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在农村聚积力量、壮大力量,待机破敌,进而夺取大中城市和全国政权。中国革命战争所取得的全国性伟大胜利,证明了毛泽东这一战略理论和实践是无比英明和正确的。

关于武装力量建设理论 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重心在农村,实质上是实行“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的特点,指出在中国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军队,就成了武装斗争的首要问题。他为了把一支以农民为主体的武装力量,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军队,能够积极地、自觉地遂行无产阶级革命任务的武装集团,借鉴苏联红军建设的基本经验和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并制定了一整套关于人民军队的建军理论原则,诸如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建立强有力的革命政治思想工作,明确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任务和建军思想,实行“三大民主”、“三队”(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思想和贯彻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方针、原则,有力地保证了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保证了人民军队能够顺利遂行武装革命和保卫无产阶

级政权的光荣使命。

关于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理论 毛泽东运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整套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理论。关于人民战争,毛泽东认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和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兵民是胜利之本;必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作为进行人民战争的依托;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矛盾,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孤立、打击敌人;要把武装斗争这种主要形式同其他各种非武装斗争形式紧密结合;实行主力兵团(野战军)与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与游击队、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与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

关于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毛泽东强调:要从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实行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扬长避短,力争主动,利用矛盾,各个击破;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退却时反对逃跑主义;承认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以歼灭敌人为主要目标,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战略上实行内线持久的防御战,战役战术上实行外线速决的进攻战;采取恰当的作战形式,实行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相结合,适时地实行军事战略转变;慎重初战;实行有利的决战,避免不利的决战等等。

关于战争的物质基础和后勤保障理论 战争是敌对双方政治、经济、军事、自然条件和精神诸力量的竞赛和全面较量。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中,是十分重视和强调物质基础的,强调军事技术和后勤保障的重要作用,并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和实际可能,制定具体的指导方针和政策。他在《论持久战》一文中强调:“中国须努力增加新式武器,以

便在战略反攻阶段中能够充分地执行阵地攻击的任务。”在解放战争后期,毛泽东又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和规模的扩大,适时地指出:取之于敌的方法,已经不能适应战争形势急剧变化的需要,要把加强军队的后方勤务保障工作,作为全党的战斗任务提出来,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毛泽东结合抗美援朝战争实践以及新时期的建军任务和特点进一步提出,对于现代的军队,组织良好的后方勤务工作,有着极其深远的战略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战略理论的发展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所创立的战略理论体系,作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智慧结晶,仍将继往开来,不断向前发展。它一方面开辟了进一步认识客观真理,发展和完善中国战略理论体系的广阔途径,另一方面又要求后人要根据新情况、新特点,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战略理论,正确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军和作战的战略理论与实践问题。邓小平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战略理论。他根据对国际形势的精辟分析和中国可能面临的国际形势及国情、军情的实际,提出要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要把军队的教育训练提到战略地位上来,发展现代化的武器技术装备,精简机关和常备军;要实行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要实行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等等。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在新的历史时期,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特点,明确提出要准备立足于现代装备,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要实施科技强军战略,发展高技术武器装备,培养高科技军事人才,达到“政治合格,军事过硬,纪律严明,作风优良,保障有力”的总要求,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的战略理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军事学术

界结合研究毛泽东、邓小平的战略思想,对战略和战略学的研究不断向深度、广度发展,陆续编写出版了一批战略理论著作和战略学著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军事科学院编著的《战略学》(1987)、《战争与战略问题研究》(1988)、《战争与战略理论集粹》(1989)、《中外军事战略概览》(1991);国防大学左良主编的《战略学教程》(1987)、黄玉章主编的《军事战略概论》(1991)、王文荣主编的《战略学》(1999)等等。同时,也先后组织翻译出版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1978)、若米尼的《战争艺术概论》(1980)、美国陆军军事学院编著的《军事战略》(1986)等等。这些外国军事战略著作的翻译、介绍,对中国军事学术界借鉴外国战略理论研究的有益成分具有重要作用。但从总体上看,近年以来国内外战略学理论著作多侧重于对战略实践活动的原则和方法的研究和论证,而对战略学基础理论如对战略和战略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规律、战略理论体系等研究揭示不够,尤其是对战略学学科理论体系的研究和建树都显不足,从已经查阅到的资料来看,无论是战略理论著作,还是有关百科全书中的战略学条目的释文,对于战略学研究的内容、科学分类,虽然都作了程度不同的揭示和区分,但普遍未涉及战略学的学科理论体系的论述和区分。已经初步提出的战略学下属学科理论体系,包括海军战略学、空军战略学、第二炮兵战略学,目前已有专门著作问世,战区战略学尚在研究中。

发展趋势 随着高技术的发展和信息时代的到来,战略理论和战略学学科理论体系将向新的广度和深度发展。战略学研究将更加紧密地结合现实战略问题,围绕世界军事形势和国际战略格局走向,遏制与制止世界战争,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进行国防现代化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及其战略运用,高技术条

件下局部战争准备与实施等重大战略理论和实践的深入研究,不断推动战区战略理论和军种战略理论研究向深层次发展。战略学研究的方法,也将使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愈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使战略理论体系和战略学学科理论体系更加严谨、科学。

参考文献

军事科学院主编:《战略学》,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

黄玉章主编:《军事战略概论》,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1。

郑文翰主编:《军事科学概论》,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

王文荣编:《战略学》,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9。

(余起芬)

战争研究 (study of war)

探讨人类社会集团之间为了一定的政治、经济目的而进行的武装斗争的活动。战争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在原始社会末期,它是氏族部落之间争夺生存条件,进而蜕变为掠夺奴隶、财富的手段;在阶级社会,则是用以解决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阶级和阶级、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矛盾的最高斗争形式,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它对人类的安危,民族的兴衰,国家的存亡,社会的进步与倒退,产生直接的重要影响。

战争研究的内容,主要有战争观、战争规律、战争指导规律、战争力量(实力、潜力;物质的、精神的)、战争形态、战争史的研究,战争的产生、发展及消亡过程的研究,战争的准备与实施的研究,以及防止或推迟战争的研究等。凡战争涉及的内容都在研究之列。其中重点内容是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研究。战争规律研究,主要是研究和认识战争诸

要素在发生与发展中的本质联系和趋势。战争规律通过战争实践反映出来,支配着战争的发展方向,决定着战争的基本进程和最后的结局等。战争指导规律研究,主要是认识和确定主观指导符合战争客观规律的战略战术,它是人们主观能动的反映论在战争中的生动体现。

自从战争降临人间,人们对战争就有了研究。中国战争研究洋洋大观,系统周全,哲理深邃,影响深远,在世界军事宝库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20世纪中国战争研究有浓郁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随着战争的发展而发展。战争实践十分复杂,战争发展异常快速,研究内容空前丰富,经历了一个由冷兵器战争研究转向火器战争研究,由资产阶级革命战争研究转向无产阶级革命战争研究,由国内战争研究转向现代条件下保卫国防、维护统一的反侵略战争研究的发展过程。其中,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的研究具有重大价值,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20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和数场国际局部战争,对中国战争研究有着重大影响。

清末和中华民国初期的战争研究 这一时期战争频仍而战争理论著述不丰。战争研究的重点是在这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革命战争。世纪之初的抗击八国联军和西藏抗英、东北抗俄的诸战争的结果是丧权辱国。但从抗击外国入侵战争的失败中,不少有识之士进一步认识到大刀长矛抵不过洋枪洋炮,必须研究现代火器战争与组建新军。1901年刊印的《中西武备新书》就包含了“操练洋枪浅言”、“用炮要言”等内容,说明对发展和掌握火器的重视。在战争理论研究方面,1908年出版的应雄图编著的《战略学》,从最高层次论述了战争。他认为“凡战争者,为一国对于他国维持贯彻其国是起见,最后所行之威力手段也。……然此威力手段

必两国互用而后可云战争”。他论述了政略与战争的关系,认为“战争为政略攸关最后之强硬手段”,“战略上至重至要之任务,即在压倒敌的兵力并破坏其一切军资”。他把战略区分为攻势和守势,论述了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军事观点,反映了当时战争研究的一般面貌。孙中山在推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中,把战争研究与革命实际相结合,其研究颇为深刻。孙中山认为,国际间的战争,是由于资产阶级列强为争夺原料、市场和殖民地而引起的;国内战争是由于社会不平等、人民不能生存造成的。他指出,战争行为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文明与野蛮之争”、“公理与强权之战”。他所倡导和实行的反清、反袁、护法战争,是“为了扫除中国一切政治在社会上旧污染,而再造一庄严华丽之新民国。”他认为,战争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凡国家政策既定,必先用外交手段以求达其目的,外交手段既尽,始可及到战争。”他认为,战争依赖经济,战争对经济有破坏作用,也有促进作用。他特别强调建立一支国民军,通过武装革命,实现政治主张,以武装手段推翻清朝统治,打倒军阀。他在1906年制定的《革命方略》中,为武装起义、夺取政权规定了一系列方针、原则。他在1921年担任非常大总统时提出《十年国防计划》,其内容包括国防方针、军备、科学、作战、军制等62条纲目,这是他建立中华民国以后第一次论述国防的指导纲领。孙中山的许多军事言论和著作,收录于《孙中山全集》。他对于战争研究的成果,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新水平,开创了新局面。这些研究成果,不但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战争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对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蔡锷是中国近代的军事家,他强调习兵尚武,实行军事救国。他组织撰写的《军事计划》,主张军队体制应编成野战军、守备

军、补充军、国民军和特种队,使之遂行不同的作战任务。义务兵役制必须实行征之能来,来之能教,教之能归,归之能安,临战即至的“五要件”。他编辑的《曾胡治兵语录》,阐述了治国必须慎重选将,用兵应以安民爱民为本,战守之法应因时制宜,审势以求当,每战必须周密准备,战必制人,以消灭敌有生力量为上等。这些研究成果的某些方面,在护国战争中有所体现。

中华民国中后期的战争研究 经过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受世界大战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战争研究内容较为丰富。由于战争中大量使用空军、海军,出现了登陆作战和空降作战等新样式,战争形态呈立体化趋势。现代化战争研究成为当时的一股潮流。蒋介石作为国民党军统帅,视军权为其独裁统治的基础,其军事思想集外国资产阶级军事思想、法西斯军国主义思想和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为一体。他的唯心主义战争观认为,战争为人类生存必须具备的本能。他否认阶级斗争,鼓吹中国革命不能以阶级斗争为方法,国民党领导的战争是以全民族社会为本位,即不牺牲某一阶级的利益,也不只图谋某单一阶级的利益,这当然是一种欺骗,目的是为了麻痹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革命斗志,蒙骗广大人民群众参加他的不义战争。他重视国防,但不适当地提出一切政策都要以“国防为中心”,强调总体性战争和总体性国防,主张要以政治、经济、教育、文化以及人民生活等凝结而成为国家之武力,提倡发展国防科学技术和尚武精神。由于受欧美现代战争思想的影响,在军队建设上,他强调发展海军、创建空军和机械化部队;在战争指导上,他强调以变制敌,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突然袭击,对弱敌速战速决,对强敌持久消耗。他对战争研究的成果,散见于他的讲话和文电中,集中反映在《蒋公全集》等著作里。上述言论

和著作,反映了当时的研究水平。蒋介石对战争研究的某些认识反映了战争的一般规律,在反封建的革命时期发挥过重要作用,在抗日战争中也有进步的表现。但由于他代表了帝国主义、官僚买办阶级的利益,坚持唯心主义的战争观和战争指导,终于避免不了失败的命运。蒋百里、杨杰是民国时期的军事理论家。蒋百里曾赴日、美、欧考察,倡议发展空军,建设现代化国防。《国防论》是其代表作。其中说到经济力即战斗力,总名之为国力。国力有人、物和组织三要素。蒋百里在抗日战争之前,就预言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并拟就多种国防计划,抗战爆发后发表《抗日基本观点》,断定日本必败,中国必胜,说明他对战争研究之深。杨杰曾考察德、法、英、苏等国。他撰写的《战争抉要》是战争研究的代表作。书中认为,战争是人类或团体或国家间,各以强力贯彻其目的的行为。他引用马克思观点,认为暴力为“革命唯一方法”。但他又以生存竞争来解释战争,认为战争的根源在于人要求生存的本性,所谓“生即是战”、“战争不能灭绝”。他阐述了发生战争的生物学、情欲、神秘观念、社会发达、民族观念、阶级压迫等十一种原因,主要从人性的角度表达了他的战争观。关于政略和战略的关系,杨杰认为决定战争目的及其大方针以政略为主,战略为辅,若两军渐近决战之时,则战略为主,政略为从。白崇禧是国民党军高级将领,较早提出了游击战配合正规战、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思想。他主编的《游击战纲要》认为,游击战是长期抗战、消耗敌人、争取主动地位的战法。白崇禧的主张对国民党确立抗日战争持久消耗战略有重要影响。

中国革命战争时期的战争研究 以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开始了自己领导的武装斗争。从此中国战

争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即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战争研究的领域。这一时期的战争研究,以赢得战争的胜利为出发点和归宿点,实践指导性强,在战争理论上亦得到空前的发展,形成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体系。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将领,他们对战争研究都有卓越成就。尤其是毛泽东,他是伟大的军事家、战略家和统帅,也是集中国革命战争研究之大成者。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认识、研究、指导战争,把战争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境界。他从战争本质的内在联系与外部事物的关联来分析解剖战争的特点,从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的高度来研究战争。毛泽东认为:战争是从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斗争形式,不懂得它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战争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指导战争,就不能打胜仗;历史上的战争只有正义和非正义两类,要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发展经济是保障战争胜利的物质基础;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研究和指导战争要着眼于战争特点和发展;必须充分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毛泽东所提出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战争理论和实践。他提出并肯定游击战争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战略地位;主张实行积极防御战略、反对消极防御战略,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强调

战略上的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与战役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相结合,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紧密配合并适时实行战略转变;要求慎重初战,实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战;等等。毛泽东求实的、科学的战争研究,不仅将中国革命战争引向了胜利,而且在军事理论上也做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的军事著作、军事方面的文电,尤其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十大军事原则》以及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作战方针等,是中国革命战争研究的典范。他揭示的战争一般原理和战争观、方法论原则具有普遍意义。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战争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战争研究的重点从国内阶级战争转向保卫国家的现代条件下的反侵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加深了中国对现代化战争的认识,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集中反映了抗美援朝战争研究的成果。该书认为,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人民军队所进行的战争中体现现代化条件作战最充分的一场战争,它的基本特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一场具有相当规模的国际性战争;战争双方的经济力量和军事技术装备优劣异常悬殊;战场地理条件特殊;异国作战,人地生疏,语言不通,补给状况敌优于我。学习和研究抗美援朝战争,对于国防现代化建设和未来反侵略战争大有教益。中印、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促进了中国在一定战略环境下如何加强国防和进行局部战争的研究。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战争研究呈现了一片繁荣景象。在战争起源、原因、定义、性质、规模,现代战争的根源、形态、特点和指导等方面,都进一步展开了研究和不同意见的交流,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及著作。如对战争起源于私有制还是

阶级社会,核战争是不是政治的继续,现代战争的根源是否局限于帝国主义,以及现代战争的多方面动因和特点等等,广大学者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见解。宋时轮针对原来的战略方针“积极防御、诱敌深入”,提出“诱敌深入”不宜作为战略方针的意见。1979年1月,粟裕在国防大学所作《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几个问题的探讨》报告中,提出了当代战争已进入导弹、核武器和电子技术装备的新阶段,传统的作战形式面临着新变化。80年代中期,中国在战争准备上实行了指导思想战略转变,推动了对中国国防发展战略和新型战争形态的研究。此时的战争研究,主要集中于局部战争和高技术战争研究方面。关于局部战争研究,先后出版了《现代有限战争的理论 and 战略》(1988),《局部战争概览》(1988),《20年战争管窥》(1989),《现代局部战争理论研究》(1997),《战后局部战争演变论》(1999)等专著。军事科学院撰写了未来局部战争的战略指导方面的研究报告。上述著作和研究报告除了介绍局部战争的基本情况之外,较系统地分析了有限战争与局部战争、军事冲突与局部战争的区别,从政治形态和技术形态分析了局部战争的发展轨迹,结合国情和军情提出未来局部战争战略指导的建议等。关于高技术战争研究,先后出版了《高技术战争》(1987)、《高技术战争论》(1993)、《高技术与现代军事丛书》(1993)、《信息战争与军事革命》(1995)等专著。这些著作阐述了高技术战争概念和新战争形态萌生的问题,认为高技术战争是“主要以使用高技术性能的武器和使用与高技术武器相适应的作战工具、作战方法进行的战争”,“是新技术革命时代的产物”,是一种新的战争形态;分析了高技术战争的特征及其对军事的影响等;论述了高技术战争的客观环境、物质基础、基本特

征、军事战略、作战理论等问题。同年国防大学出版社还出版了《高技术与现代军事丛书》,从不同侧面论述了高技术战争问题。有的学者还提出了信息战、信息战争的概念并就如何迎接世界军事革命挑战等问题进行了研究。90年代初,中国正式明确把战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条件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上来。这一决策,指明了战争研究的重点内容,全军掀起了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研究热潮。在防止战争问题上,中国十分重视运用和平谈判解决争端,同时也注意运用威慑手段,使对方明确侵略中国、破坏统一的后果。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流、世界大战有可能避免以及防止战争的一系列论述和主张,都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深化了中国的战争研究。江泽民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立足于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迎接世界军事形势发展的挑战以及开展和平外交,与周边邻国建立和平友好关系和战略伙伴关系等的理论与实践,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和邓小平军事理论,把中国战争研究推向了世界前沿水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战争研究系统完整,研究内容覆盖面大。在战争理论研究方面有战争观、方法论的研究,战争形态、规模、动因的研究以及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研究等。在战争实践研究方面,有抗美援朝战争研究,东南沿海和“三北”方向抗击外敌可能入侵战争的研究等。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方面,出版了《毛泽东军事文集》、《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毛泽东军事战略论》等。在战争史研究方面,出版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等。在国防建设研究方面,军事科学院还进行了2000年中国国防系统研究,全面论述了中国国防建设和战争准备所涵盖的内容。其他还有战争与战略研究、作战

方法研究、军队建设研究、战争动员研究以及武器装备发展研究等。1997年出版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是中国第一部全面系统地介绍军事领域各方面知识的大型军事专业百科全书。全书分军事思想、军事学术、军队政治工作、军事后勤、军事技术、军事历史和军事地理等七个门类 57 个学科,收条 1.1 万余个,释文 1 500 余万字,囊括了战争研究涉及的方方面面。这期间,学术界对世界上发生的一些局部战争如越南战争、中东战争、马岛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等的研究,丰富了中国战争研究的内容。

发展趋势 21 世纪多极化世界格局的形成过程将对战争的发生、发展产生新的影响,中国的战争研究也将在这个大前提下进行。世界军事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安全环境的需求,现实地标示着 21 世纪中国战争研究的基本走向。现代技术条件下尤其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仍是研究的重点。新型战争形态(如信息化战争,网络化战争等)的研究,将成为战争研究的新热点。由于知识经济的发展必将对战争形态、战争理论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21 世纪的中国战争研究将更加注重于军事知识和军事信息的传播、创新和应用。20 世纪的战争经验作为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将成为中国战争研究的一项十分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刘继贤主编:《战争与战略问题研究》,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

孙向明、张辉灿主编:《战争与战略理论集粹》,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

刘子明著:《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

王普丰主编:《毛泽东军事战略论》,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

(王普丰)

高技术战争研究 (study of high technology war)

探讨高技术战争的成因、形态、结果、影响等进行的活动。加强对高技术战争的研究,对于人们正确认识它的发生和发展,把握它的特点和规律,以便寻找应对的策略具有重要的意义。

随着两伊战争(1980~1988)、英阿马岛战争(1982)、以色列人侵黎巴嫩战争(1982)、美军人侵格林纳达(1983)、美军空袭利比亚(1986)等具有高技术特征的局部战争的先后发生,中国军事理论界于 80 年代中期,在局部战争研究的基础上,认识到了战争形态正向高技术化方向演进,并开始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到 90 年代末,中国对高技术战争的研究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80 年代中、后期) 这一阶段,着重对具有高技术特征的局部战争进行剖析,得出规律性认识,包括:一般技术局部战争向高技术局部战争演变的历史条件及其技术因素,高技术局部战争的基本特点,其中尤其是作战方式和作战保障的特点。通过研究,军事学术界认为高技术战争目的更加简约;战争规模变小,战争手段受到节制,战争控制更加严密,打击目标首先是政治、经济性的,尔后才是军事的;在表现形态上,作战空间缩小但涉及的空间范围扩大,战争节奏加快,进程缩短,但准备时间长;信息战、导弹战、远战非常突出,夜间成为技术优势者可利用的有利条件;战争的技术、物资消耗巨大,需要雄厚的经济基础支援和强大的综合保障能力,战争的影响扩大且极易导致国际化局面。这一阶段的代表性著作,有《高技术战争》、《高技术与局部战争》、《局部战争与突发事件》、《从马岛战争看现代战争》、《马岛战争研究》、《局部战争与军队建设研究》、《局部战争的昨天·今天·明天》等。这些著作的基本

观点是:高技术战争的出现是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发展的必然反映,是战争形态发展的又一个历史阶段,它与一般技术条件的战争在时空形态、作战手段运用、对人的素质要求等方面均有很大不同。但总的说来,这一阶段的研究对高技术战争的认识还处于初级阶段。

第二阶段(90年代前、中期) 1991年的海湾战争,较全面地展示了高技术战争的特性,高技术战争,特别是高技术局部战争成为军事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使人们对这种战争的认识更加清晰、深刻。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进一步探讨高技术战争的特点和高技术战争对作战理论的影响以及应付这种战争采取的对策等方面。关于高技术战争的特点,较具代表性的观点大致可归纳为:从交战双方对抗的实质看,高技术战争具有科学技术较量的特点;从高技术兵器的本质特征看,高技术战争具有信息对抗的特点;从战争的表现形态看,高技术战争具有战法多样性的特点;从达成战争目的的方式看,高技术战争具有较强的可控性和灵活性的特点;从对后勤保障的要求看,高技术战争具有高投入、高消耗的特点。关于高技术战争对作战理论的影响,军事学术界普遍认为,高技术战争的发展,已使传统的作战理论受到猛烈的冲击和前所未有的挑战。高技术战争对作战理论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在作战思想方面,控制战争规模成为未来作战思想的重要内容;整体战思想的内涵不断丰富;以质取胜的思想居于主导地位。在作战原则方面,快速灵活反应成为克敌制胜的首要作战原则;打敌要害成为具有新的内容和广泛选择的作战原则;夺取战场控制权原则的内涵发生变化,外延进一步扩展。在作战形式方面,传统的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正在被高技术条件下的机动战、特种战等新的作战形式所取代;机动战的地位

显著上升,阵地战的作用相对下降;特种战的运用日趋广泛,特种作战理论将日臻完善。在作战方法方面,新的作战方法不断产生,一些传统的作战方法在新的作战条件下得到较大的发展;多种作战形式和多种作战样式的综合运用使作战方法的系统性更加突出;多军种联合作战的方法成为战法发展的重点;发展“低耗高值”的作战方法成为战法发展的重要趋向。在作战指挥方面,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指挥理论进一步发展;科学决策的指挥理论日趋完善;对各种指挥方式的综合运用成为指挥理论的重要内容。在保障理论方面,立体保障理论的研究进一步深化;机动保障理论应运而生,并日趋完善;整个保障系统按新的结构排列组合;保障具有保障和作战一体化的功能。这一阶段,研究成果纷纷涌现,卷帙浩繁,代表性著述有《海湾战争》、《特点·启示·对策》、《高技术与现代军事》、《高科技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及对作战的影响》、《高科技与现代化——高科技知识普及读本》、《新军事革命与高技术战争》、《高技术战争论》、《高技术局部战争理论研究》、《高技术条件下的战争》等。

第三阶段(90年代后期) 随着对高技术战争的深入研究,人们发现推动这种战争形态发展或对其起核心影响作用的是信息技术。从90年代中期开始,首先在美国尔后在全球,兴起了一场以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其军事应用为核心的新军事革命。军事学术界普遍认为,这场新军事革命是高技术战争发展的引擎,是影响这种形态战争发展的核心要素。于是,在90年代上半期普遍探索的基础上,高技术战争研究进到了以信息战为主要研究内容的新阶段。研究的成果是大量的,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除了有关信息战论文,以及大量未公开发表的学术报告、内部资料外,较有代表性的著述有:《高技术条

件下的信息战》、《信息战争与军事革命》、《信息战争》、《数字化部队》、《2020年的武器》、《信息战》、《新战争论》等。这些著述均从一定层面上论述了高技术战争的信息化的物质基础、表现形态,描述了这种战争发展的趋向。研究的重点是高技术战争的信息化问题,其主要内容包括:信息战的含义、特点,信息技术在高技术战争中的应用,高技术战争的信息化趋势,信息战武器系统,信息战对军队建设的影响等。军事学术界较有代表性的意见认为,信息战是军事革命在战争领域的表现,是信息时代的必然结果。信息战是高技术战争的一种新的表现形态,是较之以导弹战为主的高技术战争的初始阶段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信息战的基本特征大体可概括为:信息技术在战争中大量使用;信息武器系统主宰战场;信息网络化构成信息战场;信息较量贯穿战争全时空。在军队建设上,为迎接信息战争的挑战,一是要明确树立打赢未来信息战争的观念,以正确的理论指导军队建设;二是要运用信息技术,改善武器装备;三是力争掌握战场信息的控制权;四是培养适应信息战争的人才,改革军事训练。在信息战的研究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不同的学术观点。关于信息战概念,除了上述观点外,有的认为是一种作战样式;有的认为是交战双方在信息领域的对抗。关于信息战到来的时间,有的认为已经出现,海湾战争是一个典型;有的认为下世纪初才可能登上战争舞台;有的则认为真正意义上的信息战,要到21世纪中叶前后才可能出现。关于信息技术对战争的影响,有的认为信息化武器系统和信息化战争将赋予战略、战役和战术新的内涵,大大改变现在的作战样式,战争将会发生质的变化;有的则认为信息技术固然会对战争产生重大影响,但起码在近一二十年内,信息战还仅仅是电子战的扩展,不能直接达成基本的作战目的,也不至

于促使战争发生质的变化。还有的学者认为,对信息技术和信息战的问题要辩证地看待,对其在军事上的地位作用不可忽视,但也不能夸大。战争中,信息具有重大的价值,但信息量过大也会走向反面,导致部队指挥和行动的混乱。目前,美国人对此问题也还未形成成熟的看法,我们绝不可跟在别人的后面跑,要有自己的观点。

发展趋势 未来高技术战争研究将重视新的高技术武器装备的发展和和应用问题;对信息战的研究将是高技术条件下作战理论研究的重点,力求在信息战理论问题上取得突破,为新战法提供理论依据;军队建设理论研究上,将以建立高技术军队为主线,加强高技术条件下质量建军的决策论证,探索提高军队高技术化水平的途径。

(李庆山)

核战争研究 (study of nuclear war)

探讨以核武器为主要打击手段的战争的活动。内容包括核战争的概念、核战争的基本样式、核战争的特点、核战争的准备、核战争的实施、核战争与政治的关系等。

初步研究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上空,投掷了两颗原子弹,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而且其后患无穷。对于战争中出现的这种新形态,世界各国,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开始进行全面研究,出现了原子战争这一军事术语。随后,世界战略格局逐渐演化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开始了核军备竞赛,美、苏、英、法四国相继拥有了核武器。中国在60年代中期以前尚没有自己的核力量,更缺乏核战争的实战经验,但却多次受到外国的核威胁,尤其在50年代初的朝鲜战争和台湾海峡危机期间,美国利用其核垄断地位,多次对中国人民进行核威胁和核讹诈,中国面临遭

受核打击的危险。为此,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央军委、毛泽东等老一辈领导人,以及国内有关部门,开始根据一般战争的规律和原理,在汲取国外核战争研究成果和核战训练演习经验的基础上,运用现代科学的研究手段和方法,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核战争进行研究和预测。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研究、分析、确立了中国的核战争观 1964年,军事科学院编辑出版了《马克思主义者有关核战争问题摘录》,综合反映了马克思主义者对核武器和核战争问题的基本认识,认为帝国主义是核战争的根源,核战争是帝国主义政治的继续,并确立了中国对核战争的基本态度——“一是反对,二是不怕”。

通过翻译外文资料等手段,深入了解有关国家核力量的发展情况及其对核战争的基本看法 总参谋部、国防科工委等单位翻译了《核武器手册》、《法国人看核武器和核战争》、《设想一下不可设想的事》等著作,军事科学院出版了《介绍两本书》等,对美、苏、英、法等国的核武器生产状况与发展趋势、外国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使用原则、核战争的基本理论以及爆发的可能性等问题做了较全面的介绍。

加强对核战争中毁伤效应与核防护问题的研究,以作出防护对策 有关单位翻译了《常识和核武器战争》、《核、生、化沾染规避》、《论现代作战》等书籍,为研究核战争中人员、物资、装备的生存与防护问题以及中国在核战争中的防护对策问题提供借鉴。但总起来看,这一时期国内对核战争问题的研究还比较薄弱。

深入研究阶段 60年代中期以后,世界核战略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美苏两国的核军备竞赛愈演愈烈,英、法也大力加强核力量建设,中国于1964年进行了首次核试验。在

越南战争、中东战争、中苏关系紧张等情况下,苏美在保持相互核对峙的同时,不断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进行核威胁和核讹诈,从而迫使中国不得不对核战争问题进行更深入、全面、细致的研究。这一时期,从事核战争研究工作的单位扩展到全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以及地方有关部门。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核战争的种类和基本样式 研究认为,尽管核武器具有巨大的毁伤力,但核战争同一切其他类型的战争一样,仍是某种政治的继续。依其性质,可分为正义核战争和非正义核战争;按发动核袭击的先后,可分为进攻性核战争和防御性核战争;按规模和范围,可分为全面核战争和局部核战争。全面核战争又称核大战,是指战争双方大量使用各种类型核武器的战争;局部核战争是敌对国家使用有限的核武器,为达成有限的战略目的,在某一局部地区进行的核战争。研究认为,不管是美国将核战争的样式分为战略核战争、有限核战争、战区核战争,还是苏联将其分为使用各种核武器的世界核战争及使用有限威力核武器的战争,都是从美苏自身利益和其核实力地位出发的。反映这方面内容的代表性著作有:《核战略纲要》、《核战略概论》、《核战争设想》、《战争与道义:核伦理学的兴起》、《核战略纵横》等。

关于核战争的特点 这一时期,全军各有关单位通过对核爆炸毁伤效应的深入分析,结合现代技术,尤其是导弹核武器技术、核潜艇技术、战略轰炸机技术的发展,在原有基础上,继续对核战争的特点进行深化研究。总参谋部出版了《核冬天:核战争后果的气候研究》,第二炮兵编辑出版了《国外对核冬天问题研究概况》,第二炮兵指挥学院编写出版了《核战略学教程》。研究认为,由于核武器的具有巨大杀伤破坏力以及高精度、

远投掷等特点,使核战争具有许多与常规战争不同的显著特点,主要是:破坏性大;突然性大;战争范围大,立体性强;战场变化急剧,战争进程加快;电子斗争更加激烈;作战、后勤、技术、工程等保障任务繁重;组织、协同、指挥困难。

关于核战争的实施 从60年代中期到冷战结束,是中国核力量全面发展时期。6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两弹结合”也试验成功,并组建了核部队。此后,战略导弹部队的配套建设和合成训练也进入一个新阶段,中国的核反击能力越来越强。伴随这一进程,中国对核战争的实施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①继续对核爆炸毁伤效应进行分析,并对核战争中的核爆探测、核防护措施等问题进行研究。这期间,总参谋部对地理与气象对核防护的影响与对策进行了探讨,海、陆、空、第二炮兵等军兵种对核战争中的核防护问题进行了分析,军事科学院等单位对核战条件下的各军兵种作战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总参谋部还编辑了《大规模毁伤武器及防护》等材料。②对中国核力量的战略运用原则进行了研究。总参谋部、军事科学院、第二炮兵等单位在研究了美、苏军队核力量使用原则、世界核战略格局和本国国情、军情等问题基础上,提出了不首先使用、积极遏制、灵活报复等核力量战略运用原则。③对核战争中的目标选择和火力运用等问题进行研究。这期间,军队有关单位翻译了《美国选择核目标的方针与有限核战争》、《苏联核战争战略》等书籍,对国外核作战理论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了制定核反击计划应考虑的问题,并结合全军实际,对核反击作战中的核兵力和核火力运用、打击目标选择、各军兵种的协同配合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出版了《第二炮兵战役学》、《战略目标学》等书籍,基本做到了研究

成果系统化、理论化、条理化、实用化,形成了中国战略核部队的战略、战役、战术理论体系。④对核战争的准备问题进行了研究。在建国后相当一段时间里,中国一直受到霸权主义有核国家的严重核威胁。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共中央作出了做好“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准备的指示。据此,军事理论界加大了对核战争准备的研究力度,其内容包括对政治准备、经济准备、军事准备、后勤准备等方面的研究。另外,还对核战争爆发的时机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核战争爆发的时机与国际政治、军事形势密切关联,也与其他一些因素有关。可能有四种情况:一是国际形势高度紧张,政治、经济、军事矛盾全面激化,或核均势被打破时,可能诱发核战争;二是当拥有核武器的霸权主义者,在侵略扩张的常规战争中遭到巨大失败,或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有核国家,在面临国家生死存亡之际,都有可能将常规战争升级为核战争;三是当对对方的某些行动作出错误的政治估计,或对事态失去控制时,由于政治失误而爆发核战争;四是当一方的指挥控制系统或武器系统发生故障或事故,偶尔或非法地向另一国领土发射核导弹等情况下,可能导致核战争的爆发。

关于核战争与政治的关系 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有第二炮兵指挥学院编著的《核战略学》、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编撰的《军事战略基本理论问题》等。研究认为,政治决定核力量的发展和运用,各有核国家发展核武器和无核国家谋求获得核武器的目的,以及建设一支什么样的核力量,都是由该国的政治目的决定的。核战争作为战争的一种类型,同样要遵循战争的一般规律和原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一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的基本原理,适合于古今中外一切客观存在的战争,也适合未来可能发生的核战争。随

着核军备竞赛的加剧,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核武库都达到了超饱和的程度;美国的军事思想否认核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原苏联的军事学说起初认为,核战争是两种社会制度的较量 and 决战,“采取战略核行为,首先是一项政治决策”,但到80年代,苏联理论界认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论断已经过时了,认为核战争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核战争达不成任何政治目的,已不再是政治的手段和工具。这些促使中国理论界在80年代对核战争与政治的关系进行再研究、再认识。在1989年召开的全军“军事战略基本理论讨论会”上,与会者持有几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核战争的爆发、性质、规模、打击目标及作战样式,核袭击后的谈判、占领,以及战后的世界政治等,都是由核战争的目的决定的,核战争仍然是政治的继续。另一种观点认为,在核均势条件下,核战争的毁灭性后果已不能达成任何政治经济目的,已不能作为政治手段加以运用,核战争已不再是政治的继续。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核战争是不是政治的继续要作具体的分析,认为有限核战争仍将是政治的继续,而全面核战争已不再是政治的继续,起码已不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理想选择了。

关于对核战争前景的预测 80年代初,邓小平对世界形势进行了分析和预测,认为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可以争取到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据此,作出了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研究认为,制约和制止核战争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核战争也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一是国际战略格局发生了有利的变化;二是核大国认为,核武器是一把“双刃剑”,“核战争没有胜利者”,核武器既遏制了对方,又遏制了自己;三是国际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使核战争已不是解决彼此矛盾的适宜手段;四是全世界人民

反对核军备竞赛,反对核战争的呼声日益高涨,和平力量的增长已超过战争因素的增长,核武器是人创造的,人也一定能消灭核武器,制止、推迟核战争的爆发,进而消灭核战争是可能的。同时认为,核大国的核军备控制与核裁军谈判虽有进展,并达成了一些局部性的协议,但仍具有毁灭地球几次的能力;冷战虽已结束,国际紧张局势也有所缓和,但核大国的核军备竞赛并没有停止,只是竞争的重点由以数量为主转向了以质量为主;只要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还存在,只要核武器一天没有彻底销毁,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就不能完全排除。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有《邓小平文选》、军事科学院编著的《关于核威慑和威慑战略的几个问题》、卢辉编著的《核化生武器的历史与未来》、第二炮兵指挥学院编著的《核战略学教程》等。

发展趋势 中国学术界对核战争问题的研究已历时几十年,并已取得显著成绩。但核战争研究是一个动态过程,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核战略格局的发展以及高新技术的运用,国内对核战争问题的研究将更深入、全面,更具前瞻性。①尽管冷战后核军控、核裁军有所进展,但核力量质量竞赛从未停止,核武器更新换代仍在进行,贫铀炸弹等新式武器应用于战场,使核武器的内涵发生变化,将导致对核战争概念、样式、特点的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进而影响到对核战争准备与实施等问题的研究。②和平与发展仍将是21世纪的主题,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并未消失且有恶性膨胀之势,核战争爆发的根源依然存在,对核战争爆发可能性的进一步分析、探讨、预测,将是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③作为发展中的爱好和平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对核战争问题研究的重点,将继续由准备、实施核战争,向遏制核战争方向转移。

参考文献

徐光裕著:《核战略纵横》,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7。

祁学远编著:《世界有核国家的核力量与核政策》,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

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编:《军事战略基本理论问题》,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

(张进喜 赵德喜)

局部战争研究 (study of local war)

探讨一定地区内,使用一定的武装力量进行的有限目的的战争的活动。局部战争研究是军事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其目的是通过系统总结局部战争的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探索和揭示局部战争的内在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探求解决局部战争实践中的矛盾、问题的对策和方法。研究的基本内容包括局部战争的概念、局部战争的基本样式、局部战争的特点、局部战争的准备与实施及战争指导等。

虽然局部战争的实践和概念出现较早,但在中国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加以研究,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的局部战争研究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大体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50年代) 毛泽东等领导人在警惕地注视着世界大战危险性的同时,也强调新的世界大战是有可能制止或推迟的。他们在指导抗美援朝战争和其他一些军事斗争的实践基础上,通过对帝国主义发动战争新特点的研究,形成了关于局部战争的一些基本认识。主要有:

帝国主义的战略是在准备大战的条件下搞局部战争 美帝国主义很快地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不可能的,但其总的企图是不断地以一个一个的局部战争推动为世界大战,“我们的对策是要将其发动的局部战争,一个

一个地打下去。”周恩来在1961年9月的一次座谈会上说,推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正在增长,“但有限战争即局部战争却不可避免”。张闻天在50年代中期以后的一些报告和文章中也多次指出,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双方都不愿打大战,但在总的和缓趋向中矛盾很多,可能发生局部战争。

帝国主义发动的局部战争将主要在“中间地带”进行 毛泽东认为,在美苏之间存在着一个由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构成的中间地带,因而战后世界面临的现实问题不是美苏爆发战争并引起新的世界大战,而是美国控制和侵略包括中国在内的中间地带国家。既然美苏之间的大战打不起来,那么在中间地带发生的各种侵略与反侵略战争、民族解放战争就只能是局部战争。

局部战争具有不同于大战的新特点 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认为,在两极世界格局和核威慑条件下开始形成的局部战争具有相对有限的政治目的,对战争的目标、手段、范围和进程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从而使战争得以控制。

第二阶段(60~70年代) 在这一时期,中国领导人对大战和核战争的危险性估计得比较严重,从而突出地强调了大战的不可避免性和紧迫性。因此,在这一时期内对局部战争的研究较少。尽管如此,针对这一时期发生的中印自卫反击作战、珍宝岛自卫反击战、西沙自卫反击战等局部战争与军事冲突,军队内部还是作了比较系统的经验总结,探讨了作战指导得失。同时,对世界各地爆发的一些较大规模、较大影响的局部战争的动因及作战指导得失也都作了必要的研究和探讨。然而,这种研究还仅仅是限于内部、小范围内进行。这一时期,一些领导人也谈到过局部战争问题。陈毅在1962年曾指出,美国目前还不

想打大战,而是想搞局部战争。王稼祥在1962年9月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专门论述了局部战争的问题,认为要区分各种不同性质的局部战争;对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相互间的局部战争,要坚决反对;对于各式各样的民族解放战争,要支持正义的交战一方,反对非正义的交战一方。1970年,周恩来在一次会见外宾时指出:战争扩大不一定就是世界大战,仍然是局部战争。原因是大国不敢发动核战争。由于这一阶段把军事斗争准备的立足点放在“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上,认为有了全面战争准备,就足以应付局部战争和军事冲突,因此对局部战争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不够深入、不够系统。

第三阶段(80年代)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高层领导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險很迫近的看法,认识到由于美苏的战略核均势、双方都未完成全球战略部署以及和平力量增长超过战争力量增长等原因,在较长的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根据这一思想,中央军委于80年代初提出,在爆发大战的可能性较小的情况下,军队要有随时应付突发事件的准备,要研究近期发生的局部战争。1985年6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依据邓小平关于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战略判断,实现了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并逐步把军事战略的重点转向应付可能发生的局部战争和军事冲突。在这一时期内,军内翻译出版了大量关于局部战争的著作,并多次举行有关局部战争理论的研讨会。军事科学院、解放军出版社等单位编译出版了《外国对英阿马岛战争经验教训的评论》、《外国对以色列侵略黎巴嫩战争的评论》、《外国对两伊战争的评论》、《外国对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的评论》、《局部战争今昔》等一系列著作。这些著作介绍了外国关于几次局部战争

的战争指导、作战、情报侦察、后勤保障、动员体制、战备措施、人与武器关系等各方面的研究成果,促进了国内对现代局部战争理论的研究。国内的学者对这一时期发生的英阿马岛战争、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战争、美国入侵格林纳达、美国空袭利比亚等局部战争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出版的代表性著作主要有:《局部战争与军事学术》、《局部战争概览》、《现代有限战争的理论》、《马岛战争研究》、《局部战争的昨天·今天·明天》、《局部战争与军队建设研究》、《近期局部战争军事学术概观》、《局部战争和海军》、《20年战争管窥》等。这些研究成果对局部战争理论形成了较为统一的认识,主要有:

关于局部战争的概念 研究认为,局部战争是在一定的地区内,使用一定的武装力量进行的有限目的的战争。战争仅波及世界的某一地区,在一定范围内对国际形势产生影响。局部战争由于其原因、时间、地点、规模、目的、手段和性质等方面的不同,可区分为不同的类型。强权政治、霸权主义是局部战争产生的根源。在长时期内世界大战没有爆发的情况下,局部战争仍将是主要的战争形态并长期存在;局部战争与世界大战虽然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但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能转化为世界大战。

关于局部战争的特点 研究认为,它具有与世界大战不同的特点,主要有:战争在目的、规模等方面有所限制,但重大问题的决策往往由统帅部直接掌握;大量使用新式武器,为尽快达成作战目的,通常使用当时可能应用的最有效的新武器(核武器除外);作战空间扩大;战争爆发多具有突发性。

关于局部战争的起因 研究认为,局部战争的爆发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国家领土和边界争端;争夺海上经济资源;宗教、民族矛盾;反对殖民统治和国内统治阶级;大、小

霸权主义国家对邻国的侵略扩张；大国或军事强国为维护其势力范围或既得利益而采取武力行动；超级大国为争夺“中间地带”或完善战略态势而诉诸武力；为排除可能的威胁实行警告性打击；为达成某种报复目的对敌对国家重要目标实施袭击破坏；某些国家为转移国内矛盾向外挑起战争；等等。学术界还认为，上述局部战争起因的大多数，在人类战争史上皆早已存在，是战争原因的传统话题。局部战争之所以成为当今武装冲突主要形式的根本缘由，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核僵局”遏制了世界大战的发生，局部战争由此成为国际社会对战争需求的有利选择；二是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关系和一体化趋势使大战的发生越来越困难，而区域性的经济利益的争夺又常可酿成局部战争；三是国际政治关系的多边共存和相互制约，成为发生世界战争的制约因素，而霸权与反霸权、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又不时将演变成局部战争；四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局部战争的发生提供了条件；五是现代战争物资消耗巨大，是战争规模趋向“小型化”的重要原因。

关于局部战争的规律 主要有：多数的局部战争和冲突，都表现为交战国双方整体国防实力的较量；受政治、经济等因素制约特别明显，执行“有理、有利、有节”原则十分重要；制空权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导弹在未来局部战争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电子系统起重要作用等。

关于对军队建设的影响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新技术、新武器、新装备在战场上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显著。以往主要以数量取胜的观念，已在相当程度上为质量制胜的观念所取代。加快发展和更新军队的技术装备，已成为未来局部战争中能否夺取战场主动权的重要因素。二是现代局部战争突发性强，提高部队的快速反应能

力，是必须着重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三是由于局部战争情况变化急剧，既要发挥指挥员的积极主动精神，同时还必须建立和完善统帅部与战区的自动化指挥、控制、通信和情报系统。四是由于现代局部战争对物资需求量大，时效性强，技术保障要求高，后勤保障的关键是要具有快速调拨和立体保障能力。五是应强调以局部战争为背景，根据可能的作战对象，应担负的作战任务以及作战环境条件，加强有针对性的训练，重点抓好快速反应部队和各级指挥员的训练。

第四阶段(90年代) 1991年的海湾战争后，局部战争研究逐渐转向对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研究。军事科学院和中国军事科学学会于1991年2月23日至4月26日，先后组织召开了六次海湾战争研讨会，集中探讨了海湾战争的背景及其特点、战争双方的作战指导、高技术兵器的运用与作战样式，以及对中国国防建设和未来作战指导的启示与对策建议等问题。研讨会的发言选辑收入1991年6月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特点·启示·对策》一书中。1993年，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明确提出了要准备打赢一场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战略任务，从而把中国现代局部战争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此后的几年中，军事学术界对现代局部战争尤其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研究热情空前高涨，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并出版了大量学术专著。这一时期出版的关于局部战争的著作主要有：《局部战争中的战役》、《美国有限战争理论与实践》、《高技术战争》、《军界热点聚焦——高技术局部战争概论》、《高技术军事世界》、《高技术局部战争理论研究》、《局部战争论》、《21世纪高技术局部战争大趋势》、《现代局部战争条件下的人民战争》、《现代局部战争理论研究》以及《科索沃战争研究》等。这些出版物是90年代局

部战争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论及范围十分广泛,主要包括:

关于高技术局部战争的概念和基本含义 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是作战双方或其中一方大量运用高技术武器装备,并采取相应作战方法进行的局部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发生的 180 多次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都可以统称为现代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而高技术局部战争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局部战争,它是高技术飞速发展并在军事领域广泛应用的产物。只有当新兴的高技术,如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自动化技术、新能源技术、激光技术、航天技术、生物技术等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并从根本上改变了武器装备的性能和战场的面貌,才使高技术局部战争登上了历史的舞台。高技术局部战争是现代战争,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战争。现代战争是以时间界限来划分的,一般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战争,但并不全是高技术战争,只有 80 年代以后的少数几场局部战争,如 1982 年的英阿马岛战争和以色列人侵黎巴嫩的战争、1986 年的美国空袭利比亚的战争,特别是 1991 年的海湾战争和 1999 年的科索沃战争,才称得上高技术局部战争。

关于高技术局部战争产生的客观基础 高技术局部战争的产生决不是偶然的、孤立的,而是和时代的前进,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以及和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等因素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它是战争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和产物。当今时代的发展变化是高技术局部战争产生的重要原因,国际战略格局的多极化趋势是引发高技术局部战争的重要动因,国际经济的日益发展是高技术局部战争产生的重要因素,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是高技术局部战争产生的关键条件。战争在当代的发生机制已经出现了一些规律性变化,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世界大战爆发的可

能性越来越小,局部战争难以避免,而且高技术局部战争已上升为主要形态。战争出现了局部战争——世界大战——局部战争——高技术局部战争的发展轨迹。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是由战争这一人类社会特殊现象的内在规律决定的。

关于高技术战争与诸因素的关系 高技术局部战争不仅没有改变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规律,反而与政治的联系更加紧密。高技术局部战争仍然是政治可以选择的有效手段,政治对战争进程和结局的影响更加直接。战争从根本上说总是与敌我双方的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战争与经济的这种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在高技术局部战争中体现得更加突出,经济利益是高技术局部战争的基本动因;高技术局部战争对经济的依赖性更大;经济实力对高技术局部战争的制约更强;高技术局部战争对经济具有破坏和促进的双重作用。在高技术条件下,战争与科学技术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紧密和突出,科学技术在战争中转化为巨大的战斗力,引起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的重大变化,促进高技术局部战争理论超前发展。

关于高技术局部战争的特点 主要表现在:大量运用高技术武器装备;作战空间空前扩大,战场呈现出大纵深、高立体特点;作战行动向高速度、全天候、全时辰发展;广泛使用 C³I 系统,战场的指挥控制实现智能化、自动化;战法灵活多样;联合作战成为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基本的作战方式;战争消耗巨大等。

关于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基本规律 战争的胜负更依赖于系统整体对抗;综合国力是制约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物质基础;单位空间里的兵力密度减小,而单位时间里的作战强度增大;武器与人的有机结合是赢得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关键;制信息

权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等。

关于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中实施战略指导的基本原则 如:着眼政治斗争需要确定军事行动;积极开展政治攻势达成战争目的;充分发挥整体作战的效能;努力实现军队作战指挥的快速高效;重视建立现代化的后勤保障系统等。

发展趋势 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局部战争的发展以及高新技术的运用,局部战争研究的内容将不断更新,对以往局部战争的研究也将更加深入、全面。未来研究的重点将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未来局部战争的发展趋势研究;二是研究可能面临的局部战争的样式及其特点;三是研究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对策。

参考文献

黄玉章主编:《局部战争的昨天·今天·明天》,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

张聿法、余起芬等编著:《局部战争概览》(1945年9月~1987年12月),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国防大学科研部编:《高技术局部战争与战役战法》,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3。

管继先编著:《高技术局部战争战役》,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3。

韩晓林、俞世福主编:《高技术局部战争理论研究》,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1994。

(陈昱澍)

战略研究 (study of strategy)

探讨筹划和指导战争全局方略的活动。旨在探讨战争规律与战争指导规律,包括战略环境与战争相关因素分析,战略决策、战争的准备与实施、战争的预防与控制、军事力量建设等全局性问题的研究。

清末和中华民国时期的战略研究 中国是东方兵学的故乡,有着悠久和深厚的军事战略思维传统。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产生

的《孙子》即为战略研究的代表作。19世纪中叶,西方的坚船利炮不仅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也从内容到形式极大地冲击了中国古老的兵略研究传统。进入20世纪,八国联军的入侵进一步唤醒了中国研究战略问题的有识之士。辛亥革命时期,同盟会内部曾出现了是以靠近边界城市为主还是以长江中下游城市为主发起革命武装斗争的战略争论。民国初年,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中,为了救亡图存,开创近代中国新局面,立足中国战略文化传统,吸收世界近代资产阶级战略理论精华,从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全局的高度,对战略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北伐战争期间,国民革命军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发扬长驱直入、运动歼敌、穷追猛打、速战速决、英勇顽强、连续作战的作风,战略指导上审时度势,灵活运用兵力,适时转变战法,分化瓦解敌军,补充扩大自己。这些标志着中国军事战略发展到了一个新时期。鉴于西方列强从海上入侵中国的深刻教训,孙中山提出了重视海权的战略思想。孙中山大声疾呼:“自世界大势变迁,国力之盛衰强弱,常在海而不在陆,其海上权力优胜者,其国力常占优胜。”在其拟定的《国防计划纲目》和《实业计划》中,他提出了建造和购买新式战舰、潜水艇,建造军港,训练海军人才的要求。民国初期,孙中山还提出了“航空救国”的思想,他预见到空军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强调建设独立的空军。“九一八”事变之后,国防战略研究成为当时战略研究的主导,蔡锷、蒋百里、杨杰、周亚卫、吴光杰、黎天才等发表了《国防论》、《新国防论》、《国防新论》、《帝国主义炮火下之中国国防问题》等数十种有关国防、国防战略问题的著作,提出了建立“总体性国防”的战略思想。这一时期,西方军事战略著作的译介受到进

一步重视。1914年刘祖藩编译出版英国斯坦斯布里《海军战略及战术》，并尝试以中国海防为背景，建构中国海军战略理论体系。J. F. C. 富勒的《机械战》、马汉的《海军战略》、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E. 鲁登道夫的《总体战》等一些西方战略著作中文全译本相继出版，西学东渐，成为风气，进一步促进了中西军事战略思想的交流、碰撞与融合。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研究 主要分为两大阶段：

革命战争时期的战略研究 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掀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也是中国现代战略研究的开端。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在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指导下，继承中国战略思想的优秀传统，汲取近代西方战略思想的精华，从中国国情和军情出发，开创了中国现代战略研究的新时代。集军事统帅与战略思想家于一身的毛泽东在戎马倥偬之中，写下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和《战争和战略问题》等一系列战略理论著作，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和方法论，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创立了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理论。这一理论认为，战争是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斗争形式。无产阶级要根据每场战争的政治性质，决定对它的态度，拥护一切推动社会进步的正义战争，反对一切阻碍社会进步的非正义战争。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起决定作用的归根到底是人而不是物。从本质和长远上看，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应从这点上建立无产阶级的战略思想，在战略上即总体上藐视一切敌人和困难；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老虎、铁老虎、真老虎，应从这点上建立

无产阶级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在战术上即每一个具体问题上要重视一切敌人和困难。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兵民是胜利之本。在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中国社会条件下，要建立广大农村革命根据地，作为进行人民战争的依托。人民军队是进行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实行与人民战争相适应的战略战术，机动灵活地使用兵力和作战形式，坚持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战略防御阶段必须实行战略上的内线持久的防御战和战役战斗上的外线速决的进攻战，逐步改变战争力量的总体对比，最终把战略防御推向战略进攻。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中国人民不仅取得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性胜利，而且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上第一次取得了抗击大规模外敌人侵的彻底胜利。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战略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抗美援朝战争和历次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伟大实践，继续推动战略研究由国内革命战争指导向国家间军事斗争指导，由着眼于夺取国家政权，实现民族解放，向巩固国防、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的方向发展，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确立的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具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

进入80年代，随着国际战略形势的演变和中国共产党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战略研究进一步呈现蓬勃发展的生动局面。其主要标志：一是80年代中期提出了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以及90年代初期以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为核心的新时期战略方针；二是群众性的“战略研究热”的兴起。除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国防大学战略教研室、战略研究所等专门的战略研究机构外，还出现了中国国际战略学会、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中国孙子兵法

研究会等民间性战略研究团体;三是一大批战略研究成果纷纷问世,在横向上覆盖战略基础理论与战略应用理论各个方面,在纵向上涉及国家战略、国防战略、军事战略、军种战略各个层次,在方法上既有传统的定性分析,也有现代的系统分析。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如:《国际战略学》(1986)、《战略学》(1987)、《战争与战略问题研究》(1988)、《军事战略简论》(1989)、《现代军事战略经纬》(1989)、《军事战略基本理论问题》(1990)、《军事战略概论》(1991)、《威慑战略》(1991)、《毛泽东军事战略研究》(1992)、《毛泽东军事战略论》(1993)、《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战争战略分册》(1993)、《邓小平战略思想论》(1994)、《海军战略学》(1995)、《空军战略学》(1995)、《军事战略思维》(1996)等。这些著作的出版,使新时期战略理论体系日臻完善。80年代以来,战略理论界在战略研究中提出的代表性的理论观点主要有:坚持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把国家利益作为制定战略策略的出发点与归宿;发挥战略的实战与威慑的双重功能,既重视筹划打赢战争,更要重视首先筹划制止战争;注重安全形态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既注意维护传统的军事安全,同时要注意维护包括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思想文化安全等在内的综合安全;拓展战略空间,由陆地空间向陆、海、空三维空间以至陆、海、空、天、电磁五维空间发展;战略指导重点由全面战争转到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上来;把军事战略纳入国家战略体系,自觉服从国家战略;重视提高军事战略的有机构成,增加军事战略的高科技含量,实现军队建设由数量规模型、人力密集型向质量效能型、技术密集型转变;重视军备控制与国际安全合作;重视高技术条件下的非线性、非接触、非对称作战,重视信息技术发展对战争形态带来的重大影响。

发展趋势 进入21世纪,国际战略格局的转折性变化以及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一系列高新技术群的迅猛发展,给包括战略研究在内的整个军事领域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一场由工业时代战争向信息时代战争转变的世界性军事革命正在到来。如何适应这场深刻变革,揭示信息时代战争规律与战争指导规律,创立与信息时代相适应的战争与战略理论,是新时期战略研究不容回避的新课题和新使命。

参考文献

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战略学》,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

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军事战略简论》,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

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毛泽东军事战略论》,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

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邓小平战略思想论》,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

李际均:《军事战略思维》,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

(彭光谦)

海军战略研究 (study of naval strategy)

探讨筹划海军建设和运用方略的活动。主要内容包括:基础理论方面,主要研究海上战争的战争观和方法论;海上战争的起源、本质、发展和演变;海上战争与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以及海洋地缘条件、民族文化传统的关系;海上战争的历史经验、成败原因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现代海上战争的动因、性质、样式及其发展趋势;海军各兵种的特点、能力及战略使用;海军战略的类型、结构及其组成要素;海军战略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等。应用理论方面,主要研究海上战争的指导规律,包括一般指导规律和特殊指导规律,

揭示海上战争矛盾运动对立统一的转化关系,正确指导海上战争实践。内容涉及海洋战略环境、国家海洋权益与海军使命的关系;海上战略进攻、战略防御和其他战略性军事行动准备与实施的原则;海上战场准备;海军兵力建设、装备发展、后勤与技术保障等的要求与指导;相对和平时期防止与遏制战争爆发及应付海上突发事件的战略指导;高新技术装备的使用对海军战略的影响;外国海军战略理论的发展与借鉴等。

20世纪,中国经历了晚清消亡、民国诞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三个时期。不同政治制度下,对海军的使用和海洋利用的认识不一,对海军战略需求与研究的重点也不同。晚清末年和民国初期,主要引进西方海军战略理论,发展中国海军,推动稳固海防和发展经济,是海军战略研究的启蒙期。1928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是近代中国海军战略研究取得明显进步的时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前30年,主要是研究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学习苏联海军的有益经验发展中国海军战略理论与实践,研究海军建军理论和战争初期海军海上作战指导。进入80年代后,随着军队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以及经略海洋思想的提出,中国贯彻近海防御的海军战略,并就此进行了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的研究。海军战略理论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发展繁荣期。

清末的海军战略研究(1900~1911) 甲午战争失败,暴露了近代中国海军建设中的许多问题,反映了当时海军学术的局限性,一批有识之士在痛心疾首之余,闯欧美,下东洋,发现、引进一些国家的海军学术与技术,翻译、发表A. T. 马汉的海权论著作,激励了对振兴中国海军的强烈紧迫感。在海军战略研究上的主要作为和理论观点是:

翻译出版马汉海权论著作,传播海权思

想 上海《亚东时报》、中国留日海军学员筹办的《海军》杂志,分别在1900年、1910年摘刊了马汉所著《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中的《海权的要素》;清驻德公使李凤苞,1885年就在其译著《海战新义》中首次使用了“海权”这一概念。海权论的思想唤醒了一些人对海洋的重视,推动了对海军战略性问题的思考研究。在海权论的思想影响下,国人一批研究著作相继问世。笛帆的《海上主管权之争夺》(《海军》第2期,1910)、萧举规的《海军论》(同上),都着重阐述了对海权的理解;笛帆的《论海战性质》(同上)和李毓麟的《列强海军今势论》(《海军》第4期,1910),分析了海权产生的历史条件,认为“世界交通日便,海上竞争日烈”,以优势的军事实力,保护优越的经济地位,成为海权论的理论核心。

宣扬国家盛衰的关键在海权 晚清在连续遭遇帝国主义的海上侵略后,海军学术界十分赞同马汉海权论的观点,因而一些文章呼吁:“凡一国之盛衰,在乎海权之得失。”“观察各国势力即以权力之大小定之。何以故?海军强大,能主管海上权者,必能主管海上贸易;能主管海上之贸易者,即能主管世界之富源。”因此,“立国之元素在军备,军备之扼要在海权。”

推崇海权的基础是海军 他们主张改造中国传统的重农轻商、重陆轻海的观念,以争海权为目标重建中国海军,认为“时会所趋,固舍所谓黑铁赤血以外无主义,坚船巨炮以外无事功矣。”乙巳年(1905)七月十七日《时报》载《重兴海军议》,文中分析海洋形势,指出:“我国于太平洋上,适当列国海权竞争之冲”,“尤以北太平洋为重点。”要以建设巡洋舰队为重点,“为长驱远海之具”,否则“无能控制远洋”。舰队规模“当以美、日为标准”,总吨位应在25万吨以上。

积极影响清政府重建海军的决策。宣统元年(1909)清政府拟制海军七年发展规划,每年以1800万两白银发展海军,同时整编南、北洋海军,确立中央统一领导的海军体制,成立巡洋舰队和长江舰队,向西方订购舰艇和自制舰艇。同时清政府加强了对海岛主权的重视,于同年派海军赴东沙巡查,随后又着手勘查西沙群岛。

引进海军训练和海战指导理论。重点翻译、刊印了诸如《海战新义》、《兵船炮法》、《轮船布阵》、《各国水师操作法》、《列国海战记》等多种著作,填补了当时中国海军战略、战役理论的空白。

晚清时期中国近代海军学术理论的产生,并不是中国现代工业发展与对海洋利用的主观要求的结果,而是出于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从海上入侵的被动反应。因而,一方面产生了清政府建设海军的紧迫感与缺乏持久性的矛盾;另一方面,海军学术界对西方海权理论的引进是在民族灾难深重情况下的作为,在激昂的爱国主义驱动下,产生了偏离当时中国现实、崇尚“海军至上主义”的倾向。

中华民国时期的海军战略研究(1912~1949) 进入民国时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在国民革命过程中,吸取西方军事思想,形成了建设中国海权和海军的意识。孙中山认为:“国力之盛衰强弱,常在海而不在陆,其海上权力优胜者,其国力常占优胜”。“盖太平洋之重心,即中国也,争太平洋之海权,即争中国之门户权耳。谁握此门户,则有此堂奥、有此宝藏也。”他指出:“海军实为富强之基”,“兴船政以扩海军,使民国海军与列强齐驱并驾,在世界称为一等强国。”孙中山的海权观念和海军建设思想,不仅仅是为抵御外侮,而且要建设中国近代海洋经济,他的《实业计划》可为佐证。民国建立后,海军便卷入国内政治斗争和军阀混战旋涡中,海军学术

界对海军学术理论的研究陷于萧条。但在陆军大学校中的一批海战学教官出于教学需要,坚持了对海军战略的研究。这时的研究由清末的注重建军理论转向海军作战理论。刘祖藩等通过翻译斯坦斯布里的《海军战略及战术》,第一次在中国阐述了海军战略作为海军学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陆军大学海战学的教官通过编写《海战学》、《海军战略》、《海军军事学》等教材,作了自构海军战略理论的尝试。当时海军战略理论体系虽不完整,但在中国近代海军战略理论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进入20年代后,陆军大学教官朱伟、吕德元又进一步完善了海军战略理论体系,除将海军战略定义为与战争目的相联系的方针外,还阐述了海战战略方向的选定、海上进攻与防御、海军的内线作战原则,以及海军从事破坏贸易战的作用与地位等,充实了中国近代海军战略理论体系。1928~1949年是近代中国海军战略研究取得明显进步的时期,对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的研讨均较高涨。表现在:

更深入地引入马汉海权理论的著作 1927年底起,陆续介绍了《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中《海权的要素》一章的核心内容,1940年又全文翻译出版,1944年蔡鸿干首先全文翻译了该书。这些对进一步推动国内对马汉原著研究,起了一定作用。

撰写出版中国自己论述海权的著作 林子贞编写的《海上权力论》(1928),是中国第一部有关海权的论著。作者指出:“海上权力就是一个国家,在海面上有把握,有制海的力量”。广义说,“就是海军的能力和商业的能力”。书中论述了海上权力的含义,它与国防的关系,与陆上权力的比较,以及各国扩张海上权力的目的等。

研究了海军建设的基础理论 其中1940年王师福所著《海军制度之理论与实

际》一文,系统阐述了对海军制度及其与它所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经济、技术和政治条件关系的认识。他“把海军制度当作一个混然的实体,来观察其消长异同的法则”。指出“海军制度是在社会生存的基础上,聚过去的经验而造成的一种适合的组织、政策、法度等之总和”。列举了大量史实具体说明经济、技术和政治因素对海军制度的不同影响。

论述建设中国海军的两种建议 一种意见是建设一支 60 万吨舰艇、能夺取太平洋海权的中国海军,以实现“保障我国沿海的安全;树立太平洋的均势,不使任何国家能独霸太平洋”,并以 15~30 年完成。另一种意见是建设一支与日本海军实力对等的 111 万吨、2 000 架飞机的海军,以 50 年为期,分为沿海防御建设、海岸和近海防御建设、远洋海军建设等三阶段完成。这些意见,虽然实际是很难实现的计划,但表达了海军学术界对海洋形势和建立强大海防的关心。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略研究(1949~2000) 这一时期的海军战略研究,完全摆脱了理论研究与海军实践相脱离的困窘局面,进入到从海军建设和运用的实践需要研究海军理论,依据海军实践的发展不断检验和推动理论的发展,并以海军战略理论直接指导人民海军建设的实践阶段,中国海军战略理论因此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和不断繁荣的时期。这一时期海军战略研究的发展经历两个大的发展阶段:从建国到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是人民海军战略理论创立和发展时期;从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到 20 世纪末,为海军战略理论的快速发展和繁荣时期。

第一阶段(1949~1978) 人民海军于 1949 年 4 月建立,翌年 4 月全国海军领导机关在北京成立。当时人民解放军正处于对蒋介石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追击,海上则处于

被国民党海军和空军的封锁包围中;朝鲜战争爆发后,在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的同时,既要防备美帝国主义对中国沿海地区的进攻,还要打击国民党军队对沿海地区的袭扰破坏。以国民党海军起义、投诚部队及其所带舰艇装备为主要基础组成的人民解放军海军,当时及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战略理论研究都以建军与作战应用理论为主。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及其指导下形成的人民军队优良传统,学习苏联海军建军与作战经验,指导海军战略理论研究。在共和国成立后的前 30 年内,海军战略研究主要围绕建军理论和战略作战理论指导展开。

关于建军理论 新生的人民共和国需要建设一支什么样的海军、依靠谁和怎样建设,是战略研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及海军领导机关慎密研究所作的决策,既是战略性方针、也是战略理论。主要是:
①关于海军领导机关的性质。它是战略决策机构还是军委总部的业务部门,是军种还是兵种机构,这涉及到海军领导机关的使命任务。毛泽东确定海军是战略决策机构,海军是战略军种,从而为海军的建设奠定了方向。
②关于如何建军。人民海军是在人民解放军陆军的基础上建立的,当时陆军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海军作为一个技术军种,需要大量有一定文化的成员,为解决这个矛盾,1950 年海军建军会议确定“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以工农为骨干,以解放军为基础,吸收大量的革命青年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人员,争取团结和改造原海军人员,建设人民海军”的建军路线,团结各种人员迅速形成战斗力。同时,确定了在充分考虑国家和军队实际的基础上,向苏联海军学习的方针。
③全面抓好人员素质建设。提出打好海军建设基础的“三个桩子”(即组织、政治思想、技术桩子)。
④认真处理好当前建设与长远发展的

关系。建国前后，党中央和毛泽东曾多次发出“建设一支强大海军”的指示，指出：“这支海军要能保卫我们的海防，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的侵略。”1953年12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就海军的任务与建设、海军建设与国家建设的关系，指示：“为了肃清海匪的骚扰，保障海道运输的安全；为了准备力量，于适当时机收复台湾，最后统一全部国土；为了准备力量，反对帝国主义从海上来的侵略，我们必需在一个较长时间内，根据工业发展的情况和财政的情况，有计划地逐步地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把建设强大海军的长远目标与国家及海军的现实结合起来，是建设现代化海军的现实问题。海军确定：在海军建设与国家经济建设的关系上，必需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方针；在海军建设与整个国防建设的关系上，必须服从以发展空军和防空军为重点并相应地发展海军的方针；在海军建设的内部关系上，必须服从以发展空（航空兵）、潜（潜艇）、快（鱼雷快艇）为主并相应地发展其他各兵种的方针。“从长期建设着眼，由当前情况出发，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富于攻防力的、轻型海上战斗力量。”这些有关建军与实践重大问题的解决，为海军战略发展明确了长远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界限。

关于战略作战理论指导 海军对打击国民党军破坏骚扰和对付海上强敌大规模进攻，进行了不同指导。前者遵循“边打边建”的方针灵活地规定了不同阶段的作战方针；在1950年8月前，人民解放军在全局上对国民党蒋介石军队进行战略追击，初建的人民海军则一面打击沿海国民党残余武装力量的破坏活动，解放沿海岛屿，打破其对长江以南的海、空封锁；一面准备力量解放台湾。朝鲜战争爆发后，加强海防作战，准备对付美蒋海上进攻，在战略上执行“战略防

御，战术进攻”的方针。1953年6月，美国被迫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解除了在中国沿海发动进攻以牵制朝鲜作战的可能。与此同时，国民党军在美国军事援助下，改以正规军为主进行窜犯，人民解放军采取敌进我进、针锋相对的方针，前伸力量主动打击敌人。在华东沿海，进行了多次海空作战和解放东矶列岛、一江山岛作战，迫使国民党军撤出浙江沿海，收缩至台澎金马。在与美国海军的斗争中，如何对付美海军作战是海军战略研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根据国家面临的海上被包围封锁的军事态势和强大敌人，以及海军仍是一支技术装备落后的轻型兵力的状况，当时的海军司令员萧劲光，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并发动海军院校教员共同研究，提出了海上破袭游击战的理论。海上破袭游击战与沿海抗登陆作战相结合是当时提出的海军未来海上作战的一种主要作战形式，分散的海上破袭游击战与有利条件下集中打击的歼灭战相结合的作战形式，具有在海军各种兵力作战半径内的任何地点，运用多种手段与手中武器对敌打击的广泛性，对敌隐蔽袭击的突然性，在战略防御中实施战役战斗的进攻性，以及运用兵力和有利作战形式的灵活性。1960年4月萧劲光在海军学院又一次指出：海军的作战方针，就是要在海上开辟独立战场，开展破袭游击作战，在敌后交通线上打击敌运输舰船和敌岸重要军事基地与军事工业目标，进行大规模破袭游击作战，协同陆军、空军组织与实施登陆、抗登陆、反袭击、反轰炸作战，与大陆战场相结合，取得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的最后胜利。

第二阶段(1978~2000) 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军队实行战略指导思想的根本性转变，为战略研究提供了更为宽松的环境，海军战略研究进入了快速发展和繁荣的时期。1978年和1979年邓小平不止一次地向

海军及有关部门领导指出：“我们的海军，应当是近海作战，是防御性的。”“近海不是边沿”。1979年他视察海军时题词：“建立一支强大的具有现代战斗能力的海军”。这就指明了中国海军应该执行近海防御的战略，海军应该朝向具有现代战斗能力、“顶用”的方向发展。这既是积极防御军事战略的海上部分，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组成部分。为贯彻邓小平的指示，海军由上而下地逐步开展了对海军战略的学习研究。海军学院前院长朱军在海军学院讲了战略与海军战略有关的内容，推动学院对海军战略的学习研究。海军于1983年10月举办海军高级干部研究班，研究战争初期海军作战指导，海军司令员刘华清在会上作报告，提出了“积极防御，近海作战”的海军作战方针，将中央军委积极防御战略方针与邓小平对海军的指示精神结合起来，研究了在战争初期海军的任务及其与战争中后期的关系。1985年中央军委提出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后，刘华清于同年底提出“近海防御”海军战略的概念。前述“积极防御，近海作战”的海军作战方针实际是“近海防御”海军战略的同意语。此后，海军加强了研究实体，学术界围绕“近海防御”海军战略展开对有关理论的一系列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学术成果。1985年海军成立“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编制有战略研究室，出版《海军学术交流》刊物。十余年来先后编写了《海军战略研究》、《海军战略学》、《海洋与军事》、《海军发展战略》、《外国海军军事思想》、《外国海军战略》、《海上局部战争研究》等学术著作，以及一批有见地的战略研究文章，进行了《2000年的海军》、《2000年我国海军的均衡发展》、《南沙群岛问题研究》等一批具有前瞻性的学术课题研究，推动了部队对海军战略问题的重视。研究涉及的内容主要是：

关于海军战略地位与性质的界定，及其与相关战略的关系。在统一存在海军战略的认识基础上，明确了海军战略是海军最高层次的战略，它本身就是一个多层次战略结构系统，对上它属于国家军事战略，同时还应接受国家海洋战略的制约；对下还有海军作战战略和海军发展战略。对海军战略的定义，在认识上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其最初定义是筹划海军建设与作战的方略，进入90年代后，人们在实践中认识到海军在和平时期的军事外交作用，以及大量维护海洋和平的功能，海军战略应对海军的战争运用（暴力运用）与非战争的和平运用（非暴力运用）进行统一筹划，定义为筹划海军建设与运用的方略。到20世纪末，有人认为作为军事战略，作战是其最主要的职能，任何时候不能淡化更不能忘记这个职能，否则军事战略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因此提议将海军战略定义为：筹划海军作战、和平运用与建设的方略。目前仍在探讨中。

关于海军作战方针。在实践上，海军作战方针是实现海军战略目标，指导准备与实施海上作战的总原则。它是对国家军事战略方针的具体完善和补充，对海军战役、战术和海上各战略方向或战略作战海区的作战方针有制约作用。在理论上，它是全军战略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海军战略理论中不可替代、承上启下的重要因素。海军作战方针应反映海上作战的一般规律，同时是海军进行作战准备，正确有效地运用兵力，指导海军一切作战活动的根本依据。研究海军战略作战方针的根本目的，是在统一高级指挥员思想的基础上，确定扬长避短、制胜敌人的方法。1989年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对海军高级干部进行了一次对未来海上局部战争战略指导方针的学术调研活动，集中了大家的智慧，也推动了对海上局部战争的思考。研究认为，海军战略

方针和海军战略手段既互相促进又互相制约,发展海军战略手段应符合海军战略作战方针的需要,而海军战略作战方针也应根据现有和可能发展的海军战略手段来确定,不能超越现实和可能,做办不到的事。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期以来习惯于使用作战方针的概念,在出现海军战略概念后,不少人将海军战略与作战方针等同,或者将二者合而为一。对海上全面战争或局部战争的战略作战方针,在理论上仍是一个需要继续研究的课题。

关于海军暴力运用与非暴力运用理论海军暴力运用是海上战争达成战略目的的一种传统战略运用方式,也是迄今为止许多国家在理论上承认的唯一战略运用方式。各种规模、各种样式的海军战役、战斗,就是其具体体现。海军暴力运用的成败,往往关系到海上战争的成败,对国家的安全与发展也有重大甚至决定性的影响。以往的世界海军史,就是一部世界海军的暴力运用史,传统的海军战略,其实就是海军暴力运用的方略。正因为如此,海军的暴力运用,在海军战略乃至海军学术的其他领域,占有很高的地位和很大的比重。然而,海上斗争的复杂性,并不是单纯采取暴力行为所能全部解决的;即使可以解决,也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在许多特定的情况下,采用非暴力的方式,往往能收到直接的暴力行为所难以收到的良好效果。于是,作为一种战略运用方式的非暴力运用应运而生。所谓非暴力运用,就是以显示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为主要内容,兵不血刃地达成战略目的的一种运用方式。

海军的非暴力运用,根据外在形态可分为静态运用和动态运用。静态运用是指通过诸如对海军的战争动员,组建某一(或某些)部队和指挥机构,组建或扩建某一(或某些)基地、港口、机场或其他军事设施等静态行动,向对方真实地或有意夸大地显示自己的

决心、企图和可能采取的行动,从而达到制止战争、缓和危机或者促使局势向着有利于己方的方向发展。这是寓“运用”于建设的一种一举两得战略运用方式。它与国家的政治、外交斗争相结合,或辅之以恰当的宣传和反情报工作,能收到政治、军事和心理上的多重效果。动态运用是指通过对海军兵力的集结、调动、演习、巡逻、护渔、护航等行动,显示国家的军事存在,表明己方的意图和关注点,从而达到自己的战略目的或为自己的战略目的服务的一种非暴力运用方式。舰艇编队的出访和配合国家有关部门所进行的海洋科学考察等行动,也是动态运用的一种方式,同样可以收到一定的战略效果。

海军非暴力运用必须以暴力运用作后盾。没有实施暴力行动的物质手段和精神准备,非暴力运用只能算是一种冒险。许多情况下海军非暴力运用与暴力运用往往是交替进行的,至于孰主孰次,完全取决于当时面临的形势。“暴力”与“非暴力”概念是政治斗争用语的移植和发展,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详尽地论述了暴力。在现实世界中,使用暴力与非暴力解释战争与非战争现象,已不能全部解释清楚,其界限有时很难划清,如使用兵力强迫对手就范,是非暴力抑或是暴力,很可能见仁见智各有说法。因而,到20世纪末,海上军事行动已较少使用暴力与非暴力概念,而代之以战争行动与非战争军事行动。但海上军事行动中的暴力与非暴力理论,仍是海军战略理论研究的重要问题。

关于对“近海防御”的理解 ①“近海防御”海军战略的性质。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决定了海军战略同军事战略一样,是积极的防御性的。防御的目的是为削弱敌海军的作战能力,消耗其作战实力,粉碎或打退敌人的进攻,必要时将实行战略追击。因此,中国海军战略所具有的基本

特征是:不称霸海洋,坚定不移地反对他国推行海洋霸权主义;不搞海外基地,积极建设和发展现代化的国土基地网;反对消极防御,积极主动灵活地实施海上战役、战斗的攻势作战,以达到战略防御的目的。②“近海防御”海军战略的目的。即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应付针对国家的海上局部战争,遏制和防御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来自海上的可能的侵略,保证国家能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维护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这一战略目的,是海军筹划当前和长远、平时和战时宏观指导的依据,是海军各项工作的出发点。③“近海防御”海军战略的作战海区。“近海”不是地理概念,而是一个战略概念,它包括了根据国际海洋法公约应归中国管辖的全部海区和分布在这些海域中的中国固有领土东沙、西沙、中沙和南沙群岛,包括广大的中国海区。这是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以及进行海上防御作战所必需的。今后要能真正有效地防御来自海上方向的进攻,必须具有足够的海洋防御纵深,能在尽远距离上拦截和消灭敌人海军的兵力兵器。④“近海防御”海军战略对海军作战能力的要求。“近海防御”海军战略要求海军在和平时期和局部战争与全面战争中,完成众多战略任务。为了完成这些任务,海军必须具有相应的作战能力,主要是:夺取有限时间和空间的制空权、制海权,夺取有限时间的海峡水道控制权,在与中国海区相邻的海区的作战能力,较强的核反击能力,近海与近岸海区的控制能力。

关于岛屿主权和海洋权益 维护国家海洋领土主权,既要有军事观点,更要有政治外交观点,和平时期尤其要服从国家政治外交全局的部署。海军是涉外相对较多的军种,对外国侵占中国的岛屿主权,要从国家政治外

交全局出发,积极地做好军事收回的准备,按国家全局计划行动。

关于树立新的海洋观念 中国曾是世界上航海文明悠久、造船技术高超、海军建立最早的国家,海洋正面宽广,海岸线漫长,但由于长期以来对海洋的利用重视不够,海洋观念淡薄,以致形成近代遭受海上侵略的严重局面。研究认为,近代与远古历史反差如此之大的原因之一是海洋观念落后,必须树立和加强新的海洋观念;要将国土观念从浓厚的大陆意识,转向同时具有强烈的海洋意识;海洋价值观念要从舟楫渔盐之利的有限利用,转向凭借高技术广泛利用海洋各种资源;海军建设观念应从近岸作战转向近海作战,树立近海防御的战略指导思想。

发展趋势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努力,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的努力,海军战略研究已经取得了基本符合国情和军情的海军战略理论体系的重大成果。进入 21 世纪,海洋既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希望,也是重要角逐场所,信息技术与其他高技术的发展,将进一步扩大海洋战场,推动海军战略研究向更新更高层次发展。面对世界政治、经济与科技发展变化,海军战略研究将面临发展海军战略理论、指导海军战略运用的新任务,加强“近海防御”海军战略向远海防卫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的指导研究。

参考文献

胥世明主编:《海军战略研究》,北京:海潮出版社,1990。

海军司令部编:《近代中国海军》,北京:海潮出版社,1994。

刘振环、胥世明、陈寿康主编:《海军战略学》,北京:海潮出版社,1995。

萧劲光著:《萧劲光回忆录》(续集),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

(胥世明)

空军战略研究 (study of air force strategy)

探讨筹划空军建设和运用方略的活动。主要包括对空中战争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空中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空军战略的形成、含义和发展,空军战略的制定,空军战略的运用,空军建设与发展的战略方针、战略指导原则、战略目标和战略措施的确定等内容研究。在空军现代化建设中,空军战略研究有着特殊的重要地位,对空军的建设与发展、空军战略力量运用的正确决策与指导,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华民国时期的空军战略研究 1911年飞机用于实战。自1918年英国建立世界上第一支独立的空军起,空军只有80多年的历史。中国是创建航空部队较早的国家之一。1911年辛亥革命后,武昌、上海都督府先后购买外国飞机,成立航空队。1913年,北洋政府在北京南苑建立了中国第一所军事航空学校。1915年,孙中山在日本创办“中华革命党飞行学校”,后在领导广州革命政府期间设立航空局,办航校,成立飞机队。1920年后,东北三省和广东、广西、四川、云南等省地方政府也先后组建航空部队。1928年,国民党政府设立航空署,收编各省航空队,建立统一的空军。

在创建中国空军的过程中,一些有识之士已开始对空军的建设、发展和运用等问题,进行了具有一定深度的理论研究。其代表人物首推孙中山,早在飞机问世之初,他就提出了“航空救国”的战略思想。当时虽然尚未提出“空军战略”的概念,但孙中山的“航空救国”思想实际上是反映中国早期研究空军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成果,对中国早期航空事业和空军的建立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孙中山这一思想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①预见到空军在战争中的

重要作用。1903年美国莱特兄弟发明飞机后,孙中山即敏锐地看出了它的发展前途,并预见到飞机对于战争和国家建设的重要意义。他在欧美旅行期间,看到飞机的迅速发展后,更对其引起了极大的重视。1910年5月,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飞船(指飞机)练习一事,为吾党人才中之不可缺,其为用自有不可预计之处。”他到日本后,在其亲自创办的中华革命党航空学校对学员训话时提出了“飞机将是未来战争决胜的武器”的论断。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孙中山又指出:“飞机为近世军用最大利器,……于国家前途,吾党前途均至有裨益”。②强调建设独立空军。1921年,孙中山拟定的《国防计划》中,多处强调发展航空事业,并提出空军与陆、海军并列,建成一个独立军种的思想。1924年,他在黄埔军校创建训示中提出:“自航空飞机参加战斗序列后,在国际主权的划分而言,往昔战争的领土领水,今有领空的划分,……就其效力而言,已打破兵舰、潜艇、战车的偏枯性能,极控制三界之能事。故欲因应现代国防上的需要,非扩充空军力量不为功”,突出强调了建设独立空军力量的必要性。③在空军的运用上,孙中山提出了飞机可实施空中机动和进行轰炸的见解。早在1911年,孙中山在给萧卫汉的信中就提出了“飞机一物,自是大有利于行军”。其意是指为克服各种地形障碍而实施的空中机动。虽然当时还没有大型运输机,但他却预见到了这种可能性,并为后来飞机的发展和应用所证实。1916、1920、1923年,孙中山曾三次策划并使用飞机对敌实施轰炸,均获成功。孙中山认为,使用飞机轰炸敌军有非常的震撼作用,“自有不可预计之处”。

国民党政府时期对空军战略的理论研究有了较大发展,反映这方面研究的学术著作比较多。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空军与国

防》(湛国钧主编,1933),《国防与航空》(周至柔著,1936),《空中战争与轰炸问题》(严寿康编,1936),《空中战斗战略与战术》(林均能编,1937),《航空讲话》(杜焜英、杨友梅编述,1937),《国民与航空》(蒋介石讲述,1939),《空军学》(收国民党空军参谋学校研究大纲四种,作者及出版社年月不详),等等。这些阐述空军建设和运用的专著,论及范围比较广泛,除了从战役战术上论述空军的作用外,还从战略层次上对空军的地位、任务和建设等,做了颇具学术价值的阐述:①关于空军在国防上的意义,强调“从前一个强国的条件,第一是要健全的陆军,第二是要健全的海军。但到现在都觉得巩固的国防差不多完全要靠空军,甚至于有人说:‘没有空防,就没有国防’”,这是“中国的自强之道”。②关于空军的任务,强调“并非仅严格属于军事上的,同时可收到政治上的作用,有使敌不战而降之功。……一跃而达到战争的真正目的。”“战争上胜败之要素系于人民心理。欲求最后的胜利,必先取得民众自愿的援助。所以致胜之最要条件,在能使敌国人民心理涣散。而空军之最要任务,亦即在造成敌国民众心理的颓丧状态,使其人心畏怯,自可不战而胜。”③关于空军的地位及建设,认为世界已到了“无航空即无领空”、“无空防即无国防”的时代,空军的价值至少与陆、海军“等量齐观”,中国应建设一支“攻势空军”;强调“空军既有此伟大力量,能一跃即深入敌人后方破坏其防御阵势”,“念及未来战争之可怖,空防之迫切重要”,必须建设“大空军国”。为了建设一支独立的空军,必须做好各方面的准备,主要有:“人才之培植”,“物质制造之准备”,“教育精神上之准备”,“发展民间航空组织”,等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空军战略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

式建立,并逐步发展成为一支重要的战略力量。空军初建时期,由于缺乏实践经验,在军事学术理论上,主要汲取了苏联空军的经验。经过抗美援朝战争和多年防空作战以及参加解放浙东沿海岛屿作战、西线平叛作战等实践,特别是80年代以来,人民空军广泛开展理论研究工作,加强对空军作战经验的总结和现代战争的研究,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完整的空军战略理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空军战略研究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84) 在这一阶段的研究中,虽然尚未触及到空军战略的概念问题,但研究内容涉及空军战略的许多领域。研究的重点是确立空军建设的指导思想和作战使用的基本思想两大方面。空军初创时期,为了完成中国共产党中央赋予的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的历史使命,空军从军队建设实际出发,及时开展了空军建设方针的研究,明确提出了“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的方针,既强调自力更生,又注重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确立空防合一的空军体制;在空军建设方向上,强调由防御型空军向攻防兼备型空军转变。与此同时,空军根据当时的军事斗争形势和中共中央赋予的任务,积极研究空军的作战使用问题。人民空军成立不久,就受领了抗美援朝作战的任务。空军积极贯彻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思想 and “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并根据空中作战的特点,提出了“在战斗中成长”,“积蓄力量,选择时机,集中使用”,“为地面部队服务”,“统一指挥”和“稳当”等作战原则。在实践中,采取在地面防空部队和友军配合下,以歼击航空兵打空战为基本作战方法。50年代起,空军遵照毛泽东关于“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的指示,深入开展了国土防空作战问题的研究。针对敌空中人

侵活动的特点和规律,研究提出了一系列作战原则和战法,指导空军部队有效地打击了敌人的空中入侵活动,保卫了国家的空中安全。60年代后,空军根据国家安全形势的发展变化,加强了反侵略战争中空军作战运用问题研究,着重探讨了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抗击敌人战略突袭、夺取制空权和协同陆、海军作战的理论,进一步明确了空军必须在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指导下,贯彻从最复杂、最困难的情况出发,坚持持久作战和坚持打人民战争的战略指导思想。关于空军作战使用的基本思想,在总结实践经验和汲取外国经验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夺取制空权、协同地面军队作战、防空作战,以及集中使用兵力和统一指挥等基本的学术思想。强调:把夺取制空权作为空军的首要作战任务;在诸军兵种协同作战中,坚持以合同作战的胜利为胜利和重点用于纵深作战的思想;在防空作战中,坚持“整体抗击,积极反击,严密防护”三位一体的作战思想;在空军作战使用中,强调集中兵力和实施统一的指挥。

第二阶段(1985~1990) 这一阶段的研究,重点是探讨空军战略的含义以及中国是否应该明确提出自己的空军战略。1985年,随着军事战略指导思想的转变,全军开展了战略问题研究,空军战略研究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研究空军战略运用问题,但很多观点没有达成共识。讨论的焦点是人民解放军应不应该确立自己的空军战略。主要有两种不同观点:①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不存在独立的空军战略,理由是:一个国家、一个军队只能有一个战略;确立空军战略将导致“空军制胜论”、“大空军主义”;中国空军武器装备落后,没有战略武器,构不成战略空军,也就没有空军战略。②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应该确立空军战略,理由是:空军具有战略指挥权,空军的运用和建设涉及并形

成了战略全局,需要从战略层次上进行筹划。此后,又开展了一系列学术研究活动,主要有:1987年7月,空军学术委员会在北京召开“战略问题研讨会”,再次对空军战略的含义、存在意义、如何表述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和讨论。1989年12月,空军指挥学院研究部组织空军战略研究方面的论文,参加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组织的“军事战略基本理论研讨会”。这些学术活动为以后的空军战略理论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三阶段(1991~1995) 这一阶段是为确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战略,为建立空军战略学学科奠定坚实基础的关键阶段。在该阶段,学术界进一步系统地研究空军战略的一些理论问题,介绍世界一些国家有关空军建设与战略运用的情况。1993年1月中央军委军事委员会确定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后,空军着力开展战略问题的研究,系统地探讨了空军战略、空军发展战略、防空战略、空军武器装备发展战略、空军人才发展战略等重大问题,提出了“攻防兼顾,以攻为主”的空军力量战略运用思想和“攻防兼备”的空军建设思想。与此同时,军事学术界也就空军战略问题展开了比以往更为深入而广泛的研究。在这一阶段,反映空军战略理论的书籍和学术论文陆续涌现。其中代表性的著作有《空军战略研究》(1991)、《空军学术思想史》(1992)、《空军战略学》(1995)。《空军战略研究》认为,“空军战略是依据国家的军事战略,指导空军作战和建设全局的方略”,并论述了空军战略的形成和发展,空军战略运用的基本模式、战略指导的一般规律和主要战略行动的指导,空军建设与发展的基本模式、一般规律和对空军建设与发展的指导等,是最早系统阐述空军战略主要内容的专著。《空军学术思想史》阐述了主要国家各个时期空军作战和建设的理论观点以及空军战

略使用等理论问题。《空军战略学》第一次给空军战略学下了明确的定义，并系统论述了空军战略学的研究对象和主要内容，空军战略学作为一门学科得以确立。学术界在一些重大学术问题上也取得较为一致的认识：

确定空军战略是历史的必然。空军作为全军的一个独立的合成军种，有它独立的空中战场，辖属许多战役军团，能独立执行战略、战役任务。空军实战能力的大小，关系到陆、海战力量的强弱，成为影响战争进程的重要因素，有时甚至成为主要因素。空军是一个战略军种，有大量的战略使用问题和建设问题需要解决，都必须着眼于战争的全局，从研究空军战略的高度出发，才能统筹解决空军的全局性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空军大规模执行空战、战场支援和战略轰炸任务，成为对战争进程和结局有重要影响的力量，同时也改变了战争的时空观。近期局部战争的大量事实也说明，现代空军已从以往保障和配合陆、海军作战的从属地位，转为独立承担对战争进程和结局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战略、战役任务。现代战争已扩展到陆、海、空、天、电五维战场，空天、空海、空地、空电一体化作战，将是未来战争的基本形态。随着当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航空武器装备的不断改善，空军已具有更大的快速反应能力和突击力；不仅是诸军种联合作战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能组织空中进攻战役和突击敌后纵深重要目标。从发展上看，以空中力量为主的联合作战，将在局部战争中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随着空军在现代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的日益提高，确立“空军战略”实属历史的必然。

确立空军战略有充分的根据。①对空军全局宏观指导的需要，是确立空军战略的客观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空军建设、作战以及空军对自身作战、建设的宏观指导，只

能是空军战略方面的内容。毛泽东早在50年代就指明了空军建军初期的战略目标和建设方针。空军根据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提出加强空中防御，“积极打击，严密防护”等作战指导原则。这些内容都属于空军战略。②战略所具有的全局性、独立性的特征，是确立空军战略概念的基本依据。空军具有相对全局性的特征。空军相对全军来说虽然是局部，但它仍具有相对的全局性，表现在对空中斗争形势的综合分析和判断、预测空中战争的发生与发展、揭示空中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确定空中战争所要达成的目标、制定空中战争的指导原则和计划、筹划空中力量的建设等。这些都是带有全局的问题，需要从战略高度研究和解决。未来作战中，各军兵种的联合性不应该否定各自的相对独立性。各军兵种越具有独特的作战手段，独立作战能力就越强，也越容易实现更大范围的诸军兵种联合作战。联合作战与独立作战是辩证的统一。③战略的整体性、层次性的特征，是确立空军战略的逻辑根据。战略结构是一个系统。从整体结构上看，把军事战略的全部研究对象，划分成若干群体，以揭示其全部外延，完全符合逻辑原理。从层次关系上看，军事战略和空军战略是相容概念中的从属关系。军事战略的外延包括了空军战略。空军战略是军事战略的一部分。军事战略是战争的全局，空军的战略是军事战略的局部和空军的全局，既不能同等看待，也不能肯定一个否定另一个。随着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空军的高技术化、专业化程度会更高。对其全局的筹划和指导，只能是空军战略，而不能用其他名称来代替。

空军战略具备构成战略的基本要素。军事战略可分解为军事目标、军事战略方针和军事战略手段三个要素。空军战略的三个构成要素体现了军事战略的特性：一是空军军

事行动所追求的目标。即:保卫国家的领空主权不受侵犯;从空中支援陆上、海上实施防御或进攻作战,达成一定的战略目的;通过空中威胁,威慑并制止敌人的侵略等。空军军事行动所追求的目标,对空军的体制编制、装备发展、教育训练、战场建设、后勤建设、军事学术研究方向等具有极大的影响。因此,在空军战略诸要素中,空军军事行动所追求的目标是居于最高层次的问题。二是空军军事行动的指导方针。它是空军战略要素的核心部分,是一个时期的空军作战指导思想的高度概括。三是实现空军军事行动目标的战略手段。即空军拥有在战争中长时期起作用的雄厚的作战实力,这是夺取战略空中优势的物质基础。空军的作战实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拥有英勇善战、技术战术水平高于敌方的飞行人员队伍,拥有性能优于敌方的作战兵器。空军的战略手段不能仅仅理解为战略空军或战略武器,战术空军和战术武器同样可以做出战略性的贡献。

确立空军战略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一是有利于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控制陆上、海上必须控制空中”已被许多国家列为重要战略原则。一个大国的军事力量不仅表现在陆上、海上,还表现在空中。确立并研究空军战略,有助于这一历史使命的完成。二是有利于关照好全局和局部的关系。战略结构已由单一层次向多层次发展。作为支持国家战略的军事战略,必须有包括空军战略在内的军种战略的支持,否则军事战略就不完善。同时,空军有它的全局性问题。如果对它的全局没有正确的谋划和指导,就不能同全国、全军的战略目标协调一致,空军的战略目标也难以实现。三是有利于发挥空军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邓小平曾经指出,将来打起仗来没有空军是不行的,没有制空权是不行的,陆军需要空军掩护、支援,海军没有空军的掩护也不

行。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空军能否抗住敌人大规模战略空袭,挫败敌人夺取制空权的企图,在地面、海上战役战斗的关键时刻,能否夺取局部制空权,能否对地面、海上战役战斗行动进行有力支援,都将直接影响战争的进程和结局。研究空军战略,就是要对空军在现代战争中可能担负的任务、运用原则、作战方法进行研究,实施正确的宏观指导。四是有利于指导空军建设。空军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军种,其发展既受到国家政治经济、科技水平、国际环境的制约,又受体制及其他要素是否协调发展的影响。所以,空军的发展,需要正确处理空中作战需求与经济、科学技术条件的关系,空军内部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近期建设与长远建设的关系。这些,正是空军战略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加强空军战略的研究就可以减少或避免主观指导上的失误。

第四阶段(1996~2000) 这一阶段着重应用性研究和进一步完善空军战略理论。1995年2月,空军司令部将“空军战略问题研究”列为“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军事理论研究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同年3月,空军以空军指挥学院科研部为依托,开展空军战略问题的系统研究;空军指挥学院成立空军战略问题研究领导小组,主要任务是研究空军的建设发展问题,并于1997年5月完成该课题,编写出版了《空军发展战略》。该书阐述了制定空军发展战略的基本依据,提出了“攻防兼备”的发展战略思想以及发展战略目标和战略措施。1995年12月12日,空军成立战略研究课题组,启动《新时期我国空军战略研究》的新课题,并于1997年8月完成研究工作;9月,作为全军重大课题研究成果上报中央军委。该课题系统研究了制定空军战略的依据,空军战略运用思想,阐述了空军战略的主要内容(战略目标、战略指

导原则、战略手段)、空军发展战略措施等,提出了“空疆防御”战略,其核心思想是:扩大空军的战略活动范围,包括国家领空和海洋权益区上空,在战略上实行防御,战役战斗中实行机动作战和攻防一体、注重进攻。1997年9月,空军指挥学院成立《空军战略学》编写组,正式启动研究工作。该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和阐述了空中军事斗争,特别是空中战争的基本因素和基本规律,阐述了空军战略运用、建设与发展和指导原则等内容,标志着人民空军战略理论不断丰富,进一步完善,日趋成熟。为反映军事学术界在空军战略研究上取得的重大学术成果,《中国军事百科全书》(1997)及其增补卷,专门设立了“空军战略”和“空军战略学”两个条目。

发展趋势 21世纪初,空军战略研究将得到快速的发展。随着未来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中强调使用空中力量以影响战争进程和结局的趋势不断得到加强,建设与国力相适应的空军,正确有效地运用空军力量,防止和遏制战争爆发或冲突升级,打赢可能发生的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将成为空军战略研究的重要内容。预测高技术条件下空中战争的特点、样式和空军战略行动方式,发展、更新空军战略理论,将是空军战略研究的主要任务。

参考文献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空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于官堂、孙繁海主编:《空军战略研究》,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91。

华人杰等主编:《空军学术思想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

戴金宇主编:《空军战略学》,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5。

核战略研究 (study of nuclear strategy)

探讨筹划和指导核力量建设、发展与运用方略的活动。军事战略研究的重要方面。研究的主要内容有:核战争(包括全球性和局部性核战争)的特点及规律;核力量(包括核武器、核武器运载工具以及使用核武器遂行军事斗争任务的部队)的建设和发展;核力量的运用(包括核威慑、核打击和核反击等);核战争的遏制;世界核战略格局以及核军控、核裁军问题等。

最初起步阶段(50年代) 50年代是中国核战略研究的起步阶段,也是中国核战略思想的萌芽期。建国后,中国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国际环境。在朝鲜战争和台湾海峡危机等情况下,美帝国主义依赖其核优势,不断对中国人民进行核威胁和核讹诈。这一时期中国核战略研究的重点是:掌握国外核武器发展动向,了解国外核力量的使用政策;研制导弹核武器,筹建核力量,打破核垄断;分析核武器的毁伤效能,研究核战争情况下的防护对策;研究分析核战争的本质,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核战争观。研究认为,对核战争的态度,一是反对,二是不怕;要反对核战争,必须拥有自己的核武器,打破核垄断,粉碎核讹诈;中国的核力量建设要做到“有一点,少一点,好一点”。据此,中国作出了研制核武器的决定,并开始着手这方面的工作。这一时期的研究,奠定了中国核战略理论的基础。

全面展开阶段(60~70年代) 60~70年代是中国核战略研究全面展开阶段,也是核战略理论的逐步形成期。进入60年代,中美关系继续僵持,中苏关系开始恶化,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军备竞赛进程加快,相互间保持核对峙状态;在越南战争和中苏关系恶化等情况下,美苏都曾扬言要对中国实施核打击,中国受到的核战争威胁有增无减。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中国相继成功地进行

(薛翔 陈效良)

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导弹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和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组建了核部队,不但解决了核力量的有无问题,而且解决了核武器的系列化和核力量的实战效能问题。这些因素,为核战略理论研究提供了压力和动力,促进了核战略研究的全面展开。这一阶段研究内容主要有:

对核战略基本理论的研究 60年代,随着世界核力量的发展,核武器数质量的提高,各有核国家对核战略研究都非常重视,投入了大批的人力、物力、财力,并取得了一批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尽管当时中国已经具有一定的核战略思想,但还不够深入、全面,对学术界来说,核战略还是一个有待完善的研究领域。军事科学院等单位开始了对核战略基本理论的全面研究,其内容包括核战略的概念、地位、作用以及与国家战略、国防战略的关系等;核战争的概念、样式、特点、本质;核力量建设与运用的基本原则和规律等。研究认为,核战略作为筹划和指导核力量建设、发展和运用的方略,性质上有进攻与防御之分,同时具有威慑和实战两重性,它服务并隶属于军事战略,受军事战略的指导和制约,同时又对国家战略和国防战略产生重大影响。关于核战争的概念,一种看法认为,凡是使用核武器的战争都是核战争,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使用了核武器,可称为核战争;另一种看法认为,只有以核武器为主要杀伤手段的战争才叫核战争。核战争可以区分为全面核战争和局部核战争,核战争同任何其他形式的战争一样,在本质上都属于政治的继续(这一观点在以后又产生了不同意见)。核战争的特点是战争范围广大,立体性强;战争空前严酷、紧张,精神力量竞争激烈;战局复杂多变,组织、指挥、协同困难;战争对技术、后勤等保障的依赖性大。确立核力量的发展原则,必须从国家安全利益出发,依据国家经济发展

及现有的经济、科技水平,制定出核力量的发展方针、目标和途径,确定核力量的结构体系和建设规模,正确处理发展战略核力量与发展战役、战术核力量的关系以及空基、陆基、海基战略核力量的比例。代表性著作有军事科学院编的《介绍两本书》、《论现代作战》,以及第二炮兵指挥学院编的《核战略学》等。

对有核国家核战略思想的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在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其后不久,美国一些战略研究人员就开始了对核战略的研究,并先后出版了大量有关核战略的理论著作,对美国核战略的制定有较大影响。原苏联在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对抗中,也逐渐研制和发展了自己的核力量,形成了一定的核战略思想,并反映在其军政领导人的一些言论、文章和著作之中。从核武器产生到70年代末,美国先后奉行了核讹诈政策、大规模报复战略、相互确保摧毁战略和抵消战略。苏联也先后推行了常规抵消与反垄断战略、火箭核战略、核战争制胜战略。英、法分别于50年代初和60年代初核试验成功,并逐渐形成其各自的核战略思想。中国理论界对这些核战略思想的研究,涉及其提出背景、战略目的、战略方针、战略原则、战略计划等。研究认为,无论哪个国家奉行的哪种核战略,从本质上来讲,其核心都是以核武器为主要手段,以“威慑与实战”相结合为主要标志的方略。这些研究成果为中国核战略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研究并确立中国的核战略思想 60~70年代中国核力量的建设和发展,为本国核战略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时对系统地研究和确立自己的核战略提出了迫切要求。这一时期对核战略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①提出了中国的核政策。60年代,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

级革命家,以中国的国情和国际战略格局为依据,研究并相继阐述了许多有关中国发展核武器,打破核垄断的基本政策和遏制核战争的理论、方针、原则,这些都体现在中国政府关于核试验、核爆炸成功的新闻公报里。主要内容是: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根本目的,在于打破核垄断,制止核战争,最终实现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发展核武器的目的,完全是为了防御,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消灭核武器。打破核垄断,遏制核战争的基本思想,为中国核战略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

②对中国核力量建设与发展问题的研究。国内理论界在认真分析中国核力量在平时和战时的战略任务的基础上,研究、提出了核力量建设与发展的方针和原则,并对核力量的发展规模、战场建设、教育训练,以及装备、技术、后勤保障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③对中国核力量战略运用问题的研究。主要研究了战略目标选择问题、核反击的时机与规模问题、核兵力及核火力运用问题等等,并提出了中国核力量战略运用的基本原则。

④研究了核战略决策与指挥问题。明确了核战略决策的任务,原则与要求,以及核战略领导与指挥问题。另外,还对核战略与政治工作的关系、核战争准备的依据、内容、要求、途径等问题,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中国核战略理论基本形成。

深入发展阶段(80~90年代) 80年代以后是中国核战略研究的深入发展阶段,也是中国核战略理论的完善期。80年代以来,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加强了配套建设和合成训练,体制编制也更加完善。90年代初,苏联东欧发生巨变,华约解体,冷战结束,国际形势和世界核战略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的核战略研究也步入一个新阶段。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①对核军控

核裁军问题的研究。经过几十年的核军备竞赛,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核武器库都已经达到超饱和状态,开始进入实质性的核军控核裁军阶段。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军事科学院、第二炮兵等单位,对有关国家核力量的发展趋势、世界核军控与核裁军形势、军备控制和裁军谈判问题等进行了深入全面的研究,取得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如《论不扩散核武器法律制度》、《军备控制与裁军》、《核裁军对策研究》等。

②对核威慑理论的研究。核威慑是核力量战略运用的重要方式,中国学术界对核威慑的基本理论、有核国家的核威慑战略、核威慑的前景、中国对核威慑的态度等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中国不应奉行核威慑战略,但可以提战略、战役、战术核威慑。《威慑战略》、《威慑论》、《军事威慑学概论》等著作都对核威慑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③继续深化对核战争问题的研究。80年代中后期,总参谋部防化学院编辑出版的《核战争设想》、第二炮兵编辑出版的《国外对核冬天问题的研究概况》、气象出版社出版的《核冬天:核战争后果的气候研究》以及1992年湖南出版社出版的《战争与道义:核伦理学的兴起》,都是有关核战争问题的研究专著。同时,总参谋部、军事科学院、第二炮兵等单位还对外军有关核作战理论、外军核化生条件下的作战、中国的核力量运用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④对世界核格局变化的研究。苏联解体以后,世界上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剧增,同时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核扩散问题严重,特别是90年代后期,印度和巴基斯坦相继进行了核试验,拥有了核武器,使世界核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对此,总参谋部、军事科学院、第二炮兵等单位进行了跟踪研究,对世界有核国家的核力量与核战略调整、冷战后世界核战略格局及其发展趋势、印巴核试验的战略影响

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分析。其代表性著作有《核战略纵横》、《世界有核国家的核力量与核政策》、《核后时代的降临》、《南亚上空的蘑菇云》、《核战略纲要》等。这一时期,中国核战略研究的突出特点是全面、深入,时效性强,以研究报告或理论专著等形式出现的研究成果多,标志着中国的核战略研究步入了一个新阶段。

发展趋势 21 世纪初,中国核战略研究的重点将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①随着有核国家的增加和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对新的核格局的研究将成为核战略研究的重要内容。②在核力量建设上,对新形势下所需要的核力量规模和结构进行研究,使精干有效原则进一步具体化。③在核力量运用上,研究重点继续由实战运用向威慑运用转移,进一步遏制核战争的爆发。④将继续关注超级核大国的核裁军进程,探讨核军备控制与反核扩散的具体措施,其技术性和对策性将更强,从而为最终实现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目标提供理论指导。

参考文献

徐光裕著:《核战略纵横》,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7。

祁学远编著:《世界有核国家的核力量与核政策》,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

(张进喜 赵德喜)

国防战略研究 (study of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探讨筹划和指导国防力量建设,保障国家安全方略的活动。研究内容主要有:国防力量的建设和发展、战争的准备与实施、国家安全利益的维护等。

虽然学术界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才明确提出“国防战略”的概念,但在此之前,有关

国防建设和国家安全的全局性方略等问题始终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

清末的国防战略研究 1900 年,清军抗击八国联军入侵失败,迫使清政府进一步变革军事制度。在国防和军队建设等问题上,晚清军政重臣张之洞在其军事论著《劝学篇》中提出,武力是一个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础,中国在列强的侵逼之下要想生存和独立,必须建立强大的国家武力。近代思想家郑观应面对中国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先后著成《易言》、《盛世危言》,主张学习西方长技,以近代军事知识和科学技术培养造就军事人才。他认为,中国不但应该讲“海防”,更应该讲求海战,倡议广造水雷、铁舰,改造炮台。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国防战略研究比较零碎,比较薄弱。

中华民国时期的国防战略研究 这一时期,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等提出了各自的国防战略观点,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杨杰等对国防战略进行了理论探讨。

1912 年,清王朝在辛亥革命中被推翻。袁世凯从清军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看到旧式军队已不能御敌卫国,主张从根本上改革军制,建设新军。他一方面编写了《训练要言》、《训兵要言》等著作,另一方面“专仿德国章程”,改革清军编制,用西法练兵,重视军事教育,广设武备学堂,派员出国留学。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提出了“以党治军”、“军队与国民相结合”的建军方针。主张建设强大的国防,而建设国防的前提是整顿军备。整顿军备主要有五个方面:划分军区、统一军制、实行“精兵”政策、兴军事教育、扩大兵工厂。

蒋介石认为,无国防,即无国家,就没有国防建设,没有国防建设就没有国家建设;近代国防决非单指军事国防,尚有经济(工业)国防、精神(思想)国防等;他坚持“国防中心

论”，提出一切政策，一切设施，都要以国防为中心；一切利害，一切是非，要根据国防来判断。强调现代国家的军事、政治、经济、教育，应以巩固国防为唯一目的，实行民主与国防合一。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提出并制定了守势国防方针，加强战略后方建设。蒋介石的国防思想虽在某些方面符合国防建设的一般规律，但由于他对内实施专制独裁统治，对外妥协退让，致使其国防政策名存实亡，难以付诸实施。

民国时期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对国防战略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其代表作为《国防论》、《军事常识》。他的国防战略思想涉及国防观、国防建设、国防教育、国防战略方针等诸多方面。^①关于国防观。他认为国防的基本力量是由兵力、武力、国力三个层次构成的。从根本上说，兵力之源在于武力，武力之源在于国力。武力是加以军事的组织、锻炼的国力，包括国民的体力、智力和道德力，以及农业、工业、矿业、牧业和经济等各要素。国力则是人力、地理、物质生产力、机械运动力和政治力五者的综合体。在国力综合体之中，政体和制度是“原动力”，而要增强中国的国防力量，则应改革政治，实行民主宪政和义务兵役制，使人民有参与政治之权利，也有保卫国家之义务。^②关于国防建设。他主张贯彻“生活条件和战斗条件一致”的原则，建立“既能吃饭，又能打仗”的国防制度，使国防经费的投入向有利于国民产业的方向发展，把军用和民用结合起来，以长期持久的努力来建设和发展国防；国防建设应立足于本国，主要依靠自己的人力、物力、财力，同时还强调要掌握先进的军事技术，重视新式武器的研制，争取站在世界的先进行列；军事工业和国防交通的布局要合理。这样，才能保证战时有效地抗击敌人入侵。^③关于国防教育。他认为除了对军人进行军纪教育和军事知识教育外，

还要特别提倡对全体国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通过“文武合一”的办法提高国民与军队的素质。他提出要对高中学生每年进行两个月的军事训练，从专门学校以上学校的毕业生中选拔担任军官，从而达到兵民相通，寓兵于民的目的。^④关于国防战略方针。他认为：要实事求是分析国际形势，确定国防战略目标；日本是中国国防的第一假想敌，中国御日国防的第一线应确定在东北，山东半岛是防日第二要害处；军事训练要有针对性；中国国防应以自卫为根本原则，绝对排斥侵略主义，但自卫的战争并不意味着战场上以防御为唯一方针，仍要发扬战役、战斗上的攻击精神；面对日本等帝国主义强国的侵略，应发挥自身地大、人众的优越条件，坚持战略上的持久与战术上的速决。

杨杰是民国时期研究国防战略的另一位杰出代表。“九一八”事变后，他目睹日军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加紧军事理论研究，力图变革军事现状，建设强大的国防以拯救民族危亡。主要著作有《国防新论》、《军事与国防》、《国防建设》等，特别是他的《国防新论》一书，重点论述了战争与国防、近代国防的形式及其组织，以及如何建设中国国防。其国防战略思想的核心是强调独立自主地建设适应总体作战的现代国防。杨杰认为：只要战争存在，就不能没有国防，只要战争威胁还存在，国防建设就不能终止，中华民族就不能不集中力量从事国防建设；只有从事总体国防建设，使整个国家变成一个强有力的战斗集体，才能适应现代战争需要；军事建设有赖于国家建设，主要是加强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强国才能强防，但富国强兵不能光靠发展农业经济，主要应依靠发展科学技术；只有依靠自身力量去建设国家、建设国防，舍此别无出路。蒋百里和杨杰的国防战略思想在民国时期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对加强中国国防建设，动

员人民群众抗战,都起到积极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国防战略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为适应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国防战略大致进行了四次重大调整。50年代贯彻“积极防御,防敌空袭”的国防战略。60年代,国家面临的安全形势日益严峻,国防建设从和平时期转入临战状态,提出了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国防战略。80年代中央军委决定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90年代初,世界形势发生显著变化,高技术军事领域的运用有了革命性发展。面对新的情况,中央军委及时对国防战略方针进行了又一次重大调整,将战略方针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

随着国防战略的调整,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也不断深化。特别是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国防战略的研究掀起了高潮。有关的专家、学者纷纷撰写了大量学术专著和学术论文。其中较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主要有:《国防建设研究》、《当代世界军事与中国国防》、《积极防御战略浅说》、《国防发展战略思考》、《国防建设纵横》、《国防发展战略概论》等。为使高级干部和领率机关在国防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时期认清形势,1986年,总参谋部军训部在总部机关举办了“国防现代化发展战略系列讲座”。1991年11月,军事科学院和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在北京召开了“邓小平军事思想与现代国防建设理论研讨会”,对邓小平“国防与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996年12月上旬在昆明举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与现代国防学术研讨会”,对毛泽东国防建设战略思想等理论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这些学术专著和学术活动,对国防战略的研究主要地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对党和国家三代领导人国防战略思想的研究
①毛泽东国防战略思想研究。研究认为,毛泽东国防战略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巩固的国防是保卫人民利益的需要;建设强大的国防要依赖于全体军民;国防建设必须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从实际情况出发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在突出重点的前提下进行全面建设;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强调防御性、全民性、自主性和有限威慑性;要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国防军;自力更生建设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加强民兵建设。②邓小平新时期国防战略理论研究。1985年,邓小平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势和中国军队的实际情况,果断确定中国国防建设、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在新的历史时期,仍然坚持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这一转变的实质是:要求军队的工作从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真正转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上来,充分利用今后较长时间内大仗打不起来的相对和平环境,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下,抓紧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以现代化为中心的根本建设,提高全军官兵的军政素质,增强军队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的自卫能力。③江泽民国防战略理论的研究。面对世界军事革命发展形势,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将战略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上,确定了“注重质量建设,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的建军方针,为全军跟上世界军事发展步伐指明了方向。坚持协调发展是江泽民国防战略理论的重要特色。在指导国防建设的实践中,江泽民始终坚持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经济建设与国防和军队发展战略相配套,经济建设与国防和军队建设进程相一致。

对国防战略的理论探讨
①国防战略的基本内涵。国防战略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

出现的一种战略概念。中国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展开了研究探讨,尚有不同的认识。有的认为它与大战略或国家安全战略相类似;有的认为它等同于国防发展战略;有人认为它是军事战略的同义语,或广义的军事战略,等等。^②中国国防建设的国际战略环境。学术界对此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认为和平、合作、发展已成为时代主流,但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还没有根本改变,世界和平仍面临着威胁,国际战略格局出现多极化趋势,机遇与挑战并存。^③对中国国防政策的研究。一些学者指出,中国根据自己的国情所选择的社会制度、发展战略和生活方式,不会进行对外侵略扩张,因而也不会制定扩张性的国防政策。巩固国防,抵抗侵略,制止武装颠覆,保卫国家的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是中国国防政策的基本目标。^④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研究。中国在战略上实行防御、自卫和后发制人的原则。积极防御战略不仅符合中国的历史传统,而且符合中国现在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战略利益。中国现行防御战略的特点是:中国军队一贯坚持自卫立场,决不主动挑起事端;中国的核战略同样是防御性的;中国的防务开支多年来一直保持在很低的水平上;中国致力于建设一支精干的、有战斗力的防卫力量,建设一支具有现代化水平的防御型军队;中国重视加强国际军事交往,共同维护世界和平。^⑤关于国防建设的理论研究。国防建设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是中国国防建设的基本方针。实行军民结合、军民兼容的国防发展战略。在国防建设和国防斗争中,坚持人民战争思想,坚持军民结合、全民自卫的原则。国防工业和科技的发展,实行军民兼容、平战结合的原则,把国防事业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⑥军队建设理论研究。《当代世界军事与中国国

防》等著作对军队建设的总目标、军队发展战略、军队发展的主要措施等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提出了“质量建军、科技强军、勤俭建军、依法治军”的原则。质量建军的根本任务是根据国情和军情,探索一条适合人民解放军特点和现代战争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需要的精兵之路,实现江泽民提出的“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为使军队质量建设迈上一个新的台阶,要加强军队体制编制、武器装备发展、部队管理、教育训练、军队后勤以及政治工作的研究。

发展趋势 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国防战略的理论研究还将不断发展和完善。在未来的国防战略研究中,将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党和国家三代领导人的国防战略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指导意义;21世纪国际战略格局与当代中国国防面临的新的机遇与挑战;以信息技术为主的现代高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在世界军事领域发生的军事革命对中国国防建设的影响及对策;筹划了21世纪的军队发展战略及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部署。

参考文献

- 军事科学院军事运筹分析研究所编:《国际形势与国防战略》,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
- 聂全林主编:《国际环境与未来国防》,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9。
- 杨得志、宦乡等著:《国防发展战略思考》,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
- 刘继贤等著:《国防发展战略概论》,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9。
- 张万年主编:《当代世界军事与中国国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9。
- 国防大学军队建设研究所编:《国防建设纵横》,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

(于巧华)

军队建设研究 (study of army building)

探讨组建军队、提高军队战斗力等相关内容的活动。是军事学术研究的一个基本方面,是科学地进行军队建设实践必不可少的理论基础。它的根本任务是研究和探索组建军队、提高军队战斗力的基本规律,从本质上揭示军队建设诸要素之间的必然联系,为提高军队战斗力、指导军队建设提供理论根据和行动指南。

进入 20 世纪以后,中国近代现代军队建设研究经历了以下几个历史时期。

清末的军队建设研究 这一时期军队建设研究是从翻译西方军事著作入手的。其中涉及军队建设方面的著作,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军制方面的译著有《西国兵制源流》、《列国陆军制》、《各国陆军考》等。军事训练方面的译著有《西洋练兵新书》、《德国步兵操典》等。武器装备方面的译著有《军械沿革》、《军械精蕴》等。海防与海军方面的译著有《海军指要》、《航海章程》等。军队管理教育方面的译著有《日本武备教育》、《养兵要诀》、《军队内务条例》等。军队建设理论方面的译著有《军制学》、《兵器学》、《大战学理》(即德国近代军事理论家 C. von 克劳塞维茨所撰《战争论》)。上述译著的特点是:①涵盖了军队建设领域的大部分内容,门类繁多,分类精细,标志着军队建设研究已注重向多学科、多层次方面发展,从而更具科学性。②与陆军的建设和训练、军校的教学有关的内容,占有相当大的比例。③反映德、日军事情况的译著明显多于其他国家,表明在军事方面向外国学习的重点,已由英、法、美转向德国和日本。④增添了军事领域中关于军队建设的高层次军事理论著作。如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五篇就是专门论述军队和军队建设问题的,其他各篇也多处涉及军队建设的基本理论问题,如军队是进行战争的主要力量,军队应有

武德和民族精神等。这些关于军队建设的新观点,令人耳目一新,大大拓展了近代中国兵学家的视野。

在大力引进和翻译外国军事著作的同时,中国部分兵学家和有识之士还针对中国军队建设的实际,博采中外军事理论的精华,融合中西方兵学观点著书立说。如徐建寅 1896 年编著的《兵学新书》,王韬的《火器论略》,袁世凯组织编纂的《训练操法详晰图说》、《新建陆军兵略录存》等。此外,1904 年 9 月颁布的《陆军营制饷章》,就常备军的体制、编制、官制、饷章,以及征募、训练、装备、纪律作了具体规定,确定了近代中国陆军建设的基本理论原则,同时提出全国编练新军 36 镇的设想。上述著作及规章,在采用西法,改变中国军队军事制度和训练方法的落后面貌,使其向近代化方向发展方面,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实用性。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军事家蔡锷独树一帜,开始汲取中外军事理论的精华并加以分析和整理。《曾胡治兵语录》就是蔡锷对曾国藩、胡林翼散见于各处的有关军事的言论加以收集和归纳,并根据中国的国情加以融会贯通,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进一步感到中国军队建设不仅仅是军队本身的问题,还与国人素质及尚武精神息息相关。蔡锷、蒋百里等人树起军国民主义的旗帜,呼吁改造国民素质,重振尚武精神。尽管这在当时仍属尝试之举,却显示出这一代军事理论家不同以往的理论追求。此外,由追随孙中山进行革命战争的同盟会会员林修梅所著的《精神讲话》(1918)主张:“农工并举,练成一种农工化的军队”,军队要为推翻帝国主义,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这部著作宣传了无产阶级建军思想的若干观点,昭示了中国军队建设理论研究发展的新前景。所有这些都标志着当时的军队建设研究已开始向深层次发展。这一时期军队建设研究的不足之处是:在

吸收外国军队建设经验方面存在良莠不分、盲目照搬的倾向；由于阶级的局限性，当时的兵学家们没有能从改变封建政体上来认识军队建设问题；忽略了对中国极为宝贵的传统军事理论的研究和探讨。

中华民国时期的军队建设研究 这一时期军队建设研究是由注重军事制度、军事技术变革走向军队建设理论探究的发端阶段。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提出以党治军、军队与国民相结合，进而成为群众的武力的建军方针，并在军队中建立党代表和政治工作制度，在建军思想上迈出了重大的一步。国民党在全国建立政权后，其当权者和一些军事理论研究者在持续 20 多年的内战外战中也曾总结经验教训，在军队建设方面做了一些归纳总结。其代表人物蒋介石，在各个时期的讲话、文电中对军队建设问题阐发过一些见解。他强调军权至上；重视军官培养；提出“治心为治兵之本”，即把思想控制作为治理军队的根本；鼓吹领袖至上，“领袖是建军建国，实现主义的中心”；注重军队现代化建设等等。这些观点反映出蒋介石建军理论的实质就是把军队现代化与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结合起来，维护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统治。在此期间，国民党政府中部分有识之士试图运用西方军事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的国防问题和富国强兵之路，如蒋百里的《国防论》、《军事常识》，杨杰的《国防新论》、《军事与国防》等著作，都涉及到军队建设及提高军队素质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军队建设的客观规律。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队建设研究 具体分为两大时期：

革命战争时期的军队建设研究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马列主义军队建设理论为指导，努力探索人民军队建

设的客观规律，其丰富性和系统性达到了前人从未达到的程度。毛泽东先后发表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论人民民主专政》等，周恩来发表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报告》等，朱德先后发表的《怎样创造铁的红军》、《革命军队管理的原则》等，都直接或间接地论述了军队建设问题。主要观点有：强调建设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军队必须提高纪律性，严密组织，严格训练；人民解放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人民军队是一支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人民军队建设要实现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相结合，等等。这一时期的军事期刊，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报刊《红星报》（1931 年创刊），《政治工作》（1932 年创刊），等等。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 年创刊）等，都发表了大量探讨军队建设问题的文章，促进了革命军队建设研究的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革命战争时期的军队建设理论深刻揭示了革命军队建设的基本规律，推进军队建设研究进入理性探索阶段，接受实践检验，并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军队建设研究 这一时期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0~1978）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相继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海军和其他技术兵种，人民解放军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同时也为军队建设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此间，毛泽东的《一九五〇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

示》、《军委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我军能够战胜装备优势的美国军队》、《有计划地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要紧密切联系群众，官兵打成一片》、《对部队军事训练的若干指示》等，刘少奇的《军队面临的新任务》，周恩来的《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抗美援朝，保卫和平》、《进一步提高军队的政治素养》等，朱德的《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建设海军，保卫海防》、《统一训练计划，加速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光荣伟大的三十年》、《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等，以及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的著作或讲话，都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和论述了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军；加强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加强部队的法制、法规和作风、纪律建设；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以及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的生命线等问题。在此期间建立的一些军事科研机构，在军队建设研究方面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一些军事期刊杂志的创立，为军队建设研究成果的发表提供了阵地。如1951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编的《八一杂志》正式创刊，1956年1月1日中央军委的机关报——《解放军报》正式创办，1974年9月，全军性军事理论期刊《军事学术》创刊，都发表了大量有关人民军队性质、使命和军队建设经验方面的论文。此外，还有多种军事理论期刊问世，如《军事建设》（1950年1月创刊）、《外国军队研究》、《外国军队动向》（1959年创刊），后两种期刊，着重介绍外军建军的情况和有益经验，军事科技的发展及动向。这些综合性军事期刊的出版，为当时军队建设研究工作的展开提供了大量丰富翔实的资料，并进一步推动了军队建设研究工作的开展，军队建设研究得到了迅速发展。“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军

队建设及其研究工作遭到了极大的干扰和破坏，但党和国家领导依然关心着军队的建设，如毛泽东的《要把空降兵认真搞起来》，周恩来的《向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前进》等，都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军队建设问题。特别是邓小平1975年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时，针对“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造成的严重破坏，着手对军队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观点和方针、原则。后因他被错误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初见成效的整顿工作被迫中断。1977年邓小平恢复党政军领导职务后，整顿军队的方针才得以贯彻。至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先后发表了《军队要整顿》、《军队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重要著作。其中指出：整顿军队首先要整顿各级领导班子，改变机构臃肿、领导软弱无力和纪律涣散的状况，解决文化大革命以来军队中存在的“肿、散、骄、奢、惰”和部分领导班子“软、懒、散”现象；要抓编制、抓装备、抓战略；要把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要把军队搞精干、要依法治军、从严治军；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和发扬军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等等。这不仅指导人民解放军多方面的工作胜利地实现了拨乱反正，重新走上正确的轨道，而且也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建设研究指明了方向。

第二阶段（1979年～80年代）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术界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军队建设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实现了一系列创造性的突破。主要表现在：①恢复和健全了军事科研机构。不仅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及各军队

院校加强了军队建设问题的研究,而且从军委总部直到各个军区都设立了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研究机构。军事科学院军制研究部,主要研究军队的基本制度和军事法制的理论问题。包括干部制度、管理教育制度、共同条令和军事法制建设等。国防大学设立了专门的军队建设研究所,主要任务是研究军队建设中带全局性、规律性的问题。重点是研究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的优良传统、历史经验、现状及发展,研究如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同时研究外军现代化建设的特点、经验、教训、发展趋势及共性的规律。此外,空军空降兵研究所,是空军的专业研究所,主要从事空降兵建设、发展、运用及战术理论方面的研究。②军队建设论文集不断问世。如《我军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文章汇编》、《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研讨会论文集》、《军事学术论文选》、《回顾、展望、探讨》(成都军区纪念建军六十周年学术论文集)、《预备役部队建设探索》、《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思考——新时期军队建设学术讨论会论文集》。③一批军队建设文献资料汇编问世。如:《新时期军队建设重要论述选编》、《关于战略后方建设若干问题的研究》等,为军队建设研究的深入发展提供了丰厚的文献资料。④多种学术期刊开辟专栏研究军队建设问题。如《国防大学学报》1986年创刊,设有军队建设研究专栏。《中国军事科学》1988年1月创刊,为全军性军事理论刊物,不定期设有专题论坛,探讨军队建设问题。这些期刊的问世进一步推动了军队建设研究工作的学术交流。总之,这一阶段军队建设研究无论从深度还是从广度上都取得了更大的发展。

第三阶段(90年代) 进入90年代,军队建设研究进入一个更高层次的广泛深入发展时期,军队建设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

荣景象,并呈现以下显著特点:①出版了一批军队建设研究专著。代表性成果是《军队建设学》(1991)。该书是全军第一部全面系统论述军队建设问题的理论专著,主要论述了和平时军队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军队建设的总体设计理论、现代军事人才的培养;阐述了武器装备建设、体制编制、军队司令部建设、军队后勤建设、军队政治工作建设;论述了军队法制建设、军队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等,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该书还对“军队建设学”学科的创设进行了积极而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填补了军事学中的学科空白。全军除发表了大量军队建设问题研究论文外,还出版了多部有关军队建设研究方面的论著。如:《毛泽东建军思想概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论军队建设》、《学习江泽民同志关于军队与国防建设的论述》、《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概论》、《邓小平军队质量建设思想研究》、《邓小平军队正规化建设思想研究》、《邓小平军队制度建设思想研究》、《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述要》、《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学习问答》、《邓小平新时期建军思想研究》、《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发展史》、《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军队建设的理论贡献》、《局部战争与军队建设研究》、《军队建设与改革概论》、《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层质量建设概要》、《中国人民军队建设纵览》、《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研究》、《马克思主义军队建设基本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与新时期军队建设》、《军队正规化建设》、《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军队建设的理论贡献》、《跨世纪的治军之道》、《科学技术与未来军队建设》、《军队建设的支撑点》、《军队建设新视野》、《精兵论》等。上述著作围绕加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这一主题,力求全面、深入地论述新时期人民解放军建设、

改革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颇多具有新意的见解。②许多军事杂志建立了军队建设研究专栏。如《中国军事科学》、《国防大学学报》、《军事历史》、《军事学术》、《国防》等杂志。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军队建设研究的深度、广度和发展趋势。③整理出版了许多资料汇编。代表性的成果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军队建设》、《毛泽东论军队建设》、《邓小平论军队建设》、《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陈云、李先念论军队建设》、《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论军队建设》、《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同志论军队建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中央军委文件中关于军队建设的论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论军队建设》、《学习江泽民关于军队建设的论述》等,都提供了不少关于军队建设方面的重要文献资料。④研究领域不断拓宽。近些年来研究领域不断拓宽,范围不断扩大,目前已形成了多层次、多分支学科研究的势头。比较成熟的分支学科有:军制学、军事教育学、军队政治工作学、军事后勤学、军事经济学、军事历史学等。其中,尤以军制学、军队政治工作学研究进展较快,成果较多,并且具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鉴于各军兵种的建设既有共同规律,又有自己的特殊规律,一些军兵种的教学和研究骨干已经着手研究自己领域的军队建设理论和实践。如空军、海军、第二炮兵分别开展了空军、海军和战略导弹部队建设理论的研究。总之,这一时期的军队建设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不仅促进了军队建设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而且为当代军队建设提供必要的理论借鉴。

发展趋势 在新的世纪里,军队建设研究将围绕以下问题展开:①在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理论方面,将紧紧围绕“不变质”加大研究力

度。②在军队现代化建设理论方面,将紧紧围绕“打得赢”加大研究力度,以构建更为完善的军队现代化建设理论框架,为提高军队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注入新的活力。③在科技强军理论方面,将紧紧围绕科技发展对军队建设的牵动作用问题加大研究力度,以完善科技强军的理论体系。④在治军特点和规律方面,将紧紧围绕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特点和规律问题加大研究力度,以完善新形势下军队建设的法律、法规理论体系。⑤加强人才培养理论研究,在提高人才素质上提出新举措。⑥在军队体制编制方面,将紧紧围绕“精兵、合成、高效”的原则加大研究力度,以便为军队体制编制改革提供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郭其侨、姚延进:《军队建设学》,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1。

全军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军事学研究回顾与展望》,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

姚延进:《共和国长城》,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

施渡桥:《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史》,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

(孙爱平)

战略研究著作(writings on strategy study)

研究战争与战略问题的理论专著、论文、工具书和教材等著述的统称。包括战争、战略基本理论问题的著作和对现实军事斗争、国防建设等战略指导的理论著作。

中国对战略问题的研究古已有之。春秋末期孙武撰写的《孙子》,是举世闻名的古代战略理论名著。鸦片战争后,近代西方战略理论开始影响中国。1908年,陆军预备大学堂印行了由应雄图编著的《战略学》。它融合了C. von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贝尔特的

《战略原理》的基本思想,对战略的定义、战略与政略的关系、战略进攻与战略防御等问题进行了阐述,是近代较系统的资产阶级战略理论专著,对中国近代战略理论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

中华民国时期,翻译出版了欧美和日本的大量军事著作,一些爱国将领与军事理论家也著书立说,在结合中国实际运用现代战略理论方面作了新的探索。如蒋百里的《国防论》和杨杰的《国防新论》,提出了寓兵于民、独立自主、持久防御和总体性国防等加强国防建设的主张,为中国战略理论宝库增添了一份有价值的历史遗产。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不断总结中国革命战争及其战略指导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汲取古今中外有益的战略理论成果,创立了独具特色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理论。其代表作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这些著作,深刻地阐明了关于战争的根本观点,研究战争规律的基本方法,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战略指导的方针、原则等,从而奠定了中国革命战争战略理论体系的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军事理论界密切注视着世界战略理论的发展动向,积极研究和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军事斗争特点、规律及其战略理论问题。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面对国际战略形势的深刻变化,以及世界科技发展和新军事革命的严峻挑战,全军积极贯彻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加强了对未来军事斗争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理论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出版了一大批战略理论专著和论文。其中主要有左良主编的《战略学教程》(1985),高锐主编的《战略学》(1987),刘继贤主编的

《战争与战略问题研究》(1988),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编著的《军事战略基本理论问题》(1990),黄玉章主编的《军事战略概论》(1991),阎铸撰写的《军事战略导论》(1992),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编著的《毛泽东军事战略研究》(1992),李际均撰写的《军事战略思维》(1996),王文荣主编的《战略学》(1999)等。这些著作,紧密结合军事斗争实际,围绕着战略的定义和历史渊源,战略层次结构的划分,战略学研究的范围和主要内容,各层次的战略问题,以及对现代战略理论体系和军事斗争的战略指导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全面的阐述,促进了战略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使中国军事战略理论的研究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崔淑霞)

战役学研究

(study of science of campaigns)

探讨战役规律和战役指导规律的活动。军事学术研究的组成部分。包括联合战役学和陆军、海军、空军、第二炮兵等军兵种的战役学的研究。主要研究战役的本质、特点和规律,战役的产生与发展,战役指导思想与原则,战役指挥与保障,战役准备与实施的方法,战役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战役学的形成和发展,战役学学科体系和理论体系,战役学的研究方法,战役学与邻近学科的关系以及战役学发展趋势等内容。战役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是揭示战役规律和战役指导规律,用于指导战役实践,夺取战役的胜利。

清末和中华民国时期的战役学研究战役学是近、现代军事理论发展的产物。自从战役产生后,人们就开始了对手战役规律和战役指导规律的探索。随着战役实践的发展和人们对战役认识的不断深化,战役理论逐步丰富和系统化,战役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逐步形成,并不断得到发展。

中国清朝末期,制定了陆军新军的作战法规,一些学者大量翻译了外国有关战役、会战方面的著作,并注意对其进行研究。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蒸汽铁甲舰和飞机、坦克等新式武器装备在战争中的使用,使战役的实践和理论研究得到较大发展。中国开始将作战划分为战争、战役、战斗三个层次,并初步进行了战役史的研究。1899年陈庆年在《兵法史略学》中提出,外国军事院校开设战役史的作法值得效法,他还对春秋时期的战役战例进行了分析。清代于1906年设立的陆军预备大学堂和民国初年创办的陆军大学,也进行了各种“高等兵学”、“统帅纲领”等战役作战理论的研究和教学。民国初年,蔡锷在《军事计划》中论述了战役原则和规律问题。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役学研究 中国共产党创建自己的军队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军事家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批判地汲取古今中外的战役理论,深入研究人民战争的战役规律及其指导规律,创立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学。土地革命初期,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工农红军粉碎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三次“进剿”的游击战争经验时,提出了包括战役原则在内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红军游击战争作战原则。1930年冬至1931年夏,中央革命根据地在粉碎了国民党军三次“围剿”之后,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1933年11月,刘伯承翻译介绍了《莫洛托夫说明战斗、战役和战略的理论上的范畴》一文,精辟地阐明了战略学、战役学和战术学三者的定义、相互关系以及研究这些问题对指导军事斗争的重要意义。1936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系统地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

阐述了战役的概念、原则和研究方法,明确了战役与战争、战斗的关系,提出了战役学的任务是研究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这一时期,毛泽东和其他无产阶级军事家有关战役作战指导的论述和文电,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学的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及时总结了战争的经验,从中、日双方的实际出发,科学分析了抗日战争的特点,写出了一系列理论著作,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战略防御中的战役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战斗的外线作战的方针;论述了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的地位、作用和特点,三种作战形式相互配合和转换以及战役的歼灭战、战役决战、战役指挥原则等问题。八路军、新四军其他领导人的有关著作也对游击战战役理论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一时期,八路军、新四军主要进行了一些游击战战役,也进行了规模不等的运动战战役和以夺取小城镇为基本目标的阵地进攻战役。通过多次的反“扫荡”作战和大量的进攻作战,丰富了战役经验,发展了人民解放军的战役学理论。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性著作有:毛泽东《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朱德《论抗日游击战争》,彭德怀《进入新阶段的华北战争》,刘伯承《论游击战与运动战》等。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实践与战役理论得到了很大发展。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编制、装备的发展,以及战争规模的扩大,其作战形式上已由抗日战争时期的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主,转变为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在各个战场广泛地进行了战役作战。毛泽东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一文中,明确地规定了战役作战的方法。随后,又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对作战方针、作战目标、作战形式、作战方法、作战准

备等作了高度的理论概括,使战役作战原则更加系统化。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及其他无产阶级军事家对各次战役发出的指示及经验总结,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学的理论。这主要代表性著作有: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以及邓小平拟制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同装备现代化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进行大规模作战,获得了在现代条件下局部战争中实施运动战战役、阵地进攻战役、阵地防御战役、战役性防空性作战以及战役后勤保障等的宝贵经验。从50年代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办了正规军事院校,组建了军事科研机关。战役理论研究和教学、训练全面展开。代表性著作有南京军事学院编写的《战役法原则》、《集团军进攻战役》、《集团军防御战役》和总参谋部编写的《集团军抗登陆战役》等理论著作。60年代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创立合同战役学,1965年编写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学》(初稿)。在历次保卫边疆的自卫反击作战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在特殊地形条件下对不同作战对象实施局部战争战役的经验,使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学增添了新的内容。进入80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断总结战役作战经验,广泛开展战役训练实践,汲取其他国家军队的战役作战有益经验,进行了大量的战役学理论研究活动。先后出版了多种战役学理论专著和集团军攻防战役等各种教材,深入探讨了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中以劣势装备同优势装备之敌作战的战役规律和战役指导规律。198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将军事学列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门类,并正式确认战役学与战略学、战术学、军队指挥学同为军事学的下属学科,海军、空军、第二炮兵战役

学逐步形成,从而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学学科建设进入新的阶段。80年代中期以来,以1986年和1988年两次全军性的战役理论研讨会为契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理论研究的重点,开始从全面战争和核大战背景下的战役转向局部战争的战役。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性著作有:战役学纲要、战役学教程、海军战役学、空军战役学、第二炮兵战役学等。

80年代后期,在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的指引下,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战役研究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理论研究的中心任务,战役理论研究尤其是联合战役理论研究不断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同时,有关法规的建设也逐步完善,这一时期战役理论研究空前活跃,出版和发行了一批反映高技术局部战争特色的战役理论著作和一系列战役法规,并开始探讨新军事革命对战役的深刻影响。90年代,加强了战役学理论教学和研究生培养的力度,培养了一大批包括博士、硕士在内的战役理论研究人员、战役指挥员和战役机关工作人员,对战役学科的发展和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性著作有:联合战役纲要、海军战役纲要、空军战役纲要、第二炮兵战役纲要、战役后勤保障纲要、战役学总则、战役训练手册以及《高技术局部战争战役战法研究》、《战役思想发展史》、《战役学研究》、《战区战役初探》等。总参谋部组织全军编写了联合战役学等学科著作,标志着战役学学科体系进入更加完善发展的新阶段。

发展趋势 随着高技术武器装备的发展以及打赢高技术局部战争的需要,引发了新的军事革命浪潮,促使新的军种和战役样式产生,诸军种联合力量的一体化程度逐步提高;战役与战争、战斗的联系更加紧密,影响战役胜负的因素日益增多,促进着高技术局

部战争战役形态的快速演变,对战役学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战役学所涵盖的内容越来越丰富,研究的内容将不断突破传统战役学研究范围;战役学的综合性学科特色更加突出,与军事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相关学科间交叉渗透越来越广泛。

参考文献

《毛泽东选集》,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中国军事史》编写组著:《中国军事史》第4卷,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

(刘金胜 牛鹤祥)

战役研究 (study of campaign)

探讨战役军团为达成战争的局部目的或全局性目的,在统一指挥下进行的一系列作战行动的活动。主要包括对战役基本原则、战役部署、战役协同、战役指挥、战役行动和战役保障的研究等。按参战军兵种,可分为联合战役和军种战役研究;按规模可分为战区战役、方面军(集团军群)战役和集团军战役研究;按类型,可分为进攻战役和防御战役以及不同战役样式的战役研究等。

清末和中华民国时期的战役研究 清朝末期,已出现“战役”一词。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北洋舰队战事日记中就有“则中日战役为所影响者必甚”的记载。20世纪初,蔡锷提出战役是一个作战等级的概念。1902年出版的《战法学教科书》集中体现了清末战役研究的理论成果。至中华民国时期,战役研究日趋活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蒋百里的《新兵制与新兵法》。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役研究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役,是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实

践中进行的。自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起至20世纪末已有70余年的历程,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和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四个时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以劣胜优”的战役理论。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游击性的运动战战役得到发展。毛泽东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是该战役的主要原则。主要战法是:诱敌深入,收紧阵地,蘑菇战术,围城打援,包围迂回,急袭和伏击等。主要原则有:准备充足,不失时机;集中优势兵力,拣弱的打,各个击破,选择良好阵地,打运动或阵地尚不巩固之敌;突然袭击,速战速决,力求全歼等。这一时期的主要研究成果是毛泽东撰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该文对战役的有关原则、战法、作战形式、战役指导、战役力量和战役战场等进行了阐述,奠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理论的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游击战战役理论得到重大发展,创造了许多游击战战法和原则。如:战略上的内线持久防御战与战役战斗上的外线速决进攻战;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战役作战的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主力军、地方军、民兵三结合,军民一体,游击战与正规战相配合;袭击战、破击战、伏击战、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围困战等战法。这一时期是八路军和新四军游击战战役实践与理论日臻成熟和完善,并向正规运动战战役发展的过渡时期。这些宝贵经验,不仅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理论增添了新内容,而且为解放战争实施各种类型和规模的战役在理论上做了充分的准备。主要研究成果有:毛泽东撰写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论新阶段》和刘伯承的《论游击战与运动战》等。

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

理论走向全面成熟的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具有了合同战役的性质。人民解放军陆军从单一步兵逐渐发展成为多兵种的合成军队,战役样式也由战争初期的运动战战役和部分阵地战战役,发展到战争中后期的阵地进攻、城市进攻、渡海登陆等战役样式,战法也随之得到重大发展,战役理论也日臻完善。毛泽东在总结以往革命战争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还根据整个解放战争的发展情况和各解放区、各战略战役军团当面的不同情况,及时对战役作战发出了指示。这些指示,包括了各种不同情况下战役作战的基本作战原则和战法,成为人民解放军战役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经过辽沈、平津、淮海、渡江等大型战役的实践和对这些战役经验的总结概括,使人民解放军大兵团作战、战略战役总决战的战法进入成熟时期。这一时期主要学术成果有:毛泽东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三个月总结》、《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邓小平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等。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志愿军阵地战和运动战战役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运动战阶段,创造了阵地进攻、打小歼灭战和运动防御战役作战样式。在阵地战阶段,创造性地运用了双层钳形攻坚突破方式,以及在防御战役中建立了以坑道为骨干与野战工事相结合的支撑点式的阵地体系,强调大胆机动,实施积极防御,与敌反复争夺,依托坑道进行斗争,力争在战术地幅内挫败敌人的进攻。这些战役实践和战法,对于人民解放军研究新形势下的战役问题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这一时期战役研究成果体现在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指导战役的大量文电中。

在保卫祖国边疆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中国人民解放军由以往的单一陆军逐渐发展成拥有陆、海、空军和第二炮兵诸军兵种合成军队,并先后组织实施了一江山岛战役、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西沙自卫反击战、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等边境地区(海上)战役作战,各种特殊地形条件下的战役理论得到丰富和发展。在和平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侧重于对战役理论的研究和组织战役训练,战役研究内容得到进一步深化和拓展。这一时期的主要成果有:石一宸编写的《战略、战法与指挥》、军事教育学院编写的《战役法简论》、国防大学科研部编写的《高技术局部战争与战役战法》、何太由等编写的《毛泽东战法》以及大量的战役教材和有关条令等。

发展趋势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高技术武器装备的大量使用和新的军兵种的建立,战役研究将突出对新的战役样式和新的战法的研究,战役法的内容将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参考文献

张兴业主编:《战役思想发展史》,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7。

展学习等主编:《战役学研究》,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7。

(刘长青)

特种作战研究 (study of special operations)

探讨特种部队或临时赋予特殊任务的部队,围绕特定目的进行的作战的活动。主要包括对特种作战的基本原则和兵力部署、协同动作、作战指挥、作战行动方法,以及各种保障措施进行的研究。

研究简况 特种作战研究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作战实践而产生和发展。清朝末期

和中华民国时期,特种作战研究得到一定的发展。主要成果有:蒋百里的《孙子新释》,白崇禧的《全面战术论》和《游击战纲要》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通过对特种作战的研究,创造和形成了一整套以游击战、袭击战为主体的特种作战理论,发展了特种作战的研究。特别是毛泽东等领导人,对游击战、袭击战有着许多精辟的论述。毛泽东在《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作战——袭击》一文中,明确提出了袭击的具体目的是各个消灭敌之小部队,扰乱敌之大部队,消灭敌之民团,破坏敌之后方机关,破坏敌之交通等等。并具体规定了袭击的要求和方法。他还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游击队的作战,要求集中尽可能多的兵力,采取秘密和神速的行动,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很快地解决战斗。这一时期特种作战研究的主要成果还有:刘少奇的《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朱德《论解放区战场》,刘伯承《击退正太路敌人六路围攻的战术观察》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人民解放军侦察部队和特工大队在边境地区自卫还击作战中,深入敌后,实施侦察和破袭等行动,有力地配合了主力作战,取得了一些实战经验。80年代以后,人民解放军特种部队正式建立。在系统总结自己以往特种作战经验的基础上,加强了对外国军队特种作战部队的体制编制、担负的作战任务、作战原则、行动方法等的研究,特种作战研究进入全面发展的新时期。一批颇具学术价值的专著相继出版,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高技术局部战争条件下特种作战战法研究》(1997),《秘密行动:20世纪世界特种作战行动扫描》(1998),《战神煞星——特种作战与特种部队》(1998),《诡道奇兵——中外特种作战揭秘》(1998),《闪电出击——20世纪特种部队作战纪实》

(2000)等,系统地介绍和论述了特种作战的基本含义、主要特点、基本任务、基本原则、特种部队的编成以及破击、袭击、夺取扼守要点、伏击、营救、抓捕、目标引导、袭扰、心理战等有关问题。

研究内容 关于特种作战的研究内容主要有:

基本含义 特种作战是在特殊条件下,以特殊的装备、特殊的技术、经过特殊的编组和特种训练的部队,使用特种战术进行的作战。其性质是非正规作战。包括特种侦察(无人侦察机侦察、战场电视侦察、战场雷达侦察、遥感传感侦察、直升机侦察、武装侦察、网络侦察)、引导打击(引导导弹部队实施精确打击、引导航空兵和舰队火力突击、引导远程炮兵部队火力突击、引导空降部队敌后作战、引导电子对抗部队实施“软”杀伤)、敌后游击战、特种电子战以及抓捕、窃取、破坏、心理战、网络攻击、反特战、反恐怖、反劫持等特种作战在内的一系列非正规作战行动。特种部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战斗力强,能远离主力独立作战,对加速作战进程,减少作战损耗,取得作战胜利,具有重要的作用。

作战特点 与传统的游击作战相比,特种作战具有以下特点:

任务广泛 特种部队遂行的作战任务涉及面十分广泛,如敌后侦察,获取情报;敌后袭扰,特工破袭;敌后救援,实施心战;快速反应,小股出击;特种警卫,确保安全;反叛乱、反颠覆;反特工、反偷袭;等等。

行动主动灵活 主动作战,不坐等良机,积极寻找敌人的薄弱部位,连续打击,使敌疲于奔命。进攻是主动的核心,通过出其不意的攻击行动,有效打击敌要害,破坏敌作战体系,完成特定的作战任务。由于特种部队编成灵活精干,没有固定的模式,因而它的作战任务灵活多变,赋予任务时可能有几种方案,执

行中又可根据临时情况灵活转换。具体体现在:进攻的路线灵活,在计划的基础上可灵活改变;打击的时机灵活,完全依照当时的具体情况选定;作战的方法灵活。

兵力运用出其不意 特种作战主要是深入敌后,以小打大,这就决定了这种作战形式具有出奇制胜的特点。即在敌意想不到的时间、地点,以出敌意外的战法和手段,打敌措手不及。为此,必须速战速决,快打快撤,在短时间里取得重大战果,震撼和瘫痪敌人。

技术装备多样 特种部队遂行任务时,通常需具备五大类装备:一是机动渗透工具,包括空中、海上机动需要的运输机、直升机、特种快艇、潜水装具和水下运行器等。二是特种侦察器材,包括无人机、战场电视、雷达、窃听、夜视和各种传感器。三是各种杀伤武器,包括新型轻火器、激光制导武器、单兵导弹和特种爆破器材等。四是通信器材,包括高频无线电脉冲通信和特高频战术通信卫星等。五是野战生存器具,包括在各种恶劣环境下所必需的、轻便和多用途的器材等。这些装备为遂行多种任务提供重要保证。

作战环境险恶 主要是:兵力投送易遭不测,稍有不慎就可能导导致行动的失败;实施作战的环境险恶,部队行动面临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完成任务后与敌脱离接触及回撤困难大,可能遭敌围追堵截,陷于被动挨打甚至被切断退路的危险境地。

作战任务 特种作战,大体可担负以下任务:敌情侦察;破坏指挥机构;破坏车站、机场和港口;打击大型杀伤兵器;袭击敌兵力集团;破坏敌后勤补给;分散、疲劳、震恐敌人;搜索救援;执行炸毁目标、纵火、破坏水源、燃料、供电等特殊任务。这些任务对于策应正面战场作战有巨大作用。特种作战,通常可能同时执行上述各项任务,对多目标实施多手段打击,其目的是牵制敌人,配合正面战场作

战;有时为达到某一目的,也可以进行比较集中的专项破坏作战。

基本原则 遂行特种作战,必须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慎重决策,集中指挥 特种作战性质、任务和行动特殊,协同和保障涉及面宽、难度大,作战的得失对全局影响大,因此特种作战必须慎重决策,实施集中统一指挥。

周密计划,充分准备 特种作战突然性强,作战力量必须经常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能随时执行任务;特种作战通常在敌纵深或后方进行,环境险恶,情况复杂多变,风险性大,作战准备必须周密细致,备有多种预案。

快速反应,隐蔽突然 特种作战通常遂行关键任务,时效性极强,因此组织实施时必须隐蔽快速,出敌不意,以快制敌,以保持作战的主动权。

慎选目标,击敌要害 特种作战通常应选择 and 打击敌重要目标,尤其是敌作战体系中起支撑作用的关键部位。

审时度势,把握战机 特种作战投入的兵力兵器有限,作战行动的隐蔽性、突然性比正规作战要求更高,审时度势,把握战机,可最大限度地发挥特种作战的效能。

活用战法,速决制胜 要充分发挥特种作战力量编组精干、反应快速、能攻善战、机动灵活等特点,灵活运用各种战法,力求速决制胜。

密切协同,加强保障 严密组织协同,加强对特种作战的支援保障,对发挥整体作战的威力和顺利组织实施特种作战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兵力编成 特种作战的兵力编成,应根据作战任务的需要灵活掌握确定。战时编成采取集中原则,规模一般在团以下,多以分队编成,实行多而散的形式。专门的特种作战部队通常担负最重要最艰巨的任务,而以其他

部队编成的各种小型特种作战袭击群,实行广泛的游击作战。有群众条件时,也编成敌后袭击分队,以实现全纵深、多点攻击的整体布局,全面配合作战。对某一目标的破坏编组,通常采取四个小组编成一个大队的方式。即突击破坏组、掩护组、支援组、预备组,构成特种袭击队。有时情况复杂,增加一个侦察组,或称先遣组。担负破袭敌方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目标和遂行其他特殊任务的部队,具有编制灵活、人员精干、装备精良、机动快速、训练有素、战斗力强等特点。一般从侦察部队和空降部队中挑选体格强壮、机智勇敢、文化程度高、具有献身精神和有一定作战经验的人员组成。

发展趋势 特种作战理论和实践的不断丰富,将对特种作战及其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原有的基本作战原则将不断充实新内容,形成一些新原则。特种作战的规模将不断增大,特种作战的任务不断增多;特种部队的装备技术更加灵活多样,对其机动力、突击力、快速反应能力的要求更高;特种作战方式和手段更趋多样化,特种作战研究将更加注重多维空间攻击作战、远程奔袭作战等的研究。

参考文献

姚春富等主编:《高技术局部战争条件下特种作战战法研究》,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

卢夫魁等著:《战神煞星——特种作战与特种部队》,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8。

徐登建等编著:《特种作战》,上海:文汇出版社,2001。

(王明德 郑守华)

联合战役研究 (study of joint campaign)

探讨由两个以上军种组成的战役力量,在统一指挥下围绕同一作战目的实施的战役行动的活动。主要包括对联合战役的指导思

想和原则、战役力量、战役指挥和协同、各种联合战役行动的组织实施方法和各种措施所进行的研究。联合战役研究与军事战略、战役法、军种战役和战术研究具有密切联系,并对战略、战役法、军种战役和战术研究产生重要影响。联合战役研究,是认识联合战役客观规律、探索联合战役指导规律的重要途径。联合战役研究成果,对指导诸军种联合战役作战和训练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研究简况 联合战役研究随着联合战役的出现而产生,并随着联合战役实践的发展而发展。20世纪以来,联合战役研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的局部战争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中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联合战役研究,是在诸军种战役力量的形成和发展、联合战役的作战和训练实践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其主要特点是:以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和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论述为指导,以人民战争思想为基础,以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为依据,以研究中国人民解放军可能面临的各种联合战役问题为重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联合战役研究,从50年代开始至现在,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50~60年代) 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沿海地区的抗登陆、登陆战役问题。1953年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半岛西海岸进行了大规模的抗登陆作战准备,开始研究陆、海、空联合作战问题;1955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了解放一江山岛的登陆战役,取得了陆、海、空军联合作战的实战经验;1955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辽东半岛组织实施了大规模抗登陆战役演习,把联合战役研究引向深入;军事学院和军事科学院在50~60年代展开了登陆战役和抗登陆战役问题的教学和研究,沿海有关军区在

60年代展开了登陆战役、抗登陆战役问题的研究和训练。60年代初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学》(初稿),明确了陆海空三军联合战役的有关问题。

第二阶段(70~80年代) 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反敌大规模入侵的反突袭战役、阵地防御战役和抗登陆战役,80年代后期展开了战区战役研究。198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华北地区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联合战役演习,比较全面地研究了现代条件下联合战役问题。70年代至80年代初,随着各军种的发展和现代战役研究的深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代条件下的战役理论成果,如《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学》(1981年版)、《战役学总则》、《登陆战役》、《抗登陆战役》等,对联合战役的具体样式及作战的有关问题作了明确,阐明了各军种协同作战、统一编组、统一指挥参战力量等问题。1987年,由中央军委批准颁发试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学纲要在战役分类中明确提出了“联合战役”概念,并对诸军种联合进行的各种战役样式的准备与实施问题,进行了详细说明。1988年总参谋部组织编写的战役学教程明确了“联合战役”的概念,并阐述了诸军种联合进行的战区战役的特点和指导问题。

第三阶段(90年代) 90年代以来,随着军事战略方针的转变和军事技术的迅速发展,联合战役研究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联合战役研究的重点内容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登陆战役、濒海城市进攻战役、反空袭战役、岛屿进攻战役、岛屿封锁战役、抗登陆战役、边境地区反击战役等。这一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南沿海地区进行了一系列高技术条件下的联合战役演习,探索了高技术条件下联合战役的特点和经验。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将联合战役学确定为战役学的二级学科,有关院校和科研部门开始培

养联合战役学硕士、博士研究生。1999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颁发第一代联合战役纲要,对联合战役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阐释。总参谋部组织编写了联合战役、登岛战役等教材,以及联合战役学等著作。这些作战法规和理论著作的完成,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合战役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研究内容 联合战役研究内容主要有:

联合战役的本质和特点 联合战役是实现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目的的主要手段,是连接战争和军种战役、合同战斗的中间环节。高技术局部战争联合战役具有鲜明的战略性,诸军种一体性,全纵深、多维性,非线性、非对称性,简捷性、快速性和军民一体性等特点。各国军队由于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战略、武器装备、地理环境、民族传统等情况的不同,其联合战役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

联合战役的产生和发展 联合战役是随着武器装备的发展、军队力量结构的变化、作战实践的需求而产生和发展的,经历了由陆海联合战役到陆海空联合战役,再到诸军种一体化联合战役等历史发展阶段。信息技术、空间技术等高技术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把联合战役推向陆、海、空、天、信息战场一体的更高阶段。战争及高技术武器装备的进一步发展,新军种的产生,指挥系统的网络化、智能化、为联合战役提供更加有效的物质条件,使联合战役进一步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联合战役的规律和原则 联合战役规律,包括联合战役作战规律和联合战役发展规律。联合战役作战规律,反映联合战役作战活动的规律;联合战役发展规律,反映联合战役产生、发展、消亡的规律。联合战役规律还有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之分。联合战役一般规律是从各种联合战役类型和样式的运动过

程中抽象出来的普遍、稳定的规律,它在一切联合战役中都发生作用。如:政治、经济、军事战略制约联合战役的目的、手段、规模、进程和结局,战役综合力量优劣是联合战役胜负的物质基础,战场环境和时间条件对联合战役具有制约作用,战役指导正确与否对联合战役胜负具有决定性作用,关键性作战行动的成败对联合战役进程和结局具有重大影响,战役准备和战役保障程度对联合战役实施有直接影响,战役协同的密切程度直接制约着联合战役的进程和结局等。联合战役特殊规律是具体历史阶段、具体国家军队、具体联合战役类型和样式所特有的规律,它只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发生作用。联合战役原则应对各种联合战役样式和联合战役的各个方面具有普遍指导作用;具有本国军队的特色,坚持继承传统原则和勇于创新相结合;注重对未来高技术条件下联合战役规律的深入探讨和科学预测,符合未来作战实际。带共性的原则主要有:知彼知己,主观指导符合客观实际;集中力量,重点用兵;精心筹划,充分准备;隐蔽突然,行动迅速;控制战场,保持主动;着眼全局,打敌要害;统一指挥,加强协调;突出重点,联合保障等。

联合战役的类型和样式 联合战役按基本类型,可分为联合进攻战役和联合防御战役;按战役规模,可分为大型联合战役、中型联合战役和小型联合战役。此外,按参战军种、兵种,还可分为陆空联合战役、海空联合战役、陆海空联合战役等;按战役样式,还可分为岛屿封锁战役、岛屿进攻战役、边境地区反击战役、反空袭战役、抗登陆战役等。

联合战役的指挥、协同和保障 联合战役指挥,是联合战役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对联合战役行动的组织领导活动。主要内容有:了解联合战役任务,搜集和分析判断情况,确定联合战役方针,定下联合战役决心,制定联

合战役计划,组织联合战役协同,组织联合战役保障,组织联合战役后方防卫,组织地方力量动员,调集战役力量,检查战役准备,指挥和控制联合战役行动等。联合战役协同是联合战役军团中的各种战役力量,为遂行共同的战役任务,按照统一计划进行的协调配合。是夺取联合战役胜利的基本条件之一。联合战役保障是由联合战役指挥机关统一筹划组织,为顺利进行联合战役而采取的各种保障措施统称。主要包括战役作战保障、后勤保障、装备保障和政治工作等。

发展趋势 在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条件下,诸军种战役力量共同进行的联合战役将是局部战争战役的基本形态。联合战役的参战力量增多、战场环境扩展、战役行动日趋复杂多样,联合战役研究的外延和内涵将不断扩展和加深。由陆军、海军、空军、第二炮兵、武装警察部队、民兵和其他地方力量在陆、海、空、天和信息领域共同进行的多种多样的战役行动,将是联合战役研究的重点内容。为满足指导日益复杂的联合战役行动的需要,联合战役研究将不断增强其全面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为适应战略、战役、战术行动日益一体化的作战背景,联合战役研究和战略研究、军种战役研究和战术研究的联系将更加密切。

参考文献

展学习主编:《战役学研究》,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7.6。

郁树胜主编:《论联合战役》,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7.6。

(高宇颺)

进攻战役研究 (study of offensive campaign)

探讨以主动进击敌人为主的战役的活

动。主要包括:对进攻战役的基本原则、战法、兵力部署、作战行动、协同动作、战役指挥和各种战役保障等进行的研究。

清末和中华民国时期的进攻战役研究 20 世纪初,进攻战役研究进入了发展时期,中国军队在连年征战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古代兵法精要,吸收外国的先进作战思想和军事技术,进攻战役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蔡锷等提出了分进合击、集中兵力攻弱、控制交通线和重要隘口、以我之长击敌之短、乘隙捣虚等进攻战役原则,并主张广泛运用钳形攻击、分进合击、一点突破、两点突破、翼侧突击、深远迂回等作战手段。进攻战役研究方面的主要成果有:易熙的《中西兵法通义》,蔡锷的《五省边防计画草案》,蔡锷和蒋百里的《军事计划》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进攻战役研究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和军事斗争准备的实践中,逐步完成了从游击战战役到运动战战役,从单一步兵战役到多兵种战役,从陆军战役到海军、空军、第二炮兵战役,从军种战役到联合战役研究的多次飞跃,进攻战役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整的进攻战役的理论和原则。其主要内容包括:以“整体作战,重点打击”为战役基本指导思想;注重打歼灭战;正确、灵活地确定战役目标;充分准备,不打无把握之仗;以机动进攻战役(运动战战役)为主要样式;注重造势,强调突发性;注重分割、包围和驱逐作战;注重纵深作战,力求速决;注重追击和连续作战;注重结束战役时的行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进攻战役研究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主要进行游击战、游击性运动战和战略转移中的运动战。进攻战役研究,对初期建立和巩固革命根据地及后期进行的长征,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敌

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和“大步进退,诱敌深入,各个击破,运动歼敌”等作战思想的提出,标志着红军作战已实现了由游击战向游击性运动战的转变。红军还创造性地发展了进攻战役原则,如:首战必胜原则;集中兵力原则;运动战原则;速决战原则;歼灭战原则等。进攻战役研究的主要成果有:毛泽东的《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曾中生的《与“剿赤军”作战要诀》等。

抗日战争时期的进攻战役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坚持了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进攻战役指导思想,重点组织实施了以伏击、袭击、破击为主的一系列战役。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强调:“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并提出了向“运动战发展”的思想。进攻战役研究,开始由伏击、袭击、破击作战研究向运动战和城镇、据点攻坚战研究发展;创造了在反“扫荡”中采取“敌进我进”,灵活运用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自卫军)三种战役力量进行作战,诸兵种协同作战和火力、爆破、突击密切配合的进攻战法;强调了集中统一的战役指挥原则。进攻战役研究的主要成果有: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朱德的《论抗日游击战争》,彭德怀的《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几个先决问题》,刘伯承的《论游击战与运动战》等。

解放战争时期的进攻战役研究 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进行了众多的运动战战役,以及阵地进攻、城市进攻、追击战役和渡海登陆战役,进攻战役研究成果得到极大的丰富和发展,并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中得到集中体现。其他还有一些独具特色的战役,如以高度机动、避实击虚著称的苏中“七战七捷”;用“蘑菇”方法调动疲惫敌人的

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战役；强调持重待机、运动歼敌的孟良崮战役；城市攻坚的石家庄战役；大规模渡江河作战的渡江战役等，均突出了歼灭战、速决战和决战的思想，强调正确创造战机和选择作战方向，正确处理多个作战方向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运动战、阵地战和游击战的关系等。进攻战役研究的主要成果有：毛泽东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刘伯承的《平汉战役的战术总结》，陈毅的《华东一年来自卫战争的初步总结》等。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进攻战役研究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进攻战役研究进一步发展完善，总结了一整套运动战与阵地战相结合的作战方法，战役思想开始向合同战役的方向发展。在运动战阶段的进攻战役和阵地战阶段的反击战役中，进攻战役研究突出了对强敌打小规模歼灭战，灵活运用近战、夜战手段，注重复杂条件下的作战行动，重视穿插作战和敌后袭击作战，强调步兵、装甲兵、炮兵、防空兵、工兵等的协同动作，加强各种保障等。进攻战役研究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彭德怀等指挥作战的大量文电和抗美援朝战争作战经验总结中。

保卫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进攻战役研究 保卫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进攻战役研究，加强了新技术、新战法的运用和外军进攻战役研究，进入了更高层次发展的新阶段。1955年1月进行的一江山岛战役，研究探讨了诸军兵种联合登岛作战问题；在多次边境地区自卫反击作战中，探索研究了特殊地形和气候条件下的进攻战役；20世纪50年代末，海军开始进行海上封锁战役研究；60年代起，空军进行了空中进攻战役研究。1991年海湾战争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高技术条件下的进攻战役研究全面展开，并由

单一军种进攻战役向联合进攻战役的方向发展，由在广大地区实施运动战向在局部地区实施机动进攻战役发展，进攻战役更加强调纵深、立体和多种作战手段相结合的思想，海军、空军和第二炮兵在进攻战役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信息作战和特种作战在进攻战役中的运用日趋广泛，边境地区反击战役的应用理论不断完善。军事科学院和各军事院校在总结历次革命战争经验的基础上，结合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新情况和新特点，撰写了一大批战役作战法规和专著。进攻战役研究的主要成果有：1987年，由总参谋部颁发的战役学纲要；1989年，由国防大学编写的战役学教程；1999年，由中央军委颁发的联合战役纲要等。

发展趋势 随着军事科学技术和作战理论的发展，进攻战役作战的手段将更加多样化；信息战将成为进攻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超视距火力打击将成为主要进攻手段之一；高效、快速、隐形的机动手段将得到广泛运用；纵深攻击、多方向攻击、多样式攻击将综合运用并更加复杂多变；进攻战役指挥将向信息系统集成支援下的实时化方向迈进；进攻战役保障将更加综合高效。进攻战役研究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参考文献

王厚卿主编《战役发展史》，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2。

张兴业主编，《战役思想发展史》，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7。

（蒋亚民）

防御战役研究 (study of defensive campaign)

探讨抗击敌人进攻的战役的活动。战役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空间，可分为陆上防

御战役研究、海上防御战役研究和防空战役研究;按规模,可分为战区防御战役研究、方面军(集团军群)防御战役研究和集团军防御战役研究;按行动性质和任务特征,阵地防御战役研究、运动防御战役研究、抗登陆战役研究和城市防御战役研究。

清末和中华民国时期的防御战役研究 防御战役研究随着防御战役的出现而产生,并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防御战役实践的发展而发展。20世纪初,随着战役实践的发展,在西方资产阶级兵学与中国传统兵学的碰撞和融合中开始了对近代防御战役的研究。在20年代以前,防御战役研究中虽然提出了一些新的作战思想和原则,如随着新的军兵种出现和战役规模的扩大,开始萌发三军协同防御作战的思想,提出以攻助守、设置多道防线纵深布势、使用预备队突击等战法,但是从总体上看,研究成果不多,局限性也比较大。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防御战役研究 2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军事科学在中国的兴起,防御战役研究进入了崭新的阶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军事家,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出发,科学总结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经验,研究、创造并发展了一整套以灵活机动为特色的防御战役理论。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防御战役研究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各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处于强大敌人的包围之中,打破敌军的反复“会剿”“围剿”成为红军的主要斗争形式,出现了反“围剿”这种特殊类型的防御战役。毛泽东等科学总结了反“围剿”防御作战经验,研究、创造了一整套适合反“围剿”的作战原则,主要是:在作战思想上,承认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在作战方针上,采取“诱敌深入”“收紧阵地”,反对“御敌于国门之外”;在

作战形式上,以游击战或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为主,反对固定战线和阵地战;在作战方法上,首先以退却保存力量、待机破敌,尔后抓住战机、集中兵力歼灭敌之一路或一部,反对“处处设防、节节抵御”等。防御战役研究的主要成果有: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朱德的《论几个战术的基本原则》,曾中生的《游击战争的要诀》等。

抗日战争时期的防御战役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日本侵略军的围攻、“扫荡”,八路军、新四军进行了大量的反围攻和反“扫荡”防御战役。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着眼民族解放战争的特点,丰富和发展了土地革命战争中形成的防御理论,主要是:在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指导下,以游击战为主要作战形式,游击战与正规作战相配合;在反围攻、反“扫荡”战役中,采取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的原则;针对敌人分进合击、多路围攻,采取以次要兵力钳制敌之数路,以主力对付敌之一路的方针,各个击破敌人;针对敌人“铁壁合围”、分割清剿,采取以分散对集中和以集中对分散的方针,以一部兵力位于内线与敌周旋,主力及时转至外线打击敌人,迫敌回窜等。防御战役研究的主要成果有: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朱德的《论抗日游击战争》,彭德怀的《进入新阶段的华北战争》等。

解放战争时期的防御战役研究 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御战役实践的大发展阶段,首次进行了城市防御战役和运动防御战役,野战阵地防御发展至战役规模。伴随着战役实践的发展,防御战役思想与战略、战术思想明显分离,防御战役样式日趋完善,独立性日益增强,推动了防御战役研究的深入,特别是对具体防御样式的研究有了较大进展。主要是:在阵地防御战役中强调选择

有利地形,周密组织准备,掌握强大的机动力量,以积极的攻势行动配合坚守作战;在城市防御战役中强调以城市为依托,力争在外围大量歼敌,有重点地部署兵力,掌握强大的机动力量,将城市防御作战与在其附近进行的歼灭性运动战相结合;在运动防御战役中强调依托预先构筑的多道阵地节节抗击、交替掩护,既要顽强坚守,又要灵活机动;在运动战中强调将阵地防御战役、特别是野战阵地防御战役作为经常采用的防御样式,直接为外线速决的进攻战服务等。防御战役研究的主要成果有: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朱德的《论解放区战场》等。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防御战役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抵御外敌侵略而进行战争准备的战略思想指引下,防御战役研究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在与拥有现代化武器装备优势敌人的作战实践中,开始了对现代条件下防御战役的研究。战争前期,在依托野战工事进行坚守防御作战和进行运动防御作战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原则。主要是:采取“积极防御,纵深设防,利用良好地形(山区、河流)节节阻击,迟滞和杀伤敌人,赢得时间,以待后续部队到来进行战役反击”的作战方针;以战术上的节节阻击和反击相结合实现战役上的积极防御;兵力配备前轻后重,火器配备前重后轻等。战争后期,在“持久作战、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指导下,以坚固阵地防御战役、防空战役和海岸防御战役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主要是:针对作战形势、作战任务的变化,提出了必须注重阵地战,构成以坑道为骨干、同野战阵地相结合、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采取适应依托坑道阵地抗击现代化武器装备之敌进攻的作战方法等;针对敌人大规模的“绞杀战”,提出了必须组织全面的对空防御,采取“重点保卫、高度机动”的

作战方针和反“绞杀战”的一整套打法,在无制空权、无足够的防空火器情况下,必须采取严密的防护措施;针对敌人的登陆威胁,提出了以最大决心和努力加强海岸防御,坚决不准敌人登陆,敌人登上来要坚决消灭它,以一部兵力担任海岸防御阻敌登陆,以主力位于纵深机动位置,一面准备歼灭空降之敌,一面待一线部队将进攻之敌消耗到一定程度后与敌决战,最后歼灭敌人等。防御战役研究的主要成果有《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周恩来军事文选》和《彭德怀军事文选》中有关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作战方针、原则和方法等方面的内容。

保卫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防御战役研究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直至80年代中期,在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指导下,针对不同时期的战争威胁和不同的作战对象,防御战役研究先后以抗登陆战役和阵地防御战役为主要内容,防御战役研究由单一陆军作战的理论发展到诸军兵种合同作战的理论,海军、空军战役军团实施的军种防御战役成为防御战役研究的新领域。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兴起的、以未来战争初期抗住敌战略突袭为主要背景的防御战役大讨论,使防御战役研究取得重大进展,主要是:在作战指导上,要同敌针锋相对,既要避免与敌大兵集团决战,又要通过积极的作战行动迟滞敌人,大量消耗和削弱敌有生力量;在作战形式上,要以坚固阵地防御战为主,阵地战、运动战、游击战紧密结合;在作战方法上,顽强坚守、反复争夺与依托阵地和不远离阵地的运动战相互配合;在作战重点上,把反空袭、反突破、反合围作为关乎战役成败的关键。进入90年代,防御战役研究进入了以联合防御战役为主要研究内容的新阶段,在中央军委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指导下,按照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

要求,突出研究了高技术条件下防御战役的指导思想和战法,形成了包括联合防御战役理论和陆军、海军、空军防御战役理论在内的、完整的防御战役理论体系,出版了《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战役学分册》,颁发了第一代战役纲要等。防御战役研究的主要成果有:战役学纲要、战役学教程、战役学总则、联合战役纲要、海军战役纲要、空军战役纲要、第二炮兵战役纲要和粟裕的《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几个问题的探讨》等。

发展趋势 随着军事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战役实践的不断发展,防御战役研究将进入以新军事革命为背景的研究阶段,研究领域及深度将更加宽大,研究方法与手段将更加科学。信息防御、反瘫痪作战、抗敌远程精确打击和高度机动的立体突击等将成为主要研究内容,一些新的作战原则、作战样式、作战方法、作战手段将产生,已有的防御作战理论将更加完善。

参考文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辑:《毛泽东军事文集》,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

(乔杰)

陆军战役研究 (study of army campaign)

探讨由陆军战役军团单独组织实施的合同战役的活动。主要内容包括对陆军战役的本质、类型、特点、基本原则、战役指导思想、战役部署、战役协同、战役指挥、战役行动方法以及各种战役保障措施等进行的研究。可

分为陆军进攻战役、防御战役、渡江河战役以及特殊地形条件的进攻、防御战役的研究。陆军战役研究与其他军种战役研究同受联合战役研究的指导,并与战略研究和战术研究有密切联系。

清末和中华民国时期的陆军战役研究陆军战役研究随着战役的出现而产生,并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军事技术的进步以及战役实践的发展而逐步完善。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中国的陆军战役研究在继承中国古代战役研究丰富成果的基础上,于反侵略、反压迫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并通过甲午战争、辛亥革命、讨袁战争等战争实践,使陆军的体制编制、装备和作战方式实现了变革:建立了兵团、集团军和方面军,组建了独立的炮兵师、旅和快速骑兵集团;作战方式由工事野战向机动野战发展,协同作战思想开始萌芽;作战指导强调积极主动的进攻。此期间,制定了陆军新军的作战法规,清末陆军预备大学堂和中华民国初年的陆军大学进行了各种“高等兵学”、“统帅纲领”等战役作战理论的教学和研究;蔡锷提出战役是一个作战等级,并初步区分了战争和战斗的概念,标志中国近代战役理论初步形成。其主要特点是:自始至终贯穿着进步思想与封建顽固思想的冲突和斗争,是中华传统兵学中重谋与西方近代兵学中重器战役思想的碰撞与融合。陆军战役研究的主要研究成果有:蔡锷的《曾胡治兵语录》、蒋百里的《孙子浅说》、蔡锷和蒋百里合著的《军事计划》、杨杰的《军事与国防》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陆军战役研究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陆军战役研究,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中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毛泽东及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军事家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以劣势装备同优势装备之敌作战,经过历次革命战争中400多次战役作战,研究、创造并发展了一整套以灵

活机动为特色的人民战争战役理论,使陆军战役研究进入了蓬勃发展时期。其突出特点是:①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战役规律。②战役理论与战役实践紧密联系和不断发展,从战役实践中产生,又用于指导战役实践,并随着战役实践的发展而发展。③形成了人民战争的运动战、歼灭战的战役理论体系。④战役作战原则的指导性与作战方法的灵活性相结合。其主要成果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军事著作、作战文电,以及战役理论研究的一系列著作和战役法规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陆军战役研究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陆军战役及其理论的形成时期。毛泽东、朱德在领导井冈山地区武装斗争中,在红军初创时力量不足的情况下,采用战役上的游击作战,粉碎了国民党军多次“进剿”、“会剿”。1929年4月5日,毛泽东、朱德在《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1930年冬,在第一次反“围剿”时,红军采取了“诱敌深入”的方针,由游击战转变为运动战;在成功地进行了三次反“围剿”斗争后,基本形成了红军的作战原则。在战役方面的作战原则主要是:准备充足,不失时机,集中优势兵力,选择良好阵地,打运动中或驻止而阵地尚不巩固之敌,包围迂回,突然袭击(伏击),速战速决,力求全歼等。1936年12月,毛泽东在系统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经验的基础上,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对红军的战略、战役和战术的基本原则作了系统的理论概括。

抗日战争时期的陆军战役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是陆军战役理论趋于成熟的时期。毛泽东在《论持久战》等著作中对战略和战役的关系、战役作战的形式、原则等战役理论做了

深刻阐述,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其他高级将领也对陆军战役理论的成熟和完善做出了积极贡献。八路军、新四军在配合正面战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具备了实施各种不同层次和规模作战的能力,人民战争的战役特点比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更为突出,丰富了阵地进攻战役方面的经验,实现了有效地为政治和军事战略服务的目的。

解放战争时期的陆军战役研究 解放战争时期,是陆军战役实践与理论的大发展时期。在人民解放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正规战争中,陆军战役理论得到极大丰富和发展并更加系统化。毛泽东对歼灭战方针做了大量论述,如《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人民解放军在这一方针指引下进行了许多运动战战役,歼灭了大量敌军,改变了整个战争形势。1947年,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使人民解放军的战役理论进一步系统化。这一时期,歼敌的主要战役样式包括运动战战役、阵地进攻战役、城市进攻战役、追击战役、阵地防御战役、渡海登陆战役和战略性进攻战役等,大大丰富了陆军战役理论,陆军战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更加密切,战役理论从战略、战术理论中明显分离出来。这一时期的陆军战役理论是传统战役理论与新作战实践的有机结合,是人民解放军陆军战役实践及其理论最辉煌的发展时期。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陆军战役研究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传统的陆军战役思想开始向诸兵种合同战役思想转变。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连续进行的五次运动战战役,以及后来进行的阵地防御战役和阵地进攻战役,具有现代条件下合同战役的许多特点。陆军战役实现了由传统的单一兵种战役向诸兵种合同战役的根本转变,现代条件下运动战战役理论初步形成,运动战与阵地战相结合的战法得到很大发展,并为组织实施

大规模突破防线的进攻战役和宽正面大纵深阵地防御战役提供了宝贵经验,大大丰富了陆军战役理论。

保卫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陆军战役研究保卫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代陆军战役研究不断成熟和发展的时期。此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了数次自卫还击作战,取得了在特殊自然地理和社会环境中对不同敌军作战的经验。陆军战役研究在继承中发展,通过系统研究战役理论和组织干部培训、实兵演练,以及有选择地借鉴外军有益经验等,使陆军战役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975年7月,邓小平关于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的指示精神,为陆军战役研究开辟了新的发展道路。1979年1月,粟裕提出了未来反侵略战争立足于依托阵地和不远离阵地,在运动战、游击战配合下的坚固阵地防御战的战役作战思想,全军有组织地进行了系统的现代陆军战役研究。如1986年和1988年,总参谋部先后组织召开了全军战役理论学术研讨会,提出了“整体作战,重点打击”的战役指导思想,并明确了局部战争中战役的若干作战指导思想,陆军战役研究得到了新的发展。90年代初的海湾战争以来,根据中央军委提出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按照江泽民关于“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指示,全军紧密结合近期世界发生的局部战争战役,突出了高技术条件下陆军战役特点和规律的研究,深入探讨了高技术条件下陆军战役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战役指挥、战役行动方法和战役保障等,着重研究了军事高技术对陆军战役产生重要影响的重点难点问题。这一时期陆军战役研究的成果主要有:1963年至1965年在叶剑英领导下,由军事科学院组织编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学》(初稿);1987年出版的战役学纲要;1988年12月出

版的战役学教程;1993年军事科学院编著的高技术条件下战役作战问题系列研究著作;1995年总参谋部组织编写的战役训练手册和战役训练教材等。特别是1999年中央军委江泽民主席签署颁发的陆军战役纲要,第一次以法规形式规范了陆军战役作战问题,使陆军战役研究产生了质的飞跃。该纲要继承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坚持和发展了人民战争理论;突出时代特征,揭示了高技术条件下、主要在联合战役中组织实施陆军战役的特点和规律,创新和发展了颇具特色的新的战役样式,突出规范了战役电子对抗、战役防空等战役行动;汲取全军战役研究成果,具体规范了主要战役样式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要求等,较好地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它标志着人民解放军陆军战役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体现了新的水平。

发展趋势 随着军事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高技术武器装备的广泛运用,陆军战役研究的重点,将朝着武器装备高技术化,战役力量精干化,战役行动多样化,战场环境立体化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集》,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军事科学院计划组织部编:《战役战术与现代作战》,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

张兴业主编:《战役思想发展史》,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7。

(李纳荣)

海军战役研究 (study of naval campaign)

探讨筹划、组织和实施海军战役的理论与实践的活动。基本任务是揭示海军战役规律,预测海军战役发展,指导未来海军战役实

践,以夺取海军战役胜利。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海军战役本质和特点,海军战役的形成和发展,海军战役规律,海军战役基本原则,海军战役要素,海军战役样式,海军战役行动,海军战役指挥,海军战役战法,海军战役协同,海军战役保障,海军战役趋势等。

清末和中华民国时期的海军战役 20 世纪上半叶期间,旧中国的海军虽然引进了一些西方的先进武器,具有了一定的规模,并经历了 1900 年抗击八国联军的海上入侵和抗日战争的海江防作战,但由于甲午海战之后,海军实力大为削弱,加之科学技术落后,武器性能低劣,仅装备了一些水面舰艇和海岸炮,缺乏现代海上战役力量结构和规模;在军事思想上,又沿袭了西方海军的作战理论,没有确立起独立的海军战役概念,而习惯地把海军战役问题划入到战略或战术范畴去研究,并称之为“小战略”、“大战术”或“标准化舰队战术”。尽管如此,海军学术界仍然关注新出现的海军战役现象,注重对重要海战的研究。如 1918 年出版的由北京政府海军部总务厅池仲佑编著的《海军实纪》(述战篇),就专门论述了甲申中法海战、甲午中日海战的经验教训。中华民国政府海军部部长陈绍宽将军在 1934 年发表的《海战》一文中,也论述了日俄海战、日德兰海战和海上封锁之运用等战役问题。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他结合海江防作战的实践,发表了《海军抗战纪事》(1939)、《三年来海军抗战工作之检讨及今后发展之方针》(1940)、《抗战六年来的海军》(1943) 等论文,系统总结了封锁战、要塞战和游击布雷的经验。这些海战经验的总结和理论研究,已明显含有指导海军战役作战的内容,但缺乏明确的战役意识和对规律性的揭示,尚不能形成海军战役理论的体系。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海军战役研究 1949

年 4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建初期,即投入到解放沿海敌占岛屿,打破敌人海上封锁,制止敌人骚扰破坏,以及准备解放台湾的作战中。作战任务的需求和我军战役指挥的丰富经验与优良传统,使海军战役研究从海军建立伊始就得到了足够的重视和及时展开,自觉地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导,在全军战役理论原则的基础上,总结海上作战规律,借鉴外军有益经验,形成了海军战役理论体系。在海军、舰队机关设置了战役训练处(科),专门负责海军战役研究与训练事宜。1954 年,南京军事学院海军系成立了海军战役法教授会,实施海军战役理论的研究与教学。各舰队、基地则结合自己的作战任务,进行不同战役样式的实践和研究。主要有长江口、珠江口的封锁战役,解放舟山群岛战役,解放万山群岛战役,解放浙东沿海岛屿,一江山岛战役,南海方向的保交护航作战,海军基地防御作战,以及抗登陆战役演习,取得了现代海上联合战役和海军兵力运用的初步经验,为海军战役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将自己的战役实践经验与学习苏联海军的战役理论相结合,是人民海军初创时期战役研究的主要特征,从而使其在较短的时间里建立起反映现代海战特点的海军战役理论体系。海军司令部于 1956 年 12 月颁发了《实施海上战役暂行教令》,总结了依托岛岸,近海歼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隐蔽突然,出敌不意;近战夜战,开展海上人民战争等基本原则,标志着人民海军战役理论的形成。

随着人民海军诸兵种的发展和作战能力的提高,海上作战经验的丰富和学术研究成果的积累,特别是 1957 年海上破袭游击战和 1983 年近海作战方针的提出,开辟了海军战役理论研究的新领域,走上了具有自己特色的道路,创造了海上破袭游击战、扼守海峡水道作战、珊瑚岛礁作战等新的海军战役样式。

海军学院在1960年教学改革中,专门设立了海上破袭游击战课题进行施训,概括了进攻性、主动性、灵活性、突然性和速决性等基本原则。其实质是将毛泽东关于游击战争的理论同海上作战实际相结合,探讨了正规海军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作战方法问题,具有战役指导意义。海军在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加强了扼守海峡的战役研究,并多次举行理论研讨、图上演习和实兵演练,形成了系统的战役理论。其要则是:顽强坚守,积极进攻;重点设防,重点用兵;雷炮阵地与机动兵力打击相结合;分散袭击与集中打击相结合;藏、打、封三个环节紧密衔接等。珊瑚岛礁进攻战役,具有战场远离大陆,作战环境复杂,作战行动对海上控制权的依赖性大等特点。须把握政策,讲究斗争策略;把握战役重心,围绕岛礁作战,夺取海上控制权;充分准备,实施可靠的战役保障。

80年代末至90年代,海军机关、部队、院校经过不断地总结战役实践经验,深入地探讨现代条件下海上人民战争战役的基本规律,一些海军战役理论专著开始问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部《海军战役学教程》,于1988年7月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该书系统阐述了海军战役的基本原理、组织实施海军战役的一般原则和方法,以及夺取海上控制权、海军基地防御战役、破坏岸上目标战役、海上封锁战役、破坏海上交通线战役、保卫海上交通线战役、登陆战役、抗登陆战役等理论问题,完善和发展了海军战役理论体系,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役理论趋于完善,学科体系已经形成。90年代,随着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海军舰队、基地普遍进行了适应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海上局部战争战役的理论研究和模拟演习,总结出许多行之有效的战法和经验。1999年,中央军委颁发施行的海军战役

纲要,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役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发展趋势 随着海军装备技术的发展、海战的变化和对高技术条件下海上战役特点和规律的认识,将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海军战役理论体系,并具有灵活机动,扬长避短,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显著特征;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作战方针指导下,海军战役研究将不断地深化和发展。

参考文献

- 吴树照主编:《海军战役学》,北京:海潮出版社,2001。
- 张侠主编:《清末海军史料》,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
- 赵克增著:《海军学术史探要》,南京:海军指挥学院,1993。

(吴树照)

空军战役学研究 (study of science of air force campaign)

探讨空军战役规律和空军战役指导规律的活动。战役学研究的组成部分。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空军战役的本质、特点和规律,空军战役及其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空军战役准备与实施的方法等。

中华民国时期的空军战役学研究 空军战役学是随着空军战役实践和理论的发展而产生发展的。中华民国空军虽然组建较早,并参加了北伐战争、抗日战争等实战,提出了一些作战使用的思想和原则,但因受外军学术思想的影响,以及兵力规模和战役实践有限,没有形成系统的空军战役理论体系。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空军战役学研究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战役学的教学和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1952年刘伯承元帅在《集

团军战役讲授提纲》中首次提出了空中战役问题。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取得了夺取制空权、掩护交通运输和抗登陆战役中使用航空兵的经验,并及时进行了总结。研究成果有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编印的《在进攻战役中空军的行动》等,提出了以地面军队的胜利为胜利的作战思想,以及密切协同、主动配合等战役作战原则,初步形成了空军协同地面军队作战的战役理论。

1955~196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参加了一江山岛战役、辽东半岛军事演习和闽浙沿海备战,研究了登陆战役和抗登陆战役中空军军团的战役行动问题,南京军事学院空军系编写了《航空兵歼灭敌海军兵力的独立战役》、《抗登陆战役中的航空保障》、《夺取制空权的空中战役》等专题性战役学教材。1959~1965年,空军抽调一大批既有实战经验又有理论水平的干部开展了总结作战经验,研究战役战术,编写作战条令的工作。1962年编印的《空军战斗条令》既是对空军战术的系统规范,又反映了空军的战役理论。其主要内容包括:作战基本原则、作战指挥、各兵种在各类战斗中的行动程序和方法等,为完善空军战役理论奠定了基础。

70年代末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了专门从事空军战役研究的机构。在空军战役演习和战役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拟订了撰写空军战役学的计划,全面展开了编写空军战役学的工作,并于1988年出版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战役学》。该书对空军战役作战特点,空军战役基本原则,争夺制空权,防空战役,空中进攻战役,空军在合同战役中的作战行动,空军战役中的电子对抗,使用核、化学、生物武器条件下空军战役行动的特点,空军战役保障,空军战役后方勤务,空军战役航空工程工作和空军战役政治工作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

军第一部完整系统的空军战役学理论著作。它在基本理论和应用理论方面具有鲜明的中国空军特点,该书出版后,空军指挥学院依据该书编写了内容详实的《空军战役学教程》;国防大学也编写了适用于该校教学的《空军战役学教程》,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战役学理论体系业已形成。

90年代初海湾战争爆发后,根据中央军委新时期战略方针和江泽民关于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指示,空军突出了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中空军战役特点和规律的研究。1999年编写了第一代空军战役纲要。该纲要统一了空军战役作战思想,提出了新的空军战役原则,规范了空军主要战役样式和协同其他军种实施战役作战的行动方法,创新了空军战役理论,是新时期对空军战役学内容的丰富、补充和发展。

发展趋势 随着航空航天兵器的飞速发展,以及世界新军事革命的不断深入,空军战役在未来战争中将显示出更大的作用,空军战役学研究的内容将进一步丰富,学科体系将不断完善。为达成有限战略目的而使用高技术兵器实施精确打击的理论、联合战役中的空军战役理论以及空军战役信息战理论、空天一体战理论等,将成为空军战役学新的研究内容。

参考文献

当代中国空军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空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华人杰、曹毅风、陈惠秀主编:《空军学术思想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

(何涤清 李大中)

空军战役法研究 (study of air force operational art)

探讨空军战役军团组织实施战役的方法

进行的活动。主要包括对空军战役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战役部署、战役指挥、战役协同、战役行动方法和战役保障等问题所进行的研究。

中华民国时期空军战役法研究 空军战役法研究是随着空军作战规模的不断扩大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国是世界上发展航空事业和创建空军较早的国家之一。20世纪初,孙中山先生就提出了“航空救国”的思想。1926年以后,中华民国空军不断用于北伐以及其他战役之中,并在使用上明确提出了反制作战、阻绝作战、直接支援作战、侦察作战等四项基本任务。1929~1930年,在配合陆军对各地军阀的作战中,更加强调直接支援作战,提出了“运用飞机轰炸,与陆军联合攻击”的战法。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淞沪战役失败的教训,使中华民国空军逐步认识到争夺制空权的重要性。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华民国空军派大批人员赴美受训,空军战役法研究受美军影响较大。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空军战役法研究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战役法的研究是在继承传统,借鉴外军有益经验,与空军建设和作战紧密结合进行的,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50年代~60年代中期) 这一时期的研究是在借鉴外国空军战役法研究成果,通过一些具有战役性质的作战和战役演习,在总结经验的同时开展的。50年代初期,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参加抗美援朝作战,在战役中研究并确立了对参战部队实行统一指挥,集中兵力保卫重要交通运输线和重点目标,同友军和地面防空部队密切协同作战等防空作战原则。1953年志愿军空军还进行了朝鲜西海岸抗登陆战役的组织准备,研究了相关课题。50年代中期,空军部队参加了解放一江山岛等战役,在战役实践中研究确立了以登陆部队的胜利为胜利的指导思想;

对参战的空军和海军航空兵实行统一指挥,制定周密的协同动作计划、并严格按照计划组织部队的作战行动,集中兵力突击压制岛上的重要目标,力争作战行动的突然性等空中进攻作战原则。同时,还通过组织战役集训和参加战役演习,研究了在使用核化武器条件下,方面军抗登陆战役中对主要方向诸兵种合成集团军的航空保障、方面军抗登陆战役的空军使用、集团军进攻战役中的航空保障等课题。50年代末期,空军参加封锁金门和保卫福建地区重要目标安全的作战行动,根据当时的军事斗争形势,研究贯彻了慎重初战、重视打好第一仗,集中优势兵力、以多胜少,航空兵和高射炮兵密切配合等作战原则,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封锁金门的作战,并夺取了福建地区的制空权。60年代空军在对未来战争初期反空袭问题的研究中,提出了重点使用兵力兵器、积极主动,统一布局、分区负责,连续拦截、集中突击,隐蔽疏散、严密防护等作战原则,并对兵力兵器部署提出了基本要求。这一时期战役法研究的重点是空军战役军团在合同战役中的行动,其理论成果反映在南京军事学院空军系编写的《空军战役法概则》和空军学院编写的战役教材中。

第二个时期(70年代后期~80年代) 空军通过参加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作战,组织以战争初期反空袭为课题的研究,结合华北军事演习组织研究了战争初期防御战役中空军使用课题;通过参加大军区组织的以渡海登陆、抗登陆战役作战、集团军和方面军坚守防御作战为课题的战役集训和实兵演习等,着重探索了现代合同战役中空军如何协同陆军、海军作战的问题。研究确立了在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指导下,从最复杂、最困难的情况出发,坚持持久作战和坚持打人民战争的空军战役作战指导思想,以及积极主动、集中

使用和充分发挥整体威力,在关键时节夺取局部制空权,重点掩护地面部队的主要集团和支援主要战役行动等作战原则。

第三个时期(90年代) 海湾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对伊拉克实施的空中进攻战役,以及北约空袭南联盟的行动,都显示了空中战役在现代战争中的独特作用。空军加强了对高技术条件下空中进攻战役法的研究。主要成果有:空军指挥学院编撰的《空中进攻战役概览》,以及1999年出版的空军战役纲要等。系统地研究了20世纪末发生的空中进攻战役战例,深化了对各类空中进攻战役法的研究;对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中空军战役运用问题,进行了全面规范。

发展趋势 随着航空航天兵器的发展,空中力量在未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将更加突出,空军战役法研究将受到广泛的重视。研究的重点将是高技术局部战争条件下联合战役中,实施战役规模空袭与反空袭的方法。

参考文献

当代中国空军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空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华人杰等主编:《空军学术思想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

(何涤清 李大中)

战略导弹部队战役学研究 (study of science of strategic missile forces campaign)

探讨战略导弹部队战役规律和指导规律的活动。战役学研究的组成部分。它来源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断发展壮大的战略导弹部队及其不断丰富战役实践。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萌芽阶段 战略导弹部队战役学研究萌芽于20世纪60年代初。为了保卫领土完整,捍卫国家主权,与世界霸权主义国家相抗衡,

中国于50年代后期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并遵循着“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核政策,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导弹部队战役法,为战略导弹部队组织战役作战和训练提供理论依据,是战略导弹部队战役学研究的开始。随着中国仿制的首枚导弹试飞成功及战略导弹力量的不断发展,部队开始对导弹部队训练、演习的方式、方法进行探索,逐渐萌生了包括编制体制、作战运用等内容的基本理论。196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导弹部队领导机关正式成立,新组建了一些部队和若干个导弹基地,一批经过院校培养的指挥和技术军官相继充实到导弹部队,阵地部署渐成体系,第一代中、远程战略导弹陆续研制成功并装备部队。不断发展壮大的系列武器装备和导弹部队的组建,促使与此相应的作战运用理论应运而生。

形成阶段 从1966年至1978年,战略导弹部队在组建后的十余年内,先后组织了多次不同规模带作战背景的演习,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有效地提高了部队组织指挥作战的能力和运用水平。1978年,战略导弹部队系统地总结了十余年战备训练、演习的实践经验,形成了战略导弹部队作战概则。随后,战略导弹部队建设进入了第二个十年,军事训练和军事理论研究热情空前提高,在多次实装实兵演练的基础上,召开了数次作战运用研究会议。先后修订了战略导弹部队作战运用和作战条令等法规性文件,战略导弹部队院校分别编写了战略导弹部队作战指挥等教材,较为系统地总结了战略导弹部队建设和战备训练的经验,并由此明确提出了战略导弹部队战役指导思想。80年代中期,战略导弹部队颁布了第一部《战略导弹部队战役学》,对战略导弹部队战役的特点、作战原则、战役阶段划分、战役准备、战役实施和各种保障等作了比较深入的阐述,表明战略导

弹部队战役理论已经走向成熟。90年代初,随着战略导弹部队战役训练形式的多样化和训练内容的逐渐深入,又制定了一系列战役训练法规,包括战役训练大纲、战役训练考核标准等,具体规定了战役训练的基本内容、方法以及考核的客观标准等,为战役训练步入正规化、法制化的轨道,提供了客观依据。由此,初步形成了战略导弹部队战役学的理论体系。

发展阶段 进入90年代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新武器、新装备不断研制成功并逐步装备部队,战略导弹部队拥有的导弹武器型号增多,数量、质量有了显著提高,部队的战役、战术训练水平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对战役理论的需求提出了更高的标准,战略导弹部队战役理论也随之进入了创新性的发展时期。针对战略导弹部队的作战运用问题,进一步完成了战略导弹部队战役法、战略导弹部队指挥学等理论专著,使战略导弹部队战役理论产生了质的飞跃。经过近50年的发展,战略导弹部队战役学已成为全军重点建设学科,主要培养战略导弹部队战役指挥人才。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于1990、1998年分别被确定为硕士、博士学位授权点,形成了稳定的研究方向,取得一大批研究成果,为战略导弹部队输送了大量高素质的战役指挥人才。伴随着军事斗争准备的深入,战略导弹部队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基本战法和具体行动方法,形成了战略导弹部队战役战法研究、战略导弹部队战役保障法等多部成果。既满足了部队战役训练的需要,又把战略导弹部队战役学科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90年代末,战略导弹部队在总部统一部署下编撰完成的战略导弹部队战役纲要颁发实施,标志着战略导弹部队战役理论研究已进入与全军战役理论研究同步发展的轨道,战略导弹部队战役学进入更加成熟

和完善的阶段。

发展趋势 随着战略导弹部队武器系统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以及战略防御系统的建立,太空战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新的广阔战场,战略导弹部队战役行动的纵深性、立体性将进一步增强,战略导弹部队战役学研究也将得到进一步发展。

(李朝民)

战略导弹部队战役研究 (study of strategic missile forces campaign)

探讨战略导弹部队战役军团,按照统一的作战意图,为达成战争的局部或全局性目的,在统一指挥下进行的一系列导弹突击作战行动的活动。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对战略导弹部队战役本质、分类、战役基本原则、战役指挥、战役保障和各种战役样式(行动)组织实施方法等进行的研究。目的是揭示战略导弹部队战役规律和战役指导规律,为战役作战、训练服务。

战略导弹部队战役研究,是在战略导弹部队诞生后,随着战略导弹部队战役实践的不断深入而逐步发展完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导弹部队战役研究经历了由低到高、循序渐进的过程。目前,已经形成了基础理论与运用理论、样式理论与行动理论于一体的全面、系统的知识体系。其研究过程包括三个阶段:

前期准备和萌芽阶段(20世纪60年代中期~70年代末) 战略导弹部队成立伊始,即借鉴外军经验,结合作战任务和武器装备特点,加强战术、技术研究,尤其是战略导弹部队作战运用方面的研究。按照作战阶段,对各级、各部门、各时节作战和勤务保障部(分)队完成的工作和达到的标准,彼此间的协同等进行了重点规范,并通过试验发射、演习等形式加以检验和完善。70年代,随着武

器性能的改进、数量的增加和相关作战要素的完善,战略导弹部队的整体作战能力得到较大提高。深化作战运用研究摆到了重要的日程。在进一步提高训练层次,不断总结战备训练经验的基础上,多次召开作战运用研讨会,探索战略导弹部队作战运用的特点和规律,逐步形成了具有战略导弹部队特色的作战运用理论,为尔后进行战役研究打下了基础。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战备建设和作战问题的有关规定、概则中,主要有:《战略导弹部队作战概则》、《战略导弹部队各级作战指挥程序》、《关于战略导弹部队作战运用的几个问题》等。

研究启动和初步发展阶段(70年代末~80年代末) 针对当时的国际战略环境,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导弹部队通过战备值班和高层次、多课题的战役训练、演习,进一步加强了对作战运用的研究。特别是通过深入研究战略导弹部队作战运用的特点和规律,统一了对战略导弹部队战役本质的认识,并给予了明确的界定,即战略导弹部队战役,是指战略导弹部队战役军团,按照上级的作战命令,为达成特定的战略、战役目的,在打击目标和时间上协调一致的若干次导弹突击的总和。这一认识,标志着战略导弹部队作战运用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使战略导弹部队战役与战略导弹部队战术得到了区分。以此为突破口,关于战略导弹部队战役的一系列基本理论,如战役指导思想与原则、战役指挥与协同等逐步成熟,先后出版了战略导弹部队战役学、战略导弹部队战役法等学科代表作,对于指导战略导弹部队战备训练发挥了重要作用。

全面发展和完善阶段(90年代) 根据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战略导弹部队实行了重大的战略性转变,由执行单一任务转变为多种任务并重,战役研究也步入了多种背景、

多种样式、多种行动共同研究的阶段。通过对高技术局部战争战役特点的认识,结合战略导弹部队实际,及时编写出版了一系列条令、教材,如常规导弹突击战役、战略导弹部队战役纲要等。对导弹突击战役的本质、指导思想与原则、战役指挥、战役保障、战役准备与实施方法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通过组织大型战役演习和编写有关作战法规,进一步整理、发展了威慑运用理论,使战略导弹部队战役研究向前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发展趋势 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战役中,定向能武器、计算机病毒武器、动能武器、隐形武器等相继出现和投入使用,特别是战区反导系统和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建立,对战略导弹部队战役必将产生重大影响。战略导弹部队战役研究,将在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的前提下,把着眼点放在有关的对策研究上,特别是提高快速反应能力、生存能力、突防能力、信息对抗能力的研究,以及威慑与实战的作战运用研究,为保证战略导弹部队在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局部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提供理论依据。

(葛信卿 刘铁庆 谭亚东)

战役研究著作 (writings on campaign study)

研究战役问题的理论专著、论文、工具书和教材等著述的统称。是对战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未来战役的理论探讨。包括综合性战役研究著作和专题性战役研究著作。

随着战役的产生,人们对战役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对战役规律的认识不断丰富,战役理论不断发展,战役研究著作相继出现。19世纪末,西方军事思想大量涌入中国,促进了中国的战役理论研究,《自强军西法类编》、《兵学新书》等著作都对战役问题有专门的论述。

中华民国时期,军事学术主要是继承中外战役研究成果,战役问题已逐步被人们所重视,陆军大学开设了《统帅纲领》课程,但没有出现专门的战役研究著作。1913年,蔡锷撰写了《军事计划》一书,其中有大量关于战役问题的论述。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役研究著作,是在总结历次革命战争的实践中产生的。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军事家,汲取了古今中外兵法的精华,结合中国当时的具体情况,创造了具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特色的战役理论,撰写了一批战役研究著作。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论抗日游击战争》等,系统地论述了战役的基本方针、力量运用要求、战役战法,是战役研究的经典著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重视学习和借鉴外国军队的战役理论,研究总结抗美援朝战争和多次自卫反击作战经验,促进了战役理论的发展,先后出现了一批战役理论专著和教材。如20世纪50年代南京军事学院编写的《战役法原则》,系统介绍了原苏军的战役理论。80年代,由军事科学院编著、中央军委颁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学纲要,海军、空军和第二炮兵也相继编写出版了军兵种战役学专著和教材,形成了现代条件下的战役理论体系。90年代初的海湾战争后,面对军事高技术的挑战,全军范围内的战役理论研究空前活跃,结合贯彻落实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一大批战役研究著作相继面世。主要有王厚卿主编的《战役发展史》,孙继章撰写的《战役学基础》,王厚卿主编的《战役学教程》,张兴业主编的《战役思想发展史》,军事科学院战役战术研究部编著的战役训练手册和《高技术条件下战役问题研究系列丛书》,从不同侧面研究和探讨局部战争特点与指导、反空袭、电子对抗、机动、登陆作

战、城市进攻作战以及联合战役、军种战役等问题,丰富和发展了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战役理论。

(张庆春)

战术学研究

(study of science of tactics)

探讨战斗规律和战斗指导规律的活动。军事学术研究的组成部分。由合同战术学、军种战术学、兵种战术学研究三个层次构成。研究领域涉及战斗的各个方面,着重研究战斗的本质、特点和规律,战斗诸要素,准备和实施战斗的方法以及战术学与相邻学科的关系,战术学的研究方法等。基本任务是揭示战斗规律和战斗指导规律,用以指导战斗实践,为夺取战斗的胜利服务。

研究简况 战术学研究是近、现代军事理论发展的产物。19世纪末,中国开始引进西方武器装备和军事理论,翻译和编著了许多战术学专著,促进了中国战术学的发展。

清末和中华民国时期的战术学研究 进入20世纪以来,战术学得到迅速发展。清朝末期和中华民国时期,注意吸取并采用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军事理论,在作战实践中不断研究和发展的战术学理论。战术学研究的主要成果有:徐建寅的《兵学新书》,蔡锷的《曾胡治兵语录》、《军事计划》,蒋百里的《孙子新释》、《军事常识》,杨杰的《军事与国防》,白崇禧的《全面战术论》、《游击战纲要》,周至柔的《空军之指挥及运用》,陈绍宽的《海战》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术学研究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术学,是在总结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从小规模游击战斗发展到现代合同战斗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建军开始,就注重研究适应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斗规律和战斗

指导规律。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基本战术是袭击,基本样式有奔袭、伏击、急袭、破袭和袭扰等。毛泽东、朱德等在总结游击作战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十六字诀”,包含了以灵活机动的游击行动,能动地夺取战斗胜利的战斗指导规律。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提出:“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并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一系列著作中系统地论述了战斗的目的、本质及其规律以及组织实施等理论问题,奠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术学理论的基础。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基本战法“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毛泽东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对战斗队形、战斗方法、战斗准备、战斗作风等问题作了科学概括。随着武器装备的改善,战斗规模的扩大,在以步炮为主的合同战斗实践中,形成了合同战斗的原则和方法,合同战术初步形成,战术学理论进一步扩展。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志愿军面对现代化的敌人和新的战场环境,在诸兵种合同战斗实践中,丰富了袭击与强攻相结合的进攻理论;在发展野战阵地防御战斗理论基础上,形成了以坑道为骨干与野战工事相结合的支撑点式坚固阵地防御战斗理论;总结了防空、防坦克、防空降、防化学等新的战斗经验,进一步丰富了战术学理论内容。

保卫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总结以往作战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保卫领土、领空、领海的战斗实践,进一步探索了现代战斗的特点和规律,编写了合成军队及各军种、兵种的几代战斗条令。80年代以来,部队的合同战术训练不断发展,院校的战术学教学更加系统,出版了多部战术学专著,增设了战术理论研究机构,研究队伍逐步壮大。

90年代后,根据江泽民“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指示,突出了高技术条件下战斗规律和战斗指导规律的探索,战术学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入发展。

研究内容 战术学研究的理论内容极为丰富,主要包括:

战斗的本质和要素 战斗的本质即战斗的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它制约一切战斗行动,并规定火力、突击、机动、防护等战斗要素的相互关系。

战斗的特点和规律 战斗随着军事技术、军队体制编制和军事思想等的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现代条件下,军队的火力、突击力、机动力、防护力等明显提高,使现代战斗具有多维空间、高速机动、精确打击等特点。战斗规律,是战斗诸因素本质的必然联系,具有普遍性;由于战斗运动过程存在时间、地域、性质的差异,因而具有特殊性;同时,战斗规律具有强制性,人们的主观指导必须符合客观实际。

战斗的主客观因素及其相互影响 武器装备因素,决定着战斗的形式和方法;地形、气象等因素,影响着武器装备效能的发挥,制约着军队行动和战斗方法的选择;人的因素,对战斗胜负起决定作用。

诸军兵种在战斗中的地位作用和使用原则 诸军兵种是合同战斗编成中的组成部分,并具有不能相互取代的作用;武器装备及其分工的不同,在具体战斗中的地位作用也各不相同;科学编组,能充分发挥诸军兵种的优良,形成整体威力。诸军兵种遂行战斗任务时,通常遵循集中使用兵力,掌握预备力量,周密组织协同动作,实施可靠的保障等主要原则。

进攻战斗 一般具有优势的兵力,较大的机动空间,行动的主动性和机动性。其目的是歼灭敌人,攻占重要地区或目标。现代进

攻战斗,是在使用核、化学等武器或在其威胁下进行的诸军兵种合同战斗,将在激烈的电子对抗中,全纵深、多层次同时展开,具有更大的坚决性、突然性、快速机动性和速决性。进攻战斗的主要方法是:集中力量特别是火力和电子进攻力量,选敌弱点,突然攻击,重点突击,分割包围,纵深立体打击,速战速决。

防御战斗 通常依托有利地形,抗击优势敌人的进攻,机动空间有限,处于被动地位,但积极的防御能从被动中争取主动。其目的是扼守阵地,大量杀伤、消耗敌人,争取时间,为转入进攻或保障其他方向的进攻创造条件。现代防御战斗,是在使用核、化学等武器或在其威胁下,在激烈的电子对抗中,全纵深、全方位、立体地进行。防御战斗的主要方法是:集中兵力、火力和器材,扼守主要防御方向和要点,依托阵地,正确部署兵力,周密组织火力、构筑工事和设置障碍物,构成全纵深、全方位、立体而有重点的稳固的积极防御体系,严密防护与积极打击相结合,整体抗击与积极的攻势行动相结合,各个击破敌人的进攻。

移动和驻止 移动,陆军分为行军和输送,海军为航渡,空军为转场。驻止,包括宿营、驻泊和在待机、集结地域的停留等。现代条件下的移动和驻止,是在对方空地海天一体化的侦察监视和袭击威胁下以及道路、航路可能遭到破坏、受染情况下实施的,应周密计划,充分准备,加强侦察、警戒和交通保障,做好防敌袭击准备,迅速、隐蔽、安全、按时到达指定地域、海域或机场,加强驻止地域警戒和防护等。

学科体系 关于战术学学科体系问题,至20世纪80年代在军事学术界基本形成共识,即包括合同战术学、军种战术学、兵种战术学三个层次。军种战术学包括陆军战术学、

海军战术学、空军战术学、战略导弹部队战术学等分支学科。兵种战术学包括陆军、海军、空军的各兵种战术学等分支学科。

合同战术学是研究诸军兵种合同战斗规律和合同战斗指导规律的学科,着重研究合同战斗的本质、特点和规律,诸军兵种在合同战斗中的地位、作用及其使用原则,准备与实施合同战斗的方法等。

陆军战术学是研究陆军战斗规律和战斗指导规律的学科,着重研究陆军步兵、坦克兵、炮兵、防空兵、陆军航空兵、电子对抗兵、通信兵、工程兵、防化兵等兵种合同战斗的本质、特点和规律,准备和实施战斗的方法等。

海军战术学是研究海军战斗规律和战斗指导规律的学科,着重研究海军水面舰艇部队、潜艇部队、海军航空兵、海军陆战队、海军岸防兵等兵种合同战斗的本质、特点和规律,准备和实施战斗的方法等。

空军战术学是研究空军战斗规律和战斗指导规律的学科,着重研究航空兵、高射炮兵、地空导弹兵、空降兵、雷达兵等兵种合同战斗的本质、特点和规律,准备和实施战斗的方法等。

战略导弹部队战术学是研究战略导弹部队所属部队、分队遂行作战任务的规律和指导规律的学科,着重研究战略导弹部队所属部队、分队遂行作战任务的本质、特点和规律,准备和遂行作战任务的方法等。

兵种战术学是研究陆军、海军、空军的各兵种战斗规律和战斗指导规律的学科,着重研究兵种战斗的本质、行动特点和规律,在合同战斗中的地位作用和行动方法等。

发展趋势 随着现代军事科学技术和军队武器装备、体制编制及战斗实践的不断发展,战术学理论体系将进一步完善,学科区分将越来越细,传统的战斗原则将注入新的内涵或产生新的战斗原则,形成新的战法,战术

学研究将开拓新领域、充实新内容。相邻学科的建立、完善,将使战术学通过不断汲取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进一步丰富本学科的知识内容,补充新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战术学研究将朝着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和更加系统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陆军指挥学院编:《合同战术学》,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

赵克增著:《海军学术史探要》,北京:海军指挥学院、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1993。

空军司令部编:《空军战术学》,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

军事科学院战役战术研究部编:《战术学教程》,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

(杨志远 朱锦麟)

战术研究 (study of tactics)

探讨战斗的基本原则和兵力部署、协同动作、战斗指挥、战斗行动方法以及各种保障措施的活动。包括对合同战术、军种战术、兵种战术以及进攻战术和防御战术的研究等。战术研究与战役法和战略研究具有密切联系,并对战役法和战略研究产生一定影响。

清末和中华民国时期的战术研究 战术研究随着战斗的出现而产生,并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战斗实践的发展而发展。19世纪末,中国的战术研究主要是对陆军的散兵线战术和海军的舰艇机动战术研究。清朝末期和中华民国时期,中国注意吸收并采用西方的先进技术,使战术研究得到一定发展。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进行的讨袁战争、护国战争,以及国民革命军进行的北伐战争等,多采用侧后突袭、长驱直入、猛打穷追、运动歼敌的战术。战术研究的主要成果有:蔡锷的《曾胡治兵语录》、《军事计划》,蒋百里的《孙子新释》、

《军事常识》,杨杰的《军事与国防》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术研究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长期处于以劣势装备同优势装备之敌作战的条件下,经过历次革命战争中的数以万计的大小战斗,研究、创造和发展了一整套灵活机动的人民战争的战术,使战术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并具有自身的突出特点:坚持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战斗实践相结合;以新型人民军队所独具的优越性为基础;以高度机动灵活的用兵新法为灵魂;继承传统文化,蕴藏着军事辩证法的光辉;继承军事历史遗产,立足战斗实践,注重汲取全军官兵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不断创新和发展。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战术研究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袭击是红军的基本战术,也是战术研究的重点。其研究成果为人民战争战术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毛泽东、朱德在领导井冈山地区武装斗争中,粉碎了国民党军多次“进剿”、“会剿”。1929年4月5日,毛泽东、朱德在《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十六字诀”。1930年11月1日,毛泽东、朱德给红军第一方面军发出了《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敌疲惫而歼灭的命令》,促进了游击战术向游击性的运动战战术发展,指导红军在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不断取得重大胜利。1936年12月,毛泽东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全面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并概括了一系列战术原则。主要包括:集中兵力原则,运动战原则,速决战原则,歼灭战原则,以及力争主动、力避被动,灵活机动、出敌不意,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等原则。战术研究的主要成果还有:周恩来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朱德的《谈几个战术

的基本原则》，刘伯承的《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等。

抗日战争时期的战术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的战术研究得到极大的丰富和发展。

游击战战术研究 根据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游击战斗实践，创造性地提出了袭击战、破袭战、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新战法。1938年1月11日，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中指出：游击战争要注重突然袭击或奇袭的这种形式，并详细阐述了袭击战的目的、原则、条件、时间、计划、目标等。各根据地军民灵活运用袭击战术，在战斗实践中研究并总结了一整套袭击战斗的行动方法。

运动战战术研究 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概括了兵力的分散和集中、分进和合击、攻击和防御、突击和钳制、包围和迂回、前进和后退等战术和方法。1943年1月26日，邓小平在《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中指出，敌后作战的指导原则，是基本的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要善于发现敌人的规律，善于利用缝隙钻敌人的空子，以争取主动。战争后期，运动战战术在较大规模的运动进攻和消耗、阻击敌人的运动防御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发展。

战术研究的主要成果还有：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朱德的《论抗日游击战争》，朱德、彭德怀合著的《抗日的游击战术》，陈毅的《坚持江南抗战的诸问题》，刘伯承的《论游击战与运动战》、《对目前战术的考察》、《敌后抗战的战术问题》等。

解放战争时期的战术研究 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的战术研究取得了全面发展，并形成了合同战术。

运动战战术的发展 1946年9月16

日，毛泽东发出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1947年1月，刘伯承在《钜金鱼战役的经过和经验》中提出了攻敌所必救、消灭其救者和攻敌所必退、消灭其退者的有效战法；1947年4月22日，毛泽东又发出了《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电报。人民解放军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广泛开展了战役和战斗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并发展了攻歼立足未稳之敌和伏击运动之敌的战法。与此同时，进一步完善了运动防御战术。

阵地攻坚战术的运用 1947年6月6日，毛泽东发出了《做好夺取大西北的一切准备》的电报，要求学会近迫作业，善于攻坚。此后，人民解放军重点研究了阵地攻坚战术。阵地进攻，主要发展了城镇攻坚战术和攻歼野战阵地防御之敌的战术。阵地防御，主要发展了野战阵地防御战术。

诸兵种合同战术的形成 通常集中使用炮兵、工兵和少量坦克兵于主要突击方向，支援步兵突破，采用穿插分割、迂回包围等手段，各个歼灭敌人。战术研究的主要成果还有：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邓小平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等。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战术研究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拥有大量飞机、舰艇、坦克和火炮，火力强，机动快，掌握制空权和制海权，并有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经验。面对现代化的强大敌人，中国人民志愿军人朝作战后，大力开展战术研究，并在集中兵力、选择打击目标，战斗的组织指挥，夜战、近战，以及防空袭、防坦克、防炮击、防空降、防化学、防细菌和实施工程保障、后勤保障等方面都有许多新的创造，攻防战术研究得到新的发展。

现代条件下运动战战术的研究 研究提出了战术小包围、打小歼灭战的方针和战法。

1951年5月26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打美英军在几个月内还不要实行大包围,只实行战术的小包围,即每军每次精心选择敌军一个营或略多一点为对象而全部地包围歼灭之。之后,又重点研究并采用了“零敲牛皮糖”的战斗方法,对坚固阵地防御之敌进行了有限目的的进攻,实施有重点的多路、多梯队连续突击,并以穿插渗透部队或分队直插敌防御纵深,协同突击部队各个围歼敌人。

坚固阵地防御战术的研究 探索了采用以坑道为骨干、与野战工事相结合的支撑点式的纵深环形防御体系样式,强调攻势防御,以积极的袭击、伏击、急袭和狙击等手段,大量杀伤、消耗敌人。

反坦克、防空降和空中格斗等战斗方法的研究 创造了反坦克网状阵地;粉碎了敌人的“绞杀战”;摸索了反空降战斗的行动方法;为配合地面部队作战,志愿军空军于1951年1月首次与美国空军进行了空战,并逐步研究和发展了空军战术。

战术研究的成果主要反映在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等指导抗美援朝战争的大量文电以及战后出版的《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总结》之中。

保卫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战术研究 保卫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术研究,强调坚持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加强外军战术研究,注重在继承中求发展,使战术研究进入了更深层次发展的新阶段。1955年解放一江山岛作战中,实施了陆海空军联合作战,研究探讨了诸军兵种合同战术。之后的多次自卫反击作战中,探索研究了高寒地、严寒地、热带山岳丛林地、珊瑚岛礁等特殊条件下实施合同战斗的战术问题,并深入研究了海军、空军、战略导弹部队合同战术,发展了诸军兵种合同战术。60年代以来,先后颁

发了几代战斗条令和出版了众多战术研究著作。90年代初的海湾战争后,战术研究更加广泛和深入,并根据中央军委江泽民主席“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指示,注重贯彻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突出高技术条件下合同战斗特点和规律的研究,深入研究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合同战斗的指导思想、战斗指挥和战斗行动方法,进一步强调知彼知己、集中力量、主动灵活、出敌不意、密切协同、全面保障等基本原则,强调进攻的突然性、灵活性、机动性和防御的积极性、机动性,注重在积极与敌高技术武器装备作斗争的同时有效地发挥己方高技术武器装备的作用等。战术研究的成果主要有:粟裕的《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几个问题的探讨》,军事科学院战役战术研究部的《战术发展新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战术问题研究》、《战术的哲学基础》、《毛泽东战术思想研究》、《合同战术》等。1999年1月,江泽民签署颁发了新一代合同战斗条令等。

发展趋势 军事科学技术的发展,将对战术研究及其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原有的战术基本原则将不断充实新的内容,并形成新的原则。纵深立体的战斗方法,综合火力杀伤与电子进攻的结合运用,空中机动、立体封锁,指挥自动化系统的运用,后勤、装备保障的一体化、联勤化,将成为战术研究的重要课题。同时,战术研究将注重发展多维空间攻击战术、直升机空战战术、远程空中奔袭战术、软硬结合杀伤战术、隐形打击战术、信息对抗战术等新的战术。

参考文献

军事科学院战役战术研究部编:《战术发展新探》,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

陆军指挥学院编:《合同战术学》,北京:解放军

出版社, 1989。

侯善智等著:《毛泽东战术思想研究》,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 1993。

(朱锦麟)

合同战术研究 (study of combined-arms tactics)

探讨诸军兵种进行合同战斗的方法的活动。主要包括对合同战斗的基本原则和兵力部署、协同动作、战斗指挥、合同战斗行动方法、合同战斗的各种保障措施,以及陆军、海军、空军、战略导弹部队之间和同一军种内诸兵种之间合同战斗的研究等。

清末和中华民国时期的合同战术研究 清末军队,作战主要是步兵与骑兵、陆军与海军的配合行动,以及步炮之间的协同作战,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合同战术。20世纪初至中华民国时期,中国注意吸收西方的先进军事技术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产生的合同战术,使合同战术研究得到了初步发展。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进行的讨袁战争、护国战争以及国民革命军进行的北伐战争等,研究了步炮之间、步骑之间以及陆军与海军之间协同作战的方法。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空军参加对日作战,开始了对陆空军之间、空军各兵种之间协同作战的初步研究。海军合同战术的研究也有了一定发展。涉及合同战术研究的成果有:蒋百里的《军事常识》、杨杰的《军事与国防》、陈绍宽的《海战》、周至柔的《空军之指挥及运用》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合同战术研究 具体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的合同战术研究 中国工农红军和八路军、新四军在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受客观物质条件的限制,合同战斗实践不多,因而尚未形成较完整的合同战术,但仍注重了在理

论上做好进行合同战斗的准备。1942年,经刘伯承校正出版并作序的苏联施米乐尔所著《合同战术》一书,对于形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合同战术理论起了重要作用。

解放战争时期的合同战术研究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的改善,各兵种部(分)队的相继建立和使用,在步炮协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诸兵种协同作战的合同战术,研究的重点是运动战、城市攻坚战和防御作战。在运动战的进攻战斗中,强调集中炮兵、坦克兵、工兵于主要突击方向,保障步兵战斗行动,采取包围迂回、穿插分割的战法攻歼敌人。城市攻坚作战的实践使合同战术的研究得到较大发展,进攻战斗强调编组炮兵群,步兵在炮火掩护下勇猛突击,火力、爆破、突击密切配合,步兵、炮兵、坦克兵和工兵形成整体力量。防御战斗则注重统一计划步兵、炮兵火力,使防步兵火力、打坦克火力相结合。合同战术研究的主要成果有:毛泽东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刘伯承的《战术问题》、重校《合同战术》译文上部的前言、《论苏军合围钳形攻势》编后言等。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合同战术研究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面对武器装备高度现代化并具有各军、兵种联合作战经验的敌人,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步炮协同、步坦协同、陆空协同以及防空袭、防炮击、防空降和工程保障、防化保障等方面取得了丰富经验,合同战术研究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进攻战斗强调采取步兵、炮兵、坦克兵和工兵密切协同,高速突破敌人战斗队形的战术。防御战斗注重多兵种、多火器协同的反坦克战术。反空袭作战中,志愿军空军首次参战,并与地面高炮部队掩护相配合,逐步形成了空军合同战术原则。合同战术研究成果主要反映在毛泽东的《祝

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重大胜利》等著作以及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指导作战的大量文电之中。

保卫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合同战术研究在保卫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力加强了各军兵种的建设,各级各类军队院校着力培养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指挥人才,经常组织合同战术演习,促进了合同战术研究的发展。1955年,陆海空三军首次进行协同登陆作战,解放了一江山岛,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诸军兵种合同战术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在平时研究、演习的基础上,通过多次自卫反击作战,探索积累了高寒地、热带山岳丛林地、珊瑚岛礁等特殊条件下运用合同战术的经验。1955年1月,根据毛泽东军事思想和合同战术实践,研究编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部合同战术理论著作——《现代诸兵种合同战斗原则》正式出版,体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合同战术理论研究日趋成熟。以后又陆续颁发了几代合成军队战斗概则和合同军队战斗条令,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合同战术理论研究进入了完全成熟的阶段。合同战术研究的主要成果有:毛泽东的《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训词》等,朱德的《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建设海军,保卫国防》等,彭德怀的《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而斗争》,刘伯承的《学习军事理论必须与实际结合》,叶剑英的《辽东军事演习的总结讲评》、《把我军训练提高到更高的水平》等,萧劲光的《目前海军建设中的几个基本问题》,许光达的《陆军的发展趋势及装甲兵的运用》等。

进入70年代中期,特别是90年代初海湾战争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合同战术研究无论是基本理论还是具体战法,都有了重大的发展。在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指导下,注重研究揭示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合

同战斗的特点和规律,深入探讨了由地面合同战斗转变为空地一体的合同战斗,提出了纵深打击,立体攻击,全纵深防御等新的合同战术理论,电子战、信息战也开始成为合同战术的重要手段,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合同战术理论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合同战术研究的主要成果有:邓小平的《精简军队,提高战斗力》、《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等,叶剑英的《发展我国无产阶级的先进军事科学》,粟裕的《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几个问题的探讨》等。

发展趋势 随着高技术武器装备在军事上的不断运用和更新,合同战术研究将不断地适应军事技术的发展,合同战术理论更新的速度将大大加快。非对称作战、非线性作战、网络战等新的作战样式,将对合同战术研究产生巨大影响;超视距攻击、超越攻击、精确打击将成为合同战术研究的重要内容。合同战斗将在陆、海、空、天一体化的战场进行,合同战术研究也将进入一个不断发展创新的阶段。

参考文献

陆军指挥学院编:《合同战术学》,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

军事教育学院编写:《陆军合同战术学》,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成传榜)

进攻战术研究(study of offensive tactics)

探讨进行进攻战斗的方法的活动。主要包括对进攻战斗指导原则和兵力部署、协同动作、战斗指挥、战斗行动方法以及各种保障措施等进行的研究。可区分为合同进攻战术与军兵种进攻战术研究、一般条件下的进攻战术与特殊条件下的进攻战术研究等。进攻战术研究与进攻战役法和进攻战略研究联系

紧密、相互渗透,与防御战术研究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进攻战术研究的基本任务是通过总结实战经验,揭示进攻战斗的特点和规律,寻求指导进攻战斗的正确方法,为夺取进攻战斗的胜利服务。

清末和中华民国时期的进攻战术研究中国的进攻战术研究源远流长,以《孙子》为代表的一系列古代兵法专著,为中国近、现代进攻战术研究奠定了基础。在清朝末期和中华民国时期的甲午战争、讨袁战争、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中,进行了一系列规模不等的进攻战斗,其战术思想在承袭古代兵法的同时,还融入了西方战术理论的内容,如陆上进攻战斗的散兵线战术、步炮协同战术、袭击战术,海上进攻战斗的舰艇机动战战术和空中进攻战斗的截击、突击战术等。进攻战术研究成果,主要有徐建寅的《兵学新书》、蔡锷的《曾胡治兵语录》、蒋百里的《孙子新释》和《军事常识》、白崇禧的《游击战纲要》、陈绍宽的《海战》、周至柔的《空军之指挥及运用》,以及孙中山、黄兴等人的军事论述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进攻战术研究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进攻战术研究,是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数以万计的战斗实践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断发展的。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刘伯承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军事家,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夺取胜利和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以马列主义军事理论为指南,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进攻战术,使进攻战术研究进入了新时期,其主要观点包括:①在战术上要重视一切敌人。②要将战术建立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③发挥自身专长和人的自觉能动性,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④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⑤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⑥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⑦不打无准备、无

把握之仗。⑧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⑨要因势制敌、因情施变,机动灵活地运用和变换战术。⑩着眼战斗的特点和发展,善于集中群众智慧,注重学习、借鉴古今中外的有益战斗经验和先进战术,不断研究和创新战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进攻战术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军队领导人的军事论著和作战指挥文电,以及军事科研机构和军队指挥院校编撰的战术理论专著中,它们主要有: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论持久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和“十大军事原则”;朱德的《谈几个战术的基本原则》和《论抗日游击战争》;刘伯承的《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和《论游击战与运动战》;叶剑英的《应该在现代条件下训练军队》;粟裕的《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几个问题的探讨》;军事科学院编撰的《战术参考资料》、《战术发展新探》和《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战术问题研究》;陆、海、空军指挥学院编撰的《合同战术学》、《陆军合同战术学》、《海军合同战术》、《空军战术学》等。

发展趋势 随着现代军事技术尤其是高新技术的广泛运用,进攻战斗将在复杂多变、激烈对抗的环境中和战场的全维空间内同时展开,具有更强的突然性、机动性、灵活性和速决性,从而对进攻战术研究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高技术局部战争背景条件下,进攻战术将在继承传统战术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整体合同作战、纵深立体攻击、快速重点打击和电子进攻等将成为进攻战术研究的重点内容。

参考文献

军事科学院战役战术研究部编:《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战术问题研究》(合同进攻战术),北京:军

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

陆军指挥学院编:《合同战术学》,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

军事教育学院编:《陆军合同战术学》,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空军司令部编写:《空军战术学》,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

(姚江宁)

防御战术研究 (study of defensive tactics)

探讨进行防御战斗的方法的活动。主要包括对防御战斗的基本原则、战斗指挥、防御体系、战斗行动方法和各种保障措施等的研究。防御战术研究是战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军事技术和进攻战术研究发展的制约,同时也对进攻战术研究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清末和中华民国时期的防御战术研究防御战术研究,是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防御战斗的实践不断发展的。19世纪末,由于线膛武器的广泛使用,杀伤力大为提高,防御战斗的正面和纵深增大,散兵线战术广泛运用。进入20世纪后,防御战术研究迅速发展。清朝末期和中华民国时期,防御战术研究中注重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和作战思想。1910年清政府颁发了《新定步兵操法》,认为“防御时,易陷于被动地位,致使动作不得自由,故稍有机会可乘,宜决然为攻势”,提出“攻防相辅”才能决胜的思想,并对防御配备进行了详细论述;不但摒弃了专守防御,而且不拘泥中国以主待客的战术思想,是防御战术研究的一大进步,对当时以至中华民国的防御战术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袁世凯的《训练操法详晰图说》,对防御战斗的本质和指导思想、防御体系和战法等也均有论述。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进行的讨袁战争、护国战争,以及国民革命军进行的北伐战争等,在防御战斗中注

重运用“攻势防御”战术,积极改变战斗态势,为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蔡锷、杨杰、蒋百里等著名军事将领均在其军事著作中阐述了防御战术。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防御战术研究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防御战术研究,是在长期革命战争实践中形成和发展,并在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作战、训练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其主要特点是坚持以积极防御为指导,以人民战争为基础,从实际出发,着眼未来,深入系统地总结战斗经验,不断发展防御战术。

中国革命战争时期和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防御战术研究 1936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基本的原则是承认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并对积极防御作了深刻的论述,批判了消极防御,分析了防御的基本特性。1938年,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防御必须同时进攻,而不应是单纯的防御。毛泽东的论述为人民军队的防御战术研究奠定了基础。1942年出版的常彦卿翻译的苏联《合同战术》,对防御战术作了详细的论述,对推动防御战术研究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对防御战术的论述多见于指导作战的大量电文,如《关于济南战役的电报》、《关于淮海战役的电报》等,要求在防御作战中加大防御纵深,尤其是重要的防御作战应预先构筑多层坚固的防御阵地,进一步发展了人民解放军的阵地防御战术理论。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志愿军创造性地发展了以坑道为骨干与野战工事相结合的坚固阵地防御战术,强调对空、对坦克防御。研究成果主要反映在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指导抗美援朝战争的大量电文和战后出版的《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总结》之中。

保卫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防御战术研究 保卫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防御战术研究成果主要反映在战斗条令和教材、专著中。60年代初,颁发了第一代战斗条令,明确规范了防御战斗要则、防御战斗样式、组织与实施以及各种地形、气象条件下防御战斗的特点等。70年代,针对作战对象的进攻战斗特点,提出了重点设防、重点守备的防御战斗原则,强调组成有重点的疏散配置的纵深防御,注重打敌飞机、坦克、空降和防原子、化学以及生物武器袭击,加强电子对抗等,丰富了人民解放军的防御战术理论。进入80年代后,着眼军队作战能力的提高和攻防战术的发展,注重建立全纵深、全方位、立体、有重点的稳固的积极防御体系,提出了构成以营防御地域为基础的防区式的纵深、环形的阵地体系,强调充分发挥诸防御要素的整体效力,顽强抗击与灵活的攻势行动相结合,加强防护,保持持续战斗能力,加速了防御战术理论的发展。1999年1月颁发的新一代战斗条令,针对现代条件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新特点,提出了全纵深整体防御的思想和机动防御战斗样式,在防御体系中增加了电子配系,基本打法更加注重防御手段的综合运用,进一步完善了防御战术理论,防御战术研究进入了更高的层次。防御战术研究的主要成果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各类防御战斗教材,《战术学》、《合同战术学》等。

发展趋势 随着军队体制编制和武器装备的发展以及作战形式的变化,防御战术研究将根据作战背景的变化,更加注重防御战斗的任务、时机和运用条件及新型武器装备对防御战斗的影响,将加强对防御战术手段的综合运用,以及协同和各项保障等问题的研究。

参考文献

齐正钧主编:《战术学概论》,北京:解放军出版

社,1986。

大连陆军学院编:《战术学基础》,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

(袁耀)

陆军战术研究 (study of army tactics)

探讨陆军兵团、部队、分队进行战斗的方法的活动。主要包括对陆军进行战斗的基本原则和兵力部署、协同动作、战斗指挥、战斗行动方法以及各种保障措施等进行的研究,是战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末和中华民国时期的陆军战术研究 陆军战术研究,是伴随着陆军战斗的出现而产生,并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战斗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中国清朝末年,陆军战术研究主要是对散兵线战术的研究。到了中华民国时期,随着汽车、装甲车辆和新式火炮等广泛运用于陆上战场,陆军相关兵种陆续建立,产生了陆军兵种战术。战斗中各兵种在统一计划下协调一致地行动成为战斗致胜的关键因素,陆军合同战术的应用与研究应运而生。战术研究的主要成果有:蔡锷的《曾胡治兵语录》、《军事计划》,蒋百里的《孙子新释》、《军事常识》,杨杰的《军事与国防》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陆军战术研究 中国人民解放军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指导、以人民战争为基础、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为基点,通过数以万计的大小战斗实践,逐步研究、总结形成了一整套以灵活机动和英勇顽强为本质特征的陆军战术,使陆军战术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陆军战术研究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采用的基本战术是袭击。陆军战术研究主要是根据游击作战的实际,围绕着袭击而展开的。它为人民战争战术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毛泽东、朱德在领导井冈山地区的武装斗争中,粉碎了

国民党军队多次“进剿”、“会剿”。根据作战实践,1929年,毛泽东、朱德等创造性地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游击战术。它包含了灵活机动的游击行动和能动地夺取战斗胜利的战斗指导规律。从1930年下半年开始,随着红军力量的壮大,作战形式由游击战向游击性运动战转变。1930年,毛泽东、朱德给红一方面军发出了《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敌疲惫而歼灭的命令》,促进了游击战术向游击性的运动战战术发展,指导红军在反“围剿”作战中不断取得胜利。1936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系统地论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有关战术问题,总结概括了集中兵力,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力争主动、力避被动,灵活机动、出敌不意,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等原则。陆军战术研究的主要成果还有:周恩来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朱德的《谈几个战术的基本原则》,刘伯承的《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等。

抗日战争时期的陆军战术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游击队,主要是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反击日伪“扫荡”的基本战术仍然是袭击,陆军战术研究的内容,一是着重袭击战法研究,创造了地雷战、地道战、破袭战等多种战法。1938年,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一文中,详细阐述了袭击战的目的、原则、条件、时间、计划、目标等。二是运动战战术的研究。1935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概括了兵力的分散和集中、分进和合击、攻击和防御、突击和钳制、包围和迂回、前进和后退等战术和方法。战争后期,运动战战术在较大规模的运动进攻和运动防御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发展。陆军战术研究的主要成果还有: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朱德、彭德

怀合著的《抗日的游击战术》,刘伯承的《论游击战与运动战》,陈毅的《坚持江南抗战的诸问题》,邓小平的《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等。

解放战争时期的陆军战术研究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陆军战术研究有了全面的发展。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和人民解放军力量的不断壮大,作战形式由以游击战为主向运动战转变,到战略进攻阶段又向以运动战与阵地战相结合的方向发展,基本战法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在作战实践中,毛泽东提出了指导作战的“十大军事原则”,对战斗形式、战斗方法、战斗准备、战斗作风等问题都作了科学概括。在“十大军事原则”的指导下,人民解放军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广泛开展了战役战斗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并进一步完善了运动防御战术,使运动战战术研究空前发展;同时,城镇攻坚战术、对野战阵地防御之敌进攻战术以及野战阵地防御战术都得到深入研究和广泛运用。此外,随着步兵、炮兵、工程兵、坦克兵等兵种的发展和合同战斗的增多,还开展了陆军诸兵种合同战术研究。陆军战术研究的主要成果有:毛泽东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做好夺取大西北的一切准备》、《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刘伯承的《钜金鱼战役的经验和经过》,邓小平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等。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陆军战术研究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面对现代化的敌人和新的地理环境,在合同战斗实践中,陆军战术研究有了新的发展,无论是集中兵力、选择打击目标、战斗的组织指挥方面,还是夜战、近战,以及防空袭、防坦克、防炮击、防空降、防化学、防细菌和实施工程保障、后勤保障等方面,都有许多的创新和发展。一是丰富了袭击与强攻相结合的进攻战术。战争初期,主要研

究并进行了对临时驻止或仓促转入防御之敌的进攻。在第五次战役后,主要研究了战术小包围、打小歼灭战,以“零敲牛皮糖”的战斗方法,对坚固阵地防御之敌进行了有限目的的进攻战斗。二是研究探索了坚固阵地防御战术,形成了以坑道为骨干与野战工事相结合的坚固阵地防御战斗理论。三是研究探索了防坦克、防空袭和防空降等战斗方法,创造了反坦克网状阵地,粉碎了敌人的“绞杀战”,摸索了反空降战斗的行动方法。陆军战术研究的成果,主要反映在毛泽东、周恩来与彭德怀等指导战争的有关文电和《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总结》之中。

保卫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陆军战术研究
保卫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总结以往战斗经验的基础上,加强了对外国陆军战术的研究和借鉴,注重在继承中求发展,进一步探索了现代陆军战斗的特点和规律,使陆军战术研究进入了更深层次发展的新阶段。特别是在数次边境地区自卫反击作战实践中,探索研究了高寒地、严寒地、热带山岳丛林地等特殊条件下实施陆军合同战斗的战术问题,发展了陆军诸兵种合同战术。60年代后,先后颁发了几代战斗条令、条例和出版了众多战术研究著作,陆军战术研究更加系统、全面。90年代以来,陆军战术研究更加广泛和深入,主要是针对现代战争的特点,深入研究了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陆军合同战斗的特点和规律、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战斗指挥、战斗行动方法等。陆军战术研究的主要成果有:粟裕的《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几个问题的探讨》,军事科学院战役战术研究部的《战术发展新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战术问题研究》、《毛泽东战术思想研究》和《合同战术》等。江泽民1999年1月签署颁发的新一代战斗条令等。

发展趋势 随着武器装备的发展和高新技术局部战争中陆军战斗实践的增多,特别是随着军队指挥自动化系统的运用和电子对抗手段的不断完善,以及直升机和光电等杀伤武器的广泛应用,未来陆军战斗的反应速度更快,打击手段更多,命中精度更高,火力、机动性和突击力更强,立体性更加突出,陆军战斗的方式更加多样化,战斗样式的转换更加频繁、迅速,陆军战术研究将朝着更加注重发展纵深立体攻防战术、陆军航空兵战术、远程奔袭战术、软硬结合杀伤战术、信息对抗战术等新战术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侯善智等著:《毛泽东战术思想研究》,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3。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教育学院编写:《陆军合同战术学》,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胡文龙等编著:《现代军兵种战术》,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

(孙乃祥)

海军战术研究 (study of naval tactics)

探讨海军进行战斗的方法的活动。主要包括对海军战斗性质、特点与基本原则,兵力部署、火力运用、协同动作、战斗指挥、战斗行动的方法及各种保障措施等的研究。按兵种,可区分为对海军合同战术、水面舰艇战术、潜艇战术、海军航空兵战术、海军岸防兵战术、海军陆战队战术的研究;按战斗类型,可区分为对海军进攻战术和海军防御战术的研究。

清末和中华民国时期的海军战术研究
海军战术研究,源于海军战斗的实践,随着海军战斗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清朝末期的海军,主要是学习和研究英国海军的战列线战术和舰艇机动战战术。中华民国时期,国民党海军

的战术研究主要是探索近海、江河封锁和配合陆军作战。主要研究成果有陈绍宽的《海战》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海军战术研究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海军战术研究,是从学习苏联海军战术理论开始的。20世纪50年代以来,紧密结合海军战斗的实践以及战备、训练的经验开展研究,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海军战术。海军战术研究的特点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毛泽东军事思想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源于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战争陆上战斗的丰富经验;以人民军队独具的优越性为基础,继承中国丰富的军事历史遗产,借鉴外军的有益经验;领导机关、院校、科研机构 and 部队相结合,注重吸取全军智慧;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紧密围绕军事斗争需要和海军建设情况,注重创新和发展。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初创时期,海军战术研究的重点是水面舰艇单一兵种的近战、夜战和袭击战,主要是将长期革命战争中陆上战斗的丰富经验移植于海上战斗中。其研究成果对在海军力量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遂行配合陆军解放沿海敌占诸岛屿、万山海战、粉碎敌人对东南沿海地区实施的海上封锁等战斗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海军战术研究的主要成果有:朱德的《建设海军,保卫海防》,萧劲光的《目前海军建设中的几个基本问题》等。

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根据海军各兵种建设的发展和海军担负的登陆与抗登陆、海上封锁与反封锁、海上护航、袭击与反袭扰等任务,海军战术研究基本上是海军各兵种依托岛岸的海上破袭游击战等。在强调近战、夜战和袭击战的同时,注重诸军兵种参加的登陆、抗登陆和争夺局部制海权的海空、水面和水下战术研究。重点研究了海军在配合陆军实施登陆与抗登陆作战以及海军担负海上

护航、海上封锁与反封锁、海上袭击与反袭扰时的各兵种战术及合同战术,并在解放一江山岛、粉碎敌小股匪特窜犯大陆、“八六海战”、崇武以东海战等战斗以及辽东半岛抗登陆等演习中得到检验。1963年颁发的海军战斗条令,集中反映了此阶段海军战术研究的成果。

70~80年代,根据国际战略格局和海军担负作战任务的变化,海军战术研究的重点是以扼守海峡、水道作战为背景的海上游击战、破袭战、反潜作战以及抗登陆、协同陆军坚守岛屿和对陆军濒海翼侧的火力支援等,并在战备、训练活动和西沙自卫反击战的战斗中得到实践。1979年和1989年先后颁发的海军战斗条令,集中反映了此阶段海军战术研究的成果。

9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军事战略的调整,海军加强了以近海积极防御和海上封锁作战为背景的登陆、抗登陆、对敌海上编队和运输队的袭击、对敌基地港口和岸上重要目标的袭击、珊瑚岛礁攻防等海军战术的研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在战备、训练活动和保卫南沙岛礁的实战中得到广泛运用并发挥了重大作用。中央军委于1999年颁发了新一代海军战斗条令,集中反映了此阶段海军战术研究的成果。

发展趋势 随着军事科学技术和海军装备的发展,电子战、信息战和海上超视距精确制导武器对抗在未来海军战斗中的地位将日益上升,海、陆、空、天战场日益融为一体,海军战术与其他军兵种的战术、海军合同战术与海军各兵种战术之间的互相影响和交融,将成为海军战术研究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编:《当代中国海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赵克增著:《海军学术史探要》,北京:海军指挥学院、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出版,1993。

(景继生)

空军战术研究 (study of air force tactics)

探讨空军进行战斗的方法的活动。主要包括对空军战斗的基本原则、兵力部署、战斗指挥、协同动作、战斗行动的方法和各种保障措施等的研究。可区分为空军合同战术研究和空军兵种战术研究等。空军战术研究与空军战役法研究紧密联系,相互促进。其基本任务是通过总结空军战斗的实战经验,揭示空军战斗的特点和规律,从而寻求正确的战斗指导。

中华民国时期空军战术研究 20世纪初,中国陆续创建了北洋南苑航空学校、广东航空学校、东北航空学校,并开展了空军学术研究。1931年,国民党军队成立了中央航空学校,1936年收编了分散的军阀航空队,建立了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空军,其战术研究主要是吸收、消化国外空军的空中侦察、空中格斗和轰炸等战术。主要研究成果有周至柔的《空军之指挥及运用》、《国防与航空》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空军战术研究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空军战术研究始于1949年,并随着空军战斗经验的积累和武器装备的不断创新和发展而发展。人民空军在吸收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紧密联系空中战斗的实践,创造并发展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空军战术理论,使空军战术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

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空军战术研究 抗美援朝战争中,刚组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在学习和研究苏联空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采用的战术的基础上,根据陆军传统的作战经验,提出了“大胆”、“周密准备”、“以少胜多”、“集中兵力,各个歼敌”、“机动灵活”等战

术原则。在世界上首次进行的喷气式歼击机空战中,经过反复战斗实践和群众性战术研究,创造了“一域多层四四制”的机群空战战术原则,对当时的空中战斗和空军战术研究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解放东南沿海岛屿作战中的空军战术研究 在解放东南沿海岛屿作战中,空军参战部队首次参加了陆、海、空军联合作战。空军各参战部队加强了对航空侦察、夺取制空权,保障陆军、海军集结、航渡、突击上陆,以航空火力突击敌水面舰艇和岛上防御设施等方面的研究,均取得了宝贵经验,丰富了空军战术理论。

反侦察和反窜扰作战中的空军战术研究 在反侦察和反窜扰的特种作战中,人民空军根据敌单机、小编队活动,机型频繁变换的特点,以及战斗范围遍及全国,战斗形式复杂多变、战斗保障条件不足等困难,在作战准备、兵力部署、指挥协同、武器装备改进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并创造了昼间对大速度侦察机的负速度差截击,对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的动升限攻击等战术。空军地面防空兵创造和积累了“堵口伏击”、“集火射击”、“近快战法”等经验,不仅击落了近百架敌机,还于1959年开创了世界上首次使用地空导弹击落敌机的先例。

抗美援朝和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的空军战术研究 抗美援朝战争中,空军参战的高射炮兵击落敌机590架,积累了具有现代特点的抗击较大规模空袭作战的经验,对空军防空战术研究起到了较大推动作用。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空军参战部队根据特殊的作战环境,研究了各机种的战术,特别是歼击航空兵使用空空导弹条件下的机动战术,轰炸、强击航空兵突击地面各种目标的战术等,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了空军战术理论。

主要研究成果 随着空军战斗经验的积

累,空军战术研究不断深入,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主要有:50年代出版的《空军抗美援朝作战经验汇集》;60年代编写的歼击航空兵战术、轰炸航空兵战术、强击航空兵战术、高射炮兵战术等教材;80年代出版的《空军参加对越自卫反击作战经验汇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简明战史》、《毛泽东辩证法思想及其在空军作战中的应用》、《几场局部战争中空中力量的运用》;90年代出版的《空军战术学》以及空军战斗条令和空军各兵种战斗条令等。

发展趋势 随着现代军事技术特别是航空技术的发展,空军战斗已成为纵深立体作战的重要组成部分,空军战斗的协同动作更加复杂,指挥方式更加多样,空军战术研究也将进一步深化,空军战斗的基本原则将进一步充实、完善;空军战术理论将更加系统化。

参考文献

林虎主编:《空军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

空军司令部编写:《空军战术学》,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

(杜文龙)

战略导弹部队战术研究 (study of tactics of strategic missile forces)

探讨战略导弹部队、分队进行战斗的方法的活动。主要包括对战略导弹部队、分队战斗的基本原则,战斗指挥,战斗行动方法,行军、输送和宿营,以及战斗保障、后勤保障和装备保障等进行的研究。战略导弹部队战术研究与战略导弹部队战略研究、战役法研究联系紧密,战略导弹部队战略、战役法研究的理论成果对战术研究具有指导作用,战略导弹部队战术研究的理论成果对战略、战役法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导弹部队战术研究起步较晚,但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

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末期~60年代中期) 50年代末期,中国根据国际形势和战备的需要,在坚持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原则基础上,引进了战略导弹技术,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为战术研究奠定了物质基础。60年代中期,战略导弹部队在边组建、边训练的同时,开展战术研究工作。通过战术模拟和实兵试验,并在吸收外军有益经验的基础上,编写出版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导弹战术教材》等战术研究著作。

第二阶段(60年代后期~80年代中期) 随着战略导弹部队建设的不断发展,以及导弹技术的进步和质量提高,先后组织了多次不同规模的战术演习和战术研讨会,系统地总结了训练、演习经验。在此期间,编写、颁发了导弹支队、发射大队、导弹旅发射营等作战条令,以及有关战术研究著作和训练教材等,对导弹武器作战运用的特点,导弹阵地的组成、配置和使用,以及防突袭、核反击和组织与实施各种保障的方法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总结,战略导弹部队战术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三阶段(80年代后期~90年代) 80年代后期,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转变,尤其是高技术兵器广泛运用于战场,对战略导弹部队战术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并为战术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战略导弹部队机关、院校和部队,针对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新特点,在反复进行带战术背景的训练、演习的同时,运用计算机系统进行了模拟、论证,使战略导弹部队战术研究增加了新的内涵,发展和完善了战术理论。主要包括:①创立和发展了战略导弹部队战术理论,为战略导弹部队战术学

在战术学学科中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该学科已列为战术学的二级学科之一。②发展完善了战斗基本原则,注入了新的战术思想,使之更具有自身的特色、时代特征和普遍的指导意义。③发展完善了战斗指挥,使部队、分队的战斗指挥更加适应战斗实际和进一步规范化。④发展完善了战斗样式,使部队、分队可能遂行的战斗任务以及遂行任务的计划组织、行动方法和要求更加明确具体,并能适应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客观需要。⑤发展完善了战斗保障、后勤保障和装备保障,使部队、分队战斗时各种保障的任务、内容、措施和计划组织更加全面、有力。上述成果主要反映在新一代战斗条令中。与此同时,编写出版了战略导弹部队战术学等理论专著,对战斗行动规律和组织与实施的方法,以及战斗指挥和各种保障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战略导弹部队战术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发展,对院校教育、部队作战训练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有力指导。

发展趋势 随着高新技术的不断发展,尤其是隐形导弹武器系统、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全方位全频谱的电子战系统以及太空作战系统等高技术兵器的出现和广泛运用,核威慑与反核威慑、空袭与反空袭、地面袭击与反地面袭击、防核袭击与核反击、电子进攻与电子防御等斗争将十分激烈,并将对战略导弹部队战术研究带来深刻影响。战略导弹部队战术研究将更加注重提高战略导弹部队生存能力、快速反应能力和突防能力的研究;注重机动作战方法、电子斗争的研究;有效运用战斗指挥系统和各种保障系统的研究将更加深入。

参考文献

第二炮兵指挥学院编写:《第二炮兵战术学》,北

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

(霍高珍)

兵种战术研究 (study of arms tactics)

探讨各兵种进行战斗的方法的活动。主要包括对各兵种战斗的本质、行动特点、行动规律、兵种在合同战斗中的地位作用、行动方法,以及各种保障措施等进行的研究。可具体区分为陆军、海军、空军和战略导弹部队的各兵种战术研究。

清末和中华民国时期的兵种战术研究兵种战术研究随着兵种的产生而产生,并随着武器装备的进步和战斗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19世纪下半叶,清朝政府开始尝试改革军制,大量购买西方先进武器装备,并先后编练了新式海军和新式陆军,在学习西方兵种战术的基础上,发展了中国的兵种战术,产生了步兵、骑兵、炮兵、工程兵、水面舰艇等兵种战术。但当时兵种战术研究的专门著作欠缺,仅在有关军事著作中,对兵种战术进行了一些论述。这一时期的主要成果有: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兵略录存》、《训练操法详晰图说》,徐建寅的《兵学新书》,黄兴的《革命的发难方法》,蔡锷的《军事计划》等。20世纪初,中国的兵种战术研究有所发展。1904年,清朝政府决定在全国建立新军,确立中国军队的新式军事教育体制;1905年,组织了著名的河间秋操,兵种战术研究走上了院校教育、部队演练和作战实验相结合发展的道路。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军队相继引进了西方一些先进的武器装备,炮兵实现了间接瞄准射击。20年代,中国成立了歼击机部队,出现了航空兵战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空军参战,发展了航空兵战术。随着兵种的增加和兵种装备改善,兵种战术研究得到较大发展,主要研究成果有:蒋百里的《新兵制与新兵法》、陈绍宽的《海战》、白

崇禧的《全面战术论》、周至柔的《国防与航空》、《空军之指挥及运用》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兵种战术研究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兵种战术研究,是随着有关兵种的建立和武器装备的改善不断发展的。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主要是对步兵、炮兵、工程兵、通信兵战术的研究。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坦克兵、防化兵的组建,开始了对坦克兵、防化兵的战术研究。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首次参战,进行了防空兵战术、航空兵战术研究。保卫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新的兵种逐步产生,武器装备不断发展,编制日趋于合理,兵种战术研究得到迅速发展。50年代以来,兵种战术研究范围不断扩大,内容大大丰富,包括对步兵、装甲兵、炮兵、防空兵、陆军航空兵、工程兵、电子对抗兵、通信兵、防化兵、航空兵、高射炮兵、地空导弹兵、雷达兵、空降兵、水面舰艇部队、潜艇部队、海军航空兵、海军陆战队、海军岸防兵等兵种战术的研究。60年代初,在总结兵种部队战斗经验和训练成果,以及借鉴外军兵种战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经全军兵种部队和军事科研机关的共同努力,中央军委陆续颁发了步兵、装甲兵、炮兵、工程兵、通信兵、铁道兵、防化兵等兵种战斗条令;80年代,又陆续颁发了海军航空兵、潜艇部队、海军陆战队、海军岸防兵、防空兵、空降兵、导弹兵、电子对抗兵等兵种战斗条令,促进了兵种战术研究的深入发展。90年代,尤其是海湾战争后,围绕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这个重点,兵种战术研究进入了向更高层次发展的新阶段,并于1999年颁发了新一代兵种战术条令,其中包括了新编的陆军航空兵战斗条令。与此同时,为了适应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的需要,结合军事科研、部队训练和院校教学,撰写和出版了许多兵种战术研究教材、专著等。如:胡文龙、查金路等

编著的《现代军兵种战术》、炮兵指挥学院编著的《炮兵战术学》、工程兵指挥学院编著的《工程兵战术学》、装甲兵指挥学院编著的《装甲兵战术学》等。

发展趋势 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武器装备的改进和新兵种的产生,兵种战术研究将扩展新的领域,研究内容将有新的发展。主要是:各兵种在高技术武器装备条件下的战术发展和运用问题;战斗兵种之间,战斗兵种和支援、保障兵种之间,跨军种的兵种之间协同作战问题,将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参考文献

胡文龙等著:《现代军兵种战术》,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

高锐主编:《中国军事史略》,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

总参军训部:《战术学基础》,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

(杜立平)

战术研究著作(writings on tactics study)

研究战术问题的专著和论文集、工具书、教材的统称。是对战斗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未来战斗的理论探讨。包括综合性战术研究著作和专题性战术研究著作等。

随着战斗的产生和战术研究的发展,战术研究著作随之出现并不断丰富和发展。19世纪末,清朝政府在继承中国传统战术思想的基础上,开始提出向西方学习,逐步引进了一些先进的武器装备,西方军事著作被大量翻译出版,同时,结合本国实际,编著了一批战术研究著作,如徐建寅的《兵学新书》、徐稚荪的《洋防说略》等。

进入20世纪,战术研究进一步发展,战术研究著作不断编撰和出版,研究成果日益丰富。清朝末期和中华民国前期,主要战术研

究著作有:1901年前后湖北两湖译书学堂编辑出版的《中西武备新书》,汇集了《战法学》和《西洋练兵新书》两部战术研究著作,其中《战法学》是阐述近代兵学理论的军事著作,作者结合当时中国的军备实际,博采东西方战术思想,具有较丰富的理论内容和实用价值。《西洋练兵新书》主要介绍了普法战争时期德军军制、操法和战法。1906年北洋将弁学堂编写的《战法学教科书》,论述了马、步、炮各兵种的战法及合同作战战法,对后勤、训练及不同条件下的战斗也多有论述,反映了当时世界各国战术研究的流行观点。中华民国时期,主要战术研究著作有:蒋百里编写的《新兵制与新兵法》,白崇禧编写的《全面战术论》、《游击战纲要》以及陈绍宽编写的《海战》等,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战术研究成果。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术研究著作,是在历次革命战争的作战实践中产生、创新和不断丰富发展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军事家,注重继承中国古代兵法的精髓,坚持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相结合,撰写了大量战术研究著作,主要有: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周恩来的《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等;朱德的《谈几个战术的基本原则》、《论抗日游击战争》等;刘伯承的《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敌后抗战的战术问题》、《论游击战与运动战》等;陈毅的《我们应采取的战略战术方针》等。上述著作既是战略研究的经典之作,也是战术研究的经典之作,系统地论述了战斗的目的、本质、规律以及组织实施等理论问题,奠定了人民解放军战术理论的基础。

保卫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总结以往作战经验的基础上,加强了外军战术研究,注重在继承中求发展,结合抗美援朝战争和多次边境地区自卫反击作战中的战斗实践,进一步探索现代战斗的特点和规律,先后颁发了几代战斗条令、条例,撰写出版了众多战术研究著作。特别是90年代初的海湾战争后,突出了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战术研究,并于1999年1月由江泽民签署颁发了新一代战斗条令。这一时期战术研究著作主要有:粟裕的《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几个问题的探讨》,陆军指挥学院的《合同战术学》,军事教育学院的《陆军合同战术学》,海军指挥学院的《海军战术学》,空军的《空军战术学》,侯善智、王仰贤等的《毛泽东战术思想研究》,郝子周等的《战术发展新探》,军事科学院战役战术研究部的《直升机战术与反直升机战术》和《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战术问题研究》,王东生、黄培义的《战术的哲学基础》等。

(陈大利)

军队指挥学研究

(study of science of military command)

探讨军队指挥规律和方法的活动。是军事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对象主要是军队作战指挥,同时也包括军队防暴、抢险救灾等非作战行动指挥。研究内容主要是:军队指挥基本理论,主要包括军队指挥的基本概念、历史发展、指挥要素、指挥规律、指挥原则、指挥艺术等;军队指挥系统,主要包括指挥人员、指挥机构、指挥手段等;军队指挥活动,主要包括掌握情况、运筹决策、计划组织、控制协调,以及军队指挥方式、指挥保障和指挥效能评估等。目的是:对作战指挥和其他行动指挥的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概括,用以指导军队指挥建设和指挥实践,提

高指挥效能等。

在中国,千百年来兵法典籍的许多内容,都着力研究探讨军队指挥的规律与方法。清朝末期和中华民国时期,在传播西方资产阶级军队指挥理论中,先后翻译了《高等帅兵学》、《军队指挥》、《新军队指挥》、《大军指挥》、《空军之指挥及运用》等反映军队指挥理论的译著与专著。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队指挥理论研究,具体分为以下两个历史时期:

革命战争时期的军队指挥理论研究 中国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军事家在长期革命战争实践中撰写的大量军事著作,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许多内容也是研究军队指挥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诸如指挥者如何认识与把握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正确解决主客观之间的矛盾,实现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相符合;在一定客观物质条件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把握敌对双方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规律,从中寻求制胜之策;关照全局,把握关节,等等。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军队指挥理论研究 具体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总结历史经验阶段(50~70年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战争时期军队指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针对未来反侵略战争的特点,探索了现代战争军队指挥的特点和规律,总结出了一整套军队指挥的原则、基本内容、程序与方法。这些成就,均为军队指挥学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全面系统研究阶段(80年代) 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队指挥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

理论范畴,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人们经过长期的战争和建设实践,越来越认识到军队指挥理论研究的重要性,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适应现代条件下军队指挥的需要。同时,外国军队指挥理论的发展,特别是80年代初原苏联军事科学博士P.K.阿尔图霍夫上将主编的《军队指挥理论基础》一书的出版和原苏军军队指挥学的建立,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队指挥学的产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并起着催生和推动作用。在80年代初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时,军队指挥学被设置为中国军事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1986年10月,国家教委在审查军事科学学科体系时,批准军队指挥学作为军事科学的分支学科。1987年,军队指挥学及其相关内容的条目被收入《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学术》编纂框架之中,促进了军队指挥学的研究和发展。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从事军队指挥研究、教学的专业队伍逐步建立起来,寓于古代兵书战策和军事典籍中零散的军队指挥理论得到初步整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指挥艺术和指挥经验得到较为系统的总结,军队指挥领域中的各种现实问题不断从理论上得到回答,相当数量的外军指挥理论著作及指挥法规相继翻译出版,阐述军队指挥问题的一系列理论专著问世;军队各级指挥院校先后开设了合成军队指挥学、各军兵种指挥学等专业课程,并培养了大量军队指挥学研究生。这一时期军队指挥理论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80年代初,由南京陆军指挥学院袁俊主持编著的《合成军队指挥学》于1986年正式出版。1989年出版的由国防大学于海涛主编的《军队指挥学》,是较全面、系统地论述军队指挥基本理论的专著。1989年8月,又出版了由石家庄军事教育学院薛连璧主编的《军队指挥学基础》一书,是比较通俗的指挥理论读物。这一时期

出版的指挥理论专著,主要探讨了军队指挥的概念、特点、历史发展、规律、原则,建立军队指挥系统的原则和方法,军队指挥活动的内容和方法,以及军队指挥艺术、指挥效能评估等基本理论问题。这些都对军队指挥理论的普及提高,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军队指挥学研究的全面展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深入研究发展阶段(90年代) 9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军队指挥学研究全面展开,并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主要标志是出版了相当数量的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理论专著,编撰出版了一些权威性的辞书,军(兵)种指挥学、后勤指挥学等理论专著也相继问世,还有大量军队指挥学研究成果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同时,在学科理论建设上,初步明确军队指挥学以作战指挥学为基础学科,并于1994年和1995年出版了陆军参谋学院王光宙主编的《作战指挥学》和国防大学杨金华、黄彬主编的《作战指挥概论》。两书都具体研究了作战指挥的概念、实质和特征,作战指挥规律、原则和艺术,作战指挥系统、作战指挥环境,作战指挥活动、作战指挥效能评估等等。

90年代后期,军队指挥学研究以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作战指挥和联合作战指挥为重点,得到了全面、深入的发展,并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就。主要标志是,在继续完善军队指挥学研究的同时,侧重研究了作战指挥学,出版了大量作战指挥方面的理论专著,特别是有关作战指挥方面的一些理论成果实现了法规化,如新一代司令部条例、联合战役纲要、合成军队战斗概则等作战法规,都是以一个时期以来军队指挥特别是作战指挥理论成果为基础,对有关作战指挥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规范。同时,有关联合作战指挥的论著,如汪江淮、卢利华

主编的《联合战役作战指挥》等相继出版,用于联合作战指挥的指挥自动化系统的研究也相继展开,并开始了建构联合作战指挥体系的研讨和试验,全军掀起了第三个军队指挥理论研究热潮。

发展趋势 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在新时期军队建设和打赢高技术局部战争的大背景下,军队指挥学研究将不断充实和完善学科理论体系;更加深刻地揭示新时期军队建设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军队指挥的本质和规律;不断研究和探索新情况、新特点、新问题,提出加强军队指挥建设、改进军队指挥的有效途径和措施;广泛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拓宽军队指挥学的研究领域,创新研究方法,不断增大军队指挥的高科技含量。

参考文献

全军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军事学研究回顾与展望》,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

(张世平)

作战指挥理论研究 (study of operations command theory)

探讨作战指挥问题系统化理性认识的活动。军队指挥理论研究的主要组成部分,对作战指挥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清末和中华民国时期的作战指挥理论研究 作战指挥理论研究,是由军队指挥的出现而产生,并随着科学技术和作战指挥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清朝末期和中华民国时期,由于受西方国家的影响,德、美等国军队的作战指挥理论开始在中国传播,军事学校开设了军队指挥理论和作战原则及阵中勤务理论相融合的教学课程,使作战指挥理论成为军事教学与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一时期,作战指挥理论研究主要以研究、传播西方

资产阶级军队作战指挥理论为特征,编著有《高等帅兵学》一书,主要包括战争指导、指挥机构、指挥活动及司令部业务等内容。还先后翻译、编撰了诸如《大军统帅学》、《统帅纲领》、《军队指挥》、《新军队指挥》、《大军指挥》以及《军队指挥纲要草案》等反映作战指挥理论的译著、专著及纲要,对推动当时的作战指挥理论的发展和指导作战实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指挥理论研究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指挥理论研究是与
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其理论
研究的发展过程大体经历了战争实践与作战
指挥理论结合研究、作战指挥理论与作战理
论结合研究、作战指挥理论独立研究三个历
史时期。

作战指挥理论与战争实践结合研究时期
1927年南昌起义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立前的中国革命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
军作战指挥理论研究,主要是由以毛泽东为
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在
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
理论为指导,紧密结合土地革命战争、抗日
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作战指挥实践而进行的。
这一时期,着重研究探讨了诸如如何深化对
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的认识,并运用这
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解决主客观之间的矛
盾,做到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相符合;在客
观物质条件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
用,把胜利的可能变为现实;把握敌对双方
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辩证规
律,并从中寻求制胜之策,促使敌优我劣
向我优敌劣的方向转化;关照全局,掌握
关节,从战略的高度指挥战役,从战役的
高度指挥战斗,解决作战指挥理论与实践
问题。其研究成果主要散见于毛泽东等老
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的有关军事
论著、文章、谈话和电报之中。

作战指挥理论与作战理论结合研究时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至1986年
军队指挥学学科建立前,作战指挥理论研
究主要与作战理论研究融合在一起,在全
面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战争时期作战指
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紧密结合抗美援朝
战争、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和部队演习训
练的实践,针对未来反侵略战争的特点,
探索现代战争作战指挥的特点和规律,
总结概括出一套诸军兵种合同作战指
挥的原则、基本内容、程序与方法。其
主要内容包括:提出了知彼知己、不失
时机、协同一致、统一集中、照顾全
局、掌握关节,坚定、迅速、灵活、隐
蔽和不间断指挥,主观指导符合客观
实际等作战指挥的原则和要求;定下
决心和组织实现决心为计划组织作
战的基本内容;了解任务,判断情况,
定下决心,下达作战命令,计划组织
火力,组织协同动作,组织各种保障,
对所属部队的作战准备进行督促、
检查为作战指挥的基本程序;此外,
还强调要充分发挥司令部组织指挥
的作用,指挥员应及时将自己的意图、
决心告知参谋长和司令部,听取其
建议,并通过司令部组织指挥作战。
上述作战指挥理论研究成果,主要
反映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颁发的
三代作战条令和司令部工作条例
以及相关教材之中。它标志着军队
作战指挥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与
作战理论结合研究与发展的历史
阶段。

作战指挥理论独立研究时期
1986年军队指挥学学科建立以来,是
作战指挥理论研究全面深入发展时
期。为适应现代条件下军队指挥理
论研究的需要,1986年10月,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军队指挥学
为军事学的一级学科,作战指挥
学又为军队指挥学的二级主体学
科。作战指挥学学科地位的确定,
是作战指挥理论研究发展史上的
一个新的里程碑。此后,在有关科
研机构和指挥院校中分别

成立了军队指挥理论的专门研究机构和教学机构,作战指挥理论研究全面展开,并初步建立起作战指挥学学科的理论体系。这一时期,主要探讨了作战指挥的特点、规律、原则、发展趋势,建立作战指挥系统的原则和方法,作战指挥活动的内容和方法,以及作战指挥艺术、效能评估、指挥对抗等基本理论问题;同时,依据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对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作战指挥理论,特别是诸军种联合作战指挥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相继出版了一大批作战指挥理论专著,编修并颁发了有关的条令条例。主要的理论专著和条令条例有:由刘雷波、冀廷宇、王剑忠主编的《合同作战指挥概论》;由王光宙主编的《作战指挥学》;由杨金华、黄彬主编的《作战指挥概论》;由张世平编著的《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作战指挥若干问题研究》;由赵捷、罗雪山编著的《军队指挥自动化》;由军委总部颁发的新一代作战条令、司令部工作条例等。此外,有关科研机构和指挥院校开始招收作战指挥学专业硕士、博士研究生,有12个单位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一个单位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这些都标志着作战指挥理论研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发展趋势 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了适应打赢高技术局部战争的需要,未来作战指挥理论研究将以联合作战指挥为重点,以信息作战指挥为核心,研究高技术条件下的作战指挥规律、原则和指挥活动的内容与方法,提出改进指挥方式、指挥手段和组织指挥对抗等的有效途径和措施。同时,作战指挥学学科理论研究将进一步深化,内容将更加丰富,学科体系和理论体系将更加完善。

参考文献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役战术研究部:

《作战指挥学教程》,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9。

(张忠泽)

联合作战指挥理论研究 (study of joint operations command theory)

探讨联合作战指挥问题理性认识的活动。主要内容包括联合作战指挥的特点、规律、原则,以及联合作战指挥的体制、形式、手段和程序、内容、方法等问题的研究。

联合作战指挥理论研究,随着联合作战的出现而产生,并随着军事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联合作战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联合作战指挥理论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50~70年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有了联合作战的实践,并逐步开展了对联合作战指挥理论的研究。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联合作战实践活动增多,不仅举行了不同军兵种、不同建制单位共同参加的联合作战,而且成功地进行了两个国家军队的联合作战(美军称“联军作战”),并于1950年12月上旬,经中朝两国领导人商定成立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简称“中朝联合司令部”,亦称“联合指挥部”)。凡属作战范围及前线一切活动,统一由联合司令部指挥。1950年11月,全军军事训练的基本方针中,正式使用了“联合作战”一词。1953年12月7日至1954年1月26日,召开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系统地提出了研究诸军兵种联合作战指挥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1955年1月18日至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首次组织实施了一江山岛登陆作战,使人民解放军联合作战的实践,由两个以上不同建制的战役军团、兵团联合进行,发展为诸军兵种战役军团、兵团联合进行,同时,也使联合作战指挥的理论进一步发

展。以1955年11月举行的辽东半岛诸军兵种抗登陆战役演习为标志的不同类型的联合演习,从各个不同角度,深入研究了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组织指挥问题,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诸军兵种联合作战指挥的理论。1958年3月,叶剑英元帅在军事科学院成立大会上,号召军事科学研究人员系统研究诸军兵种联合作战指挥问题。此后,全军部队结合诸军兵种联合作战和联合演习的实践,深入地研究了诸军兵种联合作战指挥的理论问题,并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有关联合作战的演习资料、会议文件以及中央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有关诸军兵种联合(合同)作战(战备)的文电之中。

第二阶段(80年代) 为探讨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的作战问题,北京军区于1981年在华北举行了陆空联合作战演习,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联合作战及指挥理论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邓小平十分注重联合作战及其指挥理论研究,曾多次指出,要认真研究诸军兵种联合作战怎样指挥的问题。为贯彻邓小平这一指示精神,全军掀起了联合作战指挥理论的研究热潮,并取得了重大的研究成果。1987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大量联合作战实践的基础上,将联合战役的形式以及联合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等,正式载入战役学纲要。1988年,总参谋部军训部颁发的《战役学教程》对联合战役包括登陆战役、抗登陆战役、防空战役以及空降战役的组织指挥问题进行了阐述。

第三阶段(90年代) 90年代初,以海湾战争为契机,全军逐步展开了对联合作战及其指挥问题的研究。1993年初,中央军委重新确立了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提出把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上,以此为契机,

全军各大单位进一步掀起了研究联合作战理论的热潮,深入细致地研究了诸军兵种联合作战指挥理论。一批颇具学术价值的联合作战指挥理论专著相继出版,如黄彬主编的《陆海空军高技术条件下作战指挥》(1993)、汪江淮等主编的《联合战役作战指挥》(1999)、周晓宇等编著的《联合作战新论》(2000)等,对联合作战指挥进行了系统的理论阐述,内容涉及联合作战(联合战役)指挥的概念及特点、产生与发展,作战指挥原则、指挥机构、指挥关系,作战情报、决策、计划、控制,指挥手段、指挥方式和指挥保障等一系列重要问题。1996年10月在济南召开了全军“联合作战理论研讨会”。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在深入研究联合战役指挥理论的基础上,为军队指挥学研究生开设了联合战役指挥理论研究方向。1999年1月23日,中央军委江泽民主席签署命令,颁发施行的联合战役纲要,规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合战役的组织指挥问题,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合作战指挥理论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发展趋势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联合作战指挥理论研究,将注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进一步揭示联合作战指挥的规律,加强对外军联合作战指挥理论的研究,紧密结合联合作战实践,在继承中求发展,使联合作战指挥理论研究进入更深层次发展的新阶段。

参考文献

- 黄彬主编:《陆海空军高技术条件下作战指挥》,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3。
汪江淮、卢利华主编:《联合战役作战指挥》,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9。
周晓宇、彭希文、安卫平著:《联合作战新论》,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

(张培高)

海军作战指挥理论研究 (study of naval operations command theory)

探讨海军作战指挥问题理性认识的活动。是军队作战指挥理论研究和海军作战理论研究的组成部分。海军作战指挥理论研究,对于海军作战指挥从经验走向科学,提高海军作战指挥决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确保海军作战指挥的高效和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海军指挥自动化系统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对海军作战指挥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清末和中华民国时期的海军作战指挥理论研究 20 世纪的最初十年,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的清朝海军一蹶不振,理论研究停滞不前。中华民国接收清朝舰队成立海军后,在抗日战争中进行了上海、江阴等一系列战役战斗,给予日本海军以有力打击,配合了陆军作战。此时,也出现了一些海军作战指挥理论的研究成果。具有代表性的是 1934 年 7 月和 1943 年 7 月陈绍宽发表于《海军杂志》上的《海战》、《抗战六年来的海军》等文章。其中,《海战》一文提出了保持目标、攻击、奇袭、集中、调节兵力、防卫、活动力、合作等海军作战原则,并论述了军舰攻击、封锁、护送、运输等行动的指挥。这在中华民国海军作战指挥理论中具有重要地位。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海军作战指挥理论研究 大致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50~70 年代) 这一阶段,海军作战指挥没有形成单独的学科,其理论研究主要和作战理论研究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 1963、1979 年所颁发的战斗条令以及有关学术专著、文章中,主要研究了海军作战指挥的原则、组织协同动作、组织通信联络保障、战斗中指挥,以及战时司令部工作等问题。

第二阶段(80 年代) 80 年代,海军作战

指挥理论研究进入繁荣时期。其主要特点是:①以海军作战指挥理论为重点内容的海军指挥学成为独立学科,学科内容体系逐步完善。②以组织指挥作战为主要内容的司令部工作理论研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③海军指挥自动化理论研究逐步展开,丰富了作战指挥理论的内容。④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中海军作战指挥成为作战指挥理论研究的新课题。主要研究成果是 1981 年颁发的海军司令部工作条例和 1987 年高纪玺、欧阳晋等编著的《海军指挥学》教材。后者以海军作战指挥理论为核心内容,提出了海军指挥学的理论体系,是海军作战指挥理论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主要内容包括:海军指挥的基本概念、历史发展、指挥原理、指挥规律和原则、指挥系统、指挥活动决策、计划组织与指挥协调控制、指挥效能评估等理论。

第三阶段(90 年代) 90 年代以来,海军作战指挥理论又有了新的发展,其主要研究成果体现在 1991、1997 年颁发的海军若干本司令部工作条例和 1999 年颁发的若干本作战条令以及 1992 年吴章燧等编著出版的《海军指挥学》专著之中。20 世纪末颁发的这些作战法规,完善了海军作战法规体系,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战略方针调整后海军作战指挥理论研究的总结,为 21 世纪初海军的作战及作战指挥提供了行动依据。

发展趋势 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技术群在战争中的广泛应用,使海军作战指挥理论研究面临新的挑战,也带来新的机遇。海军作战指挥理论研究,将重点围绕信息时代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中海军作战指挥的原理、规律和原则,组织信息作战、夺取和保持信息优势的方法,诸军种联合作战中的海军组织指挥的原则和方法,以及以电子信息系统为核心的指挥手段的发展与运用等新课题而展开,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学科内容,形成能

够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海军作战指挥理论。

参考文献

高纪玺、欧阳晋编著：《海军指挥学》，南京：海军指挥学院，1987。

吴章燧等编著：《海军指挥学》，北京：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1993。

(张异凡)

空军作战指挥理论研究 (study of air force operations command theory)

探讨空军作战指挥问题理性认识的活动。是军队作战指挥理论研究和空军作战理论研究的组成部分，对空军作战指挥和实践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中华民国时期空军作战指挥理论研究中国的空军作战指挥理论研究始于20世纪初。中华民国自1928年建立空军以后，出于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的需要，在学习、借鉴外国空军作战指挥理论和总结自己建军和空战指挥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空军作战指挥理论进行了有组织的系统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理论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主要体现在这一时期出版的空军有关理论著作、条令条例和学术文章中。有代表性的主要有《空军要论》、《空军学》、《独立空军战术》、《空军战术》以及《空军法规汇编》等。这些论著和法规，论述了空军作战指挥的原则、程序和方法，规定了空军作战指挥的组织体制、机构及其任务，提出了空军各兵种以及空军与其他军兵种协同作战的组织指挥等问题。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作战指挥理论研究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建立之日起，其作战指挥理论的研究是在不断总结空军作战指挥实践经验，有选择地借鉴外军作战指挥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经历了从研究

指挥单一机种作战到研究指挥多机种作战，从研究指挥航空兵作战到研究指挥航空兵、地空导弹兵、高射炮兵、空降兵、雷达兵合同作战，从研究指挥防空作战到研究指挥空中进攻作战，从研究指挥昼间作战到研究指挥昼夜作战，从研究本军种作战指挥到研究与其他军兵种合同作战、联合作战指挥的发展过程，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空军作战指挥理论研究特色。

第一阶段(50~60年代) 人民空军创建初期的作战指挥理论研究，主要是为了满足实战需要而开展的。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是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传统的作战指挥经验，针对作战对象的特点，紧密结合当时的作战实践来进行的，具有边打、边建、边总结、边研究的特点。同时，汲取了苏联空军作战指挥理论研究的有益成果。经过抗美援朝战争、国土防空作战和多年的训练实践，人民空军取得了丰富的作战指挥经验，总结概括出一些行之有效的空军作战指挥原则和方式方法。主要包括：在作战力量运用上提出了“积蓄力量，选择时机，集中使用”的原则；在作战指导上提出了“先打单机、掉队之敌，后打编队之敌；先打小编队之敌，后打大编队之敌；先单一机种作战，后尝试多机种合同作战；先打小仗，后打大仗；先在昼间简单气象条件下作战，后在昼间云底较高的复杂条件和夜间简单气象条件下作战”的方针；围绕“一域多层四四制”空战战术原则，总结出实施空中指挥和对空指挥的方法；在指挥方式上，提出了集中指挥和分散指挥、地面指挥与空中指挥相结合这一贯彻统一指挥原则的有效形式；另外，在计划组织、协同动作、组织保障等方面也都总结出了一套宝贵的经验。截至1966年，人民空军先后颁发各种条令、条例和编写教材306本，空军作战指挥理论研究方面的成果均融入了这些条令、条例和教材之中，标

标志着人民空军作战指挥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系统、全面、深入、配套的新阶段。

第二阶段(70年代) 70年代,人民空军的主要任务是防备敌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特别是防备来自空中的突然袭击。这一时期空军作战指挥理论研究主要以防空作战指挥为主,着重研究了大规模反侵略战争初期抗击敌空袭、夺取制空权和协同陆、海军作战的指挥问题,取得了一系列适应防空作战指挥需要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提出了“一员挂帅,三员协同”、“三人对六面”、“专责制”、“一号班”等行之有效的作战指挥制度,规定了空炮协同的基本原则,创造了“以快制快”、“负速度差截击”、“近快战法”、“机动设伏”等不同条件下的作战指挥方法,使空军作战指挥理论得到了充实、更新和深化。

第三阶段(80~90年代) 随着中央军委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的确定,空军作战指挥理论研究紧紧围绕立足现有装备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这个主题展开,通过对近期发生的几场高技术局部战争的分析研究,深入探讨了现代空军作战指挥的新情况、新特点和方式方法。同时,结合人民空军的具体情况,以可能发生的局部战争为背景,重点研究了未来高技术条件下联合作战中空军作战指挥问题,特别是研究了反空袭作战、夺取制空权和制信息权以及协同陆、海军作战的组织指挥问题,探索了使用精确制导武器、隐形兵器、新概念武器等高科技武器装备的作战指挥问题等。这一时期是空军作战指挥理论研究较为活跃的时期,大量采用了作战模拟、军事运筹、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先进的科学原理和方法,首次提出了“空中进攻战役”指挥理论,强调了打击敌战役纵深的作战指挥;较系统地提出了整体作战、空地(海)一体作战的指挥理论,强调发挥整体威力,以合同(联合)作战的胜利为

胜利;提出了“整体抗击、积极反击、严密防护”三位一体的防空作战指导思想;提出了充分利用指挥自动化手段,加强预警探测、指挥控制,特别重视指挥系统对抗,保持指挥的稳定和不间断的理论;提出了与海军航空兵、陆军航空兵等空中作战力量协同作战以及在预警探测、信息作战、电子对抗、联勤保障等方面与诸军兵种协同的指挥理论等。同时,对空军作战指挥的规律、特点、原则、要素、指挥体制、方法、指挥效能评估等基本理论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一时期,先后编修、颁发了空军作战、空军司令部工作等条令、条例,基本形成了新的空军作战条令体系;先后编写出版了《空军作战研究》、《空军作战指挥》、《高技术条件下的空军战役指挥》、《空军作战指挥基础理论》、《空军司令机关概论》、《几次局部战争中空中力量运用》、《空军作战指挥学》、《现代条件下航空兵作战组织指挥》、《现代空军指挥控制研究》等一大批理论专著和学术文章。这些研究成果的相继出现,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空军作战指挥理论研究,更加系统、全面和深入,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

发展趋势 为了适应未来作战的需要和武器装备的发展,空军作战指挥理论研究将以高技术条件下空军作战指挥为主线,以联合作战中的空军作战指挥为重点,注重研究大气层空间与太空军事活动的对抗与组织指挥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同时,随着空军指挥学正式被列为军队指挥学的二级学科,空军作战指挥理论研究将随着空军的发展和作战样式的变化,不断丰富、完善其内容,拓宽其领域,改进研究方法,向更加系统、更加深入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华人杰等主编:《空军学术思想史》,北京:解放

军出版社,1992。

李树山主编:《世界空军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

(李永贤 周 军)

战略导弹部队作战指挥理论研究

(study of operations command theory of strategic missile forces)

探讨战略导弹部队作战指挥问题理性认识的活动。是军队作战指挥理论研究和战略导弹部队作战理论研究的组成部分,对战略导弹部队作战指挥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导弹部队作战指挥理论研究,是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的,大体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50年代末期~70年代中期)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导弹部队自创建之日起,就开始了作战指挥理论的研究。但由于当时既没有实践经验,也没有大规模演习的经验,致使这一时期的研究还很肤浅,主要是在继承中国人民解放军传统组织指挥作战方式的基础上,通过学习和借鉴苏军导弹部队的组织指挥经验和结合执行导弹试验发射任务,探讨战略导弹部队的组织指挥特点、程序、内容与方法等问题,其理论研究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

第二阶段(70年代后期~80年代初期) 从70年代后期起,战略导弹部队作战指挥理论研究进入了深入发展阶段。随着导弹武器逐步装备部队,战略导弹部队的作战演练开始由低向较高层次发展,先后组织了多次不同类型、不同规模、不同背景条件下的战役战术演习和实弹发射,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组织指挥经验。战略导弹部队多次召开作战运用研究会,对作战指导思想、指挥体制等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取得了一批较有分量的学术成

果,为发展战略导弹部队的作战指挥理论奠定了基础。80年代初期,聂荣臻为战略导弹部队题词:“加强现代战争研究,攀登军事科学高峰”,进一步推动了战略导弹部队对组织指挥防突袭、组织指挥处置遭袭后果和组织指挥核反击作战等问题的研究。战略导弹部队相继编写和颁发了作战纲要、作战概则、司令部工作条例以及《第二炮兵战役学》等反映作战指挥理论的条令条例和理论专著。这些法规和理论专著,对作战指挥的原则和要求、指挥体制、指挥权限、指挥方式等问题分别进行了理论阐述与规范,从而使战略导弹部队的作战指挥理论研究有了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但这一时期对战略导弹部队作战指挥理论的研究,主要是与战役战术理论研究结合在一起进行。

第三阶段(80年代中期~90年代) 8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队指挥学学科的建立,战略导弹部队在以往作战指挥理论研究积累的基础上,也建立了作战指挥学学科,将战略导弹部队作战指挥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理论范畴,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同时开始了战略导弹部队高层次的作战指挥理论研究人才培养教育。自此,战略导弹部队作战指挥理论研究进入了深入发展阶段,涉及作战指挥领域各个方面的研究成果也相继出版和发表。《战略导弹部队指挥学》、《战略导弹部队自动化指挥》等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专著,对战略导弹部队作战指挥的特点、指挥原则、指挥规律、指挥环境、指挥活动、指挥系统、指挥艺术、指挥效能评估、指挥自动化和司令部工作与建设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与阐述,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导弹部队作战指挥理论体系已基本形成。

发展趋势 为了适应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和未来作战任务的需要,战略导弹部队作战指挥理论研究将围绕更加注重联合作战中

的战略导弹部队作战指挥,高技术条件下战略导弹部队作战指挥的特色和规律,战略导弹部队信息作战指挥和作战指挥对抗等问题深入展开。

参考文献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下)第17章第4节,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

(夏文军)

司令部工作研究 (study of headquarters work)

探讨军队司令部辅助首长在作战、战备、军事训练、行政管理,战争动员与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军事科研等方面组织领导工作的活动。主要包括组织领导活动的原则、内容程序、方式方法、制度作风等的研究。

司令部工作研究随着司令部的出现而产生,并随着军事技术进步和军队军事工作的发展而发展。20世纪20年代初,中华民国学习西方国家在军队中采取司令部组织形式。早期司令部工作研究主要是探索司令部工作职责和业务技能。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司令部工作研究是紧密结合中国革命战争实践和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进行的。具有自身的特点,即以马列主义、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导,以发挥人民军队独具的优越性为基础,以增强司令部组织指挥作战能力与指导部队军事建设能力为着眼点,以提高司令部工作效率为中心,立足司令部工作实践,借鉴外军有益成果,不断创新和发展。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司令部工作研究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处于初创阶段的红军司令部,一方面要组织红军反敌“围剿”、“进剿”,另一方面要加强自身建设。其司令部工

作研究,为建立新型的人民军队司令部奠定了基础。1929年,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指出,司令部的责任是帮助地方武装之平时的军事训练及战时的作战指挥,红军的军事机关与政治机关,在前委指导之下,平行地执行工作,凡给养、卫生、行军、作战、宿营等,政治系统应接受军事系统之指挥。1935年9月,刘伯承在《〈苏军司令部野外勤务教令〉译者前言》中提出,司令部就是首长实行指挥军队的指挥机关,司令部应根据首长的决心组织作战,明确了司令部的地位、作用及工作基本原则,从而为司令部有效地开展工作创造了条件。司令部工作研究的成果还有1930年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编制(草案)》等。

抗日战争时期的司令部工作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司令部工作研究有较大的发展。1939年,八路军、新四军先后召开了参谋工作会议,研究加强司令部工作的措施。1940年颁布了全军第一代《八路军各级司令部(军、师、旅、团)暂行工作条例(草案)》,明确了司令部的使命、工作职责、内部分工和工作制度,使司令部工作在规范化、制度化方面迈出了一大步。战时司令部工作研究取得重大进展。1940年4月,粟裕在《关于组织战斗》的讲话提纲中,系统提出司令部组织作战的基本程序。即“明确任务、了解意图;进行战争动员;组织侦察,制定作战方案,组织战时与战后勤务。”尔后,又提出了司令部的工作作风和标准,即“计划性、组织性、实际性、具体性、深入性、经常性、机警紧张精细、英勇果毅”。1941年,邓小平提出司令部工作要面向部队、面向基层、一切为了提高部队战斗力的工作方向,对做好抗日战争中司令部工作,发挥司令部作用,夺取抗日战争胜利产生了重要影响。司令部工作研究成果还有:张云逸1938年的《参谋工作建设》的报告,粟

裕 1940 年在苏北指挥部作的《战时参谋工作》的讲话,左权 1941 年《关于健全司令部工作与组织》的报告,等等。

解放战争时期的司令部工作研究 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战时司令部工作研究进一步深入发展。①提出了快速、准确、严密、细致、主动、灵活、善于预见的司令部工作原则。②总结出比较完善的战时司令部工作程序与内容。③摸索出各种野战指挥机构的结构模式和开设、转移的组织方法。④探索了大兵团协同作战的计划组织工作,提出以组织总前委和联合指挥机构、诸兵种联合办公、互派联络参谋、组织协同的方法。⑤总结出利用作战间隙,组织部队整训的经验。这些,为司令部适应解放战争作战指挥的需要,保证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司令部工作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 1949 年各野战军《司令部工作综合报告》中。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司令部工作研究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面对现代化强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时司令部工作研究取得了极为丰富的成果。①探索出司令部组织防空、步坦、步炮等协同作战以及海岸防御、反空袭、反空降等作战的组织指挥内容、程序和方法。摸索了防化学、防细菌等作战保障的组织方法。研究出保障指挥所安全和指挥不间断的措施。②战时后勤司令部工作方面,掌握了在敌实施后方火力封锁情况下后勤保障和后方防卫的组织方法。③空军战时司令部工作方面,提出了组织计划航空兵作战的内容、程序与方法。司令部工作研究的成果主要反映在志愿军各参战部队的《司令部工作总结》中。

保卫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司令部工作研究 保卫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司令部工作研究全面发展。1952 年,毛泽东指出:为了组织这种复杂的、高度机械化的、现代战役和战斗,非有健全的、具有头脑

作用的、富于科学的组织与分工的司令部机关不可。在加强司令部建设,提高司令部组织现代作战能力的同时,平时司令部工作研究,摸索出一套战备、训练、行政管理、战争动员和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军事科研,防暴与抢险救灾等计划组织工作的内容、程序和方法,探索了依法治训、依法治军、严格训练、严格管理的措施。司令部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标准化研究取得极大成效,颁发了两代司令部工作条例,完善了诸军兵种司令部工作的要求。对司令部工作效率的研究取得突破,创造了统筹法、网络图法、跳跃法等现代工作方法,使司令部工作更加科学化。现代条件下战时司令部工作研究更加深入,提出了组织指挥自动化系统的建立、运行、管理的司令部工作规范;探索了组织联合作战指挥机构的模式、人员编成、工作内容和开设、转移、接替、恢复的措施;探讨了指挥对抗和指挥保障的方法。司令部工作研究的成果主要有:叶剑英 1963 年 1 月关于《加强司令部的建设,充分发挥司令部的作用》的讲话、1982 年 12 月《关于召开全军参谋长会议的谈话》;1981 年和 1996 年颁发的两代司令部工作条例;1983 年杨得志《关于司令部建设问题》的讲话;等等。

发展趋势 随着军事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军队军事工作的发展,战时司令部工作研究将注重解决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中司令部工作的计划与组织,特别是解决诸军兵种联合(合同)作战、信息作战、特种作战等一些全新作战样式的计划与组织,探索指挥对抗、指挥保障工作的内容、程序与方法;研究提高司令部工作时效性、科学性的办法;论证利用指挥自动化系统开展司令部工作的措施。平时司令部工作研究将更加注重解决新时期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司令部在组织部队军事训练、行政管理、战争动员和

后备力量建设、军事科研、防暴、抢险救灾等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探索组织上述工作的新路子,新办法。

(丁邦宇)

军队指挥理论著作 (writings on military command theory)

研究军队指挥问题的专著和论文集、工具书、教材的统称。是军队指挥实践经验理论概括的载体,是军事科学理论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大体可分为军队指挥基本理论著作、作战指挥理论著作、司令部工作理论著作、指挥自动化理论著作、外国军队指挥理论著作等若干种类。

军队指挥理论著作,随着军队指挥实践的发展和军队指挥理论研究的深入而出现。清朝末期和中华民国时期,由于受西方国家的影响,在研究、传播西方资产阶级军队指挥理论过程中,先后翻译、编撰了《高等帅兵学》、《大军统帅学》、《统帅纲要》、《军队指挥》、《新军队指挥》、《大军指挥》等军队指挥理论译著和专著。其主要内容多为战争指挥、指挥机构、指挥活动及司令部业务等。在中国革命战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以马列主义军事理论为指导,紧密结合革命战争实际,研究解决了军队指挥一系列理论与实践问题。毛泽东所著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的“十大军事原则”等,虽然是有关战争、战役、战斗的论著,但其中许多内容论及了军队指挥问题。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这方面的著述也不少,如刘伯承的《〈苏军司令部野外勤务教令〉译者前言》、粟裕的《关于组织战斗》和《战时参谋工作》,此外还有第18集团军颁发的《关于健全司令部的组织与工作》和八路军颁布的《八路军各级司令部(军、师、旅、团)

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等。这些论述和法规,全面深入地论述了司令部的使命、工作职责、工作标准、工作作风、工作制度等,对当时的军队指挥实践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军队指挥学学科建立后,是军队指挥理论著作的丰收时期,出版的著作不但数量多,而且品种齐全,军队指挥基本理论著作、作战指挥理论著作、司令部理论著作、军队指挥自动化理论著作和外军指挥理论研究著作应有尽有。

军队指挥基本理论方面,较早的专著是1986年由南京陆军指挥学院袁俊主编的《合成军队指挥学》和1989年由国防大学于海涛主编的《军队指挥学》问世。这两部著作主要论述了军队指挥学的研究任务与对象、学科体系,军队指挥的起源与发展历史,现代作战的特点和对军队指挥的要求;军队指挥规律,指挥原则,指挥艺术,指挥环境;军队指挥系统;军队指挥活动等,对军队指挥学的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另外,1989年由薛连璧主编的《军队指挥学基础》、1990年由海潮出版社出版的《军队后勤指挥研究》、1992年由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吴章燧主编的《海军指挥学》、1992年由刘镇武主编的《现代军队指挥》、1995年由第二炮兵指挥学院牛明高主编的《第二炮兵指挥学》等,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军队指挥的基本理论问题。

作战指挥理论方面,1989年由石家庄军事教育学院刘雷波等主编的《合同作战指挥概论》率先出版,在作战指挥理论研究方面起到了先行作用。在全军具有一定影响的是1994年由石家庄陆军参谋学院王光宙主编的《作战指挥学》和1995年国防大学杨金华、黄彬主编的《作战指挥概论》。另外,还有1993年由国防大学黄彬主编的《陆海空军高技术条件下作战指挥》、1995年由军事科学

院张世平撰写的《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指挥若干问题研究》等。在这些著作中,比较详细地论述了作战指挥学的研究对象、内容及学科体系,研究作战指挥的目的、意义和方法,作战指挥的历史发展,作战指挥的实质、特征与职能,作战指挥的要素,作战指挥规律,作战指挥原则,作战指挥机构,作战指挥手段,作战指挥过程,作战指挥方式,作战指挥艺术等。

司令部工作理论方面,较早的专著是1989年由装甲兵指挥学院张济海编著的《平时司令部工作》。1990年,总参谋部办公厅编辑出版了《参谋工作文献汇编》。该书汇集老一辈革命家、军事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几届总参谋长关于司令部建设和工作方面的论述。1991年,南京陆军指挥学院贾启玉主编了《加强新时期的司令部建设》一书。1993年,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姜放然主编的《司令部工作概论》一书,较系统地阐明了司令部工作的理论问题。1996年,军事谊文出版社出版了由总参谋部办公厅主编的《司令部建设·参谋工作——谈忆录》一书。1997年1月,江泽民主席签署命令颁发了新一代《中国人民解放军司令部条例》。军事科学院战役战术研究部司令部条例课题组撰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司令部条例辅导材料》一书,围绕新一代司令部条例的基本精神,着重阐述了司令部的地位作用、职能、基本任务和对司令部的基本要求,参谋长的地位和权力,总参谋部的性质、地位作用和职权,参谋人员职责,司令部内部外部关系,司令部组织军事建设、组织指挥作战、组织指挥所、组织指挥自动化系统的主要工作内容和方法,司令部工作制度,司令部建设以及作战文书等,对于全军学习贯彻新一代司令部条例,加强司令部建设和工作,起到了理论指导作用。

军队指挥自动化理论方面,较早的是1987年由国防大学赵柱生、于海涛主编的《合成军队作战指挥自动化》一书。1993年,总参谋部、空军、海军等单位联合课题组编写了《指挥所自动化建设》一书。在全军影响较大的是1994年军事谊文出版社出版的由李德义主编的指挥自动化系列丛书,主要包括《军队指挥自动化》、《指挥自动化系统》、《指挥自动化建设与管理》、《指挥自动化系统工程》、《指挥自动化发展》等。这套丛书,覆盖面宽、信息量大、时代感强,较好地兼顾了系统性、普及性,为指挥自动化战线管理人员、使用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提供了有益的帮助,也是广大官兵了解未来军队指挥手段的科普读物。

外军指挥理论方面,第一部专著是1986年由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翻译的原苏联P. K. 阿尔图霍夫主编的《军队指挥理论基础》一书。该书主要论述了军队指挥的对象、任务和结构,军队指挥的规律,军队指挥的原则,军队指挥系统,指挥活动的组织、作风和方法,评定指挥效能的方法论基础,改进军队指挥的任务和方向等。该书的翻译出版,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队指挥理论建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89、1991、1992年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先后翻译出版了联邦德国H. 武斯特和L. F. 欣堡编著的《军事指挥信息系统》、美国的《美军高层领导与指挥》和《参谋部的组织与业务》,其内容比《军队指挥理论基础》涉及的范围更为广泛。在外军指挥理论研究方面,1995年出版了由陈锋主编的《作战指挥与外军司令部建设》和1993年出版了由徐存悌主编的《外军司令部资料汇编》等著作。这些专著的翻译出版,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挥自动化理论、作战指挥理论、司令部理论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张世平)

军事情报学研究

(study of science of military intelligence)

探讨军事情报工作客观规律和指导规律的活动。军事学术研究的组成部分。军事情报学作为一种为政治、军事斗争服务的特殊军事理论,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民族性;它与社会学、军事学的许多分支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它来源于军事情报工作实践,又能动地指导着军事情报工作实践,也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性学科。

研究内容 军事情报学的研究对象是军事情报工作实践,研究的内容一般分为:①军事情报学基础理论研究,包括军事情报概念、地位、作用、工作任务、体制;军事情报工作规律;军事情报学科体系;军事情报思想与历史等。②军事情报获取理论研究,包括各种侦察力量、手段的性质、特点、地位、作用、任务、运用原则、使用方法以及各种侦察力量、手段的相互关系、综合运用;军事情报的传递方式、手段、要求。③军事情报保障理论研究,包括战略、战役、战术层次和各种作战类型、样式的情报保障原则、体系、方式与方法。④军事情报处理理论研究,包括军事情报研究、分析、整理的原则、方法和规律;军事情报上报、通报、储存、检索的方法、原则、要求。⑤军事情报建设理论研究,包括军事情报力量与手段、侦察装备、侦察阵地与设施建设等。

研究概况 中国的军事情报理论与实践,在古代属于领先地位,一些精粹理论与经验至今为世界各国所引用。但现代意义的军事情报学是从20世纪才开始研究并逐步发展起来的。

清末和中华民国时期的军事情报学研究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清王朝对内加强封建专制统治,对外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国力衰弱,遭受外国列强侵略的时期。此时的军事情报活动主要适用于维护其

封建统治和镇压农民起义上,其在反抗侵略的斗争中却基本上无所作为,致使军事情报理论的研究与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到了中华民国时期,一些军事理论家及军队情报部门,才打破“秘而不宣”的禁令,著书立说,总结与探索了现代军事情报学理论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例如1943年7月,国民党军队将领郑介民著的《军事情报学》;1941年7月,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编、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处出版的《野战情报业务教令》;1948年6月,国民党政府国防部第二厅编的《情报八大战法》;国民党政府国防部情报军官训练班编印的《情报活页范例》、《情报之搜集》等。在此期间,还翻译出版了《军事情报》、《法国军事情报及观察业务令》、《战斗情报》等外国军事情报理论专著等。上述成果,虽然是为了维护国民党的统治而研究形成的,但其中有关情报工作和方法也不乏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情报学研究 中国人民解放军从诞生之日起就重视军事情报工作及其理论的研究,不断总结自身开展的情报工作经验,汲取古今中外军事情报理论的精华,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如1938年李廉士著的《侦察常识》,1940年编印的《谍报勤务参考材料》和1941年颁发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等。1946年,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还出版了《步兵侦察》等苏联的军事情报学译著。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正确运用“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谋略,提出了依靠人民群众侦察、综合运用各种侦察手段、重点侦察的情报思想,对人民军队的军事情报理论和实践给以最精湛的指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加强了军事情报学理论研究工作,在总结人民解放军历次革命战争情报工作经验的同时,加深了理论研究,并收获了一批成果。例如60年代,总参谋部有关部

门编写了《合成军队侦察概则》；在刘伯承主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编著了《师（团）攻防战斗侦察保障》等军事情报工作基础理论教材和《先遣侦察支队行动》等战术情报保障理论教材。70年代，总参谋部组织编著了一系列《侦察分队教材》。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指导下，出现了空前的军事情报理论研究热潮，产生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例如：1988年出版的《军事情报学概论》，1989年出版的《武官学》，1990年出版的《战术情报学基础》，1991年出版的《战术侦察学》、《部队侦察装备发展研究》，1993年出版的《国际情报战——风云变幻/情报人员》，1994年出版的《军事情报学导论》，1995～1996年出版的《军兵种侦察》、《特种侦察作战概论》，1996年出版的《军事情报学》、《军事情报学术研究浅说》，1998年出版的《军事外交概论》、《军事情报整编学概论》、《军事情报学系列教程》，1999年出版的《军事情报学》，2000年出版的《军事情报分析与预测》等理论著作。上述成果，从不同层次、不同侧面，系统地总结归纳了军事情报工作的原理、原则、任务、特点和规律，基本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和初具规模的军事情报学学科体系，为科学、系统、深入地研究军事情报学基础理论和完善尚未创立的分支学科，提供了理论框架和科学思路。这些，都标志着人民解放军军事情报学的研究向着更深的理论层次发展。

发展趋势 21世纪的军事情报学研究，在基础理论方面，将根据军事情报工作实践的发展，不断研究增加新的内容；一些尚未创立的分支学科，将加速理论上的准备并逐步创立起来；某些分支学科的某些知识板块，将随着军事斗争形势的变化，而相互渗透，逐步走向综合，形成新的学科；有些分支学科，将

可能与其他学科交叉产生新的分支学科，例如军事情报学与军事心理学，可能发展成为新兴的军事情报心理学，等等。应用理论方面，将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计算机、航天技术、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在军事情报领域的应用，战争形态、模式、手段和节奏的变化，侦察范围的扩大，侦察定位处理速度的加快等，理论与方法都将有所更新和发展。

（卢克旺）

军事侦察研究 (study of military reconnaissance)

探讨为获取军事斗争所需情报而进行的活动。习惯上称“军事侦察学术研究”。军事侦察研究是系统总结军事侦察规律的思维活动，是一种创造和整理军事侦察情报知识的工作。

研究任务 军事侦察研究的任务，主要是通过军事侦察工作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对军事侦察工作规律的不断探索，分析战略和战场环境的发展，预测军事侦察工作的发展变化，提出军事侦察工作的原则、手段和方法，军事侦察工作建设与发展的原则、目标和措施，为正确指导军事侦察的组织与实施，提供理论指导和决策依据。

研究内容 军事侦察研究，分为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

基础理论研究 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军事侦察基本理论研究，主要研究军事侦察建设的基本理论和指导思想、军事侦察活动与军事、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的关系，军事侦察活动一般的规律、原理、原则和方法等问题。二是军事侦察力量、手段使用和建设的基础理论研究，主要研究各分支学科的研究对象、内容、研究方法及其概念、范畴、规律、原理、原则和方法等问题。

应用理论研究 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运

用基础理论研究成果,解决战争、战役、战斗和战备中的军事侦察工作具体问题。二是运用基础理论研究成果,解决保卫国家安全、军队建设中的军事侦察工作指导以及行动规范问题。

对策研究 即运用军事情报科学理论,为指导军事侦察工作建设与活动而进行的军事侦察工作方针、政策、措施、办法等方面的研究,提出解决军事情报斗争和军事侦察工作建设问题的实际办法,为领率机关实行科学决策提供咨询建议。

研究概况 可具体分为:

中华民国时期的军事侦察研究 中华民国建立后,一些军事理论家及军队的情报部门即打破自古以来情报侦察“秘而不宣”的禁令,开始了军事侦察有关问题的研究,并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如:1935年9月,侯竞寰编、国民党中央航空学校印制的《空中侦察教程》;1938年2月,明凡著的《游击队的警戒与侦察》;1938年7月,国民党军将领郑介民著的《谍报勤务草案》等。在此期间,还翻译出版了《空中侦察术》、《视察讲义》、《美国空中情报条例》等军事侦察专著、条例。上述成果对秘密侦察、空中侦察、战役战术侦察、反情报侦察等方面进行较深入的探索,开创了中国军事侦察理论研究的先河。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侦察研究 中国人民解放军自建立之日起就非常重视军事侦察研究问题,不仅有关单位建立有军事侦察机构,而且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研究探索了一整套具有人民战争特色的军事侦察的一般理论和方法。其研究成果主要反映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军事家的军事著述和作战指挥文电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人民解放军更加重视军事侦察研究。50年代,主要是在总结历次革命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军事侦察经验的同时,深

入研究了军事侦察的基本理论问题。在此基础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于60年代组织编写了《师(团)攻防战斗侦察保障》、《先遣侦察支队行动》等战术侦察教材。总参谋部和各级部队还组织编写了历次战争中的战役战术侦察战例。70年代,总参谋部组织编纂了一系列侦察知识、技术、战术教材。80年代以后,军事侦察研究蓬勃兴起,在基础理论、应用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众多的成果。主要有:《部队侦察装备发展研究》(1991)、《战术侦察学》(1991)、《军兵种侦察》(1995)、《特种侦察作战概论》(1996),等等。上述研究成果不仅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侦察研究向较高的理论层次发展,而且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侦察情报条令条例的编写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例如:60年代,编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合成军队侦察概则》;90年代,编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合成军队侦察情报条例》、《特种大队战斗条令》、《观察所(哨)战斗条令》、《雷达站(哨)战斗条令》、《两栖侦察分队战斗条令》等。为推动和交流军事侦察研究理论成果,总参谋部及有关院校召开了一系列的学术研讨会。如60~80年代,总参谋部曾先后在石家庄、桂林、广州召开全军性侦察战术改革现场会;总参谋部和有关院校创办了《侦察情报工作》、《军事情报科学》、《侦察学术》等学术刊物。

发展趋势 随着军事侦察技术装备和侦察实践的不断发展,对军事侦察研究认识的逐步加深,军事侦察研究也将有新的发展。将在进一步加大对军事侦察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研究力度的同时,更加注重对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军事侦察特点、规律及方式、方法的研究,以适应未来作战的需要。

(卢克旺)

军事情报整编学研究 (study of science of military intelligence production)

探讨军事情报整编及其发展规律的活动。军事情报学研究的组成部分。国外把军事情报整编学称为“军事情报调研学”、“军事情报分析研究学”、“军事情报整理学”等。

军事情报整编学研究对象与内容 军事情报整编学研究对象是军事情报整编工作。军事情报整编工作包括军事情报资料的收集、积累、分析、研究和判断。在此基础上,运用科学的方法,经过科学的“加工”和提炼,最后编写成军事情报文件。军事情报整编工作可分为战略情报整编、战役情报整编和战术情报整编。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军事情报资料的收集、积累、分析、研究、判断、加工、提炼并最后编写成军事情报文件的工作过程、方法、规律和发展趋势。具体研究内容主要有:军事情报整编的定义、概念、内涵、外延;军事情报整编工作的历史、地位、作用;军事情报整编工作的目的、意义、指导思想;军事情报整编工作的方法、原则、特点、规律;军事情报整编工作的组织机构和人才素质、培养途径;军事情报整编工作的器材设备、自动化系统以及军事情报整编工作的发展趋势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情报整编学研究军事情报整编工作古已有之。但是,军事情报整编学的形成时间至今尚无定论,一般认为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早在红军时期就建立了军事情报工作机构,有了专业军事情报整编的工作人员。经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等等战争实践经验的积累,情报整编工作水平不断发展和提高,并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军事情报整编人才,较好地保障了作战的需要。毛泽东提出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科学分析研究方法,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情报整编工作的

重要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军事情报整编事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先后建立了适合各个层次的军事情报整编工作机构;培养并配备了各个层次的军事情报整编工作人员;军事情报整编工作的器材设备不断更新发展。1964年,周恩来指示军事情报整编部门,要对情报进行分析,加以判断,不要只是通报素材——要把情报的研究判断变成一门科学。钱学森也曾指出,高级一点的情报研究工作,实际上是一种综合的技术,这种综合技术就要用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的方法。所有这些,都为军事情报整编学的学科建立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经过多年军事情报整编工作实践和理论探索研究,军事情报整编学的学科体系建设逐步走向完善和发展,先后出版了《军事情报学概论》、《军事情报学》、《军事情报整编研究》、《技侦情报整编概论》、《军事情报整编学概论》、《军事情报整编学教程》等专著。还有武官情报整编、谍报情报整编、陆海空三军情报整编、航天侦察情报整编、技术侦察情报整编、群众侦察情报整编、公开情报资料整编、网络侦察情报资料整编、战时情报资料整编等一大批分支学科正在孕育成长之中。

发展趋势 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发展,情报信息量必将越来越大,内容越来越丰富,情报整编工作将越来越显得重要。军事政治情报、军事经济情报、军事科技情报等将要求情报整编工作的社会化分工更加具体、细致。军事情报整编工作的环境和条件将不断得到改善和提高,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将更多地运用于军事情报整编工作。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各种计算机软件、数据库等已经或正在逐步运用于军事情报整编领域,以强劲的势头促进军事情报整编工作向着自动化方向发展,给军事情报整编工作注入了强大的活力,

军事情报整编学研究必将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秦荣斌)

军事运筹学研究

(study of science of military operations research)

探讨军事问题的定量分析及决策优化的理论和活动的活动。以军事运筹的实践活动为研究对象。

研究概况 在中国,军事运筹学思想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孙武所著的《孙子》。但系统的应用与研究则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1956年秋,在钱学森、许国志的倡导下,中国科学院成立力学研究所,钱学森任所长,许国志任力学研究所下属的运筹研究室主任,从此开始了中国的运筹学研究。运筹学初始称为“运用学”,后来称之为运筹学,并很快得到中国及日本学术界的认可。50~60年代,中国运筹学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国民经济领域。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装备的改善,运筹学开始在军事上的应用,主要运用于火力运用理论和国防尖端武器的研究。60年代中期~70年代初,在华罗庚的积极倡导下,“优选法”和“统筹法”等运筹学基本方法在军事领域得到了较好的推广和应用。在70年代末,钱学森等人发表《军事系统工程》一文,研究了军事运筹学的理论和方法。随后在反坦克武器系统作战效能分析中得到运用,揭开了系统研究军事运筹学的序幕。

1978年,中国航空学会发起召开了军事运筹学座谈会,提出了开展军事运筹与系统工程研究试点工作的建议;1979年,国防科委组织召开了军事运筹学研讨会。1979年,总参谋部批准在军事科学院组建“作战运筹分析研究室”(1986年改名为“军事运筹分

析研究所”),是中国第一个从事军事运筹研究的专业机构。1981年,在北京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军事运筹学研究的学术团体——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军事系统工程委员会。随着军事运筹分析研究活动的广泛开展,许多科研院所和军事院校纷纷组建了从事军事运筹和军事系统工程研究及教学的专门机构,各军种、兵种和国防科研、国防工业部门都相继成立了各种专业性论证分析机构,有组织地开展了军事运筹学的研究和应用,出现了广泛学习和应用军事运筹学理论、方法的热潮。198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又成立了军事运筹学会。1985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运筹学会成立,标志着中国军事运筹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至20世纪末,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军事系统工程委员会共召开了11次学术年会,先后就“系统工程与国防现代化”、“高技术、军事决策与军事系统工程”、“高技术战争与作战模拟”等问题进行了学术交流,并编辑出版了《军事革命与军事系统工程》、《多媒体技术及其在军事领域内的应用》、《作战效能评估》等论文集。除了学术年会之外,军事系统工程委员会还举行了许多学术研讨会和培训班。其中主要有:1981年的“指挥控制—系统工程与计算机模拟学习班”,1986年的“2000年国防战略与系统工程学术讨论会”,1988年的“军事专家系统和人工智能学术研讨会”,1993年的“多媒体技术及其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学术研讨会”,1994年的“深化军事系统工程的研究与应用学术研讨会”,1996年的“作战效能评估学术研讨会”和“军事系统工程科研成果展示会”,等等。

为借鉴外军军事运筹学研究的经验,中国人民解放军也积极开展对外学术交流,军事系统工程委员会多次邀请了西方军事运筹学者来华讲学,并举办过两次中美国防系

统分析讨论会。1988年,原联邦德国慕尼黑国防大学应用系统科学教授 R. K. 胡贝尔夫妇应邀来华进行学术交流,围绕着“国防系统分析与建模”进行了座谈。1990年,美国陆军退休上校 T. N. 杜普伊先后在军事科学院军事运筹分析研究所进行了学术演讲和座谈,围绕着“美国军事运筹学”、“军事历史分析”进行了学术讲演和座谈。

综观中国军事运筹学学科的发展,最初主要是在军事院校教学与武器系统论证、研制方面开展活动。80年代后,作战模拟发展速度加快,开发出一批具有中国军队特色的模拟模型。90年代中国军队在指挥自动化系统研制方面也已获得可喜进展。从总体水平来看,中国军事运筹学已由教学和武器系统研制论证,逐渐开始在军队作战训练以及其他更广泛的领域中得到发展,并且取得了显著成就。

研究成果 80年代以来,随着电子计算机技术的日益发展和广泛应用,中国的军事运筹学在学科建设、院校教学、武器系统论证、军事战略的选择、作战行动的模拟、指挥自动化系统的建立、军事训练的组织指挥和军事后勤保障系统的规划管理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发挥了重要作用。军事运筹学作为军事科学体系中一个新的分支学科,通过加强理论研究,已在学科定义、学科体系、与相关学科的关系以及方法学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作为军事运筹学基础理论的射击理论、火力运用理论、兰彻斯特方程理论、随机格斗理论、概率论与统计学、数学规划理论、决策论、搜索论、排队论、库存论、网络分析、对策论、C³I系统和作战指挥决策支持系统理论、作战模拟理论等已基本成熟。

据概略估计,80年代以来公开发表的有关军事运筹学论文已达2 000篇左右,译著、

专著、教材数十种。其中比较有影响的著作有:许国志等编著的《运筹学》(1963)、李德等主编的《运筹学》(1982)、王常杰等编著的《现代作战运筹概论》(1986)、张最良主编的《军事运筹学》(1993)、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委会编纂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运筹学分册》(1993)、邵国培等编著的《电子对抗作战效能评估基础》(1994)、李乃奎编著的《军事运筹学基本理论教程》(1998)、朱建青编著的《军事运筹学基础》(2000)等。

研究内容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军事问题影响因素量化研究 军事问题影响因素量化,指对军事问题的影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定量表示。它是进行军事运筹分析,建构军事模型、进行军事模拟的重要理论和方法。中国最早涉及军事问题影响因素量化研究内容、理论和方法的相关论文出现于80年代。1987年出版的《作战模拟的研究与应用》一书中有许多相关的文章。1993年出版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运筹学分册》中,收录了《军事问题影响因素量化》、《武器系统性能量化》、《战场环境量化》、《人的因素量化》等条目。1994年,沙基昌发表了《数理战术学——运筹学在国防军事应用中的新方法》。1987年军事科学院军事运筹分析研究所的《作战系统工程导论》、1995年黄劳生的《作战工程保障运筹分析》、1998年王可定的《作战模拟理论与方法》、2000年张最良等的《军事运筹学》等专著相继出版,其中均有对军事问题影响因素量化的研究和论述。

关于军事问题决策优化研究 军事问题决策优化是定量描述军事决策问题,寻求最优解或满意解的理论和方法,其目的是为军事问题的决策提供定量依据。它运用规划论、排队论、存储论、对策论、网络分析、决策论以及构造军事模型进行模拟等,对军事上的各种问题进行研究,以寻求最好或满意的

结果。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问题决策优化研究是从火力运用的理论开始的,其代表著作是1959年出版的《地面炮兵射击理论教程》,其中计算出了不同火器的射表,提高了武器装备的射击精度。从60年代起,华罗庚在地方和军队推广统筹法、优选法和网络分析等;钱学森在军队推广系统工程理论促进了军事问题决策优化研究和应用,使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各部队、院校纷纷成立专门研究优化的机构,有关决策优化的各种期刊专著大量出版,促进了决策由定性分析向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转化,促进了作战理论、部队结构优化、武器装备研制、自动化指挥等研究的发展。

关于武器射击运筹理论研究 对武器系统射击运筹理论研究,是对武器射击过程进行定量分析,评定其射击效率,探索其火力最佳运用的理论活动。是军事运筹分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50~60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射击运筹理论是与当时的炮兵武器装备技术相适应的,求取射击效率的方法是适合人工作业的表格法、面积比法、柯氏法和二项式展开法等。进入80年代,从事武器射击的理论工作者,对射击运筹理论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其主要成果有潘承泮的《武器系统射击数量分析》(1985)、倪忠仁的《高炮射击理论》(1986)、刘怡昕的《炮兵射击理论》(1998)等。广大从事武器射击理论研究的工作者根据军队现有武器装备技术条件,充分运用军事运筹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提出了许多提高射击效果的理论和方法,如:改进了射击误差模型,增加了单炮(导弹)基线误差和数个炮兵营射击误差的描述,给出了弹片在空间分布的经验式与分布密度、射表弹道诸元及有关数据的解析逼近式,给出了按射弹能量决定单发命中弹射击效率的表达

式、计算射击效率的各种表达式与近似式、用非线性规划求解最佳人工散布和几种新型弹种的射击效率评定,研究了射击中的对抗、目标与火力的最优分配等问题,为武器系统射击指挥决策提供了定量分析的理论依据。

关于军事模型与模拟研究 军事模型是军事问题的抽象描述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仿真活动。模拟研究是选择和使用模型进行实验,对作战环境和过程进行仿真的方法和活动。利用军事模型进行模拟可以探讨军事规律,促进作战、训练和科研等任务的完成。

1978年,中央军委科技装备办公室成立了由多学科专家组成的“反坦克武器系统工程试点小组”,具体开展反坦克模型的研制,用以模拟坦克战对抗问题,这是国内最早进行的军事模型与模拟研究。随后,许多机关、部队和院校也先后建立了各种专业性论证分析机构,在军内有组织地开展军事模型与模拟研究,逐步建立了数以百计从分队到方面军的各种类型的军事模型,为军事训练模拟化和作战论证分析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模型与模拟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作战指挥训练,包括陆军分队、团、师、集团军、方面军作战模型,海军战术模型,空军防空战役模型、空中格斗作战模型等;另一方面是武器装备效能评估和装备规划论证,如反坦克武器论证、炮兵武器论证、防空武器论证、国防工程论证等。初期,研究活动的重点是放在作战模拟技术的探讨上,相继建立了一些用于武器效能评估、战术论证、教学训练的模型模拟系统。经过20多年的努力,全军在军事模型与模拟研究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与此同时,合同战役训练模拟系统、空军战役模拟系统、陆军师坚固阵地防御地面炮兵作战模拟模型、海军战役训练模拟系统、空军战役模拟系统等也相继研建成功。随着构建模型不断引入分布

交互技术、虚拟现实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模型的实用性、逼真性和灵活性又有了质的提高,90年代研制的一些新型模型也正在陆续投入使用,接受实践的检验。模型模拟已成为信息时代进行战法研究、军事训练和计划拟制的重要手段。

关于排队论军事应用研究 排队论是研究公用服务系统的排队和拥挤现象的随机特性和规律的理论。在军事上广泛用于作战指挥、后勤保障等方面的运筹分析,应用的主要领域有:防空体系的方案论证,武器装备维修方案研究,信息战略方案的确定,后勤保障运筹分析等。中国排队论研究始于50年代末期。当时,在军事上主要应用于武器装备维修方面。1978年以后,随着军事运筹学的开展及推广,排队论的研究与应用逐渐开展起来。1980年,徐光辉撰写的《随机服务系统》一书,是排队论研究的重要理论成果。

关于对策论研究 对策论是处理冲突现象选择最优决策的理论。中国对对策论的研究起步于50年代。1960年,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编写了《对策论(博弈论)讲义》。到了80年代,在钱学森、许国志等人的推动下,军队开展了对策论研究,在战役及战术问题中兵力分配或火力分配研究,机舰联合对潜艇的搜索研究,以及对一些重大事件或军事斗争热点的冲突分析等方面,获得了显著成果。如:1986年,王建华撰写的《对策论》,张嗣瀛撰写的《微分对策》,刘德铭等撰写的《对策论及其应用》,邵国培等撰写的《电子对抗作战效能分析》等专著。

关于网络分析研究 网络分析是在系统进行网络描述的基础上,运用网络理论研究系统并寻求优化方案方法。50年代,网络技术被介绍到中国,并被成功地应用于飞机、导弹等武器的研究、制造、试验等管理工作中。进入60年代,网络分析在军队作战指挥、后

勤保障、人才训练、方案规划与论证、国防工程、武器研制等方面得到广泛使用,成为军队和国防建设上成效显著的管理方法之一。1991年,冯允成所著《活动网络分析》一书出版,开创了网络分析理论的新领域。利用该理论研制的软件系统已成功地应用到中国的航天飞船以及新型飞机的全寿命分析中,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果。

关于决策分析研究 决策分析是研究决策者作出决策过程的一种系统的理论方法。它在军事领域的许多方面,诸如制定军事战略、确定作战方案、进行兵力部署、实施作战指挥和保障以及对军队管理和武器装备的研制、采购等都有广泛应用。中国最早的相关论文出现于70年代末。1977年魏权龄、应玖茜和陈光亚发表了《多目标规划的稳定性》和《多目标最优化有效解的性质及其标量化》的论文。1980年顾基发、魏权龄发表的《多目标决策问题》,是国内第一次全面介绍多目标决策的文章。同年,吴沧浦和周士高分别发表的《多指标动态规划》、《经济管理的决策分析方法》,陈光亚在80年代中后期发表的有关向量微分不等式、变分不等式的许多论文,以及众多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反映了当时中国决策分析领域的研究水平。到90年代,在决策分析的诸多方面,如多层规划、多目标决策方法、冲突分析、群决策、多属性决策灵敏度分析、仿真与决策相结合等方面的研究又有所突破,发表了几十篇有价值的学术论文。

关于统筹法研究 统筹法是关于在实现整体目标的全过程中,如何实施统筹指挥管理的理论和方法。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在研究了国外的关键路线法、网络计划法、计划评审技术、图示评审技术等方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传统的统筹思想,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统筹方法,并于

1965年出版了《统筹法评估》一书。在华罗庚的倡导和推动下,从60年代起,统筹法开始应用于导弹和空间研究的组织管理之中,并取得明显效果。进入70年代,中国学者对统筹法的研究不断深入和发展。它涉及优选学、图论、随机过程、排队论、信息论、流图、随机优化等,其代表著作是1991年华罗庚、王元合著的《数学模型选谈》一书,其中所介绍的有关模型被广泛应用于国家的许多管理领域和国防建设的国防工程施工、武器的研制与生产等管理领域中。从70年代起,军队大力推广统筹法的应用,在指挥、训练、后勤保障、方案论证等许多方面都得到了开发和利用,成为应用范围广,成效显著的管理方法之一。

发展趋势 随着数学和电子计算机等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军事运筹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也将得到进一步发展,研究领域也将进一步拓宽,诸如新的指挥自动化系统与新式武器系统的效能分析、新的战略的制定与评估、未来作战过程的模拟及军事预测等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朱松春等编著:《军事运筹学》,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张最良等著:《军事运筹学》,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

江敬灼主编:《高技术战争与作战模拟》,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

丁晓明等主编:《高技术战争与作战运筹分析》,北京:海潮出版社,1998。

(刘玉中 陈 焱)

军事问题影响因素量化研究 (study of quantification of factors influencing military problems)

探讨军事问题产生较大影响的主要因素

及其相互作用的定量分析的活动。目的是为军事问题的定量分析提供基础数据。

主要研究内容 军事问题量化研究主要是正确选择度量指标并以合理的算法确定其数据,主要包括有武器系统性能、战场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人工环境、社会环境)、人的因素、作战行动等。武器装备系统性能量化是以一定的数量指标对武器装备系统性能水平的定量描述;战场环境量化是以一定的数量指标对直接影响军事行动的战场因素的定量描述,其中主要包括:自然环境量化,即对地形、气象和水文等因素的定量描述;人工环境量化,即对防卫工事、各种障碍物、道路网络、烟幕和伪装、给水条件以及核化武器和电子对抗所造成的环境的定量描述;社会环境因素量化,即对作战产生较大影响的因素如当地的经济结构和能力、科技水平及作战双方民心向背等因素的定量描述;人的因素量化即对指战员的素质和活动状态的数量描述;作战行动量化即选用一系列的数量指标来描述作战单位的运动、搜索、射击以及战果等等。

研究简况及成果 中国最早的有关军事问题影响因素量化研究论文出现于80年代。1987年,钱学森、许国志等在《作战模拟的研究与应用》一书中分别发表了《作战模拟是一门重要科学技术》、《模拟的作用至关重要》、《考虑地形通视条件的陆战损耗的随机描述》等文章。1993年,江敬灼、刘奇志分别发表《现代武器装备系统的作用效能评估》、《武器系统战斗力量化的概念及方法》等文章。同年,沙钰、田棣华、钱七虎和黄劳生、刘红松、吴洪鳌、凌如镛、刘德铭等分别为《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运筹学分册》撰写了《军事问题影响因素量化》、《武器系统性能量化》、《战场环境量化》、《人的因素量化》、《武器射击运筹理论》、《搜索论》、《军事模型与模拟》等条

目。1994年,沙基昌发表了《数理战术学——运筹学在国防军事应用中的新方法》一文。截至2000年,相继出版的研究专著有:王寿云的《现代作战模拟》(1984)、潘承洋的《武器系统射击效力分析》(1985)、王常杰的《现代作战运筹概论》(1986)、军事科学院军事运筹分析研究所的《作战系统工程导论》(1987)、黄劳生的《作战工程保障运筹分析》(1995)、王可定的《作战模拟理论与方法》(1998)、张最良等的《军事运筹学》(2000)等,其中有的专著已被有关军事院校列入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材。

发展趋势 随着高科技的不断发展,未来高技术战争中,军事问题影响因素更加错综复杂,尤其是高技术武器系统性能可能成为对军事问题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因此,加大高技术武器系统性能因素对军事问题影响的研究将成为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量化的方法和手段也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地得到发展,许多难以量化的军事问题影响因素会逐步得到解决。

参考文献

军事科学院军事运筹分析研究所:《作战模拟的研究与应用》,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

张最良等著:《军事运筹学》,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

黄劳生著:《作战工程保障运筹分析》,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

(黄劳生)

军事问题决策优化研究 (study of optimization of military decision making)

探讨定量描述军事决策问题,寻求最优解或满意解的理论和方法的活动。其目的是为军事问题的决策提供定量依据。

军事问题决策优化是利用军事运筹学的

理论和方法(包括规划论、排队论、存储论、对策论、网络分析、决策论以及构造军事模型进行模拟等),对军事上的各种问题(如国防战略决策、战役、战斗行动的优化、战斗保障的优化等)寻求最好或满意的结果。

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问题决策优化研究是从火力运用的理论研究开始的,其代表著作是1959年出版的《地面炮兵射击理论教程》,其中计算出了不同火器的射表,提高了武器的射击精度。

从60年代起,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教授在全国、全军范围内推广统筹法、优选法和网络分析等,其代表著作是1966年发表的《统筹方法评估及其补充》。与此同时,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军队积极推广系统工程,其代表著作是1983年出版的《论系统工程》。两位科学家的卓越工作,极大地推动了军事问题决策优化研究的发展。其表现为:①各部队、院校纷纷成立研究军事问题决策优化的专门机构,如军事科学院率先于1980年在全军成立了军事运筹分析研究所,之后国防大学、国防科技大学等单位也相继成立了相应的研究中心或系所。②各种期刊纷纷出现,如军事科学院的《军事系统工程》等。③各种专著大量出版,如程云门的《评定射击效率原理》(1986),张最良等人编著的《军事运筹学》(1993)等。④军队决策由定性分析向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向转化,一大批有份量的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决策研究报告相继完成,推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理论、部队结构优化、武器装备研制、自动化指挥等问题决策化研究的发展。

随着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军事问题越来越呈现出复杂多变的局面,军事决策优化研究也必将朝着更精确化的方向发展,以提高军事问题决策的正确性和科学性。

参考文献

张最良等著:《军事运筹学》,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

王可定著:《作战模拟理论与方法》,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

程明熙著:《决策理论与方法》,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

(王可定)

武器射击运筹理论研究 (study of operations research theory of weapon firing)

探讨武器系统射击过程进行定量分析,评定其射击效率,研究其火力最佳运用的理论的活动。是军事运筹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

20世纪50~60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射击运筹理论研究是与当时的炮兵武器装备技术相适应,求取射击效率的方法是适合人工作业的表格法、面积比法、柯氏法和二项式展开法等,其代表著作作为炮兵学院的《地面炮兵射击理论教程》(1959)和《高射炮兵射击理论》(1960)。进入80年代,军队从事武器射击理论研究工作者,对射击运筹理论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其主要成果有潘承泮的《武器系统射击数量分析》(1985)、倪忠仁的《高炮射击理论》(1986)、程云门的《评定射击效率原理》(1986)、吴大梁的《射击效果的评定及最优化方法》(1986)、潘承泮的《武器系统射击效力》(1994)、张金槐的《运程火箭精度分析与评估》(1994)、俞开堂的《高炮射击效率评定》(1995)、华觉培的《炮兵射击效率评定》(1995)、刘怡昕的《炮兵射击理论》(1998)等。

在研究工作中,广大从事武器射击理论研究的工作者以军队现有武器装备技术和射击目标为前提,充分运用军事运筹学的理论与方法,改进和增加了许多提高射击效果的

内容,如:①改进了射击误差模型,增加了单炮(导弹)基线误差和数个炮兵营射击误差的描述;给出了分解弱相关误差的多种方法和近炸引信空炸射击的误差分析。②给出了弹片在空间分布的经验式与分布密度、射表弹道诸元及有关数据的解析逼近式、弹片穿孔概率的逼近式和榴弹对人员、装甲目标的毁伤能力。③给出了按射弹能量决定单发命中弹射击效率的表达式、计算射击效率的各种表达式与近似式、用雅可比多项式代替二项展开式计算射击效率、用均匀网格法与数论网格法数值积分计算射击效率、用统计实验法计算射击效率、用非线性规划求解最佳人工散布和几种新型弹种的射击效率评定。④研究了射击中的对抗、目标与火力的最优分配等问题。这些理论成果为武器系统射击指挥决策提供了定量分析的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程云门著:《评定射击效率原理》,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

俞开堂著:《高炮射击效率评定》,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

(俞开堂)

军事模型与模拟研究 (study of military model and simulation)

探讨军事问题的简化、抽象描述并以此进行的仿真实验的活动。军事模型是对所研究目标构成的军事系统要素及其关系和特征进行量化,并把这些要素有机结合起来进行描述,具有文字、图表、符号、关系式以及实体模样的具体结构形式,是静态的。模拟研究是选择和使用模型进行实验,是研究军事系统行为的一种过程,是动态的。

研究简况 利用军事模型进行模拟,可以探讨军事规律,启迪军事思想,以指导和促

进作战、训练和科研等任务的完成。中国著名学者钱学森认为,利用数学方法与计算机技术进行作战模拟的方法能够为军事研究提供一个作战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里,利用模拟的作战环境,可以进行策略和计划的实验,检验策略和计划的缺陷,预测策略和计划的效果,评估武器系统的效能等等。应用军事模型进行模拟研究具有节省经费、直观高效、逼真性好、可反复计算使用等特点。

1978年,中央军委科学技术装备委员会办公室成立了由多学科专家组成的“反坦克武器系统工程试点小组”,具体开展反坦克模型的研制,用以模拟坦克战对抗问题,这是中国最早进行的军事模型与模拟研究。1979年底,中国第一个运筹学研究机构——军事科学院军事运筹分析研究所成立。尔后,许多机关、部队和院校也先后建立了各种专业性论证分析机构,在军内有组织地开展军事模型与模拟研究,现已建立了数以百计从分队到方面军的各种类型的军事模型,为军事训练模拟和作战论证分析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做出了重要贡献。

研究成果 主要有:

分队战术模型 1985年由军事科学院军事运筹分析研究所完成。该模型被总参谋部用于轻武器的论证,同年11月被总参谋部军训部推广到全军各陆军学院用于教学。模型获1986年度军队科技成果二等奖。

合同战术训练模拟系统 1986年由军事教育学院和军事科学院军事运筹分析研究所完成。系统已应用于军事教育学院的教学,并推广到集团军用于部队演习训练。该系统获1989年度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

师团模型 1985年由军事科学院军事运筹分析研究所完成。该模型被集团军、军事院校和科研机关采用,获1988年度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集团军战役训练对抗模拟系统 1992年由北京军区、军事科学院、总参谋部军训部、第二炮兵等单位合作完成。该系统建成后用于北京军区的模拟对抗演习,获1994年度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

战役模拟系统 1987年由沈阳军区与军事科学院军事运筹分析研究所联合研制完成。该系统建成后用于对集团军、师两级的首长机关训练和研究战役问题,获1987年度军队科技进步三等奖。

发展趋势 随着分布交互技术、虚拟现实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并引入构建军事模型与模拟研究领域,使模型的实用性、逼真性和灵活性有了质的提高。未来的模型模拟研究将可能在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战场态势、作战方式和方法方面有所突破。

参考文献

军事科学院军事运筹分析研究所:《作战系统工程导论》,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

(胡桐清)

对策论研究 (study of game theory)

探讨处理冲突现象选择最优决策理论的定量分析活动。

对策论诞生于1944年。中国对对策论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1960年,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编写《对策论(博弈论)讲义》。到了80年代,在钱学森、许国志等科学家的推动下,军队开展了对对策论的研究。1986年,王建华撰写《对策论》,张嗣瀛撰写了《微分对策》,刘德铭、黄振高撰写了《对策论及其应用》,邵国培、曹志辉等撰写了《电子对抗作战效能分析》等专著。这些著作涉及的内容主要是:①对对策进行了分类,认为对策按局中人的策略集合是否随时间变化可分为静态对策与动态对策两大类。静态对策分结

盟与不结盟两种,不结盟对策又以局中人是两个或多个,策略集是有限或无限,各方赢得函数之和是否为零,分成各种类型的对策模型,如二人有限零和对策,多人有限零和对策,无限对抗对策等。动态对策有微分对策等。按局中人选取策略时是否了解对方采取策略的信息,对策又可分为正规型对策和扩展型对策。局中人根据规则,独立选取策略,构成局势,由赢得函数决定每一局中人的输赢数量,这种对策称为正规型对策。若局中人根据其他局中人采取的行动或自身所处位置的信息而采取一系列行动形成策略,这种对策称为扩展型对策,也称阵地对策。扩展型对策往往可化为正规型对策。所有对策中,研究和应用最多、理论上最完备的是二人有限零和对策。②分析了对策的要素。认为局中人、策略、赢得函数(得失函数,支付函数)是对策的三要素。对策论把冲突各方看成是一个相互矛盾、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参与冲突的各方可以是团体或个人,称为局中人。局中人为实现其利益而可能采取的行动方案,称为策略;策略的全体,称为策略集合。每个局中人都都有自己的策略集合。策略集合可以是有限的或无限的。每个局中人从各自的策略集合中选一策略所形成的策略组合,称为局势。局势决定局中人的赢得,这种对应关系定义了局势上的函数,称为赢得函数。③论述了对策论在军事上的广泛应用。例如阵地对策中兵力分配研究,空军作战中兵力分配研究,舰艇编队对抗战术策略研究,重大冲突事件策略研究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对策论应用研究中,获得了一些显著成果,如战役及战术问题中兵力分配或火力分配研究,机舰联合对潜艇的搜索研究,以及对一些重大事件或军事斗争热点的冲突分析等。国防科技大学、海军工程学院等院校相继招收对策论方面的研究

生,培养出一批对策论研究的专业人才。

高技术战争向对策论提出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课题;而数学及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又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有力的工具,从而必将促使对策论研究向更深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王建华:《对策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56。

张嗣瀛:《微分对策》,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

刘德铭、黄振高:《对策论及其应用》,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1995。

(李长生)

网络分析研究 (study of network analysis)

探讨在对系统进行网络描述的基础上,运用网络理论研究系统并寻求优化方案的活动。其目的是对系统通过网络图的分析、计算和调整,求得在既定条件下达到预定目标的非劣方案或最优化方案。

网络分析起源于18世纪对图论的研究。20世纪40~60年代,国外一些专家学者又先后提出了电路网络分析、关键路线法、计划评审技术、图示评审技术、风险评审技术和广义网络模型等新的理论。50年代,网络技术被介绍到中国,并被成功地应用于飞机、导弹等武器的研究、制造、试验等管理工作中。进入60年代,中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教授在研究了国外的关键路线法、计划评审技术、图示评审技术等网络分析方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传统的统筹思想,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统筹方法,其代表著作为《统筹法评话》。在华罗庚的积极倡导下,网络分析在军队作战指挥、通信、后勤保障、军事交通、人才训练、方案规划与论证以及国防工程、武器研制等方面得到广泛使用,成为军队和国防建设上成效显著

的管理方法之一。

1987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冯允成教授所著的《随机网络及其应用》一书出版,1991年他又撰写了《活动网络分析》一书。在后一本书中,冯允成教授把“活动网络分析”、“随机网络分析”和“系统仿真”结合起来,开创了网络分析理论的新领域。利用该理论所研制的软件系统已成功地应用到中国的航天飞船、新型飞机的全寿命分析中,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果。

参考文献

华罗庚著:《统筹方法评话及补充》(修订本),北京:中国工业出版社,1966。

冯允成等编:《随机网络及其应用》,北京:北京航空学院出版社,1987。

冯允成著:《活动网络分析》,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1991。

(李长生)

决策分析研究 (study of decision analysis)

探讨决策者作出决策过程的系统的理论和方法的活动。目的是使决策过程符合科学的原则,并使所作出的决策最大限度地满足决策者的需求。

决策分析的性质、研究对象及目标 决策分析是对带有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决策问题,提出一套概念和系统的求解方法,指导人们及社会在现有条件、偏好、目标和方案的情况下作出理想的选择。它是一门与经济学、数学、心理学、管理学和行为组织学有关的综合性学科。研究对象是决策活动,研究目标是帮助人们提高决策质量、减少决策的时间和成本。因此,决策分析是一门服从数学规律的创造性管理技术。包括:发现问题、确定目标和方案的制定、选择、反馈、调

整以及事后评估等。决策分析是一个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的分析过程,也是一个信息输入、加工处理、交换和输出的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给出进行决策的合理性论证和系统方法,必须提供满意的或最好的决策方案及其可能的结果分析。决策分析在军事领域的许多方面,诸如制定军事战略、确定作战方案、进行兵力部署、实施作战指挥以及对军队管理和武器装备的研制、采购等都有重大作用。

研究简况及成果 1966年,美国学者R. 霍华德在第四届国际运筹学会议上宣读了《决策分析:应用决策理论》一文,是学术界第一次正式使用“决策分析”这个术语。中国最早的相关论文出现于70年代末。如1977年魏权龄、应玖茜和陈光亚发表了《多目标规划的稳定性》和《多目标最优化有效解的性质及其标量化》。到80年代,关于决策分析的论文大量涌现。1980年顾基发、魏权龄发表的《多目标决策问题》,是国内第一次全面介绍多目标决策的文章。同年,吴沧浦发表了《多指标动态规划》,周士高发表了《经济管理的决策分析方法》,陈光亚在80年代中后期发表的有关向量微分不等式、变分不等式的许多论文,以及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代表了中国决策分析领域的早期研究水平。

1982年王浣尘、邓述慧分别发表了多目标决策方法与应用的文章,顾昌耀、邱苑华发表了有关 $E_a/E_2/1$ 系统近似解法的论文,较详细地论述了多目标排队系统的实用求解方法问题。1984年叶第豪在多目标决策方法、徐功仁在多目标多层次决策问题解法等的研究上取得成绩;汪寿阳建立了多目标最优化共轭对偶理论框架,推广了T. 坦尼诺和M. 阿弗里尔的研究成果。

80~90年代出版的决策分析研究专著有:李卓立的《决策与经济计划最优化》

(1983)、姜青航的《实用决策分析》(1985)、陈廷的《决策分析》(1987)、宣家骥的《多目标决策》(1989)、马庆国的《决策科学导引》(1989)、胡毓达的《实用多目标最优化》(1990)、左军的《多目标决策分析》(1991)、林铿云和董加礼的《多目标优化的方法与理论》(1992)、李祖怀的《决策理论导引》(1993)、邱菀华的《仿真决策引论》(1994)、翟立林和张庆洪的《应用决策分析》(1994)、陈守煜的《系统模糊决策理论与应用》(1994)等,均为学科建设作出过重要贡献。

80年代,一些专家学者为配合学术界的研究工作,曾利用期刊杂志举办讲座的形式,宣传决策分析知识。如1980年,翟立林在《外国经济管理》上开设了“决策论浅谈”系列讲座;1982~1983年,何毓琦在《信息与控制》上开设了“决策分析引论”系列讲座;1984~1985年,陈廷在《系统工程理论和实践》上开设了“决策分析”系列讲座;1987年,齐寅峰在《系统工程》上开设了“多准则决策”系列讲座等,为推广决策分析起到重要作用。

决策分析基本理论 中国决策分析的基本理论,主要包括决策以及多目标决策的理论基础、决策问题的主要特征及类型、决策分析的程序与方法、模型组成、灵敏度分析、决策的有效化、适用于决策分析和多目标决策模糊集理论等多个方面。

关于决策分析的理论基础 决策分析的理论基础主要是指定量描述偶然性和模糊性的有关理论。目前在决策分析中考虑的非确定性主要是偶然性。偶然性可用建立于事件在重复试验下出现频率的概念基础上的客观概率表示,也可用于建立在决策者对事件发生可能性的估计的概念基础上的主观概率表示。由于决策分析中经常要处理一次性的偶然事件,这时客观概率的表示不适用,因之主

观概率成为经典决策分析的基本概念。评定主观概率的方法很多,其中有模拟试验法、专家评定法、对决策者的直接询问或间接询问法等。非确定性的另一种情况是模糊性。由于人们对某些事物的某种特征只能获得不完备的信息,脑中不能形成关于此特征的精确知觉或概念,而只能形成模糊知觉或模糊概念。处理这一类非确定性决策问题可运用模糊决策分析。在模糊决策分析中,通常可行方案集是确定的,而状态、后果和目标等可能都是模糊的。这样,就会提出在不同事物的各自的模糊描述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模糊定量描述以及有关的分析和运算的理论体系等基本问题,这些问题可以采用不同的理论框架去处理。

关于决策问题的主要特征及类型 决策分析所处理的决策问题的主要特征及类型有:①状态和结局具有非确定性,形成非确定性决策问题。②要求达到的目标不是单一的,而各目标间往往存在对立,形成多目标决策问题。③决策须连串作出,存在依时间先后的序贯性,形成序贯决策问题。④决策者不只一个,且各决策者的目的和偏好有些可能大体一致,有些则可能不同甚至相互对立,形成群决策问题。⑤决策是上下存在隶属关系的多个层次上作出的,形成递阶决策问题。

关于决策分析的程序与方法 重点研究了经典决策分析的程序与决策树和多目标决策两种典型的决策分析方法。

经典决策分析的程序。经典的决策分析的程序可归纳如下:①对需要作出决策的问题进行分析,构成模型的初步框架。②采用适当方法确定上述模型中的数量形式、关系、数据等。例如,对随机决策问题,确定主观概率分布,效用函数等。③根据须付出的代价来权衡,是否进一步主动搜取信息,以改善模型。④根据最终确定的模型,在可行方案集中确

定最终决策。

经典决策分析方法。①决策树。在确定了主观概率和效用函数之后,对于偶然性决策问题,决策树是决策分析的常用的典型方式。以新武器的发展为例,设国防决策部门要发展达到某种战略目标的新武器,则它将面临一系列决策问题,如:在几种不同类型的新武器中选择一种类型;对研制成功的新武器确定投产规模;对已生产出来的新武器确定部署方式等。②多目标决策。多目标决策中的最基本概念是优劣结构和非劣方案(或称有效方案)。优劣结构是确定不同的可行方案之间的优劣关系的基础。多目标决策问题的基本特征为:对于给定的优劣结构,通常都可能出现无法确定两个不同的可行方案孰优孰劣的不可比较情况;非劣可行方案与相应的目标函数值通常不只一个;必须引入决策者的主观偏好以确定最终的最优或满意的方案。多目标决策中也有不同的定义和构造效用函数的方法,如果所构造的效用函数既能反映问题的客观要求又能反映决策者的主观偏好,那么最终方案的确定归结为求效用函数的最大解问题,否则采用将多目标规划与效用函数适当结合的方法以求最终决策。

关于决策分析的模型组成 经典的决策分析方法强调定量分析,强调建立问题的数学模型,强调数学模型的公理化基础及其内在的无矛盾性。其基本模型包含下列五个组成部分:方案(或称备择行动)集 A ,状态集 θ ,后果集 X ,损益函数 F ,决策准则 K 。以指挥员选择作战进攻时间为例,可行方案集是所有可供选择的若干进攻时间的总体,状态集可以是与进攻时间有关的作战双方的态势、天候、地形等状况的总体。根据作战目的、目标的不同,后果集可以是作战终止时双方军力损失或阵地得失等不同状况的总体。损益函数是评估后果的指标。决策准则是依据

后果的评估所选择的最终进行决策的准则。一般说来,后果依赖于方案与状态。损益函数值依赖于后果变量,因之依赖于方案与状态变量。决策准则既反映决策问题的要求和目的,也反映决策者的主观偏好和倾向。

发展趋势 未来的发展,将建立决策公理化体系,如决策和解的定义、知识和理论方法的公理化建设等;多目标规划理论(向量极值)已深入到一般偏序和无限维目标的抽象空间,新的更实用的决策模式与方法将兴起;把计算机专家系统和多目标决策结合起来,即研究具有自动决策支持功能的专家系统、计算机支持合作工作CSCW(Computer Supported Cooperative Work)的研究与应用也将逐渐开展起来;多目标动态决策、时序决策、信息不对称决策、风险(不确定性)决策和非线性决策等的研究也将迅速发展起来。

参考文献

陈挺:《决策分析》,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

邱苑华:《仿真决策引论》,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

(邱苑华)

统筹法研究 (study of overall planning method)

探讨在实现整体目标的全过程中实施统筹管理的理论与方法的活动。统筹法是一门管理技术,被人们称为“航天时代争分夺秒的管理上的突破”,原苏联军事专家称为“科学的军队指挥方法”。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在研究了国外的关键路线法、网络计划法、计划评审技术、图示评审技术等方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传统的统筹思想,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统筹方法(简称统筹法),并于1965年出版了《统筹方法评估》

一书。在华罗庚的倡导和推动下,从60年代起,统筹法开始应用于中国的导弹和空间研究的组织管理之中,并取得明显效果。

进入70年代,中国学者对统筹法的研究不断深入和发展。它涉及优选学、图论、随机过程、排队论、信息论、流图、随机优化等,其代表著作是1991年华罗庚、王元合著的《数学模型选谈》,书中所介绍的这些模型被广泛应用于国家的许多管理领域和国防建设的国防工程施工、武器的研制与生产等管理领域中。从70年代起,军队大力推广统筹法的应用,在指挥、训练、后勤保障、方案论证等许多方面都得到了开发和利用,成为应用范围广,成效显著的管理方法之一。

参考文献

华罗庚:《统筹方法评话及补充》,北京:中国工业出版社,1965。

华罗庚、王元:《数学模型选谈》,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

(马安丽 戴敦敬)

军制学研究

(study of science of military system)

探讨军事制度及其发展规律的活动。军事学术研究的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军事制度(简称军制),是国家或政治集团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为建设和运用军事力量而制定和实施的军事领域中各种社会关系和各种军事活动的行为规范。研究范围主要包括:军事领导体制、武装力量体制、军队组织体制和编制、军队各项工作制度、后备力量建设制度、兵役制度、国防经济管理体制、武器装备管理制度、国防教育制度、民防制度、战争动员制度、军事法制、军事制度史及中外军事制度比较研究等。基本任务是研究军事制度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揭示军事制度的发展规律,

发展军制学学科理论,为军事制度的制定与实施提供理论依据,为建立、改革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军事制度体系,加强国防与军队的质量建设,保障战争的准备与实施服务。

中国的军制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但是将军制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首先是在欧洲。19世纪30~40年代,俄国、法国等国出现军制学著作,并被列为军事学校的课程。20世纪初,国外的军制学传入中国。由于当时正处在封建主义走向没落,封建军事制度逐步向资产阶级军事制度转变的时期,军制的变革急需理论的指导,加上近代军制学的传入,军制研究在中国得到较大发展,并逐渐成为独立的学科。

清末及中华民国时期的军制学研究 20世纪初期,中国有代表性的军制学著作是清政府设立的北洋将弁学堂1903年编纂的《军制学》教课书、陈献章编纂的中国第一部《陆军军制学》、1917年北洋政府陆军部颁发的《军制学教程(甲班用)》。其他编纂、翻译和介绍的军制研究成果还有:《日本军制》、《日本陆军军制法规》、《军制》(五卷本)、《西国陆军制考略》、《列国陆军制》、《美国陆军制》、《德国军制述要》、《军制学讲义》、陆军大学校第七期教材《军制学》及各国兵备等。这一时期军制学研究的主要特点是:①适应当时中国进行军事制度改革,办军事学堂,训练新式陆军的需要。②研究成果主要是教材,在培养具有近代军事领导、指挥与专业人才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③以介绍欧美军制学理论和军事制度为主,着力介绍西方军事强国的军队组织编制、统率与指挥体制、兵役制度、教育训练制度和后勤保障制度等,缺乏深入的理论探讨与分析。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防与军事问题备受关注。在军队制度研究方面,不仅重视陆军

特种兵部队和空军军制的研究,而且普遍关注兵役制度、战争动员制度和民防制度等国防制度的研究。30~40年代,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将军制学列为军事学校和一些非军事院校的重要课程,军制学研究的代表作是1931年由国民政府训练总监部编印的《军制学概要》。该书较清末和中华民国前期的军制学教材有了发展,对作为国家基本制度之一的资产阶级军事制度及其地位与作用、内容与要点等方面的研究,均有所涉猎和发展。1942年,编写出版了中国的空军军制学教材《空军军制问题》。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军制学研究未能对西方资产阶级的军制学说有根本性的突破,也未能在中国得到很好的实行。

中国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的军制学研究中国共产党人的军制学研究,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下,借鉴苏联红军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和军队建设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马克思主义的军制学说登上了世界军事学术舞台。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的苏俄,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建设红军,在军事制度建设实践的基础上,于1927年编写了《简明军制学》教材,总结研究了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军事制度的基本理论问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结合建军、作战的实践研究军制问题,提出了许多人民军队制度建设的原则和思想,集中体现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著作、文电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有关文件之中。如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关于地方武装编制问题的密令》(1932)、《武装

民众与建设红军》(1934)等,内容主要包括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军队中要建立中共组织和领导机关,中共支部要建在连上,在班、排建立中共党的小组,营、团建立中共党委,在连、营、团各级设置中共党的代表,政治机关与军事机关平等地执行任务;军队中要废除军阀作风,建立民主制度,连以上各级成立士兵委员会,官兵平等,经济公开,等等。这些对中国无产阶级的军事制度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通过在战争中加强军队建设的实践,军制研究进一步深入,军制理论臻于成熟,其成果集中反映在中共中央、中央军事委员会有关文件和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军事家的军事著作中。如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的《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1937),毛泽东的《恢复军队中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制度》(1937)、《在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1937)、《立即组织以八路军名义出现的游击兵团》(1938)、《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对八路军野战政治工作的意见》(1940)、《军政委员会条例》(草案,1940)、《坚持为人民服务》(1944)、《1945年的任务》(1944),谭政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1944)等。主要内容包括:在统一战线中保持人民军队政治、思想、组织上的独立性,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要建立健全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组织机构体系,恢复各级政治工作机关,调整组织关系,建立党的一元化领导;依据环境变化,筹划军队建设,在军队总员额方面通过精兵以减轻抗日根据地人民的负担,走由低级到高级逐渐扩大正规军的道路,主力军地方化,灵活编组部队以适应游击战的需要等。

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和朱德的《论解放区战场》,更是全面总结了人民军队建设的经验,发展和丰富了无产阶级军制理论。在文

中,他们提出人民军队和群众武装相结合,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划分了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的任务,主力兵团执行跨地方的作战任务,地方兵团则协同民兵、自卫军保卫地方和进攻当地敌人;坚持扫除一切军阀制度,建立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的内外关系和民主制度;要求指挥机关要层层节制,有职有权,内部一致,号令一致等。

解放战争时期,军制研究又获得新的发展,其成果主要体现在毛泽东 1948 年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关于健全党委制》、《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等著作,以及总政治部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党委会草案》(1947)等文献中。主要内容有:争取国内和平的时候也不能放弃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要重新强调健全军队中的党委制,建立严格的请示报告制度;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和作战形式的正规化,要加强野战军的建设,在全军建立统一的编制、制度和供应体制;开展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密切和调整军队的内部关系;以多种方式改造起义部队和投诚官兵;建立有一定规模的军工和后勤供应体系;加强技术兵种的建设,逐步向军队正规化、现代化过渡。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军制学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军队正规化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全面展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制的建设进行了大量探索,这包含在他们的许多著述及国家和军队的大量文件之中。其主要内容是:要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这支军队要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要普遍实行民兵制度,民兵与预备役制度相结合;要精简整编,保持军队的适度规模;组建新的军兵

种,特别是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等军种和兵种,并实行科学的编制体制;建立正规的军事院校,建立正规化的规章制度;要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武器装备科研和生产体制,军队的武器装备结构要尖端武器与常规武器相结合。同时,总部机关、院校和研究机构也对军制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如刘伯承曾在军事学院主持编写《军制学讲义》,总参谋部等职能部门曾深入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兵役制度、民兵训练制度、军队正规化训练制度等问题。

“文化大革命”期间,军制理论研究处于停顿状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对国际局势进行了长期冷静的思考,在对战争与和平问题新的判断基础上,作出裁军 100 万的决定,无产阶级军制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邓小平新时期军制理论的主要内容有:①确立了新时期军制改革和建设的方针原则。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服从国家建设的大局,要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把历史上的优良传统与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要突出人民军队的特点。②指明了新时期军制改革与建设的主要任务。即进一步改革完善军队的领导制度;要精简整编,改革军队体制编制,建立科学合理的组织结构,特别是要充分考虑诸军兵种联合作战和战时的需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并作为一个制度问题加以解决;改革干部制度,用制度保障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完善条令条例,严格纪律和管理制度;建立严格的武器装备研制和生产管理制度等。

邓小平对军队建设和军事制度改革的高度重视,有力地推动了新时期军制研究的繁荣和发展。1979 年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军制专业研究机构——军事科学院军制研究部,军

制研究在中央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下,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制度改革,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起来,革命战争年代发展起来的军制学说,得到很大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这一时期不仅研究成果丰硕,而且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大部分学术著作都充分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论述为指导,对中国传统的军制学说,作了有选择、有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大大地拓展了军制理论研究的范围。在研究队伍方面,初步形成了以专业队伍为基础,理论工作者与职能部门的实际工作者紧密结合,军制理论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军制理论与院校教学相结合的局面。同时,军队广大官兵和地方研究人员、大专院校师生,从对军事制度史的研究,到对其他军事制度的探索,军制研究活动越来越活跃,业余科研队伍越来越大。

20 世纪末,军制学研究的主要方向有:军制基础理论、军事组织体制、军队管理理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理论、国防动员与国防经济理论、军事法制、军事装备体制理论等。设有军队组织编制学和军队管理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教学课程和军事组织体制编制专业的博士研究生教学课程,已培训军制学各专业硕士研究生十余名,博士研究生数名。

进入 80 年代后,军制学研究的学术活动十分活跃,并与军事改革的实践、中央军事委员会及总部的科学决策、部队建设和院校教学活动紧密结合,学术成果十分丰富:①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主要成果有:《国家军制学》(1987)和《军制学》(2000),以及《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军制分册》(1987),《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制分册》(1995),军事科

学院军制研究部刘展主编的《中国古代军制史》(1992),陈高华、钱海皓总主编的《中国军事制度史》丛书(1997),刘永杰等编著的教材《军制学》(1985)。此外,还有《空军军制学》(1989)、《海军军制学》(1994)和《陆军军制学》(1997)等。同时,还组织编写了供军制学各专业博士、硕士研究生教学用的军制学教材,包括:《军制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军制思想》、《中国军制史略》、《军事法制教程》、《国防体制教程》、《军队组织体制基础》、《中外军事组织体制比较》、《军队管理学教程》、《军队条令条例教程》、《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教程》、《武器装备学教程》、《现代军事技术基础》等,编纂出版了《军事组织体制概论》、《国防法概论》、《军事法制建设研究》、《武器装备学》等基础理论著作。②现实军制问题研究方面的主要成果有:组织修订了 1984、1990、1997 年版三代内务条令、纪律条令、队列条令,1992、1997 年版两代警备勤务条令,并且编写了这些共同条令的学习辅导材料,以及《军队条令与管理》、《新时期带兵浅说》等。随着国家军事组织体制的改革,1998 年成立总装备部后,还研究制定了反映装备工作规律、制度和行为规范的装备条令。③展开了国防与军队体制编制的调整改革和计划规划的调研、制定与修订工作,军事法规制度的论证、制定与修订工作。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的专题论证工作,编写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法规汇编》(1991)、《国防法立法理论研究》(199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律知识全书》(1997)等法规汇编和论文集。④展开关于军队质量建设、治军特点与规律的研究与论证,武器装备管理体制及发展规划的论证,兵役制度的调研、改革与论证,战争动员制度的研究,产生了一批质量较高的研究报告和咨询建议,并编写出版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

制度概要》(1988)、《兵役制度概论》(1996)、《战争动员学》(1997)等学术性与综述性著作。除军事法规和军事学术著作外,还发表了大批军制理论方面的学术论文。

展望 21世纪初,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新技术、新军事革命,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必然导致对国防体制、武装力量体制和军队体制,以及各项军事制度的新的调整。军制学理论研究将着重研究国防与军事领导指挥体制的调整与优化,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对常备军规模的控制与压缩的要求;动员体制和后备力量建设制度的完善;军队军兵种体制的变化,尤其是指挥体制的优化、调整和改革;军队政治工作制度如何适应高技术局部战争的新形势,更好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永不变质和打赢未来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提供政治思想保障;新的后勤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新的武器装备发展与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完善等。

参考文献

军事科学院军制研究部编著:《国家军制学》,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

沈雪哉等主编:《军制学》,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

唐炎主编:《国家军制学概说》,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

中国军事史编写组编:《中国军事史·第三卷·兵制》,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

刘展主编:《中国古代军制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

雷渊深等主编:《陆军军制学》,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

陈高华、钱海皓总主编:《中国军事制度史》,郑州:大象出版社,1997。

姚延进等编著:《军事组织体制研究》,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7。

军制基础理论研究 (study of basic theory of military system)

探讨军制和军制学的性质、特点、基本内容、基本原理原则、基本方法和基本规律的活动。军制基础理论研究是与军制应用理论研究相对应的理论研究范畴。军制学的专业研究方向之一。

军制基础理论研究以军事制度和军制学的基本问题为研究对象,是军制学及其各分支学科研究的基础,也是军制学各专业方向研究生教学的主体内容。军制学各专业基础理论研究以某一类具体军事制度及其基本原理原则、军制学各分支学科及各专业方向的基本问题为研究对象。主要包括:军队组织体制基础,军队管理概论,国防体制概论,后备力量建设概论,军事法制基础理论,等等。此外,还包括军队政治工作制度基础理论,军队后勤工作制度基础理论,军事装备管理基础理论等。

历史回顾 20世纪初,中国正处于备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之中,清王朝走向衰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兴起的变革时期,清王朝出于改良的需要,开始介绍和引进西方资产阶级的国防领导体制、兵役制度等国家基本军事制度。袁世凯在《新建陆军营制饷章》上报督办军务处时说:“窃查此次军兴(指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往往易为敌乘,迭见挫败者,虽由调度之无方,实亦军制之未善。若不权时度势,扫除更张,参用西法认真训练,则前车之鉴殊足寒心。”(《中国兵书集成》卷49第11页)在《改订军制学》和《陆军营制饷章》中,初步涉及到一些军制基础理论方面的问题。

中华民国时期,结合军队建设实际和军事教学的需要,撰写出一批军制学教材。有代表性的有:陆军部颁发的《军制学教程(甲班用)》(1917),杜乔著、陆军大学校印发的《军

(季德源)

制学》(1918),训练总监部编订的《军制学概要》(1931),杨劲支修正的陆军大学校讲义《军制学》(1936)等,对军制基础理论问题作了初步探讨。内容包括常备军在国家政权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常备军担负的国家安全的历史使命,国家制度中的国防与军事体制,军队建设的基本制度,兵役制度和后备力量建设制度等。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探讨人民军队的建设问题,创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理论,其中有许多思想、观点都涉及军制基础理论问题,如人民军队制度的本质,人民军队中党的绝对领导的制度和原则,人民军队民主制度建设,人民战争中武装力量体制问题,等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军制基础理论研究有了新的发展,在学习和研究外国军制基础理论的同时,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军制理论,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从50年代末期开始,由于“左”的思潮影响及60年代中期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破坏,军制基础理论研究处于停顿状态。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同时也开创了军制基础理论研究的新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军制学著作《国家军制学》,由军事科学院军制研究部编写并于1987年出版,同时出版了普及读本《国家军制学概说》。80~90年代,还先后出版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军制分册》和《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制分册》,以及《军制学》(讲义)、《空军军制学》、《海军军制学》、《陆军军制学》等。

90年代中期,军事科学院军制研究部组织编写第二代《军制学》(2000)。同时出版了《中国古代军制史》和《中国军事制度史》丛书。此外,还组织编写了供军制学各专业博

士、硕士研究生教学用的军制学试用教材,包括:《军制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军制思想》、《中国军制史略》、《国防体制教程》、《军队组织体制基础教程》、《军队管理学教程》、《军队条令条例教程》、《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教程》、《军制学教程》、《武器装备学教程》、《现代军事技术基础》等。其他有关科研单位还编纂出版有《军事组织体制研究》、《军事后勤结构概论》、《第二炮兵军制学》等基础理论著作。这些著作和教材的出版,大大开拓了军制基础理论研究,深化了军制基础理论研究的层次,形成了现代军制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框架体系。

研究状况 军制基础理论研究的基本研究状况是:

军制学学科体系研究 军制学学科体系研究缺少专门的研究著作,但许多军制学专著中都涉及军制学的学科体系问题,其内容在20世纪有很大变化。1903年出版的《军制学》,内容包括有关建军基本原则、军队结构、兵役制度、武器装备制造和军事设施建设、军需供应、军事领导指挥体制、军事教育制度、军队编制等方面的内容,主体内容是军队编制。1987年出版的《国家军制学》一书中,国家军制学的体系有较大扩展,包括军制在国家制度中的地位、作用,国防与国防领导,国家武装力量的地位、作用、构成和有关的基本原则,兵役制度,动员制度,国防经济体制,国防教育体制,国防与武器装备发展体制,军事科学研究体制,民防建设的原则和领导体制,军事法,军队组织编制体制(包括军队总体结构,军种体制与编制,指挥体制、政治工作体制、干部制度、教育训练体制、后勤体制、管理教育制度等)。2000年出版的《军制学》,则更加明确地将军制学划分为军制基础理论、军制应用理论、军制史学、比较军制学四个部分,其中军制基础理论包括军制的构成、军制

的决定与制约因素、军制的内容与形式、军制的功能与作用、军制的基本特征、军制发展变化的基本形态,以及制定与实施军制的依据、原则等;军制应用理论包括专业基础理论和具体应用理论,专业基础理论有国防领导体制、武装力量体制、战争动员体制、国防经济体制、兵役制度、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管理体制、民防体制、国防教育制度、后备力量建设制度、军队体制编制、军队各项工作制度、军事法律制度等理论。这部《军制学》深入研究了军制学的基础理论,提出了一整套军制学概念体系,是军制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

军制基本原理研究 即对军制学基本理论问题的探索。主要研究军事制度的概念、基本内容、基本形式、基本性质、基本特点、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制定与实施的基本原则和军制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等。20世纪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曾经出版过许多军制学教材,阐述了一些军制基本原理。但系统、深入地研究军制基本原理,则是在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军制学》、《国家军制学概说》、《军制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军制分册》和《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制分册》,以及《空军军制学》、《海军军制学》、《陆军军制学》和《第二炮兵军制学》等著作,集中地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军制学学科基础理论及各分支学科基础理论的许多基本问题。

军队组织体制基础理论研究 即对军队宏观组织机构的设置,隶属关系与职责权限的划分,领导、指挥与管理制度的确定等方面的研究。军队组织体制基础理论研究,主要结合军队建设与改革的实践,研究国家军队的总体结构与总额,确定军队规划的基本原理与原则,制约军队组织体制形成与发展变化的基本要素,军队的统率、行政领导与指挥

体制,军种兵种组织体制,教育训练、政治工作、后勤和装备体制,军队组织体制与编制演变的基本特点和基本规律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队组织体制基础理论研究中,提出并逐步完善了确立军队组织体制和军队编制的基本原则,如军队组织体制要与任务目标相适应的原则,集中统一的原则,精干高效的原则,平战结合的原则等;军队编制要以装定编的原则,以军事战略为指导的原则,与作战理论相适应的原则,满足任务需要的原则,平战结合的原则等。为培养军事组织体制专业人才,还结合军事科研、编写教材,开展该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的培养。

军队管理基础理论研究 军队管理是依照有关原理原则、法规制度,对军队各种管理对象进行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以实现管理目标的活动。军队管理基础理论研究,内容包括对军队管理的概念、研究对象、特点、地位和作用、原理和原则、职能和任务、方法和手段等的研究。军队管理基础研究,主要是在制定、执行军队共同条令的过程中,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重点探讨人民军队管理的原理和原则。《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学习辅导材料、《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学习辅导材料、《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条令》学习辅导材料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警备条令》学习辅导材料和有关学术文章,提出和深入阐述了军队管理的主要原理,如:整体效益原理,军队的基础在士兵的原理,法纪约束的原理,启发自觉的原理,干部是管理决定因素的原理等。在此基础上,提出和论述了军队管理的主要原则,如:官兵一致的原则,严格要求的原则,按级负责的原则,集中统一的原则,发扬民主的原则,公正无私的原则,管教结合的原则,教养一致的原则,讲求效益的原则和干部以身作则的原则等。

国防体制基础理论研究 国防体制即国

家为进行国防建设和斗争而确立的组织体系及相应制度。国防体制基础理论研究则是对国防机构的设置和管理权限划分等基本国防制度的探讨。许多专著和论文阐述了有关国防体制的理论问题,如王志毅所著的《武装力量体制概论》(1991),对以军队为主体的国家武装力量体制,作了系统的理论研究。20世纪末出版的作为研究生教材的《国防体制教程》,对国防体制作了全面的理性概括,内容包括国防领导体制、武装力量体制、国防动员体制、国防教育体制和民防体制等,着力研究了国防体制的基本概念、基本构成、基本性质、基本特点、基本功能、地位作用、制约因素、历史发展规律和确立国防体制各要素的基本原理和原则等。

后备力量建设基础理论研究 即对后备力量(或称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等的探索。后备力量建设研究中涉及到的基础理论问题,主要是后备力量的概念、制约因素、发展历史、基本特点与基本规律,从宏观上研究后备力量领导体制,预备役部队和民兵的建设,国防教育和学生军训,后备力量的动员原则与制度等。高昆山主编的《国防后备力量学概论》(1989)、雷庆善主编的《国防后备军概论》、安徽省军区《兵员管理》编写组编写的《兵员管理》(1990)等书,均是后备力量建设基础理论研究的著作。《兵员管理》一书,从九个方面对后备兵员管理的方法进行了探讨。总参谋部编的论文集《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理论与实践》(1991)、袁和平著《中国特色后备力量建设概论》(1992)、秦江昌等主编的《我国国防后备力量建设》(1996)等著作,把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当作一个学科来加以研究,探讨了这一学科的基本概念、性质与特点,研究任务、内容与方法,分析了国防后备力量领导体制的现状与改革,国防后备力量建设

的地位与作用,指导方针与原则,国防后备力量的结构、功能与运行机制等。关于“后备力量”的理解,学术界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后备力量,指国家常备军之外的一切经过准备、可以转化为直接战争实力的人力和物力的总和。狭义的后备力量,指常备军的后备力量。包括兵员、武器装备和必要的后勤物资储备。在中国,主要指民兵和预备役人员。关于后备力量建设的基本内容,多数学者认为应包括三大部分,即后备力量体系,包括兵员储备体系和后备力量组织体系;一类预备役建设,包括其编制、装备建设和人员训练;对后备力量的科学管理。为培养后备力量建设的专业理论人才,军事科学院还编写了《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教程》。

军事法制基础理论研究 军事法制指在一定军事法思想指导下,通过对军事法的制定、实施、监督、服务、教育、研究等环节,建立军事法秩序的机制系统。其实质是使军事建设和军事斗争在军事法的指导下活动,实现军事法制化。军事法制建设,是健全军事法机制系统,使军事法制逐步完善的过程。这方面的基础理论研究,在80~90年代有了快速的发展,主要著作有《国防法概论》、《军事法制建设研究》、《军事法制教程》、《中国军事制度史·军事法制卷》等。此外,还有许多综合性和专题性的论文集,如《国防法立法理论研究》。这些著作广泛涉及中国国防法制建设的基础理论,运用军事法学的原理和方法,通过对军事法的基本概念、基本原则、基本范畴的研究,包括军事立法问题,军事司法问题,军事法执行、监督、服务和教育等基本问题的研究,为军事制度、军事法(特别是军队条令条例)的制定、修改与实施,进而为整个军事法制建设提供理论依据。

发展趋势 随着国际军事交流的机会日益增多,军制基础理论研究将更加深入,为军

制的制定与实施、改革与完善,提供更加及时、更加科学的理论指导;部分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将成为军制学的新的分支学科。

参考文献

军事科学院军制研究部编著:《国家军制学》,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

唐炎主编:《国家军制学概说》,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

姚延进等编著:《军事组织体制研究》,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7。

苏志荣主编:《国防体制教程》,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9。

方宁等编:《军事法制教程》,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9。

(季德源)

国防体制研究 (study of national defense structure)

探讨国家为进行国防建设和武装斗争而确立的组织体系及相应制度所进行的活动。主要包括对国防领导体制、武装力量体制、战争动员体制、兵役体制、国防经济体制、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管理体制、人防体制等的研究。开展国防体制研究,对于正确认识国防体制发展变化的规律,建立和完善国防体制,巩固国防,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研究概况 20世纪前期国防体制的研究,基本处于自发的、零星的研究状态。由于当时的中国政府主要致力于镇压国内的人民革命运动,国防长期处于有国无防的状况,所以其研究成果没有对国防体制的实践产生多大影响。20世纪后期,国防体制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防体制理论,对国防体制方面的实践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清末的国防体制研究 清末,在国防落后屡遭外国列强沉重打击的情况下,清政府

的一些官员和有识之士开展了国防体制的研究,其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一些清朝官员的议奏、文章及其他研究者的著述之中。如刘坤一、张之洞给清廷的奏折中,分析了中国军事制度的弊端,提出了27条变法主张,包括改革旧的兵役制度,建立常备军、续备军、后备军相结合的体制;设立总参谋部,建立新的军事领导体制;仿照日本陆军师、团体制,实行多兵种合成的陆军体制编制。这些国防研究的成果,推动了清政府的军事改革进程,促使其改革国防领导指挥体制,建立陆军部、海军部;建立并加强近代海防和塞防体制,从关塞之防的体制发展为全面防卫的体制;建立近代陆军制度,创立步兵、炮兵、工兵、骑兵、辎重兵合成的陆军;引进近代军官军衔制度;筹备建立后备役等。

中华民国时期的国防体制研究 中华民国时期,一些革命党人、爱国将领和军事理论家,针对国家落后、防务薄弱、列强入侵的事实,广泛开展了国防体制研究,著书立说,倡导改革国防体制,加强国防建设,抵御外来侵略的思想。1921年,孙中山著《建国方略》一书,在“国防计划”部分,从国防经济、国防外交、国防教育、国防军建设、国防目标等方面,系统论述了国防体制,对国防建设提出了宏观设想,其中许多内容都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行性。其后,有关国防和国防体制研究的著作不断问世。如蒋百里的《国防论》(1937)、沈清麈的《中国国防史略》(1937)、高明的《国防论集》(1937)、董问樵的《国防经济论》(1940)、黄淦著的《国防要义》(1941)、杨杰著的《国防新论》(1942)等,都对国防体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论证,强调中国必须建立科学完善的国防体制,加强国防建设,才能固国安邦。

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战争时期的国防体制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中国共产

党虽然没有掌握国家政权,但是在革命战争时期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探讨过国防体制问题,并在国防体制问题上,提出了富于创造性的思想和主张。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事制度即革命根据地军事制度建设的实践中,开始探讨国防体制问题,在实践中建立了主力红军、地方红军和赤卫队、少年先锋队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并对革命根据地政权与军队的关系、经济体制等与国防体制有关的问题进行了探索。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日军的猖狂进攻,在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活动中,共产党站在全国、全民族抗战的高度,大力开展了对国防体制的研究,除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定一系列抵抗日本侵略的方针政策以外,还提出了变革完善国防体制的主张,如建立民主的统一战线基础上的国防领导体制,设立由各方面参加的经常的国防会议,讨论和决定国防计划和作战方针;动员全国陆海空军,实行全国总动员,武装人民,发展抗日的游击战争,配合主力军作战;改革军队的政治工作;在全国各地建立军区,动员全民族参战,逐步从雇佣兵役制转变为义务兵役制;实行战时的财政经济制度等。解放战争中,根据大规模作战的需要,进一步探索和研究了建立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问题,并在实践中得到了成功的运用。上述理论和实践的成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国防体制的研究,乃至军制学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国防体制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多次强调加强国防体制研究,结合中国新的国防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探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体制的许多问题,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

量,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建立强大的正规军与广大的民兵组织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建立民兵与预备役相结合的后备力量体制,适时实行义务兵役制度,建设现代化的军兵种,完善军队的政治工作制度等。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军队的各项建设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80年代中期,邓小平通过对国际形势的长期观察和冷静思考之后,作出了战争与和平问题新的判断,适时提出了国防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国防建设服从经济建设大局,走质量建军道路的国防体制思想。此后,又陆续提出了要突出军队的战斗队职能,把提高战斗力作为军队建设的根本标准;军队要精简整编,建立科学的编制体制;精简整编要实行精兵原则、合成原则、平战结合的原则、提高效能的原则;对国防科研机构和国防工业实行体制改革,既要立足自力更生,又要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要在整顿现有武器装备的基础上,建立科技先行、多搞技术储备的武器装备发展体制等等。

江泽民根据毛泽东和邓小平国防体制建设的思想,一再强调:必须加强国防建设,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要相互促进,协调发展;要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军队建设要走精兵之路;军队要实现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的转变;要依法治军,从严治军;要强调改革不合理的体制编制,使军队的规模、结构和指挥体制适应未来战争的要求等等。这些,都为国防体制研究明确了方向。

广大科研工作者和职能部门,依据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国防体制问题的总体思路,对国防体制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研究成果 多年来,军内外学术研究机构 and 专家、学者,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广泛开展了国防体制研究。1987年,经中央军委委员会批准,军事科学院开展了2000年中国的国防系统研究,对国防体制涉及的所有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1988年中国军事年鉴》设国防体制专栏,系统介绍了中国的国防体制。此后,陆续出版的《国防建设研究》(1988)、《中国的国防构想》(1988)、《大国防论》(1988)、《国防建设概论》(1989)、《社会国防概论》(1992)、《现代国防论》(1993)、《有中国特色的国防建设理论》(1993)、《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研究》(1994)、《军事组织体制研究》(1997)、《中外军事组织体制比较教程》(1999)等著作,都从不同角度对国防体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中国军事百科全书》还设有《国防体制》专条,对国防体制的概念、属性、主要内容和国防体制的特色等,进行了简明扼要的分析 and 阐述。军事科学院军制研究部在多年国防体制研究的基础上编著的《国防体制教程》(1999)一书,是20世纪国防体制研究的最新成果。上述专著在揭示国防体制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规律的同时,还研究探讨了以下主要内容:①国防体制概论,重点研究了国防体制的形成与发展、主要构成与特征、地位与作用及发展趋势等。②中国国防体制发展简史。系统地研究了夏、商、西周至民国时期国防体制的发展变化及主要特点。③国防领导体制。探讨了国防领导体制的构成、特征、作用、制约因素,重点介绍了中国和外国最高国防决策机构、国防领导和管理机构。④武装力量体制。扼要阐述了武装力量体制的基本概念、构成要素、形成与发展、制约因素,重点揭示了武装力量的基本类型、主要特点和发展趋势等。⑤国防动员体制。重点研究了国防动员体制的产

生与发展、地位与作用,以及国防动员领导体制、国防动员法规体制、国防动员计划体系等。⑥兵役制度。系统介绍了近代、现代兵役制度的发展概况,征兵制的形成与发展、募兵制的衰弱与复兴、征募混合制的产生与兴起,现役制度、预备役制度、兵役保障制度等。⑦国防经济体制。探讨了国防经济体制的概念、发展概况,阐述了决定国防经济体制的主要社会条件,国防经济体制的基本类型、主要内容,以及中国国防经济体制的建立与改革等。⑧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管理体制。研究分析了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管理体制的发展概况、基本类型,揭示了现代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管理体制的主要特征,提出了建立现代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管理体制应把握的基本原则。⑨人防体制。研究了人防体制的发展概况、人防领导体制、人防体系及人防体制的发展趋势等。

发展趋势 21世纪,中国国防体制研究将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将更多地重视新的国际格局对国防体制的影响,注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防体制的改革与完善,深入研究 with 质量效能型和科技密集型军队相适应的国防领导体制、武装力量体制、国防动员体制、兵役制度、国防经济体制、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与管理体制、民防体制等,促进中国的国防体制向科学、合理、高效的方向发展,从而推动中国国防建设的现代化进程。

参考文献

苏志荣主编:《国防体制教程》,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9。

(隋东升)

陆军军制研究 (study of army military system)

探讨陆军军事制度及其发展规律进行的

活动。研究内容主要包括陆军制度的本质、特点、内容和形式、结构与功能、发展的规律等。陆军军制研究对确立和完善陆军制度,加强陆军建设,提高陆军战斗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清末和中华民国时期的陆军军制研究中国对陆军军制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近代以来也一直比较活跃。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关近代陆军军制研究的理论专著开始问世。1899年清政府出版的中国第一部《军制学》和1903年北洋将弁学堂编纂出版的《军制学》教课书,均是以陆军制度为主要内容的著作。1905年,清政府成立贵胄学堂,专设“陆军军制学”课程,编写的陆军军制学教材,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和世界部分国家陆军的有关制度。中华民国时期先后编著出版的几十种版本的《军制学》(1918)、《军制学讲义》(1923)、《军制学教程》(1928)、《军制学概要》(1931)、《各国军制要纲》(1931)、《现代之军制与统帅》(1935)、《英国陆海军新论》(1944)等理论著作,皆从不同角度重点探索了陆军制度的性质、功能、特点、规律及各项工作制度等。这个时期出版的《西国陆军制考略》、《列国陆军制》等著作,则对英国、印度、加拿大、德国、法国、俄国、意大利、美国等国家陆军的有关制度进行了较全面系统的介绍。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战争时期的陆军军制研究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战争时期的唯一军种。如何建设这支陆军,以何种陆军军事制度建设这支陆军,是人民军队军制必须研究解决的重要问题。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积极探索适应不同战争性质和战争局势的陆军体制编制,总结人民军队陆军制度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形成了以毛泽东军制思想为核心的陆军军制理论,推动了中

国陆军军制学的发展。主要成果有:①提出必须建立和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制度,其基本内容为:在军队服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面领导的前提下,由中央军事委员会集中统一领导和指挥军队及军事工作;在军队中自上而下地建立健全党的组织系统;确立党的委员会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②要建立完善的政治工作制度,以加强军队的思想政治建设,如政治工作干部制度等。③人民军队必须实行民主制度,即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④必须建立严格的纪律,保证全军高度的集中统一,并提出了独具特色的人民军队的纪律。⑤要实行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干部制度。⑥要采用既高度集中又高度灵活的指挥体制。⑦要从实际出发,根据战争的需要不断调整陆军的编制体制。⑧要建立自力更生、勤俭节约的后勤保障制度,以适应艰苦战争的需要,确保战争的胜利。这些军制思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还推广到空军、海军和第二炮兵部队的建设中,对人民军队的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陆军军制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更加广泛地开展了对陆军军制的研究。毛泽东在要求军队继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战争年代的光荣传统,坚持无产阶级军队的本色,大力加强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同时,还提出陆军必须继续加以强化;陆军要现代化、正规化;陆军、空军和海军都必须有充分的机械化的装备和设备;要精简军队员额,主要是陆军员额,以加强空军、海军和陆军中的装甲兵、炮兵、防空部队(后转属空军)等技术兵种的建设等等。50年代,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和军事科学院的相继成立,陆军军制研究进一步深入。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邓小平果断提出国防和军队建设要实行战略转变,要坚持人民军队的建军基本原则,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要实行精兵政策,减少数量,提高质量,把军队高精干;要搞好军队体制编制改革,实行科学编组等等。1985年中共中央、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裁减员额100万,并确定了《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所有这些,都与陆军军制研究有密切的关系。在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指引下,陆军军制研究获得了新的动力,明确了研究方向。

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军队学术界开展了对外国陆军军制和法规的研究和介绍,先后发表了数百种研究和介绍世界许多国家陆军体制编制情况的出版物,对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的情况还进行了长时期的跟踪研究,以探索陆军军制的发展规律和未来发展的发展趋势。军事科学院编辑的《世界军事年鉴》和主办的《外国军事学术》,对各国陆军的体制编制、教育训练、人事管理、行政管理、武器装备管理等制度及军事法制情况,均作了不同程度的分析、研究和介绍。《解放军报》和军事院校、军事科研机构的学报及刊物,发表了许多探讨中国陆军制度改革的学术文章。军事科学研究单位与军事职能部门紧密结合,就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的体制编制、后勤保障体制、部队管理教育制度等问题,做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和论证,向中央军委及总部机关提出了不少咨询建议。80~90年代出版的《国家军制学》(1987)、《武装力量体制概论》(1991)等也开展了对陆军制度的深入研究,论述了陆军体制编制、兵种结构、层次结构和职能结构;探索了确定陆军编制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分析介绍了世界各主要国家的陆军体制、兵种结构、组织层次、编组类型、部队合成和指挥体制。《中国大百科全书》和《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分

别设有关于陆军制度方面的若干专条,对陆军体制编制、教育训练制度、人事制度、管理制度、兵役动员制度和陆军制度历史等,作了较全面的阐述。

1997年,由军事科学院军制研究部与陆军指挥学院、陆军参谋学院组织专家学者编著的《陆军军制学》,是最具代表性的一部专著,是中国第一部全面论述陆军体制编制和工作制度建设的理论专著。该书按照军事制度的体系结构和层次结构,全面阐述了陆军军制和陆军军制学的基础理论,包括陆军军制的基本概念、内容、实质与特点、功能与作用、制定与实施,以及马克思主义军制思想,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的军制思想,综合论证了军事法制与陆军法制对国防、军队及陆军建设的保障作用和推动作用,提出了加强中国陆军法制建设需要做好的各项工作;论述了陆军组织制度,即陆军体制编制,包括陆军的总定额、整体结构、领导指挥体制、兵种体制,陆军野战部队体制、教育训练体制、政治工作体制、后勤体制,陆军技术保障体制,后备力量体制、动员体制、编制的构成形式、基本类型、建立原则与要求,以及发展趋势等;论述了陆军各项工作制度(亦称陆军的各项管理制度),重点对陆军教育训练、管理教育、武器装备管理、政治工作、后勤、动员等工作制度和战场管理制度的地位与作用、主要内容、制定与实施的基本要求等进行了全面研究和论述。

发展趋势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武器装备的不断更新和战争样式的变化,陆军军制将不断改革和完善,陆军军制学也将有更大的创新、丰富和发展,分支学科将增加,应用指导性将进一步增强。中国陆军军制学研究将更加紧密地联系中国军队改革中陆军面临的现实问题,突出对质量效能型和科技密集型陆军制度的研究,探索信息化、数字化陆

军建设问题,强化军兵种联合作战中的陆军制度问题,推动中国陆军的现代化建设。

(隋东升)

海军军制研究 (study of naval military system)

探讨海军制度及其发展规律等进行的的活动。研究内容包括海军制度的基础理论、海军结构与定额、海军体制、海上兵力编组、海军编制、海军各项工作制度、海军动员制度、海军法制和国际海洋法、海战法、海军制度史和外国海军制度研究等。开展海军军制研究,对于认识海军制度的性质、功能、特点、规律,合理确定海军的结构及各种制度,加强海军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清末的海军军制研究 中国是古代海军的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中国就对海军军制颇有研究。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开始筹建中国近代海军。为加强海军建设,清政府先后在福州、天津、广东、旅顺、威海、烟台等地建立了船政学堂、水师学堂,广泛开展对海军军制的研究和教学。为借鉴外国海军军制,还分别于1903年和1907年翻译出版了日本的《海军军制概要》和《日本海陆军制法规全编》两书。1909年,海军统一编制,成立巡洋舰队和长江舰队,1910年正式设立海军部,并继续深入进行对海军军制研究。清末姚锡光的《筹海军刍议》是这一时期海军军制研究中比较重要的成果。该书认为,巡洋舰为长驱远海之具,浅水炮舰只能巡视近洋,不能保障中国的海防安全,应发展海军的巡洋舰部队,掌握与海防有关区域的制海权。他根据清政府经济状况,按照掌握制海权的需要,提出了海军的体制编制规划,武器装备发展、海军人员教育的制度,海军军区和军港、厂、坞等的设置规划。但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该书的主张实际上并没有对海军军制的发展真正起到任何

作用。

中华民国时期的海军军制研究 中华民国初期,水师改为海军,水师学堂均改称海军学校,进一步加强了海军军制的研究和教育。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海军舰艇损失殆尽,海军学校大多停办,海军军制研究停滞。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重建海军,并分别在上海、青岛重新组建海军学校和海军训练团,重新开展了对海军军制的研究和教育。这一时期海军军制研究的代表人物是海军将领陈绍宽。他曾多次考察国外海军发展情况,多次就海军建设问题上书国民党政府,并发表过较多的讲话和文章,论述海军建设问题,其中有一些内容涉及海军军制,如《在海军部成立四周年紀念会上的开会词》(1933)、《海军之建设》(1941)等。其主要观点有:①海军必须具有与国防任务、与陆军和空军相称的规模。国家的强弱,领海是否完全,全看海军的力量,海战一输,陆战便补救不及。因此,不能厚陆薄海,优空制海,必须同样重视海军建设。②原有的海军部队远远不能满足国防的需要,必须扩充,特别是要加强海军舰艇和海军航空兵部队的建设,要建立自己的潜艇和飞机母舰部队。③将国内分散的海军统一起来,加以整顿,以备国防之需。④海军建设应依据中国海岸线长、内地水道复杂的情况,在海外设立南、北、中三区舰队,在内江建立长江、珠江两区舰队,另组练习舰队,以满足国防需求。在海军兵种结构方面,应专以国防自卫为目的,要加强驱逐舰、潜艇、鱼雷快艇、炮舰等部队的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海军军制研究 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49年4月组建华东军区海军,开始接收国民党海军起义的舰艇部队。同年5月决定创建安东海军学校,8月在南京创办华东军区海军学校,11月决定在大连创办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学校,1950年4月,

海军领导机关成立。随着海军的建立和发展,海军军制研究逐步展开。

1951年10月,毛泽东指出:“海军就其性质和任务来讲,它是一种与陆军不同的武装力量。因此,它在建军的计划上,武装力量的组织上,政治工作的建设上,干部的培养与使用上,业务技术的教育与指挥上,各种编制、制度、条令的规定上,以及全面性的兵力武器的调动与使用上,又规定了它的统一性,集中性与整体性的特点”。据此,50~60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加强了对海军军制研究。最初的海军军制研究,是在学习苏联海军军制基础上,围绕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建立什么样的海军展开的,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指示,决定有计划逐步地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50年代初,对海军建设的实施方案和战斗力量建设的重点即海军结构问题,进行过较深人的研究。1950年8月海军的建军会议经过反复研究,确定先建设一支轻型的海上作战力量,它应该包括水面舰艇部队、潜艇部队、海军航空兵部队、岸防兵部队、海军陆战队及各种专业勤务部队,建军初期则以航空兵、潜艇、快艇部队为主,其他兵种相应发展。这样的海军是适应当时近海作战和岛屿登陆作战的需要的。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对海军的院校体制、武器装备保障体制、卫勤保障体制等进行过研究和探索。进入80年代后,海军军制研究更加活跃。为大力开展海军军制研究,海军有关部门还建立了专门的学术研究机构——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和海军百科编研室。部队、院校、机关和有关人员还密切结合工作实际,撰写了大量学术文章和研究报告,积极探索如何改革和完善海军军制。《人民海军》、《海军杂志》、《海军学术研究》、《当代海军》等发表了大量海军军制研究的学术文章,有关海军军制研究的理论著作亦不断问世。如:《国家

军制学》设专章对海军体制进行较系统的研究,着重阐述了海军的总体结构,领导指挥体制,舰队体制,武器装备、后勤保障体制等问题。《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1989)、《海军大辞典》(1993)、《中国海军百科全书》(1998)等分别设有海军军制的若干条目,对海军的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作了较为系统的介绍。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还研究编写了《海军军制学》(1994)、《海军法规概论》(1995)等理论专著。主要内容包括:①总结了人民海军军事制度建设的历史经验,探索了海军军制产生、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阐述了建立和完善海军军制所应遵循的原理和原则。同时,提出海军军制学是建设、管理和运用海军军事力量制度的科学,是国家军制学的一个分支,是军制理论在海军的具体运用和体现;开展海军军制理论研究的意义在于为制定和实施海军军制提供理论依据,为海军现代化建设服务;海军军制的性质决定于国家的社会制度,海军军制必须适应国家的经济能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国家军事战略和海军战略的需要,必须与国家整个军事制度相适应,同时又要照顾到海军的特点。②研究了海军的组织制度。分别对海军的总体结构和总定额、海军领导指挥体制、舰队体制、海军基地体制、海军航空兵体制、海军教育训练和军事学术研究体制、海军后勤体制、海军装备管理和保障体制、舰艇组织、海军编制等的基本概念、类型、构成、地位、作用,确立海军军制的原则,海军军制的发展趋势等,进行了综合分析和研究。③关于海军工作制度。分别对海军政治工作制度、海军行政管理、海军兵员管理、海军装备管理和保障、舰艇管理、海军动员、海军法规等项制度的概念、内容、特点、地位、作用、原则等进行了系统研究和论述。

发展趋势 随着海洋权益斗争和海军建

设的发展,海军军制研究将在深化海军军制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研究的同时,进一步加强海军制度现实问题的研究与论证;将在重视总结海军制度建设历史经验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对各国海军制度的比较研究和海军发展趋势的研究;将进一步加强海军法规特别是海洋法规的研究和运用;将特别重视利用新的技术手段和方法,不断改进和丰富研究方法,提高研究质量和研究效益,为优化海军制度提供高质量的理论指导。

(隋东升)

空军军制研究 (study of air force military system)

探讨空军制度及其发展规律进行的活动。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空军军制基础理论、空军规模、空军结构、空军体制编制、空军工作制度、空军法规等。开展空军军制研究,对于认识空军制度的性质、功能、特点、规律,合理确定空军军制,加强空军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华民国时期的空军军制研究 中国是建立航空部队较早的国家之一。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武昌、上海都督府先后购买外国飞机,成立航空队。1915年,孙中山在日本创办中华革命党飞行学校,后在领导广州革命政府期间,设立航空局,办航空学校,开展了对空军军制的初步研究。1920年后,东北三省和广东、广西、四川、云南等省地方政府也先后组建航空部队,创办军事航空学校,并分别开展了空军军制的研究和教学。1928年,国民党政府设立航空署,开始收编各省航空部队,抗日战争前夕建立了统一的空军。同时,先后建立空军军官学校,以及空军防空、机械、通信、测候和参谋等学校,广泛开展了对空军军制的研究和教学。1942年5月,罗机编写的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述空军军制的著作

《空军军制问题》问世,作为国民党空军参谋学校的空军军制学教材。该书的主要内容有:空军军制及建军,空军军令、军政与军训,航空兵要地与军制的关系,空军军制研究的范围,空军的组织,空军编制的特点,空军部队指挥单位,空军指挥系统,空军教育制度,空军后勤制度,空军动员准备等。在此前后问世的还有《空军军制笔记》,是国民党空军参谋学校聘请一位名为雷巴阔夫的外籍教官撰写的空军军制学讲义,由国民党政府航空委员会编印。该讲义除了对波兰空军建立的经过与组织沿革进行了介绍外,还对德国、英国空军的有关制度进行了介绍。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空军军制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就积极倡导开展空军军制研究。1949年11月,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领导机关。1950年4月,毛泽东为空军题词:“创造强大的人民空军,歼灭残敌,巩固国防。”毛泽东还号召空军积极开展空军军制研究,加强空军建设。此后,人民空军陆续创办了一大批空军院校,广泛开展了空军军制研究和教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空军军制研究可以1978年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78) 这一阶段主要是对人民空军建设面临的各种问题进行研究,其成果大多体现在关于空军军制的决策及条令、条例和教材中。

建国初期,空军军制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建设一支什么样的空军的问题。当时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经过反复研究,提出“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的思想,人民空军的军制建设要继承陆军的优良传统和包括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等有关制度,指出:既不能脱离人民解放军建军的优良传统另搞一套,又要注意空军的具体条件,不能机械地搬用陆军的经验。1950年,根据当时空军可能担负的

作战任务的需要,确定了空军建设的四年计划,准备组建若干航空兵团,空军的总员额为29万人。空军部队的编制也是当时研究的重要问题,最初认为40架飞机为一个团,后来根据空军初建缺乏经验的实际情况,确定了以20架飞机为一个团的编制。对于空军的兵种结构,也陆续进行了研究,推动了空军歼击航空兵、轰炸航空兵、强击航空兵、运输航空兵及各种专业勤务兵种的建立。1953年12月7日~1954年1月26日的全军军事系统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会议,确定了把军队建设成为一支优良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总方针和总任务,空军由此进入了全面建设的时期。1957年,曾经研究探讨了空军与防空军的体制编制问题。中央军委充分考虑了各方面的意见,最后研究确定了空军与防空军合并,建立空防合一的空军方案。

50年代末到60年代,空军狠抓了条令和教材建设,到1965年,编写了306种条令、条例和教令,其内容涉及国家的航空法、飞行基本规则和空军的战斗条令、飞行教令,以及武器装备的使用、管理、维护制度,以及各种勤务和专业保障制度,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飞行管理基本规则》、《空军参谋工作条例》等,空军军制应用研究得到很大的发展。

第二阶段(1978~2000) 这一阶段,对空军军制进行了有组织的、系统的研究,是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对策性研究共同发展、相互促进的时期。

70年代末,空军有关部门成立了编研室,加强了对空军军制的研究。80年代中期,空军指挥学院研究部编设了军制研究室,大力开展空军军制研究。空军许多报刊发表了多篇空军军制研究的学术文章,对空军军制理论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87年出版的《国家军制学》设专章论述了空军体制。学

术界还着重研究探索了空军的构成、空军装备管理体制、空军部队组织体制、空军指挥体制、空军后勤体制和空军技术保障体制。《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1989)、《中国军事百科全书》(1997)、《空军大辞典》(1996)等分别设有空军军制的若干条目,对空军军制作了较为系统的介绍。与此同时,空军军制研究的专著《空军军制学》(1989)、《空军军制学教程》(1990)等也相继问世,较系统地阐述了空军军制的理论体系,全面地总结了人民空军军制建设40年的历史经验,探索了空军军制建设和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些著作所论及的主要内容有:①空军军制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空军军制基本原理,研究空军军制理论的重要意义。②空军体制。系统研究了空军总体结构和总定额、空军领导指挥体制、空军教育训练体制、空军后勤体制、空军装备管理体制、空军技术勤务保障体制等。③空军编制。重点分析了空军编制的概念、作用和分类,制定空军编制的原则,空军编制的管理。④空军兵员管理。阐述了空军兵员的基本特点和管理任务,空军兵员管理的基本原则,空军兵员管理制度。⑤空军飞行人员管理。分析了空军飞行人员管理的基本原则、主要内容和各项制度。⑥空军装备管理。阐述了空军装备管理的作用和原则,研究了装备管理制度的主要内容及特征。⑦空军管理教育。论述了空军管理教育的基本原则及各项制度。⑧空军动员。论述了空军动员的作用、内容、特点、原则和各项制度。⑨空军法规。介绍了空军法规的种类、地位和作用,阐述了制定空军法规的原则和程序,以及空军法规的执行和监督等。

发展趋势 21世纪初,军事技术和空军装备迅速发展,战争样式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空军军制研究将向科学化、系统化发展,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将更加注重高技术条件下

作战对空军军制提出的新问题的研究;将更多地运用计算机、信息技术和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新的技术和理论,更多地采用模拟及实验的方法,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紧密结合起来,研究和解决空军军制方面的新问题,不断地提高空军军制研究的效益。

(隋东升)

军事制度史研究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military system)

探讨古今中外军事制度发展过程及其变化规律的活动。军制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其研究按范围分为军制发展沿革史、军制思想史与军制学术史、专项军事制度发展史和军事法制史研究等。研究内容包括:各国军事制度的形成、发展与变化的过程,基本形态、内容、特点、制约因素,各项制度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规律性。其基本任务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考察各项军事制度产生、发展的过程与规律,分析研究其基本性质、功能作用、表现形式和主要特点,比较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制定的军事制度的异同和优劣,评价其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影响与制约作用,为国家制定与实施军事制度,提供历史的、理论的依据或借鉴。

在中国,军事制度历史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宋朝就已经有人开展系统的军事制度历史研究,如陈傅良的《历代兵制》。20世纪,中国的军事制度史研究,大体可分为以下两个时期:

中华民国时期的军事制度史研究 中华民国时期的军事制度史研究是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出现第二次军制史研究高潮的继续。主要研究成果有:黄坚叔的《中国兵役法考徵》(1933)和《中国军制史》(1934),秦松石的《中国历代兵制概要》

(1937),罗尔纲的《湘军新志》(1939)、《绿营兵志》(1945),刘公任的《中国历代征兵制度考》(1944)等。这些著作,除罗尔纲的几部外,多数理论性不强,不仅没有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也没有从国家学说上解释军事制度的理论与实际问题。

这一时期,特别是30~40年代,各种报刊上还发表了有关军制史的学术论文,但大多数集中于对明代专项军事制度方面的研究。如《明辽东“卫”“都卫”“都司”建置年代考略》、《明代辽东卫所建置考略》、《明代辽东归附及卫所都司建置沿革》、《明代九边军饷》、《释明代都司卫所制度》、《明末的兵与虏》、《明之工兵制》、《明之军饷》、《明代卫所制度兴衰考》、《辽金军考略》等。这些文章主要是对中国历史上军事制度的史实所做的考证,理论研究色彩比较薄弱。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制度史研究 这一时期又分为两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50~1978)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许多历史学者和教育工作者,在研究和教学工作中,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某一时期或某一方面的军事制度,作出历史性的分析和探索。主要著作有:岑仲勉著的《府兵制度研究》(1957)、谷霁光著的《府兵制度考释》(1962),唐长孺著的《唐书兵志笺正》(1962),兰永蔚著的《春秋时期的步兵》(脱稿于1974,但于1979年出版)等。

除了著作和教材外,还发表了大量论述军制历史经验的学术文章。如《论明季兵营之积弊》、《明代初置建州卫卫址考》、《朝鲜史籍中之“移兰豆漫”与明代三万卫考》、《明代初期西北七卫的设置》、《明代的军医制度》、《明代必里卫考》、《西汉部曲初探》、《居延汉简中的省卒》、《明初东胜的设防与弃防》、《略论西周金文中的“六师?”和“八师?”

及其屯田》、《记明季的乡兵》、《明代卫所制度之研究》、《元代的探马赤军》、《论明代封藩与军事职权之转移(上下)》、《明代北边军镇及卫所的崩溃》、《明代卫所的军》、《明代亦儿古里卫的设置和管辖》、《元代军事制度》等。

这一时期,学术论文不仅数量增多,而且观点也更加鲜明,涉及的范围也十分广泛。“文化大革命”期间,军事制度史研究停顿了十年。

第二阶段(1979~2000)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发展时期,军事制度史研究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大发展的阶段。断代军事制度史的研究著作有:王曾瑜著《宋朝兵制初探》,黄今言所著《秦汉军制史论》。军事制度通史的研究著作有:中国军事史编写组编的《中国军事史(第三卷)》(兵制卷,1987),陈群著《中国兵制简史》(1989),徐勇和张焯著《简明中国军制史》,军制研究部刘展主编的《中国古代军制史》(1992),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军事科学院军制研究部联合编纂的《中国军事制度史》(1997)。《中国军事制度史》是第一部从上古一直到当代中国军事制度的军事制度通史著作,内容包括军事组织体制、军事教育训练制度、武官制度、后勤制度、兵役制度和军事法制等,同时也开启了专项军事制度的通史研究。在专项军事制度方面,80年代出版了杨洋的《明代奴儿干都司及其卫所研究》等。

这一时期发表的军制论文数量空前,例如:《探马赤军考》、《木华黎国王麾下诸军考》、《西魏北周统一与割据势力消涨的辩证关系——四论西魏北周和隋唐的府兵》、《探马赤军问题再探》、《两汉之际河北农民军杂考》、《探马赤军问题三探》、《试论秦汉的“正卒”徭役》、《汉代河西军屯劳动者成分的生活

状况》、《汉代兵制述略》、《汉代兵制及汉简中的兵制》、《说幽在西周时代为北方国事重镇——兼论军监》、《就殷墟甲骨所见试说“司马”职名的起源》、《明代松花江流域卫所设置考略》、《近代中国的军官学校》、《东吴屯田制探略》、《评“明代奴儿干都司及其卫所研究”》、《孙吴的兵制》、《历代兵役制度概述》、《秦汉徭役制度辨析》(上下)、《论中国奴隶制军队行政法》、《清末禁卫军》、《青海木简与汉代军队》、《试论西周军事领导体制的一元化》、《张之洞与清末军制改革》、《论魏晋南朝都督制》、《辽朝军政制度考索》、《论明代军事家丁制度形成的社会经济条件及其发展》、《论十六国时期胡族政权的兵役》、《明代营兵制初探》、《西方的冲击与八旗军的改造》、《五代后周的军队改革》、《北宋军赏制度考述》、《明代的京营》、《宋代宦官对军队的监督与指挥概述》、《中国古代的监军制度》、《中国历代军事职官制度》、《甲午战争与清政府的兵制改革》等。这些研究成果不仅深入挖掘了中国历代军事制度的原始资料,而且为中国军事史的研究提供了素材,为中国当代军事制度的改革提供了历史借鉴。

发展趋势 在未来的军事制度史的研究中,将可望在断代史研究方面有所突破,在专项军事制度史和中外军事制度史的比较研究方面,也将有新的开拓性发展,研究的方法和手段也将有所创新。

参考文献

谷霁光著:《府兵制度考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刘展主编:《中国古代军制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

陈高华、钱海皓主编:《中国军事制度史》,郑州:大象出版社,1997。

(季德源)

外国军制研究 (study of foreign military system)

探讨外国军事制度的性质、特点、现状、历史发展及发展趋势等进行的学术活动。军制专业研究方向之一。重点是翻译和介绍外国军事基本制度,分析外国军事制度的内容、特点与发展变化规律,对中外主要军事制度进行对比研究等。主要任务与目的是了解外国军事制度建设情况,借鉴外国国防与军队建设的有益经验。其中,中外军事制度比较研究已经成为军制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对于外国军事制度的研究,19世纪末期就已开始,并相继翻译和刊印了《德国军制述要》、《列国陆军制》和《西国陆军制考略》等。20世纪,中国的外国军事制度研究大体分两个发展时期。

清末和中华民国时期的外国军制研究 20世纪初期到辛亥革命前后,随着清政府军制改革的需要,外国军制研究达到了一个高潮。自此到30年代中期,对外国军事制度的介绍与研究主要有三条途径:一是清政府派员出国考察西方国家军政制度;二是由陆军部派遣留学生出国留学,学习和了解西方国家陆海军的建军思想和军事制度;三是聘请外籍军事顾问,在军事学堂中讲授外国军事制度。

这一时期,先后受到清朝军事制度改革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在介绍外国军事制度的基础上,对西方资产阶级共和体制下的军事制度,包括军事领导指挥体制、武装力量体制、军队军兵种体制、后勤保障制度和兵役制度等,均结合中国特点,作出了初步的理性分析。主要研究成果有:《中外时务海防策要》、《赴日考察军事报告书》、《军制》(五卷本)、《列国陆军制》、《德国军制述要》、《意大利军制》(载《军制学与战法学》一书中)、《日本军制》、《日本陆军军制法

规》、《考察日本军政纪略》、《军制学讲义》、陆军大学校第七期教材《军制学》、《参观日英法北陆军报告示件》及《邻邦兵备》(俄、美、德、法、英等)等。其特点是突出了对外国国家的军事体制和军队编制等制度的研究。《动员学讲义》、《国家总动员讲义》、《动员计划》、《动员业务摘要》、《裁兵计划书》、《日本陆军动员计划令》等,对外国的动员制度作了介绍和理论阐述。

3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各国军事制度有了很大变化,中国对外国军事制度的研究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特点是出现了对空军军事制度的介绍,突出了动员制度及与之相关的兵役制度等专项军事制度的介绍和分析研究。主要成果有:《各国兵役行政概论》、《各国兵役制度》、《各国兵役制度纲要》、《日本军制沿革概略》、《日苏军制及政治近势》、蒋百里编译的《新兵制与新兵法》等。翻译西方军制研究的著作有:《海军军制概要》、《国民皆兵论》、《空军军制笔记》、《新军论》、《日本北海道屯田兵制》等。对外国军事制度的研究和探讨,促使国民政府军事教育体制和兵役制度等发生重大变化,如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课程设置由日式改为德式,教材亦由日式改用德译军事书籍,开始实行征兵制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国军制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在军制研究方面,主要是翻译了一批苏军的条令、条例、教范,对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建设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从50年代末期开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对外国军制的介绍受到很大的限制,研究工作基本停滞。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当时,根据苏联、美国两个超级大国军事对抗的世界战略格局,中国加强了对苏美两国军制的

研究,研究的重点是其国防体制、武器装备体制、军队管理制度和军事法制情况等。同时,也注意对周边各国和世界上一些重要国家军事制度的了解与研究。这方面的翻译、编译、研究性的出版物数以千计,从研究的深浅程度上可以分为研究成分很少的直接翻译类出版物,进行了一定的分析、归类研究的编译类出版物,进行较深入分析、得出较高层次理性认识的研究类出版物。从研究内容上则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类:一是整体上介绍某一国家军事制度的,如军事基本情况类的出版物。二是介绍某一国家某一方面军事制度的,如介绍某一国家国防体制、陆军制度、海军制度、空军制度、动员制度、兵役制度等的出版物。三是对外国军队特点、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进行了一些理性分析和研究的出版物。四是进行国家军事制度比较研究的出版物。

这一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还创办了《外国军事学术》杂志,经常刊载介绍和研究外国军事制度的文章。1985年起,由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年鉴》编辑组编辑、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军事年鉴》,逐年介绍世界各国军事基本情况,有选择地介绍外国的一些基本军事制度,如国防体制、兵役制度、国防动员制度、军队管理制度和军事教育训练制度等。专业研究队伍于80年代中期起,还研究出版了系统介绍外国军事制度的系列成果,如《苏联军事基本情况》、《美国军事基本情况》、《日本军事基本情况》、《俄罗斯军事基本情况》等。这些研究成果以国防和军队组织体制编制为重点,系统地介绍各相关国家的主要军事制度情况。1996年出版了吴维满的《美国预备役部队建设研究》。空军指挥学院、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军事科学院军制研究部、陆军指挥学院和陆军参谋学院等单位编纂的《空军军制学》、《海军军制学》和《陆军军制学》等著作,对外国陆军、海军、空

军的军事组织制度和各项管理制度,也都作了较为系统地研究和介绍。军事科学院军制研究部,还将“中外军事组织体制研究”列为研究生必修课,编写了《中外军事组织体制比较教程》等教材。

发展趋势 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军队科研机构与国外联系的渠道将更多,中外军事交流将更加频繁,外国军事制度研究的领域将进一步扩展,将由客观介绍、综合分析向对比研究和专项考察发展,研究的内容将向更加深入、更加系统的方向发展。

(季德源)

军队管理研究 (study of military management)

探讨军队管理活动及其基本规律的活动,研究对象是军队的管理及其发展规律,包括管理的原理原则、法规制度,科学的管理方法,以及对军队管理对象所进行的组织、计划、协调、控制,以实现管理目标的活动。其研究内容有:①基础理论研究,主要包括军队的概念、基本特征、地位和作用、原理和原则、职能和任务、法规和制度、方法和手段、军队管理史等。②应用理论研究,主要是对军队管理学众多分支学科的研究。按部队划分,有对军队领导机关管理、部队管理、分队管理的研究。按军兵种划分,有海军管理、空军管理、战略导弹部队管理研究等。根据管理内容或专业,有作战管理、行政管理、训练管理、政治工作管理、后勤管理、武器装备管理、军事院校和科研管理研究等。

中国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历代军事家都十分重视军队管理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实践和理论研究成果,形成了自己的管理理论。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古代和近代的军队管理研究主要靠管理者个人的经验,尚未形成系统的军队管理理论体系。

清末和中华民国时期军队管理研究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军事制度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之后,清政府为维持其封建统治,开始实行“新政”,编练“新军”,引进先进军事技术、西式教育训练制度和管理制度,开办军事学堂,改革军事制度,颁布了《军队内务条例》、《军队纪律条例》、《步兵暂行操法》等军事法规。所有这些,对促进中国军队管理形态及其研究由古代向近代过渡,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些法规,但未来得及施行。北洋政府时期,由于军阀混战,军队建设和管理未能走向正轨。1924年1月,孙中山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此后,建立国民革命军,开始学习苏俄的建军经验,建立政治工作制度,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聘请苏俄专家担任军事顾问,指导军队建设。孙中山主张,用革命的精神教育和管理军队,用苏联军队的制度和办法管理军队,对军队管理研究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队管理研究 中国共产党人的军队管理理论研究,开始于大革命时期。那时,周恩来、李富春等许多共产党人受共产党的指派,到国民革命军中担任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的军、师级政治工作领导职务,或在黄埔军校担任教官。他们发表了许多讲话和文章,提出在国民革命军中要大力推行民主运动,反对打骂士兵,坚持在军队中建立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组织,向士兵宣传革命的主张,灌输革命的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军队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论研究的发端。到1927年6、7月间,共产党掌握和影响下的军队已近3万人。这些军队在革命精神、组织纪律性和管理方式等方面,同旧

式军官控制的军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1927年的“八一”南昌起义和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创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随着人民军队的诞生,实行了新型的军队管理原则、制度和办法。70余年来,人民解放军的管理研究经历了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革命战争时期的军队管理研究 人民军队初创时期,如何建设军队,以什么方法管理军队,就成为人民军队必须研究解决的重大问题。毛泽东从三湾改编、井冈山斗争,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召开之前,对人民军队的管理原则、制度和办法等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彻底批判和摒弃了旧军队的管理制度,开创了独具特色的管理制度和办法,创造性地解决了人民军队管理的一系列重大问题。①提出中国共产党对军队领导的制度,以中国共产党组织为核心的组织领导和管理体系。通过三湾改编,起义部队建立了团、营、连、排、班等军事行政组织;在连队建立党支部,班、排建立党小组,营、团建立党委,在连、营、团设置党代表,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在连以上单位建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在党代表领导下参加改善伙食、开展文娱活动等方面的管理工作。这就形成了以党组织为核心、行政组织为基础,以及群众组织士兵委员会构成的人民军队组织领导和管理体系。②提出在军队建立新型官兵关系。坚决主张废除旧军队的肉刑、枪毙逃兵等军阀作风和繁琐礼节,明确规定官长不许打骂士兵,开会士兵有说话的自由,经济公开,官兵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士兵对军官实行民主监督;官兵政治平等,只有职务的区分,没有阶级的界限,都是同志、战友和阶级兄弟。③制定严明的纪律和法规。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亲自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体现了人民

军队的性质和宗旨,而且也为人民军队的纪律奠定了基础。此后,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又称《古田会议决议》)中又明确提出了“编制红军法规”的任务。1930年9月,红一方面军颁布了《红军士兵会章程》。同年10月,红军又颁布了《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中国工农红军纪律条例(草案)》等军事法规。1936年8月,颁布了《中国工农红军暂行内务条例(草案)》。这些章程和条例的制定、颁布和施行,凝结着人民军队管理研究和探索的成果,标志着人民军队管理理论研究和管理制度、法规建设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④提出了人民军队的管理方法。古田会议之后,毛泽东深入部队调查研究,提出了管理教育部队的科学方法,即干部要深入群众,要群众化;要时刻关心战士、体贴战士;要处处以身作则,做战士的表率;要学会发动战士自己教育自己、管理自己,走群众路线;说服教育重于惩罚;宣传鼓动重于指派命令;赏罚要分明。毛泽东归纳的这七条革命军队的管理方法,不仅对当时贯彻落实古田会议精神起了重大作用,而且对指导人民军队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成为人民军队管理教育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

抗日战争时期,人民军队管理研究比较深入,管理思想不断成熟,管理理论原则进一步发展完善。毛泽东在《论持久战》(1938),朱德在《革命军队管理的原则》(1943)、《论军队的管理问题》(1943)等著述中,以及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分别作的《论联合政府》(1945)、《论解放区战场》(1945)的报告中,在阐述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建军原则的同时,都明确提出了人民军队管理的理论和原则。主要有:①官兵一致的原则。毛泽东明确提出官兵一致的原则,要在军队中肃清封建主义,废除打骂制度,建立

自觉纪律,实行同甘共苦。他认为,官兵关系搞不好,不是方法问题,是根本态度、根本宗旨问题,强调必须尊重士兵群众。在部队内部要进行拥干爱兵运动,号召干部爱护士兵,士兵拥护干部。^②大公无私的原则。朱德指出:“一切干部,学习用马列主义的原则,学习用革命的办法来管理我们革命的军队,是目前第一重要的事情。”他明确地提出:“革命的原则,这就是在对事对人上用‘大公无私’的原则。”要求对同志、对部属“一视同仁”,“赏罚公正”,“不应有亲、疏、厚、薄之分,不应有爱、恶、生、熟之别”。大公无私的原则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是人民军队一切带兵干部崇高的职业道德标准,是人民军队管理教育最基本的原则。^③干部以身作则的原则。朱德在《论军队的管理问题》一文中,系统论述了带兵的十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干部以身作则。他要求带兵干部要在日常生活中、在政治上、军事上处处以身作则,认为这比上正课、比有计划地去教育有时还要好。^④发扬民主的原则。毛泽东强调军队应实行一定限度的民主化。带兵干部要有群众观念和民主作风,要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官兵群策群力,搞好部队管理。

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大批地方部队、游击部队升级为主力部队,广大农民踊跃参军,国民党起义部队官兵和大批俘虏人员参加人民军队,新成分大量增加,加之战斗十分频繁,且规模越来越大,军队管理中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针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产生和不良风气的滋长,人民军队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加强部队管理,军队管理实践和理论研究都有了新的发展。^①更加重视强化组织纪律。1947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重新颁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要求全军必须提高

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由于广泛深入的教育,部队组织纪律观念不断增强,保证了作战任务的胜利完成。②创造了管理教育部队的新方法——新式整军运动。1948年,在全军普遍开展了以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为中心的新式整军运动,发动官兵进行自我教育,大大提高了官兵阶级觉悟,激励了部队的战斗意志,加强了管理工作。这一创造性的教育形式,对于人民解放军的巩固扩大和作战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也推动了军队管理研究的发展。③提出广泛开展军队内部民主运动,并完善了军队民主管理的理论。1948年1月,毛泽东在《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中,第一次把人民军队的民主概括为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使人民军队民主管理的思想理论化、系统化。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军队管理研究 这一时期的军队管理研究又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军队管理理论丰富完善阶段(50年代至60年代前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毛泽东发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的号召,并提出要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要加强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的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根据和平时期军队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重新修改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草案)》、《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草案)》,制定了第一部《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条令(草案)》,并于1951年初颁发全军执行。50年代中期,人民解放军实行了义务兵役制、军衔制、军官薪金制,以及干部下连当兵、干部值班和

留营住宿等制度,加速了军队正规化管理的进程。1961年5月,总政治部召开全军管理教育工作会议,会上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作了《关于加强连队管理教育工作问题》的报告,总结人民军队战争时期和50年代管理教育工作的丰富经验。此后,国防部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连队管理教育工作条例》,这个条例的主要精神是:一是明确提出了和平建设时期军队管理教育工作的基本任务和要求。基本任务是增强内部团结,充分调动全体军人的革命积极性,严格组织纪律,巩固和提高战斗力,保证胜利完成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和保卫祖国、保卫和平。二是明确规定全军在管理教育工作中,必须以毛泽东关于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为指针,坚持官兵一致、上下一致和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三是强调革命军队必须有严格的军事、政治纪律。四是要求各级党委、支部加强对管理教育工作的领导。为了加强官兵团结,针对新的情况,对干部、战士分别提出了八项要求,军队管理的实践和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军队正规化建设和管理工作受到很大挫折。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军事委员会日常工作后,狠抓包括管理教育在内的军队全面整顿,以克服“肿、散、骄、奢、惰”和解决领导班子的“软、懒、散”现象为主要内容的军队整顿全面展开,部队管理工作又重新走向了正确的轨道,军队管理理论研究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军队管理理论创新发展阶段(1979~2000)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时期,军队管理研究也迎来了发展新局面。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军队建设的发展,部队管理出现了管理工作与思想工作、军事训练工作紧密结合的趋势。于是,军队管理研究的范围也进

一步拓宽,加大了战备管理、训练管理、政治工作管理、后勤管理、武器装备管理等方面的研究力度,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到90年代后期,中央军委三次召开全军性的管理工作会议,研究探讨军队管理工作遇到的新问题,颁发了《关于加强军队管理教育工作的决定》,三次修订和颁发了共同条令,从而使军队管理的法规、制度建设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这一时期,军队管理研究的发展主要表现在:

引进现代管理科学,促进了人民军队管理的现代化。80年代初,人民解放军将现代管理科学引入军队管理领域,一些军事院校将“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理论引入管理理论教学,一些部队借鉴和推广了目标管理、矩阵管理、系统工程等管理方法,加之电子计算机在管理实践中的广泛运用,有效地促进了军队管理手段的现代化。

坚持弘扬优良传统,促进了军队管理的革命化。1986年11月,总参谋部军务部、军事科学院军制研究部等联合召开了军队管理学术研讨会,围绕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管理优良传统,建立具有人民军队特色的管理理论体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探讨。1994年11月中央军委颁布的《关于加强军队管理教育工作的决定》,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管理教育优良传统问题,把人民军队管理教育的优良传统概括为:“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官兵一致,尊干爱兵;发扬民主,依靠群众;严格要求,赏罚分明;说服教育,启发自觉;公道正派,不分亲疏;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干部带头,以身作则;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拥政爱民,军民团结。”同时,在全军部队普遍开展了“爱国奉献教育、革命人生观教育、尊干爱兵教育、艰苦奋斗教育”,从而把引进现代管理科学与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管理的优良传统结合起来,

有力促进了部队管理工作和管理理论的健康发展。

注重立章建制,促进了军队管理的正规化。邓小平主持中央军事委员会工作后,果断地作出恢复法制、健全法制的决策,要求军队所有的领域、所有的方面,都要制定章程。在邓小平加强法制建设的思想指引下,国家和军队加速了立章建制工作。制定了军事法律十余件,以及数以百计的军事法规,数以千计的军事规章,从而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法体系,促进了军队管理的正规化。

研究特点和规律,促进了军队管理科学化。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部队管理遇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管理的范围拓宽,任务加重,难度增大。为此,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江泽民关于研究治军、管理和带兵的特点和规律的指示精神,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军队管理特点和规律的研究,逐步形成了新时期军队管理工作以战斗力为标准,以人员管理为重点,以纪律建设为核心,以条令条例为依据的规律性认识。总结和归纳了发挥士兵基础作用与发挥军官主导作用相统一;依法从严施管与实行正确的政治精神贯注、启发自觉相统一;既要适应“市场”,又要面向“战场”;既要坚持军营相对封闭式管理,又要依托社会性管理;既要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优良传统,又要与改革创新,实行管理科学化相统一等原则。

随着军队管理实践和管理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军队管理理论专著不断问世。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000年,全军已经出版军队管理研究著作290余种。主要代表作有:王安撰写的《军事管理研究》(1987)、严芳田主编的《军队管理学》(1986)、周家法主编的《现代军队管理理论》(1995)、李祝文等著的《军队后勤管理理论》(1998)、张文焕等著的《空军部队管理》(2000)等。

发展趋势 进入 21 世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队管理研究将会在重视人的因素,依法施管,运用现代化的科学手段等方面得到较大发展。军队管理学科的综合性和日益增强,管理理论研究日益向组织高效化、手段现代化、人员专业化发展。

参考文献

总参谋部军务部编著:《我军管理教育研究》,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96。

王安等著:《军队管理规律研究》,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9。

(王安)

战争动员研究

(study of war mobilization)

探讨国家采取紧急措施由平时状态向战时状态转化的活动。亦称国防动员研究。其目的是揭示战争动员的特点和规律,为平时动员准备和战时实施动员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措施。

战争动员研究按不同的方法和研究对象可分为不同的研究方向。按研究问题的性质,可分为基础理论研究和现实课题研究。基础理论研究是对战争动员的作用、实施程序、制约因素等问题的研究,目的在于揭示战争动员最一般的规律;现实课题研究是对战争动员实践中的具体问题的研究,目的是为解决战争动员实践中具体问题提供方案或对策建议。基础理论与现实课题研究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基础理论研究需要以现实课题的资料为基础,与实践相结合,为实践服务;现实课题研究需要以基础理论为指导,对具体问题进行理性思考,把握其基本特点和规律。按动员时态,可分为平时动员准备研究和战时动员实施研究。战争动员是非常复杂的活动,平时准备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没有充

分的准备就没有有效的动员,因此平时动员准备研究是战争动员研究的重点内容。平时动员准备研究主要包括动员能力保存和调整、战略物资储备、动员体制和法规政策的完善、动员规划计划的制定等;战时动员实施研究主要包括战时动员令和动员任务的下达、实施程序、动员组织指挥等。按动员领域,可分为政治动员、武装力量动员、经济动员、医疗卫生动员、科技动员、人民防空动员等。随着战争动员实践的发展,动员研究的领域和内容不断扩大,研究方法不断改进。

20 世纪,中国的战争动员研究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中华民国时期的战争动员研究 1911 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封建统治,但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随后爆发的讨袁战争、护国战争、护法战争等,为中华民国的战争动员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实践经验。1924 年,孙中山在共产党的帮助下,确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政策,把组织革命力量转移到动员广大民众上。到了北伐战争,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华民国的战争动员研究有了较大进展,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如:1925 年,陶叔渊著有《航空与国防》;1931 年,张连科著有《国防与石油》;1932 年,励尔康著有《国防与物资》;1933 年,李良著有《战时经济概论》;1934 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陆军军官训练团编有《军事动员简说》;1936 年,孟广厚著有《国防与军需工业》,章乃器等著有《国防总动员》;1938 年,马寅初著有《抗战与经济》,任涛著有《抗战中底军事动员》;1940 年,董问樵著有《国防经济论》,罗敦伟著有《国家总动员论》,国民政府四川省训练团编有《军制与动员》等。这些著作从不同角度和不同程度上研究了国防与动员、战争与动员、经济与动员的关系等问题。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战争时期的战争动员研究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独立领导革命的武装斗争时期。在革命的武装力量建立之初,就投入了粉碎敌人的“进剿”、“会剿”和“围剿”作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建立根据地,如何动员根据地的人力、物力投入到革命战争中来,成为党和红军领导人必须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毛泽东等在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性质和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建立广泛统一战线,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农村根据地的动员战略。毛泽东指出,要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要建立乡赤卫队、区赤卫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到正规红军;政治动员是反“围剿”斗争中的第一个重要问题;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是根据地存在和发展的条件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毛泽东就指出,这个政治上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要在全民中组织自卫军,并挑选精干分子组织民兵;要整顿和扩大国防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保证战时生产品的自给。他坚信,虽然抗日的财源十分困难,动员了群众,则财政也不成问题。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更加重视战争动员的问题,强调要最大限度地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战争,支援战争。他曾经指出,要将军队划分为野战军和地方军,将正规军的相当部分,分散到各军分区去,从事发动群众的工作。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毛泽东充分论述了动员人民群众的伟大意义,论述了武装力量动员、政治动员、经济动员等方面的方式方法。毛泽东的战争动员思想,是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的科学总结,是人民战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在革命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战争动员研究 建国后,为了应付严峻的国际形势,维护国家的安全和利益,毛泽东等对战争动员问题非常重视,把战争动员放在战略地位,战争动员研究逐步深入,内容逐步扩展。这个时期的战争动员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50~70年代) 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是,在国际上中国面临着复杂的政治、军事形势,先有美国发动朝鲜战争,后有中苏关系恶化,对中国安全形成直接的严重威胁,而且逃到台湾的国民党集团不断对大陆进行袭扰和破坏。在国内,国民经济逐步恢复并不断发展,建立起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但经济水平比较落后、人口众多、农业占主导地位的基本国情难以在短期内改变。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应付可能爆发的战争,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除大力加强军队建设外,在战争动员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方面也进行了极大努力,取得了巨大进展。

民兵制度研究 建国后,国家把民兵建设作为战争动员的一个重要问题加以研究。对此,毛泽东作了大量论述。诸如,为了应付可能的侵略战争,必须在全国范围内把能拿武器的男女公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以民兵组织的形式,实行全民皆兵;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还要大办民兵师;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这些论述,为中国民兵建设的理论和民兵工作的实践指明了方向。

兵员动员研究 国家于1955年颁布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1961年颁发了《民兵工作条例》,从而把国家的兵员动员问题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

经济动员研究 建国初期,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经济动员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50年代,中国政府先后多次派出代表团访问苏

联,除谈判一些具体的项目外,还了解研究了苏联的经济动员体制等情况,逐步建立起中国的经济动员体制,调整了经济动员基础和动员机构,在兵器、航空、电子、船舶及民用建筑、原材料等部门形成了一定的动员能力;制定了《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为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和增强科技动员能力提出了目标、重点和政策措施。60年代中期,为应付严峻的国际形势,中共中央作出了“搞好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随后,国防工业部门研究了三线建设的各种问题,提出了“规模小、专业化和协作”的原则,并进行了实地考察,形成了关于国防工业在二、三线地区新建项目布局方案的报告。

人民武装、人民防空、交通运输动员研究中国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形成了以人民战争思想为基础的动员理论,随着建国后经济、科技、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变化,动员理论和实践也不断发展。关于人民武装动员问题,中共中央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52年作出了《关于建立各级人民武装委员会的决定》,从中央到县均建立了人民武装委员会。关于人民防空动员问题,中央人民政府于1950年作出了开展人民防空工作的决定,设立中央和省、市人民防空委员会。1953年召开第一次全国人民防空工作会议,研究确定了人民防空的重点、措施和体制建设。关于交通运输动员问题,在系统总结抗美援朝战争中交通运输动员的经验教训后,提出了加强国防交通建设的方针和原则,制定了规章制度和方法。1963年,中央军委成立了“交通战备规划小组”,国家各交通管理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部分省的专区、市、县成立了相应机构。1978年,“交通战备规划小组”改为“交通战备领导小组”,交通运输动员研究和建设工作全面展开。

第二阶段(80~90年代) 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背景,以高技术战争需求为着眼点,对战争动员问题进行了全面研究,不但对兵员动员、经济动员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而且研究了动员体制、动员法规、科学技术动员等新的动员领域和问题,形成了动员研究的良好局面。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此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战争动员研究和动员准备有了巨大发展。

关于军工企业调整问题 1985年,邓小平对世界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新的判断,确定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即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到平时期的建设轨道上来。对原来形成的较大的动员能力严重过剩问题,国家有关部门进行了研究,按照既要以国家经济建设为中心,又要考虑可能的战争需要的原则,提出了“撤一批、封一批、留一批”的调整目标方案,使军工企业的调整顺利实施。

关于后备力量建设问题 新中国建立后,国家建立了庞大的后备力量,特别是民兵数量众多,但质量不高,很难适应现代局部战争的需要。为把庞大的后备力量建设成为强大的后备力量,军队动员部门组织机关、院校和科研机构进行了研究论证。1981年,中央军委明确提出了民兵制度与预备役制度相结合、民兵工作与战时兵员动员相结合的方针。随之,全军陆、海、空军部队开始组建预备役部队。在民兵建设方面,提出了“减少数量,提高质量,打好基础”的方针,大力压缩普通民兵,发展民兵专业技术分队。这一时期,后备力量建设理论有了很大发展,后备力量规模、结构、管理、训练等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

关于战争动员体制问题 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明确提出建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动员体制已成为急待研究的问题。1991~1998年,国家计划经济委员会国防司和后来的经济动员办公室每年召开一次学术讨论会,分别对经济动员体制、军工企业改革、军民结合与平战结合、经济动员运行机制及局部战争快速动员等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提出了大量的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此期间,国家动员体制改革也不断深入。1994年成立了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下设武装力量、经济、人防和交通战备办公室,后又增设综合办公室,把主要的动员部门统一协调起来。国防经济管理体制也进行了巨大改革。1982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撤销第六机械工业部成立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将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七机械工业部分别更名为核、航空、电子、兵器、航天工业部;1986年7月,核、航空、兵器、航天工业部归国务院直接领导;1988年4月,核、航空、航天工业部改制为总公司;1999年,核、航空、航天、船舶、兵器总公司又各改组两个集团公司。这些改革,是在动员理论研究论证基础上实施的,体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战争动员的特点和要求。

关于动员法规的研究和制定问题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动员活动需要动员法规来规范和保证。50~60年代,除兵役法外,中国的动员法规很少。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动员法规的研究和制定进入了快速建立健全的阶段。1984年,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了《人民防空条例》;同年,国家修订和公布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1998年,又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再次进行了修订);1990年,修订和发布了新的《民兵工作条例》;同年,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1995年,发布了《国防交通条例》;同年,公布了《预备役军官法》;1996年,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

空法》;1997年,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

关于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中的动员问题 1985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明确提出,国防建设的指导思想要来一个战略性转变。随后,军内外学术界对军队现代化建设、国防工业军转民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研究。进入90年代,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军委制定了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提出要立足于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后又进一步提出军队建设实现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为落实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和适应军队建设“两个转变”,战争动员研究进一步深入,针对重要战略方向的需要,围绕局部战争快速动员、国民经济战时快速反应、民船动员、物资储备、战时国防交通保障等重大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国家经济动员部门制定了“九五”、“十五”经济动员计划,取得了大批理论成果。

研究成果 截至2000年,已出版的战争动员学理论专著主要有:《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战争动员分册》、《战争动员学》、《战争动员学概论》、《现代局部战争动员研究》、《国防动员概论》、《国民经济动员学》、《兵员动员学》、《国民经济动员概论》、《经济动员基础论》等。这些理论专著对战争动员或有关领域动员的基本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军事科学院军制研究部与总参动员部主编的《战争动员学》。这部著作从中国的国情、军情出发,认真总结战争动员的历史经验,深入研究现代条件下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且有选择地借鉴外国、外军的有益做法,构筑了战争动员理论框架。

发展趋势 随着战争实践的发展,战争动员研究将进一步深入。根据高技术战争的特点和经济社会结构、体制的变化,战争动员

研究的范围逐步扩展,不但继续研究武装力量动员、工业动员、交通运输动员、政治动员等传统动员领域的问题,而且在科学技术动员、信息动员等新兴动员领域的研究也将有较大进展。研究的特点将更加突出适应高技术局部战争的需要,理论研究与实际工作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单一部门动员研究与综合动员研究相结合。战争动员研究将集中在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动员的特点和规律,战争动员体制、局部战争动员需求、战争动员能力与潜力、新兴产业动员等方面,既力求动员理论的创新,又力求实际工作的突破。

(武希志)

军事训练学研究

(study of science of military training)

探讨军事训练规律和指导规律的活动。军事学术研究的组成部分。军事训练学以军事训练为研究对象,通过回答军事训练实践和理论提出的问题,指导军事训练实践,发展军事训练理论。军事训练学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和开放性的学科,它涉及社会科学领域的诸多知识,与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作战指挥学、军队政治工作学、军事后勤学、军事装备学、军制学、军队管理学等学科紧密联系;军事训练学与教育学同根同源,它是教育学原理在军队这一特殊社会群体的教育与训练实践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军事训练学与教育学的区别在于,它不仅回答如何通过教育和训练提高单个人员的军事素质和技能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研究武装力量尤其是军队中各个级别的群体通过训练提高整体作战能力的问题。

军事训练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军事训练学学科建设的理论。包括军事训练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军事训练学

的理论发展,军事训练学的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军事训练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军事训练学研究的组织、要求和方法等。二是军事训练学的基本理论。包括军事训练的本质、分类和任务,军事训练的产生和发展,军事训练的要素,军事训练的规律等。三是军事训练的指导理论。包括军事训练的指导思想、方针和基本原则,军事训练体制,军事训练的内容、方法、管理、保障和训练中的思想政治工作等。

军事训练理论是军事训练实践的产物。军队产生以后,人们在社会劳动中提高生产能力的思想方法便运用到提高到军队的作战能力上来,军事训练实践和指导这一特殊社会实践的思想理论也随即产生。在长期的战争和军队建设中,如何通过训练提高军队作战能力的问题一直是在军事理论的发展中备受关注的重要方面,古往今来的军事理论著述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军事训练问题。中国明代著名军事将领戚继光所著《练兵实纪》、《纪效新书》是古代系统阐述军事训练问题的理论专著,堪称中国古代的军事训练学。

清末和中华民国的军事训练学研究 清朝末年到中华民国时期,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练兵方法受到重视。这一时期,编练新军成为重要的军事实践,军队建设特别是军事训练理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融入了西方资产阶级军队的训练思想。此期,涌现出了一批对军事训练理论研究比较深入的人物和军事著作。清末有:徐建寅编撰的《兵学新书》,袁世凯组织编纂的《训练操法详晰图说》,张之洞编撰的《劝学篇》等。民国初年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有:蔡锷的《曾胡治兵语录》、《军事计划》,蒋百里的《国民军事常识》、《中国五十年来军事变迁史》和《国防论》,国民革命军的《陆军军官学校章程》、《陆军军官学校教育方针》等一系列军事训练

法规性书籍，北洋政府的《陆军大学现行章程》、《陆军大学条例》等。军阀割据后，为了强化其军事实力，冯玉祥、吴佩孚、张作霖等人在通过训练强化其军事实力的具体做法，也反映出其训练理论的不同特色。北伐战争结束后的国民党统治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著作有：赵志嘉编著的《军事训练教范》（1929）、霍周撰写的《国民军事教育的军事训练》（1931）、何志浩撰写的《民众军事训练》（1935）、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训练委员会印发的《军事训练与管理》（1939）、白崇禧撰著的《中国军事教育与军事训练》（1946）等。这一历史时期的军事训练理论，秉承“中学为本，西学为用”宗旨，在大量继承中国传统的练兵思想的同时，注重向西方学习。其主要观点：强调军事训练在军队建设和国民教育中的地位作用；主张军事训练应与思想训练相结合，培养军民的“尚武”精神；重视以军官为主的军事人才培养和军事学校的作用；要求军事训练要有明确的目标和与之相适应的科学的内容体系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训练学研究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后，以马列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创造性地发展了加强自身建设的军事训练理论。革命战争年代及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理论的精华集中反映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指导军队建设和作战的理论文章、工作指示、训练规定、会议报告和决议当中。此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广大官兵积累创造的练兵经验虽然没有形成著述，但却在训练中不断的升华，形成练兵传统，被一代代继承下来，奠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理论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军队的全面建设走上正规，各军区和军兵种整理汇编和选编了大量经验材料，对部队的军事训练提供了有力的

指导，为军事训练理论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资料。随着正规化军事训练的发展，一些专题训练理论著述也在训练实践的呼唤下应运而生。如华东军区高级干部训练班1951年编写的《军事训练教授法的研究》，总高级步兵学校军事科学研究部1953年编写的《军事训练教学法》，军事学院1952年翻译的伏龙芝的《关于高级军事问题》，南京军区司令部1960年编写的《军事训练方法的一些基本问题》，海军高级专科学校1960年编写的《舰艇军事训练》，武汉军区政治部1965年编写的《军事训练中的政治工作》等等。其主要观点有：在战争年代也要把军事训练提高到军队建设的重要地位，要争取时间训练；军队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才能打仗；必须以正确的方针原则和科学的方法指导军事训练；坚持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注重总结提高，注重战例研究，训练要少而精，要循序渐进；要大力开展军事民主，实行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教學原则；以干部为重点，注重并加强军校建设；必须正规制式，统一规范；训练内容要坚持军、政、文并重，相互结合，全面发展，建立科学的具有人民军队特色的军事训练内容体系。“文化大革命”期间，军事训练在军队建设中的地位作用被淡化，军事训练实践和理论的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

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后，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了战略位置并得以巩固，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训练跨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军事训练理论也有了重大发展。这期间军事训练理论的主要观点集中体现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建设的指示和决定以及党和军队领导人的重要讲话、论述之中。如：1977年中央军委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加强部队教育训练的决定》、《关于办好军队教院校的决定》，1984年中央军委印发三总部《关于全军教育训练改革的若干问题》等。

学术界关于军事训练理论的探讨也逐渐发展起来,出版了一些训练理论专著,如:朱如珂等编写的《军事教育学》(1987),李鹏青等编写的《军事训练学概论》(1988),于大清编写的《军事人才学概论》(1986),解放军报社编辑出版的《军训改革论丛》(1985),军事科学院编写的《建国以来部队军事训练法规的基本情况和值得借鉴的经验》(1988)等。此外,还翻译出版了一些外国军队军事训练的资料,如:总参谋部军训部组织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等单位编译的《外军训练情况介绍》(1985)、总参谋部情报部编译的《外军和平时期加强部队训练的主要做法》(1987),以及《美军和平时期军事训练的主要做法》(1987),彭训厚、林野编译的《苏联军事改革言论集》(1988)等。这一时期军事训练理论的观点主要有:在不打仗的条件下军队素质的提高靠军事训练,要把军事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要掌握现代科学知识,提高驾驭现代化战争的能力;努力办好军队院校,抓好干部培训;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使干部战士经过训练后既能打仗,又能搞社会主义建设。

进入90年代后,科技练兵成为世纪之交军事训练的主旋律。围绕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这一主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坚持毛泽东和邓小平军队教育训练的思想,对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工作进行了强有力的指导,出台了一系列关于科技强军、质量建军方面的重大决策,为全军军事训练的创新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此间,总参谋部编辑汇总了部队正规化训练、夜间训练、训法改革、“辽阳集训”、科技练兵观摩活动等经验材料下发全军。学术界关于训练理论的研究工作也相当活跃,出版了一批学术著作,如张慧星编写的《军队教育学》(1990),薛连璧等

编写的《中国军事教育史》(1991)和陈世俊编写的《基层军事训练难题解》(1991),总参谋部军训部编纂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训练分册》(1992),肖炳涛等编写的《军事训练学》(1993)和赵彦亮编写的《高技术作战背景下军事训练方法》(1993),张孝礼等编写的《军事训练学总论》(1994),朱艾华编著的《当代中国军队的正规化训练》(1995),第二炮兵司令部编写的《第二炮兵军事训练学》(1999),周仕忠编写的《海军军事训练概论》(2000),庄志谦主编的《空军飞行训练学》(2000),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编辑的《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关于军事训练论述选编》(2001)和李德生主编的《从郭兴福教学法到科技大练兵——我军军事训练改革与发展言谈录》(2001)等。军事训练学的代表性著作《军事训练学》,已经在总参军训部的指导下,由军事科学院联合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和南京陆军指挥学院等院校以及全军各大单位军事训练理论专家编写完成了送审稿,2002年下半年将出版发行。全军多数指挥院校已经建立了专门的军事训练系、研究室,并将军事训练学作为主要的必修课程,一些院校已经开始招收以军事训练学为主要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另外,还有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编写的《世界部分国家和地区军队训练情况》(1999)、总参谋部情报部编译的《美国陆军训练手册》(1999)、王春茅编写的《美国军事教育现状与发展展望》(2001)等外国军队训练理论资料。90年代,军事训练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强调要坚持战斗力标准,强化军事训练的中心地位,加强领导,求真务实,端正训练作风,大力开展科技练兵,学习新的科学知识,掌握新的军事技术,以现代化的训练方法和训练保障手段提高训练效益,以高质量的训练弥补技术装备的差距;军事训练要坚持人才

为本,以干部为重点,把干部训练作为质量建军的一件大事来抓;建立健全军事训练的法规体系,特别是训练内容体系、方法体系、管理体系和保障体系,依法实施标准化训练。

发展趋势 军事训练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官兵在相对平时时期最为宏大的实践活动,对军事训练理论的呼唤十分迫切,创新军事训练理论,构建军事训练学学科体系的任务十分紧迫。军事训练学学科体系的建设,将朝着科学规范的方向快速发展。军事训练学分支学科理论专著的撰写已按计划全面展开,军事训练学二级学科和三级学科的代表性著作也将陆续完成出版。军事训练学学科研究的组织机制将更加完善。

参考文献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委员会:《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学术》,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

薛连璧、张振华:《中国军事教育史》,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

(姚江宁 段伦宗)

军队院校教育研究 (study of military college and school education)

探讨军队院校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活动。研究内容包括:教育思想、院校体制编制、院校领导管理体制、教员队伍建设、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学员招收与管理、教学保障、教育科研等方面。

20世纪的中国军队院校教育研究,在不同时期、不同性质的军队中有不同的表现和作为。清末时期,为编练新军和引进外国军事技术之需,清军的院校教育研究重点是考察和借鉴工业发达国家军队的院校教育模式。清朝政府倒台后,各地军阀和国民党军队对院校教育的研究也基本上局限在这一范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院校教育是从武装夺取政

权的斗争中起步的。不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平时时期,广大教育工作者都能够根据战争的需要和军队建设需要,积极探索军队院校教育规律,开拓创新,取得了军队院校教育研究的丰硕成果,开辟了独具特色的军队院校教育之路。

清末的军队院校教育研究 20世纪初,清朝政府在总结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教训的同时,对中外军队的差异进行了比较,初步认识到,致败之由不完全是洋人“船坚炮利,机器精奇”,更主要的是败于“学术”落后,因而注重在军队中进行系统化的军事学校教育。在重点研究德国、日本等国军队院校教育的基础上,效仿其模式新建和改建了一批新型军事学堂。基本形成了以陆军学校为主,海军学校为次;以普通军校为主,技术学校辅之;以初级教育为主,中、高级教育次之的军队院校教育体系。为了在“西学东渐”的同时能够维系其封建统治思想,张之洞、袁世凯等人倡导和推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影响。

中华民国的军队院校教育研究 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朝政府倒台,建立了中华民国政府。为了打倒各地军阀,结束军阀割据的混战局面,1924年初,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广州黄埔创建了陆军军官学校(简称黄埔军校)。由于当时的民国政府鼎力革新,并具有先进阶级的人才培养观,使得黄埔军校为北伐战争的国民革命军培养了大批骨干。蒋介石攫取国家军政大权后,将军队院校演化为维护其反动统治的工具。虽然在军队中开办了不少院校,但因受其狭隘的功利观和洋奴思想的限制,并未在院校教育研究方面有什么作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院校教育研究 可分为革命战争时期军队院校教育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军队院校教育研究。

革命战争时期军队院校教育研究 1927年,中国共产党为了反抗和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创建了自己的军队,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并于20年代末开始在军队中进行院校教育。战争时期的军队院校教育研究,主要围绕“如何满足战争需求”而展开。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最初创办了教导队,以后又扩建为教导大队、井冈山红军学校和红四军随营学校。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建立后,又相继成立了各自的红军学校。1936年6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将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简称“红大”)。这些红军学校的建立,不仅为部队培养了大批急需人才,又适应了以反“围剿”为主的战争环境。院校教育研究提出的主要观点有:注重思想教育,把提高学员的政治觉悟放在首位;重视校长和学员的选配,优先把有办学和教学经验的人才配备到学校工作;从实战需要出发,训练为了前线;讲究教学方法,提倡通俗化、启发式教学等。

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1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为培养干部,做好抗日战争的准备,将“红大”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全国各抗日根据地先后创办了12所“抗大”分校,走出了一条就地办学,就近为部队输送人才的路子。这一时期,毛泽东为“抗大”制定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对“抗大”的全面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并成为以后人民军队院校教育遵循的主要思想。

解放战争时期 这一时期,人民解放军根据部队技术兵种增多的情况,重点开办了一批兵种技术学校,使院校基本上成为培养

各类军事人才的基地。解放战争中,院校教育研究提出的主要观点有:理论紧密结合实际,教学内容随作战方针和战法的变换不断调整;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院校中实行“政教合一”体制,学校各级领导既是领导管理者,又是教员;注重从部队中以及国民党军俘虏中选任教员等。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军队院校教育研究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人民解放军的院校教育开始向正规化方向发展。

第一阶段(1949~1956) 这一阶段,全军先后召开六次院校工作会议,研究解决相对和平时期军队院校教育中的重大问题,提出军队院校教育的主要观点有:建立“三级制”(初、中、高)和“两股绳”(培训和轮训)的体制;实行统一的计划和制度;一切以教学为中心;培养学员现代化的作战观念,掌握新技术,学会联合作战;学习苏联先进的军事科学;培养学员严格的纪律观念,养成按条令、规章办事的习惯等。

第二阶段(1957~1965) 这一阶段,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战争挑衅和威胁。军队院校教育着眼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需要,在总结全军以往办学经验的基础上,实行了“以我为主”的教育方针,贯彻了“少而精”、“短面少”的教学原则,确立了又“红”又“专”的人才培养目标,使院校教育具有了“应急式”的特征。

第三阶段(1966~1976) 这一阶段,军队院校教育受到极“左”思想的冲击,其在军队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基本被否定,大部分院校被撤销,正确的教育思想被歪曲或否定,许多行之有效的教育制度被废除,教育质量严重下降。

第四阶段(1977~1989) 这一阶段,全

军肃清极“左”思想,在拨乱反正中恢复和新建了一批院校,使军队院校教育重新焕发出生机。为加强对院校科研活动的指导,1983年根据总参谋部有关文件精神,各指挥院校成立了学术委员会,专业技术院校成立了科学技术委员会。同年2月,召开了第十二次全军院校工作会议,明确了院校教育的战略地位。1986年,中央军委作出《关于军队院校教育改革的决定》,提出军队院校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必须为军队建设服务,适应平时时期部队建设的需要,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等办学思想。为了贯彻《决定》,军队院校教育研究提出的主要观点有:在办学思想上,应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在人才培养目标上,应由“知识型”向“创造型”转变;在课程结构上,应由单一的必修课向必修课与选修课相结合的方向转变;在教学方法上,应由“注入式”向“启发式”、“讨论式”转变;在教育模式上,应由一次性教育向终身教育转变;在教学管理上,应由“经验型”向“科学型”转变等。这一时期,全军院校创办了《军事教育研究》等近百种学术刊物;出版了《军事教育学》等一批理论专著;成立了军事教育学会,为繁荣军队院校教育研究发挥了较好作用。

第五阶段(1990~2000) 这一阶段,中央军委基于对国际战略格局和国家安全环境的科学分析,确定了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要求军队院校要瞄准世界军事教育的先进水平,培养能打赢高技术战争的高素质人才。军队院校教育研究在探讨新时期办校治学特点和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综合型院校、规模化办学等思想,并在人才培养上推行了一些新观念:①综合素质观。注重学员的政治思想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工程技术素质、军事专业素质和身体心理素质的培养,使学员素质得到全面发展。②复合型人才观。注重对

学员进行跨学科、多专业的交叉融合培养,使学员具有复合型知识、能力结构,既是指挥、技术、管理方面兼有的通才,又是其中某一方面的专才。③自主教育观。注重培养学员的自主学习意识和自我发展能力,即送之以鱼,又授之以渔,使其具有自主获取多方面知识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成为部队建设的创新性人才,这一时期,军队院校教育工作者撰写出版了一批理论专著。主要有:《军队教育研究》、《高技术局部战争与军校教育》、《军队院校办学思想的理论基础》、《军校教学管理理论与实践》、《世界军事院校教育》、《现代军校教育论》、《现代军校教学论》、《现代军校课程论》等。这些研究成果丰富了军队院校教育理论,使军队院校教育理论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科学体系。

发展趋势 进入21世纪,军队院校教育将深入研究高技术战争对军事人才的需求特点,努力探寻培养和造就高素质军事人才的理论和实践方法;将大胆借鉴和吸收世界各国先进的教育思想和观念,提高全军院校的办学水平;将积极追踪信息技术的发展,不断把最新的信息传播技术运用于军队院校教育领域,提高教学效益;将不断地研究军队院校教育与国民教育相结合的模式,寻找利用国民教育提高军队人才培养效益的新途径;将不断地研究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最佳模式,使军队院校成为培养人才与创新知识的重要基地。

(王西太 邢连杰)

部队训练研究 (study of unit training)

探讨部队训练理论与实践的活动。包括对军种部队、兵种部队和专业兵部队的训练研究。主要内容包括:部队训练的概念、范畴和分类,部队训练的产生和发展,部队训练的构成要素和客观规律,部队训练的指导思想、

方针和原则,部队训练的体制、内容、方法、管理和保障,部队训练中的政治工作等。目的是充分认识部队训练的现象和运动形式,揭示其本质特征和矛盾运动规律,把握部队训练的指导规律,正确指导部队训练实践。

20 世纪,中国的部队训练研究,随着历史时代的变迁和军事训练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历史时期:

清末的部队训练研究 清朝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后,于 1901 年开始组建和训练新式陆军,并专门设立练兵处统管新军的训练。训练内容以操法、战法、行军、筑垒和枪械养护为主,训练方法仿照德国、日本陆军,并开始重视部队训练研究。这一时期训练研究的主要著作有徐建寅的《兵学新书》、袁世凯的《训练操法详晰图说》以及《新定步兵操法》等。主要观点是:①重视部队训练,认为练兵就是为了用兵,“救世之策,莫若兵学为先”,“训以固心,练以精其技”。②强调按西方操典,进行制式教练和战斗教练,并注重学之精义,得其要领。③倡导部队使用新式枪炮进行协同训练,灵活运用技术和战术。④为增强训练效果,建立军事考核制度,定期举办野外对抗演习等。这些观点,对清末新军的训练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中华民国的部队训练研究 民国初期,由于军阀混战,派系林立,部队训练处于参差不齐、各行其是的状况。1925 年 8 月,国民革命军建立,为提高战斗力,部队进行了较为统一的训练。内容分为学科与术科,学科以军队常识为主,术科分为操场和野外训练。这一时期,部队训练研究的代表作有蔡锷的《曾胡治兵语录》、蒋百里的《军事常识》等。主要观点是:①练兵必须从战争需求出发,锻炼其体魄,娴熟其技术。②战略战术须因时制宜。③提倡军国民主义,培养全民尚武精神。但由于受历史条件的局限,民

国初期的部队训练研究尚处于启蒙阶段。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部队训练研究 主要可以分为革命战争时期部队训练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部队训练研究两个历史时期。

革命战争时期部队训练研究 1927 年秋至 1949 年 10 月,新型的人民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的革命战争时期。在此期间,部队训练以战教战,从战争中学习战争,部队训练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军事家,科学总结革命战争经验,深入研究军队在战争时期的训练指导规律,作出许多精辟论述,形成了具有人民军队特色的训练理论,并集中体现在毛泽东等的军事著作和有关文电之中。主要观点有:①高度重视军事训练在军队中的地位和作用,强调利用作战间隙,争取时间进行训练。②坚持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注重运用实战经验指导训练。③大力开展军事民主,实行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训练原则。④训练内容,战士以技术为主,干部以战术为主。⑤开展群众性练兵活动。这一时期的部队训练研究,对于提高部队战斗力,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部队训练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人民解放军在陆军的基础上,逐步发展成为诸军种、兵种的合成军队。50 年代初至 60 年代中期,部队训练贯彻毛泽东关于要“开展正规训练,迅速提高人民解放军现代作战能力”的指示,全军展开了以战斗训练为主的正规训练,并掀起了大练兵、大比武的高潮。这一时期,部队训练围绕正规训练,进行训练内容、训练方法、训练法规和训练制度的研究,总结训练经验,编写并颁布了一系列条令、条例、教材和训练大纲。主要观点有:①军事训练要

及时转入正规训练,使其成为平时军队建设的中心任务。②坚持“以我为主”的训练方针,恢复和发扬人民解放军传统的练兵方法。③以毛泽东军事思想、新的战略战术和军事技术为主要训练内容。④以军官训练为重点,完善干部培训体制。这些理论,对于促进部队转入正规训练,掀起训练高潮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中期,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部队训练研究难以正常进行。

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后期,在邓小平“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的思想指导下,全军的军事训练跨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80年代中期以后,全军围绕单兵、分队、合同战术训练三个层次,深入进行训练内容、方法、手段的研究和改革,并取得了显著成果。1990年初,总参谋部颁布了新一代训练大纲。同年4月,中央军委颁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条例,标志着全军的军事训练迈向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部队训练理论趋于成熟。主要观点有:①在不打仗的条件下军队素质的提高主要靠训练,要把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②在训练内容上实行“三个转变”,突出干部训练、“三打三防”训练和合同战术训练,注重提高干部指挥现代战争和诸军种、兵种协同作战的能力。③训练要从实战需要出发,坚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④在训练方法上,重视开展对抗训练、模拟训练和检验性演习,提高训练质量。这一时期的部队训练研究,贯穿了改革的思想,促进了部队训练改革的深入发展。

进入90年代以后,世界战略格局的变化和新军事革命的兴起,向全军军事训练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江泽民指出,军事训练要把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作为根本目标。全军部队广泛开展了高技术条件下的战法、训法研究,掀起了科技大

练兵的热潮。这一阶段,是全军军事训练和研究前所未有的繁荣发展时期。科技练兵的实践丰富和发展了部队训练理论,取得的成果集中体现在江泽民关于军事训练的重要论述和中央军委、总参谋部颁发的一系列军事训练法规之中。主要观点有:①强调要坚持战斗力标准,以军事训练为中心。②以高质量的训练弥补技术装备的差距,训练质量越高,“打赢”的把握越大。③要坚持作战牵引和科技主导,突出信息战、空袭与反空袭、联合作战训练,增大训练的科技含量。④学习现代战争知识和高科技知识,研究探索现代条件下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战法,提高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能力。⑤以军官训练为重点,培养大批高素质的新型指挥人才。⑥科技练兵要着力在训练内容、训练方法、训练制度等方面抓好改革创新。这些理论,是新时期部队训练经验的科学总结,反映了新形势下部队训练的基本规律,对于部队训练跨世纪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发展趋势 进入21世纪,全军科技练兵实践的不断发展,呼唤新的训练理论指导,部队训练将着重研究构建具有人民军队特色的军事训练学学科体系,完善部队训练理论体系,使之更加系统化、规范化;将加强对高技术条件下训练的研究,突出联合作战训练、信息战训练以及针对性训练的研究;将加强现代训练手段的研究,突出基地化、模拟化、网络化训练,探索运用现代化的训练方法和手段组织部队训练的规律。

(吴学军 王树林)

战役训练研究 (study of campaign training)

探讨战役训练理论与实践的活动。研究内容包括:战役训练的产生、发展、本质、特

点、原理、构成要素和客观规律,战役训练的目的、任务、指导思想、原则、方法、组织管理、训练保障、战役训练发展史和趋势等。目的是通过对战役训练一般规律以及不同类型、不同层次战役训练特殊规律的揭示,为制定战役训练方针、原则、法规、计划提供理论依据;在系统总结战役训练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以未来战役作战需求为牵引,研究探讨战役训练改革的方向、方法和措施;根据战役形态和战役训练的发展变化趋势,对未来的战役训练作出科学预测。

战役训练研究是随着战役训练的产生而出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役训练研究是伴随着人民解放军战役作战和战役训练的出现而出现,并随着战役作战和训练的发展而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革命战争时期的战役训练研究 这一时期,由于全军的主要任务是作战,战役训练研究主要是结合战前训练和战后总结经验等方式进行,其理论成果主要反映在毛泽东等老一辈军事家的军事著作、作战指挥电报和战役之后的总结报告之中。如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和朱德的《黄陂东陂两次战役伟大胜利的经过与教训》等许多军事著作中,对战役的基本原则作了系统的理论阐述,为战役指挥,也为战役训练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许多重大战役,特别是辽沈、淮海、平津战役的胜利,丰富了战役理论,为研究战役的组织与实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战役训练研究 具体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50~70年代) 这一时期,全军进入了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阶段,战役训练研究也步入了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轨道。建国初期,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关于学习苏军先进经验的指示,总参谋

部和各军区、军种兵种领导机关都聘请了一批苏军顾问,并选送一批军事干部到苏联高等军事院校学习,在学习中进行研究。1952年,总参谋部,各大军区、军种兵种先后成立了专门负责战役训练的机构,为开展战役训练研究奠定了组织基础。同年,各总部、大军区、军种兵种进行了在职高级干部和机关人员的军事学习。1952年和1953年,根据中央军委决定,各大军区先后组织高级干部和机关人员赴朝鲜战场见学,研究现代战役作战和训练问题。1954年,刘伯承元帅主持全军首次高级指挥员战役集训,着重研究集团军防御战役。同年11月,总参谋部组织全军军以下首长、机关人员参观见学了军事学院在山东半岛组织的集团军进攻战役首长、司令部现地演习。1955年,叶剑英元帅导演了辽东半岛抗登陆战役演习,研究在核、化学武器条件下诸军种、兵种参加的海岸防御战役,摸索了组织大规模战役演习的经验。1957年,陈赓大将导演了抗登陆和大城市防御战役演习。1961年,罗瑞卿大将导演了有师以上首长、机关参加的反空袭演习,研究保卫大城市的作战和训练问题。随后,各军区、海军、空军也相继组织了战役集训和战役演习,研究探讨现代条件下战役组织指挥和战役训练的有关问题,战役训练研究得到了全军的重视。

第二阶段(80年代) 这一时期,军队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战役训练重新被摆到应有的位置,战役训练研究受到高度重视。1981年,在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的领导下,全军在华北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研究和演练了战争初期战役作战的有关问题,推进了全军战役作战理论的研究,同时也促进了战役训练理论研究的深入开展。1985年,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现了战略性转变,陆军组建了集团军,战役训练更加受到重

视。全军在广泛开展战役作战问题研究的同时,更加重视对战役训练理论和方法的研究。总参谋部先后多次组织全军高级干部参观一些集团军的战役演习,并总结和推广了战役训练改革的经验。1987年,在总结全军历次经验和吸收多年战役训练改革成果的基础上,总参谋部制定和颁发了关于战役训练的若干规定。1990年和1991年,又先后制定和颁发了战役训练纲目、战役训练教程,标志着战役训练研究及其理论日趋成熟。

第三阶段(90年代) 这一时期,世界军事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国家安全环境面临着新的挑战。对此,中央军委适时制定了新的战略方针。全军各部队以新时期战略方针为依据,紧密结合作战任务,狠抓使命课题和针对性训练,掀起了战役训练的新高潮,给战役训练研究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90年代初,组织全军对各军区、军种兵种部队实施的战役演习进行观摩见学,总结交流战役训练的经验;举办国防发展战略研究等系列讲座;组织高级指挥员及指挥机关进行高技术条件下的战役集训,把战役训练同战略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战役训练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并开始了诸军种、兵种联合战役训练研究。研究的主要内容:

关于战役训练指导原则 战役训练以战略方针为依据,紧密结合作战任务和部队建设的实际;追踪现代战役发展的趋势,研究作战对象特点;以战役指挥员及指挥机关为训练重点,从战役全局的谋划与指导下培养创造性思维和决策能力;注重实际演练,提高战役军团遂行各种战役任务的能力;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增强训练效益。

关于战役训练内容 主要研究战略方针和战役学等理论;研究现代战争、战役的基本规律和作战对象的经济、政治情况、军事思想及其作战行动特点;研究作战地区的地理、水

文、气象对战役行动的影响;研究现代科学技术和指挥控制方法,预测战役进程和定下战役决心,实施战役机动和战役展开,运用兵力和创造有利态势,控制战场和保持战役主动权,灵活机动和变换战法,组织诸军种、兵种协同动作、组织战役保障和后方保障等。

关于战役训练的组织实施方法 主要采取战役集训和战役演习等方式,结合作战任务,进行战场勘察,组织战役课题作业和参观战役演习,研讨战役理论。采用计算机作战模拟训练网络等先进的训练手段,演练单级或多级、首长机关带通信工具或带部分实兵以及实兵的演习,使战役训练普遍展开和受训者得到全面锻炼。

关于战役训练法规的制定和教材的编写 全军制定了战役训练的具体规定,使战役训练研究经常化、制度化。各军种、兵种颁发了战役学教程、战役学纲要以及战役训练纲要等,使战役训练的制度、内容和方法得到了统一和规范。根据现代科技发展和战役形态的变化,战役训练研究更加突出联合战役训练理论和方法的研究,更加注重战役训练手段的创新。一批有价值的联合战役训练研究成果陆续出版和发表,模拟化、网络化、基地化训练方法正在得到推广普及,对指导部队联合战役训练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发展趋势 进入21世纪,战役训练研究将更加突出对联合战役训练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更加重视现代科技手段在战役训练活动中的运用研究;战役训练研究成果对战役训练实践的指导作用将更加明显。

(王运平)

海军战役训练研究 (study of naval campaign training)

探讨海军战役训练理论与实践的活动。研究内容包括:海军战役训练的起源、本质、

演变和发展趋势;影响海军战役训练发展变化的决定因素,海军战役训练与海军战术训练、海军军事教育、海军战略、海军战役法、海军战术、海军政治工作、海军后勤工作、海军装备工作的关系,海军战役训练的历史经验及其对海军建设发展、军事斗争准备的影响,海军战役训练的性质、特征、目的与任务,海军战役训练的类型、样式及构成要素,海军战役训练的基本原理,海军战役训练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海军战役训练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海军战役训练的体制与法规,海军战役训练的内容与方法,海军战役训练的管理与保障,高新技术装备对海军战役训练的影响,外国海军战役训练的发展与借鉴等。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海军基本照搬西方海军的作战和训练理论,没有形成自己的海军战役理论,更没有海军战役训练的实践。20 世纪下半叶,新中国海军的战役训练大致经历了创建时期、初步发展时期、恢复建设时期和加速发展时期四个阶段,逐步形成了具有人民海军特色的战役训练体系。

人民海军创建时期的战役训练研究(1949~1955) 人民海军在创建初期,面临着解放沿海岛屿,防御美帝国主义从海上入侵的重大任务,处于边建、边训、边打的非常时期。贯彻训战一致的指导思想,战役训练与作战任务紧密结合,有针对性地结合作战任务组织训练,是这一阶段战役训练的特点。从 1949~1956 年,海军基地以上司令部以战役演习的形式组织战役训练 20 余次,主要研究抗(反)登陆战役、反空袭战役、登陆战役等课题。通过训练,基本确立了海军战役训练的指导思想,研究和探讨了战役训练的主要形式,取得了较为可喜的训练成果,为遂行海上作战任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55 年 1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首次联合进行一江山岛登陆作战。由于海军在战前根据一江

山岛的地理情况和参战部队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了由分训到合训的战役训练,有效地提高了部队的战役水平,较好地完成了联合战役指挥部赋予的任务。2 月,海军司令部颁发了《海军战役训练守则》,规范了海军战役训练的内容与目的、要求与方法,规定了战役作业、战役演习以及海军部队参加陆军军区战役训练的方法和措施,建立了海军战役训练的计划、监督、登记和报告制度,为海军战役训练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的指导。10 月,广州军区在琼州海峡进行登陆战役演习,南海舰队出动舰艇参演。11 月,海军部队参加了总参谋部在辽东半岛组织的抗登陆战役演习,演练了登陆作战、打击登陆输送队等课题。通过上述作战和演习,丰富了海军部队在使用原子武器条件下抗登陆作战的知识,提高了高级干部组织指挥抗登陆战役的能力,检验了部队的战备工作,熟悉了作战和演习地区的地理情况,并取得了组织较大规模战役作战和演习的经验。

人民海军初步发展时期的战役训练研究(1956~1976) 这一时期,海军战役训练进入了更高层次。在组训内容上,针对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叫嚣和可能的大规模外敌侵略,主要以防空袭战役、抗登陆战役、保交护航战役、基地防御战役、登陆战役、珊瑚岛礁地区战役、破交战役、封锁海峡战役为主要训练课题。在训练方式上,较熟练地运用了理论学习、战例研究、图上作业、实兵演习等形式进行战役训练。在训练程序上,按照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有关战役战术理论,研究典型战例,进行图上作业,检查、修订和补充训练方案,进行实兵演习的方式进行。从 1956 年起,强调了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学习和研究,运用毛泽东研究和指导战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研究海军作战指导原则、训练方针等,指导海上战役训练。1958 年,海军正式将毛泽

东军事著作列为干部、特别是团以上干部必学的内容,各舰队均组织了团以上干部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的集训。通过战役训练,锻炼和提高了各级指挥员和参谋人员组织实施战役行动的能力。这一时期,海军、舰队、基地、海军航空兵共组织战役训练40余次。通过这些演习,进一步丰富了海军与陆军、空军协同进行近海岛屿登陆作战的经验。这一时期的战役训练研究,取得了明显成绩。特别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部队的正规化训练遭到严重破坏,海军战役训练几乎陷于停顿状态。

人民海军恢复建设时期的战役训练研究(1977~1988)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遵照邓小平关于“要抓好合成作战训练”的指示,海军加强了以战役训练等为主要内容的合成训练,进一步突出了以海军中高级指挥员为重点的战役集训。这一时期,海军基地以上机关共组织战役训练40余次,主要研练战争初期海军兵力运用、反封锁作战、反突袭作战、封锁海峡作战、打击海上兵力集团作战、登陆战役、抗登陆战役、反空袭战役、基地防御战役等课题。在训练方式上,不仅丰富和发展了理论学习、战例研究、图上作业和实兵演习等,而且还加强了对重大作战问题的研究。1985年,海军举行了大规模首长、机关研究性图上演习。通过演习,锻炼了海军首长、机关统筹整个海战场的组织指挥能力,提高了谋略水平;探讨了战争初期海上作战的新课题、新战法,活跃了军事学术思想;预测了未来海战场的形势,探讨了海军兵力的建设。通过演习,机关各级新的领导班子成员和参谋人员进一步明确了职责,熟悉了业务,对理顺机关各业务部门之间的工作关系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这一时期的实兵演习,规模较大、持续时间较长,对提高海军战役水平有明显的推动作用。

人民海军加速发展时期的战役训练研究(1989~2000) 20世纪末,海军战役训练研究已经形成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以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和江泽民关于军事斗争准备的思想为指导;以中央军委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和海军近海防御战略思想为依据;以总参谋部高技术条件下军事斗争部署为立足点的海军战役训练思想;以军事思想和军事战略、战役理论、战役指挥基础、外军研究、战例研究、高科技知识、军种兵种知识和其他相关知识构成的基础训练内容;以战略战役专题理论学习、战法研究、战役准备与战役实施等构成的课题训练内容;以理论学习、战例分析、作战问题研究、战役作业和战役演习等构成的训练形式;以授课、读书、讨论、实练、观摩等构成的训练方法。这一时期,海军基地以上机关共组织各种集训、演习近40次。演练的课题主要有海上封锁战役、登陆战役中的海上战役、打击海上兵力集团作战、反空袭战役、基地防御战役等。通过训练,统一了海军的作战思想,完善了作战方案和计划,提高了战役指挥员及其机关组织实施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海上作战,以及与其他军种兵种实施联合作战的能力和水平,丰富和发展了海军战役训练理论。

发展趋势 进入21世纪,海军战役训练将更加重视部队在高技术条件下的海上战役训练;海军诸兵种的合同训练以及与其他军种的联合训练;海军特种部队训练和进行非战争行动内容的训练以及更加重视开展分布交互式模拟训练等。

(何常青)

空军战役训练研究 (study of air force campaign training)

探讨空军战役训练理论与实践的活动。

研究内容包括:空军战役训练的产生、本质和目的,空军战役训练基本原理、性质、特点与指导原则,空军战役训练的任务、课题与内容设置,空军战役训练的程序与形式,空军战役训练的途径与方法,影响空军战役训练的因素,空军战役训练的组织领导、管理体制与要求,空军战役训练计划与质量评估,空军战役训练的优化控制,空军战役训练制度与保障,空军战役训练史与发展趋势等。

中国空军战役训练研究的形成与发展,主要分为国民党空军和人民解放军空军两个时期。

国民党空军战役训练研究(1933~1949) 1933年2月,国民党政府航空署改隶军事委员会领导。1934年5月,又改为航空委员会。1946年8月,航空委员会彻底改组,成立空军总司令部,同时撤销各路及地区司令部,全国划分为五个空军军区,并设立训练和供应两个司令部。国民党政府军事航空组织机构经历了航空处—航空署—航空委员会—空军总司令部等四个时期。国民党空军的战役训练研究主要体现在防空战役训练的研究和支援陆军、海军战役训练的研究两个方面。

空军防空战役训练研究 国民党政府鉴于日本侵略军飞机对中国实施狂轰滥炸,给国民生命财产造成的巨大损失,深有“无防空即无国防”,“万事莫如防空急”的感触。为此,在1931年决定组织防空教育训练机构,并于1933年下半年开办了第一期高射炮队学员班和第一期人民防空研究班。1934年1月1日,正式成立防空学校。同年12月21日,在南京进行防空演习。1948年冬,防空学校改名为“空军防空学校”,高炮部队隶属空军。空军防空学校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开办的班次多,主要有高射炮队训练班、军队防空训练班、附设高炮干部训练班、教官训练班、

空防班、人民防空研究班、防空情报训练班、通信训练班、照射训练班、人民防空研究游动教育班等。二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担负教育训练和指挥作战双重任务,使训练与作战紧密结合起来。

支援陆军、海军战役训练研究 抗日战争期间,空军的作战行动逐渐增多,遂行任务从比较单一的空中侦察、轰炸等转变为空中侦察、空战、轰炸、空运等多种任务,特别是与陆军、海军的协同作战越来越多,空军的组织指挥也日趋复杂。为培养空军高层次指挥与参谋人员,国民党航空委员会于1939年7月开始筹划高级指挥与参谋人员训练班。1940年6月,空军参谋学校开始招收学员,对象为空军上校及少将级别的指挥与参谋军官。前两期为苏联顾问授课,从第三期开始改聘英国教官授课,抗日战争结束后又请美国教官负责授课。空军参谋学校是空军最高学府,抗日战争期间为空军培养了一批高层次指挥与参谋人才。

人民解放军空军战役训练研究(1950~2000) 人民解放军空军自1949年11月11日成立以来,已经走过了50多年的历程。空军的战役训练研究也随之经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50~70年代) 1951年,东北军区空军领导机关为适应战争的需要,按照空军作战行动的要求组织了机关业务训练、图上作业和实兵演习等。随后,空军多次组织军区空军和航空兵师指挥员、参谋人员到前线指挥所和机场轮战训练,培养了一批指挥员和战勤人员,为空军的战役训练研究打下了重要基础。1954年以后,空军的战役训练有计划、按步骤地全面展开,并开始研究空军组织战役训练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空军第一次组织了课题为“集团军防御战役中空军的运用”的集训。1955年,空军组织了“在使用

原子和化学武器条件下集团军进攻战役中的航空保障”课题的战役集训,并参加了辽东半岛抗登陆战役演习。1956~1959年,空军组织了“在使用原子和化学武器条件下方面军抗登陆战役中空军使用”等四个课题的战役集训与研究;参加了总参谋部组织的六次战役集训和演习。1959年,空军组织了以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为内容的战役集训。1960~1965年,全空军系统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并集中了一批具有一定作战经验和理论水平的人员,比较全面地总结了战役、战斗经验,编写了一套条令、条例和大纲、教程、教材,为空军战役训练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1961年,进行了反空袭斗争课题集训,空军、军区空军多次组织战役演习,进行各级指挥所抗击大规模空袭图上作战演习。各部队积极参加所在军区组织的合成军队战役演习,为空军战役训练研究打下了基础。

第二阶段(80年代) 进入80年代,人民空军武器装备有了改善,作战能力得到提高,战役训练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80年,中央军委根据军事斗争的新形势,赋予了“积极防御”战略方针以新的内容。随之,空军对战役训练和战役理论研究的重点进行了调整,开始组织战役指挥员和领率机关研究未来战争初期空军抗击敌人战略空袭,争夺局部制空权和在合同战役中的使用问题;研究不同战役的作战指导、组织指挥及保障问题;研究空军战役的组织指挥程序、内容和方法问题。1981年,空军组织参加了华北方面军防御战役演习。此后,各军区空军、空军军多次进行战役集训、演习,并参加合成军队组织的集训与演习,使战役训练研究逐步开展和完善起来。1988年出版的《空军战役学》,标志着人民空军的战役训练及其理论研究已达到了一个新水平。

第三阶段(90年代) 进入90年代,世

界形势和战略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1991年爆发的海湾战争表明,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将成为未来战争的基本样式。为此,中央军委基于对国际战略格局和国际安全环境的科学分析,确立了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空军以此总揽作战训练全局,以“科技强军”和“科技兴训”的战略思想为指导,全面加强现代战役理论研究和战役训练研究。这一阶段,在战役理论研究方面,空军下发了1991~1993年战役训练规划,出版了空军战役学教程。在战役训练研究方面,空军和军区空军及军多次组织战役集训、演习和跨区机动训练等。如空军在北京组织了进攻战役理论集训,在苏、皖地区举行了实兵演习;南京军区空军组织了实兵对抗演习;济南军区空军组织参加了全军夜间训练改革现场会实兵演习。1996年,空军研究了在高技术条件下反侦察、反空袭、反干扰的切实有效的办法。1998年,空军确定建立空军战役训练基地,以求利用高新技术加强空军战役模拟训练。这一系列有效措施,极大地促进了空军战役训练研究的发展。

发展趋势 21世纪初,空军为加强新时期军事训练的指导,确定了“紧贴实战,突出对抗,从难从严,科技兴训”的军事训练指导思想,对空军战役训练研究的针对性、质量和效益提出了更高要求。随着武器装备的发展和保障能力的增强,空军战役训练将向联合训练、合同训练及模拟化、网络化、基地化方向发展;战役训练研究的及时性、对抗性、逼真性和有效性将得到进一步提高,战役演习的次数、规模、难度和层次也将大幅度提高。

(赵荣献 余桂林)

战略导弹部队战役训练研究 (study of campaign training of strategic missile forces)

探讨战略导弹部队战役训练理论与实践

的活动。研究内容包括:战役训练的产生、本质和目的,战役训练基本原理、特点、性质和指导原则,战役训练的任务、课题和内容设置,战役训练的程序和形式,战役训练的途径与方法,影响战役训练的因素,战役训练的计划、组织领导、管理体制与要求,战役训练质量评估与优化控制,战役训练制度与保障,战役训练史及其发展趋势等。

战略导弹部队战役训练研究,是在战略导弹部队战术训练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开展起来的。

萌芽时期(60~70年代) 1966年7月,战略导弹部队的领导机关在北京成立。围绕如何运用好这支部队,开展了一系列作战运用研究。战略导弹部队战术训练研究的逐步开展,为战役训练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这一阶段,颁发了首长、机关训练大纲和第二炮兵作战概则;举办了多期高中级干部短训班和团以上干部战役理论集训。通过训练研究,提高了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从抓战术训练到抓战役训练认识上的飞跃,并注重对战略导弹部队战役训练规律进行探索性的研究,开始向建立战役训练理论体系、完善战役训练法规的方向发展。

探索时期(80年代) 1985年,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精神,进一步推动了战略导弹部队高层次战役训练研究。在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的指导下,依据战役训练的基本原则,重视打基础、找规律、促效益,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经过长期的研究探索,总结出一条适用于战略导弹部队特点的战役训练路子。在此期间,先后成功地组织了一系列大规模战役演习,重点研究了未来核反击战役中的战役理论、组织指挥、部队合成与保障等问题,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探讨了核反击战役的特殊规律。1985年9月,《第二炮兵战役学》正式颁发,

对指导战略导弹部队战役训练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发展时期(90年代) 进入90年代,世界形势和战略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1991年爆发的海湾战争表明,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将成为未来战争的基本样式。因此,战略导弹部队以中央军委新时期的军事战略方针为指导,结合自身实际,大力加强战役训练研究。在战役理论研究方面,先后颁发了第二炮兵战役训练规定、第二炮兵战役训练大纲、第二炮兵战役演习教令等法规性文件,具体规定了战役训练的任务、原则、基本内容、方法以及考核的标准等,为战役训练步入正规化提供了客观依据。同时,取得了第二炮兵战役纲要、第二炮兵战役法、第二炮兵战役训练纲目、第二炮兵战役学教程、第二炮兵战役训练教程等一大批战役理论研究成果,标志着战略导弹部队初步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战役训练理论体系。在战役训练研究方面,先后成功地组织了一系列战役集训和战役演习,使战役训练研究在规模和形式上不断得到扩展和深化。从带通信工具的模拟发射研究发展到实战背景下带实兵实弹的作战演习研究;从单型号检验性、示范性演习研究发展到多型号的综合训练研究;从基地纵向合成和小范围横向协同演习研究发展到整个导弹部队合成的大规模演习研究;从核反击战役作战训练研究发展到常规导弹突击战役作战训练研究;从战略导弹部队独立实施战役作战训练研究发展到参加联合战役作战训练研究,使首长机关、部队受到了近似实战的锻炼和考验。

发展趋势 进入21世纪,战略导弹部队为适应军事斗争准备的需要,在思想上,将围绕“打得赢”转变训练观念,增强联合战役意识;在内容上,将围绕提高谋略水平、科学筹划战役、加强战役控制、突出火力决策、密切

战役协同、灵活运用战法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在方法上,将采取基地化、模拟化、网络化、对抗性等多种途径进行研究,并加强战役训练法规体系建设,使战役训练向理论化、系统化、正规化的方向发展。

(吕向东 黄伟)

战术训练研究 (study of tactical training)

探讨战术训练理论与实践的活动。研究内容包括:战术训练的定义、特点、历史沿革、类型、作用、依据、规律、原则、要求以及学习与研究的方法,战术训练组织与实施的内容及其教学方法,特别是如何实施“导、调、裁、评”等。由于战术训练是一个多层次、多对象的复杂系统,因而对其研究可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按层次可分为单兵战术训练研究、分队战术训练研究、兵种战术训练研究、合同战术训练研究;按军种可分为陆军战术训练研究、海军战术训练研究、空军战术训练研究、战略导弹部队战术训练研究;按手段可分为沙盘(兵棋)图上战术训练研究、战术模拟训练研究、基地(野外)战术训练研究等。

20世纪,中国军队的战术训练经历了以下几个历史时期。

清末时期战术训练研究(1900~1911)清朝政府为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在引进西方先进军事技术的同时,开始进行军队体制改革,实行新军兵制。陆军战术训练不仅“阵法、号角、口令具为西式”,而且还雇佣洋人担任教官,编印了《洋枪大操阵图说》,发给将领使用。战术训练的内容和方法基本上是照搬德国军队的一套,直接使用德军的操典,实行洋操、洋枪、阵法和战法的操练,改变了清军单纯体力和冷兵器操练的内容和方式,海军战术训练主要进行舰队常操,演练进攻和退却的队形变化。《北洋海军章程》规定,

逐日小操(常操),按月大操。入冬以后全舰队南下与南洋海军合操。以舰内常操练技术,以舰队常操练战术,每隔三年组织一次舰队出海检阅。海军院校主要进行专业技术训练;陆军院校按照清政府练兵处和兵部拟定的《陆军学堂办法》,以培养各级军官为目标,以自然科学和军事学为教学内容,对有的学堂还规定了“讲武、校场、野外教授演习”的教学、教练方式。清末时期,军队已开始定期举行军事演习。1905年10月底,直隶总督袁世凯在河间(今河北河间)曾组织了有炮兵、步兵、骑兵、工兵和辎重等5万人参加的大规模演习。演习时把部队分为两军,演练了铁路输送、行军、夜袭、通信联络等战术课题。1906年9月,袁世凯又与湖广总督张之洞举行了实兵对抗演习,演练侦察探情、抢占有利地势、牵制包抄及“冲锋战法”、“遭遇战法”、“攻击防守各法”。清末期间的战术训练研究成果散见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沈葆楨等人的有关奏章和训词之中。有代表性的著述是太平军的《行军总要》、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建寅的《兵学新书》等。其主要观点是:重视战术训练;学习西方先进经验;把思想政治、作风纪律作为战术训练的重要内容;强调协同和战法的操练;重视军校练官的作用等。

中华民国时期战术训练研究(1912~1949) 1912年,将海军舰队改编为第一、第二舰队。1913年,组建练习舰队作为海校学员实习操练之用。同年10月,陆军部颁布了《陆军军队常年教育顺序令》、《陆军各兵科军士上等兵教育令》、《陆军军官团教育令》、《陆军军官团教育实施令》。1914年,组建陆战队并开始进行登陆作战训练。1915年,鉴于实际情况,陆军部对相关法规加以修订。将军官、士兵教育大纲合二为一,取名为《陆军军队教育令》,缩短了训练周期,调整了训练内容。规定部队训练以基础技术和分队战术训

练为主,同时也要组织大规模的联合演习;军官训练主要通过军校教育完成。1925年8月,国民革命军建立并进行正规的训练,其战术训练由建制单位组织实施,军官执教。士兵有半年的时间进行战斗训练,主要内容是“术科”,即射击和战斗训练;军官的指挥训练在军官团进行。由于国民革命军建立不久即进行北伐战争,因而其正规训练时间不长就被作战间隙的练兵方式所取代。30年代,由于蒋介石提出“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训练方针,把反动的政治训练摆到首位,战术训练同其他训练一样没有实质性的发展。1936年,国民党政府完成收编各省航空部队,建立统一的空军并开始战术训练。民国时期军校的战术训练,陆校侧重战术基础和应用训练;海校侧重战术基础训练;航校侧重系统的飞行技术应用训练。民国时期的战术训练研究成果,主要散见于袁世凯、吴佩孚、冯玉祥、蔡锷、蒋百里等人的奏章和训词之中。有代表性的著述是袁世凯的《训练操法详晰图说》、蔡锷的《曾胡治兵语录》和民国时期的各种教育令等。主要观点是:强调纪律严明,训练有素;效法西方练兵,从步兵、炮兵、骑兵战术到诸兵种合同战法,以及驻营、行军、构筑工事等全面仿练;认为“治心即为治兵之本”;不拘泥于纸上谈兵,必须掌握各种新式武器装备的技术和战术;以训练“攻守战阵”的散兵战术为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术训练研究 主要分为革命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两个历史时期。

革命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历次革命战争中,面临的是残酷的环境,频繁的作战,部队的战术训练实际上是在战争环境中根据当时的作战需要进行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战术训练一般是根据游击

战和运动战战术的基本要求,主要进行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策略;强敌紧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策略等战术的训练。对基层指挥员主要是进行侦察、战斗部署、隐蔽、集中、开进、展开、追击、袭击、阵地攻击、阵地防御、遭遇战、退却、夜战、避强打弱、围城打援、佯攻等战术训练。抗日战争时期,主要是进行游击战战术和攻坚战战术训练。在实战中创造出诸如“麻雀战”、“蘑菇战”、“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围困战”、“联防战”等许多新颖战法。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形势的发展和敌我力量的对比,主要是有针对性地进行攻坚战战术、攻城战术、围点打援战术、运动战战术、渡江河战术、水网稻田战术、山岳丛林战术、步炮协同战术、步坦协同战术等训练。这期间,部队训练以战教战,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战术训练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军事家对此作出了许多精辟的论述,如毛泽东等总结的“十六字诀”、“十大军事原则”等。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新中国建立后,中央军委立即着手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和训练准备。1951年,全军掀起了以学技术为主的训练热潮。1952年,毛泽东发出了“五统四性”从教育训练入手的指示。1953年,各军种、兵种先后翻译了苏军一些专业和勤务部门的条令、条例、教令、教程和教范,如《步兵战斗条令》、《骑兵战斗条令》、《高射炮兵战斗条令》、《空军战斗条令》、《海军战斗条令》、《实弹射击教令》等,这为部队的全面正规化训练奠定了基础。1954年10月,在山东半岛进行了集团军、军两级首长——司令部进攻演习。1955年11月,进行了辽东半岛抗登陆战役演习。从1956年开始,总参谋部每年都组织有诸军

种、兵种参加的不同规模的军事演习,全训师每年进行从单兵战术训练到师的合练。1963年,中央军委颁发了《合成军队战斗条令概则》、《步兵战斗条令》、《合成军队军师战斗条令》、《合成军队营团战斗条令》等。1964年,全军掀起了群众性的练兵热潮,推广了郭兴福把练思想、练作风和练战术、练技术有机结合的练兵方法,涌现出一大批“三手”和“四会”教练员。1964年底至1969年,军事训练遭到破坏。1970~1973年,部队普遍进行了野营拉练和“三打三防”的战术训练。80年代,提出了以技术为经、战术为纬的训练改革,统一了以战斗力为标准 and 军事训练以合同战术训练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形成了新一代训练大纲、训练成绩考核标准和训练指导法,颁发了分队战术训练与合同战术训练规定,促使全军战术训练走上了规范化的道路。90年代的教学法集训,系统总结了80年代训练改革的经验,统一了全军正规化训练的路子,注重了依法治训,颁发了训练条例及相关配套的训练法规,使战术训练稳步发展。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确立后,全军兴起了学习军事高科技知识的热潮,战法研究取得新成果,训法改革出现新局面,战术对抗训练引起了全军的重视,并兴起了科技练兵的热潮,部队战斗力稳步上升。部队和专设训练机构培养单兵战术训练的教练员,初级指挥院校培养分队战术训练的组织者,兵种指挥院校培训兵种战术训练组织者,中级指挥院校培训合同战术训练组织者。这也是建国以来全军战术训练得以持续发展的根本所在。建国以来的战术训练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反映在有关战术训练的法规中,有代表性的著述是《分队战术训练》、《战术训练组织法》、《21世纪合同战术训法》等。

发展趋势 随着军事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和信息、网络技术的深入与渗透,以及科学

研究方法的不断出现,用于战术训练的新思路越来越多,注入战术训练中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战术训练手段越来越先进,战术训练实践的目的性、针对性越来越强。战术模拟训练特别是虚拟现实仿真训练和利用网络训练,将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综合利用各种训练手段于战术训练野战化、基地化、对抗化之中,将是战术训练的基本趋向;适应先进作战方式的变化,向合同战术训练方向发展,将是战术训练的总趋势;战斗指挥和战斗行动实验,将有可能成为战术训练研究的一种新方法。

(朱文华)

陆军战术训练研究 (study of army tactical training)

探讨陆军战术训练理论与实践的活动。主要包括:陆军战术训练的产生、概念、范畴、分类、发展,陆军战术训练的构成要素和客观规律,陆军战术训练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陆军战术训练的体制、内容、方法、管理和保障,陆军战术训练中的政治思想工作等。

20世纪,陆军战术训练研究,可具体区分为清末陆军战术训练研究、中华民国陆军战术训练研究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战术训练研究几个历史时期。

清末陆军战术训练研究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不仅“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就连操练了二、三十年的湘军、淮军也节节败退,溃不成军”,这使清朝统治者深感“非患兵少,而患在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无术”,遂着力“整顿兵制”,裁撤防勇,编练新军,“另练有用之兵”。新军在编练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军事技术和战术训练制度,其中北洋新军更为完善,全国各省都仿照实行。如统一操练洋操和使用新式武器,制定训练

新军的章程条规,各省新军都按日操练等。新军训练,步、炮、马、工各队有相同之处,也有不相同之处。相同之处是,思想上则将则训以“忠勇廉洁”,兵则训以“恭顺勤奋”;技艺则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始练步伐身手各法,次练布阵变化诸方,再练行军驻扎攻守调度之道。各兵种的训练重点有所不同,“步队以起伏为主,炮队以攻坚挫锐为期,马队以出奇驰骤为能,工程队以尽地利备军资为事”。步队技术、战术训练的内容有射击、队形变化、分合对敌、行军攻守、夜战防守、挖沟筑垒、测量远近等。此外,新军战术训练还注重各兵种配合的两军对垒野战演习。如1906年9月,练兵处组织部队分为南北两军,成对垒之势,实战演习侦探敌情、抢占有利地势、牵制包抄及“冲锋战法”、“遭遇战法”、“攻击防守各法”。在清末全国新军中,北洋新军之所以最强,进行对垒演习当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这一时期,陆军战术训练研究的主要成就是:

强化了训练机构在训练中的作用 1903年,专门成立主管新军编练和教育的最高行政机构——练兵处,为陆军战术训练的统一规范奠定了基础。

建立了相应的制度法规 先后颁布了各种法规、条令,为各省陆军战术训练的规范化、制度化提供法律依据。如1904年9月颁布的新军《营制饷章》,不仅具体规定了各项军事制度,如“立军制略”、“分军制略”、“常备军制略”、“续备军制略”、“后备军制略”等等,也具体规定了新军从军到班的各级军事编制。

促进了新的陆军教育训练体系的建立 如颁布《陆军学堂办法》,规定全国建立三种类型的陆军学堂,即正课学堂、陆军速成学堂和陆军师范学堂,各省应于省会设立讲武堂。军事学堂的兴办和讲武堂的设立,为清军培

养了大批组织陆军战术训练的人才。

介绍推广了西方陆军战术训练的先进经验“兵制关立国之根基,驭夷之枢纽。……岂可狃于祖宗之成法”。主张在操练新军中,必须尽裁疲弱,厚给粮饷,废弃弓箭,专精火器,化散为整,选用能将,勤操苦练。姚锡克著有《东瀛学校举概》,对日本各类学校进行系统介绍。袁世凯的《训练操法详晰图说》等,都吸收了西方训练理论的成果。

中华民国时期陆军战术训练研究 中华民国初期十分重视陆军战术训练研究,其主要特点是:①强调军官训练的重要性,以提高其组织陆军战术训练的素质。如制定《陆军官佐补官暂行章程》、《陆军官佐考绩条例》、《陆军官佐补官令》、《军队内条规责令》、《平时军队参谋服务条规》等政策法规,以调动各级军官的积极性;采取一系列组织措施,如施行“军官团”教育,建立“模范团”和陆军讲武堂,以加强对在职军官的培训和教育。②重视对陆军士兵的训练与教育,先后颁布了《陆军军队常年教育顺序令》、《各兵科军士上等兵教育令》和各兵种操典、射击教范,以及筑垒、劈刺、驭马、爆破、架桥等教范,从而使陆军各兵种的训练得以统一。这一时期,在陆军战术训练研究方面的成果主要有:《炮兵应用战术》、《步兵指挥顾问》、《步兵战术必携》、《步兵战法篇》、《骑兵战术》、《战术作业》等。

中华民国中后期,陆军战术训练研究有了较大发展,其主要特点是:①研究介绍了西方战术理论和方法,聘请德国、美国、意大利、日本等国的军事顾问来指导部队训练。②研究实施了战术训练中的精神教育,把军人精神教育作为陆军战术训练的重要动力。如《增补曾胡治兵语录》、《步兵操典》、《阵中反省令》、《士兵教育及教授法大纲》中,都体现了精神教育在战术训练中的作用。③研究制定

了战术训练教材和法规。如步兵监印发的《战斗纲要》、《步兵通信教范》、《步兵机关枪操典》,骑兵监印发的《骑兵操典》、《马术教范》,炮兵监印发的《炮兵操典》等,都进一步规范了各兵种的战术训练。④研究提出了不同作战对象和不同战争形式下的训练要求,并有针对性地开展战术训练。如抗日战争时期,围绕部队作战力量的加强,提出了分期整训部队的思想,并制定了《国防军整理案》、《战时军队教育令》、《军队教育手册》、《战时教育训令》等,作为指导和整训部队的依据。抗战期间,由于美国先进装备的大量输入,为借鉴美军的训练经验,使部队学会使用美式装备,提高战斗技能,在西南开展美式装备战时训练等。这一时期,在陆军战术训练研究方面的成果主要有:《战术之教育及指导》、《现地战术》、《通信战术》、《炮兵战术大纲》、《战车战术》、《图上战术》、《沙盘战术》、《沙盘兵棋》等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战术训练研究 主要分为两个历史时期:

革命战争时期陆军战术训练研究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领导创建人民军队之日起就十分重视这支军队的战术训练研究问题,并在战争实践中总结形成了一整套战术与训练理论。主要特点是:①研究并提出在战争中学习战术,总结战法。如“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与川军作战要点》、《游击战争要诀》、《步兵基本动作》、《追击要点》、《与“剿赤军”作战要诀》、《野外勤务》等,都是在作战实践中总结提出的。②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因时、因敌制宜进行战术训练。在战争不断的情况下,不片面追求“正规化”和“系统化”。朱德的《军事教育必须从实际出发》指出:战术训练“必须从实际出发,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如在井冈

山时期,就形成了日常操课训练、野战实践训练、结合战例讲解战术、战术理论学习等一整套战术训练方法。抗日战争时期,随着装备的不断发展变化,开展了对特种兵器使用的战术训练。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战略反攻阶段,针对城市进攻作战、阵地进攻作战、水网稻田地作战增多的实际,广泛开展了城市进攻战术训练、阵地进攻战术训练、渡江河战术训练以及步坦协同战术训练等。③注重借鉴外军经验。在训练中,除介绍国民党军作战和训练经验外,还研究了日军的战斗纲要、法军的战斗条令、苏军的合同战术等,丰富了自身的战术训练理论,研究编写出一些战斗和训练的教范或条令,如《步兵操典》、《步兵教范》、《战斗条令》等。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陆军战术训练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人民解放军逐步进入了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新阶段,军事训练成为军队建设的中心任务。陆军战术训练研究也进入了繁荣发展时期。

50年代初初期到60年代中期,陆军战术训练由战争年代的应急训练转向相对和平时期的正规化训练,陆军战术训练研究也有了新的发展,并取得了新的研究成果。主要是:①研究明确了训练体制。在建国初期,迅速建立了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等新的陆军兵种及其领导机关,统一了陆军部队的训练领导机构,明确了在总部领导下各兵种、各部队按级负责的训练体制。②研究建立了训练法规体系。在总结战争年代战术训练经验的同时,借鉴苏军的经验,编写颁发了一系列规范部队训练的大纲、教令、教程、教范等,统一了陆军战术训练的制度、内容、方法、步骤。③研究推广了好的训练方法和典型经验。研究开展了以“三手”(神枪手、神炮手、技术能手)和“一专多能”为内容的群众性练兵活动,总结推广了郭兴福教学

法,提出并掀起了以大比武的形式检验训练效果的练兵热潮,总结施行《中国人民解放军连队基础训练方法二十条》等。^④突出强调了院校教育的重要性。在人民解放军先后建立了初、中、高三级相互衔接、兵种齐全的正规化陆军院校教育体系的同时,研究编写了系列教材,实现了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规章制度的规范化。毛泽东给军事学院、总高级步兵学校的训词,刘伯承的《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学习军事理论必须与实际结合》等一系列论述,为提高办学质量指明了方向。

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陆军战术训练研究主要围绕恢复部队正规化训练秩序而展开。主要研究成果是:①研究提出了全面恢复训练秩序、依法治训的思想。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大纲总则、关于加强部队教育训练的决定、关于办好军队院校的决定、关于办好教导队加速轮训部队基层干部的指示、关于全军教育训练的若干问题、关于军队院校教育改革的决定、关于经过院校培训提拔干部的决定等规范部队训练。②研究探索了适应现代战争特点和要求的陆军战术训练内容和方法,提出了加强“三打三防”训练、提高“五种能力”、开展模拟训练等训练理论。

进入90年代,陆军战术训练研究主要是围绕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展开的。主要成果是:①进一步研究和完善了训练法规体系。颁发了全军历史上第一部训练大法——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条例及与之相配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计划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考核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指导法等法规。②进一步提出了开展“科技练兵”和实施网络化、模拟化、基地化的战术训练方法。③进一步研究总结了现代条件下陆军战术训

练理论。如《军事训练学》、《合同战术训练理论与实践》以及《当代中国军队的正规化训练》等。

发展趋势 进入21世纪,陆军战术训练研究将紧紧围绕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这一基点,着重研究科学高效和便于组织、考核、监督的合同战术训练新体制;创新联合训练中陆军战术训练多兵种、多层次、多地点,实兵演习与仿真模拟相结合、指挥训练与部队训练相结合、技术训练与战术训练相结合、传统方式与信息手段相结合的新的训练形式和方法;探索培养适应未来战争需要的创新型、复合型军事人才的陆军院校教育体系;等等。

(王兴中)

海军战术训练研究 (study of naval tactical training)

探讨海军战术训练理论与实践的活动。研究内容包括:海军战术训练的定义、分类、性质、特点、任务、组成要素、训练对象、原则、手段、内容、体制、组织实施的程序和方法、训练保障等。目的是揭示海军战术训练的一般规律和指导规律,研究海军各类战术训练的特点、形成、完善和发展海军战术训练理论,寻求符合海军实际和贴近海上军事斗争需要的战术训练方法。其研究成果可用于指导海军战术训练实践,改进训练方法,提高海军战术训练的水平,为相关海军军事训练法规的制定提供科学的依据。

根据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不同,海军战术训练研究可分为水面舰艇战术训练研究、潜艇战术训练研究、海军航空兵战术训练研究、海军岸防兵战术训练研究、海军陆战队战术训练研究和海军诸兵种合同战术训练研究等。其中海军合同战术训练研究为海军战术训练研究的重点,其研究内容和研究成果

对海军各兵种战术训练研究具有指导和规定作用。

清末海军战术训练研究 海军战术训练研究的形成和发展与海军技术装备、战斗实践、战术理论的发展密切相关。20世纪初,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清末海军处于恢复重建时期。清廷认为:“惟是致胜之道,首在得人。欲求堪任将领之才,必以学堂为本”。于是,除选派人员赴英、日等国留学外,还整顿恢复了多所海军学堂,改兵轮为练船,聘请洋教官讲授海军战术训练课程。实行对海军军官进行分类分级训练,在部队进行单舰、舰艇编队战术训练。先后翻译出版了英、法、美等国的《水师操练》、《各国水师操战法》、《各国兵船操练》、《海战新义》、《船阵图说》等多种书籍,作为海军学堂和海军舰艇进行战术训练的教材。这些书籍的内容已基本包含近代海军作战指导和训练理论的主要方面,其中不少书籍一直沿用至中华民国初期的海军。为加强海军训练管理,清廷成立海军部军学司,专司海军院校教育和舰队训练;设总查学官、查学官和总督练官、督练官,专司海军各学堂、练勇营和海军各舰队的教育训练;设立海军研究所,专司海军战术及训练研究,并为海军中、下级军官提供学术讨论的场所。

中华民国海军战术训练研究 前期,北洋政府组建了海军陆战队,把清廷创办的各海军学堂集中收归海军部直接管辖,进行整顿、续办,并专门建立一支练习舰队,战术训练基本上是沿袭晚清海军的做法。到中后期,国民党海军进一步调整完善了海军院校和部队的训练体制,战术训练主要仿效德、英、日、美等国海军的训练方法。陆续创办了《海军杂志》、《海军整建》、《海军期刊》等刊物,出版《海战学》、《海军战术》、《海军战术讲义》、《海军战术参考资料》等著作和教材,使海军战术训练研究得到较大的发展。但是,由于这些研

究援引外国海军的内容较多,与自身的实际脱节,因而对中国海军的训练和作战并未起到多大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海军战术训练研究50~60年代,是人民解放军海军组建后武器装备不断更新,体制编制不断完善,新兵种逐步建立,进入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海军战术训练研究学习苏联经验,结合人民海军实际,以掌握舰艇、飞机等装备的战斗使用为基础,针对东南沿海作战需要组织战术训练展开的。在此期间,海军分别参加了广州军区、南京军区和总参谋部组织的登陆和抗登陆实兵演习,研究探讨在联合战役中海军遂行海上作战任务的方法。1955年,海军的水面舰艇部队和航空兵部队,参加了陆军、海军、空军联合进行的一江山岛登陆作战,战前进行了临战战术训练,有效地提高了部队的作战水平。50年代末,针对台湾国民党海军和可能来自海上的外敌入侵,研究了海上破袭游击战,以轻型兵力、小编队协同袭击敌小型护航运输队、单艘舰船以及岸上防御薄弱目标的战术。60年代初至“文化大革命”前,海军突出近战、夜战及航空兵低空、超低空突防轰炸和夜间空中照明攻击等高难度战术训练,加强复杂条件下协同作战的训练,部队战斗力明显提高。这一时期,海军先后多次取得海战和空战的胜利。“文化大革命”期间,正规化的海军战术训练受到破坏。80~90年代,人民海军的战术训练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海军战术训练研究是在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指引下,紧紧围绕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这一基点展开的。重点研究了在海上封锁、渡海登岛等战役背景下,遂行不同任务时组织实施不同样式战斗的方法,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善的部队、院校战术训练体制,丰富了以海军合同战术和首长、机关

训练为重点的战术训练内容体系。探讨了海军不同样式战斗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编著出版了《海军战术训练法》、《海军战役战术模拟训练》,创办了《外国海军训练》期刊,推动了海军战术训练改革,丰富了海军战术训练的理论。

发展趋势 进入 21 世纪,海军战术训练将着重研究运用新的军事理论指导战术训练实践;深化训练改革,使海军战术训练最大限度地满足高技术条件下的作战需要;依靠科技进步,实现海军战术训练的最佳效益等方面内容,以丰富和发展海军战术训练理论。

(宋海印)

空军战术训练研究 (study of air force tactical training)

探讨空军战术训练理论与实践的活动。研究内容包括:空军战术训练的产生、本质和发展,空军战术训练的类型、结构及组成要素,空军战术训练的指导规律、原则、内容和方法,空军战术训练与其他军种、兵种战术训练的关系等。

20 世纪,中国空军的战术训练研究可划分为以下两个时期:

中华民国的空军战术训练研究(1926~1949) 1926 年 7 月,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成立航空处和北伐航空队。随着空军在北伐战争中配合陆军作战的需要,空军战术训练研究也随之开始。当时主要是进行侦察、轰炸和长途飞行训练等。1929 年,成立了三所航空学校并设有战术集训班。1932 年,国民党空军又组建了第七航空队,并聘请德国人进行战斗飞行教练。抗日战争开始后,为适应战时需要,国民党加强了空军力量建设,同时也加强了空军战术训练研究。航空委员会中设有专门的训练处,负责部队的作战与训练。1943 年,航空委员会同美国

空军部队组成中美空军混合团,下辖三个大队,并派遣飞行及各种专业人员分期分批赴美受训,使空军的技术、战术水平有了提高。抗日战争结束后,设立空军训练司令部和空军供应司令部。其中,训练司令部负责空军部队和学校教育训练的组织计划工作,以及选拔优秀人才送往国外培训深造。国民党在发动全面内战的同时,其空军得到了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援,武器装备全面更新和发展。组织上的健全和武器装备的发展,促进了国民党空军战术训练与研究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空军战术训练研究(1950~2000)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自 1949 年 11 月 11 日建立以来,根据各个时期军事斗争实践和武器装备状况,紧密结合作战需要,开展群众性的战术训练研究,不断总结自己的经验,并汲取外国空军有益的经验,逐步形成了具有人民解放军空军特色的战术训练理论和战术训练系统。

初步形成时期(50~60 年代) 50 年代初期,空军通过参加抗美援朝作战,提出了“以少胜多”、“集中兵力、各个歼敌”、“机动灵活”等战术原则和要求,特别是总结提出了“一域多层四四制”的机群空战战术原则,并积极开展四机、八机及大机群的机动空战战术训练,为形成系统的空军战术理论和战术训练打下了基础。50 年代中期,空军部队为参加协同陆军、海军进行的解放浙东沿海岛屿的作战,开展了航空侦察、夺取战区制空权、保障陆军和海军部队集结、航渡和登陆进攻、掩护海军和空军基地安全、以航空火力突击敌舰和岛上防御设施等战术训练,取得了宝贵的战术训练经验。50 年代末,空军部队进入福建和广东沿海基地,与台湾国民党空军展开夺取制空权的战斗。根据当时军事斗争的需要,围绕着隐蔽突然、出敌不意、审时度势和灵活指挥等开展了多种战术训练。改

进了长机、僚机协同,制定了航空兵与高射炮兵协同作战的战术原则,研究和训练了对付敌携带空空导弹的空战战术。从50年代初至60年代末,空军为完成防空作战任务,进行了长期的反侦察、反干扰等特殊作战战术训练,积累了丰富的战术训练经验和战术理论成果,标志着人民解放军空军战术训练研究的初步形成。

调整发展时期(70~80年代) 这一时期,国际形势和中国周边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防备大规模外敌入侵,特别是防备来自空中的突然袭击,成为当时主要的作战准备任务。为适应这种形势和任务的需要,空军的战术训练研究,主要以解决大规模战争中反空袭作战具体战法为主。通过多次组织战术实兵演习,着重研究了反侵略战争初期抗击敌空袭、夺取制空权和协同陆军、海军作战问题,以及以劣胜优、以少胜多的具体战术;探讨了歼击机和轰炸机的作战使用问题,及其在未来作战中的战术运用,并开展了相应的战术动作训练。航空兵部队还组织了“红”、“蓝”军分队模拟战术对抗演练,按战斗程序练指挥、练协同、练战术,并进行了多种战术试验。针对特殊的作战环境,空军研究了各机种的具体战术,特别是歼击航空兵战斗队形的运用,使用空空导弹条件下的空战战术动作,轰炸、强机航空兵突击敌机场、桥梁和山岳丛林地带炮兵阵地的战术,极大地丰富了空战战术理论和训练实践。

全面发展时期(90年代) 海湾战争以后,中央军委确定了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把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的局部战争作为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为此,空军全面系统地开展了战术理论研究和战术训练。战术理论研究方面,出版了空军战术学和歼击航空兵空战战术概论等专著,新编了一批兵种战术理论教材,撰写出大量空军战术理论研

究的论文和调查报告,使空中进攻作战、防空作战等战术理论得到进一步充实。为了规范空军航空兵战术训练工作,空军颁发了航空兵战术训练条例,使航空兵部队组织与实施战术训练有了依据。这一时期,空军战术训练研究的主要成果是:①研究创新了战法理论。空军组织院校、部队、科研单位联合组成战术(法)研究攻关组,有针对性地对作战对手进行研究,研练与创新克敌制胜的有效对策,有力地推动了部队的战法创新与战术训练。②研究完善了战术训练内容、程序和法规制度。练程序、练指挥、练动作、练协同,从战术理论研究、模拟论证、验证试飞、分步训练、战术合练到战术演习,做到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③研究了复杂条件下战术训练问题。空军部队的战术训练严格按照作战程序,针对性地设置逼真的作战背景和环境,并尽量把部队放在复杂困难的条件下进行训练。④研究了合同战术训练问题。针对90年代以来两场局部战争中空军作战多是各兵(机)种联合作战的特点,加大了各兵(机)种的合同战术训练研究,并通过演习检验提高了空军部队的合成作战能力。⑤研究改进了战术训练手段。利用高科技建设空军合同战术训练中心,使空军的战术训练逐步向程序化、模拟化、网络化、基地化方向发展。

发展趋势 进入21世纪,空军的战术训练研究,将由单一的兵(机)种战术训练研究,向多兵(机)种的合同战术训练研究转变;由以往的图上作业、战术推演的研究方式,向战术综合仿真实验、战术训练基地检验的方式转变。

(余桂林 赵荣献)

战略导弹部队战术训练研究 (study of tactical training of strategic missile forces)

探讨战略导弹部队战术训练理论与实践

的活动。研究内容包括:战略导弹部队战术训练的产生、本质和发展,战略导弹部队战术训练的类型、结构及组成要素,战略导弹部队战术训练的指导规律、原则、内容和方法,战略导弹部队战术训练与部队建设以及与其他军种、兵种战术训练的关系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导弹部队战术训练研究已走过40多年的路程,大体可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萌芽时期(1959~1965) 1959年12月,中央军委炮兵和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在北京组建了第一个地地导弹训练机构——炮兵教导大队,学习和使用从苏联引进的P—2导弹。与此同时,战略导弹部队战术训练研究也开始启动。当时,由于部队缺乏装备和训练理论指导,只能用简易模拟器材练习操作动作、手法要领和协同动作,为实装操作训练打好基础。60年代组建了导弹营,后扩编为导弹团,相继有数个导弹营进行了实弹发射训练。这些为战略导弹部队战术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战术训练研究提供了广阔领域。这一时期的训练研究是以单个操作手、单项测试、单项操作基本功为主要内容的技术训练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编写了多种针对性很强的专业训练教材。在进行技术训练研究的同时,着手探索战略导弹部队的作战特点、战术运用原则和方法,研究战术训练问题,组织导弹营进行带战术背景的导弹点火训练和发射训练,为部队运用导弹武器作战初步积累了经验。

发展时期(1966~1983) 1966年7月,战略导弹部队领导机关在北京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非常关心这支部队的建设,要求在各种气候、各种条件下从难、从严训练部队。周恩来还对部队的训练和实弹发射,提出了“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要求。在邓小平关于要把训

练提高到战略地位思想指导下,战略导弹部队战术训练研究开始由技术训练研究为主转入以实兵实弹训练为主的战术训练研究阶段。1977年,根据中央军委命令,组织了作战演习,重点研究了导弹团以“走、藏、打”为主要内容的机动作战的组织指挥、战斗实施与保障等战术问题,使战略导弹部队的训练研究开始由单一的技术训练研究向技术训练与战术训练相结合的方向转变。同年11月,第二炮兵指挥学院成立,在总结战略导弹部队技术、战术训练经验的基础上,编写出导弹团战术教材。1978年,编写出第二炮兵作战概则。1980~1982年,制定了第二炮兵作战运用原则,使部队的战术训练及研究有了依据,这些成果标志着战略导弹部队战术训练研究开始向规范化方向发展。

繁荣时期(1984~2000) 1984年,在研究总结战略导弹部队战备建设和技术、战术训练经验的基础上,编写颁发了第一代作战条令,当年又研究提出了以加强发射大队为主体的合成训练和配套建设的理论,确立了以技术为基础,以合成配套为中心,以干部为重点的战术训练思想;揭示了战术训练的客观规律,阐明了导弹发射分队、保障分队、作战阵地、武器装备、指挥通信等各要素的内在联系;规定了先基础后应用,先技术后战术,先分练后合成,由低级到高级,循序渐进,逐步提高,逐级合成,技术与战术并重的训练原则。1994年10月和1998年5月,为加强导弹旅(团)合成战术训练与配套建设,提出了导弹旅合成训练的“一个独立、两个同时”、装检团合成训练的“一个标准、四种能力”的战术训练标准。同时,编写颁发了第二炮兵导弹旅营战斗条令、第二炮兵常规导弹旅营战斗条令、装检团站战斗条令、各级司令部工作条例、战备制度规定、战备等级规定、作战准备等级试行规定、合成训练规定、训练大纲等法

规性文件,取得了一系列合成训练理论研究成果。这些战备建设和战术训练研究成果,标志着战略导弹部队战术训练研究开始走向理论化、系统化。

发展趋势 进入 21 世纪,为适应军事斗争准备的需要,在训练方法上主要是加强科技兴训、依法治训、战技融合、整体推进的研究,提高部队整体作战能力;在训练内容上主要是遵照新的训练大纲,加强电子对抗战术训练、防精确制导武器打击战术训练、导弹突防战术训练、核导弹部队配合下的常规导弹部队进攻战术训练等的研究,使战术训练更加贴近未来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实际。

(张西民 司 宇)

国防经济学研究

(study of national defense economics)

探讨国防经济运动和国防经济关系及其规律的活动。国防经济学亦称战争经济学、军事经济学。研究对象是国防经济运动,研究内容主要有:国防需求与供给等矛盾关系及发展趋势,国防经济资源的规模、结构和布局的确定与控制,国防经济运行机制与管理体制,国民经济的平战转换及动员机制,国防经济发展战略的目标、内容、重点、步骤、策略和措施。国防经济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是揭示国防经济矛盾运动和发展的客观规律,为国防经济的决策和管理提供理论依据。国防经济学研究主要分为国防经济基本理论研究、国防经济应用研究、国防经济史研究等。

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对军事与经济的关系有所研究,出现了管仲的富国强兵思想和孙子的“取用于国,因粮于敌”的国防经济思想,形成重农和兵农一体的军事经济思想传统。18 世纪 70 年代,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对国防经

济就进行了探讨。19 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古典经济学派国防经济思想的合理内容,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战争与社会物质生产的关系,指出了暴力、战争与革命产生的经济根源,为国防经济学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将国防经济作为独立的学科进行研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开始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英国的经济学家 F. W. 赫斯特和 A. C. 庇古。1914 年,赫斯特的《战争的政治经济学》出版,1921 年庇古的《战争经济学》出版,后者一般被看作是国防经济学学科形成的标志。德国的 E. 鲁登道夫在其《总体战》中阐述了军事经济一体化的国防经济思想。欧洲的国防经济学理论,于 20 世纪 30 年代传入中国,先是《战时经济学》,1936 年《总体战》也出版了中文译本。这些国防经济学说的传播,为中国国防经济学的形成提供了条件。

中华民国时期的国防经济研究 30 年代起,中国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严重的战争威胁,继而进入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时期,战时经济的发展及其状况,成为军事家和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在国民党政府统治区,出现了以资源委员会成员为主的研究群体,出版了一批国防经济学著作。主要有:蒋百里的《国防论》(1937)、关吉玉的《中国战时经济》(1936)、钱俊瑞的《中国国防经济建设》(1937)、马寅初的《抗战与经济》(1938)、千家驹的《中国战时经济讲话》(1939)、董问樵的《国防经济论》(1940)等。从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可以将他们划分为三个流派,关吉玉、蒋百里、千家驹分别是三派的代表。

关吉玉等的国防经济观点 这一派受英美战时经济思想影响较大,运用古典经济学原理,围绕“财力”的问题,着重研究战时财政和金融状况。他们认为,国家的财力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战时财源和筹措手段至关

重要。在筹措大量战费、物资供给战争消费时,稳定市场和保证整个经济的运转,是战时经济政策的核心问题。在财政方面,战时财政收入主要有公债和税收,两者各有利弊。战时财政应以租税为主,以公债为辅,初期以公债应付急需,同时设立新税,扩张旧税,逐步使租税成为战时经济的基础。战时金融必须维持各种物资的生产,保证战时财政的顺利运行;不能靠发行纸币筹措战费,要实施战时金融调节,防止信用破坏和保护现金准备,通过提高再贴现率,不得已时以法令规定延长债务偿还期限,缓解信用危机;通过停止兑现,禁止黄金出口和外汇限制,奖励出售和储蓄黄金,扶助贵金属生产等方法避免和缓解金融危机。此外,他们还认为,对战时经济必须实行统制,特别是粮食、外贸、运输和军工生产等方面。

蒋百里等的国防经济观点 这一派受德国战时经济思想影响较大,代表人物除蒋百里外,还有杨杰、董问樵等。他们主张军事与经济一体化,发展国家的“战力”。他们认为,战争力量是各种力量,主要是军力、政治力、经济力的综合,现代战争是全体性、全民族的战争,军事与经济合则兴,分则衰,对立则亡,只有军事与经济的统一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董问樵系统阐述了国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学科体系,全面研究了国防需求、经济动员、战时经济、经济复员等国防经济的主要问题,提出国防经济的两个基本原则和两个辅助原则,即民族的生活与战斗条件、经济力和国防力一致的基本原则;国民经济利益要隶属于国防经济安全,国防经济的安全要适应国民经济的经济性的辅助原则。

千家驹等的国防经济观点 这一派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影响较大。他们认为,中国战时经济的基本特征是敌强我弱,中国经济落后,动员迟钝,受外国势力牵制,沿海经济先

遭到破坏;但中国地大物博,农村经济半自主,工业尚未统治农业,加之战时排除了部分外国经济的干扰,资金和技术流向内地,手工业得到发展空间,以及战争的正义性,使中国有了坚持持久抗战,化不利为有利的条件。他们主张进行政治改革,维护劳动人民的正当权利和基本利益,从根本上增强国防实力,夺取抗战胜利。他们认为,战时经济理论的出发点不是“财力”,而是“物力”。应首先考察物质资料的生产和流通,然后再考察战时货币运动的特点和规律,这才是合乎逻辑的。

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国防经济理论的发展把中国国防经济理论推进了一步,在中国国防经济理论发展史上处于重要的地位。

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战争时期的战争经济研究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长期处于物资极端困难的革命战争之中,始终十分重视战争与经济问题的研究,形成了独特的人民战争的战争经济理论。它主要蕴涵在毛泽东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必须注意经济工作》(1933)、《我们的经济政策》(1934)、《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论持久战》(1938)、《论政策》(1940)、《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1942)、《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1943)、《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1948)、《1948年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1948)等著作中。其主要理论成果有:

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理论 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反动力量异常强大,但对广大农村统治则相对比较薄弱,革命武装只有首先向广大农村进军,建立农村根据地,不断发展力量,才有可能最后战胜敌人。在中国,微弱的资本

主义经济与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并存,近代式的商业都市和停滞的广大农村并存,且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占绝对优势,城市受广大农村的制约,而广大农村则可以脱离城市独立地生息繁衍,这就为革命武装首先在农村立足,并通过巩固和发展农村经济支持战争提供了基本条件。这一理论解决了中国革命道路、革命战争的战略、革命根据地建设等一系列根本问题,成为毛泽东战争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

持久胜敌的经济理论 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就提出,日本侵华战争虽然是在较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的基础上进行的,但同时又是在其先天不足的基础上进行的。日本国度比较地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而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支持长期的战争。在此基础上,加上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坚持抗战,加上其他进步因素的存在和发展,中国的劣势终将转化为优势,最后的胜利必将属于中国。

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理论 革命战争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力量的支持。在革命战争时期必须进行必要的经济建设。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提出,战时经济和财政工作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经济政策必须有利于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要有利于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以造成将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货币的发行要适应革命根据地发展的需要,单纯的财政需要应放在次要地位;积极争取外来资本在革命根据地投资,发展工商业;军队要生产自给以减轻政府的负担;等等。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战争的战争经济思想,对中

国革命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防经济学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国防经济研究与国防经济建设的实践有着紧密联系。以1978年为分界线,中国国防经济理论分为前后两个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研究内容和特点。

1949~1978年的国防经济学研究 这一时期是国防经济建设经历奠定基础 and 迅速发展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战争经济理论向国防经济理论发展的时期。在领导中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国防和经济的关系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发展和丰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防经济理论。这些理论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的著述之中。主要理论内容有:①加强国防建设必须首先加强经济建设。国家经济落后,国防力量不强,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强了,国防建设才能有更大的进步。要将控制军费比例和多搞经济建设提高到战略高度来认识,严格控制军费在国家预算中的比例。②建立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国家依靠进口在短时间内迅速提高国防经济能力是必要的,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防问题,国防建设的总方针是从实际出发,自力更生,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国防工业发展道路,建立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要正确处理国防工业和基础工业、国防工业和科学技术、国防工业中军用与民用和平时与战时的关系,国防工业要学会两套本领,贯彻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方针。③建立合理的国防经济布局 and 巩固的战略后方。50年代,针对原有经济布局极不合理的状况,强调加强内地的投资和工业建设。60年代,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提出将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重点建设“三线”的战略构想,短时间内

建成了以重工业为主、生产门类齐全、科研试验与生产相结合的战略后方基地。

1979~2000年的国防经济学研究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国防经济研究进入繁荣发展的阶段。以邓小平、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毛泽东国防经济思想,研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防与经济问题,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国防经济理论。

邓小平的国防经济理论 进入80年代以后,邓小平就曾指出,经过长期的思考和冷静的判断,认为总的判断是战争危险还是存在的,但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争取和平是可能的。他还指出,对战争与和平作出准确的判断很重要,中国过去的好多决策,包括第一、第二、第三线的布局和“山、散、洞”方针等,都是从战争迫在眉睫的观点出发的。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是在国际形势的判断上不再认为战争迫在眉睫,二是相应调整了对外政策,这是两个极其重要的转变。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了战略性转变,即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真正转到了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上来。与此相适应,国防经济也要实行转轨,国防经济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要对国防经济发展的规模、结构、布局、体制实行一系列重大调整;国防工业和国防科技部门要参与国家建设,大力发展民用生产,成为经济建设的重要生力军;要提高国防经济运行的效率,增强战时动员的潜力;科技要先行,要走在国防发展的前面,高科技要成为战略重点;要从实际出发,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国防经济发展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国防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邓小平的国防经济理论,有力地促进了国防经济的转轨,使其进入与国民经

济发展相互促进、相互协调、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

江泽民的国防经济论述 进入90年代,世界战略格局发生巨大变化,江泽民在确立邓小平国防经济思想在中国国防经济建设中的指导地位的同时,作出了新形势下走有中国特色国防经济发展道路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其基本内容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防建设必须服从经济建设的大局;以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为基点,努力加强国防建设;必须形成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机制,国防科技、国防工业要能军能民,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时要充分考虑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需要;要努力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的新体制,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建立一套有效的竞争、评价、监督机制;要“科技强军”,把国防科研和武器装备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要建立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国防经济快速动员机制,做好必要的物资和技术储备;要加强军队的后勤建设,以适应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学术界的国防经济学研究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党全国的工作任务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邓小平国防经济理论和江泽民关于国防经济的一系列论述,使国防经济学界的学术研究进入繁荣和发展的新阶段。1983年起,《经济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主办的《外国军事学术》等先后开辟了“军工与民用”、“国防科技工业”、“国防经济研究”、“国防经济学”等专栏;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后勤学院等开始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的国防经济思想。1985年1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国首次国防经济学讨论会,钱学

森在会议上提出“要建立一门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的国防经济学”。同年10月,在武汉高级后勤学校召开了军队院校国防经济学讨论会。1986年11月,在北京召开了国防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这三次理论研讨会为新的国防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起了奠基的作用。1987年3月,成立了北京国防经济研究会。同年5月,在武汉军事经济学院成立了军事经济研究中心,建立了系、所、室相配套的教学科研机构,创办了全国性国防经济理论刊物《军事经济研究》。国防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后勤指挥学院、军事经济学院等院校先后开展了国防经济专业的研究生教育。

主要研究成果和主要观点 20多年来,中国国防经济学界在国防经济研究方面所取得的主要成果及主要的学术观点有:

国防经济基本理论研究 以1985年在北京和武汉召开的国防经济理论研讨会为标志,在学科称谓、定义、对象、内容、任务、特征、规律及学科地位方面,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钱学森提出了商品经济条件下军品是商品的观点,突破了传统体制下否认军品是商品的思维定势。金朱德认为,政治经济学、战略学和国防经济学研究所涉及的战争与经济关系是处于不同层次的,提出国防经济学主要研究战争对资源的直接依赖以及战争的经济准备和保障。孙振环针对民用工业和国防工业长期分离所带来的弊端,提出了建立军民结合工业体制的设想。1986年宋振铎、库桂生出版了《国防经济学概论》。此后,刘大军、张振龙、樊恭嵩、王其坤、刘化绵、杨永良、何善昌、刘义昌、朱庆林等都出版了国防经济基本理论研究成果。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防经济理论研究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并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推动了具有中

国特色的国防经济学理论的建设。以1989年在北京召开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防经济学理论研讨会为标志,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防经济的特征、运行规律、运行机制、管理体制、国防经费、国防工业、军人工资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对解决中国国防经济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了富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国防经济发展战略理论研究 1985年以后,随着中国国防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军队裁员100万,国防开支压缩,国防工业军转民等,有关国防经济发展战略方面的问题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1986年,曾有人提出国防经济增殖型发展道路,成为争论的焦点。大多数学者认为,国防不能“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军队应吃“皇粮”、走职业化常备军的道路。这场争论,深化了人们对国防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的思考。1987年,顾建一、房立中、陈维平的《关于我国国防发展道路的思考》,提出了军民结合、富国强兵的国防发展道路。1989年,杨永良的《中国模式:“短缺自补”型国防发展途径》,提出了国防有效需求超过其供给出现的不足部分,由国防系统自行发挥潜能来增加资源补充。1990年王其坤、刘化绵、徐勇的《论国防建设的适度发展》,提出了国防建设应能为国家的安全与稳定提供可靠保证,保持与经济建设相适应的国防建设规模与发展速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防经济理论研究 1991年,游潜之等人编著的《中国国防经济运行分析》,论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国防经济运行的结构、模式,分析了双重体制下国防经济的运行及调控。1993年,万东铨的《军事经济运行机制重塑》,论述了国防经济运行机制的涵义、构成,探索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国防经济运行机制的构架及机制转换的思

路。1993年的《军事经济研究中心年度文鉴》和朱庆林主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军事经济》，较为系统地分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国防经济运行的环境、供需矛盾、管理体制、运行方式和手段等问题，探索了市场经济对国防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的影响及对策。

高技术局部战争条件下国防经济理论研究 1991年，曹智英主编了《战时经济论》，初步论述了现代技术条件下战时经济动员、战时经济组织、战时经济复员中的理论问题。1993年，朱庆林主编的《战时经济概论》认为，“现代战争向着高技术化的方向发展”，“迫切要求我们对原有的观念进行更新”，分析了高技术局部战争的突发性、有限性、高技术性、多样性、高耗性等特征，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措施。1995年，朱庆林主编的《高技术局部战争与军事经济》，系统地论述了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对国防经济建设的要求，分析了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国防开支、国防科学技术、国防工业、军火贸易、战略物资采购与储备等一系列问题，探索了未来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中经济动员、战时经济统制、战时经济战、战时交通运输、战时对外经济关系、战时经济复员等的对策与措施。

国民经济动员研究 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先后召开了十余次大型的理论研讨会，出版了《寓军于民》、《常备军工与动员工作》、《市场经济与国民经济动员》、《国民经济动员管理模式与运行机制》、《国民经济动员体制改革》、《国民经济快速动员》等文集。1995年，陈得第、库桂生出版了《国民经济动员》，朱庆林等人于1997~2001年先后出版了《国民经济动员概论》、《经济动员基础论》、《经济动员机制论》、《经济动员准备论》等著作。这一时期，国民经济动员研究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国民经济动员的范畴、特征、地位、功能等

基本理论，研究了国民经济动员的基础、体制、法规、计划、预案、程序，以及快速动员能力等现实问题，在国民经济动员范畴、经济动员建设、军民一体化的工业动员基础、国民经济动员非军事功能开发、21世纪经济动员准备模式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民经济动员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

国防经济史和国防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在国防经济史方面，成果丰富，主要有张振龙主编的《中国军事经济史》(1990)、库桂生、姜鲁鸣著的《中国国防经济史》(1991)、龚泽琪著的《中国军事经济全史》(1999)、《世界军事经济史》(2001)等。在国防经济思想史方面，主要有钱大林等著的《国防经济学60年》(1988)、王萱等主编的《中国军事经济思想史》(1992)、刘业础等主编的《军事经济学说史》(1995)、库桂生等的《国防经济学说史》(1998)等。他们揭示了国防经济学各种范畴和理论体系的演变过程，寻找国防经济学历史发展的内在线索，为现代国防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素材。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国防经济思想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主要有龚泽琪、王松的《中国无产阶级军事经济思想史》(1992)、李晓华的《毛泽东战争经济和国防经济思想研究》(1993)、李怀信、缪新权的《毛泽东军事经济思想研究》(1993)、蒋宝祺等的《毛泽东军事经济思想新探》(1993)和《邓小平新时期国防经济思想研究》(1997)、陈刘华等的《试论江泽民同志关于军事经济改革思想》(1999)。这些成果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国防经济思想和论述，有助于深入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国防经济理论研究的发展。

发展趋势 未来中国的国防经济理论研究，在注重基本理论研究的同时，将着重关注

以下重大问题:依据国家发展战略和军事战略,研究 21 世纪中国国防经济发展战略;贯彻国防建设依托国民经济建设的思想,探索低耗型国防经济建设的道路;围绕军事斗争准备,研究国防资源规模、结构和布局的配置和调整;立足于打赢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重构国民经济快速动员机制;结合国家高技术发展战略,寻找开发军事高技术特别是军民两用技术的策略和措施;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国防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等。

参考文献

宋振铎、库桂生著,《国防经济学概论》,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刘大军主编:《中国社会主义国防经济学》,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

朱庆林等著:《军事经济基本理论研究》,济南:黄河出版社,1992。

库桂生等:《国防经济学说史》,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8。

(朱庆林 刘义昌 孟仁忠)

军事法学研究

(study of science of military law)

探讨军事法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活动。研究内容和范围比较广泛,可从不同角度进行划分。一般可分为:①军事法基本理论,综合研究军事法的基本概念、原理、作用、功能、结构、体系、效力等级、制定及实施等。②军事历史法学,主要研究军事法制史、军事法律思想史等。③部门军事法学,主要包括兵役法学、军事组织法学、军事行政法学、军事诉讼法学等。④军事法制学,主要包括军事立法学、军事司法学、军事法律顾同学、军事法制教育学。⑤国际军事法学,主要包括国际法中的战争法及海洋法、航空法、外层空间法等

有关内容。⑥比较军事法学,指对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军事法所作的比较研究,主要包括比较兵役法学、比较军事行政法学、比较军事刑法学、比较军事诉讼法学等。⑦边缘军事法学,指军事法学与其他学科交叉或渗透而产生的一些新学科,如军人犯罪学、军人法律行为学等。中国的军事法学研究,不仅着眼于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的发展,为军事法制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而且适应国际军事斗争的需要,为维护国家军事利益进行了有益的学术探索。同时,为增强包括军队官兵在内的全体公民的军事法制观念奠定了理论基础,为繁荣军事学理论和法学理论做出了独到贡献。

清末和中华民国时期的军事法学研究中国清朝末年,湘军、淮军、北洋海军、新建陆军,都不同程度地重视军事法制,并提出了相应的军事法思想。自 20 世纪 20 年代末起,中华民国在颁发和实施一系列军事法规的同时,进行了一定的军事法研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①研究军事刑事法律制度与军事司法。1930~1931 年,上海世界书局分别出版了郑爱珉编写的《陆海空军刑法释义》和姚骧编写的《陆海空军处罚法释义》、《陆海空军审判法释义》,逐条阐释 1929 年国民政府颁布的《陆海空军刑法》和 1930 年公布的《陆海空军惩罚法》、《陆海空军审判法》等。1937 年,宪兵学校编写了《陆海空军审判法教程草案》,内容包括军事审判法的概念,效力、军法会审、诉讼主体、侦察、审判、复审和程序等。到 40 年代,这一研究继续深入,其成果主要有:1941 年出版、刘漱石编著的《陆海空军刑法诠释》,1942 年出版、毛家骥编著的《陆海空军审判法刑法惩罚法合刊》,1945 年陆军宪兵学校编写的《陆海空军刑法教程草案》等。②研究军事行政法。1943 年邱清泉著的《军队内务处理》,这是一本专门

研究军事行政法的书籍。1947年,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军法处编写了《军法手册(第1辑)》,研究了军事行政法方面的内容。^③进行军事法汇编。其成果主要有国民党政府军政部1937年编的《军法要览》,宪兵学校1942年编的《军用刑事法令汇编》,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部1938年编的《军用刑事法令汇编》和1944年编的《现行军法类编》。

从总体上看,20世纪上半叶的军事法研究主要局限于军事刑法的范畴,研究面比较窄,研究程度也比较浅,研究的成果多以汇编、诠释的形式出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法学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军事法学有了较大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准备阶段 从建国后到1987年国家教委正式将军事法学列为法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之前。这一阶段的基本特点是:实践牵引理论。国家在继承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政府制定的各项军事法规的基础上,比较重视并逐步加强军事法制建设,制定了一系列军事法律、法规。在借鉴与研究苏联军事法律法规的同时,也翻译、介绍相关的军事法理论。1966~1976年,军事立法基本陷于停滞状态,军事法理论研究未能开展起来。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和军队制定了大量的军事法律、法规。军事立法的实践一方面积累了经验,一方面也产生了对军事法理论的迫切需要。1984年,《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首次提出军事法学是法学体系中一门分支学科。虽然该卷未能将军事法学列出专条加以阐释,但提出了军事法学的性质、任务、研究对象和范围等。1986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主办的《法学研究》率先刊登了《应当重视我国军事法学的创立与研究》一文。一些学者开始对

军事法这一特定的社会现象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研究,为建立中国的军事法学起到了奠基作用。

形成阶段 从1987年国家教委正式将军事法学列为法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之后,到1992年中国法学会军事法学研究会召开第一次年会之前。这一阶段的基本特点是:通过实践形成理论。具体表现为:^①随着军事法制建设的发展,国家和军队高度重视军事法理论研究。1987年,国家教委正式将军事法学列为法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标志着军事法学学科的正式确立。1988年6月,中央军委法制局成立,管理全军法制工作,“研究军事法学理论,开展学术交流”为其主要任务之一。随后,北京市军事法学会和中国法学会军事法学研究会相继成立,使军事法理论研究由个体分散状态开始走上有组织有计划的发展道路。^②积极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解放军报》、《法学杂志》、《中国军法》、《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报刊发表了数百篇军事法理论文章,交流学术成果。1991年10月,军事科学院邀请时任军事法和战争法国际学会主席的英国前军法署长J.S.史密斯访华,进行了国际学术交流。^③在军事法制实践的基础上,系统地研究军事法理论。这一阶段的学术成果主要有: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张建田等编著的《中国军事法学》(1988),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莫毅强等主编的《军事法概论》(1990),黄河出版社出版、夏勇和汪保康撰写的《军事法学》(1990),法律出版社出版、图们主编的《军事法学教程》(1992),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任佩瑜主编的《国防与立法》(1989),长春出版社出版、张俊撰写的《军事行政法概论》(1991),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胡留元和许继棠主编的《军事行政法实用手册》(1990),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徐有仁和张子谦

主编的《军事后勤法概论》(1992),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顾德欣编著的《战争法概论》(1991),蓝天出版社出版、张柔桑等撰写的《纪律条令通论》(1990),法律出版社出版、军事设施保护法宣传组编写的《军事设施保护法简论》(1990)等。此外,还翻译出版了苏联的《军事法学》、美国的《军事法学》和法国的《武装冲突法》等学术著作。这些学术成果认为:“军事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用以调整军事领域内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军事法的基本特征有:鲜明的阶级性,调整对象的特殊性,调整范围的广泛性,高度的强制性和权威性,以及公开性和一定程度的保密性相结合。军事法的基本原则有:维护国家军事利益的原则,高度集中统一的原则,军法从严的原则。军事法的法律责任包括:军事行政法律责任,军事刑事法律责任,军事经济法律责任。在追究军事法律责任的过程中,应当遵循责任有据、责任公平、责任审慎、责任惟一、责任分明、责任及时等原则。除了这些基本理论问题外,还探讨了军事组织、军事勤务、兵役、动员、军事教育训练、军事行政管理、军事经济、国防科技等方面的法律规范,并开始对战争法进行有益的探索。

发展和应用阶段 从1992年中国法学会军事法学研究会召开第一次年会到20世纪末。中国法学会军事法学研究会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年会,探讨了宪法与武装力量建设问题,由此标志着军事法学研究开始有组织地走向应用阶段。这一阶段的基本特点是:理论开始反作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具体表现为:①为国防建设服务。一些学者注重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国防建设的影响及其成因,研究军事法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防建设的作用,提出了加强军事法制建设的基本思路。②为军事立法服

务。特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的制定过程中,军事法学的研究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有的甚至直接转化为法律条文。③为军队建设服务。中国军事法学研究会和北京军事法学会多次召开学术研讨会,研究有关依法治军的问题。④为国际军事斗争服务。结合未来战争的需要,出版了一批研究国际军事法与战争法的学术成果。⑤进一步扩大对外学术交流,促进军事法理论研究。1995年10月,军事法和战争法国际学会主席C.斯伯林格尔在北京与中国军事法学界探讨了国际军事法与战争法的有关问题。1996年11月和1997年6月,中国军事法学研究会先后派人前往罗马尼亚和希腊参加了军事法和战争法国际学会理事会会议。这些交流不仅使国外同行了解到中国军事法学研究现状,也使中国学者接触了国际军事法和战争法研究的一些前沿问题。这一阶段学术成果颇丰。除有关报刊发表大量理论文章外,学术专著主要有: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王法安等撰写的《邓小平军队制度建设思想研究》(1995),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戴怡芳主编的《邓小平依法从严治军论》(1997),解放军出版社出版、陈学会主编的《军事法学》(1994)和中国法学会军事法学研究会组织编著的《军事法制建设研究》(1996),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许江瑞等撰写的《国防法概论》(1998),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方宁等撰写的《军事法制教程》(1999),金盾出版社出版、张子谦、张振江主编的《军事后勤立法简论》(1995),法律出版社出版、夏勇等撰写的《中外军事刑法比较》(1998),海潮出版社出版、陈学会主编的《中国军事法制史》(1999),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姜秀元撰写的《军队刑事侦察心理概论》(1994),以及国际军事法等方面的专著。论文集主要有:中国法学会军事法学研究会编辑的《国防法

立法理论研究》、《军队正规化与军事法制》、《军事执法与军队质量建设》和《依法治军的理论与实践》，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编辑的《海军国际法问题论文选编》。工具书主要有：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中央军委法制局主编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法分册》（1993）和国际军事约章编写组主编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国际军事约章分册》（1993），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杨福坤等主编的《军事法学词典》（1993），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雷渊深等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律知识全书》（1997），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中央军委法制局编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法选编（1949~1995）》（1995）。外文编译著作有：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萧榕主编的《世界著名法典·军事法卷》（199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吴新平和刘颖主编的《美国法典·军事法卷》（1994）。此外，还陆续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驻军法》、《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以及纪律条令、队列条令、警备条令、司令部条例、政治工作条例、后勤条例、油料条例等军事法律法规的释义或学习辅导材料。

上述学术成果可分为军事法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两个方面：在基础理论方面，深化了对军事法概念、军事法特征、军事法体系等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比较系统地研究了我国军事法制的各个环节及其历史沿革。认为军事法的目的和任务在于维护和发展有利于统治阶级的国家军事利益和安全秩序。指出了前一阶段对军事法特征的揭示并未抓住军事法与其他部门法的本质区别，军事法的特征只应是军事法独有而其他部门法没有的性质。这种特征主要有：调整对象的军事性，调整手段的综合性，层次门类的多样性，内容公

开的相对性，法规称谓的独特性，规范效力的优先性。军事法体系，是由各种军事法律规范组成的门类齐全、层次分明、内容和谐的有机统一体。从纵向上看，可分为五个层次：一是根本法中的军事法条款；二是基本军事法律，包括专门的基本军事法律、其他基本法律中的军事法条款、基本军事法律解释；三是军事法律，包括专门的军事法律、其他法律中的军事法条款、军事法律解释、国际军事约章。四是军事法规，包括专门的军事法规、军事行政法规、其他法规中的军事法条款、军事法规解释等；五是军事规章，包括专门的军事规章和军事行政规章、其他规章中的军事法条款、军事规章解释。从横向上看，在基本军事法之下，可分为如下几类部门法：军事组织类，军事行政类，兵役类，人事类，优抚类，国防科研生产类，军事经济类，战争与动员类，国防教育类，军事设施保护类，安全防卫类，军事刑事类，军事诉讼类，对外军事关系类等。在应用理论方面，主要研究了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军事法制思想及其对中国军事法制建设的指导意义；探讨了国防立法的原则与内容；探索了中央军委依法治军方针的含义及贯彻方式；分析了军事法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法；理顺了军事法制与军队正规化建设的关系；提出了在军队质量建设的大背景下加强军事执法的建议；研究了战争法的体系、内容与及其应有的对策；具体阐释了一些重要的法律法规，并提出了贯彻执行中应注意的事项等。

发展趋势 展望 21 世纪，中国军事法学的理论先导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学术交流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学术研究领域将进一步拓展。军事法学将立足于 21 世纪中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对军事法制的的需求，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为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相协调，与新的世界军事革命相适应，能够

保障军队打赢高技术局部战争的军事法制而进一步努力,为依法治军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研究的主要课题可能有:①关于军事法制思想的研究,主要包括毛泽东、邓小平的军事法制思想和江泽民关于军事法制的论述。②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与国防法律制度的研究,主要包括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框架中各种涉及国防领域的法律制度。③关于现代军事技术条件下军事法律制度的研究,主要包括如何使规范武装力量活动的各种法律制度更加适应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要求。④关于军事法制运行过程的研究,主要包括如何将军事法的制定、实施、遵守、保障等各个环节有机地联系起来,进行全过程的研究,即使是各个环节的探讨,也要统揽全局,融入整体。⑤关于军事法律制度与国家执法、司法、法律服务制度接轨问题的研究,包括在执法方面,国家对社会生活的管理如何通过军事法律制度对军队和军人适用,国防建设对社会的要求如何通过国家法律制度对社会组织和公民适用;在司法方面,军队保卫部门、军事检察机关、军事审判机关如何在组织设置和法律程序上与国家司法制度接轨。⑥关于军事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包括形成一整套军事法学的基本概念、原理、门类,并将其融为一个有机的体系。⑦关于军事法制史的研究,包括中国古代军事法制史、近代军事法制史、现代军事法制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法制史和外国军事法制史的研究。⑧关于军事法的比较研究,包括对一些军事法制比较完善的国家进行比较,特别是对美国、俄罗斯联邦、英国等欧美国家的军事法制进行比较研究。⑨关于军事法制建设中涉及国际法问题的研究,包括裁军、军品贸易、维和行动、外国军舰在国家领海无害通过和战争法等方面的研究,其中对战争法的研究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中国法学会军事法学研究会编:《军事法制建设研究》,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

陈学会主编:《军事法学》,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

(方宁)

军事法制理论研究 (study of military legal system theory)

探讨军事法的产生、制定、实施、保障及其发展规律的活动。军事法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内容主要有:军事立法、军事行政执法、军事司法、军事法律服务、军事法制教育以及军事法学研究的特点与规律等。军事法制理论研究不仅为军事法的制定提供基本的理论依据,而且对军事法的执行、监督、服务、教育等活动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华民国的军事法制理论研究 在20世纪上半叶,中华民国制定和实施了大量的军事法,同时也进行了相应的军事法制研究。1930年1月,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了郑爱璋编写的《陆海空军刑法释义》,是早期研究中国军事刑法制度的专著。此后,又陆续出版了《陆海空军惩罚法》、《陆海空军审判法》等方面的释义和刑法教程等方面的书籍。这些研究主要限于军事司法制度的建立及实施。1942年初,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印发了宁柏青编写的《军事特别法教程》,其中不仅有军事刑罚法规、军事审判法规,而且包括军事行政法规方面的研究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法制理论研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随着军事法制建设的发展,一些法学专著和理论文章对中国军事法律制度有所探讨。但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种研究还局限于军事法本身。

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了真正意义

上的军事法制理论研究。1988年4月,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建田等编著的《中国军事法学》,不仅从兵役、组织编制、军队行政管理、军事刑事、军事刑事诉讼、军人优抚、军事权益保障等方面研究了中国的军事法律制度,而且开始涉及军事法制的实践活动,探讨了军事立法的原则和程序。1990年5月,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莫毅强、钱寿根、陈航主编的《军事法概论》,进一步研究了军事法的适用、遵守、监督和制裁等问题。同年12月,黄河出版社出版、夏勇等撰写的《军事法学》,以专章研究了军事法制建设的依据、军事立法、军事法的实施和国家一般法在军队中的实施。1990年10月,中央军委法制局局长图们在国防大学讲课时提出了军事法制的概念:军事法制是由制定军事法并保证其得以施行的有关制度所组成的统一体,回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法制的历史,分析了现状,提出了军事法制建设的目标和任务。1992年11月,法律出版社出版、图们主编的《军事法学教程》,设置专章探讨了军事法律责任和军事法律效力。这一阶段的研究,是中国军事法制理论产生与发展的良好开端。但研究的范围较窄,程度较浅,涉及军事法制活动还不多。一些专家学者在概念上,还仅仅把军事法制看作是一种制度。

90年代中期以后,军事法学界进一步把军事法制作为一个有机的系统加以研究。1996年12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中国法学会军事法学研究会组织编写的《军事法制建设研究》,是中国第一部全面研究军事法制建设的理论专著,它提出了新的军事法制概念:中国的军事法制,是在一定的军事法思想指导下,通过对军事法规范的制定、实施、监督、服务、教育、研究等运行与操作环节,建立军事法秩序的机制系统。它在内涵上包括军事法规范、军事法运作、军事法秩序、军事法思

想等四个基本要素。1997年7月,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设置了《军事法制》条目,认为军事法制是制定军事法并保证其实施的有关制度和制定、执行、遵守军事法的活动的总和。其中,制定和实施军事法的制度包括军事立法制度、军事执法制度、军事司法制度、军事法的监督检查制度、军事法的咨询服务制度和军事法的宣传教育制度等。在这一阶段,军事法学界不仅把军事法制看作一种制度,也将其视为一种活动,认为军事法制是动态与静态的有机结合,是制度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除了在基础理论上有所突破以外,军事法学界更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的军事法体系,深入探讨了军事法制的具体环节。1996年10月,法律出版社出版、夏勇等撰写的《军事行政法律行为研究》,这是中国第一部研究军事行政法律行为的理论专著,对军事行政立法行为、军事行政执法行为、军事行政司法行为、军事行政诉讼行为、军事行政违法行为等进行了专门研究。1996年12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梁玉霞撰写的《中国军事司法制度》,研究了中国的军事司法组织制度、军事司法管辖制度、军事司法回避制度、军事司法辩护与代理制度、军事司法证据制度和军事刑事、军事经济、军事行政诉讼制度等。与此同时,有关专家学者在报刊上发表了数百篇有关军事法制的文章。

在深入研究军事法制本身的同时,军事法学界还探讨了军事法制在军队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1996年6月,中国法学会军事法学研究会在北京召开“军队正规化建设与军事法制学术研讨会”,并于同年12月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军队正规化与军事法制》,探讨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三代领导人的军事法制思想对军队正规化建设的指导作用,古今中外军队正规化与军事

法制的比较等,重点从三个方面探讨了军事法制与军队正规化的关系:一是对历史的比较研究,揭示了军队正规化向法制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二是对基础理论的研究,揭示了军队正规化建设的核心是法制化;三是对运作过程的研究,揭示了军队正规化建设与法制建设的动态契合关系。1998年5月,中国法学会军事法学研究会在西安召开了“军事执法与军队质量建设学术研讨会”,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军事执法与军队质量建设的关系以及加强军事执法的措施。

1997年7月,中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在此前后,军事法学界对一国两制条件下的军事法制也进行了较有成效的研究。《现代法学》、《中国军法》、《解放军报》等报刊发表了数十篇有关香港驻军法律问题的文章。1997年6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中央军委法制局编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法〉释义》,分析了香港驻军的职责及其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关系,阐释了香港驻军人员的义务与纪律,研究了香港驻军人员的司法管辖制度等。

发展趋势 21世纪,中国军事法制理论研究将在继续完善基本理论的同时,加强对各个运行与操作环节的研究力度。在军事立法方面,将注重研究现行军事法的修改,研究一些现实急需的实体性规范和程序性规范的制定;在军事执法方面,将注重研究执法机关的职责权限、执法活动的基本功能和执法监督的制衡机制;在军事法制教育方面,将注重研究增强军事法主体的法制观念和法律行为能力,完善军事法制教育机制。

参考文献

中国法学会军事法学研究会编:《军事法制建设研究》,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

中国法学会军事法学研究会编:《军队正规化与

军事法制》,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

(方宁)

军事立法研究 (study of military legislation)

探讨制定、修改、废止军事法律规范的理论 and 实践及其规律的活动。军事法制研究的组成部分。研究内容主要有:军事立法原则、军事立法机构、军事立法制度、军事立法思想、军事立法技术、军事立法程序、军事立法活动以及军事法体系等。军事立法研究,对于丰富军事法制理论,总结军事立法活动的经验教训,把握军事立法规律,改进军事立法制度,提高军事法律规范的质量,为依法治军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依据,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清末和中华民国时期的军事立法研究 20世纪初期,出于军事立法改革的需要,清王朝对西方军事法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和借鉴。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时期,都有人结合军事立法对外国军事法进行过一定的研究。但这种研究既缺乏系统性,也不够深入。1937年1月,正中书局出版发行了谢扶民编著的《中华民国立法史》。其中,介绍了数十件军事法律法规的立法活动过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立法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国家和军队在50~60年代制定了大量军事法,同时也广泛汲取了苏联军事立法的经验。80年代下半期,国家加快了军事立法的步伐,军事立法研究也逐步全面、系统地开展起来。进入90年代之后,军事立法研究的成果不断涌现。1990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莫毅强等主编的《军事法概论》,同年5月黄河出版社出版、夏勇和汪保康撰写的《军事法学》,1992年法律出版社出版、图们主编的《军事法学教程》,1994

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陈学会主编的《军事法学》，都为军事立法设置了专门的章节，探讨了军事立法的概念、作用、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立法体制和立法程序，认为军事立法是国家立法机关或被授权的国家行政机关和军事机关依照其职权范围通过法定程序制定、修改和废止军事法律规范的活动。军事立法是加强国防现代化的保证，是加速军队革命化、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的重要手段，是巩固和促进军队各项改革成果并使其深入发展的重要途径。中国的军事立法体制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军事法律；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制定军事行政法规和军事法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军区制定军事规章，国务院各部委单独或与军委各总部联合制定军事行政规章。军事立法程序分为两类：一是军事法律的立法程序，包括提出草案、讨论、通过、公布等阶段；二是军事法规和军事规章的立法程序，包括制定立法规划、起草、送审和审定、发布等阶段。1990年4月，中央军委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立法程序暂行条例》，规定了军事法规的制定主体、调整对象、名称、立法原则以及制定程序，这既是军事立法的结果，也是军事立法研究的重要成果。

1993~1994年，为配合国家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军事法学界广泛开展了国防法立法理论研究活动。1993年12月，国防法起草委员会办公室、中国法学会军事法学研究会和《中国军法》编辑部联合召开“国防法座谈会”；1994年11月，中国法学会军事法学研究会召开“国防法立法学术研讨会”。根据两次会议的研究成果，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中国法学会军事法学研究会编辑的《国防法立法理论研究》一书，对有关制定国防法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阐述，包括国防法的意义、调整范围和立法技

术，制定国防法的宪法依据、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国防法需要规范的内容和所具有的中国特色，国防法与国家相关法律的关系等。这些研究为国防法立法工作起到了理论先导作用。许多研究成果，如关于国防的概念、国防资产的保护、军事订货制度、军人保险制度等内容，都在1997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中得到了体现。1996年前，为配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法》的制定，军事法学界开展了“一国两制”下的香港驻军法这一具有开创性问题的研究。如中央军委法制局王黎红撰写的《“一国两制”下的香港防务与驻军法律问题》一文，就香港防务与驻军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原则、立法模式的选择、驻军立法与1997年的香港本地法律的协调问题等进行了探讨。1998年3月，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许江瑞和方宁撰写的《国防法概论》，该书以中国第一部国防法为研究对象，汲取和借鉴中外国防理论和法学理论的优长，系统地探索了国防法立法所涉及的基本理论问题。

90年代中、后期，军事立法研究开始向两个方向发展：

深入研究军事立法基础理论 1996年12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中国法学会军事法学研究会编写的《军事法制建设研究》专门设置了“军事立法若干问题研究”内容，进一步探讨了军事立法的概念和基本原则，并阐释了军事立法的主体及其权限范围，研究了军事法的外部结构形式的规范与完善等军事立法技术问题。该书在深化对军事立法本质认识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中国的军事机关享有军事立法权的依据，指出虽然现行宪法没有明确规定军事机关的立法权，但中央军委及其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军区事实上一直在行使军事法规和军事规章的制定权，而且这种立法权也为国家法律和最高国家权力机

关所认可,与宪法确立的国防建设和武装力量领导体制相一致,适应了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与依法治军的需要。军事立法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以宪法为依据的原则;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原则;维护国家军事利益,为国防建设军队建设和改革服务的原则;实事求是,从国家和军队实际出发的原则;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军事法制统一的原则。1999年,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方宁等编著的《军事法制教程》,也系统地探讨了军事立法体制和军事立法程序,特别是从军事法的名称、结构、内容、符号等角度全面研究了军事立法技术。2000年国家制定立法法时,军事法学界又探讨了制定军事法规和军事规章的性质,指出这是国家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纳入立法法的调整范围。

军事行政立法研究 1996年10月,法律出版社出版、夏勇等撰写的《军事行政法律行为研究》设置了“军事行政立法行为”一章,探讨了军事行政立法权限,军事行政立法过程,军事行政立法效力等内容。认为军事行政立法是为实施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军事法律而进行的一种抽象行政行为,其特征是贯彻性而非创意性的,是从属性而非独立性的。只有地位较高的军事行政机关才享有军事行政立法权。军事行政法的效力范围必须受其制定依据效力范围的制约,也就是受相应的国家军事法律或上一层次军事行政法的制约。由于军事行政法的效力大小不同,处于高低不同的层次上,因而形成一定的效力等级。军事行政法与国家军事法律发生效力冲突时,军事行政法应服从国家军事法律;军事行政法之间发生效力冲突时,下一层次的法服从上一层次的法;军事行政法与非军事性的法律法规发生效力冲突时,遵行军事法效力优先的原则,但军事行政法作出的与非军事性法律不相一致的规定,应有国家军事法律规

定的明确依据。

发展趋势 21世纪,中国的军事立法研究将在进一步深化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突出为军事立法服务的方向,为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法体系提供必要的理论指导。①加强对军事法急需规范的立法研究,包括对军事组织法、国防动员法、军人权益保护法、军事执法及执法监督规范等方面的立法研究。②加强对军事法现行规范的研究,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高技术局部战争对军队建设的要求,修改或废止那些不适应依法治军需要的法律规范。③加强对军事法程序规范的立法研究,切实解决立法中“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通过制定必要的程序性规范,保证实体性规范的实现,保证军事法主体依照法定程序行使军事权利,履行军事义务。

参考文献

中国法学会军事法学研究会编:《军事法制建设研究》,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

(方宁 罗友琳)

军事行政执法研究 (study of military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探讨国家行政机关和军事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军事法解决行政事务的过程及其规律的活动。军事法制理论研究的组成部分。研究内容主要有军事行政执法的主体、内容、手段、程序和对象,军事行政执法与军事立法、军事司法的关系,军事行政执法在军事行政法律行为中的地位与作用等。军事行政执法研究,对于促进军事法制的重心由立法向执法转移,强化各级军事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执法意识,明确执法职责,提高执法素质,都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已有了一些

军事行政执法方面的理论研究。1943年3月,邱清泉著的《军队内务处理》,介绍了军队内务处理的一般原则和组织运用,可称得上是一部研究军队行政执法的著作。此后,又编印、出版了《内务实施》、《加紧整饬军风纪的意义与目的》等书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陆续制定了各个方面的军事法律法规,其中大部分属于军事行政法律规范。军事行政执法逐渐受到重视。进入80年代,随着国家军事法制的全面恢复和深入发展,军事法学界进一步认识到,仅有军事立法,只能做到“有法可依”;而要真正实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治目标,必须从严执法。军事法制建设的实践需要牵动了军事执法研究,军事行政执法研究开始成为军事法学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这一研究大体可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80~90年代初期,是军事行政执法研究的兴起阶段。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出台,中国的行政法制进入了重建和发展的新时期,由此也推进了军事行政法制的步伐,并开始了这一方面的研究。这一阶段侧重于探讨军事行政执法的内容,也直接接触及军事行政执法的机构和活动。1990年9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胡留元和许继棠主编的《军事行政法实用手册》,探讨了军事行政法的基本理论,分编叙述了各类军事行政工作的制度和实施原则、要求等。该书不仅力求为军事行政执法提供一个比较全面的依据,而且涉及到具体的执法行为。1991年1月,长春出版社出版、张俊撰写的《军事行政法》,对军事行政执法主体、军事行政行为、军事行政管理的法律监督、军事行政诉讼等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

90年代中后期,是军事执法理论研究的发展阶段。在国家强调依法治国、依法行政

和军队要求依法治军的大背景下,这一阶段对军事行政执法行为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探讨。1996年10月,法律出版社出版、夏勇等撰写的《军事行政法律行为研究》,以专章的形式研究了军事行政执法行为,认为军事行政执法主体既包括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也包括国家军事机关与军队各级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国家行政机关军事行政执法的对象是享有具体行政执法权限的行政机关之外的各种组织和人员,其行政执法行为属于“外部行政行为”;而军事机关军事行政执法的对象主要是军队内部的下级机关和人员,其执法行为属于“内部行政行为”,一般不针对民间社会中的组织和人员。军事行政执法的内容,就军队而言,主要包括军队编制管理、军容风纪管理、军队作息管理、军队日常管理、军队岗位管理、装备设施管理、作战训练管理、军队财务管理、军需管理、军队营区管理、军队营产管理、军队生产管理、军队安全管理、军队政法工作管理以及军队其他方面的管理。国家机关的军事行政执法内容,主要有兵役工作管理、国防动员管理、国防教育管理、国防科技管理、军事设施管理、军人优抚管理等。军事行政执法的形式,一般有行政命令、行政处理、行政检查、行政强制执行、行政奖励、行政处罚、行政处分等。1997年5月,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雷渊深等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律知识全书》,对国防法律的行政执法行为也有所探讨。它指出行政执法行为主要有行政检查和行政处理两种。其中,行政检查包括审查、调查、检查、听取汇报、调阅、登记、责令提供必要情况、清查、考核等;行政处理包括行政奖励、行政处分、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执行等,并包括行政复议、行政仲裁、行政裁决等三种特殊的处理方式。

在研究军事行政执法行为的同时,军事

法学界还注重分析中国军事行政执法存在的问题,并积极提出对策建议。1996年12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军事法制建设研究》在第四部分“军事法执行与监督若干问题研究”中,提出了健全军事法执行和监督机制的对策:在军事执法组织机制方面,要转变领导职能,理顺执法关系,完善组织规程。在军事执法行为机制方面,要遵行掌兵之制,实行依法决策;遵行用兵之制,实现依法指挥;遵行养兵之制,实现依法管理;遵行练兵之制,实现依法治训;遵行带兵之制,实现依法带兵。在军事执法效力机制方面,要强化军事执法的确定力,改变赏罚不明的状况;要强化军事执法的拘束力,改变赏罚不严的状况;要强化军事执法的导向力,改变赏罚不信的状况。在军事执法监控机制方面,既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已有的监督制度,又要考虑建立适应依法治军需要的军事执法监察制度。

1998年5月,中国法学会军事法学研究会西安政治学院召开了“军事执法与军队质量建设研讨会”,集中探讨了军事执法与军队质量建设的关系以及加强军事执法的举措。这次研讨会,集以往军事执法研究之大成,特别是在军事行政执法的作用、主体、意识、程序等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主要成果有:明确了军事执法是军队质量建设的主要内容和重要保障;强调了军队质量建设中军事执法主体的广泛性;指出了完善军事执法程序在加强军队质量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完善军事执法监督机制是加强军队质量建设的迫切需要;肯定了有选择地借鉴古今中外军队执法的经验教训对加强军队质量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1999年,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军事法制教程》也以专章的形式比较系统地研究和介绍了军事行政执法。

在21世纪,军事法学界将更加注重研究

行政程序的执行、行政权力的行使、行政执法的监督等内容,并通过执法研究对军事立法理论和实践提出相应的建议,形成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中国法学会军事法学研究会编:《军事法制建设研究》,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

雷渊深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律知识全书》,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97。

夏勇等:《军事行政法律行为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

(方宁)

军事司法研究(study of military judicature)

探讨国家司法机关和军事司法机关运用军事法实施侦查、检察、审判等行为的制度及其活动规律的活动。军事法制理论研究的组成部分。研究内容主要有军事司法制度、军事司法活动、军事司法史、军事司法思想等。对军事司法制度和活动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军事法制理论,推动了军事法学研究深入发展,而且在军事司法实践中产生了积极影响;对完善军事司法制度,改进军事司法机关的作风,增强军事司法人员的素质,提高军事司法工作的质量,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华民国时期的军事司法研究 20世纪初期,中华民国对军事司法制度进行了一定的研究。1931年3月,上海世界书局同时出版了姚骧和王钧安分别编著的《陆海空军审判法释义》,逐条阐释1930年公布的《陆海空军审判法》,包括军法会审的组织和权限、军事检查、审问、审判、复审等内容。1937年5月,宪兵学校编写了《陆海空军审判法教程草案》,研究了军事审判法的概念与效力,军法会审,诉讼主体,以及侦查、审判和复审的程序等。40年代,又陆续出版了杨柳风等撰写

的《军法常识》、毛家骥编著的《陆海空军审判法刑法惩罚法浅释合刊》、宁柏青编写的《军事特别法教程》、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军法处编的《军法手册》、胡逸民编述的《中央陆海空军监狱训练班讲义》等,都对军事司法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司法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军事司法机关和军事司法活动都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80年代以前,对军事司法未能进行专门、系统的研究。从80年代开始,对军事司法的专门研究逐步开展起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随着军事法制建设的发展和军事法学研究的深入,对军事司法的理论探讨逐渐成为热门。1996年12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中国法学会军事法学研究会组织编写的《军事法制建设研究》,对军事司法做了专题研究。与此同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梁玉霞撰写的《中国军事司法制度》。1997年10月,军事科学院军制研究部组织编写的《军事法制概论》,在“军事法的实施”一章中专门设置了“军事司法”一节。1998年8月,夏勇、徐高撰写的《中外军事刑法比较》由法律出版社出版。1999年,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方宁和许江瑞等撰写的《军事法制教程》,设置了“军事司法”一章。此外,有关学术报刊也发表了数十篇关于军事司法的文章。

上述学术成果对军事司法的概念、制度、原则、体制、职权、管辖、监督以及中国军事司法制度发展史和中外军事刑事法律制度比较等进行了全面研究。特别是在以下几方面有比较深入的探讨:

关于军事司法的概念 有的学者认为,军事司法是国家军事司法机关处理诉讼案件和非诉讼事件的执法活动。军事司法的主体是军事司法机关,即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和部队团以上政治机关的保卫部门。也有的学

者认为,军事司法是军队保卫机关、军事检察院、军事法院依据国家赋予的司法权而进行的侦查、检察、审判、执行及其他相关活动的行为。还有的学者认为,军事司法是国家一般司法机关和军事司法机关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将军事法规范应用到具体人或组织的一种专门活动;军事司法的主体不仅是军队的保卫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也包括国家的一般司法机关,即地方的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它们的军事司法职责,主要是对一切非军人和非军事组织违反军事法律规范的案件进行处理。

关于军事司法的原则 一种观点认为,军事司法活动作为国家司法活动的组成部分,除了与其他司法机关一样,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之外,还应遵循以下四项特有原则:为武装力量服务的原则,便于军事行动的原则,军事司法优先的原则,打击和预防相结合的原则。另一种观点认为,军事司法制度的原则是军事司法机关的当事人进行军事司法活动必须遵守的基本行为准则。主要包括三点:以军事法和国家普通法为依据,非军人一般不受军事司法管辖,战时从快从简。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军事司法的原则主要包括:司法机关依法行使军事司法权,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对一般公民和军人在法律适用上一律平等,优先适用军事法律规范,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军事司法权。

关于军事司法制度 有的学者认为,军事司法制度是军事司法机关依照法律规定进行司法活动的行为规则体系,具体包括:军事司法组织制度、军事司法管辖制度、军事司法回避制度、军事司法辩护与代理制度、军事司法证据制度、军事刑事诉讼制度、军事经济诉讼制度、军事行政诉讼制度、军队劳改、劳教制度等。

中外军事刑法比较 有的学者从军事刑

法的概念、渊源、适用范围以及军事犯罪、军事刑罚、军事罪名、军事审判等多方面比较了中国与外国军事刑事法律制度的异同。一些学者还探讨了军事司法行政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对军事法律服务的范围、体制、作用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

针对中国军事司法的现状,军事法学界还探讨了军事司法体制的改革。在中国军事法学研究会1998年5月召开的“军事执法与军队质量建设研讨会”上,有的学者指出,军事司法体制,是有关军事司法组织系统、机构设置、职责权限划分、案件管辖、人员装备编配及其隶属关系的制度。一些学者认为在新的形势下,必须改革现行的军事司法体制:一是按战区设立独立的区域军事司法机构,即在中央军委领导下,在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之下,按战区设立独立的区域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及其派出机构,二是制定科学的编制,建立按部队人数比例编配司法人员、装备的制度。三是扩大军事司法机关的案件管辖和执法的范围,包括拓宽军事法院案件管辖的范围,扩大军事检察院法律监督的执法范围,加大军事司法机关法律服务的广度。

发展趋势 进入21世纪,军事司法研究将呈现出如下趋势:继续探索军事司法基本理论;高度重视军事司法体制改革的研究;深入研究军事司法的各个具体环节,为改进军事司法提供更加有效的理论指导。

参考文献

中国法学会军事法学研究会编:《军事法制建设研究》,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

梁玉霞:《中国军事司法制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夏勇、徐高:《中外军事刑法比较》,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中国军事法制史研究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ilitary legal system)

探讨中国军事法制产生、发展及其规律的活动。军事法学的组成部分。研究内容包括中国历代的军事法制活动、军事法制机构、军事法制思想等。深入研究中国军事法制史,对于总结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教训,探索军事法制建设的客观规律,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研究简况 中国军事法制的历史,一直是军事法学界研究的重要内容。20世纪70年代,在一些研究中国法制史的专著中,已有关于军事法制史的内容。80年代后期,对军事法制史的研究开始步入系统化、专门化的轨道,并于90年代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1992年,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刘展主编的《中国古代军制史》,其中包含有大量古代军事法制方面的内容。1993年,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法分册》,为中国军事法史设置了十个条目,分别介绍了中国历代王朝和中华民国军事法的内容与特点。1997年,大象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军事制度史》丛书,其中的《军事法制》卷,比较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历代军事法的创制、内容、形式、实施,军事法制机构的设置与职权,军事法制思想与特点等。1998年,海潮出版社出版、周健撰写的《军事法史纲》,研究和揭示了中国历代军事法的产生、发展、演变及其规律,各种军事法律制度的基本形态和本质、作用,军事法制与政治制度、经济条件、科技水平、武器装备、战争状况的内在联系,重点阐述了军事法律思想与理论,并对外国军事法律制度有所研究。1999年,海潮出版社出版、陈学会主编的《中国军事法制史》,探讨了中国历代军事法律制度有关问题。同时,《中国军事科学》、《国防》、《解放军报》等报刊也发表了大量研究中国军事

法制史的文章。

研究成果 主要有：

中国古代军事法制的分期、内容与特点
中国古代军事法制主要是封建社会的军事法制，由春秋至秦汉，是封建军事法制的产生和确立阶段；由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唐，是封建军事法制的成熟和定型阶段；由宋至明清，是封建军事法制进一步发展的阶段。中国古代军事法制的主要内容大体上有：高度集中统一的军事领导体制，因势择取服役方式、满足军队员额需要的兵役制度，保障军人权益的优待抚恤制度，以中央转饷调粟、统一供应为主的军事后勤保障制度，国家垄断的武器装备生产、管理制度。中国古代军事法制具有如下特点：一是继承和发展相结合，适应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军事上的变革；二是厚赏与重罚兼用，保障军事法律规范的实施与军队战斗力的提高；三是“以礼治军”与“以法治军”并行，培植、强化官兵的等级观念和服从意识；四是法治与人治混杂，维护最高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

中国近代军队有关法制的内容与措施
中国近代军队比较重视法制的作用，其法制内容也比较丰富。太平军从一开始就制定严明的军纪军法；曾国藩的湘军极为重视订立营制营规；张之洞创建的自强军，在其《条教》中专门规定了带兵人和执行纪律的关系；袁世凯创建的新建陆军，也极为突出营伍法纪。同时，中国近代军队也讲究严格执法。近代治军者，大都认识到执法对军心、士气、战斗力的极端重要作用，并在实践中身体力行，尽可能地发挥执法对于提升军力，战胜强敌的作用。为了保证严格执法，中国近代军队还采取了一些相关措施，包括高度重视思想教育和军饷待遇。近代军队强化军事法制特别是强化军事执法，为其生存与发展提供了保障。同时，中国近代军队的执法，有的过于严厉，甚

至近于严酷，而且这种严格的执法并不都能贯彻始终，大多是早期比较严格，中期逐渐松弛，晚期大多失范。当其强盛时，大体是处于执法严格的阶段；当其衰败时，大体是处于法纪松弛甚至废弛的阶段。这从正反两个方面表明，法制的强化与否，确实能给一支军队的建设带来重大影响；法制强则军力盛，法制弱则军力衰。

中国工农红军时期军事法制的地位、成就与不足
从1927~1937年，中国工农红军依靠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铁的法律制度，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求得生存与发展。这一时期的军事法律制度是军队法制的奠基阶段，在军事法制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军事组织法律制度上，这一时期明确了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军队的问题；在军队政治工作法律制度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在军事行政管理法律制度上，创造了维护军队集中统一、反映人民军队性质和宗旨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兵役法律制度上，详细规定了对兵员政治素质的要求和优抚制度；在军事刑法上，建立了比较严明的法律制度，有的制度在后来的革命战争中长期适用；在军事司法制度上，提供了值得总结和汲取的经验教训等等。中国工农红军时期的法律制度也有一些初创阶段的特征：一是军事立法不够全面，对军事后勤装备法制等方面还未予以足够重视；二是军事法制不够统一，囿于各个根据地情况有别，红军领导人主观认识存在差异等原因，立法和执法上都有不尽一致之处；三是军事立法技术较为简单，结构不太正规，立法程序不够严密。

除了红军时期的军事法制外，军事法学家对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军事法制，也有所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法制研究和主要

成果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军事法学界开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法制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1996 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史》,其中为“军事法律制度”设置了专章。1997 年,大象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军事制度史·军事法制卷》,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法制”设置了专章。1999 年,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军事法制教程》,其中专门探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法制的历史发展。同时,《中国军事科学》、《国防》、《解放军报》等报刊发表了一些有关这方面的学术文章。这些研究主要取得了以下成果。

探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法的各个发展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法是在继承革命战争时期军事法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半个世纪以来,主要经历了以下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 1949 年 10 月至 1953 年年底。国家由于担负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剿匪、政权建设和抗美援朝作战等繁重任务,未能进行广泛的立法活动。但政务院、中央军委根据建国初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需要,仍颁发了一批军人优抚、保密、奖惩、后备力量建设方面的法规以及军队的共同条令、战斗条令。这一时期的军事法建设带有明显的应急性,形式不够统一,内容不够规范。第二阶段是 1953 年底到 1957 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为适应武装力量全面进行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需要,国家和军队颁发了一系列军事法,涉及兵役制度、军官服役、军事训练、政治工作、后勤工作等各个方面。这一时期的军事法主要参照苏联经验或以苏军条令为蓝本,内容比较详细、具体,但体现中国特色不够。第三阶段是 1958 年到 1966 年,军事法建设从学习苏联为主转到注重符合中国的国情和军情,新制定颁发和经过修订重新颁发了数十件军事法规,由于其针对性、实用性比较

强,较好地适应了军队建设的需要。第四阶段是 1966 年开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使军事法建设基本处于瘫痪状态,但未完全中断。1975 年邓小平主持国务院、中央军委工作,领导颁发了一些急需的军事法规。1976 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军事法建设开始逐步恢复。第五阶段是 1979~2000 年,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方针政策指引下,军事法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特别是 1982 年以后,在国家立法体制中进一步健全了军事立法体制,加快了军事立法的步伐。经过十多年努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了十余部专门规范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法律以及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国务院、中央军委制定了 40 多件军事行政法规,中央军委制定了 70 余件军事法规,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军区制定了 1 000 多件军事规章。中国在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主要方面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初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法体系。中国的军事立法在坚持符合本国国情、军情的同时,还注重与中国在国际军事领域已经加入的条约、协定相衔接,使军事法的内容与国际法准则和惯例相一致。

阐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法律体系主要有以下内容:一是宪法中的军事法条款;二是基本军事法律,包括专门的基本军事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以及基本军事法解释,也包括其他基本法律中的军事法条款,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分则中的第七章“危害国防利益罪”、第十章“军人违反职责罪”。三是军事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役军官法》、《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预备役军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驻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驻军法》等，以及军事法律决定和中国缔结或者加入、接受的国际军事约章，还包括其他法律中的军事法条款、军事法律解释。四是军事法规，包括专门的军事法规、军事行政法规，其他法规中的军事法条款、军事法规解释、军事法规性文件。五是军事规章，包括专门的军事规章和军事行政规章、其他规章中的军事法条款、军事规章解释、军事规章性文件等。

介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法制机构

一是军事立法工作机关。1988年6月8日经中央军委批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法制局，是第一个军事立法的专门工作机关。

二是军事检察机关。分三级设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是国家设立在军队的最高级别的检察机关；军区级单位的军事检察院，包括军区、海军、空军、解放军总直属队、武警总部军事检察院；基层军事检察院，包括在集团军、海军舰队、军区空军、省军区等单位设置的军事检察院。

三是军事审判机关。也分三级设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是国家设立在军队的最高级别的军事审判机关；军区级单位的军事法院，包括军区、海军、空军、解放军总直属队、武警总部军事法院；基层军事法院，包括在集团军、海军舰队、军区空军、省军区等单位设置的军事法院。

四是军队保卫机关，分五级设置，包括总政治部保卫部；军区级单位政治部保卫部；军级单位政治部保卫处；师级单位政治部保卫科；团级单位政治处保卫股。

五是军队司法行政机关，分三级设置：总政治部司法局；大军区级单位政治部司法办公室；部分军级单位政治部司法办公室。

概括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法制思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国防和军队建设是在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

领导集体领导下进行的。三代领导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法制思想与中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法制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不仅是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是中国军事法制思想的集中代表。其内容主要包括：一是把中国共产党对武装力量绝对领导的原则法律化、制度化的思想；二是治军先治典的思想；三是依法从严治军的思想；四是法制教育为本的思想。

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法制的成就与经验

半个世纪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法制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①中央军委确立了依法治军的方针，国防和军队建设开始全面纳入法制化的轨道。②建立了各级各类军事法制机构，为军事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提供了组织保障。③加强国防和军事立法，在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主要方面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④执法监督工作受到重视，促进了军事法的贯彻落实。⑤加大了部队预防犯罪、打击犯罪的力度。⑥军队法律服务工作蓬勃兴起，有效地维护了军队和军人的合法权益。⑦法制宣传教育成效显著，广大官兵的法制意识不断增强。⑧军事法学理论研究活跃，为加强军事法制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⑨军事法学教育纳入有计划、有目标的轨道，培养了一大批军事法制建设急需的人才。⑩开展了对外联系与交往，增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军事法制的了解。

军事法制建设的主要经验：一是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二是军事法制建设必须具有中国特色；三是军事法制建设必须维护宪法、法律的尊严和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四是军事法制建设必须服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大局；五是军事法制建设必须与国家的法制建设协调发展。

发展趋势 在21世纪，军事法学界对军

事法制史的研究将呈现以下趋势:一是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各个不同社会形态下的军事法制活动;二是系统地研究中国军事法制思想史;三是进行外国军事法制史和中国军事法制史的比较研究。

参考文献

季德源主编:《中国军事制度史·军事法制卷》,郑州:大象出版社,1997。

周健:《军事法史纲》,北京:海潮出版社,1998。

陈学会主编:《中国军事法制史》,北京:海潮出版社,1999。

(方 宁)

战争法研究 (study of the law of war)

探讨战争法的制定、适用及发展规律的活动。军事法学研究的组成部分。研究内容主要有:战争法的渊源、体系及适用,海战法的内容及适用,空战法的内容及适用等。研究战争法,对于更好地掌握、运用这一法律武器,提高战争决策艺术,在国际军事斗争中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全面维护国家利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研究概况 战争法作为国际法的一个分支,是在15世纪后逐渐形成的。18世纪后,产生了战争法的习惯规则,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国际社会开始将这些习惯规则条理化和条文化,特别是通过在荷兰海牙和瑞士日内瓦召开的几次会议,逐步形成了一系列战争法文件。

清末和中华民国时期的战争法研究 20世纪初,中国法学界在研究介绍国际法的过程中,也展开了对战争法的翻译、介绍和探讨。1907年,上海丙午社出版、金保康编著的《战时国际法》,论述了有关战争的国际法问题,包括战争的开始及其效果、战争的种类、陆战和海战法规以及中立等。1913年共和法

政学会编译部翻译的《国际公法、国际私法义解》一书中,介绍了交战关系法则方面的内容。1914年会文编辑所编的《国际公、私法问答》,也涉及有战时国际法方面的内容。此后,又编印出版了多种含有战争法内容的国际法译著。如1934年岑德彰翻译的《奥本海国际法——战争与中立》;1940年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编的《战时国际公法手册》;1938~1940年,先后出版了汪馥炎的《抗战与国际公法》、朱建民的《侵略问题之国际法的研究》、周燮生等的《日本暴行与国际法》、黄正铭的《中日战争中几个国际法问题》等有关战争法研究内容的著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战争法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陆续承认、批准和加入了一些战争法条约。在此基础上,有关战争法的研究逐渐开展起来。

第一阶段(50~80年代) 这一阶段的研究,仍以编译、介绍为主,但也对战争法的历史和内容进行了初步研究。195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了《关于战争规则的主要国际条约汇编》;1961年,王铁崖等编辑的《国际条约集》中,也有关于战争法的内容,但主要限于翻译和介绍。1976年出版的周燮生的《国际法》和1981年出版的王铁崖的《国际法》中,都有关于战争法的内容。1986年出版的王铁崖等编辑的《战争法文献集》,其主要内容包括:关于战争开始及结束的原则和规则;关于限制战争手段、作战方法以及保护平民、战争受难者和战斗员的原则和规则;关于中立国及非交战国权利和义务的原则和规则;关于禁止从事侵略和非法使用武力以及惩处战争犯罪的原则和规则等。1987年,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翻译出版了法国国际法学者S. 卢梭撰写的《武装冲突法》,书中探讨了适用于陆战、海战和空战的交战规则、中立制度以及集体安全体系中武力的使

用等问题。

第二阶段(90年代)这一阶段,除了对战争法做整体性、基础性的深入研究外,还探讨了战争法的一些分支,特别是研究了海战法。1991年,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顾德欣编著的《战争法概论》,是第一部关于战争法的专著,此书介绍和研究了战争法的历史、渊源、编纂及其在国际上的地位,对作战方法和手段的限制,作战人员的地位,对和平居民与战争受难者的保护,海战法和空战法,战争和武装冲突的开始和结束,战争犯罪的责任,战时中立等。1993年,军事科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国际军事约章分册》和《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法分册》,前者包括战争法、裁军、限制军备与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地区性军事条约、同盟、会议等内容,概要地介绍了有关战争规则和国际军事关系方面的基本知识;后者设置了关于战争法的条目30余个,其中的领条“战争法”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战争法的概念、历史沿革、编纂、渊源、基本原则、主要内容等。一些国际法专著也对战争法进行了研究,如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梁淑英主编的《国际公法》和1994年7月出版、王献枢主编的《国际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修订出版、梁西主编的《国际法》,法律出版社2000年11月出版、赵建文主编的《国际法新论》等专著,都为战争法设置了专章。1999年7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肖凤城著的《中立法》。有学者还对古代中国战争法进行了研究,如1999年1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孙玉荣著的《古代中国国际法研究》设专章介绍了这方面的内容。《中国军事科学》、《中国军法》、《外国军事学术》、《解放军报》等报刊也发表了一些有关战争法研究的文章。

学术成果 90年代以来战争法研究的

主要成果有:

统一了战争法的概念 研究认为,战争法又称武装冲突法,是战争或武装冲突期间,以条约和惯例的形式调整交战国之间、交战国与中立国之间、交战国与非交战国之间关系,以及作战行为的法律原则、规则和规章制度的总称。

明确了战争法的主要作用 一是在战争或武装冲突期间,保护交战国、中立国和非交战国的合法权益;二是保护平民、交战人员和战争受难者的合法权益;三是禁止从事侵略战争和非法使用武力;四是惩处战争犯罪。同时,战争法还是现代战争中确定战争方略的重要依据;是现代战争中规范战争行为的基本准则。

探讨了战争法体系 第一种意见认为,现代战争法的体系就是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体系。其内容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日内瓦法,其主旨是保护在武装冲突中受伤或者可能受伤害的人员及财产;二是海牙法,其主旨是对冲突各方无节制地使用作战手段和方法加以限制。第二种意见认为,现代战争法体系应当是传统战争法与现代集体安全体系中有关武力使用的法律规定的二元并列。第三种意见认为,现代战争法体系应由以下四个方面构成:武力使用法,主要包括禁止非法使用武力和对非法使用武力认定的法律规定,合法使用武力的规定,以战争形式使用武力的程序及法律效果的规定;作战行为法,主要包括关于限制作战手段和方法的法律规定,关于保护武装冲突中受伤害或者可能受伤害的人员及财产的法律规定;中立法,主要包括调整交战国与非交战国之间的关系,规定它们彼此间权利和义务的法律规定;惩治战争罪刑法,主要包括有关认定战争罪行以及对其惩罚的法律规定。以上四个方面,以武力使用法为基础,以作战行为法为主体,以中立法和惩治战

争罪行为法为辅助,互相联系,互相贯通,构成了现代战争法的完整体系。

分析了现代战争法的缺陷 一种意见认为,现代战争法主要有以下不足:现行内容还不够完善;对于战争法禁止使用的某些手段至今尚无专门条约,有些条约也已陈旧;战争法缺乏国内法那种必须一体遵行的强制手段。另一种意见认为,现代战争法存在以下严重缺陷:联合国使用武力和授权使用武力的法律程序问题尚未真正解决;战争中使用新技术武器方面的立法远远落后于新技术武器的发展,落后于由此带来的战争本身的变革;对惩治战争罪犯虽然签署过某个方面的条约,在一些重要的公约或议定书上也涉及到这个问题,但是国际社会始终未能就惩治战争罪犯制度制定出一部具有国际刑事法律意义的实体法和程序法,这对战争法的适用很不利。

发展趋势 进入 21 世纪,有关战争法的研究将侧重探讨以下问题:一是修改现有战争法,纠正其存在的严重缺陷;二是根据高技术战争的发展,制定新的战争法规则;三是更好地适用战争法,使之能够真正有效地调整交战国之间、交战国与中立国之间、交战国与非交战国之间的关系。

(方 宁)

海战法研究 (study of the law of naval war)

探讨规范、限制各国在海上交战行为的原则、规则、制度、习惯的活动。战争法研究的组成部分。研究内容主要有:海战法的形成与发展,海战法的内容与编纂,海战法的实施与案例等。对海战法的研究,与有关海军国际法的研究联系紧密。由于现代条件下的海上军事斗争已不再是单纯的作战问题,更由于海军较之其他军种不同,它是一个国际性的军

种,无论平时和战时,都可以越出国家领海武装出入国际海域,因此,对海战法的研究和应用,能够使海军舰艇在领海以外的专属经济区、群岛水域和国际海峡等海域进行远洋作战、训练和巡逻时,利用相应的法律知识与外国舰船进行正常交往,与敌对国家的舰船进行合理、合法的斗争,有效地维护国家的海洋权益,对于海军建设和海上作战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清末和中华民国时期的海战法研究 进入 20 世纪以来,清政府和中华民国陆续加入了一些海战法及与海战法有关的条约。中国法学界翻译介绍的国际法中,也有海战法的内容。中华民国时期,曾编印《海军法规》,其中收入了少量与海军有关的国际法,并建立了捕获法庭,对有关外国船只进行临检、拿捕、审判等。但当时海战法的理论研究十分薄弱,成果不多。1927 年,金保康所著的《战时国际法》有专编论述海战法规。此后,涉及海战法规的著作还有胡英的《战时国际公法表解》(1913)、邱培宗编的《战时国际法问答》(1930)、国民党陆军大学编的《战时国际公法》(1930)、郑光荣编著的《战时国际公法》(1931),等等。1930 年黄右昌撰写的《海法与空法》和 1948 年包遵彭所著《海上国际法》,是比较集中地论述海战法问题的两部专著。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海战法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积极签署和参加海战方面的国际法条约,并进行了相应的研究,但比较零散,不够深入。70 年代末期,中国开始注重对战争法的研究,其中也涉及到部分海战法的内容。90 年代之后,开始对海战法进行专门研究。一方面,中国政府积极派人参与国际性研讨活动,特别是三次派专家分赴加拿大、瑞士和意大利,参加了《圣雷莫海战法手册》的专家研讨会;1995 年 11 月,

国际红十字会还在广州舰艇学院为海军舰艇作战军官举办了武装冲突法和海战法讲习班。另一方面,一些单位和研究人员比较系统地进行了关于海战法的理论研究,在报刊发表学术论文,出版学术专著,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1993年12月,海潮出版社出版、干炎平撰写的《国际海战法概要》,这是中国第一部专门论述海战法的专著。1995年6月,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编撰了《海军国际法手册》,分为五个部分:一是有关的国际法知识,二是国际海洋法,三是部分海区的法律制度,四是军舰的法律制度,五是海上战争法规,共计262个条目。1995年10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张召忠编著的《海战法概论》,这是一部比较系统地论述海战法规的专著。此外,解放军出版社出版、赵培英主编的《当代军人国际法基础》和吕北安主编的《海军法制学》,海潮出版社出版、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编写的《海军法规概论》等专著,也都对海战法有一定研究。学术成果主要有:

探讨了海战法的概念 有的学者认为,海战法,即规范和限制海战时双方交战行为的法规和惯例。海战法规的依据主要是有关的海战条约,海战时国际已普遍遵循的原则、习惯。各国海军自己制定的在海战时应遵循的法则,也是重要的参考资料。也有的学者认为,海战法现称为海上武装冲突法,属于海上战时法规,是规范和限制各国在海战中交战行为的原则、规则、制度、习惯的总称。海战法是战争法的一个子法,战争法的基本原则在海战法中也必须遵守。

归纳了海战法的主要内容 有的专著认为,海战法主要集中在两大法规系列,一是海牙法规,一是日内瓦法规。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1977年两个附加议定书和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现代海战和海洋法规的主体,是现代条件下平时和战时海上活动的

主要国际法律依据。有的专著以现代国际法和中国对外政策为依据,根据海军作战、训练、海上执勤和涉外活动的需要,结合中国海军的实际情况,比较全面地介绍与海军有关的国际法特别是海战法的基本知识,阐明有关的法律原则、规则和制度。在关于海上战争法规的内容中,分析了海战的国际习惯,海战区与海战场,作战舰船、武装商船、商船改装的军舰、受特殊保护的船舶、医务船、水面舰艇作战规则,潜艇对商船的作战规则,水雷鱼雷作战规则,海军封锁作战规则,对岸作战规则,伤者病者及遇船难者、战俘及其待遇,海战法规在当代的实践等。

研究了有关海战法的案例 有的专著从海上作战区域、军舰的法律地位、海上作战方法及手段的限制、海上中立、海上封锁、拦截、临检、搜查与拿捕、海战中目标区分与人道主义原则、海战中的违法犯罪与报复行为等方面,研究了大量海战案例,分析和说明了有关法规在各国的实践。

探索了海战法的应用 1996年10月,海军在北京召开“海军国际法问题学术研讨会”,并编辑了《海军国际法问题论文选编》,内容包括海域划界、海防管理、海军建设,海军平时与战时军事行动等方面的国际法及其对策问题,其中不少涉及海战法或与海战法有关。一些论文专门探讨了加强海战法意识、提高海战决策艺术,战争法在国内海战中的适用,实施海上封锁时一些国际法问题的处理,强敌干预借口的法律分析及对策,海战中对中立国商船的处置,军用飞机在海上活动中应遵循的有关国际法规则,医院船的法律地位及其在现代海战中的合法使用,海战法在现代海战中的运用等内容。特别是较为集中、深入地研究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海军战略、海军建设和海上军事斗争的影响。这次研讨会,标志着中国关于海战法的研究范

围进一步扩展,研究内容进一步贴近海军建设和海上军事斗争的实际。

发展趋势 21世纪,中国将更加注重海战法的内容及其发展的研究,以利于更好地参加有关海战法编纂的国际活动;深入研究海战法在未来海上军事斗争中的具体实施与应用,以利于加强海军建设,更好地维护祖国统一和国家的海洋权益。

参考文献

干炎平,《国际海战法概要》,北京:海潮出版社,1993。

张召忠,《海战法概论》,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

(方 宁)

外国军事法研究 (study of foreign military law)

探讨外国军事法的内容、沿革和制定、实施及其规律的活动。军事法学研究的组成部分。研究内容主要有:外国军事法律制度及其起源与发展,外国军事立法体制与立法活动,外国军事法的实施及保障等。对外国军事法的研究不仅有益于中国军事法学者开阔眼界,拓宽思路,学习借鉴外国先进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而且为中国的军事法制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

清末和中华民国时期的外国军事法研究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清王朝在大量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装备的同时,也开始借鉴外国的军事法律制度,促使中国古代传统的军事法制向近代军事法制演变。清末出版的《军制》一书,收入了英国、德国、俄国、美国、日本有关军事制度、军律等方面的内容。中华民国时期,制定的军事法也注重参考和模仿西方国家的军事法条文。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曾大量翻译日本、苏联、欧美等国

的陆、海、空军法规,兵役法规,战斗条令,防空教令,各军兵种操典等,对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法制建设产生了相当的影响。1929年,训练总监部编译出版了《日本军队教育令》,研究了日本军队教育的体制与法规。30年代,为建立中国新的兵役制度,曾翻译、研究了日本兵役法,并于1941年出版了《日本兵役之研究》一书,探讨了日本兵役法规的内容、实施及长处。1948年2月,国民党中央训练团监察官训练班印发了《军法业务讲话》,其中讲述了美军中的军法组织、职权、军法会审程序等,并说明中国军队与美军对于军法审判组织之观念的区别,进行了中外军事法的比较研究。

中国革命战争时期的外国军事法研究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战争期间,比较重视对外国特别是苏联军事法规的研究。1930年至1931年初,刘伯承参加和主持翻译了《苏军步兵战斗条令》。1933年他摘译了苏军《步兵战斗条令(第一部)》中关于“对空防御动作”一节、《苏联红军野外作战条令》中的“游击动作”部分。此后,他又译出了《苏联红军司令部野外勤务教令》,并在“译者前言”中探讨了世界军队指挥的历史和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工农红军司令部的建设方向及其在军队中的首脑地位,指明了参谋人员同指挥人员的法定关系。1938年12月,苏军颁布新的《步兵战斗条令(第一部)》之后,刘伯承又与左权合译了这部条令,并在“前言”、“后记”、“附言”中,对这部条令做了一定的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国军事法研究 20世纪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军事立法中主要研究和借鉴了苏联军事法的内容和立法经验,制定了一些有关战备、训练、工作、生活方面的规范。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对外国军事法的研究基本中断。70年代

后期,随着军事法制建设的恢复和发展,重新开始了对外国军事法的研究,报刊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文章。一些学术专著也设置专门章节对外国军事法的制度和实施进行探讨。至20世纪末,这一研究大体朝三个方向发展:一是对一些发达国家的军事法进行专门研究;二是结合军事立法研究外国军事法;三是研究外国军事法的实施。

在专门研究方面,主要研究了以下国家:

①英国军事法。1990年上半年,《解放军报》连载张纪孙的八篇文章,评介英国军法,包括英军的指挥体制、军法顾问、执法机构、军人犯罪及诉讼程序,英国的军事立法、兵役制度以及比较军法等内容;1991年10月,军事科学院邀请当时的军事法和战争法国际学会主席、英国军法署前署长J.S. 史密斯访华,就中英军事法制建设进行了学术交流;1995年第1期《中国军法》发表方宁的文章《英国的军事法制》,分析了英国军事法制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特点。在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前后,有关部门还组织研究了驻港英军的法律制度。②德国军事法。1992年3月,《解放军报》又连载张纪孙的四篇文章,评介德国军法,包括德国军法的特点、宪法中的军法条款、士兵法、军事纪律法、军队投诉法、军事刑法典、战时军法审判制度、院校军法教学、国防部法律处等内容;1995年10月,军事法和战争法国际学会主席、德国国防部总军法局原局长C. 斯伯林格尔博士来华顺访军事科学院,介绍了德国军事立法和军事法学研究的情况。③美国军事法。1990年12月,有关单位印发了对美国军事审判法律制度的研究成果;1993年10月,有关单位印发了《美国军事法规体系的基本构成和主要特点》,认为美国军事法规体系的基本构成包括:国会通过与颁布的军事法,总统颁布的行政命令,国防部长颁布的国防部指令,各军种部颁布的

条例、条令;美国军事法规建设的主要特点有:坚持依法指导军队建设,建立完整的军事立法体系,加强军事法规基础研究,以科学方法实施对军事法规的管理。1997年9月,美国陆军军法代表团来华访问,与中国同行交流了两军立法、司法、法律服务等方面的工作情况。④俄罗斯联邦军事法。1992年,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王安撰写的《军队条令与管理》,书中分析了原苏军共同条令的特点。1993~1995年,《东欧中东研究》发表文章,分析俄罗斯联邦军事法制建设的主要特点、存在问题、发展趋向和制约因素。1998年5月,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编写的《俄罗斯军事基本情况》,在“武装力量中的法制工作”一章中探讨了俄武装力量的法律创制工作、法律执行与法律保护工作、法律维护工作、军事司法、现行主要军事法律及规范性法律文件等内容。此外,还有一些报刊还发表文章研究了加拿大等国的军事法。

90年代中后期,中国对外国军事法的研究注重为军事立法服务。为配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的制定,从1993年末加强了对外国国防基本法的研究。特别是对美国、俄罗斯联邦、法国、瑞士、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蒙古等国的国防基本法,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1994年,有关单位编辑了《外国国防法律对有关问题的规定》、《世界各国宪法有关国防方面的规定》。《法学杂志》1994年第4期发表了方宁撰写的文章《世界若干国家国防基本法概析》,认为一些发达国家的国防基本法,在规范内容上大多包括国防领导体制、武装力量的建设和使用,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国防义务和权利等;在立法活动中,各国虽有自己的立法程序和立法原则,但也有一些共同做法:一是由最高立法机关制定国防基本法,二是立法比较原则,三是内容

相对稳定,适时修改。1996年,《外国军事学术》第12期发表了署名文章《俄罗斯新〈国防法〉浅析》,分析了俄罗斯联邦1996年5月颁发的国防法的主要特点。1997年3月7日,《中国国防报》发表一组文章,分别介绍了瑞士、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联邦四国的国防基本法。1994年之后,为配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的修改,对外国兵役法律制度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1995年6月,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外国预备役概览》,介绍了一些国家有关预备役的法律制度。1997年,《外国军事学术》第3期发表陈瑞祥的文章《外国兵役制度发展趋势》。同年12月,军事科学出版社又出版了《外国兵役制度概览》,不仅介绍了美国、俄罗斯联邦等20多个国家的兵役制度,而且分析了世界近、现代兵役制度的演变及原因,当今兵役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和做法,未来兵役制度的发展趋势。1998年5月,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美国军事基本情况》、《俄罗斯军事基本情况》、《日本军事基本情况》等书,分别设置专章研究了美国、俄罗斯联邦、日本等国的兵役制度。

为了更好地借鉴国外贯彻执行军事法的经验教训,一些学者研究了外国军事法的实施及其保障。王安的《军队条令与管理》一书,分析了美军依法从严治军的做法。1996年12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军队正规化与军事法制》一书,分析了外军依法管理的措施。1993年5月,在中国军事法学研究会召开的“军事执法与军队质量建设研讨会”上,马忠等人撰写的《美俄军队执法监督特点简析》一文,认为美国与俄罗斯联邦军队中的执法监督有以下特点:一是完善执法监督机构,充分发挥检察部门“双刃剑”的监督职能;二是重视护法工作,加强对执法的监督和管理;三是重视司法监督,重点是对

具有行政司法权人员的监督。

在研究外国现代军事法的同时,有的学者还在研究中涉及了古代和近代的外国军事法。1998年,海潮出版社出版、周健撰写的《军事法史纲》一书,介绍了古代的两河流域、印度、希腊、罗马军事法的发展概况,探讨了中世纪外国军事法和近代的美国、德国、日本等国的军事法。

在研究外国军事法的过程中,还编辑翻译了一批国外军事法规和研究成果。主要有:1987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何希泉和高瓦翻译的苏联《军事法学》;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吴新平主编的《世界各国法律大典》中的《美国法典·军事法卷》;1997年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萧榕主编的《世界著名法典选编·军事法卷》等。

发展趋势 进入21世纪,中国将在继续重视研究外国军事法内容及发展趋势的同时,强化对外国军事执法、监督和法制教育方面的研究,并深化中外军事法的比较研究,以期更好地为中国的军事法学研究和军事法制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王安:《军队条令与管理》,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俄罗斯军事基本情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

(方宁)

军事学术刊物 (military academic publications)

军队编辑出版的以研究作战指导和军事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刊物。可分为综合性和专门性、定期或不定期、公开发行或内部发行刊物的几种形式。

中华民国时期的黄埔军校,为加强对师

生的军事教育,就曾大量出版过有关军事学术方面的期刊、专刊等,向校内外发行。国民党海军亦创办过《海军杂志》、《海军期刊》等刊物。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建军初期,就已开始创办包括军事学术内容的综合性期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创办了《革命与战争》、《红色战场》等刊物;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分别创办了《八路军军政杂志》、《前线月刊》、《建军》等刊物;解放战争时期,各野战军、军区创办了各种军事期刊等。这些刊物均结合当时战争和建军实际,研究作战指导和军队建设诸问题。主要内容包括:重大战役战绩报道和敌军情况研究;战略战术、作战经验教训和战例的研究;军队领导人和高级将领撰写的军事论文;苏联红军军事论著译文;古今中外军事著作评介和战例分析等,深受根据地广大军民欢迎,并在日伪和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一定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军事学术刊物有了较大发展。1951年4月创办的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机关刊物《八一杂志》,包括研究联合兵种作战理论、宣传苏联军事科学、指导国防和军队建设等军事学术内容,对提高官兵的军事素养、推进军队建设起到了指导作用。

80年代以来,军事学术刊物又有了新的发展。综合性刊物主要有: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论述,以及作战指导和军队建设新成果的《中国军事科学》、《军事学术》等;研究国防理论,宣传国防建设,普及国防知识的《国防》杂志;研究军事理论和军事教育、军队建设的《国防大学学报》;以及研究民兵、预备役工作经验,传播现代军事知识的《中国民兵》杂志等。

专门性刊物主要有:介绍世界各国作战

指导、国防建设、教育训练等理论的《外国军事学术》、《世界军事》、《现代军事》;介绍中外军事历史和学术研究成果的《军事历史》杂志;介绍军事后勤和军种、兵种建设学术成果的《后勤学术》、《海军杂志》、《海军学术研究》、《中国空军》、《空降兵学术研究》、《防化杂志》等,以及《军事系统工程》、《中国军法》等刊物。

这些刊物坚持为军队和国防建设服务,对促进部队各项任务的完成,推进以现代化为中心的武装力量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薛志华)

军事学术研究机构 (military academ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研究作战指导和军事建设理论与方法的学术机构的统称。通常分为官方设立和民间组织、综合性和专门性、全局性和地区性的研究机构几种形式。

中国清朝后期,创办军事学堂,开始把军事教育与军事学术研究相结合。中华民国时期创办的黄埔军校和陆军大学校,讲授高等兵学、行军奥义等;陆军大学校设立的教研机构有兵学研究院及战术、军制等系。此外,还有国防研究会、欧战研究会等研究机构,军事学术研究益受重视。

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建军初期,就在军事指挥机构和军队院校,开展了与作战和教学相结合的军事学术研究活动。如在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等院校,均贯彻急用先学、学以致用原则,着重研习中国革命战争和抗日游击战争战略、战术、战斗条令、作战经验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为研究军事理论,适应国防现代化和未来作战的需要,1958年3月,全军高级军事科学研究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成立,其编制几经

变化,现设有科研指导部、政治部、院务部和战略、战役战术、军制、军事历史、外国军事、军事百科研究部及军事运筹分析研究所、军事学术杂志社、军事科学出版社、军事图书资料馆等专门机构。上述机构均以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论述为指导,以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为依据,研究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力量建设规律,为军委和总部决策、为部队建设和作战服务,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为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1994年,军事科学院作为全军军事科研中心,负责全军军事科研的计划、协调工作。

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区、各军种兵种、国防大学和各院校均设有负责军事学术研究的科研(研究)部、所、处、室等。如海军司令部下设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国防大学科研部下设战略、军队建设研究所、编研室等军事学术研究机构。民间研究机构有中国军事科学学会、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军事运筹学会、军事统筹学会、国防经济研究会、军事经济研究中心、军事法学研究会等,均对活跃和繁荣军事学术起到了积极作用。

(姜文华)

中国人民解放军 政治工作研究

(study of political work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探讨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工作理论、实践及其规律的活动。军队政治工作研究分为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理论研究。基础理论研究是以揭示军队政治工作规律为主要目的的研究活动;应用理论研究的

直接为解决军队思想政治建设中的现实问题而进行的研究。军队政治工作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军队政治工作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军队政治工作的特点、规律和科学体系;军队政治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军队政治工作的理论、方针、原则、制度和办法。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研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以及由此规定的军队的基本任务和当前任务为依据。其基本任务是:通过系统总结军队政治工作的历史和现实经验,揭示军队政治工作的内在规律,探索解决问题的对策和方法,完善军队政治工作的科学体系,为加强和改进军队政治工作提供理论指导和决策依据。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研究大体经历四个历史时期。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创立阶段。在此之前的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认识到武装斗争和建立革命军队的重要性。在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先后派出周恩来、李大钊、恽代英、萧楚女、李富春、林伯渠、熊雄、聂荣臻、刘伯坚、邓小平等大批共产党员到黄埔军校、国民革命军和北方的国民军中开展政治工作。在革命军中从事政治工作的共产党人不仅卓有成效地领导和组织了军队政治工作实践,而且对军队政治工作理论进行了富有创见的探讨,特别是周恩来在创建军队政治工作理论上作出了卓越贡献。他们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政治工作的实践经验和提出的问题进行了理论总结与探讨,提出了革命军队政治工作必须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则。主要内容是:革命军队是解放人民的工具,实现革命理论的先锋;有无革命的政治

工作是区别革命军队与军阀军队的显著标志；革命军队必须建立政治工作以灌输革命思想；革命军队必须依靠人民，宣传和组织群众是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务；对敌军进行争取教育工作；维护革命纪律是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重视政工队伍的自身建设，政治工作人员要以身作则等。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中所建立的政治工作制度及其在实践和理论上的一系列成果，为创建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理论打下了一定基础，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1927年创建人民军队开始，随着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和军队政治工作的建立，政治工作理论有了重大发展。在南昌起义期间，起义军前委和总政治部发布的《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海外各部队代表联席会议宣言》、《告全体官兵书》、《八一革命宣传大纲》、《土地革命宣传大纲》等文书文告，反映了当时政治工作的主要研究成果。在“赣南三整”中，军队建立了党组织和政治工作机构，开展宣传教育工作，严肃军政纪律，进行整顿整训。在“三湾改编”中，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和军队内部的民主两项制度，集中解决党对军队领导、思想教育、纪律建设等方面问题。特别是在井冈山斗争中，进一步提出了军队政治工作的主要原则。丰富的实践活动为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主要研究成果有：《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周恩来）、《周恩来副主席在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致词》、《一切政治工作为着前线上的胜利》（周恩来）、《红军第四军政治工作纲领》（1930）、《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1930）、《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又称“古田会议决议”，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

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集中体现了军队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思想；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确定了党对红军领导的根本原则；规定了对红军进行马克思主义和党的路线教育的原则和方法；规定了红军的宣传工作任务；阐明了政治与军事，政治机关与军事机关的关系；确立了正确处理红军内部、外部关系的原则；规定了瓦解敌军的政策和方法；规定了红军政治工作应有的作风等。它总结了工农红军创建以来的基本经验，确立了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和制度，集中解决了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问题，奠定了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基础。《井冈山的斗争》的主要内容是：明确了政治教育的作用；阐述了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及瓦解敌军的做法和意义；总结了“支部建在连上”的经验；提出了“民主集中制”的思想；确定党的中心工作是“做军事运动”等。《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是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部政治工作的基本法规。这一条例，是借鉴苏联红军政治工作条例，总结创建红军以来政治工作的经验制定的。它对于统一全国红军政治工作的组织和制度，确定政治工作的地位，加强红军政治工作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政治工作研究的理论贡献是：明确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是红军战斗力的源泉；强调政治工作要保障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政治工作根本制度是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加强官兵团结、军民团结和瓦解敌军；加强军队民主和纪律建设；制定正确的干部政策和制度；军队政治工作要根据军队的基本任务和当前的具体任务去做等等。

这一时期理论研究的主要特点是：理论

研究成果丰富,实践性强,但综合性、系统性研究不够;理论研究成果往往采取决议、指示、命令、规定等形式出现;法规性条例有明显的探索和借鉴苏联红军的痕迹;王明“左”倾路线对军队政治工作研究也存在一定影响。毛泽东曾对这一时期的理论研究作出评价,指出:“政治工作的研究有第一等的成绩,其经验之丰富,新创设之多而且好,全世界除了苏联就要算我们了,但缺点在于综合性和系统性的不足。”(《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54页)

抗日战争时期 在抗日战争中,随着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合法地位的确立,政治工作研究有了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系统地、综合地研究军队政治工作成为可能。八路军、新四军各战略区先后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八路军、新四军总部及一些师、旅相继成立了政治工作研究会。1938年和1942年曾先后两次颁布政治工作条例。全军开展了以整风为主要形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大生产运动和尊干爱兵、拥政爱民运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领导人和军队各级领导机关不断总结军队政治工作的经验,使军队政治工作在理论上有了重大发展。

这一时期主要研究成果有:《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1937)、《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毛泽东,1937)、《关于改编后党及政治机关的组织决定》(中央组织部,1937)、《中央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1937)、《关于新四军政治工作的指示任务》(总政治部,1940)、《军政委员会条例》(中央军委,1942)、《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组织间关系的决定》(1942)、《论抗日游击战争》(朱德,1938)、《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罗瑞卿,1938)、《抗战军队的政治工

作》(周恩来,1938)、《论持久战》(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中央军委,1938)等。1944年4月,谭政受中共中央委托,在中共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系统地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开始以来的军队政治工作经验,进一步提出和解决了军队政治工作中一系列重大理论原则问题,是继《中国共产党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之后的又一历史性文献,是军队政治工作走向成熟的标志。其主要内容是:重申了军队必须绝对服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原则;科学论述了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政治工作的总方针和基本原则;指明了政治工作的方向和任务;阐明了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要性和政策;强调正确对待政治工作的传统;强调要发扬实事求是和联系群众的作风;强调政治工作要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改革不适合的组织形式和工作制度。报告不仅特殊地解决了军队政治工作问题,而且也一般地解决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法与工作作风上的许多问题。报告被转发全党全军,作为各级领导干部的整风文件和固定教材。

这一时期政治工作研究的理论贡献是:明确提出了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宗旨;明确提出了党指挥枪的原则;明确提出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是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明确提出了人的因素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明确提出了军队的基础在士兵,将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的思想。

这一时期政治工作研究的主要特点是:政治工作研究在理论化、制度化方面有许多创新和发展,理论更加成熟,内容较为系统,更注重制定法规制度,系统性、综合性有所增

强,政治工作已成为一个科学体系。

解放战争时期 这一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在继承红军政治工作和八路军、新四军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创造和发展。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研究,主要是围绕军队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围绕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中央军委的战略方针,根据不同阶段的任务和特点展开:一是在解放战争战略准备阶段,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任务是保证全军完成从抗日战争向解放战争的转变,树立争取和、准备打,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的思想。二是在解放战争战略防御阶段,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任务是加强战时政治工作,鼓舞官兵士气,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确保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保证自卫战争的胜利。三是在解放战争战略反攻阶段,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由保证自卫战争的胜利转变为保证战略进攻的胜利,及时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四是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战略追击阶段,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内容,主要是教育全军官兵树立敢于决战、敢于打大歼灭战的思想;在大兵团作战中不间断地开展宣传鼓动活动和火线立功运动;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对国民党军队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大规模地开展瓦解敌军等工作;教育官兵牢固树立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

这一时期,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研究的主要成果有:《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毛泽东)、《关于恢复军队中各级党委制的指示》(中共中央,1947)、《中国人民解放军党委员会条例草案(初稿)》(总政治部,1947)、《军委关于军队政治工作方针的指示》(1948)、《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中共中央,1948)、《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

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1947)、《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中共中央,1948),各大战略区领导机关发布了《政治工作条例》、《政治工作概则》以及政治工作的大量文件和文章等。

这一时期政治工作研究主要特点是:政治工作的内容和形式丰富多样,如新式整军运动、杀敌立功运动、团结互助运动、高树勋运动、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战时政治工作理论趋于系统化;广大官兵共同参与研究活动。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为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和建设一支诸军种、兵种合成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要求,各级政治机关围绕相对和平时期军队思想政治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研究如何继承和发扬军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加强军事训练和各项任务中的政治工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加强军队政治工作建设,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的重要论断。部队先后开展了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活动,学习雷锋和“南京路上好八连”等先进典型的群众运动,开展“两忆三查”教育,创造“四好连队”和“五好战士”运动,加强军事训练中的政治工作,加强基层部队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这一时期的主要研究成果有:《关于报告制度的规定》(总政治部,1950)、《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1954)、《关于实行义务兵役制、薪金制、军衔制和颁发勋章奖章的工作指示》(总政治部,1954)、《关于制止某些高级干部腐化堕落违法乱纪行为的指示》(中央军委、总政治部,1954)、《改进机关对连队领导的七条措施》(总政治部,1963)等。为适应军队由战争环境向相对和平环境的转变,政治工作研究也取

得了新的成果,提出了一些新的思想和原则。如,把贯彻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教育作为军队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务和保证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决定因素;要求政治工作渗透到技术业务中去,保证军事技术和各项业务的提高;规定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是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保证全体军人提高军事素养、熟练地掌握军事业务、技术;军事斗争、外交斗争和瓦解敌军相结合等。

从50年代后期开始,军队政治工作逐渐受到“左”的指导思想影响,错误地开展了反“教条主义”斗争和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特别是林彪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后,大搞“突出政治”,给军队建设和政治工作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推行“政治工作可以冲击一切”,大搞无限上纲和实用主义、形式主义,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被扭曲,军队政治工作研究也偏离了正确方向。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通过拨乱反正,清除“左”的影响,重新走上了正确的轨道。为适应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全军进一步加强了对政治工作研究的组织领导。1985年,大军区级以上政治机关相继成立军队政治工作研究机构,军、师两级政治机关指定专人从事研究工作,初步形成了专职人员和广大业余骨干相结合的政治工作研究队伍。1991年以后颁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都把政治工作研究明确规定为军队政治工作的内容之一。

在全军对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的基础上,1987年1月,中央军

委作出了《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决定共七部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国家实现三大任务中的历史责任;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加强政治工作;政治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政治工作要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改革创新;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开展政治工作;改进政治机关工作,提高政治工作干部素质;各级党的委员会要成为部队统一领导和团结的坚强核心。决议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继承党和军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结合新的历史时期军队的任务和面临的情况,对军队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主要任务、方针政策和基本方法,做出了正确的阐述和规定,是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指导性文件。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全军不断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军特点和规律的基础上,1999年7月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做出了《关于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军队思想政治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共10部分:改革开放以来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基本实践;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使命;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指导思想政治建设;突出拥护和支持改革这个时代性课题;坚持不懈地强化革命军人的精神支柱;把着眼点放在全面提高官兵素质上;正确认识和运用物质利益原则;发挥法规制度在思想政治建设中的作用;切实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面向新世纪军队政治工作的改革与发展。决定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全面贯彻江泽民关于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论述,回顾改革开放二十年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基本经验,分析新的历史条件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集中回答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军队思想政治建设面临的重大问题,体现了

古田会议以来军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对军队政治工作和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研究成果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是军队政治工作研究最活跃、研究成果最丰富的时期。主要成果有:

政治工作法规制度 主要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服役条例》(1978)、《关于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决议》(1978)、《中央军委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1987)、《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1988)、《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官服役条例》(1988)、《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干部暂行条例》(1988)、《关于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军队政治工作的若干问题》(1989)、《军队基层建设纲要》(1990)、《军队经常性思想工作要则》(199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备役军官法》(1995)、《关于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军队思想政治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1999),以及曾先后四次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等等。

政治工作理论专著 主要有:《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党的建设》、《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思想政治工作》、《江泽民论党的建设》、《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研究》、《邓小平军队政治工作思想研究》等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关于政治工作的论著及研究专著;《当代中国军队的政治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教程》、《军队政治工作学》、《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中国共产党军队政治工作七十年》、《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分册》等政治工作理论专著;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组织工作、干部工作、宣传工作、青年工作、群众工作、联络工作、纪律检查工作等军队政治工作学科专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军队政治工作、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中的政

治工作等探讨新情况、新问题的对策性研究专著。

理论贡献 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研究的理论贡献是:

端正了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 1987年《中央军委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进一步端正了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明确规定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必须服务于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于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人民军队的性质,保证军队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保证军队内部的团结和军政军民团结,保证军队战斗力的提高和各项任务的完成,动员和团结全体官兵把我军建设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这个指导思想为加强和改进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和开展政治工作研究,规定了正确方向,提供了科学依据。

建立了军队政治工作学科体系 确立了军队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确立了一整套较为规范的军队政治工作学的基本概念,建构了学科知识体系;对军队政治工作主要内容进行分门别类研究,创立了军队政治工作的分支学科。

科学总结了军队政治工作经验教训,系统概括了军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 1987年《中央军委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明确地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概括为:坚持党领导军队的原则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部队;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原则;实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坚持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发扬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选拔任用干部;加强军队中党组织的建设,发挥党委的核心领导作用、党支

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等等。这些传统,反映了人民军队的本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最富有生命力的原则和内容。

集中探讨了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军队政治工作理论 在全军广泛深入开展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军队政治工作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新思想、新观点,阐明了政治工作是人民解放军生命线,就具体体现在政治工作的服务和保证之中;提出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提出了“思想政治建设”这一具有时代意义的重大任务,强调必须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全军各项建设的首位;提出了军队开展政治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实现新时期思想政治建设的使命,为打赢未来高技术战争提供精神动力,为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本色和作风提供可靠的政治保证;规定了政治工作必须紧紧围绕军队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突出拥护和支持改革这个时代性课题;提出了政治工作必须坚持继承优良传统与改革创新统一;提出了政治工作改革的总原则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保持优势,创新发展,增强政治工作的针对性、系统性、创造性,更加有力地发挥服务保障作用。这些思想观点,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

深入研究了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中的政治工作理论 面对保证打赢高技术局部战争的要求,全军结合军队使命和部队任务,突出了军事训练、军事演习以及科技练兵中的政治工作,多层次、多角度地开展探索战时政治工作特点和规律的研究;依据高技术局部战争的特点,围绕如何开展反心战斗争问题,加强“心理战”研究,并把反心战研究列入全军“八五”科研项目,先后出

版了一大批专著和理论文章;根据军队质量建设的要求,围绕军事人才开发战略,开展了加强培养适应高技术战争需要的高素质军事人才的专项研究,为干部制度改革作了理论准备。

主要特点 新时期政治工作研究的主要特点是:

学术活动空前活跃 全军多次掀起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高潮,先后召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讨会、高技术局部战争政治工作研讨会、思想政治建设座谈会、基层建设座谈会、新军事革命与心理作战学术研讨会、新形势下治军特点和规律研讨笔会等各种形式的理论研讨会,出版一大批政治工作教材和专著,发表大量研究文章。

注重系统理论研究 研究内容涉及政治工作指导理论、政治工作基础理论、政治工作应用理论、政治工作分支学科、政治工作边缘学科,以及政治工作研究的难点、热点和对策性研究等。

注重法规制度研究 研究制定了一整套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为核心的、涉及各个领域的政治工作条例、决议、决定和法规。

注重创新性研究 全军围绕探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治工作特点规律,围绕探讨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局部战争中的政治工作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形成了研究新情况、探讨新问题的浓厚空气,并取得了丰硕的创新性研究成果。

发展趋势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历史条件的变化,军队政治工作研究将立足现实,着眼未来,在继承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围绕确保“打得赢”、“不变质”的历史任务,努力探索和掌握新形势下政治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推进政治工作的改进、发展和完善。政治

工作研究将努力探索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新发展,赋予新内涵,创造新形式;将进一步探索和拓展政治工作服务保证的新领域,丰富新内容,形成新对策;将深入研究政治工作政策制度的新体系,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国家有关政策制度相衔接、符合军队实际的新的政策制度;将更加注重研究运用政治工作的新手段,增强政治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政治工作研究将更加适应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需要,更加适应打赢高技术战争的需要。

参考文献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党的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印:《关于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军队思想政治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北京:长征出版社,1999。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思想政治工作》,北京:学习出版社,200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江泽民论党的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王 泉 黄伟民)

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 (study of army'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al work)

探讨军队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特点及其规律的活动。目的在于正确认识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与作用,为指导军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服务。主要内容包括:人民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方针原则、历史沿革、地位作用、内容设置、制度措施、经验教训、方法手段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

研究,大致分为以下两个历史时期:

革命战争时期 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在国民革命军中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付诸实践。但完全意义上的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在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建立了人民军队之后开始的。1929年12月,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对红军政治工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深刻阐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极端重要性,明确提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这不仅使全党全军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产生了一次飞跃,也为以后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指明了方向。在决议精神指导下,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始终与实践相伴相随,逐步得到规范和深化。1934年2月,周恩来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代表党中央所作《一切政治工作为着前线上的胜利》的报告,李卓然代表红一方面军所作《战时政治工作报告大纲》,1936年12月总政治部颁发的《在党的新任务面前红军政治工作的任务(草案)》等,都涉及到了对军队思想政治教育情况的分析和总结,反映了当时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成果。概括起来,主要是强调把宣传鼓动工作以各种方式渗透到一切军事活动中去,为提高部队战斗力和打胜仗服务;强调干部教育应当放在第一位,提高干部的政治文化水平,是保障红军完成其政治任务的基础。1944年4月谭政在中共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中,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又先后提出了在一定物质基础之上,思想掌握一切,思想改变一切的著名论断,提出了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

节的光辉思想，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而且对于军队在整个革命战争年代以至和平建设时期，探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地位、作用、任务、内容、方法等等，都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在这个时期，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工作与革命战争实践联系得十分紧密。在各种思想政治工作指示、总结报告、经验介绍、会议讲话、体会文章中，已经大量表述了有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理性思考，初步构建了理论研究的基本框架，为深入研究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所担负的使命和责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军队建设与发展的重点有了重大调整。为使人民解放军适应从夺取政权到巩固政权的根本转变，确保优良传统在新形势下继续发扬光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审时度势，在军队中广泛深入地开展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教育、整风教育、阶级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极大地激励了官兵继续革命的斗志和爱国热情。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为加强军队正规化建设，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于1954年4月，颁布了建国后第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依据这个《条例》，军队政治工作的开展日益规范和科学。思想政治教育从内容到形式，有了较大丰富和发展。这个时期，全军各院校和政工科研机构相继建立起来，有了一支相对稳定的教学科研队伍，研究体系得到完善，力量进一步加强。在军委、总部的统一组织领导下，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工作一度十分活跃。特别是南京路上好八连和雷锋两个重大典型的推出，推动军队思想政治教育不断深入。“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受到严重冲击和扭曲，研究工作同时陷入停滞状态。

1978年6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后，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工作逐渐摆脱“左”的影响，恢复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为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军队依据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把培养“四有”革命军人，作为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和根本目标，并开始了改进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益尝试和探索。1980年12月，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颁发了《军队院校政治理论教育改革方案》。1981年4月，总政治部发出《关于进行四项基本原则教育的通知》。1982年11月，总政治部颁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政治教育大纲》。1983年4月，总政治部颁发了《关于认真贯彻党的十二大精神，加强军队院校政治理论教育的意见》。1983年12月，总政治部颁发了《关于加强干部科学文化政治理论教育的决定》。1986年6月，总政治部颁发了《关于改革军队院校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意见》。1987年3月，总政治部颁发了《关于当前编写军队院校政治理论课教学大纲和教材的意见》。1987年5月，总政治部召开了全军基层政治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了《士兵政治教育大纲》。这一系列法规性文件的颁布实施，反映了这一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成果，丰富和完善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体系。在此期间，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工作坚持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以科学求实的态度，认真回顾和总结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经验，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军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新形式、新方法，创造了许多新鲜经验，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的理念更加明确，大教育观初步确立，内容设置日益科学，途径和模式不断拓展。全军部队坚持收听收看广播、电视、新闻联播和阅读报纸的学习制度，提倡开放式、研究式、讨论式、启发式说理教育，开辟“第二课堂”，实现部队、社会、家庭教育相

结合等新的教育方式,较好地适应了形势发展要求,贯彻了民主、开放、求实的精神,得到了广大官兵的肯定和支持。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和发展,军队所处的社会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给军队思想政治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敌对势力的演变与渗透,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和影响,使军队思想政治建设面临许多新的考验和挑战。为此,江泽民提出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全军各项建设的首位,要深入开展爱国奉献、革命人生观、尊干爱兵和艰苦奋斗教育,要努力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系统性和创造性。全军12个政治理论教育协作中心、各大单位政治工作研究室、政治理论研究室和宣传文化信息网络,与各级政治机关及院校一道,从把握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军特点和规律着手,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重点研究课题,有领导、有计划地专门组织力量进行攻关,积极探讨进一步改进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军内发行的十多种研究思想政治工作的刊物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占有很大比重,几乎所有的学报都开辟了思想政治教育专栏。在已经出版的数十部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专著中,都用了大量篇幅专门阐发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理性思考。同时,还提出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系统引入社会学、教育学、管理学、心理学、伦理学、法学等相关学科知识,以及人文知识和高科技知识的新思路,不仅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也拓宽了思想政治教育渠道。90年代以来,随着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深入,理论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吸纳了许多具有高学历的优秀人才,整体素质明显提高,研究工作显示了良好的发展势头。1999年7月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深刻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基本实践,所形成的《关于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

经济条件下军队思想政治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新形势下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的一系列重大方针原则,集中反映了全军20年的研究成果,凝聚着全军思想政治工作者的智慧,是一个具有重要指导作用的纲领性文件。2000年9月召开的全军思想政治教育座谈会,围绕贯彻《决定》精神,形成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前瞻性和操作性,既是现阶段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指导性文件,也是深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重要依据。

发展趋势 进入新的世纪,军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情况更加复杂,任务更为艰巨,研究工作将按照《决定》和《意见》要求,对社会环境变化、教育对象特点、信息传播途径予以足够的关注,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增进交流与协作,在思想教育和行为规范结合、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统一、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实际问题并重、优化教育环境和提高官兵素质等方面,积极探索新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创造新的教育经验,以便在新形势下更好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和优势。

(于志刚)

军队组织工作研究 (study of army's organizational work)

探讨中国共产党在军队中的组织机构、政治机关、干部队伍、党员队伍和群众组织的地位作用、职权职能及其自身建设等规律的活动。是军队建设和政治工作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军队组织工作研究对于提高军队党务工作者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对于做好政治工作、加强和改进军队的思想政治建设,对于保证共产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的落实,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本色和作风具有重大意义。

革命战争时期军队组织工作研究 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历史时期:

大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在没有建立自己的军队之前,曾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进行组织工作的探索研究。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同国民党合作组织革命军队的过程中,学习和借鉴苏军的经验,对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如何建立组织和如何发挥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探索。1924年秋,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秘密建立了特别支部之后,又分别在武汉分校、国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四、六、十一军,以及北方一部分国民革命军中建立了共产党的支部和小组,设立了党代表。到1927年初,在国民革命军中的中国共产党员约有1500多人。《国民革命军一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关于一师党务活动办法之规定》、恽代英的《党纪与军纪》、《中共中央对于军事组织系统及其与党的关系的新决定》等是当时的代表性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在自己领导的军队中建立组织提供了经验。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这一时期,军队组织工作的研究重点是组织的设置、职能职权、地位作用和自身建设等重要问题。《军事工作大纲——中共中央通告第51号》、《红军第七军前委关于党的组织工作的通告》、《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总政治部关于红军中党支部工作的一封信》、《红军总政治部关于红军中党的工作的训令》、《总政治部关于团与青年工作的训令》、《总政治部关于政治干部问题给各军区政治部的指示信》、《总政治部关于支部工作的训令》等,体现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

抗日战争时期 这一时期的军队组织工作研究主要是总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恢复和健全共产党在军队中的组织和政治机关,同时提出把共产党的干部工作作

为组织工作的重要内容。通过研究,不仅促进了共产党在军队中组织机构的恢复和落实,同时还拓宽了组织工作的研究领域。《中央组织部关于改编后党及政治机关的组织的决定》、《关于恢复军队中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制度的决定》,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建议部队仍应保持党代表制》和谭政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等,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研究情况。

解放战争时期 这一时期的军队组织工作研究,是紧紧围绕着适应大兵团作战的需要,进一步健全中国共产党在军队中的组织机构、工作制度,以及如何发挥组织作用和如何规范党组织的活动等问题展开的,《中央关于在军队中组织党委会的指示》、《军委关于军队政治工作方针的指示》、《恢复我军的党委制度》,毛泽东《关于健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是这一时期研究情况的集中体现。

革命战争时期,军队组织工作研究取得了具有奠基意义的重大成果,主要内容有:

明确了中国共产党与军队的关系 1927年南昌起义时,强调“党的组织是一切组织的根源”。1932年,红军总政治部在《关于红军中党支部工作的一封信》、《关于红军中党的工作的训令》等文件中,明确提出了“党在红军中绝对领导”的概念。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明确党中央是红军唯一的领导。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中指出,拒绝国民党派他们的党员到八路军中当干部的要求,“坚持了共产党绝对领导八路军的原则”。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阐明了“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

权”。

构筑了军队中共共产党的组织设置形式从南昌起义到三湾改编,特别是古田会议之后,各地红军陆续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机构。后来由于王明“左”倾错误,共产党的组织(主要是部队党委)又经过了取消、替代、恢复的曲折发展过程之后,才逐步建立健全了军队中的共产党组织系统,并明确了隶属关系。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周恩来《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建议部队仍应保持党代表制》,毛泽东、王稼祥、谭政《各部政治机关干部必须是党员》,谭政《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军委总政关于在部队中建立士兵委员会的通知》,团中央、军委总政《关于在部队中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等著作、文献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研究成果。

形成了共产党在军队的组织工作制度《关于健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红军第四军各级政治工作纲领》、《红军士兵委员会章程》、《政治委员工作须知》、《连队指导员工作须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军政委员会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党委会条例(草案)》、《中国人民解放军革命军人委员会条例》等,先后对组织制度、工作制度作了初步规范。

提出了干部队伍和共产党员在革命战争中的作用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就共产党员在民族战争中的模范作用、扩大共产党和防止奸细混入、干部政策、党的纪律、党的民主等问题所作出的论述,以及军委总部发出的《关于部队中知识分子于干部问题的指示》等文件,集中的反映了这一理论成果,并标志着人民解放军

干部队伍建设的理论已初步形成。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军队组织工作研究 具体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0~1978)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军队组织工作研究主要围绕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如何加强共产党组织、政治工作、部队基层建设等问题,展开深入研究。主要活动有1953年底至1954年初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高级干部会议、1960年的军委扩大会议等。主要方法是总结建国以后军队中共产党组织建设的经验,并把这些经验以条例的形式固定下来。50年代后期,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使研究工作出现了偏差,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组织工作研究处于停顿甚至倒退状态。尽管如此,军队组织工作研究仍然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

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 罗荣桓的《切实抓好党的组织建设工作》、叶剑英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永远是党和人民的驯服工具》、陈毅的关于修改政治工作条例的说明等,都体现了这一原则的基本思想。

提出了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 彭德怀在1953年底到1954年初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四年来的军事工作总结和今后军事建设上的几个基本原则》和《总结报告》、萧华《关于军队政治工作建设几个问题的报告》,1954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以及后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都阐明了这一根本制度的科学含义、特点和坚持这一根本制度的重大意义。

总结了军队中共产党组织建设的基本经

验 郭林祥的《加强党委建设的基本经验》、总政治部组织部的《四个部队党委工作情况的报告》、中共济南军区委员会的《关于师以上党委召开书记联席会议情况的报告》等都是这些研究成果的体现。

统一了组织工作程序 1963年3月27日,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中,对部队党委、各级各类政治机关、各级政治干部以及共青团组织等的地位、作用、职责、职权,工作任务、工作程序等都作了明确规定。与此同时,还制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连队革命军人委员会工作条例》,标志着军队组织工作的规范化。

改革了干部工作制度 主要是通过研究借鉴苏军经验,并从中国的国情军情实际出发,对干部制度进行改革,实行了薪金制、军衔制,以及颁发勋章奖章,制定并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等。

第二阶段(1979~2000)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军队组织工作研究主要围绕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军队思想政治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围绕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围绕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等问题,深入开展了研究,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

明确了新时期军队组织工作研究的指导思想 邓小平的党的建设理论,江泽民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等,都为军队组织工作研究明确了指导思想。

丰富了军队组织工作的理论 姜思毅主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教程》、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军队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学》、《新时期政治工作教程》,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安政

治学院、南京政治学院、上海空军政治学院等编写的相关教材中,都对军队组织工作理论作了概括和阐发。除此之外,国防大学军队政治工作教研室统编的《新时期军队党的建设研究》、西安政治学院组织工作教研室袁忠信主编的《军队党组织建设研究》等一批专著,系统地阐述军队组织工作的理论。

解决了一些重大现实问题 紧密联系新的历史条件和部队的实际,围绕加强党委的自身建设和发挥核心领导作用、恢复政治机关的职能作用、深化军队干部制度改革、严格中高级干部教育管理、抓好基层党组织建设、发挥部队中群众组织的作用等作了深入的研究,并有了新的突破。

形成了学科专业研究方向 随着军队政治工作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形成,组织工作从1998年起已成为军队政治工作学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招收硕士研究生,1999年招收博士研究生。

完善了一系列规章制度 根据新的情况,先后在1978、1991、1995、1999年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进行修改;中央军委作出了《关于发扬优良传统加强廉政建设的决定》、《关于贯彻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加强军队党的建设的决定》;总政治部制定了《关于加强中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的意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团级以上领导干部职务任免暂行条例》等法规性文件。

发展趋势 未来军队组织工作研究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要坚持从新的实际出发,以改革的精神研究和解决军队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军队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增强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进一步统一研究对象和领域,与全党的组织工作研究统一起来,加强具体制度的研究,从制度上保证组

织工作落实；吸收地方组织工作研究的经验，借鉴地方组织部门取得的研究成果。

(房忠贤 刘星星)

军队干部工作研究 (study of army's cadre work)

探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和文职干部的选择、培养、使用和管理的特点及其规律的活动。军队干部工作研究，主要是依据中国共产党的干部路线，对军队干部工作的主要任务、工作内容、管理原则和管理制度进行研究和探讨。目的是为加强和改进军队干部管理工作，实现干部队伍建设和管理工作的法制化、制度化和科学化，提供科学依据。

研究概况 中国人民解放军从诞生之日起，就开始干部工作的研究活动。研究过程大体可划分为以下几个历史时期：

革命战争时期的军队干部工作研究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初期，中国共产党就十分重视军队中的干部工作。1930年以后，逐步颁发了一些干部政策方面的专项文件。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从理论上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政策，提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26页）的著名论断，指出“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任人唯贤’的路线。”（同前，第527页）这次会议以后，军队领导机关逐步加强了对干部工作的研究。现有资料表明，全军性全面系统的研究活动始于1940年，该年春天中央军委秘书厅拟定颁发各战略单位的《干部问题研究提纲》，提出六个方面358个问题，要求全军各大单位展开研究，然后由主要负责人到延安座谈讨

论。这六个方面的问题是：“干部概况及干部的分析；干部质量数量的变化及其分布；干部政策的应用；干部在斗争中各种表现；干部工作的组织与工作制度；经验教训和意见”，基本涵盖了当时军队干部队伍建设和干部管理制度的主要领域。之后，许多部队向军委写出干部工作的研究报告，一些领导干部在延安出版的报刊上发表多篇关于干部问题的文章。如《八路军军政杂志》、《前线》、《共产党人》等刊物上先后发表有：谭政《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政策》、萧向荣《八路军与知识分子》、陆定一《大量吸收和正确对待专门家》、周桓《目前建军中的干部问题》、方强《关于八路军的干部问题》等。同时，这一时期军委和总部制定和颁布的干部工作文件开始形成系列，如1940年10月至12月间，总政治部曾连续发布了《关于干部工作的第一号指示——干部工作一般原则问题》、《关于干部工作的第二号指示——干部政策与教育》、《关于干部工作的第三号指示——干部的提升与审查》以及《关于干部工作的第四号指示——干部团结问题》。1942年2月1~26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连续颁发《关于军队干部教育的指示》第一至五号，内容分别是：总的指示；军事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各种干部的业务教育。这些成系列的干部工作指示的发布，使战争环境中的军队干部工作向着正规化方向迈进了一大步。1947年军队党委制恢复后，干部工作列为党委会的重要工作内容，实行党管干部原则，使军队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进一步得到加强。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军队干部工作研究 1950年中央军委总干部部成立后，统一了全军干部管理制度，更加重视对干部工作的研究，在研究总结和继承发展人民军队战争年代干部工作优良传统的同

时,还研究借鉴苏联红军的干部工作经验。其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干部工作法规的制定和干部管理制度的健全上。1952年全军干部统一评定了行政级别,首次建立了军队的等级制度。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任免暂行条例》,规范了军队干部的任免权限、办法、程序等事项。1955年2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勋章奖章条例》。加上此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薪金津贴暂行办法》,全军实行了军衔制、勋章奖章制和薪金制度。

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从1965年开始,50年代干部工作的主要研究成果遭到否定。1965年5月22日,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关于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决定》,5月31日军衔制度被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亦不宣而废,勋章奖章制度、军官预备役制度、军队行政级别制度同时被废止。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军队领导机关开始恢复对干部工作的研究。1981年12月,军事科学院军制研究部成立了干部制度研究组,1983年11月,总政治部干部部成立了干部工作研究处。在开展专题研究的基础上,两单位或合作或单独撰写出版了人民解放军干部工作基础理论方面的四部论著。1988年10月,总政治部干部部与军事科学院军制部联合编著出版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制度概要》,系统全面论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以来各项干部制度建立、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总结了干部工作在历史上的某些经验教训。1993年1月,上述两个单位又继续联合撰写出版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人

事管理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借鉴古今中外人事管理经验,在总结人民军队60多年干部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概括出具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特色的干部管理理论体系,成为指导军队干部工作的一部权威性理论专著。1993年6月,总政治部干部部研究组编写出版了《外军军官管理制度概述》,对世界主要国家军官人事管理的主要制度作了较为全面的概括和系统的阐述,为研究外国军队的军官管理制度提供了方便条件。军队一些单位和学者,先后编撰出版了一批军队干部工作论著,如《干部工作概论》、《干部工作教程》、《军队干部工作学》、《军队干部管理学》、《军队干部管理新探》、《军队科技干部管理概论》、《军队干部管理素质论》等。从而进一步繁荣了军队干部工作理论,推动了军队干部工作的法规制度建设。

在全军深入开展新时期干部工作研究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新时期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必须坚持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的方针。党的干部原则也进一步得到完善,明确了党管干部的原则、任人唯贤的原则、德才兼备的原则、量才适用的原则,注重实绩的原则,着眼发展的原则,群众公认的原则,依法办事的原则,整体优化的原则等。这些原则既是党的干部工作经验总结,也是新时期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根本原则。

1978年开始,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一系列军队干部管理的法律文件。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服役条例》(1978)、《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官服役条例》(1988)、《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1988)、《中华人民共和国预备役军官法》(1995)。中央军委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干部暂行条例》(1988)、《中国人民解放军团级以上领导干部职务任免暂行条例》(1997)。2000年12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官服役条例〉的决定》，将该条例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役军官法》。根据干部工作的这些法规制度，军队进一步完善了现役军官服役制度，重新实行了军官军衔制度，实行了文职干部制度、预备役军官制度，完善了干部计划管理制度，科技干部管理制度，干部的选拔、培训、考核和奖惩制度，干部工资、福利和抚恤制度，干部退休制度等，从法规制度上规范了军队干部的管理工作，促进了干部队伍的“四化”建设。

研究形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干部工作的研究，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形式，概括起来其主要形式有：

出版专门刊物 如军委总干部部 50 年代主办的《干部工作通讯》，总政治部干部部 80 年代以来主办的《干部工作情况》等。

编印专门《汇编》 如党和国家领导人论述军队干部问题的文章、言论汇编，各种报刊发表的研究干部问题的学术论文汇编，军队干部工作文件、法规汇编，后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已出版 11 辑，约 780 万字。

召开研讨会 主要是在某项新的制度建立、某一新的任务下达和进行某些干部制度改革时，召集业务系统工作人员以及分管干部工作的领导干部，以会议的形式进行研究讨论。

举办研讨学习班 如 1985 年总政治部委托政治学院举办的“干部工作专修班”，对新时期军队干部工作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任务，干部制度改革，干部队伍的稳定，干部部门自身建设等问题，采取边学习、边调查、边研究的方式，进行专题研讨。

设置干部工作教学机构 1987 年起在西安政治学院设置干部专业进修班或大专班，及其专业教研组，进行干部工作的教学和研究。同时在若干院校和军事科学院的研究

生院(队)，开设干部工作专业方向，培养了一批干部工作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

发展趋势 干部工作研究任重道远，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的问题是：①进一步研究完善干部管理法规体系形成一部能够覆盖军队干部工作全部领域的总的法律规范文件，制定各个方面的单项法规，使各项法规互相衔接，系统配套。②进一步研究改革若干干部制度，使干部制度更好地体现科学性、系统性、操作性和稳定性的要求。③进一步研究完善干部工作的理论体系。填补有关军队干部工作史、军队干部人事管理心理学等理论上的空白。

参考文献

总政治部干部部、军事科学院军制研究部编纂：《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制度概要》，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

总政治部干部部、军事科学院军制研究部编纂：《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人事管理学》，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军队的政治工作》第三编第十三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

(刘 岩)

军队政法工作研究 (study of army's public security, procuratorial and judicial work)

探讨军队政法工作本质及其规律的活动。是国家政法工作研究和军队政治工作研究的组成部分。军队政法工作研究的对象，是军队保卫、军事审判、军事检察及司法行政工作制度。研究内容主要有：军队政法工作的理论，包括军队政法工作的概念、本质、特征、方针、原则、政策、历史沿革等；军队政法工作的制度，包括军队政法工作的性质、任务、组织体系、工作规则、活动程序和方

法等；军队政法工作的规律，包括对军队政法工作的历史经验、客观现状和发展趋势的科学认识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队政法工作研究是随着军队政法机关的诞生和军队政法工作的创立而开始的。可分为两个阶段：

革命战争时期的军队政法工作研究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军设立了政治保卫处。这标志着人民军队政法机关的诞生和政法工作的创立。在此后的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军队政法工作研究主要侧重在军队政法工作的方针、原则、政策、组织机构设置、职能作用和活动方式等方面。这期间的研究工作基本上是在党和军队的高层领导人、领导机关中进行，是以军事法规、领导讲话和文件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也有少量的著作、教材。主要成果是：

提出了军事立法的思想 1929年12月，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提出“编制红军法规，明白地规定红军的任务”，调整军内外的各种关系。

确立了军队政法工作的任务、政策和原则 1932年1月27日中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公布的《政治保卫局在红军中的组织及工作权能》提出，军队政法工作的任务是纯洁和巩固部队，“将不良分子淘汰出去、使反革命活动无以生根”。1939年8月和10月，中共中央分别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和《关于反奸细斗争的决议》，提出党要加强对军队政法工作的领导、纠正保卫工作垂直领导的偏向，强调要废止肉刑，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的原则。1941年4月，刘少奇在盐城保卫干部培训班作重要讲话，论述了军队政法工作的一系列政策。

研究和制定了一批军队政法工作的法律、法规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1932年2月

1日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事裁判所暂行组织条例》，决定在红军中建立军事裁判所和军事检查所，并规定了有关的工作职责和程序。这是当时人民军队政法工作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

编写了一些军队政法工作的教材 最早的是1933年9月29日国家政治保卫局编写的《审讯术》，该书是军队政法理论研究的第一本著作，提出了“一案的全部，是侦察、检查、审讯三部门工作的总和，”并论述了这三者的关系，对军队政法工作理论研究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军队政法工作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1950年4月总政治部成立保卫部，1954年~1955年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相继成立，为军队政法工作研究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理论研究取得了有益的成果。这些成果集中体现在军队政法工作历次重要会议的文件和起草的军事法规之中。主要有：①研究制定了军队保卫工作的基本方针，即“党委领导、首长负责、保卫工作与一般工作相结合，专门机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②研究制定了军队侦查工作的原则，即“重点建设、有的放矢、弄清问题、适时破案。”③研究拟定了一些军事法律法规，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刑法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刑法》等。

“文化大革命”时期，军队政法工作遭受严重破坏，研究工作基本瘫痪。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军队政法工作研究主要是围绕新时期军队政法工作建设的实践与现实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军队政法工作理论有所创新并日趋成熟。总政治部及各大单位的政治工作研究机构把军队政法工作作为研究的重要内容。中国法学会军事法学研究会创办了《中国军法》杂志。1993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西

安政治学院创建政法系(1994年改为军事法学系),这是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第一个培养高层次军队政法干部的教学和研究机构。1999年10月,西安政治学院又组建了刑事侦查学系,使军队政法工作的教学和研究更加专业化。这一阶段军队政法工作研究空前活跃,制定了一些法律、法规,编写了一些教材、专著,发表了一批高质量的论文,取得了史无前例的研究成果。

明确了新时期军队政法工作研究的指导思想 邓小平关于民主与法制的理论和依法治军的思想,江泽民关于加强军队法制建设的重要论述,为军队政法工作的研究明确了指导思想。1999年7月,总政治部《关于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军队思想政治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要发挥法规制度在思想政治建设中的作用,为拓展军队政法工作研究的领域指明了方向。

丰富了军队政法工作的理论 在深入进行军队保卫、军事审判、军事检察和军事司法行政工作研究的基础上,先后编著出版了《军队保卫工作学概论》、《军人违反职责罪》、《中国人民解放军审判工作史概述》、《刑事诉讼研究》、《中国军事司法制度》、《军队律师工作概论》等有关军队政法工作研究的专著。这一阶段还发表了一大批有关军队政法工作研究的学术论文。

完善了军队政法工作的法律体系 这一时期,国家和军队出台了一大批有关军队政法工作的法律和法规,主要有军队保卫部门行使侦察权、军事检察机关行使检察权、军事审判机关行使审判权等执行刑法、刑事诉讼法有关问题的规定。军队政法工作的上述研究成果,科学地总结了70多年来军队政法工作的实践经验,正确地阐述和概括了军队政法工作的历史发展、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为推动军队政法工作建设起到了积

极作用。

发展趋势 进入21世纪,军队政法工作研究将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加大力度,以为应用理论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应用理论研究将紧密联系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实际,为“打得赢”、“不变质”提供有力保证;改革创新将会更加深入,吸收和借鉴外军政法建设的有益成果,人民军队政法工作研究将会开创一个崭新的局面。

(李 昂 李自飞)

军队文化工作研究 (study of army's cultural work)

探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队文化工作理论与实践及其规律的活动。是军队政治工作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工作的形成发展、地位作用、性质、规律、原则、内容、方法、组织管理及发展趋势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工作研究大致可分两个历史时期:

革命战争时期的军队文化工作研究 这一时期的军队文化工作研究与军队文化工作的开展同步进行。1927年9月,毛泽东在进行“三湾改编”时规定,连队要建立士兵委员会,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组织领导士兵的娱乐活动。1930年,中共中央制定了《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其中包括《中国工农红军俱乐部列宁室工作暂行条例》,这是军队文化工作的第一个正式条例。《条例》明确了军队文化工作的任务、目的、机构、领导、活动方式等问题,使军队文化工作进一步规范化。1940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指出,革命的文化,是革命的有力武器。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阐述了革命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度,文

学艺术的源与流、普及与提高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提出了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1948年,总政治部颁发的《关于革命军人委员会(即战委会)条例草案》中规定,开展群众性文化娱乐、体育和学习活动是革命军人委员会的任务之一。革命战争年代的军队文化工作,形成了鲜明的阶级性、战斗性、群众性、娱乐性特点。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军队文化工作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在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关于部队的文艺工作》的报告,对文化工作的历史发展、基本特点,以及如何继续发展提高等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对部队文化工作的历史经验进行了认真的总结。1950年9月,总政治部设立了文化部,实施对全军文化工作及研究的组织领导。10月,总政治部召开了全军第一次宣教文化工作会议,提出“全面发展我军战斗性文化艺术工作”的方针,并明确指出:“文化工作是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54年,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总则中,把“不断提高全军人员的文化水平,开展文化娱乐、体育工作,使全军人员具有坚强的体质和高度的文化教育”,列为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为军队文化工作的发展和研究进一步指明了方向。1961年9月,总政治部召开全军文化工作会议,提出文化工作要“具有战斗性、群众性、多样性、经常性,同时要密切结合部队任务”。“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文化工作受到了严重摧残,1966年2月,在林彪支持下,江青主持制定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

工作座谈会纪要》,把建国以来的部队文艺界诬蔑为“文艺黑线专政”,使军队文化工作研究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军队文化工作研究在理论化、系统化、规范化上取得了重大进展。1979年12月,总政治部召开了全军文化工作会议。会议提出: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仍然是军队文化工作的根本任务;文化工作要出战斗力,必须解放思想,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来自“左”和右的干扰;必须把工作重点放在基层,面向连队等一系列基本原则。1986年至1989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共八册,汇集了革命战争年代军队文化工作的重要历史文献500余篇。其中有:聂荣臻的《红军时期的文化工作》、周恩来的《延安的文艺活动》、邓小平的《对晋冀鲁豫文化工作者的五点希望》、贺龙的《对晋绥文化工作者的讲话》等。1984年,南昌陆军学校、石家庄陆军学校、海军政治学校等首批开设了军队文化工作课。8月和10月,总政治部文化部、宣传部先后在南昌和石家庄召开了教材研讨会和教学研讨会。1996年1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总政治部文化部编写的《军队基层文化活动实用教程》,作为全军初级指挥院校(班次)教学和部队基层文化工作使用的统编教材。该教材概括总结了军队文化工作的历史经验,认为军队文化工作历史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形成了六项传统。三个时期是:红军时期——文化工作萌芽时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文化工作发展时期;建国以后——文化工作全面建设时期。六项传统是:坚持党的领导,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紧密结合部队的中心任务,保证出战斗力;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寓

教育于娱乐之中；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干部带头、官兵同乐；面向连队、为兵服务。该教材还探讨了军队文化工作理论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主要包括：军队文化工作的基本概念和范畴；军队文化的性质、特征和功能；军队文化工作的基本规律，地位作用和方针政策，基本任务和主要内容，一般形式和基本方法，主体和客体等。该教材对军队文化工作的专业知识也进行了具体研究。主要包括组织管理文化活动的知识和开展各种文化活动的知识与技能。前者包括管理连级、团级和团以上机关军人俱乐部的知识；组织各种文化活动，如大、中、小型晚会，各种体育竞赛等方面的知识。后者主要包括开展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体育等项活动所具有的知识与技能。1997年7月，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分册》，涉及军队文化工作的有34个条目。其中“军队文化工作”条目，对军队文化工作的定义、功能、机构、内容及发展简况作了准确的表述。80年代到90年代，全军机关、院校还编撰出版了一批有一定学术价值的著作、教材。如《军队基层文化理论与实践》、《军队基层文化工作》、《军队基层文化工作学》、《官兵文体活动大全》、《连队文化工作管理手册》、《部队基层体育竞赛方法》等。另外，《解放军文艺》、《解放军报》等报刊杂志也发表了一些有关文章，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

发展趋势 随着信息技术和知识军事的到来，军队文化工作将在促进部队全面建设、提高战斗力上发挥更大作用，军队文化工作与现代媒体技术将结合得更加紧密，网络技术将大大增加军队文化的传播速度，拓展影响空间，提高军队文化工作的效果。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队文化工作研究将继续关注以下几个方面问题：一是发挥军队文化工作的教

育功能与娱乐功能的关系问题；二是满足官兵文化需求与引导官兵文化消费的关系问题；三是军营文化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四是发展专业队伍与业余队伍的关系问题。

参考文献

《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

总政文化部编：《军队基层文化活动实用教程》，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6年。

（阙延华）

战时政治工作研究 (study of wartime political work)

探讨战争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基本理论、原则、制度和方法的活动。包括对作战中部队思想工作、党的建设工作、干部工作、安全保卫工作、文化工作、群众工作及瓦解敌军工作的研究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时政治工作研究大致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

革命战争时期的战时政治工作研究 北伐战争时期，周恩来在国民革命军中战时政治训练班上的讲话《国民革命军及军事政治工作》（1926年7月）、恽代英所作的报告《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方法》（1926年9月）、熊受喧作的讲演《国民革命军中之政治工作》（1926年10月）等，属于战时政治工作研究的开篇之作。其中，周恩来的讲话对战时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职能作用、工作范围、方法要求和政工干部自身建设等方面都作了原则性规范。熊受喧的讲演则首次提出了战时党的工作、政治教育工作、文化工作和民众运动工作的概念。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之后，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又称《古田

会议决议》，1929），对红军战时党的组织建设、党内教育、宣传工作、士兵政治训练、俘虏问题、军政关系等，从理论原则上进行了规定，成为战时政治工作研究的重要文件。1934年2月，周恩来在中国工农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所作的《一切政治工作为着前线上的胜利》报告和李卓然代表红一方面军所作的《战时政治工作报告大纲》，总政治部《在党的新任务面前红军政治工作的任务》等文件，也都是这一时期战时政治工作的代表作。其中尤其提出了开展军事民主，使战时政治工作紧紧围绕提高战斗力和保证作战胜利这个中心任务来展开的重要思想。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发表的《论持久战》（1938）、八路军政治部下发的《战时政治工作的几个基本问题和各种情况下的政治工作》（1938）和谭政《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1944）等，标志着这一时期战时政治工作理论研究所取得的新成果。尤其是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关于主观能动性、战争与政治、政治动员、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思想，使战时政治工作研究大大提高了理论层次。在此后的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实践经验的丰富与发展，对游击战、运动战、城市攻坚战、大兵团平原机动作战中的政治工作研究得到了进一步加强。综观革命战争年代战时政治工作研究，其特点是：为系统的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基本建立健全了与各种作战对象作战、遂行各种作战任务、运用各种战法中政治工作研究的总体框架；形成了群众性的研究队伍。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战时政治工作研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又相继完成了大规模边疆剿匪作战、解放沿海岛屿作战、抗美援朝作战、边境自卫还击作战和中小规模海空作战等，进一步为战时政治工作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1955年所作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总结》，1961年3月原志愿军政治工作领导人王平和梁必业所作的《发扬我军战时政治工作的威力》和《战时政治工作体会二十二条》、总政组织起草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政治工作总结》（1963）和《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政治工作经验》（1980）及《老山、者阴山对越反击作战给政治工作的启示》（1985）等，都为这一时期战时政治工作研究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上，《战时政治工作经验选编》（1981）、《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1984）、《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1985）、《战时政治工作研究》（1986）、《边境局部战争政治工作探讨》（1988）和《局部战争战役政治工作》（1992）、《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学》（1993）等史论著作，对战时政治工作的研究对象、主要任务、特点规律、组织领导和不同作战样式中的政治工作，都作了系统的分析研究，对濒海地区作战、热带丛林地作战、高寒地区作战、城市作战、出国作战、对外敌作战、各军种和兵种战役、坚固阵地防御作战、游击战、抗登陆作战、诸军兵种协同作战和其他特种作战中的政治工作，都作了专题研究，构建起了战时政治工作研究较为完整的体系。

1991年海湾战争以后，战时政治工作研究在中央军委提出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的指引下，着眼于新的作战对象、新的作战样式、新的时代条件和战场情况，重点对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战时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组织领导、实现形式、政治工作力量准备、具体的途径和办法等问题，进行了前瞻性的理论探讨。1994年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政治工作研究》、1998年海军政治学院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时政治工作历史研究》，汇集

了全军政治工作领域理论研究的新成果。战时政治工作研究在原有理论体系基础上,开始向战时国际国内军事法律法规、战场心理对抗、社会心理准备、市场经济条件下战争动员、现代联合战役中政治工作等新的领域拓展。其特点:一是主体研究向立足与强敌打高技术局部战争的方向转变。着眼于战略强敌,大力开展了全军防空袭作战中的政治工作,海战、空战、导弹战、电子战、信息战、心理战中的政治工作研究。二是拓展了研究领域,把心理学、人才学、行为科学、法学等与政治工作密切相关的新兴边缘学科引入战时政治工作,使战时政治工作理论研究呈现出多维度的发展态势。三是加强对外军政治工作的研究,使战时政治工作研究领域更宽,更面向世界。海湾战争后,国防大学率先制作了《海湾战争中美军战地政治工作》专题片,开设了“外军战时政治工作研究”选修课。军事科学院等研究机构,则跟踪外军战时政治工作最新发展,成为研究外军政治工作重要信息基地。

发展趋势 随着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世界军事变革的不断深化,战时政治工作将按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保持优势、创新发展的原则,围绕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这一重大历史性课题,深入探讨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给战时政治工作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拓展战时政治工作研究的新领域,探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战时政治工作的新特点、新规律、新手段、新方法、新对策,增强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战时政治工作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刘志富)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研究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PLA political work)

探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产生、发

展及其规律的活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内容主要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渊源、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创立和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历史经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及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新与发展,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历史事件、历史文献和历史人物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研究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

革命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研究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建立初期。1929年12月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系统地总结了红军创建初期政治工作基本经验。1936年12月,总政治部《在党的新任务面前红军政治工作的任务(草案)》中,首次提出了“宣传红军战斗的历史,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的命题。1937年2月19日,聂荣臻、邓小平等在《红军在新阶段的新问题与新工作——我们的意见》中指出:“在新的环境下与新的任务下,保持红军的传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要从加强传统的教育,保持部队各种传统的制度,发扬红色指战员友爱的关系等三个方面保持红军的光荣传统。1937年7月,彭德怀在云阳政工会议的讲话《红军改编的意义和今后工作报告大纲》,是红军“十年艰苦奋斗的总结”,其中就包括了红军政治工作历史的内容。他提出,红军的特长值得保留的有:艰苦奋斗,迅速机动,坚决勇敢的战斗作风;良好的群众关系,不侵犯群众的一针一线,替群众谋利益,因此到处得到人民的欢迎;自觉的纪律,革命的阶级友爱;最高度的团结和政治热情;没有白军的一切坏习惯,如嫖、赌、喝兵血等。1937年10月

25日,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指出,在1924年到1927年的时代,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组织新制度的军队,在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1927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天的八路军、新四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1939年9月,总政治部在《关于政治工作传统与作风的训令》和同年12月谭政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表的《论八路军政治工作的传统与作风》,被认为是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研究的代表作。其主要内容是:八路军、新四军的政治工作有着垂直的工作系统,有着完备的组织形式,其总的任务是从团结部队,融洽官兵感情,提高战斗力的目标出发,而能面向群众,将自己的工作直达连队;政治工作人员时时刻刻均能谨守着自己的岗位,每逢困难时候和危险场所,常常显示出他们坚定的节操与刚毅气概;有铁的政治纪律,这个纪律是建筑在自觉的原则上;共产党在八路军、新四军部队中保持着思想上的权威与政治领导,所有非党战士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各个连队保持共产党的组织基础,党的每个组织成员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和模范战士的面貌在一切场合进行活动,使政治工作的下层基础得到充实等。1944年4月谭政受中共中央委托,代表八路军驻陕甘宁边区后方留守兵团政治部,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被认为是对中国共产党自创建革命军队的革命的政治工作,历经北伐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历史性总结。《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从它参加与领导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以来,从它参加与领导为这个民族民主革命而战的革命军队以来,就创设了并发展了军队中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拿了这种革

命的政治工作去和革命的军事工作相配合,就成了革命军队的全部工作。北伐战争时期,共产党人在国民革命军中所指导的政治工作是这样做的,国内战争时期与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在过去的红军中与现在的八路军新四军中所指导的政治工作,更是这样做的。共产党人在这三个时期的革命军队中所做的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都是收到了成效的。”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研究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1965年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的研究基本上是包含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和战史的研究之中的,并没有开辟单独的研究领域,亦未形成独立的、比较系统完备的理论和学科体系。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研究工作基本停滞。

1978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针对军队政治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林彪、“四人帮”破坏,优良传统严重失传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重大课题,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的研究。从1979年开始,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军队政治工作教研室便组织力量,开始了编纂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和编写《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的工作。1982年1月,战士出版社出版了姜思毅主编的《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第一部大型史料汇编,共13册,汇集了自中国共产党参加和领导中国民主革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20多年间的重要历史文献和历史资料,计1500余万字。1984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完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的编撰工作,并由该院出版社出版,这是第一部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的史学专著。1985年,国务院国

家教育委员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正式列入军事学学科门类中政治工作学的二级学科。1987年12月,国家教育委员会在《军事学·专业目录修订方案》中,对其研究的意义作如下介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有着它自己的渊源和独特的发展道路。其政治工作史是一般革命史和军事学术所不能代替的。在新的历史时期,要继承和发扬军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加强和改进军队政治工作,必须深入研究它的历史渊源和创立、形成、发展的客观规律。”1989年5月,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至此,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基本形成。在此期间,《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分册》和《当代中国》丛书、《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等,均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的研究列为重要的研究内容。同时,《解放军报》、《军事历史》、《军史资料》等报刊也发表了一些有关研究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文献、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文章。上述研究主要取得了如下成果:

基本统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的概念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是关于研究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它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发展历程的概括和基本经验的系统理论总结。

明确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的学科地位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指导人民军队建设和人民战争中,创造的革命政治工作科学理论的历史科学,是军队政治工作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科学。相对于中国共产党党史,它是一种专门史,是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研

究党的建设和党的工作在军队建设中的实践及其规律的科学;相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它是一个方面史,是军史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关于研究军队政治建设、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历史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以党史为背景,以军史为线索,总结历史经验,探索发展规律,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研究的基本思路。

基本统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的研究对象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以中国共产党创立的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的全部发展过程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包括:军队政治工作的历史渊源;军队政治工作的创立、形成和发展;军队政治工作的理论、组织、方式方法、制度和作风的产生和发展;军队政治工作在宣传、组织、干部、保卫、群众、文化、敌军和联络工作等方面的产生和发展;政治机关及其工作、部队平时建设和战时的政治工作,以及各军兵种政治工作的产生和发展等各个方面、不同层次的历史;军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基本经验;军队政治工作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要会议、重要文献和重要人物,等等。

基本统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的学科体系 即记述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全部历史过程的通史;记述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某一方面的发展历史的专门史,如组织工作史、思想(宣传)工作史、干部工作史、群众工作史、文化工作史、保卫工作史和战时政治工作史,以及海军政治工作史、空军政治工作史,等等;政治工作史料汇编;政治工作大事记;政治工作人物传记;政治工作史论等六部分构成。

明确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的作用 探讨和把握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指导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实践,学习和研究政治工作学的基础理论,

对提高政治工作理论科学性的认识与把握,继承和发扬政治工作优良传统,促进政治工作的改革和创新等方面,均有重要意义。

发展趋势 在军事科学研究领域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还是一个年轻学科,对它的研究时间还不长,还不够系统、全面与深入,有许多领域和方面都有待于开发和深入研究。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的研究将更加注重政治工作历史经验、优良传统和发展规律的研究,更加注重政治工作史对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指导意义和作用的研究,进一步促进军队政治工作的改革与创新。

(常永富)

军事心理学研究 (study of military psychology)

探讨军事活动中人的心理现象及其规律的活动。是介于军事学和心理学之间的边缘学科研究。其研究对象主要有:作战心理、军事教育训练心理、心理战、军队管理心理、军队思想政治工作心理、军事工程心理、军人心理选拔、军人心理卫生。

军事心理学的研究从19世纪末开始趋向理论化和系统化。20世纪30年代,军事心理学开始传入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由于种种原因,军事心理学研究一度处于空白状态。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国家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入,为适应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军事心理学的研究在中国获得了发展的机遇。至80年代中期,中国军事心理学研究出现了热潮,主要标志是: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军事心理学》(1986);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军事心理学概论》(1986)、《军事心理学教程》(1988);军事科学出版社的《军事心理学教程》(1988)。这些著

作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军事心理学的研究,注意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结合,突出了和平时期军事心理研究的特点,着重研究了军事教育心理;军事教学心理;军人的心理训练;军人的德育心理;军人的心理选拔;军人的服役、成才心理;军人的恋爱、婚姻心理;军人集体心理;军队领导心理;作战决策心理;战时心理反应及其调控;战争宣传心理;军事伪装心理等问题。

90年代,心理战的研究成为中国军事心理学研究的重点。1997年4月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心理作战思想》和《不战而屈人之兵——中国古代心理战思想及其运用》两本著作。1997年8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高技术条件下心战与反心战》一书,该书研究的主要问题是:高技术条件下心理战的特点;高技术条件下心理战对军人心理的挑战;高技术条件下的政治心理战;高技术条件下的军事心理战;高技术条件下的宣传心理战;高技术条件下心理战发展的趋势;高技术条件下战争与军人心理素质;高技术条件下的反心战教育;高技术条件下的反心战训练;高技术条件下的反心战建设等。特别是对高技术条件下心理战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大胆的探索,提出了高技术条件下心战与兵战趋向一体化,心战器材趋向智能化,心战宣传手法趋向新闻化等新观点。

为了适应未来高技术战争的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军事心理学的研究和应用日渐广泛。1998年12月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联合发出通知,把“军人心理学”和“思想政治工作心理学”列为全军各类军队院校政治理论课的两门必修课。全军不少单位在军事训练科目中增加了心理训练内容,还有不少单位积极开展心理战和反心战的理论研究及应用研究。21世纪初,军事心理学的研究前景十分广阔。

参考文献

刘红松、李青扬、林建公等著：《军事心理学百题》，北京：科学出版社，1988。

(马 忠)

军事人才学研究 (study of military talent science)

探讨军事人才本质及其成才规律的活动。研究内容主要有：军事人才学的基本理论，包括军事人才的本质、特征、分类、价值，军事人才思想，军事人才史；军事人才的成才规律，包括成才内因、外因的结构及其相互关系，成才途径、成才策略、军事人才培养；军事人才的管理规律，包括军事人才群体结构及其优化，军事人才识别、使用、交流的理论与实践，军事人才的发展战略等。军事人才学是在现代科学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基础上产生的新学科，突出特点是综合性、阶级性、时代性。其主要理论来源是人才学和军事学诸学科，并且还要借助教育学、心理学、生理学、管理学、历史学、文学和系统论等相关学科的知识。

研究概况 军事人才学是随着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应运而生的，至2000年大体经历三个阶段：

酝酿探索阶段 1979年底，受人才学创立和发展的影响，军事人才的研究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1982年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55周年，《人才》杂志专题组织了研究军事人才的稿件，探讨现代战争对军事人才的素质要求及其德才结构。1985年7月，《解放军报》发表《军队应该创立自己的军事人才学》一文，对军事人才学的研究内容、创建意义及学科特点作了阐述，这实际上是军事人才学诞生的先声。

学科初创阶段 创立军事人才学的建议一经提出，立即得到了积极响应。1984年11

月，以沈阳军区为依托，成立了《当代军事人才丛书》编辑委员会。1986年8月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军事人才学概论》。1988年12月，空军政治学院将校内教材定稿为《军事人才学引论》，由能源出版社出版。这两部著作的出版，标志着学科的正式建立。

发展丰富阶段 此后，一些军队院校适应培训任务需要，陆续开设了“军事人才学”课程，编写了一批学术性较强的教材。1988年在军队政治工作学专业下，开始招收军事人才管理研究方向的硕士生，1996年招收博士研究生，这标志着军事人才学教学体系的完善。90年代末，军事教育学会召开了跨世纪军事人才研讨会，围绕21世纪军事人才素质要求及其培养，形成了一批成果，对军队院校的教育改革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研究成果 十多年来，军事人才学研究发表论文数千篇，出版教材、专著十多部，主要的学术成果体现在以下方面：

构建了军事人才学的基本框架 《军事人才学概论》和《军事人才学引论》，概述了军事人才思想的发展，分论了军事人才的分类、成才过程、成才内因与外因、成才道路与成才策略，科学技术、战争、军事训练、院校教育与军事人才成长的关系；探索了成才规律和军事人才的特殊才能；分析了军事人才群体结构、使用管理问题，为创立军事人才学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军事人才学》(1990)，对研究对象、范畴、体系做了深入阐述，分门别类地论述了军事领导人才、军事科技人才、军地两用人才，未来军事人才的含义、作用、内在因素构成及其发挥；研究了军事人才开发、培养、识别、任用、激励、竞争、流动等环节；前瞻性地研究了军事人才立法、军事人才心理、军事人才的自我修养等内容，建构了军事人才学理论体系的新框架。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军事人才学基础》

(1991),分总论、价值论、成长论、管理论、开发论五编,对军事人才价值及其性质、价值实现、价值评价,成才规律的表现形式以及新型军事人才开发等问题,提出了新的观点。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军事人才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2000),在吸收已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探索了高技术战争对军事人才的素质要求、军事教育改革,军事人才的创造力与创造性思维、军事人才的流动、竞争与激励等问题,是最新的军事人才学术成果。

界定了诸多基本概念 军事人才学从学科创建开始,就注意对基本概念和原理的研究。关于研究对象,从军事人才矛盾运动的特殊性出发,定位于军事人才的本质及其成才规律和管理规律,从而突出了与普通人才学的区别,确立了军事人才学独立的学科地位。关于军事人才概念,紧紧抓住了“为军队建设和保卫祖国的事业”、“军事创造性劳动”、“作出较大贡献”这些关键要素,从本质上揭示了军事人才的特殊属性。关于军事人才的群体结构,运用系统论的原理,不仅分析了构成要素,还研究了军事人才群体与一般人才群体的差别及其优化,对在实践中搞好群体优化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关于军事人才价值,从军事劳动的特点入手,概括了与一般人才价值区别的特殊性在于:军事人才价值的最终体现是国家安全与和平;军事人才的价值难以用金钱和地位来衡量;军事人才价值的实现充满牺牲和奉献;军事人才价值实现的途径与类型,价值评价的标准与方法等深化了对军事人才本质的认识。这些基本概念的科学界定,为深入研究和完善学科体系奠定了基础。

探索了军事人才的成才规律 军事人才的运动规律是一个多层面、多角度的系统。既有“人成其才”的规律,又有“人尽其才”的规律,还有“人才辈出”的规律。现有研究重点探

索了“人成其才”的基本规律,在“军事人才成才规律就是内外因综合作用的过程”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内外因综合效应的过程、条件,实践在内外因综合效应中的决定作用,并进一步归纳了成才规律的表现形式。虽然对军事人才学规律的研究还只是局部的、浅层次的,但抓住了军事人才成长发展过程中本质的联系,体现了这一事物运动的特殊性、必然性。

研究了一些重大现实问题 在学科创建初期的研究中,突出了现代战争对军事人才的素质要求。海湾战争之后,研究重点转向了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军事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对高技术战争与军事人才的研究,主要是探讨高技术战争对军事人才的素质要求,人民解放军军事人才队伍建设面临的主要差距,军事人才培养中通才与专才的关系,全面提高军队干部队伍素质的措施以及面向21世纪的发展战略等问题;关于市场经济与军事人才的研究,主要是探讨军事人才队伍的稳定,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事人才,军事人才管理法制化及其发展战略等问题。面向现实重大问题的研究成果,对改革军事人才队伍建设方面的政策制度起到了推动作用。

发展趋势 未来军事人才学研究,将深化基本理论研究,加强应用理论研究,不断创新研究方法,继续吸收相关学科的最新成果,使这一新兴学科理论更加丰富和完善。

参考文献

于大潜、王长林、王小夫著:《军事人才学概论》,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

裘克人等编著:《军事人才学引论》,北京:能源出版社,1988。

王日中、瞿定国著:《军事人才学》,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

阎宝珠主编:《军事人才学基础》,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

王日中主编:《军事人才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0。

高建国著:《21世纪中国军事人才发展战略构想》,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9。

(何经耀)

军事后勤研究

(study of military logistics)

探讨武装力量后勤活动规律,指导军事后勤实践的活动。军事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发展概况 中国在20世纪初开始进行军事后勤研究。清朝末年,一些新式军事学堂中进行了后勤分科教学,并开设了专门的后勤学校,如军医学堂、马医学堂、军械学堂、经理学堂等。但当时只是照抄照搬西方的教材进行讲授,并没有从理论的高度认识军事后勤的意义。中华民国时期,在吸收引进西方后勤理论上有了较大进展。不仅大量翻译引进外国的后勤著作,如《日本辎重勤务之参考》(1932)、《苏联部队后方勤务》(1945)、《美军后方勤务》(1947)等,而且开始了全面系统的研究。陆续出版了大量后勤方面的专著和教材,如李国良的《后方勤务讲稿》(1934)、田见龙的《后方勤务概说》(1936)、刘席儒的《后方勤务》(1939)、谭家骏的《后方勤务教程》(1942)、赵桂森的《后方勤务之研究》(1947)等。这些著作已经开始研究军事后勤的基本概念、特殊本质、学术分类、发展演变、地位作用、结构要素以及与相关系统的关系等基本理论问题。后勤各专业勤务和后勤历史方面的研究也有不少著作问世。如陆军大学编写的《兵站勤务》(1930)、史国藩编写的《卫生勤务》(1934)、赖恺元等编写的《交通学教程》

(1934)、游凤池编写的《输送学》(1935)、朱和生编著的《汽车学教程》(1940)、军需学校编写的《被服经理教程》(1940)、孙兴明、张文欧编写的《军械勤务》(1947)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纪元。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除了研究和遵循一般战争后勤工作的规律外,还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总结出一系列独具特色的人民战争的后勤理论原则,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1933年,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曾强调,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并围绕保障第五次反“围剿”的胜利,论述了经济工作与革命战争中心任务的辩证关系。1934年,周恩来在中国工农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演说中,阐明了后勤与政治工作的关系,强调政治工作要迅速、准确、有效地保障经费、粮食、被服、弹药及一切资材的筹集、制造和供给。1939年,叶季壮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表《关于八路军的供给工作和供给制度》一文,论述了八路军供给工作的概念、优点、对供给工作地位作用的认识以及建立各项供给制度问题。1940年,叶季壮又在同一刊物上发表了《论战时供给工作》一文,系统论述了战斗(战役)前的准备工作、战斗时和战斗结束后的供给工作。1940年12月,彭德怀、杨立三、左权、罗瑞卿等领导人在八路军总部与129师后勤会议上分别发表了《建军的三大任务之一——加强后勤工作建设》、《后勤工作报告》、《论我军的后勤建设》、《关于后勤工作诸问题》的讲话,对后勤工作的地位作用、特点、任务,后勤部门与其他部门的关系,后勤政治工作,后勤工作制度,后勤人员素质,后勤领导要诀等,进行了全面论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次对后勤工作进行的系统的专题研究和总结。1948年,杨立三在一次讲话中,专门论述了后勤在

大规模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指出,如果没有完备而有力的后勤工作,就不可能进行大规模战争,更谈不上组织战争。更加大量的关于后勤工作的理论阐述散见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的著作、讲话和文电中。例如,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中也包含着后勤理论原则等。由于战争年代的特殊环境,这些后勤理论无法按照学科的要求进行系统整理、总结和出版,后勤研究始终没有作为一个独立学科被提出来。但这一时期的军事后勤实践和军事后勤思想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后勤学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任务由夺取全国政权转变为保卫人民革命和国家建设成果,保卫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军队自身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提上日程,后勤的任务也随之发生变化。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的实践,使全军对后勤地位作用的认识产生了一次飞跃。毛泽东明确地提出后勤是一门“重要的专门的科学”,军队随之按正规化的要求组建了各种后勤院校和科研机构,开始系统地进行后勤理论教育和科学研究。这一时期的后勤学科建设随着国际形势和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出现了某些曲折,但仍取得了一些成绩。50年代,主要是学习苏联经验,编写了系列成套的后勤教材,到1955年底,出版了341种,基本达到了专业勤务与后勤指挥衔接、战术与技术配套的要求。1959年又重新全面编审、编写各类教材1000余种,约1350万字。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集中力量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后勤工作的历史经验”,编写了《后勤历史资料选编》21册,为研究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提供了翔实的资料。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的“文化大革命”中,后勤院校教育和科学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

态。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中被撤销的后勤院校和科研机构相继得以恢复,后勤院校教育和科学研究重新走上正轨。在继续总结中国革命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后勤工作经验的同时,还开始了现代战争后勤理论和外军后勤的研究。总的来看,这一阶段的军事后勤研究的重点,是总结历史经验和为了应付战备需要而进行的应用理论研究。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军事科研领域逐步打破了多年来的封闭状态,国外大量的后勤专著、论文、条令条例被介绍到中国来,中外军事交流也开始活跃起来,大大开阔了中国军人的眼界,使研究人员能够站在当代世界后勤科学的前沿思考问题,后勤基础理论研究日益得到重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越来越协调,群众性的后勤学术研究活动也空前活跃。到1985年底,全军各级后勤机关已有后勤学术委员会20多个,后勤学术研究领导小组100多个,学术研究小组500多个,拥有理论研究骨干5000多人。总后勤部的“六五”、“七五”学术研究规划在统筹全局的前提下,重点加强了后勤基础理论研究,《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后勤保障丛书》、《新时期军事后勤理论丛书》等相继出版发行。1985年2月16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将军事后勤学列为军事学的一级学科,正式确立了后勤科学在中国军事科学体系中的地位。1986年,军事后勤学作为一个研究项目被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期间军事学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1989年10月,由秦启尧、宋学先主编的中国第一部《军事后勤学》出版。1990年12月,由孙秀德主编的《军事后勤学》出版。随后,后勤各专业勤务的理论专著也陆续出版。在新的后勤理论的支撑下,一些指挥院校开始招收军事

后勤学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这一切都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层次、多学科的军事后勤学体系正式形成。

知识体系 经过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近 20 年的耕耘,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后勤理论已经形成包含基础理论学科、应用理论学科和工程技术在内的庞大的知识体系。

后勤基础理论 主要包括军事后勤史、军事后勤基本理论、军事后勤哲学方法论等。军事后勤史研究通过大量的关于战争的历史现象、历史事件,探讨后勤活动的经验教训和发展规律。军事后勤基本理论则运用包括历史方法在内的各种研究方法,揭示后勤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规律,主要包括后勤的性质、特点、内部结构、地位作用、历史演变规律、发展趋势、基本矛盾,以及后勤与相关事物的外部联系等。军事后勤哲学方法论是连接后勤科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桥梁,主要解决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认识后勤,以形成科学后勤观的问题。

后勤应用理论 通常根据层次、应用对象、专业来划分。其共同任务是:运用后勤基础理论的原理,结合应用对象的实际,研究后勤的指导原则、方法和措施。目前形成的主要理论有:①后勤建设理论。以后勤保障力量的创置、积累和发展为研究对象,包括后勤装备、设施、物资、组织、人才、法规建设等方面的内容。②后勤指挥理论。以后勤的组织领导活动为研究对象,包括后勤指挥原则、指挥组织、指挥程序、指挥手段、指挥控制与决策、指挥自动化等方面的内容。③后勤管理理论。以后勤管理为研究对象,研究管理科学的原理在后勤的应用。包括后勤管理思想、管理方法、管理机制等方面的内容。④战略、战役、战术后勤理论。以不同层次的后勤活动为研究对象,分别研究战争全局,战役、战斗的后勤建设,后勤保障和

后勤指挥等问题。⑤后勤各专业勤务理论。以某一专业勤务的组织管理和运用为研究对象,例如军队财务理论、卫生勤务理论、军械勤务理论、军需勤务理论、军队油料勤务理论、军事交通运输理论、军队基建营房勤务理论、军队仓库勤务理论等,分别研究各专业勤务领域后勤工作的特殊规律。⑥各军种、兵种后勤理论。以某一军种、兵种后勤活动为研究对象,例如海军后勤理论、空军后勤理论、战略导弹部队后勤理论等,分别研究各军种、兵种后勤工作的特殊规律。

后勤工程技术 是直接产生后勤保障能力的知识体系。主要研究现代工程技术在军事后勤领域的应用。其理论体系形成既受后勤专业的影响和制约,又受相关工程技术学科的影响和制约。目前在后勤各个专业勤务领域都已形成若干后勤工程技术学科。例如,军队卫生勤务领域的野战内科学、野战外科学、军队卫生学、军事毒理学、放射医学、军事航空医学、海军医学等;军需勤务领域的军事营养卫生学、军用食品学、军队被装工效学等;军械勤务领域的枪械学、弹药学、弹道学、雷达学、军械维修工程学、故障检测学等。

主要特点 中国军事后勤理论的主要特点是:①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认识后勤的理论基础。在认识后勤发展演变规律的方法上,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全面客观地分析古今中外的各种历史现象,既摒弃西方后勤学论著的“欧洲中心论”的片面性,又反对“唯我独尊”的倾向。在认识后勤的普遍联系上,坚持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从后勤事物的内容和形式、本质和现象、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对立统一中,揭示其内在的规律性。因此,它总结的后勤基本规律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②紧密结合中国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强调将普遍原理与中国军事后勤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特别是后勤应用性的指导原则、方法

和措施,在正确认识普遍规律的基础上,坚持与中国的国情、军情相符合,并随着不同时代国情、军情的发展变化而修正。它提出的后勤指导原则主要是为中国未来的反侵略战争服务的。③适用于“以劣胜优”的正义的人民战争的后勤指导。中国军事后勤理论体系形成的实践来源主要是中国革命战争和反侵略战争。装备上始终是“以劣胜优”,后勤力量来源主要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后勤理论对世界军事后勤理论的贡献,除了基础理论的普遍指导意义外,其后勤应用理论则比较适用于反侵略性质的人民战争的后勤指导。

发展趋势 随着世界范围的新军事革命的兴起,以及高技术军事领域的应用,后勤保障对象、内容、环境、手段、方式已经和正在发生重大变革,后勤理论特别是应用理论的全面创新势在必行。计算机、互联网等先进科研手段广泛应用于后勤科研领域,军事后勤研究将更多地采用定量分析、模拟仿真等先进技术和方法。

参考文献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辑:《当代中国军队的后勤工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秦启尧、宋学先著:《军事后勤学》,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

孙秀德主编:《军事后勤学》,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

(宋学先)

战略后勤研究(study of strategic logistics)

探讨全局性后勤活动规律,指导全局性后勤实践的活动。后勤理论研究的组成部分。目的是对战略后勤实践经验进行概括和总结,它对于指导战略后勤建设,提高战略后勤保障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战略后勤研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中国古代兵书战册和诸子百家著作中,记载着大量的有关战略后勤的思想观点。主要强调:地,即根据地(如刘邦的关中,刘秀的河北);力,即军事实力;粮,即粮食储备。这些构成了中国古代战略后勤理论的基础。进入20世纪,中国军事理论界的有识之士,汲取古代战略后勤思想,在西方先进后勤思想影响下,提出了自己的战略后勤主张。一是采用西方武器装备,从国外购买船、炮、枪支和弹药,同时筹办军事工业;二是修建铁路改善军事交通;三是改革后勤体制,按西法编设后勤部队。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非常重视发展国家经济,增强国防实力。认为战争不仅是军力的较量,也是经济力的较量,没有强大的国家经济,就不可能有强大的国防。30~40年代,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和各军事院校编写或翻译的《政论与战略》、《论战争与交通》、《交通决胜论》等军事理论著作和教材中,对战略后勤保障的有关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和论述。主要强调:要发展国家经济,兴建军事工业,加强后勤建设;要重视后勤在战争中的作用;要搞好战略物资储备,加强交通运输建设等,基本反映了当时战略后勤保障理论研究的概况。中国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战争后勤思想和战略后勤指导原则。主要是:依托革命根据地实施后勤保障;武器装备主要取之于敌;依靠人民群众支援战争;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国家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战略后勤理论有了很大发展,主要表现在:①充分利用和平时期的有利条件,集中力量搞好经济建设,为国防力量的长远发展创造条件,从中也为增强后勤保障能力奠定基础。②根据国际形势变化,及时裁减军队,把军费降低到

一个适当的水平。③保持足够的人力、物力以满足当前军事斗争任务的需要和应付外来敌对势力的突然袭击。④认真研究新情况和新问题,加强后勤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

随着战略后勤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一些战略后勤理论著作相继出版,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后勤理论体系日臻完善。代表著作有:1983年后勤学院编纂的《战略后勤学》,1988年后勤学院编著的《后勤发展战略概论》和阎家泰编著的《战略与资源》,1990年吴宝森、李平恩合编的《战略后勤学》和孙秀德主编的《战略后勤学》等。这些理论著作,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对战略后勤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其主要内容和观点有:①战略后勤研究主要探讨全局性的后勤工作指导规律。其内容包括:战略后勤理论的产生与发展,战争特点与战略环境对军事后勤的影响,战略后勤指导,后勤体制建设,国防经费,军工生产,战争后勤动员,战略后方基地建设,战略物资储备,医疗、交通运输等专业勤务支援保障,军种后勤、战区后勤建设等。②战略后勤应贯彻依据军事战略方针,依靠国家整体力量,立足各种战争背景指导战略后勤建设与保障的原则。③后勤体制建设必须适应人民战争需要,形成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保障体系;适应联合作战的需要,优化组织机构,便于集中统一指挥;适应高技术局部战争需要,增强后勤保障的适应性,便于组织快速保障。④国防经费分配与使用,应坚持宏观控制,优化结构;保障重点,兼顾一般;量力而行,尽力而为;计划管理,厉行节约的要求。⑤军工生产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平战结合、军民结合;以工业现代化建设为基础,兼顾军需与民用的指导原则。⑥后勤动员应坚持就近划区,提高时效;军民兼顾,认真准备;加强控制,适量适度;制定法规,完善体制的

基本要求。⑦战略后方基地建设应统筹规划,合理布局,与国民经济建设密切配合,要配套综合,具有全面保障能力,要分清主次缓急,突出建设重点,保持稳定,确保安全。⑧战略物资储备,应区分国家储备、动员储备、军队储备。

随着高技术的发展和信息时代的到来,战略后勤理论将注重从以下方面研究:①研究和平时期,国家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如何依托国力的增长,增强后勤保障的实力和潜力,为战争奠定物质基础。②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认真研究新时期军队战略后勤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和规律,加强战略后勤的现代化建设,努力提高后勤保障效益,满足当前军事斗争的需要和做好应付外来势力入侵的准备。③研究高新技术的发展和在战略后勤领域的应用,探讨战略后勤如何适应高技术局部战争需要。

参考文献

孙秀德主编,《战略后勤学》,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

(石文年)

战役后勤研究 (study of campaign logistics)

探讨战役后勤活动规律,指导战役后勤实践的活动。后勤理论研究的组成部分。目的是对战役后勤实践经验进行概括和总结。它对于指导战役后勤建设,提高战役后勤保障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战役,在古代战争中已开始出现,随之逐步产生了指导战役后勤保障的一些理论原则。近代以来直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工业革命带动了经济的发展,使军队的武器装备、作战方式和组织编制都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战役规模不断扩大,战役样式越来越多样

化;战役后勤与战略后勤、战术后勤的分工也越来越明显。与此相适应,战役后勤理论的研究相继提出了兵站、基地、兵站线、兵站运输网、划区保障等新概念,并逐步形成了与战略、战术后勤不同的、内容独特的战役后勤指导原则,标志着战役后勤理论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20世纪30年代以后,陆军大学编写的《兵站勤务》(1930)、《兵站勤务附录》(1943)、游凤池编写的《输送学》(1935)、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编写的《后方勤务摘要》(1938)、赵桂森编写的《后方勤务之研究》(1947)等后勤理论著作和教材中,虽已正式提出了兵站、兵站线、兵站运输等与现代战役后勤相同的一些概念,但仍未形成系统的战役后勤理论体系。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役后勤理论研究是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开展的,逐步形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役后勤理论。其要点是:充分依靠战区人民支援;建立网状的后勤部署;划区保障与按建制保障相结合;取之于敌、就地取给与后方供应相结合;军民联防,保卫后方安全等。解放战争中,辽沈、淮海、平津等大规模战役后勤保障实践充分证明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后勤理论的先进性和对中国具体情况的适应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后勤研究空前发展,在总结陆军战役后勤理论的基础上,其他军种战役后勤理论研究的内容不断充实,战役后勤理论体系日趋完善。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后勤基础理论研究不断深化,各种战役后勤的理论著作相继出版。其代表著作有:后勤学院编著的《战役后方勤务总则》(1985),国防大学编著的《战役后勤学》(1987),后勤学院编著的《战役后勤学》(1988),张荣成等主编的《局部战争战役后勤保障》(1994)。这些著作以战役后勤

的理论与实践为研究对象,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对战役后勤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其主要内容和观点是:①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出现了带有战役后勤某些特征的保障活动,但尚未形成独立形态。直到19世纪后期,战役后勤作为联接战略后勤和战术后勤的纽带,才形成相对独立的形态,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战役后勤理论基本形成。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后勤理论萌芽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中得到较大发展,到80年代中后期初步形成战役后勤理论体系。②未来战争前后方无显著差别,后方也将成为重要战场;战役规模大、耗损多、伤亡多,后方保障任务繁重;战役空间大,多种作战手段综合运用,后方保障具有多样性;战役节奏加快,战场情况多变,后方工作紧张、复杂等。③战役后勤必须贯彻“整体保障”和“全面持续保障”基本思想,并应坚持根据战役决策,组织后勤保障;积极准备,力争主动;全面规划,重点保障;依靠军民整体力量,提高保障能力;加强后勤整体协调,讲求保障效益;实行整体防卫,强化后勤生存能力的战役后勤保障基本原则。④战役后勤组织结构应分为战区后勤和集团军后勤(包括海军基地后勤,战区空军后勤,战略导弹部队基地后勤,省军区后勤等)两级。战役后勤部署应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和适应性,通常有网状部署、按方向部署和成梯队部署等形式。⑤战役后勤的基本任务是从物资、经费、卫生和运输等方面,巩固和增强部队的战斗力,保障战役作战任务的完成。⑥实施战役后勤指挥,必须坚持审时度势,最佳选择;关照全局,掌握关节;集中统一,机断行事;坚定灵活,连续稳定的指挥原则等。

现代军事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将促使战役后勤研究有较大发展。其趋势是:①后勤保障如何适应高技术条件下战役样式、战法和战

场环境的变化,将成为战役后勤研究的主要内容。②战役后勤组织指挥将重点探讨如何采用高技术的信息保障手段以及由此引起的后勤指挥方式的变革。③高技术武器对后勤的威胁及应采取的防卫对策研究将在战役后勤理论中占据更重要的地位。④高技术条件下如何坚持人民战争思想,发挥战区军民整体力量优势,将是人民战争战役后勤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参考文献

后勤学院编写:《战略后方勤务总则》,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

孙秀德等主编:《战役后勤学》,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石文年)

战术后勤研究 (study of tactical logistics)

探讨战术后勤活动规律,指导战术后勤实践的的活动。后勤理论研究的组成部分。目的是对战术后勤实践经验进行概括和总结。它对于指导战术后勤建设,提高战术后勤保障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战术后勤研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古代,战术后勤的理论散见于史书和各种兵家著作。进入20世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火器在军事上的广泛运用,使战术后勤无论从保障体制、保障内容和保障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战术后勤理论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在中国,20世纪30~40年代,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各军事院校编写的《后方勤务》、《军需勤务》、《军械勤务》、《卫生勤务》等后勤理论著作和教材中,对战术后勤保障体制、保障内容和保障方式都有系统的研究。随着军队和战争的规模不断扩大,战略后勤、战役后勤和战术后勤逐步有了明显的区分。在战术范围内,后勤保障

已形成集物资、医疗、技术和运输等主要内容的综合勤务,一批战术后勤理论专著、条令和教程也相继产生,这标志着战术后勤理论开始与战略、战役后勤理论相区别,逐步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比较系统的研究领域。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术后勤研究,是在系统总结中国长期革命战争后勤保障经验的基础上,汲取古今中外后勤保障的经验,并加以再认识而逐步展开的。在战争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积累了丰富的战斗后勤保障经验,比如依靠根据地军民整体力量支援前线的思想;实行官兵一致、经济民主的制度;战术后勤依托兵站线组织供应等。1953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相对和平的建设时期,军队院校和研究部门全面开始了后勤理论研究,20世纪60年代编写了《步兵师(团)后勤组织与工作》、《军、师、团、营在战斗中后方组织与工作》等一批战术后勤理论专著和教程,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战术后勤指挥、保障的内容和方法。70年代初,总后勤部在进一步总结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保障经验的基础上有选择地汲取外军经验,组织编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合成军队战术后方勤务概则》,对合成军队师、团战时后勤指挥和各项保障的一般原则与方法等进行了规范,从而使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术后勤理论更加系统化。7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全面展开,战术后勤理论研究也取得长足的进步。一批战术后勤理论教材和著作相继出版,标志着战术后勤理论的内容更加充实、完善,形成了比较完整、系统、具有中国特色的战术后勤学理论体系。其代表著作有:1984年后勤学院编著的《合成军队战术后方勤务概则》、《陆军师坚固阵地防御战斗后方勤务》、《陆军师进攻战斗后方勤务》,1987年编著的《战术后勤学》以及与之配套的各种勤务教材等,都以战斗后勤的理论

实践为研究对象。其主要内容和观点有：①战术后勤研究的任务是揭示战术后勤活动的本质、规律，说明它的状态及与其他事物的内部联系，寻求指导战术后勤活动的方针、原则和保障方法。②战术后勤作为军队后勤系统的一个层次，可区分为陆军战术后勤、海军战术后勤、空军战术后勤，进而又可区分为兵种战术后勤。现代战斗是诸军兵种合同战斗，必须重视研究合同战斗后勤保障的理论和实践问题。③现代条件下，战术后勤具有战斗突然性增大，后勤准备时间缩短；战斗高消耗、高需求，后勤保障任务繁重；诸兵种作战，后勤组织指挥复杂；受敌直接威胁增大，后勤防卫任务艰巨；战场环境险恶，火线保障困难等特点。战术后勤应确立全纵深、全方位、全过程合成保障的思想，建立诸兵种一体，保障与防卫一体的合成保障体系，科学地运用各种保障手段，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通过集中统一不间断的协调，发挥整体功能，对战斗实施有效后勤保障。④战术后勤必须遵循根据作战决心，组织后勤保障；预先准备，力争主动；统一指挥，密切协调；统筹兼顾，保障重点；抓好运输环节，确保前送后送；加强后勤防卫，保障后勤工作顺利实施；厉行勤俭节约，实行科学管理；依靠地方支援，增强保障潜力的保障原则。⑤现代战场情况复杂，战斗发展迅速，情况变化突然，立体防御，立体进攻，立体摧毁。战术后勤指挥必须实施统一、及时、坚定、灵活、不间断的指挥；要照顾全局，掌握关节；要不断提高后勤指挥效能，从而使整个后勤指挥系统成为既能集中统一，又具有机动灵活、高效率的后勤指挥中枢，能对各种情况作出快速反应和处置。

随着技术装备、作战行动等的发展变化，未来战术后勤活动将出现许多新特点，这些新特点将决定和影响战术后勤学理论的发

展。其趋势是：随着高技术局部战争战术后勤研究的深入，战术后勤保障原则将注入新的内涵或产生新的保障原则，形成新的保障方法，为战术后勤理论开拓新领域，充实新内容；随着后勤体制和战术后勤活动实践的发展，战术后勤理论将进一步完善，学科区分将越来越细；随着科学的方法论和计算机技术在战术后勤领域的广泛应用，战术后勤理论研究将越来越多地采用数学化、模型化为基础的各种定量分析方法，形成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新的战术后勤理论。

参考文献

宋魁忠等主编：《战术后勤学》，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石文年）

海军后勤研究 (study of naval logistics)

探讨海军后勤活动规律，指导海军后勤工作实践的活动。是海军学术研究的组成部分，目的是对海军后勤实践经验进行概括和总结。它对于指导海军后勤建设，提高海军后勤保障能力，维护和增强海军部队战斗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海军后勤保障活动具有悠久的历史，但学科理论的形成却比较晚。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海军作战装备的发展和作战规模的扩大，陆地与海上后勤保障日趋复杂，后勤组织分工也日趋严密，海军后勤理论才得到重视和发展，开始探讨海军后勤指挥、海军后勤机构职能、海军后勤工作范围、舰队海上后勤支援等一系列海军后勤理论问题。在中国清朝末年建立的近代海军，编有军储、军医、主计、军港、仓库、医院、舰船修造厂等后勤机构，并研究制定了一系列后勤保障制度。一些洋务派代表人物曾提出海军后勤建设为海军建设“至要至急”的思想，并把

交通、通信列为海军后勤建设的首位。中华民国初期,海军的后勤工作,由海军部的军务、军械、军需三司,海军总司令公署的军械、军医、军需三课,以及舰队司令处的军需员负责;以后又增设了料件、舰械、厂坞、航机等部门,加强了相应保障设施建设。同时,海军后勤理论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发展。民国初期刘华武编著的《海军军事学》比较详细地论述了海军油料保障、物资准备、经费预算等问题;朱伟辑编著的《海军战略讲义》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海上交通线问题;黄家濂编著的《船舶输送学》(1939),论述了海岸防御、上陆作战中的海上运输问题;何希琨编著的《海上输送学》(1945)、张大澄编著的《海上供应勤务》(1947),都从不同角度研究了海上后勤保障问题。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于1949年4月成立。初期,由于缺乏海军后勤工作的实践和经验,以学习苏联海军后勤建设经验为主,建立了各级后勤机关和相应的后勤制度。院校后勤教学大都采用苏联海军后勤的教材和理论观点。随着人民海军的发展壮大,在总结自己后勤保障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并发展了具有中国海军特点的后勤理论。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海军战略由近岸防御向近海防御的转变,海军后勤理论观点也有较大的发展。在后勤力量的建设与部署、后勤保障体制、后勤管理和海上作战后勤保障的组织与指挥等方面都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理论观点,一批学术论文和理论专著相继发表和出版,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后勤理论体系的形成。其代表著作有:1988年陆云编著的《海军后勤医院船与卫生运输船》,1990年张永刚等主编的《海军后勤政治工作》,1994年徐本顺主编的《海军后勤学》和杜云然主编的《海军财务管理学》等。这些理论著作,都是以海军后勤的理论与实践为

研究对象,从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角度对海军后勤进行了研究,着重从海军后勤的本质特征,基本任务、保障原则,海军后勤力量建设、后备力量建设及海军各种作战样式的后勤保障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主要内容和观点有:①关于海军后勤的特点。认为,海军后勤主要是结构多元化,后勤活动空间广阔,后勤与作战一体化,后勤保障环境特殊,指挥复杂。②关于海军后勤建设。认为,海军后勤建设要重点抓好体制建设、保障配系的建设,以及后勤装备的建设和人才的建设。③关于海军后勤指挥。认为,实施高效能、高质量的后勤指挥,对完成海军后勤保障任务具有重要意义。强调海军后勤指挥必须遵循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相符合;关照全局,掌握关节;统一指挥;坚定、灵活、机断行事的指挥原则。④关于海军后勤防卫。认为,海军后勤防卫的基本任务是保证后勤目标的安全。必须贯彻严密防护、积极抗击、防保一体、重点防卫的基本原则。

进入21世纪,海军后勤研究的重点将是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海上局部战争后勤保障的新情况、新问题,将侧重研究由过去以一般性的物质技术手段保障海上作战转为用高技术手段实施保障的问题;研究由近岸作战后勤保障转向远离海岸作战的海上后勤保障问题;由单一兵种后勤保障到多兵种合成作战的后勤保障问题;由海军独立作战或协同其他军兵种作战到与其他军兵种联合作战的后勤保障问题等。这些问题的研究必将进一步完善海军后勤学的理论体系,丰富其理论内容。

参考文献

徐本顺、严兴国主编:《海军后勤学》,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

(石文年)

空军后勤研究(study of air force logistics)

探讨空军后勤活动规律,指导空军后勤实践的活动。是空军学术研究的组成部分。研究空军后勤对搞好空军后勤建设,提高空军后勤保障能力,维护和增强空军部队战斗力,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初,随着一些国家空军的相继建立,相对独立的空军后勤系统得到迅速发展,为空军后勤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是建立航空队较早的国家。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革命军在武昌、南京用买来的飞机组建航空队。1913年,北洋军阀政府在北平南苑建立了中国第一所航空学校,1921年又成立了航空署,开办航空管理讲习所,在总结飞行后勤保障经验的基础上,同年5月研究制订了《飞行场规则》。这是中国第一份记载飞行后勤保障的规范性文件。1928年国民党政府收编了各省军阀的航空队,中国军队有了统一的空军及其后勤系统。空军后勤理论研究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编写和编译了一些空军后勤理论著作,如航空委员会编写的《航空器材保管法》(1938)、《油料通信》(1942),空军参谋学校编译的《空军参谋手册》(1946),联合勤务部编写的《空军供应勤务》(1947)等,对空军后勤保障的有关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和论述。主要内容是:强调后勤供应在发展空军和保障空军作战中的地位和作用;要求后勤供应部门根据航空部队的需要,搞好各项物资供应,特别是航空油料和航空器材供应;认为航空油料和航空器材是保障空军作战的重要环节,必须做好采购和储备工作。这些情况基本反映了当时空军后勤保障理论研究的水平和概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于1949年11月正式建立。后勤系统是以陆军后勤机构为基础,借鉴苏联空军后勤工作经验建立起来的。在飞行训练和抗美

援朝战争后勤保障的实践中,继承发展了陆军后勤保障的传统做法,创造出具有人民空军特色的后勤保障理论。这些理论集中反映在20世纪50年代空军统一组织编写的后勤条令、条例和战役、战术后勤教材之中,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后勤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80年代以来,空军技术装备和作战方式有了很大变化,空军后勤理论研究也得到迅速发展,一批学术论文和理论专著相继发表和出版,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后勤理论体系的形成。其代表著作有:1990年贺九如等编写的《空军后勤总论》,1992年空军指挥学院编著的《空军后勤学》,以及相继出版的《空军战术后勤学》、《空军后勤管理学》、《空军战时军需勤务》、《空军被装勤务》等。这些理论著作都是以空军后勤的理论与实践为研究对象,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角度对空军后勤进行了研究,着重从空军后勤的本质、特点,空军后勤发展史和重要经验,空军后勤建设,空军后勤的工作原则,力量构成和保障力量的运用等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主要内容和观点有:①关于空军后勤的本质和特点。空军战斗力的物质要素,空军经济管理与支配系统,将国家经济力量转化为空军作战能力的“桥梁”等三个方面是空军后勤的根本属性。空军后勤除具有军队后勤工作的一般特点外,还有鲜明的自身特点。主要有:对升空的航空兵部队通常实施飞行前一次性保障,而不实施伴随保障;后勤补给的速度影响和制约战机的出动次数及留空作战时间;航空兵后勤展开于面状、固定形态的机场之中,战时防卫和工程抢修任务十分艰巨;空军后方补给点、线较为稳定等。②关于空军后勤工作指导原则。主要是:为飞行服务,为作战服务;服从国家经济和军队建设的全局;艰苦奋斗,勤俭建后勤;以机场网为重心,以作战需要为基点,完善后勤保障网等。③关于空军后勤力

量建设。空军后勤力量的谋划、兴建、积聚,包括物资筹措、装备设施、后勤队伍、组织法规等的建设,必须有明确的目标和有正确的方针、原则作指导,既要加强现役空军后勤力量的建设,以全面提高综合保障能力、快速反应能力,又要注重后勤后备力量的建设,以增强后勤保障的潜力。④关于空军后勤力量的运用。强调把握好五个原则,即:按作战企图组织使用后勤力量;充分准备,预有方案;合理分配,保持潜力;密切协同,发挥整体效能;严密防卫,确保安全。提高后勤人员素质和人与物结合的科学性、合理性,以及正确地实施后勤指挥,科学地进行管理,是完成后勤保障任务的关键和前提。

现代高技术战争是各军兵种联合作战,对空军后勤保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空军后勤研究将针对高技术战争的高消耗、速战速决、高度机动等特点,深入探讨空军后勤指挥与保障的速率、时效问题;后勤研究将围绕着“保障有力”的目标,深入探索新形势下空军后勤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提出新的观点、理论和对策。

参考文献

杨绪金等编著:《空军后勤学》,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

(石文年)

战略导弹部队后勤研究 (study of strategic missile forces logistics)

探讨战略导弹部队后勤工作规律,指导战略导弹部队后勤实践的活动。对于战略导弹部队后勤建设与发展,遂行战略导弹部队反击作战和其他行动的后勤保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战略导弹部队后勤研究是随着战略导弹部队后勤的建立、发展而逐步开展起来。20

世纪40年代出现战略导弹部队,70年代以来,战略导弹部队得到迅速发展。与此同时,战略导弹部队后勤机构应运而生。为解决战略导弹部队后勤工作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一些专门的后勤理论研究和教学机构也逐步建立和完善,开始了对战略导弹部队后勤理论的系统研究。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导弹部队自1966年成立以来,为适应战略导弹部队后勤保障实践的需要,加快了战略导弹部队后勤理论建设步伐。根据平时建设的需要和战时保障的特点,先后研究制定和颁发了不同层次的战略导弹部队后勤条令、条例,研究建立了战略导弹部队后勤供应标准体系,修订完善了各项业务管理法规,初步建立了战略导弹部队后勤专业教育和理论研究体系,战略导弹部队后勤理论有了较大的发展。在后勤力量建设、部署、后勤保障体制、后勤管理和作战后勤保障的组织与指挥等方面都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理论观点。一批学术论文和理论专著相继发表和出版,标志着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后勤理论体系的形成。其代表著作有:《第二炮兵后勤工作概述》、《第二炮兵战役后勤学》、《第二炮兵战地后勤军需勤务》、《第二炮兵卫生勤务》等。这些理论著作都以战略导弹部队后勤的理论与实践为研究对象,从不同的角度对战略导弹部队后勤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其主要内容和观点有:①战略导弹部队后勤研究应着力探讨战略导弹部队后勤工作的特点和指导思想,后勤建设、保障的基本原则,战略导弹部队后勤体制及其运行机制,作战环境对战略导弹部队后勤保障的影响等。②战略导弹部队后勤具有高度分散,保障难度大;基地后勤保障独立性强;保障部队机动要求高;部队生活保障任务重等特点。必须着眼于特点和发展,坚持服从大局、服务基层的方向,把基地后勤建设好,

有效保障部队作战需要。③战略导弹部队后勤的基本任务是从物资、经费、卫生和运输等方面,巩固和增强部队的战斗力,保障作战任务的完成。④后勤体制建设必须适应战略导弹部队后勤特点,形成平战结合、军民兼容的保障体系;适应高技术局部战争需要,优化组织机构,有利于集中统一指挥;适应部队快速反应的需要,有利于增强后勤快速反应能力。⑤战略导弹部队后勤必须贯彻“整体持续保障”基本思想。坚持根据作战决心,组织后勤保障;积极准备,力争主动;全面规划,重点保障;加强整体协调,讲求保障效益;实行整体防卫,强化后勤生存能力的后勤保障的基本原则。⑥战略导弹部队后勤基地建设应统筹规划,合理布局,既有固定的后勤设施,又有保障机动作战的野战系列后勤装备,形成具有独立执行保障任务的综合性保障实体。

随着战略导弹部队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战略导弹部队后勤理论研究将着眼新的历史条件下军事斗争对后勤的影响,进行全方位、多层面的对策性和实证性研究,突出指导实践的价值,不断填补学科空白。为适应高技术战争的作战需要,诸军种联合作战的导弹部队后勤保障理论,以及新时期战略导弹部队后勤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将成为战略导弹部队后勤理论研究的重点。

(石文年)

军队后勤体制研究 (study of military logistic structure)

探讨军队后勤体制发展规律,指导军队后勤体制建设的活动。是后勤理论研究的组成部分,也是对军队后勤体制系统化的理性认识过程,它的研究成果对指导军队后勤体制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后勤体制理论以军队后勤组织体系和工

作制度为主要研究对象,它历来是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悉心研究的重要问题。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军队后勤体制理论在过去一直分散包容在军制理论和后勤保障理论之中,并未形成独立完整的知识体系。

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体制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由零散到系统、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后勤体制理论,主要反映在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军事著作和中央军委各个时期军队体制建设经验之中。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根据斗争形势,不断调整后勤组织体系,建立以经济民主为基础的后勤制度的理论;抗日战争时期,实行总部统一领导下的分散经营与独立保障相结合的后勤保障体制以及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后勤制度的理论;解放战争时期确立的建立军、政、民相结合的后勤保障体系,实行集中统一的后勤供应制度的理论等。这些理论对指导革命战争时期人民军队的后勤组织体制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体制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总结战争年代后勤体制建设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军队后勤体制建设的实际,全军加强了后勤体制理论的研究,丰富和发展了后勤体制建设理论,并在后勤体制改革和院校教学中得到广泛的贯彻和应用。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四次对后勤体制进行改革,多次研究修订后勤条令、条例,并对后勤组织体系、机构设置和职能等作了明确的规定。70年代末,后勤体制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发展繁荣时期,并取得了显著成果,发表了大量后勤体制建设方面的论文和论著,标志着后勤体制理论作为军事后勤学学科体系中一门独立的学科逐步形成。其代表著作有:1991年石文年主编的《军队后勤体制概论》,1992年刘鲁民主编的《联勤论文选编》等。这些论文

和专著,从历史的纵向和横向发展上,对古今中外军队的后勤体制变化及制约其发展的诸多因素作了比较系统的综合性研究和论述,着重探讨军队后勤体制的概念,后勤体制产生、发展规律和确立后勤体制的依据、应遵循的原则等问题。主要内容和观点有:①关于后勤体制的概念。认为,后勤体制是反映军队后勤活动各种关系的具体形式以及保证后勤活动顺利进行的各项制度的统称,它的功能在于从组织体系和制度上保证后勤建设,提高后勤保障能力。②关于军队正规化与后勤体制的关系。认为,正规化的军队必须建立统一的后勤机构,实行统、分结合的保障体制,健全各项后勤制度,组织统一的后勤保障。③关于确立后勤体制的原则。指出,后勤体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确立后勤体制时应遵循与军队总体结构相一致,与国家的经济条件和科技水平相适应,有利于后勤整体功能发挥的,平战结合、军民结合,简化、精干、高效的原则。④关于后勤体制的发展趋势。认为,后勤指挥体制将向更加集中统一的方向发展;后勤保障体制逐步向统供统管方向扩大;后勤编成向适应指挥后方战斗、组织供应的双重职能方向发展;后勤系统向更高层次的平战结合、军民结合的方向发展;后勤保障人员与作战人员的比例有逐步增大的趋势。此外,上述著作还根据军队后勤指挥、后勤保障、军种后勤、后勤教育训练、后勤科学研究诸系统的具体情况,对后勤的机构设置、隶属关系以及管理权限划分等方面的理论进行了研究。

为适应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后勤保障的要求,军队后勤体制理论将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①加强组织结构的研究,进一步调整后勤组织机构,减少中间层次,达到精干、灵活、合成、协调、高效的目的,以提高后勤指挥与保障能力。②加强联勤研究,积极推

行联勤保障体制,避免三军后勤职能和机构重复,提高后勤整体保障效益。③加强后勤应急力量建设研究,加速野战部队后勤机构合成化、综合化进程,提高综合保障能力、快速机动能力和独立生存能力。④加强军民一体的快速动员体制研究,以适应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和突发事件后勤保障的需要。

(石文年)

军事后勤管理研究 (study of military logistic management)

探讨军事后勤管理活动规律及指导原则的活动。开展军事后勤管理理论研究,对发展军事后勤管理理论和指导军事后勤管理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人民解放军为搞好后勤管理,提高军事经济效益,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了军事后勤管理的研究。1984年3月,昆明军区后勤部编写出版了《军队后勤现代管理基础知识》一书,对军队后勤管理的意义、性质、特点、职能、方法等问题作了介绍。1986年10月,后勤学院编写了《军队后勤管理学》一书,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军事后勤管理学的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首次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回答了后勤管理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后勤管理的概念、特点、原则、过程、方法、体系等。同时还先后编写了《军队后勤管理理论研究纲要》、《军队后勤管理思想纲要》两本理论教材。90年代,军队后勤管理成为全军后勤工作的主题,后勤管理研究也随之步入了一个新阶段。在研究的层次上,注重了后勤宏观管理的研究。在研究的内容上,注重了后勤管理基本特点和规律的研究。根据江泽民关于“科学管理是兴国之道,也是兴军之道”的指示精神,全军进一步加大了后勤管理研究的力度,相继编写出版了《军队后勤管理学》、《军队后勤管理理论》、《后勤管理原理》、《后勤宏观管

理》、《后勤管理信息系统》、《后勤机关管理》、《基层后勤管理》、《后勤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后勤专业管理》、《特殊条件下后勤管理》、《后勤教育训练与管理》、《后勤管理效益》、《军队后勤管理新思考》、《海军后勤管理学》、《空军后勤管理学》、《二炮后勤管理概论》及军需、军交、运输、财务、卫生、营房、物资、油料、仓储等专业勤务管理的一系列理论专著,从而使后勤管理理论有了长足的发展,建立起军事后勤管理学的完整的理论体系。

军事后勤管理研究主要对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①关于军事后勤管理学的概念和理论体系。其概念一般界定为研究军事后勤管理活动规律和指导原则的学科。其理论体系由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两大部分构成:基础理论部分包括基本概念、基本关系、管理史、管理思想等;应用理论部分包括管理要素、管理活动、管理任务、管理职能、管理工程等。②关于军事后勤管理的基本矛盾。一种意见认为其基本矛盾有两个,即后勤管理中的分合矛盾和供需矛盾。他们提出存在于后勤活动的这两个矛盾必然要反映到后勤管理活动中,从而成为后勤管理的基本矛盾,认为现代军队后勤是一个专业高度分化而保障功能又高度综合的大系统,纵向和横向关系的调节都存在着复杂的分合关系和矛盾运动,理顺和解决这一矛盾就成为后勤管理的一个焦点。供需矛盾是后勤保障的基本矛盾,如何调解这一矛盾也当然成为后勤管理的另一个焦点。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后勤管理的基本矛盾是协调与不协调的矛盾。认为管理就是协调,后勤系统内部客观存在的不协调就构成了后勤管理的基本矛盾。③关于军事后勤管理的指导原则。经研究探讨,提出了为国家负责和为部队负责的一致性原则,管事与管人相结合的原则,保障任务与军事经济效益辩证统一的原则,根据条令条

例依法管理的原则,发动群众参与后勤管理的原则等。④关于军事后勤管理的职能。一般认为是决策、计划、组织、协调、控制。也有的认为是组织、计划、执行、监督四大职能,或是计划、组织、协调、指挥、监督等。⑤关于军事后勤管理的机制。一般认为,后勤管理机制是指后勤管理系统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及系统运行的机理,是后勤管理系统存在与运行的生命力所在,它决定后勤管理系统功能的发挥。一般分为后勤保障力机制、后勤管理动力机制、后勤管理组织和自组织机制、后勤管理正规化机制等。后勤管理机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必将随着后勤管理活动的需要而不断地予以调整和改善。建立科学的后勤管理机制对于搞好后勤管理至关重要。⑥关于军事后勤管理的环境。一般认为,后勤管理环境是指存在于后勤管理活动周围并对后勤管理活动产生影响和制约作用的情况和条件。后勤管理活动必须适应周围环境。后勤管理环境分为后勤管理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其外部环境主要包括经济环境、军事环境、政治环境、社会环境、科技环境等;其内部环境主要有后勤管理组织环境、后勤保障与管理的工作环境、部队官兵的生活环境等。⑦关于军事后勤管理的绩效。一般认为,军事后勤管理绩效是指军事后勤管理工作业绩和管理劳动效果的统称,表现为管理的成果与劳动消耗之间的对比关系,要求要以最小的劳动消耗获取最大的管理成果。对其评价的准则应是:坚持军事效用与经济效益的辩证统一;坚持投入产出对比分析;坚持系统分析整体评价;坚持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等。

面对21世纪军事、经济的发展,军事后勤管理的研究将进一步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主要是研究:后勤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的后勤管理问题;高技术战争条件下后勤建设

和运行的后勤管理问题;“联勤保障”和社会化后勤保障的管理问题;后勤宏观管理和微观管理的进一步结合问题;如何强化军事后勤管理和进一步提高管理效益的问题;新形势下后勤管理的特点和规律等问题。

参考文献

国防大学编:《军队后勤管理学》,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5。

后勤学院编:《军队后勤管理理论》,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8。

后勤学院编:《军事后勤效益研究》,北京:金盾出版社,1996。

林孝诚、范中苏主编:《军队后勤管理新思考》,北京:海潮出版社,1992。

(王书琴)

军事后勤法研究 (study of military logistic laws)

探讨军事后勤法本质、特点和规律,指导军事后勤法制工作实践的活动。是军事法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军事后勤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它的研究成果对指导军事后勤法制建设实践,加强军事后勤建设,巩固和提高军事后勤保障能力,维护军事后勤合法权益,具有重要的作用。

中国军事后勤法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古代和近代军事后勤法理论多融于国家有关法律和有关典籍之中。到了现代,随着军事后勤工作内容的拓展和军事后勤法律规范的逐步建立,军事后勤法调整的范围也相应扩大,军事后勤法理论也有较大的发展。中华民国时期,除在国家的法律中设有规范军事后勤活动的条款外,还颁发了大量的军事后勤法律规范文件,并进行了汇编。如1929年陆海军经理法规编纂委员会编纂的《军需法规汇编》,1940年军事委员

会编纂的《后方勤务部法规》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革命战争年代,对军事后勤法理论缺乏系统研究,只是侧重一些现实后勤法规制度的制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以及各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府依据战争需要先后制定了《关于各项费用标准的训令》、《筹款办法》、《兵站工作条例》、《供给工作条例》等一系列军事后勤法律规范文件。这些后勤法律规范文件虽然还不系统、不完善,但在当时艰苦困难的战争环境里对保障军队作战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后勤法制建设奠定了一定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军事后勤法制建设的环境和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军队后勤已从长期的战争环境中采取就地取给、取之于敌的方法逐步转入到全军统一、全部由后方供给的新阶段。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在继承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政府制定的军事后勤法律规范的基础上,适时建立健全了统一的后勤法律制度来规范后勤活动,先后颁发了几千项后勤方面的法规、规章,仅“八五”以来就颁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司令部条例》、后勤各专业条例、各级后勤部队、分队战斗条令等一批在军事后勤法规体系中占主要地位的条例、条令450余件。同时,军事后勤法理论研究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此期间大量后勤法制建设方面的论文、理论著作发表或出版,标志着军事后勤法制理论研究迈向一个新阶段,后勤法理论基本形成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两部分。其代表著作有:1992年徐有仁、张子谦主编的《军事后勤法概论》、1995年张子谦、张振江主编的《军事后勤立法简论》等。这些理论著作都是以军事后勤法建设实践为基础,系统总结军事后勤法建设的经验,探讨军事后勤法的基本理论和法律规范的制定和实施。其主要内容和观点包括:①军事后勤法是

调整军事后勤活动中所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既包括国家权力机关制定颁发的军事后勤法律,也包括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制定颁发或中央军委单独制定颁发的军事后勤法规,还包括军委总部与国务院有关部委联合制定颁发和军委总部单独或联合制定颁发的军事后勤规章,以及各军种、大军区制定颁发的区域性后勤规章。②军事后勤法随着国家和军队的产生而产生,随着国家和军队的发展而发展。军事后勤法从其产生到现在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随着军队后勤建设的不断发展,国家行政机关和军事领导机关先后制定颁发了一系列军事后勤法规和规章,逐步形成比较完整的军事后勤法体系。③军事后勤法的调整对象主要是:调整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公民和军队在军事后勤活动中的关系;调整军队内部后勤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关系;调整军队后勤内部相互之间的关系。④军事后勤法具有地位的从属性、内容的广泛性和较强的专业性特点。其主要作用是:保障军队后勤正规化建设的步伐;促进军队后勤改革的深入发展;保证作战后勤保障任务的顺利完成;维护军队和军人的合法经济权益不受侵犯。⑤军事后勤立法是享有立法权的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军事领导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创制和废止军事后勤法律规范的活动。军事后勤法的实施,是指军事后勤法律规范在军事后勤活动中的贯彻和实现。军事后勤立法和军事后勤法的实施,是军事后勤法制建设中两个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基本环节。军事后勤立法是军事后勤法实施的依据和基础,军事后勤法的实施,是军事后勤法得以实现的手段和重要途径。

展望 21 世纪,军事后勤法理论的先导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学术交流范围将进一步扩

大,军事后勤法理论研究领域将进一步拓展。根据新时期军队后勤建设的新形势、新要求,军事后勤法研究将进一步探讨军事后勤法的概念、本质、作用等方面的基本理论,科学准确地揭示军事后勤法特有的内在本质和必然规律,解决依法管理后勤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根据后勤管理和后勤法制建设的特点、规律和发展趋势,研究探讨依法管理后勤的基本规律,明确依法管理后勤的基本标志,弄清依法管理后勤所需要的基本条件,确立依法管理后勤的基本原则和模式。

参考文献

徐有仁、张子谦主编:《军事后勤法概论》,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

张子谦、张振江主编:《军事后勤立法概论》,北京:金盾出版社,1995。

(石文年)

军事后勤史研究 (study of military logistic history)

探讨以往军事后勤保障活动的发生、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活动。军事历史研究的组成部分。研究内容主要有后勤保障活动的演化过程及其规律、后勤史学理论和后勤思想史等。

20 世纪 40 年代,国民党军队在后勤院校开设了后勤史课程,如“中国兵站沿革之概要”、“中国空军供应史”、“中国海军供应史”、“兵站勤务概述”等。这一时期后勤历史研究,主要是描述国民党军队各军兵种后勤保障体制、后勤装备、后勤保障方法和各专业勤务保障活动的发展历程,初步探索了后勤保障活动的一般规律。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后勤历史研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随着后勤地位的上升,后勤学科的分化,而逐渐开展起来的。50

年代,开始搜集史料。1952年,抗美援朝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就组织机关总结两年半志愿军后勤保障工作经验,并下发部队学习。1958年,后勤学院将搜集的革命战争时期后勤史料,按后勤工作、后勤政治工作、后勤编制体制等12个专题,编辑了《后勤历史资料选编》21册,约350万字,为研究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提供了翔实材料。1982年,按总后勤部编写《军事后勤历史丛书》的统一要求,开始搜集古今中外后勤历史资料,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已编辑出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料选编》、《中国古、近代军事后勤史料选编》、《世界军事后勤史料选编》。这次搜集史料范围之广,内容之丰富是前所未有的。此外,各大军区、各军兵种还搜集整理了大量后勤历史资料,各院校根据教学需要,也搜集了一批中外著名战争后勤资料。

80年代,后勤历史研究进入高潮,主要表现在:①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研究全面展开。1980年4月,总后勤部根据叶剑英关于“要总结后勤工作经验,特别是抗美援朝和对越作战经验”的指示精神,组织专门力量,重新编写一套《抗美援朝战争后勤工作经验总结》。这套书包括基本经验、后勤专业勤务、战例选编和资料选编四个部分,共计21册,约700万字。该书突出了后勤组织指挥、后方对敌斗争和战时后勤政治工作,反映了现代战争后勤保障的特点和规律,是一部重要的军事后勤历史文献。1980年出版了国防大学乔光烈主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简史》,是第一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在建国40周年之际,总后勤部司令部组织编写了《当代中国军队的后勤工作》。在建军70周年之际,又编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七十年》。此外,还出版了《中国革命战争后勤史简编》、《土地革命战争后勤史》、《抗日战争

后勤史》、《解放战争后勤史》、《第二野战军后勤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简编本》、《中国军事后勤思想史》、《国民革命军后勤史》等专著。总后勤部政治部组织编纂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工作》,包括综述、大事记、回忆录、文献、表册、图片等六个分册,约700万字。总后勤部各二级部组织编写了专业史。如《中国人民解放军财务简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交通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史》、《中国军事医学史》等。各大军区、各军兵种编写了《后勤工作综述》、《后勤工作大事记》,一些大军区开始组织编写本军区后勤各专业史。这些史书以翔实的材料,客观论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工作的发展历程、主要成就和经验教训,对人民解放军后勤现代化建设和做好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提供了历史借鉴。②中外古近代后勤历史研究取得新的进展。1982年,总后勤部组织军队和地方史学工作者共同编写《军事后勤历史丛书》,包括中国古代、近代军事后勤史,世界后勤史包括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军事后勤史共13部,约600万字。编写这套丛书,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历史研究走在世界前列。③研究机构逐步完善。1986年,后勤学院学术研究部历史研究室正式成立。1990年,军事后勤学后勤历史方向硕士学位的设立,标志着后勤历史研究从分散研究走上专业化研究的道路。

90年代,开始探索后勤史学理论。90年代初,在总后勤部组织编写《中国军事后勤百科全书·理论卷》、《中国军事后勤百科全书·历史卷》中,以及后勤指挥学院召开的两次学科前沿研讨会上,一些学者提出了军事后勤历史学的基本理论。认为后勤历史学是军事后勤学的一个基础性、理论性的学科,是军事历史学的一个分支,是军事后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概念可表述为,研究以往后勤建

设和保障活动、探索后勤发展规律的科学。军事后勤历史学学科框架可按三个层次 20 个分支进行构建。第一层次为理论部分,包括后勤历史发展规律、认识论、方法论、价值与功能、史学分期、史学动力等六个研究方向。第二层次为史论部分,包括世界军事后勤史、中国军事后勤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战争后勤史、后勤思想史、后勤建设史、后勤管理史、后勤教育史、后勤各个专业史、军种后勤史、后勤人物史共 11 个研究方向。第三层次为史料部分,包括历史文献、考古资料、口碑资料等三个研究方向;提出后勤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是:论从史出的基础功能、为决策服务的应用功能、以古为鉴的借鉴功能。1997 年军事科学院主编的《世界军事年鉴》专门刊登了“军事后勤历史学”文章,文中初步设计了后勤历史学学科体系,为创立后勤历史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后勤历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1 世纪后勤历史研究的趋势是:史论结合,从记述史学向理论史学发展,其课题包括后勤建设史、后勤体制史、后勤管理史、后勤教育史、后勤法制史、中外后勤比较研究等;拓宽研究领域,从立足本国研究发展为面向世界研究,其课题包括对世界一些主要国家,如美国、俄罗斯联邦、日本、英国、法国、印度等国家的后勤史,外军后勤思想史研究;应用先进手段,实现由定性研究走向定量研究,其课题包括历代国家经济实力与后勤建设发展的关系、后勤科技水平与战斗力的关系、世界战争与局部战争后勤战勤比较研究等。

(杨庆华)

外军后勤研究 (study of foreign military logistics)

探讨外国军队后勤理论与实践及其发展

规律的活动。研究内容包括外军后勤组织体制、后勤各专业勤务、后勤教育训练、作战后勤保障、后勤建设等有关的理论观点、学术思想、方式方法、法规政策等。研究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外军后勤理论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以供中国军队参考和借鉴。

清末和民国时期 进入近代后,随着西方国家的新式火器——枪械、火炮的引进,西方的后勤理论也开始被引进中国。在清末《陆军模范镇章程示范》中所使用的有关军队勤务和辎重的理论术语及所阐述的有关内容,就已经与军事家 A. H. 若米尼所著《战争艺术概论》(1838)一书中关于后勤的理论阐述十分近似。此外,当时派往西方的中国留学生,对引入外军后勤理论也发挥过一定作用。清朝末年,一些讲武堂中多设有辎重科,介绍和研究过西方后勤理论。中华民国初期,其军队在沿袭清末新军所采用的一些西方军队做法的同时,继续研究、学习西方的后勤理论,并运用于军队建设的实践。中华民国中、后期,随着其军队正规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外军后勤研究也更加受到重视。在这一时期,为适应军队训练和各类正规院校中后勤教学的需要,国民党军队的训练总监部、陆军大学、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军需学校等,先后编著和翻译了一大批外军后勤研究专著。这些专著所涉及的国家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苏联等国,涉及的内容几乎涵盖了后勤的各个领域,主要有:温润芳编著的《世界主要各国陆军军需制度概要》(1935),吴俊生编著的《苏联军队后方勤务》(1946),陆军大学编写的《美军后方勤务》(1947),吴赞唐编著的《美国供应站补给品之调配》(1948)等;翻译和编译的外军后勤专著多达 20 多种,主要有:《交通决胜论》(英,1946)、《汽车运输学》(美,1928)、《日本辎重勤务之参考》(日,1932)、

《给养史讲授录》(日)、《列国军队金钱经理之比较》(日)、《兵站勤务》(日,1930)、《德国行李及弹药纵列辎重勤务令》(德,1929)、《作战给养及补给》(德)、《美国陆军各勤务学校概况》(美,1947)、《美军野战联合勤务必携》(美,1947)等。上述专著和译著不仅对西方军队的后勤理论引进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将中国的外军后勤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水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20世纪50年代初,作为对华军事援助的一部分,苏联派遣大批军事顾问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及后勤院校工作。当时,总后勤部司令部设有翻译室,在执行与苏军顾问有关的口语翻译任务的同时,也翻译介绍一些苏军的后勤条令、条例,如《苏军步兵团后方》等。此外,还编著了《俄汉后勤字典》。总后勤部直属的后勤院所设的翻译室,在苏军后勤理论研究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该室除担任苏军顾问的口头翻译外,还笔译了大量苏军顾问的后勤课讲义,并在研究、整理的基础上汇编成后勤理论教科书《军队后方》。这本教科书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最早的外军后勤理论研究成果之一,曾被后勤学院和其他军事学院作为主要后勤理论教材使用。其他研究成果还有《苏军给养供应》、《苏军被装供应》等。这一时期对苏军后勤理论的研究,对于促进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的正规化建设和后勤干部培养发挥过重要的借鉴作用。50年代后期,对苏军后勤理论的研究因中苏关系恶化而停止。此后一直到1978年,对外军后勤的研究基本陷于停顿,仅限于少量介绍外军的个别后勤条令及后勤资料。

改革开放以来至20世纪末1979年,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外军后勤研究工作也进入一个崭新

的历史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设立了解放军历史上第一个从事外军后勤研究的专门机构——外军后勤研究部。这一时期的外军后勤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①研究范围广。不仅研究外军后勤的现状,而且研究外军后勤的历史;不仅研究平时的外军后勤,而且研究战时的外军后勤;不仅研究军队后勤理论,而且研究与军队后勤理论相关的理论。②研究对象多。除重点研究苏联(后为俄罗斯联邦)、美国两个大国的军队后勤理论外,英国、法国、日本及中国周边的印度、越南等国的军队后勤理论也作为研究对象。③研究内容丰富,涉及后勤的各个领域。如后勤的定义与概念、后勤思想、后勤体制编制、后勤指挥、后勤各项专业勤务、后勤教育训练、后勤动员、后勤建设、后勤装备发展等。④研究水平高。这一时期的研究已不仅仅局限于对外军后勤理论的介绍,而且开始有计划、有目的地确定研究课题,结合解放军后勤建设及改革的需要开展专题研究。

这一时期的外军后勤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主要有:①翻译了一批世界著名的后勤理论著作。其中主要有:美国G.C.索普编著的《理论后勤学》、H.E.艾克尔斯编著的《国防后勤学》、日本近藤清秀编著的《后勤概论》、英国J.汤普森编著的《战争生命线——武装冲突中的后勤》等。②翻译了一批世界著名的后勤历史著作。主要有:苏联C.库尔科特金主编的《伟大卫国战争中的苏联武装力量后方勤务》、N.M.戈卢什科主编的《苏军后勤七十年》、以色列M.W.克列维尔德编著的《战争与后勤》、美国J.A.休斯敦编著的《美国陆军后勤史》、美国陆军部编著的《越战后勤保障》、越南王承武编写的《越军后勤》、日本柴田隆一等编著的《日本陆军经理部》、印度陆军补给与运输局编著的《印度陆军后勤史》等。③翻译了一批外军后勤条令、条例。主

要有:美国陆军野战条令中的《陆军后勤》、《军后勤保障》、《师后勤保障》,以及《野战条令·作战后勤保障》等,苏军的《部队(舰艇)后勤管理手册》,英军的《后方勤务条令》,日军的《野战后勤条令》等。④翻译了一批军事经济理论著作。主要有:西德A.S. 米尔沃德编著的《战争、经济与社会》,罗马尼亚B. 斯坦库列斯库等编著的《经济因素在加强祖国国防能力中的作用》,苏军政治学院编著的《论现代战争中的经济问题》,南斯拉夫H. 丘布拉编著的《全民防御经济学》,苏联A. 波札罗夫编著的《军事实力与经济基础》等。⑤编写了一批外军后勤的理论专著。主要有:王波等主编,内容涉及苏联、美国、日本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勤史》和《外军后勤战例选编》,杨少俊等主编的《局部战争后勤保障》、《印度国防与后勤》,王通信主编的《外军后勤管理》和《外军油料勤务的理论与实践》,黄文寿主编的《外军后勤手册》以及《当代外军后勤研究》等。⑥撰写了一批外军研究报告和文章。⑦创办了一些外军后勤理论研究的刊物。如《外军后勤资料》、《外军后勤信息》以及《后勤学术(外军后勤版)》等。此外,还发表了几百万字的外军后勤理论译文和研究文章。

上述外军后勤研究成果,对于丰富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后勤理论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学术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对西方国家的军事后勤学形成与发展及各种理论观点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介绍与研究。②对世界主要国家军队的后勤历史和现状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与研究。③对世界主要战争的作战后勤保障作了比较深入的介绍与研究。

发展趋势 随着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军事领域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在军事后勤领域,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

国家军队已经提出了一系列基于高新技术的后勤新概念和新理论,如“速度型后勤”、“聚焦后勤”等。因此,及时了解外军后勤的发展动向,把握其理论前沿,是外军后勤研究面临的新课题。此外,冷战后世界各国之间军事交流的不断增强,也为外军后勤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因此,21世纪的外军后勤研究,无论是在研究的深度还是广度上,都将会有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

(王通信)

高技术战争后勤研究 (study of high technology war logistics)

探讨以高技术战争战场环境和战法为背景的军事后勤理论的活动。

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以后,军事理论界就提出了高技术战争的概念。海湾战争后,高技术战争研究在全世界引起了更加广泛的重视。中国对于高技术战争和高技术战争后勤保障理论的研究起步较晚,并经历了一个从不认识到认识,从少数人自发研究到有组织、有领导全面展开研究的过程。

第一阶段(1980~1985)“文化大革命”之后,院校教学开始走上正轨,后勤学术研究逐步走向繁荣。受当时国际战略环境和认识上的制约,军事后勤理论主要研究大规模核战争中如何保障部队顶住敌人的“三板斧”,如何坚持战区独立作战中的持久保障等。1981年的华北地区军事演习,在后勤保障上,基本是依据上述理论观点进行组织实施的,集中反映了当时的后勤理论水平。尽管理论界对第四次中东战争、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两伊战争、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以色列人侵黎巴嫩战争等现代局部战争后勤保障情况,进行了及时的跟踪研究,对现代局部战争中后勤的生存能力、后勤保障速度要求、损坏装备的战场“再生”、战略空运的作用等,已经

引起关注,但由于受种种主观和客观因素的限制,对高技术武器引起的战争内在规律和后勤保障方式的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引起足够重视。

第二阶段(1986~1990) 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军事后勤理论研究,从应付核条件下的全面战争,转移到如何保障一般局部战争上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开始探讨高技术战争后勤保障问题。例如,1989年10月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军事后勤学》一书,就提出高技术战争后勤保障问题,并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一些军事刊物也发表文章探讨高技术条件下的后勤保障问题。但也有人只看到中国军队装备现状距高技术化还有很大差距,认为该项研究脱离实际。总的来看,这一时期高技术战争后勤理论研究还不普遍,还只是少数人的自发研究。

第三阶段(1990~2000) 海湾战争中,高技术武器的威力得到了充分展示,作战方式和后勤保障方式呈现出全新的面貌,令人耳目一新。中央军委适时提出了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提出了要打赢现代条件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要求。此后,高技术战争后勤保障研究很快在全军展开。总部、院校、各个部队纷纷召开高技术战争后勤保障理论研讨会,开办高技术集训班,专题的学术论文汇集和理论专著陆续出版,取得了一大批学术成果。代表性的成果有:余高达主编的《高技术战争后勤》,宋学先主编的《高技术条件下的军事后勤》,杨澄宇、徐根初、马书铭主编的《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后勤保障知识问答》,杨绪金、王斌著的《高技术战争空军战役后勤指挥概论》,金国华、李冀平主编的《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中后勤与作战一体化指挥》,龚飞著的《信息战争战役后勤研究》等。还有后勤指挥学院编写的《高技术局部战争与后勤保障》、《高技术条件

下作战后勤保障法研究》、《高技术条件下联合作战后勤保障研究》等多种内部版本的图书和论集。

这一阶段,军事后勤理论研究的成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高技术条件下的后勤保障环境理论 后勤保障环境,包括自然地理环境、人文社会环境和作战环境等几个方面。高技术条件下,后勤保障的环境因素空前复杂化。特别是各种高技术武器在局部战争中的运用,对后勤保障和后方防卫带来了许多新问题。例如,高技术的侦察监视器材,使后勤目标采用简单的隐蔽伪装手段已经难起作用;精确制导武器的高打击力,使后勤目标被摧毁的概率增加,地下目标的安全系数降低;非线性式的战场环境,使后方部署的稳定性降低,地面交通运输线的畅通遇到更大挑战;地球物理战和非致命性武器的使用,使后勤可能随时遭到局部瘫痪性打击;高强度的电子战环境,后勤通信将受到严重干扰破坏。上述环境因素对后勤保障的影响都是过去战争中所没有遇到过的。后勤保障环境理论研究的进展,对于改革后勤保障的方式方法,采取新的后方防卫措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高技术条件下后勤立体保障理论 高技术条件下的战争是立体战争,实现后勤保障方式从平面到立体的变革,是后勤理论必须探讨的问题。然而,中国面对的高技术立体战争,仍将是劣势装备对付优势装备之敌。因此,探讨有中国特色的后勤立体保障理论,焦点是寻求“以劣势装备对付优势装备之敌”。围绕这一焦点,近年来新的理论观点主要有:局部立体化的超越式应急保障理论;后方交通运输线的立体衔接理论;立体防卫,合成抗击的后方防卫理论;大规模战略投送的理论等。

高技术条件下的联合作战后勤理论 联

合作战是未来高技术战争的主要作战样式。联合作战与已往的作战样式有所不同,后勤准备、组织实施、控制协调、后勤力量运用等也将有所不同。该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果。主要有:三军一体、合力保障理论;以战区为基础的联勤体制理论;后勤与作战一体化指挥理论等。

高技术条件下的军事后勤研究仍是初步的,有待向深入发展。其趋势是:高技术战争战场环境对后勤的影响及其对策研究有待深入;不同战法的后勤保障理论需要配套;后勤理论研究与实验性演习应紧密结合;后勤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技术研究应协调发展。

(宋学先)

军事后勤指挥研究

(study of military logistic command)

探讨军事后勤指挥规律,指导军事后勤指挥实践的活动。是后勤理论研究的组成部分,也是对军事后勤指挥活动系统化理性认识的过程。它的研究成果对指导军事后勤指挥实践具有重要作用。

军事后勤指挥理论是在长期的战争及后勤活动实践的基础上,为适应军队后勤指挥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1911年中国近代军事家蔡锷编纂的《曾胡治兵语录》、1934年国民党军队李国良编写的《后方勤务讲稿》、1936年田建龙编写的《后方勤务概说》、1945年陆军大学编写的《后方勤务》等论著,对后勤指挥理论都进行了较系统研究。这一时期,后勤指挥理论分散在军队指挥和后方勤务理论之中,未形成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

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指挥研究,大体可分两个阶段。

革命战争时期的后勤指挥研究 这一阶段,由于人民解放军处在战争环境,对后勤指挥理论缺乏系统完整的研究,提出的一些后

勤指挥理论观点,也散见于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军事著作和中央军委各个时期的作战方针以及后勤保障经验之中。主要是: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依靠人民和政府支援战争;利用缴获,装备自己;组织军民生产,保障部队供应;就地筹措与后方供应相结合,组成军政一体的保障体系;建立兵站和基地,开设兵站线保障大兵团作战等理论和经验,对指导军队革命战争时期后勤保障起了重要的作用,也为人民军队后勤指挥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后勤指挥研究这一阶段,全军全面系统地总结战争年代后勤组织指挥经验,结合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进一步加强了后勤指挥的研究,特别是195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成立后,军队后勤指挥研究进入了一个发展时期。在学习苏军后勤指挥理论和总结自己军队后勤指挥经验的基础上,编写了不同层次、不同条件下作战的后勤指挥理论教材。从50年代中期开始,中央军委颁发并多次修订的军队后勤条令、条例,就后勤指挥的职能、原则、机构设置、指挥方法、要求等作了明确的规定,对组织边境自卫还击作战的后勤保障,指导军队后勤建设,保障军队战备训练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后勤技术装备的改善,后勤学术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后勤指挥理论进入了一个发展繁荣时期,编写了具有中国军队特色的后勤指挥系列教材,满足了院校教学和部队训练的需要。一些后勤指挥理论著作相继出版,标志着后勤指挥理论已成为军事后勤学学科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著作有:1987年后勤学院学术研究所编纂的《后勤司令部组织与工作》,1988年余用哲编著的《后勤指挥学》,1990年后勤学院编纂的《军队后勤指挥研究》,1991年陈瑞

吕编著的《后勤领导艺术》，1993年冯亮、熊衍述主编的《军队后勤指挥学》等。这些理论著作都是以后勤指挥理论与实践为研究对象，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角度对后勤指挥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其主要内容和观点有：

①认为军队后勤指挥是“指挥员和后勤指挥机关运用后勤力量保障军队作战及其他军事行动所进行的组织领导活动”。其理论体系主要包括：军队后勤指挥发展史、军队后勤指挥规律、军队后勤指挥系统、军队后勤指挥活动、战略后勤指挥、战役后勤指挥、战术后勤指挥、军队后方防卫、后勤指挥自动化等。

②认为军队后勤指挥发展史，应按指挥组织形式进行分期，可划分为“将帅直接指挥时期”、“司令部指挥时期”、“后勤独立指挥时期”等三个发展阶段。

③认为后勤指挥主体与指挥客体相适应的规律是军队后勤指挥的基本规律，其他如后勤指挥系统各组成部分必须保持科学比例，后勤指挥的综合化与专业化要实现最佳结合，组织保障与指挥防卫必须统一，后勤指挥效能规定后勤保障效益等规律，是对基本规律某些方面的进一步规定和具体化。

④认为现代军队后勤指挥组织分三种基本类型。一是以原苏联和东欧国家军队为代表，由主管后勤的副指挥员通过后勤司令部统一组织实施后勤指挥；二是以美、西欧等国家军队为代表，由各级后勤副参谋长通过司令部中的后勤参谋机构对后勤保障部门实施后勤指挥；三是以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代表，在合成军队指挥员统一领导下，由后勤指挥员通过后勤指挥机关行使后勤指挥权。

⑤认为军队后勤指挥活动的核心是搞好决策。后勤决策是一种创造性思维活动，具有目的从属性、时间紧迫性等特点。因此，要把握好后勤指挥内容、程序和指挥方式，搞好指挥计划、协调、组织、控制等工作。

随着军事高技术的发展和后勤指挥理论

体系的进一步确立，高技术局部战争后勤指挥将成为研究的热点和重点；后勤指挥自动化、后勤指挥效益的评估等理论将会有长足的发展；后勤指挥理论研究将更多地采用定量分析方法，并与定性分析方法有机地结合，不断促进后勤指挥理论的发展。

参考文献

余用哲著：《后勤指挥学》，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

冯亮、熊衍述主编：《军队后勤指挥学》，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3。

(石文年)

军队财务研究

(study of military finance)

探讨军队经费取得、分配和使用及其所体现的各方面经济关系的活动。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中华民国就开始了军队财务研究。至40年代，出版了一批以军队财务制度为主的著作，主要有：《论审计制度》（1930）、《改良中国军队会计制度之研究》（1935）、《军需及会计行政》（1936）、《近代各国审计制度》（1940）、《财务法令辑要》（1947）、《财务之监察》（1948）、《新财务制度》（1948）等。这些著作论述了军队财务的组织机构、职能作用、业务处理程序；现行财务业务概况和存在的流弊及改革的途径；新财务制度与财务监察的优点与作用；审计制度的作用与一般程序等理论和方法。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财务研究始于革命战争年代，主要是结合革命战争实际，总结出军队财务的一些理论原则，反映在中央军事委员会颁发的训令、条例、标准规定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著作、讲话中。另外，为了解决战争时期财会人

员的需要,部队在供给学校、教导队和训练队进行了财会人员培训。根据教学需要,开展了一些学术研究,编写了一些以财会技术方法为主要内容的财务专业教材。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人民解放军进入了现代化建设时期。根据财务建设和后勤院校教学的需要,50年代初开始有计划地进行军队财务研究。在认真总结历次革命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财务保障经验和借鉴苏联军队财务工作经验的同时,结合当时军队财务工作,制定了一批财务标准制度,编写了一批财务教材。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981年9月,召开第一届全军财务理论讨论会;1987年9月,成立军队财务研究中心,使军队财务研究进入有组织、有计划的全面发展阶段。全军财务工作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紧密联系军队财务工作实际,积极开展学术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理论研究成果。在《后勤》、《后勤学术》、《军事经济研究》、《军队财务》等军队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军队财务理论研究文章。由蒋胜祥、王其昆主编的《军队财务研究论文选集》,从1987年起,每年出版1~3集。这些论文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军队财务体制、军队财务管理、军队基层财务管理、军队财务保障、经费供应标准化、军队财务法规建设、军队财务人才培养、军队财务改革等理论问题。

1986年,“军队财务学”作为军事学学科之一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重点研究课题之一。1991年10月,李家声编著的《军队财务学》正式出版。该书以中国人民解放军财务活动为主线,从商品、市场的角度全方位地论述了军队财务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是多年军队财务理论研究成果的集中反

映。其主要内容包括:军队财务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和理论体系,军队财务的产生与发展、本质与特点、地位与作用、职能与任务、管理原则与体制、组织与领导,以及军队基本建设财务管理、军队基层财务管理、军队会计基础、军队战时财务保障、军队经费效益等。认为:军队财务处于军队和经济的结合部,其根本目的是实现军队职能;货币及其运动是军队财务的基本要素和过程,军队财务的实质是反映军队发生的各种经济关系,具有阶级性、军事性、消费性、综合性、供给性和政策性等特点。

进入90年代后,军队财务研究进一步深入。1996年3月,成立军队财务科学研究所,动员和组织全军财务科研力量,深入开展军队财务研究。在此期间,还召开两次全军财务理论讨论会,召开多次全军专题性财务理论研讨会,出现一大批理论成果。总后勤部财务部组织编写出版了一些重要的理论著作和教材。主要有孙志强主编的《中国军事财务实用大全》、《中国军事后勤百科全书·军事财务卷》、《中国人民解放军财务简史》等。90年代后期编纂的《中国军事后勤百科全书·军事财务卷》,主要内容包括:军事财务体系、军事财务保障、军事财务管理、军事经费、军事预算会计、军队财务结算中心工作、军队国有资产管理、军事财务干部专业训练、军事财务科学研究、军事财务历史等。这期间,出版的军队财务理论著作主要有:王其昆、陈维丰、赵纪安主编的《军队财务学》;王俊英主编的《军队财务管理学》;熊友存等人主编的《军队财务管理心理学》;邓学伦、赵文芳主编的《军队企业财务管理学》;赵纪安、易杰明、张新主编的《海军财务管理学》;赵纪安、刘善良、张清主编的《军队基层财务》;杨震龙、王增祥、常世银主编的《军队企业会计学》;蒋胜祥、王其琨等主编

的《军事财务学研究》；罗叔勋、阮志柏主编的《军队财务实践研究》，以及《军队基本建设财务管理学》、《军队基本建设经济活动分析》、《军队基本建设会计学》、《军队基本建设审计》、《军队财务职业道德论》、《新时期军队财务管理理论与实践》、《军队预算会计学》、《战时财务》、《外事财务研究》等。这些著作全面论述了军队财务管理的对象、职能、基本任务、原则和体制，预算经费的分类与管理办法，经费供应的组织与管理，军队财务管理责任制，军队财务分析等内容。他们认为军队财务管理是指军队各级组织和广大财务人员为了保证军队建设和部队作战、训练任务的完成，对所取得经费的分配和使用过程所进行的一系列组织、计划、协调、监督、控制等活动；军队财务管理的要素是人、财物、时间、信息，军队财务管理的对象就是军队财务活动和军队财务关系。

为了适应新时期军队财务教学与干部训练的需要，总后勤部财务部组织有关后勤院校编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财务专业统编教材，包括《军队财务学》、《军队财务管理学》、《军费管理学》、《军队会计学》、《军队基层财务》、《军队国有资产管理概论》等，并先后于1997年、1998年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在今后的军队财务研究中，军队财务管理体制与方法的研究将逐步深化，探索提高军队财务管理效益的研究将成为主要课题，战时财务保障研究将引起更多的关注，在注重定性研究的同时将加强定量研究，军队财务理论体系将进一步发展与完善。

参考文献

俞国钧主编：《战时财务》，北京：长征出版社，1990。

李家声：《军队财务学》，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

蒋胜祥主编，王其琨、于健球、朱加荣副主编：《军事财务学研究》，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

朱连清主编，陈维丰、姬心中副主编：《军队财务学》，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

（胡福文）

国防费研究 (study of national defense expenses)

探讨国家用于国防建设和战争的专项费用的活动。军费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军费研究与国防费研究等同。而狭义的军费研究是指对国家用于军队建设和作战的专项费用的研究。而军事财政的研究对象是国防费的分配活动。

中国对国防费的理论研究始于20世纪初。中华民国时期，周亚卫著的《国防论》（1926）一书中，专设一章论述“国防费”问题。曹让尊编写的《国防论讲义》（1932）、卫挺生著的《战时财政》（1933）、关吉玉编著的《中国战时经济》（1936）、蒋百里著的《国防论》（1937）、钱俊瑞著的《中国国防经济建设》（1937）、千家驹著的《中国战时经济讲话》（1939）等著作，也都论述了国防与财政的关系问题。关吉玉认为，现代战争是敌我双方以整个国民经济相搏战，一国的财力，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因此，在大量筹集战争费用时，必须维持市场的稳定和保证整个经济的运转。战时财政收入不外有两大源泉：一为公债，二为租税。在长期战争中，租税较公债为优。征收租税，一方面可以抑制人民消费，防止通货过度膨胀；另一方面可以维持公债基金、巩固政府信用。千家驹认为，中国抗战前实行币制改革，建立法币制度，在战时起到稳定金融的作用，对支撑抗战贡献极大。中国战时财政收入应以发行公债为主，发行战时公债利率低，还本付息期限长，比增税易于实行。他还提出，在战时要注意进行货币战。40年代

出版的董问樵所著的《国防经济论》(1940)等著作,也对国防费理论进行了阐述。董问樵在论述财政金融动员时指出,财政金融动员的任务是平时财政过渡到战时财政,战时财政要满足对内和对外两方面的需要;对外需要主要是战时对外支付需要,对内需要主要是满足战争的开支。

80年代,国防费的研究引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财务部及其各级财务部门、后勤院校和有关科研单位的重视,围绕国防费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展开了研究,发表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出版了国防费研究的理论著作。90年代,国防费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主要围绕国防费的规模,国防费的分配,国防费的管理体制,军费的标准化、规范化管理,军人的工资福利待遇,军人保险,军队财务结算中心管理,军队财务管理自动化,战时经费的筹措与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深入研究,取得了许多重大的研究成果,对指导国防费管理起了重要作用。张忠义、樊恭嵩主编的《国防费概论》1990年由黄河出版社出版,主要论述了国防费与国力、军力及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国防费的构成、预算与分配、管理,使用与效益;战费来源与筹措,战时军票与黄金储备,战费消耗与调控;国防费的预测与发展趋势等理论问题。陈维丰、熊友存、朱连清等编著的《军费管理学》1990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主要论述了军费管理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军费管理的意义、任务、方法与要求,军费的分类及管理办法,军费供应标准制度,军费的预算及生活性、公务性、事业性、建设性和预算外经费管理,军费的结算与决算,军费使用效益考评等理论。该书认为,军费是军队赖以生存、发展及履行职能的物质基础。合理组织军费供应,加强军费科学管理,对于端正军费活动的正确方向,保证军队建设的各种经费需要,

实现少花钱多办事的需要,具有重大意义。军费管理的总任务是:筹集分配经费,保障经费供应;合理使用经费,加强经费管理;监督经费活动,提高使用效益;考评经费活动,保证经费的合理使用。

1991年和1992年由张振龙等主编的《军事财政学》分别出版。这两本理论专著紧密联系中国的国情、军情,主要论述了军事财政分配的基本原理和军事财政分配结构、军事财政分配关系、军事预算与战争财政、军事财政分配效益等方面的理论。90年代中期后,由鲁祝好主编的《中国军事经费管理》,袁明全主编的《军费运动论》、《军费经济研究》、《世界军费研究》,陈代兴等人著的《军费经济学》等著作先后出版。《中国军事经费管理》是一部由全军各级财务部门以及部分后勤院校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和业务骨干编写,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全面系统论述军费管理的专著。该书论述了中国军事经费管理的历史沿革、军事经费管理体制,军费管理的职能、作用和一般方法,军费管理中的主要矛盾和基本规律,军事经费管理法规,军事会计,军队财务结算中心经费管理,军队审计的作用和效益,军事经费管理效益,军事经费管理艺术,军事经费供应标准化,军事经费自动化管理,军队各项经费管理等方面的理论。《军费运动论》主要围绕军费的规模、军费的结构优化、国防预算、军费流量与存量等方面,探讨军费管理的客观规律。《军费经济学》系统论述了军费经济学的概念及其研究范畴,军费的起源与发展,军费的功能,军费的需求与供给,新时期军费保障的现状、军费预算改革及军费预算的结构调整与优化,军费管理体制的改革,国有资产管理,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条件下的战时军费动员,以及新时期军费效益等理论问题。

进入21世纪,国防费占国家财政支出的

比例,国防费的分配、使用与管理等理论问题,将是国防费研究的重要内容;国防费的标准供应、国防费使用效益等问题,将是热点课题,战时军费的筹措与保障也将成为国防费理论研究的重点。

参考文献

张忠义等主编:《国防费概论》,济南:黄河出版社,1990。

鲁祝好主编:《中国军事经费管理》,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

袁明全主编:《军费运动论》,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

陈代兴等著:《军费经济学》,北京:海潮出版社,1998。

(胡福文)

军需勤务研究

(study of quartermaster service)

探讨军队组织被服装具、给养、饮食装备等物资供应与管理理论的活动。主要研究军队给养、被装、农副业生产管理、战时军需勤务等方面的理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就开始军需勤务研究。为了适应陆军军需学校教学的需要,1915年,由葛海涵、何伟业编辑的《粮秣经理教程》(上卷)出版,讲述军队食品的营养价值、质量及制备方法,并配有插图。在此前后,训练总监编辑局出版了《给养勤务》一书,主要论述给养保障的内容和范围,在不同条件下给养保障的基本要领、组织计划、方式和方法等问题。张学良提出了“军需独立”的观点,他认为,把军需业务从经理部中独立出来,在各级主官指挥监督之下,依法处理军需业务,是近代一些西方国家的通行做法,有利于减轻部队长官的烦累和改进业务,是军队建设和作战的需要。

20世纪30~40年代,军需勤务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30年代出版的教材、著作主要有:吴汲明编著的《作战给养》(1932)、军需学校编写的《粮秣经理教程》(1933)、墨林翰著的《军需问题》(1934)、赵志焯主编的《军需法规》(上下集,1934)、周莹编著的《军需征用》(1938)、熊仲韬编著的《军需讲话》(1939)等。这些著作,论述了军需勤务的地位作用和职能,军需保障的一般程序和方法,以及现行的军需制度等内容。其中《作战给养》一书分六编,主要论述战时给养的准备、战时给养、战时给养品补充、给养机关及给养统辖实施、兵站、辎重等内容。40年代出版的教材和著作主要有:军需学校编印的《被服经理教程》(1940)、何应钦著的《军需独立之要义》(1942)、国防研究院编写的《被服装具之采用与装备》(1943)、联合勤务干部训练班编写的《被服之保管与补给》(1947)、钟英编著的《军需业务之监察》(1947)、副食学校编写的《膳食管理》(1948)等。这时期,军政部军需署还编纂了《军需法规》、《军需法规要览》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革命战争年代,结合革命战争实际,探讨军需保障的原则、方法和标准制度。1933年,范树德发表文章,论述了开展“种菜运动”,提高部队供给能力的问题。1934年,陈毅发表文章,介绍永丰游击小组的战斗经验,其中就有筹措给养的办法。1949年,中央军委后勤部在年度军需生产工作总结中,提出了军需生产的优缺点、经验教训和改进办法。此外,为了做好军需保障和提高军需人员的业务水平,部队在供给学校、教导队和训练队进行了军需人员培训。根据教学需要,开展了一些学术研究,编写了一些以军需保障的方法与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军需专业教材。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为了适应军需

教育训练的需要,从50年代初起,有关后勤院校为了编写军需训练教材,进行了必要的军需勤务研究。在总结历次革命战争、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军需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军需研究,充实教材内容。

70年代末以后,军需研究有了很大进展。为了适应战时保障和部队军需专业训练的需要,总后勤部军需部组织各大军区、海军、空军和第二炮兵军需部门以及后勤院校,进行了作战条件下军需保障研究,编写了《战时军需勤务概论》、《陆军师(团)进攻、防御战斗军需勤务》及《海军舰艇部队军需勤务》、《航空兵部队战时军需勤务》等教材。80年代初,总后勤部还组织编写出版了《军队给养》和《军队被装》等教材。

1986年,《军需勤务学》作为军事学的一个独立学科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重点研究课题之一。1993年2月,由刘世泰编写的《军需勤务学》正式出版。该书主要论述了军需勤务的基本概念、基本特点、基本原则和基本任务,平时供应与管理 and 战时组织指挥、保障的理论原则和方法等;提出了军需勤务的基本特点表现为基础性、服务性、经常性、区域性四个方面,认为军需勤务保障处于军队保障勤务的第一层次,是最基本的服务性勤务,其职能是从给养、给养装备器材、被服、装具及日用品等方面,保障部队平战时需要,保持和增强指战员体质,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为了适应军需专业高等教育的需要,加速军需专业干部培训的进程,在全军广泛开展军需勤务研究的基础上,总后勤部军需部组织编写了一套包括《军需勤务管理概论》、《军队给养学》、《军队被装学》、《农副业生产管理》等十部高等教育军需专业统编教材。90年代中期以后,总后勤部军需部还组织编写出版了《军需简

史》。根据总后勤部的统一安排,组织编写《中国军事后勤百科全书·军需卷》,其内容包括军需组织体制、被装勤务、给养勤务、军队农副业生产、军需专业训练、军需科研、战时军需保障、军需历史等。80年代至21世纪初,出版的军需著作和教材还有《军队营养学》、《服装卫生学》、《军队被装工效学》、《部队农场管理学》、《陆军应急机动作战部队军需勤务》等。军兵种军需勤务理论研究有了很大进展,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出版了《海军军需勤务》、《空军军需勤务》等一批军兵种军需勤务理论著作和教材。

为了加强军需勤务研究和学术交流,总后勤部军需部创办了《军需》杂志。70年代末以来,在《后勤》、《后勤学术》、《军事经济研究》、《军需》、《解放军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军需方面的学术论文,对军需勤务的各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特别是90年代以来,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高技术局部战争军需保障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理论成果,总后勤部军需部将其中一部分学术价值高的论文先后结集出版,有力地指导了军需工作。军需勤务理论体系已经初步形成,为军需勤务学科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1世纪初,军需勤务理论的发展趋势主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高技术战争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军需勤务将成为研究的重点,军需管理研究将进一步深化,军需勤务学科体系将进一步发展、充实、完善。

参考文献

刘世泰著:《军需勤务学》,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3。

张绍南著:《军需勤务管理概论》,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

(胡福文)

军队卫生勤务研究

(study of army health service)

探求军队卫生工作及其组织管理理论的活动。后勤理论研究的组成部分。卫勤理论是建立在医学、军事学和管理学基础上的交叉学科理论,它是卫勤实践经验的抽象和概括,并为卫勤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和指导,接受卫勤实践的检验。发展卫勤理论,对于军队平时、战时卫生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卫勤理论是在长期卫勤实践活动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广大的卫勤管理人员在反复的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掌握医药卫生工作的基本规律,积累了丰富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经验,为卫勤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中华民国时期的卫勤研究 卫勤理论是在长期卫勤实践活动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国进入近代以后,军队中已经形成了系统的卫生勤务组织和一定水平的卫勤理论研究。在军阀混战的年代,政府及割据的军队沿袭清制,在军队中建立了卫勤保障体系,并且开始了卫勤理论的传播与交流。1912年北洋政府在师、旅司令部设军医长,团设医务所,营设军医官,师平时有医院。卫勤机构的建立,为卫勤理论研究创造了条件。1929年10月出版第一期《军医公报》,1934年8月出版了史国藩编写的《卫生勤务》,系统地阐述了不同作战样式的卫生勤务,战时的防疫、防化和细菌战等问题;介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军的卫生勤务和蒋冯阎战争中的卫生勤务。由训练总监部审定、郭昌锦编著的《战时卫生勤务令草案之研究》(1936),系统地规定了战时各种卫生勤务的组织、任务及职责,阐述了“红十字会的卫生勤务”,介绍了红十字国际公约和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管理条例。1938年9月国民党军政部军医署编印的《军医必携》也介绍了有关卫生勤务的理论。为了

切磋、宣传和交流卫生勤务理论与经验,1947年1月1日出版了《军医月刊》,还出版了《战时卫生工作规程》。

革命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卫勤研究 中国人民解放军卫勤理论是在毛泽东人民战争和人民军队思想的指导下,吸收国内外先进卫勤理论,经过多次战争的卫勤实践,而逐步形成的。①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即形成了卫生工作为革命战争服务,一切为了伤病员,一切为了部队健康的卫生工作原则,卫生防病工作形成了预防为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思想。1931年由中央军委总军医处主办了《健康》报,1932年由总军医处主办《卫生讲话》通俗刊物,1933年由红军卫生学校主办《红色卫生》杂志,传播卫生勤务知识。1933年印发了《连一级卫生勤务》、《师以上卫生勤务纲要》和《卫生法规》,1933年10月中央军委颁发了《暂行传染病预防条例》,反映出当时卫生勤务研究的水平。②抗日战争时期初步确立了军队卫勤组织建设基本模式和卫生法规体系,并结合游击战的特点,形成了军民结合、寓救于民、巡回医疗、分散救治的基本原则。1943年5月,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卫生部门中的教学问题的通令》,要求各级卫生机关组织“卫生勤务研究小组”及“医药讨论会”。中国医科大学和各卫生学校也编写和讲授卫生勤务教材。其间,出版了白求恩编写的《游击战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与技术》。③解放战争时期进一步完善了卫勤思想和原则,编印出版了战时卫生勤务的读物,1946年东北民主联军总卫生部长贺诚编译出版了《卫生勤务基础》;《健康》报作为东北民主联军总卫生部的机关报,于1946年复刊,1948年发行量增加到7000份,东北野战军还主办了《野战卫生》,华东野战军主办了《部队卫生》等报,对开展卫生勤务研究起到促进作用;仅1949年一年中,出版《创伤初期

切除术》、《关于休克》、《新药知识》等12种军事医学书籍,共3130册;各野战军还对战争卫勤保障进行了系统总结,如华东军区、华北军区都组织编写了卫勤保障总结。战时卫勤保障理论逐步形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卫勤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卫勤研究得到较快的发展。①50年代初期,学习苏联红军卫勤经验,结合中国革命战争卫勤保障实际,编译了一系列的卫生勤务教材;1957年,经过系统整理和理论提炼,颁发了医疗预防、卫生防疫、药材供应管理和卫生统计四个卫生工作教范,系统地规范了军队各级的医疗预防、卫生防疫、药材供应管理和卫生统计工作。同年还出版了抗美援朝战争卫生工作总结《卫勤组织及战术》。1958年,军事医学院建立卫生勤务研究室,成为全军第一个卫勤学术研究机构。此后,空军、海军也相继建立了卫勤研究机构。②60年代,出版了《平时卫生勤务》、《师团卫生勤务》、《空军卫生勤务》、《海军卫生勤务》等教材;1962年总后卫生部颁发《战伤救治原则》,于1965年、1977年修订再版,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卫勤理论内容,初步建立起平时卫勤理论知识体系。1963年创办《人民军医卫勤学术增刊》,1991年后更名为《人民军医卫勤学术专刊》,1998年经国家新闻出版署和总政治部宣传部批准创办《解放军卫勤杂志》,大大地促进了卫勤学术的繁荣与交流。③70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卫生勤务理论发展处于低谷时期,尽管如此,广大卫勤人员仍排除干扰,继续坚持卫勤理论的探索。1971年经过部队演练的实践检验,编写了核条件下《战时卫生勤务手册》,1976年总后勤部卫生部编印了《战时卫生勤务教材》。④80年代是卫生勤务研究有较大发展的时期。1981年完成了《中越边境自卫还击

作战卫勤保障工作总结》,1985年总结了老山、者阴山自卫还击作战卫勤保障基本经验,并提出了战时伤病员空运后送的组织指挥模式和原则。1983年和1984年,总后勤部卫生部和空军后勤部卫生部各组建卫勤研究室,加强卫勤的学术研究。1983年、1986年、1989年先后召开了三届全军卫勤学术会议,交流了卫勤学术研究成果,共商了“七五”、“八五”两个全军卫勤学术科研规划,从而使卫勤学术研究走上了有统一规划、有正规科研管理、有技术队伍保证的研究道路。1987年提出并探索了以就近医疗、药材供应、设备维修为主的陆、海、空三军相互代医、代供、代修的划区联勤保障模式。80年代末,总后勤部卫生部召开了“战役卫勤理论研讨会”,明确了“三级指挥,两级保障”的模式。尔后,相继编写出版了《战役卫生勤务学》、《战时卫生勤务学总论》、《战术卫生勤务教材》,形成战时卫生勤务学系列教材;同时,总后勤部卫生部还出版了《平时卫勤管理学》,进一步丰富了卫勤理论。在编写后勤理论丛书之一《军队卫生勤务学》中,探索了平、战时合一的卫勤理论。随着《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卫生勤务分册》的编纂,对卫生勤务概念和理论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使卫生勤务逐步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⑤90年代初,引进了社会医学的理论,运用社会医学的方法研究部队卫生工作,在全军开展了卫生资源的论证调查和部队卫生服务需求与利用调查,从而对军队正处在医学模式的转变和两次卫生革命当中的现实,有了清醒的认识,解决了对当时卫生工作中一些问题的困惑,提出了“医疗、预防、保健一体化”的保障模式。在80年代研究的基础上,90年代卫勤理论建设研究达到了更高的水平,一批重要的卫勤著作相继出版。1991年和1992年分别出版了《卫生勤务学词典》和《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卫生勤务分

册》，明确了卫生勤务的基本概念和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对卫生勤务学理论体系进行了探讨。总后勤部卫生部先后出版了《战时医院管理》、《军队医院管理学》、《中国军事医学史》；海军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编写出版了《海军医学地理》。⑥1996年，经中央军委江泽民主席签署颁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卫生条例》，进一步明确了军队卫生工作基本体系和制度，并提出了“面向部队，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依靠科技进步，动员全军参与，为巩固部队战斗力服务”的新时期军队卫生工作方针。

参考文献

史国藩编：《卫生勤务》，京华印书馆，1934。

郭昌锦编：《战时卫生勤务令草案之研究》军用图书社印，1936。

总后勤部司令部：《军队卫生勤务学》，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

朱克文、高恩显、龚纯主编：《中国军事医学史》，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96。

(孙海)

军事医学研究 (study of military medical science)

探讨军事活动条件下防治伤病，保障军队成员身心健康的活动。其主要任务是以普通医学的理论为基础，结合军队所处的特殊环境条件，探索和总结出特殊的医学规律，预防和治疗军队成员在军事活动中发生的伤病，预防不良环境因素的影响，提高部队的生存能力和健康水平，维护与增进军队战斗力。

20世纪以来，两次世界大战和许多局部战争，除大规模使用常规武器和各种特殊装备外，又先后出现了有特殊杀伤力的武器。1915年4月22日，德军首先在比利时的伊普尔地区大规模地使用了氯气；1917年，德

军在美索布达米亚使用了马鼻疽杆菌等生物武器。1936年，日本在中国大肆制造生物武器，并多次播撒鼠疫杆菌，造成鼠疫流行。1945年美国首次在日本使用了核武器。新式武器的出现，促使军事医学针对这些问题拓展新的学科，进行新的研究，形成了一系列新的分支学科，以前已形成的分支学科也增加了新的内容。军事医学在原有学科体系的基础上，形成现代军事医学学科体系。主要的分支学科有：卫生勤务学、野战外科学、军队卫生学、军队流行病学、军队药材管理学、军队卫生装备学、核武器医学防护学、化学武器医学防护学、生物武器医学防护学、军事毒理学、军事航空医学、军事航海医学、潜水医学、军事劳动生理学、野战内科学、军事法医学，以及军事兽医学等。

清末和中华民国时期的军事医学研究中国军队的军事医学研究和教学也可追溯到本世纪初。1901年，北洋常备军在兵备处下设立医务股，除掌管军队防治伤病外，还负责医学教程的修订。1902年，北洋海军在天津开办行营医学堂，后改称陆军军医学堂，以后又在广东设立海军军医学堂和陆军军医学堂，除进行近代医学教育外，还担负考求各国卫生之术的任务。20年代后期，中华民国的军事政治学校编印了《军队卫生教程》，军官学校编印了《最新军队卫生学》等。30~40年代有了更细的分科，出版了郭昌锦编著的《战时卫生勤务令草案之研究》，系统地规定了战时各种卫生勤务的组织、任务及职责；阐述了红十字会的卫生勤务，介绍红十字国际公约和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管理条例。此外，还分类编印出版了《战地救护法》、《战地救护学》、《战时外科学》等野战外科类的教材；《食物卫生》、《饮水卫生》、《战时医药》、《选兵医学讲义》等卫生学教材；《毒气病学》、《兽医防治须知》、《红十字条约解释》、《输血疗法》等一批

有代表性的著作。在当时编著出版的卫生勤务著作中,还比较详细地介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卫生勤务和1930年蒋冯阎战争中的卫生勤务。说明当时对军事医学已有了较深入的研究,并初步形成了中国军队的军事医学体系。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医学研究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来重视军事医学研究。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探索了适应当时环境的战伤救护组织、依靠群众预防疾病等多方面的经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学习国外经验的基础上,编译出版了一些军事医学著作,主要有:抗日战争中白求恩大夫及加美医疗队编写的《创伤》、《战伤治疗技术》、《战地外科组织治疗方法草案》、《游击战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与技术》等;解放战争中,季钟朴等翻译的《现代战争外科学》、《战伤疗法》,贺诚编译的《卫生勤务基础》,宫乃泉编写的《腹部战伤》、《血管战伤》和王斌等编写的《近代战争治疗集》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建立了军事医学的专门研究机构。1951年8月,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科学院,1954年成立海军医学研究所和航空医学研究所。1960年以后,各军区也成立了军事医学研究所,军队医学研究体系基本形成,军事医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①在核、化学、生物武器医学防护研究方面取得新的进展。通过采用计算机和图像分析技术,基本完成热释光剂量系统和染色体畸变自动化分析的研究;基本完成了抗真菌新药的实验室合成研究,找到了几种防治放射性间质肺炎有苗头的药物,使极重度骨髓型急性放射病的诊治水平有所提高;建立了“全军医用放射剂量监测研究总站”,为放射治疗提供监督、咨询和服务;研制了放射卫生监测车,装备有关部队使用;编印了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损伤的医学防护手册与教材,如《急

性辐射损伤诊治手册》等。②在野战外科学的理论与技术研究方面有了新的进展。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62年成立烧伤专业组,每两年进行一次学术活动,已召开过15次全军性的学术会议。自1985年以来,已举办多届中美国际烧伤学术会议及其他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一些基层医疗单位在烧伤治疗上也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屠开元等曾在1962年开始进行狗腿断离再植的实验研究;1963年陈中伟再植完全断离的前臂成功;后来国内对各种复杂断肢均有再植成功的记录,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快速运送能力的提高,不但平时创伤性断肢(指)再植成功率进一步提高,战伤性断肢(指)也完全可以再植。而且,一些部队医疗单位也具备了进行断肢(指)再植的能力。1998年出版的由黎鳌、盛志勇、王正国主编的《现代战伤外科学》集中反映了这方面的成果。③军事航空医学、军事航海医学和潜水医学在人—机—环境的医学适应研究方面取得了进展。航空医学紧密结合新机种、新装备,对高过载防护、克服空间定向障碍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实验研究中取得了航海医学保障与舰艇卫生学方面许多可贵资料;深潜水的医学保障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④在军事预防医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进展。编写出版了《军队卫生学》、《军队流行病学》、《寒带地区、热带地区、高原地区军队卫生工作手册》,进行了全国重要战略地区和沿海地区的军事医学地理调查,对威胁部队健康的重要传染病,进行了系统的流行病学调查与病因学探讨,出版了《海军医学地理》等专著。⑤在总结历次作战卫勤保障经验的基础上三次编写修订出版了卫生勤务学教材。通过吸收引进现代管理科学、预防医学、社会医学、卫生经济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出版了《卫勤学术研究方法与实践》专著,编著了《军队

平时卫勤管理学》、《军队社会医学》等教材。各军医院校还在毕业学员中开展了“军事医学综合演习”，进一步提高了学员的军事医学素养。⑥在军队卫生装备的研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研制成功了多种新型个人卫生装备、创造性地制作了野战医用箱。80年代研制成功了野战卫生技术车辆和空运伤员卫生装备。90年代随着“世昌号”直升机训练舰作为代医院船的服役，研制成功了船用医疗模块。⑦在军事医学研究中，勤务与技术的结合研究也有新的进展。90年代末期，一些研究课题把野战外科与卫生勤务结合起来研究，把军事病理学与卫生勤务学结合起来研究，出版了《军事病理研究进展》专著，进一步推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医学研究的发展。

发展趋势 进入21世纪，军事医学将有新的发展，核、化学和生物武器损伤防治将取得新的进展，某些难治的军用毒剂和病毒性传染病的检验、预防、治疗等将有新突破；常规武器的高技术化和新武器的出现，医学的发展，将促使一些新的学科出现，各种武器损伤防治技术日趋结合，军事医学防护概念和内容将有新的变化和扩大；军事医学成果将日益向平战结合、军民两用方面发展；一些新的学科知识，如工效学、心理学、行为科学及有关社会科学内容，将引入军事医学领域，同军事医学各学科逐步结合，发挥其作用；军事医学技术与卫勤学术互相促进，协调发展，促进军事医学的全面进步。

参考文献

军官学校编：《最新军队卫生学》，武学书局印，1928。

李兆实编：《战地救护法》，商务印书馆，1938。

薛健著：《战时外科学》，中国文化服务社陕西分社，1942。

朱章庚编：《战时医药》，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印，1938。

朱克文、高恩显、龚纯主编：《中国军事医学史》，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96。

(孙海)

军队物资勤务研究

(study of military materials service)

探讨军队组织工业品生产资料供应和管理理论的活动。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物资勤务研究，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开始的。由于院校教学和业务建设的需要，20世纪50~60年代，有关后勤机关和军队后勤院校进行了物资勤务的研究，在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物资保障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一批军队物资供应、管理的标准和制度，编写了有关的军队物资勤务教材。

70年代后期，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了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随着全军学术研究的繁荣，军队物资勤务研究也有了迅速发展。为了适应军队后勤建设和后勤教育训练的需要，学术界重点对平时军队物资供应管理和战时的物资勤务保障理论进行了研究，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编写了一批物资勤务教材。80年代初由后勤院校出版的教材就有《军队物资供应管理》、《战时物资保障》等。

80年代中期后，军队物资勤务研究不断深入。一批物资勤务理论专著和教材陆续出版。由张学敏等人编写的《军队物资供应管理学》于80年代末在教学中使用。王应林主编的《军队物资管理学》、桂金鹏等人编写的《军队物资站库管理学》、丁炳南编著的《军队物资财务会计》等分别于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先后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军队物资供应管理学》主要论述了军队物资供应工作的特性，军队物资供应管理的内容、原则和一般方法；军队物资供应管理的基础工作，军

队物资供应管理系统环境和系统基础要素,军队物资筹措、储备、分配与供应,以及军队物资供应活动统计分析效益评价。该书认为,军队物资供应工作,是军事后勤工作的重要内容,同时又是国家物资流通的一部分。它是联结物资产品生产同军事消费的桥梁和纽带。军队物资供应工作既是国家经济中的军事要素,同时又是国防军事中的经济要素。军队物资供应工作的这种桥梁、纽带作用,决定了军队物资供应工作既要与国家要求相适应,又必须与军事指挥关系和后勤保障体系相一致。军队物资供应工作具有消费的军事性、供应物资的商品性、服务的间接性、业务的复杂性等特点;军队物资供应工作必须坚持为部队服务,深化改革,加强管理,提高保障能力,讲求效益的指导思想。军队物资供应管理的基本原则是:对国家负责和对军队负责的一致性原则,最佳效益原则,平战结合原则。《军队物资管理学》一书运用物资经济理论、军事经济理论和现代管理科学理论与方法,系统地阐述了军队物资管理的一般原理和方法。其主要内容包括:军队物资管理的性质、任务、原则、方法,军队物资管理目标、组织和体制,军队物资预测与决策的基本原理,军队物资消耗定额与计划,军队物资的筹措、储备、供应与使用,军队物资管理的经济效益,战时物资保障的特点、任务、原则和实施方法等。该书认为,军队物资管理的基本任务是:根据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以及物资的资源和需求情况,及时、准确、经济地为部队完成平时和战时的各项任务提供物资保障。军队物资管理的基本要求是:科学计划,严密组织,适时控制,准确评价。军队物资筹措必须遵循对路适用、数量适当、质量优良、进货及时、费用节省等要求;建立科学合理的物资储备,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是:按需储备,统一规划,讲求效益,储管

并重;军队物资供应的基本要求是:集中统一供应,按定额、标准供应,就地就近供应,配套供应,及时均衡供应。

90年代中期,为了适应军队物资专业教学和训练需要,在全军物资勤务研究的基础上,后勤指挥学院又编写了一批新的军队物资勤务教材,主要有程文生编写的《物资干部理财》、张学敏编写的《军队物资仓库管理》、杨全斌编写的《军队物资工作实用经济法教程》、王慧编写的《物资信息管理》等。总后勤部物资油料部根据总后勤部的统一要求,组织编写了《中国军事后勤百科全书·物资勤务卷》,内容包括基本概念,物资勤务体制,物资计划、物资筹措、物资储备、物资供应,物资财务,物资信息处理,物资专业科技训练等。

为了加强军队物资勤务研究与学术交流,1987年总后勤部物资部创办了《军队物资》杂志。在《后勤》、《后勤学术》、《军事经济研究》、《军队物资》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军队物资勤务方面的论文。特别是90年代以来,军队物资勤务研究主要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物资筹措、储备、供应与管理,以及高技术局部战争条件下的物资保障展开,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如《军队物资保障新模式的总体构想》、《军队后勤物资供应基本理论研究》、《军队物资统筹供应难点及对策研究》、《关于军队物资油料保障社会化改革的思考》等。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军队物资勤务必须适应市场经济的新形势,改革筹措、储备、供应与管理的体制与办法,要大力推行政府采购制度,实行集约统筹。同时认为,在高技术战争条件下,中国军队物资保障具有物资资源筹措市场化、物资保障综合化、间接产品间接保障等特点;为适应新形势下物资保障需要,应建立三军一体、统分结合的供应体系,军民一体的保障体系

和动员体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军队物资筹措与供应、现代高技术战争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军队物资保障将是军队物资勤务研究的热点和重点,军队物资保障效益研究将引起重视,军队物资勤务理论体系将逐步形成与发展。

参考文献

王应林主编:《军队物资管理学》,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

桂金鹏、杨家文、周国安编:《军队物资站库管理学》,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

(胡福文)

军队油料勤务研究

(study of military POL service)

探讨军队组织油料及油料装备供应、保障规律的活动。是军队后勤理论研究的组成部分。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油料勤务研究是随着军事装备的发展和作战理论的更新而不断发展的。大体经过三个发展阶段。

建章立制阶段(20世纪50~60年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装备的改善,油料消耗剧增,油料供需矛盾非常突出。为加强油料供应工作,1950年11月,中央军委决定总后勤部组建油料部,统一负责陆、海、空军油料供应及油库修建等工作。不久,各级后勤部门也设立了油料勤务机构。当时油料勤务研究总的指导思想是学习、借鉴苏联军队油料勤务工作经验,结合人民解放军油料勤务实际,以“保障供给”为中心,研究解决军队作战保障、教育训练和各项业务建设所急需的油料问题。主要是拟制油料勤务各项规章制度,编写教材、条令等。1950年2月,总后勤部颁发了油料

《按车定量供应制》。1952年2月7日,聂荣臻代总参谋长给总后勤部写信,希望立即订出油库各项工作规章制度,提高油库干部业务技术水平。在苏联顾问协助下,军队油料部门很快译编出《油库组织编制工作职责》、《油库工作制度》、《油库技术作业章程》等规章。经中央军委批准,1952年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后方勤务学院,设油料系,培养全军中高级油料勤务干部。1954年9月,该院油料系供给教授会编写出反映人民解放军平时、战时各级油料供给工作组织、计划及保障方法的第一部《油料勤务》教材,并用于各系本科班、短训班一期教学。从1954年起,油料供应实行限额分配制,总后勤部制定了军队《油料消耗标准(草案)》。1960年9月,总后勤部批准颁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油库工作制度(草案)》。1966年,全军后勤供应实行财务统管,车、船油料供应由限额分配制改为“计价供应制”。

理论升华阶段(70~80年代) 面对越南战争、中东战争、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等几场局部战争的现实,军队对油料勤务的认识有了新的飞跃。随着军队机械化、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油料消耗占作战物资总耗量的比例与日俱增,油料保障对战争的进程与结局产生重要影响。由此,促进了油料勤务研究进一步深入,对油料勤务的地位、作用、使命等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如:“油料是现代战争的血液”、“油料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油料与飞机、舰艇、坦克等作战装备构成了战斗力的统一体”等。对油料勤务的发展必须适应军事思想、军事技术发展的这一基本原则的认识,不仅有普遍性,而且得到了广泛的理论论证。周培德撰写的《油料工作发展战略浅探》论文(《后勤学术》1987年第5期),提出了“要研制出能与本世纪末军队武器装备相匹配的系列化油品

及野战油料补给装备器材,并建立保障平时周转和战争初期需要的适量油料储备,以保障未来战争需要”的观点。耿万良撰写的《军队油料勤务学的沿革与发展趋势》论文(《后勤学院学报》1988年第5期),对这一时期军队油料勤务发展动向概括以下几点:一是变革油料补给方式,由以整装为主转向以散装为主,以适应现代战争油料需求量大,补给效率高的要求。二是油料补给与兵器发展日趋“同步”运行。三是油料保障手段开始成为战术技术的重要组成。四是油料供应基地化,并具有筹、储、运、补、修、训的功能,以利供应的稳定和发展。

理论更新阶段(90年代末) 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高技术武器的威力得到充分展示,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油料保障方式令人耳目一新。这一时期,高技术局部战争油料保障研究比较活跃,专题研讨会的学术论文汇编及理论专著陆续出版,取得了显著的学术研究成果。主要的代表著作有:1993年7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编辑出版的《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油料保障研究》;1988年1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油料部委托后勤学院油料教研室编写的《军队油料管理》;1994年10月,耿万良、邢振昌编著的《军队油料勤务学》;1998年4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物资油料部编著的《高技术战争油料保障研究》;等等。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油料保障理论更新体现在以下方面:

①从战场地理环境出发,突出沿海、周边地域空、海战场及特殊条件下油料保障理论研究。依据国际局势新变化及中央军委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预测认为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在中国沿海、周边地域发生的可能性增大,空、海军作战地位突出,空、海战场油料消耗比例约占用油总量的70%以上,且比地面

品种多,质量要求高。周边、沿海地理、气候条件恶劣,地形复杂,交通不便,油料保障受客观条件制约,保障难度大。因此,空、海战场及特殊条件下的油料保障成为理论研究的重点。如《高技术战争油料保障研究》一书中,重点汇编了《高技术局部战争空军油料保障的特点及对策》、《对未来海战舰艇油料补给方法的研究》、《渡海登陆作战油料保障对策》、《高技术条件下登陆战役油料保障》、《高技术条件下山地作战油料保障》、《高原寒区作战油料保障研究》、《沙漠地区作战油料保障研究》、《高技术条件下岛屿防御战斗的油料保障》等36篇学术论文。

②针对高技术局部战争突发性、节奏快的特点,提出了油料保障快速反应理论。由于电子计算机等高新技术大量运用于战场,加之军队现代化水平的提高,作战的节奏加快,使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的突发性增大,并大大地压缩了作战全程时间,从而改变了以往油料消耗规律,呈现出单位时间内高油耗的特点,由此带来短时间高需求、急补充的突出问题,油料保障快速反应理论应运而生。基本理论观点是:做好预设战场及油料保障预案;加强“快反”油料保障部(分)队建设,发展“拳头”力量;加快油料及油料补给装备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做好油料保障力量的等级战备工作;严格“快反”油料保障训练,使之具备应急、快速、机动、综合保障能力;等等。

③针对高技术局部战争军兵种联合作战特点,提出了“军民兼容,三军一体”的油料立体化保障理论。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是陆、海、空联合作战,需要为陆、海、空三军快速机动的战斗装备,实施伴随机动、大批量的立体保障。基本理论观点是:平时着眼战时,建立并完善“军民兼容,三军一体”的联勤体制,战区形成便捷的全方位油料补给

网;军队、地方全面动员,统一指挥,军地联供,形成合力;军地联合实施网络型划区快速机动的“立体化”保障;油料补给与陆、海、空军战术、技术运用相适应,变被动的后勤保障为积极的战斗支援。如:为实施远程战略突袭,战斗机必须借助于空中加油机,从而使油料补给与战术、技术融为一体,成为战术、技术运用的前提。

④针对高技术手段给战争“血液”带来的威胁,提出了全新的油料安全防护理论。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敌对双方往往把摧毁输送战争“血液”的基地与油料保障网作为重要的目标,加之高精度、高灵敏度、高穿透力的现代先进侦察系统和精确制导武器大量运用于战场,使有些传统的伪装失去了效用,储油基地及补给网可能暴露在敌人的红外、电子、雷达和卫星的监视之下,且油料易燃、易爆,安全防护面临严峻考验。如何有效地对付敌方的高技术侦察和打击,提高油料保障力量生存能力,成为研究重点,主要观点是:在强化有效的传统防护技术基础上,树立高科技防护观念。如:在油料装备生产中应尽量采用新材料和隐形技术,使用中注意采用多光谱伪装网覆盖目标等科学方法;改变后方较前方安全的观点,树立“全方位立体”防护意识;树立在“动”中求生存意识;建立整体防卫体系观念。

发展趋势 展望 21 世纪,军队油料勤务研究将着重从战略上探讨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预设战场及油料保障预案理论;深入研究“军民兼容,三军一体”的油料供应保障体制,以适应“市场”,保障“战场”;深入研究如何应用高新技术使油料、油料装备与军事装备战术、技术性能发展“同步运行”机制;深入研究适应不同战法的配套的油料保障理论,深入研究油料勤务保障装备的信息化、数字化,实现油料保障有力的目标。

参考文献

后勤学院油料教研室编:《军队油料管理》,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耿万良主编:《军队油料勤务学》,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

(那荣成)

军械勤务研究

(study of ordnance service)

探讨组织实施军械物资供应、管理和军械技术保障理论的活动。主要研究军械装备及其他军械物资的供应、补给、管理,军械装备维护、修理,平时和战时军械保障的特点、规律、方法及组织指挥等。

军械勤务研究是随着军械装备和军械工作的发展,在战争实践和军队建设实践中逐步开始和不断发展的。20 世纪初中国军队只有零星的、比较粗浅的军械勤务研究,其理论观点大多散见在早期的有关后勤著作、教材或有关部门、人士的文稿之中。1929 年出版的李待琛《规定制式兵器刍议》一书,介绍各种枪炮,规定制式兵器,是较早的有关军械勤务的著作。40 年代,中国国民党军队联合勤务干部训练班出版的《兵器弹药之保管与补给》、《军械勤务讲义》等教材,孙兴明、张文欧等编写的《军械勤务》,介绍了军械勤务的有关内容、方法和知识,对军械勤务理论有一定程度的研究。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于严酷战争环境,军械物资供应和军械装备修理十分困难,难以进行系统的军械勤务理论研究,但是,在长期的战争实践和逐步积累的军械勤务工作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军械勤务方面的一些重要理论观点,并在作战训令、指示中反映出来。1930 年中央军委发布的关于军械补充的训令,其中有关“红军各部队的军械军需之补充,主要夺自敌人,其

次在苏区内由地方军委筹备”的规定,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争年代遵循的军械物资供应的“取之于敌,用之于敌”理论原则的体现。1934年中央军委制定颁发的《关于保管武器的指示》、1942年制定颁发的《八路军武器弹药保护法》、1949年后方勤务部颁发的《军械工作条例(草案)》等,对武器弹药在各种环境下的使用、保管提出了要求,其加强武器装备管理的理论观点和有关措施,对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械装备的管理、军械勤务工作规章制度的建立具有重要影响,也为军械管理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了正规化建设的新时期,军械勤务研究有了新发展。50年代初期,为了军械教育训练的迫切需要,翻译、出版了部分苏军的军械勤务理论教材。随着军队正规化建设的深入发展,军械保障体系日益健全,相关条令、条例陆续颁发,各项规章制度逐步建立、配套。从5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借鉴苏军军械勤务理论,总结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编写了一批军械勤务理论教材。例如《军械勤务》、《步兵师军械勤务的组织与工作》、《现代条件下炮兵师军械勤务的组织与工作》、《步兵师团进攻战斗军械勤务》、《战时步兵分队的军械工作》等。60年代,总部、军区军械部门和有关院校,相继修订、编写出版了许多军械勤务教材,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合成军队师团军械勤务》等。从70年代中期开始,为适应军械勤务工作和教育训练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合成军队师团后方军械勤务》、《部队军械勤务》、《弹药与勤务教材》等教材陆续出版。这些教材强调指出,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的不断发展,军械勤务任务日趋繁重,范围不断扩大,必须进一步掌握现代战争条件下军械勤务的任务、特点和规律,使军械勤务工作正规化、

科学化。

70年代末期以后,军械勤务研究有了新的重要发展。1983年,总后勤部军械部翻译出版了美军《可维修性工程理论与应用》、《可维修性设计指导》等著作,积极开展了军械维修工程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80年代相继出版了王宏济主编的《军械的可维修性与维修管理基础》等教材和《军械维修工程》等理论著作,以及国家军用标准《装备维修性通用规范》(GJB368-87)等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这些理论著作和教材指出,一切装备维修活动,归根结底是为了保持、恢复装备的可靠性,必须重视装备的可靠性、维修性研究,要根据军械装备及其部件的可靠性状况,恰当地选定装备的维修类型、级别和间隔时间,周密地制定装备维修大纲,确定所需的维修内容,选择合适的维修手段和方法进行维修;只有切实地把握军械装备的可靠性及其变化规律,科学地制订装备维修大纲,才能灵活、有效地组织实施装备维修活动,使军械装备维修速度快、质量好、费用少、效益高。

80年代以来,军械勤务研究在军队报刊上十分活跃。80年代创办的《军械》、《军械维修工程》杂志,以及《后勤》、《后勤学术》、《后勤学院学报》、《军械工程学院学报》、《解放军报》等报刊,发表了大量的军械勤务研究论文,对军械勤务学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比较广泛的研究,推动了军械勤务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有力地指导、促进了军队军械勤务工作。1983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械维修工程学会成立,使军械维修工程研究更加深入发展。1988年,后勤学院编写出版了《军械勤务学》、《军械管理学》等教材。1989年,总后勤部军械部、后勤学院学术研究部编写出版的《后勤学术文丛·军械分册》,收录文章近200篇。80年代军械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90年代,总部、军区和海军、空军及第二炮兵的军械部门和有关院校、研究所,根据军队新时期战略方针和未来高技术战争的特点、要求,结合军械勤务工作实际和部队军械专业训练的需要,对军械勤务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进行了更加广泛、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1994年7月,由陈方林、钟幼平等编著的《军械勤务学》(系军事学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的重点课题《军事后勤理论丛书》之一)正式出版,该书主要论述了军械勤务的基本概念,研究的对象、内容和方法,军械勤务发展概况、基本任务和要求,平时、战时军械勤务的基本内容和方法等。指出,无论是军械物资供应还是军械装备维修,都要从未来战争的需要和部队的实际出发,遵循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平战结合,落实战备;保障重点,兼顾一般;确保安全,讲求效益等原则。此外,宋华文等编写的《军械勤务》、工兴录等编写的《战时军械勤务学》等,对军械勤务理论也进行了广泛研究。根据总后勤部的统一计划,1991年1月总后勤部军械部组织编纂《中国军事后勤百科全书·军械勤务卷》,该卷条目范围广泛、内容全面,包括军械勤务的重要概念、军械保障组织体制、军械物资供应、军械技术保障、军械学术研究,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重要作战的军械勤务等。海军、空军军械部门陆续编写、出版了《海军军械勤务指南》、《战时海军军械勤务学》、《空军部队航空弹药勤务》、《空军地面部队军械勤务》等教材、专著。军械维修工程理论研究也继续深入,甘茂治等编写的《维修性工程》、郭芳筠等编写的《军械装备可靠性工程》、徐绪森等编写的《装备维修工程学》,以及《弹药储存可靠性》、《装备维修工程的理论与应用》、《可靠性与维修工程》、《维修性设计与验证》、《军械维修器材管理学》等一批军械装备维修理论著作陆续出版,为军队军械技术保

障发挥了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王宏济等著:《军械的可维修性与维修管理基础》,军械技术学院,1983。

军械维修工程学会等编:《军械维修工程》,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

甘茂治等编:《维修性工程》,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91。

徐绪森等著:《装备维修工程学》,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94。

陈方林等著:《军械勤务学》,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

(钟幼平)

军队营房勤务研究

(study of military barracks service)

探讨军队营房勤务活动规律和指导原则的活动。开展军队营房勤务理论研究,对发展军队营房勤务理论和指导军队营房保障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初,由孙中山领导的大元帅府军事委员会设立军政部,负责管理营房建设事宜,并开始了营房勤务理论的研究。30年代,国民党军的军需学校为适应教学的需要,由何伟业编写了《营缮经理教程》,集中论述了土地建筑物的经营、官舍及军队官署分校的器具、国有财产的利用等。继之,有关学校也编写了类似的理论教材。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30~40年代就制定有军队营房勤务的有关条例和发表不少相关文章。50年代总后勤部颁发了《营房管理部工作与任务(草案)》,明确了营房管理的基本原则和要求,进行了“适合现代化军队装备之特殊的规格、标准的各类营房”的研究;在后勤院校分别设置了“营道系”、“营管系”,组建了营房设计院、研究所,开始了对营房勤务理论的全面研究。60~70年代,着重研究了战

争初期和大打、打核战争的营房保障理论,发表了不少有关论文。80年代,营房勤务理论研究的重点转向了营房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领域,编写出版了《营房工程管理》、《营房管理学》、《营房经济》、《战时营房保障》、《军队营房工作思考》等专著。90年代,加强了营房勤务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研究,突出了现代战争特别是现代高技术战争营房保障理论的研究,编写出版了《局部战争营房保障理论与实践》、《基建营房问题研究文集》等,还编写出版了《局部战争营房保障理论与实践》、《基建营房问题研究文集》等,还编写出版了第一部研究营房勤务的综合性理论专著——《军队营房勤务学》,揭示和阐明了营房勤务工作的基本特点、原则、方法和规律。

军队营房勤务研究主要对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①关于军队营房勤务学的概念和理论体系。其概念一般界定为研究军队营房勤务活动规律和指导原则的学科。其理论体系一般认为是由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构成,也有的认为是由基础理论、应用理论、技术理论构成。②关于营房勤务的地位和作用。认为营房勤务是军队后勤的一项重要勤务,是从住用方面保障军队生活、生存、作战所必须有的物质条件,对于维护和提高军队战斗力起着重要作用。③关于营房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方针。认为营房建设具有双重属性,它既是军队工程建设的组成部分,也是国家基本建设的组成部分,因而营房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既要适应军队建设的需要,又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新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营房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是:营房建设必须遵照中央军委的战略方针和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总要求,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突出重点,量力而行。必须坚持执行保障战备、兼顾生活、注重质量、厉行节约的建设方针。要立足现有,着眼发展,努力提高

营房工程的综合配套能力,适应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④关于营房经济。认为营房经济是指营房建设和营产管理过程中的各种经济现象,它贯穿于营房建设、分配、交换、消费等各个环节。研究、探讨营房经济,对于建好、用好、管好营房和提高营房经济效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⑤关于营产管理。认为营产管理重点要抓好营区划区管理、产权管理、营房调整管理、营房标准化管理、营房设备技术管理、维修管理,以及营房占地管理等。⑥关于战时营房保障。认为战时营房保障对于维护和提高部队战斗力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一是为军队休整提供良好的场所和住用条件,二是为军事活动提供室内空间,三是为军事物资装备解决安全存放的场地。战时营房保障的基本原则是: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立足现有条件,因地制宜,因陋就简,保障供应。战时营房保障的基本特点是:能得到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支援;要兼顾前后方;受自然条件影响大。战时营房保障的基本方式是:平战结合的保障方式;军民结合的保障方式;以制式营房物资器材为主的保障方式。

21世纪,军队营房勤务研究将有重大发展。一是要进一步研究现代战争特别是现代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营房保障的特点和规律,二是要进一步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营房建设和管理,三是要进一步研究军队干部住房制度改革的基本矛盾、途径和方法。

参考文献

后勤学院编写:《军队营房勤务学》,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

王经文编写:《军队营房工作思考》,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

(王书琴)

军事交通研究

(study of military traffic)

探讨军事交通活动规律和指导原则的活动。开展军事交通理论研究,对发展军事交通理论,指导军事交通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军事交通活动历史悠久,它随战争的产生而产生,并随战争和交通的发展而发展。古代军事交通比较原始、简单,主要借助人力、畜力和风力等自然力。最早出现的交通工具是独木舟,桨船、帆船的运用推动了水路军事运输的发展和运河的开凿。随后是驯养牛、马等,用畜力运送人员和物资。车的出现并用于作战,提出了修筑道路的要求,古代中国、波斯、希腊和罗马都曾修筑许多道路,用于军队调动和物资运输。18 世纪下半叶蒸汽机的发明和 19 世纪初蒸汽机船及蒸汽机车的问世,并随之用于军事,使军事交通进入以机械力为标志的近代阶段。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以内燃机作动力的汽车、飞机相继问世,管道运输得到发展,军事交通跨入以立体化为标志的现代阶段。交通的发展促进了作战思想和战争形态的变革,新的作战理论、作战手段和保障方式又对交通设施和运输工具提出新的要求,二者推动军事交通向现代化发展。随着军事交通的不断实践,军事交通理论逐步形成和发展。

在中国,把军事交通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领域进行系统研究,是在引进西方军事交通理论的基础上,从中华民国时期开始的。20 世纪初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顾清选、江寿祺各自编写的《兵站勤务》,国民党陆军大学出版的《船舶输送勤务令》,陆军训练总监部编著的《交通学教程》,参战军军官教导团编印的《铁路输送学摘要》。30~40 年代,编著出版的理论著作有:陆军交辎学校的《兵站勤务之研究》、《交通兵操典草案》(汽车之部),郭克兴的《国有铁路军运沿革略》,国民党军事

委员会颁发的《铁道军运条例》、《兵站勤务讲义》,李漠骏的《运输讲义》和《战时补给与军事运输概论》,黄家濂的《船舶输送学》,陆军军官学校编写的《交通学讲义》,辎重兵学校的《运输学讲义》和《运输管理》,陆军大学的《铁路军运学》、《应用军事铁路运输》和《应用汽车输送学》,林问樵的《论战争与交通》,刘冠世、余宗磐、谢海泉的《运输勤务》、《运输勤务讲义》和《船舶运输勤务》,朱和生的《汽车学教程》,徐同邨的《航空运输概论》,王可襄、耿跃张、刘鼎新翻译的《运输学》、《军用汽车学》和《交通决胜论》等。上述教材、著作的主要观点是:巩固国防,必须建设能够通达边境和海疆的交通道路和设施;战争离不开交通,交通决定战争胜负;发展和利用各种运输方式,除铁路、水路两种军事运输方式外,要大力发展公路军事运输,积极发展航空军事运输;研究军事交通管理和军事交通勤务,建立兵站运输线。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交通研究,是在继承中国古代有关军事交通的朴素理论和近、现代有关思想、理论的基础上,在革命战争时期和现代化建设的军事交通实践中逐步开展的。1946 年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颁发第一个铁路军事运输管理法规——《铁道军事运输暂行条例》。1948 年军委后勤会议通过《运输工作组织与任务概则草案》。1949 年总后方勤务部运输二部制定《运输工作制度(草案)》。抗美援朝战争中研究总结出“千条万条,运输第一条”的经验,从战略上认识了交通运输的生命线地位。1951 年创办军事运输技术学校,1954 年改称军事交通学校,军事交通教学和理论研究工作开始起步。60 年代起,先后出版《军交工作研究》、《军交工作资料》、《军事交通》、《国防交通》等学术刊物,开辟了理论研究园地;至 70 年代中期,编写出一些教材和论著,主要有《铁

路军事运输组织》、《铁路交通战备》、《水路军事运输组织》、《公路运输勤务》等。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编写出版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交通用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交通史》、《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交通分册》等辞书和史书;制定颁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交通沿线军事代表条例》、《国防交通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交通运输条例》等法规制度。后勤学院首次编写《军事运输学》、《交通保障学》等学科教材和《军事交通学》专著,标志着军事交通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军事交通学科的形成。

90年代以来,军事交通研究中探讨的主要内容和观点是:①关于军事交通理论体系。军事交通理论体系由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两大部分构成。基础理论部分包括基本理论、需求与资源配置理论、体制与管理指挥理论、军事交通经济理论等。应用理论包括军事运输理论、交通保障理论、战时和特种军事交通勤务理论、军事交通建设理论等。②关于军事交通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研究对象和主要任务。军事交通理论研究以军事交通保障能力作为逻辑起点,以国防建设和现代战争对军事交通的需求与军事交通保障能力之间的矛盾作为研究对象,主要任务是从国防建设、军队作战和后勤保障需要出发,研究军事交通的平时准备、战时和特殊情况下的组织运用,包括军事运输和交通保障。③关于军事交通的地位作用。普遍认为,军事交通是战争准备的重要内容,制定战略战术的重要物质因素,军队机动和作战的重要保障,联系前后方的纽带,后勤保障的中心环节,对战争的进程和结局有重要影响。④关于军事交通组织运用的指导方针。“军、政、民统一组织,陆、水、空综合运用,运、修、防紧密结合”,是军事交通建设、管理和运用的指导方针。⑤关于军事交通保障体制。军事交通勤务属于通用勤务,要

适应各种作战样式和各军兵种对军事交通的需求,其保障体制应是军民结合,三军一体,集中统一,通专结合的联勤保障体制,并且采用现代管理理论和以计算机为代表的现代指挥技术,形成自动化指挥网络,提高管理指挥效能。⑥关于军事运输。军事运输是军事交通的核心。输送部队、装备物资和伤病员既要使用铁路、公路、水路、航空、管道等单一运输方式,又要组织多方式联运、接运,必要时动员民用运力。要周密计划与筹划,改善运输结构,优化运输方式,进行流量分配与平衡,搞好方式转换与衔接,加强组织指挥与控制,提高军事运输效益。⑦关于交通保障。战时交通保障属于作战保障。形成、保持、恢复交通生存能力,需要综合运用建设、防护和抢险等手段,动员民用交通工程力量,储备数量适当的物资器材,拟制可行的保障方案,快速组织实施。⑧关于战时和特种军事交通勤务。战时军事交通勤务包括战略、战役和战术三个层次,不同地区、不同规模、不同战役战斗样式的军事交通勤务,特点不同,要求不同。特种军事交通勤务指边境武装冲突、抢险救灾、处置突发事件和特殊地形、气候条件下的军事交通勤务,有不同的理论原则、程序和方法。⑨关于军事交通建设途径。军事交通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国防交通,寓于国家交通之中,具备国防功能的国家交通就是国防交通,在国家交通建设中贯彻国防要求,是军事交通建设的最佳途径,应当同步规划、同步建设,达到军民兼容,军事、经济、社会效益有机结合,实现军事、经济双重功能。

面对21世纪军事、经济、高科技的发展变化,军事交通理论研究将依据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围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和高新技术战争战场,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以下新理论: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交通管理体制和保障体制

理论;军事运输结构和军事综合运输理论;不同作战样式的军事交通勤务理论;军事交通网络规划与建设理论;军事交通指挥自动化理论;军事交通经济理论。

参考文献

杨明山主编:《军事交通学》,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

(袁明治)

军事装备维修研究

(study of military equipment maintenance)

探讨军事装备维修的本质和规律,并用以指导装备维修实践的活动。现代军事装备维修理论主要包括维修基础理论、维修设计理论、维修技术理论和维修管理理论。研究、发展军事装备维修理论,对于指导军事装备维修,保证装备处于良好状态,维护、巩固和提高军队作战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军事装备维修是随着军事装备的发展而逐渐产生、发展的。长期以来,人们在军事装备维修实践活动中,对维修的规律、本质有了一定的研究和认识。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为了维修战损飞机,曾经进行过零星的维修理论研究活动,如飞机维修材料性能研究、航空动力研究等。但总的来说,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人们认为维修基本上属于一门技艺,缺乏系统的理论。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现代军事装备种类不断增多,性能不断提高,复杂程度也大大增加,装备维修的地位、作用和效益日益突出,人们加强了用以指导装备维修实践的维修理论的研究。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装备维修研究,在50年代主要是侧重在装备维修工艺技术方面,出版了许多有关枪械、火炮、坦克、飞机、舰船等军事装备的维修教程、指南和维修手册。60~70年代,以可靠性为中心的军事装

备维修理论逐渐产生、发展起来,70年代末期以后,装备维修理论有了重要发展。1979年空军首先引进了国外正在研究、发展的以可靠性为中心的维修理论,随后陆军、海军也陆续开展了研究。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翻译出版的有代表性的维修理论著作主要有美国F. S. 诺兰等著的《以可靠性为中心的维修》、苏联H. H. 斯米尔诺夫的《飞机的使用可靠性和维护制度》,以及美国陆军器材司令部编写的《维修工程技术》、《可维修性设计指导》、《可维修性工程理论与应用》等。在积极研究、吸收外军维修理论的同时,空军、陆军等装备部门和有关院校、研究所,紧密结合中国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实际情况和维护修理特点,编写出版了一批具有重要影响的早期著作、教材,如陈学楚等编写的《飞机的使用可靠性与维修性》,张文思、王立群编写的《航空维修概论》,王宏济主编的《军械的可维修性与维修管理基础》,孙厚福等编写的《航空维修管理基础》等,为维修理论的深入研究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81年空军装备部门成立了航空学会航空维修工程专业委员会,陆军军械装备部门成立了军械维修工程学会,并创办了《军械维修工程研究》刊物。80年代中期以后,以可靠性为中心的维修理论研究广泛开展。《兵工学报》、《航空维修》、《后勤学术》、《后勤科技装备》、《军械》、《军械维修工程研究》等杂志,以及《空军工程学院学报》、《军械工程学院学报》、《装甲兵工程学院学报》、《海军工程学院学报》、《解放军报》等发表了许多维修理论研究的论文;一批内容比较全面、深入的维修理论著作、教材陆续出版,如陈学楚、魏邦明等编写的《航空维修工程学》、王汉功主编的《导弹使用维修工程》等。以可靠性为中心的维修理论初步形成了包括可靠性工程、维修性工程、故障和故障诊断理论、维修工

艺技术理论等内容的综合性工程技术应用理论体系。从80年代中期开始,有关军事装备维修的国家军用标准陆续颁布,如《装备预防性维修大纲的制订要求与方法》、《故障模式、影响及危害性分析程序》、《装备维修性通用大纲》等,不仅规范了军事装备维修活动,而且对装备维修理论研究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90年代,军事装备维修研究继续发展,在维修基础理论、维修技术理论、维修管理理论以及维修系统工程理论等方面,有一大批理论专著、教材陆续编撰出版,如徐滨士主编的《表面工程与维修》,徐绪森、王宏济、甘茂治等编写的《装备维修工程学》,刘瑾辉主编的《雷达维修工程学》,孟庆玉主编的《舰艇武器装备可靠性工程基础》,孔繁珂主编的《军用车辆运用工程》(维修部分),丁汉哲主编的《装备监测诊断技术》,陈学楚主编的《维修基础理论》等。这些成果理论性强,联系实际,各具特色。随着以可靠性为中心的维理论论的深入研究和推广、应用,军事装备维修从分散的、以工艺技术、维修经验为主的维修,逐步向系统的、以维理论论作指导的、更加科学的维修方面发展。1997年7月正式出版的中国第一部《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装备维修分册》,反映了军事装备维理论论研究的部分成果。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维理论论研究的不少项目,如陆军装备部门的《武器装备战场抢修研究》、海军装备部门的《舰船维理论论及其应用研究》等,注重理论紧密联系实际,注重解决部队装备维修的重大问题,取得了积极成果。

参考文献

王宏济等:《军械的可维修性与维修管理基础》,军械技术学院,1983。

徐绪森等著:《装备维修工程学》,北京:国防工

业出版社,1994。

刘瑾辉等著:《雷达维修工程学》,空军雷达工程学院,1994。

陈学楚著:《维修基础理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钟幼平)

军事后勤研究机构 (military logistics research institutions)

专门从事军事后勤学术和军事后勤技术研究单位的统称。通常指后勤科学研究院、部、所、中心及实验场等。是军事研究机构的组成部分。按研究的内容、范围,通常分为后勤学术研究机构和后勤技术研究机构,前者侧重于后勤基础理论、应用理论研究,后者侧重于后勤技术装备、后勤专业技术研究。军事后勤研究机构的设置,分为独立和附设两种形式。建立、健全军事后勤研究机构,对提高后勤学术水平、后勤技术水平和促进后勤建设有着重要作用。

为适应军队后勤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逐步建立起军事后勤各类研究机构。20世纪50年代,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科学院(后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海军医学研究所、航空医学研究所、军事兽医学研究所等机构,分别进行综合性和方向性的军事医学研究;建立了军械、车管、军需生产等专业技术装备实验研究机构,开始研制后勤技术装备;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设置后勤科学研究部,专门从事后勤学术研究。60年代,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技术装备研究院和后勤科学研究所,加强对后勤技术装备和后勤学术的综合性研究。同时,各军区相继组建了军事医学研究所。70年代后,研究结构作了多次调整,并日趋健全和完善。到1993年,形成以军事医学

科学院为骨干的军事医学研究体系,以及各种后勤专业技术装备研究体系。后勤指挥学院编设的后勤学术研究部为全军后勤学术研究中心,接受总后勤部司令部和后勤指挥学院的双重领导,担负后勤理论研究任务,并为总部提供后勤建设咨询。

参考文献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辑:《当代中国军队的后勤工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王书琴)

军事后勤学术刊物 (academic publications of military logistics)

探讨军事后勤理论与实践等问题的出版物。一般分为定期和不定期两种。它是研究、交流、传播后勤思想、观点的重要园地,是繁荣和发展后勤学术的媒体及桥梁,对后勤活动的开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咨询作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后勤学术刊物主要有《后勤学术》、《海军后勤学术研究》、《空军后勤研究》、《后勤科技装备》等。

《后勤学术》,全军性后勤理论刊物,月刊。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委托后勤指挥学院主办。1979年4月创刊。其办刊宗旨:为后勤领导机关决策、部队后勤建设、后勤教学和研究服务。主要栏目有:后勤基础理论研究、后勤建设与发展研究、后勤改革研究、后勤教育训练研究、军兵种后勤研究、后勤专业研究等。

《海军后勤学术研究》,军种后勤理论刊物,双月刊。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后勤部主办,《海军后勤学术研究》编辑部编辑出版。1985年6月创刊。其办刊宗旨:推动海军后勤理论研究,开展学术交流,促进海军后勤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提高海军后勤保障能力。主要栏目有:海军后勤理论、海军后

勤管理、海军后勤教育训练、海军后勤改革、海航后勤、海军装备维修与管理、海军政工研究、世界海军后勤等。

《空军后勤研究》,军种后勤理论刊物,双月刊。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后勤部主办,空军后勤学院编辑出版。1988年2月创刊。其办刊宗旨:交流空军后勤工作的经验和学术研究成果,为空军后勤决策提供理论咨询。主要栏目有:空军后勤理论、空军后勤战备建设、空军后勤教育训练、飞行后勤保障、空军后勤管理、空军科技与装备、空军后勤改革、空军政工研究、世界空军后勤等。

《后勤科技装备》,全军性后勤理论刊物,双月刊。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司令部主办,总后勤部后勤科学研究所编辑出版。1988年2月创刊。其办刊宗旨:研究后勤科技装备建设的目标、方向、重点和途径,探讨世界军队后勤装备研制、使用情况和发展趋势,总结交流后勤科技装备改革、科技成果开发应用的经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科技装备的发展提供理论咨询和决策依据。主要栏目有:后勤科技装备建设、军需保障装备研究、卫勤保障装备研究、油料保障装备研究、军械保障装备研究、军交保障装备研究、野营保障装备研究、后勤管理自动化等。

(王书琴)

国防科学技术研究

(research of national defen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为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而进行的科学技术基础理论探索、应用技术研究和武器装备研制的统称。简称国防科技研究。它是构成国防实力的重要因素,是军队现代化建设的科技基础,是衡量国防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国防科技研究可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国防科技研究的主要任务是:开

展国防预研,研制开发新型武器装备,对已有武器装备进行改进提高。目的是不断提高国防现代化水平,增强国家的防卫能力。

国防科技基础研究是以军事应用为目的进行的探索新思想、新概念、新原理、新方法的科学研究活动,为解决武器装备研制的技术问题提供基础知识。其主要任务是研究自然现象、掌握科学原理、进行知识储备,为新概念、新原理、新方法在军事上的应用寻求科学依据。其研究内容十分广泛,涉及诸如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流体力学、弹道学,以及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学科领域。

应用研究是运用基础研究成果,探索新概念、新原理应用于军事的可行性与实用性,为武器装备研制提供技术基础。其研究内容包括:为解决特定的军事需要进行模拟试验与仿真、原理性部件的制造与试验;对军事应用的各种技术方案的可行性与现实性进行鉴定和论证;按实际使用条件研制供验证用的部件、分系统和原理性产品,以审查各项技术在实际条件下的可行性。其研究成果具有普遍适用性,一旦有重大技术突破,将为武器装备型号研制带来广阔的发展前景。

发展研究是在应用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研制出供部队使用的武器装备。其具体内容包括:对特定型号的武器装备进行战术技术指标论证和研制方案论证,进行全系统的方案设计、验证和审定;对武器装备进行具体设计和试制;完成研制试验、作战使用试验,鉴定定型和投入生产。此外,对使用中的武器装备进行改进提高,也属于发展研究的范畴。

在古代社会,中国的金属兵器制造技术曾经处于世界前列,中国是世界上首先发明和使用火药的国家。火药的发明并应用于军事,使军事技术发生了重大变革。火药和火器先后传入阿拉伯地区与欧洲,促进了西方军事技术的发展。但从15世纪中叶以后,中国

长期的封建统治阻碍了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军事技术逐步落后于世界军事技术的发展水平。19世纪60年代,开始引进国外枪炮、舰船制造技术,仿制近代枪炮和舰船,形成了中国近代军事技术发展的基础和中国近代兵器工业的雏形。

清末和中华民国时期的国防科学技术研究 这一时期,中国国防科技的发展经历了清末、中华民国的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三个阶段。其中,清末的国防科技仍然继续了19世纪后期发展的趋势,陆军武器装备技术有一定的进步;北洋政府时期,除陆军武器装备技术有所发展外,军用航空技术也开始得到发展;国民党政府时期,陆军、空军、海军技术均有所发展,陆军和空军技术的发展更加显著一些。

清末的国防科技 20世纪初,由于清政府将军事的重点放在对付国内革命势力和农民起义,国防科技发展的重点主要是在陆军武器的制造方面,枪炮、弹药等的制造技术及相关的原材料制造技术,如钢铁冶炼技术、炮管制造技术等,均有一定的发展。枪械方面,1906年清政府议定中国步枪制式口径由7.9毫米缩小为6.8毫米,1907年仿造6.8毫米毛瑟步枪成功。火炮方面,1905年,江南制造局成功仿造德国克虏伯75毫米移动式山炮,使火炮制造技术获得新的进步。枪弹方面,仿制成功6.8毫米枪弹,步枪、机枪均可使用。火药的研究是这一时期军事技术研究略有成绩的领域,徐建寅于1901年研制成功硝化棉无烟火药,但未能规模化生产。海军技术方面,主要是通过购买国外当时较新型的军舰,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国内的舰船制造技术没有明显的提高。在航空技术方面,1901年即已有《飞机考》一文问世,清朝新军购进侦察气球、飞艇等,组织了气球队,进行过航空摄影。1910年,清政府在北京南苑修建第

一个机场,成为中国近代机器动力航空技术的开端。

北洋政府时期的国防科技 中华民国建立后,北洋政府接收和整顿各地兵工单位,改局为厂,但许多兵工厂名义上属中央政府,实际上受各地军阀控制。有些地方军阀,如奉系军阀、晋系军阀、桂系军阀还兴建了技术水平较高、规模较大的兵工厂,枪炮弹药制造技术有较大发展。由于军阀混战的需要,军用航空技术也被大力引进并得到一定的发展。1913年北洋政府在北京南苑开办航空学校,附设修理场。1918年在福州设飞潜学校和海军飞机工程处(1928年更名为海军飞机制造处),后者为中国第一个正规的飞机制造工厂,设计制造海军军用飞机。1919年底,北洋政府参谋本部设航空事务处,南苑航空学校改隶之,更名为航空教练所。1923年航空事务处扩大为航空署,航空教练所又更名为国立北京航空学校。20年代,广东革命政府及一些军阀如直系、奉系、桂系等军阀,也建立了航空局、航空学校、航空队。这时的军用飞机基本依赖进口,分别来自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中国空军成了“万国飞机博览会”。航空工业以装配修理为主,除南苑机场附设的修理场外,还有北京清河、保定、济南、沈阳、广东等地的修理厂,主要是装配和修理飞机。

北洋政府期间国防科技的发展主要表现在:①枪械技术方面,步枪由多种口径的生产改变为只生产6.5、6.8、7.9毫米三种口径。1913年,北洋政府将7.9毫米毛瑟步枪定为制式步枪,其生产得到迅速扩展。同时,机枪制造技术有所提高,仿造了德国马克沁7.9毫米、奥地利守瓦兹洛色6.8毫米、日本三八式6.5毫米、美国勃朗宁1917式7.62毫米重机枪,法国绍沙8毫米和霍齐基斯(哈其开斯)7.9毫米轻机枪。冲锋枪的制造也有发

展,主要有美国汤姆森11.25毫米、法国柏克门式7.65毫米冲锋枪等。②火炮技术方面,主要以适于陆地作战的山炮和野炮为主,仿造有德国克虏伯式29倍口径75毫米野炮、日本大正6年式18倍口径75毫米山炮、日本8倍75毫米野炮和29倍口径37毫米平射炮,1922年仿造成功80毫米迫击炮,以后还仿制成功150毫米迫击炮。③弹药方面,开始制造航空炸弹。此外,徐尚武制造成功无烟火药、枪弹药和炮弹药、制造火药用的苦味酸、油甜炸药、安全炸药等,并撰写成《火药学》一书。④空军技术方面,仿制过飞机螺旋桨、机身、机翼,1915年利用外国58.8千瓦航空发动机设计制造陆上飞机、水上飞机等,有些飞机性能不次于国外飞机。

这一时期兵器制造在技术装备、工艺水平上都有了显著进步,出现了设备超过1000台、人员过万的大型兵工厂,引进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出现的新式兵器,如迫击炮、高射炮、大口径榴弹炮、航空炸弹等,推动了军事技术的发展。

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国防科技 1928年,国民党政府军政部建立兵工署,整顿原有兵工单位,新建一批兵工单位,建立国防科技研究机构。1936~1938年新建有巩县兵工分厂,生产化学战剂和防化器材;南昌火工作业厂,装填航空炸弹;南京军用光学器材工厂。航空方面有上海高昌庙海军制造飞机处和虹桥航空工厂、广州大沙头航空工厂、杭州笕桥航空学校工厂、南京首都航空工厂、武昌南湖修理工厂、云南航空工厂、山西太原航空工厂,主要从事军用飞机的装配、制造和修理。

1932~1937年建立的兵工研究机构有:兵工署的理化研究所,从事基础科学研究和材料产品的分析试验;化学研究所,从事化学战剂、防化技术、毒伤医疗和应用化学兵器的研究;精密研究所,从事样板制造、精密测试

和材料试验;航空兵器技术研究所,从事航空兵器的试制和改进;弹道研究所,从事兵器内外弹道和火药的研究。另外,还有炮兵技术研究处、兵工专门学校等。

1932年和1934年,兵工署两次召开会议,研究枪械和火炮的制式方案,将德国1898年式毛瑟枪基础上制造的24年式步枪(中正式),德国1908年式马克沁重机枪基础上改进的24年式重机枪,仿制捷克式的7.9毫米轻机枪、7.9毫米步枪和轻、重机枪通用枪弹,金陵兵工厂1931年设计的82毫米迫击炮及炮弹等,定为制式兵器。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的兵工厂和兵工研究机构内迁,战争期间还扩建和新建了一批兵工厂,接收了一些地方兵工厂,兵工生产规模有所扩大,国防科技领域也有所拓展。如1940年新建的军用特种车辆零件试造研究所,制造车辆零件和修理战车。

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国民党政府又对兵器工业进行了全面调整,更新部分技术装备,扩建兵器研究机构和兵工学校。其中研究机构有兵器研究所,其下设有轻兵器、重兵器、航空兵器、火箭、军用车辆等五个研究组及兵器试验场。1949年兵器研究所与应用化学研究所、弹道研究所合并组成兵工研究院。兵工学校也扩大了规模,接收了装甲兵学校战车技术研究班和联合勤务总司令部化学兵干部训练班,其教学机构有兵工工程学院和训练部。前者由造兵系、应用化学系、战车工程系等组成。此外还有气象队、防毒训练班、战车工程学习队等。

这一时期的国防科技研究著作有李待琛的《国防建设之基础》、《改进兵工之要图》、《军械制造》、《火炮之制造》、《枪炮构造及理论》等。国防科技的主要成果有:①枪械方面:试制成功24年式马克沁重机枪和30节重机枪。将马克沁重机枪从水冷式改为气冷

式,以适应北方的寒冷天气;将其重量从40千克减轻到31.75千克;提高了该枪的设计性能,使其可连射5000发,这是重机枪的一次重大改进。综合捷克式和启拉利轻机枪的优点,研制成ZB26式轻机枪,制定战时技术标准,减轻轻机枪的重量,使其使用更加方便。改进中正式步枪,使其性能优于原枪和汉阳造步枪。制成掷弹筒、枪榴弹发射筒等。

②火炮方面:参照法国布朗式120毫米迫击炮,设计制造了33年式120毫米迫击炮,采用弹簧减震器和橡胶轮,将其重量从470千克减至212千克,且操纵简便,机动灵活。

1941年试制成功战防炮(反坦克炮),填补了国内不能生产反坦克武器的空白。

③弹药方面:研制成功瞬发、延时引信;提高手榴弹的杀伤力,减小其体积,改进装药,使其杀伤半径增至10~15米;研制出氯酸钾、梯恩梯混合炸药,氯酸钾和熟化桐油混合制成的钾桐炸药;改进了枪弹的生产工艺,提高了质量和工效。

④军用光学仪器方面:1939~1944年仿制成功6×30军用望远镜、奥地利式和法式迫击炮瞄准镜、金属架象限仪、60毫米迫击炮和37毫米战防炮瞄准镜等。

⑤防化器材方面:制成大批防毒面具。

⑥军用飞机方面:制造飞机的能力有了很大提高,1928~1949年,仿造了多个国家的各类军用飞机约400~500架,多为木结构。1942~1944年制造的“中运一”运输机为中国最早制造的运输机。这一时期制造的驱逐机、高级教练机发动机功率达到523千瓦,最大时速为445千米;运输机发动机功率为2×332千瓦,总重4537千克,最大时速342千米。

中国已经能够制造性能较好的降落伞,能够自造和仿制部分国外航空材料。

⑦海军舰船方面:建造了“逸仙”号炮舰、“平海”号巡洋舰,后者排水量2400吨,主发动机功率为5459千瓦,航速24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立前中国建造的性能比较好的军舰。此外,还建造了十艘“宁”字号浅水炮舰,将舰用火花式收发报机改为无线电短波收发报机。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也创建和发展了自己的军事工业。各根据地和解放区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立了一些小型兵工厂、修械所,开展技术研究工作,为部队生产了弹药、轻武器、迫击炮、通信设备等,修理了大批军械装备,对革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前期,国防科技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基本完成了从古代军事技术到近代军事技术的转变,但是,除枪炮以外的武器装备始终依赖国外,即使自己能够生产的,其核心部件及不少原材料也基本仰仗国外进口;国防科技研究缺乏组织和经费,专业门类不全,空白很多,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很大。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政府将大量兵工厂和研究机构迁往台湾,并对留在中国大陆的其他军工和科研机构进行了破坏,使中国的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受到了巨大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防科技工业就是在这样薄弱的基础上起步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国防科学技术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国防科技研究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国防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研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此,《国防科学技术发展概论》、《国防科学技术论》等著作,特别是《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这一权威著作,做了详尽和全面的总结。建国以来,中国的国防科技研究经历了以下几个主要阶段。

开创阶段(1949~1959) 建国初期,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主要是战争期间从敌人手中缴获的,品种繁杂,性能落后,大多数已不能供作战使用。这种状况远远不能与人民解放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相适应。尽

快为人民解放军研制出精良的武器装备,已成为国防科技研究的一项十分紧迫和艰巨的任务。自1950年上半年至1959年11月,经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央军事委员会批准,相继成立了中央军委兵工委员会、重工业部兵工总局、航空工业局、电信工业局、船舶工业局、第二机械工业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委)、国防工业委员会(简称国防工委)等领导机构,国防工业建设和国防科技研究工作实现了集中统一管理。

制定国防科技研究发展规划 1956年春,国务院成立了科学技术规划委员会,组织全国600多名科学技术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经过约半年时间的反复研究和讨论,制定了《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简称《十二年科学规划》)。根据这一规划,军队制定了国防科技发展规划,作为国家《十二年科学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国防科技发展规划提出的任务,被列在国家《十二年科学规划》12项重点科研任务的前列,主要是:原子能技术、喷气与火箭技术、半导体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自动控制技术等五个方面。为进一步落实国家《十二年科学规划》中的国防科技发展任务,1958年1月总参谋部还制定了《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十年(一九五八~一九六七年)规划纲要》。

组建国防科研机构和建设国防科技工业高等院校 为落实国防科技发展规划的任务,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组建导弹、核及常规武器科研机构。^①1956年5月,中央军委确定组建导弹研究院;10月8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负责导弹的研究、设计、试制任务。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从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工业部门调集了大批专家、技术干部和大中专毕业生到第五研究院工作。在进行工程建设的同时,开展了多种型

号导弹的仿制工作。②1958年2月,成立第二机械工业部,主管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工作。同年7月,又在北京建立了核武器研究所,负责第一颗原子弹的前期研制工作。同时,抓紧了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的建设。③1955年起,为了适应常规武器装备发展的需要,国防工业部门先后建立了一些专业研究机构及设在工厂的产品设计机构。在航空方面,有飞机设计、航空发动机设计、航空材料、航空工艺、飞行试验、航空仪表、空气动力等研究所;在舰艇方面,有水中兵器、水声、导航、船舶设计等研究所;在无线电电子方面,有通信器材、雷达、材料元件、电真空、半导体、亚热带电信器材、化学电源、计算机、通信技术、电子仪器等研究所;在兵器方面,有轻武器、火炸药、金属材料、坦克车辆、发动机等研究所。此外,各军兵种也相继成立了一些研究机构,主要任务是对武器装备进行战术技术论证并提出具体的性能指标,以及试验定型等工作,同时也参与武器装备的研制与设计工作。④建设国防科技工业高等院校,大力培养国防科技专业人才。1952年起,先后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后改称军事电信工程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工业学院、成都电讯工程学院、西北工业大学、南京航空学院、太原机械学院,并将上海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调整为国防工业高等院校。在此期间,为满足国防科研各专业的需要,国家还确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等高等院校设立核物理、放射化学、数学力学、电子技术、光学及仪器等专业。⑤创建国防科技试验基地。1953~1959年,先后组建了常规兵器试验基地、综合导弹试验基地、海军武器装备试验基地和核武器试验基地。50年代末60年代初,这些基地已能承担试验任务。

主要成果 经过十年的艰苦努力,中国的国防科技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不仅初步建立了常规武器装备生产和协作配套的体系,具备了仿制及生产陆、海、空三军武器装备的能力,而且建成了一批国防科研机构、国防科技工业高等院校和武器装备试验基地,初步形成了一支国防科技队伍,具备了相应的研制、试验能力,开展了原子弹、导弹的探索性研究,常规武器装备也在仿制的基础上开始了自行设计制造的尝试。从1953年开始,停止生产所有旧式武器及弹药,有步骤地试制、生产了各种新的制式武器装备。在陆军武器方面,到1956年,步兵武器已实现国产化、制式化;1954年仿制成功大口径火炮;1959年59式中型坦克仿制成功并投入生产。在飞机制造方面,1954年仿制成功“雅克-18”初级教练机;1956年成功仿制歼5喷气式歼击机;1958年自行设计的喷气式歼击教练机“歼教1”和初级教练机“初教6”试飞成功。在舰艇研制方面,到1957年仿制成功了鱼雷快艇、鱼雷潜艇、蒸汽动力护卫舰、柴油机动力猎潜艇、扫雷艇等五种型号舰艇,并投入批量生产。在尖端技术研究方面,1958年建成原子能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核工业、核科研和导弹研制所需建设项目陆续上马的有30多个。

突破“两弹”技术阶段(1960~1965) 在这一阶段,由于苏联全面毁约停援,加上国内的经济困难,国防科技特别是国防尖端技术的研究与发展曾一度陷入困境。为适应国防建设的需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运筹帷幄,适时作出了依靠自力更生,突破“两弹”(导弹、原子弹)技术的决策,并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在短短的几年里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

集中领导,调集科研力量 为突破“两弹”技术,中共中央对国防科研采取了加强集

中统一领导的重大措施。1961年11月,中共中央批准成立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简称国防工办)。1962年11月,成立15人组成的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加强了对“两弹”研制工作的领导,对迅速突破“两弹”技术起了关键作用。1963~1964年,为了适应国防科技工业发展的需要,先后成立了第三机械工业部(航空工业)、第四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第五机械工业部(兵器工业)、第六机械工业部(船舶工业)和第七机械工业部(导弹工业)。1960年1月,将一大批有实际工作经验的技术人才调到研制导弹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从全国各地、各部门选调了数百名高、中级科研骨干和工程技术人员参加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国家还为核武器研究所先后抽调了数十名留学生、数百名大专毕业生。1961~1965年,先后将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工业学院、成都电讯工程学院、西北工业大学、南京航空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太原机械学院、军事电信工程学院、炮兵工程学院和军事工程学院等11所高等院校划归国防科委领导,统筹规划,增设专业,扩大招生规模,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学质量,为国防科技工业培养了大量专业技术人才,保证了科研工作的顺利展开。

组织全国科研大协作 1961年初,中共中央批转聂荣臻《关于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科技工作安排的报告》,明确要求把从中央到地方各方面的科技力量组织起来,统一安排,共同完成国防科研任务。同年,国防科委与中国科学院商定,分别组成两个协作小组,以及时协调解决研制中的具体问题。中国科学院为此先后动员了30多个研究所的大部分科研力量,承担了300多个科研项目的协作任务。1962年以后,动员了国防科研部门、中国科学院、工业部门、高等院校和地方

科研部门五个方面的科研力量,为“两弹”的研制解决了许多重大的技术关键问题。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力量,解决相关的新材料、电子元器件、仪器仪表、精密机械、特殊设备等的研制、生产和供应问题。1963~1965年,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国防工办、国家物资部联合召开了三次导弹、核武器等研制项目所需新材料和配套产品的定点会议,重点安排了“两弹”和国防科研所需的特殊材料、配套产品和备品备件共2万余项研制、生产任务,初步形成了国防科研、生产所需原材料和配套产品的协作网。到1965年,研制成功的各种新材料共1万余项,品种可以满足“两弹”和常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需要的96%以上。全国范围的科研大协作,为突破“两弹”技术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重视预先研究 对于科技基础薄弱的中国来说,预先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尤为重要。因此,国防科委和国防工业有关部门于60年代初,在“两弹”及其他重大武器装备的研制中,就狠抓了预先研究工作,为型号研制打下了坚实的技术基础。①在对原子弹基本理论深入研究之后,开始进行设计计算和实验验证。②在原子弹研制工作开始不久,又部署了氢弹的预先研究工作,开始进行热核材料性能和热核反应机理的基础研究。③在自行设计中远程地地导弹的同时,开始对中程地地导弹动力系统的发动机和控制系统的惯性器件等关键项目进行预先研究。④在对核动力装置等进行了比较扎实的预先研究后,开始了核潜艇的研制。⑤在对人造地球卫星进行了大量基础性、开拓性的预先研究后,开始型号设计。

主要成就 ①原子弹研制成功。1960年春,中共中央决定开始进行原子弹的研制工作。经过四年多的努力,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

成功。1965年5月14日,原子弹空投试验成功。通过研制原子弹,掌握了核武器研究、设计、试制、试验的基本技能,为加速原子弹的武器化和氢弹的研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②中近程地地导弹研制成功。1960年初,中国地地导弹研制工作具备了由仿制转入自行研制的基本条件。1962年初试制出试验用的导弹,3月21日进行首次飞行试验,但未获成功。经过认真总结经验,采取有力措施,1964年6月29日,第一枚改进设计后的中近程地地导弹在西北综合导弹试验基地进行飞行试验,获得圆满成功。此后又连续进行了多次试验,均获成功。至1965年4月,中近程地地导弹的研制任务胜利完成。③常规武器装备从仿制转向自行研制。1960年后,中国在集中力量突破国防尖端技术的同时,努力发展常规武器装备。1960年12月,中共中央批准成立航空、舰艇、军事无线电电子学三个研究院,负责军用飞机、舰艇、军用电子装备的研制工作。到1965年,自行设计的常规武器装备已达50%左右。仿制的陆、海、空军武器装备性能进一步提高,国产的地空、空空、海防导弹已成批生产并装备部队;适合中国水网稻田、江河、湖泊、山区、近海等不同地形和不同气候条件作战的轻型坦克、水陆两用坦克和履带式装甲运输车,歼6歼击机,强5强击机,适合于海军近海作战的鱼雷快艇、中型常规动力鱼雷潜艇、中型护卫舰等,也研制成功并装备部队。在军用电子装备方面,基本摆脱了仿制局面,到60年代中期,低空警戒雷达和低空测高雷达、炮瞄雷达和机载火控雷达相继研制或改装成功。1965年还先后研制出一批有代表性的晶体管电子计算机,从此中国进入了第二代军用电子计算机的发展阶段。在此期间,野战通信装备实现了小型化,并试制成功一批半导体战术电台;在大型短波通信方面,突破了单边带技术,先后研制出

多种功率的短波单边带电台;在多路通信方面,有线载波机、微波接力机、对流层散射机等相继问世。

排除“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夺取国防科研新成果阶段(1966~1976) 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使正在蓬勃发展的国防科技研究事业遭到极为严重的干扰和破坏,许多科研部门和生产单位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大批领导干部和科研专家受到冲击和摧残,许多行之有效的科技工作规章制度被废除,不少技术资料散失,科研、生产无法正常进行。但是,国防科研事业在艰难的环境中仍取得了新的成果。

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 为了严格地考验核弹头的性能,加快导弹核武器的研制进程,中央专委于1966年3月批准进行“两弹”结合飞行试验。1966年10月27日,装有核弹头的中近程地地导弹点火发射,核弹头在预定地点上空实现了核爆炸,“两弹”结合飞行试验获得圆满成功。这标志着中国的中近程地地导弹核武器已进入了定型和装备部队的阶段。

氢弹提前试验成功 1965年初,中央专委批准了第二机械工业部报送的计划,力争1968年进行氢弹装置爆炸试验。1966年5月9日,含有热核材料的原子弹试验获得成功,为氢弹研究提供了实测数据。同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顺利进行,并获得完全成功。1967年6月17日,进行首次全当量氢弹空爆试验,爆炸威力为330万吨梯恩梯当量,试验场区内外人员均安全,试验获得圆满的成功。

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1967年6月,中央军委批准组建空间技术研究院,并于次年2月正式成立,卫星研制工作全面展开。1968年底,卫星测控系统第一期工程基本建成。1969年底进行第三级固体火箭与卫星对

接试车。1970年1月,进行一、二级火箭飞行试验,均获成功。1970年4月24日,“长征1号”运载火箭载着东方红1号卫星腾空而起,卫星准确入轨,第一颗卫星发射成功。1971年3月至1976年底,中国又陆续成功地发射了一颗科学实验卫星、两颗返回式遥感卫星和三颗技术试验卫星,并对返回式遥感卫星成功地进行了回收。

鱼雷攻击型核潜艇研制成功 1965年3月,中央专委决定恢复导弹核潜艇研制计划,全面展开研制工作。同年8月,决定先研制鱼雷核潜艇,再研制导弹核潜艇。1971年4月,第一艘核潜艇开始在码头进行系泊试验。1971年8月和1974年4月,相继完成了系泊试验和航行试验。试验结果证明,鱼雷核潜艇水下航速高,续航力大,隐蔽性好,设计和制造取得成功。

常规武器装备实现自行研制 主要成果是:①防空武器和反坦克武器有了较大发展。研制定型了74式37毫米高炮系统、“红旗2号”地空导弹系统。到1976年,已初步形成能对付低空、中空和中高空目标的地面防空武器系统。研制出新的40毫米火箭筒、多种口径的无坐力炮、100毫米反坦克滑膛炮及配套弹药、74式火箭布雷车、75式105毫米自行无坐力炮和69式中型坦克等,提高了反坦克作战能力。②军用飞机的改进和研制取得新成果。歼6、歼7、强5、轰5、轰6飞机改型、改进为教练、侦察和不同作战用途的飞机,性能都有较大提高。自行研制成功歼8高空高速歼击机和第一代大型水上轰炸机水轰5飞机。③研制成功第一代战斗舰艇。包括小型钢质导弹快艇,低磁港湾扫雷艇,艇具合一型扫雷艇,第一代中型常规动力鱼雷潜艇、导弹驱逐舰、反潜护卫艇和对海型导弹护卫舰等。④军用电子装备全面展开自行研制。无线电通信、测量设备,大容量电子

计算机,以及新型雷达如相控阵雷达、超远程跟踪雷达等相继研制成功,为导弹、核武器、运载火箭、卫星、核潜艇的研制,提供了必要的电子装备。

整顿恢复阶段(1977~1984) 为了挽回“文化大革命”给国防科技事业造成的严重损失,使国防科研、生产、试验工作迅速步入正常轨道,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采取了一系列整顿措施。到1984年,不仅重点完成了洲际导弹、潜地导弹、通信卫星的研制、试验任务,而且常规武器装备的研制工作也获得了可喜的成绩。

采取了有力的整顿恢复措施 主要是:①大力恢复科研秩序。通过对国防科研战线进行思想整顿,调整各级领导班子,健全组织,加强和健全科研管理等一系列工作,科研、生产秩序逐步恢复。②恢复和增建国防科技工业高等院校。不仅恢复了原有的院校,而且还组建了国防科技大学,成立了国防科委干部学校。到80年代中期,新增了15所高等院校,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培养国防科技人才的教育体系。③作出加速发展武器装备的决策。1977年9月,中央军委批准国防科委制定的以洲际导弹、潜地导弹和通信卫星为重点(简称“三抓”任务)的国防科研、试验三年计划。同年12月,中央军委又作出了《关于加速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的决定》,同时提出了1981~1985年及至20世纪末的武器装备发展计划和设想。1979年,国家进行经济建设三年调整,国防科研、生产任务等方面也进一步调整了计划,要求贯彻执行“缩短战线,突出重点,狠抓科研,加速更新”的方针。④成立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1977年11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国防科学技术装备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委)。1982年5月,以国防科委为基础,由国防科委、国防工业办公室、国防科学技术装备委员会办公

室合并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同时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工委），隶属中央军委，其工作受国务院、中央军委双重领导，全面负责武器装备研制生产的全面领导、规划协调和组织建设。

集中力量，重点完成“三抓”任务 1977年9月起，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专委集中力量，狠抓了洲际导弹、潜地导弹和通信卫星的研制、试验任务，不仅圆满完成“三抓”任务，而且也促进了常规武器装备和其他各项科研的顺利发展。①建成远洋测量船队。到1980年，已建成了“远望1号”、“远望2号”测量船、“向阳红10号”调查船各一艘，打捞救生船、援救拖船、油水补给船各三艘共五型12艘大型船舶的研制任务。远洋测量船队的建成，使中国成为继美、苏、法国之后的第四个具有海上跟踪测量能力的国家，填补了中国海上测量的空白，形成了从陆上到海上的测控通信网，为执行“三抓”任务及其他航天器飞行试验任务提供了良好的海上活动跟踪测量条件。②组织洲际导弹研制和全程飞行试验。1975年11月~1979年11月，通过洲际导弹的改进设计和地面试验，解决了一系列关键技术问题，成功地进行了高弹道、低弹道发射试验。1980年3月，全程飞行试验进入实施阶段。5月18日，中国自行研制的洲际导弹在西北导弹试验基地发射，飞行正常，陆上测控通信台站和海上测量船队完成了测量任务，数据舱在预定海域溅落并安全回收，全程飞行试验获得圆满成功，标志着中国导弹技术达到了一个新水平，战略导弹系列化走完了研制、试验的全过程。③完成潜地导弹的研制和试验。1982年10月7日，用常规动力潜艇进行了第一发遥测导弹的发射试验，但点火后不久，导弹失控，试验未获成功。10月12日，进行

第二发遥测导弹发射试验，获得圆满成功。潜地导弹的研制、试验成功，标志着中国的战略导弹，从液体推进剂发射发展到固体推进剂发射，从陆上发射发展到水下发射，从固定阵地发射发展到隐蔽机动发射，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潜艇水下发射导弹能力的国家。④试验通信卫星研制和发射成功。1984年1月29日，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但未达到预期目的。4月8日，第二颗试验通信卫星发射成功。从此，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够独立发射地球静止轨道通信卫星的国家。⑤核武器技术有了重大发展。主要是：推进了武器化工作，完成了多种战略导弹核弹头的研制、试验和定型工作；核试验逐步由大气层转入地下。到1984年，先后进行了九次地下核试验，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地下核试验道路。⑥完成导弹核潜艇的研制。1983年，首艇建成，交付海军训练使用。随后，又解决了潜地导弹武器系统及其装艇等关键技术问题，具备了实施水下发射潜地导弹的能力。从此，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导弹核潜艇的国家。“三抓”任务的完成，标志着中国战略核导弹完成了近程、中程和中远程到洲际的系列化任务和第一代潜地导弹研制工作的结束。

常规武器装备研制步伐加快 ①在抓紧完成“三抓”任务的同时，陆军武器装备的研制也取得了重要进展。在反坦克武器方面，研制成功红箭73反坦克导弹、84式122毫米火箭布雷系统，到1984年，已初步形成了地雷、火箭筒、火炮、导弹相结合的反坦克武器系列。在防空武器方面，研制了新型高射机枪和高射炮，1984年研制成功“红旗2号甲型”导弹武器系统，初步形成了火炮、导弹相结合的防空武器系列。在压制兵器方面，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中期，改进了原有的火炮，研制了新型榴弹炮、加农炮、自行榴

弹炮和多管火箭炮,到1984年,已形成了射程为8千米、10千米、20千米和40千米的大口径火箭炮系列。在坦克和装甲车辆方面,研制了新一代主战坦克和指挥坦克、装甲指挥车、履带装甲运输车、水陆装甲运输车等主要装备,形成了配套系列,提高了装甲部队的综合作战能力。②研制成功了中高空高速歼击机。1979年9月,歼7Ⅱ歼击机设计定型。1980年,开始研制中高空高速全天候歼7Ⅲ歼击机,首架飞机于1984年4月试飞成功。1981年4月,高空高速全天候歼8Ⅰ歼击机进行首次飞行试验,1984年4月研制成功。③改进了第一代舰艇。到1984年,鱼雷核潜艇、驱逐舰、中型鱼雷潜艇、大型导弹快艇、反潜护卫舰等五型舰艇实现了齐装配套,新建了扫雷、布雷、登陆艇等。同时,先后研制成功新型舰炮系统,深水炸弹反潜系统,声导反舰鱼雷和多种型号的反舰导弹。④军用电子装备水平大为提高。到1984年,为导弹试验基地、卫星发射中心、测控中心和各台站及远洋测量船研制、生产并安装了微波统一系统、雷达、电影经纬仪、双频测速仪、遥测、遥控、通信、导航、计算机等200多种3500多台(套)电子和光学设备,基本形成了从中国大陆到海洋的导弹、卫星测控网。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研制成功运算速度从数十万次、数百万次到千万次的大、中型计算机,特别是1982年1月研制成功运算速度为亿次的“银河”计算机,军用计算机初步实现了系列化。

深入发展阶段(1985年以来) 80年代中期,国防建设的指导思想从临战状态转到相对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国防科技工业贯彻军民结合方针,实行战略转变。为使国防科研朝着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方向迈进,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①调整改革

国防科技工业管理体制。1982年5月,撤销第六机械工业部,成立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同时将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七机械工业部分别更名为核、航空、电子、兵器、航天工业部。1988年和1993年,先后将核、兵器、航空、航天工业部撤销,成立核工业、兵器工业、航空工业、航天工业总公司,把政府机构转变为军民结合、技工贸结合、具有法人资格的科技先导型全民所有制经济实体。1998年又对领导管理体制作出重大改革,在国务院组建新的国防科工委,将原国防科工委管理国防工业的职能、国家计委国防司的职能及各军工总公司承担的政府职能,统归新组建的国防科工委;在军队组建总装备部,加强武器装备建设的集中统一领导,负责新型武器装备发展规划计划、科研管理,订货和现有装备管理。1999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五个军工总公司改组成立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中国航空工业第二集团公司、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航天机电集团公司等集团公司,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政企分开、产研结合、供需分离、精干高效的管理体系。②成立新的中央专委。1989年10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国务院、中央军委专门委员会,对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和军民结合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和统筹安排。③调整国防科研和生产能力。把多余的军品科研、生产能力腾出来开发民品,将军品科研、生产任务相对集中,压缩规模,调整布局。④改革国防科研试制费拨款办法,实行合同制。军队使用部门和军工企业集团的效益观念和法制观念明显加强,管理水平得到提高,对提高武器装备研制质量、加快研制进度产生了良好影响。⑤加强高技术研

究和预先研究。这一阶段国防科技的主要成果有以下几个方面:1986年2月,国防科工委组织了大规模、高层次、跨部门的《二〇〇〇年的中国国防科学技术》的研究工作,提出了2000年的国防科技发展的战略思想、奋斗目标、发展重点和政策措施。先后制订了国防科技“七五”、“八五”、“九五”计划。在制订发展规划和计划时,特别强调要把预研工作摆在战略地位,加强对预先研究工作的管理。1986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国家科委和国防科工委组织制订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八六三”计划)纲要》,包括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术、自动化技术等七个方面。同时,调整组建了精确制导技术、抗核加固技术、军用新材料应用研究等19个项目专业组,制订了预先研究管理办法。十多年来,在与军事应用有关的高技术领域,取得了数百项研究成果,有些成果已在运载火箭、遥感卫星、飞船、激光武器等项目中得到应用。

研制成功新型常规武器装备 根据中央军委重点发展常规武器装备的方针,加强了对研制工作的领导,走上了自行研制发展的新阶段,整体水平有较大的提高,有些项目已达到国际水平。199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的阅兵式上,展示了这一阶段国防科技发展的成果。轻武器完成了小口径枪族的研制,参加阅兵的徒步方队配备的是新型小口径自动步枪。防空武器研制出单兵肩射防空导弹、双管37毫米自行高炮、新型高射机枪等,参加检阅的有野战低空防空导弹、海陆通用的中低空防空导弹和四管25毫米自行高炮。反坦克武器研制出红箭8号反坦克导弹、100毫米滑膛反坦克炮等,参加检阅的车载重型反坦克导弹、120毫米自行反坦克炮,性能接近国际同类武器水平。压制兵器参加检阅的有122毫米自行榴

弹炮、152毫米自行加农炮、122毫米自行火箭炮等。坦克和装甲车辆参加检阅的有主战坦克、履带式步兵战车、装甲输送车等,其中新型主战坦克、轮式装甲输送车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空中受阅编队有歼8Ⅱ等新型歼击机、新型强击机、歼击轰炸机、空中加油机等,武装直升机也首次参加了检阅。在海军武器装备方面,研制成功新型导弹驱逐舰、多功能护卫舰、新型常规和核动力潜艇等,参加检阅的有新型舰空导弹、舰舰导弹、岸舰导弹等,其中超音速反舰导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在军用电子装备方面,研制成功新型中空远程警戒雷达、相扫三座标舰用雷达、远程警戒引导雷达、高炮火控雷达及防空自动化指挥系统等。1992年11月研制成功银河—Ⅰ10亿次计算机,1997年6月研制成功银河—Ⅱ百亿次计算机;2000年研制成功银河—Ⅳ千亿次超级计算机。此外,还研制成功了银河数字仿真机系统、军用加固微机系统等。

战略导弹和核武器研制取得新进展 “三抓”任务完成后,中国进入第二代战略武器研制阶段。1985年5月,中国首次用机动发射装置成功发射了地地固体推进剂战略导弹。1988年9月,导弹核潜艇水下发射潜地导弹成功,标志着中国已掌握了战略导弹核武器的固体化、机动发射和潜艇水下发射的新技术。90年代又研制成功新型常规地地弹道导弹和远程固体战略导弹,并在国庆50周年阅兵式上展示。核武器以小型、机动、突防、安全、可靠为发展方向,进行了新的设计理论和制造工艺的探索研究,成功进行了一系列核试验,检验了新的设计原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96年7月29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郑重宣布:从1996年7月30日起中国开始暂停核试验。这是中国为推动核裁军而采取的一项实际行动。

航天技术飞速发展 从 80 年代中期至 20 世纪末,中国的航天技术得到飞速发展,在卫星研制、运载火箭技术、发射技术、测控技术等方面已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①人造地球卫星。截至 2000 年 10 月,共研制并发射了 47 颗不同类型的人造地球卫星,飞行成功率达 90% 以上。到 2000 年底,已初步形成了四个卫星系列:返回式遥感卫星系列、“东方红”通信广播卫星系列、“风云”气象卫星系列和“实践”科学探测与技术试验卫星系列,“资源”地球资源卫星系列也即将形成。中国是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卫星回收成功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中国是世界上第五个独立研制和发射地球静止轨道通信卫星的国家。中国的气象卫星、地球资源卫星主要技术指标已达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的国际水平,90 年代后期研制并发射的六颗通信、地球资源和气象卫星投入使用后,工作稳定,性能良好,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②运载火箭。中国独立自主地研制了 12 种不同型号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适用于发射近地轨道、地球静止轨道和太阳同步轨道卫星。自 1985 年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将“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投入国际商业发射市场以来,已将 27 颗外国制造的卫星成功地送入太空。至 20 世纪末,“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共发射 63 次。1996 年 10 月~2000 年 10 月,“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已连续 21 次发射成功。③航天器发射场。中国已建成酒泉、西昌、太原三个航天器发射场,并圆满完成了各种运载火箭的飞行试验和各类人造卫星、试验飞船的发射任务。中国航天器发射场既可完成国内发射任务,又具有为国际商业发射服务和开展其他国际航天合作的能力。④航天测控。中国已建成完整的测控网,包括陆地测控站和海上测量船,圆满完成了从近地轨道卫星到地球静止轨道卫

星、从卫星到试验飞船的航天测控任务。中国航天测控网已具备国际联网共享测控资源的能力,测控技术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⑤载人航天。中国于 1992 年开始实施载人飞船航天工程,研制了载人飞船和高可靠运载火箭,开展了航天医学和空间生命科学工程的研究,选拔了预备航天员,研制了一批空间遥感和空间试验装置。1999 年 11 月 20 日~2002 年 4 月 1 日,中国已成功发射并回收了三艘“神舟”号无人试验飞船,标志着中国已突破了载人飞船的基本技术,在载人航天领域迈出了重要步伐。

半个世纪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培养造就了一支具有较高水平和优良作风的国防科技队伍,建成了比较完整配套的国防科研生产体系,形成了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国防科技和研制新型武器装备的综合能力。特别是“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和不断发展,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的重要标志,不仅使中国的国防实力发生了质的飞跃,而且广泛带动了科技事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国庆 50 周年前夕,1999 年 9 月 18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隆重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受到表彰的 23 位科技专家是:于敏、王大珩、王希季、王淦昌、邓稼先、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家骅、周光召、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钱学森、郭永槐、屠守锷、黄伟禄、程开甲、彭桓武。他们是国防科技战线上大批有重大贡献的科技人员中的杰出代表,共和国将铭记他们的功勋。

中国国防科学技术研究的发展趋势 国防科技是受世界新技术革命影响最深刻、最显著的领域。同时,其发展也受国际政治、经

济和军事形势的深刻影响。随着高新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许多国家把军队建设的重点,转向高科技领域,形成以高科技质量建设为主要标志的竞争新态势,把加速武器装备高技术化(包括信息化、精确化、智能化、隐形化等)、体系化,作为提高武器装备作战效能,提高军队战斗力的战略选择。跟踪并掌握这方面的最新动向,将是中国国防科技研究的重要任务。

中国把“科技强军”作为新时期军队建设的重要战略思想。加强国防科技研究,关系到新时期战略方针的落实,关系到科技强军和质量建军的大局,关系到军队战斗力的提高。中国在开展国防科技研究中,将一如既往地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改革开放的方针,努力跟踪国外高新技术,加强科技合作,重点加快高新技术武器装备的发展,不断提高国防科技研究的水平。

参考文献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海军》、《当代中国空军》、《当代中国的核工业》、《当代中国的航天事业》、《当代中国的航空工业》、《当代中国的电子工业》、《当代中国的兵器工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1993。

温熙森、匡兴华著:《国防科学技术论》,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1995。

《中国近代兵器工业》编审委员会:《中国近代兵器工业》,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98。

姜长英著:《中国航空史》,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黄远模 陈效良 金钰)

射击学研究 (research of gunnery)

探讨合理运用射击武器系统,将弹丸或战斗部射向目标或预定位置,获得最佳射击

效果的活动。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射击理论、射击方法、射击指挥。射击理论主要以概率论、外弹道学、最优化方法、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为基础,研究各种影响射击精度的因素对射击效果的综合作用,并探求如何获得最佳射击效果的理论。射击方法是以射击理论为指导,以作战与训练的实践经验为基础而制定的对各种目标进行射击的程式、步骤、规则 and 要领的总称。一般以教程和教范的形式,规定射击方法。射击指挥是指挥员和指挥机关在完成射击任务过程中为适时而有效地运用火力所采取的措施和行动。

武器弹药的发展、目标的多样化和武器使用条件的复杂性,使射击学形成了许多专门研究的领域:按武器射击的弹药,可分为子母弹、布雷弹、末敏弹、末制导弹的射击问题;按武器射击的目标,可分为直升机、反导弹、反机场跑道、反深层目标的射击问题;按武器射击所处的环境,可分为海上、海岸、海岛和山地、高原地、森林地、水网地、稻田地等射击问题;按武器射击时天候可分为昼间、夜间、雨天、雾天、雪天等射击问题。

中华民国时期军队的射击学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中国开始了射击方法的探索,并出版了一些介绍射击学原理的书籍,如《兵器学教程》(1927)。此后,又有一些专著问世,如《兵器学讲义》(1942)、《数学与战争》(1947)等。20世纪20~30年代,火炮以直接瞄准射击为主,射击方法实质上是射击操作问题。40年代前期,由于大量曲射火炮的使用,间接瞄准射击方法广泛使用。在方向瞄准、决定射击开始诸元、试射等方面,从实践中总结了一套方法。这一时期火炮、弹药和观察仪器来自不同国家,射击方法也杂用各国的方法,水平较低;炮兵射击保障器材数量少且质量差,不能采用精密方法决定射击开始诸元。40年代后期,开始使用交叉法试射。但

是,具有射击计算繁琐,交会观察计算复杂等不足。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射击学研究 大体经历了以下四个时期:

初步形成时期(50年代) 从50年代初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以1945年苏军颁布的射击规则及其详解和射击指挥教令为主要依据,学习苏军的射击方法、射击理论和射击指挥。在学习的基础上,收集整理以往人民解放军炮兵作战经验和大型军事演习的资料,于1959年编写出《炮兵射击教范》。同时,军事院校也研究编写了炮兵射击理论方面的教材,如《陆军炮兵射击理论》、《地面炮兵射击问题参考》、《炮兵射击理论教程》等。尽管这些教材的内容和体系还留有苏军射击学的特征,但它们标志着中国炮兵射击学已初步形成。

体系建立时期(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 从60年代初开始,人民解放军组织大批射击专家,在苏军炮兵射击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作战经验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实际情况,研究炮兵射击理论。196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炮兵射击研究所。1963年,召开炮兵第一次射击学术研讨会。1964年,组织大规模炮兵实弹射击试验。从1961~1965年,先后出版了炮兵射击教范和教令。在这期间,取得了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成果,如利用标准方法计算弹药消耗量,大间隔图法(或射击修正量器)试射。此外,还提出了精密法,试射炮调制不同号装药的修正量图表等。1972~1975年,先后出版了陆军地面炮兵射击教程、陆军地面炮兵射击教程说明、陆军地面炮兵营群射击指挥等教材。在这些教材中,增加了射击基础知识及提高射击精度的措施等内容。在射击准备中提出了保证随时执行射击任务的措施,精减了决定诸元的方法;在决定射击诸元时,考虑到了高程问

题,根据高程将射击区分为“山地”与“高原”射击等。这些标志着中国炮兵射击学体系已经形成。

体系完善时期(70年代末至80年代) 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1978年底和1979年底,先后出版了射击教程和说明。1988年出版了具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射击学特色的射击学系列教程,初步解决了一些国外尚未解决的射击学问题。在此期间,炮兵射击学有三大发展:①在射击理论上,彻底突破苏军在射击学理论上采用的纯数学的方法。苏军在射击方法上采用单一指标,目标为完全无反应的静止物,试射理论只强调精度,忽略缩短反应时间和尽可能减少试射的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射击学,把单一指标改为符合实战的多指标,把目标看成是具有对抗性的动目标,把影响战斗过程的诸因素看作一个系统,采用综合优化的方法,确定最佳射击方法;在决定射击开始诸元时,正确处理精度与速度的关系;从理论上研究射击指挥问题,把经验指挥转变为科学指挥。②在炮兵射击中,采用电子计算机,提高了作业速度,缩短了反应时间,变手工作业为计算机作业,提高了射击的速度和精度。③从交叉法试射逐渐转变为适应新情况的偏差法试射,减少了试射次数。这些新成果都反映在1988年出版的射击教程和说明之中。

深入研究时期(90年代) 从90年代开始,高新技术,如卫星全球定位技术、激光技术、自动定向技术以及初速雷达、侦察雷达、新型气象雷达、火控系统等在火炮射击中的全面应用,使射击诸元精度更高,反应时间更短,双方对抗加剧,自行化、自动化、自主化程度提高。在这一时期,大量运用高新技术的火炮、弹药,运载工具的发展,战场目标的多样化、灵巧化、制导化,新型非杀伤性弹药的使用等新情况,不论是对敌方新武器的防御,还

是对己方新武器装备的使用,都提出了射击学的新课题。射击学开始研究远程精确打击的问题,编写出了新的射击教程。射击学的应用,不再局限于指导射击,而在战术技术指标论证、计算机模拟与演示,甚至后勤保障与试验中,都有了广泛应用。射击学研究的对象已从一门或数门火炮的射击问题,发展成为对战斗全局的系统考虑及自动化指挥问题。这些新课题,有的已有初步研究成果,有的还在研究中,也是今后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郑津生主编:《炮兵射击理论研究与应用》,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

(郭锡福)

弹道学研究 (research of ballistics)

探讨各种弹丸或其他发射体从发射开始到终点的运动规律及伴随发生的有关现象的活动。弹道学包括许多分支,按发射体与发射装置的相对位置,或按弹道的不同阶段,分为内弹道学、中间弹道学和终点弹道学;从应用力学角度,分为推进动力学、发射动力学、飞行动力学和终点效应;按研究对象,分为普通枪炮弹道学、火箭弹道学、航弹弹道学、导弹飞行力学等。按研究对象所处的环境,分为真空弹道学、空气弹道学、水中弹道学、固体介质弹道学和研究对人体作用的创伤弹道学等;按研究的内容和方法,分为经典弹道学、现代弹道学、计算弹道学和实验弹道学。弹道学在武器系统的总体设计、鉴定与评价、研究与制造、贮存与保管、部队训练与战场使用中都有十分重要的应用。

研究概况 1861~1911年,中国开始建立以仿制为主的兵器工业,有关弹道学方面的知识传入中国,并有个别科学家在研究弹道问题,但还没有建立起中国的弹道学科。20

世纪30年代,有中国学者在欧美诸国学习和研究弹道学方面的知识,主要是近似解算法和测速、测压等基本试验技术。1936年4月,国民党政府兵工署在南京成立弹道研究所筹备处,该处曾聘请德籍弹道学教授负责建筑设计等工作。1937年7月1日弹道研究所正式成立,主要从事武器内外弹道学及火药的研究,也配合工厂设计火炮,制备射表,用国产原料合成炸药。30年代出版的多种兵器学教材中包含有介绍弹道学知识的内容。兵工大学也开设了弹道学课程。但由于当时使用的武器主要以引进和仿制为主,再加上科学技术的落后及社会等方面的原因,在20世纪前半期,中国始终没有形成较为完整的弹道学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弹道学理论研究获得了巨大发展。50年代,主要是学习苏联的弹道学理论,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探索一些弹道学问题。60年代初,在一些大专院校和专业研究所开展了弹道学理论研究,经过反复探索和实验,在一些重要论点上有了突破。70年代中期,开始了内弹道势平衡理论的研究,穿甲和破甲机理的实验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

80年代以后,弹道学研究开始了一个大发展的新时期,不仅继续在内弹道学、外弹道学、实验弹道学等方面有所发展,而且形成了创伤弹道学、计算弹道学、终点弹道学、低阻航弹弹道理论。在高新技术发展的推动下,围绕着提高射程、精度和威力的目标,突出研究了远程精确制导弹药的弹道问题,弹道总体优化设计问题,新型弹箭的弹道理论和发射原理,新型特种弹药的弹道理论。同时,在弹丸发射能力学、火控弹道模型、弹道探测技术等方面,也取得了较大成果。这些成果,构成了新的弹道学的重要内容,推动了新型武器的发展。

主要成果 20世纪,中国弹道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内弹道学研究 内弹道学是研究发射过程中枪膛内及固体火箭发动机内的火药燃烧、物质流动、能量转换和枪炮弹丸的运动等规律以及其他有关现象的学科。内弹道学研究始于1793年。19世纪末,形成了以几何燃烧定律和拉格朗日假设为基础的内弹道学理论。50年代至60年代初,中国主要是学习苏联的内弹道学理论,吸收和掌握以几何燃烧定律为基础的弹道学理论和实验方法,引进了苏制电子测时仪等测试设备,开始了内弹道研究,出版了《特种武器内弹道学》(1960)和《内弹道学讲义》。由于几何燃烧定律是一个理想的模型,与实际的燃烧过程存在一定的差异,用于武器设计不够理想。60年代,国内研制了电子管测时仪,晶体管测时仪,双通道、多功能测时仪,测试技术和研究方法有很大进步。70年代以来,又研究成功D4—A内弹道雷达,采用微波干涉技术,可测定弹丸在膛内位移—时间、速度—时间及压力—时间曲线,其性能达到国际80年代水平,填补了中国内弹道测速雷达的空白;双通道测速系统,以及光幕靶和电子磁靶,配有测速雷达,测速精度接近国际先进水平。此外,还发展了高膛压电测法、塑性变形法等,使中国身管武器膛压测试技术进入了国际先进行列。在此基础上,内弹道学理论研究也有了突破性的发展。中国于7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这个问题,发现了在时空域中能量势与冲量势同期达到平衡点的规律,于1979年提出了内弹道势平衡理论。尔后,又继续对膛内火药燃烧规律、弹道解算法、无坐力炮内弹道等专题进行研究,创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适用性更强的新的弹道学体系理论,对管形射击武器与装药的结构设计,具有重要指导作用。1983年,出版了《内弹道

气体动力学原理》;1984年,出版了《内弹道学实验原理》;1987年,出版了《内弹道学势平衡理论及应用》;1990年,出版了《实用两相流内弹道学》;1992年,出版了《现代内弹道学》。这些专著集中反映了中国弹道学研究的成果。

中间弹道学研究 中间弹道学是研究身管武器发射过程中,弹丸穿越膛口流场时的受力状况、运动规律,以及伴随膛内火药燃气排空过程发生的各种现象的学科。20世纪60年代,中间弹道学从内弹道学中分化出来,形成了中间弹道学学科。中国从70年代起开始利用试验法研究后效期流场,以及弹丸在后效期流场中的飞行姿态。1981年,华东工学院和军内有关部门开展了膛口流场形成及其变化规律等方面的研究,经过十年的探索和钻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初步形成了中国的中间弹道学理论。这一理论指导了身管武器的设计工作,推动了火炮炮口制退器的改进。在军事医学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部门的协同下,他们还开展了炮口冲击波、噪声、膛口消烟、膛口气流等课题的研究,也取得了有益的成果。

外弹道学研究 外弹道学是研究弹丸或其他发射体在空中的运动及有关现象的学科。50年代,中国以学习苏联外弹道理论为主,1956、1958、1960年相继出版了三种《外弹道学》。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开始对外弹道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出版了《外弹道学》(1980)、《火箭外弹道学》(1980)等专著,建立了中国的外弹道学理论体系,集中反映了60年代以来外弹道学的研究成果。80年代,外弹道学的研究还结合各种实际问题,特别在优化设计、发射动力学、增程理论研究方面进一步扩展,使中国外弹道学研究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成果世界瞩目。

终点弹道学研究 终点弹道学是研究弹

丸或战斗部对目标的作用机理及毁伤效应的学科。中国的终点弹道学研究,主要集中在穿甲和破甲机理、创伤弹道学等方面。在穿甲机理方面,70年代初开始探索,逐步形成了以国防工业有关厂、所和华东工学院、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等为主的攻关队伍。经过密切协同,精心钻研,取得了重要突破。主要成果有高密度合金钢弹体材料性能与穿甲效应的关系;长杆弹体形状结构和长径比对穿甲威力的关系;金属—非金属复合装甲结构、面背板厚度等对防护力的关系。这些成果对坦克的复合装甲和反坦克穿甲弹的研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84年,出版了反映这方面研究成果的《穿甲力学》。在破甲机理方面,主要研究空心装药破甲弹射流形态及其侵彻装甲板时的相互作用机理。1972年,开始进行破甲机理研究,一方面通过分析测定金属装甲板材料的抗拉强度、密度、韧性与抗侵彻力的关系,指导均质靶板新材料的研究;另一方面探索炸药射流在侵彻复合装甲过程中的特性,为破甲弹的设计和复合装甲材料研制提供理论依据。此外,还对旋压药形罩对低速旋转破甲弹的威胁补偿效应进行了研究,对提高侵彻装甲的威力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在对各类弹丸作用机理较深入研究的基础上,1984年、1989年和1993年相继出版了《终点弹道学》和《弹丸终点效应》,进一步丰富了终点弹道学的研究内容,建立了中国终点弹道学的体系。

创伤弹道学研究 创伤弹道学主要研究弹丸、弹片等投射物在人体内的运动规律及其对机体的影响。它属于终点弹道学和军事医学的边缘学科。中国创伤弹道学研究起步于1979年,进展较快。首先论证研究的是小口径枪弹的杀伤效应和致伤特点,集中力量分析研究了1 164个国内战伤病例,进行了800多只动物效应试验,获取了十种枪弹、四

种小型破片生物靶和非生物靶的致伤效应参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创伤弹道学理论,既为设计小口径枪械奠定了技术基础,也为提高野战外科医疗水平提供了理论基础。这些成果使中国的创伤弹道学研究走在了世界的前列。经过近20年的研究,建立了创伤弹道学实验室,在理论上和实验研究上建立了自己的体系。1985年出版《创伤弹道学概论》,1991年出版《创伤弹道学》,形成中国创伤弹道学体系。

低阻抗弹道理论研究 这是对低阻抗弹道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属航空弹道学领域。1981年开始研究,有关人员搜集了国内外的大量资料,设计了多种不同类型的低阻抗弹模型弹,采用自由飞行和风洞试验相结合的试验方法反复探索,终于找出了适用于中国的低阻抗弹特点的阻力规律,并运用这个研究成果制定出了低阻抗弹水平、上仰和低冲轰炸的弹道表,填补了中国低阻抗弹道表的空白,丰富和发展了航弹弹道学理论。

实验弹道学研究 50年代开始研究实验弹道学。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建立了完整配套的弹道试验装置、数据采集和处理系统,编写了试验原理和方法。弹道学的各分支学科的研究,建立了相应的试验装置、现代化的试验场,以进行综合试验。1982~1983年编写或出版了《外弹道实验讲义》和《内弹道实验原理》,各试验场和实验室都编制了试验操作规程和实验指导书,为科学的试验设计、试验方法和数据处理建立了标准,推动了实验弹道学的发展。

计算弹道学研究 应用计算的方法研究弹道学问题。70年代末已开始研究。80年代中期以后,弹道学的各分支学科都形成了本学科领域内的计算弹道学,用于武器的总体设计和分析,研究本学科领域的理论问题和应用问题,并把弹道理论、实验和武器系统设

计有机地联系起来,通过建模、模型离散化和计算方法,形成数值计算的一整套计算机软件,在弹道学研究中取得较大成果。

参考文献

金志明、袁亚雄、宋明:《现代内弹道学》,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92。

浦发、芮筱亭:《外弹道学》,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89。

钱伟长:《穿甲力学》,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84。

赵文宣:《终点弹道学》,北京:兵器工业出版社,1989。

刘荫秋、王正国、马玉媛:《创伤弹道学》,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91。

(郭锡福)

军用标准化研究 (research of military standardization)

探讨武器装备建设和军事技术发展及其应用中,制定、修订、发布和实施军用标准和规范的活动。研究内容包括:军用标准化的理论和方法、方针和政策;军用标准化活动一般程序、科学管理及其工作系统;军用标准化的具体形式;军用标准系统的构成要素和运动规律;军用标准系统及其与外部的关系等。目的是利用系统工程的方法和标准化的原则,围绕军事装备和军事技术发展的需要,设计、组织和建立军用标准体系;通过制定军用标准、实施标准,推选标准化的思想、原则和方法,对标准的实施进行监督以及推行零部件、元器件、设备乃至分系统的通用化、系列化和组合化,为及时地、经济地获得互操作性好、安全可靠、保障方便、技术精良的军事装备提供支持和指导。

中国的军用标准根据内容和用途的不同分为标准、规范、指导性技术文件三大类。标准类,是为获得最佳军事秩序,对活动或其结

果规定共同的和重复使用的过程、程序、实践和方法的统一的工程及技术要求等内容的一类标准文件。这类文件通常通过法规、文件或工程项目合同工作说明纳入相关合同。规范类,是为支持装备订购制定的一类文件。这类文件规定,订购对象应符合的要求及符合性判据,以保证其适用性。规范通常由订购方根据订购装备的具体情况进行必要的剪裁后纳入装备订购合同的附件,作为军事装备订购合同的质量要求以及验收的依据。指导性技术文件类,是为研制、生产、使用和技术管理等提供有关资料和指导而制定的标准化文件等。

军用标准化研究从战争对武器有需求即已开始萌芽,至今已有 200 多年的历史。中国的军用标准化研究起步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大体经历了从全面采用苏联标准到全面自行制定标准、由分散管理到集中统一管理、由以工业部门为主到以军队部门为主建立军用标准的过程。

第一阶段(20 世纪 50~60 年代) 这一阶段,主要是仿制苏联的武器装备。工业部门按照苏联的技术标准组织生产,军队系统按照苏联标准检查验收。这期间,国防工业各部门组织所属各科研单位翻译并直接采用苏联标准,生产单位主要制定工艺工装标准。军队系统根据各自的需要,曾制定过少量军用标准,例如,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军需部于 1955 年制定了服装、肩领章等技术规定 188 个,1956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兵部制定了地面通信器材总技术条件。自 60 年代初开始,各国防工业部门根据装备研制或发展的需要、资源条件和能力,逐步研究制定本部门的标准,其中包括把适用的苏联标准转化成本部门的标准。1964 年 3 月,为解决军用标准中的协调、统一问题,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曾成立标准计量局,统一管理各国防

工业部门和国防科研机构的标准化工作,但因体制调整只运行了一年。

第二阶段(70年代~80年代前期) 1978年以后,随着军用标准化工作的发展,统一问题日见突出。1979年3月和1980年11月,国家标准总局先后提出军用标准化实行统一管理的建议。1980年,中国第一个国家军用标准GJB1—80《机载悬挂物和悬挂装置接合部位的通用设计准则》颁布。1981年,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科学技术装备委员会办公室组成临时军口标准化联合工作组,统一管理军用标准化工作。1982年8月,在新成立的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综合计划部综合局设立了标准化管理机构,统一制定军用标准化工作的方针、政策、法规和基本规章制度,组织制定、修订国家军用标准。从1983年开始,全国有组织、有计划、成体系地制定各类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所需要的国家军用标准,并在制定标准过程中,遵照“认真研究,区别对待,积极采用”的方针,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军用标准。1984年1月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布了《军用标准化管理办法》。1983年4月召开的第一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军用标准化管理条例》、《1983~1990年军用标准化发展规划纲要》等军用标准化规章制度草案。同年颁布了《发展纲要》。中国军用标准化的工作从此走上了统一管理的道路。

第三阶段(80年代中期~90年代) 1986年7月召开的第二次军用标准化工作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国家军用标准体系表》和《国家军用标准“七五”计划》,提出了结合重点武器装备研制开展综合标准化、继续组建军用专业标准化委员会以及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军用标准的任务和要求,强调军用标准化工作必须和武器装备的研制与

预研相结合,解决好科研、生产、使用相结合问题,推动军用标准化工作全面展开。1986年底,《国家军用标准体系表》批准下发。它是中国第一部涉及部门最多、专业范围最广、包括标准最多的标准体系,指导了中国“七五”、“八五”直至“九五”期间国家军用标准的制定工作,对中国军用标准体系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1989年9月召开的第三次军用标准化工作会议,讨论并修改了《武器装备研制的标准化工作规定》,要求强化型号研制过程的标准化工作,确立军用标准贯彻实施途径。1990年2月19日,《武器装备研制的标准化工作规定》正式颁发,对促进标准化与型号相结合发挥了重要作用。1994年10月召开的第四次军用标准化工作会议,总结前十多年的经验,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高新技术条件下军用标准化的任务,讨论“九五”规划和“军用标准体系表”,要求深入地开展武器装备的通用化、系列化、组合化(简称“三化”)工作。

这一阶段,军用标准化得到全面、深入、持续的发展,成绩显著。①建立并完善了规范军用标准化活动和军用标准形式的规章制度,为整个军用标准化工作实行规范化、法制化管理,向正确方向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②建立并逐步完善军用标准化工作系统,总参谋部、总后勤部各有关部(局)和各军兵种相继成立了军用标准化办公室,为军用标准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③制定了国家军用标准7000余项,基本形成了军用标准体系框架。④通过采用国外先进军用标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方法,促进了观念转变,逐渐克服了装备研制中注重性能指标而忽视经费、进度及效能的观念;促进装备研制管理从传统方法向系统工程管理方法的转变,提高了管理水平;促进了环境适应性、可靠性、维修性、测试性、保障性、安全性、电磁兼容性和

质量等专业工程技术在中国的发展。⑤通过军用标准化的研究和实施,促进了武器装备研制工作的进展和质量与技术水平的提高。⑥开展“三化”的研究和实践,从“八五”后期开始研制的13项雷达模块已经陆续定型,用于产品的开发,取得了显著的效果。1994年以后,陆续开展了一批重点“三化”研究的项目。⑦开展了计算机辅助标准化的研究工作,在全国领先建立了标准全文数据库和标准目录库。

发展趋势 军用标准化除加强基础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外,还将加强高新技术标准的研究和制定工作,加强“三化”,围绕提高军事装备的互操作性、赢得信息优势、迅速吸纳新技术以延长军事装备使用寿命等开展研究,以适应质量建军和国防现代化对军用标准化的需要。

(曾凡雄 李 谊)

军事计量研究 (research of military metrology)

探讨保证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各类测量量值的准确性和统一性的活动。研究内容包括:装备特殊需要的计量标准的建立、保存和使用;军用标准的发布;装备的战术技术指标的测量与测量方法的确定;军用测量设备的校准与校准方法的研究;测量结果及测量不确定度的分析与评定;装备量值传递与保障体系的建立、运行、监督与管理;全军计量人才的培养与再教育等。研究的目的是:确保装备参数测量结果的准确与统一;为装备的试验、验收、使用、保管、维修等各环节提供可靠的技术保障;确保武器系统的战术技术性能始终保持战备完好状态。

中国的军事计量研究大体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50~70年代) 20世纪50年

代初,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由于当时中国还没有建立统一的国防计量基准和有效的量值传递系统,致使制造火炮和制造炮弹的工厂的量值不统一,直接导致无后坐力炮在战场上发生膛炸和近炸等严重事故。1955年1月,在国防工业厂长会议上,采纳苏联专家的建议,决定在国防工业系统成立部级计量机构、大行政区区域计量站和工厂计量室,对国防工业各工厂统一实行三级量值传递。1956年,中共中央决定发展国防尖端技术。聂荣臻元帅要求把计量技术作为发展国防尖端技术的“开门七件事”之一予以重视。1957年11月,在当时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二分院以及导弹试验训练基地、核试验基地等分别建立了计量测试机构,由五院副院长钱学森主管计量工作。60年代初期,为了贯彻中央军委关于军工产品必须坚持“质量第一”的方针,增强保证军工产品质量的能力,国防工业委员会决定成立第二机械工业部计量检定所,并承担保证空军修理工厂与国防工业工厂的量值一致的计量检定任务。1962年,国防部第十研究院成立无线电计量协作室,承担全国无线电计量检定任务。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国防工业的计量工作受到严重的干扰和破坏。1975年后,在李先念、聂荣臻、张爱萍、钱学森的关心和支持下,国防科委、国防工办曾多次召开座谈会,调整完善计量机构,制定管理措施,使遭受挫折几乎停顿的国防工业计量得以复苏,初具规模。

第二阶段(80年代) 由于国家经济体制的改革和调整,1982年6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组建国防科工委,设立国防科工委标准计量局。从此,实现了国防科技工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计量工作的统一管理,迎来了国防计量的快速发展阶段。1983年11月,为了进一步加强国防计量工作,适应国防现代

化建设的需要,国防科工委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国防计量工作会议。会后,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了国防科工委制订的《1990年前国防计量工作发展规划纲要》。同时,国防计量“七五”规划作为国防科研技术基础项目首次被正式列入国家发展规划和计划。1990年4月发布了《国防计量监督管理条例》,标志着国防计量进入了技术管理、行政管理与法制管理相结合的新的历史阶段。

第三阶段(90年代) 在国防科工委的统一管理下,国防计量针对现代化军事装备系统庞大复杂,涉及的科学技术领域广而新,工作环境恶劣,需要计量测试的参数多、频段宽、量程广、准确度高、综合性强等特点,研制建立了一批测量范围能满足极大、极小、极高、极低或极强、极弱等特殊要求的国防最高计量标准。例如,根据毫米波、红外、激光、电磁等精确测量的需要,研制建立了毫米波、光频、电磁兼容性、动态测试等参数的计量标准;根据火炮、导弹、火箭发动机等研制、试验的需要,研制建立了高温、高压、热流、超大、超小尺寸测量的计量标准。再如,为满足频率短稳的测量要求,研制建立了短期稳定度频率标准;为解决发动机的计量测试要求,研制建立了压力传感器动态压力校准装置;为满足导弹、卫星地面高空模拟试验和工艺的需要,研制建立了低真空到超高真空的计量标准。其中,《超导型电压标准》、《纳米激光偏阵干涉仪》、《低频立式硬支承宇航动平衡机》等大批国防最高计量标准项目荣获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与此同时,根据国防科研和军事装备总体发展的需求,还积极开展超前基础性国防计量研究,探索解决了一批带有方向性、难度大、关键性的重大计量测试问题。

到90年代末期,国防计量工作已经从弱到强,从分散到集中,逐步成长壮大起来;已

建成长度、温度、力学、电学、无线电、时间频率、光学、化学、电离辐射、水声、火炸药、光电子、微电子等14个国家一级计量技术机构;经过统一调整和择优补缺,共重新确认命名了183个国防区域二级计量站,它们分布于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已有1000多个国防科研、生产、试验以及部队等各基层单位设立了相应的国防三级计量技术机构;拥有一支6万多人的国防计量专业队伍;总共拥有3000多项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国防或区域最高计量标准和测量校准系统;其中相当一部分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基本形成了整体协调、专业配套、门类齐全的国防计量量值传递系统,在国防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技术支撑和质量把关的作用。

1998年4月,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军事装备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组建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从此军事计量研究得到加强。军事计量的主要任务是:以先进的计量测试技术为手段,通过对武器系统和仪器仪表的定期检定和校准,建立完善的量值溯源和量值传递体系,为确保部队装备的完好率和良好的战备状态提供了计量技术保障。

研究展望 为了更好地与高新技术武器装备同步发展,军事计量正在通过计量法规建设与实施,规范全军的计量工作;通过建立各级、各类计量标准和校准系统,开展量值溯源和量值传递,确保装备量值的准确、统一;通过开展计量科研与攻关,建立和完善军事装备计量测试手段。不断拓宽研究领域,努力建设一个结构完整、布局合理、专业配套、手段齐全的军事装备计量保障体系。还将不断拓宽自己的研究领域,为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李 谊)

核武器研究

(research of nuclear weapon)

探讨利用原子核裂变或聚变反应瞬时释放巨大能量而产生爆炸作用,具有大规模杀伤和破坏效应的武器的活动。主要利用铀²³⁵或钚²³⁹等重原子核的链式裂变反应原理制成的核武器,叫做裂变武器,通常称原子弹。主要利用重氢(氘)、超重氢(氚)等轻原子核的热核聚变反应原理制成的核武器,亦称热核武器或聚变武器。

中国于50年代初创建核工业。1950年5月,成立了从事核科学研究的近代物理研究所,在吴有训、钱三强领导下,汇集一批科学家,到1957年,已有20余名学科带头人。1954年,通过铀矿普查,探明中国有丰富的铀矿资源,可为核工业提供基本原料。1957年10月,中国同苏联签订了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苏联同意在核技术方面给予中国援助。1958年开始核武器研制的准备工作并创建核武器的研制机构。1959年6月,苏联毁约停援,撤走专家。1960年初,中国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核武器,从全国各有关部门调集上百名高级、中级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人员参加核武器的研制工作,开始探索原子弹的科学规律。

原子弹的设计原理,是使处于临界状态的裂变装料瞬间达到超临界,并适时提供中子以触发链式反应。超临界状态可通过“枪法”(通过化学炸药产生的高压促使数块处于次临界状态的裂变装料迅速合拢达到超临界状态)和“内爆法”(即用化学炸药爆炸产生的高压,压缩次临界状态的裂变装料密度急剧升高达到超临界状态)来达到。以“596”作为代号的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设计,采用较先进的“内爆法”。1962年底,中国基本掌握了以高浓铀为主要核材料的“内爆法”原子弹的物理规律、设计方法以及相关

工艺等,完成了理论设计以及爆轰物理、核弹飞行弹道、引爆控制系统台架三大爆速试验。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按内爆原理设计的原子弹装置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试验在102米高的铁塔上进行,核装料为高浓铀²³⁵,核爆炸装置重1550千克,威力为2.2万吨梯恩梯当量,各项指标都达到了预定的水平。

1965年5月14日,中国成功地进行了第一颗核航弹空投爆炸试验,威力为3.5万吨梯恩梯当量。1966年10月27日,在中国境内成功地进行了一次中近程地地核导弹实弹飞行爆炸试验。导弹从甘肃酒泉西北导弹试验基地发射,核弹头在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弹着区上空569米处爆炸。试验的射程为894千米,爆炸威力1.2万吨梯恩梯当量,与理论设计值基本一致。这次试验的成功使中国自行研制的中近程导弹和核弹头通过了实际飞行考验,取得了核弹头研制定型的完整经验,标志着中国有了可用于实战的核导弹。

早在突破原子弹的同时,中国探索氢弹原理的理论研究工作即已全面展开,并进行了热核材料的工艺攻关和生产准备。1965年底,找到了实现自持热核反应的关键物理因素和方法,基本上掌握了氢弹设计原理。1966年12月28日,用塔爆方式成功地进行中国首次氢弹原理试验,威力约为12.2万吨梯恩梯当量,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之后世界上第四个掌握氢弹研究制造技术的国家。

随后,中国以较短的时间完成了空爆氢弹的设计、加工、装配及试验准备工作,并在1967年6月17日8时20分在罗布泊核试验场上空2960米处成功地进行氢弹空爆试验,威力为330万吨梯恩梯当量。这次试验用轰6飞机运载,空投带降落伞的核航空炸弹,试验的目的是验证氢弹的总威力和

裂变、聚变分威力及杀伤破坏效应。这次试验的成功为热核弹头的研制和装备部队奠定了基础。

核试验是研制发展核武器必不可少的手段，是一项规模大，需要多学科多部门协同配合和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科学试验。核试验在发展核武器中发挥了非常独特的重要作用。无论是在先进的电子计算机上的大量数值计算或是实验室中的模拟实验，总不能完全符合实际情况；另一方面，核武器中的高温高密度状态，在目前的实验室条件下还创造不出来。至于核爆炸效应更需要直接从核试验中测量。

中国早期核试验方式为大气层核试验。即爆炸高度在 30 千米以下的空中核试验和地面核试验。大气层核试验便于实施，也有利于对力学、光学、核辐射、电磁波、放射性沉降等各种毁伤效应的测量和研究，能观测研究核爆炸景象，并及时回收核爆炸产物样品及测量记录仪器。中国仅进行了 23 次大气层核试验，1981 年开始停止大气层核试验，1986 年正式宣布不再进行大气层核试验，核试验全部转入地下。

中国进行的地下核试验多为封闭式地下核试验。这种试验方式有利于近距离进行核爆炸过程的测试和诊断，便于屏蔽，而且放射性几乎全部封闭于地下，因而受气象条件影响较小，有利于核试验的安全和保密。同时，核试验场的规模比较小，便于组织实施，但工程量大，周期长，不便于进行百万吨梯恩梯当量级大威力的试验，毁伤效应试验也受到限制。至 1996 年底，中国共进行了 22 次地下核试验。

核武器的物理过程涉及炸药爆轰、冲击波传播、整形和聚焦，内爆压缩中子点火和核反应、中子输运、辐射输运、高温等离子体运动等过程，涉及核物理，中子物理，凝

聚态物理、计算物理、爆轰波与冲击波物理、辐射输运理论、等离子体物理和流体力学等学科，又涉及材料科学与工程、电子学工程、加工工艺与制造、实验工程、诊断技术与工程、总体设计工程、环境工程等工程技术。几十年来，中国核武器研究的发展，带动了这些学科和工程技术的发展，而这些学科的发展反过来推动了核武器技术研究的发展，有助于深化对核武器物理规律的认识。如电子计算机技术与核武器设计技术的相互促进。核武器的研制推动了大容量、高速电子计算机的研究和发展，而大容量、高速电子计算机对各种物理过程进行大量的计算和模拟仿真，又加速了核武器研究的发展。随着研究的日益深入，特别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签署之后，对物理过程模拟的逼真度要求越来越高，提出“全系统、全过程、三维”的模拟要求，这必将推动电子计算机在容量和运行速度方面的迅速发展。

经过 40 多年来的努力，中国现已建立起一支精干、有效的核自卫力量。早在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中国政府就发表声明：中国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之，是为了防御，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核讹诈，是为了防止核战争，消灭核武器。此后，中国政府又多次郑重宣布：无条件地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并无条件地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中国参加了核不扩散条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在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上签字。中国政府认为，防止核扩散和禁止核试验本身不是终极的目的，它只是走向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一个中间步骤，中国政府就如何防止核战争问题一再提出建议。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尽一切努力争取通过国际协商，促进全面禁止并最终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崇高目标的实现。中国主张所有核武器国家都承担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不首

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

(胡思得 俞启宜)

导弹技术研究

(research of missile technology)

探讨直接应用于导弹及其配套设施的研制、生产、使用和维修技术的活动。内容主要包括：对导弹武器系统、导弹阵地工程技术、导弹作战使用技术和保障技术等研究。国防科学技术研究的组成部分。其中，导弹武器系统的研制、生产是导弹技术的核心。导弹技术，特别是战略导弹技术的发展，是衡量国家国防实力的重要标志，其研究水平是国防科学技术整体研究水平的重要体现。

20 世纪 30 年代，德国率先从事火箭、导弹技术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导弹作为现代战争中的一种新式武器终于出现在战场上。战后至 50 年代初，导弹处于早期发展阶段。自 50 年代初起，导弹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一大批中远程液体推进剂弹道导弹及多种战术导弹，并相继装备部队。60 年代初～70 年代中期，导弹进入改进性能、提高质量的全面发展时期。70 年代中期以来，导弹进入全面更新阶段。迄今，各国曾提出和研制的各类导弹型号(包括改进型)约有 800 余种，除已被淘汰的外，正在服役的约有 300 多种，处于研制和生产阶段的约有 100 多种。世界上自行研制导弹的国家有 20 多个，约有 90 个国家和地区装备了导弹。

中国自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开始研制导弹。1955 年初，中共中央作出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的决策后，国务院、中央军委即开始研究发展导弹技术的有关问题。1956 年 5 月，中央军委作出发展导弹并成立导弹管理局和导弹研究院的决定。同年 10 月，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设计和试制的综合性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

在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等人的领导下，开始了导弹研制工作。1957 年 10 月 15 日，中苏双方签订新技术协定，确定由苏方提供导弹样品和有关技术资料，派遣技术专家帮助中国进行导弹仿制。1958 年 10 月，西北综合导弹试验基地正式成立；1960 年 9 月，试验基地已初具规模，可以进行地地、地空、空空导弹的试验。从此，中国逐步建立了自己的导弹技术发展体系。至 20 世纪末，中国的导弹技术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已研制并装备了近程、中程、远程至洲际弹道导弹及多种类型的战术导弹。

战略导弹研究 战略导弹是用于打击战略目标的导弹。可分为中程(射程 1 000～3 000 千米)、远程(射程 3 000～8 000 千米)和洲际(射程 8 000 千米以上)导弹。中国于 50 年代中期开始研制地地战略导弹，从仿制液体推进剂近程地地导弹起步，在液体推进剂近程地地导弹研制过程中，开始掌握一定的导弹技术，初步建立了科研、生产的协作网，为战略导弹的研制打下了基础。1960 年起，相继展开了液体推进剂中近程、中程、中远程、洲际地地导弹和固体推进剂地地导弹的研制，经历了从仿制走向自行设计、从初级向高级、由液体推进剂转向固体推进剂的发展过程，导弹技术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液体推进剂导弹研究 液体推进剂导弹是以液体火箭发动机为动力装置的导弹。中国导弹技术研究最初是从液体推进剂导弹技术研究开始的，主要研制了液体推进剂的中近程、中程、中远程和洲际地地导弹。

中近程地地导弹研究 1960 年春，导弹研制工作的重点由仿制转到自行研制液体推进剂中近程地地弹道导弹。同年 7 月开始方案设计，到 1962 年初完成了首次试射用的两枚导弹的生产和总装测试。1962 年 3 月 21 日，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中近程地地导弹

进行首次飞行试验,但未获成功。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于1964年6月29日再次进行发射试验,获得成功,揭开了中国导弹发展史上新的一页。此后,又进行了多次飞行试验,均获成功。后来经多次改进,导弹射程增大了20%,战术技术性能也有所改善。1966年10月27日,中国用改型的中近程地地导弹成功地进行了导弹核武器的试验,核弹头在预定距离和高度爆炸,中国自行研制的中近程地地核导弹顺利通过实际考验。导弹原子弹的结合,构成了有实战效能的中国战略导弹核武器。

中程地地导弹研究 1965年3月,中央专委批准研制液体推进剂中程地地导弹。此前,国防部五院已开展了导弹方案论证和关键技术的预先研究,解决了许多技术难题,在控制系统、遥测系统、地面设备、结构强度、环境工程等方面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为中程地地导弹研制打下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中程地地导弹是中国独立研制的液体推进剂导弹,集中应用了本国60年代前期进行预先研究取得的最新技术成果。1966年12月、1967年1月、1967年5月先后进行的三次飞行试验均获得圆满成功。1981年起,又进行了提高射程的改型工作。改型后的导弹于1985年12月、1986年1月进行了两次飞行试验,均获成功。自此,中程地地导弹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性能优良、可靠性较高的作战武器系统。

中远程地地导弹研究 根据中央专委的要求,1964年夏开始了中远程地地导弹的研制工作,重点是突破多级火箭技术。经过技术论证,中远程地地导弹采用两级火箭方案,第一级以中程地地导弹的火箭为基础稍加改进,第二级为新设计的火箭。经过五年多的努力,圆满解决了多级火箭发动机高空点火、喷管延伸段断裂、制导系统和姿态控制系统、

惯性器件、火箭级间连接和分离、弹头高速再入防热、氧化剂箱和燃料箱共底等技术问题。1969年11月,中远程地地导弹进行首次飞行试验,由于指令系统发生故障,致使第二级火箭点火失败,两级火箭未能分离,导弹在空中自毁。1970年1月,再次进行飞行试验,获得圆满成功。此后,从1976年5月起,又进行了多次考核性飞行试验,证明中远程地地导弹的战术技术性能达到了预定要求。中远程地地导弹的研制成功,为掌握多级火箭技术,研制洲际地地导弹奠定了基础。

洲际地地导弹研究 1965年3月,中央专委决定在研制中远程地地导弹的同时,开展洲际地地导弹的研制工作。同年8月,开始导弹的设计和方案论证。但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干扰,研制工作进展缓慢。至1970年春,科研人员经过艰苦的技术攻关,解决了一批关键技术问题,完成了第一枚洲际地地导弹的试制生产、地面试验和总装测试。1971年9月10日,第一枚洲际地地导弹在西北导弹试验基地发射场进行首次科研性飞行试验,获得成功。此后,又经过多次不同状态的高、低弹道飞行试验,获得了大量的试验数据,为导弹的全程飞行试验打下了基础。洲际地地导弹是中国继原子弹、氢弹、核导弹、人造地球卫星研制成功之后,在尖端科学技术领域里取得的又一重大成就。它表明中国液体推进剂导弹技术登上了一个新高峰。1980年5月18日,中国的洲际地地导弹由西北导弹试验基地发射场发射,飞向南太平洋,全程近1万千米,准确到达预定落区,回收舱在预定落区溅落。中国向太平洋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的成功,具有划时代意义,标志着中国已完全掌握了战略洲际弹道导弹技术,在制导技术、推进技术、结构材料、发射试验等方面都有新的突破,在导弹的制导精度和运载能力等方面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固体推进剂导弹研究 固体推进剂导弹是以固体火箭发动机为动力装置的导弹。其特点是导弹的发动机结构简单,体积小,工作可靠,使用简便,能长期储存,但比冲较低,工作时间短,推力调节和重复启动较困难。中国固体推进剂导弹研制的成功,是中国导弹技术发展的又一个飞跃。

固体地地战略导弹研究 研制固体推进剂导弹的关键是要突破固体推进剂技术,研制大型固体火箭发动机。早在1956年10月国防部五院成立之初,就已有预见地安排少数科技人员探索固体复合推进剂技术。至1965年底,在固体推进剂的配方、浇注及发动机的推力量控制和推力终止技术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重要成果。1966年12月1日,第一台大型试验固体火箭发动机首次试车成功。1967年3月,国防科委确定研制固体推进剂地地战略导弹。但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直至1978年8月,才组织进行了固体推进剂地地导弹的总体方案论证。1980年3月完成固体推进剂地地导弹武器系统的总体技术方案;6月,中央专委批准固体推进剂导弹的研制任务。1984年4~5月,进行了固体推进剂地地导弹和地面设备的全武器系统合练,相继进行了高温、高湿和淋雨试验、公路运输试验、仪器设备工作寿命试验、待机试验、低温环境下的发射试验和大风环境试验,武器系统的技术性能和作战使用性能完全符合设计要求。1985年5月,中国自己研制的两级固体推进剂地地导弹首次从发射台腾空而起,按预定弹道飞向蓝天,飞行试验获得圆满成功。1987年5月,又成功地用改进后的地面设备进行了发射试验。中国第一代固体推进剂地地战略导弹武器系统的研制成功,揭开了固体导弹发展史上新的一页。

固体推进剂潜地战略导弹研究 1967

年3月,国防科委正式下达研制任务,其研制跨越远程单级的阶段,直接研制两级中程固体推进剂导弹。研制过程中,先后解决了导弹水下机动发射技术的试验途径、发射方式、试验程序、弹体、两级动力装置和制导系统等问题,建成导弹技术阵地、发射阵地、试验指挥所、远洋测量船队,以及各种运输、水文、气象保障等设施。1972年10月首次在真实海情下进行模型弹潜艇水下弹射试验,1982年1月和4月,在华北导弹试验基地成功进行两次陆筒发射遥测弹的飞行试验。同年10月,在常规动力潜艇上进行的导弹发射试验获得成功。1988年9月,导弹核潜艇两次水下发射均获成功。至此,第一代导弹核潜艇试验走完全程,其研制成功,标志着中国已完全掌握了导弹核潜艇水下发射技术,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导弹核潜艇的国家。

战术导弹研究 战术导弹是用于毁伤战役战术目标的导弹。属近程导弹,有时也称战役战术导弹。战术导弹射程远近不一,近则数千米,远则数十千米、数百千米。1958年起,中国在仿制导弹的同时,抓紧科研、生产和试验基地建设,逐步为自行研制战术导弹创造了良好的物质和技术条件。经过数十年的探索,先后发展了地地、地(舰)空、空空、反舰、反坦克五大类30多种型号的战术导弹。

地地导弹研究 1956年10月8日,国防部五院成立后,即着手组建研究机构,开展研究工作。首先,组建了导弹总体、空气动力、发动机、弹体结构、推进剂、控制系统等十个研究室。1957年11月,该院又成立了第一、第二分院。1958年3月,又在北京地区建设导弹总体与发动机研制、控制导引系统研制、火箭发动机试验、空气动力研究等四项工程。同时,重点开展了代号为“1059”的苏制尔—2型近程地地弹道导弹的

仿制工作。1960年11月5日,第一枚近程地地弹道导弹发射成功;同年12月,又成功地进行了两次发射试验,标志着中国在掌握导弹技术方面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导弹。

地(舰)空导弹研究 5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研制地空导弹,40多年来,由仿制到自行设计,由改进第一代武器到研制第二代武器,现已形成中高空、中低空、低空、超低空导弹系列。

中高空地空导弹研究 最初是仿制苏制斯-75型中高空导弹,通过改型,逐步过渡到自行设计。1960年导弹仿制工作全面展开。1963年4月完成模型弹的仿制,6月进行飞行试验。1964年5月进行制导站校飞试验;6月进行战斗弹试验;9月26日再次进行发射试验,获得成功;12月10日初步定型,命名为红旗1号导弹。通过这个型号的仿制,中国地空导弹的研制、生产、试验达到初步配套,为自行研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后,于1966年底红旗2号导弹成功地通过定型试验;1974年6月,红旗3号导弹研制成功;1984年6月,红旗2号甲型导弹获准定型;1986年,红旗2号乙型导弹成功地进行了实弹射击试验和鉴定飞行试验。红旗系列中高空地空导弹的研制成功,标志着中国已掌握了自行设计、制造、试验第一代地空导弹武器系统的能力。

中低空地(舰)空导弹研究 中国研制的这种导弹武器系统主要有舰空和地空两种类型。1965年8月,中央专委提出研制中低空地空导弹的要求;9月,制定了红旗41号中低空地空导弹武器系统的初步方案,后改为红旗61号舰空导弹。1970年5月研制工作全面展开,先后攻克了导弹高空大滚动、液压放大器零漂、弹性振动等关键技术及引信问题。1984、1986年分别成功地进行了导弹战

斗遥测弹射击试验和导弹装舰发射飞行试验。1988年11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红旗61号导弹设计定型。该型导弹采用的半主动寻的制导、固体火箭发动机、半主动引信和制导引信、小型化自动驾驶仪、链式战斗部、单脉冲跟踪与连续波制导雷达、导弹自动化检测等技术,填补了中国在舰空导弹方面的空白,为发展中国第二代中低空地(舰)空导弹奠定了基础。

1976年,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研制中低空地空导弹,并命名为红旗61号甲导弹。该型导弹充分利用红旗61号舰空导弹的成果,采取“海搬陆”的做法,沿用或重新研制舰空导弹的设备,主要是研制跟踪照射雷达车、射击指挥仪、发射控制车,特别是制导站等地面设备。从1979年8月审定红旗61甲导弹武器系统的设计方案起,到1988年11月该型导弹设计定型期间,经过研制单位的共同努力,相继研制成功制导雷达车、发射车、指挥仪和发射控制车等关键设备。1986年4~6月,红旗61号甲导弹武器系统在地空导弹试验基地进行设计定型试验,获得圆满成功。1988年11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该型导弹设计定型。

低空、超低空地空导弹研究 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相继开展了低空、超低空地空导弹的研制。第一代为红卫2号,于60年代末提出设计方案,1975年设计定型,更名为红卫5号。该导弹以霹雳2号空空导弹改型为基础研制而成,在弹形上增大了舵面,提高了输出力矩,减小了舱偏角,提高了起控时的速度;采用自行式发射车,具有搜索、跟踪目标和操纵控制功能。第二代为红旗7号导弹,1979年3月提出研制要求,1980年开始方案设计,1988年4~6月完成定型试验。该导弹在快速反应、抗干扰等性能上均优于红卫5号,能对付多目标。其研制成功标志

着中国地空导弹武器系统的研究、设计、试制、试验能力达到了新水平,缩短了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此外,1975年~1986年,中国还完成了便携式单兵肩射导弹红缨5号的研制,在研制过程中,先后解决了发动机燃烧室筒体整体旋压成型、发动机低温断续燃烧,延时点火时间散布大,导引头振动噪声严重,外弹道和脱靶量测量处理,初始飞行阶段早炸等大量技术难题,实现了导引头电子舱集成化。该导弹体积小、重量轻,具有较好的战术技术性能。

空空导弹研究 50年代末,中国开始研制空空导弹,通过仿制、改进、改型,逐步转向自行研制,先后发展了雷达制导、红外制导等不同类型的空空导弹。1958年初,就着手进行试验基地和科研机构的建设,首先建设西北综合导弹试验基地的空空导弹试验靶场,同时在较短时间内建成了中国第一条空空导弹试制生产线。1961年7月,国防部六院组建了605所,负责空空导弹仿制工作。60年代中后期,在三线地区相继建立了参与空空导弹试制任务的工厂。1970年,在605所的基础上,组建了承担空空导弹研制任务的612所。随着这些厂、所的建立,到80年代中期,中国已建成了一支专业配套齐全,包括高、中、初级多层次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组成的技术队伍,基本上适应了空空导弹研究发展的需要。

雷达波束制导导弹研究 1958年,中国从苏联引进雷达波束制导的克-5M型空空导弹,同年10月开始仿制,命名为霹雳1号。1960年3月,仿制出第一发导弹;7月进行飞行试验;8月进行对靶机的射击试验,未能命中靶机。经一年多的质量检查,于1962年10月恢复了仿制生产。但由于苏联单方面停止供应材料和设备,仿制工作陷于极大困难之中。科研人员自力更生,群策群力,解决了仿

制中遇到的二舱壳体加工变形、三舱大螺纹变形、四舱薄壁零件加工等重大技术问题。1963年11~12月,再次进行各种状态的发射试验,获得成功。试验结果表明,导弹精度、可靠性、杀伤效果等主要战术技术指标符合设计要求。1964年4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霹雳1号空空导弹定型投产。

红外寻的制导导弹研究 此种导弹的研制,始于1962年,从仿制苏联克-13导弹(霹雳2号)开始,主要型号有第一代的霹雳2号、2号乙、3号,第二代的霹雳5号乙,以及霹雳7号等霹雳系列导弹。霹雳2号空空导弹飞行速度为 $2.2Ma$,主要用于攻击中型轰炸机和歼击轰炸机,1962年开始仿制,1964年仿制工作全面展开,先后解决了原材料与元器件国产化、壳体加工、引信早炸、导引头陀螺转速不匀、磁放大器零位不稳、药柱包复层质量等问题,于1967年11月定型投入批量生产。1978~1981年,在其基础上研制出霹雳2号乙,解决了霹雳2号抗干扰能力差、光学引信早炸、作用距离短等问题。在仿制霹雳2号基础上,中国还开始了此种导弹的自行研制工作,1965~1980年,研制成功霹雳3号导弹,该导弹在研制过程中,在解决引信早炸、双层壳体预制破片战斗部、浸没工艺等方面均取得突破性进展。该型导弹突出了高空、高速性能并兼顾中低空性能,增大了作用距离,提高了导引准确度和威力。霹雳5号乙导弹是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二代空空导弹,1966年研制出原理样机。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拖延了研制速度,直到1986年9月才获准设计定型。该导弹采用了不少新技术,其性能得到显著提高。霹雳7号导弹是能够自动搜索、捕获并跟踪目标、具有较高机动性和近距离格斗能力的新型导弹,1977~1982年展开预先研究,1982年开始正式研制。在研制过程中,解决了舵面自

振频率超差、引信性能不稳定、速率陀螺零位偏移大等导弹性能和工艺方面的问题,于1987年通过技术鉴定,转入小批量生产。该型导弹研制速度快,花钱少,周期短,说明中国自行研制导弹的能力和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

反舰导弹研究 50年代末期,中国开始反舰导弹武器系统的研制工作,首先是抓紧科研机构和试验基地建设。到80年代,已建成具有相当规模的设计、试制与小批量生产相结合的反舰导弹研究院,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分布在江西、沈阳、四川、湖北等地区的反舰导弹研制、生产体系。1958年3月,开始建设综合导弹靶场海上分场(10月改称海军试验基地),主要承担反舰导弹等海军武器装备的试验任务。1963年底,基本建成了岸舰导弹武器系统海上飞行试验的配套工程。经陆续扩建,到80年代末,基地装备了先进的测试设备,已能满足反舰导弹科研试验和定型试验任务的要求。

中国发展反舰导弹,经历了仿制舰舰导弹,改型设计和自行设计岸舰及空舰导弹,研制第二代反舰导弹等几个阶段。在技术上,取得了先后研制成从亚音速到超音速,从液体发动机到固体发动机和冲压发动机,从单项制导到复合制导等十几个型号反舰导弹的巨大成就。80年代研制的第二代反舰导弹,在主要的战术技术性能上已接近或达到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

舰舰导弹研究 1960年初,中国仿制的舰舰导弹为1959年从苏联引进的泼—15型舰舰导弹,命名为上游1号舰舰导弹。试制过程中,解决了弹头罩成型工艺、弹翼壁板铝合金挤压铸造工艺、舵面和副翼的化学铣切工艺,以及变压环形冷气瓶、氧化剂箱、燃烧剂箱等氩弧焊接工艺等关键技术,为导弹仿制扫清了障碍。1963年10月,泼—15型导弹投

入试制。1964~1967年,成功进行了首次模型弹陆上发射试验,海上有线遥控系泊发射和航行发射试验,岸上向海上发射遥测弹试验,遥测弹海上飞行试验、定型试验等,1967年8月,获准设计定型。该导弹为正常气动布局,液体火箭发动机,固体助推器,自主控制加自动导引控制。1974年5月,开始对其进行改型研制,命名为上游1号甲导弹。1975年进行的低空模拟试验中,导弹在掠海飞行时能正常跟踪和捕捉目标。1982年第四次定型试验获得成功。1984年3月设计定型。该导弹基本解决了导弹掠海飞行中雷达系统和驾驶仪匹配问题,提高了导弹高度控制、抗电子和海浪干扰性能,并使导弹超低空飞行性能达到较先进的水平。

海鹰1号导弹是为执行远洋护航任务的导弹驱逐舰配备的武器系统。1968年2月,通过设计方案论证。1972~1973年,两次进行导弹精度试验,均获成功。1973年9月,成功地进行了首次导弹飞行试验。1976年1月,获准设计定型。1983年起,开始对其进行改型工作,以提高导弹的战术技术性能。1987年2月,改型后的导弹通过技术鉴定,被命名为海鹰1号甲舰舰导弹。

岸舰导弹研究 1963年底,确定以上游1号舰舰导弹为原型,改型设计为岸舰导弹(海鹰1号)。1964年4月,通过总体设计方案。1966年12月,首发海鹰1号岸舰导弹进行飞行试验。在尔后进行的三次飞行试验中,均存在末段雷达未能捕捉到目标的问题。通过技术攻关,采取了弹上雷达减震、增厚弹体蒙皮提高刚度等措施,解决了这一问题。1970年10月,设计定型飞行试验取得成功。1974年8月,获准设计定型。1965年6月,为研制远射程岸舰导弹,对海鹰1号进行增大射程改型。同年8月,中央专委批准该项目列入国家计划,命名为海鹰2号岸舰导弹。

海鹰 2 号导弹的技术关键是既要加大导弹的射程,又要保证导弹的命中概率不变。为确保实现这一目标,在研制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技术措施。1966 年,延时工作发动机和第一发静力试验弹试制成功。1967 年 9 月,圆满完成了研制性飞行试验。1969 年 8 月,进行海鹰 2 号岸舰导弹设计定型飞行试验。1970 年 3 月,完成齐射定型试验。此后,又对海鹰 2 号导弹进行改型,研制成功海鹰 2 号甲岸舰导弹(红外弹)和海鹰 2 号乙岸舰导弹(降高弹),分别于 1982 年和 1984 年获准设计定型。

空舰导弹研究 60 年代中期,空军和海军都提出为轰 5、轰 6 型飞机装备导弹。1966 年,空舰导弹研究室在七机部三院组建成立,开始论证和制定空舰导弹总体方案,确定以海鹰 2 号为原型,研制空舰导弹。但由于“文化大革命”开始,研制工作受到严重影响,被迫暂停。1975 年,重新开始对空舰导弹武器系统总体方案做进一步论证。1977 年 4 月,有关部门联合审定了空舰导弹武器系统总体方案,决定以轰 6 甲型飞机改装为空舰导弹的载机,命名为轰 6 丁型飞机和鹰击 6 号导弹。1978 年,进行了鹰击 6 号导弹飞行试验和摸底性投放试验。1981 年,进行火控系统精度试验、瞄准精度试验。自 1981 年底起,开始进行鹰击 6 号导弹研制性海上飞行试验。1982 年 6 月 19 日,首发导弹由轰 6 丁型飞机在低空发射,导弹飞行正常,直接命中靶标。1984 年,进行鹰击 6 号导弹设计定型试验,发射四发导弹均命中目标,顺利完成了全武器系统的设计定型试验。1986 年,鹰击 6 号导弹通过国家设计定型鉴定。

多用途反舰导弹研究 中国从 60 年代末、70 年代初开始研制多用途反舰导弹。1970 年,海军航空兵首先提出研制超音速小型导弹。1973 年,七机部三院上报小型反舰

导弹(鹰击 8 号)总体方案。1977 年 9 月起研制工作全面展开。1978 年试制出第一发鹰击 8 号导弹,1984 年 10~11 月,进行鹰击 8 号导弹海上设计定型飞行试验,结果不理想,试验暂时中止。1985 年 4~5 月,改进后的鹰击 8 号导弹进行考核试验,获得成功。同年 9 月,再次进行鹰击 8 号导弹设计定型试验,导弹的大、中、小射程,双发齐射和战斗弹的杀伤威力,艇上设备和整个武器系统的战斗性能等均符合设计要求。1987 年,鹰击 8 号导弹通过设计定型,1988 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鹰击 8 号小型多用途导弹的研制成功,使中国逐步形成了第二代反舰导弹系列。70 年代初,还开始研制上游 2 号液体火箭发动机舰舰导弹。1975 年 10 月,确定上游 2 号液体火箭发动机舰舰导弹向小型化、超低空、固体火箭发动机方向发展。1984 年 8 月,上游 2 号固体推进剂导弹被列入国防科技“七五”计划,开始制定总体设计方案。1989 年 12 月,上游 2 号固体推进剂导弹以七发五中的成绩通过了定型试验。

1971 年 9 月,海军批准研制低空超音速反舰导弹的总体方案。导弹具有低空、超音速、体积小、重量轻、成本低、装载对象广、突防能力强、战斗威力大等特点。中国反舰导弹从亚音速跨向超音速是一个大的飞跃。1978 年,进行自控弹飞行试验,存在弹道偏离、俯仰角偏大等问题。1985 年,自控弹飞行试验取得成功,标志着中国已掌握了低空超音速反舰导弹的研制技术。

反坦克导弹研究 中国从 50 年代末期开始探索反坦克导弹技术,经过数十年努力,取得了显著成就,先后研制成功了两代、三种基本型、九个型号的反坦克导弹。50 年代末,北京工业学院师生首先开始探索反坦克导弹技术,他们从零开始进行探索和钻研,先后两次制造了模拟样机,命名为 265-1 型反坦克

导弹,经过飞行试验,获得了初步成果。1962年,炮兵科学技术研究院开始研制反坦克导弹,提出了初步设计方案。研制过程中,相继攻克了总体参数选择、起飞段弹道参数、陀螺开启角、导弹重心位置和推力臂、稳定储量等技术问题。1965年,通过设计定型,定名为J—201型反坦克导弹。1969年完成试制。经过国家靶场试验后,于1973年研制成功J—201型反坦克导弹,为进一步发展反坦克导弹技术奠定了基础。

70年代初,开始研制红箭73型反坦克导弹。在研制过程中,攻克了推进剂低温点火延迟、续航发动机喷管易烧蚀、发动机隔热涂层性能差、初始弹道不稳定、传输导线易折断、引信瞎火率高等一系列技术难题。1978年,该型导弹通过设计定型。此后,在红箭73型导弹的基础上,又相继研制出红箭73A型、B型、C型和I型四种改进型导弹。通过一系列改进改造,红箭系列反坦克导弹的战术技术性能已接近国际上第二代反坦克导弹的水平。

70年代初,为适应中国第二代主战坦克需配备新型反坦克导弹的要求,中国开始自行设计红外制导反坦克导弹。1977年,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把研制工作列为重点国防科研项目,定名为红箭8型反坦克导弹。在研制过程中,重点突破了导线放线、红外信号传输、初始扰动、回输信号、环境适应性等技术关键,进行了50余次有控飞行试验,通过了部件、分系统和全武器系统技术鉴定,于1987年批准定型。导弹达到预定的战术技术指标,一些性能还优于国际同类导弹,使中国的反坦克导弹技术向世界先进水平跨进了一大步。

发展趋势 为适应未来高技术战争的需要,导弹正朝着精确制导化、机动化、隐形化、智能化和微电子化的方向发展。导弹技术研

究的重点将是:提高导弹的生存能力、快速反应能力和突防能力,以增强其作战的灵活性和杀伤效果;实现导弹武器系统的系列化、模块化、标准化和侦察、指挥、通信、发射控制、数据处理一体化;发展先进的复合材料和高性能推进剂;发展新型复合制导技术和末制导技术、多弹头技术、实时侦测与识别技术、网络化与数字化信息处理技术、全弹道突防技术;开发应用高效能、多样化战斗部。新的世纪里,中国的导弹技术将会有新的发展,为国防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海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空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军事工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兵器工业》,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船舶工业》,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

(陈效良 金钰)

海军技术研究

(research of naval technology)

探讨直接应用于海军建设和海上作战的军事技术的活动。国防科学技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军技术的研究以舰艇、海军飞机、舰载武器、机载武器及各种技术装备为主体,包括海军武器装备发展、海军武器装备研制监造技术、海军武器装备使用技术、海军武器装备管理维修技术、海洋环境研究技术、海防工程技术、海军作战保障技术、海军后勤保障技术、海军系统工程技术等的研究。其中,

海军武器装备研究,集中体现海军技术发展的水平。

海军技术历史悠久,至今已经历了18世纪以前的以桨帆木质战船为标志的古代海军技术时代、19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以机器动力钢铁战船为标志的近代海军技术时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现代海军技术时代。19世纪40年代国外海军技术开始传入中国,60年代中国开始在引进国外机器造船技术的基础上仿制舰船,开始由木质桨帆时代的海军技术向机器动力为标志的近代海军技术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就开始由机器动力钢铁战船时代转向现代舰艇时代,并在现代化道路上飞速前进。

19世纪60~90年代,中国海军技术完成了向近代海军技术的转变,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在造船方面,福建船政局于20世纪初完工的“建安”号、“建威”号快船,长宽比为9.7,主机功率为4777千瓦,排水量850吨;江南制造局所造舰船排水量最高的有2800吨。在舰载武器装备制造方面,掌握了一些舰载火炮和海岸炮等的制造和使用技术。总体上说,中国海军技术水平尚处于仿造阶段,船舶吨位、动力、火力等与西方国家的水平相差约20年。

20世纪前期中国的海军技术研究 进入20世纪以后,清政府以向欧美国家购买舰船为主,海军技术研究主要是在直接引进外国海军技术的基础上进行的,自行研究十分有限。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由于政局动荡,军阀混战连年不断,海军技术研究几乎没有发展。国民党政府时期,财力略为宽裕,海军技术研究有所发展,主要表现在:①造舰技术有所提高。1930年下水的“逸仙”号炮舰,长82.3米,宽10.3米,排水量1550吨,主机功率2940千瓦,航速18节;1937年江南造船所建

成的“平海”号巡洋舰,长109.8米,宽11.9米,排水量2600吨,主机功率5459千瓦,航速30节,装有140毫米双联舰炮三座,96毫米舰炮六门,533毫米双联装鱼雷发射管两座,1937年曾经作为旗舰指挥江阴防守作战,阻止日军进犯长江。在抗日战争中,中国的造舰能力几乎损失殆尽,抗日战争以后仍未恢复。②海军飞机制造技术从无到有。1918年,北洋政府海军在福建马尾设立海军飞机工程处,并设立飞潜学校,海军技术发展的领域得到扩张。飞机工程处建有一个装配车间,制造海军用飞机,每年可以制造2~3架。到1937年8月,已经生产了210架军用飞机。飞潜学校设有飞机研究制造专业,是海军也是国内第一个培养飞机制造技术人才的学校。③舰用通信设备,普遍应用了无线电技术,为新造舰艇和原有各舰艇装配了真空管无线电短波收发报机,基本淘汰了此前装配的部分火花式收发报机。但海军的收发报机和配套使用的发电机,基本依靠进口,海军自己只能对无线电装备进行维修。④1935年设立枪炮研究所,聘请英国军官讲授火炮使用技术和鱼雷技术。

这一时期海军技术研究的发展有很大局限:一些重要制造机器的制造生产技术没有引进,舰船制造技术受到限制;动力装置、舰炮、鱼雷等重要舰船装备基本依赖进口;独立地研究、设计能力有限,多为仿制,或在仿制基础上略加改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海军技术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海军技术研究摆脱了全靠引进技术和材料仿制国外舰船的局面,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其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人民海军创建时期的海军技术研究(1949~1955) 这一阶段,中国大力整顿、调整和发展原有船舶工业,恢复和扩大培养海

军技术人才的机构,聚集技术研究力量,使海军技术的发展迅速达到和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水平。

发展概况 为迅速发展海军和海军技术,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①建立海军及海军技术领导机关。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华东军区海军;1950年4月14日,成立海军领导机关。当时的海军技术基础非常薄弱,舰船性能落后,舰船制造工厂遭到严重破坏。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军事委员会非常重视海军技术的发展,为加快海军武器装备的技术研究,1950年在上海专门成立华东区船舶建造委员会,海军开始筹建造船部(1952年海军的造船部改编为舰船修造部),国家成立了船舶工业局,领导海军造船事宜。②制定海军发展建设方针。1950年8月的海军建军会议,确定了海军近期建设的方针,即由长期建设着眼,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富有攻防能力的、近海的、轻型的海上战斗力量,初期的海军将以空(海军航空兵)、潜(潜艇部队)、快(鱼雷快艇部队)为主。③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与装备。从1950年起,在修复、改造旧舰艇的同时,从苏联购买一批海军技术装备,组建了驱逐舰、潜艇、猎潜艇、鱼雷艇等舰艇部队和海军航空兵部队,加强了岸防兵部队,拓宽了中国海军技术的研究领域,从整体上将中国海军技术的水平提高了一大步。1953年6月,中国、苏联两国政府签订《关于海军交货和关于在建造军舰方面给予中国以技术援助的协定》(即“六四协定”),中方向苏方订购和引进六种型号舰艇的材料和制造技术,以及飞机、海岸炮等装备和技术。1954年又签定《建造苏联转让军舰协议书》。④创办海军学校。从1949~1954年,先后创办安东海军学校(不久即撤销)、华东和大连海军学校,海军航空、快艇、潜艇、指

挥、军械等学校,以及六所预备学校。1952年和1953年,还分别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南京)、军事工程学院设立海军系、海军工程系,培养海军中、高级指挥人才和各种技术人才。

主要成果 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随着海军技术研究的发展,人民海军迅速建立并得到一定发展。到1955年,已组建了包括水面舰艇、潜艇、航空兵、岸防兵、陆战队五个兵种的海军部队。其中,水面舰艇部队拥有14艘护卫舰、42艘鱼雷艇、四艘猎潜艇、四艘驱逐舰;潜艇部队拥有四艘潜艇;海军航空兵部队拥有水鱼雷机、轰炸机、强击机、歼击机、侦察机、反潜机、运输机、数种专业飞机和防空部队,其中的混编航空兵师有水鱼雷轰炸机团、歼击机团各一个,配备水鱼雷轰炸机四架,教练机四架,驱逐机19架。

这一阶段,还利用当时极为薄弱的造船工业基础,开始自行设计建造机帆船和小型巡逻艇,1952年起批量生产,为中国第一代自行设计制造的50吨级巡逻艇,航速11.5节。到1955年底,自行设计建造巡逻艇、登陆艇、运水船、自动驳船等共236艘,但艇上的主机、火炮均从苏联进口。

人民海军成长时期的海军技术研究(1956~1977)这一时期初步奠定了比较现代的船舶工业的基础,缩短了同世界先进国家海军技术的差距。

发展概况 50年代,为迅速提高海军技术,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和海军采取了许多措施:①制定规划,建立健全科研机构。1956年第一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将船舶工业的重点放在军用舰船的建造上,主要是苏联转让的六种舰艇的制造。1956年制定的《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中,将海军潜艇与快艇(两艇)、鱼雷与水雷(两雷)和海军雷达、声

纳、通信设备等列入规划。50年代,成立船舶产品设计分处(后发展为第一机械工业部船舶产品设计院)、船科学研究所(后为船舶科学研究所)、勘测研究院,相继组建海军第一(造船)、第二(水中兵器)、第三(水声和电子设备)、第四(海洋和航海)研究所,以及海军枪炮研究室、防化研究室和通信研究室。1958年成立了海军科学技术研究部,统一管理各研究所的科研工作。②建立健全培训体制,培训人才。到1965年,海军学校发展到14所,与技术有关的有海军学院,指挥学校,潜艇学校,工程学院,高级专科学校,通信学校,技术学校,第一、第二、第四航空学校,卫生学校,潜艇士兵学校,预备学校等。海军培训体制走向正规化,速成、专科和轮训的比例大为减少。同时,在上海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12所高等院校设置了51个专业,包括船舶、船机、电工、水声、水中兵器、导航、核动力、海洋等几大类专业,形成东北、华东、华中、华南地区有关造船的教育、科研与原有生产基地配套的体系。同时,国家和海军派出近百名技术人员和工人赴苏联学习和培训,在国内培训了5000多名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形成一支学科分布比较多、掌握技术比较先进的科研和技术队伍。③建立工程、技术、卫勤保障体系。国家和海军兴建了一批船舶驻泊基地、后方仓库工程等。④建立实验设施。1954年,在上海建立了小型悬臂式拖曳船模实验水池,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船模试验所。1958年,在无锡兴建大型船模拖曳试验水池,在上海建成空泡水筒和小型低速循环风洞。上海交通大学、第一海军学校(今海军工程大学)也先后建成了船模试验水池。

经过一系列的艰苦努力和全国协作,1955年到60年代初期,陆续建造出较新型的木质鱼雷快艇、大型猎潜艇、基地扫雷舰、

护卫舰、中型鱼雷潜艇等484艘,更新了部队的装备,结束了中国军用船舶“万国博览会”的局面,并为此后的自行设计、制造打下了基础,缩短了中国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

50年代末,国家作出了国防建设向尖端技术发展的重大决策,海军装备建设的方针相应作出调整,确定海军装备以导弹为主,以潜艇为重点,同时发展中小型水面舰艇的建设方针。1959年2月4日,中苏两国政府签订新的技术援助协定(“二四协定”),苏联向中国提供五种型号的舰艇、两种导弹的建造特许权相关设备和材料,并派专家来华指导。但没有多久,苏联政府即撕毁协定,中断了对华援助,中国海军技术遂进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的新阶段。60年代中期,“二四协定”转让的五种型号舰艇仿制任务基本完成,海军技术发展的重点转向研制第一代新技术舰艇,发展的重点是核动力潜艇、远洋测量船队和中型导弹驱逐舰的研制。

为实现海军技术发展的目标,首先调整和加强了领导机构。1960年,成立造船工业及科研专业小组,着重研究和协调引进苏联导弹舰艇的仿制工作。1963年成立第六机械工业部,主管海军装备建设和航运事业的发展。核动力潜艇和远洋船队的研制工作则由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直接领导。其次是建立和完善了相关科研机构。1961年6月,成立了国防部舰艇研究院(第七研究院,后由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领导),到1975年,该院拥有20多个研究所,负责各种舰船、舰上武器装备和设备、水中武器、警戒雷达等的研究和设计工作。同时,还新建、充实、完善了一批科研试验设施,以及大型海上、湖上试验场与试制工厂,基本上形成了专业配套、门类比较齐全、能胜任海军技术发展任务的科研体系。再次是国家安排120多家工厂对900多项材料和设备进行研制,解决有关的材料和配套设

备的问题,形成了以导弹快艇和鱼雷快艇为重点的舰艇材料和配套设备的科研、生产协作网,新建了一批船用配套设备和装备的工厂,自己研制了一批舰船的核心装备。

主要成果 这一阶段,中国海军技术研究取得的成绩是:①自行研制生产了第一代舰艇。这一时期,研制成功的海军技术装备有战斗舰艇十个型号,军辅船30余型,包括动力设备十型、观通导航设备38型、水中兵器八型、指挥仪十型、船用辅机和特种装置100多型、船舶新型材料27种。其中主要有:“长征”1号核动力鱼雷攻击潜艇,包括主测量船、远洋调查船、打捞救生船、深潜工作船、油水补给船、后勤供应船、援救拖船(排水量均在万吨以上)等在内的远洋测量船队,053型导弹护卫舰,035型鱼雷潜艇、四管鱼雷快艇、小型导弹快艇、低磁钢扫雷艇、艇具合一型扫雷艇、中型登陆舰等,推进了海军舰艇的综合配套和更新提高。其中62型护卫舰(第三代巡逻艇),排水量100多吨,航速30节;猎潜艇,最高航速达到30节,该型猎潜艇曾在九级以上风浪中顶风压浪行驶十多小时,具有良好的适航性,表明中国在小型水面舰艇制造上已经具有较先进的水平;火炮护卫舰,1000多吨,使用自行设计的柴油机,能够经受12级台风的考验;051型导弹驱逐舰,3000多吨,为中国建立中型导弹驱逐舰部队打下了基础;常规动力潜艇,从引进材料仿制到全部采用国产材料;“长征”1号核潜艇,某些技术性能略优于国外同类潜艇,标志着人民海军进入拥有核潜艇的新阶段。②进行了舰舰导弹的仿制工作,完成了试验。1964~1966年,陆续成功进行了舰舰导弹的陆上模型弹试验、海上模型弹试验、陆上全弹试验、海上全弹试验、定型试验后,开始进行批量生产,从此结束了中国不能生产海防导弹武器的历史,揭开了海军装备发展史上新的

一页。③提高了现有装备性能。先是在旧驱逐舰上进行改装导弹武器系统试验,60年代末起,陆续改装了四艘旧驱逐舰;70年代,改装了四艘转让制造的护卫舰,经海上试验,均获成功。舰对舰导弹系统在驱逐舰、护卫舰上改装成功,不但提高了老装备的战斗性能,也为自行设计导弹舰艇积累了宝贵的经验。④工程、技术保障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建成了一大批大型海军洞库基地、洞库机场及其他海军工程;在舰艇编队、独立的舰艇大队组建了舰船、军械等装备的修理所,到了70年代后期,已经有各种修理所250多个,7000多人,拥有船坞23座,船排45个,各种设备1400多台,年修船量达6万余吨,并建造了浮动船坞六艘,海上修理工程船30艘,装备陆上流动修理工程车86辆。在科技人员方面,形成了一支学科分布比较多、掌握技术比较先进的科研和技术队伍。

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时期的海军技术研究(1978~2000) 这一时期,海军技术得到较快发展,在一些领域达到和接近了世界先进水平。

发展概况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和海军对海军科研和装备部门进行全面整顿,解决第一代舰艇的遗留问题。1978年,成立五型舰艇工程领导小组,负责领导解决攻击核潜艇、导弹驱逐舰、常规潜艇、导弹艇、猎潜艇等五型舰艇遗留问题。1978年起,恢复驻厂军事代表制度;建立健全有关规章制度、标准、规范;对需要解决的469个问题组织协作攻关;强化定型工作、武器装备试验、可靠性研究和分析工作,并使其标准化、规范化;实行经济合同制,提高舰船建造工程的速度、质量和经济效益;开展大规模的科研和技术革新活动,取得了数以万计的成果,其中有的成果填补了国内空白,有的接近国际水平。

在解决五型舰艇遗留问题的同时,1983年5月1日,海军装备论证研究中心在北京成立。80年代以来,又陆续开展了对第二代导弹潜艇、导弹驱逐舰和导弹护卫舰等战斗舰艇及其武器装备的研制。第一艘弹道导弹核潜艇1981年下水,1988年成功进行了水下发射运载火箭试验,这既是从常规潜艇到导弹核潜艇的重大突破,也是中国海军技术乃至国防科学技术发展重要里程碑。

90年代,水面舰艇分别配置了作战指挥控制系统、电子观通和电子战系统,对空、对舰导弹武器系统,全自动舰炮系统、综合反潜系统等,形成不同使命与功能的软硬结合的作战系统。在海军飞机中,增加了海上巡逻机、反潜直升机和可携带空舰导弹的轰炸机等新机种。海军军港、机场、洞库、沿海观通、导航、岸防阵地设施、指挥、防御体系和勤务保障体系逐步完善,不断提高现代化程度。海军作战指挥、技术保障、后勤体系,连同新一代水面舰艇、潜艇、海军飞机等国产海军武器装备,反映了中国现代海军技术的新水平。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海军技术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先后建造了各类舰艇和辅助船只6000余艘,100多万吨,包括导弹艇、常规动力潜艇和核动力潜艇,使中国海军装备逐步更新,发展成为现代化的、具有一定规模的海上作战力量,为保卫国家领海安全和海洋权益,作出了贡献。

主要成果 改革开放以后,海军技术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除核动力导弹潜艇外,其他成就主要还有:①先后研制成功一批新型舰艇。主要有:布雷舰、登陆舰、训练舰、艇具合一扫雷艇、深潜救生艇、气垫登陆艇等等,这些舰艇在防空、反潜、反导弹、电子对抗、指挥自动化方面具有更好的性能。②通过改装和加装舰艇武器和设备,提高了原有舰艇的战术技术性能。到1988年,对战斗舰艇进行

了现代化改装,包括中型导弹驱逐舰、导弹护卫舰、反潜护卫舰、大型导弹快艇、四管鱼雷快艇,为中型鱼雷潜艇加装了舰舰导弹。其中,053H₁型导弹护卫舰增装了新的舰炮、反潜系统、雷达、声纳及海上油水、干货补给装置。在053H₂型导弹护卫舰上采用封闭型结构,这是中国第一艘封闭型导弹护卫舰,其舰上导弹、火炮、雷达和动力等装备都采用先进技术和现代科研成果,全舰综合作战能力有较大提高,生活设施有所改善。对导弹艇的导弹发射装置也进行了改进,在结构上增加了导弹装填伸缩臂,使一艘艇装填全部导弹的时间比原来缩短了四分之三,大幅度提高了战备适应能力。③研制成功一批舰艇配套设备和武器装备,如自导鱼雷、主动和被动声纳、舰用相控阵三坐标雷达、作战指挥情报中心、电子对抗设备、超长波通信设备、惯性导航系统、舰艇自动控制和联合操纵设备等。其中,新型舰载作战指挥系统、惯性导航系统、搜索和跟踪火控雷达及声自导反舰鱼雷等一批先进的电子设备和武器装备,使舰艇武器装备技术由单机单控对付单一目标,发展到可同时对付多个目标的舰艇作战指挥和武器控制综合系统;鱼-4甲、乙两型反舰自导鱼雷的研制成功,使中国鱼雷技术与世界鱼雷发展水平的差距,增强了潜艇部队的突击能力也得到增强;1200火箭深水炸弹反潜系统及其派生的三个型号,构成了反潜系列产品。④建成以改装的“远望”号主测量船为核心的远洋测量船队,使其技术性能得到很大提高。⑤改进了海军的导弹武器系统,包括舰对舰、岸对舰、舰对空导弹,在提高导弹突防能力方面采用了许多新技术、新措施,如固体燃料、无线电高度表、多种抗干扰末端制导雷达等,经试验均取得良好效果。研制成功100毫米舰炮,它与舰用导弹一起,使中国对空型导弹护卫舰完成了

全舰工程。⑥中外合作设计,将运8运输机改为设计制造航程远、能快速大面积实施海上搜索的海上巡逻机。

发展趋势 为适应高技术条件下战争的需要,预警探测技术、信息传输技术、电子战技术、隐身和反隐身技术等研究将成为海军技术研究的主要内容。为满足先敌发现、先敌开火、首发命中的要求,海军技术研究将十分重视推进远射程、高威力、精确制导武器的发展,重点抓好新一代导弹驱逐舰、多功能护卫舰、新型核潜艇和常规动力潜艇、海军专用飞机、导弹、鱼雷、电子战系统等等的研制工作,使海军新一代武器装备朝着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模块化、轻型化、自动化方向发展,以适应未来作战的需要。

参考文献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海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林庆元著:《福建船政局史稿》,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

姜鸣编著:《中国近代海军史事编年》,海军学术研究所印,1991。

(金 钰)

空军技术研究

(research of air force technology)

探讨直接应用于空军建设和空中作战的军事技术的活动。国防科学技术研究的组成部分,包括对空军武器装备的研制与发展、使用与保障、维修、技术统筹等的研究。其中,空军武器装备是物化的空军技术,其水平是空军技术发展的重要标志,因此空军技术研究的重点是空军武器装备的研究。研究涉及的空军武器和保障装备包括:①作战飞机(歼击机、歼击轰炸机、强击机、电子对抗飞机)和武装直升机等。②保障飞机,有侦察机、预警机、

加油机、运输机、教练机等。③地空导弹、高射炮。④雷达,有机载雷达、地面防空雷达等。⑤电子对抗装备。⑥机载空空导弹、空地(舰)导弹、航空炸弹、火箭弹、航空机关炮等。另外,还有通信、导航、各种信息处理和显示、情报、指挥和气象保障装备等。空军技术研究还有:对空军武器装备发展的研究,包括新武器论证、改进现有武器和验收武器装备过程中所应用的技术的研究;空军武器装备使用技术研究,是对空军人员使用武器装备的操作技能的研究;武器装备维修技术研究,是对保持和恢复空军武器装备的性能,使之处于良好状态的技术的研究;统筹技术研究,是对空军作战、训练和建设的工程技术的科学理论的研究。

中国很早就有制造飞行器的尝试。20世纪,中国的空军技术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即清末到北洋政府时期、国民党政权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清末及北洋政府时期的空军技术研究

1901年,《皇朝经济文编》刊载《飞机考》一文,是中国最早介绍飞机的文章。1910年,清政府在北京南苑建立了中国最早的航空机构,是中国军用航空事业的发端。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和一些地方军阀先后建立了航空领导机构、航空学校、航空队等,派学生到国外学习航空技术,建立航空修理工厂,开始发展空军技术。

1913年,北洋政府在北京南苑创立了中国第一个正规的航空学校,购买法国飞机,培养飞行人员,并附设修理工厂,最初使用的飞机是法国高德隆式飞机,最大飞行时速96千米,起飞距离为100米。1918年,北洋政府海军部在福建马尾创办飞潜学校,培养海军军用飞机的使用和制造、维修人才,是国内第一个培养飞机制造人才的学校。1920年以后,各地军阀纷纷发展自己的航空学校或航空

队,以培养飞行人才为主,也有的办有军械或机械班,培养飞机维修人才。1921年,中华航空协会成立;1923年,北京航空学会成立;1925年,广东航空同志会成立。此后,还成立了中华航空协进会、中国航空协会、中国航空建设协会等。这一切,促进了飞机的使用与维修技术的推广。

中国的飞机制造是从南苑航空学校修理工厂开始的。1915年,该厂利用外国发动机设计制造了一架发动机后置式的陆上飞机。1918年,北洋政府海军部在福州船政局创办海军飞机工程处,是第一个正规的军用飞机制造工厂。到1927年,该厂先后制造过八九架海军飞机,为初级教练机和轰炸机,其中丙一、丙二轰炸机发动机功率268千瓦,最大时速为170千米,总重量为2950千克,代表了这一时期航空技术的最高水平。1922年,上海江南造船所建成世界上第一个浮动厂棚(水上机场)。

国民党政府时期的空军技术研究 这一时期,军用飞机制造技术有了一定的发展,航空武器使用技术水平有所提高;航空工程和飞机修理水平亦有进步。

1924年,广东的国民政府设立航空局,建立航空学校、航空队和航空修理工厂。1928年以后,南京国民党政府鉴于空军机动性好,攻击力强,成本较低,而大力发展空军,逐步收编各地空军,设立航空署,后改设航空委员会,统一领导空军技术的发展。其发展主要表现在:①购买大批外国军用飞机。先后引进欧美各国各式军用飞机数千架,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引进飞机2000多架,缓解了战时的急需。新引进的飞机,性能比老式飞机有较大提高。其中战时引进的苏联CB—2轻轰炸机,装两台活塞式发动机,功率为2×641千瓦,起飞重量5732千克,最大时速424千米,航程980千米,可携带500千克炸

弹。②建立培养航空专业人才的正规机构。1928年底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成立航空队,后改为军政部航空学校、空军军官学校,培养飞行和机械人员。1936年,在南昌成立航空机械学校,至1948年毕业7000~8000人。另外,还设立各种培训班,资助一些大专院校建立航空系、航空专业或航空研究所等,建设一些试验设施。③建立空军技术研究机构。在航空方面,1934年,成立中国航空工程学会。1936年底,清华大学成立航空研究所,抗日战争中合并于西南联大航空系,后改为航空研究院。在雷达和电子技术方面,抗日战争以后建立了两个特种电讯器材修理所和雷达研究所,主要从事修理,未进行研究工作。④新建和调整飞机制造工厂,提高了飞机制造技术水平。到抗日战争时期,航空制造和修理工厂有十多个,仿制了几百架军用飞机。这些飞机发动机的功率最初为89千瓦、最大时速为150千米,后提高到功率531千瓦,最大时速455千米。⑤建设了一些研究设施。如中央大学的直径1.2米和0.9米×1.5米的风洞,清华大学的直径1.5米的风洞,南昌的10.4~4.6米的大型风洞。⑥出版了一些研究期刊和书籍。据不完全统计,1912~1945年间,出版了1500~2000种航空技术书籍,创办有《航空》、《空军》、《中国的空军》、《航空杂志》、《航空机械》等期刊杂志,都是发表空军技术研究成果的重要园地。

国民党政府时期,空军技术发展主要建立在大规模引进的基础上,军用飞机制造的核心部件和许多材料始终以引进为主,没有形成独立的科研和工业体系;机载武器和电子技术等方面,基本上是空白。40年代后期,国民党政府将空军工厂、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迁往台湾,对不能带走的工厂设施进行了大规模破坏。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空军技术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空建立空军技术研究获得巨大发展的时期,飞机从活塞式过渡到喷气式,时速从数百千米跃升到两倍音速,从昼间型发展为全天候型,从主要引进为主到自行研制为主,展现出焕然一新的面貌。

人民空军创建初期的空军技术研究(1949~1953) 人民军队的空军建设可以追溯到红军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就曾派出一批干部到东北接收和搜集敌伪航空器材,建立航空学校,开展人民军队空军技术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就提出:“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

发展概况 为了建立强大的人民空军,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①1949年起,成立空军技术领导机构,在空军中,形成空军司令部下属的工程部、各大军区航空处(后为军区空军司令部)工程部、航校和部队的机务处、机务大队和修理厂等组成的空军技术和工程系统。在航空工业方面,中央政府于1951年4月成立了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1963年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政府其他一些部委也参与了空军技术的研究与发展工作。②制定空军建设方针和发展规划。1950年,提出了空军建设方针;1950年2月,空军提出了初步建设航空工业的意见书;1951年4月,中央军委和政务院颁发了《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决定》,要求航空工业先全力保证空军所有飞机的修理,而后再逐步向制造方向发展。③建立大批空军学校,培养空军人才。1949年起,建立了12所航空学校及中级指挥员训练班等;成立了七个预科总队(后改为航空预备学校)。到1953年底,共培养出飞行人员5945名,机务人员2.4万余名。④接收和整顿原有航空工业,引进苏联空军技术。1949年以后,空军共接收了

建国前的航空工厂32个,然后开始工厂调整和改扩建工作。到1952年底,航空工厂调整为13个,初步组建基本建设设计院,六个重点厂已具有新型大型修理厂的规模。同时,先后从苏联引进各种战机500余架,有偿接收苏联空军十余个师的战机。到1954年初,成立空军部队28个师70个团,装备各种飞机3000余架。

主要成果 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空军技术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①空军的武器装备大大改进。通过引进,在歼击机师中,喷气式歼击机师已占多数;空军各兵种技术大都得到了发展,组建了歼击、强击、轰炸、运输、侦察航空兵,成立防空兵,其高射炮、雷达、探照灯等兵种和专业技术也得到了发展。②通过院校培训、部队训练和抗美援朝战争的锻炼,军用飞机的飞行技术获得了很大的进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空军仅仅飞行了十几、几十小时的飞行员在与拥有几千飞行小时的美、英等国飞行员的作战中,击落敌机330架,击伤95架,自己反被击落231架,击伤151架,中、美军空军被击落飞机的比例是1:1.47。③军用飞机维护和修理水平有了很大提高。1951~1952年,修理飞机828架,发动机3989台,保证了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

人民空军全面建设时期的空军技术研究(1954~1977) 这一时期,空军技术研究的重点从满足战争需要转向全面建设,从修理转向制造、制造与修理并举。

发展概况 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十分重视空军技术的发展。从1953年起,国家的每个“五年计划”中,空军技术的发展都是重要方面。1956年制定的《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和总参谋部1958年制定的《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十年(一九五八~一九六七)规划

纲要》中,都将喷气技术与导弹技术列于首位,以满足国防需要。为此,国家、政府和军队采取了许多措施:①建设新的航空工厂,提高军用飞机制造水平,其中,飞机厂有南昌、沈阳、成都、贵州等飞机厂,株洲和沈阳等航空发动机厂,以及一批机载设备厂、导弹和火箭研制机构,在内地、西南、西北形成航空工业基地。②聚集和培养人才。1952年10月起,创办了北京、华东、西安航空学院,西北工业大学、南京航空专科学校(后升为航空学院),以及一批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在空军,成立空军训练部,形成空军工程学院、高级专科学校,空勤、地勤航空学校,高炮、雷达、通信、卫生等院校体系;从各行各业调集技术人员和技工充实航空工业,并利用来华苏联专家培养人才。③建立研究机构。在航空工业方面,1956年起陆续组建了航空研究院(1964年并入航空工业部),空气动力、航空发动机、飞机结构强度、直升机、水上飞机、大型飞机、歼击机等研究所,救生设备、机载雷达、航空电子、航空火力等机载设备研究所,以及一批重要试验设施,如能够进行120吨级飞机全机静力试验的设施,高空模拟试车台和低速风洞、跨音速风洞、超音速风洞等。到70年代,航空科研体系的架构大体建立起来。在空军中,50年代起到70年代,陆续建立了航空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飞行研究院(后改为飞行研究所),航空装备技术维修、雷达、通信导航自动化、航空油料、加油设备研究所,防化研究所,航医研究所,以及试飞团、空空导弹和地空导弹靶场等。同时,形成了空军军事科学研究部(统管空军装备的科学研究),团以上机关的科学技术研究指导委员会、各空军军区的科学研究室或处,军级单位的科学研究科,师级单位的科研参谋组成的空军科研领导系统。

主要成果 在中央政府和空军的有力

推动下,空军技术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在军用飞机制造方面。1954年开始从修理到制造的转变,50年代后期,开始把仿制和局部自行设计结合起来。1960年7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后,中国空军技术研究进入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自主地发展时期。1954年,仿制的初教5试飞成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的第一架军用飞机。此后到1976年,在歼击机和教练机方面,先后仿制了初教6、歼5、歼6、歼7、歼5甲、歼教5、歼侦6、歼教6、歼6Ⅲ、歼6甲;在轰炸机方面,有轰5、轰侦5、轰教5、水轰5、轰6、轰6丁等。在强击机方面,有强5。此外,还开始了无人机的研制。1958年开始自行设计研制的歼教1喷气式教练机,是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架喷气式飞机;歼6于1959年试飞成功,是中国生产的第一代超音速歼击机,是空军长时期主要装备的飞机,有多种改进型;歼7于1966年研制成功,其正常起飞重量7370千克,平飞最大马赫数2.05;强5于1969年底成批生产,该机单发动机双座,装两门航炮,可携带炸弹、火箭弹,平飞最大速度为1.12Ma,实用升限1.65万米,低空作战半径250千米,是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架超音速喷气强击机,采用了与米格飞机不同的总体布局,解决了飞机总体、气动力、结构、强度(刚度)、系统等方面的一系列新问题;轰6是国产化的仿制飞机,为中程喷气式轰炸机,起飞重量75800千克,最大平飞时速在6250米高度为1014千米,该机研制过程中对原型机进行了许多成功的改进,采用了一些新技术,攻克了第一次试制大型飞机的许多难关。1969年,歼8首次试飞,其研制过程中,专门进行了大规模的部队调查,进行了73项、11000次风洞试验和500项结构和系统试验,采用了涡喷7甲发动机,其研制成功,标志着中国军用飞

机设计制造有了新的突破。

在机载武器方面。1958年、1962年引进了苏联两种型号的导弹技术,开始研制霹雳1号、2号空空导弹,于1964年、1967年定型投产,为中国第一代空空导弹。60年代中期,还开始了“霹雳”3号和第二代空空导弹“霹雳”5号乙的研制,以及空舰导弹“鹰击”6号、8号的研制,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研制工作被拖延。

在空军技术条令条例和教材、操作规范方面。1960~1966年,编写完成的条令、教材306本,其中有许多是空军各兵种和专业的技术条令和教材,涵盖了空军使用的许多兵器、装备、设备和相关技术,其中主要有《飞行原理教程》、《航空发动机原理教程》、《雷达原理教程》、《天气学教程》、《气象学教程》等。这是一次大规模的空军技术方面的理论建设和基本建设,初步形成了基本配套齐全、内容完整的空军技术条令和教材体系。

在武器使用技术方面。1953年底以前,歼击机航空兵部队只有2.94%完成了昼间复杂气象的大队战斗飞行课目,通过抓紧复杂气象和夜间条件飞行技术的训练,到1957年底,完成夜间简单气象和昼、夜间复杂气象条件训练的飞行员占航空兵部队飞行员总数的44%,其中达到全天候飞行员约占1/3。1964年9月8日,空军组织了学习“郭兴福教学法”和比武成果向中央军委首长的汇报表演,共11种机型70架飞机参加了表演,显示了空军飞行技术的巨大进步。

在航空工程保障方面。空军多次召开工程机务工作会议,完善航空修理体系,调整空军工程和机务部队的体制编制。1958年起,空军进行了航空修理网的建设,使每个战略区都有独立修理能力,形成门类齐全、布局合理、修理配套的航空修理体系,能够修理多种引进和国产的军用飞机和发动机,并能对多

种飞机进行改装。

在机场建设方面。1960年以前空军机场是按照苏联空军的战术技术规范 and 标准设计的。1961年按照中国的特点制定和颁发了《空军永备机场基本规格》。50年代起中国开始机场网的建设,到1965年初步建成了以洞库机场为骨干的机场网,以及与之配套的指挥引导网、情报网、通信导航网、装备修理网和后勤保障网,防护条件和营房设施都有较大的改善。60年代中期以后,机场网建设进一步完善。中国已经能够建设具有一定先进水平的国际机场和军用机场。

人民空军现代化建设时期的空军技术研究(1978~2000)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航空科研和工业在改革开放的方针推动下获得迅速而巨大的发展。

发展概况 1979年起,拟定了飞机“更新一代、研制一代、预研一代”的目标,先后进行了航空外贸体制改革、企业改革,加强了空军技术科研管理,航空工业从重点抓成批生产到重点抓科研和新机的战略转变。同时,空军多次制定建设规划,进行训练、航空机务、后勤等方面的整顿,重建空军院校,强化军事理论研究和军事技术工作,加快了新装备的发展和定型工作;实行了初、中、高三级院校培训体制,专业技术军官实行中等、高等的培训体制,1985年飞行员培训开始招收大学本科毕业生,1985年开始,一批技术和工程院校开始培训硕士研究生;部队军事训练则由单一机种、单一兵种、单一部队转向多机种、多兵种、多部队合成训练,部队的技术水平协同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普遍建立了以微机为主要手段的教学管理中心,电化教学在全军评比中名列榜首。装备科研取得许多新成果,并形成了一支学科配套、技术门类齐全的专家队伍,建立起效能较高、组织合理的科研机构。

主要成果 有以下几个方面:

在军用飞机研制方面,更新一代的飞机,主要是指歼7、歼8(白天型和全天候型)、运7、运8、强5Ⅰ等机种。经过集中力量攻坚,解决了歼7Ⅰ弹射救生设备不安全问题,将其改型为歼7Ⅱ,具有较好的机动性,装涡喷7乙发动机以增加推力,采用720升机身副油箱以增大续航能力。歼8也于1979年设计定型,其最大平飞速度 $2.2M_0$,最大飞行高度20500米,研制过程中曾解决大量重大关键技术问题。强5Ⅰ于1983年装备部队,它加大了航程,增加了载弹量,改用增大推力的发动机。其改进型强ⅠA型、Ⅱ型、Ⅲ型,也分别在1983、1985年定型。研制的一代,主要是指性能更先进的歼8Ⅱ歼击机,于1984年6月首次试飞成功,是歼8的全天候改进型,能在昼间和夜间复杂气象条件下拦截敌机,并兼有对地攻击能力。它采用了115项新设计的或改进改型的机载设备。预研的一代,是为90年代至2000年提供实用精良的飞机装备而开展的预先研究和型号研制。到1986年,定型生产新飞机五种,特种飞机两种;改进改型飞机15种,特种飞机两种,发展超轻型飞机七种;试制成功新航空发动机三种,改进改型成功七种,初步形成涡喷6、涡喷7、涡喷13、涡桨5等四个系列,涡轴发动机也研制成功并投入生产。许多新品种的投产,填补了中国飞机制造的一些空白:如无侦5无人驾驶侦察机、轰6电子干扰机、运8海上巡逻机、高机动靶机、超轻型飞机、小型无人机等。还有一些较高性能的飞机,如歼7Ⅲ、歼8Ⅱ、直8直升机、歼教7歼击教练机等。歼7Ⅲ于1984年4月首次试飞成功,它配备了火控雷达,增强了武器外挂能力,采用涡喷13发动机,能在昼间、夜间复杂气象条件下作战,主要用于截击和空战,并兼有对地攻击能力,增加了空军全天候作战

的手段。强5Ⅱ则在强5基础上增加了压力加油系统,换装了新型射击轰炸瞄准具,增加了外挂武器品种,使用性能、生存能力、作战能力均有较大提高。

在机载武器方面,1978年起,加快了新型号地空导弹的研制,并抓紧了对现役地空导弹的改进。到2000年空军武器装备研制发展的目标是:加紧发展新一代主战武器装备,缩短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主要战术技术性能方面,除应具有能适应现代战争环境要求,更强调要适应空军的战略战术特点和作战使用要求,即机载武器威力大、机动性能好、适应性强、耐用可靠、维护简便、价格适中。到1986年,新研制成功导弹两种,改进改型三种,有上千项机载设备新产品达到定型生产或装机使用。

在雷达和气象保障技术方面,1976~1987年间,研制了十种性能较好的新型警戒雷达、引导雷达,淘汰了四种老旧雷达,应用新技术提高了原有雷达的低空性能和抗干扰性能,基本构成了以大型远程雷达为骨干,与中、近程雷达相结合的高、中、低空探测网。70年代,装备了“771”多普勒导航雷达。气象保障技术方面,研制出地面气象要素综合遥测仪、84式自动计算测风经纬仪、77A型激光测云仪、自动收转报系统、甚高频危险天气警报系统、气象报文微机定时处理和自动填图系统、近距离有线图象传输设备、视频积分分层显示设备、回波图象自动照相录取设备等,组建了几十个卫星接收站,装备了数百部测风、测雨雷达,形成了全国范围的气象雷达网,实现了气象雷达和卫星云图数据自动化和半自动化,提高了探测的时效和精度。

在航空侦察和指挥自动化技术方面,航空侦察装备,研制了歼侦6和电子侦察机,为侦察机配装了可见光、雷达相机,研制了航丁42红外相机,研制成功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

和高空高速歼击型侦察机,大大提高了侦察机的突防能力和侦察能力。指挥自动化装备,1985年,航空兵师半自动化指挥仪系统开始装备部队,它能自动录取和迅速传递雷达情报,计算机自动解算显示截击方案。

在武器装备使用技术方面,1976年起,组织了歼教5、6和歼6飞机的螺旋试验,进行螺旋飞行512架次,解决了困扰多年的螺旋问题。1977年起,组织了仪表飞行、编队飞行、特技飞行、攻击、空中实弹射击等的训练,提高了空军飞行员的技术水平。1980年,空军甲类团的数量比1977年增加了五倍。1981年、1984年、1987年,空军不断提高对甲类团的要求,使甲类团达到了四种气象训练水平,能随时遂行作战任务。

电子对抗技术方面,1976年空军成立电子对抗领导小组,1977年扩编了雷达对抗部队,1978年增编了各级电子对抗机构和专业人员,以后又组建和扩编了几个电子对抗分队和航空兵电子干扰部队。80年代以后,电子对抗设备发展很快,采取自行研制和国外引进相结合的方法,加强了对机载截击雷达的告警和干扰设备,提高了飞机的生存能力和突防能力。

航空工程技术方面,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引进国外先进的维修理论和维修思想,翻译出版了《航空维修管理基础》、《飞机的使用可靠性与维修性》、《航空修理可靠性基础》、《以可靠性为中心的维修》等航空维修理论著作。80年代,成立了空军维修理论研究领导小组、中国航空学会航空维修工程专业委员会、空军航空修理研究所,在空军普及维修管理和新的维修理论,在院校开设相关课程;创办了《军代表工作研究》、《航空修理》刊物,作为空军维修理论研究和工艺研究的园地;召开了数十次学术研讨会,研讨会和各种刊物上发表了数以千计的学术论文;80

年代中后期起,出现了一批具有国际水平和中国特色的空军维修理论专著和论文,如《航空维修现代化的情报研究》、《飞机使用可靠性分析的一般模式》、《战役航空工程学》、《飞机着陆后经典起火事故研究和预防设计》、《飞——续——飞载荷谱和程序块载荷谱对疲劳分散系数的影响》等,形成了具有中国空军特点的航空维修理论体系。航空维修理论研究和工艺研究的发展,促成了空军维修观念的更新,航空维修水平也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空军针对危及飞行安全的多发性故障采取了维修措施,改善了飞机的维修性,提高了飞机的可靠性和作战性能,开展了新飞机维修性、可靠性的论证研究,减少了飞机的故障率,提高了飞机的可用率,推动了空军的现代化建设。

发展趋势 未来的空军技术研究,将注重解决:作战飞机进一步向信息化、综合化、一体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不断提高其突防能力、战斗生存能力、电子战作战能力,提高高低空性能和短距垂直起降能力,提高其可靠性和可维修性;歼击机将具有非常机动能力、高敏捷性和超音速巡航能力,战略侦察机将装有高性能的光电侦察设备,直升机将装用新型旋翼,无人机性能和数量均将有大的发展;防空武器将较大地提高发现能力、反应速度、抗干扰能力和生存能力。在新的世纪里,中国的空军技术将获得更快、更大的发展,缩短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为国防和军队建设现代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航空工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空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姜长英著:《中国航空史》,北京:清华大学出版

社,2000。

(金 钰)

火药研究

(research of propellant)

探讨以燃烧方式快速而有规律地释放大
量高温燃气物质的活动。

中国的火药研究历史悠久。至迟到公元
808年,中国已发明了黑火药等。

为满足身管武器初速和射速的要求,发
射药的发展主要以提高能量和降低烧蚀为
主。中国70年代初研制成功轻武器用双基球
扁药,采用搅拌成型工艺可制成弧厚0.5毫
米以下,直径1毫米的药粒,用于7.62毫米
枪弹的装药。利用挤压成型工艺则可生产弧
厚0.6毫米,直径1.8毫米以上的药粒,用于
口径在37毫米以下的炮弹和迫击炮弹的装
药。典型双基球扁药的火药力为1 072千焦/
千克,定容燃烧温度为2 960K,比容达到
952.5升/千克。提高大口径火炮用发射药的
能量和降低烧蚀的途径主要是通过使用高氮
量的硝化棉和使用混合硝酸酯加入硝基胍,
使用高爆热的硝酸炸药(黑索今或奥克托今)
和叠氮硝酸化合物等。90年代研制成功的高
能硝酸发射药,其火药力高达1 226千焦/
千克,而叠氮硝酸发射药的火药力则可以达到
1 128千焦/千克,定容燃烧温度低于3
000K,既适用于大口径压制兵器,也适用于
小口径速射武器。

在发射药生产技术方面,50年代末建立
了单基发射药的生产联动线,实现了从胶化
到混同包装的连续化。双基管状药则采用吸
收药湿混、螺旋驱水、沟槽压延机塑化、螺旋
压伸成型的连续生产工艺。针对世界发射药
生产向柔性化发展的特点,90年代,中国开
展了一线多能的双螺杆混合成型工艺技术研究,
解决了连续预混、双螺杆成型、塔式驱除

溶剂和振动烘干等关键技术,形成了一条生
产线可以轮换生产单、双、三基药的技术。

火炮的装药技术,是研究如何以最佳的
装药方式实现能-功转换以获得最大炮口动
能的问题。其中包括渐增性燃烧的发射药技
术、发射药的深度钝感技术、低温敏感系数装
药技术、密实装药技术、刚性组合装药技术、
无壳弹技术、随行装药技术等。中国先后研
制成功的可燃药筒技术、火箭增程技术、底
部排气增程技术,可降低身管武器的作战成
本,减少环境污染,大幅度提高身管武器的
作战效能。90年代,研制成功低温度发射
药技术,显著降低了环境温度对弹道性能的
影响,在温度为-40℃~-50℃范围内,火
炮初速的变化量<1%,高温膛压增量<5.0%,
明显改善了火炮的初速和弹道稳定性,使中
国炮用发射药的低温处理技术处于世界领
先水平。

为提高火箭和导弹的射程和实现精确
打击目的,固体推进剂技术以提高能量,降
低感度和减少排气烟雾的特征信号为发展
的主要方向。特征信号是指火箭发动机排
出的烟和羽流所产生的红外、紫外和可见
光等信号。它会暴露火箭和导弹的飞行轨
迹,干扰导弹的制导信号(激光、雷达波、
红外)的传输。实现低特征信号的技术途
径主要是减少或取消配方中金属燃料铝粉,
采用燃烧中不产生HCl的硝酸取代高氯酸
铵;加入电子捕获剂;使用含叠氮基团的
粘合剂和增塑剂等。截至20世纪末,中
国已形成实测比冲为1 961~2 254牛·
秒/千克,燃速为5~30毫米/秒,压力指
数为0~0.3的一系列微烟改性双基推进
剂。少烟的端羟基聚丁二烯推进剂的比冲
可达2 300牛·秒/千克左右。

采用新的含能材料,提高配方中的固
体含量,改善装药的比冲效率,是固体推
进剂提高能量的主要途径。在改性双基推
进剂和丁羟复合推进剂中加入高能硝酸
炸药奥克托今

或黑索今,使两类推进剂的能量有了显著提高。80年代研制成功交联改性双基推进剂,其标准实测比冲达2420牛·秒/千克,密度为1.81克/厘米³。在丁羟复合推进剂中使用20%的奥克托今取代高氯酸铵,在配方的固体含量为88%~90%时,推进剂的比冲增量为25牛·秒/千克。90年代中期,中国成功合成了高能量密度化合物六硝基六氮杂伍兹烷,用以制成低特征信号推进剂,其比冲增加50牛·秒/千克左右。向粘合剂分子中引入叠氮基团,是提高推进剂能量的另一有效途径。中国80年代以来合成了由叠氮缩水甘油醚和3,3-双(叠氮甲基)氧丁烷为单体形成的聚醚,并通过网络的控制和有效键合剂的应用,制成了力学性能良好的叠氮聚醚推进剂,为中国高能低特征信号推进剂提供了新的品种。

推进剂内弹道性能的控制主要是改变燃烧速度和减少燃速对压力、温度的敏感性。催化剂的使用和氧化剂的粒度级配是调节燃速的有效办法。使用微米级高氯酸铵的粒度级配结合二茂铁类催化剂的应用,中国已研制成功燃速为80毫米/秒的丁羟复合推进剂,降低压力指数的办法是使用特殊的附加物如亚铁氰酸铜、十八酸铜等。使用此类附加物的丁羟推进剂的压力指数为0.15左右。燃速不随压力变化的推进剂称“平台”推进剂,可以为火箭发动机提供最佳的内弹道特性。通过有机或无机的铅盐、铜盐与碳黑组成的复合催化剂的应用,可以在双基推进剂中获得平台燃烧效应。70年代以来,中国已研制成功数种压力指数为0~0.2的平台双基和压力指数为负的“麦撒”双基推进剂。

固体填料含量为85%以上的复合推进剂的力学性能的调节主要依靠粘合剂网络的控制,即预聚物的化学结构、平均分子量及其分布、固化后的交联密度,以及填料与网络间

的相互作用的强化实现。针对复合推进剂的填料主要为氧化剂高氯酸铵的特点,80年代以来,研究成功以三乙醇胺二氟化硼与氮丙啶磷化氧配伍使用的键合剂,使用此类键合剂的丁羟推进剂在-40℃、+20℃、+50℃条件下的延伸率可达50%以上,能满足各种型号发动机的装药要求。根据NEPE推进剂的主要填料为硝胺炸药的特点,中国90年代研究成功由丙烯腈、丙烯酸羟乙酯为主要成分的中性大分子键合剂,使此类推进剂的力学性能可满足各种装药条件的要求。

在推进剂的燃烧机理研究方面,1986年中国学者提出了由化学组成预估非催化推进剂燃烧性能的方法及燃烧模型,该模型可定量地非催化推进剂的超速、平台和麦撒燃烧过程。1996年,建立了火炸药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可采用高速摄影、全息干涉计量术、纹影照相术、阴影照相术研究火焰结构,并可采用相干反斯托克斯喇曼光谱(CARS)测定火焰中物质的种类和浓度,为高性能火药的研制创造了良好条件。

参考文献

张端庆等编:《固体火箭推进剂》,北京:兵器工业出版社,1991。

张续柱编著:《双基火药》,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

侯林法等编:《复合固体推进剂》,北京:宇航出版社,1994。

(谭惠民)

炸药研究

(research of explosive)

探讨在适当外界激发能量作用下能产生化学爆炸物质的活动。包括炸药合成研究;单体(单质)炸药,如硝基化合物,硝基胺化合物,硝酸酯基化合物和硝酸盐,叠氮化物,雷

酸盐等的研究;混合炸药,如炸药与炸药混合而成的有熔黑梯炸药、奥梯炸药、太梯炸药、铵梯炸药、活性代那买特等,炸药与非炸药混合而成的有高聚物粘结炸药,例如黑索今、奥克托今等,非炸药与非炸药混合而成的黑火药、液氧炸药、铵油炸药、燃料空气炸药等的研究。

火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早在公元 808 年中国就发明了火药,10 世纪开始用于军事。中国发明的火药既用作抛射,也用作爆炸装药,一直沿用到 19 世纪。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科学技术的落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中国的炸药工业和炸药研究基本上是空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为了巩固国防,加速国防现代化的建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迅速地建立起自己的炸药工业,同时建立了研究机构,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炸药科学技术在不长的时间内赶上了国际先进水平。

炸药合成研究 中国从 60 年代初开始了新炸药合成的研究工作。1966 年,研究发明了 662 炸药,理论密度 1.94 克/厘米³,爆速 9 182 米/秒(密度 1.895 克/厘米³),与奥克托今相当,生产成本比较低廉。以 662 为主体的高聚物粘结炸药适用于装填破甲弹、导弹战斗部。在这一时期内,中国科学家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索研究,先后探索的领域包括芳香类硝基化合物,硝仿系列,二硝基系列,氮杂环及氮杂稠环硝胺系列,尿环及尿环稠环硝胺系列,呋咋及氧化呋咋系列,含氟及含叠氮基的各类炸药。合成出含不同基团和不同结构的新炸药数十种。其中,爆速在 9 000 米/秒左右的就达十种以上,如六硝基苯;重乙二胺(2 号炸药);7201;四硝基甘脲;四硝基丙烷二脲;7507;7311 等等。这些高能炸药中有的得到了应用,有的虽然在安定性或综合性能方面存在一定缺陷,但对于炸药

合成的研究积累了经验。

在炸药合成的理论方面中国科学家也进行了研究,并有所创新。发明了计算炸药理论密度的公式和计算炸药爆速的氮当量公式及修正氮当量公式,可以根据炸药的结构式,较精确地计算出炸药的理論密度及爆速。改进了炸药的热化学计算,提高了计算精度。将量子化学方法引入炸药性能与结构关系的研究。这些理论研究成果为炸药分子设计建立了理论基础。

通过实践和理论的研究,炸药界一致认为接近零氧平衡的笼形的氮杂环硝胺或硝基化合物将是高能炸药合成的研究方向。90 年代初,美国等相继报道合成了六硝基六氮杂伍兹烷,随后中国科学家也合成出这一高能炸药。六硝基六氮杂伍兹烷,理论密度为 2.01 克/厘米³,能量比奥克托今提高约 14%,在现有炸药中能量最高,综合性能较好。它具有一定应用前景,有可能成为新一代的高能炸药。中国现正进行其工艺研究,以降低其生产成本。

单体炸药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为发展国防工业,建立了梯恩梯生产线,并从苏联引进技术,建成了直接法黑索今生产线。同时,对特屈儿、太安、奥克托今等炸药的生产工艺也进行了研究和开发,相继建立了生产线。此外,还建成了硝基胍、吉纳的生产线。

军事上应用最广泛的单体炸药是梯恩梯、黑索今、奥克托今。为了降低黑索今、奥克托今的生产成本,中国科学家对它们的新的合成路线及生产工艺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和研究。目前世界上黑索今采用直接法生产,按甲醛计其得率仅达到 40%左右。中国相继研究了硝胺法、硝镁法、白盐法等黑索今生产新工艺,将黑索今的得率提高到 70%~90%。在奥克托今生产工艺方面,原有工艺采用醋酐

法、使用醋酸作为溶剂,醋酐—硝酸为硝化剂,得到的产品为A型晶体,再用有机溶剂转晶,最终得到B型奥克托今。由于使用大量醋酐、醋酸及有机溶剂,生产成本低,在常规兵器中的应用受到限制。中国于70年代开始研究奥克托今的新工艺,一方面对醋酐法进行改进,以提高其得率,并研究了先醋解再硝解的DADN法,较大幅度地提高了产品的得率;另一方面,研究非醋酐法新工艺,创立了HPR法及硝基尿法,完全不用醋酐、醋酸及有机溶剂,中型扩试表明,这两种方法均能大幅度降低奥克托今的生产成本。

80年代,中国开始研究六硝基芪的制备工艺,创立了两步法新工艺,降低了生产成本,并建立了生产线。六硝基芪是一种耐热炸药,并可作为梯恩梯的晶形改进剂,用于制造结晶梯恩梯。此外,还研究开发了三氨基三硝基苯,双苦胺基二硝基吡啶两种耐热炸药的生产工艺,并投入生产。三氨基三硝基苯不仅是一种耐热炸药,还是一种不敏感炸药,对安全炸药系列的研制正在显示出日益增长的重要性。

截至20世纪末,中国研究的单体炸药的品种和产品质量,已经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混合炸药研究 炸药在实际应用中必须通过装药工艺将炸药装填到弹体中。装药方法主要有:注装、压装、螺旋压装等。常用的单体炸药中,梯恩梯的熔点较低(80.4°C),且长时间熔化不分解,可以用注装,也可以用压装或螺旋压装的方法进行装药。但梯恩梯的能量较低,不能满足某些品种弹药的要求,可以加入黑索今、奥克托今等高能炸药,组成注装型混合炸药。而黑索今、奥克托今等高能炸药,感度高,熔点高,熔化时分解,且无法注装,压制成型性能差,无法压装。所以这些高能单体炸药不能直接应用于军事目的,而必

须通过适当的工艺,加入钝感剂、粘结剂、增塑剂等添加剂,制成混合炸药后用于装填弹药。混合炸药研究的目的在于寻求能满足对军用炸药性能要求的混合炸药的配方及其生产工艺,通过适当的装药工艺,制得具有一定强度的,没有裂纹、气孔等疵病的,能承受发射振动而保证安全的爆炸装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混合炸药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针对螺旋压装研制了改性梯恩梯,在不预热的条件下可直接进行螺旋压装,应用于装填大口径、曲率大的弹药。对于以梯恩梯为基的高能注装炸药,研制了一系列新的配方,包括由梯恩梯与黑索今组成的熔注梯黑炸药系列,其中黑索今的含量达 $50\%\sim 70\%$ 。由梯恩梯和硝基胍组成的梯胍熔注炸药系列,其中硝基胍的含量达 $40\%\sim 73.5\%$ 。

中国于60年代开始研究粘结炸药。结合中国国情,研制了一系列以高能炸药为主体的高分子粘结炸药,其中广泛应用于装填破甲弹的以黑索今为主要成分的高分子粘结炸药,如:8321(爆速为:8530米/秒,密度为:1.753克/厘米³);8701(爆速为:8425米/秒,密度为:1.722克/厘米³)。以662为主要成分的如:662-1(爆速为:8932米/秒,密度为:1.858克/厘米³)。以奥克托今为主要成分的如:2701(爆速为:8700米/秒,密度为:1.829克/厘米³);2721(爆速为:8844米/秒,密度为:1.835克/厘米³),以及多种用于核武器的以高能炸药为主要成分的高分子粘结炸药。此外,为了满足特种需求,还研制了特种炸药。例如,塑4炸药,也是一种以黑索今为主要成分的高分子粘结炸药,在 $-40\sim +50^{\circ}\text{C}$ 之间,不变硬,不渗油,仍具有塑性,可以搓捏成型,可用于装填碎甲弹,用作爆破装药。又如挠性炸药(橡皮炸药),以黑索今为主要成分,以天然橡胶为粘结剂,经

硫化处理而制得,在 $-40\sim+50\text{ }^{\circ}\text{C}$ 下,能自由挠曲,不产生裂纹,可用作水下导爆索和爆破装药。

参考文献

孙荣康等著:《猛炸药的化学与工艺学》,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83。

周发岐著:《炸药合成化学》,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84。

董海山等主编:《高能炸药及相关物性能》,北京:科学出版社,1989。

孙业斌等编著:《军用混合炸药》,北京:兵器工业出版社,1995。

(赵子立 李伟民)

弹药研究

(research of ammunition)

探讨具有壳体,装有火药、炸药或其他装填物,能对目标起毁伤作用或完成其他作战任务的军械物品的活动。包括枪弹、炮弹、手榴弹、枪榴弹、航空炸弹、火箭弹、导弹、鱼雷、水雷、深水炸弹、地雷、爆破器、发烟罐、爆破药包等。弹药作为武器中的毁伤分系统,是武器系统的核心部分。弹药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各类弹药从投射(或运动)至终点作用全过程所发生的现象及本质、各组成部分的工作原理和结构零部件的运动规律等,以战斗部作用机理与终点效应、目标易损性分析、弹药系统总体设计以及弹药的新技术、新概念探索为重点。由于弹药具有高速、高压和高温的特性,尤其是弹药的发射、终点过程是典型的瞬态过程,加之弹药的种类繁多,性能差别大,使得弹药研究的难度加大,涉及的学科和技术领域特别宽广,内容繁杂,综合性强,系统特征明显。

研究概况 中国弹药研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发明火药,并在10世纪首先应用于军

事。但是,近现代的射击式弹药、定装式弹药、带壳爆炸弹、装填猛炸药的杀伤弹药以及装填不同烟火剂的燃烧弹、照明弹、发烟弹、毒气弹、眩目弹等特种弹药均源于欧美国家。中国弹药研究的真正发展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才开始,最先研究的是弹药的爆炸性能、聚能效应、弹丸的侵彻特性等。包括爆炸物理的基本理论、聚能效应的基本现象,空中、水下和土石中的爆炸现象以及自然破片的杀伤作用等。50年代引进脉冲X光机,并且建起了第一批爆炸洞以后,开始在实验室定量研究弹药的爆炸现象、金属射流的形成过程等。通过测定爆炸冲击波的初始参数、聚能效应的某些参数,例如冲击波的速度、药型罩的压垮角、金属射流的速度等,逐步发展了爆破杀伤弹药预制破片和预控破片的各种方法、结构,建立了自然破片质量分布的总体理论,自然破片形状分布的新概念,单枚破片对目标单元的毁伤准则,以及目标单元失效对目标总体毁伤的定量贡献模型,制定了在不同作战条件下战斗部毁伤目标的威力特征量。60年代,利用炸药接触爆炸的冲击波在甲板背面产生崩落的效应,研制了碎甲弹,用来破坏混凝土工事、反坦克和装甲车辆,崩落出的大小碎片能毁坏坦克内部设备,杀伤其乘员。60年代以后,由仿制发展到自行设计、制造的新阶段。

70年代开始深入地研究穿甲、破甲机理。随着现代化实验设施的建立和先进试验技术的应用,如高速摄影技术、动态应变测量技术、轻气炮等高速发射装置、模拟靶道等。科研人员全面系统地研究了金属射流和多种形状的钢、钨等重金属侵彻体对均质钢甲、复合装甲、玻璃钢、复合陶瓷等装甲和材料的侵彻特性,以及各种因素对侵彻特性的影响,促进了穿甲与破甲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也丰富了撞击与侵彻力学的内容,使中国穿甲弹、破

甲弹的技术水平保持在世界先进水平。到 80 年代末,完成了杀伤战斗部对复杂目标毁伤的完整理论体系。在此基础上,发展了炮弹、航空炸弹、子母弹等破片式战斗部对人员、战车、飞机、导弹等目标毁伤计算的软件系列。为杀伤爆破弹药,如枪榴弹、航空炸弹、地雷、水雷和导弹战斗部的研制提供了依据。80 年代以来,弹药突破了传统的概念,不再是钢铁加炸药,先进的光电技术、计算机技术等高新技术在弹药上广泛应用,使弹药的系统性更强,结构更复杂,也使中国弹药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弹药研究极为活跃,内容更为丰富。对灵巧弹药技术、爆炸成型弹丸技术、燃料空气弹药技术、航空炸弹远程投放技术、榴弹高能炸药装药技术、底部排气火箭增程技术、战斗部定向杀伤技术、防空反导弹药技术、引信与战斗部配合技术、弹道修正技术,以及软杀伤技术等高新弹药技术和新概念弹药都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

主要研究成果 中国的弹药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

破甲技术研究 研究了金属射流的形成、运动射流的拉长和断裂行为、射流的侵彻行为,建立了断裂射流和连续射流的破甲理论、工程模型及有效的计算方法。对影响破甲效应的因素,从药型罩的形状(锥形罩、喇叭形罩、双锥罩、曲线组合罩等),罩锥角、罩壁厚以及壁厚变化率,药型罩材料、药型罩的加工方法和加工精度,装药的性能、密度、形状、尺寸,隔板的结构、材料、放置位置,到战斗部的旋转、壳体、炸高、起爆系列等,研究比较全面。发现了旋压药型罩具有旋转补偿效应,创造性地提出用旋压药型罩克服弹丸的低速旋转运动对破甲不利影响的方法。旋压成型工艺简单,加工出的罩子壁厚差小,故破甲跳动量也小。到 20 世纪末,它仍然是一种抗旋的好方法。研究了精密装药、精密药型罩和精密

装配技术,改善了大炸高(15~20 倍口径)条件下破甲弹的破甲性能。由于采用了高能炸药及各种先进的破甲技术,破甲弹的威力从 60 年代的五倍装药直径提高到 90 年代的 9~10 倍装药直径。对金属射流侵彻陶瓷靶板、复合装甲材料的试验研究,不仅揭示了射流对新型复合装甲的侵彻机理,亦为新型复合装甲防护的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80 年代末起,为了对付反应式爆炸装甲,又研究了破一破串联破甲技术、穿一破破甲技术。其中,破一破串联破甲的技术已成功地应用于产品的研制。

穿甲技术和撞击与侵彻机理研究 研究的重点是对杆式穿甲弹的穿甲机理和穿甲弹结构的研究。长径比 L/D 在 5~32 范围内,速度在 800~2 300 米/秒的范围内,倾角为 $0^\circ\sim+73^\circ$,侵彻体材料包括合金钢和钨合金,靶元包括半无限均质靶、有限厚均质靶、分层靶、复合靶等。试验取得了标准圆柱杆对半无限均质装甲的侵彻深度与着靶速度的关系曲线(即“S”曲线)和侵彻有限厚靶的侵彻增量。此外,还研究了分段式杆式弹的侵彻机理,各种弹头结构及着靶攻角对穿甲威力影响等,提出了长杆体对半无限厚钢靶垂直侵彻和斜侵彻模型,对有限厚钢板的垂直及斜侵彻穿透简化模型,以及有攻角条件下长杆体对钢板的侵彻等。这些研究为长杆式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的威力设计和研究提供了依据。普通穿甲弹、半穿甲弹对混凝土介质的侵彻规律及影响因素的系统研究也始于 80 年代,通过试验研究,取得了半穿甲弹对混凝土介质的侵彻、爆破效应的大量数据和经验公式,并且建立了相应理论和计算方法,考虑了介质的物理力学性能尤其是动态性能的应变率效应,为研制对付机场跑道、地下目标、礁石工事等的半穿甲弹和半穿甲战斗部提供了必要的依据。

破片侵彻研究 全面研究了钢和钨合金的实心球破片对水介质、低强度粘塑性介质、木板、钢板,以及半无限、单层、多层铝板等的侵彻现象,掌握了极限穿透速度、跳飞极限角、弹坑形态、空腔形成等基本规律。此外,还研究了方形破片对钢板的侵彻现象。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条形破片随机着靶的穿透概率计算公式。

推进、增程和减阻技术研究 主要研究了固体火箭发动机技术、飞行弹丸减阻技术和复合增程技术等。这些研究涉及固体推进剂燃烧与点火机理、传热理论、新型推进原理、弹丸底部排气装药燃烧机理、各种弹形减阻机理和实验测试技术等。70年代,自行研制了高精度六分力推力测试系统,开展了火箭推力偏心试验研究。80年代进行的“微推偏喷管”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发明了微推偏喷管技术及其设计理论,并成功地将其应用于火箭弹的型号研制,大幅度提高了火箭射击的密集度。火箭增程技术应用于追击炮弹,在装药量增加30%和弹重增加20%的条件下获得了大于150%的增程率。弹丸减阻技术有底凹、改善外形和底部排气技术等。在底部排气技术方面,研究了底部排气药剂点火与燃烧规律、底部排气动力、底部排气外弹道和底部排气结构等。对底部排气药柱的燃烧流场及高速旋转下药柱的变形特征研究,使得底部排气药柱燃烧表面积的计算更真实地反映底部排气弹在飞行中的实际情况。应用底部排气技术,使增程率接近了30%。

弹药制导技术研究 50年代起,在战术导弹方面,先后成功研制与装备了HJ系列反坦克导弹、HQ系列及其他地空导弹、HY系列及其他反舰导弹及地地导弹等。反坦克导弹经历了人工瞄准跟踪、光学瞄准跟踪,并向“发射后不管”的方向发展。

特种弹药和无源电子对抗弹药研究 在照明弹药方面,以钠盐为主的黄光照明剂取代了传统的钡盐照明剂,能辐射大量红外射线的新型红外隐身照明弹,可使第一、第二代夜视器材的视距提高三倍以上。燃烧弹技术方面,采用锆、镁基合金和三乙基铝等,使用稀土合金等新型高能燃烧剂,加强了弹药的引燃和纵火作用。发烟弹技术方面,从只能遮蔽可见光,发展到能遮蔽可见光,近、中、远红外、激光等的宽频段组合烟幕弹技术。50年代,还开展了红外诱饵药剂的研究,到80年代,无源电子对抗弹药技术已经有了比较大的发展,研究成功对付红外寻的远红外干扰弹和对付厘米波雷达等探测器的箔条无源干扰弹。

弹药设计理论和方法研究 70年代末,将有限元素法引进弹药发射强度研究之中,开展了弹药终点效应的数值模拟研究。80年代以后,基于杀伤战斗部机理研究提出的“榴弹威力设计”综合研究成果,解决了概念、模型及软件上的一系列关键问题,完成了一套实用的设计理论与方法,摸索了一套适用于大型杀伤战斗部威力试验技术,将中国的榴弹杀伤威力设计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所提出的“杆式(钨、铀合金)穿甲弹设计理论”,使国内杆式穿甲弹威力设计达到定量化程度,应用三维有限元法和三维带惯性力的光弹试验法校核发射强度,使发射强度校核有了实用可靠的手段。对弹药的系统设计方面,应用现代系统工程的理论和方法,针对弹药的特点,建立了包括弹药总体设计指导原则、弹药总体设计的框架结构、步骤和目标分析等一整套方法。一批现代设计方法的应用,如CAD技术被应用于榴弹、穿甲弹、破甲弹等弹药的设计,推动了对弹药发射的安全性、弹丸碰击目标的强度、弹药用材料的应变率特性、弹药的弹道特性等的研究都

取得了进展,为弹药的系统设计提供了依据。对典型目标,如坦克、装甲车辆、飞机等的易损性,也通过理论建模、易损性单元模拟试验和积累的实际试验数据进行了研究。

弹药结构、材料及加工技术研究 80年代,进行了子母弹结构及关键技术研究,完成了杀伤子母弹和破甲子母弹的研制。用马鞍形弹托取代碟形卡瓣,大大增加了弹芯的长度。采用串联结构的成型装药,有效抵御了爆炸装甲的干扰。对弹药用特殊材料(如D60炮弹钢)、专门的加工技术、先进制造技术的研究,都极大地提高了弹药的水平。

发展趋势 21世纪初,弹药研究的重要内容,将是提高弹药战斗部的杀伤威力,发展智能引信,研制集束式、子母式和多弹头战斗部,提高弹药对点目标的命中精度,发展各种特种弹药,采用高能发射药,增大弹药射程,等等。其研究成果将促使弹药向灵巧化、智能化、远程和高效毁伤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于骥等编:《弹药学》,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87。

王儒策、赵国志:《弹丸终点效应》,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93。

魏惠之等:《弹丸设计理论》,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85。

蒋浩征等:《火箭战斗部设计原理》,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82。

(王儒策 王晓鸣)

轻武器研究

(research of small arms)

探讨各种枪械及其他可由单兵或战斗班组携行使用的武器的活动。一般包括枪械、手榴弹、枪榴弹、榴弹发射器、火箭发射器研究等。轻武器是步兵装备使用的基本武器,作为

辅助武器也广泛装备其他军种、兵种,主要用于杀伤敌有生力量,毁伤敌装甲战斗车辆,打击敌低空目标,压制和破坏敌其他武器装备和军事设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轻武器研究 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中国轻武器研究主要以仿制国外枪械、弹药为主。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先后建立了规模不大的22个生产厂。清朝末期的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等工厂生产的枪械基本仿制英、美、德、法、奥、日、俄等国的产品,从工厂设计到原材料供应主要依赖外国,有些还聘请外国人监制。这一时期枪械的仿造经历了由前装到后装、由滑膛到线膛、由大口径到小口径、由单发到连发的发展过程。先后制造过德国11毫米前装枪、1871式后装步枪等。广东制造军械总厂1908年仿造的丹麦8毫米麦德森轻机枪是中国最早生产的轻机枪。金陵制造局1914年仿制的马克沁重机枪是中国最早制造的重机枪。

北洋政府时期,各地军阀为加强军事实力,千方百计引进设备仿制西方的枪械。这一时期枪械制造种类较多,生产量增大,质量有所提高。步枪口径主要有6.5毫米、6.8毫米、7.9毫米三种。1913年,北洋政府陆军将7.9毫米毛瑟步枪定为制式步枪。

国民党政府时期,兵器生产的管理开始由分散走向集中,当时军政部的兵工署专门负责兵器研究和生产。1934年兵工署规定了一些枪械、弹药的制式:1898毛瑟步枪被定为24年式步枪(后改名为中正步枪),1908马克沁机枪被定为24年式重机枪,7.9毫米捷克轻机枪被定为制式轻机枪,7.9毫米枪弹被定为步枪、机枪制式弹。与此同时,还组织生产了大量的木柄手榴弹。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一些兵工厂西迁,形成以川、滇、湘、陕为后方的生产基地。这一时期的枪械研

究工作主要是根据前方需要,对仿制武器进行性能改进。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主要靠缴获敌人武器武装自己,同时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也重视发展自己的兵工生产和轻武器研究。各兵工厂除了制造手榴弹、地雷、复装枪弹和修复各种枪械之外,还千方百计研制新型步枪。山西黄岩洞兵工厂1940年制造了7.92毫米55式步枪,同年7月研制出7.9毫米“八一”式步枪。该枪性能优良、结构紧凑,受到八路军总部的嘉奖。解放区的轻武器研究工作尽管开展较晚,但成绩卓越。

总之,由于当时国民经济基础薄弱,兵器科研和教育落后,中国近代轻武器研究只能进行一些枪械、弹药仿制研究,产品技术性能落后于当时世界水平十年左右。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轻武器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轻武器研究和生产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国民党政府的兵器工业基地经改造后形成了新兵器工业的源头。50多年来,中国轻武器科研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仿制到自行研制阶段(50~60年代)
战争年代,人民解放军装备的枪械陈旧、杂乱,枪弹非常缺乏。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后,中央军事委员会曾经通令全军收集、翻修枪弹,但也只供应了1.2亿余发。为了摆脱困境,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采取两项措施,一是从苏联进口部分枪械和弹药;二是仿制苏式枪械。1950年,仿照苏PPsh-41冲锋枪,制造了3万多支中国50式7.62毫米冲锋枪。到1954年,又仿制出51式、54式手枪,53式步枪,54式冲锋枪,53式轻、重机枪和54式高射机枪,并成批装备部队,换下了各种旧杂式武器,人民解放军轻武器装备第一次实现大换装,枪械系列得到统一,装备水平有了很

大提高。1955年,中国再次从苏联引进了一系列步枪、机枪的图纸和技术资料,同时对轻武器生产也进行了大规模技术改造。从1956年起,生产、装备了大量56式半自动步枪、56式冲锋枪、56式轻机枪,使步兵班枪械型号统一到56式,枪弹也由原来的两种统一为一种。1957~1958年,先后生产了57式重机枪、58式连用机枪、56式四联高射机枪和58式双联高射机枪,使人民解放军班组火力压制能力和防空能力得到极大提高。此外,还仿制了541型手榴弹、59式木柄手榴弹、56式40毫米反坦克火箭筒等。1956年2月,总军械部成立了军械科学研究所,着重研究新武器和解决部队装备的技术问题。所内设有一个枪械研究室,主要从事枪械弹药储存、抗美援朝武器使用经验研究及枪管寿命研究等。1960年10月,总后勤部军械部将军械科学研究所枪械研究室扩编,组建了轻武器研究所,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正规的轻武器专业研究机构。中国轻武器由仿制走向了自行研制的发展道路。1963年,中国自行设计、研制出7.62毫米63式自动步枪。它采用步枪、冲锋枪合一的设计思想,能够单发和连发射击,火力较强,在同类武器中较为先进。1967年5月,中央军委批准其列入军队装备体制。

1963年,中国自行研制出63式木柄手榴弹,定型生产并装备部队。同年底,科研、生产、使用部门在北京联合召开手榴弹工作会议。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主任张爱萍在会上明确了手榴弹发展的方向是“外形为卵形、破片小型化”。这一阶段,新材料的开发应用,冲压技术和精密铸造工艺的应用,加工机械化和热处理、焊接等新技术的应用都得到加强。1964年,研制成功64式7.62毫米手枪和枪弹。它体积小、重量比54式手枪轻29%。同年还研制出64式微声手

枪和子弹。在研制新型轻武器的同时,有关部门还非常重视对列装武器的改进工作,改进成功56—1冲锋枪、56·1轻机枪等一批改进型武器,改进后的武器重量有所减轻,性能有所提高,装备部队后普遍受到好评。早在50年代,北京工业学院和军械科学技术研究所的专家就提出以减轻重量为主,将轻、重机枪合一的设想。1967年,他们与工厂合作,研制成功67式7.62毫米两用机枪。它比53式重机枪轻40%,并从设计上解决了原机枪子弹人膛易掉头的问题。这种机枪70年代初期投入批量生产、装备部队。

系列配套研究阶段(70~80年代) 早在60年代,以美国、苏联为代表的两大军事阵营就开始研制小口径班用枪械。北大西洋条约组织最终选定了5.56毫米口径,苏联采用了5.45毫米口径。在选择口径方面,中国科研人员没有盲目地跟随国外潮流,而是从战斗需求出发,走自己的路。1971年1月,总后勤部和第五机械工业部在北京联合召开轻武器科研工作会,会议决定组织七大军区和所在地区的枪、弹厂以及有关院校、科研部门开展小口径步枪和枪弹的开发研制工作。经过几年的努力,共研制出七种枪弹,十种枪。经过两次选型,1977年选出了5.8毫米口径。后经中国著名轻武器专家程尔康教授等科研人员论证,中央军委正式将5.8毫米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未来待研步枪和机枪的口径。此口径的确立,标志着中国轻武器研究水平已经接近世界先进行列。5.8毫米枪弹同5.56毫米、5.45毫米枪弹相比,优势明显:既保留了小口径枪弹重量轻、精度好的特点,又满足了通用机枪的使用要求,实现了步枪、机枪枪弹的统一,由于口径稍大,弹头穿透力和杀伤力也大于国外枪弹。1975年,为加强轻武器论证工作,经中央军委批准,总后勤部成立了轻武器论证研究所,专

门从事轻武器的发展方向、重点和战术技术指标论证工作,轻武器研究开始逐步走向正规化发展轨道。1977年,77式12.7毫米大口径机枪问世。它设计新颖,结构紧凑,性能优良,重量比54式轻40%。列装后,使人民解放军大口径机枪装备接近了世界先进水平。同年,还研制成功77式7.62毫米手枪,该枪小巧、美观、轻便,突出特点是可以单手装填,得到广大官兵的好评。1979年,为满足特种部队的需要,研制出人民解放军第一代特种单兵战斗武器——79式7.62毫米轻型冲锋枪。它轻便灵活,火力较强,最初主要装备侦察兵,后来大量装备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公安部队。手榴弹方面,1977年,定型四种77式手榴弹,手榴弹开始从长柄到短柄和无柄,从非预制破片到有预制破片,从大破片到小破片的转变。

1978年,轻武器论证研究所提出步枪和班用机枪成族,走通用化、枪族化的道路,得到许多研制单位的赞同。总后勤部、第五机械工业部联合组织了四个研制小组分别开展研制工作。1981年,以某厂设计的锥形枪被选中,被命名为81式7.62毫米枪族,1985年开始批量生产装备部队。81式枪族是人民解放军第一代班用轻武器族,武器精度高,可靠性好,结构紧凑,重量轻;步枪、机枪使用同一种枪弹,主要活动部件和供弹具可以互换,便于训练、生产以及后勤保障,是中国轻武器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1982年,82—1型拉发火无柄手榴弹和82—2、82—3针刺发火无柄手榴弹相继设计定型。这些手榴弹重仅260克,有效破片数比63式手榴弹增加三倍。此外,发烟手榴弹、燃烧手榴弹、反坦克手榴弹也先后定型试用,人民解放军手榴弹向品种全、重量轻、威力大的方向迈出了可喜的一步。1985年,又研制出85式12.7毫米高射机枪,枪重只有40千

克,是54式高射机枪的四分之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同年,第二代轻型冲锋枪和微声冲锋枪诞生。这两种枪结构简单,轻便灵活,携带方便,活动部件可以互换使用。

深入发展研究阶段(90年代) 这期间,轻武器研究硕果累累,以5.8毫米枪械系列为代表的一大批新型轻武器定型列装,人民解放军轻武器又进行一次全面更新换代。

于80年代开始的,以5.8毫米枪械系列、新型12.7毫米重机枪、35毫米自动榴弹发射器为代表的新一代轻武器研制,经过协作攻关,5.8毫米枪械系列于90年代初期陆续定型。系列中包括步枪、短步枪、轻机枪、狙击步枪、通用机枪五种枪械。五种枪械采用同一口径,在世界上属于首创。步枪和轻机枪同一枪族,大部分活动部件可以互换使用。步枪、轻机枪、狙击步枪都采用“无托”结构(将常规步枪的自动机构、供弹机构置于枪托内),弹匣、枪托等采用塑料件,枪长大幅度缩短,重量大幅度减轻,各种武器都是世界上同类武器中最短、最轻的。步枪、轻机枪都配有白光瞄准镜和微光夜视镜,能满足全天候战斗需要。步枪可以下挂35毫米榴弹发射器,发射国产各种防暴榴弹。

89式12.7毫米重机枪的研制于1995年定型。它以创新的结构设计和轻材料的大量使用,使武器系统重量大幅度减轻,比85式减轻了27%,是世界上最轻的大口径机枪,配有白光和夜视瞄准镜,发射12.7毫米钨芯脱壳穿甲弹,能够有效打击现有薄装甲目标和低空目标。

1995年定型的87式35毫米自动榴弹发射器,不仅填补了人民解放军此类武器的空白,而且总体技术水平很高。该发射器有轻型和重型两种,轻型发射器全重12千克,用于打击600米内目标,必要时装在三脚架上可以作为重型发射器打击1800米内外的有

生目标。重型状态发射器重20千克,比美国40毫米MK19-3型轻70%,比苏联30毫米AGS-17型轻35%。武器由七大部件组成,野战分解只需十几秒钟。配有机械和光学瞄准具,发射杀伤弹或破甲弹。

1997年,经中央军委批准,新一代轻武器首先装备了驻香港部队,标志着人民解放军在轻武器装备方面进入了世界先进行列。

在此期间,还研制定型了F89A单兵多用途火箭、89式50毫米弹射器、警用35毫米枪挂榴弹发射器等。新研制的40毫米枪榴弹系列,包括破甲、杀伤、定时杀伤、燃烧、发烟等种类,可以用实弹发射,适合不同作战条件下使用。35毫米防暴弹药包括催泪、爆震、染色、闪光等弹种,为防暴行动提供了多项选择。

发展趋势 21世纪的轻武器,将是新型高性能轻武器。包括单兵战斗武器、单兵自卫武器、班组支援武器三大类,突出特点是部分武器将发射爆炸弹药。特别是单兵战斗武器,既能发射枪弹又可以发射爆炸榴弹,配有小型火控系统,具有快速精确打击能力,是轻武器发展的又一重要里程碑。中国轻武器科研人员非常关注国外轻武器的发展,同时积极寻求中国21世纪轻武器的发展之路,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的轻武器事业会再创辉煌。

(新 卫)

装甲兵技术研究

(research of armored corps technology)

探讨装甲兵武器装备发展、使用、维修、训练等技术的活动。装甲兵武器装备主要有履带式 and 轮式两类。按照作战使用可分为坦克、步兵战车、装甲输送车、装甲侦察车、装甲指挥车等装甲战斗车辆,以及坦克架桥车、装甲救护车、战斗工程车等装甲保障车辆。装甲兵武器装备发展研究包括论证、研制与试验

研究;使用和维修技术研究包括武器装备的动用、运输、保管、维修、抢救等方面的应用技术研究;训练技术研究主要包括训练模拟器材的研制和使用,以及采用现代技术手段完成训练任务的技术研究。

装甲车辆最早出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期,至20世纪末,各国的坦克共发展了三代,装甲车辆已形成具有地面突击、战斗保障、技术后勤保障功能的庞大车族。随着装甲车辆的发展,与之配套的使用与维修技术、训练技术也逐渐形成体系,成为装甲部队战斗力不可分割的要素。

研究概况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装甲兵技术研究,可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仿制生产到自行研制发展阶段(50~60年代) 50年代以前,中国没有装甲车辆制造业,装甲兵技术主要反映在装备的使用、维修、管理和乘员操作技能训练等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50年代后期,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部队相继装备了缴获的日制、美制装甲车辆700多辆,以及从苏联购买的T-34中型坦克和CY-76自行火炮等2000余辆,并在实践中积累了坦克的使用和维修经验,培养了技术骨干。

1956年,中国开始兴建坦克制造厂。1959年生产出第一批仿制苏T-54A的59式中型坦克。为解决镍铬合金资源缺乏的困境,中国自行研制出无镍稀土601、603装甲钢、701稀土炮钢和7—200均质靶板钢等新型材料,打破了国际封锁,使装甲车辆的原材料能立足于国内进行生产。1960年1月,装甲兵装备技术研究机构开始承担59式中型坦克的试验任务,内容包括战术技术性能测试、人机环境性能测试、使用维修性能检测和坦克的使用寿命、地区适应性考核,以及武器系统、动力装置和新钢种性能等专项试验。试验工作历时两年多,在国内不同地区行驶试

验9000千米,取得了大量数据,在试验理论研究、测试手段建设方面获得了丰硕成果。

根据国家《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制定的自行发展坦克,减轻其重量、改善其越野性能的目标和要求,在国家科委军事第五组(坦克专业组)领导下,论证确立了中国装甲车辆“南轻北重”的发展方针,于1958年开始研制中国的第一代轻型坦克、水陆坦克和履带式装甲输送车。1962年底和1963年初,这三种装甲车辆设计定型并开始装备部队,标志着中国装甲车辆的研制技术走上了自力更生的道路。59式中型坦克、62式轻型坦克、63式水陆坦克和63式履带装甲输送车构成了中国第一代装甲车辆的基型车系列。在这四种基型车及改进型的底盘基础上,还发展了多种变型车辆,主要有:中型坦克和水陆坦克底盘的坦克抢救车、水陆装甲输送车,轻型坦克底盘的军用推土机,履带式装甲输送车底盘的装甲指挥车、装甲通信车、装甲救护车等。

配合生产到深入研究提高阶段(70~90年代) 70年代以来,中国装甲车辆技术迅速发展。相继研制定型了69式、79式和80式/88系列主战坦克,86式履带步兵战车、89式/90式履带装甲输送车,92式/92A式和93式轮式装甲输送车。以79式坦克底盘为基型,发展了84式坦克架桥车、84式坦克抢救车和88式双37自行高射炮;以89式/90式履带装甲输送车为基型,发展了装甲侦察车、装甲抢修车、装甲补给车等。其中,88式系列主战坦克的改进型85-II AP式,战斗全重41吨,乘员三人。火力系统采用一门配有自动装弹机的125毫米口径滑膛炮和稳像式火控系统。动力装置为一台570千瓦的涡轮增压水冷柴油机,最大速度57千米/小时。防护系统采用了复合结构装甲,并可挂装反应式装甲,加之配有三防装置、自动灭

火抑爆装置、抛射式烟幕装置等,使得该坦克具有良好的综合防护性能。此种坦克属中国第三代的过渡型产品,但其火力性能已相当国际第三代水平。1986年,中国开始研制第三代主战坦克。虽然起步比美、苏、德等国晚了十余年,但是研制的起点高,广泛采用新技术,瞄准世界坦克发展的某些先期技术进行重点突破,使坦克的综合性能达到国际现役坦克的先进水平。

研究成果 装甲兵技术研究成果有:

装备论证研究 装甲兵武器装备论证,可分为发展方向重点论证、体制系列论证、规划计划论证和武器型号论证。装甲兵武器装备论证工作,从1956年首次制定装甲车辆12年发展规划算起,已有40多年的历史,进行的各类论证有300余项。80年代以前,装甲兵武器装备论证多以定性分析为主,同时辅以概念样机、样车试验论证等方法。80年代以来,随着决策科学的发展和推广应用,逐步形成了较为规范的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论证模式。在定量分析中,综合运用军事系统工程、军事运筹学及价值工程、人机工程和多目标决策理论等,对装甲车辆的发展规划和型号的战术技术指标论证进行量化处理,以求得最佳方案。在预测和决策分析过程中,较多地采用德尔斐法、层次分析法和单车对抗计算机模拟、坦克(装甲步兵)分队或师、旅规模的攻防战斗计算机作战模拟等手段,在效能费用分析的基础上,研究论证了装甲兵武器装备发展和技术领域的大量问题。1991年,装甲兵装备技术研究所研究人员依据长期的理论研究和论证工作实践成果,撰写出约360万字的《装甲兵武器装备论证手册》,系统、全面地介绍了装甲兵武器装备论证工作的方法、数据、文献资料,并对论证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基本原则、基本特点进行了分析和论述,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

的装甲兵武器装备论证工作著作。

试验场建设 根据中国国防科研任务的分工,装甲兵装备技术研究机构承担新型装甲车辆的设计、定型试验任务和其他重要的科研试验任务,建设了亚洲规模最大的装甲车辆试验场,建有测试各型履带车辆、轮胎车辆性能和强化考核试验的混凝土直线跑道、环形测功跑道、起伏土路环形跑道、河滩砂(卵)石路面环形跑道、特形路面场地、专用转向试验场地,各种人工障碍、标准直坡、潜渡水池等;在中国东北寒区,建有对装甲车辆进行严寒条件下考核的各种试验跑道和射击靶场,该地区冬季最低气温可达-45℃,是理想的天然低温试验场所;在中国南方炎热地区和西北高原地区,还设有水网稻田地、海滩地、戈壁沙漠地等试验场所,能对各型装甲车辆进行特殊环境条件下的性能试验、环境适应性试验和可靠性试验。上述试验场所拥有各种测试仪器设备,如装甲车辆运动学和动力学参数测试,工况参数采集,振动、噪声测试,路面谱测试,电子信息参数和电磁参数测试等仪器,以及其他自动数据采集与处理设备。对装甲兵武器装备进行试验时,严格按照国家军用标准——装甲车辆试验规程进行,从1959年首次进行59式中型坦克生产考核试验起到20世纪末,先后进行了60余种车辆的定型试验,试验里程累计达到100万千米。

训练场地建设 装甲兵武器装备的类型多、技术复杂,对训练器材和训练场地的依赖性大。训练器材研制技术和训练场地建设的水平,是装甲兵技术完善的一个重要标志。50年代,中国依靠进口和仿制苏军器材,建立起一批专业训练场地。60年代以后,主要依靠自身力量进行配套建设,逐步完善、加强训练场地的综合利用。80年代以来,开始运用现代技术的最新成果,大力发展激光模

拟电化教学器材,建立完善综合训练场地和训练中心,使训练器材和训练场地向着模拟化、系列化、自动化、综合化方向发展。40多年来,装甲兵先后研制、生产各种制式训练器材万余件(台),建设各种训练场地近400处。1979年,研制出第一台点光源初级驾驶模拟器,之后,又陆续研制出100毫米坦克炮激光射击模拟器等一些初级机电型模拟器材。1984年以后,装甲兵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大力发展训练模拟器材的决定,制定了分期发展规划,研制出包括坦克射击、驾驶、通信、战术、修理等门类比较齐全,初、中、高级配套的训练模拟器材。主要有:59式中型坦克、63式履带装甲输送车激光交战模拟器,TJM—1/TJM—2坦克射击模拟器,JMG—1坦克高级驾驶模拟器,TSM—2坦克射击模拟器,JM—1坦克通信模拟系统,JWM—1坦克稳定器操作模拟器,坦克团战术训练模拟系统等。JMG系列高级坦克驾驶模拟器和TJM系列坦克射击模拟器已向国外出口。1998年,装甲兵模拟训练中心建成,标志着装甲兵模拟训练水平又前进了一步。装甲兵训练模拟器材的迅速发展,促进了训练手段的变革,缓解了训练场地和经费不足困难,有效提高了训练质量和效益。

使用与维修技术研究 装甲兵武器装备的使用与维修,在平时是部队顺利完成训练任务的保证,战时则是部队获得持续作战能力的重要措施,其内容既包括组织管理工作,还包括装甲车辆的动用、保管、保养与修理等各种技术手段。1951年,装甲兵颁发了《摩托化装甲兵车场勤务与车辆使用条例(草案)》。此后,又先后三次修改、颁发了《装甲兵技术工作条令》,并在使用与维修理论研究不断深化的基础上,制定出《关于装甲兵技术工作几项制度的改革意见》、《坦克装甲车辆管理科学化、制度化、经常化标

准》、《延长坦克装甲车辆摩托小时的规定》、《装甲兵修理部(分)队业务管理制度》、《装甲兵器器材仓库业务管理制度》、《关于稳定器使用管理的试行规定》、《关于坦克大修车辆交接规定》、《坦克战备器材管理试行办法》等,使装甲兵技术工作的各项法规日趋完善。80年代以前,装甲兵一直实行预防为主的定期维修制度。采用这种维修制度,维修时机容易掌握,计划管理工作简便。但是,定期维修不能充分发挥机件的潜力和完全防止随机性故障的产生,有时由于机件的多次定期分解,反而易造成新的故障。80年代初,装甲兵借鉴欧美国家的先进经验,开展了以可靠性为中心的维修理论研究,并以第一代装甲车辆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大规模的维修制度改革试验,同时伴随进行保养机械化和零部件强化与修理工艺的改革研究。维修制度改革试验历经三年多时间,共动用170余辆装甲车辆,行驶试验里程达30余万千米,发射炮弹2500余发,收集到数以百万计的数据,摸清了这些车辆的可靠性、维修性及可用性水平,为确定其维修方式、维修间隔期和维修范围提供了科学依据,并为以后装甲兵武器装备的可靠性、维修性、保障性理论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至此,装甲兵开始试行定期维修、视情维修和状态监控相结合的预防维修制度。根据此次维修改革试验的成果,科研人员编著了《坦克管理学》、《坦克维修管理概论》、《维修名词术语》、《故障评定标准》及多种教材,发表了《59式坦克发动机延长使用周期分析》、《59式坦克的可靠性与维修性分析》等学术论文100余篇。进入90年代后,中国武器装备维修理论研究日趋成熟,相继颁布了国家军用标准,对于装甲兵技术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发展趋势 进入21世纪,随着反装甲车辆武器的发展和作战形态的变化,装甲兵武

器装备将朝着功能齐全,结构合理,更加自动化、智能化,具有更强作战能力的方向发展。信息技术及新材料、新能源技术的发展应用,将为装甲兵技术提供新的发展潜力。此外,军事系统工程理论的发展,专家系统,计算机模拟仿真技术和计算机辅助论证、设计技术的发展,将使装甲兵武器装备的研制、使用、维修和装甲兵的训练更加科学合理。随着各种科学技术的进步,中国的装甲兵技术研究将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李蕴学)

防核、化学、生物武器技术研究

(research of NBC defense technology)

探讨避免和减轻核、化学、生物武器毁伤的军事技术的活动。简称三防技术研究。按照三防技术体系所承担的任务分类,可分为发现报警技术、侦察监测技术、防护技术、洗消技术和医疗救治技术研究等。

三防技术研究是在与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斗争中逐渐发展起来的。首先开展的是防化学武器技术研究,其次是防核武器技术和防生物武器技术研究。

中国的防核、化学、生物武器技术研究,经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与建立后两个历史阶段。

民国时期的三防技术研究 20世纪30年代初,一些爱国科学家自发地进行了活性炭的研制和毒剂侦检方法的研究。1933年,中国政府决定建立防毒面具工厂,并在两年后开始生产防毒面具。抗日战争期间,针对日军多次使用化学武器,中国军民研究了多种防护技术,并取得一定效果。但由于三防技术研究的基础薄弱,技术落后,到国民党政府垮台前夕,研究工作基本停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三防技术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防技术研究起步于50

年代初,大体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仿制研制阶段(50年代) 1951年2月,美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开始使用化学武器,中、朝军民面临化学武器的直接威胁,迫切需要化学防护装备,全军相继组建的防化兵分队也急需解决装备问题。于是,中国防化科学技术研究在创建化学兵学校的基础上开始起步。首先是人才培养。中国人民解放军化学兵学校先后选送150多人到全国多所高等院校借读进修,培养专业技术骨干。1952年8月,化学兵学校开始筹建化学防护研究室。1953年1月,化学防护研究室正式成立,不久就研制出能侦检七种毒剂的“石鹰”1号侦毒器和数百套毒剂嗅样盒,装备到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1953年8月以后,中国开始引进苏联的防化装备,首先采用引进苏联的侦毒器资料,完成了“石鹰”2号侦毒器的设计研制,其性能较“石鹰”1号明显提高,还设计研制了适合中国特点的便携式野战化验箱。1954年10月,在化学防护研究室的基础上组建化学防护研究所。该所陆续研制生产了野战化验箱、侦毒器、个人消毒包等化学防护器材装备部队,并研究掌握了多种毒剂、药剂的分析化验方法,初步解决了对防毒面具及皮肤防护器材性能和质量的检验方法,完成了个人剂量仪、辐射仪、乙丙种射线探测仪等核防护器材的初样设计与试制。从1954年开始,有关工厂仿制苏式三防装备,有防毒衣、防毒靴、手套、斗篷、气象观测仪、侦毒器、野战化验箱、射线探测仪、服装消毒车、地面消毒器、背囊式洗消器、个人消毒包、毒剂嗅样盒等20余种,共10万多件,通过对苏式装备的研究和生产,使中国三防技术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5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三防技术研究得到较快发展。1956年6月,防原子、防化学、防细菌科学技术作为重要的分支,列入国家计划委

员会、中国科学院等共同研究制定的中国《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简称《十二年科技规划》),为三防科技研究的发展开辟了道路。1957年开始,与苏联签定了引进36种技术资料的协议,利用苏方援助,培养三防科技人才,聘请苏联专家指导防化科研工作,选派数批研究生赴苏联进修深造。1958年,中央军事委员会有关部门根据国家统一颁发的《十二年科技规划》研究制定了《防化学科学技术十年规划》。1959年9月,总参谋部会同国防科委、国务院有关部委及中国科学院,组织召开了全国防化科学技术协作会议,就调动全国力量发展防化科学技术,培养专业人才商定了一些重要措施,强调军内外力量联合攻关,尽快摘掉防化科技装备落后的帽子,努力赶上国际先进水平。这次会议以后,防化科研协作在全国范围内有了很大发展,同时,群众性技术革新活动也在全军蓬勃开展起来。

自行研制阶段(60年代~70年代中期)
60年代初,苏联突然撤走防化专家,虽然给中国防化科技研究造成一定困难,但却激励和促进了中国的防化科研更快地走上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尽快建立起独立自主的科技发展体系。1962年2月,防化学兵科学技术研究院正式成立。随后,各大军区相继组建防化技术室,基本形成了上下配套、各司其职的三防科技研究体系,并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在配合尖端技术研究和保障方面,完成了对导弹燃料在使用、储运过程中的侦察、化验、防护、消毒技术的研究,保证了中国导弹研制工作的顺利进行。这项科研成果荣获国务院1963年颁发的一等奖。同时,承担并完成了核试验辐射安全防护保障及部分技术测试任务,研制并小批量生产了包括空气取样、辐射测量、效应试验及安全防护等20多种仪器和器材,在中国首次核试验时使用效果良好。在

追踪外军化学武器研究方面,初步掌握了外军主要装备毒剂的使用特点及传播规律,证实了外军新型毒剂的化学结构和主要性质,为侦、防、消技术研究提供了主要依据和基本条件。在研制新型防毒面具方面,依据中国人头面型和中国气候条件,完成了头戴式通话防毒面具的设计定型,还研制成功不带导气管的轻便防毒面具。防化学兵科学技术研究院副研究员高方大胆创新,发展了新的防毒时间计算方程,并成功运用于滤毒罐的设计及推算现有面具对火箭推进剂蒸气的防护能力。这一理论研究成果的应用,减少了大量试验工作,到80年代仍在国内设计防毒元器件中沿用,类似计算理论,国际上到70、80年代才有公开报道。上述科研成果,标志着中国三防科技研究在主要方面已明显缩小了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已能独立自主地研制、发展较先进的三防装备。

6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核防护技术研究异军突起。历次核试验为核防护技术的研究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国防化兵在完成核试验现场及其下风地区核辐射监测及防护保障任务的同时,还多次进行核防护技术、战术效应试验,探索评估核武器的毁伤效应,核爆炸放射性沾染的分布特点及其变化规律,人员、武器装备、服装等遭受放射性沾染的特点及其消除方法,人员在沾染区停留或通过时所受照射剂量的影响因素和计算方法等。同时,还进行了核条件下核防护技术装备的野战生存能力和使用性能试验,在研究技术装备的现场评价和科研攻关,以及核条件下的防化保障行动、军队核防护行动和组织指挥等的研究,获得大量数据和资料,取得一系列重要科研成果。相继建立了“核观测”和“核估算”研究专业,核防护仪器很快向晶体管、集成化、多功能方向发展,并填补了一些空白。相继研制成功兼有测量 γ

照射量率和放射性活度两种功能的新型辐射仪、工事用 γ 射线报警器、以车载式 γ 辐射仪为主要专用设备的防化侦察车及射线指示仪等新型核防护装备。化学防护技术研究也有较大发展,先后研制成功含磷毒剂报警器、新型洗消车、新式轻型防毒面具及特种防毒面具等。

繁荣发展阶段(70年代后期~90年代)从70年代后期起,中国三防技术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77年,全军防化科技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总结了20多年来防化科技工作的经验,展示防化科研成果121项。大会讨论了《1978~1985年防化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化学防护和群众性防护装备被列为发展重点。在此基础上,1980年1月制定了国民经济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防化科技发展规划。尔后,通过狠抓高层次科技专业队伍建设,更新实验手段,推进科研改革,开拓国际交流渠道,扩大科研协作等措施,使防化科技研究出现新的面貌。到1985年,顺利实现第六个五年计划规划,部队防化技术部门取得技术革新成果100多项,主要科研单位取得科研成果277项,其中六项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五项获国家科技成果奖,35项获全军科技成果奖,并推广应用了160多项。个人防护、毒剂侦检、核爆炸观测与监测及洗消领域,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有的项目已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在此期间,研制成功的七种合成军队群防装备中,透气式散热防毒衣、直读式双量程辐射剂量仪、毒剂蒸气侦毒包和液滴毒剂侦毒纸,达到或接近先进国家技术水平。通过对一些国家化学武器的追踪研究,进一步探索了现代化学武器的性能、使用特点及防护要求,促进了侦察、化验装备的研制;工事用毒剂报警器和监测器材的研制成功,填补了工程防化设施的空白;配有先进分析技术装备的防

化化验机构,提高了对未知毒剂、毒物的分析鉴别能力;核爆炸自动测量仪器采用光、电磁脉冲复合开机等改进措施,提高了可靠性;采用电脑技术的防化参谋作业工具,提高了核估算的速度和质量。生物防护技术研究,对生物战剂的采样、检验、免疫预防、大面积消毒杀虫等技术的研究,相继研制成功微生物采样箱、气溶胶侦察仪、生物战剂检验车、消毒杀虫车等专用装备。进入90年代,中国三防科学技术研究瞄准世界先进水平,积极开展对微电子、遥测遥感、计算机、生物工程、现代光谱等技术的应用基础研究,开展对关键性装备项目的预先研究,为实现长远战略目标打下基础。同时,加强了对核武器核查技术,化学武器核查与销毁技术,核事故、化学事故应急救援技术等的研究,并在数次化学武器核查国际联试活动中,中国均取得名列前茅的成绩。

发展趋势 预期21世纪初,中国三防技术研究将有一个大的发展,各种高技术手段将被不断引进应用研究,使三防装备的质量、品种将有较大发展。如:利用监测、遥测、遥控和机动侦察等先进技术,构成空地一体化的野战防化侦察系统,与合成军队自动化指挥系统相结合,将在短时间内获得广大地域核化袭击及其后果的信息,提高军队在核化条件下的作战指挥保障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大型多功能的快速洗消装备,将使军队的洗消保障能力成倍增加;各军种、兵种的专用三防装备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配套完善;基因工程等新技术的应用,将为生物战剂检验、免疫预防等开辟新的领域。三防技术研究与各项相关民用科技的研究将更加紧密结合,在民防、环境保护、劳动保护、卫生防疫及核事故、化学事故应急救援等多种领域,得到更加广泛的发展。

(李运宝 何新中)

军事化学防护研究

(research of military chemical defense)

探讨不同条件下,使用化学武器所造成的化学毒剂和染毒物质的毒害作用及其防护措施的活动。主要包括:化学武器防护装备的设计、研制;化学毒剂防护工事的研究;染毒区化学毒剂的种类、染毒浓度、毒害剂量、染毒范围的侦检、分析,化学毒剂在大气中扩散的态势、规律;被化学毒剂污染的空气、水体、物体的清洁、消毒;受污染化学毒剂人群的防护措施;防化学武器袭击国防普及教育的组织实施等的研究。

在战争或军事行动中使用有毒物质,古已有之。但是在军事行动中大规模使用有毒化学物质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化学毒剂在战争中的大规模使用,军事化学防护研究也应运而生,并得到较快发展。20世纪初,中国化学工业不发达。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尽管对化学武器的使用及其危害已有所了解,但却没有引起高度重视并加强对军用化学毒剂及化学武器防护的研究。抗日战争中,日军在中国战场上频频使用化学武器,数以万计中国军民惨遭杀害,中国开始了军事化学防护研究。国民党统治区和抗日根据地,都出版了一些介绍化学武器种类、毒理作用、侦检和防护技术的著作,国民党政府军政部工兵署设防毒组织和人员,建立防毒总队,国民党统治区各军事院校及庐山训练团等也开始讲授有关知识,培养一些专门人才。八路军曾在抗日军政大学设立化学队,举办防毒训练班,培训防化骨干,组织指导部队进行防毒教育,采取简易办法进行化学毒剂防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1950年12月成立化学兵学校,1956年1月1日,成立了防化兵部,并大力开展军事化学防护研究与人才培养。60年代开始,防化兵加快军事化

学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的研究及防化装备的开发研制。首先开展追踪外军化学武器的研究工作,加强对化学毒剂毒性与化学结构关系和作用机制的研究,重点是对60年代以来外军发展的神经性毒剂的新类型进行跟踪研究并证实其化学结构,了解其主要性质,取得了一定成果。通过实验室研究与模拟试验,初步掌握了中国特定地区的天候、地形条件下外军主要装备毒剂在大气中的扩散传播规律,为加强化学毒剂侦检分析及其防护与消毒等研究,提供了依据。1964年,高方等研制成Ⅱ—催化炭,并将以当时苏联在国际上的权威吸附理论为基础的杜比宁(Dubin)吸附方程和美国克劳兹(Klotz)吸附方程相结合,研究提出了新的防毒时间计算方程,成功地用于滤毒罐设计和防毒面具对火箭有毒推进剂蒸气的防护能力的推算,获得了国家发明奖。

1978年以后,防化研究院、防化指挥工程学院大力开展军事化学基础理论的应用研究,建立了拥有核磁共振、色谱/质谱联用、色谱/傅立叶红外光谱联用、高效液相色谱等近代分析仪器的分析实验室,研究了各种化学毒剂及其相关物质的波谱特性,建立了数据库,提高了对未知化学毒剂的鉴定能力。随后发展为研究各种染毒样品的分析,建立了可靠的萃取、富集与衍生方法,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已建立的数据库。1985年,高方等采用特殊工艺,研制成功透气散热防毒服,达到当时国际先进水平。荷兰的国防研究所和美国科斯洛公司为其做了鉴定试验,给予高度评价。1990年起,防化研究院、防化指挥工程学院分析实验室连续四次参加了国际裁军委员会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技术秘书处组织的,有美国、苏联、英国、法国等十余个国家的实验室参加的“国际实验室间化学裁军核查比较测试”(International Interlaboratory Com-

parison Test for the Verification of Chemical Disarmament), 以及尔后由“禁止化学武器组织”(OPCW)技术秘书处组织的五次水平考核,均名列前茅。该实验室于1998年被OPCW指定为“国际核查实验室”,达到20世纪末国际先进水平。

21世纪,对新类型军用毒剂——化学生物战剂和非致死性化学物质的研究及其防护将是军事化学防护研究的重要方面;新催化剂的研制与纳米技术的利用,为创造新的防护与消毒材料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侦检分析技术与微电子技术及计算机技术的结合,将推动传感器在新毒剂的监测和报警方面的研究和应用,使化学防护的各种信息准确、及时地进入指挥自动化系统。

(钟五征)

军用电子技术研究

(research of military electronic technology)

探讨电子理论与技术在军事领域应用的活动。军用电子技术研究范围十分广泛,几乎涉及电子学的全部分支和领域,其应用范围也遍及军事活动的各个方面,是当前发展速度最快、应用面最广、交叉性和渗透性最强的研究领域之一。

军用电子技术在中国的发展始于1877年,当时国内开始建立第一条军用有线电报线路。到了20世纪初,中国军队已开始使用有线电话和无线电通信。然而,军用电子技术在中国真正发展起来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并且是国防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与军用电子装备的发展历程相对应,军用电子技术研究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学习国外、全面仿制阶段 中国的军用电子工业是从仿制苏联产品开始的。20世纪50年代,主要以电子管为基础,仿制生产了

中国第一代军用通信、雷达、导航、指挥仪装备及通用计算机。如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设计生产的各种电台、坑道通信设备、防空警戒雷达、炮瞄雷达、无线电罗盘等。通过仿制,掌握了比较先进的工艺技术和研究方法,并具备了一定的改进提高能力,使军用电子工业一开始,就有了起点较高的技术基础。1952年和1955年,分别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和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培养军用电子专业技术人才。与此同时,在其他各大综合性理工科高等院校中也相应设立了电子技术专业。1956年,国家制定《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将半导体、电子计算机等列为发展的重点,先后组建了通信、雷达、计算机、元器件、电子仪器等十个专业研究所,形成了中国第一批军用电子技术专业研究队伍。

单机研制、单项应用阶段 从60年代开始,中国军用电子技术的发展逐渐从仿制走向自主发展的道路,在有些新的技术领域,如军用光电子技术等,几乎与世界同步启动,研究队伍也不断壮大;通信、雷达、导航、测控、电子对抗、遥感、计算机、光电子、微电子、电子元器件等各种军用电子技术门类日趋齐全;发展速度大大加快,先后发展中远程引导雷达、中高空警戒雷达、短波大功率单边带电台、无线电数字通信系统、卫星通信系统、战术通信电台、光电经纬仪、电子对抗设备、电子计算机以及靶场测控等一批电子装备。这一阶段的“三抓”任务,即洲际导弹、潜地导弹、通信卫星的研制和试验,对军用电子技术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这一时期,军用电子技术发展的主要特征是:整机装备普遍采用了晶体管和半导体分立元件,70年代末开始使用小规模集成电路;雷达、通信、电子对抗等频谱技术向光波段技术扩展;各种技术性能与特点主要

靠模拟体制实现；各种装备以单机研制、单项应用为主，以填补国内空白、解决有无为主要目的；自动化程度比较低。

系统研制、综合开发应用阶段 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七个“五年计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期间，军用电子技术研究从过去的注重单机研制向成网、成系统研制和综合开发的方向发展，强调系统内各单项技术的综合运用，新体制、新技术也大量应用。这一时期军用电子技术发展的主要特征是：主要军事应用领域的频谱进一步扩展，基本覆盖了从米波到紫外波的各个频段；微电子、光电子、微波电真空器件等关键元器件的发展受到高度重视；中、大规模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专用集成电路、计算机控制芯片以及固态功率器件的普遍运用，使整机系统的体积和重量大大减小，系统的质量、可靠性和自动化程度大大提高；全数字或数模混合的技术体制成为实现大多数装备先进性能的关键；计算机辅助设计、制造、测试、决策等技术成为研究军用电子技术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标准化、模块化、系列化、通用化等系统工程的设计思想逐渐成为主流。特别是进入90年代，由于电子战、信息战在现代战争中所显现的巨大威力，使军用电子信息技术成为现代军用电子技术的代名词，同时也成为军用电子技术研究的主要内容。这一阶段，先后发展了以合成集团军野战电子系统、国土防空雷达系列装备、自动化作战指挥系统、战略战术通信系统、敌我识别系统、情报侦察系统，以及电子对抗系统为代表的一大批重要装备。此外，银河—Ⅰ亿次巨型计算机、银河—Ⅱ十亿次通用巨型计算机、银河—Ⅲ百亿次大规模并行计算机和银河—Ⅳ千亿次超级并行计算机，分别于1983、1992、1997和2000年研制成功，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这期间，国家在全面实施国防科研计划的基础上，于1986

年开始在“863”高科技计划中加强了智能计算机、先进通信、信息获取与处理、强激光、智能机器人、计算机集成制造以及空间对地观测等技术的研究，这对军用电子技术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体系发展、一体化集成阶段 随着微电子技术的巨大进步及全球电子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中国的军用电子技术从90年代中期开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其突出特征是：微电子化、数字化、自动化和综合化，在各专业技术不断发展的同时，强调它们之间的系统集成，强调全系统综合效能的提高。军用电子装备的体积更小，重量更轻，性能更先进，功能更完善，可靠性更高，反应更快，集成度更高，相同功能模块的成本更低。电子技术在其他武器平台中的应用也成倍增长。军用电子技术的研究领域进一步延伸与拓展，专业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相互交叉、相互支撑的领域越来越普遍，信息战、软件无线电、虚拟现实、孤立子、光量子等一批新概念的提出，以及决策论、控制论、信号处理、信息融合、建模与仿真和软件工程化等一系列基础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新技术、新方法的广泛应用，使军用电子技术的发展又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展望 由于军用电子信息技术已经使传统的军事对抗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电子信息装备在战争中的作用也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争夺信息优势已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军用电子技术的发展必然要适应新的战争需要，对电磁频谱的高效利用，发展新一代综合化、一体化、智能化的信息装备，使武器系统信息化和信息系统武器化，将是军用电子技术研究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郑积源编著，《科学技术简史》，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1989。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编:《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

(黄乔华)

军用电子计算机研究 (research of military electronic computer)

探讨电子计算机在军事领域应用的理论和方法的活动。主要内容包括对专门为军事应用而设计制造的计算机,以民用计算机为基础进行加固后用于军事目的的计算机,民用计算机在配以适当部件和应用软件为军事服务的计算机等的研究。

世界上第一台模拟电子计算机出现于20世纪40年代,用于防空武器的火力控制计算。60年代,模拟计算机有了较大发展,70年代其发展则远远落后于数字计算机。第一台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于1946年2月在美国问世,50年代后期晶体管计算机取代了电子管计算机(即第二代计算机),60年代中期出现中、小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即第三代计算机),70年代微型电子计算机问世,计算机应用从此更为普及,军用嵌入式计算机迅速增多,同时,以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应用为标志的第四代计算机技术也日趋完善,巨型计算机的研制取得重大进展,计算机网络技术及数据库技术进一步广泛应用。80年代以来,计算机向微型化、高性能、低成本方向迅速发展,其应用空前普及,在运算能力、智能程序和智能化输入、输出等技术方面不断取得新的突破。

研究概况 中国军用计算机研究于50年代末开始起步,并在国家军事科研和重大工程的推动下逐步发展起来。中国在1956年制订了《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把电子计算机技术列为国家重点项目之一。1958年,为满足当时国防尖端武器研究的需要,中

国研制成功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在60年代和70年代,依靠自己的力量,走过了电子管、晶体管、中小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的研制阶段。80年代以来,凭借对外开放的有利条件,中国军用计算机技术和应用有了新的快速发展,先后为军事科研、指挥控制、武器配套提供了各种型号的计算机系统。例如:采用晶体管的有108甲机、108乙机、108丙机、441B机、320机、655机、905机;采用中小规模集成电路的有中大型机200系列(210、220、240、260、265),小型机100系列(130、135、140)和180系列(183、184、186);采用大规模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小型机1000系列、2000系列(2220、2230、2234、2400、2100)、微型机0500系列和0600系列;还有巨型机银河系列和神州系列,以及各种专用计算机。上述军用计算机系统满足了军事科研、重大工程、作战指挥自动化、后勤保障系统建设的需要,为国防现代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主要成果 军用计算机研究的成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军用计算机体系结构的研究 中国军用计算机体系结构的研究重点是“超高性能计算机技术”。超高性能计算机又称“超级计算机”。它以先进的体系结构、超高速计算能力、特大存储容量为特征,是同时代计算技术的顶峰。其应用领域十分广泛:在军用方面,如核武器研制、密码破译、技术侦察、作战指挥自动化等;在民用方面,如中长期天气预报、地球物理勘探、空气动力学模拟、核物理模拟、量子化学研究以及新材料的设计和药物的研制等。凡是要求大型科学计算和大规模数据处理的领域,均需要超高性能计算机。超高性能计算机的体系结构中,向量计算机的统治地位一直延续到80年代后期。进入90年代,中国在对称式多处理(SMP)、大规

模并行处理(MPP)和群机结构(Cluster)并行超级计算机研制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对称式多处理(SMP)体系结构计算机这是一种采用高速总线互联,统一编址的共享存储器系统,系统中的每个处理器都有同等的机会占用总线,访问主存和总线上的其他资源,操作系统可以在多个处理器间分配任务。它有与普通单处理机系统相近的编程环境,便于软件移植和软件开发,成本低廉。中国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中心研制的“曙光一号”采用了这种结构。

大规模并行处理(MPP)体系结构计算机通过高速互连网络将大量低价格、高性能通用RISC微处理器连接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并行处理系统,与SMP不同,它不采用统一的共享存储器,而是把存储器分散给每个处理器。各个处理器采用消息传递方式访问其他存储器。其优点是系统可以扩展到上千个处理器,而性能可以随处理器数量的增加线性增长,性能价格比也很高,是千亿次级超高性能计算机的主流结构。中国的“神州”计算机系统就采用了这种结构。

群机(cluster)结构计算机 20世纪末,随着工作站性能的迅速提高,价格日益下降,以及高速网络产品的出现,一种新的并行处理系统——群机并行计算机系统应运而生。群机处理系统主要由工作站、标准网络和相应软件组成。主要优点是结构灵活、编程方便、扩充性好、性价比高。华北计算技术研究所研制成功的“太极1000”群机系统就是由八台 Sparc 工作站组成的群机并行处理系统。在“863”计划的推动下及各级主管部门的领导下,“银河”系列巨型机、“曙光”1000、PAR95、990STAR、“江南”系列机、“神州”系列机和“太极”群机计算机相继研制成功,使中国在世界超高性能的计算机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军用计算机可靠性设计技术的研究 中国在军用计算机研制过程中始终把可靠性放在首位。设计的基本方法是减小影响设备与系统可靠性的内部和外部因素对系统正常工作的消极作用。首先是选用高可靠性的元器件和设备,使系统具有良好的基础;同时采取相应的加固措施排除或减弱各种外部因素(如湿热、盐雾/霉菌、震动冲击、电磁干扰等)对正常工作状态的干扰。其次是采用冗余技术,大幅度提高系统的“任务可靠性”。冗余技术是指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相同的部件并联使用,只要不是所有的部件同时失效,就不会导致系统失效。国内经常采用的冗余设计模式有:并联冗余、双机系统、双工系统、三重模块冗余和容错计算机。

抗恶劣环境计算机设计技术的研究 计算机的可靠性与它所承受的环境应力密切相关。恶劣的环境应力会增大系统的故障率,缩短系统使用寿命,甚至立即使系统失效。中国对抗恶劣环境计算机设计的基本方法是针对恶劣环境对计算机的影响采取加固措施,以拓宽其高低温工作范围,提高其抗震动抗冲击能力和防潮、防霉、防盐雾、防风沙能力,提高其电磁兼容能力和系统可维性。

关于拓宽计算机的工作温度 拓宽工作湿度上限的基本方法是散热,拓宽工作温度下限的基本方法是加温。不同类型的抗恶劣环境计算机的工作温度上限为 $40^{\circ}\text{C}\sim 55^{\circ}\text{C}$ 。计算机内对温度最敏感的是半导体器件,特别是工作时发热量很大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和大功率晶体管。提高整机工作温度上限的基本方法是使这些器件工作时产生的热量及时离开发热点,即散热。散热的机制有三种:对流、传导和辐射。在计算机内,主要的散热方式是传导,传导热量的介质为固体、液体或气体。固体传导通常用于要求体积尽量小的加固计算机。液体传导由于成本很高,在

普通军用计算机中很少采用,而仅被用于超高密度组装的巨型计算机。在加固的车载、舰载计算机和便携式计算机中,通常以空气作为传递热量的介质。

关于提高计算机的抗冲击震动能力 在计算机中,抗冲击震动的薄弱环节是硬磁盘和各种连接器。提高抗冲击震动能力的加固方法主要分两类。一类是紧固法,一类是缓冲法。对于主机、插卡和各个连接器采用紧固法加固。用带锁定机构的连接器,对插卡增加压紧装置,使其受到冲击或震动时,不会产生瞬时或永久性的相对位移。缓冲法主要用于对磁盘的减震,通常使用橡胶或钢丝绳减震器安装磁盘,利用减震器吸收一部分动能,减小传递到磁盘体上的加速度。

关于提高计算机的防护能力 主要是提高计算机的防潮、防霉、防盐雾、防风沙能力。基本方法是密封和涂覆。密封,是采用完全密闭的机箱,使计算机所有的元器件与外界隔绝;涂覆,则是采用防护材料浸渍或喷涂在插件板或其他结构件的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且不影响元器件的散热和连接器的导电能力。

关于提高计算机的电磁兼容能力 电磁兼容能力是指计算机在规定的电磁环境中工作时,按设计要求具有一定的抗干扰能力,并不产生超过限度的电磁干扰。抗恶劣环境计算机,尤其是车载和舰载的军用计算机往往处于电磁设备非常密集的环境中,对电磁兼容能力的要求大大高于普通的商用计算机。采用导电和导磁性能良好的材料制作完全密闭的机箱,是提高电磁兼容能力的理想设计。通常采用以钢板或铝板为基片制作机箱,用导电和导磁材料进行多层涂覆的办法。互连电磁兼容设计的基本方法是接地、屏蔽、滤波和隔离。

关于提高计算机系统的可维性 系统可

维性是指系统维修的简便和快捷程度,其指标是平均修复时间。按军用标准,计算机的平均修复时间应小于30分钟。计算机硬件系统的故障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致命性的,另一类是非致命性的。提高军用计算机系统可维性的措施,一是主动检测和报告所有可能诱发致命性故障的非致命性故障和其他故障先兆;二是尽量把系统设计成可在现场更换的独立模块,以便在发生故障时易于进行故障定位和更换故障模块,快速恢复系统的正常运行。

军用软件的研究 从7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军用软件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自行开发了一些操作系统。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神州”机的多机操作系统、151机操作系统、与“银河”配套的系统软件,以及为重大军事工程设计的实时操作系统、实时应用软件和诊断检查程序等。这些软件在中国军事系统工程实施中起了重要作用。“七五”和“八五”军用数据库、Ada语言和开发环境、军用操作系统、军用软件标准与规范等“军用共性软件”硕果累累。“九五”期间,又提出了“区域电子化通用信息平台”的概念。据此规划与开发的军用软件将把中国军用软件推向前所未有的水平。

军用计算机应用研究 军用计算机在中国国防建设中已得到广泛应用,对国防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战略工程中的应用 XXX718工程、巨浪工程、331工程的测量控制系统采用了国产的200系列机、154系列机、180系列机等。这些计算机系统为中国的洲际导弹、水下发射远程导弹和通信卫星的发射成功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作战指挥自动化系统中的应用 中国最早的作战指挥自动化系统是1125工程,这是一个以处理雷达情报、引导我机、拦

截敌机为主要任务的半自动防空系统。该系统于1984年交付部队使用。1980年全军指挥自动化网正式投入运行。随着有X期网和X期网的建设,一个平战结合、办公室自动化和C³I系统相结合的指挥控制系统正在不断的发展和完善。

舰载计算机的应用 中国舰载计算机经历了由集中处理到分布处理的发展过程。已研制成功的有130毫米舰炮微机指挥仪、“上游”导弹指挥仪、鱼雷射击指挥仪、舰载情报指挥控制系统和舰载通信导航系统等。

机载计算机的应用 70年代,中国开始研制和使用机载火控计算机系统,如XX火控计算机、XX拦截火控计算机、歼击机平显火控系统计算机、XX平显火控系统计算机、机载电子告警系统计算机、机载雷达信息处理计算机、通信导航计算机等。

航天、弹载、箭载计算机的应用 计算机技术是航天事业的重要支柱,从1965年开始,中国陆续研制了多种弹载计算机、飞船控制计算机。箭载计算机的研制开始于1967年,先后研制成功KS-1、KS-A(A)、KS-4、KS-4(A)、ZK45-3、ZK45-3-1等,多次成功执行“长征”系列等火箭发射任务。

车载计算机的应用 车载计算机主要用于野战火控系统、野战防空系统、坦克火控系统、电子对抗系统、情报处理系统、车载武器控制系统和地面机动式指挥自动化系统。研制的主要成果有:地炮射击指挥系统、122榴弹炮营射击指挥系统、高炮通用数字指挥仪、三位一体高炮火控系统雷达信息处理计算机、电子对抗系统计算机和训练模拟用计算机等。

便携式军用计算机的应用 便携式微型计算机已在人民解放军的军事通信、武器控制、指挥系统、军事后勤等方面有广泛的应用。尤其是C³I系统的信息采集和野战作业

中大量使用便携式微型计算机。

中国的军用计算机虽然仍面对严峻的局面,但已经具备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的发展环境。中国的军用计算机研究将在这一有利的条件下,在国防现代化建设和迎接世界新军事革命的挑战中,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进一步发展自己的军用计算机技术。

(王祖永 林维达)

军事通信技术研究 (research of military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探讨军事通信的各种技术的活动。内容主要包括:无线电、有线电和光通信技术研究;信息传输、交换、保密、处理等技术研究;单项技术研究和系统技术研究,以及通信网的组织运用和管理技术研究等。

研究概况 军事通信技术的研究随着战争的出现而产生和发展。电信技术的研究及应用始于19世纪中叶。1854年有线电报开始用于军事通信,1877年出现军用有线电话通信,1899年军事上开始使用无线电通信。20世纪初,有线电通信和无线电通信手段开始用于野战部队。

中国的军事通信技术研究,大体上可分两个阶段。20世纪前半叶,因战乱频繁,国力衰弱,独立自主的军事通信技术研究甚少。当时所用军事通信装备主要依靠进口,少量自制。1900~1906年,先后在南京、广州、武汉、北京、上海等地兴办有线电话通信。1905年开始,先后在广东、江西等江防要塞安装的火花式无线电发报机,多为从国外购买的通信设备。国民党军队曾大量进口美国、欧洲国家制造的军用通信机、电台、通信车,如V101型、694型、284型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30~40年代除使用部分缴获的通信设备外,还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在根据地设厂自制军用通信器材,保障了革命战争和反

侵略战争指挥的通信联络。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军事通信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在国民经济和国家科学技术蓬勃发展的同时,军事通信技术和装备的研究、开发,也从学习、引进、仿制走向自主发展,相继成立了若干军事通信技术研究院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部和各军种、兵种都成立了通信研究所。国家有关部委建立的电子第54研究所(原1919所)、电子第7研究所、电子第30研究所、电子第22研究所、电子第34研究所等以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现归属中国人民解放军理工大学的通信工程学院等都参加了军事通信技术的研究。各个通信装备生产制造工厂也多有自身的军用通信装备研究、开发设计所和研究所。每个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期间,对军事通信技术的研究都有具体规划,有相当的研制经费投入。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军事通信技术经历了从真空管、半导体管到集成电路,从模拟技术到数字技术,从人工手动操作到自动化、智能化;从架空明线到地下电缆、光缆;从短波、超短波电台到抗干扰跳频、直接序列扩频电台;从较窄的使用频段向宽带、高频段扩展;组建了卫星通信、散射通信、流星余迹通信、毫米波通信等新型通信设备与系统。在军事通信技术研究的过程中,尤其是70年代以来,重视运用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网络仿真等技术,设备研制性能更加优化。此类研究成果突出的有:通信指挥学院的“国防通信网建设理论与应用研究”课题,用现代仿真技术建立了国防通信网的系统模型,又用抽样统计方法调查、实测了大量国防通信网的业务流量、流向数据及其统计分布等,用计算机模拟技术研制成功一套可优化国防通信网管理、规划及日常值勤的大型软件和数据库,在全军推广应用。

该项目获全军科技进步一等奖(1997)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二等奖(1999)。总参谋部通信研究所对野战地域通信网进行仿真研究,实现了图形建模、数据库建设及仿真等技术的突破,改善了泛搜索协议及网络同步方案。20世纪末,中国军事通信技术已经发展到较高水平。

主要研究成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军事通信技术研究取得显著成绩。在有线电通信方面,相继研制配备了载波电话终端机和载波电报机,建成了长途地下电缆通信网,先后开通了连接主要驻军城市的长途电话,安装了大量的程控电话交换机。在无线电通信方面,研制配备了单边带电台和微波接力、对流层散射、卫星通信设备,建立了移动无线电话通信系统,光纤通信进入实用阶段。全军基本建成了平时和战时相结合、有线电通信和无线电通信等多种手段综合使用的军事通信系统。

通信传输技术 至20世纪末,中国已掌握了波分复用(WDM)的同步数字系列(SDH)光通信技术,建成纵横全国的军用地面通信网;掌握了各种先进的短波通信技术,短波通信实现了单边带化、自动调谐、自适应选频、跳频抗干扰、报/话/数据/图像综合传输。除野战使用外,还建成了数以百计的坚固的地下无线电台,成为军事通信系统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掌握了各种先进的跳频、直接序列扩频技术,抗干扰传输技术,软件无线电台技术,生产和装备了新一代先进的无线电台及无线电接力机;研究掌握了在强衰落色散的多径信道中传输的对流层散射通信技术及流星余迹通信技术;拥有了军事通信卫星及卫星通信地球站的研究、生产能力,建成了有大量地面通信设施和空间资源构成的军事卫星通信网;研究了长波在地面和水下传播的特点,掌握了大型长波

天线及大功率长波发射台技术,建立了海军长波通信系统;研究掌握了毫米波和大气激光的传播特点及相关的发射、接收技术,建立了毫米波和大气激光通信装备;研究并掌握了多种地下通信技术,建立了最低限度应急通信系统。

交换技术 研究掌握了计算机程序控制的全数字交换机、综合业务数字 ISDN 交换机;研制了车装的军用异步传输模式(ATM)交换机,并已装备部队;研究掌握了各种数据交换机,包括分组交换(X.25)、帧中继(FR)及以因特网协议(TCP/IP)为基础的路由交换机技术;装备了野战地域通信网使用的话音、数据综合交换入口以及节点交换机。

通信终端技术 研究掌握了多种总和增量调制($\Delta-\Sigma$)及多种线性预测编码(LPC)为代表的话音压缩技术;研究掌握了以联合图像专家组(JEG)及活动图像专家组(MPEG)所订标准为代表的,以及基于小波变换适应信之交换(ATM)的多种图像压缩方法;研制生产了多种适合固定及野战恶劣条件使用的军用电话、数据、图形、图像、综合业务、多媒体终端,并已装备部队。

通信网络的管理和支撑系统 研究掌握了用于各种业务网和综合集成管理的网络管理系统;各种网络模拟、仿真、规划、优化软件系统;用于各种业务网的保密管理软件和密钥分配中心;数字网络同步技术和设备、网络信令系统;多种电磁频谱的规划及管理系统。

通信网建设 在研究掌握各种先进军事通信技术的基础上,建设了多个有中国特色的军事通信系统和网络,主要有:

国防通信网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便开始建设架空明线、模拟载波网络。20世纪70年代,又建成地下同轴电缆网。20世纪末,发展为以地下光缆、海底光缆为主,与卫

星、微波、短波通信共同组成的传输网络。与各种计算机控制的交换节点相结合,承载着话音、计算机数据、图像(视频)等军事指挥信息的传递,形成数字化的综合通信系统。

野战综合通信系统 从原来的无线电台逐级树状组织,发展到现在以各种干线、入口交换节点与抗干扰微波接力线路、野战光缆等组成的野战地域通信网,加上单、双工保密移动通信系统,构成比较完备的野战综合通信系统。20世纪末,军事通信网正在用新的研究成果进行新建与改造,进一步向宽带、高速、智能、全数字化的综合业务军事网络方向发展。

地下通信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为保证各坑道之间、坑道与地面指挥所之间的通信联络,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通信人员进行了坑道通信的研究与试验。例如,架设了各种浅埋地天线、坑道内壁挂架天线等,与外界沟通联络。随后,各军区及海、空军通信部门、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等先后开展了坑道通信及埋地天线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其中,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系统研究且有较大影响的有:1959~1960年间,军事电讯工程学院的研究组,经过理论分析和大量实验,摸清了坑道通信的电波传播机理及地下天线的辐射过程,于1960年在西安召开了埋地天线现场会,在全军推广埋地天线技术。1978年开始,总参谋部某研究所地下通信研究组,继续深入研究地下通信,对地下天线特性、电波传播规律、大气及工业噪声分布、终端设备参数等进行了综合分析,建立了数字模型,进行了不同地区、不同坑道、不同土石地质条件下的大量实测试验,找出了最佳的传输频率窗口,研制了抗雷电脉冲的地下通信设备。该项目于1991年获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1993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卫星通信 1970年4月,中国首颗人造

地球卫星升空后,立即开始了通信卫星及卫星通信系统的研制。197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所属第19研究院,成立了卫星通信办公室。整个卫星通信工程项目由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负责,卫星由航天工业部第五研究院研制,地面通信系统(包括多种型号的地球站)由第19研究院的第19研究所、第30研究所,第10研究院的第14研究所,第14研究院的第25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电子所,以及江苏、贵州地区的若干通信及雷达制造工厂共同研制生产。到1984年中国第一个通信卫星发射成功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建成北京、昆明、乌鲁木齐等若干卫星通信地球站,担负起用中国自制的通信卫星向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传送电视和广播节目的任务和保障军事指挥的任务。在此基础上,到90年代,建设了数以千计的各种卫星地球站,可传送话音、数据、图像等各种军事指挥信息,组成了完善的军事卫星通信系统。中国的军事卫星通信系统从一开始就采用先进的数字通信技术和安全保密技术,采用了包括直接序列扩频技术在内的抗干扰措施,并逐步向扩展新的频段和提高机动性、抗毁性方向发展。

亚热带丛林无线电通信技术 中国南部的不少地区属亚热带丛林及山地,无线电通信环境十分特殊。20世纪60年代初,为解决这类地区军事通信的难点,组织了大规模、长时间的现场试验研究。对亚热带丛林、山区不同地形环境、不同无线电频段、不同天候条件、不同发射机功率、不同距离的通信,进行了大量测试,积累了大量宝贵数据,得出了在灌木林、乔木林、丘陵、高山(单峰、多峰)等各种环境条件下,电磁波的直射、绕射、散射、反射的传输吸收及衰耗结果,对指导适应这类环境条件的通信设备的研制、运用及通信联络的组织等起了很大的作用。如在大规模试

验数据基础上,研制了数种适合亚热带丛林地区使用的双波段、宽波段电台。

发展趋势 近年来,电子信息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新的技术成果不断涌现,人类正进入信息化社会,而军事对抗也正进入一个以高技术兵器为代表的信息战时代,军事通信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军事通信技术研究的任务将主要是:不断提高军事通信系统的抵抗硬摧毁和软攻击的能力,抗干扰和抗病毒能力,快速机动和“动中通”的能力,综合一体和协同保障能力以及安全保密和抗人侵窃听的能力;在全数字化、模块化、软件化、网络综合化、智能化等方面努力探索,确保上述各种能力的不断提高,确保复杂条件下军事指挥信息的通畅。

(杨千里)

电子对抗技术研究 (research of electronic warfare technology)

探讨直接用于电子对抗的各种技术的活动。分为单项技术研究和系统技术研究,其内容包括电子对抗侦察技术、电子干扰技术、电子防御技术和反辐射摧毁技术等研究。电子对抗技术研究已是军事电子技术研究的一个分支和现代军事高技术研究的组成部分,是提高电子对抗作战效率的基础。

研究概况 电子对抗技术出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最初是对无线电通信的侦察、测向和干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雷达用于防空作战,对雷达的侦察、干扰技术迅速兴起。20世纪50~70年代,导弹、航空、航天技术的飞速发展,促进了多种电子对抗技术的发展。20世纪后期,由于武器系统中广泛采用先进的电子技术,促进了电子对抗技术研究的高速发展,使电子对抗成为一种重要的作战手段。

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电子对抗

技术研究,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建立了电子对抗教学、技术研究和装备研制生产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和陆、海、空三军相继组建了电子对抗技术研究和训练、作战的相应部门,军内外逐步形成一支适应各军种、兵种作战任务需要的电子对抗技术研究队伍。70年代中国电子学会成立电子对抗分会,开展学术研究,交流技术研究成果,并定期发行《电子对抗》会刊。到20世纪末,全国拥有数百名高级电子对抗技术研究专家;组建了十几个电子对抗教学、研究和生产机构;出版了数十种电子对抗专著和刊物;获得了数百项技术研究成果,有的达到国际水平;研制、生产了一批电子对抗装备,为适应21世纪的高技术战争奠定了技术研究基础。

研究成果 半个世纪来,中国电子对抗技术研究主要在下述主要方面取得了成果:

电子对抗侦察技术 它以密集复杂、多参数变化的战场电磁环境为对象,研究对超宽频率范围(从光电装置使用的红外、紫外、可见光及激光的频段到雷达、通信、导航、测控用频段)和全空域的信号环境进行搜索、截获、测量、分析、识别和测向、定位的技术。中国的研究成果主要在天线技术、接收机技术和信号处理技术等方面。①天线技术方面。广泛应用对数周期超宽频带天线,它适用于10:1频带宽的圆极化螺旋天线和具有全极化性能的曲折形天线。而多模阵列天线与移相馈电巴特勒矩阵网络相连,可用以对威胁信号单个脉冲进行全方位瞬时测向。在一种改进的最大似然谱估计测向方法中,研究了天线阵元间存在的互耦对测向的影响及克服方法。在光电频段,按工程光学原理研究设计了多种光学望远系统和光电成像扫描系统。②接收技术方面。应用光电器件、低声固态器件、声表面波器件、微波集成器件和电荷耦合器件等,研制成数字化告警接收

机、信道化宽带接收机、数字瞬时测频接收机、压缩接收机、声光接收机、时差测向接收机和成像接收机等,较好地解决了在超宽频率范围内电磁辐射信号的全概率截获,以及瞬时测量信号参数的技术。③信号处理技术方面。研究了频谱理论、相关理论、模糊理论,采用了快速傅立叶频谱分析技术、模式识别技术、数据库技术和高速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开发了作战软件和专家系统。以空间谱估计技术作为一种新型的阵列处理体制,从理论研究发展到工程应用,并研究了无源定位技术、短基线时差测向技术和脉内特征识别技术。对信号流进行实时处理,使各类辐射源的参数得到测量、识别并确定其位置,最终依据敌我态势判断威胁等级或给出最佳的电子对抗策略。

电子干扰技术 针对战场各型武器系统中复杂多变的电磁辐射特征,主要研究了增大有效发射功率、精确频率引导、设计干扰样式和综合使用干扰资源等方面的技术,用以干扰多目标、新体制武器系统和精确攻击武器。现已广泛使用计算机技术,对电磁辐射信号进行分选、识别、威胁判断,经过对策运筹,在时域、空域和频域上,有选择地以有源、无源方式按程序或自适应地确定干扰样式并分配干扰功率或施放无源干扰器材。随着一些新技术、新材料、新器件的出现,针对通信、导航、雷达、敌我识别、精确制导武器等系统中新体制和新型信息传感器的有源、无源、光电干扰技术的研究正在深入。新一代电子干扰设备具有系统功能,实现总线控制,自动化、智能化程度和可靠性进一步提高。其中雷达、通信干扰机由于采用数字调谐压控振荡器,可在微秒量级上精确变换频率。研制出相控阵干扰天线和透镜馈电多波束阵列天线,具有3:1频带宽,能够在数微秒内和小于 3° 的精度,将干扰波束指向威胁目标。电子干扰技

术研究中的另外一些重要成就是:数字射频存储技术,可在确定的时间将存储的数字信号恢复成射频信号,使干扰波形与信号波形精确匹配;直接数字频率合成技术,实现了精确瞄准干扰;发展了供一次使用的干扰机;开发了干扰引信的技术。同时,还开展了电子调制编码的红外干扰技术研究,欺骗式和致眩式激光干扰技术研究,可同时干扰雷达、红外和激光制导武器的复合干扰器材及相关技术的研究,改进传统的箔条器材和投放技术研究等。

电子防御技术 它包括各种反电子侦察技术,反电子干扰技术,抗反辐射摧毁技术。针对日益严重的电子干扰,在军用电子装备上采用了一系列反干扰新技术,如雷达的频率捷变技术、脉冲多普勒技术、相干积累技术、相控阵技术、合成孔径技术、脉内调制技术、超低副瓣天线技术、副瓣对消技术、数字或数模结合对消技术、自适应阵列天线技术、多参数捷变技术,以及对反辐射导弹的告警和诱饵技术等;通信的扩频、跳频技术,数字通信技术,猝发通信技术等;光电设备的成像反诱饵技术和多光谱技术等。由于采用综合性的抗干扰技术,提高了电子装备的抗干扰、反摧毁防御能力。还开展了隐身材料和隐身技术等研究。

反辐射摧毁技术 它的核心是对辐射源的识别、稳定跟踪和抗辐射源关机的导引技术,并从构成反辐射武器系统的要求进行配套技术研究。在技术研究和装备研制、设计中,采用模拟技术、数字仿真技术等先进方法,缩短了研究周期,提高了研究质量。在电子对抗技术研究和装备研制的同时,一些重要的电子对抗专用器件、器材的技术研究也取得了进展,如宽带大功率行波管、双模行波管、宽带微波开关、微波集成电路、电调谐红外光源、多元焦平面红外器件、大功率激光

管,以及固态放大器等技术已缩短了与国际水平的差距。另外,与硬件技术相适应的一批软件技术也取得了进展。

发展趋势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武器系统中应用新技术、采用新体制的电子设备得到优先发展,毫米波、电视、红外、激光和卫星定位制导的精确攻击武器,超低频、次声波、超大功率激光、强电磁武器和隐身作战平台的投入使用,以及武器运载平台从水下到宇宙空间的多样化发展,武器系统进一步综合化、系统化,都向电子对抗技术研究提出了挑战,也为电子对抗技术研究发展开拓了前景。电子对抗技术研究的发展必将随着作战需求和信息产业、基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达到新的水平。

(金兆洵)

军用雷达技术研究 (research of military radar technology)

探讨军用雷达的设计、制造、操作使用、维修保养等技术的活动。

1935年,世界上第一部可实用的军用雷达在英国问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作战的需要,雷达技术的发展极为迅速,雷达的战术使用也由单一的对空警戒扩展为引导、截击、炮瞄、轰炸瞄准、侦察、敌我识别以及导航等诸多方面。战后,军用雷达技术保持了高速发展的势头。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天线波束可高速扫描的相控阵天线,给雷达的发展带来极大的推动。特别是90年代以来,海湾战争、波黑战争以及“沙漠之狐”军事行动的经验表明,雷达在现代战争中,无论是在情报侦察、指挥控制、作战管理,还是在作战效果评估等方面,都具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华民国时期的军用雷达技术研究中国的雷达技术研究,可以追溯到1947年国

民党政府国防部第六厅在南京组建的特种电信器材修理所。1948年10月,该所正式易名为雷达研究所。但由于中国的工业发展整体落后,技术人才严重匮乏,加之处在战争期间,所以并没有真正开展雷达技术研究工作,只能做一些修理雷达、培训初级技术人员的工作,摸索和了解雷达技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军用雷达技术研究 中国的雷达工业,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为适应国防建设的需要,中国的军用雷达技术研究经历了从修配、仿制到自行设计研造、发展提高等阶段,已可以独立自主地开发研制各种复杂的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雷达。

修配、仿制研究阶段(50年代) 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了国民党国防部的雷达研究所,建立了新的雷达研究机构,为中国雷达工业的发展揭开了序幕。1949年至50年代初,盘踞在台湾和沿海岛屿的国民党军部队经常空袭沿海城市,防空部队急需雷达。不久,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对雷达的需求更趋紧迫。国家对雷达研制部门大力支持,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日留下的各种雷达设备和缴获的电讯器材,进行维修补缺配套,向部队提供了多种对空警戒雷达、炮瞄雷达和舰艇对海搜索雷达,满足了部队的急需。

从1953年起至60年代初期,中国根据与苏联签订的有关协定,按照苏联提供的图纸、样机及有关技术资料,仿制对空警戒雷达、炮瞄雷达、机载雷达(测距雷达、轰炸瞄准雷达、高度计)等,提高了雷达科研、生产的管理能力,为自行设计、试验雷达奠定了良好基础。在仿制的同时,中国也开始了雷达的自行设计和研制工作。1956年,定型生产的406型雷达是中国第一部远程对空警戒雷达;1957年,研制成功的402型对海警戒雷达是

中国第一部微波雷达。

自行设计研制阶段(60~70年代) 从60年代初期开始,国家输送了大批大学毕业生到有关雷达研究所和工厂工作,极大地提高了军用雷达的科研与生产能力,一批新的国产化雷达相继问世,如1965年研制成功的408型远程对空警戒雷达已具有动目标显示能力,在结构上、工艺上均有很大突破,其天线为26米×9米的巨型抛物面,是中国首次设计制造的大型雷达天线。60年代初期研制成功的502型测高雷达具有很高的测高精度。242型轰炸雷达、771型多普勒导航雷达、242型、201L型机载火控雷达等均于60年代研制成功。随后,又相继研制成功860型炮瞄雷达、331型岸舰导弹跟踪雷达、红旗2号地空导弹制导雷达等,并大量装备部队,为国防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60年代中期起,为配合导弹发射试验和多种卫星发射任务,中国开始自行研制多种单脉冲精密跟踪测量雷达和连续波测量雷达,保证了洲际导弹、潜射导弹及1970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1号等的发射与测控任务,为中国的“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和发射作出了重要贡献。

70年代中期起,中国军用雷达技术有了长足进步。70年代中期先后研制成功中国最大的110型单脉冲精密跟踪测量雷达和两维相控阵7010型大型相控阵雷达。110型雷达的天线口径250米,天线罩直径44米,雷达作用距离超过1000千米,7010型相控阵雷达天线面积更大,作用距离达3000千米,可同时跟踪多批高速飞行的外空目标。这两部大型雷达是贯彻自力更生精神,由中国自行设计和建造的,关键器材全部国产化。

深入研究发展阶段(80~90年代) 进入80年代以后,又研制成功了许多新型雷达,如固态相控阵三坐标雷达、机载脉冲多普

勒火控雷达、舰载相控阵雷达、地空导弹制导雷达等。这些军用雷达大多采用了全相参主振放大式发射机、频率捷变、脉冲压缩、脉冲多普勒、数字动目标显示、数字信号处理等新技术,多数雷达均具有低的天线副瓣电平和其他抗干扰措施。

发展趋势 为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雷达要完成的任务日益增多,技术日趋复杂。从军事需求上对新一代军用雷达提出的主要要求有:探测隐身目标;提高雷达在复杂电磁干扰环境下工作的有效性和可靠性,以及在反辐射武器打击下的生存能力;提高雷达测量的分辨力和精度,以适应具有精确打击能力的各类作战平台发展的需要;对目标进行分类、识别和判别属性;对地面、海面和空中运动目标进行高分辨成像;发展双/多基地雷达系统,将多部雷达组网,实现多传感器数据融合;提高雷达进入各类指挥控制(C³I)系统与作战平台的综合能力;将有源雷达与无源雷达结合,将雷达中的一些功能模块与敌我识别、电子对抗和通信等系统中的相应功能模块共用,减少雷达的体积和重量,降低成本;严格控制雷达发射信号的辐射,对雷达辐射进行管理,以改善雷达所在平台的综合电子系统的性能等等。为实现这些新要求,有关的雷达新技术将继续获得新的发展,它们主要表现在:雷达频段的扩展;自动目标识别能力的提高;雷达成像技术、超低副瓣天线技术、超宽带雷达技术、相控阵天线技术、先进的信号与数据处理技术,以及雷达系统建模与仿真技术的发展与提高;各种新工艺、新结构、新材料在雷达上的应用。中国在这些新的军用雷达技术领域中的研究正取得新的进展,并将不断地用于提高中国的国防实力。

参考文献

丁鹭飞、张平著:《雷达系统》,西安:西北电讯工

程学院出版社,1984。

张直中著:《微波成像术》,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

张光义著:《相控阵雷达系统》,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94。

(张光义)

军用光学和光电子技术研究 (research of military optical and optoelectronic technology)

探讨从紫外到红外波段电磁波的产生、传输、探测、处理、与物质的相互作用及其规律和军事应用的活动。包括对军用光学仪器、红外、激光、可见光和微光、光纤、平板显示器、集成光学与光电子集成、光学材料、光波传播、目标与背景光学特性等方面的研究。

研究概况 1949年以前,中国的军用光学技术研究基本上是空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以王大珩为首的科学家创办了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成为中国第一个重要光学技术研究基地,并支援了国内其他光学科研单位的建立和成长。50年代末,在国际上刚刚兴起的光电子技术的影响下,开展了红外变像管、微光像增强器和红外探测器等光电子器件的研究。1961年9月,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研制成功中国第一台激光器。此后,各种激光器及其军事应用研究蓬勃发展。60年代,针对武器装备首先是尖端武器发展的需要,开展了靶场测量用的电影经纬仪、高速摄影机、弹道照相机的研究,还研制生产了多种光学玻璃和激光玻璃、多种军用光学仪器。70年代,开始光纤通信技术研究,并研制了一批先进的军用光学和光电子仪器。这些仪器不仅满足了常规武器配套的需求,而且相继完成了1980年洲际弹道导弹全程试验、1982年核潜艇水下发射导弹试验和1984年试验通信卫星发射试验

等“三抓”重点工程的动态光学观测和测量任务,为中国独立自主地发展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中国军用光学和光电子技术研究队伍不断发展壮大。1984年1月,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成立军用光学专业组,在专业技术的发展规划上起咨询和参谋作用。1986年5月,军用光电子技术作为一个跨部门的国防预先研究重点项目单独立项,军用光学专业组换届并更名为光电子技术专业组。1986年,国家高科技计划(“863”计划)把强激光技术和光电子技术作为重点课题纳入计划。80年代以来,军用光电子技术研究得到进一步加强,开展了广泛深入和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

主要研究成果 中国军用光学和光电子技术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军用光学仪器研究 从60年代起,参考苏军装备,设计生产了各种望远镜、瞄准镜、跟踪镜、测距仪和经纬仪等观测仪器;研制了远距离照相机、大型和中型电影经纬仪、光电经纬仪、弹道照相机、光学判读仪等摄影测量仪器并配备于各靶场,对中国尖端和常规武器的研制、鉴定与检测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开展了自适应光学技术研究,对补偿光波传播中的波前畸变研究起了明显推动作用。

激光技术研究 1965年,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和西安应用光学研究所合作,研制成功中国第一台激光测距机。1986年,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在邓锡铭主持下,建成中国第一套用于激光核聚变研究的“神光一号”钕玻璃激光器系统;2001年建成更先进的“神光二号”钕玻璃系统。1968~1980年,华北光电研究所研究靶场激光测距技术,实现了外弹道测量的高精度单站定轨,并可实时输出。此外,还研制了多种军用固体、气体、半导体和化学激光器、激光测距机、激光告警器、激光射击模拟训练器材,以及用于先

进制造技术的激光加工设备;广泛开展了激光的军事应用研究,包括激光分离同位素、激光与物质相互作用、红外激光雷达、激光水下目标探测和激光对抗等技术。

红外技术研究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于1958年开始硫化铅红外探测器及其应用的研究。不久,华北光电技术研究所和昆明物理所亦相继开展红外探测器及其应用的研究。迄今已研制出基于硫化铅、铋化铟、碲镉汞等材料的,覆盖短波(1~3微米)、中波(3~5微米)和长波(8~12微米)三个红外波段的单元和多元红外探测器及其配套的杜瓦瓶和微型制冷器;开展了基于铂化硅、碲镉汞和铋化铟材料的中波和长波红外焦平面阵列的研究。在军事应用方面,研制生产了多种战术导弹用的红外导引头、星载气象云图照相机、手持和车载热像仪、机载红外行扫仪、星载多光谱相机和地平仪等;开展了红外搜索跟踪、红外成像、红外测温、化学战剂红外探测和红外对抗等技术研究。

可见光和微光技术研究 研制和生产了第一、第二代和二代半(又称为“超二代”)像增强器和微光夜视仪、电荷耦合器件(CCD)和相机、电视跟踪器等。

光纤技术研究 1978年9月,建成2.7千米双芯光缆野外通信试验段。此外,陆续研制了高强度光纤、保偏光纤、野战光缆、海底光缆、多种光无源元件、掺铒光纤放大器、机载和舰载光纤数据总线、光学时域反射计;开展了光纤陀螺、光纤水听器、微弱磁场光纤传感器等的研究。

光学材料研究 1958年起,中国第一批光学玻璃试制成功。1962年4月,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干福熹等研制成功中国第一根激光玻璃棒并获得激光振荡。同年,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钟永成等成批试制出红宝石激光晶体。1966年,西南技术物理所用

熔盐溶剂法研制成掺钕的钇铝石榴石激光晶体(Nd:YAG),1970年,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华北光电技术研究所等单位用引上述方法生长出该晶体,后小批量生产,广泛使用。80年代,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所相继发明偏硼酸钡(BBO)、三硼酸锂(LBO)两种非线性晶体,因其优越的性能,被同行誉为“中国牌非线性晶体”,已批量生产,广泛销售到国内外。山东大学用独到的生长工艺获得的另一种优良的优质大尺寸非线性晶体磷酸钛氧钾(KPT),已大批量生产,行销国内外。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用热交换法生长的可调谐激光晶体掺钛蓝宝石,尺寸大,质量好,受到国际市场青睐。此外,广泛开展了其他激光晶体、非线性晶体、碲镉汞材料和薄膜材料、半导体超晶格量子阱材料、有机非线性材料等研究有的已批量生产。

光波传播、目标与背景光学特性研究建立了外场观测设施和室内仿真实验装置,开展了相应的实验研究。中国科学院安徽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对可见光和红外线在大气中的传输及激光的大气传输,进行了长期的系统研究,积累了一定的数据,建立了相应的物理模型。青岛海洋大学对光在水中的传播,特别是激光在水中的传播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积累了一定的数据。

此外,在显示器技术研究方面,开展了彩色等离子体显示器、彩色有源矩阵液晶显示器等平板显示器技术的研究。在集成光学和光电子集成技术研究方面,研制了多种光波导元件、光电子混合集成模块和基于集成光学的频谱分析器。

发展趋势 军用光学和光电子技术研究将在获取精确的图像信息,对图像进行快速处理,图像信息的快速传输,大容量存储和高清晰度显示,光电子技术同微波技术进一步融合,即在微波雷达和微波通信等系统中更

广泛地被使用,光电子器件和整机系统的固态化和小型化,特别是采用微机电(MEMS)和微光机电(MOEMS)技术等方面,加大研究力度。

参考文献

邓锡铭主编:《中国激光史概要》,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

师昌绪等编著:《高技术新材料要览》,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

梅遂生主编:《光电子技术》,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

(梅遂生)

军事航天技术研究

(research of military space technology)

探讨军用航天器进入太空(地球稠密大气层之外的空间区域)并在太空正常运行和可靠工作,以探测太空环境和开发利用太空资源的综合性技术活动。军事航天技术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①军用航天器研究。主要是指研制、发射、控制和管理军用航天器的技术,包括军用航天器技术、军用航天运载器技术、军用航天发射场技术和军用航天测控技术等。②军事航天信息应用技术研究。主要是指军用航天器获取、传输信息,以及军事部门应用信息的技术。包括军事航天信息获取和传输技术、军事航天信息存储和处理技术、军事航天信息融合技术和军事航天信息分发技术等。③军事航天防护技术研究。包括保护本国军用、民用航天器,使其免遭干扰和破坏,并在必要时能阻止外来干扰和破坏的技术,如航天器的加固技术,防太空垃圾碰撞技术,以及电子对抗技术,在轨维修和加注(液体推进剂)技术等。④军事航天攻击技术研究。指以己方航天兵器对敌方军事目标实施攻击的技术。包括地对天、空对天、天对地、天

对空以及天对天作战武器等技术。

研究概况 20世纪40~50年代发展起来的运载火箭技术,为航天技术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截至20世纪末,军事航天技术已应用于航天侦察、导弹预警、海洋监视、卫星通信、气象观测、导航等各个方面,并在航天作战和航天勤务保障方面得到发展。世界上已有俄罗斯联邦、美国、中国、法国、日本、英国、印度、以色列等国家及欧洲空间局等先后研制出百余种运载火箭,发射航天器数千个,正在使用的通信、导航气象等卫星系统数十个,载人航天先后将数百名航天员送入太空。

中国自1956年起发展火箭技术,于1958年开始人造卫星的先期研究。1965年开始人造卫星的工程研制。1970年4月24日,中国用长征1号运载火箭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1号卫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够研制和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1975年11月26日,中国用长征2号运载火箭首次将返回式科学试验卫星送入近地低轨道。该卫星沿轨道正常运行三天后,按预定计划返回预定地区,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卫星返回技术的国家。1984年4月8日,中国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3号运载火箭发射了东方红2号试验通信卫星。八天后,该卫星定点于预定地理经度处的赤道上空,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利用地球静止轨道的国家(含地区性组织)。1988年9月7日,中国用长征4号甲运载火箭从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的第一颗风云1号气象卫星,成功地进入海拔约900千米的太阳同步轨道,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拥有太阳同步轨道卫星的国家。到20世纪末,中国已形成了返回式卫星、“东方红”通信广播卫星、“风云”气象卫星、“实践”科学探测与技术试验卫星、“资源”地球资源卫星等四个卫星系列;“长

征”系列运载火箭已成功发射63次;成功研制了载人飞船和高可靠运载火箭,“神舟”号无人试验飞船发射成功,突破了载人飞船的基本技术,在载人航天的领域取得了重要成就。

主要研究成果 中国在军事航天技术研究方面取得的主要成就有:

航天器运载技术 中国航天运载火箭统称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截至2000年年底,已研制成功:长征1号运载火箭;长征2号系列运载火箭,包括长征2号、风暴1号、长征2号丙、长征2号丙改进型、长征2号丁和长征2号戊等运载火箭;长征3号系列运载火箭,包括长征3号、长征3号甲和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和长征4号甲运载火箭。除长征1号运载火箭的末级(第三级)为固体推进剂火箭外,其余均为液体推进剂火箭。其中,长征3号系列运载火箭的末级火箭采用高性能的氢、氧发动机,长征2号戊和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在第一级捆绑了四个液体推进剂助推器。中国运载火箭的运载能力已从最初LED300千克提高到现在LED11000千克和GTD5000千克。

人造卫星技术 截至1998年年底,中国已研制成功的人造卫星有:科学实验卫星,技术试验卫星,返回式遥感卫星,通信卫星,气象卫星。其中,返回式遥感卫星、通信卫星、气象卫星、技术试验卫星是军、民两用卫星。

返回式卫星,采用三轴稳定、对地定向的姿态控制,运行于近地低轨道。它们的初始轨道为高度170~500千米、倾角 57° ~ 63° 的近圆形轨道。星上装有由地物相机、恒星相机和胶片暗盒等组成的可见光摄影系统。卫星在沿轨道运行过程中,用地物相机对预定地区进行摄影,同时用恒星相机对星空摄影。恒星相机获取的星图,用于事后校正摄影时刻卫星的姿态误差。在卫星完成预定的摄影任务

后,装载胶片暗盒的返回舱返回地面,回收后对胶片处理获取遥感资料。

“东方红”系列通信卫星,运行于地球静止轨道。其绕地球运行的角速度与地球自转角速度方向相同、大小相等。从地面看去卫星高悬于某一地理经度处的赤道上空,静止不动。它们采用的通信频率均为C频段,但采用不同的姿态控制方式和带有数量不等的通信转发器。其中:DFH—2卫星和DFH—2A卫星采用双自旋稳定姿态控制方式,星上分别带两台和四台通信转发器;DFH—3卫星采用三轴稳定姿态控制方式,星上装有24台通信转发器。一颗DFH—2A卫星可以同时传送3000路双向电话和四路彩色电视。一颗DFH—3卫星可以同时传送15000路双向电话和六路彩色电视,其性能达到80年代末世界通信卫星的先进水平。1997年5月发射成功并定点于东经125°赤道上空的一颗DFH—3卫星,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在轨调试和试用,已于1998年8月正式交付有关部门使用。

风云系列气象卫星包括FY—1太阳同步轨道气象卫星和FY—2地球静止轨道气象卫星。其中:FY—1卫星能获取全球气象资料,其运行的轨道平面绕地球自转轴转动(即轨道面进动)的角速度和地球绕太阳公转的平均角速度(也就是太阳在黄道上运行的平均角速度)方向相同(均向东)、大小相等(均等于 $0.9856^{\circ}/\text{天}$),采用三轴稳定姿态控制,星上携带两台五波段通道(四个可见光通道,一个红外线通道)多光谱扫描辐射计,所获取的云图经星上传输系统发到地面;FY—2卫星采用双自旋稳定姿态,有效载荷为一台三波段通道(一个可见光通道,一个红外线通道,一个水汽通道)多光谱扫描辐射计,每30分钟获取、传送一幅覆盖近1/3地球表面积的全景原始云图,性能达到90年代初期国

际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1997年6月,FY—2卫星首次发射成功并定点于东经105°赤道上空。该卫星已于同年12月正式交付使用。

发射场技术和航天测控技术 中国已拥有三个航天发射中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中国已建成由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和若干个航天测控站、航天测量船队以及连接它们的测控通信网组成的航天测控网,包括设在各地的固定站、机动站等,测量船队有以“远望”号航天远洋测量船为主体的海上测量队伍。中国的航天测控网配备有光学和雷达跟踪、遥测、遥控、数据传输、通信和计算机设备,能承担航天器回收、地球静止轨道定点等全部测控的任务。

航天信息应用技术 中国利用本国的卫星和国外一些为公众服务的卫星,已发展了卫星普查、卫星通信、卫星气象、卫星资源、卫星微重力试验、卫星科学研究等卫星应用,并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技术、军事和社会效益。

返回式卫星数据经国家经济、军事、科研部门处理分析后,获得了用其他手段得不到或难以得到的资料。这些对地遥感资料已广泛用于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各领域,为国家进行国土规划和宏观经济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为国防现代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利用本国的通信卫星和租用、购买的国外通信卫星发展了国内卫星通信事业。中国卫星通信事业的进步,使中国广播和电视传输的落后状态得到明显的改观,促进了信息交换手段的现代化以及经济、文化、教育、国防事业的发展。中国的电视、广播的人口覆盖率已分别超过85%和79%。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通信部门使用本国的通信卫星建立的国防卫星通信网初具规模,已拥有数十个大小不等的地球站。国防卫星通信网尚

通了各总部、各大军区以及重要的边、海防地区的卫星通信联络,在指挥部队执行军事行动、抗险救灾等任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利用本国的气象卫星和外国的气象卫星发展了卫星气象事业。已建成由北京气象卫星资料处理中心和若干个接收站组成的具有国内外兼容性的气象卫星资料接收处理系统,为气象预报、洪涝监测等方面的工作提供了有效的服务。军事气象部门利用卫星云图和常规气象资料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作战训练和国防科研试验的气象保障业务。

发展趋势 中国的军、民两用航天信息应用技术将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致力于提高水平、扩大规模和应用范围。军民通用卫星的发展将进一步受到重视,传输型对地遥感卫星、导航定位卫星和移动通信卫星的研制正在积极进行之中,近年即可发射。中国的军事航天技术将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中国国防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王希季、李大耀编著:《空间技术》,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

张钧主编:《当代中国的航天事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

(王希季 李大耀)

军用能源研究

(research of military energy source)

探讨军用能源的开发、生产、转换、输送、储存和利用的活动。军用能源是为军事设施、武器装备的正常工作提供能量的物质和设备的统称。军用能源的研究广泛涉及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等基础学科以及电子、电力、半导体等技术,是一个综合性强、涉及面

广的科学技术领域。所有军事活动都离不开能源,能源的供给和有效利用是军事战略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

能源在军事领域中的应用历史悠久。中国对热能、电能的军事应用早在19世纪下半叶已经实现。最初,是清朝引进欧美国家设计制造的火炮、舰船、有线通信设施等。20世纪初,热能、电能的军事应用更加广泛,出现了军用飞机、装甲车辆及各种通信设施的能源转换、能源传输和利用装置与设施。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工业基础落后和军事技术落后突出地表现为能源装置与设施的设计、制造能力十分薄弱,大量舰艇、飞机、装甲车辆的发动机始终依赖于国外进口,国内只有很弱的维修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这种落后面貌得到迅速而彻底的改变。新中国的军用能源研究主要是对各种能源的开发利用及设施与装备的研究,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电能设施与装备研究 中国对军事方面的电能研究主要在有线电、无线电通信技术、电能传输技术、电能武器等方面。如采用定向能束输电法,通过大功率能源中心将产生的电能转换成频率极高的微波能,由定向辐射器发送出去;特殊的能束接收器,将接收到的微波能变换成一般电能,即实现电能的无线电定向传输。超导技术方面,开展了超导电机、超导磁体储能装置的基础性研究。超导电机体积小、功率大、损耗和噪音较小,使发电、输电、电能储存等的效率增强,提高了军队作战的机动性和隐蔽性。超导磁体储能装置可长时间、无损耗地储存大量电能,使时断时续的太阳能变成稳定、可靠的电力。此外,还开展了电热化学炮、电磁炮的研究。电热化学炮是一种利用电能转变为热能,使化学推进剂燃烧释能驱动宏观弹丸的高速发射装置,是正在研制的一种新原理武器。主要应用前景

是远程火炮、防空、战术导弹防御、反轻装甲等。电磁炮利用电磁推力(洛仑兹力)发射高速弹丸攻击目标,主要形式有轨道炮和线圈炮两类。

化学能设施与装备研究 化学能源指利用化学反应产生的能量。可直接转化为热能或电能。中国军事领域的化学能研究主要在火药、炸药、军用化学电池、推进剂等方面。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研制了各种各样贮备电池,用于鱼雷动力电源、潜艇声纳浮标、海上救生讯号、气象探测电源以及导弹、火炮和炸弹近炸引信电源等;各种新型高能蓄电池已广泛用于汽车、装甲车辆、通信卫星等军事和航天工业的电源中。中国氢能系统的研究与发展可追溯到60年代初,如用作火箭燃料的液氢生产等。在氢的生产方法及贮氢技术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进展,并进行了有关氢能应用领域的研究。

核能设施与装备研究 核能是指重核裂变反应或轻核聚变反应过程中释放出来的能量,也叫原子能。核能比化学能大几百万至上千万倍。中国的核科学技术研究始于50年代初。1955年,开展了铀矿普查工作,发现了比较丰实的核资源。60年代,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得到迅速发展,先后掌握了原子弹、氢弹和潜艇核动力技术。建立起具有一定规模和纵深布局的核科技工业体系,包括原子能科学研究体系,核燃料工业体系。能设计建造和运行各种原子反应堆。

太阳能设施与装备研究 太阳能是指太阳辐射能。太阳能的转换和利用方式有光—热转换、光—电转换以及光—化学转换等。中国从80年代开始研究光电化学电池、半导体材料,特别是对用多晶薄膜材料制作光电化学电池、充电化学电池,以及光电化学转换储存太阳能的过程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随着军用能源研究的不断深入,军用能源将得到开发,军用能源技术将得到进一步发展,将出现多能互补的格局。新原理武器将会不断地对军用能源提出新的要求,军用能源技术的先进与落后,将成为影响战争全局的重要因素之一。

(俞启宜 胡思得)

军事系统工程研究

(research of military systems engineering)

探讨按照系统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借助信息技术等手段,对武器研制、军队作战、后勤保障、军事行政和其他国防建设与军事斗争活动的组织与管理技术的活动。属军事科学的应用技术研究。依照组织与管理的对象区分,军事系统工程研究可分为国家安全系统工程、作战系统工程、组织系统工程及指挥自动化系统工程研究等。

军事系统工程研究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有组织地开展军事系统工程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在钱学森等倡导下,中央军委科学技术装备委员会办公室于1978年12月成立了由多学科专家组成的“反坦克武器系统工程试点小组”,着手开展应用军事运筹学与系统工程的理论和方法评估武器装备的试点工作。试点小组首次建立了反坦克作战模拟模型,运用电子计算机进行反坦克武器系统作战效能、全寿命期费用和效费比分析,不仅提出了反坦克武器装备研制发展的若干建议,而且摸索出开展军事系统工程研究的一般原理和方法、步骤。反坦克武器系统工程试点小组的工作成果显示了军事系统工程在国防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1979年,军事科学院成立了专门研究军事系统工程的作战运筹分析研究室。1986年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成立了系统工程研

究所。各军种、兵种及各国防工业部门也都于80年代初期成立了各种专业性论证分析机构,研究利用系统工程的理论方法,解决武器装备发展、重大型号项目论证与管理、作战运筹分析、部队作战训练和后勤保障等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问题。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和其他有关军事院校也先后设立了军事系统工程和军事运筹学专业。在军事学术界,先后于1981、1984和1992年成立了军事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军事运筹学会和国防系统分析专业组,出版《军事系统工程》、《系统工程与电子技术》等杂志。这些都进一步推动了军事系统工程的研究与应用。

中国军事系统工程的研究,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①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军事系统工程的研究侧重在提供定量支持的计算机作战模拟系统研制及应用方面。1979年,钱学森、王寿云、柴本良在《军事系统工程》一文中指出,“作战模拟实质上提供了一个‘作战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里,利用模拟的作战环境可以进行策略和计划的实验,可以检验策略和计划的缺陷,可以预测策略和计划的效果,可以评估武器系统的效能,可以启发新的作战思想”。基于这一认识,全军先后研制了上百个作战模拟系统,应用于武器效能评估,装备发展规划以及作战指挥训练等方面。由于缺乏研制作战模拟系统的经验,加上实际问题的复杂性,这一阶段军事系统工程研究成果的实用性不够理想,时效性也较差。②90年代,针对系统工程应用中的成功经验及存在的问题,钱学森于1989年提出了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他指出,这种方法,就是将专家群体(各种有关的专家)、数据和各种信息与计算机技术有机结合起来,把各学科的科学理论和个人的经验知识结合起来,构成一个系统,并充分发挥其整体优势和综合优势,产生新思想、新知识、新方法,用以

解决开放复杂的系统问题。1992年,钱学森又提出了这种方法的应用形式——“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按照综合集成方法,军事系统工程研究除继续努力提高作战模拟系统的质量外,还致力于应用综合专家判断与定量评估的各种软方法,包括决策分析、层次分析、模糊决策等方法。综合集成方法的应用显著提高了军事系统工程研究的有效性和时效性。90年代中期开展的国防科技发展战略研究中,王寿云领导国防系统分析专业组,在武器装备体系对抗问题研究中,提出从体系对抗要求出发,以武器装备体系建设为中心,发展中国武器装备的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具体实施步骤,为研究制定中国的武器装备跨世纪发展战略及规划提供了有效的支持。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军事系统工程研究取得了一大批很有价值的成果,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为国防现代化建设和决策科学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军事系统工程研究正在以改革创新精神,努力适应世界军事发展的挑战,加强在军事领域各个方面的研究与应用,为实现国防现代化的跨世纪战略部署发挥应有的作用。

(张最良)

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easant wars)

探讨中国封建社会发生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及其相关内容的活动。在中国古代和近代战争史上,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仅见的,它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国史领域中一个重大的研究课题。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课题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一

领域的研究处于零散状况,取得的成果不多。薛农山的《中国农民战争之史的研究》(上海神州国光社,1933)、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新华日报》1944年3月9~22日)和李文治的《晚明民变》(中华书局,1948)是当时影响比较大的有限的几部论著,堪称这一时期学术界研究农民战争的代表作。

对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系统 and 大规模研究始于建国以后,“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度趋于沉寂。因此,以“文化大革命”为界线,建国以来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①1949~1957年是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理论学习和准备阶段。在这一阶段,史学研究工作者开始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古代历次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进行探讨与研究,先后发表了650余篇学术研究文章,出版了70多种资料集、论文集和通俗读物。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郑天挺主编的《明末农民起义史料》(1952)、赵俪生和高昭一的《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1954)、漆侠的《隋末农民起义》(1954)、孙祚民的《中国农民战争问题探索》(1956)等。论著的内容主要集中于对马列主义关于农民战争理论的体会,史料的整理与考索,某些较大规模农民战争的介绍,有关农民起义领袖的评价以及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等。②1958~1966年是农民战争史研究的繁荣阶段。这一阶段,学术空气非常活跃,研究成果亦十分丰硕。专题讨论会、座谈会和报告会日渐增多,共发表了各种研究文章2000余篇,出版农民战争的简史、专史、资料集和通俗读物数十种。其中较有影响的有:刘开扬的《秦末农民战争史略》(1959)、万绳楠的《隋末农民战争》(1961)、史绍宾主编的《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讨论集》(1962)、漆侠等著的《秦汉农民战争史》

(1962)以及洪焕椿著的《明末农民战争史略论》(1962)等。在研究过程中,围绕农民战争的性质、特点、起因、历史作用、失败原因、农民政权性质、农民阶级思想、农民战争与宗教关系等一系列农民战争的理论问题,史学界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关于农民战争的性质问题 中国农民战争是否具有反对地主阶级和封建制度的性质?这是史学家们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在这一问题上,有三种不同的意见。

以孙祚民、翦伯赞和蔡美彪等人为代表,认为中国农民战争自始至终都不曾超越封建制度的范围,封建社会中的农民不可能具有把封建当作一个制度来反对的意识,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矛头始终是指向某些为他们所深恶痛绝的统治阶级个别人物,而没有同封建制度进行战斗。(孙祚民《关于“农民政权”问题》,载《新史学通讯》1955年第6期;翦伯赞《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载《光明日报》1961年12月22日;蔡美彪《对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中几个问题的商榷》,载《历史研究》1961年第4期)

以侯外庐、漆侠和白寿彝等人为代表,对此持反对意见。白寿彝认为,封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因而决定了封建社会农民战争的性质必然是反对封建制度的(《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性质的商榷》,载《历史研究》1961年第1期)。漆侠指出,农民有自己独立的思想活动,他们在革命实践中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等纲领与口号,就是其革命思想的具体体现,并且在反封建斗争中起着主导和决定性的作用(《农民是地主阶级的对立面,还是地主阶级的后备军》,载《哲学研究》1964年第3期)。侯外庐在《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的农民战争及其纲领口号的发展》(载《历史研究》1959年第4期)中发表了类

似看法。

郭沫若、戎笙等人则提出第三种看法。他们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的农民战争不反封建,只有在封建社会走向衰落的后期,起义农民提出了反对封建所有制关系的“均贫富”、“均田”等口号,农民战争才具有了反封建的性质。(郭沫若《中国农民起义的历史发展过程》,载《人民日报》1959年5月16日;戎笙《试论明代后期农民阶级斗争的性质和特点》,载《历史研究》1958年第10期)

关于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问题 这也是争论较多的问题之一。在此问题上,史学界一致肯定农民战争打击了封建统治,起到了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但在具体阐述上,却观点各异。

翦伯赞在1951年2月发表题为《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载《学习》第3卷10期)的文章,提出“让步政策论”。他认为每一次的农民战争都不同程度地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迫使统治者不得不作出某些让步,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从而使生产关系得到若干调整,生产力得以继续向前发展。孙祚民同意这一说法,主张要把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同封建王朝初期的生产发展与经济繁荣联系起来考察(载《中国农民战争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中国农民战争问题探索》,1956)。漆侠的《秦汉农民战争史》一书,则概括出一条“让步政策论”的公式,即“革命斗争——被迫让步,再斗争——再让步”。

“让步政策论”在50年代颇为流行,但进入60年代却遭到异议。一些学者认为,仅仅从统治阶级作出让步的角度来理解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是很不够的。孙达人更认为,农民战争之后,新的封建王朝不仅不会实行“让步政策”,而且要“反攻倒算”,理由是农民战争削弱了封建生产关系,农民获得了一定的自由,而农民战争失败后,封建统治者作出的让

步恰恰是要剥夺这种自由,重新束缚农民(《应该怎样估价“让步政策”》,载《光明日报》1965年9月2日)。这一理论被称作“反攻倒算论”。

关于农民阶级的思想问题 在中国封建社会,起义农民究竟是不是皇权主义者?这一问题也引起史学界历久不休的争论。孙祚民的《关于“农民政权”问题》一文认为,农民是自在的阶级,无法理解阶级利益的一致性,他们不能代表自己,因此需要一种至高无上的政府的权力来代表自己,即皇权主义。白寿彝的《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特点》(载《新建设》1960年第8、9期合刊)持相反看法,认为农民不只反对地主、贵族、官吏,而且反对过封建皇帝和封建朝廷,说明农民战争并没有表现出皇权主义的性质。宁可的《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中的皇权主义问题》(载《光明日报》,1960年12月13日),则区分了农民的皇权主义与地主阶级的皇权主义的差别,承认中国农民战争带有皇权主义的性质,但不构成主要方面。

建国后到“文化大革命”前这一时期,关于中国农民战争问题的讨论还涉及到其他许多方面,史学界注重运用马列主义理论分析史实,质疑驳难,空前活跃的学术争鸣推动了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开展,提高了这一课题的研究水平,取得了重大研究成果。然而,由于过分重视史学为政治服务的精神,以及“左”的思想的影响,后期农民战争史研究领域开始出现片面强调阶级斗争的倾向,“文化大革命”期间则恶性发展,正常的学术交流和讨论被迫中止。此外,这一时期的农民战争史研究或侧重于理论概念的争辩,或偏重于研究意义的论述,或局限于某一次具体的农民起义的探讨,或着眼于某些农民战争史料的考释,缺乏理论联系实际,把个别农民起义纳入农民战争史的整体角度来考察,阐明各个时期

多次农民起义的共性、个性及其根源和不同历史作用,从而体现封建社会农民战争的特点和发展规律的系统研究意识,这方面的专著更是付诸阙如。

“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 1978年10月,中国农民战争史学术讨论会在上海举行,会上成立了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从1980年5月起,在成都、西安、桂林、庐山、济南又先后召开了四届中国农民战争史年会,标志着一度沉寂的农民战争史研究重新活跃起来。

不少学者发表了研究文章,一些资料集、论文集和专著也相继出版。安作璋主编的《秦汉农民战争史料汇编》(1982)、张泽咸和朱大渭主编的《魏晋南北朝农民战争史料汇编》(1980)、王永兴主编的《隋末农民战争史料汇编》(1980)、张泽咸主编的《唐五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1979)、杨讷和陈高华主编的《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1985)、谢国桢编辑的《明代农民起义史料选编》(1981)、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的《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一册,1984)以及蒋维明主编的《川湖陕白莲教起义资料辑录》(1980)等资料集为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提供了方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编的《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第一辑,1978)、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主编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刊》(第一辑,1982)、孙祚民的《中国农民战争问题论丛》(1982)等专题论文集则汇集了许多农民战争史专家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反映了新时期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整体水平与状况。

专著方面,田昌五的《中国古代农民革命史》(第一册,1979)和孙达人的《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第一卷,1980)各具特色,具有启发和先导的作用。但都只研究了秦汉时期的农民战争,没有出版后续诸卷。谢天佑、简修

炜主编的《中国农民战争简史》(1981)虽嫌简略,却是建国以来唯一的一部完整反映中国农民战争史的著作。为解决缺乏农民战争史系统专著的需要,1985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开始集体编写一套多卷本的《中国农民战争史》。迄今已经出版的有朱大渭主编的魏晋南北朝卷(1985)、李斌城主编的隋唐五代十国卷(1988)和朱大渭与谢桂华主编的秦汉卷(1990)。这套以分卷主编形式出现的著作,侧重于对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总体性把握,既揭示了不同历史时期农民战争的共同规律,又凸现了各个具体历史阶段农民战争的特点,且在撰写体例上多有创新与突破。此外,张绍良和郑先进的《中国农民革命斗争史》(1983)、胡如雷的《唐末农民战争》(1979)、陶懋炳的《窦建德 李密 杜伏威评传》(1980)、方积六的《黄巢起义考》(1983)、诸葛计的《唐末农民战争战略初探》(1985)、白钢和向祥海的《钟相杨么起义始末》(1981)等著作,从不同角度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农民战争作了探讨,有的提出了新颖独到的见解,学术价值颇高。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自80年代以来,关于明末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研究的著作明显增多,大都集中于进一步运用史料探究考证农民起义军的军事斗争、政权建设及相关史事等情况。例如袁庭栋的《张献忠传论》(1981)、王兴亚的《李自成经济政策研究》(1982)和《李自成起义史事研究》(1984)、柳义南的《李自成纪年附考》(1983)、顾诚的《明末农民战争史》(1984)、方福仁的《李自成史事新证》(1985)、胡允恭的《李自成张献忠起义》(1986)、干纲的《张献忠大西军史》(1987)、袁良义的《明末农民战争》(1987)等。其中尤以顾诚的《明末农民战争史》最值称道,不仅在史料的分析、辨伪与考订上可见作者深厚之功力,而且立论新颖,

文笔生动流畅。另外关于李自成的个人结局的讨论,从80年代初起亦再度成为热点,当时有人对李自成死于湖北通山县九宫山一说加以否定,并提出隐居于湖南石门县夹山寺的说法,由此开始,文章连篇不断,争论愈演愈烈,迄今尚未完全停止。

总体来看,“文化大革命”之后农民战争史的研究规模与氛围,已不像以前那样宏大热烈,并正经历一个由盛到衰、由热到冷的过程。与“文化大革命”之前相比,近20年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在原来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进展,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一些长期存在的认识分歧,逐渐趋于统一;研究领域得到开拓,研究方法和手段上另辟蹊径;某些理论问题的研究有所突破,比如注重同社会经济的发展演变及同农民战争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等等。许多著作和文章力求发掘新资料,提出新看法,探讨新问题,取得的成果斐然可观。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也十分明显:一些论著要么缺乏思想深度和理论分析,停留在罗列表面现象的层次上;要么故作惊人之语,抛出奇谈怪论,有的甚至考证成癖,专同公论定说唱反调。而且,有许多新领域,还需要广大史学工作者全面、深入地去开拓,研究方法还有待进一步更新,这也是新时期如何把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引向深入发展需要解决的课题。

(葛业文)

中国近代战争史研究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odern wars)

探讨1840~1949年间在中国发生的历次重要战争及其相关内容的活动。中国近代军事史研究的主要组成部分。它的任务是研究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110年间历次战争发生、发展和结局的历史,揭示每次战争发生的经济、政治原

因,战争的目的和性质,阐明作战双方的兵力和计划,以及战争的进程,战争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分析战争胜败的原因,总结经验教训,得出科学的结论。

中国近代战争史的研究,肇始于鸦片战争失败之后。1842年9月,林则徐在兰州致友人姚春木、王冬寿的信,是近代最早从军事上总结清军在鸦片战争中失败原因的文献之一。次年刊印的魏源的《海国图志》,则比较系统地总结了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提出了著名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从林、魏至今,中国近代战争史研究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初) 从鸦片战争失败到清王朝覆灭,史学界称之为晚清时期。这一时期先后出现了一批比较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魏源的《道光洋舰征抚记》,梁廷枏的《夷氛闻记》,夏燮的《中西纪事》,张德坚的《贼情汇纂》,《李秀成自述》,杜文澜的《平定粤寇纪略》,王定安的《求阙斋弟子记》、《湘军记》,王闿运的《湘军志》,李滨的《中兴别记》,魏光寿的《勘定新疆记》,罗惇福的《中法兵事本末》,唐景崧的《请缨日记》,姚锡光的《东方军事记略》,易顺鼎的《盾墨拾余》等等。这一时期的战争史研究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大多是对各次重大战争的个案研究,以直观的过程描述为主,间或抒发作者本人对御敌、战守方策的见解。第二,研究者均为封建士大夫,都采用传统的史学观点和方法,尚不能系统、准确地表述近代战争发生、发展的实质及规律。但是,晚清学者们的筚路蓝缕之功仍值得今人缅怀,他们的研究为后世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第二阶段(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 这一时期是近代军事史研究由个案研究走向会通,变描述具体过程为理性探究的发端时

期。其代表性成果首推蒋百里《中国五十年来军事变迁史》(1923)和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1930)。前者对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至1922年间军队建设史、武器装备史、战争史、军事人物和军事思想的演变过程作了会通性综述;后者记述了20世纪前30年内北洋军、奉军等全国各地军队的历史沿革,内容包括军制、军史和战史,实际上是近代最早一部陆军发展通史。30年代初期,伴随着国民党政权统治的确立,一批记述国民革命军建军作战历史的著述相继问世。在此之后,尤其是抗日战争前后,学术界出现了研究军事史的一个高潮。其中侧重于近代战争史研究的专著有:凌惕安的《咸同贵州军事史》(1932)、张荫麟的《甲午中国海军战绩考》(1935)、伍非百的《咸同时期平定川乱方略》(1935)、武伯纶的《近世中华民族抗敌史》(1937)、罗尔纲的《捻军的运动战》(1939)、黄埔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战史研究》(1944)、秦翰才的《左文襄公在西北》(1945)、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训部的《中国骑兵战史资料》(1946)等等。上述著作,虽然超越了以往孤立考察各次重大战争的研究格局,开始注意战争之间的历史联系,但大多内容略呈粗疏,至于英雄史观和唯武器论,以及研究方法上的片面性和形而上学,更随处可见。因此,这一时期的中国近代战争史研究虽不乏若干重要成果,但总体上尚处于幼年时期。

第三阶段(50年代至70年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由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先后出版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捻军》、《回民起义》、《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第二次鸦片战争》等专题资料,计11种68册,共2758万字。同时,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

所主编的《近代史资料》期刊也于1954年创刊问世。“丛刊”、期刊的出版,为近代战争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资料。在此基础上,一大批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对本学科许多领域进行了全新的探索,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其中,近代战争史研究的成就尤为显著。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专著有:姚薇元的《鸦片战争史实考》(1955)、贾逸君的《中日甲午战争》(1955)、牟安世的《中法战争》(1955)、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稿》(1955)、魏建猷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955)、江地的《捻军史初探》(1956)、来新夏的《北洋军阀史略》(1957)、牟安世的《太平天国》(1959)、戎笙的《太平天国革命战争》(1962)、戚其章的《中日甲午威海海战》(1962)、蒋孟引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965)等。与此同时,各地报刊上也登载了为数众多的涉及历次战争史研究的学术文章。从60年代初起,经周恩来总理倡导,全国政协及各地政协先后成立了文史资料委员会,一大批民国时期高级将领纷纷撰写军事回忆录,这些资料陆续在各级《文史资料选辑》中发表,其中相当部分内容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可弥补档案文献之不足。所有这些,不但改变了旧中国历史学研究的面貌,也为近代战争史研究的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5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史学界受到了政治运动的不断冲击,近代战争史研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痕迹。例如,有的学者在研究某些历史问题时,往往离开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而从现实政治情感出发,用“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反动”、“爱国与卖国”这类简单的公式生硬地套用到复杂的历史现象与历史人物上去;在不少论著中,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战争被人为地拔高到农民还不可能达到的高度去渲染和描绘;对封建统治阶

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所作所为,不加分析地予以否定。与上述原因相联系,各个专题研究很不平衡,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一直是研究热点所在,而其他各次重大战争的研究则薄弱得多。这一时期的论著,基本上都是从通史角度着眼的,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军事史、战争史,故大多数研究成果的军事色彩不够浓厚。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成绩还是要充分肯定。因为没有建国后第一代史学工作者的艰辛努力,就不可能有后来20余年的迅速发展。

第四阶段(80年代)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史学界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中国近代战争史的研究也进入了繁荣发展的新时期,取得了许多突破性的研究成就。①在指导思想上,逐渐克服了“左”的错误,对过去被视为已有定论的问题,重新展开讨论,对以往被视为“禁区”的一些领域,努力开拓,简单化、公式化的毛病逐步得到克服。②在研究的广度上,有一批系统研究中国近代战争史的较有分量的学术专著相继问世:张玉田、陈崇桥、王献中、王占国的《中国近代军事史》,是建国后第一部关于中国近代80年的军事通史;军事科学院编著的《中国近代战争史》,是第一部通贯近代80年间的战争专史,该书叙述了1840年至1919年历次内外战争,并对战略战术的得失作了初步的分析,且附有34幅彩色作战示意图,具有较浓的军事特色,是一部成熟之作。1989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出版,其中关于中国近代战争和军事人物条目的编写,第一次从历史长河的高度着眼,对52个中国近代战争战役和43个军事人物的历史地位作了取舍和安排,将近代战争史研究推向了更为科学合理的层次。以上几部著作的出版,成为中国近代战争史研究趋于成熟的重要标志。

与此同时,随着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开创与兴起,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和国民党政府统治初期的各次战争,逐渐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课题。张同新的《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略》(1982)和来新夏主编的《北洋军阀史稿》(1983),都是影响甚广的学术专著。③在研究的深度上,一大批厚积薄发、新意纷呈的专题论著和军事人物传记不断涌现。专著方面,如牟安世的《鸦片战争》(1982),酆纯的《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1982),孙克复、关捷的《甲午中日海战史》(1981)、《甲午中日陆战史》(1984),戚其章的《威海卫之战》(1981),谢本书等著《护国运动史》(1984),雷远高主编的《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史》(1988),毛振发的《护法战争史略》(1989)等。论文方面,则有张一文的《太平天国前期战争的战略问题》(1979)、季平子的《丰岛海战》(1980)、沈渭滨的《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战役研究》(1982)、茅海建的《鸦片战争时期的中英兵力》(1983)、牛俊法的《论近代清军装备与战术》(1985)等。上述成果,或开风气,或集大成,被史学界公认为优秀之作。人物传记方面硕果累累,举凡晚清、中华民国时期的重要军事人物,如林则徐、魏源、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袁世凯、蔡锷、蒋介石等人,均有多种研究性传记出版。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张一文、施渡桥主编的《中国近代军事人物传》,为52个近代军事人物立了传,突出展现了传主的军事色彩;王成斌等主编的《民国高级将领列传》(1~7卷),是建国以来第一部比较系统地记述民国高级将领从军、从政及其他重大活动的书籍,为中国近代战争史研究,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参考资料。④在资料整理编辑方面,先后有多套颇有价值的史料集出版,代表性的成果有:《鸦片战争档案史料》、《鸦片战争史料选译》、《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清末海军史料》、《中华

民国海军史料》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出版的《中华民国史资料汇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以及《历史档案》、《民国档案》等专业杂志，都提供了不少历次战争的重要档案资料。⑤成立了全国性的学术社团组织，即中国近代军事史学会。该会自1986年在北京成立以后，先后组织和召开了三次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出版了三部论文集，有力地推动了学术交流与合作。⑥推出了数种专业性军事史刊物。198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博物馆创办知识性双月刊《军事史林》；1986年，上海空军政治学院创办学术性季刊《军事历史研究》；同年，原为《军事学术》增刊的《军事历史》，也改为学术性与知识性结合的双月刊，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主办，独立发行。中国近代战争史是以上各刊关注的主要内容。总之，这一时期的近代战争史研究已经从早期着重于军事政治关系的一般分析和战争过程的简要叙述的模式中解脱出来，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第五阶段(90年代) 从90年代初开始，中国近代战争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更高层次的发展时期，其特点是：①研究气氛更加活跃，研究队伍不断扩大，海内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在1991年金田起义140周年、1994年中日甲午战争100周年、1998年北洋海军成军110周年之际，全国有关学术团体和城市举办了学术讨论会，出版了多种论文集，极大地推动了这些研究课题的深入发展，并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注意。②研究水准进一步提高，出现了三部学术观点与风格、研究方法以及体系各不相同的代表专著：郭汝瑰主编的《中国军事史》(1983~1991)；高锐主编的《中国军事史略》(1992)；军事科学院组织编写的《中国军事通史》(1999)。在这三部纵贯数千年的军事通史中，近代战争内容均占

相当大篇幅，反映了史学界最新研究水平。此外，还有莫世祥研究护法战争的专著《护法运动史》和姜可夫的《民国军事史略稿》出版。③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宽，研究者的学术视野更加开阔，各项研究成果深化了人们对近代战争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的了解和认识。现已出版的重要专著有：戚其章的《甲午战争史》(1990)、龙盛运的《湘军史稿》(1990)、钟文典的《太平天国开国史》(1992)、张一文的《太平天国军事史》(1994)、《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中国近代战争史分册》(1994)、樊百川的《淮军史》(1994)、马毓福的《中国军事航空1908—1949》(1994)、徐松荣的《捻军史稿》(1996)、张守常的《太平天国北伐史》(1997)、黄振南的《中法战争诸役考》(1998)等。这些著作，不仅超越了以往单纯就战争论战争的研究模式，对隐藏在战争背后起决定性作用的各种深层次因素，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剖析，而且一改往日大多数论著缺乏军事历史学特色的通病，对历次战争的作战指挥、战略战术、武器装备、后勤保障均有详实的记述和独到的分析。其中，尤以《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最为引人注目。这部由中央军委组织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军事科学院等机构编纂的大型工具书，有相当部分涉及中国近代战争史。在军事历史、军事思想等门类中设置的有关条目，基本涵盖了这一时期的重要战争、战役、战斗；重要军事人物及其军事思想；军队发展及组织沿革；著名军事学堂、学校和重要军工企业。该书释文精练准确，文图并茂，体例完备，使用方便，是一部高质量的权威性工具书。在军事制度史方面，则有陈崇桥、张玉田主编的《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1840~1927》、史全生主编的《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军事科学院军制研究部合作编写

的《中国军事制度史》等陆续出版。这几部著作均可资研究者参考。④资料编辑工作在继承中不断发展。其中列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第12种《北洋军阀》、第13种《抗日战争》，均于90年代前期出版。与此同时，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11种专题资料，也由中华书局等单位主持编辑续编，现已出版的有：戚其章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甲午战争》（中华书局1989~1996年版），共约400万字，分11卷。张振鹜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法战争》，共约300万字，已于1995~199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第1、2卷。以上两书的特点是注重了外文史料的搜集，取材精当，规模宏大，出版后颇受史学界的重视。⑤中国近代海军史研究，在这个时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先后出版了胡立人、王振华的《中国近代海军史》（1990）、姜鸣的《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1991）、陈书麟、陈贞寿的《中华民国海军通史》（1993）、海军司令部编写的《近代中国海军》（1994）、姜鸣的《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1860—1911》（1995）、戚其章的《晚清海军兴衰史》（1998）等，尤其是海军司令部编写的《近代中国海军》，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内容最为充实，学术水平也最有分量。总之，这一时期中国近代战争史研究所取得的成绩，不仅促进了中国近代军事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而且为当代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提供了必要的借鉴。

从整体上来看，中国近代战争史研究虽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但与近代史领域其他学科相比，尚有许多不足和差距。对于每一位研究者来说，这既是严峻的现实，同时也是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

参考文献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委员会，《中国军事百科

全书·军事历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

张一文、刘庆、皮明勇编著：《中国近代军事史研究概览》，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

沈渭滨、夏林根、朱学成：《中国近代军事史研究述评》，载《历史研究》1987年第2期。

沈渭滨、苏贻鸣：《中国近代军事史研究四十年》，载《历史教学》1992年第1期。

（金立昕）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史研究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Peasant War)

探讨19世纪中叶洪秀全等领导的太平天国反清农民战争历史的活动。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是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波及地域最广、战斗最为激烈的一次农民起义战争，历来为史学工作者所高度重视。据不完全统计，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出版的有关太平天国的各种书籍达250种以上，发表的论文近4000篇，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军事和战争的。因此，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是近代几次重大战争中被研究得最为充分的一次战争。

从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爆发到19世纪末，先后刊印的有关太平天国战事的书籍约有近百种，大致可划分为三类：一是资料汇编性质的书，如《钦定剿平粤匪方略》、《贼情汇纂》等；二是以纪实性为主的书，如《李秀成自述》、《粤氛纪事》、《粤匪纪略》等；三是专门记述太平天国的对立面——湘军战史的研究性史著，如《湘军志》、《湘军记》等。这些书的立场和观点大都是站在腐朽没落的统治阶级一边，但它们的价值却在于为后人保留了大量的研究资料。

进入20世纪，随着民主革命的兴起和清王朝的覆亡，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由此掀开了新的篇章。1904年，汉公撰、孙中山作

序的《太平天国战史》出版,该书配合革命党人宣传兴汉排满活动的形势,一时风行海内外。20年代初,萧一山的《清代通史》(上中下三卷)相继出版,该书下卷第一编为《太平天国之始末》,作者用了30余万字的篇幅,比较翔实地记述了太平天国建军作战的历史过程。上述两部著作,大体上反映了20世纪初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水平。从《清代通史》问世至今,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

奠基时期(20世纪30~40年代) 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有成就的学者和影响深远的代表作,如王钟麒的《太平天国革命史》(1931),谢兴尧的《太平天国史事论丛》(1935),陈安仁的《太平天国革命战争概论》(1938),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纲》(1937)、《捻军的运动战》(1939)和《洪秀全》(1944),简又文的《太平军广西首义史》(1944),郭廷以的《太平天国史事日志》(1946),范文澜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1949),华岗的《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1949)等。这些著作,或侧重于史料的发掘、搜集,或侧重于史实的考订论证,或侧重于对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历史经验和历史意义的分析解说,具有重要的学术和史料价值,影响很大,堪称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开山之作。

繁荣时期(50~80年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经过几代史学工作者的努力,太平天国史研究逐渐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史乃至整个史学领域中最为突出、最有成就的学科之一。作为该学科的主要分支——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

史料搜集、整理、出版工作成绩显著先后出版了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195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

(1953)、《太平天国资料丛编简辑》(1961)、《太平天国资料汇编》(1980)、《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五辑)》(1980)、《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1984)等为代表的一大批资料书,为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不断深化提供了坚实的史料基础。

史料校勘、考辨、注释工作功迈前人 在这方面,罗尔纲先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为笺证《李秀成自述原稿》,前后长达49年,可谓面壁功深,精益求精。他继承了乾嘉学派的优长而又有所创新,先后修订出版的《太平天国史记载订谬集》、《太平天国史事考》、《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等力作,都是从事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必读书。同时,这一时期出版的其他重要史料校勘、注释本如《洪秀全选集》、《洪仁玕选集》、《洪秀全集》、《曾国藩全集》、《左宗棠全集》等,都为研究者提供了前人难以企及的方便条件。

不少太平天国战争史的研究著作问世其中通史类的,以戎笙等著《太平天国革命战争》(1962),酆纯的《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1982),张玉田、陈崇桥等著《中国近代军事史》(1983),军事科学院编著的《中国近代战争史》(1984)等最富军事特色,影响较大。专题类的则有:酆纯的《太平天国制度初探》(1956),江地的《捻军史初探》(1956),周邨的《太平军在扬州》(1957),钟文典的《太平军在永安》(1962),王天奖的《太平军在河南》(1974),郭豫明的《捻军起义》(1979),董蔡时的《太平天国在苏州》(1981),王兴福的《太平军在浙江》(1982),史式的《太平军在四川》(1985)等。此外,苏双碧著《太平天国人物论集》(1981),钟文典著《太平天国人物》(1984),郭毅生主编的《太平天国历史地图集》和《太平天国历史与地理》(1989),以及为数众多的人物传记,也都是太平天国战争史

研究的重要成果。

发表了一大批研究论文。这一时期发表的研究论文，大致可分为七类：①有关太平军历次战役战斗史实、经过的研究，如江地的《太平军北伐战争始末》（1957），茅家琦的《1860年太平军围攻湖口之役》（1963），舒翼的《太平天国北伐军若干史事考辨》（1982）等。②有关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战略决策问题研究，如茅家琦、方之光的《太平天国建都天京是战略上的重大错误吗？——与牟安世同志商榷》（1963），王庆成的《太平天国内部对建都问题的争论及其影响》（1978），张一文的《太平天国前期战争的战略问题》（1979），沈渭滨的《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战役研究》（1982），苑书义的《评太平军二次西征的最佳方略》（1982）等。③有关太平军战役战术和武器装备问题的研究，如沈渭滨的《一八五三年太平军南京战役研究》（1983），张一文的《从怀庆之战看太平军的战法》（1987），凌崇征的《从太平天国历史看武器装备在战争中的地位》（1986），郭存孝的《太平天国火炮研究》（1988）等。④有关太平军军事失败原因的研究，如李恩普的《太平军攻克苏州及失守原因初探》（1982），杜德凤的《雨花台破围战失败的原因》（1983），朱哲芳的《试论太平军第二次西征失败原因》（1985），齐建的《太平军北伐战役失败原因浅析》（1987）等。⑤有关太平军的对手湘军作战指导思想的研究，如施渡桥的《论曾国藩的战争指导思想》（1988），黄顺力的《试论曾国藩镇压太平军的战略思想》（1988），张海鹏的《湘军在安庆战役中取胜原因析》（1988）等。⑥有关太平军人物研究，举凡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洪仁玕、陈玉成、李秀成等太平天国主要领袖，涉及每人的研究文章都有数十或数百篇，成为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侧

面。⑦有关捻军研究，代表性的文章有：祁龙威的《东捻军失败与赖文光被捕事迹调查简记》（1958），郭豫明的《东、西捻军究竟于何时何地分军？》（1981）等。

深化时期（90年代）进入90年代，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史研究迈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并呈现出以下显著特点：①在积年研究的基础上，一批代表当代太平天国史研究新水平的学术专著陆续问世。著名学者罗尔纲积40年研究而撰成、煌煌四巨册、154万言的《太平天国史》，茅家琦主编、135万言的《太平天国通史》（全三册），同于1991年出版。这两部巨著虽然都是全面、系统的通史，但军事与战争方面的内容均是贯穿全书的核心与主线。此外，陈宝辉等著《太平天国诸王传》（1990），史式著《太平天国史实考》（1991），钟文典著《太平天国开国史》（1992），茅家琦著《太平天国与列强》（1992），张一文著《太平天国军事史》（1994），郭毅生、史式主编的《太平天国大辞典》（1995），张守常著《太平天国北伐史》（1997）等，都是90年代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突出成果。②对太平天国的对立面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逐渐加强。从1990年开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1~22册）的陆续出版，不仅有助于对太平天国革命战争时期清政府及其统治集团的全面了解，而且也促进了对太平天国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在著作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有：龙盛运的《湘军史稿》（1990），贾熟村的《太平天国时期的地主阶级》（1991），朱东安的《曾国藩幕府研究》（1994），樊百川的《淮军史》（1994）等。论文方面呈逐年递增之势。众多研究者对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湘、淮军重要人物的治军特点、战略战术、与清朝中央政府的关系，及其各自力量消长对晚清政

局的影响等,都展开了深入的探讨,不乏佳作。③文献史料研究日益深化、细化。研究者依据近年来新发现的史料,对原来分歧较大或者早有定论的问题,不断地进行过细的考察,从而使研究结论更加客观、平实。这方面的最主要成果,当推王庆成的《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海外新文献刊布和文献史学研究》(1993),祁龙威的《太平天国经籍志》(1993)。④研究机构逐步健全。自1978年起,北京等地相继建立了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在此基础上,1990年在南京成立了中国太平天国史学会。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史研究在繁盛兴旺之后,也在不知不觉中渐趋冷落。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研究难度的加大和学者研究兴趣的转移,研究队伍和发表论文的数量均逐年递减,学术交流和学术气氛也没有以往活跃。另外,还出现了否定太平天国,为曾国藩翻案的种种倾向。因此,在世纪之交,有识之士对21世纪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史研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前瞻性意见,如应该继续深入钻研太平天国史料,提高马克思主义史学修养,注意吸收各种观点,实事求是地阐明这场革命战争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总结历史经验;扩大研究领域,对已有的结论应该建立适当的共识;进一步从军事角度研究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等。

参考文献

陈周棠、吴秦杰、吴晓平:《太平天国研究四十年》,载《历史教学》1991年第10期。

郭毅生、史式主编:《太平天国大辞典》,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姜秉正:《研究太平天国史著述综目》,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

(金立昕)

北伐战争史研究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Northern Expedition)

探讨1926~1927年北伐战争历史所进行的活动。

北伐战争,是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为推翻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的统治,领导国民革命军进行的革命战争。国民革命军于1926年7月誓师北伐,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仅用一年时间,基本消灭了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军队,重创军阀张作霖的军队,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沉重打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推动了中国革命历史的进程,在中国近代战争史上写下了绚丽的篇章。

中华民国时期的北伐战争史研究 对北伐战争的分析、评论,最早可以追溯到战争进行当中。《申报》、上海《民国日报》、《晨报》、长沙《大公报》、《国闻周报》、汉口《民国日报》、广州《民国日报》和江西《民国日报》等报纸,刊登了许多记者在各地采写的战况报道。中国共产党的《向导》周报也发表了不少文章,阐述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30年代初,国民党政府有关部门出版了几部北伐战史著作,主要有:训练总监部秘书室编《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战史纪略》(1930)、江声煌编《十七年度北伐全军作战计划命令经过合编》(1931)、国民革命军战史编纂委员会编《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第1、2辑)等。另外,文公直的《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1930)、华岗的《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1931)、欧振华的《北伐行军日记》(1931)、张粹生的《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之经过》,也记述了北伐战争的主要事件及其经过。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战争时期北伐战争史研究 从总结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出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对中国共

作的北伐战争作了多方面的论述,如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新民主主义论》(1940),周恩来的《关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1943)、《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1944)等文章,都用一定笔墨,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北伐战争的一些重大问题,其重要论断具有深远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北伐战争史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 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一阶段的北伐战争史研究开展得很不充分,成果寥寥可数。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有关内容散见于几部革命史、党史、现代史简要读本和教材之中,侧重北伐战争史的专著仅有叶蠖生、罗仰申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简史》一种,论文不足百篇。研究主要集中在叶挺独立团参加汀泗桥、贺胜桥战斗,工人农民对北伐战争所作的伟大贡献,以及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等问题上。还有些文章对武汉国民政府第二次北伐进行了初步研究,对北伐战争时期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罪恶活动进行了揭露。“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没有真正的历史研究可言,北伐战争史领域同样是一片荒芜。

第二阶段(70年代末至80年代)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大批从事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现代史和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对北伐战争历史给予了高度重视,进行了辛勤探索,取得许多突破性成就。研究领域不断拓宽,过去很少有人涉及的领域如国民党方面人物的活动,北洋军阀、西南军阀以及其他阶级的活动,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过去长期被忽视的课题,如关于北伐期间国共两党的合作问题,北伐时期美、日对华政策的异同问题,以及北伐期间的中外关系问题、

土地问题、工人运动中“左”倾问题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展开了研究。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

一批涉及北伐战争史的学术专著先后问世 如陈志凌著《新编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史稿》,刘继增、毛磊、袁继成著《武汉国民政府史》,黄修荣著《第一次国共合作》,胡之信著《北伐战争》,顾群、龙秋初著《北伐战争在湖南》,来新夏著《北洋军阀史稿》,陈石平编《泸州顺庆起义》等。另外,这一时期出版的所有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现代史和中华民国史的著作,均设专章专节论述北伐战争。

一系列北伐时期重要人物的文集、回忆录相继出版 如《陈独秀文章选编》、《吴玉章回忆录》、《林伯渠日记》、李维汉的《回忆与研究》、《周士第回忆录》、冯玉祥的《我的生活》、《冯玉祥自传》、《李宗仁回忆录》、《张治中回忆录》、《包惠僧回忆录》、《郑超麟回忆录》,以及萧劲光的《北伐纪实》、萧克的《铁军纵横谈》、唐生智的《从辛亥革命到北伐战争》、黄琪翔的《大革命洪流中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李汉魂的《我是沙场过客》等,都为研究北伐战争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此外,一批共产国际代表、苏联顾问有关北伐战争的回忆录也陆续翻译出版,如巴库林著的《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切列潘诺夫著的《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卡尔图诺娃著的《加伦在中国》、达林著的《中国回忆录》、克利莫夫等著《在中国土地上》、勃拉戈达托夫著的《中国革命纪事》以及印度人罗易撰写的《罗易回忆录》等。这些文集和回忆录从不同的侧面与角度反映了北伐战争的一些情况。

一大批覆盖北伐战争历史的资料汇集相继出版 如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

1926)》、《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伐战争(资料选辑)》;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中国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杜春和等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处编《北伐阵中日记》(收入荣孟源主编《近代稗海》第14辑)、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汉口九江收回英租界资料选编》、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中共惠阳地委党史办公室编《叶挺研究史料》、河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北伐战争在河南》等。基础史料的大量出版,有力推进了北伐战争史研究的发展。

发表了一批颇有价值的学术论文。代表性的文章有:龙秋初的《北伐时期的江西战场》和《论北伐时期的浙江战场》、曹敏华的《北伐战争中的福建战场试探》、陈立平的《北伐战争中“铁军”称号的考证》、曾庆榴的《北伐时期的“迎汪”运动和共产党的方针》、李善雨的《北伐时期的李大钊》、高炳康的《北伐时期福建战场的若干问题》、刘曼容的《北伐时期的国民军北方战场》等。上述研究成果,既是新史料发掘的产物,也是学者们解放思想、锐意进取的结果。

第三阶段(90年代) 进入90年代,经过众多学者的长期积累和不懈努力,北伐战争史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主要标志是:

出版了一批研究专著。主要是:王宗华主编《中国大革命史1924~1927》(1990),曾宪林、曾成贵、江峡著《北伐战争史》(1991),李新总编、杨天石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北伐战争与北洋军阀的覆灭》(1996)。这三部著作,集中代表了史

学领域关于北伐战争史研究的新成果、新发展。1996年尚有陈伙成著《国共合作北伐记》一书出版。

发表了一些研究文章。据不完全统计,发表于国内各大报刊的有关北伐战争史的研究文章共有500余篇。其中代表性的论文,如罗铭的《关于北伐战争的军费问题》(1992),马沈的《汀泗桥战斗考》(1992),季云飞的《论北伐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的几个问题》(1993),陆卫明的《北伐战争时期的战略之争与国共关系》(1994),陈铁健、黄岭峻的《北伐战争时期的奉张宁蒋议和》(1995),陈铁健的《北伐漫议——读〈中华民国史·北伐战争与北洋军阀的覆灭〉》(1997),王颖的《北伐战略之争的历史教训》(1999)等,都是颇有影响之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探索了以往学术界早有定论或分歧较大的问题。90年代以来,学者们围绕北伐战争的意义和特点、北伐胜利进军的军事战略和政治因素、国共两党在北伐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工农群众和海外华侨支援北伐战争的特点、苏联对北伐战争的援助以及帝国主义对北伐战争的破坏等问题不断地展开探讨,此外,还就“铁军精神”,北伐两支先遣队作用问题,李大钊、周恩来、叶挺、邓演达、宋庆龄、李宗仁、唐生智、冯玉祥、杨虎城以及加伦、鲍罗廷等人在北伐战争中的作用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和评价。研究的重点主要是:①北伐战争的上下限问题。传统观点认为北伐战争是1926年到1927年间国共合作条件下进行的。近年来有的学者提出,北伐战争在时间上应为1917年至1928年,并应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孙中山于1917、1922、1924年领导的三次北伐;第二阶段是1926至1927年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第三阶段是南京国民政府领导的1928年的北伐,直到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为止。②如何评价南京国民政府

“继续北攻”的性质问题。有的学者坚持认为蒋介石领导的北伐是新旧军阀混战，不能算作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但多数人认为，“继续北伐”的决策是国民党中央决定的，蒋介石作为北伐军总司令，是受国民政府的委派，其目的又在于结束军阀割据，实现国家统一，因此不能称为新的军阀混战，而应视为继承孙中山先生遗愿，实现国家统一的北伐战争。③北伐战争的领导权问题。这是一个分歧较大的问题，一说是国民党领导的，因为从战争的组织领导、政治宣传、命令文告到军队统辖都是以国民党名义进行的；二说是国民党在军事上处于领导地位，共产党在政治上居于领导地位，特别是工农群众运动的领导、北伐初期的筹划与督促、军队政治工作的开展等，共产党都起了主要作用；三说是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四说是主张不要简单地说是哪个党领导的，而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把复杂的事物套一个简单的结论。④对陈独秀北伐观的争论。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很活跃，一种意见认为陈独秀是赞成北伐的，以往之所以对他的北伐观有歧见，主要是他在《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中个别词句引起的误解，不能因此而否定他支持和造成北伐。另一种意见认为陈独秀的北伐观是消极的，之所以如此，是他对北伐的性质、意义、方式和时机有不同见解。⑤对蒋介石在北伐战争中功过的评价。过去很少有人研究这个问题，现在，学者们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既有对他在北伐战争时登上权力高峰并从此走上军事独裁、政治反动道路的笔伐，也有对他在北伐中积极一面的描述，如肯定他“继承总理遗志”，促成北伐大业，在作战中能采纳正确意见，亲临一线指挥，不失主帅风度等。总之，新思路、新观点的不断涌现，有助于从整体上推进北伐战争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参考文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八十年来史学书目 1900～1980》，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曾景忠编：《中华民国史研究述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金立昕）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史研究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battles in the frontal battlefield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探讨 1937～1945 年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的作战历史的活动。

正面战场又称国民党战场，即由国民政府军队担负正面作战任务的战场。据统计，抗战中正面战场共有会战 22 次，重要战役共计 1 117 次，小战斗 38 931 次。正面战场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担负作战任务的敌后战场（又称解放区战场）相互依存、相互配合，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战场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研究概况 正面战场自其形成之日起，人们即开始了对它的研究。国民政府军事当局在战争进行中数次召开的南岳军事会议、参谋长会议及汉口、开封、武功、兴隆山、柳州等军事会议，其主要目的都是检讨前一段作战得失，总结经验教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历次军事会议上的训词及谈话，参谋总长何应钦在历次国民党中央会议上的军事报告，他写的《三年来之抗战经过》、《四年来的战事经过》、《五年来之抗战经过》，都对正面战场历年作战情况作了剖析和阐述。国民党军队各层次作战单位关于战役、战斗的报告和总结，国民党军一些高级将领对战事的分析，也从各自的角度反映了正面战场作战历程。

抗战胜利后,一些有关抗战史的专著、档案史料相继问世,主要有:何应钦的《八年抗战之经过》(1946),陈诚的《八年抗战经过概要》(1946),白崇禧的《抗战八年军事概况》(1946),曹聚仁、舒宗侨编著的《抗日战争画史》(1947),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编的《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部处理日本投降文件汇编》(上下卷,1945~1946)等。这些著述均以较大篇幅,记述和评析了正面战场作战经过以及各方面情况,为正面战场研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资料。

中国共产党对正面战场作战十分重视。抗战期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以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等对正面战场曾作过许多评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向各战略区、各根据地的通报和指示中,都有许多分析正面战场作战的内容。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群众》、《解放》、《八路军军政杂志》、《解放日报》等报刊,对正面战场也作了及时报道和评论。1940年,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辑出版的《抗战中的中国军事》,摘编了大量有关正面战场的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研究概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抗日战争史研究集中于敌后战场方面,正面战场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由于连续的政治运动,人们对这个政治敏感性很强的领域不敢涉足,正面战场实际上成为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一个“禁区”。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史的研究开始步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轨道。20多年来,正面战场研究异军突起,成为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十分活跃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

学术专著相继出版 如郭雄等编写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重要战役介

绍》,毛磊等撰著的《武汉抗战史要》,茅海建、刘庆、皮明勇等编写的《国民党抗日殉国将领》,贾绣君等的《国民党抗日爱国将领传》,陈小功的《抗日战争中的国民党战场》,张宪文主编的《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张宏志的《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马振犊的《惨胜——抗战正面战场大写意》,石柏林的《从长沙大火到衡阳失守——国民党抗战内幕》等。1994年12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写的《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中下三卷全部出齐。这部国内迄今篇幅最大的抗战史著作,代表了史学界对抗日战争史包括正面战场作战史研究的新水平。1997年7月,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委员会编纂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出版,其中中国近代战争史学科,设置了正面战场历次重要作战的条目,史料精确,立论谨严,是目前研究正面战场作战史的权威性著述之一。

史料的整理、编纂、出版成绩显著 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成果,当属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抗日战争正面战场》,该书公布了大量馆藏的国民政府指导抗战的文电档案,备受学术界称道。其他重要资料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辑的《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长沙作战》、《香港作战》、《河南会战》、《湖南会战》、《广西会战》、《昭和十七、十八年(1942、1943)的中国派遣军》、《昭和二十年(1945)的中国派遣军》等,浙江省中国国民党历史研究组编印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战场史料选编》,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局编的《卢沟桥事变和平津抗战》,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的《八一三抗日史料选编》,江西省上高县政协编的《上高战役史料选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的《原国民党将领抗

日战争亲历记》丛书，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四川省政府参事室编的《川军抗战亲历记》等。1997年，由中国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的《抗日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第13种公开出版，为深入研究抗日战争提供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资料。另外，《民国档案》、《历史档案》两份专业杂志先后发表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档案史料。

研究队伍扩大，学术空气浓厚 1980年张晔发表《怎样看待抗战初期的国民党战场》一文，提出如何正确评价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历史作用问题，在史学界引起很大反响，许多人投入了这项研究。198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时，发表了一批关于正面战场的文章，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研究者。此后召开的一系列关于抗日战争的学术讨论会，正面战场作战史研究都是与会者十分关注的重点课题之一。1991年1月，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在北京成立。同年9月，由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的《抗日战争研究》创刊。这份专门以抗日战争史为研究对象的学术季刊，有关正面战场作战史研究的内容，每期都占有相当的比例。与此同时，各地报刊上有关正面战场作战史研究的文章不断涌现。

1995年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出现了抗战史研究的热潮，正面战场作战史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全国各地举办了多次纪念性的学术研讨会，出版了一大批抗战史著作。除上面提到的军事科学院编写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外，李新、陈铁健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抗日战争时期三卷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95年8月出版，该书对正面战场的作战历史进行了新的梳理和叙述，是研究正面战场作战史的又一项重要成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出版社、

重庆出版社均推出了抗战史丛书，受到了史学界的关注和好评。

研究课题集中 80年代以来，正面战场作战史研究的主要课题大致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国民政府的抗日准备问题 过去对这个问题或是避而不谈，或是认为国民政府对抗日未做任何准备，只是被迫仓促应战。1985年2月出版的《张治中回忆录》较早提出国民政府准备抗日的事实，引起了史学界的重视。1987年，胡哲峰在《军事历史研究》第2期发表《抗战前国民党政府国防准备评述》，介绍和分析了抗战正式爆发前，南京国民政府的军队和战场准备情况。乐嘉庆、姜天鹰在《复旦学报》社科版第5期发表了《评抗战前夕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抗日准备》一文，指出：“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就提出了准备抗日的问题，但大多停留在计划上、口头上，只是到1935年底，由于日本的侵略已经威胁到国民党政权自身的稳固，才“不得不逐步把抗日准备从口头的幌子变成了初步的行动”。陈谦平在《南京大学学报》第1期发表的《试论抗战前国民党政府的国防建设》一文中，详细叙述了南京国民政府进行国防区域的划分、国防工事的构筑和江海防要塞的整建情况，指出这些国防建设“增强了中国军队抵御日本侵略的能力”，但是，由于“攘外必先安内”错误政略等因素的影响，整个建设可说是“计划周密，进展缓慢，魄力有限，功效甚微”。进入90年代，又有多篇文章论述了这一问题，如陆大钺的《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调整兵工事业述论》（1993）、王德中的《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航空工业》（1994）、李占才的《铁路抗战准备工作与徐州会战中的铁路运输》（1994）等。另外，军事科学院编写的《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卷、马振犊著《惨胜——抗战正面战

场大写意》，都专设章节，从各个方面综述了国民政府抗日准备的情况。目前，史学界普遍认为，国民政府的抗日准备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防能力，为抗日战争创造了一些有利条件。但是，由于长期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基本国策，致使国民政府的备战工作进行得极不充分、极不完备。

关于正面战场的战略方针问题 长期以来，人们常用“片面抗战”或“消极防御”来统括国民党的战略方针，自1985年徐矛、王建朗提出国民党的“持久消耗”战略方针后，史学界陆续发表近20篇文章论述这一问题。余子道在《中国正面战场对日战略的演变》（载《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1935年春夏间蒋介石提出了这一战略的初步构想，1937年8月7日由国防会议正式决定为抗战的基本战略方针，但至1938年11月南岳军事会议时才最终形成。“持久消耗战略”的主要内容是“由持久战略、消耗战略、单纯防御战略、以阵地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战略等等组成的”。其具体口号是“以空间换时间”；其实施方针是“积小胜为大胜”。对于国民政府的这个战略方针，研究者们大都予以肯定，认为这是国民政府统帅部“在正确分析了敌我形势与战争实力差距之后所制定的符合实际的战略”，“对奠定中日战争的长期化格局，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与此同时，学者们也指出，国民政府这一战略方针也包含着错误的一面，即持久战略的不彻底性和动摇性、依赖外力取胜、消极防御的战场作战方针、以阵地战为主辅之以运动战和游击战的战争形式等，而且“随着战争的延续和国民党反共反人民倾向的日趋上升，错误一面在不断地发展着”。

关于正面战场重要战役评价问题 这是80年代以来学者们花费力量最大、成果也最丰富的课题。在现有的抗日战争史和中国现

代史专著中，都用较大篇幅叙述了正面战场的重要战役，并对历次战役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作用及影响进行了客观的评价。另有近百篇论文分别对卢沟桥事变，淞沪、忻口会战，南京保卫战，台儿庄战役，徐州、武汉、南昌、随枣、桂南会战，三次长沙会战，中条山会战，中国远征军人缅作战，豫湘桂战役，缅北滇西作战等进行了专题研究。这些论著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澄清事实，驳斥日本某些人推卸发动侵华战争罪责的谰言；二是从战争全局出发，对敌我双方的战略计划、战役经过、结果及其各方面的影响进行多方面的分析，对一些重要战役力求作出科学、全面的评价；三是围绕淞沪会战的发起问题展开争鸣，提出了一系列新见解；四是对过去一直被忽视的某些战役战斗重新认识，填补正面战场作战史研究中的空白。

关于正面战场战略阶段划分问题 近年来研究者对抗日战争何时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及正面战场是否存在战略反攻阶段，提出了一些不同于传统观点的新看法。何理认为，1938年10月武汉失陷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是相持阶段的前期。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的几年，是抗战的第三阶段，可称为战略相持阶段的后期。刘庭华认为，1938年11月至1940年夏，是“由战略防御向战略相持的过渡阶段”；1941年至1945年8月为“完全的战略相持阶段”。隆武华则把武汉失守到第一次长沙会战胜利称为“过渡时期”，划入战略防御的第二阶段，1939年的湘北大捷至昆仑关对峙期间，抗日战争才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关于战略反攻阶段问题，史学界目前的观点不尽一致。一些学者认为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没有实施战略反攻”。这是因为当1944年解放区战场转入局部反攻时，正面战场正面临着第二次大溃退，从全国战场看并没有进入所谓的反攻阶段。1945

年春，国民政府曾决定于同年秋开始对日军发动进攻，然而未及实施，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因此，“中国的抗日战争不存在一个战略反攻阶段，而是在战略相持阶段以后，在外部力量的支援下，急速转入胜利”。90年代中期开始，有些学者论证中国抗日战争存在战略反攻阶段。他们认为，战略反攻不单单指全面战略反攻，也包括局部战略反攻。从1944年初起，中国军队先后在几个重要战场上转入局部战略反攻，使中国抗战走出了持续多年的战略相持阶段，步入战略反攻的新阶段。

关于地方实力派部队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问题 抗日战争中各地方实力派部队参战兵力约有百万人之多，是正面战场的主力军之一，但是以往却很少有人研究。近20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一批专著、回忆录、史料集和人物传记相继问世，许多论述地方实力派抗战的文章不断发表。在结论方面，谢本书发表在《社会科学家》1991年第2期的《论地方实力派》一文，详细分析了西南地方实力派和北方地方实力派在抗战期间的不同表现、不同道路、不同归宿及其根源之所在。马振犊发表在《民国档案》1993年第2期的《华北地方实力派抗日态度之比较研究》一文，着重分析了河北宋哲元、山西阎锡山、山东韩复榘的所作所为对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战局的影响与后果。在专题研究方面，代表性的文章有：陆军、杜连庆的《抗日战争中的东北军》（1988），王干国《川军出川抗战述略》，赵万钧、纪青的《抗日战争中的桂系》（1990）等。这些文章充分肯定了东北军、川军、桂系军队在抗战中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深刻剖析了其历史局限性。目前，有关地方实力派部队参战问题的研究正向深层次发展。如有学者通过考察地方实力派军队在台儿庄战役中的作用，提出了区别

国民党嫡系部队与非嫡系部队的界定原则，视角独特，具有新意。

关于正面战场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 80年代以来，众多著述均论述了这一问题。内容大致分为对正面战场在不同阶段的评价和总体评价、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等方面。对战略防御阶段的正面战场，史学界一致的看法是：正面战场是战略防御阶段的主战场，担负了抗击日军战略进攻的主要任务。虽由于战略指导的某些失误，进行单纯的阵地防御，未充分发动民众参战，使得多数作战未能给敌人以更大的消耗，并丧失了过多的国土和城市，但广大爱国官兵出于民族义愤，不惜流血牺牲，进行顽强的作战，仍给敌人以相当的打击。对战略相持阶段的正面战场，史学界一般是将其划为前期和后期来分别评述。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了南岳军事会议，调整了指挥系统，对部队进行了部分的补充和整训，使战斗力得到一定的恢复。在抗击日军数次的有限进攻中，基本稳定了原有的战线，并在1939年冬季攻势中，对日军实施了广泛的袭击，给敌一定的打击和消耗，在战略上配合了敌后战场的作战。但是，由于受日本诱降和国际绥靖主义者劝降的影响，国民党反共分裂和妥协投降倾向显著增长，五届五中全会及其“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的提出和实施，两次反共高潮的掀起，给坚持团结抗战造成了严重的危机，加重了相持阶段的困难。因此，在相持阶段前期，正面战场作战的范围、规模及频繁程度，都较战略防御阶段有明显的减弱，各战区部队未能充分积极作战，主动策应配合，以钳制更多的日军。与此相反，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对中国抗战相持阶段提出的总任务和战略策略，成为全国人民坚持持久抗战、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指针,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广大军民,成为坚持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敌后战场成为抗击日伪军频繁进攻的主战场,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等武装成为对日伪军积极作战的主力军。1939年初到1943年上半年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后期,正面战场在这一阶段先后取得了上高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及鄂西会战等后期反攻的部分胜利,恢复了原态势,给日军以较大的消耗。但是由于蒋介石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遂使正面战场进入1940年后便相对沉寂下来,其统帅部既无积极的作战指导,第一线部队又疏于戒备,因此在1941年日军向豫南、晋南等地的进攻中,中国军队遭受严重损失,特别是中条山之战丧师失地,成为中国军队的耻辱。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依靠外援,坐待胜利,消极对敌,准备内战,所以在这个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是起消极作用的。对于如何评价正面战场在1943年秋至1945年9月这一阶段的作用,研究者们普遍认为:1943年春夏以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已经不可阻挡,敌后战场各根据地军民向日伪军普遍发起了猛烈的局部反攻。然而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却顽固坚持其与人民群众的利益背道而驰的政策,政治上失掉民心,经济上腐败透顶,军事上被动消极,以至于正面战场在1944年4月至12月日军发动的豫湘桂战役中一败涂地,“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令人遗憾而又痛心的一页”。但是,日军在此次作战中也付出了重大的代价,更由于中国抗战的重心——解放区战场的强大攻势作战锐不可挡,日军孤注一掷的冒险挣扎,不但没有改变整个被动局面,相反使它在大陆战场的战略态势急剧恶化。

关于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关系问题

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一致认为: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二者缺一不可,共同组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中国战场。“两个战场相互依存、相互配合的关系一直贯穿着整个抗日战争时期”。

正面战场作战史,是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有人用“成果斐然、观点各异、争鸣激烈”来形容20世纪后20年该领域的研究状况。当然,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还有许多,需要史学家们共同努力,奉献出更丰硕的科研成果。

参考文献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抗日战争史研究述评》,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

曾景忠编:《中华民国史研究述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金立昕)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研究

(study of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探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立及其发展壮大历史的活动。是军事历史学的主要内容之一。其任务是:通过研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诞生、发展和壮大的历史过程,揭示其发展壮大的基本规律和根本原因;探讨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的使命和作用;总结其发展建设中的经验与教训等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研究是从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建军之后不久即已开始,大体可以分为两个大的历史时期:

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研究 1928年10月和11月,毛泽东先后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初步总结了三湾改编后红军建设的经验,回答了当时军队建设中亟待解决

的重大问题。1929年12月,毛泽东又对红军创建两年来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所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是毛泽东对红军军史研究的重大成果,以会议决议的形式,明确规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性质、任务,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制定了军队建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红军肃清了旧式军队的影响,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之上,从根本上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改造成为具有无产阶级性质和严格组织纪律的、能够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大问题。由于长期处在战争环境之中,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的研究基本上限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及其领导机关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中。其特点是:①从战争实际出发,密切结合当时的斗争实际,积极开展对策性研究,及时解决军队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军队建设的方针和原则。②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回答了当时军队建设中急需解决的一些重大问题。诸如:中国共产党要不要建立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党对军队要不要实行绝对领导,军队除打仗之外要不要开展群众工作与担负必要的生产任务,军队要不要实行民主制度,军队要不要严格纪律,军队要不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性质、任务和宗旨,等等。这对于推动军史研究工作的深入发展,不断加强军队建设乃至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都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研究 具体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50~70年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为了加强中国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决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并分别设立战史部(后改称军事历史研究部)和战史系,以加强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战史研究;向全军发出指示,要求各部队加强军事历史研究,尽快编纂出各军军史、战史,以加强对部队的革命传统教育。随后,又批准了军事科学院临时党委《关于编写我军战史情况及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1958年11月),同意组织力量,首先编写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红军战史、军史。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关怀和指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研究取得许多可喜的成果。其中影响较大的成果有:①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组织完成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历史资料选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史料摘要。接着,又完成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省)史料汇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甘史料汇编、解放战争时期史料选编和基本参考资料汇集,为深入研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战史创造了良好条件。②研究撰写了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专题报告,为深入研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奠定了重要基础。③从1959年6月起至60年代初,全军许多单位陆续研究编写出了一批军史和战史著作。

第二阶段(80~90年代)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并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陆续取得了一些重大研究成果:

编纂出版了大型工具书 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和《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是目前辞书最高水平代表作,最具权威性。特别是《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基本上吸纳了多年来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它几乎覆盖了这一研究领域的所有方面,

为深入研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陆续出版了一批军史研究著作。在中央军委关怀指导下,陆续编撰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史》、《八路军敌工工作史》、《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暨山东军区史》、《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八路军山东纵队史》、《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史》、《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史》、《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史》、《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史》等,比较集中地记述了革命战争时期有关部队的诞生、发展及其相关的内容。另外,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和“九五”规划,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撰的八卷本共约320万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预计2002年陆续出版。这部军史全面、系统、准确地记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光辉战斗历程,科学地总结其丰富的斗争经验。它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部军史,全面展示了目前军史研究最新成果,必将进一步推动军事历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陆续出版了一批比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诸如:《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史》、《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简史》,《当代中国》丛书国防军事卷中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当代中国军队的政治工作》、《当代中国军队的后勤工作》、《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当代中国海军》、《当代中国空军》、《当代中国兵器工业》、《当代中国装甲兵》、《当代中国军队群众工作》、《当代中国民兵》,以及军队院校史等专著和报告。

整理出版了一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如:经中央军委批准编纂的大型《中国

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现已出版《红军长征》、《八路军》、《新四军》、《各地武装起义》、《巩固陕甘根据地》、《南方八省三年游击战争》,全面、系统、准确地汇集了人民解放军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文献,代表了军事史料工作的最新水平,而且已经发挥出显著的社会效益。此外,中央档案馆等也先后编辑出版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8集)、《八七会议》、《南昌起义》、《湘赣边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左右江起义》、《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遵义会议文献》、《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集》、《晋冀鲁豫边区史料选编》、《百团大战史料》、《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皖南事变》等。

出版和发表了人物军事文集和传记。如:《毛泽东军事文集》和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军事文选先后整理和出版。无产阶级军事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叶挺、杨尚昆、李先念、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许继慎、蔡申熙、段德昌、曾中生、左权、彭雪枫、罗炳辉、黄公略、方志敏、刘志丹等传记,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辉战斗历程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这一阶段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研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充分肯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认为,中国革命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坚持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宗旨,为人民和民族的解放事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立下了不朽功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保持和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为巩固和捍卫新生的人民政权,粉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一切反动势力的颠覆活动,保卫国家安全和人民的和平劳动,保卫改革开放成果和参加、支援社会主义建设等等,都作出了伟大贡献。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自身建设也得到加强,它已经发展成为一支诸军兵种合成的具有强大战斗力的人民军队。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贯彻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锐意改革,开拓进取,使自身的建设又有了新的进步,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了坚强有力的保证。实践一再证明,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愧是人民的子弟兵,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钢铁长城,捍卫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重要力量。

充分肯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长期斗争中逐步形成的基本经验。中国人民解放军之所以能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赢得广大人民的赞誉,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是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套区别于其他任何军队的建军、作战的理论和原则。诸如:坚持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坚持紧紧地 and 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决执行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的三大任务,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军政一致的三大原则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与人民战争相适应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坚持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等等。这些宝贵经验已经成为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巨大精神财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仍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妥善地解决了一些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重大争议问题。长期以来,史学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按照《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客观、公正地处理了许多历史遗留下来的重大问题。譬如《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不仅对林彪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而且对红军长征中的“密电”问题也作了客观、公正的表述。书中指出:张国焘“仍坚持其‘乘势南下’的错误主张,并于9月9日,背着中共中央电令陈昌浩,以武力要挟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阴谋危害党中央。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看到电报后,立即报告了毛泽东,在紧要关头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为党立了大功。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同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博古等在红3军驻地阿西紧急磋商,为贯彻党的北上战略方针,推动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和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率领右路军中红1、红3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脱离险境,先行北上。”“在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时,红四方面军中有人不明真相,提出是否派部队拦阻。总指挥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要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为避免武装冲突,维护红军团结,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样,不仅保证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的真实可靠性,而且为今后的部队建设提供了必须汲取的重要历史教训:永远把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坚决维护部队内部的团结和统一,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汲取这一历史教训,对加强部队建设尤为重要。

研究趋势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仍然存在许多热点、难点和疑难问题。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关于肃反扩大化问题、西路军的形成及其失败的历史责任问题等;抗日战争时期,关于百团大战问题、皖南事变问题、“抢救失足者运动”问题等;解放战争时期,关于“让开大路,占领两厢”问题、四平保卫战问题、晋察冀军区精简整编问题等。深入探讨和妥善解决这些问题,是摆在史学工作者面前的严肃的政治任务,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地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得出正确的结论,以推进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的研究,为繁荣和发展中国军事科学作出应有的贡献。

(徐占权 王有鹏)

八路军军史研究 (study of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Eighth Route Army)

探讨八路军的建立及其发展历史的活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研究的内容之一。其任务是:揭示其发展壮大的基本规律;探讨其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总结其发展建设中的经验教训等等。

研究简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史学界就开始了对八路军军史的资料搜集整理研究工作,并撰写出版了有关著作,如《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和新四军》(1953)、《129师暨冀鲁豫军区抗日战争史(草稿)》等。

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八路军军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其研究范围也逐步扩大,新老课题研究不断深入,一些专题研究也取得了比较重大的进展。研究的热点问题主要有:八路军在太原失陷前是否执行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战略方针、平型关战斗的评价、百团大战的评价等,这些热点问题的深入探讨,对于从整体上提高八路军

军史研究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是八路军军史研究蓬勃发展时期。其间,恰逢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5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60周年、70周年等重大纪念活动,为史学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机遇,使八路军军史研究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

研究成果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挖掘整理了一大批新的史料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军内70余位史学工作者编纂的八路军史料丛书,是一部全面、系统、完整的八路军史料库,其内容包括综述大事记、文献、回忆史料、参考资料等,分8册,共约550余万字,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各个方面活动的本来面貌。此外,由后勤学院历史研究室和解放军档案馆编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共7册),是一套研究八路军后勤史比较全面的史料汇编,填补了八路军军史资料的一项空白;全国各地对本地区史料的收集整理日趋重视,也为八路军军史研究提供了条件,如《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资料选编》、《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历史资料》、《八路军山东纵队回忆史料》、《晋豫烽火:八路军晋豫边游击支队回忆录》等,从不同方面为八路军军史研究提供了一些参考资料。

出版了一些研究专著 80年代中期以来,八路军军史研究不断深入,有关著作相继问世。1991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姜思毅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军队政治工作七十年史》第二卷《在抗日战争中成熟》,详尽叙述了八路军政治工作从实践到理论逐渐成熟的发展轨迹。1994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刘家国所著《浴血奋战:抗日英雄八路军》,虽属战

史研究著作,但对八路军从改编至抗战胜利的发展也作了全景式的概括,特别是在史料的采用上有一定的新意。1998年济南军区政治部联络部编写的《八路军敌军工作史》(上、下),以翔实的史料阐述了八路军敌军工作的开展情况。此外,一些关于八路军各部队及其军区的发展史研究著作也相继出版。其中有:1986年出版的《晋察冀军区抗日战争史》、《牺盟会和决死队》,1991年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抗日战争时期)、《冀鲁豫边区革命史》,1994年出版的《八路军第120师晋绥联防军抗日战争史》,1995年出版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史》,1998年出版的《八路军抗战史》等,都从不同侧面研究了八路军的改编、沿革及发展变化问题,其中不乏许多创新的观点。

专题研究取得重大进展 如八路军的精兵建设、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的形成、游击战理论等。此外,八路军军史研究的范围也不断扩展,八路军南下支队、先遣纵队、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八路军瓦解和争取敌军的工作、八路军的大生产运动等等,都有一批论文发表,充实了八路军军史研究的内容。

(张婉英)

新四军军史研究 (study of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New Fourth Army)

探讨新四军建立及其发展历史的活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研究的内容之一。其任务是揭示其发展壮大的基本规律;探讨其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总结其建设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等等。

研究简况 20世纪50年代,中国史学界就开始了对新四军军史的研究,主要进行了一些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同时也对一些历史事件进行了一定的考证。60~70年代,由于受“左”的思潮影响,学者们很少涉足这

一领域。即使有些研究,但对个别历史问题的结论也有失客观公正。这期间,新四军战史编审委员会于1963年编写出《新四军抗战史(初稿)》,由于历史原因一直未公开出版。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使很多重大历史问题得以澄清和总结,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史学界对新四军军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研究成果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研究新四军发展史的通论著作相继问世如军事科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二卷(1987),田玄著《铁军纵横:华中抗战的新四军》(1996),马洪武、童志强著《新四军发展史》(1997)等,标志着新四军军史研究取得了具有开拓意义的突破性进展。

研究新四军不同阶段或部队史的著作陆续出版 如《新四军重建军部以后》(1983)、《新四军第五师抗战历程》(1985)、《新四军军部在黄花塘》(1988)、《新四军第五师抗日战争史稿》(1989)、《烽火江南话奇冤——新四军与皖南事变》等,使新四军军史研究在广度与深度上都有了进一步发展。

研究新四军军史的资料大量出版 到目前为止资料搜集最全面、最系统的是解放军出版社1990~1995年出版的新四军史料丛书。它包括综述大事记、文献、参考资料、回忆史料等共12册,所辑史料均经过专家评审,具有权威性。此外,各地也整理和出版了一些史料集,如《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10辑)、《新四军在茅山》(1982)、《新四军办事机构概览》(1988)、《江淮烽火》(1991)、《新四军在皖南(1938~1941)》(安徽省档案馆)、《新四军在黄花塘》(1993)、新四军第四师老战士回忆录《抗战在淮北》(2辑,1995、1997)。另外,以研究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斗争史实为内容的《大江南北》杂志也

已问世。

研究新四军军史的个案问题取得进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关于新四军成立时间问题 史学界对此产生争鸣，说法不一。多数学者认为，新四军的成立时间应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时间，即1937年10月12日。军事科学院编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年大事记》（1927～1987）、《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七十年》即采用的这一时间。

关于新四军军部成立的时间和地点问题 对此问题史学界争论也相当激烈，但多数学者认为，新四军军部应是1937年12月25日在汉口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年大事记》（1927～1987）、《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七十年》中采用了此种说法。

关于皖南事变问题 皖南事变是新四军军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进行分析探讨，结论也各有不同。主要集中在皖南事变中新四军遭受重大损失的责任问题。绝大多数观点认为，皖南事变中新四军遭受严重损失，主要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反动阴谋造成的。但从中国共产党内说，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项英对这次失败负有一定的责任。项英在领导新四军的工作中做出过贡献。但他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认识不足，对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的正确方针理解不够，措施不力。当国民党顽固派阴谋进攻新四军的迹象已十分明显时，他对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的转移，迟疑犹豫，未抓住北移的有利时机。最后在北移中，没有做出应付突然事变的充分准备。当国民党顽军发动进攻时，又处置失当，因而未能减轻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的严重损失。也有少数学者认为，新四军错过北

移时机原因复杂，不能把责任全部放在项英身上。

（张婉英）

土地革命战争史研究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grarian Revolutionary War)

探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人民为反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工农民主政权而进行的革命战争的活动。是中国现代军事历史研究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任务是：研究自大革命失败后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十年间土地革命战争发生、发展和结局的历史，揭示其发生的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等原因，以及战争的目的和性质，阐明作战双方的兵力和部署，战争的进程，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总结战争胜利和受挫的经验及教训，得出科学的结论，从中得到借鉴。

对土地革命战争史的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至今已有70余年，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起步阶段（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又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革命战争的奠基时期，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时期。由于当时处在战争环境中，对土地革命战争史的研究基本上限于上层党政军领导人及其领导机关。早在1928年12月，《红军第四军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就提出“编纂红军战史及死难同志传略，并收集其遗嘱、遗物，做纪念品”。1931年4月17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成立红一方面军军史编辑委员会，叶剑英为总编辑，朱云卿、郭化若、左权、杨立三、范树德、林彪、林野、黄公略、陈奇涵、耿凯、邓萍、曾士峨等为编辑委员会委员。下设战史部、编译部、杂志部、军事地理部。1937年5月1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

东、红军总司令员朱德,联名发出征集红军历史材料的通知,并决定成立红军历史征编委员会,徐梦秋为主任,张爱萍、陆定一、丁玲、吴溪如、舒同、甘泗淇、傅钟、黄镇、萧克、邓小平等为委员,负责编写红军战史。同年6月12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总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建军、作战等方面经验,提高红军指战员的军事知识,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决定成立军事研究委员会,朱德为主席,毛泽东、林彪、萧劲光和李德为委员。1944年,为了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更好地指导今后的建军和作战,朱德在延安召开编写红一军团(包括原红三军团)史座谈会,亲自部署红一军团史的研究和编写工作,并把它作为向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献上的厚礼。这一阶段涌现出一批比较有影响的代表作。如:毛泽东撰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共产党人〉发刊词》等。其中影响最深的是毛泽东于1936年12月撰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一部高度浓缩了的土地革命战争史的经典文献。该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对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的基本经验进行了科学总结和高度概括,分析了土地革命战争发生、发展的根本原因,阐明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性质、任务及其所应采取的正确战略战术。这一阶段,土地革命战争史研究的特点是:①与当时的斗争实际相结合。许多领导人和领导机关从当时的斗争实际出发,着重研究反“围剿”作战胜利和受挫的经验和教训,力求做到打一仗进一步。②研究者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到军事历史研究领域,

实事求是地研究土地革命战争的有关问题。③对土地革命战争史的研究尚未形成群体规模,学术研究成果大多系论文和专题报告,专著则很少,而且属局部性的,不全面、不系统、不深入。

发展阶段(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于全面、深入、系统地研究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作战的历史极为重视,决定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和高等军事学院,并分别设立了战史部和战史系,加强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同时发出指示,要求全军各部队编纂军史、战史,加强对军队的传统教育,推动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批准军事科学院临时党委于1958年11月22日《关于编写我军战史情况及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同意组织力量研究和编写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红军战史。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关怀和指导下,土地革命战争史的研究工作步入发展的轨道,涌现出大批优秀的科研成果。经毛泽东亲自审定,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公开出版,为深入研究土地革命战争史奠定了理论基础。由军事科学院战史部(后改为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辑出版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史资料选编共八辑32册1200余万字,《军事文献》共三集150余万字,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史料摘要(约50万字),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各地(省)史料汇编(约300万字),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陕甘史料汇编(约300万字),为深入研究土地革命战争史提供了重要保证。经过广大编写人员的艰苦努力,于60年代初,《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中国工农红军西北红军战史》等相继编写出来,并进行了许多专题研究,编撰了许多专题材

料,为全面加强土地革命战争史的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

繁荣阶段(70年代末至90年代)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盛世修史”提供了良好的客观条件,给史学研究、编史修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土地革命战争史研究比较全面、深入、系统,科研成果十分显著。主要是:

研究专著陆续出版 60年代初经中央军委批准编撰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等,经过加工修改后陆续公开出版发行。随后,《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史》等亦相继公开出版发行。这些专著比较集中地记述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三大主力红军的作战及其相关的内容,反映了土地革命战争史研究的主体内容。军事科学院编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三卷本、约150万字),曾获得首届中国图书奖(国家最高等级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历史研究所达到的水平和在全国社会科学领域中所处的地位。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编的《红军长征史》,于1997年被评为第三届国家图书奖、五个一工程奖。

大型工具书陆续问世 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先后出版发行。这两部大型工具书中,特别是《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中,大量吸纳了土地革命战争史的研究成果,几乎覆盖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全部重要内容,为深入研究土地革命战争史提供了方便。

大型历史资料丛书陆续出版 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是经中央军委批准编纂的共43卷、250册、2亿多字的大型《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现已出版了《红军长征》、《各地武装起义》、《巩固陕甘根据地》、《南方

八省三年游击战争》等卷,共120多册。正在编辑加工的《红军初创时期的游击战争》、《红军反“围剿”》等卷也将面世。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全面、系统、准确地汇集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重要文献,代表了军事史料工作的最新水平,为深入研究土地革命战争史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各地编撰的专著、资料专集陆续出版 如《南昌起义研究》、《井冈山斗争史稿》、《中央革命根据地斗争史》、《中国共产党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湘赣革命根据地斗争史》、《湘鄂西苏区历史简编》、《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简史》、《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等,相继公开出版发行。与土地革命战争史有关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8集)、《八七会议》、《南昌起义》、《湘赣边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左右江起义》、《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湘鄂赣苏区史稿》、《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稿》、《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遵义会议文献》、《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集》等,也相继编辑出版发行,为深入研究土地革命战争史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个人传记、回忆录、文集等相继出版 8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开始分批公布历史档案,《毛泽东文集》、《毛泽东军事文集》和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军事文选也先后整理和出版。并在此基础上,又编撰出版了大量的人物传记、回忆录等。如:《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张闻天传》、《朱德传》、《刘伯承传》、《彭德怀传》、《陈毅传》、《罗荣桓传》、《聂荣臻传》、《叶剑英传》以及《聂荣臻回忆录》、《李聚奎回忆录》、《杨得志

回忆录》、《王平回忆录》、《杨成武回忆录》，等等，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艰难曲折的战斗历程，为深入研究土地革命战争史提供了重要资料和线索。

创办了数种军事历史刊物 1985年，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创办知识性双月刊《军事史林》；198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将原《军事学术》增刊《军事历史》，改为学术性与知识性并举的双月刊，由军事历史研究部主办，独立发行；同年，上海空军政治学院创办学术性季刊《军事历史研究》。这些刊物都把土地革命战争史研究作为主要内容。

这一阶段，对土地革命战争史的研究已经从军事、政治关系的一般分析和战役战斗过程的简要叙述模式中解脱出来，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取得长足进展，并澄清了许多重大历史问题，在史学界达成了许多共识。如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问题、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等，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看法。

研究趋势 土地革命战争史的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与中国现代革命战争史领域其他学科相比，仍然存在着不足和差距，尚有许多难点、重点、疑点问题，有待于更加全面、深入、系统地研究。如对富田事变的评价问题、西路军形成和失败的历史责任问题，共产国际与东北抗日联军的关系问题，等等。

参考文献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一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主编：《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

（徐占权 王有鹏）

中国工农红军反“围剿”作战史研究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ounter-campaigns against “encirclement and suppression” of the Chinese Workers and Peasants’ Red Army)

探讨中国工农红军反对国民党军大规模军事“围剿”历史的活动。国民党军对红军的“围剿”和红军的反“围剿”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全面、深入、系统地研究红军反“围剿”作战的历史，总结其丰富的斗争经验，对于了解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继承和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深刻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等，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因此，红军反“围剿”历史的研究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对它的研究，从红军反“围剿”结束后至今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起步阶段(20世纪30~40年代) 这一阶段，党和军队的许多高级领导人结合战争实践发表了许多言论，从不同角度和侧面探讨了反“围剿”斗争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毛泽东撰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突出的代表作。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红军反“围剿”的历史进行了系统研究，并科学地总结了反“围剿”斗争的基本规律。该文指出：“十年的红军战争史，就是一部反‘围剿’史。”“中国内战的特点，是‘围剿’和反‘围剿’的长期地反复和攻防两种战斗形式的长期地反复，并且包括着一次一万多公里的伟大的战略转移(长征)这样一种东西在里面”。这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指挥的红军反“围剿”基本经验的科学总结和高度概括。该文是浓缩了的土地革命战争史，是马克思主义党史、战史的经典文献，为人们学习和研究红军反“围剿”的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

发展阶段(50~70年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战争环境基本结束,国家进入相对和平的建设时期,史学研究工作逐步步入发展的轨道,并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关怀和指导下,涌现出了大批的优秀科研成果。其中具有重要影响的研究成果是:①经毛泽东亲自审定,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公开出版发行,这不仅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而且为深入研究中国工农红军反“围剿”战史奠定了理论基础。②由军事科学院编辑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史资料选编共八辑32册1200余万字,《军事文献》共三集150余万字,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史料摘要(约50万字),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各地(省)史料汇编(约300万字),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陕甘史料汇编(约300万字)相继出版,为深入研究红军反“围剿”战史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③60年代,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相关单位编写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中国工农红军西北红军战史》(初稿)等刊印了内部本。与此同时,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进行了许多专题研究,形成了许多重要战役战斗战例选编和其他专题成果。

繁荣阶段(80~90年代)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关怀指导下,史学界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红军反“围剿”战史研究全面展开,并涌现出大批优秀科研成果。

陆续出版了一批军史、战史著作。60年代初编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经过修改,公开出版发行。与此同时,《中国人

民解放军战史》、《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史》等陆续公开出版。这些史书比较系统地记述了红军大规模反“围剿”的历史,为深入研究红军大规模的反“围剿”历史提供了条件。

陆续出版了一批红军反“围剿”战史专题研究著作。主要是:《中国工农红军反“围剿”史记》、《中央革命根据地斗争史》、《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革命根据地》、《湘赣革命根据地斗争史》、《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等。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专著是: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反“围剿”史记》。该书全面、系统地记述了中国工农红军反“围剿”艰难曲折的战斗历程,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反“围剿”作战的丰富历史经验,生动地再现了红军广大指战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创造的气壮山河、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并以大量史料论证了红军反“围剿”战史研究中的若干难点、热点、疑点问题,澄清了一些历史事实和社会上一度流行的错误观点。该书是一部红军反“围剿”史研究的力作,填补了中国学术界专题研究反“围剿”史的空白。

整理出版了大型历史资料丛书。主要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湘鄂赣苏区史稿》、《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稿》、《湘鄂西苏区历史简编》、《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简史》、《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遵义会议文献》、《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集》,等等。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是经中央军委批准编纂的共43卷、250册、2亿多字的大型《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在该丛书中,反映红军大规模反“围剿”历史的有《红军长征》、《巩

固陕甘根据地》和将要出版的《红军反“围剿”》卷等。它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全面、系统地汇集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反“围剿”作战的重要历史文献，代表了军事史料工作的最新水平，为深入准确地研究红军反“围剿”史奠定了资料基础。

相继出版了一批文集、传记和回忆录。8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开始分批公布历史档案，《毛泽东文集》、《毛泽东军事文集》和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军事文选先后编辑和出版。同时编撰出版了一批人物传记、回忆录等。例如《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张闻天传》、《朱德传》、《刘伯承传》、《彭德怀传》、《陈毅传》、《罗荣桓传》、《聂荣臻传》、《叶剑英传》以及《聂荣臻回忆录》、《李聚奎回忆录》、《杨得志回忆录》、《王平回忆录》、《杨成武回忆录》等。上述文集、传记和回忆录的出版，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红军反“围剿”斗争的艰难曲折的战斗历程，为红军反“围剿”战史的开拓性研究提供了更广泛、更丰富的资料和线索。

专题研究取得很大进展。这一阶段，对红军反“围剿”许多难点、热点、疑点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毛泽东抵制立三路线问题。对此，学术界的说法不一。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执行了立三路线，并同朱德部署和率部进攻南昌和九江等中心城市；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在执行立三路线中是逐步认识逐步加以抵制的；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对立三路线是有比较清醒认识的，并在一开始就抵制了这一错误路线。其理由是：毛泽东虽然部署了向广昌集结部队，表示进攻南昌、九江，但在实际上当部队进至清江地区后，只派了一部兵力进至牛行车站鸣枪示威，以纪念南昌起义三周年，主力则挥师西进，开展群众工作，放弃进

攻南昌、九江的冒险进攻计划；在第二次攻打长沙中，毛泽东因势利导，率部撤围长沙，并通过株洲会议、峡江会议、罗坊会议和攻占吉安，逐步统一了红一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思想，率先脱离了立三路线的轨道，转入了反“围剿”的准备，为打破国民党军即将对中央苏区进行的第一次“围剿”奠定了基础。

关于“奔袭建宁”问题。学术界少数人认为，红一方面军在第二次反“围剿”最后一仗“奔袭建宁”是一个失着，这使红军主力远离苏区中心区七百里，造成第三次反“围剿”开始时千里绕道回师，致使苏区几乎全部丧失的危险局面。但多数人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红一方面军乘胜“奔袭建宁”是对的，应予肯定。至于红一方面军主力远离苏区中心区，是为了更好地开展群众工作，筹款、筹粮和扩大红军，做好反对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的准备，为打破国民党军即将进行的第三次“围剿”创造了有利条件，并未造成危局；中共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对于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围剿”是早有预料的，但未想到来得这么快。由于预有准备，再加上毛泽东、朱德等的正确指挥，红军主力继续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绕道千里会师集中，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大规模“围剿”，充分显示出毛泽东等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关于毛泽东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的三次战略性建议问题。1933年9月至1934年10月，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毛泽东虽然被迫离开对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但他对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前途和命运仍然十分关心，特别是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面临着严重形势时，他从对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大局出发，于1933年9月，提出红军主力应放弃黎川，继续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在建宁、泰宁地区寻机歼敌，以打破

敌军的“围剿”，而不应坚守黎川，陷入被动；1933年11月，正当红一方面军第五次反“围剿”陷入被动之时，福建事变爆发，毛泽东敏锐地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向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建议：红军主力应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并强调：“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这种方法是必能确定地援助它的。”1934年9月，当红军在内线打破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根本没有可能时，毛泽东再次向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建议：红军主力应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围剿”中央苏区之敌脱离其堡垒区域向湖南前进，以便红军寻机歼灭运动之敌一路或二路，打破其第五次“围剿”，恢复中央苏区。对毛泽东的这三项战略性建议，长期以来史学界是公认的，没有异议。但是，当毛泽东逝世后，一度有人提出质疑，认为查无实据，这是毛泽东后来总结提出的，而不是当时提出的。多数人不同意这种观点，并根据当时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王稼祥的回忆、毛泽东于1936年12月撰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毛泽东的一贯思想，一致肯定了上述毛泽东的三项战略建议，坚决否定了那种一度在社会上流行的错误意见。

关于红军在反“围剿”中创造的战略战术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问题 经过对红军反“围剿”历史的研究，史学界一致认为：红军的大规模反“围剿”历史虽然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但经验是十分丰富的。首先，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围剿”和反“围剿”这一中国内战的特点，这是胜利指导中国工农红军进行反“围剿”的关键。其次，在敌大我小、敌强我

弱的客观实际情况下，必须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运用运动战、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等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这是保存力量、待机破敌的基本战略指导思想。再次，密切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屡挫强敌的力量源泉，等等。这些成功经验，是红军在反“围剿”作战中创造和形成的，并被斗争实践一再证明是正确的战略战术，它已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应该继承和大力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一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主编：《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

徐占权主编：《中国工农红军反“围剿”史记》，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

（徐占权 王有鹏）

南方八省红军三年游击战争史研究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ree years' guerilla war of the Red Army in Eight Southern Provinces)

探讨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八省的红军和地方武装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历史的活动。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各苏区的部分红军和地方武装，分散在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湖北、河南、湖南、广东八省15个地区，坚持了长达三年之久的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完成了党赋予的历史使命，保存了自己的力量和党在南方的战略支点。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除琼崖红军游击队后来编为琼崖纵队外，其他14个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合编

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成为驰骋大江南北的抗战主力军,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战争亲历者和学术界,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起步阶段(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 193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项英关于《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报告后作出决议,指出:“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极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的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至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重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从此以后,人们对三年游击战争历史的研究逐步展开,涌现出一批较好的研究成果。诸如:1938年9月,项英《关于南方红军游击队谈判改编之经过》;1940年夏,刘英关于《北上抗日与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1940年10月,陈毅关于《新四军产生的最近历史——南方三年游击战争》;1948年5月,朱德关于《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意义和作用》等。这些材料,作者以亲身经历,客观地阐述了三年游击战争的基本过程和教训,弥补了由于三年游击战争环境极其艰苦、原始资料大部散失之不足,为尔后系统研究南方八省三年红军游击战争的历史奠定了重要基础。

发展阶段(50~70年代) 当年参加三年游击战争的老干部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编写军史、战史的号召,从50年代开始,奋笔撰写了大量的回忆文章和专著。其中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文章和专著有:陈毅于1957年7月所作的关于《三年游击战争回忆》的专场报告,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南方八省

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状况;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撰写的《闽西三年游击战争》,刘毓标、江天辉、李步新、许登寿撰写的《皖浙赣边区三年游击战争概况》,傅秋涛撰写的《湘鄂赣三年游击战争的回忆》,武汉军区编写的《鄂豫皖红二十八军斗争史》等,为全面开展三年游击战争历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资料。

繁荣阶段(80~90年代)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关怀和指导下,南方八省三年游击战争历史的研究全面展开,并取得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

编纂出版了有关军史、战史著作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一书。1986年,经中央军委批准,由陈丕显担任三年游击战争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主任,叶飞、朱云谦为副主任,江渭清、饶守坤、卢胜、段焕竞、李世安、张万年、陆恂、阮家新为委员,负责编审工作。从当年开始,经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委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南京军区、广州军区、济南军区及有关省军区的共同努力,并由总政治部负责汇总,至1995年全部出齐,共14册,约885万字,全面、详细记述了南方八省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的战斗历程和光辉业绩,系统总结了它的经验教训,客观、公正地评价了它在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这是一部研究南方八省三年游击战争历史的力作,是三年游击战争历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和南京军区编撰的《陈毅传》、军事科学院编撰的《粟裕传》、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主编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三卷本)等,记述了南方八省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的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充分肯

定了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所作出的伟大贡献。

发表了众多论文。它们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南方八省红军三年游击战争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是徐进于1986年在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党史通讯》第九期发表的《伟大的第二战场》一文,引起了史学界的广泛重视。该文以大量可靠的历史事实,论述了南方八省红军三年游击战争在支援和配合红军主力战略行动中所起的作用;论证了南方八省红军三年游击战争为保存一支重要的革命武装力量推动南方八省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并使各游击区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重要支点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此外,粟裕的《回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比较详细地记述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的情况,并以亲身经历阐述了“南阳事件”的经过,澄清了历史事实,起到很好的解疑释惑作用,得到史学界的好评。

专题研究取得很大进展。在这一阶段,很多难点、热点、疑点问题的研究比较深入,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红军游击区的数量问题 1953年5月,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的注释中,把坚持南方八省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和地方武装区分为14个游击区,闽中未被列入。对此,当地学者提出不同意见,并经过专家论证和中共中央有关部门的批准,闽中地区被作为一个独立的红军游击区正式列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卷。至此,南方八省三年游击战争由14个游击区改为15个游击区,得到史学界的认同。为此,中央文献研究室于1991年6月《毛泽东选集》再版时,吸收了史学界的这一研究成果,对《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的注释作了修改,纠正了过去14个游击区的说法,改为15个

游击区。

关于红军游击区的称谓问题 1953年5月,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注释中,对南方八省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的红军游击区的称谓和排列顺序为:浙南地区,闽北地区,闽东地区,闽南地区,闽西地区,赣东北地区,闽赣边地区,粤赣边地区,湘南地区,湘赣边地区,湘鄂赣边地区,鄂豫皖边地区,豫南桐柏山区和广东省的琼崖地区,这些称谓和排列顺序,不够确切,不尽合理,史学界有不同看法。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在编写《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时,对此进行了专题研究和认真论证,纠正了不够确切的传统称谓和不尽合理的排列顺序,改定为:赣粤边、闽赣边、闽西、闽粤边、皖浙赣边、浙南、闽北、闽东、闽中、湘鄂赣边、湘赣边、湘南、鄂豫皖边、鄂豫边和琼崖(今为海南省),得到专家、学者的一致认同。中央文献研究室于1991年《毛泽东选集》再版时,吸收了这一研究成果,并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一卷的表述方法,对南方八省三年游击战争15个游击区的称谓和排列顺序进行了调整。

关于对项英的评价问题 南方八省红军三年游击战争期间,项英是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委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领导和指挥留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各苏区的红军和地方武装坚持斗争。一些人认为,由于他一度继续坚持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作战方针,与敌军死打硬拼,企图保卫苏区,等待红军主力反攻,粉碎敌军第五次“围剿”,恢复各苏区,而没有采纳陈毅等人的正确意见,尽快改变组织方式和作战方式,分散开展游击战争,结果使部队遭受严重损失。因此,对项英持否定态度。但多数专家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项英在三年游击战争初期有严重错误,但综观他三年游击战争期间的一贯表现,对敌斗争是坚决的,革命意志是坚定的,

对自己要求是严格的,同广大指战员同生死、共患难,表现是好的,应该予以肯定。

参考文献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卷,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一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主编:《三年游击战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

(徐占权 王有鹏)

抗日战争敌后战场作战史研究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battles in the battlefield behind enemy lines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探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在解放区战场上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的作战历史的活动。

20世纪50~60年代史学界就对此有所研究,但不够深入,成果也不多。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抗战敌后战场作战史的研究进入了空前繁荣时期。

研究著作陆续问世 如《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军区抗日战争史》、《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第120师晋绥联防军抗日战争史》、《八路军抗战史》、《浴血奋战:抗日英雄八路军》、《新四军第五师抗日战争史稿》,以及即将出版的《八路军第115师暨山东军区战史》等。其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抗日战争时期)是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写的。编写人员从50年代末即开始搜集整理大量历史文电及其他资料,为编撰工作打下了初步基础。“文化大革命”期间,这项工作陷入停顿,中国共产党十一届

三中全会后又恢复了编写工作。经过几代研究人员的辛勤耕耘,终于在1987年出版了这部40余万字的著作。该书以翔实的史料,深入研究了敌后战场抗日军民的斗争历程,深刻总结了斗争的经验,是一部具有权威性的著作。

史料的整理工作卓有成效 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八路军》、《新四军》史料丛书,资料收集全面系统,可谓研究八路军、新四军战史的资料库,《华南抗日纵队》史料丛书也正在编纂之中。此外还有各地编辑、出版的史料汇编,如《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共十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资料选编》、《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历史资料》、《江苏党史资料》第20辑(黄桥战役专辑)、《百团大战史料》、《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皖南事变》等。

重要问题研究不断深入 80年代以来,关于敌后战场作战史的研究论文主要涉及以下诸问题:

关于太原失守前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中是否存在偏误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出现过偏误。这是由于对华北抗战局势的错误估计造成的。(王建科《抗战时期我党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的涵盖及其执行中的偏误》,载《南京社会科学》社会·文化版1995年第6期)

关于八路军何时完成军事战略转变问题 史学界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这种转变到1938年5~6月间,八路军在晋东南粉碎日军九路围攻之后即得以实现(严志才《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党军事战略的转变》,载《党史研究》1982年第2期)。另一种观点认为,这种转变完成于1938年3月,即晋东南反九路围攻之前(张国祥《山西抗日根据地与党的军事战略转变》,载《军事史资料》1986年第4

期)。第三种观点认为,到1939年春,敌后抗日根据地由山区扩展到平原,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等几大块根据地基本形成,八路军在华北、华中的战略展开胜利完成,军事战略转变才宣告实现(岳思平《论抗日战争初期我军的军事战略转变》,载《军事历史》1991年第2期)。

关于敌后战场的战略反攻问题 史学界对敌后战场战略反攻的起点问题有不同看法: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以及罗焕章、支绍曾的《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认为,战略反攻始于1943年;贺新诚的《论中国抗战的战略反攻》认为,从1944年初起开始转入战略反攻;胡德坤的《中日战争史》等认为,战略反攻起点为1944年底、1945年初。另有少数人认为抗日战争不存在战略反攻阶段,多数学者认为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

(张婉英)

各战略区反“扫荡”作战研究 (study of counter-operations against “mopping-up” in all strategic theaters)

探讨抗日战争时期各战略区八路军、新四军和民兵反击日伪军大规模“扫荡”作战的活动。

对各战略区反“扫荡”作战问题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此前对该问题的研究较少,资料搜集整理工作也很欠缺。

80年代以来,对各战略区反“扫荡”作战的资料搜集整理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1980年地图出版社出版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春季反“扫荡”要图》、《山东抗日根据地沂蒙山区反“扫荡”要图》、《苏北苏中抗日根据地反“扫荡”要图》,为这几个根据地反扫荡作战研究提供了便利。解放军出版社出

版的《八路军》、《新四军》史料丛中,搜集了八路军、新四军反“扫荡”作战的文献、回忆文章等。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一套抗日根据地资料丛书,已出版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文献选编》第一册(上、下)、《苏中抗日根据地》、《苏北抗日根据地》、《山东抗日根据地》、《淮南抗日根据地》、《苏南抗日根据地》等近十种,其中有很多各根据地反“扫荡”作战的文献资料。此外,江苏省档案馆编辑的《苏中人民反“扫荡”反“清乡”斗争》、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辑的《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共10辑),以及《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1987)、《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1986)等,也都为研究当地反“扫荡”作战史奠定了扎实的史料基础。

对史料的挖掘与整理,促进了各战略区反“扫荡”作战史的研究逐渐走向深入。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抗日战争时期),对华北的鲁西、冀鲁豫边区、冀东、冀中、晋察冀、太岳、太行、鲁中沂蒙山区等抗日根据地,华中的盐阜、苏中、淮南、苏南等抗日根据地的反“扫荡”作战,均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此外,陈廉著《抗日根据地发展史略》(1987)、岳思平著《八路军抗战史》(1995)、《晋察冀军区抗日战争史》(1986)、《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抗日战争时期)、《冀鲁豫边区革命史》(1991)、《八路军第120师晋绥联防军抗日战争史》(1994)、《八路军山东纵队史》,以及各地编写的根据地抗战史如《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1987)、《皖江抗日根据地史稿》(1985)、《华北抗日根据地史》(1990)等书中,对各战略区的反“扫荡”作战都作了不同程度的研究。

有关各战略区反“扫荡”作战问题的文章,已发表的有几十篇,大多是回忆文章,具

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也有些研究论文,对某些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如周蔚昌的《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反“扫荡”与反“清乡”斗争》(《军事历史》1994年第4期)、王凯捷的《冀中“五一”反“扫荡”战略转移方针的演进过程》(载《党史资料与研究》1994年第2期)、田苏的《冀中根据地在“五一”反“扫荡”中对党的策略的正确运用》(载《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1期)等文章,都有一些新的观点与见解。

虽然近20年来对各战略区反“扫荡”作战史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但相对于这块广阔的历史园地来说,取得的研究成果仍不能说很丰硕,还有待于历史工作者更深更广地去耕耘。

(张婉英)

解放战争史研究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Liberation War)

探讨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推翻以国民党蒋介石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政权而进行的革命战争历史的活动。解放战争,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史上最后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亦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在战争中,人民解放军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和全国人民的支援下,英勇作战,共歼灭国民党军807万人,解放了除台湾、澎湖、金门、马祖、西沙、南沙等少数岛屿以外的全部国土,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战争中人民解放军也付出了重大代价,共损失152万人。这场战争规模之巨大、战场幅员之广阔、战役战斗之激烈、战争指导中谋略运用之精深,都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罕见的,其经验教训对中国未来反侵略战争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初步研究时期(1946~1949) 对解放战

争历史的研究,早在战争进展过程中就已开始进行。战争期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就十分重视对这场战争的研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十分善于总结每次战役、战斗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还亲自研究这场战争,对战争的性质、目的、意义进行了充分的阐述;他们时刻关注战争的进程,发表了一大批总结战役战斗和战争经验的文章,如毛泽东发表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提出的十大军事原则等等。各战略区和各部队亦十分注意总结战役战斗的经验教训,每次战役战斗结束后都及时组织有关人员进行总结,写出战役战斗详报或总结报告。

初步发展时期(1949年10月至70年代中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不久,为进一步总结战争经验,中央军委于1949年12月25日发出了关于全军编写军史战史的指示,要求全军各部队要认真研究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1953年,总参谋部专门发出了关于全军战史编写工作的指示。根据军委和总参谋部的指示,全军各大单位、各部队即着手研究解放战争的历史。1951年1月成立的南京军事学院,设立了战史系,组织学员学习和研究人民解放军战史,并编写了一批解放战争的战例,供学员和军队中高级干部学习。50年代中期,相继成立了原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和华北军区战史编审委员会或战史编辑委员会和战史编辑室,由各战略区的主要领导人任编委会主任,负责领导编写各野战军战史工作。各军亦相继成立了战史编写机构。为了编写各野战军战史,各战史编辑机构搜集整理了大量的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文献资料,并将其汇编成册。在此基础上,即着手编写各野战军及各军的战史。到60年代初,第一野战军战史编审委员会和编辑室在彭德怀、习仲勋等关怀、支持下,写出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初稿);第一野战军原所辖各军亦相继编写了第1、第2、第3、第6、第7、第8军战史初稿。第二野战军战史编辑室在以刘伯承、邓小平为主任委员的战史编辑委员会的指导下,编写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暨西南军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初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暨西南军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例选编》。原第二野战军所辖各军相继编写了第4兵团,第10、第11、第12、第13、第14、第15、第16、第17、第18、第19军战史初稿。第三野战军战史编辑室在以唐亮为主任、张震为副主任的战史编审委员会的具体指导和在陈毅、粟裕、谭震林等的关怀下,编写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初稿)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役选编》(初稿)。第三野战军所辖各兵团、各军先后编写出第7兵团兼浙江军区、第20、第21、第23、第24、第25、第26、第27、第28、第29、第30、第31、第33军战史初稿或草稿。第四野战军战史编审委员会和战史编辑室在罗荣桓的关怀指导下,编写了《第四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大事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初稿)。原第四野战军所辖各军相继编写了第38、第39、第40、第41、第42、第43、第46、第50、第54、第55军战史初稿。华北军区战史编写机构编写出了《华北军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初稿),原华北军区所辖各军编写了第60、第61、第62、第63、第64、第65、第66、第67、第68军战史初稿或草稿。在此期间,各战史编写机构还相继撰写了一批专题研究材料。许多老干部撰写了大量的回忆解放战争的文章,并汇编成书,如《星火燎原》、《百万雄师下

江南》等。这一时期研究解放战争史的成果虽然是初步的,但为尔后全面系统地研究解放战争史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958年,军事科学院成立。该院战史研究部,从全军各大单位和军事院校抽调了一批有战争实践经验和较高军事理论素养的中高级干部,专门研究人民解放军战争史,其中第三研究室专门负责研究解放战争史。战史研究部第三研究室成立后,即开始搜集有关解放战争的历史资料,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搜集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并进行初步的研究,编写了一批解放战争的战例和专题研究材料,为全面系统地研究解放战争战史作了准备。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全军战史研究工作被迫停止,并损毁了一批精心搜集整理出来的宝贵资料。

新的发展时期(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术界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放战争史的研究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开始对解放战争战史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中央军委成立了战史编审委员会和战史编辑室,由军事科学院战史部正式承担编写《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其中第三研究室负责编写第三卷,即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卷。其他有关单位也开始组织有关研究人员,成立相应机构,开展对解放战争史的研究。战史编辑室和其他研究机构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克服过去“左”的错误,编写、撰写了一些高质量的著作和文章。其主要代表作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1983)、《渡江战役》(1985)、《苏中七战七捷》(1986)、《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三卷(全国解放战争时期)(1987)、《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1987)、《解放战争纪事》

(1987)、《济南战役》(1988)、《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年大事记》(1988),以及《辽沈决战》(1988)等。

繁荣发展时期(90年代) 进入90年代后,对解放战争史的研究进入了繁荣发展的新时期。其表现为:研究机构进一步完善,研究队伍进一步扩大,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研究水平不断提高,学术成果数量多、质量好。如:90年代初,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等单位编辑出版了多套有权威性的史料集,其中有多卷本《中共中央文件选集》、《毛泽东军事文集》、《邓小平文选》、《周恩来军事文选》、《朱德选集》,以及共和国元帅的军事文选等。与此同时,军队和地方有关党史、军史研究部门相继编辑出版了一大批史料集,为进一步研究解放战争史奠定了丰厚、坚实的资料基础。从80年代末开始,全军相继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各总部和海军、空军、国防科工委、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各大军区也成立了各自的编审委员会和编研室,负责编写《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包括解放战争战史在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相继成立了原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战史编审委员会或战史编写领导小组,组织专门人员,重新编写或修订各野战军战史;各集团军组织人员编写或修订本军战史;中共中央和全国各省市则成立了研究中共党史的专门机构。军队各级军史研究单位和地方各级党史研究机构相继召开了多次全国性或专题性的学术讨论会。在此期间,还广泛展开了撰写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传记和老干部撰写回忆录的活动。经过10年的努力,出版和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解放战争战史的学术成果。主要有:

出版了研究解放战争史的专著和资料丛书 如《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

(1990)、《华北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1990)、《中国人民解放军简明战史》(1993)、《从延安到北京》(解放战争重大战役军事文献和研究专题选集)(1993)、《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史》(1995)、《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1996)、《全国解放战争史》第一至第五卷(1997)、《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1997)、《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分册》(1997)、《第一野战军战例选编》(1999)等等。先后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有:《解放战争时期过渡阶段军事斗争》、《解放战争战略防御》、《解放战争战略进攻》、《解放战争战略追击》、《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起义投诚》、《解放战争时期剿匪斗争》等。另外,还编写出版了人民解放军各军(集团军)的军战史近30部。这些专著,基本上都是由军队专业研究机构的史学工作者编撰的,或全面系统、或从一个侧面记述了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过程,总结了战争的特点和取得胜利的经验,具有较高的权威性。

在此期间,地方各级党史研究机构也出版了许多研究解放战争的专著,主要有:《解放陕西》、《解放甘肃》、《解放宁夏》、《解放青海》、《解放新疆》、《解放山西》、《解放河南》、《解放湖北》、《解放江西》、《解放四川》、《解放山东》、《解放安徽》、《解放江苏》、《解放浙江》、《解放上海》、《解放福建》、《解放黑龙江》、《解放吉林》、《解放辽宁》、《解放湖南》、《解放广东》、《解放广西》以及《解放海南》等。

出版了一些传记和回忆录 如《周恩来传》(1989)、《陈毅传》(1991)、《徐向前传》(1991)、《刘伯承传》(1992)、《朱德传》(1993)、《彭德怀传》(1993)、《贺龙传》

(1993)、《罗荣桓传》(1993)、《聂荣臻传》(1994)、《任弼时传》(1994)、《叶剑英传》(1995)、《毛泽东传》(1893~1949)(1996)、《刘少奇传》(1998)。在此期间,各出版社还相继出版了许多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传记。这些传记,结合传主切身经历,实事求是地记述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各战略区指导和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历程。此外,还有一大批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一辈革命家撰写了自己的回忆录,从不同侧面记述了解放战争的历史和经验教训。

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许多专家学者解放思想、厚积薄发,撰写发表了一大批探讨全国解放战争的高质量的论文,据不完全统计,自1995年至2000年底发表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军事历史》、《文献与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党史研究资料》等报刊上的专题论文近2000篇。这些论文,以史实为依据,广泛探讨、研究解放战争的政治、经济背景及战争的性质、交战双方的得失,论证、澄清了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和有争议的学术问题,并打开了一些学术“禁区”,有效地推动和促进了解放战争史的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这一时期,学术界对解放战争史的研究,呈现出全方位、系统化、硕果累累的喜人局面。

(华国富)

中国人民志愿军军史研究

(study of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s Volunteers)

探讨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人民为保家卫国、援助朝鲜人民抗击以美国为首的侵略者,组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及其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发展壮大历史的活动。

抗美援朝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后,规模较大的一场国际性局部战争,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经历的第一场反侵略战争。这场战争现代化程度高,美军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当时世界上最为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中国人民志愿军也使用了较国内战争更为先进的武器装备;战争时间长,达两年之久;战争双方投入兵力多,战场兵力最多时达到300余万人;作战样式多样,既有运动战,又有阵地战,还有反空降、反机降作战,反细菌作战和反空中“绞杀战”;斗争方式,既有军事斗争又有谈判斗争,而谈判斗争长达两年零17天,这在世界战争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经过两年零九个月的浴血奋战,以劣势装备战胜了优势装备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最终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打出了国威军威。朝鲜停战后,志愿军严格遵守停战协定,帮助朝鲜人民重建家园,为稳定朝鲜半岛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贡献。史学工作者历来重视中国人民志愿军历史的研究。据不完全统计,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出版的有关抗美援朝战争的书籍(含未公开发行数)达300余种,发表论文千余篇。研究的内容包括东北边防军、志愿军以及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后方勤务司令部等领导机构的组成,志愿军空军、炮兵、高射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通信兵以及陆军兵团、军的历史,志愿军的组织发展沿革、编制体制、武器装备,志愿军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后勤工作,志愿军人物,等等。从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以来,中国人民志愿军军史的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

初步研究时期(1950年底至1958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不久,中央军委发出指示,要求全军各部队编写军史、战史。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央军委要求志愿军各参战部

队,注意总结作战经验,汇集历史资料。朝鲜停战后,志愿军党委将总结作战经验,编写军史、战史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1954年6月,志愿军遵照总参谋部《编写军史材料》的指示,要求入朝各参战部队编写《军史材料汇编》,为将来编写军史做准备。此后,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陆军军、师相继完成了军史材料汇编。在此基础上,编写出部分军史。到1956年,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总结,各军(兵)种的军史战史,以及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陆军军和特种兵师的军史战史编写已基本完成。这就为编写抗美援朝战争史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军史奠定了基础。另外,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反映志愿军英雄模范事迹的《志愿军英雄传》。

停滞研究时期(1959~1978) 1958年军事科学院成立后,中央军委赋予其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负责组织编写全军的军史战史。在1959年1月召开的全军首次军事科学研究工作会议上,将总结人民解放军的建军经验,编写人民解放军的军史战史,列为全军1959年至1960年军事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军事科学院战争历史研究部(现军事历史研究部),具体承担中国人民解放军战争史和抗美援朝战争史的研究和编写任务。遵照中央军委确定的编写军史战史由近及远,先战史后军史的原则,首先着手抗美援朝军史战史编写工作。正当此项工作展开之际,由于当年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于1959年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上受到错误的批判,抗美援朝战争史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军史的编写工作被迫中断。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有关抗美援朝战争史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军史的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繁荣发展时期(1979~2000) 中国共产

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彭德怀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昭雪。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军史和抗美援朝战争史的研究得到了广泛重视,进入了繁荣发展时期,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综合性著作 1980年,中央军委赋予军事科学院编写《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的任务。经过长期的资料收集和整理,该院军事历史研究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于1988年编撰完成,并于同年7月由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1990年12月第二版公开发行。这部官方组织编写出版的历史专著,除反映战争全貌总结战争经验外,还以相当篇幅对志愿军组织机构以及人员配备情况作了介绍,并附录志愿军序列表、志愿军团以上干部烈士名录。1982年12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央宣传部组织军事科学院承担编写的大型《当代中国》丛书《抗美援朝战争》卷,于1990年9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以军事斗争为主线,对与战争相关的政治、外交(谈判)、抗美援朝运动进行了介绍。同时,还以大量篇幅对停战后志愿军帮助朝鲜人民重建家园,维护停战协定的斗争,以至撤军回国等情况进行了介绍,并附录了志愿军英模志。列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九五”科研计划重点课题的多卷本《抗美援朝战争史》,2000年9月由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上述抗美援朝战争历史专著,对志愿军的组织指挥机构,领导人的变化,编制序列,武器装备,参战兵力,人员伤亡,参战军兵种、陆军兵团、军等基本情况作了介绍,其中有些是首次公布于世。此外,《当代中国》丛书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当代中国军队的政治工作》、《当代中国军队的后勤工作》、《当代中国空军》等卷,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后勤工作以及志愿军

空军的历史情况进行了介绍。

上述作品,均不同程度勾画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发展历程,热情讴歌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不畏强敌,不怕牺牲的高度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回忆录、人物传记、志愿军序列 这一时期出版的志愿军领导人回忆录,如《抗美援朝战争回忆》(洪学智著)、《为了和平》(杨得志著)、《在志愿军总部》(杜平著)、《新的使命》(杨成武著)、《李志民回忆录》(李志民著)、《王平回忆录》(王平著)、《刘震回忆录》(刘震著)和《彭德怀传》(《彭德怀传》编写组编撰)、《邓华传》(罗印文编著)等,对东北边防军的组成,志愿军领导机构的组成及领导人的变化,志愿军空军,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志愿军各部队入朝参战等情况都有介绍。《中国人民志愿军人物录》(谭诤编著)、《中国人民志愿军人物志》(《中国人民志愿军人物志》编审委员会编辑)、《中国人民志愿军序列》(胡光正等编著),对志愿军的组织沿革,部队入朝参战情况,志愿军师以上领导人、志愿军牺牲的团以上烈士和志愿军英模功臣作了介绍。

辞书 《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对志愿军、志愿军空军、志愿军英模集体和个人等单独列条释文。《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志愿军军史条目比《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志愿军军史条目增加数十条,释文达7万余字,其中有志愿军、志愿军空军、志愿军炮兵、志愿军高射炮兵、志愿军装甲兵、志愿军工程兵、志愿军铁道兵、志愿军通信兵、志愿军政治工作、志愿军后方勤务、朝鲜停战谈判、抗美援朝运动、志愿军英模集体和个人等等。这些条目释文,比较全面、系统、准确地反映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

研究文章 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百万大裁军,部队变化较大,有的

兵种被撤销,有的部队被撤销。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各部队都在加紧编写军史。这一时期,各军(兵)种、各集团军内部编写的军史,对本军(兵)种、本军参加抗美援朝的历史均有详细的记载。同时,报刊上也发表了有关中国人民志愿军军史,其中包括志愿军空军、志愿军炮兵、志愿军高射炮兵、志愿军装甲兵、志愿军工程兵、志愿军铁道兵、志愿军通信兵、志愿军军事工作、志愿军政治工作、志愿军后方勤务、志愿军英雄模范、志愿军建设等研究文章。

研究趋势 中国人民志愿军军史研究与抗美援朝战争史研究相比明显不足,至今还没有一部全面反映中国人民志愿军军史的著作。志愿军军史需要研究的内容很多,如如何适应战争需要、建立健全各种组织指挥机构,加强军兵种建设、加强后勤建设、改善供应体制,加强军政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在异国作战,如何严格执行政治纪律和军事纪律,赢得当地政府和人民的支持;停战后,志愿军是如何加强自身建设的;志愿军在战争动员、临战准备、建军、兵员补充、轮番作战、军事训练、政治教育、军队现代化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等等。现在各军(兵)种、各集团军均编写完成了各自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军史,这就为志愿军军史的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今后,在加强抗美援朝战争史研究的同时,将重视和加强对志愿军军史的研究,编撰出版一部以反映中国人民志愿军军史的权威性著作,以填补中国人民志愿军军史著作的空白。

参考文献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

《抗美援朝战争》编辑部编著:《抗美援朝战争》,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鲍明荣)

抗美援朝战争史研究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War to Resist
U. S. Aggression and Aid Korea)

探讨 20 世纪 50 年代初,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保家卫国,援助朝鲜人民抗击以美国为首的侵略者的战争历史的活动。

抗美援朝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规模较大的一场国际性局部战争,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经历的第一场反侵略战争。这场战争现代化程度高,美军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武器装备,中国人民志愿军也使用了较国内战争更为先进的武器装备;战争持续时间长,达两年零九个月;交战双方投入兵力多,战场兵力最多时达到 300 余万人;作战样式多样,既有运动战又有阵地战,还有反空降、反机降作战和反细菌战、反“绞杀战”;斗争方式既有军事斗争又有谈判斗争,而谈判斗争长达两年零 17 天,这在世界战争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全力支援下,以劣势装备战胜了优势装备的敌人,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通过战争实践,志愿军取得了现代化战争的宝贵经验,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促进了国防现代化建设。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和经验极为重视,要求有关方面进行认真的研究和系统的总结。为落实这一精神,志愿军总部、各参战部队等从出国作战不久就开始了各种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为战后的全面系统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据不完全统计,至 2000 年研究出版的有关抗美援朝战争的书籍(含未公开发行数)达 300 余种,发表论文千余篇。其内容包括朝鲜战争的起

因、中共中央出兵朝鲜的战略决策和战争准备、战争双方的战略决策和战争指导、战争过程中的战役战斗、朝鲜停战谈判、中国国内为支援战争所进行的抗美援朝运动,以及战争期间中国对外关系,等等。从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以来,抗美援朝战争史的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

初步研究时期(1950 年底至 1958 年)抗美援朝战争对中国来说,是一场全新的战争,与国内战争相比有许多新的特点。在战争期间,毛泽东和志愿军首长对这场战争的经验教训非常重视。每一次战役和重大军事行动结束后,志愿军领导机关和各参战部队都及时地进行总结,以便指导部队下一步作战行动。1952 年 7 月,志愿军司令部组织撰写了题为《朝鲜战场对美军作战的几个战术问题》的研究报告,共 40 万字。报告从战术角度,分战场概况、敌军研究、进攻作战、防御作战和战斗保障五个部分,系统地研究和总结了志愿军 1950 年 10 月至 1951 年 12 月期间与美军作战的经验。同时,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等领率机关和军事院校,对战争特点、战争双方的作战指导、具体战例、敌军情况等进行了研究,以用于指导部队的作战、训练和军队院校的教学。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志愿军党委即把总结战争经验列为在朝各部队停战后主要工作之一。1953 年 10 月 1 日,志愿军总部发出《关于总结朝鲜作战经验问题》的指示,要求各部队系统研究总结作战经验,以便志愿军司令部统一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经验。赴朝参战已回国的部队,亦按照志愿军总部的要求完成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总结工作。至 1954 年 4 月,志愿军政治部以及志愿军军、师,后方勤务司令部和志愿军炮兵、高射炮兵、装甲兵、工兵、通信兵、空军司令部等单位也分别完成了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总结工作。

1954年4月,中央军委根据志愿军总部的建议,决定成立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总结编写委员会,负责编写《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总结》。编委会受总参谋部直接领导,由原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负责,原志愿军代参谋长张文舟主持,从志愿军司令部、各参战部队和军委有关部门、军事院校调集60多名干部参加编写工作。历时一年,至1955年8月基本上完成了《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总结(草稿)》一书的编写工作。全书分战争简史、战术经验总结、战例选辑、敌军研究四个部分。经广泛征求意见后,于1956年10月正式定稿,作为内部文件下发全军部队、院校。与此同时,总政治部、总后勤部也分别组成了编委会,于1958年10月完成了《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几个主要问题的经验总结(草稿)》、《抗美援朝战争后勤工作经验总结(草稿)》,下发全军师以上单位和后勤单位征求意见。中央军委空军司令部、炮兵司令部、防空军司令部、工程兵司令部、装甲兵司令部等也完成了本军(兵)种部队在朝的作战经验总结。在此期间,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入朝参战的各陆军军和特种兵师、团、营在总结作战经验的同时,陆续完成了本部队抗美援朝战史的研究编写工作。军委炮兵司令部、防空军司令部、装甲兵司令部、铁道兵司令部、工程兵司令部等也陆续完成了本军(兵)种战史的研究编写工作。1958年军事科学院成立后,中央军委决定将编写全军军史、战史的组织实施工作,由总参谋部移交给军事科学院。军事科学院战争历史研究部(现军事历史研究部)具体承担中国人民解放军战争史和抗美援朝战争史的研究和编写任务。

另外,这一时期还出版了有关抗美援朝战争的文件汇集,如《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等,以及志愿军

指战员撰写的散文集《志愿军一日》,反映志愿军英雄模范事迹的《志愿军英雄传》,记者、作家深入朝鲜战地采写的通讯报道《朝鲜通讯报告选》。

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总结和各军兵种编写军史战史的顺利完成,为研究抗美援朝战争史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为后来编写抗美援朝战争史奠定了基础。这一阶段研究的特点,主要是以总结作战经验教训为重点。主要研究方式是中央军委总部机关、志愿军领导机关和各部队具体组织,由战争亲历者参加研究撰写。

停滞研究时期(1959~1978) 1959年以后,由于当年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彭德怀在庐山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上遭到错误的批判,致使抗美援朝战争史的研究工作受到严重影响。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对抗美援朝战争的政治工作与后勤工作的经验总结文稿的审定工作被迫中断。抗美援朝战争史的编撰工作被无限期推迟。这时期的研究工作主要是收集整理有关资料,内部翻译了美国官方撰写的《1950年~1953年美帝侵朝战争中的海军》(中译名)等、《朝鲜战争中的美国空军》(中译名)等。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抗美援朝战争史的研究工作处于停滞状态。

繁荣发展时期(1979~2000)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此后不久,彭德怀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昭雪,抗美援朝战争史的研究也得以重新开展起来,进入了繁荣发展时期。其特点是:①研究队伍不断发展壮大,除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军事百科研究部等专门研究机构和人员外,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各军兵种和军事院校,均有从事抗美援朝战争史的研究人员;地方院校和党史、国史研究部门中,也

有相当一批研究人员从不同侧面研究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②研究中思想解放，学术空气活跃，在全国报刊发表了大量学术文章，内容包括战争的起因、战争的特点、战争的性质、战争的结局、战争指导、出兵朝鲜的决策，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邓华等在战争中的贡献和指挥艺术，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战争中的运用和发展，军事、政治、后勤工作经验，志愿军宽待俘虏的政策，战争的意义及其影响，停战谈判、战役战斗介绍，战争期间的中苏、中美关系，美国侵朝政策和战略，等等。③学术交流活动增多。1987年，军事科学院与沈阳军区在沈阳举行了首次志愿军战史学术讨论会；1990年，南京地区军队院校协作中心、武汉地区军队院校协作中心先后在南京、武汉举行了“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40周年学术研讨会”和“抗美援朝40周年理论研讨会”，在学术讨论会上，全国全军专家学者提交了数百篇论文，会后分别辑集出版。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50周年，2000年10月25日，首都各界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集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出席大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总政治部、中国军事科学学会等单位举行学术研讨会。从而使抗美援朝战争史的研究在原有的基础上更加深入一步。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与国外的研究机构和人员就双方感兴趣的问题进行学术探讨和交流。这时期出版了一批研究著作、回忆录、人物传记等，成果十分显著。

综合性著作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是中央军委赋予的研究任务。该书对抗美援朝战争的全过程进行了全面系统准确的叙述，

在内容上以军事斗争和作战为主，着重反映和总结战略、战役指导经验。大型《当代中国》丛书的《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出版的《当代中国》丛书中唯一一部反映战争的历史著作。该书以军事斗争为主线，全面系统完整准确地反映了朝鲜战争爆发至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胜利回国的历史。同时以相当篇幅反映外交斗争和停战谈判斗争以及抗美援朝运动、维护停战协定斗争、帮助朝鲜人民重建家园、撤军回国等内容。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的多卷本《抗美援朝战争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九五”科研计划的重点课题。该书是一部以军事斗争为主线，从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多方面全景式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著作。这几部由官方组织编撰的权威性历史著作，基本反映了中国抗美援朝战争的研究水平。它们的公开出版发行，澄清了历史事实，宣扬了中国的立场和观点，歌颂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崇高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

专题著作 《当代中国》丛书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当代中国的军事工作》、《当代中国的军队政治工作》、《当代中国的后勤工作》、《当代中国的空军》、《当代中国的海军》等卷，分别对抗美援朝战争的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后勤工作，以及空海军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等情况作了叙述。《当代中国的外交》、《当代中国的财政》等卷，对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的外交斗争和国家财政情况进行了介绍。毛泽东、周恩来是抗美援朝战争的主要决策者和组织者，《毛泽东与抗美援朝》（逢先知等著）、《周恩来与抗美援朝战争》（张民等著），对毛泽东、周恩来参与战争决策等情况进行了专题介绍。《板门店谈判》（柴成文等著），对朝鲜停战谈判以及维

护停战协定斗争情况作了叙述。《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经验总结编委会编著)、《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总结》(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编著)、《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总后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编辑委员会编著)、《论抗美援朝战争的作战指导》(邓华著,内部图书)、《抗美援朝战争运动战若干问题研究》(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分别对抗美援朝战争中政治工作、后勤工作、作战指导、运动战方面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

回忆录 这一时期出版了彭德怀的《彭德怀自述》、聂荣臻的《聂荣臻回忆录》、洪学智的《抗美援朝战争回忆》、杨得志的《为了和平》、杜平的《在志愿军总部》、杨成武的《新的使命》、李志民的《李志民回忆录》、王平的《王平回忆录》、李聚奎的《李聚奎回忆录》、刘震的《刘震回忆录》、李德生的《李德生回忆录》、江拥辉的《三十八军在朝鲜》、杨迪的《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伍修权的《在外交部的八年的经历》、师哲的《在历史巨人身边》等人的回忆录,反映了作者在战争期间的经历和对这场战争的感受。其中彭德怀在隔离审查期间所写的自述,更为弥足珍贵。

传记 《周恩来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彭德怀传》(《彭德怀传》编写组编著)、《邓华传》(罗印文编著)等,以相当的篇幅记述了传主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经历。根据档案资料和研究成果编写的《毛泽东军事年谱》(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编)、《周恩来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彭德怀年谱》(王焰主编)、《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周恩来军事活动编写组编),对他们在抗美援朝期间的活动作了客观真实的反映。

文集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毛泽东军事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外交文选》、《周恩来军事文选》、《周恩来外交文选》、《彭德怀军事文选》等文件汇集,公布了大量有关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档案。

辞书 《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对抗美援朝战争、运动战阶段的五次战役、1951年夏秋季防御战役、1952年秋季反击作战、上甘岭战役、金城战役、“钢铁运输线”、反“绞杀战”、反细菌战等单独列条释文。《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有关抗美援朝战争史条目81个,分别对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历次战役、重要战斗和作战行动进行了叙述。这些条目全面系统高度概括准确地反映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

译著 为了解外国对朝鲜战争的研究成果,有关单位和学者翻译出版了韩国国防部编著的《朝鲜战争》(中译名)、美国陆军部历史局编著的《美国兵在朝鲜》(中译名)、日本战史普及会编著的《朝鲜战争》(中译名)等外国官方有关朝鲜战争历史专著。翻译出版了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艾奇逊、杜勒斯、麦克阿瑟、布莱德雷、李奇微、泰勒等美国参与侵朝战争决策和战场指挥的回忆录以及他们的传记。这些译著,有助于从另一个侧面、另一个角度,认识和了解朝鲜战争的历史。

研究趋势 在抗美援朝战争史研究方面权威性著作的出版,填补了中国在这一方面的空白。对战争起因、出兵朝鲜决策、停战谈判、志愿军人物、战俘以及中苏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均有所突破。但在研究的广度上,如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美、中苏、中朝关系,抗美援朝战争对世界格局的影响,战争对中国的经济建设、国防现代化建设、军事学术思想的影响等问题的研究还不够。由于受历史档案的限制,对战争中重大问题的研究不够深入。

同时研究成果的数量还不多。在今后的研究中,战争的起因、战争决策和战略战役指导等,仍是研究的热点问题。随着历史的沉淀,战争双方历史档案的逐步解密,对抗美援朝战争的研究将越来越深入,研究的范围将越来越广,成果将越来越多。

参考文献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

《抗美援朝战争》编辑部编著:《抗美援朝战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鲍明荣)

世界战争史研究

(study of the world war history)

探讨除中国国内战争以外在世界上发生的历次重要战争及其相关内容的活动。目的在于揭示世界范围内各国家或地区历次战争发生的原因和性质,探索战争的本质和基本规律,研究战争进程及其结局,阐明作战双方的兵力和作战意图,考察战争对社会的影响,分析战争胜负的原因,总结经验教训,为人们正确认识战争、应付战争、控制战争、制止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社会发展提供历史的借鉴。

20世纪中国对世界战争史的研究大体可分为:

中华民国的世界战争史研究 卢凤阁是中华民国时期研究世界战争史并取得丰硕成果的一位著名史学专家。其主要代表作有《中外古代战史(1~3卷)》(1946)、《日俄战史(1~3集)》(1940~1943)、《第一次世界大战简史(上、下册)》(1945)、《第二次世界大战述要》(1946)等。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史政局编著、1946年12月出版的五卷本《世界战争研究会记录(机密)》是民国时期又一部研究世

界战争史的重要文献资料。该书收编了自1942年2月28日至1946年5月29日计220次会议记录。每次记录包括会议程序及研究内容、一般报告、专题报告、讨论事项、会议主席指示等。一般报告项目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内外各战场敌情及战况、同盟国和轴心国交战双方全部战况及其作战指导、对敌动员概况及兵力部署之判断、敌情(含政治、经济、外交等)、奸伪动态、各次会战经过概况、国民党军受降进展状况等。专题报告项目有对苏联远东兵力之判断、东北四省兵要地志、珊瑚海附近形势、美日海军兵力之比较,关于总力战之研究、战后和平与中英美苏关系、苏军作战之特点、原子弹试验等。讨论项目有:南太平洋敌作战最终目的何在?轴心国今后整个动向如何?以及苏日问题、大战形势检讨、日军动向之研究、太平洋战场战略问题等。该文献资料集对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具有重要价值。

此外,民国时期出版的重要世界战争史著作还有胡祖舜编著的《二十世纪世界大战记》(1914),何遂著的《欧洲观战记》(1919),蔡元培和王云五等分别主编的《日俄战争》(1928、1929),郭寿生编著的《最近列强海军政策实力与太平洋问题》(1929),《普法战争》(1936),陆军大学校第十三期修纂的《欧战丛书》,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军官高等教育班和陆军大学校分别编著的《日俄战史》(1936),陆军大学编著的《欧洲战史》(1936),陈南平编著的《坦能堡战役论》(1936),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处编撰的《日俄战史讲义》(1939),第三战区将校研究团编著的《日俄战史》(1940),丘兆琛编著的《一九四〇年西战场德军作战经过概述》(1941),陈孝威著的《论苏德之战》(1941),文举等著的《苏德战争分析》(1941),陆军大学校编著的《古代战史》(1944),陆军大

学校将官班鲁若参编著的《世界大战史讲义》，王麟生编著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史——高加索战事》（1946），陆军大学校编著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史——坦能堡会战》（1946），万祖章编著的《达达尼尔海峡登陆战史》（1947）等100余部。

民国时期世界战争史研究中十分重视对外国有关著作的评介，成果也颇丰。诸如，英国杰理师著、罗衡升译的《西方战史》（1912），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译的《日俄战纪全书》（1918），日本伊藤政之助著、王成斋译的《世界战术与战史》，德国英马诺尔著、周修仁译的《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九年世界大战史（上、下卷）》（1933），日本川原贞男编著、中华民国训练总监部军学编译处译的《世界大战概史》（1936），俄国托罗舍夫斯基著、孔祥编译的《欧战史》，陆军大学校函授处编译的《世界十大战争》（1937），俄国托马舍夫斯基著、吴保泰译的《普法战史》（1944），日本森五六著、中华民国训练总监部军学编译处译的《欧洲大战史讲话》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世界战争史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史学界十分重视世界战争史的研究，并且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综观研究历程，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78） 这一阶段，研究世界战争史的指导思想主要是“以俄为师”，着重研究苏联反法西斯战争史和军事科学；而1958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期间，研究世界战争史的指导思想由“以俄为主”转为“以我为主”，着重研究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组成部分的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史，特别是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的理论，以及中国人民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巨大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一些军队院校在军事教学中开设了有关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史的课程，在地方院校的近代史教学中也

讲授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特别是苏德战争史，并出版了一些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翻译著作和教材。但是，反映两次世界大战全貌的专著不多。“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世界战争史研究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总的来看，中国对世界战争史研究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并未引起社会上应有的重视，没有建立起专门的科研机构和学术团体，学术成果亦不多。

第二阶段（1979～2000）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世界战争史研究出现了生机。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该阶段的世界战争史研究具有两大鲜明的特点：由封闭型研究发展为开放性研究；由官方研究发展为官方研究与民间研究并举。在此期间，专门成立了民间性世界战争史学术团体——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出版了18期《二战史通讯》、多部论文集和上万部研究专著。除在国内多次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学术研讨会外，还多次派员参加了一些国际性的世界战争史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学术研讨会。1980年6月16～24日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在昆明召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学术讨论会上宣告正式成立。1986年8月，经中央军委批准，为落实1982年五届人大四次会议关于加强中国抗日战争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的提案，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世界军事史研究室正式组建。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军事学院（今国防大学）、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单位撰写的各种版本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著作的基础上，该室先后完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大事纪要》、《三十年代世界主要国家的战略与军备》、三卷集《中国抗日战争史》和五卷集《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中国特色和军事特色，具有综合性和开拓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起点、

阶段划分、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评价等方面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结束了中国世界战争史研究长期以来处于无组织、零散和不系统的被动局面,把世界战争史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此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组织编纂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世界军事史分册》(1987),由军事科学院组织编纂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世界战争史分册》(1995),对上起公元前26~前25世纪的拉格什-温马战争,下迄20世纪90年代初的海湾战争,长达4500多年人类历史上著名战争战役、军事人物以及著名军队、舰队、战舰和军事院校,作了比较系统且有所侧重的介绍,史实准确,观点明确,通俗易懂,为读者学习和研究世界战争史提供了必备的基础知识。

在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吴春秋主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世界战争通鉴》(1995),是一部集古今世界著名战争之大成的比较全面系统的一部世界战争史巨著。该书选择了世界历史上发生在亚、欧、非、美等各地地上起公元前14世纪后期古埃及与赫梯的战争(这次战争中著名的卡迭石会战是世界战争史上第一次有文字和约的战争),下迄本书定稿时(1993年9月)仍在继续进行的前南斯拉夫内战,近200次比较重要的战争加以介绍,时间和空间跨度之大,资料之丰富,在同类著作中不可多得。本书以战争为单元(而不是会战或战役为单元)编写。对每次战争,无论其规模大小、时间长短,作者尽可能采取全景介绍,一般包括背景、交战双方情况、战争过程和结局等。军事行动是重点,与之密切相关的政治、经济、外交、技术以及人物等,也不同程度地加以阐述。本书每章末尾均有“评析”,综合分析战争特点、胜负原因和影响等,或详或简,不

拘一格,目的是提出可供后人鉴戒的经验教训。上述著作,探讨的问题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战争的性质问题 在指导思想,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战争观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作了分析研究。认为历史上战争的性质大体上有四种情况:①战争一方是正义的,另一方是非正义的。如公元前492年希腊诸城邦反对波斯帝国发动的希波战争中,前者是正义的,后者是非正义的。公元前334年起,亚历山大对波斯、印度等东方各国的十年掠夺性战争,显然是非正义的,而后者对亚历山大的抵抗则是正义的。中世纪阿拉伯和奥斯曼帝国先后对亚、欧、非一些国家的征服战争是非正义的,后者对异族征服者的武装抵抗则是正义的。近代各国推翻封建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亚、非、美各大洲一系列国家反抗英、法、西、荷等殖民主义压迫、争取民族解放的战争,其正义一方与非正义一方是比较典型的,显而易见的。至于20世纪中前期法西斯阵线与反法西斯阵线进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大战前后一些国家的国内革命战争和反对外国武装干涉、侵略扩张,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战争,也都是如此。②交战双方都是非正义的。这主要是指历史上某些争霸战争。如公元前14世纪后期古埃及法老与赫梯国王争夺叙利亚等地区统治权的战争,公元前431年古希腊以斯巴达克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海上强国雅典之间争夺霸权的战争,公元前3世纪古罗马与迦太基争夺地中海西部统治权的前两次布匿战争等等概属此类。欧洲中世纪的许多封建王朝战争,特别是1618年起,欧洲两大强国集团——哈布斯堡王朝集团与反哈布斯堡王朝集团为争夺欧洲霸权而进行的“三十年战争”,双方的非正义性都是显而易见的。至于英国同西班牙、荷

兰、法国争夺海外殖民地的多次战争,其非正义性也是不言而喻的。帝国主义时代的美西战争、日俄战争,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同盟国和协约国,双方都是非正义的。当然,协约国方面的弱小民族如塞尔维亚,它为反对奥匈帝国的压迫而参战,这应当说是正义的,但不足以改变第一次世界大战整体上的性质。^③战争的性质在战争过程中发生变化。如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中,新兴的资产阶级法国起初是为反对外敌入侵、保卫法国大革命成果而战,而后来逐步向扩张领土与争夺霸权的战争转化;反法联盟起初是为了扼杀法国革命、扶植波旁王朝复辟、维护欧洲封建势力而战,而后期有的成员国也具有反抗民族压迫的一面。1870年普法战争中,尽管普鲁士在一定程度上是为排除德国民族统一的严重障碍而对法作战,但基本上仍属于王朝战争,双方都是非正义的。而普军在色当一役大获全胜并俘法皇拿破仑三世之后,仍继续坚持战争,向法国首都进军,激起法国人民的武装起义。于是普鲁士的战争转变为侵略和掠夺的非正义战争了。^④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同时互相交织的情况也间或有之。19世纪多次俄土战争中的土耳其就是具有双重性;这个早已衰落的帝国抵抗沙皇俄国的侵略扩张,这应当说是正义的,另一方面,它坚持对巴尔干等地各民族的压迫和残暴统治,这是非正义的。

关于战争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问题 研究认为,正义战争通常在历史上起进步作用,非正义战争起反动作用,但是也要承认某些非正义战争在客观上起了某种积极作用。欧洲中世纪延续了一百多年的十字军东侵本来是非正义的,但客观上促进了西欧商业与手工业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东西方联系的进一步加强。中世纪英国两派王朝之间的玫瑰战争双方都是非正义的,但战争的后果却是

英国腐朽的封建关系的削弱和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加强。同样,俄土战争中俄国对土作战,客观上造成了有利于巴尔干等地各民族反对土耳其暴政的形势。战争本身的非正义性和它在客观上产生的某种积极作用是两回事,不能因为客观上某种积极的作用而否定非正义战争本身的非正义性。同时,一切战争,不论其性质如何,都具有很大的破坏性。然而,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反对和否定一切战争,而是反对和否定非正义战争,同情、支持和肯定正义战争。

关于战争对作战方法的影响问题 研究认为,不同的战争条件下的作战方法也必须相应地改变。历史上的这些战争表明,任何杰出的军事家和统帅都不可能脱离这些条件而随心所欲地创造,他们必须在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探索新的作战方法,加以巧妙运用,从而克敌制胜。反之,历史上有些愚蠢的将领或军事保守派,不顾战争条件的变化,总想照搬前人成功的经验,例如拿破仑战争时期普鲁士试图沿用距当时已半个世纪的弗里德里希(又译腓特烈)二世的战法,拿破仑战争结束半个世纪后的克里木战争中,沙皇俄国统帅还照搬拿破仑时期的战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法国统帅也照搬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打法,如此等等,没有不招致灾难性后果的。因此,研究各个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地域和民族、不同性质的战争,应当着眼其特点和发展,这是为世界战争史实践多次证明了的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关于战争对国防建设的影响问题 世界战争史还反复证明,军事力量和战争准备对于国家兴亡、民族盛衰、人民安危关系密切。这也正是为什么自古以来人们重视国防建设的原因。综观世界战争史,在对待军队和战争的问题上,曾出现过两种错误倾向:一是

穷兵黩武，二是偃兵息武。这两种倾向各执一端，都是祸国殃民之道。居安思危，有备无患，是一条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指导思想，对于对外推行和平共处政策、对内致力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国家，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吴春秋主编：《世界战争通鉴》，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5。

姚有志、过毅主编：《百年战争评说》，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1999。

（彭训厚）

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研究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

探讨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相关内容的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国家两大军事集团——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和以英国、法国、俄国为核心的协约国，为争夺世界霸权、重新瓜分殖民地、争夺势力范围和奴役他国人民而进行的首次具有全球规模的战争。它给世界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总结这一方面的经验教训，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所以，中国学术界一直比较重视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研究。

中华民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研究 中华民国时期，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翻译外国的著述，介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基本情况。此间的主要译著有：刘献捷翻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消耗》（1937）、韩则武译、法国陆军参谋部战史编纂委员会编纂的多卷本《第一次世界大战》（1944年开

始陆续出版）、张传普翻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战场国境会战》（1945）、李霁编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简史》（1948）。专著主要有：曹未风编著的《第一次世界大战》（1946）、王麟生著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史高加索战争》（1946）、陆军大学编写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战场国境会战》（1945）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史学界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研究空前发展，著述和译著日渐增多。主要有：蒋孟引著《第一次世界大战》（1957）、于熙剑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1959）、吴机鹏著《第一次世界大战》（1979）、萨那等编《第一次世界大战史》（1979）、寿进文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大战役》（1980）。80～90年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研究的一个崭新阶段，有价值的论著不断出现。钟石翻译出版了苏联罗斯图诺夫编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史》（1982）。张瑞德著的《第一次世界大战》（1986）和张海麟等著的《公理战胜强权的神话——第一次世界大战》（1993）是两部比较有特色的著作。后者是一部侧重于从军事方面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力作，对战争的准备、作战计划、兵力部署、战役进程及其特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评述，较为系统地论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经过、结局和经验教训。其间，各类报刊共发表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的学术研究文章200余篇，其中探讨最多的问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缘起”与“战争责任”是史学界争论的焦点和热点之一。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界就“英德矛盾主要说”展开了讨论。不少研究者对此说持肯定态度，但也有人对此持不同看法。

“英德矛盾主要说”不少研究者对此说

持肯定态度。司徒琳认为:英德在重分世界问题上的矛盾,是20世纪初期帝国主义的主要矛盾,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原因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英德矛盾》,载《中学历史教学》1984年第3期)赵辉杰认为:英德矛盾是由两国各自的帝国主义利益决定的,海军竞争和协约国的形成及其发展是英德矛盾的两个主要表现形式,二者互相关联、互相影响,终于成为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主要因素。(《略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德关系的演变——评西方学者的一些观点》,载《兰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否定“英德矛盾主要说” 陈汉时认为:从实际情况考察,“英德矛盾主要说”并不全面。英国是把德国作为主要对手,而德国没有从国策方面把英国作为主要敌人,只是在具体政策和海军竞赛上把英国作为主要对手,因此两国之间的矛盾构不成主要矛盾。德国最大的敌人是法国,无论从欧陆的霸权地位或德国的发展来看都是如此。(《二十世纪初英德主要矛盾说质疑》,载《山东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

德国是战争策源地说 段延春、丁雪辰从政治和地理因素考虑德国是战争策源地。德国虽处于欧洲的中心,但却未形成统一的、强有力的政权。德国不是通过革命、而是通过王朝战争来实现统一的。这种统一,除了依靠强制手段外,更主要的是靠煽动起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靠对外发动战争达到的。正是这种膨胀的民族主义情绪,导致了德国成为战争策源地。(《试论德国成为战争策源地的政治和地理因素》,载《牡丹江师院学报》1996年第1期)罗天焕认为最热衷发动战争的德国皇帝威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第一次世界大战责任分析》,载《湖北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

“时代”、“格局”和“人”三层次说 潘人

杰、李巨廉认为,至少要从“时代”、“格局”和“人”三个层次来看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与战争责任。(《时代、格局和人——关于世界大战起源问题的若干思考》,载《世界历史》1989年第1期)

七月危机说 陈兼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欧洲各大国,尤其是德、英两国决策者对于危机判断与处理的失当。(《德国、英国与七月危机——关于国际危机处理的一项方案研究》,载《世界历史》1990年第6期)吴瑞认为:在七月危机期间,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插手和频繁的外交阴谋,终于将萨拉热窝事件引发为七月危机,又将七月危机演变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悲剧。(《七月危机期间的欧洲外交》,载《江海学刊》1992年第3期)

“核心成因”说 时殷弘从宏观上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成因进行了系统阐释之后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核心成因是德国的暴发对英俄的冲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成因——一种宏观阐释》,载《江海学刊》2000年第1期)

关于美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问题 主要是:

关于美国是中立还是参战的问题 史煦光认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是中立还是参战、在何时参战、以何种形式参战,取决于能否保持其“利益线”。(《再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中立”与参战》,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

关于美国的调停外交问题 吴瑞、杨春龙认为:调停外交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是以调停促成妥协,将战前欧洲两大集团相互对峙、相互牵制的格局继续维持到战后,从而为美国因势乘便称霸世界铺平道路。(《略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调停外交》,载《苏

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

关于威尔逊的“十四点”问题 唐济生认为：“十四点”充分反映了威尔逊外交的基本特征。“十四点”充满了民主、自由、正义的字眼，其背后却隐藏着美国向外扩张的企图。“十四点”标志着美国对外政策的重大转变，由以前立足西半球的孤立主义开始走向“领导世界”的扩张主义。“十四点”及其外交政策还为以后的美国对外扩张政策提供了一个可供遵循的基本理论。（《威尔逊“十四点”与美国外交》，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关勋夏认为，威尔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玩弄了假中立、真备战，假调停、真战争，假和平、真争霸的阴谋手段，谋求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谋求美国的世界霸权。（《威尔逊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载《军事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

关于中国参与参加巴黎和会问题 中国参战问题。吴瑞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北洋军阀内部在中国参战问题上的争执即“府院之争”，其实质是美日两国争夺对中国控制权斗争的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国“参战之争”》，载《苏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中国参加巴黎和会问题。史学界多持否定态度。袁继成、王海林则认为对此不能一概否定，把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巴黎和会这两件事放到中国近代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争取国家独立的历史长河里考察，就会觉得中国参战不是没有道理的，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有失但也有得。（《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巴黎和会问题》，载《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6期）

关于战争与革命的关系问题 “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的公式能否用来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与革命的关系？史学界对此有不同看法。茅海建认为：革命和战争之间没有直接的、必然的、因果的关系。即使某一事

例恰恰是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那也不能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被革命制止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各国革命运动高涨的情况下结束的，这些革命对加速战争的结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它不是主要的因素，更不是唯一因素。大战主要是以军事上的胜负而告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被革命制止的吗？》，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6期）

与上述意见相反，石森认为：不能否定革命斗争对制止战争的重要作用。战争与革命都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战争虽然不是产生革命的根本原因，但战争往往是加速革命的一个重要条件。当革命力量强大时，就有可能推迟和制止战争的爆发。德国和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虽然没有能制止一次大战，但对加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全面正确地分析一次大战中的战争与革命问题》，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2期）姚海认为：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最基本特点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十月革命的发生》，载《外国问题研究》1988年第2期）潘黎明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得以顺利实现的首要因素。两次革命均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帝国主义无暇顾及，因而使得革命获得成功。（《俄国十月革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载《苏联历史问题》1988年第3期）

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与地位问题 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世界性。龚敏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世界规模的战争，战争对国际政治格局和经济格局具有世界性的深刻影响。（《浅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世界性》，载《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卢文璞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世界现代历史进程的深远影响不亚于

十月革命,而且十月革命与之紧密相联,因此,这两件大事可同视为世界历史进入一个新时代,即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标志。《《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世界现代历史进程的深远影响》,载《历史教学问题》1989年第2期)金鸣娟认为,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影响下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思想轨迹的转变提供了契机。《《试析十月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影响》,载《北京农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夏季亭、张钦贤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世界现代史的影响是深远的、广泛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已经具备了世界现代史因素,应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入世界现代史的范围。世界现代史开端于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都是世界现代史开端时期的重大事件。《《应当全面认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兼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世界现代史的一部分》,载《德州师专学报》1989年第1期)萧钟生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无节制的行为,打破了‘和平’的资本主义均势,形成了政治力量重组的资本主义新格局。”可概括为四点:引起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巨大震动,促使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在20年代大发展;加速了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客观上刺激了资本主义世界以工业技术为主的现代科技发展;推动了战后国际社会维和、制约机制的初步建立和资本主义固有关系在一定时期的和平发展。《《益阳师专学报》1996年第1期)另外,还有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英国和非洲的影响也作了研究。

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国数量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国的数量至今史学界未形成一致的看法。赵晓兰、吴潮认为:除史学界公认的30个参战国外,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这四个英国自治领及印度、

捷克斯洛伐克、波兰、门的内格罗、哥斯达黎加也应视为参战国,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国应为39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国考证》,载《军事历史》1989年第4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国问题再探》,载《浙江师大学报》1997年第3期)裴泽湘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是36个。他将玻利维亚、秘鲁、乌拉圭、厄瓜多尔排出参战国行列,而将圣马力诺列入参战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应为三十六个》,载《学术交流》1989年第1期)伏广存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国应为37个,埃及应列为参战国,其他36国与裴文一致。《《究竟有多少国家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载《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1期)

研究展望 中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的研究工作,取得了累累硕果。但从全面情况来看,仍有许多差距。这主要表现在:研究空白多。目前的研究力量和成果比较集中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和战争期间的外交与国际关系方面,其余方面很少涉及。例如从军事角度来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文章极少,基本上仍停留在介绍性、普及性的水准上。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世界和欧洲带来的变化和影响,要从全局把握,要重视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东欧、中欧、巴尔干、中亚等民族主义国家的重大影响。除了要从外交和政治的角度研究这种变化,还应从民族学、民俗学、宗教等多角度入手,而这方面的研究文章是鲜见的。此外,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研究等方面都是薄弱环节乃至空白,有待进一步开拓。

(黄传武 吴井潮)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探讨1939~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及其相关内容的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苏联、美国、英国等同盟国反对德国、意大利、日本等轴心国侵略的全球性反法西斯战争,是世界军事史和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宏大、战斗最激烈、影响最广泛和最深远的—次战争。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研究历来为史学工作者所重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 中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研究始于大战爆发的初期。1939年7月郭化若撰文《日本的速胜论为什么必将失败》,密切结合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针对性极强,批驳了日本的“速胜论”,对坚持和全面贯彻落实毛泽东关于持久抗战必胜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刘思慕从1939年9月起,陆续发表了《波兰的悲剧》、《太平洋战争初期的政治教训与中国》、《欧洲第二战场问题的探讨》等文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汪权棣所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储玉坤所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和唐子长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史》(多卷本)等,分别由南京胜利出版公司和上海永祥印书馆于1946年出版。这些文章、专著和萧乾等战地记者所撰写的报道和评论,对大战的起因、经过和结局都有详细的评述,为后人留下了不少珍贵的史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在“向苏联学习”的口号下,一些军队院校在军事教学中开设了有关苏德战争史的课程,在地方院校的近代史教学中也讲授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特别是苏德战争史,并出版了一些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翻译著作和教材,其中包括中国抗日战争史的内容。20世纪50年代,张继平、胡雪岩、俞楠等还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性质等重大学术问题在报刊上展开过讨论。但是,反映第二次世界大

战全貌的专著不多。“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1976),由于“四人帮”的干扰与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总的来看,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未引起国内社会应有的重视,没有建立起专门的科研机构和学术团体,学术成果不多。

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史学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研究出现了转机。1979年2月10日,徐向前在给军事科学院和军事学院(今国防大学)领导的一封信中首先提出要恢复战史课,要使指挥员懂得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他在信中强调指出:“军事学院设战史课,应视为一门主课之一,我军中高级指挥员不懂或不精通中外古今典型的各种或各个战例,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即不可能深入地、熟练地掌握战争的规律和知识,对于以后的指挥作战大为不利。军队院校停开战史课已经20年,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现军事学院拟开战史课,我认为非常之好。”军队院校为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迫切希望得到地方院校的帮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方面先走一步的地方院校和科研单位也乐意与军队的史学工作者共同开创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的新局面。1979年7月中旬,由哈尔滨师范学院、辽宁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发起,在哈尔滨举办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学术讨论会,并决定成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筹备组,会后即开始了学会的有关筹备工作。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于1980年6月16~24日在昆明召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学术讨论会上宣告正式成立。参加成立大会的有军事科学院、军事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安徽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46个单位、

74 名代表。至今已召开过 21 次学术研讨会，出版五本论文集，并多次与外国史学家进行学术交流。

1982 年，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的第 5 号提案（提案人段苏权），由国务院批交中国社会科学院会同军事科学院研究处理，这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是一个巨大的推动。1986 年夏，经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专门研究机构——世界军事史研究室，隶属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集中人力撰写“有科学依据、有权威、有中国特色的‘二战’史”。

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史学工作者结合本单位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奋发图强，锲而不舍，深入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撰写了大量学术水平较高的著作。这些著作大体可分为七类：

第二次世界大战通史 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朱贵生等人编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军事学院（今国防大学）黄玉章等人编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武汉大学张继平、胡德坤编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胡德坤等人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纲》，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的五卷集《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特别是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吸收了近年来新的档案史料和研究成果，反映了国内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的最新成就和水平。该书具有以下主要特点：一是在框架结构方面，突破了西方中心论和苏联中心论的藩篱，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充分反映和肯定了中国抗日战场及其他反法西斯战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与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方面，采取了大战在东方（1937 年七七事变）和西方（1939 年 9 月 1 日德国人侵波兰）先后爆发的观点，颇具新意。二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作为国内第一部多卷集的《第

二次世界大战史》，广泛吸收国内外最新史料、观点及研究成果，兼收并蓄，博采众长，融为一体，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三是注重从战略高度突出军事斗争，兼顾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科技、心理等诸多方面，并突出战略层次。各主要战役均注意与整个大战相联系，从战略高度进行分析和评价。四是全方位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全貌。既重点反映大战的主战场苏德战场，亦如实客观地反映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做出巨大贡献的东方主战场——中国战场和其他战场，包括世界各国的反法西斯斗争；既充分反映中国抗日战争八路军、新四军的敌后战场，又如实反映国民党军的正面战场，比较客观、公正、全面。该书还总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如：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防止法西斯主义死灰复燃是消除大战隐患的关键；反对绥靖政策，制止大国争霸的局部侵略战争，是消除大战隐患的重要举措；结成最广泛的国际反侵略统一战线，是制止或推迟大战爆发和赢得胜利的确定性条件；实行全民动员，开展全民战争，是赢得反侵略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雄厚的综合国力是取得反侵略战争胜利的重要基础；根据未来战争特点，加强军事科学研究和武装力量建设，是夺取反侵略战争胜利的重要环节；先进的技术与武器系统、创新的军事学说和科学的体制编制，是军事革命密切相关的三大要素，不可或缺。

学术专著 如武汉大学张继平所著的《历史的反思——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政略与战略》、中国社会科学院朱庭光主编的《法西斯新论》，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姚有志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略指导教程》，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编的《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暴行》，王振德所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国战场》，华东师范大学李巨廉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论集》、《第二次世界大

战· 专题研究》，海军指挥学院翁赛飞、时平所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海战史》，国防大学张海麟等所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经验教训》，云南大学徐康明所著的《中国远征军战史》等。这类专著，从大战的某一领域作了较为深刻的分析研究，总结了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词典、教材、工具书 如李巨廉等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百科词典》，张跃铭等人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通鉴》，王斯德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事件人物》，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徐晓村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大事纪要》，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蔡祖铭编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简编》、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彭训厚、于江欣编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教程》等。这类图书，资料丰富，可供读者查考。

通俗读物和画册 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沈永兴、朱贵生主编的《二战全景纪实》，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彭训厚和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左立平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纪实图集》，郑志国等人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等。这类书籍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可读性较强。

论文集 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编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论文集》，军事科学院军事学术杂志社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军事论文选——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军事科学院编《战争奇观，民族壮举——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论文选》，以及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写的《三十年代世界主要国家的战略与军备》等。

译著 如安徽大学翻译的苏联国防部军事历史研究所著十二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海市政协编译工作委员会翻译的英国历史学家利德尔·哈特所著《第二次世界大

战史》，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翻译的朱可夫著《回忆与思考》、德国瓦尔特·瓦利蒙特著《德国国防部大本营(1939~1945)》、英国历史学家艾伯特·西顿所著《苏德战争》、德国军事历史学家汉斯-阿道夫·雅各布森等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决定性战役(德国观点)》，彭训厚等翻译、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苏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秘密战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内幕》等。

参考文献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1999。

朱庭光等：《法西斯新论》，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

黄玉章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

李巨廉、潘人杰：《第二次世界大战——专题述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彭训厚)

战后局部战争史研究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local wars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探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范围内爆发的局部战争及其相关内容的活动。

研究概况 综观人类战争史，世界上爆发的大约1.5万次各类战争，除两次世界大战外，从广义上讲，均可称为局部战争。然而，出现局部战争这一概念并开展研究却是近代的事，广泛深入地对其进行理论研究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据不完全统计，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迄今50多年来，世界各地爆发的局部战争和军事冲突已达200余场，平均每年约4~5场。根据国际战略形势的变化，军事斗争的需要和局部战争的实践，各主要国家先后掀起“局部战争”研究热，各自进行这一战争样式的概念界定和理论概括，并且随着现代

局部战争实践的发展和国际上军事学术的交融,认识也在不断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根据对国际形势和周边环境分析判断,军事实践和军事理论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研究如何应付“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尽管如此,中国毕竟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解放一江山岛作战、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中苏珍宝岛事件、西沙之战和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等局部战争和军事冲突等实践,在军队内部,对大规模、较有影响的局部战争的动因、作战经过及作战指导得失都作了必要的研究和探讨,并有一定建树。不过,这种研究是在小范围内进行的,还不够深入、不够系统,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不多。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根据邓小平对国际形势和时代主题的科学观察和深刻分析,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爆发世界战争的可能性较小,由此中国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指导思想实行了战略性转变,由“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入到相对和平建设轨道上来。随后又明确提出将军事斗争准备的重点转到应付可能发生的局部战争和军事冲突上来,从而开启了将局部战争史作为独立的领域进行深度研究的契机,局部战争史研究开始向新的广度和深度发展。

1992年末,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根据对冷战后国际战略格局和周边安全环境的科学分析,提出了新时期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要求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上来,由此学术界掀起了军事理论与实践特别是战后局部战争史研究的新热潮,战后局部战争史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研究成果 综观中国战后局部战争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以下七类:

通史 如张聿法、余起芬等编著的《局部战争概览》、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海湾战争史》等。

学术专著 如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齐德学编著的《巨人的较量——抗美援朝高层决策和指导》(1999),是一部抗美援朝战争史研究专著。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支绍曾编著的《战后世界局部战争史教程》(2000),在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战后局部战争进行了梳理和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其观点颇具代表性。该书对战后局部战争史的阶段划分、战后世界局部战争的基础特点以及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主要特征进行了较为客观和全面的阐述。作者以国际格局的重大转变为主要依据,以有重大影响的战争爆发为主要标志,对战后世界局部战争史进行了综合考察,认为战后世界局部战争史大体可划分为三个时期(每个时期又可分为几个阶段):第一个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中苏边境武装冲突爆发之前,为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形成与对抗时期;第二个时期,中苏边境武装冲突爆发至海湾战争爆发之前,为美苏争霸与第三世界的崛起时期;第三个时期,海湾战争爆发至20世纪末,为两极格局解体与世界向多极化发展中的角逐时期。该书还对战后世界局部战争的特点和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主要特征,作了概括性叙述。

学术论文 如刘精松的《当今世界军事发展趋势及战略思考》、戴怡芳的《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姚有志的《从科索沃战争看美国21世纪的战略走向》、彭光谦的《科索沃战争与当代国际战略格局》、柯春桥的《冷静观察科索沃战争对国际战略格局的影响》(均载《中国军事科学》,1999)。

译著 如翻译出版的苏联沙夫罗夫著

《局部战争今昔》、日本井上四郎著《中东战争全史》、韩国历史学家著《朝鲜战争》(原名《韩国战争史》)等。

战后局部战争史通俗读物 如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战后局部战争系列丛书《日出日落三八线——抗美援朝纪实》以及《援越抗美——中国支援部队在越南》等。

研究的主要问题 中国学者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局部战争和军事冲突相比,有许多新的特点。

关于局部战争与世界大战的关系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局部战争是通向世界大战的阶梯,而战后的局部战争与新的世界大战却无内在的密切联系,1948年的柏林危机、1950年的朝鲜战争、1961年的第二次柏林危机以及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等,虽有诱发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性,但都很快被消除了。

关于局部战争的根源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意、日是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法西斯主义是战争的主要根源。战后,霸权主义取代了法西斯主义成了战争的主要根源。许多局部战争,都具有超级大国争夺势力范围、调整全球战略部署和对外扩张的背景;两个超级大国,直接出兵和间接介入的局部战争占了总数的24%。帝国主义列强和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没有直接发生局部战争,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却几度兵戎相见。这是由于某些社会主义国家也走上了全球霸权主义和地区霸权主义的道路,使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激化,从而导致了局部战争。

关于局部战争的发生地区问题 局部战争的多发地区,由战前的欧洲发达地区,转移到亚、非、拉不发达地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局部战争共发生64场,以欧洲地区为最(22场),其次是亚洲(20场)、拉美(17场)、非洲(5场)。战后,从1945~1986年发生的182

场局部战争来看,欧洲只发生四场,更多的局部战争发生在亚洲(87场)、非洲(59场)和拉美(32场)。

关于局部战争的发生频率问题 研究认为,局部战争爆发的频率明显增大。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平均每3.7月爆发一场局部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平均每2.7月爆发一场局部战争,其中60年代为高峰期,平均每1.5月即爆发一场局部战争。

关于局部战争的作战样式问题 武器装备发生了质的变化,作战样式灵活多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局部战争中使用的兵器主要是飞机、坦克、军舰,进攻和防御为基本的作战样式。战后随着高科技在常规武器中的应用,隐形飞机、精确制导武器等先进的技术兵器有了很大发展,出现了空地一体战等新的作战样式。美国远程空袭利比亚,用集束炸弹能通过窗口打进卡扎菲的住室。局部战争有了高效能的手段。

关于局部战争的结束方式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局部战争,交战双方通常以一方胜利一方失败而结束,除在战场上决定胜负外,选择的余地较小。战后的局部战争,受政治、外交等因素制约更为明显,更加强调军事行动必须服务于国家的政略。在许多场合下,当战场上难于决出胜负时,通常采用外交谈判和政治妥协的方式来解决。例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四次中东战争等局部战争,最终都是通过外交谈判的方式加以解决的。

关于局部战争的发展趋势问题 史学界的基本观点是:①战争的科技含量不断提高,有形战争正在孕育无形战争,信息战初见端倪,高技术性已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多次局部战争的显著特点。②政治、经济等诸多因素对战争的制约力增强,战争的目的和规模受到限制,战争呈局部性。③战场空间日益增大,战争的时空观发生重大改变,战争已由平

面转化为立体战争。④高技术武器装备使战争的节奏大大加快,战争的进程大为缩短,但准备时间延长。⑤战后空中力量的巨大作用日渐显现,战略空中进攻与防御成为重要作战模式,空中袭击的重点目标及其顺序不断有所变化。⑥战争的胜负更依赖于综合国力、系统对抗、军队质量对比和战前准备。⑦高技术战争并不排斥某些固有的作战思想与方法,但某些固有的作战思想与方法要适应新的条件并有所发展。

研究趋势 中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爆发的局部战争史虽然有较为完整和系统的理论总结与抽象概括,但基本上还是初步的。战后世界局部战争史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尚有待逐步完善。大量的权威资料,还有待于搜集。诸多问题的研究,还有待于深化。随着局部战争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新的局部战争史研究热潮将会到来。

参考文献

张聿法、余起芬等编著:《局部战争概览》,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陈舟著:《现代局部战争理论研究》,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7。

(彭训厚)

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研究 (study of the Malvinas Islands War)

探讨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的起因、发展、结局以及经验教训等的活动。

研究概况 1982年4月,英国和阿根廷围绕马尔维纳斯群岛(福克兰群岛)及其附近海域主权问题爆发了一场局部战争,历时74天,以阿军失败,英军重占马尔维纳斯群岛而告结束。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一开始,就成为世界各国,特别是政界和军界所瞩目的研究热点,同样也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战争结束后,许多军内外人士从不同角度对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所展示的特点和反映出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发表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著作和学术文章。主要有:蒋树兴著《马岛战争中英阿参战飞机及其损失情况》(1982)、蒋树兴撰《英阿马岛战争的主要教训》(载《外国军事学术》1983年第1期)、王保存撰《马岛战争中英军的快速反应》(载《外国军事学术》1983年第9期)、军事科学院军事学术杂志编辑部编《马岛战争研究》(1984)、汪子强著《马岛战争始末》(1985)、徐锡康编《局部战争与海军》(1988)、王增铨撰《英阿马岛战争双方战略得失剖析》(1989)、翟晓敏撰《马岛战争前夕英阿双方战略判断失误简析》(载《外国军事学术》1996年第8期)、史鲁泽等撰《英阿马岛战争对登陆作战的启示》(载《军事历史》2000年第3期)、朱海平等撰《英阿马岛封锁作战的特点、经验及启示》(载《外国军事学术》2000年第9期)、潘玫等著《惊心动魄一百天:马岛战争》(2000)等。其中《马岛战争研究》精选了18篇中外学者研究论文,内容涉及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的历史背景、战略决策、作战指挥、战争动员、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电子对抗、先进武器使用以及后勤保障等许多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上述著述认为: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改变了传统的海战观念和战法,显露出新的海战模式,预示了未来海战的走向;海上力量强弱的主要象征已不再是舰船吨位的大小,而是导弹、鱼雷等精确制导武器的多少、射程、精度和杀伤力;海战的攻防态势已由近距离格斗转向超视距攻击;所谓“彼此互不照面的海战”、“非接触式的海上打击”已经逐渐成为海战的主要战法。此外,中国学者十分注意对外有关文献资料的介绍,翻译发表学术文章数十篇,如阿根廷M.吉苏尔著《论马岛之战》、英国国防部

白皮书《英国国防部对福克兰群岛战争中使用武器装备的看法》、苏联 A. 德罗夫等撰《英阿冲突中军兵种使用的特点》、美国温伯格撰《福克兰和黎巴嫩作战的经验教训》、日本藤井治夫撰《马岛海战反映出的几个问题》、苏联 B. 罗季奥诺夫撰《英阿冲突中的无线电的电子战》等。20 世纪末,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和做好军事斗争准备,中国对于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的研究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重点和领域多集中在制空权、制海权、制信息权,封锁与反封锁,登陆与抗登陆作战等方面,研究的范围和内容更具针对性和实用性。

研究内容 中国军事学术界对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内容展开:

关于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的特点 研究认为,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就其性质来说,是一个二流的军事大国对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战争;就战争类型来说,是一场常规局部战争;就其作战样式来说,是一次以海空军为主的岛屿争夺战。其特点是:①决策、指挥层次高。在这场争夺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的战争中,英阿双方为了实现各自的目的,都采取由最高层进行决策和直接实施指挥。②战争规模有限。英阿将作战范围仅限争议地区,不涉及对方本土。双方只投入了部分军事力量,阿根廷动用了 1/3 强的兵力,英国只动用了 8% 的兵力。英战时内阁在给其出击部队司令下达任务时就明确了“尽量减少伤亡,不要轰炸阿根廷本土,何时登陆要看政治需要”等三条原则,把战争规模严格限制在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争夺上,避免战争升级。③战争目的坚决。在决出战争胜负之前,英阿双方战争目的都很坚决,一直没有动摇过。阿根廷尽管因上层判断有误,指挥失当,但其航空兵的作战行动体现了阿军作战目的的坚决性。其飞机能在接近作战半径的极限上,巧妙地避开英

军舰载雷达和导弹的袭击,以超低空飞行袭击英特混舰队的舰船,击毁击伤了英军 17 艘舰船,取得重大战果。英军采取灵活的战术并使用大量的精确制导武器,使阿航空兵损失过大而失去有效的空中突击能力。④战争进程阶段性明显。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持续时间不长,但阶段性明显,可分为三个阶段:即阿军夺占马尔维纳斯群岛和英军兵力展开阶段、封锁与反封锁阶段和登陆与抗登陆阶段。⑤战区地理条件特殊。南大西洋战区气候严寒、风大雾浓、岛上地形复杂、交通不便,加之人烟稀少等,对交战双方都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⑥诸军兵种联合作战。战争中,海战、空战和陆战交织进行,参战部队有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空降兵、步兵、炮兵、防空兵等,是一次现代条件下的诸军兵种联合作战。⑦精确制导武器作用巨大。在战争中,英阿双方都大量使用导弹、鱼雷等精确制导武器。由于精确制导武器射程远,命中精度高,适应性强,能实施全天候作战,因而在战争中取得了惊人战绩。

关于英阿双方的战略判断 战争初期,英阿双方战略判断都有失误。阿方战略判断的重大失误是:①阿政府认为,国际形势有利于收复马尔维纳斯群岛,绝大多数美洲国家会支持阿根廷的行动,美国不会支持英国,最多保持中立;北约其他国家也不会有大的反应。②英国因其自身能力,不可能远涉重洋以武力收复马尔维纳斯群岛。因此,阿方没有进行可能爆发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的准备。③战争开始后,阿方又错误地认为英军将进攻阿本土,因而大陆防御使用兵力过多,一些飞机转移到了本土,从而减少了在马尔维纳斯群岛战区的作战力量。这种对基本形势估计的错误和战略决策、战争指导的失误,是阿方在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中失败的首要因素。

英方战略判断上的重大失误是：①认为英阿之间不会爆发突然性的军事冲突。1982年英阿谈判破裂后，阿曾公开表示：“关于马岛主权问题，阿保留采取其他手段的权利”。英政府尽管预先觉察到了两国关系的紧张形势，但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对军方提出的一些措施也未采纳，因而未能有效地制止战争的爆发。②认为最好的对策是维持现状，采取拖延和渐进的办法解决马尔维纳斯群岛争端。③认为平时无必要进行军事威慑，战前还减少了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和附近水域的军事存在。

关于战争指导 研究认为，英阿双方战争指导的经验教训值得汲取。阿方战争指导思想立足于先机制敌，速战取胜。英出兵后，阿上层集团脆弱，总统和一些高级将领缺乏驾驭战争全局的能力，对战争进程、发展、规模、作战方式和战争结局等重大问题缺乏通盘考虑和缺乏应变措施。作战指导是走一步看一步，把希望寄托在武力相威胁上，尽量顶，争取拖，认为拖得越久对自己越有利。这种战略指导使阿军在军事行动上丧失了积极性和主动性，造成作战上的重大失利。

阿攻占马尔维纳斯群岛后，英国反应迅速，当即宣布与阿断交，成立由首相撒切尔夫人为首的战时内阁，全面负责对马尔维纳斯群岛之战的决策与指挥，组建特混舰队，调集兵力和作战物资，征用或租用商船。同时，确定了以武力为主，政治、外交和经济手段为辅的作战方针。

关于战争动员 英国对商船的征用动员，速度之快，作用之明显，是非常突出的。4月3日英国宣布成立战时内阁，同时下达了征用商船命令。4月5日，在驶向战区的英主力舰队中已有少数商船随队出征。许多商船都是在阿根廷出兵马尔维纳斯群岛后不到一周的时间内便启航执行军事任务。5月初，

所有的征用商船全部到位。英国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程度，关键是英国平时都有明确规定和措施。按照英国政府动员法令，在紧急情况下，可根据法令迅速动员或征用民间的人力、物力。英国的战争动员体制完善，措施落实，为其争取了大量时间，赢得了战争主动权。

关于诸军兵种联合作战 研究认为，英阿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是一次以争夺岛屿为目的的诸军兵种联合作战，双方作战编成内，不仅有大量的海军和空军，而且还有相当数量的由海军陆战队、空降兵、步兵，以及炮兵、防空兵、工程兵、通信兵、陆军航空兵和各种勤务保障部队组成的地面部队。为达到作战目的，双方都按照总的企图和计划，在联合指挥机构的统一指挥下，以联合作战的方式实施作战。

在整个作战中，英军三军协同配合默契，有效地发挥了诸军种联合作战的整体威力。在海上封锁作战时，英海军在积极寻歼阿海上作战力量的同时，不断用舰炮和舰载直升机轰击马尔维纳斯群岛重要目标，为地面部队登陆创造了条件。在登陆作战时，英海军积极配合空军和炮兵对马尔维纳斯群岛重要目标实施火力准备，有力地支援了登陆部队的作战行动；英空军以空中巡逻、作战配合海军行动，对马尔维纳斯群岛重要目标进行空中火力打击，支援地面部队作战；英地面部队通过渗透侦察、袭击阿军机场和防空导弹阵地等行动，支援空海军的作战行动，从而增强了作战的有效性。

阿方虽成立了战区司令部，但三军仍然独立，各自为战，互不协调。战争初期在没有遇到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对抗时，三军联合协同尚能维持，而当其受到英特混舰队的严密封锁和电子战、火力战的沉重打击后，三军联合作战就遭到严重破坏。特别是“贝尔格拉诺

将军”号巡洋舰被英军“征服者”号核潜艇击沉后,海军司令I. 安纳亚海军中将为保存实力,不顾空军的强烈反对,立即将兵力从战区收缩到近海,避战不出。战区内只剩下空军独自同英军作战,联合整体的分化、作战力量的失衡是阿军作战节节失利的重要原因。

关于封锁与反封锁作战 研究认为,英军实施海上封锁的做法值得重视。其战法主要是:①根据兵力的增长和作战需要,逐步扩大封锁范围。英国先是宣布对马尔维纳斯群岛周围200海里海域实行封锁。随着第1梯队的到达,又将海上封锁升级为海空封锁。战争形势激化后,又扩大到距离阿海岸线12海里。②海上封锁与空中封锁相结合,建立多层封锁线。外层封锁任务由核动力潜艇和常规潜艇及海上巡逻飞机执行,中层封锁任务由舰载战斗机执行,内层封锁任务由驱逐舰护卫舰编成的小舰群执行,重点封锁与包围马尔维纳斯群岛,袭击靠岸的阿军舰船和岸上目标。③在封锁范围内同时进行反舰、反潜和防空作战。④在海空封锁中不断轰炸和炮击马尔维纳斯群岛阿军防御设施。英军在进行海空作战的同时,还以相当的力量对马尔维纳斯群岛进行空袭和舰炮袭击,破坏与摧毁阿军的机场、雷达、防空阵地、弹药库、防御工事及其他军事设施,以削弱阿军的防御能力。

关于登陆作战 研究认为,马尔维纳斯群岛的登陆与抗登陆作战是双方主力作战,具有决战性质。英军能在失去先机之利的情况下,劳师远征,成功登岛,其原因主要有:一是精选登陆地点。选择不很理想的圣卡洛斯港海湾作为登陆点。二是运用欺骗手段。英军在登陆前两周就选定圣港为登陆点,而英报却登载大量消息,预测英军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南部登陆。登陆前,英军飞机和舰炮连续袭击马尔维纳斯群岛南部阿军,造成将在

马尔维纳斯群岛东、南面登陆的假象。三是充分利用夜暗。英军发挥夜视器材的特长,乘夜暗和浓雾隐蔽地将兵力集结于待机地域,凌晨登陆,从而绕开了阿军抗击火力和航空兵突击。四是巧妙实施佯攻。英登陆舰船向圣卡洛斯港开进时,英两艘航空母舰却驶向南部海域。英军在圣卡洛斯港登陆的同时,其飞机、军舰则对阿根廷港、古斯格林等地进行轰击;部分突击队员还在达尔文港、路易斯港等地登陆,发动牵制性攻击。五是果断实施立体登陆。英军突击部队乘登陆艇、武装快船和水陆两用车辆实施多点登陆,同时使用直升机实施垂直登陆,从而大大提高了上陆速度。

关于精确制导武器 研究认为,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中精确制导武器发挥了重大作用,是以往任何一次海空战所不能比拟的。主要表现在:①扩大了战场范围。如阿“超级军旗”式战斗机在距目标48公里处发射了1枚“飞鱼”式导弹,就将英国3500吨的“谢菲尔德”号驱逐舰击沉。②战役突然性增大,在意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实施突然袭击。③进攻速度快,战场情况复杂,瞬息万变。④武器系统自动化程度高,杀伤的准确性增大。⑤协同作战的难度增大,重要性提高。⑥对军队指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证明,海上力量优劣的重要标志是精确制导武器。它具有适应性强,命中精度高,能实施全天候作战等特点,因而小国有了一定的先进武器也能有效地反击大国的军事攻击,在战争中取得惊人战绩。

关于电子战 研究认为,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中的电子战虽然水平不很高,但却很有效。战争中,英军电子战装备远远先进于阿军,加之美国卫星的支援,因而比较有效地掌握了制信息权,致使阿军通信受干扰、密码被破译,甚至指挥系统瘫痪。英“海鹞”式

飞机采用消极干扰后没有一架被阿雷达自动制导导弹击落，“火神”式战略轰炸机能在夜间飞行 6 100 公里准确无误地轰炸阿根廷港，并能安全返航，都是因为装备有先进的雷达和电子计算机，并对阿雷达和通信系统实施干扰的结果。阿军虽然电子战装备比较落后，但能采用各种综合手段，最大限度地发挥己方导弹具有电子战功能的优势来打击对方，阿“飞鱼”式导弹之所以取得了击沉英“谢菲尔德”号驱逐舰的显著战绩，是因为这种导弹装备有反干扰装置，能够吸收对方施放的干扰电波；“超级军旗”式战斗轰炸机能多次袭击英特遣舰队而不被击落，也因为其装备了先进的电子设备，特别是多功能雷达可以引导飞机超低空飞行，实施精确攻击。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表明，电子对抗已从过去对雷达搜索警戒和指挥通信的干扰反干扰扩大到对武器系统的干扰反干扰，扩展到现代海战的各个方面。

展望 21 世纪初，对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的研究将更加全面和具体。除继续对军事领域各方面进行研究外，还把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放在整个局部战争史的历史长河中加以总结，从战略的高度评价其历史地位、作用和影响，并结合新情况、新问题，探索与中国未来海战实际情况相适应的作战理论，为中国的国防、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提供更加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参考文献

军事学术杂志编辑部：《马岛战争研究》，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4。

徐锡康：《局部战争与海军》，北京：海军出版社，1988。

张聿法等：《局部战争概览》，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黄玉章等：《局部战争的昨天·今天·明天》，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

潘玫等：《惊心动魄一百天：马岛战争》，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

（吴晓燕）

海湾战争研究 (study of the Gulf War)

探讨海湾战争的起因、发展、结局以及经验教训等的活动。

研究概况 1990 年 8 月 2 日，伊拉克出兵侵占科威特。1991 年 1~2 月，美国为首的多国联盟以“维护正义”和“解放科威特”的名义，对伊拉克发动了海湾战争。海湾战争是冷战结束后第一场规模最大、参战国最多（30 多个）、现代化程度最高且颇为典型的高技术局部战争，对中东地区格局和国际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学术界高度重视对海湾战争的研究，从不同侧面对这场战争进行了深入探讨，撰写、翻译了数百部（篇）有价值的专著和论文。

有关海湾战争译著最具代表性的有：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翻译的《海湾战争》（1991）、《美国国防部致国会的最后报告：海湾战争》（1992），以及白华翻译的由基尼和科恩著的《战争的革命：渡海战争的空中力量》（2001）等。介绍海湾战争的专著有近百本，如《海湾危机实录》（1991）、《海湾纵横》（1991）、《海湾战争》（1994）、《海湾战争与高技术》（1991）等。研究海湾战争的专著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主编的《海湾战争全史》（2000），内容涉及政治、外交、经济、军事、民族、宗教、文化等，着重对战争和军事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此外，学术界还发表了大量学术文章。

研究内容 中国军内外学者对海湾战争的研究，主要是围绕战争起因、作战特点、交战双方胜败的主要原因、战争对地区与国际局势的影响等问题展开的。

关于战争的起因问题 研究认为，伊拉

克吞并科威特是战争的直接原因,但美国出兵海湾有其更深刻的战略目的:控制海湾石油资源,掌握西方经济命脉,巩固其在西方世界的“领导”地位;长期驻足海湾,在中东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新秩序”;制服地区强国伊拉克,保持海湾地区力量均衡,维护美国全球利益。研究认为,海湾危机之所以升级为一场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战争,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①急剧变化与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为海湾危机乃至战争爆发提供了条件和契机。在世界战略格局由以雅尔塔体系为基础的两级体制向多级化过渡期间,各种力量分化组合,潜藏和交织于其中的政治、经济、民族等矛盾相对凸现出来,致使某些地区不稳定因素迅速增多,并趋于表面化。②美伊双方尖锐对立的利益冲突是这场危机走向战争的根本原因。③美伊双方立足于以打的方式处理危机,使危机逐步升级,战争势在难免。④美国出兵海湾获得了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的肯定和国内舆论的支持,取得了军事行动的法律保障。美国在围绕出兵开战和战争保障等问题上进行了全面的估量,尤其是对军事行动的法律依据进行了谨慎的考虑,自始至终力图通过法律手段推动战争机器的运转。主要表现在:争取联合国的授权,获得军事行动的“合法”性;促使国会通过决议,获得“合法”的开战权;修改有关新闻法规,减少国内舆论的压力;发布行政命令,保障战争对兵员的需求;通过法定程序保障参战人员的切身利益,鼓舞官兵的士气;根据国防生产法,保障战争所需物资的供应。

关于海湾战争的作战特点问题 有关著作将海湾战争的作战特点归纳为以下几点:①战争对作战理论和军事思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美军首次使用“空地一体战”作战理论,达成空地一体的有效协同,赢得了战争胜利。伊拉克军基本是以阵地战为主的消极防御,

作战理论和军事思想还停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军防御作战及80年代两伊战争经验基础上,寄希望于“萨达姆防线”及地面入海抗击,结果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②空中作战具有明显的重要作用,但地面作战仍是结束战争的最终手段。空袭的特点是:先发制人,突然袭击;全面突击,重点摧毁;昼夜不停地连续打击;实施干扰精确轰炸;多种力量协同攻击。地面作战的特点是:进攻战役的主要目的是歼灭伊拉克军队;集中力量打击伊军共和国卫队;速战速决,四天即达成进攻目的;实施战役佯动;密切协同,陆、海、空、陆战队密切协同,地面突击、空中突击、空降突击和登陆佯动紧密配合,做到了在关键性的时间和地点协调一致地打击伊军。③高技术兵器特别是精确制导武器在战争中作用突出。④电子战空前激烈,增大了现代战场环境的复杂性。⑤情报与反情报斗争仍是战争的重要环节。⑥战争中后勤任务艰巨。⑦地下防护工程等措施有助于保存有生力量。伊拉克正是利用其多年营造的地下防护工程,在多国部队长时间大规模空袭中,保存了指挥中枢、大部分作战飞机及相当的有生力量。在丧失制空权等劣势情况下,伊拉克利用设置假目标和伪装措施,在分散敌空袭火力方面发挥了作用。⑧化学武器威慑与反威慑贯穿战争始终。历时42天的海湾战争,是一场典型的化学武器威慑条件下的常规局部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双方都进行了大量使用和防护化学武器的作战准备,化学武器威慑与反威慑斗争贯穿战争始终,渗透于战略决策和战役战术行动之中。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化学武器在海湾战争中未能使用,但它对这场战争的准备与实施,却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⑨实施高强度的心理战。海湾战争既是一场高科技战争,也是一场前所未有的高强度心理战争。其心理战的显著特点是:一

是双方都把打击和影响对方决策层作为心理战的主要目标,使心理战呈现出较高的层次。二是双方进行心理战的技术、战术手段纷呈,既有政治的、外交的,又有军事的、文化的;既有传统的心理战技术手段,如战场喊话、散发传单等,又有崭新的心理战技术手段,如电视录像、短波和超短波电台等;既有一般的政治宣传,又有军事威吓,使心理战达到了空前激烈的程度。三是心理战几乎达到不择手段的地步,其范围空前扩大。如伊拉克在美伊开战后,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70多次针对美国和其他对伊参战国的心理恐怖活动,把心理战范围扩大到军事战场以外的广大地区。

关于交战双方胜败的主要原因问题 学术界普遍认为以下几点是多国部队胜利和伊拉克失败的重要原因:①伊拉克失道寡助。由于战争起因是伊拉克公开违反国际准则侵吞科威特,这使伊在政治上极为孤立,经济上遭到国际社会的严厉制裁,军事上孤军作战,民心士气受到影响。而美国虽怀有众所周知的战略企图,却举起反对伊侵科的旗帜,广泛争取国际舆论,同时推动联合国通过授权对伊动武的决议,使美国在政治上赢得一定程度的主动,部队士气较好。②交战双方实力对比悬殊。所有的论著都承认这一点是伊拉克失败的最为重要的原因。③伊拉克战略决策一度严重失误,军事水平不适应现代化战争的需要。战前,伊拉克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低估了美国发动战争的决心,过分相信国际反伊联盟内部会发生有利于伊的变化,对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缺乏正确判断,冒险与美国等进行军事对抗。在安理会通过对伊动武决议后,伊虽有意从科威特撤军,但又继续玩弄边缘政策,谋求体面撤军,未能掌握和平解决的时机。在地面战斗即将开始的关键时刻,伊又企图借助俄罗斯联邦的影响制止或推迟美军行

动,宣布准备从科威特撤军,结果事与愿违,只能起到向敌示弱和涣散军心的作用,致使伊军在丧失斗志的情况下投入地面战斗,终于造成前线部队一触即溃的严重局面。在作战理论与军事思想方面,伊因循守旧,指战员军事素质不能适应现代化战争的需要。

关于海湾战争对地区与国际形势的影响问题 学术界普遍认为,海湾战争实际上是整个中东和海湾地区各种矛盾的集中爆发。战后,地区形势出现了一些缓和迹象;美俄在中东地区由对抗转为伙伴;阿、以和解出现一线转机;由于伊拉克战败,中东地区一个重要的战争根源被消除;国家间关系有所改善。但是,原有许多矛盾并未解决,而且还引发了一些新的不稳定因素;阿、以争端的解决仍将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地区军备竞赛难以控制;地区争雄势头不减,并有新的发展;海湾形势仍不稳定,并出现新的问题;阿拉伯贫富矛盾难以解决,原教旨主义势力有所抬头。海湾战争对国际形势的发展产生的影响主要有:①美国得到了中东的主导权,力图“领导世界新秩序”的欲望膨胀,但力不从心。②世界军事形势出现新的复杂局面,新的军事干涉主义在抬头,许多国家调整战略,发展军事。③世界经济中的南北差距较前拉大。此外,学术界还围绕海湾战争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对第三国的影响,对美俄关系的影响,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对中国、印度、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对世界军事的影响,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等进行了研究和探讨。

海湾战争是美苏两极体制瓦解后的第一场战争,它调整和充实了人们对国际格局大变动中某些规律的认识。海湾战争表明:旧的国际格局不仅在欧洲瓦解,而且在中东也发生根本转变。这一次国际格局的更迭不同于前两次,是分地区逐步完成,各地区存在重要差别和不平衡。就综合国力而言,美国保持着

超级大国的地位,特别在军事力量方面的优势最为明显。

(陈振中)

军事地理研究

(study of military geography)

探讨地理环境对军事活动的影响及其规律和军事上利用、改造地理环境的理论和活动的活动。其目的是为制定军事战略、研究武装力量建设、准备和实施作战行动等提供地理的科学依据。可区分为:战略地理研究、战役地理研究、战术地理研究、海军地理研究、空军地理研究、战区军事地理研究、世界军事地理研究、中国边疆军事地理研究和中国周边国家军事地理研究等。

军事地理研究,是伴随着战争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武器装备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发展的。20世纪中国军事地理研究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军事地理研究19世纪下半叶,西方一些国家的大学中设立了地理系,在军事院校里开设了军事地理方面的课程,训练培养军事地理人才,军事地理作为一门专业学科开始建立起来。中国近代军事地理学是在西方近代军事地理学的影响下逐步形成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一些学者为了了解世界,抵御帝国主义侵略,纷纷研究国外先进科学知识,翻译外国地理著作,组织地理教学和研究,陆续出版地理论著,主要有《海国图志》、《朔方备录》、《东北边防辑要》、《海防要览》、《中国海防地理形势论》、《筹海初集》、《兵要地理》等。其中《兵要地理》一书的出版(一说1915~1921年出版;另说1915~1928年出版)标志着中国近代军事地理学已初步创立。该书论述了战略、战术、军队编制、军事教育、兵工厂配置等与兵要地理的关系。也有说魏源的

《海国图志》的问世,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军事地理学形成的标志。这部书主要是论述了当时世界各国有关海洋地理方面的情况。20世纪20~40年代,中国有不少地理专著出版,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不少爱国学者编写了抗战地理著作,如竺可桢撰写的《从战争讲到科学研究》、《天时对于战争之影响》、《说云》,游凤池的《兵要地学》,胡焕庸的《国防地理》,沙学浚的《国防地理新论》等。这一时期,区域军事地理方面的论著多,而系统的理论著作少,与西方军事地理著作的科学性和系统性相比尚存在差距。这时期出版的军事地理著作,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分析中国的地理条件和特点,以及如何利用地理条件抗击日本侵略者。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中,特别注重军事地理的研究。1932年,红军反“围剿”作战中,毛泽东、朱德共同签发训令,要求各军团组织有关人员对作战地区进行详细的地理调查。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中精辟地论述了战争与地理的关系,根据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地理特点确定战略方针,在选择、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以及进行战略决策和指挥战役行动时,都能充分利用各种有利的地理条件。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军事家,在军事实践活动中,认真研究战争与地理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观点,主要是:地理条件是一切军事活动的重要客观物质基础,对军事活动有重要影响;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军队,尤其要重视创造与发挥地理条件的优势;地理条件由诸多因素构成,在分析、研究、判断时要防止主观性和片面性;军事上能否成功运用地理条件,取决于军事理论水平、军事领导者的重视程度及军队的素质等。这些重要论述为研究军事地理提供了

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建立具有人民军队特色的军事地理学奠定了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军事地理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总结革命战争经验的基础上,伴随着科学技术和军事理论的全面发展,军事地理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50年代,刘伯承元帅在军事学院组建了军事地理研究机构,组织编写了军事地理教材,开设了军事地理理论应用课程。随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军事院校基本上都成立了军事地理教研室(组)。各院校以积极防御战略方针为依据,结合各自的专业特点和需要,编写了军事地理教材。1960年,叶剑英元帅把军事地理作为军事学术的组成部分,列入军事科学体系。1962年,各军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军事地理调查研究,编写了一批参考价值较高的兵要地志和军事地理资料。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院校撤销或合并,军事地理教学和研究工作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军事地理的研究工作进入了蓬勃发展时期。1989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将军事地理作为一个学科收入其中,下设军事地理学、中国军事地理、世界军事地理等条目共98个,初步确立了军事地理学的学科体系。此后,随着《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纂工作的开展,又进一步促进了军事地理学的研究和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部门和院校先后撰写出版了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地理专著。如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编写,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军事地理概况》(1988),《中南半岛军事地理》(1989);总参谋部测绘局编写,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军事地理学》(1988)。这期间还翻译出版了《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地理》卷(1982),苏联的《政治和军事地理学》(1984);日本的《从兵要地志看中苏战争》(1983);美

国的《军事地理学概论》(1988),《战争地理学》(1988);英国的《国防地理学》等一系列理论和区域军事地理专著。此外,还研究编写了一批外国军事地理方面的专著,如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编写、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苏联军事地理》(1985)、《蒙古军事地理》(1985)等。总参谋部测绘局编写的《军事地理学》论述了军事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以及研究军事地理学的基本方法和原则;军事地理学的形成与发展;地理要素对军事行动的影响;中国边疆历史军事地理及边防要地;中国周边国家军事地理概况;世界军事地理形势和战略要地等,是一本理论性较强的军事地理学著作。与此同时,为了加强军事地理教学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院校组织编写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地理教材和专著。其中南京陆军指挥学院编写的《中国军事地理》(1985);石家庄地区军队院校协作中心军事地形学专业组编写的《军事地理学》(1985);国防大学编写的《中国周边国家军事地理》(1986);总参谋部军训部委托军事教育学院编写的《中国军事地理》(1988)等著作,为军事地理教学和军事地理学科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90年代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地理研究又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出版了许多有关军事地理方面的专著,如:国防大学编写的《战略地理论》(1990);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撰写的《中国海区军事地理》(1991),海军海洋测绘研究所编写的《台湾及其毗邻海区军事地理》;军事科学院编写的《军事地理学》(1995);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兵种部编写的《核化生防护地理与气象》(1995)。其中《核化生防护地理与气象》一书全面系统论述了核、化学、生物武器防护与地理和气象之间相互关系,对核化生防护与国家安全环境、核化生防护与经济

环境、核化生防护与社会环境、核化生防护与作战区环境做了较详细的阐述,同时从作战需要出发,对核化生防护地理和气象保障方面总结概括出具有指导意义的措施和方法等,为联合作战指挥员及各级机关指导核、化学、生物武器(威胁)条件下的作战与防护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此外,军事科学院编写的《军事科学概论》一书有专门章节论述了军事地理学在军事科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军事地理学的形成和发展,地理与气象诸要素对军事行动的影响等。为适应新时期的军事斗争需要,总参谋部军事地理研究室从军事地理角度对俄罗斯联邦、印度、日本等15个国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1997年出版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又将军事地理测绘气象列为一个知识门类,下设军事地理、中国军事地理、世界军事地理、军事测绘学、军事气象学五个学科,收条目1232个、地图340幅、图表870幅,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军事地理测绘气象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的内容,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地理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此后,随着军事地理研究不断深入,又有一些军种、兵种,从自身建设需要出发,为解决作战和训练中遇到的军事地理问题,出版了有关军事地理方面的论著。如第二炮兵编写的《第二炮兵军事地理学》(2000)、空军撰写的《空军地理学》(2002)等。其中《第二炮兵军事地理学》从研究地理环境与第二炮兵建设和作战行动的相互关系入手,分析、判断各种地理环境下战略行动的利弊得失;研究战略环境与战役(战术)环境、核环境与常规作战环境、地球表层环境与外层空间环境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服务于第二炮兵的作战与训练。从而,使军事地理从注重一般性研究,向具有特色、特点的研究发展;从注重理论研究,向

重视应用研究过渡。为进一步完善军事地理学科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发展趋势 随着高科技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所最终引起的战争形态的变化,地理环境对军事活动的影响更加受到重视。由于海洋与外层空间战略地位的提高,军事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将向海洋军事地理和空间军事环境扩展;由于军事地理信息系统的完善和地位作用的提高,它将成为军队指挥自动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实时、快速满足军事决策需求发挥重要作用,军事地理与军事地理信息系统的结合研究将更加紧密;由于作战空间的扩展和作战手段的多样化,作战理论对军事地理学需求的研究将进一步得到加强,以适应新的作战理论的发展需要。

参考文献

曹操等注,郭化若译:《十一家注孙子》,北京:中华书局,1962。

陈健安主编:《军事地理学》,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傅荣斌 郑朝军)

战略地理研究 (study of strategic geography)

探讨战争全局的筹划和指导与地理环境之间关系的活动。研究内容主要是:研究战争形势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战略方针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军事经济、战略后方体系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武装力量建设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战场建设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作战行动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战略保障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等。其任务是:为分析战略环境、拟定战略方针、进行战争准备和战略指导等提供地理依据。

在中国晚清时期,战略地理学还没有形成,但是一些军政官员已从战略层次研究地

理对国家边海防建设和治国的影响。如左宗棠在用兵新疆的方略中,对新疆的战略地位和地理有充分的认识,并根据新疆地理特点,制定了控北制南的军事方略,取得收复新疆的胜利。这时期的著述有曹廷杰的《东北边防辑要》(1885),从战略地理角度论述了东北的战略地位,阐述了自古以来黑龙江流域就是中国的领土。徐家平的《洋防说略》(1887),介绍了中国沿海的战略地理形势,并根据海防地理特点提出了设防对策。

进入 20 世纪,尤其是辛亥革命后,西方军事地理理论包括战略地理理论传入中国,1914 年译有《战争地理学》,在陆军测绘学堂开设军事地理课程并进行研究。著名学者竺可桢、丁文江等非常重视战略层次的军事地理教学与研究。竺可桢在其编译的《新地理学》(1933)中提出,战略地理学是军事地理学最有实际价值的学问。抗日战争时期出版和发表的许多军事地理著作和论文中,有大部分内容是从战略层次论述地理对国防和战争的影响的。如胡焕庸的《国防地理》(1938),林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地理基础》(1941),沙学浚的《国防地理新论》(1946)等。

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非常重视战略地理研究,他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地理国情和战争实际相结合,在对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和条件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扬长避短,利用地理环境制定军事战略和指导作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地理理论。其基本观点主要反映在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井冈山的斗争》、《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和周恩来、朱德等的著述之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战略地理研究

有了新的发展。1952 年,在刘伯承元帅的主持下军事学院创立了军事地理教授会,编写了一系列的战略地理研究教材,并用于教学实践。60~70 年代叶剑英元帅主持军事科学院工作时,十分重视战略地理研究工作,强调研究国防和武装力量建设要搞好国家地形和气候的研究,并指示要加强河西走廊的军事地理研究,要从战略上看河西走廊在反侵略战争中的地位。1978 年,他还提出要编写反映中国人民解放军特色的军事地理学。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战略地理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80 年代初,在全军一次重要会议上,总参谋部测绘局从战略角度阐述了“三北军事地理”与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的关系问题。80 年代中期,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编写、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苏联军事地理》,为适应当时的军事斗争准备,从战略层次上论述了中国北方与苏联的地缘情况。1985 年,总参谋部主持的国防现代化发展战略研讨会专门邀请美籍华人伍承祖作了“世界战略地理的形势及结构分析”的报告。

80 年代中期以来,战略地理研究取得了更大的进展,出版了一系列战略地理方面的论著。翻译出版了苏联的《政治和军事地理学》,美国的《战争地理学》、《地缘政治论》和《20 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英国的《国防地理学》。全军成立了军事地理学会,学会先后出版了四本研究军事地理的论文集,其中一半以上的内容是战略地理方面的。1986 年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世界重要战略地区图说》。1988 年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军事地理学论丛》,收入了 30 多篇论文,其中多数是战略地理研究方面的论文,如沈伟烈《关于军事地理与国防发展战略关系的几个问题》,蒋润观《论军事地理与军事战略》,陈健安《研究现代战争不能忽视地理环境的作用

和影响》等论文。

90年代以来出版的战略地理论著主要有雷杰的《战略地理学概论》(1990),陈力的《战略地理学》(1990),程广中的《地缘战略论》(1999)等。1995年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军事地理学》和1998年星球地图出版社出版的《现代军事地理学科概论》中都有战略地理学方面的内容。1989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和1997年出版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中均收有《战略地理学》条目。

随着21世纪的到来,战略地理研究的广度将从陆地、海洋、空中扩展到外层空间;在研究的深度上将围绕地缘战略格局变化,战争的起因与民族、宗教、领土和资源方面的关系,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战略指导,未来的军事斗争准备,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数字地球与国防现代化建设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战略地理理论。

参考文献

庞书周主编:《现代军事地理学科概论》,北京:星球地图出版社,1998。

王三欣、沈伟烈主编:《军事地理学论丛》,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

(姜春良)

战役地理研究 (study of campaign geography)

探讨战役行动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的活动。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战役战场的地理环境和地理位置、幅员大小和战略地位;战场内重要目标的分布情况,如城市、交通线、工业设施、机场、桥梁、港口和军事设施等;战场容量,战场建设,战役部署,战役保障等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任务是:揭示战区地理环境对战役活动的影响及其规律,以认识、利用和改造地理条件,为战役军团正确进行战役准备和

指导战役实施提供科学依据。

自从人类战争活动中产生战役以后,人们就开始了对战役行动与地理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清朝末年编辑,1902年正式出版的《训练操作法详晰图说》,是反映北洋新军训练情况的法规性军事著作。书中对山地、河川、市街、隘路等特种地形的攻守战法进行了论述。1910年的《新定步兵操法》中论述了山地、河川、森林及居民地的攻防作战原则。中华民国初期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云南讲武堂都开设了“地形学”课程,讲授地形对作战的影响。《兵要地理》一书论述了兵要地理的研究内容,认为作战之详细计划,莫不以兵要地理为基础,并对沿海和东北三省的兵要地理分别进行了论述。民国时期的陆军大学等军校都开设“地形学”等课程,其中就包含有战役地理的内容。

中国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军事家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战役实践中,十分重视地理对战役影响的研究。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充分利用根据地有利的地理条件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持,打破敌人的“围剿”。抗日战争时期,抗日军民利用山地、河湖港汊等有利地理条件建立根据地,打击日本侵略者。解放战争时期的三大战役等都充分利用了当时当地战场的地理条件,扬长避短,取得了战役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战役地理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1962年,各军区编写兵要地志和军事地理资料,深入研究战区范围内的地理环境。军事科学院战役战术研究部编写的《热带山岳丛林地作战行动》(1987)、《特殊高原地作战行动》(1989),详细论述了特殊地理条件下如何组织战役行动的问题,要求指挥员在组织作战中要充分认识地理条件的客观性、制约性和可利用性,始终把握战役的

主动权。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编写的《军事地理学》(1995),论述了山地战役和江河地区战役中需把握山地、江河地理环境下进攻、防御作战的特殊规律的问题。一些学者在战役地理研究方面发挥了较好的作用,王厚卿主编的《战役学教程》(1989)中,明确指出自然环境是影响战役最重要的因素。其中,地形、水文和气象,地形中的山地、岛屿与海岸、丘陵地,水文中的江河水文和海洋水文,气象中的气温、降水,人文地理环境中的人口、经济潜力、交通运输、通信和城市等,都是影响战役作战的主要因素。陈访友主编的《海军战役学教程》(1991)提出,战场是作战双方海军战役力量活动的舞台,又是决定双方战役胜负的重要客观条件之一。因此,研究海军战役必须要研究海战场。海战场有与陆地地理环境相同的方面,但不同点更多。海战场空间是由濒海陆地、水面、水中、海底、海空、外空等不同空间组成的,比陆战场具有更多的层次性。海战场要素具有较大的变化性,海战场的大部分空间都是由海水和空气等流体组成的。这些流体的不断变化和运动,对海军战役力量运用影响很大,要求海军战役力量必须建立与此相适应的保障体系和手段。戴金宇主编的《空军战役学教程》(1991)指出,空军战役战场是空军战役军团实施战役的场所。空军战役结构包括空中战场,是空军战役作战的主战场,空中战场的水平范围大大超过陆战场。地面战场主要指机场、防空阵地和物资供应等设施,是空中战场的依托和后盾,没有地面战场,空中战场就失去了支援和保障。此外,还有外层空间战场和电磁战场。战场自然地理条件对空军作战有着重要的影响,要辩证地分析战场地理条件对空军作战的影响,既要看到有利的和便于发挥空军特长的方面,又必须注意克服不利的方面,以正确使用空军战役力量。

为研究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地理学会于1996年组织召开了“军事地理对高技术局部战争的影响及保障”研讨会。会后,从180多篇论文中选出64篇编成了《高技术战争与军事地理》一书,全书45万余字,于1998年出版,其中大部分属于战役地理学方面的内容,论述了地理环境对战役作战的各方面影响。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战役空间从海洋、陆地、空中进一步扩展到外层空间,使未来战役作战的纵深性和立体性发生了很大变化。研究战役行动与地理环境之间关系及其影响的战役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将进一步加深和拓宽,研究手段和方法不断更新。随着地理信息技术的采用,战役地理理论在打赢未来可能发生的高技术战争中将发挥更大的指导作用。

(姜春良)

战术地理研究 (study of tactical geography)

探讨战斗活动与战场地理条件之间的关系的活动。主要任务是,探索战斗范围内利用各种地理条件的规律,为制定战术和组织指挥战斗提供地理方面的依据。主要研究是:影响战术行动的地貌、水文、气象、植被和土壤等自然地理要素,以及居民地、道路、人口和经济等人文地理要素;各军种、兵种战斗行动以及合同战斗行动利用各种地理条件的原则和方法;特殊地理条件对战斗行动的影响等。

自从人类社会有了战争活动以后,人们就开始了地理条件对战斗的影响的探索。中国古代兵书《孙子》和普鲁士军事理论家C. von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中都有地理因素对战斗影响的论述。清末编写的军事书籍

中多数都有地形对战术影响的内容。1899年编辑、1902年出版的《训练操法详晰图说》中,论述了对地形攻守的利弊,地形对进攻、防御、遭遇战及对炮兵和骑兵作战的影响。1910年的《新定步兵操法》论述了特种地形战斗的战术战斗原则,认为山地之攻守均须占领制高点,进攻须利用通往敌方之道路、山岩,防御须坚守隘路。20年代初,中华民国政府开办的一些军校开设了地形学等战术地理方面的课程。20年代出版的《兵要地理》一书中,有章节论述了地理对战术的影响。

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建军开始,在研究适应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斗规律和战斗指导规律时,特别重视对地理条件的研究。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朱德在总结游击作战经验基础上提出的“十六字诀”,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周恩来总结提出的“十大军事原则”中都充分考虑了地理条件的影响。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总结以往作战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保卫领土、领空、领海的战斗实践,进一步探索地理条件影响战斗的规律,部队的战斗训练和院校教学也都有战术地理方面的内容。80年代中期,翻译了美国1966年出版的《军事地理学概论》。该书第五章中详细论述了战术地理学的有关问题,认为战术地理学是军事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它研究的是战争更具体的方面;战术地理研究的根本意义在于对影响部队运动和武器运用的空间和环境因素的评价,以及对这些因素中的一种或一组在特定地点和时间所能发挥作用的估计。进入90年代以来,战术地理研究又有了新的发展。1997年出版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列有“战术地理学”条目。1997年总参谋部颁发的《军事地形学》,在探讨了特殊地形对战斗的影响及其规律的同时,对特殊地形条件下的山地战斗、江河战斗、水网稻田地战斗、

热带山岳丛林地战斗、高寒地战斗、荒漠草原地战斗、城市战斗等进行了充分论述,进而揭示了特殊地形对作战的制约与影响及其内在规律,分析了特殊地形各要素在组织战斗时的利弊得失,阐述了攻防作战诸环节对地形的分析内容、分析方法和实施步骤。全军机关、部队、院校把它作为进行战术训练的基准教材。1998年星球地图出版社出版的《现代军事地理学科概论》一书中设有“战术地理学”一章。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地理学会召开的历次军事地理与军事地形学术研讨会都把战术地理作为研讨的一个重要方面。所有这些都进一步推动了战术地理研究的繁荣与发展。

随着战术地理研究手段和方法的改进,未来战术地理研究将更重视定性定量相结合的动态地形分析,通过建立军事地理信息系统和电子地图,更加快速地为战术决策提供地理信息资料,在满足战术训练和战斗需要的同时,促进战术地理研究的发展。

(姜春良)

海军地理研究 (study of naval geography)

探讨海军建设和军事行动与地理环境之间关系的活动。其目的是揭示海域及其毗邻陆地的地理环境对海洋军事活动的影响与利用地理条件的规律,为海军制定作战方针、进行战场准备、实施作战行动,以及军事地理保障提供科学依据。研究的主要内容,可分为综合海军地理研究、专题海军地理研究和区域海军地理研究。

在中国,自清朝政府正式建立海军之后,就基本开始了海军地理研究。1906年,清政府在筹办海军过程中,经过反复勘察、论证,认为象山港地形险要、条件优越,可作为军港上选。1909年,为巩固南海门户,广东水师派员到西沙群岛进行调查、测绘,以“重

领土而保海权”。中华民国建立后,海军整顿和发展军事教育,福州、烟台、黄浦海军学校相继改制开办,学习科目包括地理、航海、天文、地文、海道测量等。1921年,海军部设立海道测量局,首次在机构上保证了地理勘察、水道测绘、水文观测等业务的开展,建立了海军地理研究与海上测绘业务的直接联系。1924年,陆军大学印发的《海战学》增编了海上军事地理学的内容。30年代,海军将领陈绍宽在研究中国海疆地理大势的基础上,提出把中国海区自北向南分为四区,每区设立舰队;认为旅顺、青岛、三都澳、马公等地为最适宜的军港。1932年,陆军大学出版了《海上兵要地理》,介绍了中国和日本等其他国家的军港等军事地理状况。30年代后期~40年代,海军军事学术和海军技术研究有明显进步。有研究者提出,决定中国海军规模、确定海军建设目标的原则之一是本国的地理形势,认为中国大陆海岸线绵延1万多千米,应具备与之相应的海军舰船总吨位。在海军战略战术理论中,也贯穿有对地理位置与环境影响因素的研究。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宣告成立。50多年来,海军地理学科的研究不断扩展和深入,并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1949年起,实施海区测量和岛屿调查的计划,大规模海洋测量与兵要调查的开展,为海军地理研究提供了各种基本资料。50年代,在海军院校开设海军地理课程。60年代,对黄海、渤海的主要岛屿进行了测量和海军地理调查,为编制抗登陆海岸图和海区兵要图集提供了完整资料。随着海洋测量范围向近海扩大,对中国海岸军港设置、沿岸和近海海域军事活动所需的地理环境条件有了充分了解,海军的基地、港口建设和兵力设置充分考虑了海军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特点。

随着人民海军的发展,对海域地理资料

的调查和区域的研究不断加强。70~80年代,继续开展近海兵要资料调查测量,包括对南海东沙群岛、中沙群岛、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岛屿调查;编制了军港图集、岛屿兵要图集、港湾锚地地理资料。学术界和相关部门系统研究了海战区自然地理及人文条件对海军建设和海上军事行动的影响,提出了海洋军事地理学的任务是研究海战区自然条件对海军兵力使用的影响,对海战区各国的军事、经济能力的研究等。此间,在对不同地理环境的海军工程建设与维护、海岸地形对登陆抗登陆的影响、水道布雷条件等的研究,也取得了显著成果。

90年代,海军地理研究在军事学术研究领域的地位更加明显,研究领域与范围有了新的拓展,主要是:①世界海洋的军事地理区域环境特征研究取得新进展。全球海洋,特别是中国海区的外围海域即岛链以外边缘海的地理位置、地理环境的特征得到较详细描述。②物理海洋学研究成果融入海军地理。海洋水文气象、海洋重力和磁力、异常的区域特征对海上军事活动有直接影响,作为海军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提高了军事地理研究成果的应用价值。③加强海洋地理环境对海军装备影响的研究。海洋地理环境,诸如海区外部轮廓与水深、海洋水文气象要素极值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武器装备的发展和利用。④研究内容更多地涉及到与海军战略和作战行动的关系,如渡海登陆作战,海岛、海岸、海滩对登陆作战的影响,海峡控制的战略意义与作用等。20世纪末,海军地理、海战地理作为军事地理学分支学科的地位得到肯定,在相继出版的军事地理著作中均有较详细的论述。

参考文献

海军司令部编:《近代中国海军》,北京:海潮出

版社,1994。

郭树桂、刘建忠、田智慧著:《普通军事地理学》,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

(苏振礼)

空军地理研究 (study of air force geography)

探讨空军建设和军事行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的活动。研究的内容主要有:可能的作战对象及空中战略情况的地缘政治判断;作战区域的战略地位,地理位置和空间范围;打击目标的选择和识别,国家重要政治、经济、军事防卫目标的分布和地理特点;气象与气候对空中活动的影响;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对空军活动的影响;空军基地的地理分布、设施特点;地理要素对空中航线、航路和空中走廊的判定,以及军事航空管制的制约与影响;土质、地貌和水文等因素对机场选择和建设的影响。其任务是,揭示地理环境对空军军事活动的影响,为规划空军建设,制定空军作战计划,准备与实施空军作战行动和进行空军军事地理保障等,提供科学依据。

空军地理的研究是随着动力飞机的出现及其在军事上的运用,逐渐成为军事地理学组成部分的。

1913年,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在北京建立了第一所航空学校——南苑航空学校。30年代初,国民党政府建立了统一的空军。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空军在正面战场上进行了对日作战,给日本侵略军以打击。但由于当时正处抗日战争时期,加之空军力量弱小,空军作战理论以及空军地理研究几乎处于空白。

中国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军事家,非常重视空军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都曾派人到苏联学习航空。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在东北航空学校的教学中就设置有空军地理方面的内容。当时没有航空地图,飞行没有地面指挥,学员就用沙盘作业的办法,熟悉飞行区域的军事地理情况,保证飞行任务的完成。1949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创建,50年来人民空军不断发展壮大,在空军建设、教学和作战训练中都考虑和研究了地理对空军的影响。研究认为,空军国防工程的建设要根据高原、戈壁、盐湖、丘陵、水网和地下溶洞等地理类型制定不同的技术标准。在机场建设选址过程中更要考虑战略地理环境和自然地理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空军机场建设重点在东北和华北。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空军为配合海、陆军解放沿海岛屿,机场建设的重点转向东南沿海地区。60~70年代,为防止敌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减少一线空军的损失,机场建设重点又转到战略纵深地区。

80年代以来,空军学术研究和院校教学空前繁荣,出版了许多空军理论著作,其中就有空军地理学的专门论著。1989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和1997年出版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中都专门设有“空军地理学”条目。星球地图出版社出版的《现代军事地理学科概论》(1998)一书中列有“空军地理学”和“空战地理学”两章,着重研究了地理条件对制定空军战略、空军作战和防空作战的影响,认为:制定空军战略和空军作战离不开对地理条件的分析和判断。航空兵在空中进行作战活动,受天候、地理条件影响很大。航空兵在昼夜间与复杂气象条件下作战各有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与差异,不仅影响空军战役战斗行动,而且影响空军战略性作战行动,影响空军在不同层次作战中作战兵力出动的强度、规模和对敌突击效能的有效发挥,

影响作战进程和目标的实现。空军独立作战或参加联合战役,都要善择时机、审时度势,善于将敌对双方空军情况和天候、地理、时间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考虑,正确地制定空军战略,灵活地实施战略指导,才能取得胜利。在当今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中,防空作战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空袭与反空袭贯穿于战争始终,现代防空所担负的任务,比过去的防空要艰巨得多。地理条件制约着防空部署。对战略、战役防空部署的主要制约因素是国家和战区的地理位置、幅员、形状和社会经济等条件。对于战术防空部署来说,主要制约因素是地形、保卫目标的面积、形状和交通等。这些论著的出版为空军地理研究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数字地球的构建和应用,以及空军在战争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空军地理研究显得更加重要。其趋势是,将在深入研究基础理论的同时加大应用理论的研究力度,使其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姜春良)

战区军事地理研究 (study of theater military geography)

探讨战区内既定或预想作战区域军事行动和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的活动。主要任务是为制定战区战略和作战训练计划、战场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提供科学依据。主要内容有:战区的划分原则;战区的组成范围及其战略地位;战区自然地理环境对战略与作战训练的影响;战区社会政治状况、兵员潜力对战区军事斗争准备与作战训练的影响;战区经济条件对战争与作战的影响;战区武装力量的组成与部署,交通运输与通信状况,以及战场容量和战役方向的地理特征对军事斗争准备与作战计划制定的影响;战区周边国家的地缘政治,历史战例与地理关系;战区

的综合评价等。

在中国,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兵要地理》中,就有中国兵要地理概要和东三省兵要地理方面的论述。1937年,国民政府陆军大学出版的《兵要地学》中指出,狭义的军事地理学研究决定战区及区内各地在战略上之意义,考究各战区内地理上之性质,战区内交通网之方法,战区内大气之变动,战区内地方粮秣之存储等。为中国近代战区军事地理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中国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非常重视战区地理。1927年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部队进入井冈山仅两个月时间创办的第一个红军教导队讲课时就指出,要利用地形地物,发扬火力,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等签发“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令第九号”,决定成立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下设军事地理部,任务是详细调查红军连年转战各地区的地理、经济、政治、居民状况与军事有关的各种材料。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在转战陕北时随时带着全国各大战区的地图,要军委作战部随时统计上报各战区的军事力量对比和战区的变化情况,用作战略指挥的参考。毛泽东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时,是在深刻地分析了各战区的地理环境、战略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之后,选择战役主要作战方向的。如辽沈战役,就是毛泽东在全面地分析了东北战区的军事地理形势基础上,并加上其他因素综合考虑后,作出东北野战军把战役作战的主要方向指向锦州的决策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确定了大军区体制,形成了现代意义的战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军种、兵种和各大军区十分重视战区军事地理的研究,陆续编写了大量的战区军事地理研究论著,如战区兵要地志、海岸

兵要地志、江河兵要地志和区域军事气候志等。在南京军事学院等军事院校教学中也编写了大量的战区军事地理教材。战区军事地理研究有了新的发展。

80~90年代,战区军事地理研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1988年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编著的《中国军事地理概论》一书中,论述了中国华北、东北、中南、西南和西北地区的军事地理。1989年军事教育学院编写的《中国军事地理》一书中,论述了北京战区、沈阳战区、兰州战区、济南战区、南京战区、广州战区、成都战区和中国近海海区军事地理。1989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和1997年出版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中都列有《战区军事地理学》条目。总参谋部测绘局于90年代后期组织编纂的多卷本的战区军事地理著作,代表了战区军事地理研究的最新进展,标志着战区军事地理研究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随着地理信息技术在军事地理研究中的应用,战区军事地理研究将在搞好战区军事地理环境变化跟踪研究的同时,加大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的研究,为战略和战役指挥员指导军事斗争提供更全面、准确的军事地理保障。

(姜春良)

世界军事地理研究 (study of world military geography)

探讨世界地理环境与军事活动之间关系及其规律的活动。主要任务是,研究全球或区域的自然与人文地理环境与变化中的国际战略环境,国家和区域的力量对比,国家间的地缘政治和军事地理特点,战争形成与发展的地缘因素,战略的制定、战区的划分和军事形势发展之间的地缘关系及其规律等,为国家和军队制定战略,指导国防和军队建设提供

科学依据。

世界军事地理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全球地理环境对军事地理理论形成与发展的影响;世界各区域、各国的地理位置和地理特点在世界战略格局中的地位与作用;领土、边界、资源、民族、宗教对战争和地区冲突的影响;全球陆地、海洋、空中和外层空间对战争的影响;全球人文地理环境,如人口、社会、文化、民族、宗教对国家力量和安全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及经济潜力对国家国防发展战略和战争潜力的影响;全球交通运输和战略通道对军事运输和战争的影响;国际组织或国家集团,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的地理分布及对军事的影响;世界各国武装力量与军事基地分布对战略环境和军事活动的影响;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域文化对国家战略的制定和军事斗争的影响等。

20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对世界军事地理的研究较少,出版的军事地理著作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事地理》(1941)、《太平洋军事地理》(1942)等,但缺少系统研究世界军事地理的著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对世界军事地理研究有了长足发展。50~70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世界军事地理研究方面,不仅编写了许多内部资料,供总部机关和院校训练参考,而且还编写了一些内部教材用于教学实践。如南京军事学院编写的《东南亚军事地理》、《朝鲜半岛军事地理》、《美国军事地理》等。

80年代,世界军事地理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①翻译出版了一批外国军事地理著作,如苏联的《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地理》卷(1982)、《政治和军事地理学》(1984);日本的《从兵要地志看中苏战争》(1983)等。②研究和编写了一些外国或地区的军事地理专著。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

学院先后编写出版的《苏联军事地理》(1985),《蒙古军事地理》(1985),《中南半岛军事地理》(1989)等。其中《苏联军事地理》分五个部分,分别介绍了苏联的地理位置、苏联自然地理概况、苏联经济状况、苏联社会情况、苏联各军区军事地理等;《中南半岛军事地理》上篇论述了中南半岛的地理特点及战略地位、自然地理环境、经济与交通、人口与民族、军事,下篇论述了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七个国家的军事地理。③大部分军事院校开设了世界军事地理课程,并研究编写了实用教材。如国防大学编写出版的《中国周边国家军事地理》(1986);受总参谋部军训部委托,由国防大学和有关单位共同编写的《世界军事地理》(1993),该书在上篇总论中,分六章论述了世界军事地理的研究对象与任务,世界各国情况,全球自然环境,世界人口、民族和宗教,国际组织,世界资源与经济。下篇分八章论述了亚洲、欧洲、非洲、大洋洲、北美洲、拉丁美洲、南极洲和海洋。该书被列入全军教材。此外,还有陈健安主编的《军事地理学》(1988)中,有两章论述了中国周边国家军事地理、世界军事地理形势及战略要地等问题。

90年代,世界军事地理研究进一步发展,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王林山主编的《世界重要战略地区军事地理》(1991),用七章分别阐述了世界军事地理概况,论述了亚太地区,南亚地区,中东地区,地中海地区,中欧地区和中部美洲地区的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自然地理概况,经济地理概况,社会、政治、军事概况和近代以来的战争史等。

1997年出版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地理测绘气象》卷是世界军事地理研究的重要成果,世界军事地理学科共收条目525个,约77万字,地图200余幅。该卷运用军事

地理学的理论和原则,综合研究了军事活动与世界地理环境的关系。主要内容有世界各大洲、大洋、重要山脉、河流的战略地位、自然条件,及其对军事活动的影响;主要国家(地区)、城市的基本情况、发展简史、经济条件、军事实力和主要海空军基地。读者可以透过广阔的地理空间了解世界,从而增长世界军事地理知识和国防意识。

进入21世纪,为使世界军事地理研究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及军事斗争准备,世界军事地理的研究将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拓宽研究范围,并及时反映出全球军事动态和战略格局的变化,把世界军事地理研究推向新的水平。

(姜春良 郑朝军)

中国边疆军事地理研究 (study of military geography of China's border areas)

探讨中国边疆地区地理环境与军事活动的关系的活动。主要任务是:根据国际战略格局和中国政府的政策,探索中国边疆地理环境对战争和军事活动的影响;评估边疆地区的战略地位、综合实力和支撑战争的潜力等;总结边疆地理环境对军队实施作战行动的得失。其目的是,为国家军事指挥部门制定边疆战略方针,规划边疆战场,拟制作战方案,指导军事训练与实施作战行动提供地理依据与保障。

研究的主要内容:①边疆地区的地理形势、特征。包括地区组成、位置、范围、面积及其与周围地区的关系,以及在政治、军事斗争中的地位等。②边疆地区自然地理条件。主要包括地貌、水文、土质等自然地理要素的分布特征以及对军事行动的影响等。③边疆地区社会人文环境。主要包括经济、社会状况、交通运输、通信设施和战略资源的保障能力等。④边疆地区的军事活动。主要有军事重

镇的变迁,军事力量的组成,本区军事斗争的历史状况以及运用地理条件的情况等。⑤评价边疆地区地理环境对军事行动可能产生的影响和应采取的措施。

中国边疆军事地理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到了清末,中国边疆的军事地理研究几乎一直处于停滞状态,直至中华民国建立后研究工作才有了新的起色。1915~1921年(一说1915~1928年)出版的《兵要地理》显示了中国近代军事地理学的研究方向,是当时世界军事地理研究与中国传统的兵要地志研究相结合的产物,它对中国后来的军事地理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抗日战争时期出版的《兵要地学》(游凤池)、《国防地理》(胡焕庸)等,对中国边疆军事地理进行了一定的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边疆军事地理研究受到广泛重视,广大研究工作者牢固树立马列主义世界观,以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为依据,按照军委总部的要求,在汲取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国边疆军事地理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50年代,军事学院、海军学院对中国周边国家和海洋进行过专门研究,撰写出一批有影响的教材和论文,为后来的边疆军事地理研究奠定了基础。80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写出版的《苏联军事地理》(1985)、《蒙古军事地理》(1985)、《中南半岛军事地理》(1989)等研究了中国边疆军事地理环境。沈伟烈研究撰写的《关于军事地理与国际发展战略关系的几个问题》、《从军事政治地理角度分析我国安全环境》等论文,为国家边疆地区的建设发展以及国防的巩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90年代,陆续出版的许多军事地理专著在不同程度上都对边疆军事地理进行专门研究。如:国防大学编写出版的《世界军事地理》(1993)、总参谋部

军事地理研究室编写的《南海地区军事地理》(1996)等,标志着中国边疆军事地理研究的新发展。

随着世界战略格局的变化以及海洋和外层空间战略地位的提高,中国边疆军事地理研究的范围还将进一步扩大,人文地理环境,大气物理和地理物理等方面的内容将有新的发展。研究方法也将随着航天遥感、计算机技术、军事地理信息系统(MGIS)技术的发展而有所改进和发展。

(张 奔)

中国周边国家军事地理研究 (study of military geography of China's peripheral countries)

探讨中国周边国家军事地理环境与军事活动的关系的活动。其主要任务是:根据国际战略格局以及中国周边形势变化的特点,探索中国周边各国地理环境对军事活动的影响,评估中国周边各国的战略地位、综合国力和支持战争的潜力等,在军事上认识和运用国家地理条件的规律。其目的是:通过揭示周边各国地理环境诸因素对军队实施作战行动的利弊得失,为国家军事指挥部门制定战略方针、研究武装力量建设、规划战场准备、拟制作战方案、指导军事训练与实施作战行动提供地理依据。

中国周边国家军事地理研究的主要内容为:①战略地位。即国家的地理位置、领土、疆界在战略上所处的地位,从空间关系角度评价该国在战略上的重要意义。②自然条件。即从国家的自然地理环境入手,研究其对武装力量建设和组织实施军事行动的影响。③人文环境。主要包括社会、政治和经济三个组成部分。在社会环境中主要研究人口、民族和宗教等要素的情况,即国家人口的数量、素质及其分布,民族和宗教的组成、特性和

地域分布等。政治环境主要研究国家制度和内外政策、行政区划、疆界的演变与现状等。经济环境重点研究国家的军事经济特征,主要包括战略资源的分布、储存量及产量;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的分布、发展水平和生产能力;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平,国家综合国力和支持战争的能力及其在世界上所处经济地位。④区域军事情况。重点研究战区的划分及其战场准备情况,一般包括战场建设、交通运输、通信设施、军事基地和武装力量以及它们对国家军事力量、军队机动和作战能力的影响等。

中国近代较早进行周边国家军事地理研究的当属清代学者魏源,他编撰的《海国图志》是中国出版的介绍世界各国情况较早的地理著作。此书是1841年魏源受林则徐嘱托,根据英国人慕端的《世界地理大全》(1836)译稿《四洲志》和《历代史志及明代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等资料整理而成。主要介绍世界各国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气候、物产、交通、贸易、风俗民情、文化教育、对外关系、先进科学技术、战舰火器等,附地图74幅。该书虽然不属于国家军事地理性质的资料,只是充实了一定军事内容和中国情况的世界地理志,但在当时却使中国人开阔了地理视野。后人称其为“国人谈瀛海故实之开山”,是中国人从国防建设需要出发比较系统地研究世界地理的开始。1894年,宝善书局出版了姚文栋出使日本所编《日本地理兵要》,全书分疆域、东海道、畿内、东山道、北陆道、山阳道、南海道、西海道、北海道等十卷,当属中国周边国家军事地理研究中较为典型的一本专著。甲午战争以后,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为了指导战时的军事地理研究和提供系统的军事地理资料,中国一些颇有远见的知识分子采用“西法”研究地理、兵要(军事地理)。1937年出版了游

凤池撰写的《兵要地学》一书,作者分析了国际形势、邻国军备及陆海空现况、国防、政略、战略战术、外交、交通、地理资源、战迹(战史)等情况,同时引进了国外先进的地理学研究方法。该书对推动中国周边军事地理研究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根据当时中国面临的周边地理环境和加强国防建设的需要,开始了周边国家军事地理的研究。在50年代,南京军事学院、海军学院对中国周边国家(地区)和海洋进行过研究,撰写出一批较有影响的教材,为后来系统地进行中国周边国家军事地理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80年代,为适应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的需要,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组织人员编写了《苏联军事地理》(1985)、《蒙古军事地理》(1985)等,较系统地对部分中国周边国家军事地理进行研究。90年代,中国周边国家军事地理研究被纳入军事科学院重点课题。在总参谋部测绘局组织、指导下,总参谋部军事地理研究室从军事地理角度对中国周边的俄罗斯联邦、印度、日本等15个国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该书根据当时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围绕事关国家利益的诸多地理问题展开分析,初步形成了国家军事地理研究的内容体系,拓展了军事地理应用研究的领域。它是目前较系统而完整的中国周边国家军事地理研究成果之一。此间,还陆续出版了许多军事地理专著,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对中国周边国家军事地理进行了专门研究。如国防大学战略教研室编写的《世界军事地理》(1993)、总参谋部军事地理研究室编著的《南海地区军事地理》(1996)、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委员会组织编纂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1997)等。

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变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建立新的国家安全观和21世纪的

国家安全模式正在受到各国的重视。为适应国际形势和国家间关系的新变化,中国周边国家军事地理研究将进一步发展。为适应信息时代对周边国家军事地理研究的要求,将加强周边国家军事地理信息系统研究,运用计算机技术及系统工程和信息科学的理论,综合地、动态地获取、管理和分析中国周边国家空间地理环境信息,建立起服务于战场环境分析和辅助决策的现代军事应用系统。

(杨建华)

军事地形研究 (study of military topography)

探讨地形特征及其对作战行动影响规律的活动。主要任务是,研究地形,揭示地形对作战行动的制约与影响规律,阐述地形分析的理论、方法和手段,为作战行动与实际地形的紧密结合提供依据和方法。主要内容是:研究地形的分类及各类地形的特征,地貌、水系、道路、居民地、土壤和植被等地形要素的结构特征及其对作战行动的影响;研究军用地形图、电子地图、海图、航空图和专题地图的识别与应用,调制要图和沙盘堆制的方法与手段;研究测定战场目标的距离、高度、地面坡度、角度,以及在现地判定方位的方法;研究地形分析的基本依据、原则和方法;研究航空、航天像片的判读理论和实际应用以及判读方法等。

在中国,军事地形研究开展较早,古代军事名著《孙子》一书中的“地形”、“九地”和“行军”三篇专门论述了地形与军事之间的关系问题。西方军事测绘技术和军事地理理论的传入,促进了中国军事地形研究的发展及其学科的形成。1897年清朝政府在北京建立了京师陆军测绘学堂,中华民国初年改组为中央陆军测绘学校。1931年国民党政府在南京组建了中央陆军测量学校,1945年改名中央

测量学校,成立大学部,这是一所设有地形测量、制图等五个专业的高级军事测绘院校。这一时期的军事学校编有多种军事地形学著作,如著名的黄埔军校编写的《地形学》被列为四大军事教程之一。

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建军开始就重视军事地形研究工作,土地革命时期的红军,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都在自己创办的学校中,开设了军事地形课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地形研究得到很大的发展。1953年,中央军委决定,将解放战争时成立的解放军测绘学校改为解放军测绘学院。50年来解放军测绘学院为全军培养了大量的军事地形和军事测绘人才,推动了军事地形研究的发展。60~70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先后出版有《军事地形学》和《识图用图手册》,并将其作为军事院校和部队军事地形学教育训练的基本教材。进入80年代以来,军事地形研究伴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的前进步伐也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先后翻译了苏联尼古拉耶夫中将主编的《军事地形学》(1981),贝佐夫上将主编的《军事地形学》(1990),这两本书均由苏军总参谋部测绘局审定为苏军军事学校教科书。80年代中期还翻译出版了美军《地形分析》和《识图》等。军事地形研究人员总结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历次边境地区自卫反击作战运用地形的经验教训,编写了大量新的更为符合战场实际的军事地形论著。90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地形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出版了许多关于军事地形方面的论著。《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中收有15个军事地形学条目。《军事测绘》杂志社编有《地形与军事》(1991),选编了61篇地形对作战影响的战例,供有关方面进行军事地形研究时参考。军事科学院编写出版的《军事科学概论》(1994)、《军事地理学》(1995)两

书中,设专门章节论述军事地形学在军事科学和军事地理学中的地位与作用、形成与发展。1993年八一出版社出版的《军事地形与利用》从军事角度阐述了地形的构成与分类,研究了地形对作战的制约与影响,分析了诸要素和不同地形战术特性,介绍了攻防作战诸环节对地形的分析内容、方法与步骤,阐述了定量分析和进行综合评价的方法。为了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地理学会于1994年组织开展了军事地形对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影响及保障的专题研究,取得丰硕的成果,50多篇论文收入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军事地形学学术论文集》(1995)。199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向全军印发了新版《军事地形学》,该书是全军机关、部队、院校军事地形学教学和训练的基准教材,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地形学科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随着卫星定位、遥感技术和电子地图等先进军事测绘技术在军事中的广泛运用,军事地形研究的精确性、可靠性有了显著提高。军事地形研究的内容,将随着现代战争特别是高技术战争的需要和军事测绘技术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

(姜春良)

军事测绘研究

(study of military geodesy
and cartography)

探讨实施军事测绘的理论、技术和方法的活动。主要包括:军事大地测量研究、军事摄影测量研究、军事制图研究、军事海洋测绘研究及军事测绘保障理论与方法研究等。目的是揭示军事测绘的规律;探讨军事测绘的理论和方法;指导部队军事测绘保障的现代化建设;满足国防和军队建设及作战、训练等工作对地理空间信息的需求。

清末和中华民国的军事测绘研究 军事测绘研究源于作战中对战场地形的高效利用和地理空间信息的快速、准确、全面获取的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和实践。中国现代测绘研究始于20世纪初。1903年,清政府成立陆军测量局,主管陆地量测及地形图编绘。1904年,成立京师陆军测绘学堂,专门培养测绘人员。中华民国初期,南京临时政府设立陆地测量总局,改京师陆军测绘学堂为中央陆军测量学校,建立了全国性的测量管理及测绘人才培养机构。1931年,中央陆军测量学校聘请德国、瑞士专家,开办航测研究班,培训人才,进口航测设备和材料,陆地测量总局组建了航测队,并用航测的方法第一次对中国部分军事要塞地形进行了测量。1932年,同济大学在其工学院内设测量系,培养高级测绘研究人才,这是中国高等院校内最早设立的测绘专业。1941年,中国地理所内设测量制图组,专门从事大地测量、重力测量及有关小比例尺地图制图研究。1945年,中央测量学校设立大学部,培养四年制本科生,这是中国最早的正规培养高级军事测绘人才的院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测绘研究 1950年5月11日,中央军委测绘局(后改称总参谋部测绘局)正式成立,设有测绘研究处。为加强军事测绘研究和军事测绘人才培养,将解放军测绘学校升为解放军测绘学院,并先后成立总参谋部测绘研究所和海军测绘研究所,专门从事军事测绘研究和军事测绘人才培养工作,建立了专业门类齐全的军事测绘研究队伍。1953年,在苏联帮助下,总参谋部测绘局将苏联“1942年普尔科沃夫大地坐标系”引到中国,建成“1954年北京坐标系”。到了70年代后期,为提高测量精度,又采用国际大地测量学会1975年推荐的椭球参数建立“1980年国家坐标系”。为适应远程武器研

制和空间技术发展的需要,从1979年开始,经过十年的努力,又建立了“中国地心坐标系”。此外,为满足天文观测和重力测量的需要,总参谋部测绘局和中国科学院有关单位联合研究建立了“中国天文基准”,“1957年重力系统”和“1985年重力基准”。进入90年代以来,军事测绘研究有了较大发展:研究、制定、颁发了50余部相关的军事测绘标准;编写出版了《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测绘学分册》(1991);编写出版了《军事测绘与军事地理主题词表》;编绘出版了《军官地图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区标准地名图集》;编写出版了《军事测绘高新技术知识丛书》;研究制定并经中央军委批准正式颁布施行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测绘条例》(1996)等。从此,军事测绘研究步入法制化和正规化轨道,取得了丰硕成果。

军事大地测量研究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军事大地测量研究一直都沿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向发展。1951~198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展并完成了军事大地控制网布测和平差,在全国范围内施测一、二等控制点31 000多个;1970~1975年,组织并完成了青藏高原1:10万比例尺地形图测图,改写了中国有“无图区”的历史。1986~1989年,研究并建立了“国家大地网数据库”、“空间大地测量数据库”、“三角高程数据库”、“天文测量数据库”等大地测量专业数据库,并参加了国家测绘局、总参谋部测绘局、中国地震局等单位组织的“2000国家重力基本网建设”工程;1991~1997年,开展并完成了全国GPS一、二等大地网建设研究,共布测各类GPS网点近600个。此外,还出版了《人造卫星精密轨道确定》、《GPS导航与精密定位》、《近代平差理论及其应用》等重要学术专著。

军事摄影测量研究 中国军事摄影测量研究起步较晚,最初主要是开展对成图质量

有重要影响作用的航摄仪和航摄材料的研究。先后仿制和研制了一些航摄设备和器材,用于部队施测基本比例尺地形图。1963年,单航线空中三角测量法研究成功,取代了测绘部队传统的光学机械作业,使测量方法焕然一新。60年代后期,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应用,解析空中三角测量和测图自动化研究成为重点。1975年,开始研究航带法和独立模型区域网平差法,成果获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奖。1974年总参谋部测绘研究所首次研制成功初级“数字摄影测量系统”,1980年又研制出数字化仪,组成了新的“数字摄影测量系统”。经过多年实践,研究成功的“航测一次成图法”极大地缩短了成图周期,减轻了作业人员的工作强度。总参谋部测绘研究所研制的APS系列解析测图仪,曾在一段时间内替代了进口产品,并占领国内市场,收到了良好的社会、经济、军事效益。进入90年代,国家成功发射了一系列科学试验地球卫星,为进行航天遥感测绘研究开辟了道路。在军事测绘领域,有关遥感理论、技术与应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卫星精密定位测量,遥感影像获取、处理、利用和远程战略武器制导等方面。总参谋部测绘研究所等单位利用各种遥感资料进行1:10万比例尺地形图、影像图、数字影像图、数字等高线图以及立体影像图等测绘试验,并形成了相应的软件系统。另外,解放军有关科研单位和测绘部门开展的航天遥感测绘研究、卫星定位技术研究以及远程武器测绘保障工作和匹配制导研究也都取得了进展。1996年开始,研制成功了摄影测量数字化生产网络系统,进一步理清了军事摄影测量建设与发展的思路。出版的学术专著主要有:《数字摄影测量学》、《航空摄影测量学》、《航天摄影测量》、《像片判读》等数十种。

军事制图研究 在理论方面,主要集中在

在地图投影理论方法的研究,在地图编制技术方面,对各种专题地图编制中的难点和重点问题进行了研究。中国人民解放军测绘学院针对中国地理特点研究的“双标准经线等角圆柱投影”满足了国家测绘制图的需要,其学术专著《地图投影变换原理与方法》被评为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总参谋部测绘局和中国科学院合作研究京津地区1:25万比例尺卫星影像图的编绘,利用计算机技术进行投影变换,提高了成图精度,并为机助影像图制作提供了经验。在制图自动化研究方面,中国人民解放军测绘学院研制成功了“自动建立地图数学投影基础软件”,并建立了一套“1:20万比例尺地形图的全要素符号库”。总参谋部测绘研究所研制成功了“JZ 1型计算机制图系统”。围绕着军事测绘数字化攻关任务,1996年以后,总参谋部测绘局先后建立了“1:25万地图数据库”,该成果达到国内先进水平,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此外,还研制完成了“像素地图数据库系统”,“矢量地图数据库系统”,“全要素数字测图系统”,“1:5万数字地图数据库系统”,“电子图集制作系统”等自动化系统,并出版了《数字地图自动制图综合原理和方法》等学术专著。

军事海洋测绘研究 主要围绕海洋测绘理论与应用及海洋测绘装备等进行的研究。20世纪50~60年代,军事海洋测绘研究在近海深度基准面的确定,无线电波长的测算,无线电定位等值线的绘制等方面取得了创新性成果。1958年至1959年1月,完成了中国领海基线的测量工作,整理出全国领海基线(除台、澎、金、马、南海诸岛)测量资料,这是中国海洋测绘史上的一次壮举。1963年,研制成功“线形锁直接算法”。1965年,研制成功了两种浅海测深仪,为中国沿海水深测量提供了国产仪器。1966年,又研制成功了

海上无线电相位式定位仪,使军事海洋测绘的仪器向电子化迈进了一步。从70年代开始,又先后研制了单、双侧海底地貌探测仪,水声仪器(声纳)和海上定位仪,海洋重力仪等设备,为近海测量提供了国产化系列仪器。1960年,编制出版了中国第一部大型的海图集——《太平洋图集》。1976年,出版了《台湾省及台湾海峡航海参考资料》。近年来,还出版了《世界主要海峡军事地理图集》、《海洋测绘词典》及《水下地形测量》等重要图集和学术专著。

军事测绘保障理论与方法研究 主要是对部队训练、作战测绘保障,战略武器研制、空间技术、大型军事工程的测绘保障等理论与方法的研究。1980年,总参谋部测绘局设立测勤训练处,指导军事测绘保障工作。70年代以前的保障理论研究主要围绕解决部队“有图用,会用图”展开。1978年总参谋部测绘局提出了地心坐标转换参数DX-1,供战略武器研制使用,1989年又提出了DX-2参数。1979年总参谋部测绘局、总参谋部测绘研究所参加了《全国卫星多普勒大地网布测方案》研究和量测,该成果获全国科技进步二等奖。1983~1985年总参谋部测绘局主持研制的《态势图自动处理系统》,1986年解放军测绘学院研制的《战役地形分析系统》,1987年总参谋部测绘研究所研制的《军事地形分析系统》等都为部队提供了新的测绘保障手段。1988年,总参谋部测绘研究所研制的地球重力模型为空间技术研究等提供了重要的数据,该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此外,开展的定位卫星技术研究及远程武器测绘保障和影像匹配研究也取得突破性进展。有关单位还研制了“炮兵像片快速定位车”,“车载快速定位仪”,“GPS粗码定位系统”及“野战地形测绘保障系统”等保障装备。军事测绘还为卫星发射试验、战略武器研究等国

防重点项目提供了测绘保障服务。各军兵种的军事测绘保障工作也都顺利开展,基本满足了本部门需要。

发展趋势 21世纪的军事测绘研究将主要围绕空间大地测量、地球重力场、空间定位技术与理论、数字摄影测量、地图与地理信息工程技术与理论、军事测绘保障理论与方法等方面深入展开,以推动军事测绘理论的深入发展。

(张奔 杨建华)

军事大地测量研究 (study of military geodesy)

探讨为满足国防建设和军队作战的需要,而进行的测定地球形状、大小和地球重力场,以及地面和空间点几何位置的理论和技术的活动。其用途是:为军事地形图的测制和军事工程测量提供平面和高程控制;为空间技术和远程武器提供地面及空间点坐标和地球重力场数据;为炮兵阵地连测提供起算数据;为推求地球形状、大小提供资料;为勘定国界、海疆提供点的位置。

军事大地测量研究的主要内容是:①大地控制测量,研究布设大地网的理论和方法。设计布设国家和军用控制网,在卫星发射场和导弹阵地建立轨道跟踪网和阵地控制网。②天文大地测量,通过观测恒星,以测定地面点的天文经度、纬度和至相邻点的天文方位角。用于推算天文大地垂线偏差、研究大地水准面起伏和控制天文大地网中方位误差积累。③重力大地测量,用重力仪测定重力加速度值。用于大地测量归算、弹道导弹飞行轨道和人造卫星轨道的计算,推算地球形状、大小及地球重力场等。④空间大地测量,利用空间技术,通过对人造卫星、河外射电源的测量,研究测定地面及空间点的位置、地球形状、大小及地球重力场。⑤惯性大地测量,利用陀螺

和加速度计等惯性元件,测定地面点的几何位置、重力异常和垂线偏差。用于快速定位、布设军用控制网及连测炮兵战斗队形。⑥椭球大地测量,研究椭球面与地面、大地水准面、投影平面之间的数学关系,大地坐标系的建立和不同坐标系间的换算。⑦大地测量数据处理,利用最小二乘法原理和概率统计等方法,对各种大地测量数据进行处理,以求得观测量的最佳估值并评定其精度。

18世纪初,中国清朝政府为了编制《皇舆全览图》,就开始了大地测量及研究工作,在世界上开创了以先测量全国经纬度点作控制,用仪器测绘全国性地图的先河。19世纪末,清政府为编制《清会典图》又进行一次全国性大地测量工作,并于1897年创办了测绘学堂。中华民国时期,大地测量研究又有新的进展。1930年开始进行正规的大地测量,直到1949年建立了约2000千米的一等大地控制网,但精度较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设立了军委测绘局,1956年成立了国家测绘局,颁布了大地测量法式和相应的细则规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地测量工作,建立了近8万千米锁长包括约5万多个三、四等控制网点。在战略地带测设了近10万个军用控制网点,直接为各种炮兵战斗队形连测服务。布设了9.3万千米的一等水准,建立了1985高程基准。布设了13.7万千米的二等水准和100多万千米的三、四等水准。重力点布设密度基本上达到 $15' \times 15'$ 范围内有一点,建立了1985重力基准网。随着现代空间技术的应用,从70年代中期开始,布设了全国37个点组成的卫星多普勒网和由37个点组成的西北卫星多普勒网,用卫星测量方法完成了西沙、南沙群岛的大地连测。1988年利用全球定位系统(GPS)技术,建立了全国一、二级(GPS)网,初步完成了地面网与空间网的联合平差工作。70年代末开始了甚长基

线干涉测量(VLBI)测地的研究工作,建成了上海和乌鲁木齐两个 VLBI 天线系统,通过国际合作观测与研究,获得大量有意义的成果。卫星激光测距(SLR),在全国建立了七个跟踪站,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卫星测高系统的研究也取得可喜的进展。20 世纪军事大地测量研究在中国取得长足的进展,各种地面网和空间网的建立,汲取了世界各国的经验,其精度达到世界同类网的先进水平。这些基本控制网,为测制全国 1:5 万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和军事测绘保障提供了大量资料,为中国疆域版图和海域范围的绘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为航天航空技术和尖端武器发射提供了精确的测量数据。

军事人地测量研究,将进一步利用全球定位系统,精确、实时地测定地面点和空间点的位置,为人造卫星、载人航天、巡航导弹、宇宙飞船对接等提供空间动态导航定位资料;利用甚长基线干涉测量和激光测卫技术,建立更高精度的地面控制网,精化全球统一的地心坐标系;利用卫星重力梯度测量、航空重力测量、卫星—卫星跟踪技术,精化大地水准面形状和地球重力场模型。

参考文献

《中国测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测绘史》第二卷,北京:测绘出版社,199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大地测量学》,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

(郑 勇 徐正杨)

军事地图制图研究 (study of military cartography)

探讨军用地图及其制作的理论、工艺、应用原则和方法的活动。其目的是:从军事目的和需要出发,研究如何用地图的形式来反映自然和社会各种现象的空间分布、相互关

系位置及其动态变化,为各级指挥员和指挥机关了解战场地理环境提供相关资料,也为飞机、舰艇的导弹以及远程武器的发射提供定位数据。

军事地图制图研究的主要内容有:①地图设计。根据地图的用途和用户的要求,按照视觉感受理论和地图设计的原则,对地图的技术规格、总体构成、数学基础、地图内容与表示方法、地图符号与色彩、制作工艺方案等进行全面规划。通常通过编定地图编绘规范、地图图式符号作出原则性规定。实际作业中,结合分析制图资料,确定具体实施方法。当以数字地图为基本资料时,地图设计工作可以在计算机辅助下完成,设计的对象不仅是纸质地图,还包括电子地图。②地图投影。按一定的数学法则,将地球椭球面上的经纬线网描绘在平面图上。通常根据地图用途、地图比例尺和制图区域所在的地理位置,选择适当的地图投影,合理地控制投影变形,建立起地图的数学基础,以使用一定的精度表达地图内容。③地图编绘。制作编绘原图和印刷原图的过程。通常包括地图编绘规范和地图设计书,采用制图综合等方法,对制图资料、数据进行编辑处理,制成多色的地图原稿,然后按照地图图式规定,用清绘或刻绘的方法对原稿进行加工,取得符合复制要求的地图原图。地图编绘有手工制图和计算机制图两种方法。前者是在编绘底图上,进行图形编辑、着墨清绘或薄膜刻绘;后者是利用计算机制图系统,用专家系统技术结合人一机交互方式进行编辑处理,实现了较大比例尺的地图数据向较小比例尺的数据制图综合。④地图复制。将地图原图制成多份单色或多色地图的过程。常规的地图复制主要包括地图复照、地图制版和地图印刷三个工序,即将地图原图经过复照取得底片,用制版方法把底片上的图形文字制成印刷版,再用

平版胶印机印制,即可获得批量的印刷图。电子出版系统的引入,使地图复制产生革命性变化,从地图原图(纸质原图或数字地图)到输出分色胶片完全实现数字化,简化了地图复制工序,明显提高了印刷效率和效果。先进的电子出版系统还可以将制版和印刷过程数字化。

中国清末就开始了地形图的测绘与研究。中华民国建立后,军事地图制图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并开始了实际的军事地图的绘制工作。至1947年已完成全国1/3地区约8000幅1:5万地形图和百余幅1:100万地形图的测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军事地图制作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至80年代,完成了大陆系列比例尺地形图的测制、编绘研究和出版;完成了军用地形图的基本规格和比例尺研究,并已形成系列;有了严密的数学基础,位置和高度精度明显提高;地图品种增多,军事专题地图和军事地图集得到发展;地图内容逐步充实和深化,并形成了科学的符号系统,地貌的表示由服从一定的数学规则,能判断斜坡坡度的晕翁法取代了透视图画法,进而用能直接确定绝对高程、相对高差、斜坡方向和坡度,判断地貌形态和切割程度的等高线法取代了晕翁法;地图制图与复制技术日趋成熟,由雕刻铜版印刷发展到平版印刷。90年代军事地图制图研究与指挥现代化建设相结合,加强了以大规模地图数据库或作战环境信息系统为基础,建立地图制图与使用相结合的作战环境咨询体系的研究。经过近十年的研究,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已建成了全国1:25万地图数据库系统。军事地图制图技术的研究,也取得了实现由单一的纸质地图、电子地图技术向虚拟地形环境技术跨越的显著成绩。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军事地图制图研究将探讨如何最有效地利用地图建立指挥员

的战场环境印象,通过构图、符号和色彩的优化,提高用图者的视觉感受效果,揭示地图信息传输过程的规律及各个环节的视觉体制,逐步形成现代条件下军事地图制图的科学体系;将进一步加大在数字地图条件下的地图设计与地图编绘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力争取得突破性进展。

(游 雄)

军事气象研究

(study of military meteorology)

探讨大气环境对作战人员、武器装备和军事行动影响的规律,以及为国防建设和军事行动实施气象保障的理论和方法的学科。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军用大气探测研究、卫星气象研究、雷达气象研究、军事气候研究、军用人工影响天气研究、天气预报理论与技术研究、军事航海气象研究、军事航空气象研究、弹道气象研究、导弹气象研究等。

军事气象研究是基于战争的需要,在其他相关科学技术的基础上形成并逐步发展起来的。20世纪中国军事气象研究可区分为两大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军事气象研究中国的军事气象工作和理论研究起步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中华民国海军在东沙岛观象台及少数几个报警台设立气象观测点,开展气象观测;末期,国民党军空军在航空学校开设气象科目,开展了军事气象的教学和研究。1932年,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在《科学》杂志上发表《天时对于战争之影响》一文,列举很多国内外受气象条件影响的战例,阐明天气对作战的影响不可忽视。1939年,国民党军在重庆设立空军气象总台。1945年,八路军在延安建立第一个气象观测所和无线电探空测风站。1946年,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设立气象台,为航校的飞行训练实

施气象保障,并开始进行军事航空气象人员的培训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军事气象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气象事业和理论研究得到迅速发展。

大气探测技术、天气预报技术、气象信息传输和处理技术研究方面 至20世纪末,已建立起遍及全国的,由人工、雷达、卫星进行地面、空中和海洋的定时或不定时的气象观测网。其中,地面观测已逐步使用自动化观测系统。70年代起,首先研制成功X波段天气雷达。此后,又开发并研制成功卫星云图接收机及卫星云图分析处理系统,使卫星资料在军事气象保障中得到广泛有效的利用。此间,全军在不断跟踪和采用国内外先进气象预报技术的同时,还开展了适合军事需要的预报技术研究,达到同期国际先进水平。8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研制数字化雷达,90年代中期研制成功多普勒天气雷达。

军事气候学研究方面 70年代及其以前,主要是收集整编有关气候资料。80年代,在整编气象台站基本气象资料和区域气象资料的基础上,相继开展了军事气候的分析和区划的研究。90年代以来,对全国及周边地区寒冷、干热、湿热和高原等特殊的气候环境进行了系统研究;中国军事气候区划的研究取得了较为系统的成果;开发研制的军事气候数据库系统已投入使用。

在军用人工影响天气研究方面 在理论上,通过对云、雾的数值模式和催化模拟的研究,建立了具有详细微物理模式和辐射模式的辐射雾数值模式,以及积云数值模式、层状层数值模式,测定多种催化剂的下落速度、扩散范围和播散后不同时段不同高度上的粒子谱及消光系数;在技术上,开展了较大规模的人工消云、消雾科学试验,对一些催化剂的物理性质及人工消云、消雾作业的效果进行研

究,在此基础上开发研制了云物理探测仪器和飞机自动播撒盐粉等装置,充实和完善人工消云、消雾技术方案,积累了作业对象、作业部位、播撒剂量和飞行方式等方面的经验。

军事气象保障研究方面 有关研究机构和人员,在认真总结气象保障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开展了一系列军事气象保障研究。80年代,开展了气象条件对人员、武器装备和军事活动影响的定量化研究;开展了军事气象保障辅助决策系统的研究,并将研究成果成功地运用到多次军事演习气象保障中。90年代以来,随着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发展,开展了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气象保障的研究。1994年,由唐万年主编的《空军气象保障学》,总结了空军气象保障工作法规建设、质量管理和气象保障领导方面的宝贵经验,阐述了空军气象保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基本规律,并就空军气象保障的组织实施、管理和系统建设等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研究和探讨。1995年总参谋部气象局出版的《军事气象学》,在回顾了军事气象学的形成与发展,论述了气象(水文)条件对军事活动的影响之后,系统地总结了军事气象的基本内容、体制与业务系统、组织实施方法,以及现代战争条件下军事气象保障定量化与自动化的发展趋势;系统论述了人工影响天气的原理、技术和应用等问题。

专业气象学研究方面 70年代以来,军兵种的气象研究有了较大发展,出版了多部理论专著。1973年,总参谋部气象局出版《军事气象》一书,就大气环境对诸军兵种的影响作了阐述;1987年,曲延禄编著的《外弹道气象学概论》,就大气参数场对发射飞行器及其飞行的影响进行了系统研究。在航海气象学方面,对海洋水文气象资料进行了整理和统计;90年代开展了有关地区天气水文资料整编与军事气象水文预报研究。军事航

空气气象学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空军司令部1989年出版了《航空气象学》;1993年,赵树海在对飞机颠簸、飞机积冰和飞行气象保障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编著出版了《航空气象学》。

发展趋势 随着高技术武器装备的发展,未来战争对气象保障的要求越来越高,气象保障的作用越来越大,军事气象保障将面临一系列新问题、新情况。同时,电子技术、通信技术、网络技术、计算机技术和遥测遥感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军事气象科技和装备的发展和理论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军事气象学必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①随着军事斗争空间范围的扩大,高层大气探测技术将进一步发展和提高,军事高层大气学和空间天气学将逐步形成和发展。②随着光电武器装备的发展,军用光电气象学将逐渐形成。③军用天气预报技术将进一步向客观化、定量化和自动化方向发展。④以气象卫星为代表的非常规探测技术将迅速发展。⑤适应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特点的气象保障理论和方法将有新的发展。⑥局部人工影响天气将有可能成为气象保障手段。⑦新一代网上作战模拟训练系统将对军事气象环境平台有更高的要求,研究逼真可靠的网上训练气象模型将是军事气象发展的方向之一。⑧军事气象工作在广泛采用新技术、新手段、新装备的基础上,将朝着装备电子化、数字化、智能化,信息获取遥测化、综合化、自动化,信息传输高速化、网络化,信息处理人机交互、人工智能化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 赵树海著:《航空气象学》,北京:气象出版社,1993。
- 唐万年等著:《空军气象保障学》,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4。

总参谋部气象局:《大气环境与高技术战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9。

空军司令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气象史》,北京:蓝天出版社,1999。

(唐万年)

军用大气探测研究 (study of military atmospheric sounding)

探讨军事气象保障中测量和观察地球大气的物理、化学特性以及大气现象的原理和方法的活动。其研究内容可归纳为三个方面:①大气探测原理的研究,主要是指对测量气象要素的大气物理基础、测量仪器对气象要素的响应特性以及测量结果的处理模式等的研究。②大气探测仪器的研究,是指依据大气探测理论研制测量气象要素和天气现象的仪器。③大气探测方法的研究,是指大气探测仪器的安装,观测的组织与实施,站点的合理性布设等的综合研究。

人类为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自古就对大气现象和物候进行各种形式的观察,积累了一定经验。但利用气象仪器对大气的科学测量则始于16世纪末。随着物理学的发展,探测仪器的进步,大气探测研究逐步发展成为一门学科。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气探测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主要是开展常规气象探测仪器和观测方法的研究。50年代后期,开始进行自动地面观测系统和高空气象探测系统的研制。60年代,先后研制成功多种有线遥测气象仪、59型探空仪、701型测风雷达军事探测仪开始装备部队,711型天气雷达研制成功。70年代,七型电子探空仪和713型天气雷达研制成功。80年代,在电子探空仪——C波段一次测风雷达系统研制完成后,开展了电子探空仪——L波段测风雷达系统的新一代天气雷达——多普勒天气雷达

的研制。1988年,成功发射“风云一号”(FY-1A)太阳同步轨道气象卫星。90年代,部队开始装备使用多普勒天气雷达。激光气象雷达、气象声雷达、风廓线仪等大气遥感探测设备的研究取得长足进展,气象卫星研究也取得飞速发展。1997年,成功发射了“风云二号”(FY-2)地球同步静止轨道气象卫星。2000年,又成功发射“风云二号”(FY-2B)静止气象卫星。

军用大气探测仪器在现代科学技术进展的基础上,将向集成化、多功能、智能化和数字化方向发展,目测项目将会逐渐被仪器测量所代替;原有的测量仪器将更加现代化、自动化,测量结果将更精确。大气遥感开辟了军用大气探测研究发展的新阶段,军用气象卫星、多普勒天气雷达等大气遥感探测技术将得到快速发展,遥感气象信息的提取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将越来越重要。此外,军用大气探测还将向气象综合探测系统方向发展。总之,军用大气探测研究将在军事气象保障要求的推动下,在其他领域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上得到更快速的发展。

参考文献

赵相林、张霖深主编:《大气探测原理》,北京:气象出版社,1987。

(廖仿玉)

天气预报理论与技术研究 (study of weather forecasting theory and technique)

探讨天气发生、变化规律以及制作天气预报的原理和方法的活动。其主要内容为:①天气发生、变化规律。研究大气环流、天气系统、天气过程等运动现象及其规律,各种尺度天气系统的发生、发展、结构和移动特征,以及建立不同尺度天气系统发生、发展的物理图像等。②天气预报原理、方法。主要是对天

气模式,如天气学模式、统计学模式、动力学(数值)模式,以及天气预报方法,如天气图方法、数值预报方法、统计预报方法和统计-动力学预报方法等的研究。其根本任务是揭示天气发生和变化的规律,提出天气预报的原理和方法,提高天气预报的准确率,为军事活动提供准确的天气预报。

中国是世界上较早开展天气预报理论与方法研究的国家之一,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研究发明了许多观测仪器。中华民国时期,天气预报理论研究和不断技术不断发展。1916年中央气象台正式开始发布北京地区天气预报。1938年,涂长望提出中国气团新的分类法。1943年,卢鋈编写中国第一部《天气预告学》,并对30~40年代的中国寒潮和台风进行研究。1946年,赵九章提出行星波不稳定性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天气预报理论及方法的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50年代,叶笃正、顾震潮开始研究青藏高原对大气环流的作用。1954年,中国开始研究数值天气预报方法。1961年,曾庆存提出半隐式差分格式求解大气运动原始方程组。1962年,巢纪平建立中小尺度系统动力方程组,顾震潮提出暖云降水起伏理论。1965年,开始用准地转正压模式发布500百帕高度场的24小时数值预报,现正在业务运行的数值模式T106为全球谱模式,预报时效可达十天左右。1977年,谢义炳提出湿斜压大气概念和理论。1977~1980年,进行了北京、长江流域和华南前汛期暴雨观测、分析和预报试验研究。70年代末建立了气象预报专家系统。80年代,气象预报专家系统得到广泛应用,使传统的天气图经验预报方法实现了现代化。80年代以来,提出时变系统预测技术和灰色系统理论,并成功应用于天气预报,提高了天气预报质量。

中国人民解放军根据军事气象预报保障

的特殊需要,研究开发相应的天气预报理论与技术。1945年,解放区的机场开始建立气象台,开展军事航空气象预报研究和保障工作。80年代前,主要是跟踪和采用国内外先进的天气预报理论与技术。进入80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深入开展了天气预报理论与技术研究。1980~1987年,组织大规模的华东中尺度天气试验,重点研究了中国东部地区的中度天气系统的发生、发展及其演变规律。1985年,陈国楚等研制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个气象预报专家系统——航空气象要素短期预报专家系统。1992~1995年,气象局组织以北京地区强对流天气的分析和预报为核心的系统研究,在获取大量观测资料的基础上,从理论上对对流性天气系统的结构和发生、发展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为北京地区强对流天气的预报提供了实践依据和技术方法。1995年,魏绍远等研制成功空军中尺度数值预报业务系统。1998年开始,军队气象部门组织军用全球中期数值天气预报业务系统的研制和应用,在天气预报和气象保障技术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突破。这些成果大大推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气预报业务现代化的进程。

在未来军事天气预报理论与技术研究中,随着卫星气象学、雷达气象学和军用大气探测研究的深入和发展,数值预报方法的不断完善,以及人工智能和多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作为两大理论支柱的天气学和动力气象学将日趋结合,使天气预报理论与技术向精确化、综合化、定量化和自动化方向发展,形成综合运用动力学、天气学、统计学方法,结合天气、气候的地方性特点和预报员经验的业务预报系统,对大气环流、不同尺度天气系统之间和天气系统与下垫面之间相互作用等的深入研究,特别是对中小尺度天气系统的研究,以及集成预报理论和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在军事上将使以军事危险性天气为

重点的天气预报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参考文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自然科学学科发展战略调研报告》(大气科学),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委员会:《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地理测绘气象》,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

(孔玉寿)

卫星气象研究 (study of satellite meteorology)

探讨气象卫星遥感探测大气的理论和方法、卫星遥感资料及反演产品应用的活动。主要研究内容:气象卫星探测大气的理论和方法;气象卫星资料的分析和应用方法。卫星气象研究与气象学、大气物理、大气探测、计算机、地理信息等学科的理论和技术以及卫星遥感探测技术、卫星资料接收处理技术有着密切的联系。

1960年,美国发射了第一颗气象卫星,并系统开展了卫星气象研究工作。70年代,中国开始研制气象卫星,并建立了多个气象卫星云图接收站,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财力研究气象卫星资料。陶诗言等利用接收到的APT云图资料分析全国的天气系统,揭示了许多天气系统活动规律。1971年,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出版了《卫星云图接收和分析》一书,较系统地介绍了卫星资料的观测原理及接收处理分析方法。1975年,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整编出版《卫星云图手册》。80年代,卫星气象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曾庆存等利用卫星资料反演大气温、压、湿、风等要素垂直分布;方宗义等利用卫星资料分析各种天气尺度系统的生消演变规律,并应用于天气分析预报。

1988年9月、1990年9月,中国先后发射FY-1A、FY-1B试验气象卫星,1997年6月成功发射FY-2静止气象卫星,1999年成功发射FY-1C极轨气象卫星,2000年又成功发射FY-2B静止气象卫星。气象卫星的成功发射标志着中国卫星气象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

70年代初,军队有关部门开展进行卫星云图接收处理设备的研制和利用卫星云图研究大尺度天气系统的云图特征,取得了一些成果。1974年,蔡松青等整编了《卫星云图分析手册》。1976年,空军气象学院正式开设卫星气象学课程。80年代,军队加快了静止气象卫星云图接收处理系统的研制。1986年,空军气象学院孟昭崔等研制开发了我国第一台伪彩色云图接收处理系统,王德钊等研制成功彩色卫星云图接收机,均获得了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

90年代,卫星气象研究进入全面发展的阶段,军队气象部门相继研制成功并安装高分辨数字化卫星云图接收处理系统,卫星资料得到广泛的应用,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1997年以来,空军气象学院开展了卫星资料定量化分析研究,进行云迹风、云中垂直速度、云区散度、云顶温度梯等定量化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并开始进行业务试验。1998年,根据军事气象保障需要,研制成功便携式卫星云图接收处理系统。

到20世纪末,卫星资料反演应用研究正在从云图分析、物理反演方法研究转为多通道定量化分析和同步反演方法研究。卫星资料在军事气象保障上的应用研究,不再局限于云图资料的常规处理,而是进一步开展了对如何解决卫星资料与常规、非常规气象资料的匹配同化问题,以及对在军事活动中构成严重威胁的灾害性天气的监测预报方法等问题的研究。卫星资料如何直接应用于数值

预报模式,以及提高遥感资料反演精度等都将是我国卫星气象研究需继续深入探索和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卫星云图的接收和分析》,北京:科学出版社,1971。

(石汉青)

雷达气象研究 (study of radar meteorology)

探讨以气象雷达作为主要工具探测大气状态的理论和活动的活动。其内容包括:气象目标物对雷达波的散射、衰减性能及雷达回波信号特性的研究;适合气象特点的雷达发送、接收和显示设备的研制;进行回波信息处理的计算机软硬件技术的开发;回波图像分析、强风暴结构识别及监测和警报方法研究;定量测量区域降水量方法的研究;晴空回波观测与研究等。

20世纪40年代,雷达技术被引入气象部门,用于高空风探测和降水探测试验,一批气象人员投身到雷达探测理论、探测方法,以及运用雷达进行气象学的研究,一些雷达技术人员也开始从事气象回波信息提取方法、天气雷达设备的研究工作。

中国的雷达气象研究开始于60年代。当时由于缺乏装备,主要是开展一些初步的理论探索,如对天气雷达使用的最佳波长、大气折射起伏对雷达波散射的影响进行的探索等。70年代初,在自行研制出X波段天气雷达后,天气雷达的探测试验和应用研究工作得到较广泛的开展,葛润生等提出了利用太阳辐射校准天气雷达的方法,讨论了天气雷达测量误差;林海等研究了雨滴的微波辐射特征;陈良栋等对冰雹云回波的结构特征及其形成机制进行了观测和分析;汤达章等初

步探讨了天气雷达定量测量降水的 Z-I 关系;黄炎等利用雷达回波进行了台风定位和台风强度判定的试验。1979 年,空军印发天气雷达观测的气象技术规范,对雷达气象工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规定。

80 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雷达气象工作者利用天气雷达的加密观测网资料,分析华东地区强对流天气的类型及发生、发展的规律,提出了适于天气雷达的预报线索。陈良栋编著的《天气雷达资料的分析与应用》一书,对该项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80 年代中后期,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开始重视对降水回波信号涨落现象和回波数字化处理方法的研究。通过对降水回波信号的采样和累加平均,减少信号的涨落,以求得雷达对降水回波强度较准确的测量,直接推动了军队 K/LLX716 型数字化天气雷达的研制。

90 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了北京地区强对流天气监测试验,有八部天气雷达参与气象观测,对北京地区强对流天气,特别是飚线回波的来向,移动转向及强度演变进行了比较细致的观测和分析,摸索了强对流天气回波的活动规律。90 年代中期,还积极开展降水回波信号涨落谱与多普勒速度谱之间关系的理论分析,研究了 DPRF 技术扩展多普勒天气雷达测速范围的算法。1996 年,研制成功 LLX06 型多普勒天气雷达,其主要技术性能达到 90 年代初国际同类产品水平,是全军现代化装备的重要组成部分。

21 世纪初,雷达气象研究将有大的发展。未来全军雷达气象研究将侧重于多普勒天气雷达技术的进一步完善和提高,回波资料的区域组网,多普勒天气雷达速度场资料的反演及其在军事气象保障中的应用。同时,将积极开展双线偏振天气雷达的研制及其在定量测量区域降水量和水文环境方面的应用研究工作。

参考文献

陈良栋编著:《天气雷达资料的分析与应用》,北京:气象出版社,1991。

(胡明宝)

军用人工影响天气研究 (study of military artificial weather modification)

探讨运用人工方法改变某些局地天气现象,以达到改造战场大气环境、使之有利于己方作战行动的理论与技术活动。人工影响天气有人工降水、人工消云、人工消雾、人工抑制雷电、人工削弱和引导台风及人工防雹等。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人工影响天气的理论、催化原理及其作业技术方法、效果检验的方法等。研究方法有实验室实验、野外试验和数值模拟等。80 年代以来的几场局部战争表明,现代高技术武器装备性能发挥受大气环境的制约,有利的大气环境能使高技术武器装备发挥出更大的威力。因此,军用人工影响天气研究在军事上具有重要价值。

人工影响天气的科学研究开始于 20 世纪 40 年代。1946 年, I. 朗缪尔、V. J. 谢弗和 B. 冯内古特首次用干冰和碘化银进行了人工影响天气的试验。中国从 50 年代开始进行人工降水和防雹的研究和试验。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人工影响天气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工消云、消雾,特别是消暖云、暖雾方面。1958 年,首次用干冰和饱和盐水进行了人工消云试验。70 年代后期,对暖性孤立的淡积云和层积云采用水、盐水、白粘土、耐火土等进行了人工消云试验,取得了一定的效果。80 年代中期,开展了较大规模的人工消云、消雾试验,采用播撒盐粉等方法进行消雾,对耐火土、水、盐粉、尿素硝酸铵饱和水溶液等催化剂的消云效果进行了测定。90 年代后期,采用改装的涡轮喷气发动机对机场雾进行人工消雾试验,并对加热后近地面

温度、湿度和气流速度的分布情况进行测定,同时用飞机播撒盐粉消云,具有明显效果。

在进行野外试验的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数值模拟和实验室研究方面也开展了工作:①研究并建立了具有详细微物理模式和辐射模式的辐射雾数值模式,可对辐射雾的生成过程进行数值模拟。②同时开展了盐粉消雾的数值研究,证明盐粉具有一定的消雾效果。③研究并建立了积云数值模式,对冰雹形成机制,气溶胶对积云发展的影响和人工抑制暴雨机理等进行了数值研究。④研究并建立了层状云数值模式,对播撒盐粉消层积云进行了数值研究。⑤在实验室内,测定了碳黑的吸湿性和有效吸收率,对碳黑消云的可能性进行了研究。同时对不同地区和厂家的盐粉、氯化钙等的谱分布和吸湿性能进行了测定。⑥利用大云室进行了催化模拟研究,测定了多种催化剂的下落速度、扩散范围和播撒后不同时段不同高度的粒子谱及消光系数。⑦研制了飞机自动播撒盐粉装置。

未来军用人工影响天气的研究,除了不断深入研究消云、消雾外,还将开展其他人工影响天气的研究,如人工影响闪电、人工影响电离层天气,以及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系统等。

(孙学全)

军事气象信息工程研究(study of military meteorological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探讨由通信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同军事气象学各分支领域相结合面形成的军事气象信息工程技术的活动。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军事气象通信技术、气象信息处理技术和军事气象业务自动化技术等。基本任务是:为收集、传输、交换和分发军事气象情报建立专业通信链路,利用计算机完成气象资料的接收、处理、应用和存储。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军事活动对气象

情报需求逐渐增加,气象情报传输量迅速增大。20世纪40年代以后,一些国家陆续出现传输气象信息专用电传打字机和气象信息传真机等,增加了报文、图形和图像传输形式。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微处理器和微计算机的问世,电子计算机在军用大气探测、气象仪器装备研制、资料处理、气候统计、天气分析预测、气象保障等科学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并在与军事气象学和军事气象业务的结合中,开发了许多新的技术产品。这不仅丰富了军事气象学的研究手段,突破了长期存在的“计算障碍”,革新了气象仪器装备,而且引起了军事气象学研究方法、军事气象勤务结构、气象保障方式等的变革,提高了气象保障的质量和效益,同时促成了军事气象信息工程的形成和发展。

在中国革命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的气象情报的接收手段主要采用手工抄收,并用保存电报底稿的办法进行存储,气象情报传递也主要靠通用的收(发)报机和有线电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人民解放军主要采用莫尔斯电报技术作为传递气象信息的基本手段,并将气象情报的获取、加工处理与传输逐渐合为一体,气象情报改用穿孔卡片或纸带、磁带和缩微胶片录取、存储,并用语音、数字、符号、图形和图像等多种形式表述。60年代末,为解决莫尔斯电报传输速率低和抗干扰能力差等问题,国家开始研究气象移频和气象传真广播体制,70年代初建成短波无线广播网。1973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利用气象移频技术定时定量接收国内外各种气象报文和图表。90年代初,有关部门开始研究新的军事气象信息传输体制,首次提出利用卫星电视广播信道资源,在视频信号的场消隐期间插入气象数据信息进行广播的技术体制。其特点是覆盖范围广,传输速率高,抗干扰能力强,可行性高。90年代后期,卫星电视

气象数据广播接收应用系统装备部队,替代了使用20年之久的无线移频气象广播接收设备。90年代末,军事气象信息的传输信道由无线过渡到无线与有线相结合,传输速率向中高速发展,通信由广播方式发展为广播与点对点通信相结合的方式。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军事气象信息工程技术研究也将有所发展:一是将进一步加强对卫星探测,L波段二次雷达与GPS高空探测,地面自动观测,多普勒雷达联网探测,风廓线仪连续监测,GPS大气遥感,飞机、船舶和浮标等全球资料的四维同化处理和质量控制的研究;二是为实现对气象观、探测数据、天气分析过程和预报保障产品可视化处理,将加强战场地理环境、大气环境及未来战场气象准备的数字化和可视化研究等。

(孔毅 许屏)

军事航空气象研究 (study of military aeronautical meteorology)

探讨大气环境影响军事航空活动、航空武器装备的规律,以及实施气象保障的理论和活动的活动。其内容主要有:低空风切变、低云、低能见度、强对流天气、飞机颠簸、飞机电击等。目的是为航空兵部队在各种气象条件下,有效地运用航空武器装备,顺利完成作战、训练的飞行任务提供气象保障依据。

军事航空气象研究是基于军事航空活动的需要,在气象学和其他科学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军用飞机只能在简单的气象条件下飞行,航空气象侧重于研究地面风和低空气流对飞机起落、射击、轰炸及远程飞行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针对气象情报封锁问题,苏、美等国积极研究应用飞机侦察天气和采用不完全天气图预报天气的方法。大战期间,空军战役的气象保障上升到重要位置,云、雾、降

水、雷暴以及飞机颠簸、飞机积冰、电击和急流等成为探测、研究的重点。战后迅速发展的喷气式飞机,使平流层气象探测和飞机尾迹高度预报成为研究重要问题。60年代以来,晴空湍流和低空风切变成为军事航空气象研究的重要内容。随着气象卫星和气象多普勒雷达的出现,使获取全球范围和中小尺度天气系统的气象资料成为可能;电子计算机在加工处理气象情报和制作航空天气预报中的应用,使军事航空气象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在中国,军事航空气象研究是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广东、湖北、上海军政府先后成立航空队开始的。到1927年,各机场就设有测候所,进行航空气象观测。1928年,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气象研究所,在竺可桢所长的指导下,研究所编印了《航空气象概要》、《测候须知》、《国际云图节略》等,为开展军事航空气象研究奠定了基础。1939年,中华民国航空委员会设立空军气象总台。同年12月,昆明空军军官学校正式成立空军测候训练班,并在开展教学和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中国第一本《气象手册》。1942年,中美为共同对日作战,开辟了“驼峰航线”。为满足军事航空气象保障需要,到1945年已设立28处机场气象台站,并于1946年开始绘制天气图表,发布航空天气预报。

1945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开始建立机场气象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逐步建立起气象保障系统,开展了多方面的军事航空气象研究工作。先后研究制定了航空兵作战气象条件及气象保障条例。进入80年代,空军气象研究所利用北京气象铁塔的观测资料,分析了北京地区低空风切变的统计规律,并研究了对飞机起落飞行的影响。空军气象学院利用1000多个飞机积冰报告,研究了飞机积冰发生的

天气背景和气象条件,提出了预报飞机积冰较为客观的方法。1989年,空军司令部组织编著了《航空气象学》,从理论和实践上全面阐述了航空气象学原理、航空气象探测、航空天气预报、航空气候和航空气象保障等。1992年,有关部门开展了北京地区强对流天气系统的监测及利用常规、非常规观测资料进行强对流天气的短期和临近预报方法的研究。1994年,空军司令部气象局组织编著了《空军气象保障学》专著。该书第一次系统论述了军事航空气象保障的基本原理、基本规律及组织实施方法,对军事航空气象保障研究进行了全面的总结。1997年,有关部门进行了中国军事气候区划的研究,其中军事航空气候区划的研究,系统分析了中国各航空气候要素的时空分布及特征,并首次按机种进行了中国军事航空气候区划。20世纪末期,军事航空活动已由根据气象条件决定能否飞行,发展为在复杂气象条件下如何飞行,军事航空气象研究已从过去研究气象条件对飞行的影响,发展为研究如何在各种气象条件下保障飞行安全问题。

在未来的军事航空活动中,除低能见度、雷暴、大气湍流、高空气象条件的探测和预报仍需进一步研究解决外,形成强烈扰动和危害飞行的中、小尺度气象系统的预报方法、高速处理、传输,显示大量气象情报的自动化、客观量化航空气象保障系统及人工影响云雾改善飞行环境的理论和方法,都将成为军事航空气象研究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赵树海:《航空气象学》,北京:气象出版社,1994。

空军司令部气象局:《空军气象保障学》,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4。

(赵树海)

《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China Encyclopedia Military)

中国第一部现代型综合性军事百科全书(简称军事卷)。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于1989年6月出版。辑为上下两卷。

1978年5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务院批准了学术界提出的编纂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建议。为高质量完成《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编纂任务,中央军委于1980年11月6日批准成立了由宋时轮、张震、梁必业、洪学智、萧克、钱学森、萧洪达、马卫华、王定烈、王诚汉、朱云谦、向守志、刘道生、李水清、李光军、李燧英、宋承志、张翼翔、陈彬、陈再道、郑汉涛、单印章、贺进恒、聂奎聚、高克、黄玉昆、黄新廷、曹里怀、韩怀智、谭善和等军队高级将领和科学家组成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编审委员会,全军各大单位成立了编研机构,动员组织全军学术力量密切协作,从组织上确保了编纂任务的完成。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胡耀邦、杨尚昆等参与了对重要条目和重大问题的审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元帅和钱学森、朱光亚等著名科学家以及110多位军队高级将领,亲自为军事卷撰写了重要条目,3000多位军内外有关的专家、学者、研究人员以及富有经验的老干部,参加了撰审工作,历经八年时间,完成了编纂出版任务。

军事卷编纂工作,以军事科学体系为基础,按照军事思想,战争、战略,战役,战术,军队指挥,军事工程,军制,军事训练,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军队后勤,中国古代兵器,枪械、火炮、坦克、弹药,舰艇,军用飞机,导弹、核武器、军用航天器,化学、生物武器、三防装备,军事通信装备、军用雷达、电子对抗装备,中国历代军事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中国人民志愿军战

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人物,世界军事史,军事人物、军事地理,国际军事约章等 25 个分支学科,选收条目 2 924 个,共约 376 万字,随文配图 1 398 幅,以插页的形式配彩色图片 630 幅。军事卷以条目为基本知识单元,全面介绍了军事和军事科学领域各方面的基本知识、基本事实和基本理论。为便于读者查询使用,除设置了齐备的各种索引外,卷首以“军事科学”概观性文章,系统地论述了军事与军事科学、两类不同性质的军事科学、古代军事科学与当代军事科学,综合分析了军事领域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涵盖了全卷各方面的内容。增设了“中国军事史大事年表”。军事卷编纂工作中形成的确保进度与质量的一系列制度和规范,为以后展开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纂奠定了学术和实践基础;军事卷编纂工作中锻炼了一批严谨治学、无私奉献的学术骨干队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研事业培养和储备了人才;军事卷编纂工作搜集和整理的珍贵资料,成为服务于军事科研工作的宝贵财富;军事卷编纂工作还推动了一些原来基础薄弱学科的研究。

军事卷编纂工作始终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突出中国特色、军事特色和时代特色,着眼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在编纂工作中,始终坚持科学性、客观性以及治学的严谨性。全卷编纂的高质量,受到全军部队、院校、科研单位以及学术界和出版界的好评。军事卷的编纂出版,填补了军事科学领域中的若干学术空白,拓宽了军事科学研究的视野,为在军队官兵和民众中普及军事科学知识,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收到了很好的军事效益和社会效益。先后获军事科学院科研成果编辑一等奖和全军军事科研成果总编编辑一等奖。

(麻光武)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China Military Encyclopedia)

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编纂出版的中国第一部现代型专业性军事百科全书。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中央军委根据人民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需求,着眼于提高军队官兵军政素质、科学文化水平和全民族国防观念,作出了编纂《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以下简称《全书》)的决定,并成立了由宋时轮、萧克、张震、傅全有、梁必业、朱光亚、韩怀智、周克玉、郑文翰、吴铨叙、徐才厚、赵南起、徐惠滋、袁守芳、丁衡高、马伟志、王诚汉、王祖训、石云生、石宝源、朱云谦、向守志、刘存智、刘顺尧、刘道生、杨国屏、李静、李光军、李旭阁、李希庚、何其宗、邹玉琪、张序三、张翼翔、林虎、固辉、周依冰、郑汉涛、单印章、宗顺留、徐长友、徐芳春、高克、郭化若、郭伯雄、陶伯钧、曹刚川、曹里怀、程建宁、裴怀亮、廖锡龙、潘日源等一批高级将领和科学家组成的《全书》编审委员会,动员和组织了军内外 5 000 余位专家、学者,其中有 40 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形成了阵容强大的学术攻坚队伍和顺畅高效的运行机制,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亲笔为该书题写了书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傅全有担任总编辑。全军各大单位 500 多位专业工作者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历经 11 年,于 1997 年 7 月完成了卷本编纂出版任务,并于 1999 年研制出版了光盘版。

《全书》始终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作为编纂的基本指导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突出中国特点和风格,保持时代特色和活力,充分反映中国几千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 70 年来丰富的军事实践和军事理论,特别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及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综合体现了军事领域 90 年代中期以前的

最新研究成果、现代科学技术在军事领域中的应用与影响。它以准确的内容,丰富的资料,辅以形象、直观的照片、图表,全面、系统、客观地介绍和阐释了古今中外军事领域的基本事实、基本概念、基本理论。为方便读者检索查寻,各门类卷本的条目,均按条名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并设有条目分类目录、条名汉字笔画索引和外文条名索引;有的门类卷本还设置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民兵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英雄模范名录,外国人名中外文对照表,外国地名中外文对照表,外国武器装备译名对照表,世界主要海空军基地表和计量单位一览表。

《全书》以现代军事科学体系为基础,设立军事思想、军事学术、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军事后勤、军事技术、军事历史、军事地理测绘气象七个知识门类、57个学科,共选收1.1万余个条目,选配照片、图表近万幅,总计1500余万字。军事思想门类,介绍了马恩列斯军事理论、毛泽东军事思想和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基本内容、形成与发展过程、地位与价值等,同时也介绍了中国历代和世界一些国家、政治团体、重要军事人物关于战争、军队和国防等方面的基本思想。军事学术门类,阐述了该门类的研究对象、内容、方法、发展过程及趋势,系统介绍了战略、战役法、战术、军队指挥、军事情报、军事运筹、军事制度、军事训练、战争动员、国防经济、军事法等方面的内容。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门类,全面介绍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同时介绍了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中国民兵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政治工作。军事后勤门类,介绍了古今中外军事后勤保障、后勤指挥、后勤建设和后勤管理的内容、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实施方法和基本要求。军事技术门类,介绍了军事技术的基础理论、各种武器装备的发展沿革、原理、结构、性能

和作战应用,以及各军种、兵种的技术应用等方面的知识。军事历史门类,介绍了中外军事历史,特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史、军史和人物,同时介绍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史以及国际军事约章方面的知识。军事地理测绘气象门类,介绍了军事地理学、军事测绘学、军事气象学以及中国和其他国家或地区军事地理方面的知识。

《全书》以学科为单位,于1989年以后陆续出版了54本《全书》学科分册;1997年,又按知识门类辑为十个正文卷和一个总索引卷,《全书》卷本采用文图彩印和国际16开本精装。《全书》规模宏大,体系完整,知识密集,资料翔实,检索方便,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全书》的编纂出版,展示了当代中国军事科学研究的总体水平,向国内外、军内外读者提供了完整、准确、科学、权威、典范的军事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从整体上建立和完善了中国现代军事科学体系,系统收集和整理了大量珍贵的资料和图片,填补了部分学科研究的空白,促进了军事科学各学科建设,推动了一些专业领域专题性军事百科全书的编纂出版,扩大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国际影响,增进了中外军事文化的交流,成为中国军事科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全书》编纂贯彻了中央军委批准的“全军动手,专业对口、军地结合,分工合作”的组织原则和“抓紧时机,好中求快,质量第一”的要求,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工委、各军种兵种、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和全军各大单位及有关院校共同承担了编纂任务,并分别设立了编研机构。选聘了国内外、军内外的专家、学者为条目撰写人。国家机关有关部门、科研单位、院校、图书档案资料部门的许多专家、学者和科研人员给予了大力协助。军事科学院发挥了学术、人才和信息资料的整体优势,周密论证并拟制了《全书》的框架结构和

条目总表、体例规范和质量标准,严密实施了撰写、编审和出版各个阶段的工作,缜密组织了资料搜集和资料核对以及出版协调及各项保障工作,慎重处理了有关政治性、政策性、法规性以及涉外保密等问题,对涉及各学科重大问题的结论,报请国家和军队有关职能部门或机关审批认可,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人物的评语,报经中央军委讨论审定。稳妥地解决了编纂各个阶段遇到的学术疑难问题和条目间、学科间、门类间相关内容的交叉重复以及知识内容抵牾的问题,确保了编纂工作的高水平。《全书》编纂出版后,先后获军事科学院“军事科研成果特别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研成果总编编辑特别奖”、第二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图书奖荣誉奖”。

(麻光武)

《当代中国》丛书国防军事卷 (National Defense and Military Affairs, *Contemporary China*)

大型历史系列丛书《当代中国》中,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史学专著的总称。在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领导下,从1982年开始,成立编写机构,确定编写内容和分工,组织力量广泛收集整理史料,并对重大历史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和研究,精心写作,反复修改,经有关单位审阅定稿。国防军事卷共19卷,约1200万字,1996年出齐。

国防军事卷从总体和不同侧面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人民解放军的建设成就和国防事业的发展,较为全面、系统地记述了当代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光辉历程;记述了人民解放军在保卫国家主权完整、领土安全,参加社会主义建

设,训练、战备、国防科研、施工、生产等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以及基本经验和教训;记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解放军建设的新成就和新经验;通过对九位元帅生平事迹的记述,生动地反映了他们的革命业绩、言行品质和道德风范,多角度、多方面地展现了人民解放军成长壮大的历程。

国防军事卷的卷数约为《当代中国》丛书总卷数的15%,占有相当的比重。国防军事卷从总体上以反映当代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为主,同时通过前言、绪论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人民解放军的历史都有较为全面、准确的总结,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根据《当代中国》丛书的体例要求,国防军事卷设专题卷十卷,人物卷九卷。十部专题卷中,《当代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综合性的,由军事科学院组织编写;其他专题卷,《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由总参谋部组织编写,《当代中国军队的政治工作》由总政治部和国防大学组织编写,《当代中国军队的后勤工作》由总后勤部和后勤学院组织编写,《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由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组织编写,《当代中国海军》由海军组织编写,《当代中国空军》由空军组织编写,《当代中国民兵》由总参谋部动员部和总政治部群众工作部组织编写,《当代中国军队的群众工作》由总政治部群众工作部和总政治部办公厅组织编写,《抗美援朝战争》由军事科学院组织编写。人物卷中,《朱德传》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组织编写,《彭德怀传》由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组织编写,《刘伯承传》由国防大学组织编写,《贺龙传》由总参谋部组织编写,《陈毅传》由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编写,《罗荣桓传》由总政治部组织编写,《徐向前传》由国防大学组织编写,《聂荣臻传》由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编写,《叶剑英传》由军事科学院组织编写。

国防军事卷通过综合性、专题性历史记述,以及元帅传记,使各卷之间在内容上互相联系,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形成《当代中国》丛书关于人民解放军建设的一个系列。

国防军事卷史料丰富、翔实、可靠,大量史料来自档案材料,经过严格筛选和核对,在反映基本历史事实的过程中,既有简要的概括,也有重大历史事件的详细情况,既有基本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有失误和教训的记述。各卷的写作,严格遵照丛书编委会的要求,对历史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虚美、不掩过,使之成为反映历史本来面貌的信史。

国防军事卷是第一套研究当代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丛书,涉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九位元帅的重要史实,在编写单位中共党委审查的基础上,均报请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战史编审委员会审定,具有系统、真实、科学和权威性的特点。国防军事卷为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和战史,继承和发扬优良的革命传统,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提供了素材。

(赵明春)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 (*Military Terms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规范全军作战、训练、日常工作和生活用语的法规性辞书。该书经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批准,由军事科学院组织编写,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颁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入正规化建设轨道,《军语》编纂工作就被提上议事日程。由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军训部组织编写的《军语汇编》于1951年出版发行。六年之后,当时人民

解放军的最高学府军事学院,于1956年编纂出版了《军语画一》。为了更好地统一、规范全军的军事用语,军事科学院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牵头组织编写了《军语》,并于1972年10月向全军颁行。70年代末,中央军事委员会指示军事科学院及有关单单位,对1972年版《军语》进行增修,修编之后的版本于1982年8月出版。该版《军语》出版发行之后,军事科学院根据中央军委有关指示精神,组织全军有关单单位的百余名专家,编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于1997年9月向全军颁行。新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是以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和江泽民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论述为指导,依据中央军委新时期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一系列方针与原则,在保留1982年版《军语》精华的基础上,根据军事发展的新情况编纂而成。新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分全本和简本两种版本。全本收词6500多条,分为综合性军事术语,国防、战争、战略,战役、战役法,战斗、战术,军队组织指挥,体制编制,军事训练,行政管理,装备管理,政治工作,后方勤务,侦察、情报,电子对抗,国防科技,各军种、兵种知识,以及军事地理、军事测绘、军事气象、水文等29大类,覆盖了军事科学各领域的基本知识。插图(表)180余幅,80多万字,发全军团以上单位。简本由从全本中精选出的2000余条基层官兵常用词目编成,主要发全军营以下分队。新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根据80年代以来的军事发展情况,大量增收了在实际工作和学术中经常使用并已相对稳定的新的军事术语,淘汰了已经陈旧过时或很少使用的军事术语,在新增收的词目中,反映现代科技特别是高技术知识的军事术语所占比重增大;框架结构的设计科学合理,类目设置兼顾了学科、部门、专业以及军

兵种等多方面的需要；词目定名和释文表达准确、简明、规范，在学术观点上有所发展和创新。新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在全军颁行后，广大官兵一致反映该书收词全面合理，释文准确简明，文字通俗易懂，适合新时期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需要。1997年底，新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获全军第二届军事科研成果特等奖。

（李庆山）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Academy of Military Science of the CPLA）

中央军委领导下的军事科学研究机关，全军军事科学研究的中心，计划协调全军军事科学研究工作的机构，军委、总部从理论高度指导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助手。

1956年9月，为适应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新形势，总结中国人民解放军几十年革命战争的经验，编写军队加强正规化建设所迫切需要而又适合新特点的条令条例，充分发挥军事科学理论对军队建设和作战的指导作用，经毛泽东主席批准，中央军委决定建立军事科学研究机关。12月3日，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以叶剑英元帅为主任的军事科学院筹备委员会，负责军事科学院的筹建工作。1957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正式命名。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科学训练部从训练总监部分出，成为军事科学院的组建基础。1958年3月15日，军事科学院在北京正式成立。编制为大军区级，直属中央军委领导，叶剑英任院长兼政治委员。设学术秘书处、政治委员办公室、院务部、计划指导部和战史、战争理论、战役、战术等研究部。此后几经调整，至1966年，设有院办公室、政治部、院务部和战争理论、战术、战史、外国军事等研究部，以及军事技术直观教研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军事科学院的建设

遭受干扰和破坏，军事科研工作处于停顿状态。1972年，编制设有院办公室、政治部和战争理论、战术、战史、外国军事等研究部。1978年，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军事科学院充实科研队伍，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军事科研工作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1986年，编制调整为计划组织部、政治部、院务部和战略、战役战术、军制、军事历史、外国军事等研究部，以及毛泽东军事思想、军事运筹分析、军队政治工作等研究所和军事学术杂志社、军事科学出版社、军事图书资料馆。进入90年代后，军事科学院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增强了军事科研的创新意识和服务意识，进一步深化科研改革，在搞好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理论研究的同时，加强对国防和军队建设与作战指导等对策问题研究，发挥了军事理论对军事实践的先导作用。1993年后，军事科学院设有科研指导部、政治部、院务部三机关和战略、战役战术、军制、军事历史、外国军事、军事百科等研究部，以及军事运筹分析研究所、军事学术杂志社、军事科学出版社、军事图书资料馆和研究生部。

军事科学院科研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马列主义军事理论、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和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论述为指导，以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为依据，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认真总结人民解放军的历史经验，重视汲取外军的有益经验，紧紧围绕确保战争“打得赢”和军队“不变质”的要求，深入研究高技术战争的战略指导和战法，努力探索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特点与规律，创新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科学，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和总部的决策服务，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与作战服务，为院校的教学和培养人才服务。军事科学院的基本任务是：开展军事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对策问题研究，加大

对重大现实问题研究的力度,为军委和总部决策提供咨询建议,为国防和军队建设及作战提供理论指导;编写或修订军队有关的条令条例,为军队建设和作战指导提供军事法规;组织协调全军各有关单位开展军事科学研究,负责中国军事科学学会的日常工作;培训军事学博士、硕士研究生,为部队、机关和院校输送军事人才。

军事科学院建院 40 多年来,完成了中央军委和总部赋予的军事科研任务,推出了一大批有重要影响的军事科研成果。在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研究方面,整理出版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推出了一批研究马列主义军事理论、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论述的专著,为军队建设和作战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在军事法规研究方面,完成了作战条令、共同条令、警备条令、司令部条例、政治工作条例、装备工作条例等重要军事法规的编写和修订,为建军和作战提供了法规依据。在对策问题研究方面,完成了一大批有分量的研究报告,在世界军事发展趋势、国家安全环境分析、军事战略方针调整、战略指导和作战方法、国防和军队发展战略、军队改革设想及措施、军队的体制编制、管理教育和军事训练、军队的政治建设、后勤保障工作和武器装备发展等方面,向中央军委、总部提供了有价值的咨询建议。在科学体系和学科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研制印发了中国军事科学体系,编写出版了战略、战役、战术、指挥、军制、政治工作、军队管理、军事历史等一批专著,组织编纂了军语、军事百科全书和军用主题词表等军事工具书,以及军事志等专用军事书,翻译和编译了一批有影响的外国军事著作,从多方面进行了外国军事问题的研究,开展了国防发展战略、国防经济、国防科技、军事装备、军事运筹、军事心理、军事法等新兴学科

和交叉学科的研究,逐步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军事科学知识体系。此外,军事科学院还研制了一些作战模型和软件系统。以上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有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有的填补了军事科学领域的空白,有的获得了国家级和军队级奖励。在此期间,还编辑发行了《中国军事科学》、《军事学术》、《国防》、《军事历史》、《外国军事学术》、《军事百科》、《中国军事志》、《军事系统工程》等刊物,对活跃和繁荣军事科学研究起到了积极作用。

军事科学院依据规定的职能,依靠部队和院校的支持,开展了计划协调全军的军事科研工作。研制印发了军事科学研究条例及军事科研管理的若干规定,研究制定并组织实施了全军的军事科研工作计划,完成了军队系统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军事学项目的管理工作,多次召开了全军军事科研工作会议及业务会议,成立了中国军事科学学会等学术团体,组织了一系列全军性的重大学术活动,有力地推动了全军军事科学研究工作的深入发展。

军事科学院结合军事科研工作,发挥科学研究和理论创新优势,培养了一批军事学博士、硕士研究生。从科研与教学的实际出发,作出了加强和改进研究生教育工作的决定,组织编写了研究生培养方案和教学大纲,加强了导师队伍建设,编写出版了 55 本硕士研究生系列教材,建立了研究生军事实践基地,同军队有关院校开展了合作办学,探索了科研单位办学和具有军事特色研究生教育的路子,促进了军事人才的培养和科研成果的创造。

军事科学院成立 40 多年来,不仅成果累累,工作卓有成效;而且人才辈出,知名度比较高。在军事科学院的人才队伍中,既有一批担任院领导职务的军队老干部,领导着军事

科研工作的发展;又有一批综合素质较高的军事科研人员,为军事科研事业无私的奉献。军事科学院的历任院长和政治委员,继叶剑英元帅任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之后,历任院长为:宋时轮、郑文翰、蒋顺学、赵南起、徐惠滋、刘精松、王祖训、葛振峰;政治委员为:粟裕、王树声、王新亭、廖汉生、刘志坚、萧华、袁升平、梁必业、王诚汉、杨永斌、张序三、张工、温宗仁。军事科学院通过到部队选调、送院校深造、下部队代职、岗位培训和出国留学等各种途径,逐步培养和造就了一支多学科、高学历、有实践经验的军事科学研究队伍。目前研究人员中大学学历以上的占81.6%,其中硕士、博士占26.7%。在这支队伍中有一些是享誉军内外的专家学者,其中“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技术、管理专家”三人,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学者55人,军队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获得者两人,院军事科研重大贡献奖获得者11人。同时,还涌现了一批受到各种不同形式表彰的先进模范人物。

军事科学院的建立和发展,主要有以下几点经验:①坚持正确的科研方向。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确保党对军事科研工作的领导。深入学习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坚定不移地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回答和解决军事实践的新情况、新问题。认真做好军事科研工作中的思想政治工作,从讲政治的高度把握军事科研的正确方向。②坚持以科研为中心。军事科学院的中心工作是军事科学研究,离开了这个中心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在科研工作的指导上,必须坚持以军事科学研究为中心,以军事科研工作为主体,以军事科研人员为主体。各级领导和机关要紧紧围绕中心开展各项工作,全心全意地为军事科研工作和军

事科研人员服务。③大力弘扬创新精神。创新是军事科学研究的职责,是军事科学发展的动力,是军事科学生命的灵魂。在军事科学研究工作中弘扬创新精神,就是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深入实际,刻苦钻研,勇于探索,大胆创新,不断创造新理论,及时提出新对策。④不断深化科研改革。依据军事实践需求的新变化,适时调整学科布局。在注重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把主要力量投入到现实问题研究的“主战场”;加强跨领域、跨学科综合性研究,注重发挥科研力量的整体优势;建立和完善法规制度,使科研工作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⑤抓好科研队伍建设。军事科学的创新与发展,关键是要有优秀人才。采取多种方式提高科研队伍的整体素质,在科研实践中选拔、培养学科带头人,造就一批在军内外有影响的军事科研名人名家。⑥营造良好科研环境。积极倡导和开展学术民主和学术争鸣,广泛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积极改善科研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激励和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推出能够促进理论发展和实际需要的科研成果。

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对军事科学院的建设非常重视,都对加强军事科学研究工作作过许多重要指示,邓小平、江泽民先后多次到院视察并题词,这是军事科学院不断发展的重要因素。面对新世纪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军事科学院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继往开来,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推出更多的高质量科研成果,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军事人才,为创新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科学而奋发努力,为确保国家的安全和赢得未来战争的胜利作出应有的贡献。

(刘继贤)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of the CPLA)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军事学府。直属中央军委领导。

国防大学的前身是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1985年12月24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将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合并,成立国防大学。其基本任务是培养陆军、海军、空军、第二炮兵和武警部队集团军(军)以上军事、政治、后勤、装备指挥军官,集团军(军)以上机关高级参谋人员,军队高级理论研究人员和地方省以上政府有关部门领导,并从事有关战略、国防和军队建设问题的研究,为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四总部的决策提供咨询。在该校先后任校长的有张震、朱敦法、邢世忠;先后任政治委员的有李德生、张震(1990. 4~1992. 10 兼任)、李文卿、王茂润、赵可铭。

该校行政管理机构设有训练部、政治部、科研部、校务部和校办公室。教学科研机构设有战略、战役、军队指挥、军兵种、马克思主义理论、外军、后勤、科技、外语、外训等13个教研室和科研部所属的战略、军队建设、马克思主义三个研究所,以及出版社、杂志社等。杂志社编辑出版校刊《国防大学学报》。学员培训管理机构设有国防研究系、基本系、进修系、研究生院和外国留学生系。

该校在教学和科研中,涉及的学科门类比较齐全,主要包括军事思想、军事历史、战略、战役、军队指挥、军队政治工作、军队后勤、哲学、法学、教育学、应用经济学、政治学等。其中,战略学、战役学、军队指挥学、军队政治工作学是其教学科研的重点学科;作战模拟中心是其教学科研的重点实验室。

学校的教学指导思想是:高举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贯彻江泽民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坚持改革创新的精神,坚持“高、新、宽、深”的教学内容,坚持自学为主,实行研究式、启发式、开放式的教学方法,加强以教学和科研为中心的全面建设,培养政治上合格、适应国防现代化建设和打赢高技术局部战争要求的复合型高级军事人才。

该校的教学研究,突出高层次、综合性和开放性。课程设置力求起点高、内容新、知识面宽和专业研究深,学员队实行混合编班,统一施训,使学员不仅懂得军事、政治、后勤、装备,而且还懂得经济、外交和必需的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学校的教学实行在教员指导下,学员独立思考、自学研究为主的方法,努力培养学员的科学管理、宏观决策、指挥谋略等能力。学校对国内外开放,积极开展学术交流,力求把最新信息、最新科研成果用于教学。

建校十多年来,国防大学已初步形成了一支数量较多、水平较高的教研队伍,现有教研人员483名,其中教授87名、副教授163名,博士生导师25名、硕士生导师120名。每年培训在校学员1000名左右。迄今已为全军培养了近万名高级指挥员、高级参谋人员和高级理论研究人员,并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几十个友好国家培养了400多名中高级军官。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学校还积极开展军事理论研究,多次完成国务院、中央军委和总部赋予的重大科研任务,先后出版理论专著1000多部,完成咨询报告120多份,发表学术论文7000多篇,开发计算机软件100多套,其中有100余项科研成果获得国家级、军队级奖励。

进入21世纪,国防大学将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发扬传统,改革创新,博采众长,大力推进教学科研的“五个新进展”,即在学习运用邓小平理论上取得新进展,在学习运用高科技知识上取得新进展,在研究把握战略全局上取得新进展,在研究把握联合战役组织指挥上取得新进展,在研究把握新形势下治军特点规律上取得新进展;努力抓好“四项基础工程”,即以建设高素质专家群体和领导班子为主的“人才工程”,以质量高、内容新为标志的“教材工程”,以广泛应用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模拟和网络工程”,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为目的的“乐业工程”,把国防大学建设成为军事理论的创新基地,复合型高级军事人才的培养基地,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咨询基地,军事政治理论信息交流和军事教育协作中心,成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最高军事学府。

(罗光明)

中国军事科学学会 (The China Association for Military Science)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注册登记的研究军事科学的高层次群众性学术团体。1991年1月在北京成立,挂靠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名誉会长为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刘华清上将,历任会长为蒋顺学中将、赵南起上将、徐惠滋上将、刘精松上将、王祖训上将、葛振峰中将。

中国军事科学学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和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论述为指导,以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为依据,贯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联络、团结军内外军事科研力量,广泛开展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国际战略形势、军事战略、战役战术、军队建设、军事历史、外军建设与作战

理论、军事运筹、军队管理、军事制度、中国古代兵法及军事辞书等方面的群众性学术研究,组织国内外军事学术交流与协作,宣传和推广军事科研成果,以促进中国军事科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

中国军事科学学会荟萃了全国全军著名军事科学理论专家、学者以及一大批学有专长的专业和业余军事科研工作者。学会由中央军委、总部和全军各大单位领导担任主要领导,由十余名德高望重、在国家和军队及科研战线上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为中国军事科学研究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老将军担任高级顾问,由各职能部门分管学术研究工作的领导和学术带头人担任常务理事,由军事学各学科、各专业学术造诣深、学术成果显著的专家学者担任学会理事,吸收具有较强学术研究能力、并有优良学术研究成果的研究人员为会员。目前,有团体会员44个,个人会员500余名。会员中既有中央军委、总部领导机关的工作人员,又有全军主要院校、部队和科研单位的教研人员和干部,既有从事军事科学研究的专业人员,又有在职的业余研究人员和离退休老干部,使学会在学术研究上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和广泛的代表性。

中国军事科学学会成立以来,根据国际战略形势的发展,现代军事技术的进步,新时期国防建设、军队建设和作战的需要,组织了一系列学术活动,推出了一大批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先后主办或与其他单位联合举办了“海湾战争系列研讨会”、“邓小平新时期国防建设军队建设理论研讨会”、“苏联解体后世界主要国家军事战略调整及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影响座谈会”、“第三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叶剑英学术讨论会”、“刘伯承军事理论研讨会”、“纪念甲午战争100周年学术研讨会”、“全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邓小平新时期军事经济理论研讨

会”、“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学术报告会”、“高技术局部战争联合战役研究笔会”、“邓小平军事改革思想研讨笔会”、“纪念叶剑英诞辰 100 周年学术报告会”、“学习邓小平理论,探讨新形势下治军特点和规律研讨笔会”等十几个大型学术会议,党、国家和军队的许多领导人,地方一些科研单位以及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都分别出席了这些会议,各种媒体作了大量报道,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1994 年与有关学术团体和新闻单位联合举办了全国国防知识竞赛活动;1997 年组织开展了全军性庆祝建军 70 周年“党的三代领导集体与军队质量建设”主题征文活动。通过上述学术活动,编辑出版了《邓小平新时期国防建设军队建设理论研究》、《党的三代领导集体与军队质量建设》等十余本论文集。一些研究成果对有关部门进行决策起到了积极的咨询作用。中国军事科学学会作为全国性的学

术团体,组织各方面的军事科研力量,广泛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对军事科研工作的全面深入发展,完成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以及作战对军事科学提出的新任务,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日益成为联系广大专业和业余研究者的桥梁和纽带,成为捍卫与发展无产阶级军事科学的坚强阵地,成为培养军事科研人才的摇篮。

中国军事科学学会会刊为《中国军事科学》,由中国军事科学学会与军事科学院合办,大型军事理论期刊,国内外公开发行。该刊连续多年重点地开展了“战略与思想文化”、“中国军事近代化”、“海洋与中国海防”、“学习邓小平军事理论,加强军队质量建设”、“中国军事社会学与新时期的军队建设”等一系列“主题讨论”,推出了大批学术研究成果,扶持了许多学术骨干,在国内外具有较大影响,曾经获得全国首届优秀社会科学期刊奖。

(任连生)

条目汉语拼音索引

说明 本索引按条目标题第一个字的音序编排,第一个字同音者,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或第一、二、三、四声)的声调顺序编排;同音同调者,按第二个字的音调顺序编排,如此类推。

B

八路军军史研究	534
北伐战争史研究	522
兵种战术研究	243
部队训练研究	309

C

陈赓的军事思想	62
陈毅的军事思想	46

D

弹道学研究	445
弹药研究	478
《当代中国》丛书国防军事卷	609
导弹技术研究	454
德国军事思想研究	132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	28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	564
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研究	561
电子对抗技术研究	500
对策论研究	270

E

恩格斯军事理论研究	6
-----------------	---

F

防核、化学、生物武器技术研究	488
防御战术研究	236
防御战役研究	214

G

高技术战争后勤研究	405
高技术战争研究	166
各战略区反“扫荡”作战研究	546
国防费研究	410
国防经济学研究	329
国防科学技术研究	430
国防体制研究	283
国防战略研究	194

H

海军地理研究	533
海军后勤研究	393
海军技术研究	461
海军军制研究	288
海军战略研究	178
海军战术训练研究	324
海军战术研究	239
海军战役训练研究	313
海军战役研究	219
海军作战指挥理论研究	251
海湾战争研究	574
海战法研究	353
合同战术研究	233
核武器研究	452
核战略研究	191
核战争研究	168
贺龙的军事思想	45
黄克诚的军事思想	60
黄兴的军事思想	127

火药研究 474

J

蒋百里的军事思想 127

蒋介石的军事思想 128

解放战争史研究 547

进攻战术研究 234

进攻战役研究 212

局部战争研究 172

决策分析研究 272

军队财务研究 408

军队干部工作研究 372

军队管理研究 295

军队后勤体制研究 397

军队建设研究 198

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 366

军队卫生勤务研究 414

军队文化工作研究 376

军队物资勤务研究 418

军队营房勤务研究 424

军队油料勤务研究 420

军队院校教育研究 307

军队政法工作研究 374

军队指挥理论著作 257

军队指挥学研究 245

军队组织工作研究 368

军事测绘研究 592

军事大地测量研究 595

军事地理研究 577

军事地图制图研究 596

军事地形研究 591

军事法学研究 335

军事法制理论研究 339

军事航空气象研究 605

军事航天技术研究 506

军事后勤法研究 400

军事后勤管理研究 398

军事后勤史研究 401

军事后勤学术刊物 430

军事后勤研究 386

军事后勤研究机构 429

军事后勤指挥研究 407

军事化学防护研究 491

军事计量研究 450

军事交通研究 426

军事立法研究 341

军事模型与模拟研究 269

军事气象信息工程研究 604

军事气象研究 597

军事情报学研究 259

军事情报整编学研究 262

军事人才学研究 384

军事认识论研究 77

军事司法研究 345

军事思维研究 80

军事通信技术研究 497

军事问题决策优化研究 268

军事问题影响因素量化研究 267

军事系统工程研究 510

军事心理学研究 383

军事行政执法研究 343

军事学术刊物 357

军事学术研究 150

军事学术研究机构 358

军事训练学研究 304

军事医学研究 416

军事运筹学研究 263

军事哲学思想史研究 86

军事哲学研究 71

军事侦察研究 260

军事制度史研究 292

军事装备维修研究 428

军械勤务研究 422

军需勤务研究 412

军用标准化研究 448

军用大气探测研究 599

军用电子计算机研究 494

军用电子技术研究 492

军用光学和光电子技术研究 504

军用雷达技术研究 502

军用能源研究	509
军用人工影响天气研究	603
军制基础理论研究	279
军制学研究	275

K

抗美援朝战争史研究	553
抗日战争敌后战场作战史研究	545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史研究	525
空军地理研究	585
空军后勤研究	395
空军技术研究	467
空军军制研究	290
空军战略研究	186
空军战术训练研究	326
空军战术研究	241
空军战役法研究	222
空军战役学研究	221
空军战役训练研究	315
空军作战指挥理论研究	252

L

雷达气象研究	602
李先念的军事思想	56
联合战役研究	210
联合作战指挥理论研究	249
列宁军事理论研究	11
刘伯承的军事思想	43
陆军军制研究	285
陆军战术训练研究	321
陆军战术研究	237
陆军战役研究	217
罗荣桓的军事思想	48
罗瑞卿的军事思想	68

M

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研究	570
马克思军事理论研究	1
毛泽东军事思想	19
美国军事思想研究	147

N

南方八省红军三年游击战争史研究	542
聂荣臻的军事思想	50

P

彭德怀的军事思想	42
----------------	----

Q

轻武器研究	481
-------------	-----

R

日本军事思想研究	142
----------------	-----

S

射击学研究	443
世界军事地理研究	587
世界战争史研究	557
司令部工作研究	255
斯大林军事理论研究	14
苏联军事思想研究	139
粟裕的军事思想	57
孙中山的军事思想	126
《孙子》研究	100

T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史研究	519
谭政的军事思想	63
特种作战研究	207
天气预报理论与技术研究	600
统筹法研究	274
土地革命战争史研究	536

W

外国军事法研究	355
外国军制研究	294
外军后勤研究	403
晚清军事思想研究	106
王树声的军事思想	69

网络分析研究	271
卫星气象研究	601
武器射击运筹理论研究	269

X

萧劲光的军事思想	65
新四军军史研究	535
徐海东的军事思想	59
徐向前的军事思想	49
许光达的军事思想	70

Y

杨杰的军事思想	129
杨尚昆的军事思想	55
叶剑英的军事思想	52
叶挺的军事思想	53
印度军事思想研究	145
英国军事思想研究	135
袁世凯的军事思想	125

Z

炸药研究	475
战后局部战争史研究	567
战略导弹部队后勤研究	396
战略导弹部队战术训练研究	327
战略导弹部队战术研究	242
战略导弹部队战役学研究	224
战略导弹部队战役训练研究	317
战略导弹部队战役研究	225
战略导弹部队作战指挥理论研究	254
战略地理研究	579
战略后勤研究	389
战略学研究	157
战略研究	176
战略研究著作	202
战区军事地理研究	586
战时政治工作研究	378
战术地理研究	582

战术后勤研究	392
战术学研究	227
战术训练研究	319
战术研究	230
战术研究著作	244
战役地理研究	581
战役后勤研究	390
战役学研究	203
战役训练研究	311
战役研究	206
战役研究著作	226
战争动员研究	300
战争法研究	351
战争研究	161
张云逸的军事思想	66
中国边疆军事地理研究	588
《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	606
中国工农红军反“围剿”作战史研究	539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研究	89
中国近代战争史研究	515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	607
中国军事法制史研究	347
中国军事科学学会	615
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	511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	614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研究	530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611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	610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研究	380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研究	359
中国人民志愿军军史研究	550
中国周边国家军事地理研究	589
中华民国军事思想研究	118
周恩来的军事思想	38
朱德的军事思想	40
装甲兵技术研究	484
作战指挥理论研究	247

条目汉字笔画索引

说明 本索引按条目标题第一个字的笔画数顺序编排;第一个字笔画数相同者,按笔形“一(横)、丨(竖)、丿(撇)、丶(点)、一(折)”的顺序编排;以同一个字开头者,按第二个字笔画数顺序编排,如此类推;如条目标题以拉丁字母或阿拉伯数字开头,则依次排在本索引最后部分。

二 画

八路军军史研究 534

三 画

土地革命战争史研究 536

卫星气象研究 601

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研究 570

马克思军事理论研究 1

四 画

王树声的军事思想 69

天气预报理论与技术研究 600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史研究 519

日本军事思想研究 142

中华民国军事思想研究 118

中国人民志愿军军史研究 550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研究 530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611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 610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 614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研究 380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研究 359

中国工农红军反“围剿”作战史研究 539

《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 606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研究 89

中国边疆军事地理研究 588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 607

中国军事法制史研究 347

中国军事科学学会 615

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 511

中国近代战争史研究 515

中国周边国家军事地理研究 589

毛泽东军事思想 19

火药研究 474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 28

五 画

世界军事地理研究 587

世界战争史研究 557

北伐战争史研究 522

叶挺的军事思想 53

叶剑英的军事思想 52

电子对抗技术研究 500

印度军事思想研究 145

外军后勤研究 403

外国军事法研究 355

外国军制研究 294

司令部工作研究 255

对策论研究 270

六 画

列宁军事理论研究 11

《当代中国》丛书国防军事卷 609

网络分析研究 271

朱德的军事思想 40

合同战术研究 253

各战略区反“扫荡”作战研究 546

刘伯承的军事思想 43

决策分析研究 272

军队干部工作研究	372	军事后勤法研究	400
军队卫生勤务研究	414	军事后勤研究	386
军队文化工作研究	376	军事后勤研究机构	429
军队后勤体制研究	397	军事后勤指挥研究	407
军队财务研究	408	军事后勤管理研究	398
军队物资勤务研究	418	军事行政执法研究	343
军队油料勤务研究	420	军事交通研究	426
军队建设研究	198	军事问题决策优化研究	268
军队组织工作研究	368	军事问题影响因素量化研究	267
军队政法工作研究	374	军事运筹学研究	263
军队指挥学研究	245	军事医学研究	416
军队指挥理论著作	257	军事系统工程研究	510
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	366	军事制度史研究	292
军队院校教育研究	307	军事侦察研究	260
军队营房勤务研究	424	军事学术刊物	357
军队管理研究	295	军事学术研究	150
军用人工影响天气研究	603	军事学术研究机构	358
军用大气探测研究	599	军事法制理论研究	339
军用电子计算机研究	494	军事法学研究	335
军用电子技术研究	492	军事思维研究	80
军用光学和光电子技术研究	504	军事测绘研究	592
军用标准化研究	448	军事哲学研究	71
军用能源研究	509	军事哲学思想史研究	86
军用雷达技术研究	502	军事航天技术研究	506
军事人才学研究	384	军事航空气象研究	605
军事大地测量研究	595	军事通信技术研究	497
军事气象研究	597	军事情报学研究	259
军事气象信息工程研究	604	军事情报整编学研究	262
军事化学防护研究	491	军事装备维修研究	428
军事计量研究	450	军事模型与模拟研究	269
军事认识论研究	77	军制学研究	275
军事心理学研究	383	军制基础理论研究	279
军事立法研究	341	军械勤务研究	422
军事训练学研究	304	军需勤务研究	412
军事司法研究	345	许光达的军事思想	70
军事地形研究	591	导弹技术研究	454
军事地图制图研究	596	防核、化学、生物武器技术研究	488
军事地理研究	577	防御战术研究	236
军事后勤史研究	401	防御战役研究	214
军事后勤学术刊物	430	《孙子》研究	100

孙中山的军事思想 126

七 画

进攻战术研究 234

进攻战役研究 212

苏联军事思想研究 133

杨杰的军事思想 129

杨尚昆的军事思想 55

李先念的军事思想 56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史研究 525

抗日战争敌后战场作战史研究 545

抗美援朝战争史研究 553

兵种战术研究 243

作战指挥理论研究 247

局部战争研究 172

张云逸的军事思想 66

陆军军制研究 285

陆军战术训练研究 321

陆军战术研究 237

陆军战役研究 217

陈赓的军事思想 62

陈毅的军事思想 46

八 画

武器射击运筹理论研究 269

英国军事思想研究 135

国防体制研究 283

国防经济学研究 329

国防战略研究 194

国防科学技术研究 430

国防费研究 410

罗荣桓的军事思想 48

罗瑞卿的军事思想 68

周恩来的军事思想 38

空军地理研究 585

空军后勤研究 395

空军军制研究 290

空军技术研究 467

空军作战指挥理论研究 252

空军战术训练研究 326

空军战术研究 241

空军战役训练研究 315

空军战役学研究 221

空军战役法研究 222

空军战略研究 186

九 画

南方八省红军三年游击战争史研究 542

轻武器研究 481

战区军事地理研究 586

战术训练研究 319

战术地理研究 582

战术后勤研究 392

战术学研究 227

战术研究 230

战术研究著作 244

战后局部战争史研究 567

战争动员研究 300

战争法研究 351

战争研究 161

战时政治工作研究 378

战役训练研究 311

战役地理研究 581

战役后勤研究 390

战役学研究 203

战役研究 206

战役研究著作 226

战略地理研究 579

战略后勤研究 389

战略导弹部队后勤研究 396

战略导弹部队作战指挥理论研究 254

战略导弹部队战术训练研究 327

战略导弹部队战术研究 242

战略导弹部队战役训练研究 317

战略导弹部队战役学研究 224

战略导弹部队战役研究 225

战略学研究 157

战略研究 176

战略研究著作 202

美国军事思想研究 147

炸药研究	475
贺龙的军事思想	45
统筹法研究	274

十 画

袁世凯的军事思想	125
聂荣臻的军事思想	50
核武器研究	452
核战争研究	168
核战略研究	191
恩格斯军事理论研究	6
特种作战研究	207
射击学研究	443
徐向前的军事思想	49
徐海东的军事思想	59
高技术战争后勤研究	405
高技术战争研究	166
部队训练研究	309
海军地理研究	583
海军后勤研究	393
海军军制研究	288
海军技术研究	461
海军作战指挥理论研究	251
海军战术训练研究	324
海军战术研究	239
海军战役训练研究	313
海军战役研究	219
海军战略研究	178
海战法研究	353
海湾战争研究	574

十一画

黄兴的军事思想	127
黄克诚的军事思想	60
萧劲光的军事思想	65
晚清军事思想研究	106
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研究	561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	564
弹药研究	478
弹道学研究	445

十二画

彭德怀的军事思想	42
斯大林军事理论研究	14
联合作战指挥理论研究	249
联合战役研究	210
蒋介石的军事思想	128
蒋百里的军事思想	127
粟裕的军事思想	57
装甲兵技术研究	484

十三画

雷达气象研究	602
解放战争史研究	547
新四军军史研究	535

十四画

谭政的军事思想	63
---------------	----

十五画

德国军事思想研究	132
----------------	-----

条目标题主题词索引

说明 本索引编排顺序参照“条目汉语拼音索引”;没有条目的主题词用黑体字,未设条目的主题词用仿宋体。

A

岸舰导弹研究 459 右
奥克托今生产工艺 475 右

B

《八路军敌军工作史》 535 左
《八路军各级司令部(军、师、旅、团)暂行工作条例(草案)》 255 右
八路军军史研究 534 左
八路军军事战略转变问题研究 545 右
八路军史料丛书 534 右
“八一三”淞沪会战研究 122 左
“八一”式步枪 482 左
巴黎和会问题研究 563 左
白崇禧 163 右
白寿彝 512 右
《败后宣战与乘胜即收——试论清政府在马尾、镇南关战役后的策略》 111 右
《北伐军两湖战场作战特点》 121 右
北伐战争领导权问题研究 525 左
北伐战争上下限问题研究 524 右
北伐战争史研究 522 右
北伐战争战略问题研究 121 右
北洋政府时期的国防科技 432 左
北洋政府时期的海军技术研究 462 左
北洋政府时期的空军技术研究 467 右
北约的“前沿防御”战略 134 右
“奔袭建宁”问题研究 541 右
《兵法史略学》 204 左
兵学范畴研究 99 左

兵学流派研究 99 左
《兵要地理》 577 左,581 右,586 右,589 左
《兵要地学》 586 右,590 右
兵员动员研究 301 右
兵种战术学 229 右
兵种战术研究 243 右
丙一轰炸机 468 左
部队训练研究 309 右

C

蔡锷的军事思想研究 117 左
《蔡锷军事思想研究》 117 右
蔡和森 19 右
蔡美彪 512 右
《曹操》 95 右
曹操的军事思想研究 95 右
曹汀 6 左
层状云数值模式 604 左
掺钛蓝宝石可调谐激光晶体 506 左
长城抗战研究 122 左
“长征”1号核潜艇 465 左
长征1号运载火箭 507 左
长征2号系列运载火箭 507 右
长征2号运载火箭 507 左
长征3号系列运载火箭 507 右
长征3号运载火箭 507 左
长征4号甲运载火箭 507 左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 507 右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研制 442 左
常规武器装备研制 437 左
超导磁体 509 右
超导电机 509 右

超导技术研究 509 右
超高性能计算机技术研究 494 右
超级计算机 494 右
晁错的军事思想研究 98 左
《朝鲜战场对美军作战的几个战术问题》 553 右
陈独秀北伐观研究 525 左
陈赓 62 左
陈赓的军事思想 62 左
陈绍宽 288 右,584 左
陈望道 1 左
陈毅 46 右
陈毅的军事思想 46 右
成吉思汗的军事思想研究 97 右
持久胜敌的经济理论 331 左
持久消耗战略研究 123 左
《筹海军刍议》 288 左
《筹海图编》研究 94 左
《筹海图编浅说》 94 左
初教 5 教练机 470 右
穿甲机理研究 447 左
穿甲技术研究 479 右
创伤弹道学研究 447 左
《从第一次直奉战争看吴佩孚的军事谋略》 119 左
《从怀庆之战看太平军的战法》 111 左
催化模拟研究 604 左

D

大规模并行处理体系结构计算机 495 左
单体炸药研究 476 右
弹道学研究 445 左
弹道研究所 445 右
弹药结构、材料及加工技术研究 481 左
弹药设计理论和方法研究 480 右
弹药系统设计研究 480 右
弹药研究 478 左
弹药制导技术研究 480 左
氮当量公式 476 右
当代日本军事思想 143 右
《当代世界军事与中国国防》 197 左
《当代中国》丛书国防军事卷 609 左

《当代中国·抗美援朝战争》 551 右,555 右
导弹核潜艇研制 439 右
导弹核武器试验 437 右
导弹技术研究 454 左
德国的战争观 133 右
德国建军指导思想 134 右
德国军事法研究 356 左
《德国军事思想》 132 右
德国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133 左
德国军事思想研究 132 左
德国军事战略思想 134 左
德国作战指导思想 135 左
《德意志军事思想研究》 132 右
邓小平 165 右,182 右,284 右,287 左,28 左,72 右
邓小平的国防经济理论 332 左
邓小平国防建设思想 30 左
邓小平新时期国防战略理论研究 196 右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 28 左,154 左
邓小平新时期军制理论 277 右
低空、超低空地空导弹研究 457 右
低温度发射药技术 474 右
低阻航弹弹道理论研究 447 右
敌后战场战略反攻问题研究 546 左
底部排气技术研究 480 左
地地导弹研究 456 右
地方实力派部队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
问题研究 529 左
地(舰)空导弹研究 457 左
地下通信技术研究 499 右
《地形与军事》 591 右
《第二次世界大战》 566 左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日本军事思想 143 左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 564 右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 558 右
《第五次反“围剿”的新战略及其“功效”》 121 右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原因问题研究 561 右
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国数量问题研究 564 左
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研究 561 左
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与地位问题研究 563 右
第一代舰艇 440 左

电磁炮 510 左
电能设施与装备研究 509 右
电热化学炮 509 右
电子对抗技术研究 500 右
电子对抗侦察技术研究 501 左
电子防御技术研究 502 左
电子干扰技术研究 501 右
叠氮聚醚推进剂 475 左
丁羟复合推进剂 475 左
丁日昌的军事思想研究 116 左
定向能束输电法 509 右
《东北边防辑要》 580 左
东方红系列通信卫星 508 左
董问樵 411 左
杜牧的军事思想研究 98 左
端羟基聚丁二烯推进剂 474 右
对策论研究 270 右
对称式多处理体系结构计算机 495 左
《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
几个问题的探讨》 165 左
多用途反舰导弹研究 460 左

E

俄罗斯联邦军事法研究 356 右
《恩格斯对无产阶级军事理论的伟大贡献》 7 左
恩格斯军队理论 9 右
《恩格斯军事理论》 8 左
恩格斯军事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8 左
恩格斯军事理论研究 6 左
恩格斯论科学技术与军事的关系 10 右
恩格斯武装起义理论 10 左
恩格斯战争观 9 右
恩格斯作战指导理论 10 左

F

发射场技术 508 右
发烟弹技术研究 480 右
《反杜林论》 9 左
反辐射摧毁技术研究 502 左
反舰导弹研究 459 左

反坦克导弹研究 460 右
反坦克、防空降和空中格斗等战斗方法
研究 232 左
反坦克武器系统工程试点小组 510 右
反侦察和反干扰作战中的空军战术研究 241 右
返回式遥感卫星 507 右
范蠡的军事思想研究 97 左
《范蠡与孙武战略思想的比较》 97 左
范仲淹的军事思想研究 98 左
《范仲淹军事思想初探》 98 左
防毒面具研究 489 右
防毒时间计算方程 489 右, 491 右
防核、化学、生物武器技术研究 488 左
《防卫计划大纲》 143 右
防御战斗 229 左
防御战术研究 236 左
防御战役研究 214 右
飞潜学校 462 右
分队战术模型 270 左
分析实验室 491 右
风洞(清华大学) 468 右
风洞(中央大学) 468 右
风云系列气象卫星 508 左
冯玉祥的军事思想研究 119 右
弗里德里希二世 135 左
辐射雾数值模式 604 左
复合型人才观 309 左

G

改性梯恩梯 477 右
《干部问题研究提纲》 372 左
杆式(钨、钍合金)穿甲弹设计理论 480 右
高德隆式飞机 467 右
高分子粘结炸药 477 右
高技术局部战争概念 175 左
高技术局部战争特点 175 右
高技术局部战争条件下国防经济理论研究 334 左
高技术条件下后勤保障环境理论 406 右
高技术条件下后勤立体保障理论 406 右
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基本规律 175 右

- 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战略指导基本原则 176 左
- 高技术条件下联合作战后勤理论 406 右
- 《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八六三”计划)纲要》 441 左
- 高技术战争后勤研究 405 右
- 高技术战争研究 166 右
- 《高技术战争与军事地理》 582 右
- 高能硝酸发射药 474 左
- 高能注装炸药 477 右
- 《革命方略》 162 右
- 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理论 331 左
- 革命战争时期的北伐战争史研究 522 右
- 革命战争时期的部队训练研究 310 右
- 革命战争时期的防御战术研究 236 右
- 革命战争时期的国防体制研究 283 右
- 革命战争时期的后勤指挥研究 407 左
- 革命战争时期的军队干部工作研究 372 左
- 革命战争时期的军队管理研究 296 右
- 革命战争时期的军队建设研究 199 左
- 革命战争时期的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 366 右
- 革命战争时期的军队文化工作研究 376 右
- 革命战争时期的军队院校教育研究 308 左
- 革命战争时期的军队政法工作研究 375 左
- 革命战争时期的军队指挥理论研究 246 左
- 革命战争时期的军队组织工作研究 369 左
- 革命战争时期的陆军军制研究 286 左
- 革命战争时期的陆军战术训练研究 323 左
- 革命战争时期的外国军事法研究 355 右
- 革命战争时期的卫勤研究 414 右
- 革命战争时期的战略研究 177 左
- 革命战争时期的战时政治工作研究 378 右
- 革命战争时期的战役训练研究 312 左
- 革命战争时期的战争动员研究 301 左
- 革命战争时期的战争经济研究 330 右
- 革命战争时期的战争研究 163 右
- 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研究 530 右
- 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研究 380 右
- 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的军制学研究 276 左
- 各战略区反“扫荡”作战研究 546 左
- 《给养勤务》 412 左
- 古代日本军事思想 142 右
- 占德里安 134 右
- 固体地地战略导弹研究 456 左
- 固体推进剂导弹研究 456 左
- 固体推进剂潜地战略导弹研究 456 左
- 关吉玉 329 右,410 右
- 《关于八路军的供给工作和供给制度》 386 右
- 《关于编写我军战史情况及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 537 右
- 《关于部队的文艺工作》 377 左
- 《关于曹操军事才能的评价问题》 95 右
- 《关于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军队思想政治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 363 右
- 《关于革命军人委员会(即战委会)条例草案》 377 左
- 《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决定》 469 左
- 《关于加强军队管理教育工作的决定》 299 左
- 《关于加强连队管理教育工作问题》 298 右
- 《关于军队干部教育的指示》 372 右
- 《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 381 左
- 《关于捻军起义的作战方法问题》 111 左
- 《关于“农民政权”问题》 513 右
- 《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 363 右
- 《关于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科技工作安排的报告》 436 左
- 《关于镇南关大捷在中法战争中的战略地位问题》 111 右
-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377 左
-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中的皇权主义问题》 513 右
- 《关于中国近代战争的经验和教训》 109 左
- 《关于总结朝鲜作战经验问题》 553 右
- 《关于组织战斗》 255 右
- 《关注与超越——中国近代军事变革论》 115 右
- 《〈管子〉的国防思想》 95 左
- 《〈管子〉军事思想初探》 95 左
- 《管子》研究 94 右
- 光波传播、目标与背景光学特性研究 506 左

光纤技术研究 505 右
光学材料研究 505 右
《规定制式兵器刍议》 422 右
郭化若 101 左
郭沫若 513 左
国防部第七研究院 464 右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454 左
国防部舰艇研究院 464 右
《国防法概论》 342 右
《国防费概论》 411 左
国防费研究 410 右
《国防计划》 186 右
国防建设的国际战略环境 197 左
国防建设理论研究 197 左
国防经济发展战略理论研究 333 右
国防经济基本理论研究 333 左
《国防经济论》 411 左
国防经济史研究 334 右
国防经济思想史研究 334 右
国防经济学研究 329 左
国防科工委 439 左
国防科技发展研究 431 左
国防科技基础研究 431 左
国防科技应用研究 431 左
国防科学技术研究 430 右
《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十年(一九五八~
一九六七)规划纲要》 469 右
《国防论》 163 右
国防体制基础理论研究 281 右
《国防体制教程》 282 左
国防体制研究 283 左
国防通信网 499 左
国防通信网建设理论与应用研究 498 左
国防战略基本内涵 196 右
国防战略研究 194 左
国防政策研究 197 左
《国家军用标准体系表》 449 左
《国家军制学》 280 右
国民党军“围剿”中国工农红军的战略问题
研究 121 右

国民党空军战役训练研究 316 左
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国防科技 432 右
国民党政府时期的空军技术研究 468 左
《国民革命军及军事政治工作》 378 右
国民经济动员研究 334 左
国民政府的抗日准备问题研究 527 右
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 436 左

H

海军的暴力运用 184 左
海军的暴力运用与非暴力运用理论 184 左
海军的非暴力运用 184 左
海军地理研究 583 右
《海军法规》 353 右
海军飞机工程处 462 右
《海军国际法手册》 354 左
《海军国际法问题论文选编》 354 右
《海军后勤学术研究》 430 左
海军后勤研究 393 右
海军技术研究 461 右
海军军制研究 288 左
海军试验基地 459 左
海军战略地位与性质 183 右
海军战略研究 178 右
海军战术学 229 右
海军战术训练研究 324 右
海军战术研究 239 右
《海军战役学教程》 582 左
《海军战役训练守则》 314 右
海军战役训练研究 313 右
海军战役研究 219 右
《海军制度之理论与实际》 180 右
海军作战方针 183 右
海军作战指挥理论研究 251 左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 180 右
《海上兵要地理》 584 左
《海上权力论》 180 右
海湾战争对地区与国际形势的影响问题
研究 576 右
海湾战争起因研究 574 右

- 海湾战争双方胜败原因研究 576 左
- 海湾战争研究 574 右
- 海湾战争作战特点研究 575 左
- 海鹰1号岸舰导弹 459 右
- 海鹰1号舰舰导弹 459 右
- 海鹰2号岸舰导弹 459 右
- 海战法的案例 354 右
- 海战法的概念 354 左
- 海战法的应用 354 右
- 海战法的主要内容 354 左
- 海战法研究 353 左
- 《海战新义》 179 右
- 航空救国 186 左
- 《航空气象学》 606 左
- 航天测控技术 508 右
- 航天测控技术研究 442 左
- 航天测控网 508 右
- 航天技术研究 442 左
- 航天器发射场建设 442 左
- 航天器运载技术 507 右
- 航天信息应用技术 508 右
- 合成军队群防装备 490 左
- 《合成军队指挥学》 257 右
- 合同战术学 229 右
- 合同战术训练模拟系统 270 左
- 合同战术研究 233 左
- 《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 381 左
- 核防护技术研究 489 右
- 核防护技术装备野战生存能力和使用性能试验
489 右
- 《核化生防护地理与气象》 578 右
- 核、化学、生物武器医学防护研究 417 左
- 核军控核裁军问题研究 193 左
- 核能设施与装备研究 510 左
- 核试验辐射安全防护技术研究 489 左
- 核威慑理论研究 193 右
- 核武器技术研究 439 右
- 核武器研究 452 左
- 核战略基本理论研究 192 左
- 核战略研究 191 右
- 核战争的基本样式 169 右
- 核战争的实施 170 左
- 核战争的特点 169 右
- 核战争的种类 169 右
- 核战争前景预测 171 左
- 核战争问题研究 193 右
- 核战争研究 168 右
- 核战争与政治的关系 170 右
- 贺龙 45 左
- 贺龙的军事思想 45 左
- 轰6轰炸机 470 右
- 红箭73型反坦克导弹 461 左
- 红军长征中的“密电”问题研究 533 右
- 《红军第四军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536 右
- 《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共中央的信》 218 左
- 《红军改编的意义和今后工作报告大纲》 380 右
- 红军游击区称谓问题研究 544 右
- 红军游击区数量问题研究 544 左
- 《红军在新阶段的新问题与新工作——我们的
意见》 380 右
- 红旗1号地空导弹 457 左
- 红旗7号地空导弹 457 右
- 红旗61号甲低空地空导弹 457 右
- 红旗61号舰空导弹 457 左
- 红旗系列中高空地空导弹 457 左
- 红外技术研究 505 右
- 红外寻的制导导弹研究 458 右
- 红外诱饵药剂研究 480 右
- 红卫5号地空导弹 457 右
- 红一方面军军史编辑委员会 536 右
- 红缨5号地空导弹 458 左
- 侯外庐 512 右
- 后备力量建设基础理论研究 282 左
- 《后勤科技装备》 430 右
- 《后勤历史资料选编》 402 左
- 《后勤学术》 430 左
- 胡林翼的军事思想研究 115 左
- 《胡林翼战略战术指导与湘军战局》 115 左
- 《华北地方实力派抗日态度之比较研究》 529 左
- 化学防护技术研究 490 左

化学能设施与装备研究 510 左
华罗庚 274 右
《华岳〈翠微北征录〉考索》 94 左
黄海海战中清军战术研究 112 右
黄克诚 60 右
黄克诚的军事思想 60 右
《黄石公三略》的成书时间和思想内容研究 93 右
《黄石公三略浅说》 93 右
黄兴 127 左
黄兴的军事思想 127 左
《回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 544 左
混合炸药研究 477 左
《活动网络分析》 272 左
火箭推力偏心试验 480 左
火箭增程技术 480 左
火炮护卫舰 465 左
火药研究 474 左

J

机载计算机研究 497 左
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 32 左
“积极防御,近海作战”的海军作战方针 183 左
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研究 197 左
积云数值模式 604 左
激光技术研究 505 左
《集团军战役讲授提纲》 221 右
集团军战役训练对抗模拟系统 270 右
计算弹道学研究 447 右
计算机电磁兼容能力研究 496 左
计算机防护能力研究 496 左
计算机工作温度拓宽研究 495 右
计算机抗冲击震动能力研究 496 左
计算机系统可维修性研究 496 左
《稷下兵家及其哲学思想初探》 94 右
《加伦与北伐战争的胜利》 121 右
《甲午海战与晚清海防战略战术》 113 左
歼 6 歼击机 470 右
歼 7Ⅱ 歼击机 472 左
歼 7Ⅲ 歼击机 472 左
歼 7 歼击机 470 右

歼 8 歼击机 472 左
歼 8Ⅱ 歼击机 472 左
坚固阵地防御战术研究 232 左
《简本与传本孙子兵法比较研究》 103 左
翦伯赞 512 右
“建威”号快船 462 左
舰舰导弹研究 459 左
舰载计算机研究 497 左
江泽民 72 右,165 右,284 右
江泽民的国防经济论述 332 右
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论述 154 右
江泽民国防战略理论研究 196 右
姜尚的军事思想研究 97 左
蒋百里 127 右,163 右,195 左,330 左
蒋百里的军事思想 127 右
蒋百里的军事思想研究 120 右
《蒋百里的御日国防思想初探》 120 右
蒋百里国防观 127 右
蒋百里国防建设思想 127 右
蒋百里国防教育思想 128 左
蒋百里国防战略思想 128 左
蒋介石 128 右,163 左,194 右
蒋介石的军事思想 128 左
《蒋介石的军事思想》 119 右
蒋介石的军事思想研究 119 右
《蒋介石军事思想初探》 120 左
交换技术研究 499 左
交联改性双基推进剂 475 左
交通运输动员研究 302 左
接收技术研究 501 左
解放东南沿海岛屿作战中的空军战术研究 241 右
解放战争时期的防御战役研究 215 右
解放战争时期的合同战术研究 233 右
解放战争时期的进攻战役研究 213 右
解放战争时期的陆军战术研究 238 右
解放战争时期的陆军战役研究 218 右
解放战争时期的司令部工作研究 256 左
解放战争时期的战术研究 231 左
解放战争时期的政治工作研究 362 左
解放战争史研究 547 左

- 进攻战斗 228 右
- 进攻战术研究 234 右
- 进攻战役研究 212 右
- 近代日本军事思想 142 右
- 近海防御 184 右
- 经典决策分析的程序 273 右
- 经典决策分析方法 274 左
- 经济动员研究 301 右
- 《精神讲话》 198 右
- 《井冈山的斗争》 360 右
- 局部战争的根源问题研究 569 左
- 局部战争发生地区问题研究 569 左
- 局部战争发生频率问题 569 右
- 局部战争发展趋势问题研究 569 右
- 局部战争概念 173 右
- 局部战争规律 174 左
- 局部战争结束方式问题研究 569 右
- 局部战争起因 173 右
- 局部战争研究 172 左
- 局部战争与世界大战关系问题研究 569 左
- 局部战争作战样式问题研究 569 右
- 决策分析的程序 273 右
- 决策分析的理论基础 273 左
- 决策分析的模型组成 274 左
- 决策分析研究 272 左
- 决策问题的主要特征及类型 273 右
- 《军队财务学》 409 左
- 军队财务研究 408 右
- 军队干部工作研究 372 左
- 军队管理基础理论研究 281 右
- 军队管理研究 295 右
- 军队和国防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 29 右
- 《军队后方》 404 左
- 《军队后勤管理学》 398 右
- 军队后勤体制研究 397 左
- 《军队基层文化活动策划教程》 377 右
- 军队建设理论研究 197 左
- 《军队建设学》 201 右
- 军队建设研究 198 左
- 军队建设研究所 201 左
- 《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 298 左
- 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 366 左
- 军队卫生勤务研究 414 左
- 军队文化工作研究 376 右
- 《军队物资供应管理学》 418 右
- 《军队物资管理学》 419 左
- 军队物资勤务研究 418 右
- 军队营房勤务学的概念 425 左
- 军队营房勤务学的理论体系 425 左
- 军队营房勤务研究 424 右
- 《军队油料勤务学的沿革与发展趋势》 421 左
- 军队油料勤务研究 420 左
- 军队院校教育研究 307 左
- 《军队正规化与军事法制》 340 右
- 军队政法工作研究 374 右
- 《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 381 右
- 《军队指挥理论基础》 258 右
- 军队指挥理论著作 257 左
- 《军队指挥学》 257 右
- 军队指挥学研究 245 右
- 军队组织工作研究 368 右
- 军队组织体制基础理论研究 281 左
- 《军费管理学》 411 左
- 《军费经济学》 411 右
- 《军费运动论》 411 右
- 军人精神世界 84 左
- 军人思维训练 85 左
- 《军事财政学》 411 右
- 军事测绘保障理论与方法研究 594 右
- 军事测绘研究 592 左
- 《军事常识》 157 右
- 军事大地测量研究 595 左,593 左
- “军事地理对高技术局部战争的影响及保障”
研讨会 582 右
- 《军事地理学》(1988) 578 右,588 左
- 《军事地理学》(1995) 582 左
- 军事地理研究 577 左
- 军事地图制图研究 596 左
- 《军事地形学》 583 左
- 军事地形研究 591 左

- 《军事地形与利用》 592 左
- 《军事法史纲》 347 右,357 右
- 军事法学研究 335 左
- 军事法制基础理论研究 282 右
- 《军事法制建设研究》 340 左,345 左
- 军事法制理论研究 339 右
- 军事海洋测绘研究 594 左
- 军事航空气象研究 605 左
- 军事航天技术研究 506 右
- 军事后勤法研究 400 左
- 军事后勤工程技术 388 右
- 军事后勤管理研究 398 右
- 军事后勤基础理论 388 左
- 军事后勤理论体系 388 左
- 《军事后勤历史丛书》 402 左
- 军事后勤史研究 401 右
- 军事后勤学术刊物 430 左
- 军事后勤研究 386 左
- 军事后勤研究机构 429 右
- 军事后勤应用理论 388 左
- 军事后勤指挥研究 407 左
- 军事化学防护研究 491 左
- 《军事计划》 162 右
- 军事计量研究 450 左
- 军事交通保障 427 右
- 军事交通保障体制 427 左
- 军事交通建设途径 427 右
- 军事交通理论体系 427 右
- 军事交通研究 426 左
- 军事交通组织运用的指导方针 427 左
-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 537 右,551 左
- 军事科学院军制研究部 201 左
- 军事科学院战争历史研究部 537 右,551 左
- 军事客观规律与军事指导规律 76 左
- 军事立法基础理论研究 342 右
- 军事立法研究 341 右
- 军事模型与模拟研究 269 右
- 军事气候学研究 598 左
- 《军事气象》 598 右
- 军事气象保障研究 598 右
- 军事气象信息工程研究 604 左
- 《军事气象学》 598 右
- 军事气象研究 597 右
- 军事情报学研究 259 左
- 军事情报整编学研究 262 左
- 《军事人才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 385 左
- 《军事人才学》 384 右
- 《军事人才学概论》 384 右
- 《军事人才学基础》 384 右
- 军事人才学研究 384 左
- 《军事人才学引论》 384 右
- 军事认识方法的应用与发展 80 左
- 军事认识方法理论 79 左
- 军事认识方面性方法 79 右
- 军事认识基础理论 78 左
- 军事认识论的研究对象 77 右
- 军事认识论研究 77 左
- 军事认识论与军事辩证法的关系 77 右
- 军事认识应用理论 79 左
- 军事认识运动理论 78 右
- 军事认识中的理性与非理性因素 75 右
- 军事认识专门性方法 79 右
- 军事认识总体性方法 79 右
- 军事摄影测量研究 593 左
- 军事司法的概念 346 左
- 军事司法的原则 346 右
- 军事司法研究 345 右
- 军事司法制度 346 右
- 军事思维方式 83 左
- 军事思维效率 84 左
- 军事思维学的性质 82 左
- 军事思维研究 80 右
- 军事通信技术研究 497 右
- 军事文化研究 99 右
- 军事问题决策优化研究 268 左
- 军事问题影响因素量化研究 267 左
- 《军事系统工程》 511 左
- 军事系统工程研究 510 右
- 军事心理学研究 383 左
- 《军事行政法律行为研究》 340 右,344 右

《军事行政法实用手册》 344 左
军事行政立法研究 343 左
军事行政执法研究 343 右
军事学术刊物 357 右
军事学术研究 150 右
军事学术研究机构 358 右
《军事学习》 139 左
《军事学志》 109 右
军事训练学研究 304 左
军事医学研究 416 左
军事运筹分析研究所 263 左
军事运筹学研究 263 左
军事运输 427 右
《军事哲学》 73 左
军事哲学的基本功能 76 左
军事哲学的逻辑起点 74 左
军事哲学的体系建构 75 左
军事哲学的学科称谓 73 右
军事哲学的学科性质 73 右
军事哲学范畴的形成 74 右
军事哲学方法与其他科学军事方法 76 左
军事哲学思想史研究 86 左
军事哲学研究 71 右
军事哲学研究的发展方向 76 右
《军事哲学札记》 90 右
军事侦察研究 260 右
军事制度史研究 292 左
军事制图研究 593 右
军事装备维修研究 428 左
《军械勤务学》 424 左
军械勤务研究 422 右
“军需独立” 412 左
《军需勤务学》 413 左
军需勤务研究 412 左
军用标准化研究 448 左
军用大气探测研究 599 右
军用电子计算机研究 494 左
军用电子技术研究 492 左
军用光学和光电子技术研究 504 右
军用光学仪器研究 505 左

军用计算机可靠性设计技术研究 495 右
军用计算机体系结构研究 494 右
军用计算机应用研究 496 右
军用雷达技术研究 502 右
军用能源研究 509 左
军用人工影响天气研究 603 右,598 左
军用软件研究 496 右
军制基本原理研究 281 左
军制基础理论研究 279 右
《军制学》(1903) 280 右
《军制学》(2000) 280 右
《军制学概要》 276 左
军制学学科体系研究 280 右
军制学研究 275 左

K

康熙的军事思想研究 96 右
抗恶劣环境计算机设计技术研究 495 右
抗击八国联军入侵战争研究 113 左
抗雷电脉冲地下通信设备 499 右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防御战术研究 236 右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防御战役研究 216 左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合同战术研究 233 右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进攻战役研究 214 左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陆军战术研究 238 右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陆军战役研究 218 右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司令部工作研究 256 左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战术研究 231 右
《抗美援朝战争史》 551 右,555 右
抗美援朝战争史研究 553 左
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空军战术研究 241 左
《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 238 左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208 左,213 右
抗日战争敌后战场作战史研究 545 左
抗日战争时期的防御战役研究 215 右
抗日战争时期的合同战术研究 233 左
抗日战争时期的进攻战役研究 213 右
抗日战争时期的陆军战术研究 238 左
抗日战争时期的陆军战役研究 218 左
抗日战争时期的司令部工作研究 255 右

- 抗日战争时期的战术研究 231 左
- 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工作研究 361 左
-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空中作战力量建设与使用的主要启示》 124 左
- 《抗日战争研究》 527 左
-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 526 右
-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地位研究 122 右
-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关系问题研究 530 左
-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研究 529 右
-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战略方针问题研究 528 左
-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战略阶段划分问题研究 528 右
-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重要战役评价问题研究 528 左
-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史研究 525 右
- 《抗战时期蒋介石空军教育训练思想之探讨》 124 右
- 可见光和微光技术研究 505 右
- 空舰导弹研究 460 左
- 空军地理研究 585 左
- 《空军发展战略》 190 右
- 空军防空战役训练研究 316 左
- 空军后勤研究 395 左
- 《空军后勤研究》 430 右
- 空军技术研究 467 左
- 空军军制研究 290 左
- 《空军气象保障学》 598 右,606 左
- 《空军学术思想史》 188 右
- 《空军战斗条令》 222 左
- 《空军战略学》 189 左,191 左
- 空军战略研究 186 左
- 《空军战略研究》 188 右
- 空军战术学 229 右
- 空军战术训练研究 326 左
- 空军战术研究 241 左
- 空军战役法研究 222 右
- 《空军战役学教程》 582 左
- 空军战役学研究 221 右
- 空军战役训练研究 315 右
- 空军作战指挥理论研究 252 左
- 空空导弹研究 458 左
- 《孔子的军事活动及其国防思想》 97 右
- 孔子的军事思想研究 97 右
- 《孔子军事思想简议》 98 左
- 《孔子是我国最早的军事教育家》 97 右
- L**
- 雷达波束制导导弹研究 458 左
- 雷达气象研究 602 右
- 冷战思维 84 右
- 《李鸿章的军事思想》 116 左
- 李鸿章的军事思想研究 115 右
- 《李卫公问对》的作者研究 94 左
- 李先念 56 右
- 李先念的军事思想 56 右
- 《联合国维和行动合作法案》 144 右
- 联合战役的本质 211 右
- 联合战役的产生和发展 211 右
- 联合战役的规律 211 右
- 联合战役的类型 212 左
- 联合战役的特点 211 右
- 联合战役的样式 212 左
- 联合战役的原则 212 左
- 联合战役的指挥、协同和保障 212 左
- 联合战役研究 210 左
- 联合作战 249 右
- 联合作战指挥理论研究 249 右
- 联军作战 249 右
- 《粮秣经理教程》 412 左
- 列宁暴力革命和武装起义理论 12 右
- 列宁国防建设和战争指导理论 13 左
- 列宁军队建设理论 13 左
- 《列宁军事理论》 11 右
- 列宁军事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11 右
- 列宁军事理论研究 11 左
- 列宁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理论 13 右
- 列宁战争观 12 左
- 猎潜艇 465 左
- 林修梅 198 右
- 《林则徐军事思想的特点初探》 113 右

林则徐军事思想研究 113 右
磷酸钛氧钾非线性晶体 506 左
刘伯承 1 右,44 左
刘伯承的军事思想 43 右
刘华清 183 左
“榴弹威力设计”综合研究 480 右
《六韬》的作者、成书年代和思想内容研究 93 左
《六韬浅说》 93 右
六硝基六氮杂伍兹烷 475 左,476 右
《陆军军制学》 287 右
陆军军制研究 285 右
陆军战术学 229 右
陆军战术训练研究 321 右
陆军战术研究 237 右
陆军战役研究 217 左
《略论晁错的军事思想》 98 左
《略论丁日昌提出的“三洋”方针》 116 左
《略论杜牧的军事思想》 98 左
《略论袁世凯的教育主张》 116 右
《略论曾国藩治军思想》 114 右
《论八路军政治工作的传统与作风》 381 左
《论长城抗战》 122 左
《论持久战》 238 左,379 左
《论地方实力派》 529 左
《论丁汝昌海上战役指挥失误问题》 112 右
《论冯子材镇南关战役的组织指挥》 112 左
《论甲午战争中的清军战略》 112 左
《论甲午战争中清廷海陆作战方略的失误》 112 右
《论解放区战场》 276 右
《论军队的管理问题》 297 右
《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作战——袭击》 208 左
《论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的战略指导方针及其相互关系》 123 左
《论抗战初期正面战场作战重心之转移》 122 左
《论李鸿章的守势战略》 110 左
《论联合政府》 276 右
《论〈六韬〉的军事思想》 93 右
《论〈六韬〉之道》 93 右
《论戚继光的军事思想》 96 左
《论清政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战略战术》 110

右
《论权威》 6 左
《论孙子的军事思想与哲学思想》 104 左
《论太平军的水战战略》 111 左
《论魏源的反侵略思想》 114 左
《论徐光启的军事思想》 98 右
《论曾国藩的军事思想》 114 右
《论曾国藩的战争指导思想》 115 左
《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 513 左
罗尔纲 520 右
罗荣桓 48 左
罗荣桓的军事思想 48 左
罗瑞卿 68 左
罗瑞卿的军事思想 68 左

M

《马岛战争研究》 136 左,570 右
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登陆作战研究 573 左
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封锁与反封锁作战研究 573 左
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特点研究 571 左
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研究 570 左
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战略判断研究 571 右
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战争动员研究 572 左
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指导研究 572 左
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中的电子战研究 573 右
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中的精确制导武器研究 573 右
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研究 572 右
马克思暴力革命理论 5 左
《马克思恩格斯军事理论研究》 2 右,8 左
马克思军队理论 4 左
《马克思军事理论》 2 右
马克思军事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2 右
马克思军事理论研究 1 左
马克思战争观 3 右
马克思战争指导理论 5 左
《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史》 86 右
埋地天线技术 499 右

- “麦墩”双基推进剂 475 右
- 毛奇 134 右
- 毛泽东 286 右
- 毛泽东抵制立三路线问题研究 541 左
- 毛泽东国防建设思想 26 右
- 毛泽东国防战略思想研究 196 右
- 毛泽东后勤保障理论 160 左
- 毛泽东军事思想 19 左
-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19 右
- 毛泽东军事问题方法论 22 右
- 毛泽东军事哲学 81 左
- 毛泽东人民军队思想 24 左
- 毛泽东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 25 右
- 毛泽东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理论 160 左
- 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 25 左
- 毛泽东武装革命和建立农村根据地理论 159 左
- 毛泽东武装力量建设理论 159 右
- 毛泽东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的三次战略性建议
问题研究 541 右
- 毛泽东战争观 22 右,159 左
- 美国建军思想 149 右
- 美国军事法研究 356 左
- 《美国军事思想》 148 左
- 美国军事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148 左
- 美国军事思想研究 147 右
- 《美国军事思想研究》 148 左
- 美国军事战略思想 149 左
- 美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关系问题研究 562 右
- 美国战争观 148 右
- 美军作战思想 150 左
- 《蒙古兵学研究——兼论成吉思汗用兵之迹》 97 右
- 《〈蒙古秘史〉军事思想初探》 95 左
- 《蒙古秘史》军事思想研究 95 左
- 民兵制度研究 301 右
- N
- 内弹道势平衡理论 446 左
- 内弹道学研究 446 左
- 南昌航空机械学校 468 右
- 南方八省红军三年游击战争史研究 542 右
-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543 右
- 《南京国民政府对“一·二八”事变的方针》 122 左
- 南京国民政府“继续北攻”性质问题研究 524 右
- 挠性炸药(橡皮炸药) 477 右
- 《年大将军兵法》 94 左
- 聂荣臻 50 右
- 聂荣臻的军事思想 50 右
- 农民阶级思想研究 513 右
- 农民战争历史作用问题研究 513 左
- 农民战争性质问题研究 512 右
- O
- 《欧洲军队》 8 右
- P
- 彭德怀 42 左
- 彭德怀的军事思想 42 左
- 霹雳 1 号空空导弹 458 左
- 霹雳 2 号空空导弹 458 右
- 霹雳 3 号空空导弹 458 右
- 霹雳 5 号空空导弹 458 右
- 霹雳 7 号空空导弹 458 右
- 偏硼酸钡非线性晶体 506 左
- “平海”号巡洋舰 433 右,462 右
- “平台”推进剂 475 左
- 《评蒋介石的海防言论和行动》 124 左
- 《评抗战前夕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抗日准备》 527 右
- 破甲机理研究 447 左
- 破甲技术研究 479 左
- 破片侵彻研究 480 左
- Q
- 戚继光的军事思想研究 96 左
- 《戚继光建军思想初探》 96 右
- 漆侠 512 右
- 千家驹 330 左,410 右
- 钱学森 510 右
- 潜地导弹的研制和试验 439 左
- 《浅论伊尹的军事思想》 96 右
- 《浅谈蔡锷的治军思想》 117 右

- 《浅谈杨杰国防思想》 121 左
《浅谈曾国藩的训练思想》 115 左
强 5 强击机 470 右
强 5 I 强击机 472 左
强 5 II 强击机 472 右
《秦汉农民战争史》 90 左
轻武器研究 481 左
轻武器用双基球扁药 474 左
氢弹空爆试验 452 右
氢弹试验 437 右
氢弹原理研究 452 右
清华大学航空研究所 468 右
《清会典图》 595 右
清军战术思想研究 113 左
清末兵种战术研究 243 右
清末部队训练研究 310 左
清末防御战术研究 236 左
清末国防科技 431 右
清末国防体制研究 283 左
清末国防战略研究 194 右
清末海军军制研究 288 左
清末海军战略研究 179 左
清末海军战术训练研究 325 左
清末海军战役研究 220 左
清末合同战术研究 233 左
清末和中华民国时期的近代战略理论 157 右
清末进攻战役研究 213 左
清末军队管理研究 296 左
清末军队建设研究 198 左
清末军队院校教育研究 307 右
清末军事学术研究 150 右
清末军事训练学研究 304 右
清末军事医学研究 416 右
清末陆军军制研究 286 左
清末陆军战术训练研究 321 右
清末陆军战役研究 217 右
清末外军后勤研究 403 右
清末战术学研究 227 右
清末战术训练研究 319 左
清末战术研究 230 左
清末战役学研究 203 右
清末战争研究 162 左
清末作战指挥理论研究 247 右
《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 521 右
丘吉尔 137 右
瞿秋白 6 左
全军防化科技大会 490 左
全军战役理论学术研讨会 219 左
《全面评价戚继光的文韬武略》 96 右
群机结构计算机 495 左
- R**
- “让步政策论” 513 左
人民防空动员研究 302 左
人民海军初步发展时期的战役训练研究 314 右
人民海军创建时期的战役训练研究 314 左
人民海军恢复建设时期的战役训练研究 315 左
人民海军加速发展时期的战役训练研究 315 右
人民解放军空军战役训练研究 316 右
人民武装动员研究 302 左
人造地球卫星技术 507 右
人造地球卫星研制 437 右
《日本地理兵要》 590 左
日本建军思想 144 右
《日本军事思想》 142 左
日本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142 右
《日本军事思想史的考察》 142 左
日本军事思想研究 142 左
《日本军事思想研究》 142 左
日本军事战略思想 144 左
日本战争观 143 右
《日军作战理论研究》 145 左
日本作战思想 145 左
《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 144 右
《日美安全条约》 144 左
《日美防卫合作指导方针》 144 右
戎篁 513 左
熔注梯黑炸药系列 477 右
冗余技术 495 右

S

- 三氨基三硝基苯 477 左
- 三硼酸锂非线性晶体 506 左
- 上游1号甲舰舰导弹 459 右
- 上游2号舰舰导弹 460 右
-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防经济理论研究 333 左
-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部队训练研究 310 右
-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防御战术研究 236 右
-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防御战役研究 216 右
-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合同战术研究 234 左
-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进攻战役研究 214 左
-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军队干部工作研究 372 右
-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军队管理研究 298 左
-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军队建设研究 199 右
-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工作 367 左
-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军队文化工作研究 377 左
-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军队院校教育研究 308 右
-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军队政法工作研究 375 右
-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军队指挥理论研究 246 左
-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军队组织工作研究 370 右
-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陆军战术训练研究 323 右
-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陆军战术研究 239 左
-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陆军战役研究 219 左
-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司令部工作研究 256 左
-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战略研究 177 右
-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战时政治工作研究 379 左
-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战术研究 232 左
-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战役训练研究 312 左
-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战争研究 164 右
-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政治工作研究 362 右
-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研究 531 左
-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研究 381 右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防经济理论研究 333 右
- 射击学研究 443 左
- “神光二号”钎玻璃系统 505 左
- “神光一号”钎玻璃激光器系统 505 左
- “神舟”号无人试验飞船 442 右
- “神州”计算机系统 495 左
- 《审讯术》 375 右
- 生物防护技术研究 490 右
- 师团模型 270 左
- “施利芬计划” 134 左
- “十大军事原则” 238 右
- 十六字诀 238 左
- 《十年国防计划》 162 右
- “石鹰”1号侦毒器 488 右
- “石鹰”2号侦毒器 488 右
- 实验弹道学研究 447 右
- 世界核格局变化研究 193 右
- 《世界军事地理》 588 左
- 世界军事地理研究 587 左
- 世界战争史研究 557 左
- 《世界战争通鉴》 559 左
- 《世界重要战略地区军事地理》 588 左
- 《试论冯玉祥治军思想演变》 119 右
- 《试论抗战前国民党政府的国防建设》 527 右
- 《试论李鸿章的海军战略思想》 110 左
- 《试论林则徐、魏源的军事思想》 114 左
- 《试论清军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基本原因》 110 右
- 《试论晚清的持久战思想与实践》 110 右
- 《试论晚清国防战略的几个问题》 110 左
- 《试论袁世凯军事思想》 116 右
- 《试论左宗棠的军事思想》 115 右
- 《试谈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的使用问题》 112 左
- 《试析诸葛亮研究中的几个疑题》 95 右
- 《书剑飘逸》 91 右

- “曙光一号”计算机 495 左
- 《数学模型选谈》 275 左
- 数字射频存储技术 502 左
- 双螺杆混合成型工艺技术 474 左
- 司令部工作研究 255 左
- 《司马法》的真伪和思想内容研究 92 左
- 斯大林国防建设理论 17 左
- 斯大林积极防御战略理论 17 右
- 斯大林军队建设理论 16 左
- 《斯大林军事理论》 14 右
- 斯大林军事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14 右
- 斯大林军事理论研究 14 左
- 斯大林统率艺术和作战艺术 18 左
- 斯大林战争观 15 右
- 宋时轮 1 右,6 右
- 苏联建军原则 141 左
- 《苏联军事地理》 580 右
- 《苏联军事思想》 139 左
- 苏联军事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139 右
- 苏联军事思想研究 139 左
- 苏联军事战略思想 140 右
- 苏联战争观 140 左
- 苏联作战思想 141 右
- 苏联作战原则 141 右
- 《诉诸总体战的神灵——鲁登道夫〈总体战〉
浅说》 133 左
- 粟裕 58 左,165 左,255 右
- 粟裕的军事思想 57 右
- 塑-4 炸药 477 右
- 《孙臆兵法》的编成和思想内容研究 92 右
- 《孙臆兵法浅说》 92 右
- 《孙臆兵法校理·例言》 92 右
- 孙中山 72 左,126 左,176 右,186 左,194 右
- 孙中山的军事思想 126 左
- 孙中山的军事思想研究 117 左
- 孙中山军队建设思想 126 右
- 《孙中山军事思想的几个问题初探》 117 左
- 孙中山武装斗争思想 126 右
- 孙中山战争观 126 左
- 《孙子》 81 左
- 《孙子兵法概论》 104 左
- 《孙子兵法校释》 103 右
- 《孙子兵法新论》 104 左
- 《孙子兵法新研究》 103 右
- 《孙子兵法之初步研究》 101 左
- 《〈孙子〉兵学体系初探》 104 左
- 《〈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全胜”论新探》 105 左
- 《孙子的成书年代》 102 右
- 《孙子》的国家安全观 104 右
- 《孙子》的校勘及版本 103 左
- 《〈孙子〉的军事管理思想》 105 左
- 《孙子》的军事思想体系研究 103 右
- 《孙子》的军事哲学思想 105 右
- 《孙子的胜负观与国家安全观》 104 右
- 《孙子》的思想渊源和社会背景研究 103 左
- 《〈孙子〉“伐谋伐交”思想对当代非对称战略的
启示》 104 右
- 《孙子防御作战思想初探》 105 左
- 《〈孙子〉国防观对世纪之交的国家安全的
启示》 104 右
- 《孙子集注》 101 右
- 《孙子评论》 103 右
- 《孙子十一家注》 101 右
- 《孙子思想研讨》 104 左
- 《孙子》研究 100 左
- 《孙子》与西方兵学的比较 105 右
- 《孙子战争理论之体系》 103 右
- 孙祚民 512 右

T

- “太极 1000”群机系统 495 左
- 太平军战略战术研究 110 右
- 《太平天国兵法》 110 右
-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史研究 519 右
- 太阳能设施与装备研究 510 左
- 谭政 63 右
- 谭政的军事思想 63 右
- 特殊条件下油料保障理论研究 421 左
- 特种弹药研究 480 右
- 特种作战兵力编成 209 右

特种作战基本含义 208 右
特种作战基本原则 209 右
特种作战特点 208 右
特种作战研究 207 右
特种作战作战任务 209 左
梯弧熔注炸药系列 477 右
天气预报理论与技术研究 600 左
《天气预告学》 600 右
《天时对于战争之影响》 597 右
天线技术研究 501 左
通信传输技术研究 498 右
通信网建设 499 左
通信网络管理和支撑系统研究 499 左
通信卫星的研制 439 右
通信终端技术研究 499 左
统筹法研究 274 右
《统筹方法评估》 274 右
透镜馈电多波束阵列天线 501 右
透气散热防毒服 491 右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防御战役研究 215 左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进攻战役研究 213 左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陆军战术研究 237 右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陆军战役研究 218 左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司令部工作研究 255 左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战术研究 230 右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工作研究 359 右
土地革命战争史研究 536 右
推进、增程和减阻技术研究 480 左

W

《外弹道气象学概论》 598 右
外弹道学研究 446 右
外国军事法研究 355 左
外国军制研究 294 左
外军后勤研究 403 左
外军化学武器研究 489 右, 491 右
《外军军官管理制度概述》 373 右
晚清兵书研究 117 右
晚清持久战思想研究 110 右
晚清国防战略思想研究 109 左

《晚清海防思想研究》 110 左
晚清海防战略思想研究 109 右
晚清军事思想研究 106 右
晚清军事思想总论研究 108 右
晚清农民起义领袖的军事思想研究 114 左
晚清人物军事思想研究 113 右
《晚清时期的国防思想》 109 右
皖南事变研究 536 左
《王安石的军事改革思想》 98 右
《王安石的军事思想》 98 右
王安石的军事思想研究 98 右
王树声 69 左
王树声的军事思想 69 左
网络分析研究 271 右
威尔逊“十四点”问题研究 563 左
威海海战失败责任问题研究 113 左
“微推偏喷管”研究 480 左
微烟改性双基推进剂 474 右
《伟大的第二战场》 544 左
卫星气象研究 601 右
卫星通信技术研究 499 右
《卫星云图接收和分析》 601 右
《〈尉繚子〉成书、著录及其相关问题》 93 左
《〈尉繚子〉初探》 93 左
《尉繚子》的真伪和作者研究 92 右
《〈尉繚子〉对古代军事哲学的贡献》 93 左
《〈尉繚子〉考辨》 93 左
《魏源的海防论与朴素的海权思想》 114 左
《魏源军事思想初探》 114 左
魏源军事思想研究 113 右
无线电通信技术研究 498 右
无源电子对抗弹药研究 480 右
吴黎平 6 左
《吴佩孚的军事思想》 119 左
吴佩孚的军事思想研究 119 左
《吴佩孚军事思想简析》 119 左
《吴子》的作者和成书年代问题 91 右
伍子胥的军事思想研究 97 左
《伍子胥军事思想述略》 97 左
武器射击运筹理论研究 269 左

《武器装备研制的标准化工作规定》 449 右

X

系统工程研究所 510 右

《现代军事地理学科概论》 583 右,585 右

现代条件下运动战战术研究 231 右

现代战争法的缺陷 353 左

《析“不战而屈人之兵”》 105 左

项英评价问题研究 544 右

相控阵干扰天线 501 右

萧华 298 右

萧劲光 65 左,182 右

萧劲光的军事思想 65 左

硝基尿法 477 左

《新地理学》 580 左

《新定步兵操法》 236 左,583 左

《新建陆军营制勋章》 279 右

《新时期我国空军战略研究》 190 右

新四军成立时间问题研究 536 左

新四军军部成立时间地点问题研究 536 左

新四军军史研究 535 左

新四军史料丛书 535 右

新型常规武器装备研制 441 左

信号处理技术研究 501 右

修正氮当量公式 476 右

徐光启的军事思想研究 98 右

徐海东 59 右

徐海东的军事思想 59 右

徐尚武 432 右

徐向前 49 右,565 右

徐向前的军事思想 49 右

许光达 1 右,6 右,70 右

许光达的军事思想 70 右

《训练操法详晰图说》 583 左

Y

鸦片战争中清政府战略战术研究 110 右

亚热带丛林无线电通信技术研究 500 左

盐粉消雾数值研究 604 左

杨杰 129 左,163 右,195 右

杨杰的军事思想 129 左

杨杰的军事思想研究 121 左

杨杰国防思想 130 左

杨杰战争观 129 右

杨杰作战思想 131 左

杨尚昆 55 左

杨尚昆的军事思想 55 左

《洋防说略》 580 左

姚锡光 288 左

野战地域通信网仿真研究 498 右

野战外科学研究 417 右

野战综合通信系统 499 右

叶季壮 386 右

叶剑英 1 右,6 右,52 左

叶剑英的军事思想 52 左

叶挺 53 右

叶挺的军事思想 53 右

液体推进剂导弹研究 454 右

《一代军事学家蒋百里》 120 右

“一·二八”淞沪抗战研究 122 左

《“一国两制”下的香港防务与驻军法律问题》 342 右

《一九二六年南口战役论略》 121 右

《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 434 右

伊尹的军事思想研究 96 右

移动 229 左

《以经济观审视海防建设——魏源海防思想述评》 114 左

“逸仙”号炮舰 462 左

《银雀山简本〈孙子〉校读举例》 103 左

印度的战争观 146 右

印度国防发展思想 147 左

印度建军思想 147 右

印度军事思想的形成 146 左

印度军事思想研究 145 右

《印度军事思想研究》 146 左

《印度军事战略研究》 146 左

印度战略思想 147 左

印军作战思想 147 右

英国的战略分类 137 右
英国的战略思想 137 右
英国的战争观 137 左
英国防务政策 138 左
英国建军思想 138 左
英国军事法研究 356 左
《英国军事思想》 136 左
英国军事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136 右
英国军事思想研究 135 右
英国威慑理论 137 右
英国战略研究 137 右
英国作战思想 138 左
鹰击6号空舰导弹 460 左
鹰击8号反舰导弹 460 右
营产管理 425 右
《营房管理部工作与任务(草案)》 424 右
营房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方针 425 左
营房经济 425 右
油料安全防护理论 422 左
油料保障快速反应理论 421 右
《油料工作发展战略浅探》 420 右
油料立体化保障理论 421 右
《游击战纲要》 163 右
游击战战术研究 231 左
有核国家核战略思想研究 192 右
有线电通信技术研究 498 右
鱼-4甲、乙两型反舰自导鱼雷 466 右
鱼雷攻击型核潜艇研制 438 左
《浴血奋战:抗日英雄八路军》 534 右
袁世凯 125 左,194 右
袁世凯的军事思想 125 左
袁世凯的军事思想研究 116 右
《袁世凯对近代军队进行的改革及其评价》 116 右
袁世凯军事教育思想 125 右
袁世凯军事训练思想 125 右
袁世凯军制改革思想 125 左
原子弹研制 436 右,452 左
远洋测量船队 439 左
岳飞的军事思想研究 96 左
《岳飞“反攻中原”战略述评》 96 左

运动战战术研究 231 左
运载火箭研制 442 左

Z

载人航天技术研究 442 右
《在进攻战役中空军的行动》 222 左
泽克特,H. von 134 右
《怎样看待抗战初期的国民党战场》 527 左
曾国藩的军事思想研究 114 右
《曾国藩战略思想简论》 115 左
《曾胡治兵语录》 163 左,198 右
炸药合成研究 476 左
炸药研究 475 右
战斗的本质 228 右
战斗的规律 228 右
战斗的特点 228 右
战斗的主客观因素及其相互影响 228 右
战后局部战争史研究 567 右
《战后世界局部战争史教程》 568 右
战略导弹部队后勤研究 396 左
战略导弹部队战术学 229 右
战略导弹部队战术训练研究 327 右
战略导弹部队战术研究 242 左
《战略导弹部队战役学》 224 右
战略导弹部队战役学研究 224 左
战略导弹部队战役训练研究 317 右
战略导弹部队战役研究 225 右
战略导弹部队作战指挥理论研究 254 左
战略导弹研究 454 右
战略地理研究 579 右
战略后勤研究 389 左
《战略论》 136 左
《战略学》 157 右,162 左
战略学研究 157 左
战略研究 176 左
战略研究著作 202 右
战区军事地理研究 586 左
战时和特种军事交通勤务 427 右
《战时卫生勤务令草案之研究》 414 左
战时营房保障 425 右

- 战时政治工作研究 378 右
- 战术导弹研究 456 右
- 战术地理研究 582 右
- 战术后勤研究 392 左
- 战术学学科体系 229 左
- 战术学研究 227 右
- 战术训练研究 319 左
- 战术研究 230 左
- 战术研究著作 244 右
- 战役地理研究 581 左
- 战役后勤研究 390 右
- 战役模拟系统 270 右
- 战役学教程 211 左,582 左
- 战役学研究 203 右
- 战役训练内容 313 左
- 战役训练研究 311 右
- 战役训练指导原则 313 左
- 战役训练组织实施 313 右
- 战役研究 206 左
- 战役研究著作 226 右
- 战争的起源 75 右
- 战争动员研究 300 左
- 战争对国防建设的影响问题研究 560 右
- 战争对作战方法影响问题研究 560 右
- 战争法的概念 352 右
- 战争法的主要作用 352 右
- 《战争法概论》 352 左
- 战争法体系 352 右
- 《战争法文献集》 351 右
- 战争法研究 351 左
- 《战争诀要》 163 右
- 战争历史作用问题研究 560 左
- 战争性质问题研究 559 右
- 战争研究 161 右
- 战争与军事的本质 75 右
- 《战争指导》 136 左
- 张云逸 66 右
- 张云逸的军事思想 66 右
- 张之洞的军事思想研究 116 右
- 《张之洞军事思想》 117 左
- 《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军事教育的兴起》 116 右
- 《张之洞在甲午战争中的海军作战方略》 117 左
- 阵地攻坚战术运用 231 右
- 《镇南关大捷不是中法战争的转折点》 111 右
- 郑成功的军事思想研究 96 右
- 政治工作法规制度 364 左
- 政治工作理论专著 364 左
- 支援陆军、海军战役训练研究 316 右
- 中程地地导弹研究 455 左
- 中低空地(舰)空导弹研究 457 左
- 《中法战争后清政府“乘胜即收”原因析》 111 右
- 《中法战争时期的清军战术》 112 左
- 中法战争研究 111 左
- 《中法战争与晚清国防政策的转变》 109 右
- 《中法战争诸役考》 111 右
- 中高空空地空导弹研究 457 左
- 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 436 左
- 中国边疆军事地理研究 588 右
- 《中国兵书集成》 90 右
- 《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 606 右,517 左,552 左,556 右,578 左
- 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编审委员会 606 右
- 《中国大百科全书·世界军事史分册》 559 左
- 中国的大气层核试验 453 左
- 中国的地下核试验 453 左
- 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 565 右
-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238 左,539 右
- 中国革命战争时期的战略理论 158 右
-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 533 右
- 《中国工农红军反“围剿”史记》 540 右
- 中国工农红军反“围剿”作战史研究 539 右
- 《中国工农红军俱乐部列宁室工作暂行条例》 376 右
- 中国工农红军时期的军事法制 348 右
- 《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 360 右
-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360 左,366 右,378 右
- 《中国共产党军队政治工作七十年史》第二卷 534 右
- 中国古代兵书研究 91 右

- 《中国古代兵学发展的三个阶段与三次高潮》 91 右
- 中国古代军事法制的分期 348 左
- 中国古代军事法制的特点 348 左
- 中国古代军事法制的主要内容 348 左
-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发展基本线索研究 91 右
-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研究 89 左
- 中国核战略思想 192 右
- 《中国近代兵书概论》 117 右
- 中国近代军队的执法 348 左
- 中国近代军队有关法制的内容 348 左
- 《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史》 121 左
- 《中国近代战争史》 517 左
- 中国近代战争史研究 515 左
-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 607 右,518 右,531 右,
552 左,556 右
-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委员会 607 右
-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国际军事公约分册》 352 左
-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地理测绘气象》 588 左
-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法分册》 352 左
-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 526 右
-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世界战争史分册》 559 左
-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中国历代军事思想
分册》 94 右,118 右
-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
分册》 378 左
- 《中国军事地理》 587 左
- 《中国军事地理概论》 587 左
- 中国军事法制史研究 347 右
- 《中国军事后勤百科全书·军械勤务卷》 424 左
- 中国军事科学学会 615 左
- 《中国军事司法制度》 340 右
- 《中国军事通史·总序》 91 右
- 《中国军事文化纵横》 99 右
- 《中国军事制度史》 293 左
- 《中国抗日战争史》 526 右
- 《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特点》 513 右
- 《中国农民战争简史》 514 右
- 《中国农民战争史》 514 右
- 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 511 右
- 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 514 左
- 革命战争时期军事学术研究 152 左
-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兵种战术研究 244 左
-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部队训练研究 310 右
-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防御战术研究 236 右
-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防御战役研究 215 左
-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海军战术研究 240 左
-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海军战役研究 220 左
-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海军作战指挥理论研究 251 左
-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合同战术研究 233 左
-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进攻战术研究 235 左
-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进攻战役研究 213 左
-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队管理研究 296 左
-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情报学研究 259 右
-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训练学研究 305 左
-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医学研究 417 左
-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侦察研究 261 左
-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空军战略研究 187 左
-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空军战术研究 241 左
-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空军战役法研究 223 左
-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空军战役学研究 221 右
-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陆军战术训练研究 323 左
-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陆军战术研究 237 右
-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陆军战役研究 217 右
-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射击学研究 444 左
-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院校教育研究 307 右
-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研究 177 左
-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术学研究 227 右
-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术训练研究 320 左
-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术研究 230 右
-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役后勤理论研究 391 左
-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役学研究 204 左
-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役研究 206 左
-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指挥理论研究 248 左
- 《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人事管理学》 373 左
- 《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制度概要》 373 左
-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 614 左
-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 439 左
-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略研究 181 左
- 《中国人民解放军合成军队战术后方勤务
概则》 392 右

- 《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工作》 402 右
- 《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
534 右
-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队建设研究 199 左
-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 532 左
-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研究 530 右
-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611 左
-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 610 左
-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战役学》 222 左
-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作战指挥理论研究 252 左
-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 540 右
- 《中国人民解放军连队管理教育工作条例》 298 右
- 《中国人民解放军司令部条例辅导材料》 258 左
- 《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 377 右
-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 297 右
-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 544 右
-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 381 右
-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的学科体系 382 右
-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研究 380 左
-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 367 左,
377 左
-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研究 359 左
- 中国人民志愿军军史研究 550 左
-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 164 右,551 右
- 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 102 右
- 《中国五十年来军事变迁史》 516 左
-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军事系统工程委员会 263 右
-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 527 左
- 《中国正面战场对日军事战略的演变》 123 左
- 《中国正面战场对日战略的演变》 528 左
- 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理论 330 右
- 中国周边国家军事地理研究 589 右
- 中华民国初期的战争研究 162 左
- 中华民国的部队训练研究 310 左
- 中华民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研究 561 左
- 中华民国的海军建设及战略战术思想研究 123 右
- 中华民国的海军战术训练研究 325 左
- 中华民国的军队院校教育研究 307 右
- 中华民国的军事法制理论研究 339 右
- 中华民国的军事训练学研究 304 右
- 中华民国的空军建设及战略战术思想研究 124 左
- 中华民国的空军战术训练研究 326 左
- 中华民国的世界战争史研究 557 左
- 中华民国军事思想研究 118 右
- 中华民国时期的北伐战争史研究 522 右
- 中华民国时期的兵种战术研究 243 右
- 中华民国时期的国防经济研究 329 右
- 中华民国时期的国防体制研究 283 右
- 中华民国时期的国防战略研究 194 右
- 中华民国时期的海军军制研究 288 右
- 中华民国时期的海军战略研究 180 左
- 中华民国时期的海军战役研究 220 左
- 中华民国时期的海军作战指挥理论研究 251 左
- 中华民国时期的海战法研究 353 右
- 中华民国时期的合同战术研究 233 左
- 中华民国时期的军队管理研究 296 左
- 中华民国时期的军队建设研究 199 左
- 中华民国时期的军事法学研究 335 右
- 中华民国时期的军事立法研究 341 右
- 中华民国时期的军事情报学研究 259 左
- 中华民国时期的军事司法研究 345 右
- 中华民国时期的军事学术研究 151 右
- 中华民国时期的军事医学研究 416 右
- 中华民国时期的军事侦察研究 261 左
- 中华民国时期的军事制度史研究 292 左
- 中华民国时期的军用雷达技术研究 502 右
- 中华民国时期的军制学研究 275 右
- 中华民国时期的空军军制研究 290 左
- 中华民国时期的空军战略研究 186 左
- 中华民国时期的空军战役法研究 223 左
- 中华民国时期的空军战役学研究 221 右
- 中华民国时期的空军作战指挥理论研究 252 左
- 中华民国时期的陆军军制研究 286 左
- 中华民国时期的陆军战术训练研究 322 右
- 中华民国时期的陆军战术研究 237 右
- 中华民国时期的陆军战役研究 217 右
- 中华民国时期的三防技术研究 488 左
- 中华民国时期的射击学研究 443 右
- 中华民国时期的外国军事法研究 355 左
- 中华民国时期的外国军制研究 294 左

- 中华民国时期的外军后勤研究 403 右
 中华民国时期的卫勤研究 414 左
 中华民国时期的战略研究 176 左
 中华民国时期的战略战术思想研究 121 右
 中华民国时期的战术学研究 227 右
 中华民国时期的战术训练研究 319 右
 中华民国时期的战术研究 230 左
 中华民国时期的战争动员研究 300 右
 中华民国时期的战争法研究 351 左
 中华民国时期的作战指挥理论研究 247 右
 中华民国时期重要人物的军事思想研究 118 右
 中华民国中后期的战争研究 163 左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研究 561 右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防经济学研究 331 右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海军建军理论 181 右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海军军制研究 288 右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海军战略作战理论指导 182 左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海军战术训练研究 325 右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测绘研究 592 右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法学研究 336 左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法制机构 350 左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法制理论研究 339 右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法制思想 350 左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法制研究 348 右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立法研究 341 右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司法研究 346 左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制度史研究 292 右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空军技术研究 469 左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空军军制研究 290 右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世界战争史研究 558 左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国军事法研究 355 右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国军制研究 294 右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律知识全书》 344 右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北伐战争史研究 523 左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弹道学研究 445 右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研究 565 左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国防科学技术
 研究 434 左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国防体制研究 284 左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国防战略研究 196 左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海军技术研究 462 右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海战法研究 353 右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后勤指挥研究 407 右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军事地理研究 578 左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军事学术研究 153 左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军用雷达技术
 研究 503 左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军制学研究 277 左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抗日战争研究 526 左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陆军军制研究 286 右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轻武器研究 482 左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三防技术研究 488 左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外军后勤研究 404 左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卫勤研究 415 左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战略理论 160 右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战争动员研究 301 右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战争法研究 351 右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研究 565 左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军事地理研究 577 左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军事气象研究 597 右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抗日战争研究 525 右
 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法律体系 349 右
 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法制的成就与经验 350 右
 中华人民共和国空军战术训练研究 326 右
 《中华文化通志·军事学志》 118 右,123 右,124 右
 中间弹道学研究 446 右
 中近程地地导弹研制 437 左,454 右
 中日甲午战争清军战略的评价 112 左
 中日甲午战争研究 112 左
 中外军事刑法比较 346 右
 《中西军事哲学比较研究》 86 右
 《中西武备新书》 162 左
 中央军委测绘局 592 右
 中远程地地导弹 455 左
 “中运一”运输机 433 右
 终点弹道学研究 446 右
 周恩来 19 右,38 左
 周恩来的军事思想 38 左

- 洲际导弹研制和全程飞行试验 439 左
- 洲际地地导弹研究 455 右
- 朱德 40 右, 297 右
- 朱德的军事思想 40 左
- 诸兵种合同战术 231 右
- 诸葛亮的军事思想研究 95 右
- 《诸葛亮〈隆中对〉的战略思想及其他》 95 右
- 《诸葛亮在军事上的贡献》 96 左
- 诸军兵种在战斗中的地位作用 228 右
- 诸军兵种在战斗中的使用原则 228 右
- 驻止 229 左
- 装甲兵技术研究 484 右
- 装甲兵试验场建设 486 右
- 《装甲兵武器装备论证手册》 486 左
- 装甲兵武器装备论证研究 486 左
- 装甲兵武器装备使用与维修技术研究 487 左
- 装甲兵训练场地建设 486 右
- 装甲车辆试验场 486 右
- 《装甲战》 136 左
- 撞击与侵彻机理研究 479 右
- 自主教育观 309 右
- 综合素质观 309 左
- 总参谋部测绘局 592 右
- 《总体战》 132 右
- 《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 516 左
- 左宗棠的军事思想研究 115 左
- 《左宗棠评传》 115 左
- 《左宗棠治军有术》 115 右
- 作战运筹分析研究室 510 右
- 作战指挥理论研究 247 右
- 作战指挥自动化系统计算机应用研究 496 右
- 5.8 毫米枪械系列 484 左
- 7.62 毫米 63 式自动步枪 482 右
- 8 毫米麦德森轻机枪 481 右
- 33 年式 120 毫米迫击炮 433 右
- 50 式 7.62 毫米冲锋枪 482 左
- 051 型导弹驱逐舰 465 左
- 053H1 型导弹护卫舰 466 右
- 053H2 型导弹护卫舰 466 右
- 59 式中型坦克 485 左
- 62 式轻型坦克 485 右
- 62 型护卫艇 465 左
- 63 式履带装甲运输车 485 右
- 63 式水陆坦克 485 右
- 64 式 7.62 毫米手枪和枪弹 482 右
- 67 式 7.62 毫米两用机枪 483 左
- 77 式 7.62 毫米手枪 483 右
- 77 式 12.7 毫米大口径机枪 483 右
- 77 式手榴弹 483 右
- 79 式 7.62 毫米轻型冲锋枪 483 右
- 79 式坦克 485 右
- 81 式 7.62 毫米枪族 483 右
- 82-1 型手榴弹 483 右
- 82-2 型手榴弹 483 右
- 82-3 型手榴弹 483 右
- 85 式 12.7 毫米高射机枪 483 右
- 87 式 35 毫米自动榴弹发射器 484 左
- 88 式系列主战坦克 485 右
- 89 式 12.7 毫米重机枪 484 左
- 110 型单脉冲精密跟踪测量雷达 503 右
- 402 型对海警戒雷达 503 左
- 406 型对空警戒雷达 503 左
- 408 型对空警戒雷达 503 右
- 502 型测高雷达 503 右
- 662 炸药 476 左
- 662-1 高分子粘结炸药 477 右
- 1914 年仿制马克沁重机枪 481 右
- 2701 高分子粘结炸药 477 右
- 2721 高分子粘结炸药 477 右
- 7010 型相控阵雷达 503 右
- 8321 高分子粘结炸药 477 右
- 8701 高分子粘结炸药 477 右
- DADN 法 477 左
- DFH-2 卫星 508 左
- DFH-2A 卫星 508 左
- DFH-3 卫星 508 左
- FY-1 太阳同步轨道气象卫星 508 左
- FY-2 地球静止轨道气象卫星 508 左

HPR 法 477 左

J-201 型反坦克导弹 461 左

LLX06 型多普勒天气雷达 603 左

ZB26 式轻机枪 433 右

CF-2 轻轰炸机 468 左

Keyword Index of Entry

(条目外文关键词索引)

说明 本索引按拉丁字母顺序编排;第一个字母相同者,按第二个字母顺序编排,如此类推。如有俄文,在其后单独编排。

A

academic publications of
military logistics 430
Academy of Military Science of
the CPLA 611
air force campaign training/study of 315
air force geography/study of 585
air force logistics/study of 395
air force military system/study of 290
air force operational art/study of 222
air force operations command theory/
study of 252
air force strategy/study of 186
air force tactical training/study of 326
air force tactics/study of 241
air force technology/research of 467
ammunition/research of 478
armored corps technology/research of 484
arms tactics/study of 243
army building/study of 198
army campaign/study of 217
army health service/study of 414
army military system/study of 285
army tactical training/study of 321
army tactics/study of 237
army's cadre work/study of 372
army's cultural work/study of 376
army'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al
work/study of 366
army's organizational work/study of 368
army's public security /procuratorial and

judicial work/study of 374

B

ballistics/research of 445
basic theory of military system/
study of 279
British military thought/study of 135

C

campaign/study of 206
campaign geography/study of 581
campaign logistics/study of 390
campaign training/study of 311
campaign training of strategic missile
forces/study of 317
Chen Geng's military thought 62
Chen Yi's military thought 46
China Association for Military
Science/The 615
China Encyclopedia Military 606
China Military Encyclopedia 607
China's ancient military thought/
study of 89
combined-arms tactics/study of 233
counter-operations against "mopping-up"
in all strategic theaters/study of 546

D

decision analysis/study of 272
defensive campaign/study of 214
defensive tactics/study of 236

Deng Xiaoping's thought of army building
in the new period 28

E

electronic warfare technology/
research of 500

Engels' military theory/study of 6

explosive/research of 475

F

foreign military law/study of 355

foreign military logistics/
study of 403

foreign military system/
study of 294

G

game theory/study of 270

German military thought/study of 132

Gulf War/study of the 574

gunnery/research of 443

H

He Long's military thought 45

headquarters work/study of 255

high technology war/study of 166

high technology war logistics/
study of 405

history of Agrarian Revolutionary
War/study of the 536

history of battles in the battlefield behind
enemy lines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study of the 545

history of battles in the frontal battlefield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study of the 525

history of Chinese military legal system/
study of the 347

history of Chinese modern wars/
study of the 515

study of the 515

history of Chinese peasant wars/
study of the 511

history of counter-campaigns against
"encirclement and suppression" of the Chinese
Workers and Peasants' Red Army/
study of the 539

history of CPLA political work/
study of the 380

history of Liberation War/study of the 547

history of local wars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study of the 567

history of military philosophical thought/
study of the 86

history of military system/study of the 292

history of Northern Expedition/
study of the 522

history of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Peasant War/study of the 519

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
study of the 561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study of the 564

history of the War to Resist U. S.
Aggression and Aid Korea/
study of the 553

history of three years' guerilla war of the
Red Army in Eight Southern Provinces/
study of the 542

Huang Kecheng's military thought 60

Huang Xing's military thought 127

I

Indian military thought/study of 145

J

Japanese military thought/study of 142

Jiang Baili's military thought 127

Jiang Jieshi's military thought 128

joint campaign/study of 210

joint operations command theory/
study of 249

L

law of naval war/study of the 353

law of war/study of the 351

Lenin's military theory/study of 11

Li Xiannian's military thought 56

Liu Bocheng's military thought 43

local war/study of 172

Luo Ronghuan's military thought 48

Luo Ruiqing's military thought 68

M

Malvinas Islands War/study of the 570

Mao Zedong Military Thought 19

Marx's military theory/study of 1

military academic publications 357

military academ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358

military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study of 343

military aeronautical meteorology/
study of 605

military art/study of 150

military artificial weather modification/
study of 603

military atmospheric sounding/
study of 599

military barracks service/study of 424

military cartography/study of 596

military chemical defense/research of 491

military cognitive theory/study of 77

military college and school education/
study of 307

military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research of 497

military electronic computer/
research of 494

military electronic technology/
research of 492

military energy source/research of 509

military equipment maintenance/
study of 428

military finance/study of 408

military geodesy/study of 595

military geodesy and cartography/
study of 592

military geography/study of 577

military geography of China's border areas/
study of 588

military geography of China's peripheral
countries/study of 589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study of the 530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s
Volunteers/study of the 550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Eighth Route Army/
study of the 534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New Fourth Army/
study of the 535

military judicature/study of 345

military legal system theory/study of 339

military legislation/study of 341

military logistic command/study of 407

military logistic history/study of 401

military logistic laws/study of 400

military logistic management/study of 398

military logistic structure/study of 397

military logistics/study of 386

military logistics research institutions 429

military management/study of 295

military materials service/study of 418

military medical science/study of 416

military meteorological information
engineering/study of 604

military meteorology/study of 597

military metrology/research of 450

military model and simulation/study of 269

military optical and optoelectronic
technology/research of 504

military philosophy/study of 71
military POL service/study of 420
military psychology/study of 383
military radar technology/research of 502
military reconnaissance/study of 260
military space technology/research of 506
military standardization/research of 448
military systems engineering/
 research of 510
military talent science/study of 384
Military Terms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610
military thinking/study of 80
military thought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study of 106
military though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study of 118
military topography/study of 591
military traffic/study of 426
missile technology/research of 454

N

National Defense and Military Affairs/
 Contemporary China 609
national defense economics/study of 329
national defense expenses/study of 410
national defen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of 430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study of 194
national defense structure/study of 283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of the
 CPLA 614
naval campaign/study of 219
naval campaign training/study of 313
naval geography/study of 583
naval logistics/study of 393
naval military system/study of 288
naval operations command theory/
 study of 251
naval strategy/study of 178

naval tactical training/study of 324
naval tactics/study of 239
naval technology/research of 461
NBC defense technology/research of 488
network analysis/study of 271
Nie Rongzhen's military thought 50
nuclear strategy/study of 191
nuclear war/study of 168
nuclear weapon/research of 452

O

offensive campaign/study of 212
offensive tactics/study of 234
operations command theory/study of 247
operations command theory of strategic
 missile forces/study of 254
operations research theory of weapon
 firing/study of 269
optimization of military decision making/
 study of 268
ordnance service/study of 422
overall planning method/study of 274

P

Peng Dehuai's military thought 42
political work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study of 359
propellant/research of 474

Q

quantification of factors influencing military
 problems/study of 267
quartermaster service/study of 412

R

radar meteorology/study of 602

S

satellite meteorology/study of 601

science of air force campaign/study of 221
science of campaigns/study of 203
science of military command/study of 245
science of military intelligence/
study of 259
science of military intelligence production/
study of 262
science of military law/study of 335
science of military operations research/
study of 263
science of military system/study of 275
science of military training/study of 304
science of strategic missile forces campaign/
study of 224
science of strategy/study of 157
science of tactics/study of 227
small arms/research of 481
Soviet military thought/study of 139
special operations/study of 207
Stalin's military theory/study of 14
strategic geography/study of 579
strategic logistics/study of 389
strategic missile forces campaign/
study of 225
strategic missile forces logistics/
study of 396
strategy/study of 176
Su Yu's military thought 57
Sun Yat-sen's military thought 126
Sunzi/study of 100

T

tactical geography/study of 582
tactical logistics/study of 392
tactical training of strategic missile forces/
study of 327
tactical training/study of 319
tactics/study of 230
tactics of strategic missile forces/
study of 242

Tan Zheng's military thought 63
theater military geography/study of 586

U

unit training/study of 309
United States military thought/
study of 147

W

Wang Shusheng's military thought 69
war/study of 161
war mobilization/study of 300
wartime political work/study of 378
weather forecasting theory and technique/
study of 600
world military geography/study of 587
world war history/study of the 557
writings on campaign study 226
writings on military command theory 257
writings on strategy study 202
writings on tactics study 244

X

Xiao Jinguang's military thought 65
Xu Guangda's military thought 70
Xu Haidong's military thought 59
Xu Xiangqian's military thought 49

Y

Yang Jie's military thought 129
Yang Shangkun's military thought 55
Ye Jianying's military thought 52
Ye Ting's military thought 53
Yuan Shikai's military thought 125

Z

Zhang Yunyi's military thought 66
Zhou Enlai's military thought 38
Zhu De's military thought 40